

目录

[譯者的話 2](#_Toc58922340)

[總編輯序 4](#_Toc58922341)

[第15卷序 5](#_Toc58922342)

[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亂中的中國，1966—1969年 6](#_Toc58922343)

[第一章 1949—1976年的毛澤東思想 6](#_Toc58922344)

[從人民民主到人民內部矛盾 7](#_Toc58922345)

[毛對“中國式道路”的尋求 22](#_Toc58922346)

[中蘇分裂的原因與后果 32](#_Toc58922347)

[“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 45](#_Toc58922348)

[結論 對毛的思想遺產的探索 54](#_Toc58922349)

[第二章 中國陷入危機 71](#_Toc58922350)

[走向對抗 73](#_Toc58922351)

[權威的垮臺 87](#_Toc58922352)

[奪權 94](#_Toc58922353)

[政治體制的重建 109](#_Toc58922354)

[結論 114](#_Toc58922355)

[第三章 中蘇對抗：中國北部邊疆地區的戰爭與外交 131](#_Toc58922356)

[“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 132](#_Toc58922357)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137](#_Toc58922358)

[中國外交政策的低谷，1967—1968年 146](#_Toc58922359)

[1969年的中蘇邊界沖突 149](#_Toc58922360)

[1969—1975年的中蘇邊界談判 159](#_Toc58922361)

[附錄 中國和蘇聯的軍事集結，1969—1975年 167](#_Toc5892236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為繼承權而斗爭，1969—1982年 190](#_Toc58922363)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問題和毛主義的終結 190](#_Toc58922364)

[引言 190](#_Toc58922365)

[中國政治的軍事化 190](#_Toc58922366)

[林彪的覆滅 195](#_Toc58922367)

[“四人幫”的興衰 207](#_Toc58922368)

[空位期 225](#_Toc58922369)

[鄧小平的綱領 234](#_Toc58922370)

[政治進程與中國的外交政策 261](#_Toc58922371)

[通往北京之路，1968—1972年 263](#_Toc58922372)

[停滯與動亂，1973—1976年 272](#_Toc58922373)

[通往正常化之路，1977—1979年 276](#_Toc58922374)

[樹立獨立自主的形象，1980—1982年 288](#_Toc58922375)

[中美關系的意義 291](#_Toc58922376)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291](#_Toc58922377)

[第六章 中國的經濟政策及其貫徹情況 291](#_Toc58922378)

[引言 291](#_Toc58922379)

[經濟混亂，1966—1969年 291](#_Toc58922380)

[工業發展戰略，1966—1976年 291](#_Toc58922381)

[工業戰略的變化，1977—1980年 291](#_Toc58922382)

[加速工業增長，1982—1987年 291](#_Toc58922383)

[農村發展戰略 291](#_Toc58922384)

[1979年以后農村政策的變化 291](#_Toc58922385)

[結論 291](#_Toc58922386)

[第七章 教育 291](#_Toc58922387)

[學校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291](#_Toc58922388)

[發動群眾 291](#_Toc58922389)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 291](#_Toc58922390)

[否定教育革命 291](#_Toc58922391)

[“中國模式”在第三世界的前景 291](#_Toc58922392)

[第八章 文藝創作與政治 291](#_Toc58922393)

[“文化大革命”的發端：作家遭受思想攻擊，文化機構陷入混亂 291](#_Toc58922394)

[文學體系的變化 291](#_Toc58922395)

[現代革命題材的京劇樣板戲 291](#_Toc58922396)

[1976年和“傷痕文學”的產生 291](#_Toc58922397)

[第四篇 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生活和文學 291](#_Toc58922398)

[第九章 共產主義統治下的農村 291](#_Toc58922399)

[建立一個新的經濟和政治制度，1949—1955年 291](#_Toc58922400)

[社會改造，1955—1963年 291](#_Toc58922401)

[塑造“社會主義新人”，1963—1976年 291](#_Toc58922402)

[復舊，1977年以后 291](#_Toc58922403)

[結論 291](#_Toc58922404)

[第十章 人民共和國的城市生活 291](#_Toc58922405)

[早期年代，1949—1956年 291](#_Toc58922406)

[中期年代，1957—1965年 291](#_Toc58922407)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 291](#_Toc58922408)

[毛澤東以后的中國，1977年及1977年以后 291](#_Toc58922409)

[結論 291](#_Toc58922410)

[第十一章 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文學 291](#_Toc58922411)

[社會主義文學的建立，1949—1956年 291](#_Toc58922412)

[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56—1965年 291](#_Toc58922413)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臺灣的新作家，1966—1976年 291](#_Toc58922414)

[毛以后的時代 291](#_Toc58922415)

[附言 291](#_Toc58922416)

[第五篇 分離的省份 291](#_Toc58922417)

[第十二章 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1949—1982年 291](#_Toc58922418)

[鞏固基業，1949—1959年 291](#_Toc58922419)

[經濟起飛，1960—1970年 291](#_Toc58922420)

[新的挑戰，1971—1978年 291](#_Toc58922421)

[美中關系正常化以后的臺灣 291](#_Toc58922422)

[后記 統一的重任 291](#_Toc58922423)

[附錄 會議與領導人 291](#_Toc58922424)

[參考文獻介紹 291](#_Toc58922425)

[第一章 1949—1976年的毛澤東思想 291](#_Toc58922426)

[第二章 中國陷入危機 291](#_Toc58922427)

[第三章 中蘇對抗：中國北部邊疆地區的戰爭與外交 291](#_Toc58922428)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問題和毛主義的終結 291](#_Toc58922429)

[第五章 對美開放 291](#_Toc58922430)

[第六章 中國的經濟政策及其貫徹情況 291](#_Toc58922431)

[第七章 教育 291](#_Toc58922432)

[第八章 文藝創作與政治 291](#_Toc58922433)

[第九章 共產主義統治下的農村 291](#_Toc58922434)

[第十章 人民共和國的城市生活 291](#_Toc58922435)

[第十一章 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文學 291](#_Toc58922436)

[第十二章 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1949—1982年 291](#_Toc58922437)

[參考書目 291](#_Toc58922438)

[重印后記 291](#_Toc58922439)

# 譯者的話

《劍橋中國史》是劍橋多種歷史叢書中的一種，各卷由研究中國相應歷史時期的專家學者編輯，卷內各章由各課題的專家撰寫，包括世界各國的中國史研究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國史研究的水平和動向，在國際學術界有較大影響。

《劍橋中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是《劍橋中國史》第15卷的中譯本，全面系統地敘述了1966—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新歷史進程，其重點是對“毛澤東對中國式道路的尋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與毛澤東思想發展的關系及由此產生的深遠影響，進行了深入、謹慎、求實的研究。后毛澤東時代，繼承人鄧小平對中國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及中國經濟的巨大變化，是本書的又一論述重點。同時，本書對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對外關系、教育、文藝及知識分子等，也分別予以充分的研究和考察，并作出相應的評價。本書最后部分對臺灣省也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敘述和評析。本卷撰寫人皆為研究這一時期中國問題的國外專家，他們向讀者展示了所有這些方面的相互關系，為關心中國“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的一切讀者提供了一部彌足珍貴的參考書。

翻譯出版《劍橋中國史》是為了給我國學術界提供參考、以資借鑒。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具備“為錯”、“攻玉”條件的他山之石，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對我們是有益的。就本卷而言，我們認為各章作者的態度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對許多問題的敘述和分析較接近客觀。另一方面，由于東西方文化觀念上的巨大差異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尖銳對立，本卷作者們的某些觀點和結論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在這里，我們特此申明。特別是其中的某些作者，將中國的臺灣作為“中華民國”看待，是我們不能同意的。不過，考慮到翻譯著作的特點及全部15卷的《劍橋中國史》之學術性質，本卷的翻譯仍本著忠實于原著的態度，作者的觀點、對材料的取舍以及術語的使用等敬請讀者自行鑒別。書中引用的中文材料，尤其是一手材料，我們盡可能查對原文；少數引文未能查到，從英文回譯，并將引號刪除，尚祈讀者見諒。此外，對于原文中的錯誤、不明確之處，我們盡力作了糾正和補充。

本書是集體勞動的結晶。參加本書翻譯的有（按所譯章節先后為序）：俞金堯、時和興、鄢盛明、王云周、徐再榮、胡北海、劉峰、包茂宏、鄭文鑫、齊霽、韓立民、孟慶龍、李慶紅、趙成根、胡葉平、張宙星、鮑靜、熊進、王明毅、蘇征宇、張薇、張軍、李光祥、周駿、張勇、姜江華、李涼、張濤、田淑芳、秦立德、張丹、戴清、邵燕君、周閱、史成芳、匡紘遠、袁克修、王丹妮、張曉華、明立志、王東海、冀飛、李耀星、孫學敏、溫瑞茂、亦文和日天。本書大部分章節由李殿昌校訂，俞金堯、孟慶龍、匡紘遠、陳福生、郝名瑋、鄭文鑫、徐再榮、日天校訂了部分章節（第一章、第二章部分、第三章、第四章部分、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部分、第十一章部分）。全書由孟慶龍負責統稿工作，浦鞍平通看了全稿，出版社有關領導及歷史編輯室的同志們詳細審閱了全書，并對原文中的不少錯誤和不當之處進行了糾正和補充。在翻譯過程中，徐景慧、畢建康、王眉、劉興成、高珊、向有等做了大量的核查引文和文字工作。

為了使本書早日與廣大讀者見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領導給予了大力支持；歷史編輯室和負責出版發行的同志也多方協助。

由于我們水平有限，譯文錯誤及不妥之處懇請讀者指正。

1992年6月20日

# 總編輯序

由于現代世界相互聯系日益緊密，從歷史上認識世界就愈發變得必要，歷史學家的任務也就更為復雜了。事實和理論互為影響，資料激增，認識也在提高。僅僅總結已知的事件就令人生畏，然而，對于歷史的思考來說，認識的事實基礎越來越必不可少。

自20世紀初起，劍橋歷史叢書已經在英語世界中為多卷本史學著作樹立了一個樣板，叢書的各章都是在各卷主編的主導之下由有關專家撰寫而成。由阿克頓勛爵規劃的16卷本《劍橋近代史》于1902—1912年間問世。隨后又陸續出版了《劍橋古代史》、《劍橋中世紀史》、《劍橋英國文學史》以及關于印度、波蘭和英帝國的劍橋史。原來的《近代史》現在已為12卷本的《新編劍橋近代史》所替代，而《劍橋歐洲經濟史》現在也接近完成。其他的劍橋史學著作有伊斯蘭史、阿拉伯文學史、伊朗史、猶太人史、非洲史、日本史以及拉丁美洲史。

就中國而言，西方史學家面臨著一個特殊的問題，中華文明史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文明史都來得廣泛而復雜，它只是比作為整體的歐洲文明史略少頭緒而已。中國的歷史記載浩如煙海，詳盡而廣泛。很多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學一直是高度發達和成熟的。但是，直到20世紀中葉之前，盡管歐洲的漢學家們有過重要的、開拓性的辛勤耕耘，西方對中國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績幾乎限于翻譯少量古典著作，以及編寫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綱。

近來，西方學者更為充分地利用了中國，還有日本的豐富的史學傳統，大大地增進了我們對過去的事件和制度的明細認識，以及對傳統歷史編纂法批判性的理解。此外，現在這一代的西方中國史學家在繼續依靠迅速發展著的歐洲、日本和中國的漢學研究扎實基礎的同時，還能利用現代西方歷史學的新觀點、新技術以及社會科學的近期發展成果。近期的歷史事件在對很多舊觀念提出疑問的同時，也使一些新問題突出起來。在這眾多方面的影響之下，西方在中國學研究方面的革命性變革的勢頭正在不斷增強。

1966年，在開始規劃《劍橋中國史》時，其目的是為西方的歷史讀者提供一部內容豐富的、基礎性的中國史著作：即按當時的認識寫一部6卷本的著作。自那時以來，當代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新方法的應用，學術向新領域的擴展，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史的研究。現在，《劍橋中國史》已擴充為15卷，而且還必須舍棄諸如藝術史、文學史等專題史，經濟學和工藝學的很多方面內容，以及地方史的所有寶貴資料。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史研究的長足進步。

近幾十年來，我們對中國過去的認識所取得的驚人的進展今后將會繼續，并會加快。西方史學家對這一巨大而復雜的課題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的，因為他們所在國家的人民需要對中國有更廣更深的了解。中國的歷史屬于全世界，這不僅是因為它有此權利和必要，還因為它是激發人們興趣的一門學科。

費正清

丹尼斯·特威切特

# 第15卷序

第14卷《劍橋中國史》闡述了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為止的中國共產黨改造社會的歷史。那個時候，這個國家似乎已從“大躍進”的災難中恢復了元氣，當局正在著手實施其耽擱了的第三個“五年計劃”。盡管中國在此前與蘇聯分道揚鑣，但它看起來還只是一個變異的斯大林模式的國家。實際上，包括最高領導層在內的所有中國人，以及全部外國觀察家都沒有意識到，毛澤東即將發動一場運動，以改變那種形象，這是一場除了犧牲生命以外，在各個方面都將比以往所經歷過的任何運動破壞更為嚴重的運動。

“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在第14卷中作了分析。在第15卷里，我們力圖追溯一連串事件的進程，而大多數中國人對這些事情至今仍知之不多。我們從分析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后毛的思想的發展入手，致力于理解他發動這一運動的原因。對于“文化大革命”，當時人們有頌揚之詞，以后回顧時往往又有完全相反的說法。我們就竭盡全力來解答這兩種相互對立觀點的證據。

我們接著考察毛的革命在他1976年逝世后又如何為一個新的革命所繼續。毛為了在精神上改造中國作了最后的努力，并孤注一擲，而他的繼承者鄧小平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道路。他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努力從經濟上改造這個國家。“文化大革命”遠沒有使中國人變得更為革命，其結果，似乎是使他們為拋棄卡爾·馬克思的原則、支持亞當·斯密的理論準備了條件。本卷的大多數撰稿人都對這一新道路在80年代早期的情況作了分析。那時候，鄧的實驗正取得初步的重大成就。

關于政治、經濟、外交、教育及知識分子各章的順序，我們仍遵循第14卷的編排。但除此而外，另有兩章我們把視線從北京的決策者那里轉落到中國的民眾上，看看這場革命對他們意味著什么。我們還越過臺灣海峽，把目光落向這個海島省份。該省利用其與連續不斷動蕩的大陸相隔絕的狀態，用一種不同的方法改變了自身。

本卷是涉及19世紀和20世紀的第6卷，也是最后一卷，至少對這一版本的《劍橋中國史》來說是這樣。與以前一樣，我們的注腳表明我們從別人那里獲益匪淺。我們也樂于指出，由于在過去10年里北京堅持開放政策的結果，我們引用中國學者的文句已大大增加。

……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

費正清

# 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亂中的中國，1966—1969年

## 第一章 1949—1976年的毛澤東思想

像列寧一樣，毛澤東奪取政權后，又繼續發展他以前在野時形成的思想。情況不同了，他對自己以前所采取的立場進行修改、補充，闡述得更詳細。在許多方面，他的思想是連貫的，但其中也有驚人的斷裂與相悖之處。此外，毛也探索了他以前從未涉足過的新的領域。

毛澤東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他一貫從事的把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一個落后農業國家的社會經濟實際、與中國的歷史遺產相結合的事業。這份遺產在毛看來依然是那么實際。在奪取政權以前，這一工程的首要任務是為農民提供一個比十月革命模式所顯示的政治作用更大的理論依據，尤其是為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提供證明。在這方面，也許有人認為，可能1949年毛澤東本人就是這么想的：中國的理論與實踐和蘇聯的理論與實踐更接近了。在農村和城市取得政權之后，中國共產黨能有力地發展現代工業，進而創造一個自己設想的“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的階級基礎，在共產黨統治下開辟一條趕上先進國家的道路。

在人民共和國的最初幾年間，這種趨勢似乎就要出現了，但很快發生了逆轉，而且在1949年建國10年之后，中蘇關系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疏遠了。《劍橋中國史》第14卷記載了這段歷史，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當然，我們感興趣的是毛澤東及其思想在這些方向性變化中所起的作用，這里我們要論證的是，部分原因在于農民在中國社會依舊所起的作用，部分原因則是農民意識對于毛本人的影響。然而，這并不是全部的答案。從斗爭精神與犧牲精神方面而言，從經濟工作中的分散經營與自力更生方法而言，延安模式的影響也必須給予重視。另外，還有一個顯然很重要但難以估價的因素，就是前文已經提到的毛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雖然他在1938年就已經提出并實施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但到了50年代初就不再提起了，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不能容忍在國際共運中，除他之外，還有其他的理論權威存在。斯大林的這種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毛澤東的想法的。

毛確信，中國文化是一項偉大的、也許是一項獨一無二的歷史成就。這種成就加強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他目標十分明確，就是要用淵源于民族傳統的思想和價值去豐富馬克思主義，并使它成為革命轉變、并最終西方化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不是用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新傳統主義去取代它。然而，我們越來越難以確定“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結構究竟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尤其是對其晚年的思想，就更難判斷了。

他的有關矛盾的理論更是如此。人們自然可以問，在毛最后的15年里，他是否仍像過去那樣對這種理論問題感興趣呢，或者只是全力以赴地為實現他自己確定的革命目標而奮斗呢？毛的思想中另一個模糊的地方，是他非常重視“主觀能動性”與上層建筑的作用，這一點在他的整個革命生涯中始終如一。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種普羅米修斯式的推動力，這在現代中國以前的文化中并不突出，在歐洲文明中也不顯著。絕不能把它看作毛的思想中的一個傳統成分。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統治者品德的優劣可以看作是人民幸福的首要保證，認為道德教化是社會控制的關鍵手段，這可以在帝王統治時期的中國找到十分相似的例子。

當然，在毛澤東的最后歲月里，他被明確地比作秦始皇，是偉大的革命先驅和運用革命暴力的大師。然而，與此同時，作為延安遺產的真諦的組成部分（盡管常常被誤解），群眾參與和依靠群眾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廣泛宣傳。

無產階級政黨與農民擁護者，現代化進程與革命戰爭精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宿命論與主觀能動性，道德救世與技術救世，獨裁專制與人民民主——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毛1949—1976年間反復思考的矛盾問題中的一部分。

毛澤東在處理這些或那些問題的過程中，留下了許多復雜的著作。在對此進行討論的過程中，我們采取了部分按專題、部分按年月順序討論的方法。就許多重要方面而言，1957年下半年是毛一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時期，其標志是他的觀點與個性都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一直伴隨著他最后的19年。因此，關于毛澤東思想許多方面的論述都將被分為1957年以前和1957年以后兩個相等的部分。但是，我們不會生搬硬套這一模式，毛晚年的一些極為重要的思想實際上是在1957年以后才形成的。

## 從人民民主到人民內部矛盾

#### 統治方式

確切地說，第一個主題是關于這樣一個問題，即毛的思想在1957年似乎并沒有決定性變化，而從井岡山到延安，從延安到20世紀60年代卻有很大的連續性。整個這段時期，堅持政治精英的堅強領導，是他思想的顯著標志。

實際上，這個特征是“群眾路線”本身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它常常被浪漫化和感情化，用以象征允許人民自我解放，并自發地管理他們自己。事實上，當毛澤東把政府的作用看作是教育作用的一部分時，他并不具有斯帕克的思想，即讓“學生” 自己完全自由地決定他們該學什么。相反，要正確理解“群眾路線”，就必須看到，它不是列寧“民主集中制”的否定，或與其相反的東西，它與“民主集中制”是互補的。“群眾路線”所強調的只是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當中的一個特殊的方面。[[1]](#_1_You_Guan_Mao_Si_Xiang_Yu_Xing)

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群眾路線”這個思想確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理論與領導方法上的一個真實而重要的方面，這種理論和方法是以黨的經驗為基礎的。在江西時期，就已開始非常重視與群眾的密切聯系，其顯而易見的原因在于，假如沒有這樣的聯系，脆弱的根據地就難以生存。[[2]](#_2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uo_Sh)“群眾路線”這一術語并不是由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它的提出明顯歸功于周恩來和陳毅。[[3]](#_3_Li_Jian_Ding_Wei_Zhi___Shi_Zh)然而，這一思想在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有特殊的表達，它是毛的思想的核心，而且是毛給了這一概念明確、系統的表達。1943年在延安，中國共產黨首次系統總結并表達了自己的經驗。毛的經典定義就是在當時提出來的。請看下面一段：

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4]](#_4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g)

正像畫著重號部分所明確表示的，雖然群眾受到革命運動領袖們的信任，但他們最終還是要去領會和掌握別人的思想。他們自己對于構筑一個系統化的理論體系是難有作為的。這一點與列寧的思想有明顯的相似之處，所以毛大約在提出“群眾路線”的同時，也以其列寧式的嚴厲態度再次強調必須接受由革命精英們集中指導的原則。“一部分同志”，他在1942年2月1日的講話中抱怨說：

他們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5]](#_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g)

毛極力主張下面要發揮主動和積極參與，上面要堅定地進行集中領導。他所界定的范圍很廣，中間的側重點有不斷變化的余地。從延安時期開始，毛澤東的側重點是不斷變化的。然而，至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為止，他一直認為集中領導歸根結底比民主更為重要。

不過，雖然毛絕不是一個列寧斥之為“尾巴主義”的那種人（更準確的翻譯是“屁股主義”），也就是說，跟在群眾后頭跑而不是去領導他們的那種人，但是，他比列寧（不用說斯大林）更注意去傾聽并考慮人民的意見，至少直到60年代一直是這樣。然而，“群眾路線”的另一個方面必須注意到。有待解決的不光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問題，而且是黨員及黨的支持者的性質，特別是他們的社會成分。

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的觀點，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即使列寧擴大了運動的社會基礎，給農民以相當的地位。然而，從1927年開始，毛在繼續談論無產階級的主導地位的同時，又從更廣泛的社會階層中吸收了新的成分：農村流氓無產者、店主、職員、低級公務員以及知識分子等等諸如此類，甚至還包括“民族資本家”、“愛國紳士”和其他一些人。這些階層中的大多數相對說來都享有較少的社會特權，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屬于“人民”而不屬于“特權階層”。雖然情況都一樣，在蘇聯，“群眾”（或“勞苦大眾”）其實基本上是工人階級加上農民當中可靠成分的同義語，它用來替代階級這個更為精確的標簽，以強調追隨者的初期特點，因而他們需要領導。對于毛來說，“群眾”表示絕大多數中國人民，這些人最終都能推動革命。[[6]](#_6_Guan_Yu_Cong_Ling_Yi_Ge_Jiao)

在毛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中，各不同階級到底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將在后面進行探討。然而，他必須面對的“群眾”異質性這一簡單事實，對他所努力創造的政治秩序中領導的本質與功能不無影響。

當毛在1944—1945年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提出與國民黨成立“聯合政府”的設想最終化為泡影，并為內戰的硝煙取代之后，就再也沒有任何理由繼續維持關于黨的直接政治目標的極其模糊的提法了。因此，1949年6月30日，在毛澤東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所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他詳述了準備在三個月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確切本質。

實際上，早在1939年5月，毛就已經介紹過“人民民主”的概念。在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的講話中，他說“在目前的階段上，不是實行社會主義，而是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改變中國[現在的]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7]](#_7_Zhu_Nei_Shi_Bian___Mao_Ze_Don)到了1949年，毛指出新人民民主政權的特征時，提出了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使用過的“國體”與“政體”的區別。[[8]](#_8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g)因為毛澤東及其他一些作者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看待這一問題，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他們主要是從階級意義上去界定國體就不足為奇了。因此，在1952年首次出版的一本供基層干部政治學習用的參考書中，作者說了下面一段話：

國體是國家的階級性質。國體問題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支配問題，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世界上各種國家的國體可分為三種類型：（1）資本主義的國體，實行反動的資產階級專政；（2）社會主義的國體，實行工人階級專政；（3）新民主主義國體，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9]](#_9_Chen_Bei_Ou_Bian____Ren_Min_X)

這是毛在1939—1940年間就已作出的劃分。1949年建立的國家之所以叫人民專政，而不叫無產階級專政，是因為它被看作是一種混合形式，以適合于當時從戰后恢復到建設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環境。雖然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來說，在一個資本主義已經取得發展的社會中，權力要么只由無產階級來掌握，要么由資產階級來掌握，而不能由任何中間階級或階級聯合體掌握。但是，列寧在1905年就提出“工農革命民主專政（revolutionary—democratic dictatorship of the workers and the peasants）”的方案，用來表示在建立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之前政治制度的特征，在這種政治制度下，俄國可以推行某些改革。毛的“人民民主專政”直接承繼了列寧主義的概念。在二三十年代，列寧的概念曾被共產國際應用于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10]](#_10_Mao_Guan_Yu_Ge_Jie_Ji_Zai_Zh)

1949年，毛澤東將中國的統治權描述為一個同心圓，也可以比作一個原子或蔥頭。其核心由工人階級所組成，他們將通過據說能代表其利益的政黨來進行統治。圍繞核心的是農民，據說他們構成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接著是小資產階級，他們是主要的追隨者。至于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具有二重性。他們是愛國者，但同時也是剝削者。所以，他們躊躇于“人民”的邊緣，永遠存在著滑入“非人民”的陣營、敵視革命的危險。

這四個階級（當然，這相當于斯大林20年代的“四個階級集團”）行使“人民民主專政”。既然“國體”不僅包括國家的階級本質，而且也包括統治（專政）的方式，那么，剩下“政體”所能涵蓋的意義是什么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11]](#_11_Can_Jian___Ren_Min_Da_Xian_Z)大多數關于政體的定義都是引用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說法，在這里毛寫道：

至于還有所謂“政體”[[12]](#_12_Zai_Chu_Ban_Zhong__Ci_Ci_Wei)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 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中國現在可以采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并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于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于表現民意……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

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13]](#_13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

當然，這段話是毛澤東在1940年寫成的。當時他仍然在與國民黨結成的統一戰線內進行活動，而且在當時，中國共產黨處于比較弱的地位，到了1949年，他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思想強調的是對“反動”階級實行專政的需要，而不再強調在普選基礎上的直接選舉，而這正是真正民主的關鍵。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的命題作為新國家基本的組織原則，繼續原封不動地存在下去。

毛澤東堅持諸如民主集中制等列寧主義的關鍵口號，以此來顯示他對蘇聯榜樣的忠誠。但是，在1949年6月30日的文章（指“論人民民主專政”——譯者）中，他同時也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概念和術語。例如他使用了舊式的詞語“獨裁”作為“專政”的同義詞。固然，在過去，當馬克思主義的表達方式在漢語里還沒有完全規范一致的表達時，作為對“專政”的翻譯，這種混合使用曾不時出現。然而，毛澤東不會不意識到“獨裁”這種翻譯方式對其讀者產生的傳統聯想，就像他不會沒有意識到中國古代術語“大同”的含義一樣。“大同”一詞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被康有為改寫。毛澤東則將它當作“共產主義”的同義詞。

1953年，以毛為首的一個委員會開始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時有人作了一首八行押韻詩，歸納了這一政治制度的正確功能：

大權獨攬，

小權分散；

黨委決定，

各方去辦；

辦也有訣，

不離原則；

工作檢查，

黨委有責。[[14]](#_14___Gong_Zuo_Fang_Fa_Liu_Shi_T)

換句話說，應該有公民和下級干部的參與，但必須牢牢保持在集中控制之下。

1956年4月25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以《論十大關系》為題所作的講話，無疑是他1949年以后所發表的六個最主要講話之一，是他有關管理哲學的兩三項最富權威的論述之一。以我之見，即使毛在報告中所闡述的經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起草者的報告中引申出來的，他這篇講話的重要性、權威性是不容置疑的。這點下文還要談到。

對講話第五部分關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理解，必須放在全文中。從全文看來，他最重要的主張是，任何政策目標的片面和教條地追求都屬自我拆臺。因此，如果你真的想發展重工業的話，你就不能忽視輕工業和農業；而要在內地建設新的工業中心，你就應該合理利用沿海地區現有的工業。對于我們這里所要關心的問題，毛以類似辯證法的推理方式說：

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目前的情況看，我認為需要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眼下地方的權力太有限，這不利于我們建設社會主義。[[15]](#_15_Zhe_Li_De_Yin_Wen_Lai_Zi_196)

歸根結底，毛繼續強調的是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內聚力與效率的極端重要性，而且重視在規定范圍內的分散和基層的積極性。在總結《論十大關系》第五部分的內容時，他聲明：

必須有充分的積極性和充分的獨立性……自然，我們在同時也必須告訴下面的同志不能亂來，必須謹慎從事。能夠統一的，他們應當統一……不能統一的……也不應強求統一。兩個積極性總比只有一個要好得多……簡言之，地方應當有相當程度的權力。這有利于我們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6]](#_16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_Ton)

我所引用的是非官方文本，官方的版本中對集權的強調更加強烈。關于這一點，新的文本增加了這樣的話：“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17]](#_17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

在毛逝世三個月之后，《論十大關系》的官方文本出版。雖然此時不同版本強調內容的不同已非常清楚，但因當時缺乏有關資料來源以及對于這一關鍵版本編輯過程的信息，我們不可能評價版本之間的差別有什么意義。的確，一些觀察家認為當時加上的新的段落是偽造的。隨后出版的信息使我們得以澄清這些問題。

這篇講話詳細談及我們所關心的統治方式，它是第一次試圖確定經濟發展的全局性戰略。1956年2月至3月的一個半月間，毛澤東在一些黨和政府領導人的陪同下，聽取了一大批經濟部門的匯報，并形成了一些結論。1956年4月25日，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總結了他對這些結論的理解；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召開前，他修改了他的講話，重申了他講話的實質內容。官方的版本是那兩次講話結合而成的。[[18]](#_18_4Yue_25Ri_Jiang_Hua_Zai_Dang)

盡管毛一直強調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但他在1956年最為關切的是擴大地方的權威，因為他當時考慮的是現存的集權程度已經達到自我拆臺的地步。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有另外一個講話，他說：“下級與上級的關系就像是老鼠見了貓一樣。好像魂都嚇跑了，許多事情不敢說。”[[19]](#_19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_S)

但是，有效的中央集權怎樣與“適當”的地方權力相結合呢？以毛的觀點看，這個問題與縱向的雙重領導有不解之緣（見《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2章）。這在《論十大關系》第五部分中明確提了出來：

現在幾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辦。……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員會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廳局聯成一線，天天給廳局下命令。這些命令雖然黨中央不知道、國務院不知道，但都說是中央來的，給地方壓力很大。……這種情況，必須糾正。……我們希望中央各部要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關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門可以分成兩類。有一類，它們的領導可以一直管到企業，它們設在地方的管理機構和企業由地方進行監督；有一類，它們的任務是提出指導方針，制訂工業規劃，事情要靠地方辦，要由地方去處理。[[20]](#_20_Zhe_Yi_Wen_Ben_Ji_Yu_Zhong_G)

上面引文中的最后一段，是關于1956—1957年所采取的政策，即在中央各部僅僅保留對大型或重要企業，特別是重工業領域的企業的直接控制。而把其他的工商業企業交給地方去搞（見《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3章）。這種結果所形成的復雜模式一直是許多研究者研究的對象。20年以前，弗朗茲·舒爾曼對他所謂“分權模式Ⅰ”和“分權模式Ⅱ”所作的劃分至今仍不失其價值。“分權模式Ⅰ”指將決策權轉給生產經營單位自己掌握，而“分權模式Ⅱ”意味著將權力下放給某些下級或地方行政機構。他把陳云看成是第一種模式的倡導者，這種模式將把中國引向南斯拉夫式的經濟道路。毛澤東和劉少奇則是第二種模式的支持者。然而，他發現，陳云的集權方法是分權模式Ⅰ和分權模式Ⅱ的“矛盾”組合。[[21]](#_21_Fu_Lang_Zi__Shu_Er_Man____Go)

哈里·哈丁用六重標準來研究這一問題，同樣得出結論說，1957年秋季八屆三中全會所采納的政策（實際上是由陳云起草的）是一個“折衷主義”方案，是集權與分權的結合。[[22]](#_22_Ha_Li__Ha_Ding____Zu_Zhi_Zho)事實上，這樣一個矛盾的或“折衷”的方案反映了當時領導層中每一個人的特點，所不同的只是他們強調的重點不一。舒爾曼又進一步說，在“大躍進”年代，這項在“真正的對立統一體”中結合集權與民主的政策，是由“一般政策推動的集中和特定政策推動的分散”所組成。[[23]](#_23_Shu_Er_Man____Gong_Chan_Dang)明確地說，他這里稱作“一般政策推動”基本上是指毛在1953年順口溜中的“大權”；“特定政策推動”（或產生這種推動力的權利）相當于“小權”。

1958年1月31日，毛澤東修訂了《工作方法六十條》，這一指示實際上為“大躍進”制訂了藍圖。在這個指示的第28條，第一次摘錄了1953年的那首順口溜，然后做了如下解釋：

“大權獨攬”是一句成語，習慣上往往指的是個人獨斷。我們借用這句話，指的卻是主要權力應當集中于中央和地方黨委的集體，用以反對分散主義。難道大權可以分攬嗎？……所謂“各方去辦”，不是說由黨員徑直去辦，而是一定要經過黨員在國家機關中、在企業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團體中、在文化教育機關中，同非黨員接觸、商量、研究，對不妥當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過，方才去辦。[[24]](#_24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_S)

我們將會看到，這段文字既是為了處理上下級關系，也是為了強調黨的協調作用。毛有意強調“大權獨攬”這個家喻戶曉的格言與“獨斷”一詞之間的相似性。按他的說法，獨斷通常表示個人的專斷或獨裁決策。這再次表明，他沒有在強調需要強有力的集權統治方面退縮——或者說他在實踐中努力貫徹這種思想。

那么，這種集權怎樣與基層真正的、意義重大的“小權”（雖然是下級權力）結合呢？主要是通過黨的協調作用來實現的，主要的內容毛在1953年順口溜的評論中已經提到。雖然他在這里沒有使用“一元化”的字眼，但他在這里所強調的東西是他的思想核心。“一元化”意為“一體化”，“使之堅如磐石”、“使之成為一元論者”，這在延安時期他的統治哲學中已大部分成型。[[25]](#_25_Guan_Yu_Zhe_Yi_Gai_Nian_Yi_Y)在1956年4月的講話中，他回憶延安時期，為了對付根據地過于分散和地方鬧獨立的緊急情況，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關于加強“黨性”（從俄語partiinost翻譯而來）的決議，“實行了一元化”，他接著說，“但也保留了大量的自主權”。[[26]](#_26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_S)

1958年，毛對于1953年順口溜的評論中，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一長制已經名聲掃地。在人們所見到的最基本的組織原則中，他認為“集體領導與個人作用相結合”，等同于“黨委與第一書記相結合”。[[27]](#_27__1958Nian_1Yue_Zai_Nan_Ning)這可以看作是毛對延安時期所理解的一元論領導的重新肯定，是作為反對高崗對這一問題的觀點提出來的。對于高崗來說，一元化非常接近于“鐵板一塊”的意思，按他的觀點，鐵板一塊模式的組織暗含的是，諸如工廠之類的每一個實體都只能向外部某個權威負責，這個權威在實際中就意味著北京相應的部。作為與這一權威保持聯系的代表，工廠廠長在自己的工廠內部也就必須擁有無可爭辯的權威。按照毛的觀點，一元化領導不僅僅要在中央一級實行，而且也要在地方實行。甚至“小權”也不能沒有領導而亂來。毛的觀點在50年代末期是流行觀點。一元化的領導的代表只能是各級黨委。毛明確提出，無論在中央還是在地方，黨的控制首先是原則問題的決定，然后是督察這些原則的執行情況。

關于黨的領導地位的進一步討論，我們最好是放一放，在研究“大躍進”時期毛整個的政治和經濟戰略以后，再回過頭來討論。現在，要完成對于統治方式的討論，我們回憶一下他在1962年1月的講話就可以了。在那篇講話中，毛澤東在提出民主集中制必須“既在黨內又在黨外”貫徹之后，就像在延安時期那樣，他又一次強調說，集中甚至比民主更重要。他接著說，真正的集中只有在民主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這有兩個原因，一方面，如果不允許人民表達自己的意愿，他們就會“生氣”，就會灰心喪氣，因而也就不會自愿地和有效地參與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另一方面：

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便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好的路線、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來說，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如果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那就難避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28]](#_28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_T)

在這里，“民主集中制”一詞的使用，既包括有效的“集中統一”與來自下面的積極支持與首創精神相結合的兩難困境，又包括了“群眾路線”所提倡的上下意見交流的問題。毛關于這一系列問題的主要觀點清楚地反映在他的加工工廠的比喻當中。的確，如果沒有不斷的信息和建議反饋，這個工廠就生產不出任何有意義的東西，但歸根結底，正確的路線也只能由中央的大腦精心提煉出來。“加工工廠”一詞前面的反義副詞“僅僅”并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決策從這里產生。

廣義說來，這就是從延安時期到60年代早期毛關于民主與集中的觀點。與此同時，正像這一部分開頭所說的，雖然他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總的來說基本一致，但是也不可否認，他在1957—1958年間的側重點也有所變化。這一變化與毛在經濟問題和階級斗爭領域逐漸增長的激進主義密切相關，我們將在后面討論這個問題。然而，它對于我們這里所考慮的權力結構問題有著直接的影響。

我們已經看到，在毛澤東由他最終所追求的一個“強大社會主義國家”理想所局限的范圍內，他的確努力使人民積極參與國家事務，只是在實踐中政治選擇范圍卻很狹小。尤其是，毛很少考慮去建立一個結構與功能俱皆民主的政治機制，而不只是說說代表“人民”而已。

當然，這只是自1978年開始的中國對他的批評之一，我們在本章的結論部分將重新回到這個問題上。然而，重要的是要說明，從“大躍進”時期開始，毛澤東比過去更少關注制度的重要性。一言以蔽之，直到1956年或1957年，在從國家的階級特性意義上，而不是從政治功能意義上去界定民主時，他仍然認為國家結構是必須加以考慮的問題。

例如，1956年4月，毛在討論集權與分權問題時指出：

我們的憲法規定，立法權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違背中央方針的條件下，按照情況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條例、辦法，憲法并沒有約束。[[29]](#_29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

1957年2月27日，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毛強調說，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他還嘲笑西方議會民主和兩黨制這樣的民主思想和實踐。[[30]](#_30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他對中國自己的政治制度浮想聯翩、十分自豪，但是，他至少是注意到了它的存在。中國仍然存在的為數不多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在憲法里被作為專政對象，即使這樣，在討論到他們是否應該得到大赦的問題時，毛澤東用形象化的語言說道：“這是憲法已經規定了的。你是主席，你是不是要去看看憲法？”他對這一難題很有特點的回答是提出建議，雖然并非全部，但這種人的大多數都應該釋放，不過這個建議當然不能作為政策公開宣布。[[31]](#_31_Zhe_Duan_Hua_Yi_Cong_1957Nia)

到“大躍進”時期，毛確實已很少注意這些制度的完善了。但是，因為毛澤東思想的這種演變是在經濟與社會領域進行著的革命所引起的激進氣候的直接結果，在考察毛晚年對待政治權力的問題以前，讓我們轉入經濟與社會問題的討論。

#### 發展模式

在研究毛關于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思想時，我們有必要介紹性地強調一下，他對于現代化與工業化的態度一貫是積極的。近些年有一種傾向，認為毛是某種田園詩式的烏托邦信徒，是與我們所謂的先進工業社會不同的“穩定狀態”經濟的堅決支持者。實際上，在他主宰中華人民共和國命運的整個27年間，毛從未停止過提倡快速的經濟進步，而且是以數字形式來規定：多少噸鋼、多少噸糧食，諸如此類。

前些年，“現代化”一詞常被用來作為西方文化的自豪感的表現，因為似乎它表示加入了“現代”世界，亞、非各民族就必須走美國或歐洲人的道路。事實上，毛自己絲毫沒有這種考慮，而且從40年代到60年代，他一直用這些術語來確定中國的經濟目標。譬如，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所作的報告中，他就說，中國的農業必須有所進步，從其“古老的落后水平”提高到“現代化的水平”，以便為工業提供市場，“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32]](#_32___Mao_Ze_Dong_Ji____Di_9Juan)

以毛的觀點，工業是頭等重要的，因為它在保證中國富強方面發揮了和可能發揮巨大的作用。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醒人們注意，“我們還有帝國主義在旁邊，這個敵人是很兇惡的”。毛又說（需要說明的是，這在選集版本中已刪去）：“中國取得真正的經濟獨立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只有當中國的工業已經發展了，中國在經濟上再也不依靠外國了，她才能享受真正的獨立。”[[33]](#_33___Mao_Ze_Dong_Ji____Di_10Jua)

本章導言部分講述了農民在中國社會長期的重要性，以及這一事實和農民意識形態對毛澤東自身的影響。這個因素確實存在，而且至關重要，但從1955年，尤其是從1958年開始，這一因素才更加強烈地表現出來。相比之下，在取得勝利的前夕，毛閉口不提，或者說，他無論如何是貶低黨的農村工作經驗的重要性。他在1949年3月指出：

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34]](#_34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

換言之，迄今為止我們所走的都是一條非正統的道路，因為這是我們能取得勝利的唯一道路，但是從今以后，我們將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方式去行動，從城市的工業環境出發，去引導和啟發農村落后的農民。1949年6月，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的這一看法已非常明顯。那篇文章宣稱，由于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仍然存在，所以國家權力不能廢除，恰恰相反，目前的任務是要加強人民的國家機器。毛繼續說，“具備這個條件后，中國就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毛認為，在引導中國“從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發展的任務方面，教育和改造民族資產階級是相對容易的。他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致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主義化”。[[35]](#_3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

毛強調教育農民，強調工人階級在“人民專政”中的領導地位，以負起教育的責任，清楚地表明了他在1949年3月所宣布的城鄉之間的重心轉移。

另一個饒有興趣的事實也表明了這一點。以前有一種說法，認為農村的“半工人階級”也像城市的工人階級一樣，是革命的領導階級。這種提法1950年春天由劉少奇提議，而后被中央委員會通過，毛于1951年12月放棄了這種提法。雖然在此之前毛自己也曾把“半無產階級（貧農）”稱作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階級，但現在他發現，把領導權給城市工人以外的任何階級都是“錯誤的”。這明顯地標志著他向更加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轉變。[[36]](#_36__Zhi_Liu_Shao_Qi___1951Nian)

此外，在50年代早期，為了改變黨的階級成分，中共曾力圖吸收大量工人，輸入新鮮血液，通過這一措施，上述思想傾向轉變為實際的行動（見本書第二章）。

雖然毛在1962年曾經聲明，在建國初期除去“照搬蘇聯”[[37]](#_37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_T)別無選擇，但他并不像蘇聯那樣，把工業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混為一談。雖然在毛的社會主義發展思想中，科學技術現代化是核心的和關鍵的組成部分，但人們也有理由提出疑問，他在1949年所懷有的關于中國革命的宏大藍圖，是否將最終證明與這種技術現代化思想相一致。

由毛明確制定的經濟政策一開始是穩健的。比如在1950年6月，他要求“保存富農經濟以利于早日恢復農村生產”，而且在總結總目標時說：

合理地調整現在工商業，切實而妥善地改善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38]](#_38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

就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之后，毛對于這些問題的看法也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1953年8月，他把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規定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39]](#_39_Tong_Shang_Shu__Di_102Ye)

1954年9月，他指出：

我國人民應當努力工作、努力學習蘇聯和各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老老實實，勤勤懇懇，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虛夸和驕傲，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明程度的偉大的國家。[[40]](#_40_Tong_Shang_Shu__Di_148__149Y)

1954年11月，毛澤東提醒劉少奇和周恩來注意，他認為剛在《人民日報》發表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摘要中有一個“說法是錯誤的”：“在社會主義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經濟法則。”[[41]](#_41___Zhi_Liu_Shao_Qi___Zhou_En)毛批判這一觀點，明確顯示他對中國提法的理論依據十分關注，即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社會主義性質。

不過，毛直到1955年3月還承認，社會主義道路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里面，情況是復雜的，國民經濟原來又很落后，要建成社會主義，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50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42]](#_42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

但到1955年年中，毛的態度突然發生了變化，而且（像《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2章闡述的）他還在農村發動了一場更快速的合作化運動，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改變了整個中國社會的氣氛。毛的新思想，還有他新的分析框架，鮮明地體現在他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寫的按語中，這些按語和序言是在1955年底寫出來的，他在7月31日號召加速合作化，到這時，正在展開的合作化進程比他自己預想的還要快。[[43]](#_43_Can_Yue___Zhong_Guo_Nong_Cun)

從這些論題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躍進”、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某些基本思想的萌芽，比如毛相信動員起來的群眾，通過他們的主觀努力，具有改變他們自己及其環境的無限性。舉個例子，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積累了“大量的生產資料”。在贊揚王國藩合作社的一段按語中，毛評論道：“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于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在另一段按語中，注意到在1955年上半年全國已有幾千萬農戶加入了合作社，并因此完全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毛評論說：“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沖走了。”[[44]](#_44___Zhong_Guo_Nong_Cun_De_She)

在農民熱情和奮斗精神的鼓舞下，毛在1955年寫道：

對比一下我們國家與蘇聯：（1）我們有根據地20年的經歷，又有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鍛煉；我們（取得權力的）經歷異常豐富……因此，我們能夠很快地建立一個國家，并完成革命任務。（蘇聯是一個新建立的國家；在十月革命時期，他們既沒有軍隊又沒有政府機器，而且黨員數量很少。）（2）我們享有蘇聯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幫助。（3）我們的人口眾多，而且位置優越。[我們的人民]工作勤奮、吃苦耐勞，如果沒有合作化，要想得到農民是不可能的。中國的農民甚至比英國與美國的工人都好。我們必然能夠更好更快地實現社會主義。[[45]](#_45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_S)

因此，早在1955年毛就表示，因為他們是在農村進行了20年的斗爭之后獲得政權的，而不是在首都突然取得政權，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在1949年時比列寧及其同志們在1917年更懂得在基層群眾中行使權力，并獲得他們的支持。另外，以毛之見，中國的農民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源。

然而，這絕不是一種毛當時努力推動的片面的“鄉村”革命。雖然他1955年7月31日關于合作化講話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要求在中國，集體化應先于機械化，但也不是要走得過早，因為對拖拉機、水泵和其他工業產品的準備是很緊迫的。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毛繼續堅持他在1949年提出的觀點，按照這一觀點，“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里的含義很明確，那就是，通過使他們學習城市所創造的知識，尤其是技術知識，必須把這些鄉村居民引入現代世界。在這一過程當中，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其他知識分子將起關鍵作用。的確，1956年1月，在他宣布關于農業發展十二年綱要時已認識到這一點。他指出，中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全面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中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國家水平”。他還說，“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46]](#_46_1956Nian_1Yue_25Ri_De_Jiang)

因此，在1956年1月，毛要求用說服和理解的方式對待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毛強調中國是一個工業和技術的各個方面都落后的國家，而且一些方面處于依賴的地位，因為它還不能生產一些自己所需要的關鍵產品。他還評論說：

有的同志說些不聰明的話，說什么“不要他們也行”（指知識分子）！“老子是革命的”！這話不對。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單靠我們老粗是不行的。[[47]](#_47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_S)

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看法，最恰當地總結在他1956年4月25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論十大關系》中，此文有令人信服的總結。這篇著名講話的各個方面都講了同樣的意思：要懂得事物的內在聯系，不要顧此失彼。因此，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他要求在政治領域擴大地方的權力和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性，以利于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領域，他提出減少以犧牲農業和輕工業為代價的對重工業過多的優先權。（但不像有人有時說的把關系顛倒過來，）他認為一味重視重工業無異于自殘。但與此同時（這表明了他當時的平衡與公平思想），他提出應適當注意進一步發展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現存的工業基礎，而不是把所有能得到的資源都投入到整個內地去擴大工業。[[48]](#_48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_T)

如前所述，在起草這篇講話時，毛仔細考慮了陳云以及其他經濟工作方面的專家的意見。《論十大關系》從總體上講無疑代表了他自己妥協的立場，企圖以此來獲得黨內廣泛的贊同。然而，毛在個別問題上采取溫和與妥協態度，絲毫也不能表明他準備在所有方面向大多數領導人的意志低頭。

1955年，在他發動加速農業合作化進程的運動中，毛澤東已經表示出，在他十分關切的問題上，他要對與他意見相左的人進行粗暴打擊的傾向。[[49]](#_49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uo_S)1956年年中，他又以一種更隱蔽、但卻是更可怕的態度再次表露了同樣的褊狹。1956年早期毛曾經相信，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成果，將能促進所有的經濟工作的發展。面對出現的矛盾與不平衡，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恩來負責起草的《反對冒險主義》的重要社論。事先，毛曾經審閱了社論，但他并沒有表示任何意見，給他的同事們的印象是他已贊同了這一討論，然而在實際上，他對此是有所保留的。當他承認不能要求經濟發展太快時，他仍相信中國經濟是可以很快發展的。在“大躍進”前夕，他開始發泄他的感情。在此之前有一年半的光景，他總是對這篇社論懷藏怨恨，對周恩來尤其如此。[[50]](#_50_Guan_Yu_Mao_Chi_Xu_De_Le_Gua)

同時，在1956年春季和夏季，毛不僅提出了“百花齊放”的口號，而且也對階級與階級斗爭問題、共產黨與其他社會力量的關系問題、是非關系問題等采取了非常溫和的態度。他在1957年2月27日《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更為詳細地論述了這些問題。但毛在此之前的講話中已多次提到這些問題。由于“階級斗爭”在1957—1976年間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專門對這一主題進行詳細討論。

#### 人民、階級與矛盾

1957年2月之前，毛考慮這些問題的理論框架基本上是在1937年的《矛盾論》中形成的。在這篇文章中，毛認為，雖然矛盾“貫穿于每一個發展過程的始終”，雖然所有的矛盾都包含著斗爭，但它們不一定都是對抗性的，對于不同性質的矛盾應該采取不同的解決方法。在毛當初寫的這篇論文的原文中，他把“非對抗性矛盾”的范圍規定得非常寬泛，對階級斗爭的范圍規定得也就很嚴格了：

例如，共產黨內正確思想與錯誤思想的矛盾，文化上的先進與落后，經濟方面城市與鄉村的不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生產與消費，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各種不同的勞動分工，工、農在階級關系上的矛盾，以及自然界中的生與死，遺傳與變異，冷與熱，白天和黑夜——沒有一種是以對抗形式而存在。[[51]](#_51_Ni_Ke__Nai_Te____Mao_Ze_Dong)

1951年的校訂本當然構成了我們這里所考察的這個時期正統的思想意識的標準，在這個版本中，毛澤東劃分界限更為謹慎，他解釋說，“共產黨內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階級存在的時候，這是階級矛盾在黨內的反映”。“但如果犯錯誤的人堅持錯誤，并擴大下去”，這種矛盾也就有可能發展為對抗性的。他還指出，城鄉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面，在中國的國民黨統治區里，都是“極其對抗”的矛盾，但在根據地里面，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是非對抗的矛盾。[[52]](#_52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

就這篇著作的語氣而言，這里存在著重大的差別。它反映了毛澤東對強調階級斗爭的需要，他要在整個50年代或多或少地掀起階級斗爭。但是，就兩個僅有的、對新政權構成嚴峻問題的階級而言（正像我們從前文關于《論人民民主專政》研究中所看到的），他1951年劃分界限時對它們的態度沒有重大變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仍然要“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方式來解決；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工人與農民之間的矛盾，1937年設想的是通過“農業社會主義化”解決，現在他提出要用“農業集體化與機械化”的辦法，這確實比以前具體多了。[[53]](#_53_Ni_Ke__Nai_Te____Mao_Ze_Dong)

1950年6月，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題為《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該講話已收入《毛澤東選集》），他在當時的這個講話中堅定了他基本溫和的態度。換句話說，就是不要同時與很多階級進行斗爭。在總結黨在目前對于中間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時，他指出：

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我們一方面要同他們作斗爭，另一方面要團結他們。[[54]](#_54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

以毛的觀點，到1952年6月，事情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因此再把民族資產階級界定為“中間階級”就不合時宜了。[[55]](#_5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

然而，他在1952年9月寫給黃炎培的信中說，在整個“一五”計劃時期（到1957年止），要求一大部分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思想，那是不合理的。他們必須接受工人階級指導，但要求他們接受工人階級的思想，放棄賺錢的念頭，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56]](#_56__Zhi_Huang_Yan_Pei___1952Nia)

1955年夏，毛澤東又進一步推動農村的階級斗爭，特別是區別“上”中農和“下”中農，把這兩部分人之間的界限當作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分界線。195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擴大）全會正式認可了他的農村路線。在這次全會的總結報告中，毛總結了當時的形勢，再次提到共產黨人的兩個聯盟，一個是同農民的聯盟，另一個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這兩個聯盟都“很必要”。但在這兩個聯盟中，同農民的聯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而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是“暫時的，第二位的”。在強調這兩個聯盟間的相互關系時，他說：

1950年，我在三中全會上說過，不要四面出擊。那時，全國大片地方還沒有實行土地改革，農民還沒有完全到我們這邊來，如果就向資產階級開火，這是不行的。等到實行土地改革之后，農民完全站到我們這邊來了，我們就有可能和必要來一個“三反”、“五反”。農業合作化使我們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基礎上，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基礎上，鞏固了同農民的聯盟。這就會使資產階級最后地孤立起來，便于最后地消滅資本主義。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那么兇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

毛解釋說：在頭三個五年計劃的15年里（其中三年已經過去），“國際國內的階級斗爭會是很緊張的”。[[57]](#_57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正像上文剛引述的，毛在他的講話中說，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而實際上到1956年底就全部完成了（見《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2章）。到1956年早期，毛澤東對未來充滿信心，并感覺到自己的地位日益鞏固。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他對階級斗爭采取了更加溫和、更加穩健的方針，尤其是對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用。他還強調了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

另一件能夠反映這一傾向的事情是，不再像先前那樣，在接納新黨員時歧視非無產階級成分。正像我們已經指出的，為了改變黨的階級成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黨作出了艱苦的努力，吸收更多的工人入黨。然后，1956年，新黨章取消了以前對于非工人成分的較為嚴格的審查。其理由正如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作的報告中所指出的，“以前的社會成分的劃分已經或正在失去其意義”。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鄧小平觀點的詳細內容，因為它們為我們提供了毛在他生命最后20年間關于階級觀點發展的背景材料：

工人和職員已經只是一個階級內部的分工；……貧農和中農現在都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他們之間的區別很快就只有歷史的意義；……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在政治上已經站在工人階級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改變著；……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和學生變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農民和他們的子弟變為職員和知識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學生、工人和職員變為士兵；……把這些社會成分分為兩類還有什么意義呢？[[58]](#_58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_D)

鄧在這里更加注重為革命工作的主觀態度與愿望，而不是家庭出身，在這方面，他的觀點與毛的思想是協調的。毛這時的思想發展趨勢未變（雖然不是前后始終完全一致）。毛指出，中國社會的階級斗爭正迅速消失。但是在這一點上，他的思想與后來興起而且將黨沖垮的潮流顯然是背道而馳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毛澤東當時不同意他的觀點。甚至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高潮期間，當康生抱怨八大政治報告含有階級斗爭熄滅論時，毛還承認他在1956年也持有這種觀點：“報告我讀過，而且是經大會通過的。我們不能讓劉、鄧兩人單獨承擔責任。”[[59]](#_59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_T)

毛是怎樣又是為什么開始戲劇性地改變他對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態度，而在10年后把劉少奇打成“頭號走資派”呢？一般的情況眾所周知。值得強調的一個方面是中國知識精英關鍵性的更新換代，這無論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但1957年的幾個事件卻加速了這一進程。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幾年間，中國所必需的技術干部與管理干部，大多數是舊社會留下來的，他們出身于“資產階級”，或在西方受過教育，或在從歐美或日本留學回來的人執教的大學中受過教育。毛認為這些人的忠誠是可以得到的，他們是專家，也可以變紅。毛在1956年春天提出的“百花齊放”政策，主要是考慮到這樣一個目的，在提高他們的修養、改造他們的過程中，把1949年以前的知識分子拉進來，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

他在1956年4月25日最初向黨闡述《論十大關系》時，重申“黨內的原則上的爭論”是“社會上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同時，強調了交流思想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科技領域與國內外人們的交流。[[60]](#_60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在政治局討論他的報告的過程中，提出了“百花齊放”的口號。在4月28日的進一步討論中，毛指出，只要一個人的觀點正確，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它。他又補充說，黨在文學領域里的方針應該是“讓百花齊放”，在學術上的方針是“讓百家爭鳴”。[[61]](#_61___1981Nian_Jue_Yi__Zhu_Shi_B)

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的《論十大關系》文稿中，毛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對這一問題的思想。他作了高度的概括，宣布春天已經到來，應該允許“百花齊放”，而不只是放那么幾朵。他回憶說，“百家爭鳴”的提法來自春秋戰國時期，當時有百家主要的哲學家們，他們各樹一幟，自由爭論。他說，目前我們也需要“百家爭鳴”。在憲法規定的范圍內，各種學術派別都可以在互不干涉的情況下爭論他們思想的對錯。他說，我們仍未弄清李森科的思想是對還是錯，所以讓每個學派在報刊上各抒己見。[[62]](#_62_Tong_Shang_Shu__Di_254Ye)

人們不僅在報紙上討論李森科的思想，而且在1956年8月，又以“百家爭鳴”為口號，在青島召開了為期兩周的大型學術會議，就遺傳學中的不同觀點進行辯論。[[63]](#_63_You_Guan_Zhe_Ci_Hui_Yi_Zheng)有一個與會者隨后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文章，毛澤東個人決定應該在《人民日報》轉載，并親自補加了一個副標題：“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64]](#_64_Qian_Yin_Shu__Di_10Ye__Dao_Y)

關于人民內部矛盾既相互關聯又互相區別的思想，在1956年秋天首次出現，那是在蘇聯反斯大林主義和波匈事件之后。1956年11月15日，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作報告，指出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已基本得到解決，然而他也堅決支持階級斗爭、支持對反革命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并且反對赫魯曉夫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的思想。[[65]](#_6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

根據現有資料，毛在1956年12月4日致黃炎培的信中首次使用“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確定概念。黃是民主黨派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在這封信中，毛指出，雖然階級斗爭在中國（如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已經基本上解決了”，但在將來，人民內部的問題將“不斷涌現”。[[66]](#_66__Zhi_Huang_Yan_Pei___1956Nia)顯然，這意味著人民內部矛盾將日益增多。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社論，[[67]](#_67_Yi_Wen_Jian_Ying_Wen__Wu_Cha)這是毛關于這一問題思想的第一次公開解釋。[[68]](#_68_Zhe_Yi_Biao_Da_De_Xin_Ti_Fa)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與由波匈事件所引起的對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的過分否定進行論戰，文章以稍微強烈的觀點評論說，誰也不能采取“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的立場，并指出，“否定階級斗爭、不分敵我的人，決不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69]](#_69__Wu_Chan_Jie_Ji_Zhuan_Zheng)

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關于階級斗爭和人民內部矛盾方面的經驗還不充分。這是一門科學，我們必須很好地研究它”。[[70]](#_70___1981Nian_Jue_Yi__Zhu_Shi_B)

一個月之后，毛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著名講話，用大量篇幅精辟闡述了這門學說。在這篇講話的原文中，毛表示對12月的社論持保留態度（即使是他親自修改過）。[[71]](#_71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_S)他說，社論未明確闡述民族資產階級問題，尚未說清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的確，在特定的環境下，這種矛盾可以轉變為對抗性矛盾，但是我們不能錯將善意的批評當作惡意中傷。列寧沒有來得及正確地分析這一問題，而斯大林根本就沒有作這一區分的嘗試：

你只能贊同，不能反對；你只能為他的功績和美德唱贊歌，而不能批評；如果你批評了，他就會把你當作敵人，你就會有被送進集中營或處死的危險。

“左”傾機會主義者，也就是所謂“左派”，他們打著左的旗號，但是他們并非是真正的“左”派，因為他們把敵我矛盾擴大化。比如，斯大林就是這么個人。

毛澤東說，中國也犯過同樣的錯誤，尤其是在肅反運動中。[[72]](#_72___Xue_Xi_Wen_Xuan_____Di_193)

關于中國與蘇聯的分歧以及相關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在毛2月27日講話的原稿中占有很長而且很重要的篇幅。這在下文關于中蘇破裂的部分中還要討論。講話還涉及了本章無暇展開的各種不同的問題，諸如在計劃生育工作中流行的“無政府主義”，[[73]](#_73___Xue_Xi_Wen_Xuan_____Di_209)現階段的中國無力普及中等教育等等。[[74]](#_74_Tong_Shang_Shu__Di_211Ye)就我們這里所關心的問題，毛宣布，中國社會“基本的”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75]](#_75_Tong_Shang_Shu__Di_212__213Y)與此同時，他明確宣布，在他看來，階級斗爭在中國基本上已經結束。[[76]](#_76_Can_Yue_Qian_Yin_Shu__You_Qi)

在毛1957年2月講話的官方文本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同樣強調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作用。例如，他指出：“正是這些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推動我們社會向前發展”；在毛看來，因為矛盾是變化的原動力，所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特殊矛盾，或特殊類型的矛盾，在邏輯上當然是主要矛盾。另外，在同一段中，毛繼續說：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77]](#_77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

這些論述似乎是支持了近幾年中國幾位主要理論工作者提出的觀點，意思是毛在1956年末和1957年初的思想就是從1955年到1956年間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內部矛盾（一般說來，它不能被當作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取代了階級斗爭而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78]](#_78_Liao_Gai_Long___She_Hui_Zhu)

與構成中國社會各階級間矛盾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知識分子作用問題。毛對消滅知識分子隊伍中階級差別問題采取了相對寬容和緩和的態度。他的這一態度表現在1957年1月的一次講話中。他指出，在中國，80％的大學生仍然是地主、富農、上中農與資產階級的子弟，他認為，“這種狀況應當改變，但是需要時間”。[[79]](#_79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不過，在關于“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的原文中，他著重強調了讓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性，不讓他們放任自流。他說，他們所要求的一切，不過兩件事情：一個是高工資，另一個是“討老婆”或“嫁老公”——換句話說，“吃東西和生孩子”。[[80]](#_80___Xue_Xi_Wen_Xuan_____Di_207)

毛對諸如此類目標是鄙視的（不消說在這兩方面他自己卻是享用夠的）。他在1957年2月27講話中談到物質享受的腐蝕作用，說中國人有兩個特點：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而這兩個特點都有兩方面的含義：

如果中國變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準，她就不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財富已成了他們的缺點，這些缺點就是他們不再想革命了……他們高水平的生活還沒有我們的文盲來得好。[笑聲][[81]](#_81___Xue_Xi_Wen_Xuan_____Di_225)

我們將會看到“大躍進”期間，毛的思想中的這種傾向大量出現，并進一步表現出來。然而，與此同時，在1957年初，毛對于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總體上還是都留有好感的。

直到1957年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據一位消息靈通的中國專家說，這篇社論“完全反映了毛澤東同志當時的觀點”。社論說，“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決定性的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論最后指出，中國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以及其他一些性質類似的矛盾。[[82]](#_82__Wei_Shi_Yao_Yao_Zheng_Feng)

但是在5月中旬，由于連續猛烈的批評，毛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他覺察到在黨員中“有許多人”是修正主義者或“左”傾機會主義者，他們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他們“與社會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系”。[[83]](#_83__Shi_Qing_Zheng_Zai_Qi_Bian)

在1957年6月改寫他2月的講話時，毛修飾了他當初階級斗爭已經結束的結論，進一步寫道：“我們國內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還有階級斗爭。”[[84]](#_84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Yin)這段話還是比較溫和的，但是毛的語氣在逐漸加強。因此，到1957年7月，當“百花齊放”運動逐漸演變成為“反右運動”時，他斷言：“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隊伍。……這個任務，應當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內基本上解決。”固然，他說這支新的隊伍應該包括舊社會過來的“真正經過改造站穩了工人階級立場的”知識分子，但是很顯然這支隊伍的大多數成員是要階級出身好的年輕人。他說：“在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新部隊沒有建成以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是不會充分鞏固的。”[[85]](#_85__Yi_Jiu_Wu_Qi_Nian_Xia_Ji_De)

至于現存的知識分子，毛輕蔑地警告他們：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資本主義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干的，就要辭退你，明年就不下聘書了。[[86]](#_86__Da_Tui_Zi_Chan_Jie_Ji_You_P)

從此以后，毛日益看到到處都是“反共產黨和反人民的牛鬼蛇神”。[[87]](#_87_Tong_Shang_Shu__Ying_Wen_Ban)

## 毛對“中國式道路”的尋求

正如本章的導言所論述的那樣，總的來看，1957年秋的反右運動不僅是中國政治生活而且是毛澤東思想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這一時期所發生的種種變化，涉及毛的理論興趣和毛對政治思考的各個方面，從經濟學到哲學，從中國國內問題到與蘇聯的關系等。不過，在相當大程度上，毛澤東思想中這些新趨勢的核心及導致這些新趨向出現的動力，都可以從他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中找到。

#### 決定論與烏托邦夢想：“大躍進”理論

如同剛才指出的那樣，這時毛的情緒與思想所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對知識分子態度的急劇轉變。1957年初參與“大鳴大放”的專家、學者，以其嚴厲的、對毛的思想的否定性、詆毀性的批評，使人們對毛不顧他的許多老同志的反對而推行的這些政策、進而對毛的觀點發生懷疑，這就動搖了他的威望與權威。因此他轉而粗暴地反對他們。此后，除了培養新的根紅苗正的知識分子以外，毛更愿意依靠廣大群眾的熱情和創造性。

至于那些在“百花齊放”期間辜負了他的信任的可憐的書呆子們，有誰需要他們呢？因此，和他1956年認為科學家是決定因素的觀點完全相反，毛反復重申并積極推行了一些政策，強調“一切聰明才智都來源于人民群眾”，“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1958年3月，他宣稱：

從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他們一眼看出一種新東西，就抓住向老古董開戰。……美國富蘭克林發明了電，他是賣報的孩子，……高爾基只讀了兩年小學。當然學校也可以學到東西，不是把學校都關門了，而是說不一定在學校。[[88]](#_88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_T)

不論我們發現這段語錄以及毛在“大躍進”期間發表的其他許多反知識分子的言論多么精辟有力，如果我們把其中的任何一段，當作他對這些問題的觀點的全面而公允的表述，那就錯了。在這個時期，他仍力求在緊張狀態中保持一個整體，力求處置好處于兩個極端的問題，如人民群眾的創造性與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科技投入，或中國的鄉村社會與城市社會等。

1958年12月，毛寫信給陸定一，支持了清華大學黨委關于糾正在處理物理系教員時所犯“左”傾錯誤的報告，并要求將該報告印發各處。這份報告說，人們普遍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知識分子是革命對象，向共產主義過渡期間他們更是革命對象。因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剝削階級，連團員助教也被認為是革命對象”。在這種流行的觀點看來，把這些人全都留在身邊的唯一原因是為了樹立斗爭的對象。如果教授們拒絕接受改造、拒絕自愿削減工資，那么就該把他們送往養老院。

毛和清華大學黨委一樣，以需要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各類教師和研究人員為無產階級的教育、文化和科學事業服務為理由，徹底地否定了這一觀點。[[89]](#_89__Zhi_Lu_Ding_Yi___1958Nian_1)盡管如此，毛的主要興趣毫無疑問已經改變，把希望轉向了人民群眾和農村。

除了毛對城市知識分子的不滿以外，促使他的思想轉向農村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創立更大規模的農村組織以適應機械化和水利灌溉這種不斷增長的趨勢。這也是黨的政策轉向農村的主要推動力。早在1955年底，在他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寫的一則編者按中，毛就宣布了大社的優越性，并寫道：“有些地方可以一個鄉為一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鄉為一個社，當然會有很多地方一鄉有幾個社的。”[[90]](#_90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在1956年春至1957年秋這段時間里，反對“冒進主義”的運動和其他因素，使毛倡導的某些更加激進的政策黯然失色，總的來看，毛的這一意見并沒有付諸實施（參見《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2、3章中有關開始“大躍進”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的論述）。不過，在1957—1958年的冬天，一個合并現存的高級合作社的運動出現了。毛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全力支持這個運動。1958年4月8日，中央委員會發布了一個意思一樣的指示，部分內容如下：

……農業生產合作社如果規模過小，在生產的組織和發展方面勢將發生許多不便。為了適應農業生產和“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在有條件的地方，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合并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91]](#_91___1981Nian_Jue_Yi__Zhu_Shi_B)

這個指示正好是在毛參觀四川紅光的“大社”的消息在報上登出的當天發布的（毛3月中旬視察該地，當時成都會議正在進行之中）。[[92]](#_92_Dai_Wei__S_G_Gu_De_Man____Zh)這一巧合實在太明顯了，不會是偶然所致。

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建立大型組織的沖動的出現，是出于要在農村創立一個更為有效的基層組織這樣的考慮，其中首要的是促進水利工程發展的考慮。因此，就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以及在成都會議之前的南寧會議上，毛竭力主張大社。他又花費大量時間來聽取有關修建巨壩控制長江水流的“三峽”工程的不同意見，并主持會議進行這方面的決策。所有這些也就不足為怪了。[[93]](#_93_Can_Jian_Li_Rui___Lun_San_Xi)

在成都會議早期，“大社”還不正式賦予行政和軍事功能。這兩方面的功能是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所批準的“人民公社”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們不能說，兩者都是公社，只不過是叫法不同而已。不過，大社已經開始具有這方面的一些特征，因而它們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很快就成為公社。

當然，公社出現的歷史本身不是我們這里要關心的問題，但上述的這些事實卻與這一章的主題有關，因為它們表明了毛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對于1958年夏天突然到來的體制革命有著直接的作用，并且將在1/4世紀的時間里塑造中國的農村社會。

對于這一傾向的美妙想法，我們不僅可以在毛對農村社會的認同中發現，而且也可以從1955年集體化運動中就已支配他的太平盛世的夢想里看到。從毛于1956—1958年間在文章里反復闡述的主題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思想。根據他的思想，中國人民可以從他們處于“一窮二白”的狀態中，獲取一些有利條件。1958年4月，他寫道：“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94]](#_94___Mao_Ze_Dong_Zhu_Zuo_Xuan_D)

在這里，毛把他1957年2月27日的講話中曾用不同語言表述過的兩個互相聯系的觀點統一起來了。當時，他在講話中談到中國“文盲”的優越性大于西方的財富。從總體來說，農民是全體中國人民中最為貧窮的部分，也就是說，他們受到物質享受的侵蝕較少，對現代世界的狡猾奸詐最為無知，從這一意義上說，他們在道德和革命能力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

毛的思想中這種傾向的深刻根源可以追溯到過去，追溯到他勝利地進入北京城之前在農村的22年艱苦斗爭。我在《劍橋中國史》第13卷中關于“1949年以前的毛的思想”這一章的結語中指出，50年代晚期的經濟政策的特性不能根據“延安模式”來描述，因為具體情況太不相同。[[95]](#_95___Jian_Qiao_Zhong_Guo_Shi)不過，它同延安和井岡山精神確實有著某種連續性。

這種連續性在1958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中表現得分外鮮明。這次會議正式批準組建人民公社。毛在會上反復提倡取消工資制，重新采用戰爭年代實行的供給制，他聲稱，人活著只搞點吃的，同狗就沒有什么區別了，“不搞點幫助別人，不搞點共產主義，有什么意思呢？”他斷言工資制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其結果是“發展個人主義”。他評論說，有些人硬說平均主義會助長懶惰，但實際上等級制才是這樣。[[96]](#_96_1958Nian_8Yue_21Ri_Shang_Wu)

毛明確地把整個社會的斗爭精神與犧牲奉獻精神和過去的武裝斗爭聯系起來。他說，“我們共產主義也是從軍隊首先實行的。中國的黨是很特別的黨，打了幾十年仗，都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現在，在與帝國主義和自然所進行的雙重斗爭中，目標同樣是清楚的，采用供給制度絕不會削弱人民的主動性和獻身精神。[[97]](#_97_1958Nian_8Yue_30Ri_De_Jiang)

在論述公社包含著“共產主義萌芽”時，毛把公社與城市對立起來。城里人要“正規化”，充斥著高高在上的大衙門。在號召拼命干、大煉鋼鐵時，毛指出，有些人批評后院煉鋼是“農村作風”或“游擊習氣”，實際上，這樣的觀點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它已經丟棄了我們黨的許多優良傳統。[[98]](#_98_1958Nian_8Yue_17Ri___8Yue_21)

1958年9月29日在與一位記者的談話中，毛又一次公開指責那些認為動員群眾搞工業生產是“不正規”或是一種“農村作風”的人。[[99]](#_99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_D)不過幾個月后，即1959年7月，他不得不承認這一指導失誤，導致了“大規模的混亂”，并且是對資源的極大浪費。[[100]](#_100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毛計劃推行軍事共產主義式的供給制，周恩來根據各個部提供的資料作了精細的估算，結果表明，與工資制相比，供給制的昂貴簡直是災難性的。[[101]](#_101_Liao_Gai_Long___Li_Shi_De_J)毛的計劃才被勸阻。順便說一句，毛澤東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發動、并在3月的成都會議上猛烈抨擊了1956年“反冒進”的人，而周恩來就是他抨擊的主要對象。盡管如此，周能夠在這個問題上勸阻毛，足見了周的執著和威信。[[102]](#_102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不過，雖然毛承認這種想法在眼前是不現實的，但他繼續做著這樣一種鄉村烏托邦夢。

然而，早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就清楚地認識到農民對自身的物質利益表現出某種依戀。他聲稱：“在沒有實現農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農民總還是農民，他們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總還有一定的兩面性。”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他幾次重申了這一論斷，并認為，在現階段，在工農關系中仍然扮演著“老大哥”角色的是工人，而不是農民。[[103]](#_103___Wan_Sui_____1969Nian___Di)

也許，無論是在實踐上還是在內心里，毛從來就沒有真正地解決這樣的一個兩難命題，即農民階級既是社會的中堅，同時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又是工人階級的“小弟弟”。

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試圖創立關于社會主義發展的總體模式中特別富有啟發性的象征，就是“繼續”或“不斷”革命的理論。毛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這樣闡述這一理論：

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在全國范圍內奪取 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反右運動]。……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104]](#_104___Wan_Sui_____Fu_Lu___Di_32)

由于這段話說得清清楚楚，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改造同時進行是“大躍進”的特點，總的來說，這同毛對革命的總的看法一樣。與此同時，在1958年毛的眼里，技術水平和物質生產水平的迅速提高是很重要的部分。號召進行“技術革命”及1957年12月宣布的“十五年趕超英國”的口號，明顯地表示了對生產和技術的重視。

確實，在“大躍進”的高潮中，毛曾兩次把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開端和變革的時間定在19世紀末，那時，張之洞開始實施他的工業計劃。1958年9月，毛根據機床的數量衡量進步的程度；1959年2月，他的計量標準則是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增長。這兩次，他都比較了1949年前后中國在追趕世界上發達國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05]](#_105___Wan_Sui_____1969Nian___Di)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毛把工業化或經濟上的總體發展看作革命的全部實質之所在。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宣布開始“大躍進”，毛在會上的一次講話中表明了他要加速經濟增長的決心，但他又指出，革命并不是經濟發展的唯一結果：

我們不提“干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也不提“蘇維埃加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我們不提這個口號，是否就不電氣化？一樣的電氣化，而且更化的厲害些。前兩個口號是斯大林的提法，有 片面性。“技術決定一切”，——政治呢？“干部決定一切”，——群眾呢？在這里缺乏辯證法。斯大林對辯證法有時懂，有時又不懂。[[106]](#_106___Wan_Sui_____1969Nian___Di)

因而，雖然中國想要實現“電氣化”，也就是說像蘇聯那樣迅速地發展經濟（這里用的是列寧的一種比喻的說法），但毛認為這個過程是與人的轉變緊密相連的。

這樣“大躍進”就并行不悖地包括了許多各不相同的靈感和強制命令，同時堅持技術革命與政治動員僅是這方面的一個實例。這類矛盾中最顯著的就是，一方面用“政治是統帥”這一口號來強調黨的統一領導，另一方面，經濟上的主動性和控制權分散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致連毛后來都承認，行之有效的計劃經濟基本上不再存在了。這個問題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1956年重新采用“雙重領導”制度造成的（參見《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3章）。這一制度在1958年對黨極為有利，以至于各級領導的實際控制權都在黨的干部手中，而他們沒有任何辦法來檢測經濟決策的廣泛后果，即便他們想要這樣做。

當時，毛認為這沒有什么好擔憂的，因為不平衡是推動事物發展的“普遍的客觀規律”。[[107]](#_107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在這一意識形態公式的背后是這樣一種信念，那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動員起來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能動作用是絕對必要的。反轉過來說，這不僅強調作為專家對立面的人民群眾的創造性，而且實際上賦予全體“革命人民”（專家或至少是他們當中的“紅色”專家）無限的能力，去改造他們自身的環境。因而，在那些在“大躍進”時期明顯地反映出了毛的觀點的思想著作中，我們發現了諸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或甚至是“主觀創造客觀”這樣令人瞠目結舌的言論。[[108]](#_108_Jian_Wu_Jiang_Zai___Zhe_Xue)

或許可以這樣說，在“大躍進”時，即1968年5月事件前的十年，毛就領會并闡明了“想象會變成力量！”的口號。后來巴黎的學生使這一口號名噪一時。當然所不同的是毛大權在握。1958年夏，總的來看，不是冷靜觀察而是不斷的狂熱，作為確定真理和事實的標準。

1958年9月毛在進行形勢總結時宣稱全國的糧食產量差不多翻了一番，并可望在1959年再翻一番。以至于很快就會發現，糧食太多，即使喂了牲口也有余，于是，就會出現如何處理糧食的問題。[[109]](#_109___Wan_Sui_____1969Nian___Di)

1958年12月9日在武昌召開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他在全會召開前舉行的非正式討論中，再次提出了“實事求是”的口號。他解釋說，這就意味著在計劃工作中，需要既熱情又冷靜，既要有崇高的志向，同時又要進行大量的科學分析。毛具體地說道，當他在預計1962年鋼產量達到1.2億噸時，他僅僅是考慮到中國對鋼的需求，而“沒有考慮到可能性的問題”。他說實際上這樣的目標既不可能也不現實。中國人民不應該把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和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混為一談，或企圖先于蘇聯進入共產主義。[[110]](#_110___Wan_Sui_____1969Nian___Di)

在1959年的頭幾個月里，當“共產風”刮遍全國時，毛本人再次陶醉在幻想之中。1959年3月，他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說，如果鋼產量能像1958年那樣達到1959年所訂的目標，那么就可以每年有600萬噸鋼用于農機設備的生產，機械化很快就可以實現。[[111]](#_111_An_Nuo__Lu_Yi_Si__Si_Te_Lan)到7月，他終于認識到土高爐是一種魯莽的冒險行為，他應該對此負責。[[112]](#_112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不過，經濟上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間表雖然很快朝著更加現實的方向作了修改，但是，經濟高速發展這一決定性的根本目標仍然沒有改變。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全國上下進行有效的通力合作。因此，在1959年7月毛對“大躍進”高潮時期摧毀了計劃體制一事也承擔了責任[[113]](#_113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贊同了1959年初采用的“全國一盤棋”的口號。

毛認為有必要對工業領域實行更加有效的集中控制，與此同時，他又帶頭在公社實行所有權和控制權的下放。1959年3月，在調整有關核算與分配的基本單位是否應下推一級或兩級的激烈爭論中，毛選擇了后者這個比較大膽的解決辦法。[[114]](#_114___Wan_Sui_____1967Nian___Di)（這里討論的單位是“生產隊”，通常譯為“production team”，這意味著在1959年，現在所說的隊就大致相當于過去的高級社）中間方案堅持要把后來取消了的相當于行政管理區域的實體作為基本的核算單位，毛反對這一方案。有關這方面的詳情以及對后來發展，參見《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8章。

人們使毛相信，人民公社制度基本上是正確的，通過1959年春和初夏的調整，很容易得到鞏固。[[115]](#_115_Si_Te_Lang____Yu_Mao_Ze_Don)或許他認為，由他親自動手修正他以前設計的，或者說至少由他推廣的制度中的缺陷就可以消除黨內可能對他的批評。如果他真是這樣想的，那么他也實在是太失望了。在1959年7、8月間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和其他人公開抨擊了“大躍進”的一整套政策。[[116]](#_116_Shi_Ji_Shang__Zhang_Wen_Tia)

廬山會議上這場沖突影響之大，無論怎樣估計也不算過分，不僅是在毛對待他的同事們的態度上，而且在他的思想實質上。正如1957年一樣，他犯了判斷錯誤，但這番經歷不僅沒有使他吸取教訓，相反卻使他對自己的尊嚴變得更加敏感起來。結果，從心理角度看，廬山會議以后，毛澤東不僅力圖打擊每一個同他意見不一致的人，而且愈發認為他提出的任何一個想法都是正統的標準。換句話說，任何與毛所規定的正統標準相左的意見，即便不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義”。[[117]](#_117_Yong_Ying_Wen_Dui_Lu_Shan_S)

#### 合成物或折衷主義：毛思想中的中國成分與馬克思主義成分

毛作為統治者的自我形象的產生，勢必產生另一個二元性的問題，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的關系問題。自50年代后期起，這一問題在他的思想中日益突出。1958年5月，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宣稱，“大躍進”的新政策帶有與中國革命的“先生”——蘇聯比一比的意圖。他還說，“我們有兩個生身父母，一是國民黨社會，二是十月革命”。[[118]](#_118___Wan_Sui_____1969Nian___Di)他明確表示把這一說法用于政治學和經濟學。

在毛承認的兩個“生身父母”中，十月革命的重大意義不用作什么評論或解釋。他一直說，中國從列寧、斯大林以及從1917年以來的蘇聯經驗中學到了進行革命，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另一方面，與“國民黨社會”的關系，其所指遠比初看的深刻得多。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1949年的中國人民創造的，因此，它不僅反映了在國民黨統治的20年，也反映了他們在整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態度和風俗習慣。

固然，中國需要一場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革命改造，但這并不意味著要把這個國家變成蘇聯的復制品。1959年3月，毛說：“有些東西不要什么民族風格，比如火車、飛機、大炮，而政治、藝術就應該有民族風格。”[[119]](#_119___Wan_Sui_____1967Nian___Di)在這一論斷背后，我們可以再次感到毛在1938年所表達的信念，即對過去的總結不僅為今天制定正確路線提供了素材，而且也提供了“方法”。

到“大躍進”時，毛就這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蘇聯傳統和中國歷史的經驗教訓相提并論，不分高低，一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蘇聯傳統，一邊是中國歷史的教訓，甚至認為國民黨社會是現階段革命的“雙親”中更重要的一個。六、七年后，他強調的重點又進了一步，多次對黨內的同志說：“我是土哲學家，你們是洋哲學家。”[[120]](#_120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在1964年和1965年，毛稱自己是一個“本國的”或“土生土長”的思想家。這并不意味著他放棄了馬克思而選擇了孔子。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他的思想中的傳統根源仍是十分重要的。不過，在20世紀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初期毛的思想中的中國成分與西方成分是怎樣確切地結合在一起的呢？他們是融合在一起了或是合并成了一個新的合成物？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兩個組成部分中的哪一部分決定了他的整個思想體系的結構？“毛澤東思想”在本質上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變種，因而歸根結底仍然是一種西方化的載體？或者毋寧說，他的思想的邏輯和模式日益中國化？或者根本就沒有體系，沒有清晰的結構，只是由毫無關聯的成分組成的一個不牢固的東西，里面有兩個理論框架在運作，它們有時相互強化，有時相互矛盾？

毫無疑問，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隨著時間的推移，毛的思想的性質和他本人對它的感知發生了變化。在人民共和國的頭幾年里，他仍然把源于西方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視為他一心要編織的新的社會和政治組織結構的經線和緯線。但是到50年代后期，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開始沿某些方向發展。這些方向既反映了“大躍進”政治氣候的影響，又反映在對源出于中國傳統的思想方式的越來越多的強調。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毫無保留地接受了馬克思和黑格爾辯證法的“三個基本規律”（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但在同時，他突出“對立統一法則”，說它是“思維的根本法則”，似乎把它放在其他兩個基本規律之上。[[121]](#_121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He)誠然，列寧是曾說過“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于對立統一的學說”。1957年1月毛引用了這句話又馬上接著說：“這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展。”[[122]](#_122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另一方面，毛歸根到底傾向于這樣一種觀點，即對立統一規律本身概括了辯證法的全部精髓。

1938年斯大林在為《聯共（布）黨史》所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節中，列舉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四個“基本特征”：一切現象都是互相聯系的；自然界處于不斷的運動和變化之中；發展的方式是從漸漸的量變導致質變或“飛躍”；矛盾是一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對立面之間的斗爭“就是發展過程的內在內容”。[[123]](#_123___Lian_Gong__Bu__Dang_Shi_J)

1957年1月在同黨委書記們的談話中，毛明確地就這一問題對斯大林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他既批評了斯大林四個方面的分類在哲學上是不恰當的，也批評其在政治上的含義：

斯大林……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四個基本特征。他第一條講事物的聯系，好像無緣無故什么東西都是聯系的……就是對立的兩個側面的聯系……他第四條講事物的內在矛盾，只講對立面的斗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

顯然，這里指的是1938年以后斯大林對階級斗爭的強調，而在這個階段，毛并不愿把階級斗爭激化到同樣的程度。但是隨后他繼續論述了在辯證法思想方面他與斯大林的區別：

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于同一性的一條，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辭典里說：“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 互相排斥的。”……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

在他們看來，戰爭就是戰爭，和平就是和平，兩個東西只是互相排斥，毫無聯系……戰爭與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聯結，并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和平時期不醞釀戰爭，為什么突然來一個戰爭？……

生與死不能轉化，請問生物從何而來？地球上原來只有無生物……生與死也在不斷地互相斗爭、互相轉化。[[124]](#_124_Zai_Ying_Wen_Yuan_Wen_Li__C)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轉化，為什么經過革命，無產階級變為統治者，資產階級變為被統治者？……

對立面的這種斗爭和統一，斯大林就聯系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么硬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錯誤。我們堅持對立統一的觀點，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25]](#_12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在第二個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文中，用極為類似的措辭，重復了許多對斯大林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批評。他說，斯大林雖然不是完全沒有辯證法，但是是相當缺乏辯證法的。他的辯證法是“吞吞吐吐的辯證法”。毛的總結是，斯大林70％是個馬克思主義者，30％是個非馬克思主義者。[[126]](#_126___Xue_Xi_Wen_Xuan_____Di_21)

雖然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政治上的經驗教訓是顯而易見的，但毛關于階級斗爭的觀點在6個月后發生了急劇的轉變。不管怎樣說，哲學的含義多少是更加晦澀難懂，或至少是更模棱兩可。關于生與死之間相互關系的討論，無疑使人想起了論述自然界盛衰枯榮的古老的道教辯證法。但是，毛在1957年4月說，“辯證法不是循環論”。[[127]](#_127___Wan_Sui_____1969Nian___Di)

上文所引的1957年的那段話，以及毛的其他許多論述，反映了毛對辯證過程的本質的基本看法，問題是，怎么可能在保持這種看法的同時，又依然歸屬于現代的馬克思主義體系？毛對這一兩難問題的解決簡單得驚人——簡單到了這種程度，以至于在面對它時，我（據我所知，還有所有研究這些問題的外國學者）百思不解其意。

1958年1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一文上署了名。當這份指示以草稿形式轉發時，毛有這樣的一句話，10年前我是這樣翻譯的：“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肯定和否定規律是永遠存在普遍存在的。”[[128]](#_128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這里所說的“肯定和否定規律”，我認為是一種中國政治和哲學語言中屢見不鮮的省略語句。“肯定和否定”意在引出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基于這樣的設想，對照其6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觀點，我隨后寫道，毛在1958年“重申了”恩格斯關于三大規律的經典公式。[[129]](#_129_Di_Ke__Wei_Er_Xun_Bian____Z)

事實表明，剛才所引證的中文表述，實際上應翻譯為“否定之肯定規律”，人們正是這樣來理解，而且在當時的中國被當作毛主席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創造。[[130]](#_130_Can_Jian_1960Nian_Chu_Ban_D)

這似乎是一個非常深奧的論點，除了那些對馬克思的學說進行細致辨析的注釋者外，似乎對任何別人都不會產生興趣。實際上，它的政治意義和理論意義都是非常重大的。首先，在哲學領域有一個毛的個人權威問題。最近，有一個學者寫了一本書，他在延安時期曾是毛的哲學研究小組的成員，他宣稱：“毛澤東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把慣稱的否定之否定規律改稱否定之肯定規律。這是他并未進行更多的論述而遺留下來需要哲學界進行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131]](#_131_Yang_Chao____Wei_Wu_Bian_Zh)

幾乎不需要對前面一句話中加了著重號的字的意義作詳盡闡述。因為，由毛澤東引入指示、此后也從未詳細闡述的短語，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成了一條新的規律，被中國的哲學家們斷然接受。這完全可與斯大林在生物學、語言學和其他領域里的所謂“天才貢獻”相媲美。

不過，隱藏在這一理論創造之下的毛的思想傾向也是值得注意的。1983年3月，周揚竟然這樣明確地說，由于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當作黑格爾的遺跡加以擯斥，毛也沒能糾正斯大林的這一“偏頗”，結果最終毛開啟了導致毀滅性暴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門。周揚觀點的核心是，毛對這個舊概念的擔心表現出了這樣一種傾向，即夸大辯證過程中連續階段的絕對對立與相互排斥的性質，而忽略了“否定”意味著在拋棄被否定的事物的某些成分的同時，也保留了其他成分，并將它們合成為一個新的綜合物。[[132]](#_132_Zhou_Yang___Guan_Yu_Ma_Ke_S)如果這就是毛的意思之所在，那么這一新理論確實直接導致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觀念。

而楊超則斷言，在毛看來，每一次否定都使前一階段的大部分被消除。他也提到毛懷疑這個舊公式，并用一個“豐富其內容”的新概念代替之。因為毛認為這意指整個過程的最終結果是回歸到最初的肯定，而不是上升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并且他還說，毛相信“肯定”和“否定”是對立的辯證統一，就像他相信和平與戰爭、生與死、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等的統一一樣。在毛看來，一切事物都是由“肯定和否定組成的矛盾統一體”。[[133]](#_133___Bian_Zheng_Fa_Wen_Ti)

也許把上述兩種觀點合在一起，就能對毛引入這一新概念企圖達到的目的有一個合理的正確理解。顯然，“否定之肯定”的論述所強調的事實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新的事物總是在不斷地涌現出來。不過它也認為，這樣的新事物并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對以前產生的事物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否定之否定），而且它們還受歷史的主體，如各個階級或是那些自稱為階級的代言人的領袖和政黨的肯定或維護。換句話說，“否定之肯定”既引發了無休止的變化，這是“不斷革命的本質”（這并不奇怪，因為這兩個詞在1958年1月的《六十條》中曾被一起使用過），同時也引發了意志的作用。或換種方式說，它是為了適應于從強調經濟基礎到強調上層建筑的進一步轉變。

根據毛的思想的實際政治意義，否定之肯定的概念，最好或許可以看作是上文曾經談到過的“一窮二白”這一說法的象征性的表述。換句話說，它是這樣一種說法，即否定的東西可以轉變成肯定的東西，或是在被稱為“肯定”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轉化過程中，包含有許多消極因素的局面能夠轉化成一個新的、更有發展前途的局面。如果我們接受周揚的分析，那么這種“肯定”將存在于要求迅速而全面變遷的不切實際的希望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以已經取得的成就為基礎的、逐步的、漸進主義的戰略之中。

這樣，在60年代，毛就超越了僅僅對否定之否定重新進行命名并在某種程度上重新進行定義的范圍，徹底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基本概念。在1964年8月18日與康生、陳伯達關于哲學的談話中，康請主席“談談有關三大范疇的問題”。顯然他知道主席有新思想要提出，果然，主席就開始談了：

恩格斯講了三個范疇，我就不相信那兩個范疇。（對立統一是最基本的規律，質量互變是質和量的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沒有。）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同對立統一規律平行的并列，是三元論，不是一元論。最根本的是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就是質與量的對立統一。沒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發展的每一個環節，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隸社會否定原始社會，對于封建社會又是肯定，封建社會對奴隸社會是否定，對資本主義社會又是肯定，資本主義社會對封建社會是否定，對社會主義社會又是肯定。[[134]](#_134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第二年，在1965年12月的杭州會議上，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毛再次非常明確地總結了他的觀點：

辯證法過去說是三大規律，斯大林說是四大規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個基本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質和量，肯定和否定……內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現實等等，都是對立的統一。[[135]](#_135_Tong_Shang_Shu__Di_240Ye)

在過去，一些西方學者，包括弗雷德里克·韋克曼和我本人都認為，在以上這一發展中，毛是在轉向或復歸于更為傳統的辯證法觀點。[[136]](#_136_Fu_Lei_De_Li_Ke__Wei_Ke_Man)不管人們是否接受這樣的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中國傳統思想對毛的整個思想的影響日益突出。

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他對孔子的評價。毛曾把“五四”時期的中文教師斥為把“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著向我們的腦子里灌”的“頑固的先生”。[[137]](#_137__Ren_Min_Qun_Zhong_De_Da_Li)而早在1938年，毛就開始采取這樣的觀點，認為古典文化遺產既有積極的方面，又有消極的方面，因此必須區別對待。另一方面，從“五四”時期以來，他一貫相信用儒家思想來回答20世紀的問題的反動性和有害性。但在同時，從30年代到50年代，他默認了儒教經典著作殘篇中所記載的各種態度，如孔子周游四方，以及“每事問”[[138]](#_138___Mao_Ze_Dong_Zhu_Zuo_Xuan)的做法，他“不恥下問”[[139]](#_139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He)的態度，《孟子》中的勸告，如“說大人則藐之”。[[140]](#_140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然而，就在1964年，毛轉向中國的經典著作尋求靈感。這使他對孔子產生了驚人的好感。1964年2月在關于教育問題的座談會上，毛在批評這位圣賢輕視體力勞動以及對農業缺少興趣的同時，他又說：

孔夫子出身貧農，他放過羊，也沒進過中學、大學……他自小由群眾中來，了解一些群眾的疾苦。后來他在魯國當了官，也不太大……[[141]](#_141_Tong_Shang_Shu__Di_208Ye)

接著在8月，毛在與康生和陳伯達關于哲學的談話中，毛以贊同的口氣從《詩經》中引用了一段話，并評論道：“這是怨天、反對統治者的詩。孔夫子也相當民主。”[[142]](#_142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在毛的政治觀點中，也許“中國的民族風格”最典型的表達，在于他強調道德價值的政治意義，以及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強調國家的教育職能。1958年1月，毛在那個為“大躍進”制訂藍圖的指示中，號召培養新的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他是這樣說的：

中央各部，省、專區、縣三級，都要比培養“秀才”。沒有知識分子不行。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這些人要較多地懂得馬克思主義，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學知識、詞章修養。[[143]](#_143___Wan_Sui_____Fu_Lu___Di_37)

秀才或“有教養的人才”一詞，是帝制時代考試制度中最低層次畢業生（生員）的俗稱，帶有十足的傳統內涵，不能把毛故意使用這詞當作幽默風趣。毫無疑問，毛并非毫無保留地欣賞這個詞，但這詞含有儒家正統學說核心的、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人們受教育是為了做官，而一旦受了教育就有義務承擔起權力的責任。

另一個對過去的附和，是毛在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的觀點，即“外行領導內行”是一個普遍規律。確實，他知道一年前右派分子們提出過這個問題，他們聲稱外行不能領導專家，造成了極大的混亂。[[144]](#_144___Wan_Sui_____1969Nian___Di)換句話說，他的這個命題是對這種觀點的駁斥，他在“六十條”一文中已經駁斥過這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我們是小知識分子，不能領導大知識分子。”[[145]](#_145_S_Shi_La_Mu_Yi_Zi___Mao_Ze)除了正規院校的畢業生對那些在1957年春批評過毛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不滿之外，不難看出，毛在1958年5月的這次講話中所提出的“政治家是搞人與人的相互關系的”這一觀點，又一次肯定了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道德基礎。

幾個月后，1958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在討論法治（像韓非子所倡導的那樣）和人治（像儒教所倡導的那樣）的問題時，毛聲稱：

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養成習慣。……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是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我們）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146]](#_146_8Yue_21Ri_De_Jiang_Yan____X)

這一段話除了有關于中國共產黨與政府機構的關系的含義之外，毛在這里非常有力地表述了國家作為最高教育者的傳統作用的思想。

1964年4月，毛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討論了勞動改造問題。毛說：“歸根結底究竟是人的改造為主，還是勞動生產為主，還是兩者并重？是重人、重物，還是兩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實人的工作做好，物也就有了。”謝對此回答說：“我在浙江省第一監獄宋碩中隊，向犯人宣傳了‘雙十條’（亦稱前十條和后十條，是當時所搞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導方針。該運動在《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7章中已有論述）……讀后，絕大多數原來不認罪的犯人認罪了，許多頑固犯人也有轉變。”[[147]](#_147___Wan_Sui_____1969Nian___Di)

我不認為對政治犯宣讀一項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絕對等同于從前召集百姓宣讀敕令（上諭），不過在相信道德勸誡是政治領導的一個重要方面來說，這里確實有某種內在的連續性，或許毛沒有明確講出的觀點是：新社會的知識分子的政治觀點應該是“馬克思主義”或“無產階級的”，他們又是“資產階級的”，因為他們肯定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起來的現代知識的承擔者，而就他們對自身作用的認識而言，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封建的”。

就本章開頭部分討論的權力問題而言，馬列主義與中國傳統的關系問題在這一領域也許是一個更為模棱兩可的問題。在總體上說，晚清帝制時代國家的正統觀念所規定的儒家與法家學說的綜合，是等級制度與專制主義的。在很大程度上列寧主義也是這樣。就此而論，馬列主義與中國傳統殊途而同歸。此外，如果毛把政治看成是永遠優先于經濟，并最終形成社會變動模式的“綱”，那么，他在這個問題上不但師從了列寧，也繼承了在社會秩序方面盛行中國兩千年的一元論和國家中心論。[[148]](#_148_Guan_Yu_Zhe_Ge_Wen_Ti__Qing)與此同時，毛的思想與中國的傳統也有重要的區別：他把人與社會機構同時看成是正確思想的改造力量的主體和政治活動的目的。

我們在前一部分已經看到：毛關于國家思想的重心在于中央集權。這一思想明顯地貫穿在他從40年代到60年代的所有論著中。所以，他不僅對秦始皇而且對中國歷史上其他強有力的統治者多次褒揚就不足為怪了。1959年他寫道：“殷紂王（通常稱之為‘暴君’）精通文學和軍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壞人，這是不正確的。”[[149]](#_149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_To)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毛有一段著名的話，毛把秦始皇吹捧為“厚今薄古的專家”，并用贊許的口氣引用了得到秦始皇恩準的李斯的奏議：“以古非今者誅”。他還吹噓說，秦始皇帝不過活埋了“四百六十個儒”，而中國共產黨已經處決了百倍于此數的反革命知識分子。[[150]](#_150___Wan_Sui_____1969Nian___Di)

那么，毛澤東從另外的中國傳統，常常被看作不成功的和與帝制格格不入者的意識形態——道教——那里學到了什么呢？我們已經指出，毛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以一系列連續的運動為特征，只是間或點綴一些平靜的時光。這種模式構成了G.威廉·斯金納和埃德溫·溫克勒所稱的“依從循環”。毛自己把這種現象看成是“激烈斗爭”與“靜止鞏固”相交替的“波浪式發展”。[[151]](#_151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_To)

安格斯·格拉姆曾經評論過老子“倡導以無為作為一種治世之策，而不是放棄治世”。[[152]](#_152_An_Ge_Si__Ge_La_Mu____Lie_Z)毛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先是退居“二線”，然后，盡管他又重新保持權威，卻始終（除在幾次紅衛兵集會上露面外）深居簡出，這樣的擔任主席角色的方法，與《莊子》“天道”一章中所闡述的原則有著某些奇妙的相似性：

……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君之道也。[[153]](#_153___Zhuang_Zi_____Shang_Hai_G)

縱觀毛一生，尤其是他在1949年以后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歸根到底，毛顯然更多地受到中國的“偉大”傳統而不是受到“渺小”傳統的強烈影響。[[154]](#_154_Guan_Yu_Zhe_Yi_Wen_Ti_Geng)

這些有關統治者作用的思想，這些與傳統密切相關的思想，在毛生活的最后10年變得更加重要。他在經濟和政治問題上越來越“左”的態度也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對形勢發展的第三個因素、在很多方面也是關鍵性的因素就是中蘇關系中矛盾的逐漸暴露以及毛對這些變化的反應。

## 中蘇分裂的原因與后果

中國共產黨從創立伊始，蘇聯對其發展的影響當然就是廣泛而深刻的。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以至以后的時期內，莫斯科曾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中心和精神源泉。毛對于蘇聯在這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明顯地持有不同態度。毛逐漸地，而且是比較晚地對蘇聯模式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相反，對于中國不僅是共產主義事業中的一個小伙伴，而且應該使中國完全從屬于一個世界革命組織，在革命過程中喪失個性的觀念，毛在任何時候都是不會接受的。

在某種意義上說，毛1936年同埃德加·斯諾的談話對這個問題已作了總體概述。當斯諾問，共產主義勝利后，在蘇維埃中國與蘇維埃俄國之間，是不是會出現“某種實際上合并的政府”時，毛回答說：“我們解放中國不是為了把這個國家轉讓給莫斯科！”毛澤東反駁了斯諾的猜測，并補充說：“中國共產黨不能為俄國人說話，或者為第三國際而執政，而只能代表中國人民大眾的利益。”[[155]](#_155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延安時期蘇共和中共、毛與斯大林之間關系的演變，不屬本章討論的范圍。然而為了說明1949年以后發生的情況，注意一下毛對斯大林在1945年內戰爆發后的艱苦時期的所作所為的評價，看來是合適的。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毛回顧了1960年以來中國因“反赫魯曉夫”被迫將注意力離開國內事務的情形，他批評道，“你看，社會主義國家，馬列主義中出現這樣問題”，接著，他追述了以前的一切事情，繼續說：

其實根子很遠，事情很早就發生了。就是不許中國革命。那是1945，斯大林就阻止中國革命，說不能打內戰，要與蔣介石合作，否則中華民族就要滅亡。當時我們沒有執行，革命勝利了。革命勝利后，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以后到莫斯科，簽訂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也是經過一場斗爭的。他不愿意簽，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最后簽了。斯大林相信我們是什么時候起呢？是從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156]](#_156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1949年6月，在內戰勝利前夕，毛仍然宣布，與蘇聯的聯合將作為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對此，他作了如下總結：“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你們一邊倒。”在回答一個虛構的對話者的這一指責時，毛對其之所以采取這一政策作了詳細的說明：

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157]](#_157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雖然這是1949年就已經明確宣布了的外交路線，但是斯大林的態度使毛執行起來并非總是那么輕松、愉快。像毛后來回憶的那樣，他于1949年12月出訪莫斯科，為了獲得斯大林對中國提供在毛看來是必要的、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幫助和支持，耗費了他兩個月的談判時間，“等于一場斗爭”，當然，問題的一個方面是中國和蘇聯之間的民族利益沖突，以及這兩個大國在50年代以“社會主義陣營”著稱的大統一體中的地位沖突。毛在1958年3月的一次講話中解釋了他自己在1950年莫斯科談判中的態度：

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于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要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158]](#_158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當然，在這些沖突的背后隱藏著的不僅僅是斯大林對另一個最終可能成為蘇聯競爭對手的強大的共產主義勢力的崛起缺乏熱情，或者至少對于世界舞臺上如何維護“社會主義的利益”這個問題上要求享有發言權，而且還有毛與斯大林在中國革命應走什么樣的道路這個問題上長達20年的沖突。對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事情，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一次重要講話中說：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于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志呢？[[159]](#_159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_To)

“認識中國這個客觀社會”當然就意味著抓住在一幅員廣大而且農民占絕對多數的國家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特殊情況，設計一個以土地改革和農村根據地的游擊戰為基礎的斗爭形式。而且它也意味著設計一套新辦法，以便一旦奪取政權的斗爭取得勝利后立即改造社會和發展經濟。假如從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8—1960年的“大躍進”中蘇之間的沖突發展尚未公開化的話，那么困難時期里，中蘇對這些現實問題的沖突就漸趨白熱化。

在這個時期，國外和國內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毫無疑問，二者是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在1956年秋天波蘭和匈牙利的動亂之后，中國人可能很快就明白了，莫斯科今后所能提供的經濟援助會減少，因為要穩定東歐局勢，必須在那里付出更多的代價。就這點來說，中國特別在1958年開始強調“自力更生”的政策，并不完全反映了毛個人的武斷，而且也是對國際形勢客觀現實的一種對策。與同一時期在某些其他國家充當顧問和技術專家的“丑陋的美國佬”相比，“丑陋的俄國佬”顯然不算更有魅力。而且拋開中蘇經濟和技術合作這些心理和外交方面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規劃依靠外國專家來領導，就產生了更為根本的問題，即中國人在塑造他們自己的未來當中起什么作用。

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講話中有一段話，明確而有力地表明了他對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相互聯系的各方面問題的總的態度。他說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幾年：

情況就是這樣，由于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弱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從1958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160]](#_160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毛的這段論述，強烈地顯示出應有的民族尊嚴。他說，照抄外國的經驗，雖然在當時是必要的，但絕“不能是”中國人民的長期戰略。在1958年，當“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經濟和社會試驗剛開始實行時，毛就直言不諱地表示，他知道蘇聯可能會對中國拒絕盲從他們而不滿——而且他們不能不介意。在關于打破“盲目迷信”蘇聯樣板尤其是在軍事領域的樣板的必要性的討論中，他指出，“有人說，蘇聯顧問同志看到我們不準備照搬他們的作戰條令，這使他們很不高興，說了些難聽的話。我們也要問這些蘇聯同志：你們照搬中國的條令了嗎？如果他們說不搬，那么我們也會說：如果你們不照搬中國的條令，我們也不會照搬你們的條令”。[[161]](#_161_Tong_Shang_Shu__Di_126__127)

毛堅持破除蘇聯模式的動機，并不簡單地是出于自尊；在1958年前，他日益對蘇聯模式在蘇聯自身的價值及其中國的可行性產生懷疑已經好幾年了。1956年4月《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標志著他試圖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道路理論體系的開始，毛宣稱：

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做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輕重工業發展不太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里是不存在的。……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162]](#_162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盡管毛澤東對蘇聯經濟發展的經驗有這些疑慮，而且盡管他批評了斯大林迷信階級斗爭和斯大林作為辯證法理論家的缺陷，他對赫魯曉夫1956年發動的非斯大林化運動的方式和性質，仍持嚴肅的保留態度。現在，到了我們更加系統地考察他對這件事情的反應的時候了。

#### 非斯大林化與“現代修正主義”

中國對蘇共二十大的反應，是長期以來推測和爭論的主題。這些推測和爭論只是根據一方或另一方所發表的零碎材料。現在有了大量文獻材料，盡管還不完整，但可考察這個問題了。《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6章已討論了這個問題。早在1956年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即對斯大林做出了評價，縱觀其一生，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毛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就是“按照這個分寸”寫的，盡管具體數字實際上并沒有在社論中出現。[[163]](#_163___Li_Shi_De_Jing_Yan_____Di)毛認為三七開評價是“公正的”，雖然斯大林錯誤地指導了中國革命。[[164]](#_164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半年之后，針對波匈事件的后果，毛在1956年11月2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體會議上作了關于“斯大林這把刀子”和“列寧這把刀子”的著名評論。在毛看來，即使是前一把刀子，也不能用反對“所謂的斯大林主義”的名義簡單地把它拋棄。盡管他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但他覺得應當保護蘇聯領導人的聲譽。至于“列寧這把刀子”，作為反對“議會道路”堅持“十月革命”的模式，毛強調，無論如何都不能丟掉。[[165]](#_16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這種思想傾向在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得到繼續，與4月的那篇社論相比，這篇更加強調斯大林的功績和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斗爭的連續性。另一方面，在1957年2月27日關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毛澤東詳細說明了他對斯大林以及相關的理論和具體問題的看法，其中多少有點不同的態度。

本章第一節里我已經引述了關于斯大林一貫排除異己的一段文字，緊接著這段話，毛以鎮壓反革命為題，對中國與蘇聯之間運用與濫用革命暴力的差別作了比較：

比較起來，我們這個國家的肅反工作究竟做得怎樣呢？是很好還是很不好？缺點是有，但是和別國比較起來，我們做得比較好，比蘇聯好，比匈牙利好。蘇聯太“左”，……和匈牙利比較，沒有那樣右。

他也承認，中國過去有時也犯“左”的錯誤，但大多是在南方根據地時期，受蘇聯影響而發生的；1942年關于反對亂殺、濫抓的指示已經糾正了這些錯誤。甚至在那以后，也曾有些缺點，但絲毫不同于斯大林執政時的蘇聯：“他那個東西搞得不好。他有兩面，一面是真正肅清了反革命，這是對的，另一方面殺錯了許多人，許多重要的人物，例如黨代表大會的代表。”

在這里，毛首先提到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提出的被害者數目，然后承認中國在1950—1952年鎮壓了70萬人，他認為中國的分寸掌握得還“基本上正確”。[[166]](#_166___Xue_Xi_Wen_Xuan_____Di_19)

除了批評斯大林把所有持不同政見者送入集中營或處死的政策之外，像他在1957年1月對黨的書記們的一次談話中所講到的那樣，毛再次提到斯大林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缺陷。但這次，他走得更遠，說與馬克思和列寧，當然還有斯大林相比，他在哲學上有獨到見解：

人民內部的矛盾如何處理的問題還是一個新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對于這個問題談得很少，列寧簡單地談到，他講到社會主義社會對抗消失了，矛盾仍然存在著。那就是說，資產階級打倒了，但人民之間有矛盾。列寧來不及全面分析這個問題的性質。人民內部矛盾有沒有可能轉化成對抗性矛盾呢？應該說是有可能的，但列寧沒有詳細觀察這個問題。斯大林在很長時期內把這兩類矛盾混淆起來了。[[167]](#_167_Tong_Shang_Shu__Di_194Ye)

列寧沒有能對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概念作出闡釋，毛認為這是由于在革命勝利后的最初日子里缺乏經驗。[[168]](#_168_Tong_Shang_Shu__Di_211__221)另一方面，斯大林也未能進行闡述，毛將此歸咎于斯大林本人對辯證法的理解不全面。[[169]](#_169_Tong_Shang_Shu__Di_212__213)

毛總結了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評，指出此事有雙重性質。一方面，破除對斯大林的迷信，揭開蓋子，這是“一個解放運動”。但是在另一方面，赫魯曉夫不加分析，不考慮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他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是錯誤的。毛說，在與蘇聯人面對面的討論中，我們已提出過意見，說他們是大國沙文主義者。[[170]](#_170___Xue_Xi_Wen_Xuan_____Di_22)

當1957年11月毛澤東再度訪問莫斯科，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時，毛談到那時說他仍是“滿腔被抑制的憤怒，主要對斯大林”。盡管他沒有詳細說明原因，因為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了。但是他接著用獨特的口氣明確地說：“在斯大林時代，沒人敢暢所欲言。我兩次來莫斯科，第一次是壓抑的。盡管說的都是‘兄弟黨’，但實際上是沒有平等的。”

他說，現在，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蘇聯同志作風有很多轉變”。接著，他表明了自己的意見，“首先，我們現在必須承認蘇聯是頭，蘇聯共產黨是會議召集人，其次，現在這樣做是無害的”。[[171]](#_171_1957Nian_11Yue_14Ri_De_Jian)盡管已有的莫斯科會議紀要說明毛與赫魯曉夫之間有種親切友好的氣氛，但是這樣一個官樣文章并不能表明毛對蘇聯的思想意識和政治權威的什么崇拜。會后不到一年，沖突的跡象暴露出來了，從任何角度來說這都不會令人驚訝。當然，雙方關系惡化的一個主要因素是莫斯科反對“大躍進”這一新經濟政策。

毫不奇怪，蘇聯人只看到毛的新方式中的某些異端，而沒有看到他的許多方針和目標與列寧主義邏輯是基本一致的。他們對1958年夏天成立的人民公社持非常悲觀的態度，先是赫魯曉夫個人在私下嘲笑，不久就在公開場合進行奚落（見《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11章）。

無疑，蘇聯人也對他們所見到的中國人在工業生產領域提出的夸夸其談的要求感到震驚和惱怒。尤其令他們吃驚的是，在1957年11月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毛就在他們的鼻子底下提出了在15年內趕超英國的鋼產量和其他主要工業品產量的口號，這是其中最為極端的一個口號。[[172]](#_172_Jian_Mao_1957Nian_11Yue_18R)

毛解決國內問題的新辦法及與此密切相連的更加不愿依賴蘇聯援助的態度，本身就意味著中蘇關系日益疏遠。直到1956年12月，毛還明確重申他在1949年第一次提出來的“一邊倒”政策：

社會主義陣營主要是蘇聯和中國。中國和蘇聯靠在一起，這個方針是正確的。現在還有人懷疑這個方針，說“不要靠在一起”，還認為可以采取中間路線的地位，站在蘇聯和美國之間，作個橋梁，就是南斯拉夫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兩邊拿錢，這里邊也拿，那里邊也拿，這樣做法好不好呢？我認為站在中間，這個辦法并不好，對民族不利，因為一邊是強大的帝國主義，我們中國是長期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如果站在蘇聯美國之間，看起來是很好的，獨立了，其實是不會獨立的。美國是靠不住的，他會給你一些東西，帝國主義怎么能給我們吃飽呢？不會給你吃飽的。[[173]](#_173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然而，在1958年，毛與赫魯曉夫的關系急劇惡化，遠遠超出了“大躍進”政策邏輯發展所隱含的范圍。這一不斷加深的分歧并不簡單是，甚或主要是關于非斯大林化爭論的結果，盡管如我們所知，毛對赫魯曉夫沒有與他商量就掀起非斯大林化運動的做法強烈不滿。但同時，毛對斯大林對中國采取的高壓政策也強烈不滿，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贊成赫魯曉夫為縮小斯大林形象所做的努力的。1958年3月他指出：“佛像比真人大好幾倍，是為了嚇人……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中國藝術家把我和斯大林畫在一起時，總把我畫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時蘇聯的精神壓力。”1958年4月，他又說：“我們這位斯大林同志有點老爺味道……過去蘇聯與我們的關系是父子、貓鼠關系。”[[174]](#_174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但是他仍然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說，反對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做法。斯大林的錯誤應當批判，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他也有正確的一面，而對于這正確的一面，“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

盡管他在這點上有保留，但他在1958年3月那次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還是尊重赫魯曉夫的，把他看作從地方黨組織中涌現出來的年富力強的優秀革命者的典范：“地方工作同志，將來總是要到中央來的。中央工作的人總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魯曉夫是從地方上來的。地方階級斗爭比較尖銳，更接近自然斗爭，比較接近群眾。這是地方同志比較中央同志有利的條件。”[[175]](#_175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我想，我們可以肯定，在1958年年中以后，毛在提到赫魯曉夫時再也沒有用過這種基本肯定的詞語。當然，導致兩人之間關系惡化的決定性事件是1958年夏季的外交政策危機（或一系列危機）。赫魯曉夫試圖在沒有北京參與的情況下解決1958年7月的中東沖突，這顯然是產生麻煩的一個主要根源。更為重要的因素也許是毛確信蘇聯領導人正在試圖控制中國的外交政策。

1959年7月29日，毛與彭德懷的對抗在中央委員會廬山會議上達到高潮。當時毛對三份國外批評人民公社的文件（其中包括赫魯曉夫在美國關于這一問題的談話的新聞報道），寫了一個簡要的批語。三天以后，他把這些材料和他的批語的副本送給一位老同志，并附上一個便條，上面寫道：

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之流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于被動了，我 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176]](#_176__Zhi_Wang_Jia_Xiang_De_Xin)

顯然，毛對于那種認為他所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與馬克思主義正統觀念不一致的意見，既憤恨又蔑視。與此同時，對國內也有人像蘇聯人那樣在某種程度上持保留態度的擔心，大大加劇了他對毀謗人民公社言論，更廣泛地說對赫魯曉夫干涉中共內部事務做法（其方式是批評公社，與彭德懷的關系等等）的不滿。

接著，1959年秋發生了塔斯社聲明事件，隨后又是與蘇聯的一系列沖突，毛在十中全會上對此作了如下概述：

…… 1959年9月中印邊界問題，赫支持尼攻我們，塔斯社發聲明以后赫壓我國，十月在我國國慶十周年宴會上，在我們講臺上，攻擊我們。1960年布加勒斯特會議“圍剿”我們，然后兩黨（中國和蘇聯）會議，26國起草委員會，81國莫斯科會議，還有一個華沙會議，都是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爭論。[[177]](#_177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_To)

毛在這段話中用的“圍剿”一詞，曾是30年代蔣介石為了策劃由他發動的消滅共產黨人的戰役而使用的術語，這個詞生動地反映出他已察覺到以前的同志對他的敵對程度。但是，盡管毛對這種敵視感到憤慨，但面對這種敵視仍非常冷靜。在1960年3月的一次講話中，他解釋了他自信的原因：

所謂大反華，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過是一些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其他一些國家的反動派和半反動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分子和半修正主義分子，以上三類人，估計總共只占全人類的百分之幾，例如說5％吧。最多不過 占10％。……所以他們反華，對我們來說，是好事，不是壞事，證明了我們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證明了我們的工作還不錯。……美國和我們的仇恨更大一點，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華，也有間歇性。……不但現在有較小的間歇性，而且將來會有較大的間歇性，……[例如說]，我們全黨全民真正團結一致，我們的主要生產項目的總產量和按人口平均的產量，接近和超過他們了，這種較大的間歇性就會到來，即是說這會迫使美國人和我們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則他們就會被孤立。[[178]](#_178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毛在1960年預測的中美關系改善在后來的10年里并未變為現實。與此同時，中國與蘇聯的關系迅速惡化至極點。在毛講了上面詳細引用的這段話一個月之后，中國人發表了題為《列寧主義萬歲》的社論和其他一系列文章，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攻勢，表面上是針對毛所說的“反華大合唱”成員的“修正主義分子”，即南斯拉夫人，實際上矛頭所向都是蘇聯的“半修正主義”，在毛的著作中，他們很快就成了眾所周知的主要敵人。1962年1月，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實際上發出了推翻蘇聯現政權的號召，這時，形勢到了決定性的轉折點。

他在這次講話中有這樣一段話（1967年作為指示發表），毛說：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篡奪了，但是，我勸同志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179]](#_179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盡管這一講話在當時并沒有公開發表，但是蘇聯領導人還是很快就確信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毛認為他們離經叛道。總的來說，莫斯科和北京的決裂在1963—1964年的公開論戰中充分顯示出來。中蘇論戰的歷史在《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11章已作了敘述，即使把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國回擊蘇聯人的9篇文章的作者都歸于毛的名下，我也不想在這里評價它們的內容。在這一內容里，與此有關的是，毛本人是怎樣迅速地給在9月初剛剛開始的反蘇言論賦予了思想和政策的實質內容。

在1963年9月下旬，政治局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在9月27日，毛在會上作出了“新疆反修斗爭的指示”。他說，第一點是要做好經濟工作，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超過國民黨時期，而且要超過“修正主義統治下的蘇聯”。應當少征購糧食。為了與邊境那邊的情況相比處于優勢，棉布、茶、糖等物資的供應應當“比那邊充分些”。

在這種背景下，毛接著闡明了第二點指示：

（2）新疆在反修正主義斗爭中要加強政治掛帥，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加強各民族干部和人民反修正主義的學習……漢族干部應學習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正確處理民族關系。堅持階級觀點，執行階級路線，相信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絕大多數，進一步增強民族團結，以保證反修正主義斗爭的勝利。

要注意的第三點是教育當地的漢族人尊重當地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毛要求幫助解決那些被派往新疆的漢族勞動者的“婚姻和其他困難”，毛在這一標題下發出的號召表露出某些意味深長的思想。第四點是要密切注視邊境地區的形勢，加強“邊疆的反修斗爭”。第五點是要警惕“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分子”的“顛覆和破壞，以及他們的軍事人侵”。最后一點是講反修斗爭中的“一元化領導”。[[180]](#_180___Mao_Zhu_Xi_Guan_Yu_Guo_Ne)

事實上，毛澤東確信中國很快就能夠趕上蘇聯的生活水平，不僅是它的中亞部分，而且要趕上蘇聯整個國家的生活水平。1964年1月他對路易斯·斯特朗說：

赫魯曉夫認為，現在中國是五個人穿一條褲子，大家喝清水白菜湯。他說這個話的時候，正是他那里褲子太少而清水湯太多的時候。他的日子比我們好過不了多少。[[181]](#_181_Si_Te_Lang____Yu_Mao_Ze_Don)

不管毛實際上是否相信這點，但他確信，蘇聯試圖用它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老大哥地位來擴大它自身的經濟利益。1960年在他關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讀書筆記中，毛就已經批評了莫斯科在“經互會”中的經濟專業化政策。“經互會”是蘇聯支配東歐的經濟組織。這一政策的圖謀是使某些國家對它們的某些先進鄰國，尤其是對蘇聯處于農業原料供應國的地位。[[182]](#_182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這一點一直使他氣憤，在1964年1月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毛宣稱，“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是赫魯曉夫想讓他們生產單一的經濟產品以滿足蘇聯的需要……當兒子真難當”。[[183]](#_183_Si_Te_Lang____Yu_Mao_Ze_Don)

因此，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澤東的語調日益表現出堅定的民族主義傾向，這不僅僅是對帝國主義封鎖中國的反應，也是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回擊。與這種傾向和中蘇關系的一般演變相聯系的，是日益增長的激進主義，首先表現為對階級斗爭的強調。這種“左”的轉向，就像在本章第一節所指出的那樣，是“大躍進”政策的自然派生物，但是又被毛對赫魯曉夫“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的厭惡進一步予以推動。此外，由于對蘇聯內部出現修正主義的震驚，毛澤東開始覺察到中國本身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因而，又有另一因素注入了這一復雜的過程，這一過程終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潮。

#### 內部的敵人：毛澤東逐漸沉湎于階級斗爭

正如本章第一節結尾所指出的，1957年夏天毛大大地改變了他對中國社會矛盾性質的看法，這種轉變對經濟政策的后果我已作了探討，它在哲學領域的某些含義也已提及。既然對1957年以后毛的思想傾向與中蘇沖突之間的關系已作了回顧，現在該是研究中國中心主義，對馬克思的一種激進解釋，以及由于對過去英雄品質的懷戀所引起的“左”傾情緒等諸種因素合在一起如何導致毛進行史無前例的試驗的時候了。

20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的思想和政治態度日益激進，其中的關鍵因素當然是他更加尖銳而固執地強調中國社會內部階級斗爭的存在和重要性。因此讓我們先簡要回顧一下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段時期內毛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的演變。

在1957年10月9日召開的三中全會的講話中，毛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他的新觀點。他放棄了前一年在黨的“八大”上正式通過的觀點。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他本人在1957年2月還重復了這一觀點，大意是說現階段中國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現在毛卻斷言：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過去主要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那個任務已經完結了。那么，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么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184]](#_184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以上所引的毛的被修正了的提法在現在的中國當然被認為是不正確的。無論正確與否，強調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和“兩條路線”之間的階級斗爭卻成了毛晚年思想的主要特征。在隨后的19年中，毛澤東在提倡階級斗爭的熱情和嚴厲性以及在分析現存階級關系方面當然有很大的偏差、轉折和波動，但大方向沒變。

在“大躍進”前夕，毛用相當古怪的術語表達了他對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看法。他指出，“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決定于三大階級之間的關系”：（1）“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右派分子以及他們的代理人”；（2）“民族資產階級”，他說這里所指的是除右派分子以外的這一階級的所有成員；（3）“左派，即勞動人民、工人和農民”，對于最后一類，毛澤東后又附帶作了補充：“其實是四個階級，農民是另一個階級。”[[185]](#_185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在1958年4月6日漢口會議上的講話中，毛糾正了一種反常現象——沒有指出農民的特殊作用，卻繼續把“帝國主義”包括在中國現存的階級當中。這一次，他對這一問題作了如下闡述：

……國內有四個階級，兩個剝削階級，兩個勞動階級。第一個剝削階級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殘余，30萬右派也包括進去。地主現在分化了，有改造過來的，有沒有改造過來的。沒有改造過來的地、富、反、壞和右派分子。這些人堅決反共，就是現在的蔣介石、國民黨，是敵對階級，如章伯鈞等。黨內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樣的，……這些人加起來大約占人口的5％，就是3000萬……這是敵對階級，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10％分化出來，就是大勝利。……幾年以后，他們把心交出來，真正轉變，可以摘掉帽子。[[186]](#_186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第二個剝削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包括農村富裕中農。毛把他們說成是搖擺不定的和機會主義的階級。關于“兩個勞動階級，工人和農民”，毛指出：“過去心不齊，意識形態，相互關系沒有搞清楚。”他接著指出：“工人農民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做工，種田，我們在相互關系問題上，過去處理不恰當。”

“大躍進”的后果，使毛以前結合了客觀標準和主觀標準的關于階級問題的觀點因一點新因素的加入而被修正。這種新因素就是干部和知識分子中的特權分子構成了萌芽狀態的階級的觀點。這一傾向是同上面所談到的一代人的變化相聯系的，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因為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習慣了某種生活水平，所以必須付給他們高薪。關于這一問題，中國報紙在1956—1957年曾展開過廣泛的討論。1957年1月，毛本人也為此進行辯護，因為他說過出“一點錢”“買”資本家以及與他們有聯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的話。[[187]](#_187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顯然，同樣的照顧并不適用于新培養出來的年輕人，他們沒有這樣的奢望，也許他們被認為有較高的政治覺悟。

我已經提到，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提倡“供給制”。當然，他的這次講話當時沒有公開發表，但其思想的主要內容在1958年10月《人民日報》轉發的張春橋的文章中得到了體現。張的文章于9月份在上海首次發表，實際上絕不僅僅是張和毛的觀點偶然巧合的一致，這是一種精明的政治謀略的結果。上海的“左”派市長柯慶施出席了北戴河會議，他在電話里向張春橋通報了他關于毛講話的筆記。這給張春橋的文章提供了靈感。一看到這篇文章，毛就決定在北京轉載。因此，毛的這一舉動既表明他易于接受奉承，也表明上海環節（如果此時尚未形成上海網的話）在此時就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了。[[188]](#_188_Guan_Yu_Ke_Qing_Shi_Suo_Qi)

毛在《人民日報》上為張春橋的文章寫了編者按。他說，文章所表達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他認為有“一些片面性”，而且，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189]](#_189_Zhang_Chun_Qiao___Po_Chu_Zi)但是，即使毛認為張對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觀念”或馬克思所界定的資產階級法律規范過于急躁，用這一用語所提出的問題在他以后的講話和文章中卻一再出現。簡言之，毛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勞分配所造成的不平等與馬克思論及資本主義社會時所界定的“資產階級權利”在性質上是相似的。正是這一點為他的下述論點提供了理論基礎：由于黨內存在一大批依戀其特權的高級干部，因此，黨是產生資產階級或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分子的溫床。[[190]](#_190_Zhong_Guo_Zui_Jin_Dui_Mao_Z)

我已經強調了1959年廬山中央全會的重要性。這次會議成為日益強調階級斗爭的轉折點。毛指責彭及其盟友是混入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191]](#_191_1959Nian_9Yue_11Ri_Dui_Jun)毛聲明，廬山的這場斗爭已經是階級斗爭了，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而且預言，這種斗爭“至少還要延續20年”[[192]](#_192__Ji_Guan_Qiang_He_Po_Ji_Pao)（結果是毛幾乎全力促使這種斗爭發生）。

在討論“文化大革命”前這段時期毛澤東“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的錯誤”時，鄧力群指出了毛日益增長的激進主義的另一根源：“事實上，1958年以后，毛基本上沒有注意經濟工作，這就影響了毛對階級和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193]](#_193_Deng_Li_Qun_Zai_1981Nian_8Y)不應望文生義地認為上述說法意味著毛此后對與經濟有關的任何問題都沒有興趣。畢竟，正是在1960年他寫了研究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讀書筆記，而且現在說1961年3月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六十條”是他親自主持起草的。[[194]](#_194_Tao_Kai___Kai_Shi_Quan_Mian)所以，鄧力群的觀點是，毛雖然還不斷地談到經濟制度的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但他對經濟學或者經濟現實并沒有多少認真的興趣。從這個意義講，鄧的結論無疑是有道理的。

從1959年以來，毛越來越堅信，中國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傾向不僅僅是“工作作風”中的缺點所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共產黨及其干部中階級性質的最初變化，不僅是毛，劉少奇及其他同志長期以來也一直譴責這種傾向。毛對蘇聯情況的觀察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這種看法。他在1960年就社會主義社會在消滅階級以后又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問題作了評論。雖然這些評論出現在他研究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讀書筆記中，但這番話顯然也是想適應用于中國。

今天的中國確有一些學者認為，毛對蘇聯“修正主義”進行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制造一個武器，以對付中國共產黨內部那些不同意他觀點的人。這或許有些言過其實，毫無疑問，毛對赫魯曉夫的俄國深感厭惡，在他看來，它所具有的一切都已停滯不前了。事實上，毛還追溯了蘇聯體制弊端的最初根源。他斷言，十月革命之后，蘇聯沒有徹底解決好“資產階級權利”的問題。結果，出現了對沙皇時代等級制度的懷戀，多數黨員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農民沒有提升的機會。[[195]](#_195___Xue_Xi_Wen_Xuan_____Di_30)他還指出，蘇聯沒有徹底破壞資產階級的自由；因而也就沒有建立起無產階級的自由；中國的政治和思想革命一直比較更徹底些。[[196]](#_196_Tong_Shang_Shu__Di_311Ye)毛最嚴重關切的仍是這種有害傾向可能會在中國生根的危險。這時，毛已經看到，中國干部中被這種毒素感染的人是兩個特點造成的。在他以后的有關思想中，這兩種特點一直處于中心位置。一方面，他們依戀根據“按勞分配”原則即“資產階級權利觀念”所帶來的特權；與此同時，他們的行動又像封建地主一樣。毛說：“人這種動物很有趣”，“稍有一點優越條件就覺得了不起”。[[197]](#_197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1962年1月，在一篇主要強調必須繼續與舊的反動階級（地主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的講話中，毛說他們“仍妄圖復辟”。同時他又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198]](#_198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1962年8月，在十中全會前的北戴河中央委員會預備會議上，毛宣布：“《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的高潮》（由毛親自編輯）一書中一段按語講資產階級消滅了，只有資本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講錯了，要改過……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199]](#_199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就實際情況看，資產階級可以“新生”這一說法留下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即毛指的是舊的資產階級可以再生，還是說資產階級的幽靈或本質能夠以一種新的、能適應社會主義社會條件的形式而獲得新生，這是我們關心的中心問題。他可能是指第二種情況，即德熱拉斯和其他人所稱的“新階級”——盡管毛本人從未使用過這個詞。然而，這些“新資產階級分子”究竟僅僅是孤立的個人，他們因濫用職權而腐化墮落呢，還是所有干部都因其擁有的權力和特權而傾向于成為這種人物呢，關于這一點，毛在60年代中期似乎還難以作出判斷。

60年代初，他強調金錢的腐蝕作用和用錢換來的好處，這是他的第一個傾向。于是，在繼續承認物質刺激在中國現階段是必要的同時，他又認為，物質刺激應當服從于政治思想領域的“精神鼓勵”，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體利益。[[200]](#_200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在1962年1月30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把“五類分子”同他們個人的社會根源聯系起來。他說：“人民民主專政要壓迫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代表的是地主階級和反動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四五。這些人是我們要強迫改造的。”[[201]](#_201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在1962年9月至10月召開的十中全會上，毛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口號，并親自修改了概括他思想的全會公報。[[202]](#_202___1981Nian_Jue_Yi__Zhu_Shi)就像五年前他在三中全會上的講話和廬山的爭論一樣，這一次標志著進一步轉向大搞“階級斗爭”的政策。但是，正在成為斗爭對象的這些階級的性質和地位基本上仍是模糊的。在1962年1月的講話中，毛曾提到“這些階級和壞人”。換句話說，盡管毛說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代表地主和反動的資產階級，但他們未必都來自這些階級。從1962年夏至1963年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正在形成過程之中。在此期間，毛的兩段話特別強調了黨內離心傾向的階級根源，但與此同時，他仍然強調通過教育繼續進行改造的重要性。

8月9日，毛在北戴河的談話中指出：

黨員的成分，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知識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203]](#_203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1963年5月，在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第一個指示（即“前十條”）公布前夕，毛對黨的階級構成作了完全不同的分析，但還是用極為類似的措辭談到了“改造”問題：

從黨內成分來看，我們黨內主要成分是工人、貧雇農，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黨內有大量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識分子，還有相當數量的地主、富農的子女。這些人有的馬克思主義化了，有的化了一點，沒有全部馬克思主義化，有的完全沒有化，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沒有入黨。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思想準備。另外，這幾年還鉆進一些壞人，他們貪污腐化，嚴重違法亂紀。……這個問題要注意，但是比較好處理。主要問題是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知識分子和地主、富農子女，對這些人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對黨員干部進行教育、再教育，這是一個重要任務。[[204]](#_204___Zi_Liao_Xuan_Bian_____Bei)

顯然，從這兩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對于毛來說，盡管客觀的社會出身仍很重要，但通過政治教育對整個階級進行個人改造也同樣是一個關鍵的方面。如果情況是這樣，那么，毛在1963年比1962年更強調“改造”，即主觀標準。

1964年5月，隨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展開，毛在聽取四位副總理匯報工作時宣布：

一定要很好的注意階級斗爭。農村“四清”是階級斗爭，城市“五反”也是階級斗爭。……城市要劃成分。至于如何劃法，將來做時要作出標準。不能唯成分論，馬、恩、列、斯出身都不 是工人階級。[[205]](#_205___Za_Lu_____Di_351Ye____Mao)

在一條未注明日期，但幾乎可以肯定是寫于1964年下半年的關于劃分階級的指示中，毛明確論述了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之間的關系：

劃分階級有必要……這兩個，（客觀的）階級成分和本人表現要區別，主要是本人表現。劃分階級主要是把壞分子清出來。

階級出身和本人表現，也要加以區別，重在表現，唯成分論是不對的。問題是你站在原來出身的那個階級立場上，還是站在改變了的階級立場上，即站在工人、貧下中農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義，又要團結大多數，連地主富農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團結，地富子弟，要團結，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壞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應當要他們，都要嘛。[[206]](#_206___Za_Lu_____Di_351Ye__Ling)

可以認為，過去有幾個相互矛盾的對立面尚能在能動的和創造性的緊張關系中共存，到毛的晚年卻開始分離了，從而釋放出一股能量，最終驅使毛的思想和行動走向破壞性的軌道。在幾個決定性的、相互關聯的方面，以前的統一體從1962年秋八屆十中全會開始解體。毛越來越把享有特權的領導者同其他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看作對抗性矛盾，而不是人民內部矛盾。由此，從這一洞察中產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一個包括所有享有特權的當權派在內的實體，即中國共產黨已根本不能在與群眾的接觸過程中得到鍛煉和凈化，而必須徹底打碎，至少要打碎一大部分。

毛澤東思想結構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發生極為復雜的分解或解體過程，除了黨或黨內特權分子與群眾的關系之外，還涉及其他許多對矛盾。我已經用相當篇幅探討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的相互作用，也曾探討了蘇聯模式與中國經驗之間的關系問題。

中蘇沖突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為“一分為二”這一核心思想提供了歷史背景。1963年10月26日，周揚在中國科學院作了一個題為《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所面臨的戰斗任務》的報告。這篇報告在毛70壽辰之日（1963年12月26日）公開發表，這也實在太巧了。很明顯，它代表了毛澤東本人的思想。在報告中，周揚用“一分為二”的原理分析了從馬克思時代至當時的工人運動史。[[207]](#_207___Bei_Jing_Zhou_Bao____1964)

事實上，毛本人早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會議上就使用過這一表達方式。盡管他當時強調的不是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分裂，而是這樣一些事實：所有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都“充滿”了矛盾；任何事物都有好與壞兩個方面，他得出結論：“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現象，這就是辯證法”。[[208]](#_208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Zh)

緊接著周揚1963年的講話發表后，“一分為二”這一口號首先喚起了在中共黨內進行（用毛的話來說）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要求。換句話，這意味著號召進行階級斗爭（正如《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10章論述的那樣，這也是為了清除和迫害楊獻珍及其他提出相反提法——“合二為一”的人）。

毛宣稱，這一原理構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核心”。并由此得出結論，說電子也像原子最終要被分裂。但他首先相信的是，不論現在還是將來，社會范疇和政治力量都會不斷地發生分裂。[[209]](#_209_An_Nuo__Lu_Yi_Si__Si_Te_Lan)

歸根結底，毛與其他領導成員的沖突當然是圍繞著建設社會主義應當采用何種基本的政治和經濟戰略問題展開的。但文化領域也是一個重要的戰場。60年代初期，毛認為，文學和哲學的某些發展不僅是種種不良傾向的表現，而且已成為通過上層建筑機構向社會主義根基發動進攻的武器。因此，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達了他的這一憂慮，并同時發出階級斗爭的號召，這絕不是偶然的：

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個大發明。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府，先要制造輿論，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210]](#_210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這一論述的明顯含義是：在被奪取政權13年以后，“反革命階級”依然在中國進行活動，企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為阻止他們的破壞活動，有必要在上層建筑領域里進行經常性的斗爭。正是在這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呈現其萌芽狀態。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更成為龐然大物。由于這一時期毛的階級概念有些含糊不清，這一理論的發展顯然進一步表明他強調的重點是上層建筑和主觀力量，而這從一開始就是毛的思想的特征。

正如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關于階級斗爭的號召導致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樣，這一論述也推動了文藝批判運動，鼓勵了江青去發動京劇改革。在《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10章里，我已對這些政策及其后果進行了描述和分析，這里只需簡要地提及毛繼續火上澆油的兩條指示就足夠了。1963年12月，毛抱怨藝術、文學和戲劇的許多部門仍由“死人”統治。他宣稱：“社會和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他的判斷更加嚴酷了，他說，中國作家協會“15年以來，基本上（著重點是毛加的）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他們將會變成另一個裴多菲俱樂部。[[211]](#_211_Zhe_Xie_Shi_1967Nian_5Yue_C)換言之，他們將會變成徹底的反革命，并將作為反革命受到處置。

與此同時，從1963—1964年，毛愈來愈懷疑知識分子在革命和發展中的作用。毛并沒有使他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發展到像“四人幫”那樣以“臭老九”來丑化他們的地步，他轉向了比“大躍進”時期更為極端的教育政策。他在1964年2月說：“書不能讀得太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也不能讀得太多，讀十幾本就行。讀多了會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212]](#_212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毛之所以向藝術、文學、哲學和教育所有這些不同的領域中間知識分子的頭面人物發動進攻并不是因為他們是剝削群眾的特權分子（盡管他可以證明他們就是特權人物），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接受他烏托邦的斗爭哲學，沒能全心全意地執行他的指示。

1964年夏，毛尖刻地指責了全黨在物質生活方面的腐敗現象，他說：“現在幾包煙就能買通一個支部書記，把女兒嫁給他就更不必說了。”[[213]](#_213_Tong_Shang_Shu__Di_217Ye)

這里提到基層干部表明，在劉少奇拿出“修改了的后十條”前不久，毛并非完全不同意這樣的觀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應當針對基層和較高的領導層。無論如何，毛更擔心的是享有特權的城市精英的態度和行為。1964年6月，在一次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談話中，毛說道：

不要老是掙錢，掙來了錢，就亂花錢……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政策，必要時可以收買，對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什么要收買？錢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圍的人……蘇聯的高薪階層，先出在文藝界。[[214]](#_214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正如我們在《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7章中所討論的，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最后沖突是在1964年12月發生的。當時，毛對那些他認為歪曲并篡改了他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原定戰略的東西感到不滿，因而提出了新的二十三條指示。毛后來聲稱，劉拒絕接受這一指示。在這段時期，他發表了大量關于“新資產階級”的講話，這些講話反映了這樣一個觀點：在新資產階級中，權力而不是金錢成為決定性因素。

也許值得一提的是，盡管階級成分與工資差別問題顯然是毛特別關心的問題，但即使在這時，他對此仍表現出一種寬松和幽默的態度，而這在“四人幫”那些沉悶和狂熱的理論家的文章中是很少見的。毛說：“吃多和占多是件相當復雜的事。”“像我們這樣的大人物，有汽車，有帶暖氣的房子，有司機。我只掙430元，我雇不起秘書，但我必須雇。”[[215]](#_215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在理解這段話時，我們不能不參考毛在1964年早些時候所說的這樣一句話：“宣統的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個皇帝。”[[216]](#_216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人們有這樣一種印象，對毛來說，除了“工人”、“貧農”、“革命烈士后代”等等外，還有另一種成分，那就是統治者。凡與毛的地位，與這位以前皇帝地位不同的人，是不能允許他們繼續迷戀其特權的。

因而，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討論中，他再一次譴責了干部中那些主要關心自己拿更大的工資份額的“當權派”，并同意給其中的“極端惡劣分子”戴上“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但他警告不要過多地估計他們的人數。并且說，對他們不要提“階層”，叫分子或集團就行了——很明顯，他們的人數還很少，不能構成一個完全的階級。[[217]](#_217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一星期以后，也就是1964年12月27日，毛宣稱，中國共產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和一個資本主義派。這兩派就這樣體現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218]](#_218_Tong_Shang_Shu__Di_597__598)

這些論述以及毛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決心，當然直接導致了他與劉少奇及黨內其他人的沖突，并導致“文化大革命”。

## “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

在討論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思想實質以前，向我們自己明確提出如下問題是十分必要的：毛為什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他的這一決定同上文所闡述的“大躍進”及“大躍進”以后所出現的綜合征之間有什么關系？他采取這種極端的行動路線是否因為他的思想受到了歪曲或曲解，或者像他自己認為的那樣是因為某些現實問題在困擾著他——這首先是要懲罰并最終消滅批評他的那些人的愿望？

尤其在討論毛關于辯證法、階級斗爭的那些正在變化的觀點時，我已指出，在我看來，這兩個過程的因素均在起作用，但主導因素是第二個。換言之，其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心理根源顯然要比理性方面的東西更為重要。正如一位中國作者所說的，人們使毛完全相信，只有他本人的觀點才是對馬列主義唯一正確的解釋。在毛看來，任何不同意其觀點的人自然是修正主義者。結果，“事實愈證明他的思想不能付諸實踐，他愈把這視為階級斗爭的反映，……視為黨內出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反映”。[[219]](#_219_Wang_Nian_Yi___Mao_Ze_Dong)

#### 專政、造反和靈魂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思想及政策發明中，以激進的方式號召懷疑黨和各種形式的權威（主席的權威除外）是這場動亂之初最為引人注意的現象。回顧起來，毛對上層領導的否定并不像當時表現出來的那樣廣泛，盡管如此，他也實在走得太遠了。

毛在1960年對蘇聯那本教科書的評論中宣稱：“不管什么，歷史不是英雄創造的，而是人民群眾創造的。”[[220]](#_220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即群眾只有得到正確的領導，才能發揮其創造歷史的作用。1965年12月，與黨的大規模沖突來臨之際，他又向前邁了一步，宣布民主就意味著“群眾的事情要由群眾自己來管理”。他接著說，有兩條路線：一是完全依賴少數人，二是動員群眾。他說，“民主政治”“必須依靠每個人來管理事情，而不能只依靠少數人”。與此同時，他再次號召要依靠“上級黨的領導和基層廣大的人民群眾”。[[221]](#_221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只是到了1966年3月“文化大革命”真正開始時，毛才發出了更為激進的號召，提出群眾可以不需要黨的集中領導：

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殿，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地方要多出幾個孫悟空，大鬧天宮。[[222]](#_222_Tong_Shang_Shu__Di_640Ye)

兩個月以后，這些“猴王”高舉著毛的語錄，包括“造反有理”這一口號，突然登上了歷史舞臺。“造反有理”這一口號是毛在1939年創造的，并把它歸功于斯大林——這是種種諷刺中的諷刺。[[223]](#_223___Mao_Ze_Dong_Ji____Di_7Jua)“敢于造反，是無產階級黨性的基本原則”，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宣稱，“革命者就是孫猴子，……我們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我們要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224]](#_224___Ren_Min_Ri_Bao____1966Nia)這些紅衛兵所要打碎的舊世界，當然，是受黨控制的；他們不準備去糾正它，而是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使之冰消瓦解，用一個全新的秩序去代替它。

毛本人從未宣布過這樣的目標。他在8月23日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主要問題是各地所謂‘亂’的問題。采取什么方針？我的意見是亂他幾個月……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哩！”[[225]](#_225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照字面理解，“幾個月”可能是3個月或4個月，最多也就是6個月。其本質上是要使“文化大革命”更像一次普通的整風運動。盡管如此，由于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一段時期內，黨只能以基層黨委的形式存在，中央機構已被有效地打碎并停止工作。毛至少是在冒險，他不惜打碎他曾經為之奮斗40多年的政治機器，以便從中清除他的敵人。

隨著事情向著這一方面的發展，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黨的生存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毛不得不在列寧主義與無政府狀態之間作出選擇。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1967年2月，他在與張春橋和姚文元談話時提到，上海有些人要求取消所有的部長，“這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是極端反動的。現在都不愿叫某某人某某長，而叫勤務員、服務員。其實這只是形式，實際上總還是長的”。[[226]](#_226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在討論到反對把政府機關稱作公社時（張和姚在上海就是這樣做的），毛質問道：“我們黨放在哪里？……在一個公社里必須要有黨；公社能代替黨嗎？”[[227]](#_227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隨后9年的歷史充分證明，在毛看來這是不可能的。

此時，另一種矛盾也逐漸變得尖銳起來。毛一貫認為，應該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但是，自1960年以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政治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當然這一趨勢開始時實際上乃是毛企圖在林彪掌握的人民解放軍中形成一個權力基礎的一種戰術調動，這是因為他感到黨正脫離了他的控制，而絕不是因為他思想中有了任何革新或突然的變化。但是，無論他本人當初的意圖如何，實施這種戰術很快把毛引向一些具有重大理論含義的方向。

在1964年2月發動“向人民解放軍學習”的運動（見《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7章）中，工業企業、學校以及全國其他各單位，都用軍隊的方式建立了政治部。這是事態發展中最重要的東西。軍隊不僅為這些部門提供了模式，而且還向它們提供了人員。這是毛事先就已親自決定好的。1963年12月16日，他在給林彪、賀龍、聶榮臻元帥和肖華將軍的一封信中說道：

國家工業各個部門現在有人提議從上至下（即從部到廠礦）都學解放軍，都設政治部、政治處和政治指導員，實行四個第一和三八作風。我并提議解放軍調幾批好的干部去工業部門那里去做政治工作。……看起來不這樣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個工業部門（還有商業部門、農業部門）成百萬成千萬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這個問題我考慮了幾年了。[[228]](#_228___Zi_Liao_Xuan_Bian_____Di)

這種依靠軍隊而不是黨去領導其他組織的做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同樣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義的事實是，到196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已逐漸成為中國人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導師。正是軍隊在1964年5月編輯出版了第一部“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另外，雖然至今人們并不認為毛參加了語錄的編輯工作，但他是語錄的作者，該書序言的絕大部分出自1960年10月軍委會議的決議，[[229]](#_229_1960Nian_10Yue_20Ri_De_Jue)而這一決議是毛親自改寫和批準的。因此，這一階段確定了1966—1972年間無政府狀態與軍隊控制之間的辯證關系，同時也確定了毛澤東思想中各個極點的進一步和最終的分離。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許多似是而非的悖論與青年人的作用毫無關系。一方面，在運動一開始毛向紅衛兵們發出號召，要求他們像他和他那一代學生在1919年沖上歷史舞臺一樣，爭當先鋒。但是，另一方面，1966年及其以后的方針卻又極大地削弱了這些受過教育的精英們的作用。紅衛兵的無組織無紀律及自我放縱行為可以部分說明毛為什么這樣做。1968年12月開始，毛把他們送往農村向農民學習，去提高“無產階級覺悟”。在此之前，1968年夏曾為此批評過紅衛兵。但這種悖論也反映出，在毛的思想和政策中，并沒有十分清楚地認識到專業知識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從理論上講，所有這些矛盾均可在“又紅又專”的口號下達到更大的統一。但事實上，“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使重點發生了很大偏差，其方向不是用政治來補充知識和技能，而是用政治代替了知識和技能。于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毛所孜孜以求的現代化事業的整個基礎實際上被大大地削弱了。

很多過分行為的根源乃是1968年7月21日毛發表的一項指示。這項指示說：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230]](#_230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1968年7月28日毛對上面這段文字作了評論，也可能是對7月28日他與紅衛兵領袖的談話作的評論。在這個評論中毛本人看上去并不是特別關心用于實踐的技術，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懷疑正規教育的價值。他說：“大學還要辦嗎？”“要不要招生呢？如果要招呢；比如講文科，你不招也不行。我那個講話是留有余地的，并不是說文科一定不要辦，我今天講的是理科、理工科”。然而，毛又繼續說道：“如果文科搞不出什么名堂，那就拉倒。”他說，高小學的東西到初中重復，高中學的東西到大學又重復，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像恩格斯和他自己年輕時候那樣：自學或自修大學（像毛在1921年所做的那樣）。他最后說：“真正的大學是在工廠和農村。”[[231]](#_231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在理解這些話時，應考慮到這樣一些事實，即與此同時，毛向他的那些紅衛兵對話者們傳達了一個非常嚴厲確實也非常無情的信息：即聯歡會結束了，過去兩年來他們一直熱衷的活動再也不能被容忍了。在這種情況下，毛在某些事情上對他們表示贊同，給藥丸包上糖衣，這是可以理解的。毛接著還說，考試是浪費時間，“所有的考試都應廢除，徹底廢除。誰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呢？誰考林彪同志呢？誰考我呢？謝富治同志，叫學生們都回學校去”。[[232]](#_232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學生們確實將被召回學校，雖然學校的考試規則被廢除了（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但社會秩序卻有力地恢復了。在向紅衛兵領袖解釋為什么不得不停止這一已經使成千上萬人流血犧牲、兩敗俱傷的爭斗時，毛宣稱：

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斗、批、改，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們少數大專學校是在搞武斗。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你們能用這種方式聯合成一個王國嗎？

毛警告說：“如果你們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可以采取軍管，叫林彪下命令。”[[233]](#_233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當然毛確實這樣做了，但是不管蘇聯人和各種各樣的“左”派怎樣想，軍隊專政絕不是毛的理想。他“采取軍管”是因為除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外沒有其他手段能夠阻止這場派性斗爭。這種派性之間的戰斗不僅僅是用磚頭和彈弓打，而且還用步槍，甚至迫擊炮和其他重型武器。一旦局勢變化、條件允許，毛就會重新確立黨對“槍”的領導。他在1971年8月至9月與大軍區司令員的一次談話中論證了這一步驟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復雜的政治和經濟事務中行使領導權，不是最好的辦法。他說：“軍隊歷來講雷厲風行的作風我贊成。但是，解放思想不能雷厲風行，一定要擺事實，講道理”。事實上，這些講話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復黨的統一領導，使軍隊服從于黨。毛說：“地方黨委成立了，應當由地方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如果地方黨委已經決定了的事還拿到部隊黨委去討論，這不是搞顛倒了嗎？”[[234]](#_234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在中國以外的人普遍認為，1969年4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回顧歷史，盡管劉少奇在這次會議期間所受到的正式貶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但是，從1966—1976年所發生的一系列拋物線狀的事件就是這樣，也許我們能像中國人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說的那樣，更為準確地將其稱為“文革十年”。然而，從九大開始，我們確實看到毛澤東思想中出現了一些重要的新主題和新公式。

#### 馬克思與秦始皇：模棱兩可的遺產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使用“文化大革命”這一術語作為一個簡便的標簽來描述，從1966年開始的這段時期，還沒有進一步探究它的含義。在深入分析所謂“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內容以前——因為這場運動在1969年以后繼續展開了，讓我們首先考察一下這一表達方式的正確含義。

姑且不論“偉大”這一形容詞，它純粹是為了修飾或加強語氣，那么，這是“無產階級”的嗎？是“文化”的嗎？是一場“革命”嗎？很清楚，毛相信這三者都是名副其實的。在我看來，這三者都不真實。但是，毛為何認為它們是名副其實這一問題，正是理解他最后10年的一切思想的核心所在。

事實上，毛賦予他1966年發動的這場運動的三種屬性，其理由卻是完全重疊的，因而它們或是一起成立，或是都不能成立。換言之，這場運動是無產階級的、文化的，又是革命的，否則其中任何一個屬性都不能恰當地概括它的特征。

假如我們按照通常排列的順序來分析這三種屬性，那么“無產階級”可能首先意味著“與城市工人階級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說，1966年的這場動亂絕不是無產階級的。就像我們在下一章要指出的，在其初期和形成時期，這場運動的突擊隊是學生而不是工人。盡管工人中那些所謂的“造反派”后來在各種政治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們的介入卻很少體現馬克思賦予城市無產者的那種紀律性和對技術現代化的傾向性。

就稍為寬泛的意義來說，如果“文化大革命”能促進工業的發展，從而壯大工人階級，并為無產階級居于主導地位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的話，也可以合法地稱之為“無產階級”的。但事實并非如此。1968年12月，毛發出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對此作出的解釋是，城市工人的子女將在農村從貧農那里接受“深刻的階級教育”。[[235]](#_235___Bei_Jing_Zhou_Bao____1968)正如我所反復強調的，雖然毛從未停止過號召加速經濟的發展，甚至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將會帶來經濟與技術的奇跡，但他對經濟發展的后果卻表現出愈來愈多的憂慮。

1958年8月在北戴河，毛曾呼吁要恢復延安精神，不過當時的重點集中在經濟目標上。另一方面，在1969年4月召開的新的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毛以懷舊的語氣說道，很多很多的同志為奪取政權而被敵人殺害了。他接著說：

多年來我們都是沒有薪水的。沒有定八級工資制，就是吃飯 有個定量，叫三錢油，五錢鹽。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現在進了城，這是好事。不進城，蔣介石霸住了這些地方；進城又是壞事，使得我們這個黨不那么好了。[[236]](#_236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雖然毛斷定，進入城市歸根結底是正確的，但他對現代化及其經濟發展重要性的態度卻是非常模棱兩可的。

即使“文化大革命”既沒有反映城市工人階級的作用或也沒有反映城市工人階級的理想，它仍可在唯一一種意義上稱之為“無產階級”的，這就是它與毛界定的“無產階級”思想一致。我們已提到過毛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用以觀察階級的三重構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客觀的階級出身從未被人們看作是無關緊要的東西，但作為衡量階級屬性的主要標準的主觀因素一般來說具有高度的、決定性的意義。

列寧曾按照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語氣寫道，“區分階級的根本標準是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生產中所處的地位”。1966年11月，毛的魔鬼才子康生說，列寧的階級定義已經證明是不充分的，因為階級差別也屬于政治和思想范疇。1970年康生更加明確地指出：“資產階級存在的最明顯的特征是經濟上的剝削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盡管各階級之間仍有經濟矛盾，但階級的存在則只是反映在它的思想上和政治上。”[[237]](#_237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在這一時期的中國，這個意義上的階級究竟在哪里和以什么方式“表明其自身存在”？我們暫時撇開這個問題不談。顯然，以思想標準劃分階級，實際上是把毛在1966年發動的這場運動的“無產階級”性質問題引入了文化領域。換言之，這場“革命”只有在它也是文化的情況下，才是無產階級的。

一些天真的觀察家當時宣傳了這樣一種觀點，即1966年的事件與“五四”運動一樣，在同等意義上構成了一場“文化革命”，并且真正繼承了“五四”運動的傳統，這實在是荒謬的。而用毛逝世后中國流傳的一個充滿苦澀的笑話：“文化革命”是革文化的命，以此來描述這場動亂倒是更接近事實。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場動亂的發生的確是出于毛對某種文化現象的反應，它始終以強調文化和心理改造為標志。

可以舉出幾個表明這種傾向的例子，這些都能明確地反映毛的長期信念。如通過灌輸或思想改造來改變人們的態度，就能改變他們的客觀屬性，強調“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偉大革命”。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構成一個主觀改造過程，以造就一種新的政治實體。還有概括了這些思想和政治全部內容的“斗私、批修”這個口號，其含義是，即使在那些老革命家和無產階級戰士的思想中（也許毛本人不屬此列），也可以發現“資產階級”傾向。

最后，無論這場斗爭的后果多么激烈，也無論它釋放出的狂熱有多么瘋狂，這樣一些事情能被稱之為革命嗎？從廣義上講，“革命”這個詞有兩種為人們普遍接受的含義。或者是指不同的階級、社會集團或政治派別奪取政權；或者是指運用已經獲得的權力去改造社會。理論上說，按照毛的觀點，中國自1949年特別是1955年以后，已經完成了第二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我曾經指出，“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經濟內容在他最后十年的計劃中卻沒有得到廣泛的表現。思想態度的轉變當然是社會轉變的一種形式。但即使是這樣，其最終所起的作用相對來說也是有限的。在毛的思想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仍是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

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統治了17年之久的國家里，這種事情之所以可能發生，僅僅是由于把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和“走資派”，即那些膽敢在物質刺激到文學和哲學問題上不同意毛澤東的任何意見的人，重新定義為階級敵人，并要從他們手中奪回權力。所以，歸根結底，“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革命”是由于對其目標所作出的思想和文化上的規定。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公開宣布贊成巴黎公社式的群眾民主開始，以贊美十惡不赦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暴君秦始皇而告終。在這10年中，人們看到林彪的沉浮和解放軍影響的興衰，也看到支持“皇帝周圍（或女皇周圍）的法家領導集團”的黨在沉浮和失去她的部分光輝。[[238]](#_238_Liang_Xiao___Yan_Jiu_Ru_Fa)

林彪沒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愿意接受軍隊重新服從黨的領導這一事實，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原因在這里幾乎沒有什么興趣。這一事件，盡管讓人弄清了中國政治體制的職能，但它與我們對毛澤東思想的分析幾乎毫無關系。另一方面，“批林批孔運動”不僅對漢學家是一個迷人的主題，而且在理論上也有重要的意義。

在這一點上，這場運動的一個重要方向是1973—1974年發展起來的對秦始皇的狂熱崇拜。“上海激進派”也在宣揚這樣一種由一個獨裁者統治的中央集權的思想，這只是一種表面上的自相矛盾，因為無政府狀態和專制統治是國家的兩種弊端，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大躍進”期間，毛毫不猶豫地頌揚秦始皇，并將他看成一位先驅。但這并不一定意味著毛在當時和后來，對秦帝國統一的歷史意義持有與1973—1975年間的思想家們相同的看法。那時，據說毛在前面引用過的1958年的演說中，詳細闡明了“革命暴力的進步作用，揭露了攻擊秦始皇就是攻擊革命暴力，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實質”。[[239]](#_239_Jin_Zhi_Bai___Pi_Kong_Yu_Lu)70年代中期的材料對此從未直接做過結論，但它們所暗含的意義卻很清楚，即就是像秦始皇這樣的歷史人物，如有可能的話，也應當徹底平反。林彪批評毛是個暴君。與此相反，正直的人應當把秦始皇看作一位革命領袖，把秦的獨裁看作一種原始的無產階級專政。

很明顯，按照這一推論，隨著王朝的建立，不僅僅要變革國家政權組織，而且也應改變“時尚風氣”，即改變統治階級。因此，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便被提前到公元前5世紀乃至公元前3世紀，而毛本人早些時候（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第一版中）曾認為這個轉變是在公元前11世紀。可以設想，自1939年以來，毛或許已經改變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無論如何，1972—1974年間提出的這一觀點是某些中國歷史學家長期以來持有的觀點。然而，即使在公元前3世紀末統治階級發生了變化，即“新興的地主階級”以法家思想為指導，自覺地改造中國社會，依此類推，說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今天也在那樣做，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這一觀點完全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從歷史上看它是荒謬的，而認為毛一貫信奉這一觀點也是沒有根據的。

能為這一系列論點作辯解的，似乎是向其他人表明中國早在其他國家之前就具有革命政權和革命思想。換言之，在提出秦始皇的類比方面，姚文元和“四人幫”的其他理論家們實際上都是林彪的信徒。他們把“階級斗爭”奉為一種像搞一連串的宮廷政變那樣的極端老式的中國政治觀點。盡管毛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感到自豪，但他的態度更老道些，很少有狹隘的民族主義。

然而，正如我們所強調的，60年代中期，在當時產生的緊張沖突中，相反的見解出現了全面的分離傾向，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這兩種截然對立的傾向進一步發生了分裂。

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可以認為，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在毛思想中的復活，尤其是由于受到一種類似道家根據潮水的漲落來理解對立物之間關系的傾向的影響，毛的哲學觀點此時發生了變化，他不再把歷史變革的方向納入辯證法過程的結構中。但毛對革命前景的悲觀主義也是由于他擔心中國和蘇聯會出現“復辟”而產生的。毛因為實行了他本人和周恩來僅在一兩年前制定的較為溫和的路線，他的頭腦中再次想象出“修正主義”的幽靈。1973年，毛同意了“批林批孔”運動，周恩來成了運動的真正目標。正是這同一幽靈的作用，又使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由張春橋和姚文元在1975年春發起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運動。[[240]](#_240_Liao_Gai_Long___Li_Shi_De_J)

約瑟夫·埃謝里克把列寧和毛作了區別。列寧“總是認為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是‘小生產經濟’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而毛則認為復辟的主要危險是黨和國家機構里出現一個新的階級。[[241]](#_241_Yue_Se_Fu__Ai_Xie_Li_Ke___G)這種方法使埃謝里克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在一個走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新的資產階級可能成為世襲的統治階級。他提請人們注意毛在1960年讀蘇聯教科書筆記中有關批評干部子弟的缺點的那段引人注目的談話：

我們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擔心，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革命先烈，要完全靠自己。[[242]](#_242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在回顧毛在60年代對斯諾和其他人就中國青年的缺點所作的評論時，埃謝里克認為，在毛看來，這些干部的子女可能繼承他們父母的地位和特權，因而就會構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由于集團本身的存在數代不變，它最終將使自己轉變為一個階級。[[243]](#_243_Ai_Xie_Li_Ke___Guan_Yu__Zi)

這個論點存在的問題是，它沒有對官僚階層和社會上其他人之間的關系作認真的分析，或者對稱它為一個階級這一論點提出任何論據。我并不是說凡以階級的統治為中心，而不是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中心；或把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看作本文所說的“新階級”或“新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論點都毫無道理。在過去的30年里，從德熱拉斯到巴羅，許多人正是這樣做的。此外，根據一切已有的事實，似乎表明毛本人在晚年也有這個傾向。他不僅接受了康生的觀點，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階級表現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不是根據人們與生產資料的關系來劃分，但他實際上的確贊成在1975年和1976年間提出的觀點，認為在中國，應當主要地或果斷地到黨內去找資產階級。此外，毛接受了這個邏輯推論。這個推論是從這樣一個前提出發的，即這些“新資產階級分子”是通過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是國家機器的途徑來剝削工人和農民的。[[244]](#_244_Guan_Yu_Mao_Zai_Wan_Nian_De)

然而，即使我們斷定毛在70年代初持有這一觀點，但他也沒有提出系統的觀點來論證它的正確性——的確，那時他也許不能這樣做。在我看來，寫過有關這些問題的那些西方學者，也沒有替他那樣做過。[[245]](#_245_Guan_Yu_Zhe_Yi_Wen_Ti__Huan)

關于新舊資產階級之間的關系問題，張春橋和姚文元根據毛的說法，用相當篇幅論述領導干部中特權階層的自私和腐朽行為時，將這些“極端孤立的人”看作那些實際上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被推翻的反動階級”殘余分子的工具。姚文元寫道：

如果不限制“資產階級權利”和物質刺激的作用，資本主義發財致富、爭名奪利的思想就會泛濫起來，化公為私、投機倒把、貪污腐化、盜竊行賄等現象也會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原則就會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黨內生活，瓦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會產生把商品和貨幣轉化為資本和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的資本主義剝削行為……而當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力量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它的代理人就會要求政治上的統治，要求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要求全盤改變社會主義所有制，公開地復 辟和發展資本主義制度……[[246]](#_246_Yao_Wen_Yuan____Lun_Lin_Bia)

這段分析同樣蹩腳，與新的官僚主義精英控制著生產資料這一說法相比，它更不符合實際。難道在革命后長達1/4世紀之久的中國，1949年以前的資產階級真的如此強大嗎？首先，黨內的“新階級分子”——他們醉心于現存秩序下他們手中掌握的權力和利益——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參與包括生產資料私有制在內的真正的資本主義復辟？他們肯定會認識到，在這樣一種制度下，他們將在裝備極差的情況下與往日的“真正”的資本家進行競爭，并且很快就會失去他們的特權地位。在明確根據50年代末期以來毛本人著作里出現的思想傾向而建立起來的社會里，這兩種情況都提出了“新階級”的作用問題。

在很大程度上，毛主要關心的是，革命以后的中國，“資產階級”態度如貪戀金錢、享受和特權等等是否會復活的問題。在他看來，物質報酬上的不平等會助長這種偏向——因而無論適當與否，他支持1975年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運動。但歸根結底，他更關心的是改造“內心”或“靈魂”的斗爭。毛之所以將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上，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這種人享有更多的、很可能腐化他們的特權，享有更多的、會使他們去腐化其他人的權勢。

同時應當強調的是，毛認為腐化的根源不僅僅是指權力的報酬，而且還有權力本身。1976年5月，人們引用了毛在有生之年發出的最后幾條指示之一。這條指示指出，革命將來還會發生，因為“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247]](#_247___Bei_Jing_Zhou_Bao____1976)沒有什么辦法能證實這條語錄的真實性，但聽起來它卻十分像是無拘無束的毛所說的。盡管毛由于需要繼續擔任領導職務，致力于國家的強大，他顯然對任何人——除了他這個皇帝本人——被委以權力表示懷疑。

我已反復強調過，在毛的晚年，他的思想和行為中顯著的極端傾向，在相當程度上是從他關于保證完全徹底地、系統地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和原則，例如反對階級敵人的斗爭，縮小城鄉差別和建立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等一系列必要措施所作出的結論為基礎的。這一源于西方的思想，不管它被作出什么奇怪的詮釋，它仍是毛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中國的影響和傳統的影響在毛的頭腦中，在中國政治制度中，仍占有的日益增大的位置，這是不可否認的。

除了以上所討論的對秦始皇的崇拜以外，這種傾向的另一方面是強調要忠于領袖和他的思想，這是通過“忠”的符號來表示的。像紅衛兵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不僅能熟背“紅寶書”，能夠在每個場合背誦合適的語錄，并以此顯示他們掌握了毛澤東思想。而且，他們還“無限忠于毛主席”，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中國，這種高于一切的品質是區分真假革命者的試金石。

在《左傳》魯成公九年里寫道：“無私，忠也。”這句話的大致意思可以理解為：“無私的人是真正的忠（于統治者）”，在毛的晚年，中國人反復學習這一公式，倒背如流。一方面，真正無私的，愿意像雷鋒那樣做一個“永不生銹的螺絲釘”，為人民服務的人，是毛主席真正的和忠實的信徒和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反過來說，忠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人，正是由于這一事實，成為無私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并賦予其他一切革命美德。[[248]](#_248_S_Shi_La_Mu_De_Lun_Wen___Da)就這方面而言，就像他舉秦始皇為例一樣，毛到晚年完全從一個擅長用中國人民喜聞樂見語言來表達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領袖變成一個折衷主義者，一個傳統的價值觀念和傳統思想在自己思想中起著愈來愈大作用的人。

## 結論 對毛的思想遺產的探索

“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的思想”一詞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含義。首先，它是指在毛的漫長的一生中，由各個時期著作的原始資料所展現的毛本人實際上的思想。其次，它可能包含這層意思：在中國，從50年代到毛逝世（其實是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止，別人賦予它的想法；也就是說，它可能是指某特定時期的正統學說，如在1951年以后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和在其他公開發表的毛的講話和著作里，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間當作“最高指示”的語錄里的正統學說。第三，它是指毛的全部著作中仍被看作正確的，并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和其他人在他們的著作中進一步作了補充和發展的毛的某些思想，不包括那些反映他晚年錯誤的著作。中國人現在就是這樣做的。

在本章，我繼續進行了在《劍橋中國史》第13卷最后一章開始的嘗試，即分析了從1917—1976年，毛澤東思想在第一種意義上的發展。本章還探討了建立在毛著作基礎上的正統觀念的變化問題。但在1949年以前并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那時還沒有官方正式出版的毛澤東著作，也沒有對“毛澤東思想”如此正統的解釋。現在，我的任務是要概括一下毛的理論貢獻的實質，但是，我的這一做法是在與中國普遍采取的立場和方法相當不同的基礎上進行的。

經常有人認為，中國現在的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思想所采取的態度完全是武斷的、隨心所欲的和嘲諷的——換言之，被他們冠之以“正確的”毛的那些思想，是為了論證他們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制定的政策服務的。這種看法似乎過于簡單。如今那些盡力對“毛澤東思想”進行解釋和闡述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毛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斗爭幾十年的老戰士，他們除了要接受足夠的毛的思想遺產以證明他們是毛的合法繼承人以外，也只能將毛澤東時代的許多思想和實踐融入他們自己的思維中。現在重新解釋毛思想的目的就是如他們所說，是為了界定毛的思想遺產中哪些部分是正確的，要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需要相結合的雙重意義上來確定。我們要承認他們這樣做不是不合理的。

然而，即使情況是這樣，中國正在進行的對毛及其思想的重新評價的目的、邏輯性和判斷標準，也是與本章完全不同的。在此，我要分析的是構成毛從1949—1976年關于社會主義發展問題的思想的本質。

過去，本章作者把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積極貢獻的本質，稱之為“主流的毛主義”。并提出，這個主流可以在1955—1965年，更確切地說，可在60年代初期找到。[[249]](#_249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換言之，“主流的毛主義”可解釋為由毛設想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合理內核，它不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過激行為。通過進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我發現這個用法并不十分滿意。如上所述，1958—1966年間的進程在許多方面都是不可抗拒的。在這兩次激進的試驗過程中，“左”的思潮勢不可擋，它應被看成毛的最后25年（如果不是他的整個一生）里更加獨特的東西。相比之下，毛在60年代初期，后又在70年代初期采取的立場則較為謹慎和現實。

毛在1964年3月說：“凡事都是一分為二的。”“我這個人也是一分為二的。”[[250]](#_250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作為結論，這也許是必須首先說明的最根本的東西。一方面，毛的思想，尤其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思想，始終是由各種根本不同的思想和指示很不穩定地并列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在這些思想成分之間設法構建的暫時的和不穩定的綜合性理論，在“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下開始迅速解體。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毛在“大躍進”期間和“大躍進”之后闡述過的經濟思想，在我看來，我們必須承認，這些思想遠不像近年來根據“文化大革命”時對“兩條路線斗爭”的解釋所做的理解那樣片面和簡單化。我們發現，他同樣強調精神鼓勵和物質刺激、又紅又專、大小工業并舉。“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從某些方面來說，是他整個經濟戰略的核心。它是靠兩條腿盡可能快走的方針，并不是要靠小工業和土辦法一條腿跳躍。

然而，即使在毛澤東從1958年夏天過分的幻想中退卻以后，他對發展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也反映出他根本沒有認清工業化和技術進步的含義。這些方面之一是毛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我在前面對此曾予以相當多的注意。另一方面是他對政治程序和領導與群眾的關系的看法。

1960年，毛澤東在討論蘇聯憲法時說，這部憲法給了勞動者工作、休息和受教育的權利，但它沒有給人民治理國家、經濟、文化和教育的權利，而這些權利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最基本的權利。[[251]](#_251_Liao_Gai_Long___Quan_Mian_J)在《讀書筆記》中與此相似的一段里，毛用的是“管理”，[[252]](#_252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而不是“治理”一詞。盡管兩個措辭在意義上有細微的差別，但兩者都是模棱兩可的。它們的模棱兩可再次反映了我們在毛的“群眾路線”的理論和實踐中已注意到的矛盾。由紅衛兵翻印的、出現于毛本人的語錄中的“管理”一詞，它的意思可能是“經營”、“支配”或“監督”；廖蓋隆的文章中所引用的“治理”，則表示“整頓”、“清理，或“安排”。第一個詞顯然更具體一些，因為它反映了一個組織構成而不只是簡單的過程。至于毛的意思實質上究竟是打算使工人或勞動者隨時關心正在發生的事情，使他們確信政治權力的運用符合他們的愿望，還是指他們實際上應當親自管理事情，這兩方面都是模糊不清的。

毛的“讀書筆記”的一個英譯本將“管理”譯成run和manage（經營），而另一個則譯成administer（行政管理）和take charge（負責）。[[253]](#_253_Mao_Ze_Dong____Dui_Su_Lian)我更喜歡用supervise（監督），其意思不是指全體勞動者都在同等程度上行使管理的權力，因為這種譯法更符合我所理解的毛在60年代的思想。應當承認的是，這一選擇是武斷的，但它并不比其他的譯法更武斷。實際上，模棱兩可客觀存在著，存在于毛本人的語言和思想中。

另一個恰當的例子是，1965年的那段話宣稱，民主是指“群眾的事情由群眾來管理”。[[254]](#_254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至于“由”一字，在群眾是有效力量的意義上，它的意思可能是指依靠群眾，或者通過群眾。換句話說，就是把事情擺在群眾面前，與他們商量。這里將它譯成是“通過”，因為在1965年12月的同一段引文中，毛清楚地闡明了需要來自上級黨的領導，這進一步證實了那時毛仍堅持他反復而明確地陳述過的觀點，即集中比民主更重要。然而，到1965年，他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顯然已開始改變。

在“大躍進”前后的這段時期內，強調集中制表現的形式是，堅持黨的領導起關鍵性和決定性的作用。正如在本章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毛恢復了在延安時十分強調的使黨的領導一元化或一體化的思想。

總的說來，毛在“大躍進”期間的觀點是，一體化或一元化不僅在國家，而且必須在地方得到貫徹。此外，即使1953年那幾句順口溜里提到的“小權”也不能放，否則必導致混亂。一元化的代表只能是各級黨委。黨的控制，不管在中央還是在地方，正如毛在1958年所闡明的，首先是就原則問題作出決定，然后去督察其執行情況。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臨近，這一整套哲學逐漸被放棄了。因為毛澤東對應該發揮“一元化”作用的黨的合法性和政治上的正確性，在理論上產生了懷疑，隨后在實踐中加以否定。在1964年7月14日給蘇共的《九評》那段著名的論述中，可以發現對將要發生的事情的最初和最有戲劇性的暗示之一。這段話指出，如果干部被階級敵人（由“地、富、反、壞、牛鬼蛇神”組成）“腐蝕侵襲，分化瓦解”，那么，“不要很多時間，……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255]](#_255___Hong_Qi____1964Nian_Di_13)

在1967年2月與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談話中，毛雖然再次斷言必須有一個作為領導核心的黨，雖然他繼續努力用某種方式把對黨的需要與反天才論和鼓勵來自下層的首創精神——這種首創精神成了證明“文化大革命”有理的借口（如果不是主要動機的話）——結合起來。由于群眾對黨的等級制度和政府官員“造反”的權利僅僅是靠某個大人物某種個人權威來保證的，因而整個事業被歪曲和敗壞了。不久這種個人權威終于正式地與秦始皇的權力聯系在了一起。

人們必須根據這一點來理解王洪文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256]](#_256___Hong_Qi____1973Nian_Di_9Q)和張春橋在1975年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257]](#_257___Hong_Qi____1975Nian_Di_2Q)為實現黨對政府機構和其他一切機構的“一元化領導”而發出的號召。因為到此時，張春橋和毛本人對組織之間的關系都沒有多大興趣，而只是對實施毛的個人權威感興趣。從此以后，真理和權力不屬于黨，而屬于毛主席。因為歷史賦予這位領袖以教導中國人民和指引他們走向共產主義的使命。

在毛澤東從井岡山和延安時期到60年代的整個生涯中，他一直把民主和集中當作政治進程中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它們彼此聯系、相互促進。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卻出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造反”代替了民主，對偉大領袖和舵手的“忠”代替了集中，就像看待民主和集中的關系一樣，毫無疑問，毛把這些傾向看作一個辯證統一體，彼此密切聯系，在原則上他并不拒絕接受它們。不過，雖然他自己承認“首長”的必要性，但他任由一種形勢在發展：在這種形勢下，社會和經濟的各級“首長”實際上并不能發揮其作為“首長”的作用，因為，盡管他們被認為負有責任，但他們卻無權作出決定。在國家一級，領導和群眾之間的聯盟采取的只是松散的公民投票的民主形式，這使人傷心地回想起早先的民主模式。在基層，它產生的是特別委員會的專斷統治、軍事管制、冷酷無情和騷亂的混合物。

這些思想的根源要追溯到60年代，尤其在1963年初，毛曾反復強調，要堅持“一分為二”的原理。因為只有當黨實際上是由一個人代表和由一個人身上體現時，“一元化”和“一分為二”（以及它們的組成部分之間相互斗爭的傾向）這兩條原理才能共存。換言之，只有當中國共產黨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在毛的領導下時，黨才能夠雖會分裂但又能保持統一，才能夠實現它的一元化使命。因為毛主席本身是不會分離的（盡管我們在前面引用過他的話，說他也是一分為二的[[258]](#_258_Zhi_Mao_Ze_Dong__Wo_Zhe_Ge)），而且永久地掌握權力，即使他的思想充滿了矛盾。

毛的思想，正如我通篇所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遺產相互結合的產物，這一雙重性是解釋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所在。在毛的晚年，領袖終于成了崇拜的偶像和真理的源泉，這一事實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不一致的，實際上與毛本人在1971年的說法也是不相符的。他曾指出，《國際歌》否認“救世主”的存在。[[259]](#_259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這樣說，實際上并不是把毛的統治完全當作東方專制主義的一種形式，也不是指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主要是中國的而不是西方的。對領袖的崇拜畢竟有充分的西方或西方化根源——包括斯大林的紅色法西斯主義，還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最初理論。此外，在文化移入的復雜過程中，如果西方的新思想能夠被用來服務于中國的舊目標和舊價值觀，那么，中國的傳統思想同樣可以轉向外來的思想所闡述的目標。[[260]](#_260_Guan_Yu_Zhe_Yi_Wen_Ti__Jian)因此，很難斷定最終何者占上風，但對這一問題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之間，毛澤東改變了拒絕接受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原則的態度。他在1956年8月“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采用了他從1938年以來一直堅持的比較平衡的觀點，即中國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還必須向西方學習很多東西。他宣稱，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雖然它必須與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但這種“產生于西方的基本理論”構成了中國新制度的基礎或者“體”。[[261]](#_261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另一方面，1965年12月他在杭州時說，實際上，張之洞是對的，“西方的‘體’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術”。[[262]](#_262_Tong_Shang_Shu__Di_234__235)

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即使毛在那一次講話中說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哲學家”，這句話的意思不能理解為毛不再打算從馬克思那里或從西方吸取任何東西。這句話只是強調如果想使從西方借用的東西能夠得到很好的利用，那么中國的革命學說今天就必須扎根于她的文化和傳統之中。然而，這并不是一個通過分析毛的理論體系，用純理性的措辭就能夠得到有效解決的問題。根深蒂固的感情因素也滲人其中，甚至使他的政治理論或思想觀點受到了渲染。

1958年3月，毛在成都宣稱：“首先是階級消亡，然后是國家消滅，最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263]](#_263___Mao_Zhu_Xi_Guan_Yu_Guo_Ne)1970年12月18日，毛在和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對此作了如下論述：

什么叫民族啊？包括兩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層、剝削階級、少數，這一部分人可以講話，組織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廠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沒有這些人就不能組成民族。[[264]](#_264_Tong_Shang_Shu__Di_6__7Ye)

在晚年，毛把階級斗爭看作一部分“大人物”與全體人民之間的斗爭，他在1970年的講話再次表明了他的這一傾向。但是他的這些講話正如他在1958年的講話一樣，認為民族作為一種主要的社會組織形式具有根本主義。

雖然毛總是不容置疑地把中國當作“中心地區”，把中國文化當作“中心之花”（“中華”），但我們不應從毛的這一性格中得出像蘇聯人和他們的支持者，以及托洛茨基和持各種觀點的其他“左”派分子通常所提出的結論，即毛畢竟是一個沒有多少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舊式的中國民族主義者。

事實表明，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間，毛數十年里潛心打造的綜合體基本上分崩離析了，至少就他思想和態度來說是如此。1976年，當毛去“見上帝”或“見馬克思”的時候（或許兩者都見）——以前他曾對埃德加·斯諾這樣說過——出自《左傳》和類似典籍的道德和政治標準膨脹起來了，一個由其繼承者開創的新時代開始了。

然而，如果我們不去考察毛最后這段可悲的和反常的歲月，而只分析他在1935—1965年間形成的較為嚴肅的思想理論，那么，歸根結底，它構成的是一種源于西方的、相當革命的思想和西方化的載體。

毫無疑問，西方化的影響和毛澤東的不容置辯的中國中心主義之間的重要聯系，已在毛所謂的“落后的辯證法”的觀點中得到了闡釋。他在1960年的《讀書筆記》中，最典型地闡釋了“主流的毛主義”。毛在其中一節里提出了“落后國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難”的論題。不必說，他的結論是否定的。他說，資本主義出現兩三個世紀以后，在西方先進的國家，資產階級的毒害極深，影響了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社會的各個階層。因此，列寧的“國家愈落后，它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愈困難”這一論斷是不正確的：

其實經濟越落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越窮，越要革命。……在東方，像俄國和中國這樣的國家，原來都是落后的，貧窮的，現在不僅社會制度比西方先進得多，而且生產力的發展速度也比他們快得多。就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的歷史來看，也是落后的趕過先進的，例如在19世紀末葉，美國超過英國，后來20世紀初德國又超過英國。[[265]](#_265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

今天的中國當然放棄了這種過分樂觀的幻想，而強調發展生產力是改造社會制度的前提。毛在剛才所引的這段話里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在西方（其含義是，在中國，一旦經濟發展了）“最重要的問題是人民的改造問題”。不管怎樣，這一觀點至今尚未被一同拋棄。

也許，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對人與道德在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強調，最終仍將是毛澤東對革命理論和實踐的主要貢獻，因為這種洞察力是根植于對悠久歷史的觀察之中的。

[[1]](#_1)有關毛思想與行為中“傳統”與“現代”因素之間復雜而模糊關系的討論，參見斯圖爾特·R.施拉姆：“黨的領袖還是真正的統治者？——毛澤東個人權力的基礎和影響”，見S.施拉姆主編《中國國家權力的基礎與范圍》。

[[2]](#_2)見《劍橋中國史》第13卷S.施拉姆撰寫的一章，第820—822、826—866頁。

[[3]](#_3)例見丁偉志、石仲泉：“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載《文獻和研究》1983年，第420—428頁，尤其是第421—422頁。

[[4]](#_4)《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3卷，第119頁。（《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頁。——譯者）

[[5]](#_5)《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3卷，第43—44頁。（《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頁。——譯者）

[[6]](#_6)關于從另一個角度對這一問題所進行的討論，見鄒讜：“中國共產黨國家形成和建設過程中的馬列主義黨、群眾和公民”，載S.施拉姆《國家權力的基礎》。

[[7]](#_7)竹內實編《毛澤東集》第6卷除了中文原有改動以外，英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243頁譯文相當不確切，“人民民主制度”被簡化為“人民民主”。

[[8]](#_8)《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2卷，第351—352頁。（《毛澤東選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77頁。——譯者）

[[9]](#_9)陳北鷗編：《人民學習詞典》，第2版，第288—289頁。

[[10]](#_10)毛關于各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及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發展，《劍橋中國史》第13卷。

[[11]](#_11)參見《人民大憲章學習手冊》，第135頁，及《人民大憲章學習資料》，第31頁。

[[12]](#_12)在初版中，此詞為“政權”，而不叫“政體”，但后者被用在下一段的第一句中，從而對這一質的內涵產生根本的影響。（《毛澤東集》第7卷，第165—166頁。）

[[13]](#_13)《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2卷，第352頁。（《毛澤東選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77頁。——譯者）

[[14]](#_14)《工作方法六十條》，載于《毛澤東思想萬歲》（附錄），第34頁。（S.施拉姆譯；也可見杰羅姆·陳編《毛澤東的文章與目錄》，第68—69頁。）

[[15]](#_15)這里的引文來自1967—1969年紅衛兵整理的毛講話版本，見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談話和信件（1956—1971）》，第71—72頁。（參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5頁。——譯者）

[[16]](#_16)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73頁。（參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7頁。——譯者）

[[17]](#_17)《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294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6頁。——譯者）

[[18]](#_18)4月25日講話在當時只在黨內高級干部中傳達；1965年12月，《論十大關系》傳達到了縣及相當于縣級的干部。這個講話標明的日期是4月25日，但實際上卻是1956年5月2日講話的版本。后一次因為要對非黨群眾傳達，所以就可以理解在處理諸如與蘇聯的關系等各種問題時，變得不那么明確和強硬。（舉例說，在公布“百花齊放”的口號時，毛在5月2日實際上脫離了他4月份的立場，但那一段將在后一章論述的談話就沒有收入1965年12月的文本中。）紅衛兵以《論十大關系》為題重印的是毛在5月2日講話的刪節本，這個版本在70年代被翻譯到西方。只是到了1975年7月，在鄧小平的建議下，這兩次講話才被結合起來成為官方版本。編輯工作是在鄧的領導下由胡喬木做的。在當時經毛的同意在黨內傳達，只是到1976年12月才公開出版。根據這些事實，我在講話剛一披露就寫的那篇文章的題目（S.施拉姆：“華主席編輯毛的文學遺產：‘論十大關系’”，載《中國季刊》第69卷[1977年3月號]）現在看來有點可笑了。  
　　上面注釋中的所有信息均來自《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注釋本》（第243—245頁）（下文簡稱《1981年決議·注釋本》），這本書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這個機構專門負責出版毛澤東（也包括其他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著作，其權威性是無疑的。這本書公開出版的版本比最初在1983年出現的內部版本內容稍微豐富，因而也就受到青睞。關于《論十大關系》這篇文章，有關的段落實際上是一致的。

[[19]](#_19)《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35頁；《毛澤東思想雜錄》（1949—1968年），第30頁。

[[20]](#_20)這一文本基于中國官方文本，在翻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93頁。但翻譯在有些地方有所修改，使用了S.施拉姆在《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72頁中的詞語。（參見《毛澤東選集》中文版第5卷，1977年版，第275—276頁。——譯者）

[[21]](#_21)弗朗茲·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第167—175、196—198頁。

[[22]](#_22)哈里·哈丁：《組織中國：官僚問題（1949—1976）》，第107—115、175—182頁。舒爾曼和哈丁都是根據關于陳的觀點的第二手材料；陳云自己的話現在可以在尼古拉斯·拉迪和肯尼思·利伯撤爾編的《陳云的中國發展戰略：一種非毛主義的選擇》一書中見到。

[[23]](#_23)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第86—87頁。

[[24]](#_24)《毛澤東思想萬歲》（附錄），第34—35頁（由S.施拉姆翻譯）。

[[25]](#_25)關于這一概念意義演變的更詳細討論，見S.施拉姆：“中央集權國家的分權：理論與實踐（1940—1984）”，載S.施拉姆編：《中國國家權力的基礎與范圍》，第81—125頁，特別是第87—89頁；關于“一元化”一詞，也見《劍橋中國史》第13卷，第864—866頁，施拉姆寫的一章。

[[26]](#_26)《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36頁；《毛澤東思想雜錄》，第31頁。“關于增強黨性的決議”1941年7月1日由政治局通過（鮑大可：《毛的中國》，第156—160頁 ），當時沒使用“一元化”一詞，但強調了集中與“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的重要性。毛公開認為這一討論是確立黨的一元化領導的第一步，這在1942年到1943年有進一步的表達。

[[27]](#_27)“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148頁；《毛澤東思想雜錄》，第79—80頁；《毛澤東思想萬歲》（附錄），第34—35頁。

[[28]](#_28)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63—164頁。

[[29]](#_29)《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294頁。這里基本上是按非官方的文本（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72頁），不包括后來明確所指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立法機關。（參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1977年版，第276頁。——譯者）

[[30]](#_30)《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398頁。（參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1977年版，第367—368頁。——譯者）

[[31]](#_31)這段話已從1957年6月編輯的毛澤東講話中刪去（《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398—399頁）。見《學習文選》，第201—202頁，毛1957年2月講話的內容在后文將詳細討論。（參見《毛澤東選集》中文版第5卷，第376—378頁。——譯者）

[[32]](#_32)《毛澤東集》第9卷，第244頁。（有關農業現代化的文句已從官方文本《毛澤東選集》第3卷英文版第297頁中的這一講話中刪去）（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1991年版，第1074頁。——譯者）

[[33]](#_33)《毛澤東集》第10卷，第304頁。同見《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4卷，第421頁，這里最后兩句引文不見了。（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9頁。——譯者）

[[34]](#_34)《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4卷，第363頁。（《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26—1427頁。——譯者）

[[35]](#_35)《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4卷，第418—419頁。（《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頁。——譯者）

[[36]](#_36)“致劉少奇”，1951年12月15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427—428頁。

[[37]](#_37)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78頁。

[[38]](#_38)《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29—30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19頁。——譯者）

[[39]](#_39)同上書，第102頁。（同上書，第89頁。——譯者）

[[40]](#_40)同上書，第148—149頁。（同上書，第133頁。——譯者）

[[41]](#_41)《致劉少奇、周恩來》，1954年11月18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484—485頁。

[[42]](#_42)《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155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9頁。——譯者）

[[43]](#_43)參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毛的按語在《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235—276頁收錄。（《毛澤東選集》第5卷，1977年版，第225—259頁。——譯者）

[[44]](#_44)《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第5—6、159—160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7、233頁。——譯者）

[[45]](#_4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27頁；《毛澤東思想雜錄》，第29頁。

[[46]](#_46)1956年1月25日的講話見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報》。引文見阿蘭納·卡埃爾·當高斯與S.施拉姆翻譯編輯的《馬克思主義和亞洲：導論與閱讀材料》，第293頁。

[[47]](#_47)《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34頁。

[[48]](#_48)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61—83頁；官方的文本見《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284—307頁。（參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8—277頁。——譯者）

[[49]](#_49)見《劍橋中國史》第14卷的討論，也可參閱施拉姆在《黨的領袖還是真正的統治者？》當中所做的分析，第214—216頁。

[[50]](#_50)關于毛持續的樂觀與急躁情緒，見他在1956年11月15日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332—335頁。（中文版，第313—329頁。——譯者）毛對關于“急躁冒進”批評的心理反應的重要意義，在近期中國關于這一時期的記述中廣為強調。在1986年4月24日的一次對話中，龔育之認為它可能是通向“文革”之路的第一步。關于“文革”期間毛對于這篇社論發怒的跡象的總結，見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86—91頁（求實出版社，第101—104頁。——譯者）。關于周恩來對起草1956年6月20日社論的貢獻，胡華主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講義》，第146頁。

[[51]](#_51)尼克·奈特：《毛澤東的“矛盾論”：一份公開文稿的注釋翻譯》，第38頁。（譯稿在中文基礎上略作修改。）

[[52]](#_52)《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1卷，第344—345頁。（《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頁。——譯者）

[[53]](#_53)尼克·奈特：《毛澤東的“矛盾論”》，《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1卷，第321—322頁。

[[54]](#_54)《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35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頁。——譯者）

[[55]](#_55)《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77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5頁。——譯者）

[[56]](#_56)“致黃炎培”，1952年9月5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441—443頁。

[[57]](#_57)《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213—215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7—199頁。——譯者）

[[58]](#_58)《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英文版第2卷，第213—214頁。（《鄧小平文選（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234頁。——譯者）

[[59]](#_59)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269頁。

[[60]](#_60)《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301—306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4—288頁。——譯者）

[[61]](#_61)《1981年決議·注釋本》，第253—254頁。

[[62]](#_62)同上書，第254頁。

[[63]](#_63)有關這次會議正式討論的全部記錄在近30年之后才出版。見《百家爭鳴——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島遺傳學座談會記錄》。

[[64]](#_64)前引書，第10頁（導言）。更完整的闡述見龔育之：“發展科學必由之路——介紹毛澤東同志為轉載《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的信和按語”，載《光明日報》1983年12月28日。

[[65]](#_65)《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341—348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375頁。——譯者）《1981年決議·注釋本》，第513頁。

[[66]](#_66)“致黃炎培”，1956年12月4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14—515頁。（毛自己明白副詞“基本上”是什么意思。）

[[67]](#_67)譯文見英文“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第21—64頁。

[[68]](#_68)這一表達的新提法在當時很廣泛，這些總的來說都是毛的思想。（這一段話見S.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1963年版）毛在未公開出版的文稿中沒有事先表達這一思想的事實由廖蓋隆確認，見“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和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廖蓋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第245頁。

[[69]](#_69)“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第25頁。

[[70]](#_70)《1981年決議·注釋本》，第532頁。

[[71]](#_7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89頁；《毛澤東文集》，第61頁。這一資料只是表明這次，會議是在1957年1月召開的。在英文版《毛澤東選集》中的日期是1月27日（第5卷，第359—383頁），但其中沒有這段內容。

[[72]](#_72)《學習文選》，第193—195頁。關于這段話在1957年2月初稿中的另一個文本，見《毛主席文獻三十篇》（北京：特鋼廠1967年版），第94—95頁。

[[73]](#_73)《學習文選》，第209頁。

[[74]](#_74)同上書，第211頁。

[[75]](#_75)同上書，第212—213頁。

[[76]](#_76)參閱前引書，尤其是第201頁。也可見蘇紹智在《試論我國現階段的階級狀況和階級斗爭》一文中的評論（《馬克思主義研究文選》第6期，第35頁）。（中文版載于《學術月刊》1979年10月號，第1頁。）

[[77]](#_77)《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393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2—373頁。——譯者）

[[78]](#_78)廖蓋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和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第246—253頁。蘇紹智：《試論我國現階段的階級狀況和階級斗爭》，第22—26頁。

[[79]](#_79)《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353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3頁。——譯者）

[[80]](#_80)《學習文選》，第207頁。

[[81]](#_81)《學習文選》，第225—226頁。

[[82]](#_82)“為什么要整風”，《人民日報》1957年5月2日。關于上面的引文涉及的毛對社論的肯定，見廖蓋隆：“關于學習《決議》中提出的一些問題的解答”，《云南社會科學》1982年3月第2期，第104—105頁（1981年10月8日在云南黨政干部會議上的發言）。

[[83]](#_83)“事情正在起變化”（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440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3頁。——譯者）

[[84]](#_84)《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395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8頁。——譯者）

[[85]](#_85)“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479—480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1977年版，第462—463頁。——譯者）

[[86]](#_86)“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1957年7月9日），《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469—470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1977年版，第453頁。——譯者）

[[87]](#_87)同上書，英文版，第444頁。

[[88]](#_88)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19—120頁。

[[89]](#_89)“致陸定一”，1958年12月22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54—555頁（出于某種考慮，這里略去了該大學的名稱）。毛的信和有關文件的原文都收錄在《萬歲》（1969年）一書中第267—269頁。

[[90]](#_90)《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7—258頁。英文原注為《社會主義高潮》，第460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73—274頁。

[[91]](#_91)《1981年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頁。英文原注為《1981年決議·注釋本》，第323—324頁。這里所說的毛在成都會議上突然支持大社，在中國之外可以看到的有關他在會上三次演講的原文中都沒有出現。（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96—124頁。）

[[92]](#_92)戴維·S.G.古德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與省：四川和貴州（1955—1965）》，第144—145頁。

[[93]](#_93)參見李銳《論三峽工程》，第8—10、94—99、171、245頁和其他各處。

[[94]](#_94)《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第249頁。英文原注為《紅旗》第1期（1958年6月1日）第3—4頁；《北京周報》第15期（1958年6月10日）第6頁。

[[95]](#_95)《劍橋中國史》（英文版）第13卷，第868—869頁。

[[96]](#_96)1958年8月21日上午和1958年8月30日上午的講話。《學習文選》，第304、306—307頁。

[[97]](#_97)1958年8月30日的講話。出處同上，第318頁（也參見8月21日的演講第306頁）。

[[98]](#_98)1958年8月17日、8月21日（上午）和8月30日（上午）的演講，出處同上，第302、305—307頁各處，第318頁。

[[99]](#_99)S.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353頁。

[[100]](#_100)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44—146頁。

[[101]](#_101)廖蓋隆：“歷史的經驗和我們的發展道路”，《中共研究》1981年9月號，第123頁。這份報告最早是提交給1980年10月25日由中央黨校主持召開的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的，后來在中國正式出版的只是修改后的文本。完全有理由相信臺北復制的原件是真實的。它被翻譯在《問題和研究》1981年10月號、11月號和12月號上。這里所引的部分出自10月號第84頁。至于新的文本，參見廖蓋隆《黨史探索》，第308—365頁。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有關五六十年代的歷史全貌作了極大的壓縮，并且沒有包括周在勸說毛放棄“供給制”中所起的作用的有關細節。

[[102]](#_102)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22頁，其中特別是1958年3月22日的談話部分。

[[103]](#_103)《萬歲》（1969年），第247頁；《萬歲》（1967年），第12、17、49頁等。

[[104]](#_104)《萬歲》（附錄），第32—33頁；譯自S.施拉姆《毛澤東和他1958—1969年的永遠革命理論》，載《中國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第226—227頁。

[[105]](#_105)《萬歲》（1969年），第245頁；《萬歲》（1967年），第15頁。

[[106]](#_106)《萬歲》（1969年），第204頁。

[[107]](#_107)S.施拉姆：《毛澤東和永遠革命理論》，其中特別是第232—236頁。

[[108]](#_108)見吳江在《哲學研究》1958年第8期第25—28頁上的文章。S.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99、135—136頁。

[[109]](#_109)《萬歲》（1969年），第228頁。

[[110]](#_110)《萬歲》（1969年），第262—263、264—265頁；《雜錄》，第141—142、144—145頁。

[[111]](#_11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與毛澤東的三次會見》，載《中國季刊》第103期，1985年9月號。

[[112]](#_112)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43頁。

[[113]](#_113)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42頁。

[[114]](#_114)《萬歲》（1967年），第106—107頁（1959年3月15日的信）。

[[115]](#_115)斯特朗：《與毛澤東的三次會見》，第496—497頁。

[[116]](#_116)實際上，張聞天三小時的中間發言比彭德懷的“意見書”要更系統，用了更精確的理論術語。參見李銳（當時曾出席了廬山會議）在“重讀張聞天同志的‘廬山發言’”一文中所做的分析，載《讀書》1985年第8期，第28—38頁。張聞天演講的原文已收錄在《張聞天選集》中正式出版，見第480—506頁。

[[117]](#_117)用英文對廬山事件及其意義作了最全面最精確的描述的是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躍進”（1958—1960）》，第187—251頁。

[[118]](#_118)《萬歲》（1969年），第222頁；《雜錄》，第121頁。

[[119]](#_119)《萬歲》（1967年），第48頁。

[[120]](#_120)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225、239頁。

[[121]](#_121)《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0頁。英文原注為《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45頁。亦請參見S.施拉姆在《劍橋中國史》第13卷中關于1949年以前毛的思想一章。在“論辯證唯物主義”一文中，毛明確地肯定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它包括三大法則（《毛澤東集》第6卷，第300頁）。

[[122]](#_122)《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5頁。英文原注為《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66頁（1957年1月27日的講話）。

[[123]](#_123)《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7—121頁。英文原注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106—110頁。

[[124]](#_124)在英文原文里，此段與下段合為一段，沒有分開。這里按《毛澤東選集》第5卷中文版原文處理，將其分為兩段。——譯者

[[125]](#_125)《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349頁。英文原注為《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67—369頁。

[[126]](#_126)《學習文選》，第212—213、220頁。

[[127]](#_127)《萬歲》（1969年），第104頁；《雜錄》，第66頁。

[[128]](#_128)S.施拉姆：《毛澤東和永遠革命理論》，第228頁。

[[129]](#_129)迪克·威爾遜編：《在歷史天平上的毛澤東：一個初步評價》一書中的“馬克思主義者施拉姆”這一部分，第63頁。早在1976年，史蒂夫·秦就領會了這一論述中包含著一個新的巨大的背離，但不幸的是后來他又返回到原處，把這一論述當成是指“肯定之否定”。秦：《毛澤東的思想：形式與內容》，第60、66—67頁等。

[[130]](#_130)參見1960年出版的兩本重要的毛的著作選編（僅供內部使用）：《毛澤東哲學思想（摘錄）》，第195220頁；《毛澤東同志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摘錄）》，第150頁及以后各頁。兩本書都有冠之以“否定之肯定規律”標題的擴充章節，盡管其資料都選自延安時期和50年代中期，內容是關于新與舊、中國與外國思想的結合問題，等等。（或許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本書的各章節是根據主題進行編排的，書中有關于辯證唯物主義講稿的筆記。對此，毛在1963年與埃德加·斯諾的會談中否認他是原作者。）

[[131]](#_131)楊超：《唯物辯證法的幾個理論問題》（以下稱《辯證法問題》），第211頁。這本書起初是專門直接研究毛的思想的，書名為《論毛主席哲學體系》（內部討論稿），共2冊（以下稱《毛的哲學體系》），后經修改而得今名。關于楊超在1939年參加毛的哲學研究小組一事，參見溫濟澤在《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討論會論文選》一書第69頁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是怎樣教我們學哲學的”一文。除毛之外，該小組的其他成員有：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陳伯達。

[[132]](#_132)周揚：“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人民日報》1983年3月16日第4版。這篇文章是根據周揚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際的演講寫成的。由于它提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異化問題，因而在19831984年冬的“反精神污染”運動中受到了批評。但迄今為止還從未有人認為周揚對毛的辯證法的分析是錯誤的。要想了解有關這一演講的發表及其受到的批評的情況，請參見S.施拉姆的《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策（1978—1984）》一書，第41—56頁。

[[133]](#_133)《辯證法問題》，第199—217頁，其中特別是第212—213頁；《毛的哲學體系》，第247—263頁。

[[134]](#_134)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226頁。

[[135]](#_135)同上書，第240頁。

[[136]](#_136)弗雷德里克·韋克曼：《歷史與意愿》，第323—326頁；S.施拉姆：“馬克思主義者”，第63—64頁。

[[137]](#_137)“人民群眾的大聯合”，S.施拉姆譯自《中國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80—81頁。

[[138]](#_138)《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頁。英文原注為《毛澤東著作選讀》，第34頁。（《文選》第7卷，第2頁；萊格：《中國古典名著》第1卷，第178頁。）

[[139]](#_139)《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31頁。英文原注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378頁。（《文選》第5卷，第14頁；萊格：《中國古典名著》第1卷，第178頁。）

[[140]](#_140)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82頁。（《孟子》第6卷第2冊，第34頁；D.C.羅：《孟子》，第201頁。）

[[141]](#_141)同上書，第208頁。

[[142]](#_142)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215頁。

[[143]](#_143)《萬歲》（附錄），第37頁。（“六十條”中的第四十七條。）

[[144]](#_144)《萬歲》（1969年），第210—211頁；《雜錄》，第110—111頁。

[[145]](#_145)S.施拉姆譯自《毛澤東和他的永遠革命理論》，第227頁。

[[146]](#_146)8月21日的講演，《學習文選》，第310頁。

[[147]](#_147)《萬歲》（1969年），第493頁；《雜錄》，第347頁。

[[148]](#_148)關于這個問題，請參見S.施拉姆為《國家權力的范圍》和《國家權力的基礎》所寫的前言，以及第二本書中所收的各篇文章，其中特別是雅克·格內特和許華茨的文章。

[[149]](#_149)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01頁。

[[150]](#_150)《萬歲》（1969年），第195頁。

[[151]](#_151)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06—107頁。

[[152]](#_152)安格斯·格拉姆：《列子一書》，第10頁。

[[153]](#_153)《莊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頁。英文原注為安格斯·格拉姆《莊子：〈莊子〉一書中主要的七章和其他著作》，第261頁。

[[154]](#_154)關于這一問題更進一步的討論，可參見S.施拉姆：“黨的領袖還是真正的統治者？”

[[155]](#_155)S.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419頁。

[[156]](#_156)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91頁。

[[157]](#_157)《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415頁。

[[158]](#_158)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01頁。

[[159]](#_159)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72頁。在官方出版的文件中對這一點并未作出如此的強調，以至于外國同志更難了解中國革命。（參見《北京周報》1978年第27卷第14期。）

[[160]](#_160)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40—141頁。

[[161]](#_161)同上書，第126—127頁。

[[162]](#_162)《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5、291頁。對本章第一部分里所闡述的理由，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官方文本比紅衛兵翻印本對蘇聯的批評更加坦率。這個文本已收在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中。

[[163]](#_163)《歷史的經驗》，第18—19頁。

[[164]](#_164)《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4頁。

[[165]](#_165)《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41—342頁。

[[166]](#_166)《學習文選》，第197—198頁。官方修訂的版本的相應部分中甚至沒有提及蘇聯（《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96—399頁）——不必奇怪，因為這份文獻首次公開發表是在1957年6月，那時任何這樣的否定性注釋都不會有問題。

[[167]](#_167)同上書，第194頁。毛澤東關于非對抗性矛盾的思想與列寧、斯大林的比較，施拉姆：《有關中國“永遠革命”理論文件集》，第32—38頁。在1957年2月27日講話的官方文件中，毛對他前輩的評價轉而相反。他說：“這個規律，列寧講得很清楚。”（《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92—393頁。）

[[168]](#_168)同上書，第211—221頁。

[[169]](#_169)同上書，第212—213頁。

[[170]](#_170)《學習文選》，第223—224頁。（這個文集中收錄的原文實際上印成了“我們的大國沙文主義”。但是，我認為“我們”是“他們”的印刷錯誤。否則，毛可能是指，在他批評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問題的處理時，蘇聯斥責中國的大國沙文主義。那就是他堅持要在這類問題上發表意見。）

[[171]](#_171)1957年11月14日的講話，見邁克爾·舍恩霍斯的譯文，載于《共產主義研究雜志》1986年6月第2卷第2期。

[[172]](#_172)見毛1957年11月18日的講話，在同一本雜志中有舍恩霍斯的譯文。這些情況在胡惠強的文章“大煉鋼鐵運動簡況”中也有介紹，此文載《黨史研究資料》第4輯，第726頁。

[[173]](#_173)《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2—63頁。

[[174]](#_174)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99頁，又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183頁。

[[175]](#_175)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14—155頁。

[[176]](#_176)“致王稼祥的信”，見《毛主席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批判》，第14頁。

[[177]](#_177)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90—191頁。

[[178]](#_178)《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316—318頁。

[[179]](#_179)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81頁。

[[180]](#_180)《毛主席關于國內民族問題的論述選編》，1978年10月，第40—41頁。

[[181]](#_181)斯特朗：《與毛澤東的三次會見》，第504頁。

[[182]](#_182)《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第226—227頁；《雜錄》，第296頁。

[[183]](#_183)斯特朗：《與毛澤東的三次會見》，第504頁。

[[184]](#_184)《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頁。

[[185]](#_185)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12—113頁。

[[186]](#_186)《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180—181頁；《雜錄》，第85—86頁。

[[187]](#_187)《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7頁。

[[188]](#_188)關于柯慶施所起作用的材料，見1986年4月23日我同胡華的談話。1986年4月24日我與龔育之的談話又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

[[189]](#_189)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見《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

[[190]](#_190)中國最近對毛澤東思想的這一傾向的最有權威的分析，見石仲泉的“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和毛澤東對它的誤解”一文，載《文獻和研究》1983年，第405 417頁。該文修改后又在《紅旗》1985年第11期（第12—22頁）上公開發表。像最近發表的其他許多文章一樣，這篇文章明確斷言，從“大躍進”開始，毛在把“資產階級權利”的概念引人中國政治言論中起著主要的作用。通常被譯為英文“bourgeois right”，即“資產階級權利”這一術語出自馬克思最有權威的著作《哥達綱領批判》，在這本書中，馬克思運用它批判了“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這一概念（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17—321頁）。在德語中，法權是指權利和法律秩序，權利指的是有權取得某個人的勞動（或人身權利的）報酬這一層意思。馬克思在此提到這個法權問題時，實際上是指這兩方面的意思，在他明確指出“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以后，他接著指出：“權利，就他的本性來講，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換句話，使某人有權利這種意義上的權（或權利）是由法制或類似法律的準則所規定的。中國人由于不接受為毛所使用的“資產階級法權”（按字面意義講，指“資產階級的法律權利”）這一譯名，進一步混淆了其中的意思。1979年以來，它往往被譯成“資產階級權利”，那就更有個人主觀權利的意味。總之，毛最擔心的就是他所注意到的這樣一個事實，即“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的嚴格運用，并沒有考慮個人的社會需要，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像資本主義的勞動工資制一樣，是很殘忍的。

[[191]](#_191)1959年9月11日對軍事委員會的講話。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47—148頁。

[[192]](#_192)“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源”，1959年8月15日，《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73頁。

[[193]](#_193)鄧力群在1981年8月11日和12日舉行的全國黨史資料征集學術討論會上回答關于1981年6月27日決議問題時的發言。見《黨史會議報告集》，第145頁。

[[194]](#_194)陶凱：“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見《學習歷史決議專輯》，第121頁。

[[195]](#_195)《學習文選》，第305頁。（1958年8月21日上午的講話。）

[[196]](#_196)同上書，第311頁。（1958年8月21日下午的講話。）

[[197]](#_197)《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第192頁。早先提到的“像地主一樣裝腔作勢”，見毛在1958年11月就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所作的講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117—118頁。

[[198]](#_198)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68頁。

[[199]](#_199)《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424頁。

[[200]](#_200)《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206、210頁。（現在，人們知道他在討論蘇聯教材的會議上的論說是根據他在1960年關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讀書筆記編輯而成。）

[[201]](#_201)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69—170頁。

[[202]](#_202)《1981年決議·注釋本》，第359頁。

[[203]](#_203)《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426頁。

[[204]](#_204)《資料選編》（北京，1967年1月），第277頁。該指示的全部譯文載于理查德·鮑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維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58—71頁（毛的這段話是在第70—71頁），該文是中國致蘇聯的第9封公開信中首次公開發表的。S.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367頁。

[[205]](#_205)《雜錄》，第351頁；《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494—495頁。

[[206]](#_206)《雜錄》，第351頁；另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02—603頁。（關于這一論述的日期，另參見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于1981年出版的“1949年以后毛的論著索引”第2卷中的討論，第47頁。）

[[207]](#_207)《北京周報》1964年第1期，第10—27頁；參見《紅旗》1963年第24期，第1—30頁（“一分為二”這一詞出現在第4—5頁）。關于毛與這一報告的關系，S.施拉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策（1978—1984）》，第44—45頁。

[[208]](#_208)《毛澤東選集》中文版，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8頁。

[[209]](#_209)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與毛澤東的三次會見》，第499—500頁。

[[210]](#_210)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95頁。毛在其當時尚未公開發表的1960年關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讀書筆記中，對宣傳工具的影響力以及政治斗爭的決定性領域——上層建筑，已經表示了同樣的關心。《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342—343頁；《雜錄》，第266頁。

[[211]](#_211)這些是1967年5月出版的關于藝術和文學的“五個戰斗性文件”中的兩個。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指示的譯文（這里稍有修改）見《北京周報》1967年第23期，第8頁。

[[212]](#_212)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210頁。

[[213]](#_213)同上書，第217頁。

[[214]](#_21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498—499頁。

[[215]](#_21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587頁。

[[216]](#_216)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98頁。

[[217]](#_217)《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582—588頁。

[[218]](#_218)同上書，第597—598頁。

[[219]](#_219)王年一：“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對形勢的估計”，見《黨史研究資料》第4期，第772頁。為進一步探討“文化大革命”的心理根源，可參考S.施拉姆的論文：“黨的領袖還是真正的統治者？”，第221—224、233—237頁。還可參考他的“劇變的限度：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發展中的地位的看法”，載于《中國季刊》1986年12月第108期，第613—624頁。

[[220]](#_220)《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第206頁。

[[221]](#_22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30頁。（1964年12月21日與陳伯達和艾思奇的談話。）

[[222]](#_222)同上書，第640頁。

[[223]](#_223)《毛澤東集》第7卷，第142頁，譯文見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427—428頁。

[[224]](#_224)《人民日報》1966年8月24日；《北京周報》1966年第37期，第2—21頁。

[[225]](#_22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53頁。

[[226]](#_226)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277頁。

[[227]](#_227)《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70—671頁；另見《雜錄》，第453—454頁。

[[228]](#_228)《資料選編》，第287頁。

[[229]](#_229)1960年10月20日的決議由J.切斯特·鄭翻譯，收錄在《中國紅軍的政治》第66—94頁。與《毛主席語錄》的前言的相應的部分在第70頁。另見同一卷第30頁。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親自”修改了這一決議。

[[230]](#_230)S.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371頁。上海機床廠的例子可參見《北京周報》1968年第37期，第13—17頁。

[[231]](#_23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93、706、695頁；另見《雜錄》，第475、488、471頁。

[[232]](#_232)《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714頁；另見《雜錄》，第496頁。

[[233]](#_233)《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98、688頁；另見《雜錄》，第481、470頁。

[[234]](#_234)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296頁。

[[235]](#_235)《北京周報》1968年第52期，第6—7頁。

[[236]](#_236)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288頁。

[[237]](#_237)《毛澤東選集》第5卷，1977年版，第18—19頁。

[[238]](#_238)梁效：“研究儒法斗爭的歷史經驗”，《紅旗》1974年第10期，第60頁；另見《北京周報》1975年第2期，第11頁。

[[239]](#_239)靳志柏：“批孔與路線斗爭”，見《紅旗》1974年第7期，第32頁；另見《北京周報》1974年第33期，第11頁。

[[240]](#_240)廖蓋隆：“歷史的經驗”，第147頁。

[[241]](#_241)約瑟夫·埃謝里克：“關于‘資本主義復辟’：毛和馬克思主義理論”，見《現代中國》第5期（1979年1月），第57—58、71—72頁。

[[242]](#_242)《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351頁。

[[243]](#_243)埃謝里克：“關于‘資本主義復辟’”，第66—68頁。

[[244]](#_244)關于毛在晚年的觀點的這一論述與1982年4月和5月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其他地方進行討論時，一些嚴肅的理論工作者通常表達的見解是一致的。另見廖蓋隆：“歷史的經驗”，第135—136頁。

[[245]](#_245)關于這一問題，還可參見理查德·克勞斯的《中國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一書。他比埃謝里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作出了更為重要的貢獻。對于以階級出身為基礎的階層與“作為政治行為者的階級”之間的關系問題的許多方面，克勞斯進行了極其敏銳的和富有啟發性的分析。但我認為他的錯誤與埃謝里克一樣，在于認為毛在其晚年主要以特權和對生產方式的控制（這些都是由干部從他們與國家的關系中獲得的）為標準來劃分階級。

[[246]](#_246)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第7—8頁。

[[247]](#_247)《北京周報》1976年第21期，第9頁。

[[248]](#_248)S.施拉姆的論文：“黨的領袖還是真正的統治者？”，論述了“忠”的含義，并較廣泛地討論了毛晚年統治的性質。參見第223—225、233—243頁。

[[249]](#_249)S.施拉姆：《毛澤東：初步再評價》，第71頁。

[[250]](#_250)《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477頁；另見《雜錄》，第343頁。

[[251]](#_251)廖蓋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第2頁。

[[252]](#_252)《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342—343頁。

[[253]](#_253)毛澤東：《對蘇聯經濟學的批判》，見《雜錄》，第266頁。

[[254]](#_25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30頁。

[[255]](#_255)《紅旗》1964年第13期，第31—32頁；另見《北京周報》1964年第29期，第26頁。（源出于毛對1963年5月9日關于浙江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一份文件所作的評語。）

[[256]](#_256)《紅旗》1973年第9期，第22、27頁；另見《北京周報》1973年第35期，第36、25、28頁。

[[257]](#_257)《紅旗》1975年第2期，第17頁；另見《北京周報》1975年第4期，第19頁。

[[258]](#_258)指毛澤東“我這個人也是一分為二的”。——譯者

[[259]](#_259)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297頁。

[[260]](#_260)關于這一問題，見施拉姆：“黨的領袖還是真正的統治者？”

[[261]](#_261)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85—86頁。

[[262]](#_262)同上書，第234—235頁。

[[263]](#_263)《毛主席關于國內民族問題的論述選編》，第8頁。

[[264]](#_264)同上書，第6—7頁。（這段引文出自中國官方關于這次談話的記錄。據我所知，斯諾從未在自己的著作中用過這段話。）

[[265]](#_26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333—334頁；另見《雜錄》，第258—259頁。

## 第二章 中國陷入危機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國官方算法，從1966年初起直到大約十年后毛澤東去世時為止，是20世紀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文化大革命”的情形，想起來仍栩栩如生：身著軍裝的年輕的紅衛兵們擠滿了北京寬廣的天安門廣場，當他們看到偉大舵手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時，不少人熱淚盈眶；老干部們頭戴高帽，脖子上掛著“牛鬼蛇神”的牌子，被抓上卡車，那些年齡只相當于他們1/3的年輕人強迫他們沿著大城市的主要街道游街；報紙見方的大字報上充斥著對高級領導人的修正主義與反革命行為的辛辣譴責。紅衛兵帶著的“紅寶書”——用塑料包裝的毛主席語錄的小冊子——是年輕的造反派反抗成年人權威的象征。

純粹從敘述的角度看，無論對發動者個人還是對整個承受了它的社會來說，“文化大革命”只能被看成是一場悲劇。這場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個人決策的結果。毛在革命勝利后時代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純潔性，這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他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獨一無二的超凡的地位，這使他有資本發動“文化大革命”；他對群眾運動充滿信心，這就決定了運動的形式。毛的開闊的視野和改造八億中國人命運的能力成了神話，從而產生了一位比真實的毛澤東更偉大的人。

可是，就像在古典悲劇中一樣，這些貌似英雄的品質最后濺上了致命的污點。毛對革命純潔性的追求導致他夸大和錯誤估計了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所面臨的問題。他個人的權威使他有能力發動各種社會力量，卻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控制它們。隨著群眾運動逐漸演變成暴力，派系斗爭和騷亂，毛認為群眾一旦發動起來就能拯救國家的觀念被證明完全錯了。毛本希望“文化大革命”能成為他對中國和馬列主義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貢獻，結果倒成了他晚年的重大錯誤。

由于毛具有操縱中國的能力，所以，他個人的悲劇同時也就是整個民族的悲劇。當今的中國領導人都把“文化大革命”描繪成國家的大災難。雖然“文化大革命”對經濟的破壞不如“大躍進”嚴重，生靈涂炭的情形也不如太平天國起義時期、日本侵華時期和共產黨革命時期，但由“文化大革命”帶來的事業的中斷、精神的崩潰以及所付出的生命的代價都具有毀滅性。運動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影響恐怕要幾十年方能消除。而且，“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這些代價基本上是毛對中國形勢的估計和提出的對策的結果。毛認為中國正處在復辟資本主義的邊緣，提出阻止復辟的最好方法是發動城市青年。

從另一種觀點，即從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又是非常有趣的。政治學家們常常提及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危機”：現行的政治機構由于經濟處于過渡階段、知識界發生騷動，以及政治的動員、社會的變革等原因[[1]](#_1_Lun_Na_De__Bin_De_Deng_Bian)，遇到了挑戰甚至被動搖，發生了危機。如不進行有效的改革，政治危機就可能發展成暴力、混亂、反叛甚至革命。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初看起來，就像20世紀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所經歷的，似乎是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場危機。中國共產黨在城市中面臨著高層次的抗議，因為城市里對許多社會、經濟和組織政策存在著廣泛的不滿。中共既無法壓制這些持不同意見者又無法有效地迎合他們。這種情形的結果，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地方，都是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直到軍隊干預，恢復秩序，開始重建政治體制為止。

不過，“文化大革命”的獨特之處是，這場危機是由這位政權領導人自己引發的。使共產黨的合法性產生疑問的正是毛自己，發動各種社會力量削弱他自己政權的也是毛，為人們的抗議和不滿提供了政治、意識形態詞匯的仍是毛。這個曾經發動革命反抗舊政權的人現在又發動革命來對抗自己親手締造的新政權。

但是，毛的第二次革命不如第一次革命成功。根據毛的觀點，成功的革命，既是立又是破：建設一個新秩序，同時破壞一個舊秩序。毛第一次革命的指導思想中，不僅有對現存體制的批判，而且有對未來新政治經濟體制的整體設想。與此相類似，第一次革命不僅發動了廣大對現實不滿的人，而且創造了具有高度紀律性的、能在奪取政權后有效執政的革命組織——中國共產黨。與此相反，毛的第二次革命既無明確的指導思想，也沒有產生能執行新的方針政策的統一組織。它推倒了舊政權，留下的卻只是一片混亂。

本章是對“文化大革命”前期三年半的歷史作一描述和分析，也就是從1965年底的前奏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時期被某些學者稱為“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階段”，其余的稱作“狂熱階段”。正是在“紅衛兵階段”，毛所引發的政治危機陷得最深，混亂最嚴重，生命代價最高。

這三年半的時間可分為幾個小階段，每一階段在本章中都將逐個論述。第一階段，從1965年秋至1966年夏，毛與黨的機構的矛盾上升。在這一階段，毛開始發展自己的權力基礎，與他認為是修正主義分子的黨的領導人相對抗。毛利用他的政治資本，罷免和貶謫了一些軍隊、文化部門、北京市政府和政治局里他所不滿意的人。然后，在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使中央委員會正式批準在更大規模上批判修正主義。

第二個階段，從八屆十一中全會到1966年底。在此期間，毛對黨的機構的攻擊迅速遍及全國，紅衛兵充當了主要工具。但這一時期的結果，卻與毛的初衷相左。很明顯，他原希望紅衛兵會形成統一的群眾運動，領導干部們也會坦誠地接受來自這些特殊組織的批評。這樣，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黨的方向得到糾正，黨的權威也完整無損。事實上，結果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紅衛兵分裂成互相對立的派別，一派攻擊黨的機構，另一派保護黨的機構。省、市級的領導開始時壓制群眾運動，爾后與之合作，最后采取逃避態度。紅衛兵各派系之間及群眾運動與黨的機構之間的對抗不斷升級，不僅沒有加強黨的權威，反而削弱了黨的權威。至1966年底，中國許多重要城市的政治機構完全癱瘓。

在第三階段，即從1967年1月至1968年年中，毛下令：向已名聲掃地的黨的機構奪權。究竟采用何種程序奪權，毛經過數周猶豫之后，決定政權應當分享，在省、市級，由“文化大革命”中誕生的群眾組織、運動中生存下來的領導干部和人民解放軍三者聯合掌權。問題是三者中無一完全可靠。群眾組織動輒搞暴力和無政府，領導干部與人民解放軍（尤其在省、市級）則聯合起來壓制最難駕馭的紅衛兵積極分子。毛已不能完全控制他自己釋放出的各種社會力量，他唯一的辦法是使鷸蚌相爭。結果是再度混亂。毛最后得出結論，阻止全面崩潰的唯一辦法是遣散紅衛兵，讓軍隊恢復秩序。

這一決定標志本章將要討論的最后一個階段的開始：重建中國政治體制。這一過程的最高潮是1969年4月黨的九大。九大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批準了新的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黨章。由于軍隊在這一階段發揮了突出作用，所以九大決定許多領導職務由軍官擔任，甚至國防部長林彪被指定為毛的接班人也就不足為奇了。可是，盡管軍隊在軍外的權力迅速增長，也不足以恢復政治穩定。權力仍被三者分享——發動紅衛兵的激進知識分子、備受攻擊而幸存下來的老干部及壓制紅衛兵的軍隊。正如本書以后幾章所描述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階段留下的遺產是長期的不穩定，直到毛澤東去世，清除了激進派，鄧小平出任中國的主要領導后，這種不穩定勢態才得以完全清除。

## 走向對抗

#### 政治沖突的根源

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對中國的政治形勢越來越不滿。在一個接一個的問題上，黨通過了一系列毛認為不必要和不能接受的政策，如：農業恢復搞承包，工業中采用物質刺激，公共醫療過分集中在城市，雙軌制教育的發展，文學藝術中一些傳統主題和風格的再現等等。這些政策大多是在反右和“大躍進”之后為恢復社會團結，提高生產力而制訂的。可在毛的眼中，這些措施只會產生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特殊化、特權階層和不滿，而這些與他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完全不相容的。[[2]](#_2_You_Guan_Mao_Yu_Ta_De_Tong_Sh)

由于毛與某些主要同事之間個人關系日漸緊張，毛對黨的政策就更加不滿。首先，毛認為背叛他的事件越來越多了。雖然在1958年底，毛據說自愿從日常領導事務中退下來，但他日益不滿的是黨的某些領導，尤其是總書記鄧小平，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未與他商量就作了決定。在1966年10月毛曾說：“一開會（鄧）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1959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3]](#_3_Jie_Luo_Mu__Chen_Bian____Mao)1961年3月，當毛發現鄧未與其商議而在農業改組問題上作出了一些重大決定時，曾譏諷地問：“是哪個皇帝作的這些決定？”[[4]](#_4_Pa_Li_Si__H_Zhang____Zhong_Gu)60年代新聞與文學中出現針對其領導方式的含沙射影的批評，毛對此感到很惱火，對那些負責文化事務的官員（包括彭真和陸定一）聽之任之的態度更為氣憤。

此外，毛由于無法使官僚機構執行自己的意志而日漸灰心。1962年至1965年間，在他一直感興趣的五個領域內，毛曾試圖改變黨在“大躍進”后所采取的一些政策。他曾阻止農業包產到戶的潮流；提議改革高等教育的課程設置和考試制度；批評公共醫療設施過分集中在城市；建議創立農民組織來揭發農村公社黨政干部的腐敗無能；譴責文化領域中傳統主題和修正主義理論的重新抬頭。

盡管黨的機構對他的每一倡議最終都作出了相應的反應，但他們的做法使毛不無道理地覺得他們是半心半意，極不熱情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許多高級領導人繼續支持黨在“大躍進”后所實行的政策，不愿因有毛的指示就加以改變。對毛的指示的消極反應也部分說明了官僚機構的意圖，一面按部就班，盡量多地維持現行路線政策，一面按照毛的指示，采取一些新的行動。除此以外，毛的意圖往往是用含混不清的語言表達出來，他善于著重批評一些他不喜歡的做法，卻不善于提出具體的改進辦法。

不論怎樣，毛得出結論，官僚們的消極反應，精神生活中傳統的“資產階級”觀念的出現，以及國民經濟戰略中過分強調效益等等一起構成的修正主義的危險——根本脫離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正在中國出現。起初，毛以低調提出他對這方面的擔憂。如在1962年，他號召全黨克服修正主義，但又說這一任務不應“干擾我們的（日常）工作……或占非常主要的地位”。[[5]](#_5_Si_Tu_Er_Te__Shi_La_Mu_Bian)同樣重要的是，起初他是通過溫和又非常傳統的方式來克服黨內修正主義傾向：在官僚機構內部發動一場學習馬列主義原理和向模范干部學習的運動。

但是，這些措施并沒奏效，毛的警告就更尖銳了。他最后得出結論，修正主義比他預料的還要廣泛，黨內最高層的一些領導人不愿有效地處理這一問題，很可能，是他們自己也有修正主義思想。在1965年9月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毛就問他的同事們，“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6]](#_6_Jie_Luo_Mu__Chen_Bian____Mao)

漸漸地，這些針對修正主義的警告變成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系統理論基礎。很重要的一個事實是，運動的理論依據尚未完善之前，運動已經開始了。但是，1967年發表的兩篇社論，中國人認為是充分表述了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7]](#_7___Ren_Min_Ri_Bao____He___Hong)的新理論。盡管這些文章不是毛本人所撰寫，但沒有理由懷疑文章反映的不是毛的觀點。

概括起來說，這些社論的結論是，在毛看來，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外部的進攻，而是國內資本主義的復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蘇聯的經驗證明，如果修正主義分子在執政的共產黨內篡得了權力，資本主義復辟就會出現。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有必要經常與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內當權派”作斗爭。實際上，在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之后，這將是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這種進行階級斗爭的方式在一場“文化革命”中將“大膽地喚起基層的廣大群眾”，不僅批判黨內當權的修正主義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們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傾向。因為修正主義的根源在于人類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須要有一場持續數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持社會主義社會的純潔。

#### 鑄造毛的權力基礎

到1964年，對黨的機構發動攻擊的力量基礎開始建立。這一力量基礎的各部分開始是逐個形成的，相互間似乎沒有協調。其中一個部分是由社會和經濟政策而非人為操縱所產生的，這些政策在社會中，尤其是在城市青年中制造了一群社會地位低下、幻想破滅的人。第二部分是在毛的妻子江青的指揮下，在知識界和文化界逐漸形成的。第三部分是由國防部長林彪在部隊中組成的。在1964—1966年間，這三支力量有組織地形成了一個政治聯盟，在毛的領導下可以有足夠的力量發動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地位牢固的黨的機構。

人民解放軍 毛的權力基礎上最關鍵的部分，是林彪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因為解放軍控制了中國有組織的武裝力量。[[8]](#_8_Guan_Yu_Ren_Min_Jie_Fang_Jun)林彪在1959年廬山會議后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他一直非常注重在軍隊中恢復政治工作——一項一箭雙雕的政策，一方面保證武裝力量對毛領導的忠誠，另一方面提高自己在毛眼中的身價。林在人民解放軍的基層單位重建了黨支部（原文如此——譯者），復活了在彭德懷領導時期日漸松散的政治部工作系統，加強了黨的軍事委員會對軍隊的控制，林還強化了軍隊的政治教育項目，主要以新編的《毛澤東語錄》作為基礎教材，這種語錄小冊子成了以后紅衛兵攜帶的“紅寶書”的原型。

同時，林也尋求恢復一些革命時期的軍事傳統。在5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游擊戰的組織原則和戰術原則被擱置一旁，采用了具有正規軍特點的原則。建立了正式的軍銜制。民兵的地位降低，彭德懷建議以更為正規的軍事預備役制度取而代之。早期的“軍事民主”不見了，更強調軍階等級和軍事紀律。蘇聯軍事理論（注重陣地戰與現代化裝備）取代了用原始武器打運動戰的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反對拋棄人民解放軍的革命遺產而采用這些“外國戰略戰術原則”的呼聲早在50年代中期已很強烈。所以在50年代最后幾年，當彭德懷還擔任國防部長時，有些恢復某種平衡的做法已在進行。但是，在林彪的領導下，這一“重新革命化”的過程加速了。新的軍事條例強調一些傳統觀念，如政委與軍事指揮員的聯合領導，維持部隊忠誠與士氣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軍民的緊密關系，官兵平等，等等。軍事戰略再次強調步兵（與技術兵種相對立），民兵（與正規軍相對立）的重要性，強調小分隊戰術（與諸兵種協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相對立）。最后一個尤具象征意義的步驟是在1965年廢除了軍銜制，將士們取下了5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穿、戴的蘇式制服與識別標志，重新穿上延安時代的無任何標志的草綠色軍裝。

可是，林彪也不允許自己的這一系列政策削弱人民解放軍的戰斗力。盡管他聲稱取得軍事勝利，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林還是支持空軍的現代化和研制中國的核武器。他說，政治教育在部隊訓練中應占最優先地位，但他也督促部隊將更多的時間花在軍事操練上而不是政治學習上。林多次重申人民解放軍要遵循人民戰爭原則，但民兵活動規模比“大躍進”時的高潮時期縮小了很多，農村民兵組織更多地從事農業生產、維護治安而不是軍事活動。

這樣，在60年代初，林不僅恢復了部隊的政工系統和一些傳統軍事思想，也成功地于1962年與印度在邊界打了一仗，兩年后又引爆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這些成就表明，人民解放軍的“紅”并不是以失去“專”為代價的。

60年代初期人民解放軍的非凡表現與同期眾所周知的黨政機構的軟弱無力形成明顯對比。所以，毛把林彪看成比劉少奇或鄧小平更能干的組織管理者和更為忠誠的副手，并且把人民解放軍作為政府機構學習仿效的楷模就不足為怪了。為此，1964年2月，發起了“向人民解放軍學習”的全國性運動。作為運動的一部分，政府機構以人民解放軍的政治部作典范建立了自己的政工部門，這一機構負責政府官員的日常政治學習。政工部門中約30％—40％的職位由軍隊轉業干部或直接從部隊借調的軍官擔任。[[9]](#_9_Guan_Yu_Xiang_Ren_Min_Jie_Fan)

林彪自然很樂意讓軍隊充當這一新角色。實際上，很有可能是林彪首先提議在政府機構中設立政工部門，更有可能是林彪提議將政府機構的政工部門統一由解放軍總政治部管轄。如果這一建議被采納，將會大大增加軍隊在政府事務中的影響，侵犯了黨在這一領域內的傳統責任。雖然劉少奇同意毛的決定，在政府機構內設立政治部，但他堅持政治部應由負責經濟工作的黨的機構來管轄，而不受軍隊政治機關領導[[10]](#_10_Bei_Jing_Guo_Ji_Guang_Bo_Dia)。

盡管如此，“向人民解放軍學習”的倡議和政府機構中政工部門的設立使解放軍和林彪對政府事務比50年代初以來的任何時期都具有更大的影響。1966年2月，人民解放軍召開了一次討論文化工作的會議，名義上只限于軍隊內部的文藝工作，實際上對全國文藝界都有很大影響。[[11]](#_11_Ken_Ni_Si__Li_Bo_Sa_Er____Zh)1966年3月，林給一次全國性的工貿會議寫了一封信，號召經濟管理者們更積極地學習毛主義——這是一個相對來說無足輕重的信件，但卻標志著林對全國性的經濟工作有了更大的發言權。[[12]](#_12_Gao_Ying_Mao_Bian____Lin_Bia)

激進的知識分子 最初的毛聯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激進知識分子的小集團，到1966年年中，他們充當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裁判者和群眾發動者。糾集這幫極“左”宣傳家和作家的關鍵人物是毛的妻子江青，她很快認識到，毛與黨的機構的緊張關系給她帶來了可以實現自己政治野心的極好機會。

江青1937年去延安參加共產主義運動之前，是上海的一個二流演員和文藝圈中名聲不太好的女人。她與毛1938年的初次接觸給這個野心勃勃的女人從舞臺轉向政治提供了機會。由于她復雜的背景，她與毛的婚姻遭到許多高級領導人的堅決反對，只是在她同意30年內不參加政治活動后，這樁婚姻才得以認可。[[13]](#_13_Luo_Si__Te_Li_Er____Bai_Gu_J)由于健康原因，她在50年代遵守了自己的諾言，但到60年代初，她健康狀況好轉（雖然脾氣依舊），開始著手一項新的工程：改造中國文化。她承擔這一任務，一是她早期的舞臺生涯使之勉強說得過去，而主要則是毛對文化領域內的“修正主義”日漸不滿，給了她實質性的鼓勵與支持。

江對京劇改革的最初努力遭到一些頗有名望的表演家的蔑視和負責文化事務的官員的反對，新聞界對她也不屑一顧。[[14]](#_14_Guan_Yu_Jiang_Qing_Zai_Ci_Sh)遇到這些阻力，江轉而求助于北京和上海的一批較年輕而相對激進的文人。與那些有名望的知識分子相比，他們年紀較輕，地位較低，較少從世界范圍來看問題，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更徹底。自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來，出于信念和職業的原因，在有關學術和文化問題上，他們中許多人都采取了較為激進的態度。他們在60年代初期文化氣氛比較寬松時，經常與他們更具自由化傾向的上司進行論爭。[[15]](#_15_Shang_Hai_De_Yu_Bei_Jing_De)

江青與這些激進知識分子中的兩部分人發展了關系：一部分集中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包括關鋒、戚本禹和林杰），另一部分集中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包括當時任宣傳部部長的張春橋以及姚文元）。前一部分人學有專長，精通歷史和哲學，與之相比，上海這一批人在新聞批評方面更有經驗，更懂得創造性的藝術。在北京方面，多年擔任毛澤東私人秘書和理論家的陳伯達促進了江青與這些人的交流；在上海方面，中共華東局書記柯慶施為他們的聯系提供了便利，與其他許多領導人不一樣，柯慶施在“大躍進”失敗后，仍然緊跟毛。

1963—1966年期間，江青與她的文人小集團將主要精力放在文藝事務上，尤其是她感興趣的京劇和其他表演藝術的改革。（在這一行動中，共產黨中南局書記陶鑄也支持了江青）可是，隨著毛與黨的機構之間的對抗逐漸加劇，這些激進文人開始轉向更為公開化的政治問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他們既批判毛的對手，同時也為“文化大革命”準備了理論基礎。

毛陣營中的這第二支力量，用洛厄爾·迪特默的話來說，充當了“帝王親信”的角色。[[16]](#_16_Luo_E_Er__Di_Te_Mo___Zhong_G)這些激進文人沒有豐富的經歷，政治立場比較教條和理想主義，除了通過江青與毛有所聯系外，并無獨立的政治聲望。他們在現行的政治秩序中沒有多大的既得利益，清楚地認識到反對現行體制比耐心地去適應更有助于他們飛黃騰達。一旦毛發現他們的忠誠、他們的宣傳技巧、他們對激進理論的嫻熟，使他們可以用作攻擊黨的機構的工具時，他們的權力也就增大了。

群眾基礎 毛聯盟中的最后一支力量，在1966年年中和年底以前還處于隱蔽狀態的是群眾基礎，主要由中國城市社會中那些自認為地位較低的人組成。似是而非的是，正是毛推動下出臺的兩項政策大大加劇了中國城市社會的緊張狀態：學校招生和安排就業時要重新強調階級成分；從郊區農民中招收一些臨時工進工廠干活。實施這兩項政策據說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毛的群眾基礎中最積極的一部分是高中和大學里的學生。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運動主要出于年輕人正常的理想主義，理想主義使他們與毛一樣對地位優越的社會成員，對不平等，對60年代中期困擾著中國的官僚機構的遲鈍感到憤慨。毫無疑問，這些學生也很愿意得到因參加毛的反修運動而帶來的地位與權力。

此外，60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也給中國學生帶來分裂與痛苦。上小學和初中的機會增加了，而同時，高中和大學的招生人數卻比“大躍進”時大大減少了，主要原因是國家在經濟衰退時期要努力緊縮過大的財政開支。重點中學與非重點中學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前者的學生比后者的學生有更多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此外，在1964—1965年間，規定沒有上大學和進工廠的中學生要大量送往邊疆和農村，[[17]](#_17_Guan_Yu_60Nian_Dai_Chu_Qi_De)這一政策成為后來大規模上山下鄉的前兆。

往上爬的機會減少了——這就是永久送往農村的真正危險所在——廣大學生便全力關心著晉升的標準。表面上，決定學生上重點中學、大學和安排理想工作有三條標準：家庭成分、學習成績和政治表現。但是到60年代中期，標準的重心變了，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現變得越來越重要，學習成績則不怎么看重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最幸運的是那些出身于干部或軍人家庭的學生，他們的學業成績并不見得比別人好，但由于把家庭出身作為升高中、上大學和入團的重要標準，他們就得到更多的優惠。其次是來自工農家庭的學生，他們良好的家庭出身可以彌補其學業的平凡。處于最底層的是出身資產階級或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他們常常成績最好，但他們“很差”或“中等”的家庭成分成了他們升遷的最大障礙。[[18]](#_18_Zhong_Guo_Xue_Sheng_De_Fen_L)

正如學生們一樣，城市工人也因60年代初的政策而分裂了。50年代的經濟政策在固定工與學徒、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以及在較大的國營工廠工作和在較小的集體企業工作的工人之間就已經產生了裂隙。在任何情況下，前者都比后者得到的工資和工作福利多。

在中國采用蘇聯模式而導致的這些差別，又因1964年在工業中實行“工人—農民制度”而進一步擴大。根據這一政策，要按照工廠企業的具體需要，從郊區公社招收一些臨時工或非全日制工人。官方認為這一制度有利于減少城鄉之間的社會和經濟差別，因為它產生了一個同時既是農民又是工人的階層。可是，真正實行起來，這個亦工亦農原則就顯得并不像所說的那么高尚了：工廠很高興有機會雇用臨時合同工，與固定的正式工人相比，他們的工資低，也沒有資格得到國營企業提供的退休金和公費醫療，隨時都可以因表現不好被解雇。[[19]](#_19_Li_Hong_Yong__Yin_____Zhong)

亦工亦農制實行的結果，不但沒有緩和反而加劇了社會緊張。這一就業政策不但產生了深感不滿的工人下層階級（他們雖然與正式工干同樣的活，收入卻更少，更沒有工作保障），而且還使更多的人產生跌入社會底層的恐懼。許多國營企業傾向于將原本屬于正式工的工作分配給更有彈性的亦工亦農制工人。這樣，學徒工眼看著升遷的機會消失了，就是正式工人也面臨著被送往農村變成合同制工人的危險。

當“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年中爆發時，群眾性大規模抗議受到鼓勵，這些團體的憤懣和個人的痛苦形成了“紅衛兵”運動的燃料。像任何一場復雜的社會運動一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每個人在60年代中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其政治傾向之間存在著一種松散的聯系。但“紅衛兵”運動中一個常見的模式是出身“較差”或“一般”、感到他們往上爬的機會逐漸減少的學生以及在經濟分工的階梯上位置較低的工人一起向黨的機構發泄他們的憤怒。[[20]](#_20_Ma_Ke__J_Bu_Li_Qi___Ge_Deng)

#### 危機出現

當中國領導人就對越南的軍事方針與戰略、對文學界人士的政策及整黨等問題的爭論日趨激化時，我們上面討論的問題與緊張狀態在1965年秋至1966年夏之間達到了頂點。這些爭論使得林彪和江青在毛的支持下，將他們的潛在對手靠邊站，加強了他們對部隊和文化機構的控制，從而使毛的政治基礎更加穩固。就人民解放軍而言，中國對逐步升級的越南沖突應作何反應的爭論使他們有機會清洗了總參謀長羅瑞卿。羅是能夠向林彪控制軍隊提出挑戰的潛在對手。在文化領域，針對一出歷史劇的論戰——此劇被認為是指責毛的——最后導致罷免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重組黨的宣傳部，任命陳伯達、江青和康生——一個長期以來與毛關系密切的公安工作專家——擔任即將開展的反修運動的領導。幾個月以內，毛已與劉少奇徹底決裂，將運動從文化領域擴展到高等院校和政府機構。

1966年春，毛政治陣營的三支力量——軍隊、激進的知識分子和希望破滅的青年——逐漸融合成相對緊湊的聯合陣線，他們可以充當“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1966年2月，在一次軍隊文藝座談會上，江青和林彪正式建立了聯盟，此前，江青與軍隊幾乎沒什么聯系，但在這次會議上，江青充當了部隊文藝工作領導人的角色。在緊接著的以后幾個月里，毛澤東周圍的激進官員和軍隊領導人開始在城市不滿現實的人中尋求支持。六七月間，陳伯達、江青和康生領導下的“文革”領導小組開始與北京主要高校師生中的激進分子建立聯系，鼓勵他們猛烈攻擊學校、黨和政府的領導人。至7月底，解放軍就已開始為主要大學里出現的“左”派組織提供補給和后勤支持。

最后，1966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了人數不全的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剛過半數，會議大廳里塞滿了紅衛兵，這次會議通過一項決議，批準發動城市人民起來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決議的結果，到年底就變成了毛和他的追隨者對黨的全面進攻。“文化大革命”從此進入最混亂、最具破壞性的時期。

羅瑞卿 林彪的軍事方針在解放軍的高層領導中并非未遇挑戰。林的主要對手是總參謀長羅瑞卿，早在1964—1965年間，他就懷疑林的軍事方針是否適當，當時美國對越南戰爭的干預正逐步升級，在南部邊界給中國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威脅。[[21]](#_21_You_Guan_Luo_Rui_Qing_De_Qin)

回顧起來，羅瑞卿向林彪挑戰現在還有些令人感到意外。1949年以前，羅大部分時間都是擔任政委，50年代擔任公安部長（而非一支部隊的司令）。所以，沒有理由懷疑羅會反對強調思想教育和政治忠誠，而這正是林彪當國防部長的特色。除此之外，林和羅在共產黨革命過程中有著良好的私人關系，早在30年代紅一軍團時，羅就在林的手下任職，后又在紅軍大學和抗大（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擔任林的副手。1959年，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羅就被提升為總參謀長。即便對羅的任命不是林彪提出的，但至少也得到了他的認可。

自50年代初以來，林彪一直受各種慢性病的折磨，如戰傷、胃病、肺結核，或者是一種綜合征，使得他時不時地減少自己的體力活動和政治活動。60年代初，這些毛病的復發，明顯地使林和羅瑞卿的關系變得非常緊張。至少可以說，羅曾希望，林的疾病可使他對軍隊有更大的指揮權；或者換句話說，羅可能曾希望林辭去國防部長的職務，自己取而代之。根據一戲劇性的描述，說羅曾當著林的面講“一個病人應把自己的位子讓給稱職的人！少管閑事！不要礙手礙腳！”[[22]](#_22_Ha_Ding___Ge_Tuo_Fu____Qing)

隨著美軍在越南戰爭中下的賭注越來越大——其程度完全出乎中國領導人的預料——兩人緊張關系也加劇了，羅開始建議做好軍事準備，以防美國將戰火燒到中國。正如羅在1965年5月所說的：

戰爭一旦打起來，有準備和沒有準備是大不一樣的……戰爭準備的立足點，又必須放在可能出現最困難最嚴重情況的基礎上。既要準備帝國主義小打，也要準備帝國主義中打和大打。既要準備帝國主義使用常規武器，也要準備帝國主義使用原子武器。

羅更進一步說，如果戰爭打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應當在預筑陣地上保衛祖國，然后發起反攻，跨過邊界將敵人消滅“在洞穴里”。[[23]](#_23_Luo_Rui_Qing___Ji_Nian_Zhan)

羅的這些建議，可能代表了職業軍人的觀點，對林彪來說是無法接受的。至少有一點，羅所倡議的線式防御與人民戰爭原則相抵觸，根據人民戰爭的理論，中國軍隊應當誘敵深入，使敵方的供應線拉得過長然后各個擊破。羅還堅持如他1965年9月所說的，“千條萬條，最重要的一條”是準備打仗的思想，[[24]](#_24_Luo_Rui_Qing___Ren_Min_Zhan)意即人民解放軍應重新安排優先考慮的事情，至少暫時要這樣做，以高度重視軍事準備工作。這兩點意見中，后者可能更引起爭議，解放軍當時在政府事務中發揮著比以前更大的作用，而且是與黨的機構對抗的毛的力量陣營中關鍵的一部分，如果采納羅的意見，就是對這一過程的反動：他們將要消除解放軍對政治事務的影響，這樣解放軍基本上就從毛聯盟內撤了出來。

林彪和羅瑞卿的爭議在9月初達到高潮，當時兩人都發表文章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日本投降20周年，文中兩人就中國的國防政策發表了完全不同的見解。[[25]](#_25_Jian_Qian_Yin_Shu__Lin_Biao)羅認為中國“一定要有足夠的估計和全面的準備”以防美國進攻中國。與此相對照，林指出美國人未必如此莽撞，即使他們真的敢來，也有足夠的時間來發動“幾億拿武器的中國人民所形成的汪洋大海”。這是羅最后一次公開講話，到11月底，他從公眾的視野中一下子消失了。林彪開始羅織各種罪名來控告他這位同事，并將這份起訴書于12月8日交給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會議。這次會議任命了一個以葉劍英元帥為首的七人小組，調查林控告羅的各條罪狀。

調查組很快就走訪一圈，在來自軍隊各部門代表的陪同下，于1966年3月與羅作了后來被描述為“面對面”的斗爭。羅的自我檢討以不深刻為由遭到拒絕，之后，他試圖從關押他的樓房跳樓自殺，但并沒有死。4月8日，調查組結束了工作，最后向中央建議罷免他擔任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以及在軍隊擔任的各種職務。結案報告在5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獲得通過，有理由相信，當時擔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彭真在調查過程中曾為羅辯護過，但他的觀點遭到拒絕。[[26]](#_26_Guan_Yu_Luo_De_Ming_Yun__Jia)

羅瑞卿事件因為兩點理由而顯得重要。其一，它充分表明毛和林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撤換任何不贊同他們的政策和向其地位挑戰的人。其二，這一事件使毛和林加強了對中國專政機器中兩個最關鍵部門的控制。羅被撤銷總參謀長之職，后由楊成武接替，使林能對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發揮更大的影響。此外，清洗羅之后，公安部接著又撤換了羅以前的一些下屬，于是，康生控制了國家安全機器。

吳晗和彭真 在羅瑞卿受到猛烈攻擊的同時，毛開始注意知識分子中的持異議者。[[27]](#_27_Guan_Yu_Wu_Han_Shi_Jian__Jia)他把火力集中在《海瑞罷官》上。此劇作者為吳晗，一個作家兼學者，當時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毛指責這出歷史劇名義上寫的是明朝一個正直的官員被嘉靖皇帝不公平地罷了官，實際上是影射毛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清洗彭德懷。毛最初可能鼓勵吳寫此劇本，但這卻沒能影響他對此劇的最終判決。

在處理吳晗和海瑞劇的問題上，毛使用了鉗形攻勢。一開始，他把批判吳晗劇本的任務交給了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該組織成立于1964年。這一舉動將彭真置于極為困難的境地，因為作為市委第一書記，當然要對自己的副市長的行為負責。彭真或許出于與吳晗密切的個人關系和對知識分子問題持較為寬容的態度，他很快就表明他要采取什么手段了：只提劇中所說的歷史事件而不談其寓意，并且舉行公開討論，顯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28]](#_28__Wu_Chan_Jie_Ji__Wen_Hua_Da)

毛事先就意識到彭對此事的傾向性，便與此同時走了第二步棋。他讓姚文元——一個與江青關系密切的上海文人——準備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毛還特別強調，姚的文章應著重說明他認為是關鍵的一點：吳晗的意圖是說彭德懷就是歷史上的海瑞。姚的文章發表以前，毛看過三次，這充分證明了毛對此事的興趣和卷入程度之深。[[29]](#_29_Yao_Wen_Yuan___Ping_Xin_Bian)

姚的文章——對吳晗直接的嚴厲的攻擊——于11月初在上海發表。在此之前，北京的五人小組還沒有對吳晗一案采取任何正式行動。彭真萬分憤怒，這不僅因為自己的下屬受到如此嚴厲的批評，還因為他認為沒有得到黨的有關部門的正式批準就擅自發表這樣一篇文章，是違背了黨內斗爭的原則。在五人小組成員之一、宣傳部長陸定一的幫助下，彭真成功地阻止了中央和北京市各大報登載姚的文章。只是在周恩來秉承毛的指示親自干預之后，這篇文章才出現在報紙上，廣為轉載——首先登在《解放軍報》上并加了吹捧性的編者按，然后又上了《人民日報》并附上一個懷疑性的簡介。

盡管彭真最后未能壓制住姚文元文章而不讓其見報，但他還是努力使對知識分子的批評限制在他認為比較適當的水平上。由于有五人小組中大多數人的支持（其中只有康生是毛立場的強硬支持者），彭繼續阻止發表更多的由戚本禹之類的激進文人所寫的文章，他認為這些文章對吳晗來說太過分了。他堅持這一立場而不顧毛對他的直接批評。12月底，毛譴責彭無視海瑞和彭德懷之間的類比。彭則找到一些較為勉強的理由為自己辯護，他說彭德懷和吳晗沒有私交，所以吳晗沒有參加任何宗派活動。但彭真還是答應毛：五人小組將在兩個月之內就此問題作出最后結論。

五人小組就此問題至少開了兩次關鍵性的會議：第一次是在1966年1月2日，第二次是在2月4日。雖然各種跡象都表明毛對他們的報告一定會不滿——12月毛與彭真的談話和康生的多次警告——五人小組還是決定堅持彭真原來的態度。2月3日，宣傳部兩名副部長，姚溱和許立群概括五人小組多數人的觀點起草了一個報告。

這一文件（即著名的“二月提綱”）承認文化領域內存在著資產階級傾向問題，但同時強調必須在學術范圍內討論這一問題。[[30]](#_30__Wen_Hua_Ge_Ming_Wu_Ren_Xiao)提綱意思是說，處理“像吳晗一類人”的問題有兩種不同方法，一種方法是將這類事件看作政治問題，將一切不同意見和非正統觀點都認為是反社會主義和反革命的，應當使用行政手段來壓制；相反，第二種方法是將這類事件當作嚴肅的學術問題對待，應當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以理服人。

提綱明確地選擇了第二種方法，宣布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應遵循“百家爭鳴”原則，目標應當是通過多做學術工作來消除不同意見和非正統觀點，而不是通過“政治上打擊他們（意見不同的知識分子）”，這應當是一個寬大為懷的過程，批評者“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最重要的是，提綱建議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應當“有領導”地“慎重”地進行，而且要經過“較長一段時期”。

“二月提綱”在兩個重要方面與毛和依附江青的激進派的觀點明顯不同。它故意回避就吳晗是否有意借海瑞來間接批評毛罷免彭德懷的問題作出任何結論，這樣就避開了毛先前明確交給他們的任務。此外，提綱既批評了被認為是修正主義學者的吳晗，也批評了以姚文元為代表的激進文人。五人小組雖沒有點名批評任何激進的作者，但它指責某些“革命‘左’派分子”的行為像“學閥”，它甚至號召整頓“左”派中的錯誤思想。

2月5日，“二月提綱”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進行討論并通過。彭真和其他成員接著就去武漢和毛討論此事，不出所料，毛明顯反對這個提綱中對激進分子措辭嚴厲，而對吳晗卻未提出明確的批判。雖然如此，彭回到北京后還是聲稱毛已認可“二月提綱”，2月12日，中央委員會批準該文件下發。

1965年秋，姚文元對吳晗直截了當的批判與彭真及中宣部較為溫和的態度形成明顯對比。到1966年2月，五人小組所擬的“二月提綱”與林彪、江青聯合授意起草的另一文件形成尖銳對立。該文件是2月2—20日在上海召開的軍隊文藝座談會紀要，此次會議形成了江青與林彪的政治聯盟。[[31]](#_31__Lin_Biao_Tong_Zhi_Wei_Tuo_J)像先前姚文元寫的文章一樣，此座談會紀要（即中國人所說的“二月紀要”）是在毛的親自監督下起草的，據說經過毛的三次修改，才在黨內傳達。

“座談會紀要”對知識分子采取的立場與“二月提綱”正好完全相反。它不僅將中國的文化生活說成是革命的觀點與修正主義觀點之間的“16年尖銳的階級斗爭”，而且聲稱文化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是對宣傳部和五人小組領導的尖銳攻擊。“座談會紀要”號召積極地、大規模地批判這些傾向，而不像“二月提綱”所要求的那樣，以寬容的態度從學術觀點上去批評。

“座談會紀要”不再理睬吳晗與海瑞劇，因為此時的問題不再是吳晗，而是彭真、陸定一領導的中宣部，以及他們控制的五人小組的行為。在3月底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彭真、吳晗和“二月提綱”，并威脅要解散五人小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傳部。毛以中國古代神話中得到的生動聯想，對康生談話時說：

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各地應多出些孫悟空（猴王），大鬧天宮。如果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壞人，那么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組都要解散。去年9月，我就問一些同志，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有可能。[[32]](#_32___Mao_Ze_Dong_Si_Xiang_Za_Lu)

工作會議召開后，彭真清楚地意識到，再不服從毛已毫無用處。為了盡一切努力保住自己的職位，他鼓勵北京市委加強對吳晗的批判，還開始攻擊鄧拓——另一個曾撰文影射毛的領導的北京市官員，甚至開始準備自我檢討。根據一紅衛兵的敘述，4月初，彭真還召集五人小組成員、中宣部領導以及北京市委主要成員在他家里開了一次聯席會議，他動情地說自己在這場文化領域內的革命中犯了嚴重的錯誤，但堅持認為在其余的政治生涯中，自己堪稱楷模。他請求各位同事幫助他：“古話說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我現在盼望得到你們的幫助。”[[33]](#_33_An____Zhong_Guo_Zheng_Zhi)

但這太遲了。在4月9—12日的書記處會議上，彭發現自己不僅遭到康生、陳伯達的批判，也成了鄧小平與周恩來的批評對象。書記處決定解散彭真的五人小組，并向政治局提議組成新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使之能更加同情毛的立場。[[34]](#_34_Li_Bo_Sa_Er____Yan_Jiu_Zhi_N)在這戲劇性的發展過程中，劉少奇正好不在北京，不合時宜地去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緬甸了，這樣就未能帶頭站出來保護彭真和陸定一。

政治局五月會議 到此為止，兩個主要的目標——羅瑞卿和彭真——的最后命運在5月4—18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最后決定了，會議最重要的部分是林彪的即席發言，其主要材料，據后來指控，是張春橋提供的。[[35]](#_35_Li_Bo_Sa_Er____Yan_Jiu_Zhi_N)林在講話中將羅瑞卿的問題與彭真和陸定一聯系起來，指責此三人暗中與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合謀發動軍事政變以推翻毛及激進分子。林演戲般對政治局委員們說：“你們可能已聞到了——火藥味。”

林大談軍事力量在奪取政權中的作用，以此來支持他那些異想天開的指控。他還突出地談到，在中外歷史上，軍事政變都非常盛行，每一朝代都發生過謀殺和篡權，而第三世界自1960年以來，“每年平均發生11次政變”。雖然這些事實是想用來說明林對羅、彭、陸、楊的控告是合乎情理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林醉心于使用軍事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林還表示，他吸取了歷史教訓并已采取行動：按照毛的指示，已經派遣忠實可靠的部隊進駐廣播電臺、軍事設施和北京市公安部門以防止發生“內部顛覆和反革命政變”的任何陰謀行動。

同樣有趣的是林對毛諂媚拍馬，樹立毛的高大形象。他一面指控羅、彭、陸、楊“反對毛主席和反對毛澤東思想”，一面繼續稱贊毛的天才，并把是否忠于毛當作選拔黨和政府官員的最重要的標準。“毛主席經過的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都多……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毛主席的話，毛主席的著作和毛主席的革命實踐都表明他是無產階級的偉大天才……毛主席著作里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誰反對他，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政治局擴大會議同意并批準了調查羅瑞卿問題的小組工作報告，并指示在黨內和軍內傳達。會議于5月16日發出一通知，后來江青聲稱是她起草的，主要講了文藝界的一些問題。[[36]](#_36__Zhong_Gong_Zhong_Yang_Tong)“五·一六通知”撤銷了“二月提綱”，指責提綱企圖“使運動向右轉”，混淆文藝界正在討論的政治問題，妄圖通過批判所謂“學閥”，“將矛頭指向‘左’派”。通知譴責彭真，要他對“二月提綱”負責，決定解散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意即在毛的領導之下），而不像此前那樣，五人小組隸屬于中央書記處（意即鄧小平和劉少奇領導之下）。鑒于五人小組的主要成員處理“文化革命”問題時反對毛的觀點，新的“文革”小組主要由毛個人的支持者和江青周圍激進的文人組成。陳伯達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組員有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原文如此——譯者）。

成立新的“文革”小組的主要目的是繼續批判文藝界的“資產階級”思想，同時，“五·一六通知”警告，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可能會遇到與彭真、羅瑞卿相同的命運。通知指出：

一定要清除那些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這樣，“通知”表明毛的反修運動大大升級了：從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擴大到針對全黨的運動。

5月政治局會議為重組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和書記處做好了準備。6月初正式宣布：派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取代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派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取代陸定一任中宣部部長；楊尚昆擔任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則由汪東興接替，汪當時任公安部副部長，掌握著首都精銳的衛戍部隊。5月底6月初罷免了這么多高級領導人，充分表現了毛在自己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上寸步不讓的決心，同時也說明了他完全有能力撤換那些不服從他意志的人。更為重要的是，每一次改組——總參謀部、“文革”小組、北京市委、中宣部、書記處——都壯大了毛的陣營，削弱了抵制和反對他的力量。換句話說，每一次清洗即便沒有平息毛的憤怒，至少也為他在黨內將反修運動擴大化提供了便利。

五十天 “五·一六通知”發出了“資產階級代表”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的警告，這預示著毛要在全中國對“修正主義”來一次徹底的大清洗，不只限于文藝領域而是在整個國家機構。在遠離北京的華中某地，毛深居簡出，把這一任務交給了劉少奇。毛后來說他早已懷疑劉是修正主義分子，其他激進分子則認為劉就是“五·一六通知”里所說的被培養為毛的接班人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無論劉是否完全意識到毛對他的懷疑，他在1966年6月都面臨著進退兩難的處境。一方面，如果他要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就必須以最大的熱情和最高的效率來與修正主義作斗爭。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央對政治動員的速度進行控制，尤其是在大學校園內，他還要保護自己已受到損害的政治基礎。從劉在1966年6月至7月上旬50天時間的一系列行動中可以看出他在努力擺脫這種困境。在這一段時間里，由于毛不在北京，主要由他負責黨的日常事務。

到這個時候，激進的師生，尤其是北京的師生，都已獲悉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爭論，并且了解到毛對“二月提綱”的態度。一部分原因是一些年輕教師本人就是黨員，可以看到有關文件，如“五·一六通知”，這些文件通常在黨內傳達。還有一個原因是新成立的“文革”小組在北京主要的高校派駐了代表以發動群眾支持他們。[[37]](#_37_Sun_Dun_Fan____Zhong_Guo_Gon)

5月25日，北京大學的一些激進教授和助教在聶元梓——哲學系的一個助教——的率領下，寫了一張大字報，批評學校領導支持“二月提綱”的自由化政策，壓制學生就海瑞事件引發的政治問題舉行大辯論。根據“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發表的有關材料，聶當時得到了“中央理論調研組”的直接支持，該組織由康生的妻子曹軼歐領導，曹攜“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指示來到北大。[[38]](#_38_Bei_Da_De_Shi_Jian_Jian___Ho)

毫不奇怪，學校當局立即采取行動壓制這種行為。在此事上，他們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在聶的大字報貼出的當天晚上，周就另外派出一個中央工作組，批評了聶的行為。但是，毛澤東在得知大字報的內容之后，指示全國報紙、電臺在6月1日刊登和廣播大字報并加上鼓勵性的評論。這一決定，再加上隨之而來的整個北京大學領導機構的改組，無疑說明作為反修運動一部分的群眾運動是天生合理的。同時，中央宣傳部改組之后，對中央新聞媒體也換上了另一班人馬。這樣，《人民日報》上出現的煽動性社論也就越來越多。

由于上述鼓勵，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校園里都貼出了師生員工寫的大字報。大多數大字報是有關教育方面的，如招生程序、學期考試、課程設置等是談得最多的問題，但也有一些是指責學校領導甚至更高一級的官員支持修正主義政策的。這些不滿意見的總爆發，就像在北大一樣，許多是得到陳伯達、江青和康生領導的“文革”小組的鼓勵的，是他們進行協調的。沒多久，學校的領導權威就垮臺了，學生和教工的紀律觀念也喪失殆盡。

這一迅速的政治衰退過程——不同意見的崛起和現存權威的垮臺——成了劉少奇頗為擔憂的問題。[[39]](#_39_Guan_Yu__Wu_Shi_Tian___Jian)在沒有得到毛的明確指示的情況下，他決定采取幾項措施，希望借此既能顯示他反對修正主義的決心，同時又能將學生運動置于黨的領導之下。一開始，他命令各大學暫停招生半年，以獲得時間對大學的考試制度和課程設置重新審查并加以改革。同時，他下令成立了工作組——大概有400個工作組，10000多名組員——并將他們派到大、中學校以及金融、貿易、工業、交通等政府部門。由于共產黨在過去的整風運動中，經常派工作組，所以劉毫不懷疑地認為他的決定是正常的、恰當的、無可非議的。

導致劉少奇最后毀滅的并不是派遣工作組這一做法，而是給工作組行動作的指示。工作組明顯被告知，政府機構里有大量的官僚主義的一般干部和高校里的教職員應當受到批判，甚至可以解除他們的職務。例如，在財政部據說有90％的干部受到批判；在文化部，工作組被授權可以罷免2/3的官員的職務。在大學里，許許多多的一般行政人員和教師受到攻擊，長達10年的恐怖統治就此開始。

工作組也得到指示，在全國的主要大、中學校恢復黨的領導，并將學生運動置于其控制之下。7月13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在回顧了北京市各中學的“文化革命”情況之后得出結論：學校的主要工作是“恢復黨支部的領導”和“增強工作組的力量”。[[40]](#_40_Sun_Dun_Fan____Zhong_Guo_Gon)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用更為直率的語言道出了同樣的觀點，他說，“凡是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的單位，必須立即派去工作組，把領導權奪回來”。[[41]](#_41_He_Fei_Dian_Tai_1966Nian_7Yu)

重申黨對學生運動的領導意味著要遣散激進的學生及支持他們的教師。國家政策還是允許學生示威、游行、貼大字報，但只限于校內。可是，許多地方的黨委和工作組急于控制學生運動，采取了更為嚴厲的手段。在一些地方，大字報和游行都被禁止，有些地方則規定，只有經工作組同意后方可進行此類活動。有些激進的學生被開除出團，部分被押上了批斗會，有的甚至被送往農村勞改一段時間。由于這一系列嚴厲措施，工作組在許多大學恢復了一定的正常秩序。

一部分學生聽從勸告停止了政治活動，還有一部分因為種種限制反而加深了他們的對抗情緒。他們成立了一些秘密組織來與工作組對抗，有的還冠以“紅衛兵”的稱號，盡管劉少奇將他們定為“秘密的（所以）也是非法的”組織也無所畏懼。[[42]](#_42__Da_Shi_Ji___Di_25Ye)另外一些學生組織也在工作組的授意下成立了，他們支持工作組。換句話說，出現了這樣的結果：學生運動不僅部分停止，而且剩下的一些積極分子也分化了。

工作組壓制激進派的問題很快就在黨的最高層領導中引起較大的爭議。7月初，蒯大富——清華大學非常激進的學生之一——受到駐校工作組的批評，這件事成了北京黨的高層會議的議題。劉少奇在會上說蒯是一個惹是生非的家伙，康生則替他辯護，認為他有權反對黨內的修正主義。直到此時，眾人才認識到蒯大富之類的積極分子與康生任顧問的中央“文革”小組有著直接的聯系，而蒯與之斗爭的工作組卻是根據劉少奇的指令派駐的，更為針鋒相對之處在于工作組的領導人不是別人正是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43]](#_43_An____Zhong_Guo_Zheng_Zhi)這樣，劉的政治前途就不可避免地與工作組的舉動系在一起了。

在毛澤東看來，工作組正在重犯60年代早期農村社教運動時劉少奇所犯的錯誤。[[44]](#_44__Guan_Yu_She_Hui_Zhu_Yi_Jiao)那場運動是為了反對農村干部中的腐敗現象和資本主義傾向而發動的。劉的做法是，派遣大量工作組到基層黨組織，限制農民參加整黨，批判大批公社干部，削弱高一層領導的職權。在毛的眼里，60年代中劉在政府機關和高校的一系列整治措施與過去的錯誤如出一轍。大批基層干部受到批斗，群眾運動受到限制，完全沒有認識到修正主義的根源就在于高級官員的同情態度。

#### 十一中全會

毛對劉少奇主持政府機構中反修運動的表現和對激進學生運動的處理十分憤怒，因此7月中旬他突然中斷在杭州的停留返回北京。在返回首都途中，毛暢游長江——這一行動旨在證明在未來的政治斗爭中他的身體沒有問題。毛在杭州期間一直在工作（雖然是幕后活動），但這是數月以來第一次公開露面，因而受到中國新聞媒介前所未有的頌揚。新華社對毛此舉的報道開頭為“七月十六日這一天長江水面笑逐顏開”。繼而在講到漢口一火力發電廠的一個民兵見到毛主席時，“興奮得忘記了自己在游泳，舉起雙手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他躍起來又沉下去，喝了幾口水，覺得長江的水特別的甜”。然后，世界職業馬拉松游泳協會主席邀請毛參加即將舉行的兩次比賽。因為據新華社的報道，毛主席的泳速幾乎是世界紀錄的四倍。[[45]](#_45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

一到首都，毛就召集了有各地黨委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會議，會上毛要求撤銷由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工作組不懂，有些工作組搞了些亂事……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學校的事）要依靠學校內部的力量，工作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46]](#_46_Chen____Mao_Ze_Dong_De_Wen_Z)北京市委立即宣布從該市所有大中學校撤出工作組，并由各校師生員工選舉產生的“文化革命小組”取而代之。[[47]](#_47_Sun_Dun_Fan____Zhong_Guo_Gon)

但是北京市委的迅速投降并未使毛平靜下來。他開始為召開中央全會做準備。這次全會是1962年以來的第一次，將批準已經采取的措施，并使他關于在中國發動一場反修革命的長遠目標的設想合法化。會議在8月初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可能剛過半數——這反映出黨內分歧很深，會議召開得也很倉促。與會者不僅有非中央委員的黨的干部，而且有“來自北京高等院校的革命師生代表”。[[48]](#_48_Li_Bo_Sa_Er____Yan_Jiu_Zhi_N)此外，林彪明顯加強了軍隊對首都地區重要單位的控制——因而使他加緊了在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次宣布的對這個城市的控制。即使如此，毛自己后來也承認他得到與會代表支持的人數剛剛超過半數。[[49]](#_49___Mao_Ze_Dong_Si_Xiang_Za_Lu)

這次人數不齊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在三個主要方面作出了決定。人事方面：同意提升七個毛的主要支持者，而那些在過去幾個月中抵制他或沒有正確理解其意圖的則被降級。全會批準了5月政治局會議關于免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的職務的決定，以及將彭和陸開除出政治局的決議。劉少奇由于對“五十天”運動的錯誤處理，被免除了黨的副主席職務，并在黨的排列順序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則代替劉成為第二把手，并且成為黨唯一的副主席，從而取代了劉成為毛的接班人。新的“文革”小組領導人陳伯達和康生，由政治局候補委員提升為政治局委員。與“文革”小組關系越來越密切的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被指定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被任命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全盤負責政治和法律事務，這個位置以前由彭真占據。

新進政治局的人不全是林彪或江青的親信。八屆十一中全會作出的其他人事決定似乎反映出毛、林和“文革”小組與黨和軍方的妥協。一些與江青、陳伯達或林彪沒有密切聯系但富有經驗的黨和軍隊的干部，也被補進“文革”小組。四個資深的省級領導人——陶鑄（新任宣傳部部長）、李雪峰（新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宋任窮和劉瀾濤也被選為政治局委員。三位人民解放軍元帥——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也被增選進政治局，也許這是一種平衡林彪日益增長的政治影響的手段。

在政策方面，劉少奇作了正式政治報告，但他的報告在林5月作的關于政變的談話和毛8月下旬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一封友好的信面前就顯得黯然失色。這兩份材料分發給了大會代表。[[50]](#_50_Sun_Dun_Fan____Zhong_Guo_Gon)全會公報回顧了60年代初的重大問題，肯定了一切與毛澤東有關的觀點，間接批評了劉少奇的某些做法。毛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方針（體現在1963年5月的“前十條”和1965年1月的“二十三條”中）被說成是處理農村組織問題的正確方針。全會贊揚毛對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關心和他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存在階級斗爭的理論。全會也贊同他提出的向大寨大隊、大慶油田和人民解放軍學習的號召。

最后，全會通過了“文革十六條”，“十六條”表達了毛對這場運動的觀點，[[51]](#_51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_Z)運動的主要目標是要“改變全社會的精神面貌”，是要：

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

主要方法是發動“廣大的工人、農民、戰士、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干部”，決定聲言，即使這些人可能會犯錯誤，但“文化大革命”成功的關鍵在于“黨是否敢于發動群眾”，無論是抵制還是試圖控制這場運動都是不妥當的。

“十六條”反映出中央委員會內部的嚴重分歧。“十六條”對“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混亂可容忍到何種程度這一問題十分含糊不清。一方面，決定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中會出“亂子”，但又用毛1927年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話說：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決定也提出了運動的總目標：“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里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決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對參加革命的大、中學生的報復行為。

另一方面，由于周恩來、陶鑄的提議，決定也包括了一些明顯意在限制“文化大革命”行為的條款。[[52]](#_52___Ren_Min_Ri_Bao____1986Nian)強調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可能性，禁止使用強迫和暴力。這樣在很大程度上，使普通科學家、技術人員、干部以及鄉村的黨政機關，免于卷入整個運動。決定堅持“文化大革命”不能妨礙經濟生產，并且規定即使“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和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必須批判，但未經黨委的批準不能在報紙上點名批判他們。

即便如此，十一中全會的基調與這些正式要求防止出現偏向的警告仍有明顯差距。甚至在大會期間，毛寫了一張“大字報”，張貼在中央全會會議廳外面，他在大字報里指責“某些領導同志”——很明顯，這指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在“五十天”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派出工作組去學校和政府機關。[[53]](#_53_Chen____Mao_Ze_Dong_De_Wen_Z)十一中全會通過決定，撤銷了三個政治局委員（總共有21個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這兩件事合在一起，標志著十一中全會的深刻意義：毛澤東個人發動的對黨的機構和知識分子的全面進攻合法了，為了進攻就需要在更高程度上發動群眾和進行更激烈的政治斗爭。

## 權威的垮臺

#### 紅衛兵的出現

八屆十一中全會批準了毛用“發動群眾”的“文化大革命”去批判“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的修正主義傾向的設想。這樣，全會就把毛思想中從60年代初就形成的兩個主題結合在一起：第一，黨本身要對中國從“大躍進”以來產生的修正主義負責；第二，反擊修正主義最好的方法則是發動中國的普通群眾——尤其是年輕人——反對之。

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設想出一個群眾參加的機制。這個機制僅存在幾個星期。計劃是：在基層單位，從工廠和公社到大學和政府機關，建立由群眾推選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為模式，革委會成員由普選產生，并且隨時接受選舉人的批評，可隨時被撤換。簡言之，他們在由其組成的機構中要有廣泛的代表性。

重要的是，無論如何，文化革命委員會不會取代黨委和行政機構。相反，十一中全會的決定多少有點矛盾地把它們說成是“保持我黨和人民群眾密切關系的橋梁”。一方面，這些委員會被看成是批判修正主義和反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的常設機構，但在另一方面，決定又強調他們將仍然置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從毛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問題是“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個構想具有內在的缺陷，這些缺陷削弱了革委會的戰斗力。一開始就規定革委會接受黨的領導，這就使得地方黨委有可能與之合作，或通過群眾“推選”，確保思想比較保守的人成為委員會成員，從而控制委員會。規定委員會由推選產生，實際上保證了至少在大學，委員會代表了日益分化的學生團體的利益。在許多情況下，“文化革命”委員會為高干子女所操縱，這不僅因為干部家庭的子女肯定要在大學生中建立最大的單個組織，而且因為上級黨委有可能贊成其同僚的大學生子女成為群眾運動的領袖。更重要的是，“文化革命”委員會只關心他們自己各個單位的問題，而不是更廣泛的國家政策問題，而國家大事卻是毛主義者要他們關心的“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問題。

但是立即有了另一種群眾參加的方式，這就是紅衛兵。就在十一中全會批準“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構想之前，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代表復信，很巧妙地認可了這種組織形式。雖然十一中全會決定連紅衛兵的名字提都沒提，但會議大廳里卻有紅衛兵的代表。與“文化革命”委員會相比，紅衛兵肯定會超出只關心基層團體事務的范圍，向考慮更廣泛的問題和批判高級領導人的方向發展。而“文化革命”委員會似乎有可能落入黨的機構的控制之下，紅衛兵可能更樂意聽中央“文革”小組的話。[[54]](#_54__Guan_Yu_Zhe_Liang_Zhong_Zu)

因此，在十一中全會閉幕后一周之內，北京開始了一系列的大規模紅衛兵集會。雖然“文化革命”委員會從未被拋棄，甚至在這一年的后一段時間里還偶爾見諸報端，但很清楚，他們與紅衛兵相比已黯然失色了。從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的三個月中，紅衛兵組織在人民解放軍的后勤支援下，先后組織了由全國各地1300萬紅衛兵參加的8次集會。[[55]](#_55_Sun_Dun_Fan____Zhong_Guo_Gon)有關這些事件的電影片展現了這些欣喜若狂的年輕中學生的生動形象：一些人淚流滿面，高呼革命口號；另一些人向遠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他們的超凡人物揮舞著毛主席語錄本。連紅衛兵組織的名字都帶有軍事色彩，如“紅旗營”、“三面紅旗團”、“徹底革命團”等等。許多紅衛兵身穿軍裝，毛自己也佩戴了一幅紅衛兵袖章，這就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息，即紅衛兵得到了毛和人民解放軍的支持。“文革”小組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布的指示授予紅衛兵組織示威游行、使用印刷機械、出版報紙和張貼大字報來批判任何一級黨委的權利。

本章前面部分討論了紅衛兵運動招致的許多社會經濟的分裂和不滿，尤其是階級背景和學習成績之間的緊張關系：它們哪一個應是中國教育體制成功的標準。除此之外，紅衛兵的發動還受到其他幾個因素的推動：被國家領袖召喚參與國家事務的激動之情；參加“文化大革命”會對個人前途產生根本影響的機遇感；暫停上課和入學考試使數百萬大中學生解除了學業負擔，而更重要的是，想周游全國以“交流革命經驗”的紅衛兵可以免費乘坐火車。被紅衛兵組織所吸引的不僅有城市青年，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60年代初下放到農村去的年輕人，他們乘當時混亂之機回到了城市。

但是在1966年秋，紅衛兵運動并未實現毛所預期的目標。一開始，紅衛兵仍沉迷于那些毛主席肯定認為是次要的、甚至瑣碎的問題中。他們認真執行十一中全會關于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的指示。紅衛兵走上街頭，尋找“資產階級”文化的證據。留長發的青年男女被攔在街上當場剃光頭，穿緊身褲的婦女須接受“墨水瓶測驗”：如果墨水瓶從褲腰放進去不能痛痛快快地落到地上，就要把褲子割成碎條。店主們被迫取下寫有傳統店名的牌子，換成更革命的牌子。紅衛兵們常常自作主張，更改街道名稱，有時還為改成什么名稱更進步而爭論不休。一群紅衛兵提議改變交通信號，使代表革命的顏色紅色表示“走”而不是“停”。

另一個來自北京一所中學的紅衛兵組織，列了一份有一百個“破舊立新”的樣本的單子，給“文化大革命”增添了一些情調。他們讓“流氓阿飛”去“剪掉長發”，“脫掉你的火箭式皮鞋”。他們要求人們戒酒、戒煙，丟棄“養蟋蟀、養魚、養貓、養狗這類資產階級習慣”。他們說，“洗衣店不要為‘資產階級家庭’洗衣”，“浴室要把不給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服務，不給他們按摩作為一條規定”。這群紅衛兵還要求把他們自己學校的名稱“第26中學”改名為“毛澤東主義中學”。[[56]](#_56___Zhong_Guo_Da_Lu_Za_Zhi_Xua)

一些紅衛兵的活動更不令人愉快。教師和學校行政人員，在中國常常被視為主要的“資產階級”代表，說不清有多少人被他們自己的學生騷擾、拷打或折磨——常常致死。以前的資本家和地主的家常被以搜查“私貨”或藏匿財物為名遭到侵襲和搶劫。藝術品被沒收，典雅的家具被毀壞或被涂成紅色，墻壁上刷滿毛澤東的語錄。一些成分不好的階級（如地主）成員，被集中起來趕出大城市。僅在北京大學，100位教職員工的家被搜查，書籍及其他個人財產被沒收，有260人被迫在脖子上掛著列有自己“罪行”的牌子被“監督”勞動。[[57]](#_57_Dui_Hong_Wei_Bing_Bao_Li_De)盡管沒有怎么得到官方的支持，愚笨莽撞的暴力和獸行持續發生且不斷加劇了對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恐怖統治，而這恐怖統治是從這年早些時候的“五十天”里在黨的領導下開始的。

從一開始，紅衛兵運動就為嚴重的派性所困擾，他們主要分歧點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學生之間的分野是60年代初教育政策所導致的錯誤方針。[[58]](#_58_Guan_Yu_Hong_Wei_Bing_Yun_Do)出身干部或軍人家庭的學生主張紅衛兵運動要在黨的領導下，他們試圖緩和對黨的機構的批評，把斗爭矛頭引向其他目標：知識分子、學者、前資本家和地主，以及在中國城市社會中帶有“資產階級文化”標簽的階層。

相反，出身資產階級背景的學生，則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次消除60年代初他們所遭受的歧視的機會，那時越來越注重階級背景使得他們在大學招生、入團和入黨及工作分配問題上處于不利的地位。在他們看來，紅衛兵運動給他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以證明其參加革命行動的程度將不會受其討厭的家庭出身的限制，也使他們有機會向黨的機構合法地發泄不滿。在“五十天”里遭到壓制和迫害的毛主義的同情者現在看到了推翻工作組強加給他們的裁決的可能性。他們說他們反抗工作組是反對“錯誤的”黨的領導，是造反行為——十一中全會上通過的“十六條”保證他們享有這個權利。

對北京和廣州的紅衛兵組織的許多事例的詳細研究可以看出學生運動中出現的分裂，一份對廣州近2200名中學生的抽樣調查表明，占壓倒多數的（73％）干部子弟參加了保衛黨的組織，而半數多點（61％）的知識分子的子女和許多（40％）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學生參加了造反派組織，盡管分析有所不同，但同樣的數據表明，“保皇派”組織吸引的大部分成員（82％）是干部和工人的子女，而“造反派”組織則主要從知識分子家庭（45％）吸收其成員。[[59]](#_59__Zhong_Guo_She_Hui_Jie_Gou_D)

從毛主義者視野看這是一個最大的諷刺，因為情況不像當時大講特講的那樣，參加反修革命運動最激進的學生并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而是資產階級自己的代表。然而，從一種不太強烈的意識形態的觀點來看，學生運動內部的分化就更容易理解了。對黨批評最激烈的是那些從黨的教育政策中得益最少的人，是那些其家庭是黨的“階級路線”的主要受害者的人，而那些支持黨、反對對黨進行攻擊的人，則是在入黨、上大學和工作分配等現行體制中受益最多的黨的官員的子女。

#### 黨機構的反應

紅衛兵運動并未按照毛的意圖發展，卻陷入混亂、派性和暴力，這可歸咎于許多原因。部分地是因為“十六條”所包含的對群眾運動的限制不足以抵消該文件、黨的官方報紙和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人富有煽動性的言辭；部分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明顯偏離了十一中全會最初的設想，不是由革命委員會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而是由紅衛兵來搞，紅衛兵則把反對黨的權威當作其權利和義務了。也許最重要的一條是因為黨的決定，這個決定要發動數百萬不成熟的年輕人，在當時十分激烈的政治環境中，鼓勵他們進行“革命斗爭”，并將任何把他們置于領導或控制之下的企圖譴責為“壓制群眾”，而他們斗爭的目標卻又模糊不清。

紅衛兵運動出現困難的另一原因，是黨內的反對。官員們對這樣做法感到迷惑不解，即他們的好壞要由身穿軍裝、手舞紅色毛的語錄本、組織松散的幾伙大中學生來評價。但顯然他們的飯碗已難以保得住。十一中全會的決定公開宣布要解除黨內走資派的職務。而且林彪在十一中全會的講話中談到同一個問題時，措辭更為直白。林彪說：“文化大革命”要依據三條政治標準“對干部進行全面的審查和調整”。這三條標準是：他們“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對這場革命是否熱情支持”。符合這些標準的將獲得提升或保留官職；不符合標準的將被免職，以便將支持和反對毛計劃的人之間“的僵局”打破。[[60]](#_60_Gao_Ying_Mao____Lin_Biao)

令人吃驚的是，事態很快變得越來越明顯了——倒霉的不只是他們的名利了。如上文所述，截至當時，已有不知多少教師和校長被自己的學生拷打、折磨甚至殺害。黨的干部絕難避免遭受類似的暴力行為。僅在紅衛兵運動的頭幾個月，就至少有一位黨的干部——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在激進學生搞的批斗會上喪命，另一個——黑龍江省的潘復生——在餓了四天后住進醫院。[[61]](#_61_Di_Te_Mo____Liu_Shao_Qi)

在一些地方，干部可能已注意到黨的命令而無拘無束地接受紅衛兵的審訊和批判。但官員們接受審訊和批判的方式總的看來，他們是想盡力拖延、轉移或破壞這場運動。[[62]](#_62_Guan_Yu_Dang_De_Guan_Yuan_Du)剛開始，一些干部試圖完全禁止紅衛兵組織，根據是他們還沒有得到十一中全會的正式批準。另一種策略則與“五十天”中工作組采取的方法相似，他們允許紅衛兵成立組織，然后對其活動規定嚴格的限制，禁止他們舉行示威游行、張貼大字報，或者出版他們自己的報紙。

然而，在北京舉行的大規模的紅衛兵集會以及贊揚性的社論在中央黨報的發表，很快使得否定紅衛兵組織的合法性成為不可能。隨后地方干部開始采取一種更為圓滑的方法。一些人試圖犧牲幾個下屬（用中國象棋作比喻，中國人常用“丟車保帥”這個習語來形容這種策略）的方法來證明他們忠心耿耿而不使自己有危險。有些人舉行“大辯論”討論他們的黨委是否真正實行了“革命”領導，但又巧妙地控制會議以確保產生正確的結果。一些人在墻上刷上毛主席語錄以阻止紅衛兵張貼大字報和標語，因為他們堅信用大字報蓋住毛主席的話就等于是對毛主席的褻瀆。其他人正通過把他們的干部轉移到地方兵營內以躲避紅衛兵，因為激進的學生是不得進入兵營的。

然而，省和地方干部的主要策略還是鼓勵成立保守的群眾組織以保護他們免遭激進學生的批判。通過各大中學校的黨組織和共青團做工作，就有可能把那些維持現狀對其有利害關系的學生組織起來，把那些較激進的紅衛兵組織描繪成尋求向黨報復的資產階級家庭的成員。通過工會做工作，地方領導人還把更為保守的工人組織進“赤衛隊”，以保護黨和政府的辦公地免遭激進的紅衛兵的襲擊。這些措施的結果，使起初以大中學校校園為基地的紅衛兵運動，開始向外轉向工業勞動大軍的隊伍。

這一策略得到了中央一系列規定的幫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條規定對黨的機構有利，對“文革”小組不利。起初，中央的政策只準許出身于“紅五類”——工人、農民、士兵、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學生加入紅衛兵組織，并且禁止“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參加紅衛兵運動。這不僅限制了學生運動的規模——在1966年夏末秋初，只有15％—35％的大中學生是最早的紅衛兵組織的學生，[[63]](#_63_Li_____Wen_Hua_Da_Ge_Ming__D)但這又自相矛盾地正好把紅衛兵成員局限在更有可能保護黨的機構的學生之中。

為什么官員們用所有這些方式抵制紅衛兵運動？其答案部分在于，面對一場他們肯定認為是無政府的和失控的紅衛兵運動，他們有自我保護的欲望。但是地方和省的官員肯定還認為他們在北京有人撐腰，而且最好的戰略就是盡力渡過這場運動最險惡的時刻，并希望盡快把這場運動引向結束。畢竟無論是劉少奇、鄧小平還是周恩來都沒有被十一中全會開除出政治局。劉的確在排列表上靠后了，但他依然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鄧和周保留了黨的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的職務。前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6月初被任命為黨的宣傳部部長，他也試圖防止紅衛兵運動產生太多的受害者。所有這些中央領導人，在他們的講話中，都積極支持為把紅衛兵成員限制在“紅五類”家庭的學生中，保持紅衛兵組織的團結和紀律，并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使激進的少數派服從較保守派的多數派所做的各種努力。

#### 毛主義者的反應

因此，到9月底，對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組來說，“文化大革命”并未按初衷發展已是愈益明顯了。對“四舊”批判太多，卻幾乎沒有怎么批判最主要的官員。只有幾個低級別官員被迫辭職。黨的機構的主要趨勢是躲避、暗中破壞和應付這場運動。

因此，10月初，“文化大革命”大大地激進化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力量加強了，黨的機構削弱了。這個情況最先反映在10月1日國慶節之際的一系列講話和社論中，其中大多數社論是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執筆的。這些講話批評了黨的干部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重申紅衛兵有權反對黨組織，強調“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是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而不是保守組織所說的“四舊”。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宣布要推翻對紅衛兵組織成員的限制，從而使出身“壞”家庭成分的激進學生能夠合法地參加這場群眾運動。

此外，從10月9日到28日在北京舉行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以對到當時為止的“文化大革命”的進展作出評價，并尋找克服運動所遇到的阻礙的辦法。[[64]](#_64_Li_Bo_Sa_Er____Yan_Jiu_Zhi_N)首先，毛和林向代表們再次保證了這場運動的目的，以尋求代表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他們許諾，只要是歡迎而不是試圖躲避群眾的批評，大多數干部是可以“過”“文化大革命”的“關”的。毛說：“你們有錯誤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膽放手工作。”毛甚至進行了自我批評，他承認在60年代初出現修正主義，部分原因是他“退居二線”和決定放棄負責日常工作的結果。而且，毛承認他未料到發動紅衛兵會產生“大問題”。[[65]](#_65_Chen____Mao_Ze_Dong_De_Wen_Z)

但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仍未被寬心，本來預計三天的會議開了兩個多星期，原以為平和的氣氛也變得越來越緊張。[[66]](#_66_Sun_Dun_Fan____Zhong_Guo_Gon)陳伯達在一篇報告中指出，在60年代初已很明顯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路線斗爭現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反映。毛澤東和林彪不再對有顧慮的干部給予安慰，而是猛烈地攻擊那些試圖妨礙和躲避運動的干部。毛抱怨“只有極少數人堅決地把‘革命’一詞放在其他之前，絕大部分人把‘畏懼’放在第一位”。林把黨的抵制歸咎于中央一些干部的阻撓，并點名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可能應對此負責。他們二人被迫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1966年事態發展的結果，大大減少保守派群眾組織的影響。[[67]](#_67_Guan_Yu_Shi_Yue_Gong_Zuo_Hui)年底，北京的一些保皇派組織進行了最后一次反抗，他們攻擊激進的紅衛兵組織，批評林彪，捍衛劉少奇，堅持認為正確的路線是“踢開中央‘文革’小組，自己鬧革命”。但他們顯然已是強弩之末。一些保守組織作了自我批評，有些被激進的學生接管，另一些則因他們的首領被公安局逮捕而垮臺。

中央“文革”小組在1966年底也加強了群眾對黨的機構的進攻。放松對加入群眾組織的條件限制使得激進派人數劇增。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小組加強了與那些他們認為最有同情心的組織的聯絡，驅策他們合并成更大、更有戰斗力的團體。在11月和12月，已允許紅衛兵進入工廠和公社，工人也有權組織他們自己的“革命造反”組織，這就打破了以前由黨委機關把持的對組織工人、農民的有效的壟斷。免費乘車去北京已被取消，以鼓勵紅衛兵結束他們的“革命旅行”，返回他們所在的城市和省去進行反對地方黨委的“革命”。

最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組開始為群眾組織指明要攻擊的高層官員，并向友好的紅衛兵提供材料，作為他們用來進行批判的根據。紅衛兵代表帶著哪個干部要經受“考驗”的十分具體的指示從北京來到大的省城。激進的紅衛兵組織已被告知劉少奇和鄧小平反對毛澤東，可以作為批判對象。中央“文革”小組還向紅衛兵提供了劉、鄧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所作自我批評的副本，11—12月，攻擊二人的大字報開始大批出現。根據1980—1981年在審判“四人幫”的法庭上提供的證據，張春橋曾于12月18日在中南海接見清華大學激進學生代表蒯大富，要他公開羞辱劉和鄧。據說張說要“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68]](#_68___Zhong_Guo_Li_Shi_Shang_De)快到年底時，陶鑄因為企圖保護省委、中宣部和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據說要剝奪中央“文革”小組對這場運動的領導權而被撤銷職務。其他五位重要的中央官員——楊尚昆、羅瑞卿、陸定一、彭真和賀龍在北京的群眾集會上被連續批斗、辱罵了數小時。

這些事件傳遞的信息非常清楚：在中國，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沒有一個人可以免遭批判；而且批判的方式的確是很嚴厲的。

#### 省級權力的垮臺

1966年最后3個月，“文化大革命”升級造成的結果，在中國因地方不同而各異。在較邊遠的省份，發動激進的學生是困難的，因而省的領導人尚能牢固地守住自己的地盤。而那些已發動起來的省份，其結果就不是如毛所期望的那樣了，不是地方官員整風而已，而幾乎是省級權力機關的徹底垮臺。

上海就是這后一種情況的典型。[[69]](#_69_Zhe_Yi_Shi_Qi_Shang_Hai_Shi)10月份中央領導人火上澆油的言辭推動了第一個激進的全市范圍的工人組織——“上海市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在11月初的成立。該組織顯然是由一些低層干部（如國棉十七廠的王洪文，他在后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全國性的顯赫人物）在激進學生的幫助下，主要組織下層工人，如徒工、臨時工而建立的。根據有些說法，上海市市長曹荻秋雖然有些勉強，但出于某些原因，還是按中央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辦。但是他抵制建立“工總司”，理由是中央尚未準許建立獨立的工人組織；這樣的組織也必然干擾生產。

當“工總司”去找曹以尋求官方的承認和物質支援時，曹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一氣之下，“工總司”的頭頭們強征了一列火車開往北京以把他們的問題提交給中央領導。曹命令火車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條側線上，在那里，他的代表再一次試圖解釋他的態度，給他們做工作。

起初中央“文革”小組支持曹的立場。但在工人拒絕返回工廠之后，北京激進的領導人派張春橋去同他們談判。張春橋給了曹荻秋重重的一記上鉤拳：同意承認“工總司”，條件是他們的革命行動不得妨礙正常的生產任務——對于這個決定，曹荻秋除了同意之外別無選擇。

在聶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的地位進一步被削弱，聶顯然隨身帶來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長為修正主義者、指責曹荻秋庇護他的指示。在她抵達之后，一群激進分子接管了地方報紙《解放日報》，命令它印發聶的講話。幾天之后，市政府停止了抵抗。

然而曹的權力的垮臺，并非主要是激進的工人和知識分子的行動所致，而是更保守的上海市民反動員的結果，他們的行動至少有一部分是自發的。在《解放日報》被（激進派）占領期間，“赤衛隊”和其他支持者們曾試圖沖擊報社大樓，把它重新奪回來。郵電工人拒絕分送載有聶的講話的報紙。“赤衛隊”要求曹拒絕向激進派“投降”，不再向他們作任何更多的讓步。

根據安德魯·沃爾德的認真研究，曹對這種兩極分化過程的反應是，兩派“送到他辦公室的任何要求他統統簽署”。[[70]](#_70_Wo_Er_De____Zhang_Chun_Qiao)其結果是社會上弱勢群體的組織紛紛提出經濟利益方面的要求。那些降為臨時工和被解雇的合同工工人要求恢復原職和補償工資。固定工人四處活動，要求增加工資和提高福利，指責激進派干擾生產會使他們獎金減少。

在激進派和保守派之間爆發了武斗和騷亂，據報道，在一次有8個保守派分子被打死的事件發生之后，“赤衛隊”號召總罷工。加上已被圍困的市政府的戰略是滿足各派的要求，這就導致了上海經濟的崩潰：擠兌存款、搶購商品、供電和交通中斷。到12月底，這座中國最大的城市已陷入一片混亂。

## 奪權

#### “一月風暴”

上海的形勢是到1966年底為止中國城市形勢最極端的形式的代表。從根本上來說，三種過程在起作用，它們合在一起，導致了黨的權力的崩潰。首先是發動中國社會的大部分人，這些人對黨的官僚機構提出了更大的要求。這個過程開始是北京的毛主義者故意組織一支力量以批評黨。但一經這個過程開始之后，它就自發地向前發展，毛主義者動員起來的力量引起了一種反動員的力量（一些是自發的，一些是組織程度很高的）來支持黨的機構。

因此，這一發動群眾的過程導致了中國社會的高度分化，反映了黨的最高層領導中業已存在的激烈的派別斗爭。在號召中國的學生（后來為工人）去批判黨內的修正主義時，毛似乎天真地相信他們會作為一支比較統一的力量去行動——毛自20年代中期以來就說過也寫過的這個“民眾大聯合”將在“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中形成。[[71]](#_71_You_Guan_Mao_Ze_Dong_De_Si_X)事實恰恰相反，群眾動員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分裂，特別是把干部家庭的子弟與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弟分隔開來。把熟練的固定工人同欠熟練工人和臨時工分離開來。

再次，與動員和分化相伴產生的是對黨的權威的否定。通過授權紅衛兵去造黨內修正主義者的“反”，主張人民只應服從與毛澤東思想一致的黨的指示，毛主義者在事實上剝奪了黨的絕對合法性，但又沒有用其他任何權力結構來取而代之。與此同時，取消下邊的黨組織的合法性又加重了對上層黨的權力的否定。因為被圍攻的黨組織試圖處理群眾提出的種種要求時想取悅于每一個人，但最終誰也取悅不了。上海的經驗生動表明了當政府無法控制日益加劇的動員和反動員進程時，就會出現權力危機。

實際上，毛對權力崩潰的解決辦法是授權激進派把信譽掃地的（或頑抗到底的）黨委撇在一邊，組織新的政治權力機構取而代之。上海又一次充當了這一階段“文化大革命”的先頭兵。[[72]](#_72_You_Guan_Shang_Hai_Shi_Jian)1967年1月6日的上海群眾集會正式肯定了所發生的事實：撤銷了曹荻秋及上海市其他官員的職務。同日，中央“文革”小組代表張春橋由北京返回上海，以建立一個新的市政府，取代已被推翻的市委。在他的鼓勵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由激進的“工總司”的人馬形成的組織發布了恢復社會秩序和經濟生產的命令：要求把工人們經濟方面的不滿擱置到“文化大革命”的“后一階段”，工人們留在原崗位；凍結企業和銀行基金。與此同時，造反派組織在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下，開始接管工廠、碼頭、報紙和其他經濟企業單位。這些行動開始后不久便采取了最后一步：激進派組織宣布新的上海市政權機關組成，它將承擔舊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政治和行政職能。

在這個月的后半個月里，這種奪取政權的方式得到中國各地的認可。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辛辣的社論鼓勵全國的激進組織起來從黨委手中奪權：

千重要、萬重要，掌握大權最重要！于是，革命群眾凝聚起對階級敵人的深仇大恨，咬緊牙關，斬釘截鐵，下定決心：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奪權！奪權！！奪權！！！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所竊取的黨、政、財等各種大權，統統要奪回來！[[73]](#_73_1967Nian_1Yue_22Ri___Ren_Min)

第二天，中央委員會正式發布的一條指示重申了《人民日報》要人民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里”奪取權力的號召。它把“文化大革命”描繪成不像十一中全會決議所說的，只是一場對中國的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傾向的批判，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74]](#_74__Zhong_Gong_Zhong_Yang___Guo)

中央“文革”小組的目標的激進化是與“文革”小組人員構成的激進化相伴產生的。1967年1、2月，所有在前一年任命的人民解放軍、地區和省的黨組織的代表都被免除了職務——當然是和陶鑄一起被免職的，他作為中宣部部長在12月被清洗時就喪失了“文革”小組成員的資格。這再次意味著，中央“文革”小組只反映了與江青、康生和陳伯達有聯系的激進的知識分子的利益。他們的觀點再也不會受高級的黨和軍隊的官員的影響了。

中央委員會1月23日的指示還在第二個方面使“文化大革命”進一步升級。整個1966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多少有點不沾不靠和態度曖昧的角色。可以確定的是，它以某些方式積極地站在了毛主義者一邊：為江青攻擊現行的文藝路線提供了一個論壇；在1966年春，通過《解放軍報》為激進觀點提供了喉舌；在一些重要會議期間（如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8月的十一中全會），保證了北京的安全；向紅衛兵提供后勤支援。然而從其他方面來看它又置身局外，甚至采取了敵對的立場。十一中全會決議特別規定了軍隊不受中央“文革”小組管轄，其他指示也顯然命令軍隊在群眾組織之間以及激進組織與黨的機構之間的沖突中采取“不介入”姿態。在許多地區，軍隊還為地方和省里黨的官員提供庇護，并動用力量鎮壓激進組織，起了“防空洞”的作用。

而后，直到1月23日，在毛主義者的聯盟中最積極的成分一直是以“文革”小組為象征的激進的智囊團和以激進的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組織為典型的基本群眾。現在，鑒于在整個秋季出現的全國范圍內的對峙局面和在1966年底前后開始出現的權力垮臺，毛決定把軍隊——此乃其政權基礎的第三支力量——更直接地投入到這場沖突中去。1月23日的指示（其中引用了這位主席最新發布的一條指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命令武裝部隊取下任何不介入的偽裝，不要再當“保衛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防空洞”，要“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斗爭”，從而“決定性地消滅”一切敢于反抗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組織”。

然而，一俟決定了授權群眾奪權之后，其他同樣重要的決定仍待作出。誰應奪取政權？誰應行使權力？通過何種組織？也許關于此事最緊迫的問題是“群眾”是否能真正地擔當起給他們的任務。1月22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使用的語言及第二天中央委員會的指示，提出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農民起義：一種推翻那些篡奪政權后并背離正確路線的人的農民起義。但是中國的“群眾”是分成許多忙碌于爭權奪利的利益集團的，而且不諳政治管理，不是一支能夠行使有效的政府職能的統一的政治力量。

這些問題都在1月底遍及全國的“奪權”浪潮中得到了反映。在一些地方，互相競爭的群眾組織均紛紛聲稱已奪取政權，并向北京請求支持。在其他一些地方，黨的官員利用友好的群眾組織發動后來所說的“假”奪權。還有某些地方，群眾代表進入黨政機關辦公室，要出用以在官方文件蓋印的圖章后再出來，相信占有了權力的象征即意味著奪取了權力。正如周恩來所言，權力被黨“放棄”了，但紅衛兵卻未能有效地“保住”它。[[75]](#_75_Fei_Li_Pu__Bu_Li_Qi_Hai_Mu)

這些困難的程度之大在中國中央的新聞媒介承認的事實中可以看得出來。1月底全國發生的13起奪權事件中只有4起得到了認可。發表在2月1日黨的理論刊物《紅旗》上的一篇重要社論，實際上默認了馬克思主義的農民起義思想是不切實際的。編者按指出，奪權不應簡單地由群眾組織的“大聯合”，而應由態度足夠“革命的”、由“革命群眾”代表、當地駐軍、黨政官員的“三結合”來實施。群眾代表的存在可能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初始的民粹主義精神。但是如編者按所承認的：“只依靠這些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是不行的”，沒有“三結合”的其他兩種成分，“無產階級革命派就不能解決好在他們的斗爭中奪取政權和使用政權問題……即使他們取得了政權，他們也不能鞏固政權”，干部的需要，是因為他們有行政經驗，十分了解政策和計劃；軍隊代表，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是“三結合”中最重要的部分，將能夠保證秩序和鎮壓任何對奪權的反抗。[[76]](#_76___Hong_Qi____Di_3Qi__1967Nia)

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后，毛主義者的中樞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新的權力機構的形式了。在短期內，毛主義者曾幾度打算圍繞巴黎公社的原則來重組中國：所有干部通過全體選舉，都從普通公民中產生，與普通工人同酬，向選民定期匯報工作，可隨時被免職。這些原則，其關于政府形式的含義完全不同于經典的官僚機構，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和1917年之前的列寧所認可，他們要引入種種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機構形式來替代，用列寧的話說，“資產階級社會所獨有的”官僚機構。[[77]](#_77_Fu_La_Ji_Mi_Er__Yi__Lie_Ning)

在1966年，存在時間不長的巴黎公社成立95周年之際，巴黎公社模式在中國激進分子中是很時髦的。早在十一中全會之前，2月份的《紅旗》上刊登的一篇長文，重述了巴黎公社的歷史，主張巴黎公社的原則適用于中國。全會批準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規定這些新的組織要體現公社的原則。盡管如此，全會仍同時規定這些委員會將是補充、而不是取代官僚化的黨和國家的機構。[[78]](#_78___Hong_Qi____Di_4Qi__1966Nia)

以此為背景，一經1967年1月作出要從黨和國家的官僚機構中奪權的決定之后，激進的中國人又回到巴黎公社模式上去就不會令人驚訝了。2月1日的《紅旗》上的編者按完全重復了一個世紀之前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接受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而是必須建立新的組織形式的評論，堅持認為中國的革命造反派不能僅僅從現存的黨政機構中奪取權力，而必須要建立全新的組織機構。雖然它對要建立的新的組織形式沒有提供任何明確的指導方針，但它強烈地暗示要遵循巴黎公社的模式。為了貫徹這一建議，許多在1月底新成立的省市政府宣布：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其官員將通過群眾選舉挑選并接受群眾的監督和免職。有的地方如上海和哈爾濱，實際上自稱是“人民公社”。

然而，從1967年初的形勢來看，這一步驟與早些時候號召群眾起來奪權一樣不現實。以上海的情況為例，上海一點也沒有立即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在組織公社問題上，張春橋無視直接選舉的原則，只應允將來在某個時候“條件成熟”時舉行這樣的選舉。實際上，上海公社成立后馬上就有人不滿地說張犧牲其他組織的利益，偏袒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的代表，并動用人民解放軍去鎮壓反對派。一些人抱怨他忽視了工人在去年12月提出的經濟要求，指出他是前上海市宣傳部部長，現在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很難說自己是一個“普通公民”了。正如安德魯·沃爾德所指出的：“盡管上海公社依憑幻想塑造了一個烏托邦形象……但支持它的人可能不到上海關心政治的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其生存主要依賴于人民解放軍。”[[79]](#_79_Wo_Er_De____Zhang_Chun_Qiao)

毛澤東認識到談論“人民公社”會產生立即實行民主的期望，而這在群眾充分動員而意見完全對立的情況下不可能實現之后，他便把張春橋和姚文元召回北京，勸他們更換上海公社這個名稱。毛所關心的是忠實地實行巴黎公社模式會導致政治權威進一步垮臺、干部和軍隊的代表被排除出“三結合”“班子”、恢復秩序和鎮壓“反革命”的能力喪失殆盡，以及以后再為重組后的中國共產黨安排一個角色都有不少難題。所有這些傾向均被這位主席列為“最反動”之列。[[80]](#_80_Guan_Yu_Mao_De_Ping_Lun__Jia)

因此在2月19日，毛召見張和姚的第二天，中央委員會禁止在國家、省和市各級使用“人民公社”一詞。[[81]](#_81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_Zh)（當然，公社在農村依然故我，仍是農村最高一級的經濟和政治管理機構的名稱。）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委員會恢復使用了革命年代里的一個名稱——“革命委員會”——來描述奪權后形成的“革命的、負責的、無產階級的臨時政權組織”。這個歷史參照名稱很適當，因為40年代的革命委員會也是群眾代表、黨的干部和軍人組成的作為在剛剛被紅軍“解放”的地區的臨時政府的三結合機構。但在1967年使用這個名稱也強調了關鍵的一點：像它們在延安時代的前任一樣，文化革命委員會現在只被視為在某種更為長久的組織建立之前的臨時政府。似乎毛這樣做是想用某些方式降低“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很高的群眾動員的程度。

1967年初的第三個緊迫問題是成立這些革命委員會的程序。由于普選思想被放棄，黨的機構又一片混亂，“三結合”中唯一能在全國組織革命委員會的便是人民解放軍了。因此，北京批準的程序是：推翻地方黨委之后，地方衛戍部隊（負責城市）或軍區（負責省）領導將組成“軍事管制委員會”，負責維持秩序，維持生產，并開始挑選群眾代表、干部、軍官進入革命委員會。軍隊實質上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工作組，它不僅負責決定哪些干部能在“文革”中幸存下來，而且還決定哪些群眾組織能加人革命委員會。[[82]](#_82_Ha_Ding____Zu_Zhi_Zhong_Guo)

1967年初推翻黨委的行動被中國人自己稱之為“一月革命”，國外則說這等于是武裝奪權。但不論是比作一場群眾革命還是說成一場軍事政變，都不是充分認識這段時期的辦法。誠然，一月革命里有一定程度的公眾的不同政見、有群眾組織和1949年以來不為人們所知的政治抗議。但是，官方的言論還是說，一月奪權的主要目的與其說是推翻權威，還不如說是恢復秩序。也應該承認，由于國家落入軍隊統治之下，奪權的主要受益者是人民解放軍。但1967年初軍隊干預中國政治是執行了中央文職權力機關的訓諭而不是為了對抗他們。換句話講，如果說中國1967年1月發生的事件可以算是一場革命的話，那也是一場來自上層的革命；如果這些事件導致了軍事統治，其結果也是一個文官集團決定利用軍隊去推翻另一個集團而已，不是一場反對文職權力機關的軍事政變。

#### “三結合”的主要參加者

三結合機構是創建革命委員會的正式框架，三結合也就成了此后十個月里的主要問題。在多少行政單位和在什么級別的政府中奪權？在各個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如何在三結合的三方之間均衡權力？

三結合原則還十分清楚地說明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國政治中造成的主要分歧。在省、市一級，干部、群眾組織和軍隊都爭著在革命委員會中占一席之地。在北京，三結合的每一方都在黨的最高領導層中有自己的靠山：周恩來和其他資深文職干部代表干部的利益；江青、陳伯達和康生領導的“文革”小組代表激進的群眾組織的利益；林彪及其在軍事委員會中的同伙代表軍隊的利益。

但如果說這三個垂直系統內部是團結的話，也是不正確的。正像在激進的和保守的紅衛兵組織的群眾之間存在著沖突一樣，在軍隊內部，同情和反對林彪的部隊之間也有分歧，在愿意跟著“文化大革命”走和要抵制它的兩派干部之間亦有分裂。重要的是，這三個組織系統，抑或它們在北京的大靠山，沒有一個能獲得或保持住毛澤東的絕對支持。

通過對中國“文化大革命”中三個垂直系統各自的利益和行為的分析，首先是從殘存的黨和國家的官僚機構入手，有助于人們去理解在1967年剩下的時間里和1968年上半年發生的事件。到1967年1月底，顯然中國的每一個黨政官員都面臨著激進組織的批判、免職，甚至人身攻擊。一些干部已經下臺，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目標，如彭真、陸定一、羅瑞卿；以及1966年底紅衛兵運動的激進化和1967年1月第一次奪權浪潮的受害者，如陶鑄和曹荻秋。其他人如劉少奇和鄧小平，以及周恩來和他的副總理們受到了嚴肅批評，但實際上沒有被免職。其他地方，大批干部還命運未卜。各級干部都在觀望，看他們是否能被任命到軍隊扶持下正在組建的革命委員會中，而他們的下屬則保留了職位，權力雖被削弱了，但沒有被徹底剝奪。

如周恩來所代表的那樣，干部們所關心的，首要的是減緩“文化大革命”對黨和國家機關的沖擊。周在這場運動中自始至終的目的是，盡最大可能：（1）使黨和國家的要害部門免遭“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壞性的活動的沖擊；（2）阻止群眾組織在未經上級批準的情況下奪權；（3）限制任何群眾組織活動的地域范圍；（4）確保正常的生產和行政工作的進行。[[83]](#_83_Dui_Zhou_En_Lai_Zai__Wen_Hua)此外，周力圖保護一大批高級干部免受紅衛兵的攻擊。據說在1月份，他邀請了二三十名內閣部長來中南海，輪流住在戒備森嚴的領導人的寓所里，并把許多地區、省和大城市的第一書記轉移到北京，以使他們免遭當地紅衛兵的騷擾和批斗。[[84]](#_84_Sun_Dun_Fan____Zhong_Guo_Gon)

盡管干部們在限制“文化大革命”的范圍上有著共同的利益，但在中國不同的官僚集團中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些干部，尤其是低層干部，把“文化大革命”視為一次能青云直上的機會，或借機對那些心存芥蒂的同事進行報復。因而，在一些省、市和自治區，出現了低層干部與激進的群眾組織串通一氣，從他們的上級手中奪權的形式。湖南省委書記華國鋒，河南省委候補書記兼秘書長紀登奎，當然還有上海的張春橋，都是很重要的例子——所有這些人都直接因為“文化大革命”而在他們的省里爬上了更為重要的位置。這就為以后的紛爭埋下了伏筆。因為通過這種方式從“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好處的干部，在70年代后半期與“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發生了對抗。

第二個重要的垂直系統是中央“文革”小組和由它發動、保護并在某種程度上由它指揮的激進的群眾組織。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目的似乎一直是搞臭盡可能多的干部，給群眾組織以最大限度的活動范圍和自主權，并使群眾代表最大限度地加入革命委員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早在1966年8月，“文革”小組就開始擬出一份包括中央委員、省級黨政領導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的名單。（他們認為政協委員是革命年代里的“起義分子”和1949年以后的“修正主義分子”）。1967年底和1968年，這份名單的范圍進一步被擴大。例如，據說到1968年8月，康生炮制了一份包括一百多位中央委員和37位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在內的長名單，要把這些人開除出黨。[[85]](#_85_Tong_Shang_Shu__Di_271Ye)此外，中央“文革”小組順順當當地利用紅衛兵組織去組織群眾游行，批斗黨和國家的官員，從其家宅中強取可用以進行誹謗的材料，甚至對被他們懷疑為“修正主義分子”的人搞逼供信。有時甚至還連及他們的家人、保姆和工作人員。[[86]](#_86___Da_Shen_Pan____Yi_Shu_Zhon)

中央“文革”小組的這些活動導致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其他兩個垂直系統發生激烈的沖突。中央“文革”小組試圖把政治斗爭的范圍擴大到實際上包括各級官僚機構的所有官員。而干部們則顯然力爭把“文化大革命”的打擊對象限制在少數人身上。中央“文革”小組希望激進群眾組織在奪取黨政機構權力中擁有更大的自主權，而像周恩來那樣的文職官員，則試圖把奪權置于上級權力機關的控制之下，并把群眾組織的功能嚴格限于監督，而不是行政管理方面。

此外，關于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問題，中央“文革”小組與人民解放軍的沖突也開始加劇。1967年1月，當奪權剛開始之際，陳伯達就把“文化大革命”與40年代中國革命的最后階段作了比較。而后，他說，紅軍奪取政權，實行軍管，并且自上而下發布命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奪取權力的”是“群眾”，而不是軍隊。[[87]](#_87___Huo_Che_Tou____1967Nian_2Y)因而，毛給予人民解放軍在瓦解黨的機構、組織革命委員會中的作用，比中央“文革”小組愿意提供的要大得多。更糟糕的是，地方駐軍并不總是根據中央“文革”小組的要求，把群眾代表如數安插到革命委員會，或者不是把中央文革小組所支持的群眾組織的人安排進革命委員會。因而，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某些心懷怒氣的紅衛兵組織去攻擊地方軍隊的司令部，并因此使人民解放軍和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組之間關系緊張。

這導致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三個垂直系統——人民解放軍本身的激烈沖突。如我們已看到的，軍隊的地位在整個1966年和1967年初穩步地提高了。現在，“文化大革命”一旦進入奪權階段，軍隊在中國政治中發揮的作用就更大了。其職責不僅是為向黨組織奪權助一臂之力，就像1月23日它奉命行動的那樣，而且也保證維持以后的秩序。對第二個目標所采取的措施是：對重要倉庫、銀行、電臺和工廠派駐軍隊；對春耕實行軍事監督；對民航實行軍事管理；以及在那些已經奪權的重要行政管理區域建立軍事管制委員會。[[88]](#_88_Jun_Dui_Jie_Ru_Bu_Duan_Sheng)在“文化大革命”中，共計有200萬人民解放軍參與了民事。[[89]](#_89_Ai_De_Jia__Si_Nuo____Man_Cha)

從總體上看，在“文化大革命”中，軍隊似乎只關心一件事：維持秩序和穩定；防止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垮臺；進而避免中國出現易遭外來侵略的弱點。此外，有些軍官也希望最大限度擴大軍官們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中的影響、增加軍隊代表的人數、保護軍隊免遭紅衛兵的攻擊，因為這與他們自己利益息息相關。

但是，除了這些共同利益之外，“文化大革命”中軍隊內部的分歧看來與不同階層干部內的分歧或這個國家的群眾組織內的分歧完全一樣大。[[90]](#_90_Jian_Yu_Er_Gen__Duo_Mu_Si)有些分歧是結構性的，主要是由于人民解放軍分成地方部隊和主力部隊而產生的。主力部隊——包括海、空軍和地面精銳部隊——裝備精良，并且直屬中央指揮。相反，地方部隊由裝備輕型武器的陸軍部隊組成，歸省軍區（每個省軍區都與省相對應）和大軍區（由幾個相鄰的省組成）指揮，承擔廣泛的地方性事務。

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力部隊更忠實地執行來自林彪的中央指示，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直接受命于林彪親信充斥的總參謀部和軍事委員會，而且也因為他們是林彪在60年代初就開始著手的軍隊現代化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地方部隊，其首長往往與地方黨的領導人關系密切，它常常以保守的方式，充當省、市黨的機構的保護人。例如，于爾根·多姆斯的研究表明：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29個省軍區司令員中，只有5人支持這場運動，8個司令員只是在將地方群眾組織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后才在名義上表示了支持，反對的有16個。[[91]](#_91_Duo_Mu_Si___Jun_Dui_Zai_Ge_M)

軍隊中的第二類分裂是圍繞著個人小圈子而形成的。在共產黨革命的后半期，紅軍被分成五大“野戰軍”（原文如此——譯者），每一路野戰軍負責解放中國的一部分地區。在這一時期建立起來的人事關系構成了1949年以后很長時間里軍官派系的基礎。人們普遍認為，在1959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后，林彪力求鞏固他對人民解放軍的控制，對他曾指揮過的野戰軍（四野）的軍官恩惠有加，而對其他野戰軍軍官則進行壓制。[[92]](#_92_Dui_Zhong_Guo_Jun_Shi_Zheng)林彪事件之后，他被指控曾收集對其他野戰軍高級軍官的誹謗材料，特別是對聶榮臻、徐向前、賀龍和葉劍英的誹謗材料，這些人挫敗了他建立個人對軍隊的絕對控制的企圖。[[93]](#_93___Yi_Chang_Da_Shen_Pan_____D)

作為評估三結合主要參加者的最后一個組成部分，強調一下毛與三個獨立系統中的每一個系統之間時不時地出現的緊張關系和沖突是非常重要的。很顯然，毛與黨和國家干部的分歧是主要的，因為他所懷疑的修正主義正是他們，而他指導“文化大革命”反對的也就是他們。另一方面，毛似乎注意到需要有經受過鍛煉的行政管理干部，擔任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他說希望這些干部能經受住“文化大革命”的“考驗”（“誰要打倒你們？我也是不想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要打倒你們。” 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這么說），[[94]](#_94_Chen____Mao_Ze_Dong_De_Wen_Z)毛也保護了一些高級政府官員，特別是周恩來，使其免遭紅衛兵的批判。

但毛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也有分歧。雖然毛在1959年選擇了林當國防部長，并在1966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挑選他做他的接班人，但這位主席顯然對林在歷史和意識形態問題上的許多觀點表示懷疑。1966年7月初他在給江青的一封信中，批評林夸大軍事政變和軍事力量在中國和發展中國家歷史上的重要性，批評他抬高對毛的個人崇拜。毛對他的妻子寫道：“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還是第一次”。[[95]](#_95___Zhong_Guo_De_Fa_Lu_He_Zhen)

毛對林的很多批評同時可以被看作是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因為中國新聞界在1966年中期對毛澤東思想的頌揚和對毛的吹捧問題上，中央“文革”小組與人民解放軍負有同樣重要的責任。1月份毛關于上海公社的一些講話表明，毛很關注中央“文革”小組中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以及他們要打倒所有的國家干部的企圖。[[96]](#_96___Mao_Ze_Dong_Si_Xiang_Za_Lu)沒有證據表明毛愿意批準群眾組織動用軍隊，江青及其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同黨有時卻準備那樣干。

如果三個獨立系統的任何一方顯示出不服從或抗拒的跡象，毛有各種各樣的資源和策略來對付它們。干部最易于控制，因為當時他們的權力基礎最為薄弱。中央文革小組是個工具，毛可以讓它加強對黨和政府官員的批評，相信這很快就會在激進群眾組織的行動中反映出來。更為具體的是，毛能夠確定哪些干部從革命委員會中排除出去，哪些干部要受懲罰，哪些干部要給予保護。

相反，人民解放軍擁有的權力比政府官員大得多，因為軍官們控制著有組織的軍隊，這對當時中國政權的穩定是必不可少的。但軍隊是能受到控制的——控制軍隊的一個辦法是增加激進群眾組織批判軍隊干部的錯誤，一個辦法是可以通過軍隊指揮系統懲治犯錯誤的軍官。1967年春，對“文化大革命”態度冷淡的五個大軍區和六個省軍區司令員就是這樣被免職或調離的，在此后的年月里又有不下八個省軍區司令員遭到同樣的命運。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在極端情況下，毛和林可以把主力部隊調到省軍區司令員特別頑固的省份。

毛也有種種方法去控制群眾組織。他可以對激進群眾組織的活動加以限制，在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走向分裂，以及暴亂眼看就要失控時，他就縮小他們批判文武官員的活動余地。此外，毛和他的代表還可根據某些組織是否執行中央指示而將它們定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組織，還可授權地方駐軍去鎮壓或解散那些被認為是反革命的群眾組織。

#### 平衡的演變

由于有這么多裂痕——每個體系內部的裂痕、三個體系之間的裂痕，每個體系和毛澤東之間的裂痕——因此，在1967—1968年成立革命委員會是一件極其復雜的任務。僅有黑龍江、上海、貴州和山東這幾個地方的革命委員會在1967年的頭兩個月順利成立。這些省的關鍵是它們另外還存在著一套候補領導班子，這通常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市黨的機構。黨的機構能迅速填補1月發生的權威崩潰所造成的空白。在其他省，現有的軍隊和文職領導分裂了，群眾組織里裂痕既深又大，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是一個時間相當長的過程，其中包含著持續的沖突和斗爭。

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這20個月基本上是三個相互競爭的組織體系之間的平衡演變的時期。在此期間革命委員會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里每個組織體系都不時地挖其他組織體系的權力，或自己權力被別人挖走。在此期間毛有能力決定三個獨立體系之間的力量平衡，盡管毛的決定顯然是對干部、軍隊和群眾組織行動的反應，盡管他從未完全控制局勢。這一時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長情況，可通過研究四個關鍵的轉折點而得到很好的了解：1967年2—3月的“二月逆流”，1967年7月底的“武漢事件”，9月初清洗所謂激進的“五·一六”組織，楊成武代總參謀長被解職以及1968年夏天遣散紅衛兵。

從起源和結果看，這些轉折點中每一個都是重要的。每個事件的發生都是由于三個關鍵的獨立系統內部及它們三者之間的緊張關系造成的。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每個事件都反映出這三個組織系統中有一個或幾個是不可靠的。“二月逆流”表明黨的高級干部仍在抵制“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運動；“武漢事件”證明高級軍官，尤其是大軍區一級的，趨于同保守的群眾組織站在一起，反對激進的對手；“五·一六”事件和1968年中遣散紅衛兵反映了群眾運動和“文革”小組的領導人對暴力和天下大亂有特殊的嗜好。

總之，三個事件也產生了統治這個時期中國政治的三個組織系統之間權力平衡的變化。雖然這三個系統開始時都是三結合的平等參加者（至少理論上是這樣），但到1967年年底，人民解放軍的優勢顯然超過了干部和群眾組織。1968年夏紅衛兵解散，數百萬年輕人下鄉插隊，他們參加三結合的人就從中國政治舞臺上徹底消失了。

二月逆流 1966年8月的十一屆中央全會正式通過的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預見到了一場正在興起然而卻受到壓制的群眾運動。強調發動群眾和開展群眾批判（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預示著國家黨政官員的生活會弄得更加復雜。但在三個方面作出了有重要意義的限制。第一，“十六條”中列出的干部政策把嚴厲批判和寬大處理相結合。十一中全會認定，絕大多數干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并且暗示一旦他們進行了“嚴肅的自我批評”，并且“接受了群眾的批評”，他們就可以留在或重新回到自己的崗位上。第二，運動以黨的名義進行，而且將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進行，如果不是由下面的黨組織來領導的話。第三，人民解放軍中的“文化革命”與社會其他部門中的運動分開，由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而不是“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

可是，到1967年1月底，大量情況表明，“文化大革命”越過了所有這些界線，很多高級干部，包括彭真和羅瑞卿，都被激進的群眾組織“拘留”，而沒有任何拘留證和其他法律手續。其他人頭戴高帽子，脖子上掛著羅列了他們的“反革命罪行”的牌子，在中國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街示眾。至少有一位國務委員、煤炭部部長張霖之被毒打致死，其他高級干部的肉體受到凌辱。劉少奇和鄧小平受到了惡毒的口頭攻擊。

授權群眾組織“奪權”和創立“上海公社”，表明甚至連黨的領導這個原則都正在被拋棄，因為，正如毛自己指出的，在巴黎公社的結構中，沒有先鋒黨領導的位置。更有甚者，“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已擴散到武裝部隊的基層之中。因為解放軍已奉命“支左”，干預地方政府。而且，林彪本人似乎急切地唆使他在武裝部隊的追隨者，用紅衛兵的方式批判那些資深元帥，如朱德、賀龍和葉劍英，因為這些人有可能對林彪對武裝部隊的控制發起挑戰。[[97]](#_97___Wen_Jian_Ji_____Di_19__20)

為了對付這些問題，中央當局在2月發出了一系列指示和聲明，旨在控制“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混亂。為了政治穩定，進行了四個方面的努力。第一，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建立“巴黎公社”模式，主張直接民主選舉，不要黨的領導，結果只能產生宗派主義和無秩序，被毛親自否定。“巴黎公社”模式被革命委員會模式和人民解放軍奉命“支左”干預所替代了——這兩種辦法都是為了恢復國家秩序和紀律而提供一種組織框架。作為落實三結合的一個部分，中央的宣傳工具開始了一場宣傳毛的政策的運動，毛的政策要求對“文化大革命”開始前，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幾個月“犯有錯誤”的干部采取比較寬大的政策。

第二，毛也進行干預，限制紅衛兵組織武斗。在2月1日給周恩來的信中，毛批評了那種打著批判旗號，強迫挨批的干部“戴高帽子，油漆涂臉和游街”的傾向。毛把這種行為說成是“某種形式的武裝斗爭”，宣布“我們必須堅持說理斗爭，要擺事實，講道理，并使用勸說方式……卷入打人事件的任何人都應按法律處理”。[[98]](#_98___Lian_He_Chu_Ban_Wu_Yan_Jiu)1月28日軍委發布了一條指示，其中也有類似的反對使用武力的命令。據說這個文件是在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這樣老帥的倡議下起草的，然后經過毛批準。該指示宣布：“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不許戴高帽子，不許游街，不許抄家。認真提倡文斗，堅決反對武斗。”[[99]](#_99___Wen_Jian_Ji_____Di_54__55Y)

第三，還力圖限制“文化大革命”對那些維持經濟生產和政治秩序至關重要的政府和軍事機構的沖擊。2月，命令外邊的群眾組織離開所有黨中央各部和那些負責國防、經濟計劃、外交、公安、財政金融和宣傳的中央政府各部、局；軍隊里的奪權被限制在諸如研究機構、學校、文化機構和醫院等這樣的外圍機構；并且，7個極重要的軍區都“延緩”任何形式的“文化大革命”運動。[[100]](#_100___Wen_Jian_Ji_____Di_56__61)另外，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進一步發布指示，要求對所有的秘密文件和檔案保密，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個人檔案，群眾組織用來批判領導人的許多證據材料都來源于此。[[101]](#_101_Tong_Shang_Shu__Di_84Ye)

最后，中央的指示也試圖把群眾組織可以活動的范圍縮小到這樣的程度，即如果這些指示都得到執行，紅衛兵運動將會走向終結。群眾組織接到通知，要停止為“交流革命經驗”而進行的全國大串聯，而且接到了要他們返回家鄉城鎮的指示。通知中學生返回學校，重新上課。而且“邊上課，邊鬧革命”。在“一月風暴”中開始自發形成（或受到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鼓勵）的“全國紅衛兵聯盟”變得非常強大，具有難以控制的潛在危險，這個聯盟被當成是“反革命組織”并被命令立即解散。工人隊伍中的不滿人員，尤其是合同工、臨時工和被調往邊疆地區工作的工人接到通知，要求他們留在自己的崗位上，這些人提出的要求留待“文化大革命”后期解決。[[102]](#_102_Tong_Shang_Shu__Di_72__82)

來自政府和軍隊系統的一批黨的高級干部為這些變化所鼓舞，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的思想發起沖擊。[[103]](#_103__Er_Yue_Ni_Liu__De_Xu_Shu_L)這些官員包括葉劍英、聶榮臻和徐向前元帥，以及副總理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和譚震林。他們利用周恩來總理在2月中旬召開的一系列有關“抓革命、促生產”的會議之機，表達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這些老干部明確提出了四個原則性的問題：群眾運動要不要黨的領導；沖擊那么多的老干部是否正確；把軍隊搞亂是否應該；以及在此基礎上，“文化大革命”是應該繼續下去，還是像這些官員明確表示的那樣應迅速結束。

2月中旬的一個下午，在北京中南海內的懷仁堂發生了這幾次會議中最富有戲劇性的一幕。在這次會議上，爭論的兩派嚴格地沿長桌的兩邊落坐，周坐在會議桌的頂端，他的左手是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其他成員；總理的右手是三個元帥、五個副總理和國務院官員余秋里、谷牧。會議很快轉為兩派之間的嗓音比賽。主管農業工作的副總理譚震林從桌旁起立，宣布他打算辭職。他被陳毅和周恩來勸阻。

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成員很快把這次會議的記錄（后來指責這個紀錄是歪曲事實）呈送給毛澤東。毛對會上所表達的一些意見非常惱火，他認為這是否定他的領導。得知毛生氣后，激進派很快就把二月份的幾次會議說成是“二月逆流”，并以此為論據，發動一場把所有尚存的高級干部從職位上清除出去的運動。

因此在某些方面，中南海的這些會議的結果與“大躍進”期間、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相似。就兩次運動的時機來說，中國都處在毛澤東發動的激動人心的群眾運動之中。在這兩次事件中，運動所產生的破壞性結果已經變得很明朗，并且都在進行限制不良后果的努力。但在這兩次運動中，一些高級官員不但批評運動的過分之處，而且還對運動總體上發表某些反對意見。在這兩次運動中，毛都把批評看成是對他個人領導地位的挑戰。結果是，兩次運動不但在其反面影響已經明朗后仍持續了很久，而且一些意在糾正那些后果的措施也被取消或被推遲執行。

“二月逆流”否定二月初所做的恢復秩序的嘗試，從而使“文化大革命”重新激進化。這種發展勢頭的一個標志是，把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從紅衛兵的大字報和小字報轉移到了黨的官方出版物上，盡管使用了像“中國的赫魯曉夫”、“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的代名詞。假如分別擔任國家主席和黨的總書記的劉、鄧都是這樣，那么，對全國所有干部都應沖擊了，對此原存有的任何疑慮都一掃而光了。與此措施相關的一項措施是，對黨、政、軍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發起猛烈攻擊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在它通過一周年紀念日出現在大眾傳播媒介上。

由于有這些變化壯膽，在整個1967年春天，激進的群眾組織對許多現存的政府官員發起了更為強烈和頻繁的批判。一個突出的靶子就是譚震林，他是“二月逆流”最積極的參加者之一，他的坦率直言使他成為激進派首當其沖的打擊對象。在懷仁堂的那次斗爭白熱化的會議上，譚稱蒯大富是一個“反革命小丑”。蒯是清華大學的激進分子，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愛將。據說譚給毛和中央委員會遞交了許多書面報告，力請結束“文化大革命”，他在其中一份報告中稱江青為“當今的女皇武則天”。根據同情激進派的記錄，譚還企圖恢復“一月風暴”期間被推翻的農業部官員的職務。

激進派的另一個目標是罷外交部長陳毅的官。像譚震林一樣，陳絲毫不隱瞞自己對“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運動的尖刻態度。有一份記錄，盡管可能是偽造的，但流傳甚廣，其中寫道，陳毅一次與一群紅衛兵對決，他揮舞著自己的那本小紅書《毛主席語錄》說：“現在該輪到我發言了，讓我給你們引用毛主席語錄第271頁的一段話，毛主席說：‘陳毅是個好同志’。”紅衛兵是否能發現中文版的語錄上沒有這一頁，那是紅衛兵的事了。[[104]](#_104_Duo_Bi_Er_____Wen_Hua_Da_Ge)

但是許多激進派群眾組織的最終目標，或許也是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最終目標，是周恩來。周被激進派認為是“二月逆流”的“幕后支持者”，是譚震林、陳毅等這類官員的保護者。在北京貼出的許多大字報以沖擊譚和陳開始，而以批判周恩來結束。

“二月逆流”就是以這種方式使高級干部日益處于易受攻擊的、被動的地位。確實，毛還不時進行干預，再三肯定他的信念：95％的中國干部是可以挽救的。至少在一個時期，毛和周也把一些干部從群眾批判和肉體打擊中解救出來。周本人受毛的保護，而周則竭力保護像廖承志、陳毅、李富春和李先念這樣的干部。就在這個時刻，周把許多省、市官員帶到北京，以便能夠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

但是這樣的措施沒能保護每一個人，也沒能阻止老資格的文職官員的政治地位的進一步削弱。1967年夏天某個時候，劉少奇和鄧小平被軟禁。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開始攫取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的許多權力。激進派繼續用“二月逆流”作為高級干部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反對毛領導的證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個獨立系統里，老一輩官員現在處于最軟弱的地位。

武漢事件 1967年中期，中國最重要的三個變化是：在激進的和保守的群眾組織之間，在解放軍內部保守和激進的部隊之間，以及在“文革”領導小組和武裝部隊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分裂。7月20日的“武漢事件”（中國人稱“7·20事件”，依據事件發生日期而名之），為理解這些分裂的發展及其含意提供了最好的例證。[[105]](#_105_Dui__Wu_Han_Shi_Jian__De_Xu)

人民解放軍奉命監督全國省、市一級革命委員會的組建，當時，這項任務主要分配給了各大軍區及其下轄的地方駐軍和衛戍部隊。許多軍區司令員與當地黨的負責人有密切的私人關系，這使得他們傾向于與較為保守的群眾組織站在一起來保護黨組織。同樣，人民解放軍維持秩序和紀律的傾向把自己置于與較為激進的群眾組織的沖突之中，這些激進的群眾組織力圖推翻一切官員，他們為了“革命”，忽視經濟生產。

所以，在2月間，許多軍區司令以中央最近發布的有關限制“文化革命”的指示為由，開始壓制最難駕馭的激進組織。在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作出了許多決定，他首先是與“工人總司令部”脫離關系，然后命令這個激進組織聯盟的總司令部解散，理由是，它們一直在從事危害社會秩序及經濟穩定的破壞性活動。

對“二月逆流”的批判給北京和各省的激進派帶來機會，他們抗議人民解放軍“鎮壓”“左”派群眾組織。4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一篇社論，呼吁“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也就是紅衛兵）。這篇社論是以武漢和成都軍區對現狀不滿的激進派所提供的材料為基礎寫成的。同一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委各自發布指示，大大削弱了解放軍鎮壓激進群眾組織的能力。[[106]](#_106___Wen_Jian_Ji_____Di_111__1)這些指示剝奪了軍隊宣布任何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以及壓制那些批判過軍隊領導人的組織和進行大規模逮捕的權力。從此以后，對群眾組織進行分類的權力只有北京來掌握，而那些被軍區司令員們貼上反革命標簽的群眾組織將得到寬恕。據說，這些指示是林彪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共同努力的結果。這件事表明，至少在這一點上，毛主義者的聯盟之中的這兩派之間還有高度的合作。

由于這些指示大大削弱了人民解放軍恢復秩序的能力，它們也就大大增加了保守和激進的群眾組織之間的沖突程度。激進派開始從軍械庫奪取武器，而在華南，他們從開往北越的軍火運輸船上奪取武器。與此相應，有些地方的人民解放軍給比較保守的群眾組織提供武器。武斗事件大大增加，不僅造成人員傷亡，而且還影響經濟生產。在武漢，主要的結果就是激進派發起了一系列的抗議和示威活動，要求扭轉這個城市的“逆流”。顯然，這些活動得到了江青本人的支持。

由于4月初的指示規定，只有中央有權決定參加派性斗爭的群眾組織的政治性質，所以陳再道請求會見周恩來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討論武漢的形勢。根據陳本人的敘述，會議的結論是：武漢軍區的行動基本上是正確的，應該通知武漢的激進派停止對軍區的沖擊。對陳來說不幸的是，在北京正式宣布之前，有關該文件的消息就在武漢泄露了出來。這就促使江青指責陳再道是在利用他的勝利搞小動作，并使她壯起膽子廢除這一協議。

在此期間，武漢群眾組織之間的斗爭也加劇了。5月中旬，成立了一個“百萬雄師”保守組織。該組織的宗旨是保衛軍區和大多數老干部。據陳再道說，在武漢，參加“百萬雄師”的人當中黨員占85 ％，而且至少獲得了大多數當地駐軍的暗中支持。陳宣稱，軍區在派性斗爭中正式采取中立態度，并且呼吁它們團結起來。不過，對所有卷入派性斗爭的人來說，陳及其部屬的真正偏向大抵是心知肚明的。

于是，第二輪會議于7月中旬在武漢召開，以求重新解決該城市存在的問題。從北京前往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中央軍委的兩位代表（李作鵬和楊成武）、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兩位成員（王力和謝富治）。毛也親自參加了幾次會議。會上，毛和周都批評陳在2月份解散“工人總司令部”，并且命令恢復這個組織。但毛明確敦促參加派性斗爭的群眾組織聯合起來，而且否認有任何打倒陳再道的企圖。

隨后，周返回北京，留下謝和王向武漢各派傳達會議結果。不論公正與否，這兩人將毛和周的指示說成是否定軍區，批評“百萬雄師”和支持該市激進的群眾組織。為這些變化所激怒的“百萬雄師”的代表們猛烈沖擊謝、王下榻的賓館。然后，有一群當地衛戍部隊的士兵抓住了王力，把他拘留起來，可能還打了他。謝只是因為他的正式職務是副總理和公安部長而得到寬恕。

由于周火速趕回武漢，保釋王力，并調動大量的海軍和空降部隊奪取了武漢的控制權，終于把暴亂壓制下去。王、謝和陳再道都離開武漢，飛往北京。前兩人獲得了英雄般的歡迎，后者則遭到批判和審問。

像“二月逆流”一樣，“武漢事件”的直接后果顯然有限得很。激進派把陳的問題描述成一場兵變，因此，人們以為他將因為其不忠行為而受到嚴懲。但是，像譚震林一樣，陳再道受到的處分比想象的要輕得多。他被解除了軍區司令員的職務，但在其他方面，對他處理相當寬大，而且在林彪倒臺后不到兩年便恢復了職務。陳本人把此歸因于毛和周的善意。但人們也許要問，林彪對他手下一位軍區司令員，不管他如何桀驁不馴，遭“文革”領導小組如此羞辱，究竟會持怎樣的歡迎態度。

“五·一六”兵團的清洗 盡管“武漢事件”對主要參加者的影響不是太大，但從更廣泛的方面來看，其影響是毀滅性的。激進派，包括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成員要求抓住這一機會，進一步攻擊北京和各省的保守派和“修正主義分子”。7月22日，僅在“武漢事件”兩天以后，江青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107]](#_107___Zhong_Guo_Da_Lu_Bao_Kan_G)她那個級別的領導人支持席卷全國的武斗，這還是第一次。她的聲明只是使恢復秩序的一切努力復雜化。

這種膨脹的激進主義目標包括在中國的外交官、外交部和周恩來。許多國家的外交官受到騷擾，英國駐華代辦處被付之一炬。一個以前曾駐印度尼西亞名叫姚登山的年輕外交官，在外交部策動一場奪權斗爭，他不僅直接把矛頭指向陳毅，而且還暗指周恩來，因為周試圖保護陳。[[108]](#_108_You_Guan_Zhe_Yi_Shi_Qi_Wai)為了批判“陳再道的后臺老板”，揪出為了保護最大多數人而挺身而出的“另一個劉少奇”，[[109]](#_109_Guan_Yu_Zhe_Yi_Shi_Qi_Zhong)這一時期激進派書寫的墻報號召打倒“舊政府”。激進的紅衛兵想把周揪出來“批斗”，公然在辦公室把他堵了兩天半時間。

不過，這時最重要的目標不是周恩來，而是人民解放軍自己。8月初，《紅旗》雜志的一篇社論號召激進派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10]](#_110___Hong_Qi____Di_12Qi__1967N)人民解放軍中可能有修正主義分子，這大概算不得什么新觀點。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里有這個意思，1967年上半年的許多社論中也有這個說法。但“武漢事件”所產生的后果使得這樣一個口號具有爆炸性，而且產生了許多直接的后果。軍區司令員，包括一些與林彪關系密切的人都受到沖擊：廣州軍區司令員、國防部長的得力干將黃永勝被激進的紅衛兵比作“廣州的譚震林”。[[111]](#_111_Duo_Bi_Er_____Wen_Hua_Da_Ge)如果再不制止，這樣一種提法將威脅到中國軍隊維持任何一種秩序的能力。

毛、周和林在反對“文革”小組的煽動上是一致的：對林來說，因為它威脅到軍隊的團結及其合法地位；對周而言，因為它危及他對外交事務和國務院的控制，并使他自身的政治地位受到沖擊；對毛來說，因為它使中國更加遠離他在追求的、令人難以捉摸的團結目標。

所以，8月下旬，“文革”小組改組。最激進的四名成員——王力、穆欣、林杰和關鋒——被解職，第五個即戚本禹4個月后倒臺。陳伯達當主編的黨的理論刊物《紅旗》向來是“文革”小組的喉舌，現在被迫停止發行。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命名的“五·一六”兵團也受到指控，因為他們用“二月逆流”作借口，先是批判余秋里，然后又批李先念、李富春和陳毅，而所有這一切的最終目的是推翻周恩來本人。8月，將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的罪責落在激進派身上。[[112]](#_112_You_Guan__Wu__Yi_Liu__Bing)

9月5日，中國的全部四個中央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國務院和“文革”小組——聯合發出指示，企圖結束全國的武斗，恢復人民解放軍被砸爛的權威。禁止紅衛兵組織從軍隊手中搶奪武器，軍隊不經中央指示，不得向群眾組織轉交武器。現在，允許人民解放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武力，以對付抗拒軍隊恢復秩序計劃的群眾組織。[[113]](#_113___Zhong_Guo_Da_Lu_Bao_Kan_G)

同一天，江青在北京的一次紅衛兵集會上發表談話，她設法讓自己及“文革”小組的幸存者疏遠與那四個被解職的人的關系。她不點名地提到他們，把“五·一六”組織說成是一小撮企圖奪取群眾運動控制權的“極‘左’分子”。她把“揪軍內一小撮”的號召斥為這些想把中國引向混亂的極“左”分子設下的“陷阱”。她繼續為自己提出的“文攻武衛”進行辯解，同時她認為，中國目前的形勢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使用武力的正當理由。盡管她竭力否認自己對“五·一六”兵團負有任何個人責任，但事實上，江青等于被迫發表了一篇表示自我批評的講話。[[114]](#_114___Zhong_Guo_Da_Lu_Bao_Kan_G)

8月的混亂和“五·一六”事件對“文化大革命”的進程有重要的影響。第一，就像我們在下面將要看到的，它把“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從舊的政治秩序的破壞轉為新的政治秩序的創立。9月，毛澤東根據他整個夏天巡視全國的情況，透露了他為今后的“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偉大戰略部署”。這個部署實質上是要結束混亂，在22個尚未組織革命委員會的省級單位以最快速度成立革委會。

到1967年底，“革命委員會”有條不紊地組織起來了，而且激進的群眾組織和軍區司令員之間的平衡也因這年夏天幾個事件的發生而重新調整，形勢對后者有利。1968年春天，正如我們很快就看到的，激進主義最后一次回潮，但它從未達到1967年8月的水準。毛被迫在群眾運動和人民解放軍之間，也就是在繼續混亂和政治穩定的唯一希望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候，毛選擇了后者。結果是，在新的地方革命委員會中，軍隊現在能夠相對穩定地向著使自己的統治地位制度化的方向邁進。

“五·一六”事件也改變了北京的中央領導層中的聯盟形式。在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所有主要成員中，與“五·一六”清洗的犧牲品關系最為密切的，從而也是受到最嚴重削弱的人是陳伯達。“五·一六”事件的全部五個犧牲品顯然都是陳直接控制的《紅旗》雜志的副主編。在60年代初期北京激進的知識分子和新聞機構中，他們都與陳有密切的聯系；《紅旗》停刊只能被解釋為對陳的編輯方針的否定。在意識到自己的地位正在削弱以后，陳伯達便轉而尋找新的政治靠山。看來他已選擇了林彪。這是一場雙方互有所求的政治聯姻。陳伯達能給林彪提供意識形態和理論上的點綴，而這顯然是林自己公開講話中所缺少的。作為回報，林彪可以給陳伯達提供獨立系統——人民解放軍——的支持，軍隊似乎不可避免地從“文化大革命”中脫穎而出，處于最有力的地位。1967年底，陳伯達開始與林彪更緊密地工作在一起，獻上他以前提供給毛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那種捉刀代筆的服務，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清洗楊成武和壓制紅衛兵 縱使發生了“五·一六”事件，但在1968年春天和初夏，激進的群眾運動還有一次回光返照。解放軍領導層發生一次神秘的改組，這使激進派曇花一現的復興成為可能：1968年3月，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和空軍政委、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一道被解職。[[115]](#_115_Jie_Chu_Yang_Cheng_Wu_Zhi_W)

清洗楊成武看來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分裂的一個典型事例：各省激進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分裂，周恩來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之間的沖突，以及人民解放軍內各不同野戰軍派系的代表間的緊張關系。所有這些沖突似乎都在楊成武的突然失寵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一直到1967年底，楊一直負責解決許多省里的沖突，就像他7月份陪毛去武漢完成類似的任務那樣。不論在山西還是河北，楊都支持保守派反對他們較為激進的對手。在山西，楊拒絕支持激進的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反對該省較為保守的軍官們的挑戰。在河北，楊支持保守的軍事組織和群眾組織的聯盟反對一個一直得到謝富治撐腰的與激進派類似的聯盟。

更有甚者，楊成武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站在周恩來一邊，與中央“文革”小組和激進的群眾組織交鋒。顯然，楊和傅對與周關系密切的一大批軍隊干部提供了軍事保護。戚本禹被解除職務后，楊鼓動傅崇碧派小隊士兵以逮捕戚的同黨為名，沖擊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并遍翻檔案，搜查他們的罪證。不管楊的最終目的是什么，對包括江青和謝富治在內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剩余成員來說，認為楊正在為控告他們尋找材料不是沒有道理的。

最后，楊成武也卷入了軍隊內部兩敗俱傷的斗爭。盡管楊與林彪歷史上有些關系，但是，在革命的最后幾年他是在軍委直屬的第五（大概是指楊、羅、耿兵團，解放軍序列上沒有第五兵團——譯者）野戰軍而不是在第四野戰軍工作。楊與包括空軍司令吳法憲在內的楊最親密的助手們的關系是相當緊張的，而林顯然懷疑楊的忠誠。同時，林也把清洗楊成武當成是打擊他自己的對手聶榮臻和徐向前的一種手段，聶和徐曾是楊成武所在野戰軍的上司。

因而，楊成武被指控為支持第二次“二月逆流”而受到陷害，像第一次一樣，第二次“二月逆流”的本意是保護保守力量，尤其是保護高級干部免受激進派的沖擊。他被解職的直接影響有兩個方面。第一，它使林彪加強對中央軍委辦公廳的控制，辦公廳負責對武裝部隊的日常控制。現在林彪能夠把他的五個親信塞進這個要害部門，這五個人是：吳法憲；黃永勝，原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現在代替楊成武成為總參謀長；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后勤部部長邱會作；林的妻子葉群。[[116]](#_116_Sun_Dun_Fan_Deng_Bian____Zh)

楊成武事件的第二個后果是激進群眾組織的活動回潮，并且合法化。他們提出抗議，宣稱新的革命委員會不具代表性。在山西、河北、山東和廣東，暴亂尤為廣泛。在北京，清華大學對立的雙方以校內建筑物為工事保護自己，他們在大樓前面設置水泥路障和鐵絲網，而且用弩機向仇敵發射磚塊。

在廣西這樣的省份里，革命委員會尚未成立，武斗更容易發生。對立的組織都從開往越南運送軍需物資的列車上偷取武器。他們用機關槍、火箭筒甚至用防空武器互相戰斗。人們在香港附近的水域發現了沿珠江漂流而下通常被捆綁起來的尸體。它們是武斗的犧牲品。

正是清華大學的武斗引起了對群眾運動的最后鎮壓和解散紅衛兵。7月底，毛命令保衛黨中央領導人的精銳保安部隊——8341部隊，與北京一個針織廠和印刷廠的工人一起進駐清華。幾天后，7月 28日夜，毛接見了清華和北大的學生領袖。聽到蒯大富抱怨：有一只“黑手”把工人派到學校來鎮壓紅衛兵，毛說：“黑手仍沒抓住，黑手不是別人正是我。”毛對紅衛兵搞武斗，而不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表示不滿：

你們現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們少數大專學校是在搞武斗。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興，你能用這種方式把全國團結起來嗎？[[117]](#_117___Mao_Ze_Dong_Si_Xiang_Za_L)

除非紅衛兵能把事情辦好，否則，毛警告，“我們將訴諸軍管（對學校），并且要林彪實施指揮”。

此后不久，正如毛所威脅的，“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軍官監督下開始進駐中國的主要大學。8月5日，毛把巴基斯坦訪問團贈送給他的一些芒果轉送給清華的宣傳隊，代表個人對他們的行動表示支持。毛壓制紅衛兵的理由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應該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而不是在學生手里。8月中旬，毛發布指示，宣布“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幾周后，他命令，與“解放軍戰士”配合的“工人群眾”應領導“無產階級教育革命”。[[118]](#_118_Chen____Mao_Ze_Dong_De_Wen)

姚文元曾寫過論海瑞的文章，發起了“文化大革命”。8月底，他又寫了一篇文章，該文實質上突然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階段。姚的題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嚴厲批評過激的群眾運動。而文章作者正是靠群眾運動爬上權力寶座的。文章說，紅衛兵運動的無政府主義和宗派主義是由于參與者的“小資產階級”觀點。姚表示：“現實狀況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學生、知識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119]](#_119___Bei_Jing_Zhou_Bao____Di_1)由于實行這樣的領導，遺留的群眾組織被解散，紅衛兵的報紙和期刊都停止發行。

到年底，在遣散紅衛兵組織的同時，開始了數百萬年輕人的上山下鄉運動。12月，毛又發出了一個指示，認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到1970年底，約有540萬青年人被轉送到農村。大部分人去祖籍農村落戶，但也經常被安置到偏遠和邊疆地區。很少有人對自己還能返城回家抱任何希望。[[120]](#_120_Tuo_Ma_Si__P_Bo_En_Si_Tan)

## 政治體制的重建

隨著1967年8月底清洗“五·一六”兵團和翌年春天遣散紅衛兵，“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從對舊秩序的破壞轉變為創立新秩序——從中國人所謂的“斗批”時期轉變為“批改”時期。重建政治體制包括兩個重要方面：完善革命委員會組織和重新恢復黨自身的地位。

這一時期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形式上，中國“新”政治秩序的結構與“文化大革命”前夕存在的那種結構幾乎沒有什么差別。[[121]](#_121_Guan_Yu__Wen_Hua_Da_Ge_Ming)“文化大革命”以沿著巴黎公社的路線，“推翻”官僚機構并建立直接民主的烏托邦式的夸張辭藻開始的。但是，當政治重建的工作實際上已開始以后，重建的藍圖遠不是那么富有遠見卓識。干部們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他們在那里參加體力勞動和政治學習，認為這樣就能培養他們更為無私和更為有效的工作方式。人們認為革命委員會及其監督下的官僚機構比之以前的機構更加精悍能干，而且更加忠實于毛主義的價值。而且由于其中包括了少數群眾代表，這些組織被認為更能代表大眾利益。然而，重建時期的組織路線在這兩個方面仍然十分明確：政府機構仍按官僚政治路線來建設；中國共產黨仍是一個指導革命委員會工作的列寧主義的組織。

新的政治體制區別于以前的政治體制的地方是它的成員而不是它的機構。軍隊官員比50年代初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級別較高的組織中。老一輩的政府官員靠邊站，讓位于那些缺乏經驗、文化程度較低、視野狹窄而且更不稱職的男男女女，盡管這些人并不比前者年輕多少。接納新黨員的工作重新開始。而且強調要大量吸收從紅衛兵運動中涌現出來的群眾積極分子。此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犧牲者、積極分子和旁觀者之中所造成的沖突尚未解決，結果，黨政機構受到了宗派主義的嚴重浸染。

#### 毛的“戰略部署”

1967年9月，毛澤東為結束“文化大革命”制訂了所謂的“偉大戰略部署”。在為前20個月的混亂辯護的同時（“不要怕制造麻煩，我們制造的麻煩越大，越好。”），毛承認，亂子已達到了它的目的，現在應迅速結束。毛告誡說：“車子開得太快就要翻，因此，謹慎是必須的。”[[122]](#_122___Zhong_Guo_De_Fa_Lu_He_Zhe)

毛認為，當務之急是在中國29個省成立革命委員會。直到此時，成立革委會的進程十分緩慢，令人煩惱：1967年1月至7月底，在省一級僅有6個革命委員會成立。毛指示：現在我們必須“發展和鞏固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毛期望這些任務到1968年1月能完成。

毛認為兩條指導方針有利于其余的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首先，毛現在準備讓人民解放軍主宰這個進程，（即使沒有主宰的名分）因而毛愿意向人證明軍隊是有權威的，是忠誠的，他并愿意寬恕軍隊偶爾犯的過失。就像他在夏末所說的那樣：“軍隊的威望必須堅決維護，無論如何都不能有任何遲疑。”有一次，毛以相當寬宏大量的口氣提及“武漢事件”，他接著指出：“軍隊在首次執行大規模的支‘左’、支工和支農以及執行軍管和軍訓的戰斗任務時犯錯誤，這是難免的。當時的主要危險是一些人要打倒人民解放軍。”[[123]](#_123_Nei_Er_Sen____Zhong_Guo_De)毛認識到軍隊的重要性，這反映在他不愿看到翌年春天楊成武解職后，人民解放軍成為大批判的靶子。[[124]](#_124_Fei_Li_Pu__Bu_Li_Qi_Hai_Mu)

第二條指導方針是，毛認識到，如果革委會中的群眾代表來自于廣泛的群眾組織，而不是僅僅從那些得到地方軍隊司令員們支持的群眾組織中產生，那么，就能加速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這一強調包容性的觀念在一份通知中得到具體體現。這份通知說，解放軍應該“支‘左’不支派”。毛的一個指示指出：“工人階級……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125]](#_125___Jie_Fang_Jun_Bao____1968N)1967年底，新聞界對宗派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斷發起猛烈攻擊，配合宣傳毛關于全國團結的理想。現在，宗派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被說成是“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表現。

1967年夏天毛巡視全國后，革命委員會分兩個階段建立起來了。1967年8月至1968年7月，18個省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最后五個省，如福建和廣西這樣分裂很深的省，以及像新疆和西藏這些敏感的邊疆地區的革命委員會是在7月對紅衛兵運動最終壓制下去后產生的。總之，革命委員會是在一系列協商之中誕生的。在這些協議中，地方軍隊指揮員和北京的領導人力求硬把互相競爭的群眾組織攏到一起。

由于毛規定革命委員會應當廣泛地代表各種觀點，因此，革命委員會通常是龐大臃腫的機構。每個委員會都由100—250人組成。[[126]](#_126_Fu_Lei_De_Li_Ke__C_Tai_Wei)不過，革命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是比較有效的機構，通常比“文化大革命”前存在的類似的黨和政府領導組織還要小。常務委員會的構成隨時代趨勢的變化而變化，在較為激進的時期任命的群眾代表多一些，在較為溫和的階段任命的群眾代表就較少一些。盡管在這一時期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中，群眾代表占據了相當數量的位置（在182個主任和副主任中占61個），但實權仍掌握在軍隊手里。23個主任中，有13個是部隊司令員，5個是專職政委。第一副主席中，有14人是軍隊司令員，5人是政委。其余的都是黨的干部，群眾代表一個都沒有。[[127]](#_127_Zhe_Xie_Shu_Ju_Chu_Zi_Li_Ch)

過了較長的一段時間后，毛也預見到，一旦在全國各省把革命委員會當作省一級的政府建立起來，就應進行黨的重建。從一開始，毛主席就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個凈化黨的運動，而不是毀滅黨的運動。就像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十六條”中所說的那樣，“文化大革命”委員會的目的就是用作聯系黨和群眾的橋梁，而不是使其扮演一個黨的替代物的角色。與此相似，紅衛兵的目的就是推翻黨內的“走資派”，而不是推翻整個黨組織。我們可以回憶一下，毛在1967年初反對把巴黎公社的模式應用于中國的主要原因是：黨在這種結構中的地位不明確。這一點下面還會談到。“如果一切都變成了公社，那么黨怎么辦？我們把黨放在什么位置？……無論如何必須有一個黨！不管我們怎么稱呼它，都必須有一個核心。可以稱之為共產黨，或社會民主黨，或國民黨或一貫道，但必須有一個黨。”[[128]](#_128___Mao_Ze_Dong_Si_Xiang_Za_L)如果黨被紅衛兵和革命委員會置于一邊，那只是個暫時現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目的。

1967年9月，毛認為到了考慮重建黨的時候了。毛說：“黨組織必須恢復，而且黨的各級代表大會應該召開。”毛是樂觀的，他認為能較快地完成這一任務：“我看，大約就在明年這個時候（即1968年9月）召開第九次黨代會。”[[129]](#_129___Zhong_Guo_De_Fa_Lu_He_Zhe)毛把重建黨的任務交給了張春橋和姚文元，還有謝富治。“文化大革命”時期謝負責政法工作，也出盡了風頭。10月10日，姚提交了一個初步報告，為黨的重建設計了一個由上而下的基本原則。[[130]](#_130_Guan_Yu_Yao_De_Bao_Gao_He_S)姚的報告擬定出一個嚴密的程序，要求先召開一次全國黨的代表大會，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并通過一個新的黨章。參加黨代會的代表將與各省“協商”后由中央指定。黨代會結束后，就開始下級黨組織的重建工作。根據姚的報告，各級新黨委至少要具體體現三個“三結合”的原則，即每一個委員會都由老、中、青；工、農、兵及群眾、部隊官員和干部結合而成。

在姚的報告的基礎上，11月27日，中央委員會發出了一個“關于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意見的通知”。12月2日，又發布了一個“關于整頓、恢復和重建黨的機構的意見”的文件。這些文件遵循了姚報告的要點，作了兩個重要補充。第一，“通知”增加了一個決定，它其實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隱隱約約存在著：現在林彪成了毛的接班人。“通知”宣布：“大批同志建議，黨的九大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而且為了進一步加強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這一點要寫進九大的報告和決議。”

第二，中央委員會的文件通知各基層黨組織重新開始過“組織生活”。為指導基層黨組織的整頓，省革委會內部成立黨支部，通常被稱作黨組，其任務是開始純潔黨員隊伍，開除那些已蛻變為修正主義分子的黨員，并從“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分子中吸收“新鮮血液”。

#### 八屆十二中全會

盡管預期在1967年秋天開始黨的重建工作，但直到1968年9月最后一批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后，這一進程才真正開始。不過，這個重要任務一旦完成，殘存的中央領導人就迅速召開了第十二次中央全會，這次會議于10月13—31日在北京舉行。

像1966年8月的十一中全會一樣，十二中全會是黨中央的一次殘缺會議，中央委員會的正式委員中，只有54人出席了會議，勉勉強強代表了這個機構現存委員的法定人數。[[131]](#_131_You_Guan_Shi_Er_Zhong_Quan)此外，像前一次中央全會一樣，非中央委員充塞了十二中全會。但是，1966年的特邀觀察員是紅衛兵運動中的“革命師生”，而1968年的特邀代表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各省革委會的代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負責同志”——即官員。換言之，這些人現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受惠者。[[132]](#_132_Shi_Er_Zhong_Quan_Hui_Gong)

激進派懷著勃勃野心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要爭取大會承認前兩年發生的事件，并完成最高層黨的機構的清洗。與第二個目標相比，他們在第一個目標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這次全會最后的公報贊揚了“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歌頌了毛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堅信毛在這場運動中所作的很多“重要指示”和林的“許多講話”是“完全正確”的，并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斗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會議擁護毛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認為“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會議宣布：“這個波瀾壯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這次中央全會還放眼于未來，通過了一個新的黨章草案，并宣布將在“適當的時候”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133]](#_133_Dang_Zhang_Cao_An_De_Wen_Be)

這次全會宣布的最重要的決議大概是劉少奇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并被“永遠”開除出黨。在這一議題上，全會的決議——“文化大革命”期間，劉首次在正式公布的文件上受到點名批判——用煽動性的語言污蔑劉，把他定為“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一個“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然而，中央全會會后散發的證明材料（至少在西方能看到的材料）主要涉及劉在革命早期的1925年、1927年和1939年的活動，幾乎沒有提及他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表現。[[134]](#_134_Zhi_Kong_Liu_Shao_Qi_De_Ti)這表明，全會在如何敘述劉在1949年以后的活動時，不能取得一致意見。

在中央全會的小組討論會上，“文革”小組和林彪對1967年的“二月逆流”發起了猛烈的攻擊。奇怪的是，毛在中央全會的閉幕講話中對那段插曲所持的觀點比過去更為緩和。現在，毛主席把懷仁堂那次臭名昭著的會議看成是中央政治局成員行使自己的權利，對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發表自己意見的一個機會。不過，全會公報還是把“二月逆流”斥責為對“以毛主席為統帥、林副主席為副統帥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次攻擊”。毛對此不置可否。

盡管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除了譚震林已在前一年遭清洗外，激進派仍沒能把最積極地參與“二月逆流”的任何一個人排擠出中央委員會。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全都留在中央委員會。最為重要的是，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不但要把鄧小平趕出中央委員會，還要把他與劉少奇一道，永遠開除出黨。這一建議在毛澤東本人干預后遭到否決。[[135]](#_135_Guan_Yu_Shi_Er_Zhong_Quan_H)

除了這幾點以外，十二中全會幾乎沒有作出什么重要決策。全會含含糊糊地提到將在工宣隊領導下進行“教育革命”，但沒有說要采取什么特別的方案。與此相似，全會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正在促進并將繼續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出現新的飛躍”，但沒有宣布新的經濟計劃。“文化大革命”可能想要否定60年代初期毛認為是“修正主義的”某些經濟、社會政策，但全會表明尚未確立任何新的、可以取代它們的政策。

#### 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1969年4月召開的第九次黨代會反映了許多相同的傾向。林彪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報告的主要內容試圖證明“文化大革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136]](#_136_Lin_Biao_De_Bao_Gao_Jian)林彪贊揚了軍隊和“文革”領導小組自1966年以來所取得的成就。他不指名地提到了幸存的政府高級干部，又一次批判“二月逆流”（“這里說成是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現的那股逆流”）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猖狂反撲”，其目的是“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

關于國內政策，林的政治報告——與十二中全會的公報一樣——實際上沒有什么內容。報告只是指出經濟形勢一片大好——“農業生產連年獲得豐收”、“工業生產……出現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市場繁榮”、“物價穩定”，并斷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必將繼續促使經濟戰線……出現新的躍進”。報告還宣稱，“在文化、藝術、教育、新聞、衛生等部門”的奪權將結束“知識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這些部門的一統天下，但沒有說明將有什么新政策出臺。報告還用相當篇幅提及從黨內開除一些老黨員，吸收一批新黨員。但是，對這個即將開始的過程，報告沒有提供任何新的線索。

九大對中國政治重建的貢獻在于它對新黨章和黨中央領導人所作的決議。與上一次在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相比，新的黨章強調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和繼續進行階級斗爭的重要性——這兩種提法在以前的黨章中都沒有出現過。[[137]](#_137_1969Nian_Dang_Zhang_Jian)另外，入黨的機會現在只給那些階級出身好的人。1956年的黨章向所有“參加勞動、不剝削他人勞動”及承擔黨員義務的人敞開大門。相反，1969年的黨章原則上把黨員的來源局限在工人、貧下中農和軍人家庭出身的人。

新黨章最重要的特點是簡略而缺乏精確性。新黨章只有12個條款，所占篇幅大約只有1956年黨章的1/5。新黨章沒有一處提到黨員的權利，也沒打算要詳細地闡明各級黨委的結構和權力、處分黨員的程序、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周期，及黨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所有這些都是以前的黨章的重要特點。從黨的結構中被撤銷的組織有：領導中共黨組織的書記處、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的總書記和負責黨內紀律的監察委員會的全部組織系統。因此，九大所產生的黨的組織結構，比起“文化大革命”前的組織結構，必然更加靈活更加缺乏制度化，因而也更容易受到高層領導人物的操縱。

黨的九大不僅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國，看來也為毛以后的時代選舉了一個新的中央領導班子，林彪作為唯一的副主席和“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正式寫入新黨章，從而確定了他的地位。上一屆中央委員會的167名委員，在九大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的僅54人。一大批沒有進革命委員會的省、自治區的黨的領導人，還有一些重要的經濟專家，如以前一直在國務院工作的薄一波、姚依林，此時都被排除在黨的精英集團之外。在經歷了一場由激進派發起的曠日持久的運動之后，大部分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一輩文職官員和軍官，盡管還保留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資格，但都丟掉了在中央政治局的職位。九大最主要的犧牲者是鄧小平，他被貶出了中央委員會。不過，黨代會的正式文件仍沒有點名批判他。

很清楚，參加大會的代表和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證明了“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政治體制的影響。第一，他們表明了軍隊突出的地位。對大會紀錄片的一份分析表明，在1500名代表中，大約有2/3的人身著軍裝。與1956年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軍隊代表占19％的數字相比，這屆中央委員會中，解放軍代表占了45％。[[138]](#_138_Guan_Yu_Di_Jiu_Jie_Zhong_Ya)軍隊的崛起是靠犧牲文職官員和群眾代表而實現的，前者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后者則一直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益者。在新的黨中央機構里，群眾代表極少。的確，有19％的中央委員“來自群眾”，但是，他們往往都是老工人、老農民，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現出來的年輕的群眾積極分子。軍官代表數量大也意味著文職官員的代表數量下降了，尤其是國務院官員的代表數減少了，他們約占中央委員的1/3。眾所周知，人民解放軍和那些政府領導人所受的教育不同，他們的人生道路也不相同，中央委員會構成上的這種變化，關系到文化教育程度的下降和國外生活閱歷的減少。

第二，與第一點同等重要的是，大會證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造成的權力分散。1956年，約有38％的中央委員是省里任職的干部，其余的都在中央黨政軍各部委任職。相反，在1969年，整整2/3的中央委員是地方代表。不過，這種傾向在中央政治局的反映還不太明顯。“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只有3人可算是省、自治區的代表。相比之下，選進九大中央政治局的專職地方大員有2人（紀登奎和李雪峰），軍區司令員3人（陳錫聯、許世友和李德生）。

第三，從九屆中央委員會可以看到，盡管權力還沒有轉移到年輕人手里，但卻轉移到了資歷較淺的一代領導人手中。確實，人們講到九大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的一個特點是“年紀不輕經驗不足”。170位正式中央委員中，有136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沒有擔任過中央委員（在279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占225人）。但由于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的平均年齡約為60歲，因而，這屆中央委員會比它剛取代的中央委員會僅稍稍年輕一點，而實際上，它比1956年選出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當時的年齡要大。此外，由于地方軍隊領導人、省里第二梯隊的地方官員和群眾代表充實進中央委員會，進入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的人的級別明顯比上一屆要低。

從最后發展的結果看，這屆中央委員會正式通過的政治局說明了北京最高層的權力繼續分散。除毛和林之外，25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與林關系密切的中央軍隊官員5人；與中央“文革”小組有關系的6人；與林彪沒有密切關系的大軍區和省軍區司令員3人；“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沖擊的高級文職官員2人；另有一位用來制約林彪的人民解放軍元帥；由于“文化大革命”而登上權力寶座的黨的中層干部3人；還有3位早過鼎盛期的老資格的黨的領導人。因而，中央政治局的成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幸存者和獲益者之間，軍隊和運動期間上臺的文職激進分子之間，林彪及其在中央軍隊領導層的對手之間，以及中央軍事機構與大軍區司令員之間的分裂。

總之，盡管有結束紅衛兵運動暴亂的成功嘗試，盡管開始了重建中國政治體制的初步努力，但是，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留給了這個國家一個捉摸不定的政治形勢。“文化大革命”后的政策輪廓沒有確定：權力在明顯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團間分割；黨和國家的結構模糊不清，而且非制度化。盡管林彪在名義上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但他的權力基礎極為脆弱。在此后的兩年里，林企圖讓軍隊永久性地支配政府事務，提出了一個他以為會受到廣泛歡迎的政綱。他想以此來加強他的權力基礎。但是，這些努力最終導致了林在政治上的垮臺，而且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 結論

我們如何公正地評價“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的起因與發展、后果和意義呢？由于這些事件很復雜，紅衛兵出版物提供的資料又不確切，加之對發生在不到20年前的事件缺少從歷史角度進行總結的材料（如本文一樣），因此我們被攪得混亂不堪，這項工作變得異乎尋常地困難。

自九大以來中國和西方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易走極端，而且不斷變化，我們的分析工作和這些評價糾纏在一起難解難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國把紅衛兵運動描繪成一場創造性的和有效的運動，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那個時代的官方解釋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國工人階級“粉碎修正主義，奪回被資產階級篡奪了的那一部分權力”，因而“保證我國繼續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139]](#_139_Zhe_Xie_Yin_Yan_Yuan_Zi_Lin)遲至1977年，甚至在清洗“四人幫”之后，中國領導人繼續用熱情的語言描述“文化大革命”。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華國鋒說：“毫無疑問，我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偉大創舉而載入史冊，隨著歷史的前進，越發顯示它的燦爛光輝。”確實，華國鋒斷言，作為繼續與黨內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影響作斗爭的方式，深入的“文化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140]](#_140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

然而，兩年之后，中國的官方路線發生了徹底的改變。1979年中，葉劍英把“文化大革命”描述為“我國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最近流行的解釋是，中國從未存在過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毛對1966年中國政局的判斷“與現實背道而馳”，“文化大革命”后期提出的綱領是不切實際和空想的，紅衛兵是天真爛漫和易受影響的青年，受到“野心家、冒險家、機會主義者、政治墮落者和社會渣滓”的蠱惑。[[141]](#_141___Bei_Jing_Zhou_Bao____1979)1981年通過的關于黨的歷史的正式決議譴責“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142]](#_142___Guan_Yu_Jian_Guo_Yi_Lai_D)

西方也跟中國完全一樣，對“文化大革命”進行重新評價。70年代期間，許多美國人把“文化大革命”描述成毛想實現自己愿望的有益的范例，毛的愿望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維護公有社會的、平均主義的和大眾的價值以及他的信念：“官僚和現代化不會必然導致生活質量的提高。”據說這場運動的起因在于毛對社會的“高尚理想”，即“關于統治和服從的劃分將會變得模糊，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差別將縮小……而被領導者將更直接地參與決策過程”。據信，“文化大革命”將制定出社會經濟綱領，防止中國“在官僚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泥坑中僵化”。[[143]](#_143_Zhe_Xie_Yin_Yan_Yuan_Zi_Ha)

在中國人對“文化大革命”持更加批評的態度之同時，西方觀察家也采取同樣的做法。他們把毛的“狂熱”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狂熱”相比較，把“文化大革命”比作宗教裁判所和大屠殺。這場運動的起因不再追溯至高尚的理想，而追溯到對6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曲解。從1966—1976年的十年被描述成“混亂和破壞”時期，產生了“這個古國曾經歷過的、最有害的極權主義政權之一”，通過“摧殘知識分子，消滅學校，以及……使中國的經濟崩潰，‘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現代化至少倒退十年”。[[144]](#_144_Zhe_Xie_Yin_Yan_Yuan_Zi_Ha)

對“文化大革命”的解釋有如此急劇變化，這使我們對自己的能力產生疑問，即我們還能不能準確而公正地描述60年代后期的騷亂事件。然而，我們可以根據目前對“文化大革命”已有的了解，對這場運動的起源和后果作如下評價。

#### 起源

“文化大革命”的最終責任公正地歸因于毛對6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國社會面臨問題的判斷。毋庸置疑，毛指出的缺點中有許多確實扎根于耳聞目睹的現實之中。地方黨組織特別是農村黨組織變得很腐敗和效率低下，國家和黨的高級行政機構人浮于事、業務生疏，沉湎于官僚作風。“大躍進”以后采取的社會和經濟政策雖然使工農業生產復蘇，但這是以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之間、擁有肥沃土地的公社和那些大自然對之不那么慷慨的公社之間、聰明的學生和他們比較普通的同班同學之間以及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的不平等的加深為代價的。

但是，毛以極端的方式突出了這些問題。他把官僚主義和不平等的產生解釋為這樣一種跡象，即中國正沿著修正主義道路前進，而其根源在于黨的最高領導層中隱藏著的“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分子”。通過這種做法，毛把他畢生對中國階級斗爭的關心歸納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毛一生中前2/3的大部分時間從事反對他認為是中國人民的敵人的革命。50年代中期的一個短時期內，在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化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后，毛暫時認為中國的階級斗爭現在基本上結束了。但長期堅持這樣的結論對他是困難的。到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運動，他發展了這樣的觀點，即在社會主義階段，如同在社會主義以前的時期一樣，對抗階級之間的斗爭繼續成為主要的政治矛盾。而且如果不在1959年黨的廬山會議上，那肯定在1962年1月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得出結論，認為階級斗爭的焦點是在黨的領導人內部本身。

因此，當代的中國領導人和知識分子批評毛下述一點時是不無道理的：毛習慣于尋找中國社會問題的階級根源和把黨內意見的分歧看作是階級斗爭的反映。正如一名中國歷史學家地所言，“毛認為社會存在不平等和弊病是階級斗爭沒有抓好的標志”。[[145]](#_145_Shao_Hua_Ze___Guan_Yu__Wen)

毛也深受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蘇聯發展的影響。面臨莫斯科試圖操縱中國的外交政策和控制中國經濟以及蘇聯內部不斷增加的不平等和衰退跡象，毛推測，蘇聯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中明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修正主義”只能表明蘇聯共產黨領導階層的變質。一旦得出這個結論，毛就合乎邏輯地推論，中國也存在相似的倒退危險。

在毛對蘇聯的分析中，他很強調從斯大林到赫魯曉夫政治交班的后果。盡管毛也毫不猶豫地批評斯大林的缺點，但他仍相信，總的說來，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關于赫魯曉夫，毛主席得出相反的結論。自從蘇聯共產黨二十大以來，毛似乎越來越相信斯大林的繼承人就是一名修正主義分子，他的上臺使十月革命誕生地發生資本主義復辟完全成為可能。考慮到60年代中期毛已是高齡老人，蘇聯這個教訓是深刻的。正如1966年6月他對胡志明所說的，“我們都是70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我們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146]](#_146_Shao_Hua_Ze___Guan_Yu__Wen)

了解毛在選擇接班人過程中對付出現修正主義的戰略，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后果也具有極端的重要性。毛的辦法是號召中國的大學和中學學生首先在自己的校園，然后在較高級的黨的官僚機構中批判中國的資本主義傾向。然而，自相矛盾的是，60年代中期毛對中國青年持很大的懷疑態度。1965年，他對埃德加·斯諾說，由于中國的年輕人沒有親自經歷過革命，他們可能“同帝國主義講和，讓蔣介石集團的殘余分子回到大陸，站到國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一邊去”。[[147]](#_147_Mao_De_Hua_Yin_Zi_Si_Nuo)但是，毛看來很自信——自信得缺乏依據，正如以后的情況所證實的——依靠青年既有助于鍛煉他們，也有助于清洗共產黨。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為整整一代中國人提供了一個革命經歷，它也同時提供了一種檢驗老一代共產黨官員的革命信仰的方法。

這個戰略至少在兩個方面是毛主義所特有的。首先，這體現了他的思想中長期存在的平民主義成分：他相信，即使是先鋒黨也需要通過它所領導的人民的批評，進行整風和改造；他相信中國的群眾應參與甚至是國家的最高事務。1967年秋，毛在評價“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時，強調這種平民主義理想已實現的程度：“這種大好形勢的重要特征是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以往的任何群眾運動從未像這場運動一樣得到如此廣泛和深入地動員。”[[148]](#_148_S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

其次，毛的“文化大革命”戰略也反映了他依靠不可靠的人揭露黨的領導人中陰暗面的傾向。毛故意從那些對社會主義缺乏堅定信仰的集團中尋求對黨的批評，這并不是沒有先例。50年代中期，在“百花齊放”運動中，他在知識分子中就采取過這種做法。在60年代初期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動員農民清洗農村黨組織，盡管與此同時，他承認，甚至在較窮的農民中也存在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而現在，在60年代中期，他將動員成百萬學生——在最好的情況下是天真的和未成熟的青少年；在最壞的情況下，用毛自己的話說，是準備“否定這場革命”的人——向黨內的修正主義發動攻擊。[[149]](#_149_Si_Nuo____Man_Chang_De_Ge_M)

盡管這個戰略是毛的特征，但對共產黨來說，仍是極不正統的。正如弗雷德里克·泰維斯指出的，動員學生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內當權派”至少與三個重要的黨的傳統背道而馳：黨的領導人不能因政策問題上的觀點受到懲罰，而且即使他們處于少數地位也應該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黨的整風運動產生的結果應該是溫和的鼓勵，而不是“無情打擊”；如果允許群眾參與黨的整風，這種參與應該處于正常的黨組織或者特別的黨的工作組的堅強領導之下。[[150]](#_150_Fu_Lei_De_Li_Ke__C_Tai_Wei)況且，通過非正常程序發動“文化大革命”，面對大多數黨中央領導人的不情愿或反對，毛同時違反了第四條準則：黨的集體領導和多數統治原則。

只有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擁有像毛一樣獨一無二權威的領導人，才能成功地同時拋棄所有這些準則。因而，可以毫不夸張地作出結論，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責任——這場運動影響了成百上千萬中國人——在于一個人。沒有像毛澤東這樣一個人，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但是，如果說毛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必要條件，那么他不是一個充分的條件。首先，如同我們知道的，撇開毛自己的個人合法性不談，他還擁有決定性的政治資本。這些資本包括：第一，非常深厚的群眾基礎。這種群眾支持包括真心擁護的和機會主義的，熱情的和默認的。有些人參加“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對毛的忠誠，因為毛從帝國主義和軍閥手中解放了他們的國家。其他人參加“文化大革命”就如同80年代許多人支持改革的理由一樣：他們擔心蘇聯發展模式會使中國走上僵化、不平等和獨裁的道路。還有一些人因對個別干部特別不滿而成為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正如一名原紅衛兵說的，中國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對他們的上級進行一切報復，從微小的侮辱到重大的濫用政策”。[[151]](#_151_Liang_Heng___Zhu_Di_Si__Xia)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群眾基礎開始解體，因為許多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對這場革命引起的暴力和混亂有了清醒的認識。然而，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初，毛有能力動員足夠的群眾支持，從根本上動搖中國共產黨的基礎。對這樣的結果，中國人民本身必須承擔一些責任。

毛也依靠中國領導人內部的政治支持。如同我們在這一章中反復強調的，毛的資本包括北京和上海的一群野心勃勃的政治理論家和組織者，他們能更系統地發展毛對中國修正主義威脅的相當不完整的論述，通過操縱大眾媒介提高毛的個人魅力，動員城市社會中的已清醒過來的一部分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導群眾運動的行動。同時，毛也得到人民解放軍中重要人物尤其是林彪和高級指揮官中主要人物的支持，他們在1966年初向毛主席提供政治支持，在那一年晚些時候對紅衛兵運動提供后勤支持，在1967年初推翻黨的權力機構，然后在1967年年中至1969年年中之間著手恢復秩序。

但是，黨的其他機構因沒有更強有力地抵制毛也必須承擔責任。現在對“文化大革命”的官方提法特別強調1967年1月以后出現的中央和地方各級對毛的抵制。1967年的“二月逆流”因是特別增光的事件被挑出來作為中國共產黨反對“文化大革命”而進行的“不懈斗爭”的范例。但到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已受到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的認可。動員、沖突和混亂的力量已經不可逆轉。

黨的機構如果能早點以更團結的行動反對毛、而不是對他的決策作出讓步，那或許能中止“文化大革命”。特別重要的是周恩來的幫助，1965年11月，他讓姚文元的關于海瑞的文章廣泛印發；1966年4月，他參與對彭真的批判；9月他對激進學生如蒯大富的辯護和后來在1966年12月對“文革”小組的辯護，以及沒有旗幟鮮明地支持1967年的“二月逆流”。尤為重要的是，新近發現周是一個文件的起草人，這是對官僚主義進行最辛辣斥責的文件之一，這個文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而以前認為這個文件是毛澤東起草的。[[152]](#_152___Ren_Min_Ri_Bao____1984Nia)這就讓人以為，周可能確實認為，需要采取嚴厲的措施對付官僚主義僵化的危險。或者，周支持毛是出于個人對毛的赤膽忠心，或者是他明哲保身。鄧小平后來承認，這兩種情況中無論是哪一種，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所作所為中國人民都已經“原諒”了他。[[153]](#_153_Deng_Xiao_Ping___Da_Yi_Da_L)

但是，不應該單單挑選周作為指責的對象。葉劍英和楊成武參與起草清洗羅瑞卿的報告。[[154]](#_154_Li_Bo_Sa_Er____Yan_Jiu_Zhi)1966年4月，鄧小平似乎與周一起參與對彭真的批判。而且總的說來，整個政治局都同意撤銷羅瑞卿的職務，改組北京市委，于1966年5月清洗黨的書記處和宣傳部，在8月舉行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正式通過了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

關于黨的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與毛合謀問題，黨史的正式決議對此沉默不語。但是，中國的歷史學家更樂意提供材料。如同一位歷史學家所說的，政治局在通過“五·一六通知”這樣的決議時并不相信這些決議是正確的，或者甚至是因為感到非通過不可；但是政治局還是贊成毛的決定，因而必須對“文化大革命”“承擔一定的責任”。[[155]](#_155_Jin_Chun_Ming____Wen_Hua_Da)

在解釋1966年春夏黨的機構沉默時，中國人強調毛的個人權威對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中其他同事的重要性。這種解釋意指毛既在中國群眾也在黨的領導人中間享有超凡魅力的地位。這種解釋使人進一步聯想到，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毛領導中國共產黨在敵我力量極大懸殊的情況下取得勝利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他享有一貫正確的威信，這種威信只在“大躍進”的災難中稍被降低。

近來中國的報道披露，毛事實上是要中國共產黨在林彪和劉少奇之間選擇一人做他的繼承人，而黨的許多領導人最初就同意林彪是更好的人選。用鄧力群的話說（鄧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劉少奇的秘書，在80年代初期負責宣傳工作），毛對林彪的偏愛“不能說沒有得到黨內的支持”。這是因為，與劉少奇相比，林對毛更為忠誠，似乎對意識形態有更深的信仰，而對軍事問題肯定更加懂行。那時，中國面臨美國在越南戰爭中逐步升級，也面臨與蘇聯日益嚴重的軍事對抗，黨的許多高層領導人顯然被這種論據所說服，即“管好中國這個國家，中國這個黨，光懂政治不懂軍事不行”。[[156]](#_156_Deng_Li_Qun___Xue_Xi___Guan)

正如毛要對“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負責一樣，他也必須對其后果承擔大部分責任。這場運動中大多數最具破壞性的后果——特別是暴力、混亂和傷亡——可以認為是毛所用戰略的結果。這結果如果說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預料的。在發動群眾時，毛同意使用極有煽動性的語言，把這場運動完全看作是中國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之間的一場摩尼教徒式的斗爭。他使中國社會內深藏的分裂和不滿表面化，卻沒有創設任何機制來組織或引導它釋放出來的社會力量。他似乎預見到一場自我約束的革命運動，但產生的卻是一種分裂的和宗派的力量，對于這種力量，毛本人、“文革”小組，甚至軍隊都只能進行有限的控制。他指望黨的干部歡迎并支持群眾對他們自己的領導人的批評，而黨的干部為維持自己的地位卻試圖壓制或操縱群眾運動，這本不足為怪，他卻感到失望和痛恨了。

換言之，毛的戰略的缺點是，他只在1966年至1969年之間進行半場革命。他未能設計出一個切實可行而持久的、可供選擇的政治制度來取代他想推翻的政治制度，或者把他動員起來的政治資本從破壞性的力量轉變成建設性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是20世紀第二次不成功的中國革命。1911年，孫逸仙（孫中山）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但他未能創建有效的共和制度以代替被推翻的王朝，中國從而陷入軍事統治之下。60年代后期，毛成功地從黨的機構中奪取了政權，但他未能設計出有效的民眾機構取代列寧主義的黨—國家機構。政權再次落入中國軍人手中。

在為毛的辯護中，說得最多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間，毛確實在總體上減輕了“文化大革命”對黨的機構和社會的破壞性影響。毛試圖阻止武斗和人身迫害，在他簽發的許多中央指示中很明確，禁止拷打、搜查住所、搶劫、監禁和損壞個人財產。[[157]](#_157_You_Qi_Jian_Yu_1967Nian_6Yu)他批評擾亂群眾運動的宗派主義，要求革命委員會包融所有互相競爭的群眾組織的代表。毛不但反復強調干部中的大多數是好的，而且親自保護過許多高級官員免受攻擊，這些官員中最重要的是周恩來。[[158]](#_158_Wei_Te_Ke____Jiang_Qing_Ton)

問題是這些干預措施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和暴力方面并未取得完全成功。歸根到底，毛能夠重新控制這場運動的唯一辦法是完全否定這場運動。而毛拒絕這樣做。他從未放棄“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支持這場運動的理論或者這場運動反映出來的戰略。毛也從未拋棄要對許多暴力事件負責的助手。直到他生命終結，他繼續相信“文化大革命”是確保他死后中國沿著真正的革命道路前進的一場及時的、必要的和合適的運動。

#### 后果

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具有某種全對或全錯的特性。中國社會的重要部分徹底受影響，同時，同樣重要的其他國家部門幾乎沒有觸動。與此相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有些后果已證明是暫時的，而其他后果在未來幾十年里將繼續影響中國。

“文化大革命”對中國農村，對生活在那里的6.2億人口（60年代后期統計數）基本上沒有多大影響。靠近大中城市的為數不多的公社，尤其是那些城市所轄縣城郊區的公社例外。這些郊區確實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活動，比如農民參加公社和生產隊一級的奪權斗爭，以及在附近城市參加群眾抗議活動。理查德·鮑姆根據中國新聞通訊社的報道，在對中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詳細研究中證明，1966年7月至1968年12月之間有231個地方發生農村騷動。在這些騷動事件中，42％發生在郊區縣，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廣州周圍；另外22％發生在距大中城市50公里以內的地方。相比之下，不到15％的騷亂事件發生在距城市100公里以外的地方。當然，鮑姆的調查結果并不意味著只有231個公社直接參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他的統計資料確實啟發我們，“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階段除了對中國的主要城市外沒有多深的影響。這確實主要是一場城市運動。[[159]](#_159_Li_Cha_De__Bao_Mu___Nong_Cu)

如果說在“文化大革命”中農村只受到輕微的觸動，那么城市居民未受它影響的就只有極少數了，因為這場運動實際上在中國的每一所高中、每一個工廠、每一所大學、每一間辦公室和每一家商店里進行著。1980年，胡耀邦在接受南斯拉夫記者采訪時，估計有1億人——幾乎是城市人口的一半，實際上所有到了工作年齡的人——在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毛主義的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將少許一點夸張考慮在內，我們認為胡耀邦說的數字相當準確地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城市的總體影響。[[160]](#_160_1980Nian_6Yue_21Ri__Jian_Wa)

經濟上，“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階段中國遭受的損失驚人地小。1966年和1967年，谷物產量上升，1968年大幅度下降，但1969年又恢復到1966年的水平。1968年收成差可能部分與那一年的政治動蕩有關，但也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1968年的天氣比1967年的要壞得多。況且，次年谷物產量的迅速恢復表明，“文化大革命”對農業產量只存在有限的和暫時的影響。

在工業中，類似的情況是顯而易見的。1967年工業產量下降約13％，這是由于工廠和運輸線的正常工作遭到破壞造成的。結果，1967年和1968年國家收入、支出和國有企業的投資急劇下降。但是，工業經濟很快恢復。1969年的工業產量再次超過1966年的水平，次年，國家收入、支出和投資跟著上升。[[161]](#_161_Guan_Yu_Gong_Nong_Ye_Chan_Z)到1971年初，據西方估計，工業生產已完全恢復，恢復到60年代初期規劃的增長率水平。[[162]](#_162_Luo_Bo_Te__Mai_Ke_Er__Fei_E)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這個階段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范圍和持續時間上是有限的；這些影響肯定遠遠不如10年前“大躍進”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嚴重。但是，“文化大革命”對文化和教育事業的影響要大得多。[[163]](#_163_Guan_Yu__Wen_Hua_Da_Ge_Ming)中國的舞臺和銀幕除了在江青的支持下寫的一小部分“革命”影片、戲劇和芭蕾舞之外，停止上演任何藝術作品。傳統文學和外國文學作品不讓賣了，圖書館和博物館關閉了。1966年夏，大學停課，同年秋季，中學教育暫停，好讓學生們參加“文化大革命”。盡管次年春恢復了中學教育，但在隨后的四年里大學教室仍是一片漆黑。直到1970年夏，第一個大學生新班才招收新生，甚至這種做法也被限制在一小部分高等院校里。

從嚴格的課程角度來說，“文化大革命”初期對中國教育體制的危害只是溫和的。危害更大的是1969年以后實行的政策，使課程政治化，減少教育時間，要求過長的體力勞動，以及根據階級出身而不是學習上有無造就前途挑選學生。另一方面，許多文化和教育機構蒙受嚴重的物質損失。許多圖書館和博物館的收藏品遭到損害、破壞或失散。紅衛兵損害或破壞了大量歷史古跡、宗教建筑和文物。而軍隊被派往大學恢復秩序后，他們征用學校建筑物為己有。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后，這些后果中仍有許多沒有得到完全補救。

在文化和教育領域，“文化大革命”最嚴重的后果是對學者、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影響。關于1966—1969年間文化界遭受迫害和折磨的人數仍未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1980—1981年對“四人幫”的審判提供了一些可作為例證的資料。這次審判的起訴書說，文學和藝術界中有2600人、教育部下屬機構中有14.2萬名干部和教師、研究機構中有5.3萬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衛生部部屬的醫學院和研究機構中有500名教授和副教授“受到錯誤的指控和迫害”，其中有些人（具體數字不詳）被迫害致死。[[164]](#_164___Yi_Chang_Da_Shen_Pan)絕大多數人遭受本單位紅衛兵組織的折磨，有少數人成了江青個人的犧牲品。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經歷有損她的形象，她擔心這方面的資料會被她的對手泄露出去，于是組織幾個小組查抄上海作家和藝術家們的家，沒收有關她過去的信件和照片。

對黨和政府領導人的粗暴對待與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政治清洗率極高。在自治區和省一級，清洗率達70％—80％，6個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的4個、29個省委第一書記中的23個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在黨的中央機構里，清洗率約60％—70％，23名政治局委員中的9名、13名書記處成員中的4名以及167名中央委員中的54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于難，政治地位絲毫無損。在這場運動結束時，15名副總理和48名內閣部長中只有約半數的人仍留在國務院。[[165]](#_165_Guan_Yu_Qing_Xi_Lu__Jian_Be)

當然，在整個官僚機構中清洗率并不一樣。[[166]](#_166_Li_Cha_De__K_Di_Ao____Wen_H)關于“文化大革命”對組織機構影響的研究表明，某些職能領域（特別是農業、工業、規劃、文化和教育）的人員調整比例比其他領域（如國防、財政和貿易）的人員調整比例要高一些；職位愈高，愈有可能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這當然是預料之中的事；而有點諷刺意味的是，非黨員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損害比黨員干部受到的損害少。參照中國公布的數字，清洗涉及的干部人數參考中國說法進行粗略的估計，總共大約有300萬人，他們被列為修正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70年代后期，他們的名譽得以恢復。這個數字表明，在擁有1500萬至2000萬官員的官僚機構中，多達20％的官員被清洗。

“文化大革命”不像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和大屠殺。“文化大革命”的大多數受害者在這場運動中幸存下來，并在毛逝世和“四人幫”被打倒以后重新獲得政治地位。但是，中國官僚分子的經歷仍是不愉快的。許多人——可能多達300萬人——被送到通常位于農村地區的“五·七干校”，參加體力勞動，進行緊張的思想學習，并與附近的農民結成“緊密的聯系”。雖然有些干部，特別是那些比較年輕的，覺得這種經歷在若干方面有收獲，但對年齡較大的干部，尤其是那些留在干校與家庭分居兩地的干部來說，“五·七干校”確是長時間的身體煎熬。

其他官員經歷的命運比在“五·七干校”做定額工作悲慘多了。有些人被隔離在自己的工作單位里，經受嚴重的心理折磨，目的在于勸說他們“坦白” 自己政治上的瀆職行為，不知道有多少人遭受拷打和折磨。有些人被害死，有些人死于關押，其他人自殺。1967年劉少奇被軟禁在家中，這一年晚些時候，他遭到紅衛兵的毆打，1969年死于獄中。賀龍作為中國軍隊的一名元帥，被軟禁在家期間因營養不良而被送到醫院治療，而后死于葡萄糖注射引發的糖尿病酮酸中毒。[[167]](#_167_Dai_Wei__Bang_Na_Wei_Ya_De)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其他著名的高級官員包括：彭德懷和陶鑄，兩人都是政治局成員；兩位北京市黨委書記劉仁和鄧拓；吳晗，《海瑞罷官》一書的作者，同時是北京市副市長；上海市市長曹荻秋和副市長金仲華；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羅瑞卿，原參謀長，曾試圖自殺。

這些領導人的子女們也受到政治迫害和肉體折磨。有些人，如鄧小平的女兒，與其父母一起流放外地。其他人，如鄧的兒子，在紅衛兵手中折磨得終生殘廢。據說周恩來的一個養女遭到紅衛兵的折磨。而其他人因他們是官員的子女，常常受到尖銳的批判和凌辱。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死亡總數我們不得而知。在起訴“四人幫”時提到729511人，受到“四人幫”及其同伙的蓄意“陷害和迫害”，據說其中3.48萬人被迫害致死。這些人包括：河北近3000人，云南1.4萬人，內蒙古1.6萬人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1萬人。[[168]](#_168___Yi_Chang_Da_Shen_Pan)福克斯·巴特菲爾德根據一個消息靈通的中國人的估計，認為有40萬人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間。[[169]](#_169_Fu_Ke_Si__Ba_Te_Fei_Er_De)根據一些特殊省份如福建和廣東的死亡人數做出的推斷有些偏高，從70萬人至85萬人不等，這些數字是根據經受暴力和混亂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推斷出來的。有理由估計，1967年中國約1.35億城市人口中的約50萬人直接死于“文化大革命”。

除了剛才考慮的直接后果外，1966—1969年的事件也有長遠的影響。首先，紅衛兵歲月產生了支離破碎的領導和軟弱無力的政治機構的爆炸性結合。中央和省領導分成幾派：資深的黨的官員、解放軍軍區和主力部隊的指揮員、群眾代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上臺的低層干部。黨的權威出現了嚴重問題，取代了黨的革命委員會只被當作政府的臨時機構。“文化大革命”批倒了60年代初期的社會經濟政策和組織準則，但是，新的領導人在用什么取代它們的問題上又無統一意見。

在隨后的7年半時間里，權力分散形成的格局主宰了中國政治，直到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首先，文職領導人和軍隊領導人對軍隊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作用問題上存在著斗爭。林彪要使軍隊控制文官政治，并使其制度化的努力并不成功，1971年秋他墜死之后，努力使人民解放軍脫離文職事務的嘗試更為奏效。60年代后期還產生了關于“文化大革命”后的綱領的定義的斗爭，使得想恢復60年代初期政策的、更為保守的官員與希望對工農業和文化生活制定一整套更加平等和民粹派綱領的、激進的領導人相互對立。而在黨的九大選出的政治局里，權力分散十分明顯，此后，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官員（如鄧小平）、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家和組織者（如江青），結束“文化大革命”的軍人（如林彪）和“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來的中層干部（如華國鋒），為繼承毛澤東權力而不可避免地展開嚴重的斗爭。總之，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熱階段”帶來了七八年動蕩幅度較小的歲月，只有在1976年10月清洗“四人幫”和1978年12月鄧小平的改革綱領出現時，“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才被清除。

然而，1976年秩序的恢復以及1978年經濟政治改革的開始并不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最終消失。當中國進人80年代中期時，“文化大革命”兩個持續的后果顯著而廣泛地存在著。一個后果是根深蒂固的宗派主義，幾乎影響著每一個政府機關、工商企業和黨委。派系沖突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因奪權而產生，在組建革命委員會過程中因堅持要廣泛同意和具有代表性而保存下來，并在70年代中期因恢復“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譽又得到加強。派系沖突嚴重削弱了政治機構的效能，因為決策和人事任命都成了派系利益的俘虜。

另一個后果是，60年代后期的事件在中國的年輕人中產生了嚴重的信任危機。由于400多萬高中和大學學生——他們中有許多人原是紅衛兵——在1968年和1969年被安置到農村，正常的學校教育中止了，這意味著他們的前途發生急劇而常常是破壞性的變化。盡管到70年代末，幾乎所有人都回到他們的家中，但是，大多數人無法完成教育這一事實意味著他們的職業道路和生活機遇變得更糟了。如此災難深重的事件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發動的，這個事實損害了他們對意識形態的信仰；“文化大革命”削弱了他們對現存政治制度的信心，而黨對此又無能為力。

幻想破滅的過程在不同的時間里發生在不同的青年身上。對有些人來說，轉折點是“一月風暴”后限制和解散紅衛兵，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那些一度被告知自己是領導這場運動的人，現在成了這場運動的替罪羊。對其他人來說，關鍵事件是在1966—1967年“大串聯”期間或在隨后幾個月的上山下鄉期間發現中國農村是何等貧窮。有一名原紅衛兵經歷過這些后覺醒，1967年他逃到香港后，在與美國學者的交談中，發泄他的憤怒和失望，他是代表整整一代人說下述這番話的。

我無法描述對（1967年）3月以來事態發展方向的憤怒。那些兔崽子們（解放軍及他所在中學里的軍訓排）把我們全都扔出窗外……在進行一場真正的革命時，我們確實成功地奪取了權力。現在，這些雜種們把權力全部拋棄了。

[我在農村的生活時期]是另一次擴大眼界的經歷。[農民們]無休止地抱怨他們的艱苦生活。他們說，即使在好年成也只有極少的糧食可吃……他們感到，甚至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時代也比這好些，那時人們能勞動，節省些錢，用于投資，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們也喜歡劉少奇勝過喜歡毛，因為他們把劉少奇和小塊私有地聯系在一起，小塊私有地給了他們節儉的機會，并走上成功發跡的階梯……我以為只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才會有這種想法。但我恰恰是從一位革命的貧苦農民口中聽到這些話的，他為黨工作了20多年。……在短短的10天中，在農民生活和態度的現實面前，我對我的世界觀產生了懷疑。[[170]](#_170_Bei_Nei_Te___Meng_Ta_Po_Tu)

各人幻想破滅的后果也不相同。對一些年輕人來說，他們是中國所謂“失落的一代”，其后果是政治上的憤世嫉俗、工作中的消極被動和缺乏創造性以及不斷增加的物質主義和對財富的渴望。人們普遍認為，70年代后期犯罪和反社會活動的增多要歸因于年輕人中間的這種信任危機以及與之相結合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法制的松弛。對其他人，尤其是那些1966年前受過一些大學教育的人來說，在農村的時光提供了讀書、思考和討論國家前途的機會。以后，這些原紅衛兵中有許多人構成一群較年輕的知識分子，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他們幫助制定后毛澤東時代經濟改革的總體綱領和具體政策。

到了80年代后期，這話說來有點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事實上卻是后毛澤東時代改革的一個重要條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么多老干部遭受如此沉重的折磨而仍然活下來，一俟這場運動結束，這個事實對創建經濟和政治解放的領導層頗有幫助。紅衛兵運動期間成千上萬知識青年和知識分子幻想的破滅，促進許多激進主張的誕生，這些主張日后轉變成了具體的改革。而以防修名義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共產黨遭到嚴重削弱，黨想抵制政治和經濟秩序的建立也力不從心了。這種秩序遠比毛在蘇聯看到的、他本人堅決反對的那種秩序更甚。總之，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后毛澤東時代的改革不可能走得這么遠或進行得這么快。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長遠影響仍不明確。我們還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否會成為將來發生類似事件的先例，抑或會使中國對這類事件產生免疫能力。當然，從80年代的情況來看，“文化大革命”所打的預防針效果似乎較大。紅衛兵造成的損失（又沒有任何可彌補此損失的成就）警告人們不能很快再發動類似“開門”整風的事件。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記憶有可能變得模糊，回顧“文化大革命”時會覺得它比現在更崇高和更受人尊敬。如果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仍可能作為中國另一場政治權力斗爭，或者通過發動群眾清除國家的不平等、腐敗和精英統治的另一個嘗試的范例。問題是后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是否能充分使政治制度化、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文化現代化，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即使“文化大革命”打的預防針效果逐漸減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沒有什么吸引力。

[[1]](#_1_1)倫納德·賓德等編：《政治發展的過程與危機》。

[[2]](#_2_1)有關毛與他的同事們在60年代初的沖突，參見安炳炯《中國的政治與文化革命：政策進程的動力》；哈里·哈丁：《組織中國：官僚問題（1949—1976）》第7章；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躍進”（1958—1960）》；肯尼思·利伯撒爾撰寫的《劍橋中國史》第14卷中的章節。

[[3]](#_3_1)杰羅姆·陳編：《毛澤東的文章與目錄》，第40頁。

[[4]](#_4_1)帕里斯·H.張：《中國的權力和政策》（修訂本），第131頁。

[[5]](#_5_1)斯圖爾特·施拉姆編：《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93—195頁。

[[6]](#_6_1)杰羅姆·陳編：《毛澤東的文章與目錄》，第102頁。

[[7]](#_7_1)《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編輯部：“一個歷史性的偉大文件”，1967年5月18日，《北京周報》1967年5月19日，第10—12頁；《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沿著十月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1967年11月6日，《北京周報》1967年11月10日，第9—11頁。最近出版的材料說明，后一篇文章是在陳伯達與姚文元的監督下起草的，見孫敦璠編：《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下冊，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頁。

[[8]](#_8_1)關于人民解放軍在60年代初期的情況，見約翰·吉廷斯：“中國軍隊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載《太平洋事務》第39卷第3—4期（1966—1967年秋季號和冬季號），第269—289頁；約翰·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12章；埃里斯·喬菲：“林彪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政治干預的前奏”，載約翰·M.H.林德貝克編《中國：一個革命社會的管理》，第343—374頁；埃里斯·喬菲：《黨與軍隊：中國軍官的職業化與政治控制（1949—1964）》。

[[9]](#_9_1)關于向人民解放軍學習的運動，見安《中國政治》第6章；約翰·吉廷斯：“‘向解放軍學習’運動”，載于《中國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哈丁：《組織中國》，第217—223頁；拉爾夫·L.鮑威爾：“經濟中的政委：中國的向解放軍學習運動”，載《亞洲概覽》第5卷第3期（1965年3月），第125—138頁。

[[10]](#_10_1)北京國際廣播電臺（1967年12月16日）引自約翰·吉廷斯：“從‘文化大革命’看黨與軍隊的關系”，載約翰·威爾遜·劉易斯編《中國黨的領導與革命力量》，第395頁。

[[11]](#_11_1)肯尼思·利伯撒爾：《中共中央和政府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第238—239頁。

[[12]](#_12_1)高英茂編：《林彪事件：權力政治和軍事政變》，第321—322頁。

[[13]](#_13_1)羅斯·特里爾：《白骨精：毛澤東夫人傳》，第154頁。

[[14]](#_14_1)關于江青在此時期的作用及其與激進知識分子的關系，見默爾·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建議和異議》第3章；羅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21—322頁。

[[15]](#_15_1)上海的與北京的之間的區別，參見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3章。

[[16]](#_16_1)洛厄爾·迪特默：“中國政治中的權力基礎：‘四人幫’垮臺的理論和分析”，載《世界政治》第31卷第1期（1978年10月），第42頁。

[[17]](#_17_1)關于60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見約翰·加德納：“知識青年與城鄉差別（1958—1966）”；約翰·威爾遜·劉易斯編：“共產黨中國的城市”，第235—286頁；唐納德· J.芒羅：“共產黨中國的平均主義思想與教育真相”，林德貝克：《中國》，256—301頁。

[[18]](#_18_1)中國學生的分類參照李洪勇（音）：《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個案研究》；史坦利·羅森：《紅衛兵派性與廣州的“文化大革命”》。

[[19]](#_19_1)李洪勇（音）：《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29—139頁。

[[20]](#_20_1)馬克·J.布里奇、戈登·懷特：《當代中國的微型政治：對一技術單位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情況的分析》。

[[21]](#_21_1)有關羅瑞卿的情況，參見哈里·哈丁、梅爾文·格托夫《清洗羅瑞卿：中國戰略計劃中的政治斗爭》；邁克爾·亞胡達：“蘇聯政策研究和中國的戰略爭論（1965—1966）”，載《中國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32—75頁。

[[22]](#_22_1)哈丁、格托夫：《清洗羅瑞卿》，第10頁。

[[23]](#_23_1)羅瑞卿：“紀念戰勝德國法西斯，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北京周報》第20期（1965年5月14日），第7—15頁。

[[24]](#_24_1)羅瑞卿：“人民戰勝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戰勝美帝國主義”，《當代背景材料》第770期（1965年9月14日），第1—20頁。

[[25]](#_25_1)見前引書；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26]](#_26_1)關于羅的命運，見安《中國政治》，第203—204頁；利伯撒爾：《研究指南》，第248—249頁。

[[27]](#_27_1)關于吳晗事件，見安《中國政治》，第195—213頁；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5章；杰克·格雷、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危機中的中國共產主義：毛主義與“文化大革命”》第4章；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章；詹姆斯·R.普西：《吳晗：借古諷今》。

[[28]](#_28_1)“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5年9月一1966年12月）”，《聯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2期，第349頁；《共產黨中國譯文集：政治和社會學情報》（1967年8月25日），第3頁。

[[29]](#_29_1)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匯報》1965年11月10日。

[[30]](#_30_1)“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見《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年）》，第7—12頁。

[[31]](#_31_1)“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北京周報》第10卷第23期（1967年6月2日），第10—16頁。

[[32]](#_32_1)《毛澤東思想雜錄》第2卷，第382頁。

[[33]](#_33_1)安：《中國政治》，第207頁。

[[34]](#_34_1)利伯撒爾：《研究指南》，第246—247頁；《大事記》，第10—11頁。

[[35]](#_35_1)利伯撒爾：《研究指南》，第248—249頁；高：《林彪》，第326—345頁；《人民日報》1978年5月18日，見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78年5月24日，E2—11。

[[36]](#_36_1)“中共中央通知”，《“文化大革命”文件集》，《當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2—6頁。關于江青的作用，見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20頁。

[[37]](#_37_1)孫敦璠：《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下冊，第247頁。

[[38]](#_38_1)北大的事件見《紅旗》第19期（1980年10月），第32—36頁。

[[39]](#_39_1)關于“五十天”，見安《中國政治》第9章；瓊·多比爾：《中國“文化大革命”史》第1章；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群眾批評的政治》，第78—94頁；哈丁：《組織中國》，第225—229頁。

[[40]](#_40_1)孫敦璠：《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下冊，第250頁。

[[41]](#_41_1)合肥電臺1966年7月16日消息。

[[42]](#_42_1)“大事記”，第25頁。

[[43]](#_43_1)安：《中國政治》，第218頁。

[[44]](#_44_1)“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見安《中國政治》第5章；理查德·鮑姆：《革命的序幕：毛、黨和農民問題（1962—1966）》；哈丁：《組織中國》第7章。

[[45]](#_45_1)“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28期（1966年10—12月），第149—152頁。

[[46]](#_46_1)陳：《毛澤東的文章與目錄》，第26—30頁。

[[47]](#_47_1)孫敦璠：《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下冊，第250頁。

[[48]](#_48_1)利伯撒爾：《研究指南》，第255—257頁。

[[49]](#_49_1)《毛澤東思想雜錄》第2卷，第457—458頁。

[[50]](#_50_1)孫敦璠：《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下冊，第251頁。

[[51]](#_51_1)《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52]](#_52_1)《人民日報》1986年1月5日；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86年1月24日，第12—22頁。

[[53]](#_53_1)陳：《毛澤東的文章與目錄》，第117頁。

[[54]](#_54_1)“關于這兩種組織形式的相互影響”，參見哈丁《組織中國》第8章。

[[55]](#_55_1)孫敦璠：《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下冊，第254頁。

[[56]](#_56_1)《中國大陸雜志選》第566期（1967年3月6日），第12—20頁。

[[57]](#_57_1)對紅衛兵暴力的描述，見戈登·A.貝內特、羅納德·蒙塔珀圖《紅衛兵：戴小艾政治傳記》；肯林：《上天的報應：一個中國年輕人的日記》；《紅旗》1980年10月19日，第32—36頁。

[[58]](#_58_1)關于紅衛兵運動內部的分化，見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羅森：《紅衛兵的派性》；安尼塔·詹：“中國社會結構的反映：廣州學生變化中的看法”，載《世界政治》第34卷第3期（1982年3月），第295—323頁。

[[59]](#_59_1)“中國社會結構的反應”表2，第314頁。

[[60]](#_60_1)高英茂：《林彪》，第346—350頁。

[[61]](#_61_1)迪特默：《劉少奇》，第132頁。

[[62]](#_62_1)關于黨的官員對紅衛兵運動的反應，見帕里斯·H.張：“省級黨的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存策略”，載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英》，第501—539頁；理查德·鮑姆：“困難條件下的精英行為：‘文化大革命’中的‘擋箭牌’教訓”，載斯卡拉皮諾編：《精英》，第540—574頁。

[[63]](#_63_1)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5頁。

[[64]](#_64_1)利伯撒爾：《研究指南》，第259—262頁。這幾個日期與利伯撒爾說的不一樣，是孫敦璠的說法，見《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下冊，第255頁。

[[65]](#_65_1)陳：《毛澤東的文章與目錄》，第40—45頁；杰羅姆·陳編：《毛澤東》，第91—97頁。

[[66]](#_66_1)孫敦璠：《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下冊，第255頁。

[[67]](#_67_1)關于十月工作會議以后的事件，見多比爾《“文化大革命”史》第3章；迪特默：《劉少奇》第5章；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18—129頁。“文革”升級也反映在這一時期發布的中央指示中，見“文件匯編”。

[[68]](#_68_1)《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審判：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1980年11月—1981年1月）》，第35頁。

[[69]](#_69_1)這一時期上海事件的材料可見尼爾·亨特《上海日記：“文化大革命” 目擊記》；安德魯·G.沃爾德：《張春橋和上海一月風暴》。

[[70]](#_70_1)沃爾德：《張春橋》，第36頁。

[[71]](#_71_1)有關毛澤東的思想傾向的論述，見S.施拉姆：“從‘人民群眾的大聯合’到‘大聯盟’”，載《中國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88—105頁。

[[72]](#_72_1)有關上海事件的論述，見沃爾德《張春橋》第7章。

[[73]](#_73_1)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見《北京周報》1967年1月27日，第7—9頁。

[[74]](#_74_1)“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關于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1967年1月23日，載“文件匯編”，第49—50頁。

[[75]](#_75_1)菲利普·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奪權斗爭”，載《中國季刊》第34期（1968年4—6月），第7頁。

[[76]](#_76_1)《紅旗》第3期（1967年2月1日），出自《聯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0期，第86頁；譯自《紅旗》（1967年3月1日），第12—21頁。

[[77]](#_77_1)弗拉基米爾·伊·列寧：“國家與革命”；亨利·M.克里斯曼編：《列寧的主要著作》，第290頁。

[[78]](#_78_1)《紅旗》第4期（1966年2月15日），見《聯合出版物研究署》第35期，第137頁，譯自《紅旗》（1966年4月21日），第5—22頁；《決定》摘要見第9頁。關于這一時期巴黎公社模式的使用見約翰·布賴恩·斯塔爾：“回顧革命：中國人眼中的巴黎公社”，載《中國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106—125頁。

[[79]](#_79_1)沃爾德：《張春橋》，第61頁。

[[80]](#_80_1)關于毛的評論，見《毛澤東思想雜錄》第2卷，第451 455頁；《聯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期，第826頁；《有關共產黨中國的譯文集》（1970年2月12日），第44—45頁。

[[81]](#_81_1)“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對奪取政權的宣傳和報道問題的通知”，1967年2月19日，“文件匯編”，第89頁；陳：《毛澤東的文章與目錄》，第136—137頁。

[[82]](#_82_1)哈丁：《組織中國》，第253頁。

[[83]](#_83_1)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論述，見托馬斯·W.魯賓遜：“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載托馬斯·W.魯賓遜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第165—312頁。

[[84]](#_84_1)孫敦璠：《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下冊，第260—261頁。

[[85]](#_85_1)同上書，第271頁。

[[86]](#_86_1)《大審判》一書中這類事例到處可見。

[[87]](#_87_1)《火車頭》1967年2月7日，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3898期（1967年3月14日），第4—7頁。

[[88]](#_88_1)軍隊介入不斷升級可追溯到中央的指示，見“文件匯編”。

[[89]](#_89_1)埃德加·斯諾：《漫長的革命》，第123頁。

[[90]](#_90_1)見于爾根·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和軍隊”，載《亞洲概覽》第8卷第5期（1968年5月），第349—363頁；于爾根·多姆斯：“軍隊在革命委員會成立過程中的作用（1967—1968）”，載《中國季刊》第44期（1970年10—12月 ），第112—145頁；哈維·W.內爾森：“‘文化大革命’中的軍事力量”，載《中國季刊》第51期（1972年7—9月），第444—474頁；內爾森：“‘文化大革命’中的軍隊官僚”，載《亞洲概覽》第14卷第4期（1974年4月），第372—395頁。

[[91]](#_91_1)多姆斯：“軍隊在革命委員會成立過程中的作用”。

[[92]](#_92_1)對中國軍事政治中野戰軍作用的分析，常見的參考書有：威廉·W.惠策恩、黃震遐：《中國的高級指揮：共產黨軍事政治史（1927—1971）》；也見錢玉生（音）：《衰退的中國革命：軍隊中的不同意見與軍隊的分化（1967—1968）》；威廉·L.帕里什：“中國軍隊政治中的派系”，載《中國季刊》第56期（1973年10—12月），第667—669頁。

[[93]](#_93_1)《一場大審判》，第82—89頁。

[[94]](#_94_1)陳：《毛澤東的文章與目錄》，第45頁。

[[95]](#_95_1)《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6卷第2期（1973年夏季號），第96—99頁。

[[96]](#_96_1)《毛澤東思想雜錄》第2卷，第451—455頁；《聯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卷，第826頁；《有關共產黨中國的譯文集》（1970年2月12日），第44—45頁。

[[97]](#_97_1)《文件集》，第19—20、21頁；《大審判》，第160、164頁。

[[98]](#_98_1)《聯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卷第826期；《有關共產黨中國的譯文集》（1970年2月12日），第22頁。

[[99]](#_99_1)《文件集》，第54—55頁；也見迪特默《劉少奇》，第152—153頁。

[[100]](#_100_1)《文件集》，第56、61、66、71—72、78—79、89頁。

[[101]](#_101_1)同上書，第84頁。

[[102]](#_102_1)同上書，第72、82、83、85、87—88頁。

[[103]](#_103_1)“二月逆流”的敘述來源于1979年2月26日《人民日報》，見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79年2月28日，E7—20；1984年10月21和22日《新華日報》中聶榮臻回憶，見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84年1月6日，K 21—24；也見李《文化革命的政治》第6章；多比爾：《“文化大革命”史》第5章。

[[104]](#_104_1)多比爾：《“文化大革命”史》，第220頁。

[[105]](#_105_1)對“武漢事件”的敘述根據陳再道的“武漢‘7·20事件’始末”，見《革命史資料》第2期（1981年9月），第7—45頁；和托馬斯·W.魯賓遜：“武漢事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地方沖突和省級官員的造反”，載《中國季刊》第47期（1971年7—9月），第413—438頁。

[[106]](#_106_1)《文件集》，第111—112、15—116頁。

[[107]](#_107_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增刊）》第198期（1967年8月），第8頁。

[[108]](#_108_1)有關這一時期外交部的斗爭，參見梅爾文·格托夫：“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務”，魯賓遜：《“文化大革命 ”》，第313—366頁。

[[109]](#_109_1)關于這一時期重新復活的激進主義浪潮，見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章，以及多比爾《“文化大革命”史》第8章。

[[110]](#_110_1)《紅旗》第12期（1967年8月），第43—47頁。

[[111]](#_111_1)多比爾：《“文化大革命”史》，第207頁。

[[112]](#_112_1)有關“五·一六”兵團垮臺的情況，請看《當代背景材料》第844期（1968年1月10日）；巴里·伯頓：“‘文化大革命’的極‘左’陰謀：‘五·一六’兵團”，載《亞洲概覽》第11卷第11期（1971年11月），第1029—1053頁。

[[113]](#_113_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4026期（1967年9月22日），第1—2頁。

[[114]](#_114_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4069期（1967年11月29日），第1—9頁。

[[115]](#_115_1)解除楊成武職務的材料是由事件的參加者包括那些與林彪親近的人提供的。參考：《林彪》，第488—500頁，在《新華日報》（1984年10月9—10日）和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84年11月5日聶榮臻的文章（第18—21頁），以及在《北京晚報》1985年4月12日及1985年5月1日的傅崇碧的文章（第9—10頁）。也見哈維·W.內爾森：《中國的軍事體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織研究》，第97—101頁。

[[116]](#_116_1)孫敦璠等編：《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下冊，第270—271頁。

[[117]](#_117_1)《毛澤東思想雜錄》第2卷，第470頁。

[[118]](#_118_1)陳：《毛澤東的文章與目錄》，第105頁。

[[119]](#_119_1)《北京周報》第11卷第35期（1968年8月30日），第3—6頁。

[[120]](#_120_1)托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鄉：中國青年從城市走向農村》，第57—58頁。

[[121]](#_121_1)關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機構變遷的敘述和估價，見哈丁《組織中國》第8—9章。

[[122]](#_122_1)《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1期（1969年春季號），第3—12頁。

[[123]](#_123_1)內爾森：《中國的軍事體制》，第83頁。

[[124]](#_124_1)菲利浦·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鞏固權力的斗爭”，載《中國季刊》第41期（1970年1—3月），第5頁。

[[125]](#_125_1)《解放軍報》1968年1月28日；《北京周報》1968年2月2日，第8—9頁。

[[126]](#_126_1)弗雷德里克·C.泰維斯：《中國的省級領導層：“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第27、29頁。

[[127]](#_127_1)這些數據出自理查德·鮑姆的“中國：醋泡黃瓜的年月”，《亞洲概覽》第9卷第1期（1969年1月），第1—17頁。

[[128]](#_128_1)《毛澤東思想雜錄》第2卷，第453—454頁。在共產黨的歷史中，在民主革命時期“一貫道”是一個反動的秘密會社。

[[129]](#_129_1)《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69年春季號）第2卷第1期，第3—12頁。

[[130]](#_130_1)關于姚的報告和隨后的兩個黨的文件，見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296—301頁。

[[131]](#_131_1)有關十二中全會的參加者，見胡耀邦：“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載《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頁；鄧小平：“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274頁。

[[132]](#_132_1)十二中全會公報，見《北京周報》第11卷第44期（1968年11月1日），附錄，第5 8頁。

[[133]](#_133_1)黨章草案的文本見聯合研究所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文件》（1956年9月至1969年4月），第235—242頁。

[[134]](#_134_1)指控劉少奇的題目為“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見聯合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文件》，第243—250頁。

[[135]](#_135_1)關于十二中全會這些方面的情況，見孫敦璠《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下冊，第274頁；聶榮臻的回憶見《新華日報》1984年10月23日，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84年11月7日，第20—21頁。

[[136]](#_136_1)林彪的報告見《北京周報》第12卷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16—35頁。關于該報告的起草有不同說法。周恩來在1973年的十大報告上說，由林彪、陳伯達起草的初稿“被中央委員會否定”。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最近，胡耀邦聲稱，這個報告是由康生和張春橋起草的。胡耀邦：“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第57頁。

[[137]](#_137_1)1969年黨章見《北京周報》第12卷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6—39頁。1956年黨章，聯合研究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文件》，第1—30頁。

[[138]](#_138_1)關于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以及與上一屆中央委員會成分的比較分析，戈登·A.貝內特：《中國的第八、九、十次黨代會、黨章和中央委員會：黨章縱覽及比較分析》；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中共領導層的變化：第八、九屆中央委員會比較”，斯卡拉皮諾：《精英》，第67—148頁。

[[139]](#_139_1)這些引言源自林彪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見《北京周報》第12卷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21頁。

[[140]](#_140_1)《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51—52頁。

[[141]](#_141_1)《北京周報》1979年10月5日，第15、18、19頁。

[[142]](#_142_1)《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81年7月1日，第14頁。

[[143]](#_143_1)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載《威爾遜季刊》第4卷第4頁（1980年秋季號），第132—141頁。

[[144]](#_144_1)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來自中國的蔑視：中國研究的新趨勢”，《亞洲概覽》第22卷第10期（1982年10月），第934—958頁。

[[145]](#_145_1)邵華澤：“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幾個問題”，見全國黨史資料工作會議和紀念中國共產黨60周年學術討論會秘書處編《黨史會議報告集》，第353頁。

[[146]](#_146_1)邵華澤：“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幾個問題”，見全國黨史資料工作會議和紀念中國共產黨60周年學術討論會秘書處編《黨史會議報告集》，第356頁。

[[147]](#_147_1)毛的話引自斯諾《漫長的革命》，第221—222頁。

[[148]](#_148_1)S.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修訂版），第370頁。

[[149]](#_149_1)斯諾：《漫長的革命》，第223頁。

[[150]](#_150_1)弗雷德里克·C.泰維斯：《中國的領導人、合法性和沖突：從有超凡魅力的毛到繼承政治》第3章。

[[151]](#_151_1)梁恒、朱迪思·夏皮羅：《文革之子》，第47頁。

[[152]](#_152_1)《人民日報》1984年8月29日，見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84年8月31日，第1—4頁。

[[153]](#_153_1)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見《鄧小平文選》，第329—330頁。

[[154]](#_154_1)利伯撒爾：《研究指南》，第243、249頁。

[[155]](#_155_1)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見中共黨史研究會編的《學習歷史決議專輯》，第159—160頁；邵華澤：“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幾個問題”，第378頁。

[[156]](#_156_1)鄧力群：“學習《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問題和回答。”

[[157]](#_157_1)尤其見于1967年6月6日指示，禁止“打、砸、搶、抄、抓”，見《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集》，第463—464頁。近來中國的解釋把這個指示歸功于毛本人，見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164頁。

[[158]](#_158_1)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63頁。

[[159]](#_159_1)理查德·鮑姆：“農村的‘文化大革命’；剖析一種有限的造反”，見魯賓遜《“文化大革命”》，第367—476頁。

[[160]](#_160_1)1980年6月21日，見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80年6月23日，西方有些解釋錯誤地把這1億受害者的責任只歸于“文化大革命”，見《華盛頓郵報》1980年6月8日。

[[161]](#_161_1)關于工農業產值的統計數字引自（小）阿瑟·G.阿什布魯克：“中國：經濟現代化和長期成績”，見（第97屆）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四個現代化下的中國》第1卷，第104頁。關于國家收、支出和投資的統計數據來自1984年3月19日《北京周報》，第27—28頁。

[[162]](#_162_1)羅伯特·邁克爾·菲爾德、凱思林·M.麥克格林、威廉·B.阿布尼特：“中國的政治斗爭與工業增長（1965—1977）”，見（第95屆）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毛以后的中國經濟》第1卷，第239—283頁。

[[163]](#_163_1)關于“文化大革命”對教育制度的影響的討論，引自瑪麗安·巴斯蒂：“‘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經濟困難和教育改革中的政治理想”，載《中國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16—45頁。

[[164]](#_164_1)《一場大審判》，第182、183頁。

[[165]](#_165_1)關于清洗率，見貝內特《中共第八、九和第十屆黨代表大會、黨章和中央委員會》，唐納德·W.克萊因、洛伊斯·B.黑格：“第九屆中央委員會”，載《中國季刊》第45期（1971年1—3月），第37—56頁；斯卡拉皮諾：“中共領導層的變化”；泰維斯：《中國的省級領導層》。

[[166]](#_166_1)理查德·K.迪奧：“‘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經濟界杰出人物的影響”，載《中國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65—87頁。

[[167]](#_167_1)戴維·邦納維亞的《北京裁決：審判“四人幫”》一書中此類材料隨處可見。

[[168]](#_168_1)《一場大審判》，第21頁。

[[169]](#_169_1)福克斯·巴特菲爾德：《中國：在苦海中生存》，第348頁。

[[170]](#_170_1)貝內特、蒙塔珀圖：《紅衛兵》，第214—217、222—224頁。

## 第三章 中蘇對抗：中國北部邊疆地區的戰爭與外交

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躍期”（直到1969年），中國由于被內部動亂耗盡了國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意采取了低姿態。“文化大革命”的外交政策是盡可能減少外事。中國故意在外交上孤立自己，把外國人擋在國門之外，降低與其他國家貿易往來的規模，避開一切國際性組織，用毛主義的華麗辭藻代替切合實際的政策手段。一時之間，中國不再是全球政治甚至不是亞洲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一員了。

然而，對這一簡短時期的研究，可以清楚說明中國外交政策的幾個事實真相。其中之一是，中國的內部發展與國際環境的互相依賴和互相滲透。[[1]](#_1_Zhe_Ge_Guan_Dian_Lai_Yuan_Yu)雖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人幾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內部事務上，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也有部分國際因素，它的發起時間因中國之外的事態發展而被推遲，其影響不但被中國的鄰國直接感受到了，而且被離北京非常遙遠的國家和外交部門強烈地感受到了，它的方向因1969年及1969年以后的戰爭威脅而突然發生了轉變。

另一個事實是，中國的內政和國際活動深受美蘇兩國的政策和行動的影響。美國對越南的干涉，在1965年曾引起中國領導層戰略性的爭論。這場爭論促使領導層分裂成支持和反對“文化大革命”路線的兩派；1968年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引起了中國領導人對蘇聯沿中國邊界集結軍事力量的恐慌，并促成了次年初中國軍隊乘蘇聯人不備對珍寶島的襲擊。俄國人出人意料的強烈反應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活躍期”的結束。

第三個事實是，“文化大革命”影響了中國高級官員的命運。他們中的許多人自愿或被迫地對外交政策問題發表意見，僅僅是為了有效地參加各派之間緊張激烈的斗爭——這是整個60年代中國政治的特點。因此，一旦清洗階段來臨，他們就使自己易受毛主義者和紅衛兵的攻擊。

同樣重要的一點是，“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和中國領導人因此在外交方面面臨的困境成了一面鏡子，這面鏡子對隨后十多年中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更為重大的影響。不但北京向世界的全面開放——除外交外，還有經濟和體制方面——是從“文化大革命”的極端政策中向后退的結果，而且中國與美國的和解（這是70年代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礎）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決策所促成的。因此，盡管這個時期對過去和未來外交政策的連續性而言是個例外，但對隨后發生的事情來說，它又是一個新的起點。[[2]](#_2_Can_Yue_Qiao_Na_Sen__Bo_La_Ke)

最后一點，我們對“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的外交政策現可重新做出評價。研究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比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的要更積極，參與得更多。中國不但在中蘇邊界采取了許多行動（這些行動是在中國首都經過深思熟慮以后決定的），并一直與美國保持接觸（討論越南和大三角戰略政治等問題），而且還繼續進行著進出口貿易、對外援助及接待高層次來訪者的工作，雖然其規模已大為減小。中國自我孤立的時期很短。此外，還有“文化大革命”時期暴力活動和狂熱的思想意識向外蔓延，對世界的影響。香港爆發大規模騷亂，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緬甸和柬埔寨在紅衛兵于兩國首都引發暴力活動后改變了對華政策。對蘇聯駐北京使館的圍攻，直接針對撤離使館的俄國外交人員家屬的民眾暴力活動，以及中國紅衛兵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反對蘇聯的滑稽舉動，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宮的強烈反感。蘇聯雖然暫時保持了克制態度，但從1969年以后，這些事件造成了其在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激烈反應——使此類事件“不再重演”。

不過，總的說來，“文化大革命”“活躍期”的外交政策似乎并不像開始時表現得那樣異常。事實上，它與1965年以前及1969年以后北京奉行的外交政策總體上是一致的，是由同樣復雜的各種決定性因素造成的。其基本準則和“能動變量”是相同的。本章認為，雖然在國際社會中幾乎消失，但實際上中國對它眾所周知的國內外雙重壓力仍一一作出反應。

就國內而言，這些壓力有三種形式：[[3]](#_3_Zhe_Yi_Guan_Dian_Chu_Zi_Bi_Zh)政治、人的個性及二者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影響；中國古往今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以前的形成和發展時期的“教訓”；以及意識形態（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中國人的世界觀）的影響。

國際壓力也有三種形式：美國和蘇聯——唯有這兩個國家對北京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的政策；全球國際體系（政治、經濟和安全）的總格局、亞洲地區體系的狀況及二者各自正在使用的“控制規則”；與其他有關國家的利益和中國國力的增長相關的中國國家利益的復雜性。“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外交政策表明，當中國共產黨決定冒險違背本國政策和國際慣例的一些基本準則時，它付出了多么大的代價。

## “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

我們的研究是在粗線條的年代順序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分析。首先，我們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研究“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把意識形態方面的修正主義概念從中蘇關系向中國國內的政治和社會經濟領域的擴展（特別是在毛澤東的頭腦中）；由于美國對越南的軍事干涉和中國領導層關于如何對此作出適當反應的爭論，使“文化大革命”的發起時間推遲；這些事件與外交政策中的其他爭議問題對中共高層領導人之間的私人關系的影響。每一個方面都是國際和國內因素復雜混合在一起的最好例證。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批評克里姆林宮對斯大林問題的處理開始，到毛澤東得出中國也和蘇聯一樣，正在走意識形態上的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之路的結論為止，其間的道路既漫長又曲折，但也是清晰可辨的。[[4]](#_4_1956__1964Nian_Jian_Zhong_Su)毛認為，蘇聯外交政策走上了這樣的歧途——對美國實行和平共處、冒險主義和投降主義和對中國奉行沙文主義、分裂主義和全面敵視——其原因是以赫魯曉夫及其繼任者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聯領導集團，蓄意違背了真正的列寧主義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蘇聯復辟了資本主義。60年代初，中國在九篇論戰文章中把上述問題都明確地列為克里姆林宮的罪行。[[5]](#_5_You_Ren_Zhong_Yin_Le_Qi_Zhong)

如果不是毛澤東對共產黨執政后社會主義的發展問題得出邏輯上的和經驗主義的結論的話，中蘇之間的論爭會是純粹的外交政策問題。按照毛的邏輯，蘇聯一貫犯如此重大的錯誤，必定有其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的實質性原因。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犯這樣的錯誤，所以，蘇聯已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并已逐步復辟了資本主義。蘇聯共產黨因而是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資產階級團體，具有以壟斷國家財產為表現形式的政治集團和帝國主義的階級的所有特征。由于蘇聯在列寧和斯大林時期是社會主義，又由于個人不可能把莫斯科引向資本主義，所以，蘇聯倒退的原因必定是，在工業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以及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和社會的上層建筑（即俄國的過去）對經濟基礎的重大影響。由于蘇聯是第一個因而也是最老的社會主義國家，修正主義就有機會在那里泛濫。若果真如此，則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就有可能發生同樣的倒退，其表現特征在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雖然其程度要淺得多。具體來說，修正主義的跡象在中國也該顯現出來了，因為到60年代，中國共產黨已執政十多年了。

毛澤東一直是個信奉實驗社會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完成上述邏輯推理（其證據在他的著作及在他指導下完成的中央文件中隨處可見）后，[[6]](#_6_Yi_Wen_Jian___Mao_Ze_Dong_Si)即轉入經驗主義的領域以求得證實。他自然找到了要找的東西，并確信他的同事們——他們負有發展地域廣闊且地區差別很大的國家的重任，而運用的是極不完善的社會主義組織方法——平時的行政方面的、官僚主義的及思想意識的行為就是修正主義的一種表現，因此，他們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即是說，毛認為中國國內存在著修正主義。我們可以從他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黨的幾乎所有領導人（他的妻子江青、林彪以及其他少數幾個除外）的行為的日益不滿中，追尋出他的這種看法的軌跡來。[[7]](#_7_Guan_Yu_Zhe_Ge_Shi_Qi_De_Quan)

1965年初，毛斷定只有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清洗才能拯救中國和中國共產黨，而且發動得越早越好，以免黨內的資本主義勢力變得過于強大。毛確曾準備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擴大成為“文化大革命”。[[8]](#_8_Zhang_Xu_Cheng____Zhong_Guo_D)為此，尋找個人的或階級的盟友、確認國際形勢對中國仍然有利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為實現第一個目標，毛讓自己在黨內的可疑對手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負責推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此來檢驗他們的忠誠；讓國防部長林彪負責軍隊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負責編印毛主義語錄——“紅寶書”，并幫助學生組建紅衛兵；開始把貧苦農民組織起來，把他們變成進行階級斗爭的一支特殊力量。[[9]](#_9_Tai_Wei_Si____Zhong_Guo_De_Zh)這一切都需要時間。實際上，1965年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這些活動上。

然而，在毛處心積慮決定把中國推向極端的時候，國際環境變得越來越險惡了。自肯尼迪政府進行軍事干預支持南越政府以來，越南的內戰日趨激烈。1964年夏末的北部灣事件和美國對北越油庫和海軍基地的報復性轟炸，使戰爭進一步升級了。林登·約翰遜宣稱不進一步擴大戰爭，而是要通過談判結束戰爭，他并以此為政綱于1964年11月當選為美國總統。盡管如此，當越共軍隊在波來古成功地襲擊了美國顧問的住處并摧毀美國飛機后，美國總統乘機恢復了對北越更為猛烈的定期轟炸，并增加了美國在南越的地面部隊的數量。轟炸持續不斷，美國似已經卷入了越南戰爭。對中國而言，最急迫的問題是：華盛頓是否會派美國軍隊侵入北越，迫使中國政治局像它曾向世界表示的那樣，出兵與美國地面部隊開戰（像在朝鮮那樣）？[[10]](#_10_Si_Tan_Li__Qia_Nuo____Yue_Na)

果真如此的話，不管毛認為他關于發動內部革命的想法對拯救中國的社會主義有多么重要，都必須把這種想法擱置一邊。還有一個次要問題是，如果要共同保衛北越，中國需要（如有可能）蘇聯多大程度的合作。有段時間，尤其是1965年2月美國發動空襲之后，俄國人一直在強烈要求與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采取“聯合行動”保衛北越。[[11]](#_11_Tang_Na_De__S_Zha_Ge_Li_Ya)如果毛同意蘇聯的要求（這在當時的情況下雖然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仍足以使中國降低反蘇的調門），他自己貶低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和根除中國國內剛剛抬頭的修正主義的雙重戰斗將遭受嚴重挫折。

因此，毛非常不愿意改變與俄國人的敵對狀態，更何況自1960年以后，中國的外交政策一直在致力于與蘇聯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1965年初，蘇聯召集的有19個共產黨參加的三月會議因故失敗（遭到了中國及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的抵制），而中國發起的打算排除并孤立蘇聯的第二次亞非會議（第二個萬隆會議）在阿爾及爾即將召開，對中國領導人來說，他們的成功似乎已近在眼前。[[12]](#_12_Cha_Er_Si__Niu_Hao_Ze____Di)為此，中國必須既堅持反蘇，又援助越南反對美國。其中的關鍵有兩點：（1）得到美國的明確承諾或默許：在繼續空中轟炸的同時，不從地面入侵北越；（2）有效地武裝越南人，讓越南人靠自己力量抵御美國的軍事壓力。

中國成功地實現了兩個目標。對于美國空襲的升級，中國在外交和軍事上都作出了特別的反應。這導致中美之間達成了一項默契，[[13]](#_13_Ai_Lun__S_Hui_Ting___Zhong_H)美國的保證就是從這項默契中得出的。雖然到1967年才得以完全確認美國不會入侵北越，但在1965年夏，這一點就比較清楚了，即美國很可能會把地面行動局限在南越，華盛頓已理解并時刻留意著中國發出的警告。[[14]](#_14_Ai_Lun__S_Hui_Ting___Wo_Men)武裝越南人要花很多時間，因為中國需在華南新建機場，提高軍工生產，把產品運給北越人，幫助河內進行軍事訓練，與河內聯合進行軍事演習，把配備防空師的5萬解放軍鐵道兵部隊派往越南等等。[[15]](#_15___Zhan_Lue_Gai_Lan__1966)不過，這些承諾最終都實現了。

當決定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以后，毛澤東就信心十足地一邊與克里姆林宮作斗爭，一邊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了。然而，他的時間表無疑被美國的軍事干預打亂了。本來應該在1965年夏天就發生的事情（即“文化大革命”的開始）直至11月份才得以發生。內部兩個方面和外部兩個方面的事態同時交織在一起，使人們難以按時間順序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

在內部，當中國領導層在為怎樣對美國的挑戰和與蘇聯簽訂一項意識形態方面的和平條約的要求作出最佳反應而爭論不休時，毛則希望看到黨內的對手們如何執行分配給他們的實施“二十三條”的任務。[[16]](#_16_Tai_Wei_Si____Zhong_Guo_De_Z)由于同一班人馬同時卷人了兩個方面的事態，自然易于混淆甚至中斷正常的工作任務。這使毛更加相信他在黨內的對手在為蘇聯的修正主義事業服務。

在外部，因越南沖突的發生和蘇聯成功地使河內在中蘇爭論中回到了中立立場，反蘇運動和與之相關的中國率領新近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努力都遭到了挫折。[[17]](#_17_Wei_Lian__E_Ge_Li_Fei_Si___Z)此外，1965年秋，中國的外交政策在阿爾及爾、雅加達和許多北非國家的慘重失敗，使人們對毛澤東關于第三世界各國的革命與中國革命并肩前進的論斷產生了懷疑。這些事件都有一個發展過程，這就進一步推遲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時間。

觀察家們已經對中國領導層1965年關于越南戰爭的戰略爭論進行了許多分析研究。盡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某些結論是可以成立的。[[18]](#_18_Ha_Li__Ha_Ding_He_Mei_Er_Wen)最重要的一點是，雖然確實發生過爭論，但有跡象表明，毛在1965年夏就可能已經確認：中國無需擔心美國對北越的入侵；傳統的人民戰爭模式是可行的，定會在越南最終證明它是成功的（雖然增加了諸如防空武器等現代化裝備），因此，北京無須對莫斯科作出重大讓步。[[19]](#_19_Zhe_Ge_Jie_Duan__Mao_Dui_Mei)

因此，總參謀長羅瑞卿發出的認真備戰（包括平息內部的政治沖突、以民用經濟的受損為代價增加軍工生產和軍事預算、同意蘇聯提出的采取“聯合行動”的建議等）的呼吁，就顯得太不識時務了。[[20]](#_20_Luo_Rui_Qing___Ji_Nian_Zhan)它背離了政治方向，是極其危險的，因為它把國內的反修防修斗爭擺到了次要位置，將使解放軍脫離國內政治斗爭的中心（它充當著為“文化大革命”做準備的組織指揮部和中國青年的模范軍），并使之僅僅成為外交政策的工具。另外，必須繼續把人民戰爭理論放在首位，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盡可能少地消耗中國軍事資源的情況下，使中國的敵人（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者）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

最后，爭論使毛的對手公開了他們的意見。一派是以羅瑞卿為首的職業軍人，持相對強硬的立場，力主在越南抗擊美國，而對蘇聯則主張在實際政策上（即使不在意識形態方面）作必要的和暫時的讓步。另一派是以劉少奇和鄧小平為代表的理性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他們看重國內事務，擔心介入越南戰爭和增加軍事預算會嚴重限制經濟的快速增長和阻止必要的社會經濟改革。為了使介人越南戰爭一事變得毫無必要，為了恢復蘇聯的經濟援助和與蘇聯的大規模貿易，這派人在中蘇政策分歧方面顯然也準備向蘇聯作出讓步。兩派均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應向蘇聯靠攏。但兩派對越南問題的立場有區別，因而在國內政策孰輕孰重方面意見也不盡一致。毛及其追隨者（特別是林彪，甚至可能包括周恩來）站在兩派之外。他們贊成繼續堅決反蘇，也贊成繼續支持越南抗美。他們對美國在印度支那的行動看得不太重（毛1月份對埃德加·斯諾的談話可以為證）。[[21]](#_21_Si_Nuo___Mao_Ze_Dong_Fang_Ta)他們堅決反對理性主義者——不論在事實上還是在毛澤東眼里，他們都是修正主義者——提出的改變國內政策的建議。

毛對付兩派的策略很相似，即讓他們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22]](#_22_Xiang_Xi_Qing_Kuang_Can_Yue)因此，他讓修正主義者負責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后期工作，讓職業軍人在黨委會上或在文章中發表意見。由于美國在越南行事十分謹慎，蘇聯在意識形態的爭論中未獲勝利，以及1965年秋初印度尼西亞和非洲的形勢發生具有諷刺性的逆轉，[[23]](#_23_A_Se__J_Duo_Men___Yin_Du_Ni)使得中國較容易地解決了關于外交政策的爭論。9月初林彪發表的論人民戰爭的文章，[[24]](#_24_Lin_Biao___Ren_Min_Zhan_Zhen)是爭論已獲解決的信號：中國將不直接介入越南戰爭，也不對蘇聯作任何讓步，此后，中國將把外交政策擺在次要位置。

所以，林彪的文章（甚至林自己也承認文章非他本人所寫，文章觀點對中國人來說也不是什么新鮮事）發表的時機和象征意義比其內容更為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國人關于革命戰爭進程的經典信條，把原來的模式從中國農村類推到了“世界農村”，[[25]](#_25_Xu_Hua_Ci_Guan_Yu__Mao_Zhu_Y)但它絕對不是反對發達國家的宣戰書。聯系中國在第三世界已經或即將遭受種種失敗的情況來看，該文更像是堅信最終會獲得勝利并恢復革命進程的政治宣言。從這個意義上講，該文是一篇保守的宣言。[[26]](#_26_Tuo_Ma_Si__W_Lu_Bin_Xun_He_D)然而，聯系“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來看，該文的發表表明中國將把力量更多地用于確保在國內繼續進行革命，而不是用于向外輸出人民戰爭。因此，“文化大革命”共有兩發信號彈：一是1965年9月3日林彪論人民戰爭的文章，二是11月10日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27]](#_27_Yao_Wen_Yuan___Ping_Xin_Bian)二者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按照因果關系和時間順序來說，“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與1964年和1965年中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的失利有關。在受到1960年蘇聯顧問的撤離、蘇聯經濟援助的斷絕和“大躍進”及其后“三年自然災害”蕭條期的震動之后，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處于沉寂狀態。同時，毛左右更為務實的助手們在努力使國家走上正常的軌道。1962年10月的中印沖突使北京又在外交政策方面活躍起來。[[28]](#_28_Hui_Ting____Zhong_Guo_De_Wei)不過，此時外交政策的基礎已不僅僅是反對美國和蘇聯，而是增加了一項：擴大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聯系和在第三世界推動革命。北京認為中國的使命已經變為充當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獲獨立的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領袖了。這不僅是為了在與俄國人的競爭中戰勝他們，也是為自身利益的一項策略。支持世界各地社會主義和反帝革命的利他主義思想，與向全球各地擴張勢力的國家利益——這對中國而言是第一次——結合了起來。這樣的政策與毛個人的革命熱情正相符合，因為它的成功可被視為中國革命確實是歷史的先驅的明證。

因此，從1963—1965年底，中國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視第三世界，并在第三世界花費了大量的財力、物力。[[29]](#_29_Xiang_Xi_Qing_Kuang_Can_Yue)表面看來，中國取得了很大的進展。1963年末至1964年初，周恩來總理訪問了非洲，1965年夏又去了一次。[[30]](#_30_Luo_Bo_Te__A_Si_Qia_La_Pi_Nu)中國開始實施一項以非洲為中心的對外援助計劃，并向外提供軍用物資，訓練外國的反對派領導人。北京試圖抵消蘇聯在第三世界各個組織中的影響（它獲得了一些成功），把它們變成為中國政策服務的工具。北京對亞非人民團結組織尤其重視，準備1965年夏在阿爾及利亞召開“第二次萬隆會議”把俄國人排除在這次會議之外。

但是，中國的努力遇到了障礙。第一，中國顯然在試圖操縱別人，它更感興趣的是挫敗俄國人，而不是幫助前殖民地發展經濟。第二，中國缺乏推行其計劃的“力量”：北京的雄心壯志往往遠遠超過其實際能力，無法在遠離國土的地方投入足夠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國的政策存在極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試圖領導一個統一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給各國共產黨提供武器，支持他們推翻本國的政府。所以，中國的第三世界政策未能全面成功是不足為奇的。蘇聯并不打算不經戰斗就放棄陣地。第三世界在反對西方的問題上并不是鐵板一塊，也不是中國人認為的那樣都接受了社會主義。亞洲和非洲的許多政治家越來越懷疑中國的意圖，一直在尋找中國人耍兩面派的證據，并常常找到此類證據，如貯藏武器的秘密地點或受中國援助的反政府游擊隊的訓練基地。[[31]](#_31_Luo_Bo_Te__A_Si_Qia_La_Pi_Nu)

令人吃驚的倒是中國的第三世界政策很快就支離破碎。周恩來的非洲之行只獲得了無關緊要的成功。[[32]](#_32_W_A_C_A_Di___Zhou_En_Lai_Zai)他因雙重政策而受到了被訪問國家首腦們的責難，被迫在口頭上作了讓步。1964年，中國在剛果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活動因美國和比利時軍人的英勇善戰而遭到了失敗。1965年初，受中國援助的一起謀殺布隆迪總統的陰謀被破獲后，該國斷絕了與北京的外交關系。中國人為之付出了艱辛努力的阿爾及爾會議被“無限期”推遲，因為非洲的政治家普遍對周恩來的操縱和不擇手段的反蘇活動感到不滿，也因為中國很快就把對本·貝拉——阿爾及利亞國家元首，在6月末會議舉行之前不久就不合時宜地被推翻了——的寵愛轉移到了繼任的布邁丁身上。原定的第二次亞非會議一直未能舉行。中國人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周恩來兩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國。[[33]](#_33_Xiang_Xi_Qing_Kuang_Jian_Niu)

中國還通過幫助建立“泰國愛國陣線”、給該陣線提供中國武器和訓練人員來支持泰國的“人民戰爭”。這些活動引起了曼谷的敵視，使美國在泰國的影響大為增加。[[34]](#_34_Dan_Ni_Er__D_Luo_Fu_Lai_Si)中國人在南亞的表現活像一只紙老虎。1965年夏，中國慫恿巴基斯坦人進攻印度的卡奇沼澤地，繼而卷入外交交涉，向印度發出了近似于最后通牒的聲明。但到最后關頭，當新德里態度強硬時，中國都無所作為。他們發現蘇聯總理柯西金橫插一竿，在塔什干為印巴沖突進行斡旋，[[35]](#_35_Ba_Ba_Ni__Sen__Ge_Pu_Ta____Y)大為沮喪。

這一切都打擊了北京對第三世界的熱情。但是，理性地說萬事開頭難，付學費是正常的。1965年9月，中國在印度尼西亞遭到了更嚴重的挫折。當時，受中國支持（也有人說給予物質援助）的印尼共產黨企圖通過暗殺本國高級將領使印尼軍隊變得群龍無首，然后在雅加達發動政變奪取政權。這個計劃未竟全功，幸存的軍隊將領發動反擊，在全國各地大力鎮壓印尼共產黨，幾天之內砍了幾十萬人的腦殼。[[36]](#_36_An_Dong_Ni__C_A_Dai_Ke_____H)由于中國人明顯地與這次事件有嚴重牽連，也由于死亡人數太多（更不用說印尼共產黨的生存問題了。事件發生后，該黨立即被宣布為非法，從印尼的政壇上消失了），北京的聲譽立馬遭到巨大的損害。揚帆出征的中國革命政策航船就完全失去了的助力。

這些事件均發生在外國，其中幾件乃趨勢發展所致，中國無力控制。然而，在每一次事件中，中國的政策都在當地引起了負反應。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緊隨著中國在印度尼西亞的大挫折爆發的話，中國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失敗肯定會更加顯眼。事實上，這些事件（特別是雅加達和阿爾及爾的事件）發生的時機對毛很有利，給他多提供了一個從無法堅守的外交陣地上后撤的借口。自從跟俄國人分裂和國家從“大躍進”的災難中恢復元氣以后，毛就把中國引入這個陣地。毛和林彪沒有承認失敗。他們搬出了斯大林的老式理論：歷史是波浪式前進的，暫時的挫折是預料之中的。[[37]](#_37__Zhong_Gong_Zhong_Yang__Guan)總之，“文化大革命”給了中國領導人這樣一個機會：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從外交問題上引開，（通過毛主義者的宣傳）把失敗說成是勝利，宣稱北京手里僅有的政策工具——巧舌如簧——就是唯一必要的工具。

而且，在1966年初中國遭遇致命的打擊。這打擊幾乎成了中國假革命角色的注腳。第一件，達荷美（今貝寧——譯者）和中非共和國發現，中國駐在兩國的外交官在明目張膽地從事顛覆活動，故兩國均斷絕了與中國的外交關系。[[38]](#_38_La_Jin____Zhong_Guo_Yu_Fei_Z)第二件，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此人被視為領導第三世界國家共產主義革命獲得成功的典范——與中國決裂，使北京的拉丁美洲政策宣告破產。卡斯特羅與北京決裂先由于中國干涉古巴內政（古巴發現中國人在古巴軍官中散發反蘇小冊子）和利用古巴對大米的需求，誘使哈瓦那改變對蘇聯的態度。[[39]](#_39_Sai_Xi_Er__Yue_Han_Xun____Go)此后，卡斯特羅堅定地站在了蘇聯陣營一邊（蘇聯人通過對古巴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使卡斯特羅留在蘇聯陣營內，而中國人在這兩方面都難與蘇聯人相抗衡）。第三件（也許最具象征意義），加納左派總統恩克魯瑪在剛剛抵達北京后就被推翻了。[[40]](#_40_La_Jin____Zhong_Guo_Yu_Fei_Z)他的繼任者很快就斷絕了與中國的關系，因為中國人繼續把恩克魯瑪視為該國真正的領導人。

從此時直至70年代末，中國都不得不把革命政策放到一邊，因為中國面臨著蘇聯的軍事挑戰，需要與華盛頓緩和關系，需要恢復社會秩序和發展經濟。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躍期”，毛聲稱的外交政策是完全按原則制定的，是最純潔的。毛自圓其說之詞居然使他免遭難堪，原因在于莫斯科和華盛頓都不太重視中國。此外，內亂中的中國只把經濟的發展和與外界的聯系放在次要位置。1966—1969年間，中國的革命雄辯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中國人在香港、仰光和莫斯科等地雖然也進行過一些可稱之為“革命”的活動，但是，把這些活動視為中國的內部動亂在國外的表現也許更合適些。在很大的程度上，革命活動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內容一樣，都退居幕后了。

##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外交政策主要是按下述兩個設想制訂的：中國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與外部世界打交道和國際環境繼續對中國有利（如此異想天開）；也就是說對外事務不會發生需要中國對外交政策給予過多注意或者發生需要花費過多財力物力的事件，沒有外部力量對中國內政構成嚴重威脅。總的想法是割裂國內和國外事態之間一直存在的那種密切聯系，把中國與外界隔開，以北京確定的時間和條件來處理與其他國家和人民間的關系和問題。事實上，這些都是自以為是的主觀推想，既反應了整個“文化大革命”精神的不切實際，也反映了毛的傲慢與自大：堅信只有他自己發現了真理，其他人（包括外國人）只要得到正確和充分的教育，就會自覺同意真理的正確性。由于這些臆想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產生的，所以未遇到任何麻煩。但當中國違背它自己的信條以后，國際環境即以可怕的軍事威脅的方式對中國展開了報復，迫使它改變“文化大革命”的進程和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即使在中國將其國內問題與對外事務人為地完全分隔開來期間，內外問題，仍然保持著一定的聯系。總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決策、各個階段及每個階段的轉折點都反映在北京的對外立場、政策和行動上，只是程度上打了一個大折扣而已。

“文化大革命”“活躍期”的外交政策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式開始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為止。在這期間，北京基本未參與什么國際性活動。中國對蘇聯、美國和越南沖突的方針已經確定；第三世界政策基本停留在口頭上；領導層的注意力被轉移到了內部團結上，所以不可能或者不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

第二階段，從1966年8月紅衛兵上街到1967年夏天動亂達到高潮——以“武漢事件”和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為代表——為止。在這個階段，中國嚴格按“文化大革命”的條件對待外部發生的事件；中國的外交行動和與其他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接觸，幾乎與中國國內的動亂程度完全一個節拍。因此，當時中國對外政策發生的兩件重大事件也都成了國內問題：紅衛兵接管外交部，外交部長陳毅暫時去職；對外國駐華外交人員的粗暴待遇，特別是受官方指使的對蘇聯和英國外交官的暴力事件。在北京的政策的影響下，在中國國境線上也發生了一系列事件。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對外關系僅僅是內部動亂向外蔓延的結果，盡管這種蔓延在香港、柬埔寨和緬甸表現得比較嚴重。

第三階段始于1967年夏，當時中國領導人作出了中止暴力活動、實行軍管和解決毛的繼承人問題的決定。這些措施及蘇聯的軍事活動直接導致了下列事件的發生：1969年3月的中蘇邊界沖突；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決定把中國支離破碎的外交政策重新收攏；10月，周恩來和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后，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壓力，此外，還最終促成了中美和解。因此，“文化大革命”“活躍期”結束時，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恢復了“文革”剛開始時的模樣。中國不但卷入了與超級大國的糾紛之中，而且，國內事務與外交政策間固有的密切聯系也恢復了。

#### 第一階段，1965—1966年

在第一階段，北京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擔心三點。第一，如果美國對越南的干預進一步升級，是否需要中國作出更直接的反應；第二，如何與莫斯科保持不即不離的關系，也就是說，關系雖壞，但不要太壞；第三，如何對待印度尼西亞迫害華僑的事件及雅加達和印尼其他地方的暴民對中國外交機構的襲擊。1965年末及1966年全年，美國大幅度增加了對北越的空襲，并連帶轟炸了停靠在海防港口的中國船只及河內和其他地方的中國軍事援助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41]](#_41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6Nia)這自然又一次引起了北京的擔憂：是否應該采取更直接的行動，特別是在美國人把戰火燒到中國南部的情況下。但是，美國竭力不讓空襲擴大到中國領空，雙方達成了兩國空軍不交鋒的默契。[[42]](#_42_Hui_Ting____Zhong_Guo_De_Wei)不言而喻，只要中國繼續向北越提供軍需物資、在北越駐軍并建立維修設施，中國人必會處在美軍空襲的威脅之下。所以，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北京說得多，做得少；隨著美軍空襲的日益頻繁和殘酷，北京發出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在中國各個城市舉行群眾集會；當美國戰斗機侵入中國領空時它只采取防衛措施而不進行實際的攻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注定要拒絕約翰遜政府首次提出的建議：[[43]](#_43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8Nia)通過改變對臺灣問題的態度和不擴大越南的軍事活動來改善中美關系。中國對美國發出的這些明確的和解暗示不感興趣。盡管如此，美國還是一再提出這些建議，加上蘇聯的軍事壓力，最后終于引起了中國的重視。

中蘇關系主要受下述兩個方面的制約。第一，蘇聯在越南沖突中的作用；第二，北越和美國在蘇聯調停下和解的可能性（不管這種可能性在當時有多少）。[[44]](#_44_Heng_Li__Ji_Xin_Ge____Bai_Go)考慮到美國已幾次試圖利用克里姆林宮的調停（雖然這些調停基本上未見效）把越南人拉到談判桌邊，中國人非常擔心蘇美會“互相勾結”，作出與國際緩和有關的決策。美國的幾次努力都無結果，因為河內不打算再次在未獲全勝的情況下結束戰爭。[[45]](#_45_Qia_Nuo____Yue_Nan_Shi____Di)但這絲毫未減輕中國人的疑慮：蘇美兩國可能避開越南問題和戰略武器控制問題而達成全球性諒解，包括取消蘇聯對中國的核保護（旨在抗擊美國的進攻）。因此，北京繼續利用一切機會攻擊蘇聯：在次數日益減少的中蘇雙方都參加的共產黨內部會議上，在中國國內規模日益擴大的反蘇集會上，在中國的新聞媒介中，[[46]](#_46_Niu_Hao_Ze____Di_San_Shi_Jie)一有機會（只要不引起蘇聯真正具有威脅性的強烈反應），中國就直接抨擊俄國人。所以，北京拒絕出席1966年初在莫斯科召開的蘇共第23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后來蘇聯召開的其他會議，并譴責俄國人向其他主要的共產黨遞交了秘密信件。北京拒絕蘇聯在信中對中國的一切指責，特別駁斥了關于中國阻止蘇聯的軍事設備通過中國領土運往河內（這種指控似乎確有其事）的傳言（和蘇聯的譴責），并故意實施一項傲視克里姆林宮的計劃——明確頒布了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控制蘇聯船只航行的規定。[[47]](#_47_Guan_Yu_Mi_Mi_Xin_Jian_Ji_Yo)

雖然北京和河內的關系幾乎完全受美越沖突的制約，但有跡象表明，兩國共產黨并非真正親密無間。河內懷疑北京把阻斷蘇聯的供應當作一種政治籌碼，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反蘇。在武元甲已經決定由游擊戰轉為用大部隊進行正規戰以后，中國告訴越南人應該怎樣進行斗爭（如林彪論人民戰爭的文章），河內很難對此表示贊賞。此外，越南勞動黨也不喜歡中共的這種做法：迫使越南在中蘇爭論中站在中國一邊而不顧此舉會對越蘇關系帶來多大的傷害。

最后一點，即使在早期，胡志明和他的同事們就知道中國不贊成北越收復南越，重建一個統一的越南，更不希望出現一個由越南控制的共產主義的印度支那。[[48]](#_48_W_A_C_A_Di___Zhong_Guo_Yu_Yu)中國對東南亞的長期政策似乎是：可以共產主義化，但不能統一。由于當時面臨著美國的軍事威脅，雙方把分歧暫時放在了一邊，但北京很清楚，就中國的利益而言，越南共產黨的獨立性太大。中國人最了解自力更生的好處，他們在反對俄國人的運動中就很好地運用過這個方針。他們當然不愿看到這種斗爭手段被用來反對他們自己。因此，70年代中越沖突的種子，在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雙方對待對方的態度中就已扎下根了。[[49]](#_49_You_Jin__K_Lao_Sen____Zhong)

這個階段，中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被動。北京無力有效地回應印度尼西亞對中國國家利益的挑戰，就是對這一點的生動說明。1965年9月，印尼共產黨的政變計劃流產以后，蘇哈托政權大肆迫害所有共產黨員及共產黨嫌疑分子，允許軍隊和普通公民對共產黨及嫌疑分子發現多少殺掉多少，常常對他們的家屬也不放過。[[50]](#_50_Tang_Na_De__Xin_De_Li___Yin)中國當然很尷尬，很痛心，但卻無能為力。然而，當襲擊蔓延到印尼華僑身上并進而波及到中國在雅加達和其他城市的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人員及設施時，中國進行合法干預的道路就暢通無阻了。1966年春夏，襲擊、抄家、強行搜查、搶劫中國大使館和一些領事館、驅逐中國外交人員的事件相繼發生，使印度尼西亞的反華暴力活動達到了高潮。然而，中國除了提出抗議、撤回官方人員及留學生、取消經濟援助之外，仍然無所作為。當華僑普遍受到迫害時，中國外交部曾要求印度尼西亞允許中國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國的人。[[51]](#_51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1966年末，印度尼西亞允許一艘中國客輪前去接運華僑。中國最后共接回4000余名華僑。

鑒于印度尼西亞如此挑釁，中國應立即斷絕外交關系。然而，想不到中國當時會采取那么軟弱的政策。在每個階段，采取斷然措施的都是印度尼西亞而非中國。只是到后來，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動亂達到高潮的時候，紅衛兵暴徒闖入并焚燒了印尼駐北京大使館，形勢才轉為對印度尼西亞人不利。而在196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苗頭已經顯露，加上北京還不能把它的力量投放到遠離國土的地方，致使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處于被動應付的狀態。在與蘇聯、美國和越南的關系中，中國唯一可用的選擇是，對其他國家所作出的舉措、對國際事件，以及在北京無發言權的重大問題上所做的決定，做一些口頭上的反應而已。

#### 第二階段，1966—1967年

在1966年9月至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時期，中國的外交政策完全是騷亂、暴動和復仇活動——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中國的內政就是如此——的產物。中國不再對國外的事態作出反應，因為外界也準確地斷定中國不僅甘愿處于孤立，而且更希望外界不要打擾它。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只是對國內事態作出反應。一度紅衛兵奪占外交部并揪出陳毅進行批斗和戲弄，這時北京的外交政策就降低到在外交部大樓正門口與吵吵鬧鬧的“革命”青年進行談判的水平了。中國終于獲得了長期奮斗的目標：徹底擺脫外國的要求和控制。不過，這是以完全失去外交政策為代價的。

中國內部的動亂規模和它對外部世界的言詞抨擊程度幾乎是完全成正比。1967年6月外交部被整垮以前，中國一直在通過群眾集會推行其外交政策。這使人回憶起了巴黎公社的情景。因此，當中國想對蘇聯的某些行動發泄不滿時，就在蘇聯駐京大使館前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第一次示威發生在1967年1月。這次示威整整持續了三個星期，日夜不停。[[52]](#_52___Yuan_Dong_Dong_Tai____1967)此外，北京企圖在蘇聯首都向克里姆林宮傳授革命的藝術：中國留學生途經莫斯科時，下車到紅場煽動俄國人，引起了流血沖突，然后在西伯利亞的歸途上向火車內的乘客展示包扎著傷口的繃帶（他們說傷口是沙俄式的騎兵的毆打造成的）。他們在蘇聯的各火車站進行反克里姆林宮的宣傳。[[53]](#_53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在此階段，在其他國家（特別是英國、緬甸和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前的游行示威也時有發生，旨在報復各該國政府的所謂罪惡行徑，或者僅僅是針對（中國人看來）他們所具有的社會政治特點。

當俄國人成為中國人開口必罵的目標時，中蘇關系當然就更加惡化了。當雙方針鋒相對、互相驅逐外交及其他人員（特別是記者）時，兩國的外交關系有好幾次幾乎斷絕。[[54]](#_54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中國在其他國家——如法國和伊拉克——的留學生也在當地蘇聯使館前舉行示威。當警察與他們的帶頭人沖突時，這些人就成了英雄人物。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把（除用毛的語錄贊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全部精力用于對蘇聯廣播，播音時間增加至每天24小時。中國人曾直接襲擊在華的蘇聯公民，這是他們所犯的付出代價最大的錯誤。不但蘇聯大使館的部分房屋遭到了搶劫，而且停泊在大連港的一艘俄國船上的官員們也因拒絕佩戴毛澤東的像章而被押到市內游街示眾。[[55]](#_55_O_B_Bao_Li_Suo_Fu_He_B_T_Ke)此外，經北京機場撤離的蘇聯外交人員的家屬，受到了臨時召集起來的成千上萬紅衛兵的嘲笑、威脅和唾罵。[[56]](#_56___Su_Zhong_Guan_Xi__1945__19)這些行動在1969年和1969年以后因蘇聯人激烈的報復而使中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國還在所有的出版物上繼續攻擊克里姆林宮，指責蘇聯與美國“互相勾結”；在國內外推行修正主義；蓄意利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殘余勢力）來反華；對越南假支援真出賣等等。[[57]](#_57_1966Nian_9Yue_Zhi_1967Nian_X)但是，由于北京與莫斯科的關系已凍結，而且中國根本不想改善，故而，雙方外交關系的地位已不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邊界地區的軍事形勢（雖然還未公開）。在中蘇邊界，邊界事件和軍隊的集結活動已屢見不鮮，[[58]](#_58_Tuo_Ma_Si__W_Lu_Bin_Xun___Zh)發生爆炸性事件的舞臺已經搭好。爆炸性事件很快發生，中國暫時停止“文化大革命”就很有必要了。

這個階段，中國基本上實現了外交政策的目標：使本國與外部世界隔絕，而且愈徹底愈好。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員外，其余的外國人都被要求離開中國。外國高級官員的來訪或者被中止，或者被減至最低限度。但中國并未被密封住，特別是在社會動亂、奪權、示威游行和亂找替罪羊的活動盛行的情況下，向外蔓延是不可避免的。最嚴重的事件發生在香港。

#### 香港的騷亂

對激進分子來說，香港這塊英國尚存的殖民地是一個吸引人的和必然的目標。當外交部停止運轉，中國的外交政策決定權落入早已變得急于表現滿腔革命熱情的地方官員手中時，英國的這塊殖民地遲早會直接感受到街頭革命行動的威力。另外，香港一點就著。它是盛行一時的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后一個堡壘，是過去卡爾·馬克思描述的資產階級丑惡社會的最典型的現代例證，香港自然符合毛澤東主義進行社會經濟革命的標準。

事情開始于1967年5月初香港的一次勞資糾紛。如果不是中國插手其間，鼓勵罷工工人，公開支持工人及其家屬的游行示威的話，這場糾紛無疑會很快解決。從糾紛一開始，中國的支持就傳到了香港，其中包括通過廣播電臺播送指示；在維多利亞商業區的中國銀行大樓安裝轉播大陸電臺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錢給罷工工人和示威群眾；中國工會還通過了支持罷工的決議。這樣，勞資糾紛很快演變成了全面騷亂，并進而威脅到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大逮捕開始了，有時一天中就有數百人被捕。罷工先波及其他的私人企業，后來發展到交通、煤氣供應等公共服務機構，最后還蔓延到了政府部門。

但是，英國政府堅決迎接這些挑戰，向香港派遣了一艘載有直升機和海軍陸戰隊的航空母艦。同時，香港的警察（99％是華人）面對襲擊沒有亂，也未加入騷亂者的行列。然而，隨著中國國內秩序的進一步混亂，香港的危機在7月份更加嚴重了。廣東地方政府顯然是自作主張地部分開放了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邊界，致使邊界村鎮發生了不少嚴重事件，其中包括用機槍射死幾名香港警察的事件。由于邊界半開半閉，基地設在中國的恐怖分子潛入了九龍中心地區。到夏末為止，共發生了大約160起與中國工人的恐嚇有關的炸彈爆炸案。[[59]](#_59_Wei_Lian__Xi_Dun___Mao_Zhu_Y)

中國人一開始就把香港的勞資糾紛提到了外交的高度。首先，中國向港英當局正式提出了五項要求（如果英國同意這些要求，香港的政權將落到騷亂者手中）；第二，讓大批群眾包圍英國駐華代辦處，肆意辱罵英國外交官，其嚴重程度是20世紀的中國絕無僅有的。7月和8月，英國駐北京代辦處建筑物和上海領事館也遭到了破壞；第三，在中國駐倫敦代辦處周圍挑起騷亂（這又被用作進一步侵犯英國在華外交豁免權和嚴格限制英國官方代表的借口）。[[60]](#_60___Zhong_Guo_Ji_Kan____Di_32Q)這些使事態逐步升級的行動很可能和外交部精心安排的旨在把英國趕出香港殖民地的一系列措施無關，甚至不是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在“黨中央”（到1967年夏，除直接的軍事管制外，這是中國僅剩的中央政權機關）任職的領導人的決定。相反，它們似乎反映了下述事實：外交部在逐步解體；外交政策實際上掌握在下級官員姚登山及追隨他的紅衛兵手中；[[61]](#_61_Hou_Mian_Jiang_Geng_Duo_Di_T)陳毅手中無權；甚至周恩來也不得不（據說是違心地）把自己和香港的革命活動聯系起來。

在正常情況下，英國駐華代辦唐納德·霍普森和駐上海領事彼得·休伊特受虐待事件，就足以使英國斷絕與中國的外交關系。[[62]](#_62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7Nia)僅焚燒代辦處事件就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倫敦沒有采取這一合乎邏輯的步驟。最明顯的原因是，如果與中國沒有外交關系，香港將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實際上，雖然香港的騷亂非常嚴重，但貿易、旅游和生產仍保持旺勢，亦很少有抽走資本之現象）。此外，倫敦意識到，中國人的悖常行為是中國外交政策墮落為國內民眾暴力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的結果。這場風暴可能會很快平息下來，事實的確如此。英國決心向中國表明：恐嚇政策不會奏效；如果中國想繼續做一個文明國家，就必須按文明國家的原則行事。這個觀點留有19世紀的痕跡。

英國的這個策略最后得到了報償。1967年末，隨著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恢復和全國范圍內軍事管制的實行，香港殖民地的社會秩序恢復了正常，邊界回到了合作控制的正常狀態，而且（最重要的是）駐北京的英國外交官被準許在北京市內活動。中國像往常一樣，無中生有地聲稱取得了勝利，然后解除了對英國駐華外交官的壓力。不過，完全解除壓力還需要一段時間，直到1968年夏，倫敦才得以開始把駐華外交官接出中國。然而，即使到了這時，路透社記者安東尼·格雷仍在受軟禁（始于1967年7月），一直到1968年底。同時，英國的船長和海員們仍常常遭扣押、審訊和驅逐，至少有一名英國公民（維克斯—吉瑪公司的工程師喬治·瓦特）因被指控犯有間諜罪而被判處三年徒刑。（維克斯—吉瑪公司的其他職員于1968年7月被驅逐出境，他們一直在修建一家合成纖維廠。）[[63]](#_63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

“文化大革命”期間英國人在中國的遭遇是此類事件中最極端的例子。但西歐大多數國家的經歷與此也大體相似，盡管中國使館在各駐在國首都屢生事端，這些國家決定繼續保留駐華使館，或者至少保持與中國的經濟關系。中國的鄰國或中國影響所及的國家的經歷有一些不同。它們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向外蔓延所造成的影響，雖然受影響的時間短一些，方式更溫和一些。柬埔寨和緬甸爆發了危機，印度、尼泊爾、錫蘭（斯里蘭卡）、肯尼亞和阿爾及利亞也感受到了“左”派造成的壓力。[[64]](#_64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

#### 在東南亞的蔓延

金邊的形勢因越南戰爭而變得復雜起來。西哈努克親王想利用中國聲稱的友誼，阻止越南沖突向西蔓延，盡管北京一直在支持他的反對派武裝力量——紅色高棉。中國的目的是不讓柬埔寨領導人過分擔心越共利用柬埔寨領土進行活動；讓金邊保持對越南的絕對獨立；維持紅色高棉的活動，但不把它公開當作中國的工具；支持西哈努克在中蘇爭論中的中立立場。[[65]](#_65_Luo_Jie__M_Shi_Mi_Si____Jian)北京的困難在于它不能控制事態的發展。不但俄國人、美國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都各行其是，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這個階段，中國革命的向外輸出已變成了另一個致亂因素。

1967年3月，中國駐金邊使館向外界散發毛主義的宣傳品，鼓勵當地華人青年進行紅衛兵式的活動，給高棉—中國友好協會提供資金，公開介人柬埔寨的內部政治。[[66]](#_66_Ge_Tuo_Fu____Zhong_Guo_Yu_Do)西哈努克對這些故意冒犯他的舉措不可能置之不理，雖然他依賴中國的外交支持和經濟援助。他被迫采取對策，有效地制止了此類活動。他還嚴厲抨擊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67]](#_67_Tong_Shang_Shu__Di_79__81Ye)

如果中國國內不再生事端，事情本來在1967年夏即可得到解決。由于外交部到8月份已混亂不堪，周恩來不得不對來訪的柬埔寨外交大臣普里薩拉親王說，中國實際上已失去對駐柬埔寨使館的活動的控制。[[68]](#_68_Tong_Shang_Shu__Di_121Ye)此外，中國仍在支持當時已被西哈努克取締的高棉一中國友好協會，中國新聞媒介也開始直接攻擊這位柬埔寨元首了。這些行動導致西哈努克明確地指責中國干涉柬內政（很準確）。[[69]](#_69_Tong_Shang)再加上8月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燒及中國人在緬甸采取了相似的行動，遂導致西哈努克在9月份宣布撤回柬埔寨駐北京使館的全體人員。雖然周恩來隨后說服他打消了斷交的想法，但造成的損失已無法挽回，兩國關系在隨后的“文化大革命”歲月中一直很疏遠。

在緬甸，事態的發展更趨于極端。它表明，一旦“文化大革命”直接影響到外交部的正常運作，就會立即使原本不錯的雙邊關系產生破裂。由于仰光奉行不公開冒犯中國的謹慎政策，也由于北京的目標是在促進兩國友好關系，為以后支持共產主義暴力革命奠定基礎，故中緬關系歷來很好。因此，北京能容忍緬甸的中立和不介入政策，能容忍其對本國“左”傾運動較為嚴格的控制和在一些政策方面違背中國的意愿，包括對越南沖突和軍備控制的態度，以及對第三世界與西方和蘇聯的最佳立場應該是什么等等。只要緬甸政府能夠合作，緬甸國內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還比較薄弱（起初分裂為紅旗派和白旗派，60年代中期親北京的白旗派再次分裂），中國在緬甸就什么也不能（或者不需要）做。因此，中國在1960年與緬甸簽訂了一項邊界條約，1961年又簽訂了一項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1963年，奈溫政府因與“左”派談判破裂而大力鎮壓共產黨勢力時，中國聽之任之；而且，1964年緬甸政府實施的把銀行和主要工業企業收歸國有的政策影響到緬甸華僑的利益時，中國也沒有公開反對。[[70]](#_70_Ge_Tuo_Fu____Zhong_Guo_Yu_Do)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情況就馬上不同了。首先，共產黨白旗派在內部的一次暴力沖突和血腥清洗后發生轉變，變成了毛主義式的純政治軍事組織，由中國培養出來的紅衛兵式的干部領導。[[71]](#_71_Yue_Han__H_Ba_Jie_Li___Mian)其次，緬甸在越南沖突、反蘇斗爭和對待第三世界等問題上沒有緊緊追隨中國的路線方針，盡管劉少奇、陳毅和周恩來等高層領導人在1965年和1966年先后訪問了仰光。[[72]](#_72_Ge_Tuo_Fu____Zhong_Guo_Yu_Do)此外，中國駐仰光使館和新華社分社不但資助當地的華語學校，而且在學校課程中加進了許多毛主義的內容。“文化大革命”爆發后，這方面的內容就更多了。這種做法把華僑學校的學生變成了住在外國的紅衛兵。最后，隨著1967年春夏中國外交部的逐步解體，該年早些時候經受“文化大革命”洗禮的中國外交官返回了仰光。他們公開散發毛的語錄即“紅寶書”、毛的像章和其他具有煽動性的宣傳品。當當地政府出面干涉時，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有這么做的權利。[[73]](#_73_Ge_Tuo_Fu____Zhong_Guo_Yu_Do)

這些活動，特別是最后一項活動，對仰光民眾和奈溫政府來說，確實太過分了。所以，當受中國大使館支持的學生拒絕按緬甸政府的規定摘下佩戴在身上的毛的像章時，反華騷亂就開始了。騷亂迅速轉變為對中國大使館、新華社、華人學校直至許多緬甸華僑的襲擊。這些騷亂未能被仰光警察平息，而是一再擴大，致使中國駐緬甸大使的助手被殺身亡。北京對此事的反應與對香港事件的反應相同（金邊的事件此時也都在演變中）。首先，北京于6月末發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的照會，繼而向仰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于這些要求太苛刻，緬甸政府只能拒絕），然后在緬甸駐華使館周圍舉行大規模示威，最后又經過外交途徑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74]](#_74_Tong_Shang_Shu__Di_115__116Y)

即使到了這種地步，如果不是北京站出來（這是第一次）公開支持共產黨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緬甸政府的活動而致使形勢全面惡化的話，事情仍然是可以了結的。北京抨擊緬甸政府和奈溫本人，號召緬甸人民武裝起來推翻現政府，在本國建立一個共產黨政府。北京還讓白旗派利用中國的新聞媒介。[[75]](#_75_Tong_Shang_Shu__Di_116Ye)形勢在6月的最后三天內急遽惡化。這顯然是中國外交部內的過激分子造成的。他們違背（實際上破壞）了中國政府自1949年以來處心積慮維持的對緬甸的立場。緬甸政府和人民均作出了相應的反應。7—8月，緬甸各地普遍爆發了示威游行，中國支持的宣傳機構遭到查封，左翼團體遭到大規模鎮壓。緬甸政府還發起了一場反對中國及親華分子的輿論攻勢，并驅逐了幾名中國記者。[[76]](#_76_Tong_Shang_Shu__Di_117__118Y)隨后，兩國不可避免地斷絕了外交關系。同年夏，雙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一年之后，中緬關系才開始恢復。

#### 外交部走向極端

香港、金邊、仰光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如果中國外交部在1967年夏沒有走向極端，外交部長陳毅沒有受到人身攻擊，外交部的一些檔案沒有被人為地毀壞，這些事件很可能不會發生。要了解“文化大革命”這個階段和后來階段中國的外交政策，就必須就這些事態的發展加以研究，因為它是中國內部事務和外交實踐之間的紐帶。

“文化大革命”在政府部門的表現是：工作組、紅衛兵、革命造反派、革命委員會和其他破壞勢力對國務院各部委正常工作的干擾。但是，這些干擾活動的時間先后長短各有不同，它取決于各部的實際情況及“文化大革命”暴力活動的總體方向和發展階段。外交部是各部委最晚卷入的單位之一，遭受劫難的時間也比較短（雖然在1967年夏受到的打擊非常嚴重）。與其他政府機關明顯不同的是，外交部在我們所關注的這個時期仍然在運作。但是，它的運作是妥協的產物。中國外交政策的內容和方向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秩序的混亂和重新整頓緊密相關。

因此，1966年夏外交部長陳毅接受了黨派往外交部的工作組。不過，他和其他各部部長一樣，把工作組用來維護外交部各部門的完整和免受造反學生的干擾。[[77]](#_77_Mei_Er_Wen__Ge_Tuo_Fu____Hua)1966年秋，中共十一中全會正式決定開始進行“文化大革命”后，毛召回了工作組，允許紅衛兵在外交部和國務院其他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但是，陳毅不許紅衛兵干擾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他和往常一樣堅守職責。他和其他各部的頭頭們都在做同樣的努力，都采取了拖延的辦法，希望局勢能夠好轉。[[78]](#_78_Tong_Shang_Shu__Di_318__322Y)

然而，約束激進主義的瓶蓋一旦松開就難以再把它關回瓶里了。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學生和工人開始到處“奪權”。“一月風暴”有意識地把全國和大多數政府機關（包括外交部）推進了混亂的深淵。1月18日，外交部成立了一個革命造反聯絡站。始于上年秋天的對陳毅的批判現在變得越來越激烈了。陳毅在一次萬人大會上被迫作了自我批評，自己承認有“七大罪狀”。[[79]](#_79_Ge_Tuo_Fu___Wai_Jiao_Bu_He_W)當然，陳和主持這次萬人大會的周恩來的想法一樣，為的是利用自己的“坦白”來避免造反派干擾外交部的正常運作，并借周恩來的權威，這也意味著是毛澤東的權威來保住自己的職位。這個辦法很有效，外交部造反聯絡站的一些“左”派被搞掉了。以后的兩個月中，中國的外交政策仍是較為理智的。

但是，后來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導致這種策略到1967年初夏便不靈了。首先，中國在這期間召回了所有駐外大使（駐開羅的黃華除外）[[80]](#_80_Dang_Shi_Zhi_You_Huang_Hua_Y)及各使館的大多數高級官員，讓他們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這項措施顯然嚴重削弱了北京了解和分析國外局勢的能力。但是，此舉的一個嚴重后果是，外交部各部門和各駐外使館（隨著外交人員很快返回駐在國）都走向了極端。其次，1967年1月，毛澤東號召解放軍支持“左”派奪權。軍隊臨時作為一支穩定秩序和相對保守的力量介入了斗爭，在“三結合”（解放軍、老干部和紅衛兵）時把有經驗且不太激進的老干部擺到了首要位置。但是到了4月，軍隊就因這種做法（被稱為“假奪權”）受到了批評，不得不給造反派更多的權力。這樣，陳毅在外交部再次受到了壓力。這次的壓力來自“批判陳毅聯絡站”。不久，北京舉行了反對陳毅的公開游行。1967年5月，經周恩來同意，陳又一次受到了群眾的批斗。[[81]](#_81_Ge_Tuo_Fu___Wai_Jiao_Bu_He_W)

再次，造反派在一些爭強好勝、能與陳平起平坐的人中推出了自己的帶頭人來反對外交部長陳毅。1967年4月雅加達驅逐中國代辦姚登山，中國和印尼就此斷交。4月30日，姚返抵北京，在北京機場受到了整個中國領導層的熱烈歡迎。此后，他成了北京市的風云人物，在5月中旬的一次聲討印度尼西亞的群眾集會上出盡了風頭。姚回到了外交部后，馬上就成了反對陳毅的造反派的領袖人物。陳毅還想使中國的外交事務（和外交部資深官員）再次躲過內部暴力活動的大沖擊。[[82]](#_82__Wai_Jiao_Bu_He_Wai_Jiao_Shi)

但是，外交部在部內外造反派的聯合攻擊下分崩離析了。5月13日發生了一系列暴力破壞事件：數百名批陳聯絡站的造反派攻進外交部，打斷了部里的正常工作，毆打官員，把檔案弄得亂七八糟，還帶走了機密材料。5月29日又發生了類似的事件。此后，外交部基本上就不能正常運作了。上文已談到，當時中國與香港、柬埔寨和緬甸的關系已急遽惡化，與其他三十多個國家的關系也出現了危機。這種局面主要是1967年夏外交部的癱瘓和陳毅派與姚派在部內爭權造成的。如果說中國還有外交政策的話，那也是由于周恩來的努力。他不但出面與造反派交涉救陳毅的駕（典型的做法是告訴造反派更全面地調查陳毅的情況，以此來爭取時間），而且暫時主管外交部，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發指示處理部務。[[83]](#_83__Wai_Jiao_Bu_He_Wai_Jiao_Shi)

但是，暴力活動在1967年盛夏達到了高潮，因為毛認為中國人民需要重溫革命經歷。各省都發生了武斗。這從兩方面對外交部和外交政策產生了影響。一方面，它使中央領導人把幾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武斗上。毛及其追隨者對北京的外交政策造成的問題熟視無睹，讓外交部自己解決內部的糾紛而不給予任何幫助。

另一方面，這年夏天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武漢事件，[[84]](#_84_Tuo_Ma_Si__W_Lu_Bin_Xun___Wu)造就了新英雄王力（盡管是曇花一現）。他回到北京的情況和姚登山一樣，風光得很。權力很快沖昏了他的頭腦。他選定外交部為行使權力的部門之一。8月7日，他發表講話。這是他和姚登山對外交部和陳毅發出的最后一擊。隨后的兩周內，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陳毅又一次遭到批斗（在8月11日和27日的兩次批斗會上，他又交代了一系列新“罪行”）。[[85]](#_85_Ge_Tuo_Fu___Wai_Jiao_Bu_He_W)中國的外交政策完全陷入了混亂。

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與緬甸和柬埔寨的關系嚴重惡化，英國代辦處被焚燒。這些都是姚和王的過激行為造成的。姚自作主張給中國駐外使館打電報，還“到處作報告制造麻煩”，[[86]](#_86___Hong_Wei_Bao____1967Nian_9)儼然以外交部長自居。黨中央（即毛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對這些過火行動不是不愿制止，就是無力制止，直到8月底為止。

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和蓄意挑起的內亂給國家造成的嚴重危害終于震驚了毛派領導人。9月1日的一項決定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停止“武斗”或“奪權”；紅衛兵不再搞串聯活動，一律留在原單位；用政治斗爭代替武斗作為革國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燒、抄家和阻塞交通”。[[87]](#_87_Yu_Er_Gen__Duo_Mei_Si____Zho)這個180度的大轉彎馬上對外交部產生了影響：姚、王及其追隨者受到清理和審查；陳毅恢復職權（表面的和象征性的）；駐外使館奉命停止制造革命；嚴禁在外交部搞奪權活動。[[88]](#_88_Ge_Tuo_Fu___Wai_Jiao_Bu_He_W)中國和許多國家的關系已經受到了嚴重傷害，裂痕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彌合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系要么已經斷絕，要么非常緊張。但是局勢已開始向好的方面轉變。

## 中國外交政策的低谷，1967—1968年

1967年夏季內亂之后一年半的時間里，中國實際上在國際舞臺上沒有任何作為。但是，中國外交政策的真正悲劇是，1969年初中國人自己挑起的中蘇沖突本來是不必要的和可以避免的。1969年3月初的中蘇邊界沖突引起了俄國人軍事上的過激反應，使此后十年中國的外交政策喪失了主動權。這次沖突幾乎完全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內部政治問題和毛自己不明智的決定造成的。在此，我們先簡要論述一下1968年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幾件與對外關系有關的而在時間順序上并不相聯系的事情。

1968年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最疏遠的一年。盡管官方發布了禁令，暴力活動全年不斷發生，甚至黨和政府的重建工作也是過了很長時間才正式開始的。[[89]](#_89_Lai_Si____Mao_De_Dao_Lu____D)中國實際上已把政策工具減到了零。北京只能旁觀國外的事態，不時地發表一些評論，并開始恢復與前三年內和中國失和的那些國家間的關系。對于美國，中國只講它干的壞事，主要是與美國在越南的軍事作用有關的一些事情。[[90]](#_90_Xin_Dun_Bian____Zhong_Hua_Re)所以，它沒有采取任何改善中美關系的舉措，甚至一點暗示都沒有。直到1968年夏蘇聯人推翻捷克政府之后，情況才發生了變化。

對于越南，北京擔心的仍是河內可能會與美國認真談判，而不利用美國停止轟炸和提出各種和談建議并進行會談的時機部署下一次戰役。[[91]](#_91_Heng_Li__S_A_Er_Bin_Si_Ji)盡管有這些擔憂，盡管不同意武元甲的軍事戰略（春節攻勢即是證明），中國仍不斷向北越提供軍用物資和經濟援助。然而，中越兩國不和的證據也在不斷涌現出來。1968年6月，越南駐廣州、昆明和南寧的領事館前，均發生了群眾示威，抗議河內（在蘇聯調停下）接受美國提出的巴黎和談建議。駐昆明領事館還遭到了嚴重破壞。[[92]](#_92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

中國人對俄國人仍是一句好話也沒有，新聞媒介在所有問題上對克里姆林宮的指責越來越多。[[93]](#_93_1967__1968Nian_Wai_Guo_Guang)至少在此前的兩年內，中國沒有對莫斯科采取過多的不適當的暴力活動。1968年8月，東歐發生了將對中蘇關系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與邊界有關的問題將在下文述及）：蘇聯紅軍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此前，北京與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領導的捷克共產黨一直保持著距離，因為捷共奉行的顯然是修正主義的改革政策。然而，當俄國坦克出現在布拉格街頭時，中國馬上轉變立場，口頭上支持起這位（已被剝奪權力的）捷克領導人來了（雖然不支持他的改革計劃）。[[94]](#_94_Can_Yue_1968Nian_8Yue_23Ri_Z)蘇聯的軍事入侵使中國人大為震驚。勃列日涅夫提出為克里姆林宮行動辯護的理論（一個國家一旦成為共產黨國家，就永遠是共產黨國家，蘇聯負責單方面義務確保它們性質不變）以后，中國人就更是緊張不安。勃的理論推而廣之，顯然中國也會被包括在內。當時，俄國人在文章中指出，中國已不再是一個馬列主義的國家。他們對中國的譴責變得十分激烈。[[95]](#_95_Can_Yue_San_Pian_Lian_Zai_We)中國擔心它自己可能會成為蘇聯的下一個軍事進攻的目標。盡管這種擔心缺乏依據，但它卻在1969年初俄國人血灑烏蘇里江冰面的事件中起了相當大作用。按照毛的思維邏輯，殘酷的謀殺會使俄國人措手不及，還可能使他們在進攻中國之前有所醒悟。

中英關于香港問題和英國駐華外交官受虐待一事的爭執仍在繼續。1968年仍然發生了一些事件，盡管都不像1967年那般嚴重。[[96]](#_96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北京與印度尼西亞和緬甸（尤其是前者）的關系（或從外交意義上說，沒有關系）亦是如此。1967年末，為報復早些時候印度尼西亞駐北京使館遭搶劫，印尼群眾洗劫了中國駐雅加達使館，使館內的20名中國人受了傷，數名印尼人失去了性命，其中的幾個是被中國人開槍打死的。[[97]](#_97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最后，雙方各自召回了駐對方首都的外交人員。西哈努克盡管幾存疑慮，公開說中國擁有雙重動機，但中柬關系還是有了一些好轉。美國轟炸越共陣地和北越在柬埔寨的供應線的決定，直接導致了中柬兩國的初步和解。中國答應“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以幫助柬埔寨趕走美國人。1968年初，中國的軍事援助開始源源不斷地運往柬埔寨。[[98]](#_98___Ren_Min_Ri_Bao____1967Nian)（然而，北京同時也加緊了對反西哈努克的紅色高棉的武器供應和軍事訓練。西哈努克無力說服北京停止給這些叛亂者提供物質援助。這是他數年后被趕下臺的因素之一。）

1968年，中國對日本、印度和北朝鮮等對中國來說很重要的三個亞洲國家的政策引起了人們的注目。北京對東京的態度日趨強硬。“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中國經常拘捕和驅逐日本記者，理由是他們對中國國內的事態打聽得過分詳細。在1967年和1968年下半年，一些日本商人也遭到了驅逐。[[99]](#_99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其結果是，前來中國的商人和記者大幅度減少，甚至在廣州交易會上亦是如此。這對中日貿易產生了不利影響。1968年4月，中國指責東京在致力于用核武器重新武裝自己（后來甚至指責日本和南朝鮮在進行秘密軍事合作以反對中國）。[[100]](#_100___Ren_Min_Ri_Bao____1968Nia)這是中國外交政策犯的基本錯誤的最好的一個例子。這些錯誤是外交部保存的中國對重要國家的外交政策的檔案材料被毀壞造成的。

北京還對印度發起了宣傳攻勢，號召印度人民通過暴力推翻印度政府。北京給那加游擊隊秘密提供武器和軍事訓練，稱贊納薩爾巴里的農民暴動，贊揚比哈爾的騷亂，口頭上鼓勵印度共產黨（當時已分裂為三派）中的親北京派放棄走議會道路，改走暴力之路。[[101]](#_101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人民日報》在2月份的一篇社論中宣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讓印度的農民革命風暴更猛烈些吧！” 自然，印度政府對內對外作出的反應都很強硬。新德里更加接近莫斯科，決意把軍隊建得更強大，以便抗擊中國，還進一步限制了喜馬拉雅山邊境各邦的外交自治權。1962年中國入侵印度以后，中印間的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在1967年9月得到了驗證。當時，中印兩國的正規軍曾在錫金和西藏邊界作戰一周，雙方互有傷亡。這次戰斗勝負難分（這是印度軍隊的訓練和裝備都比以前好的結果），所以北京和新德里達成默契，都沒有聲張此事。[[102]](#_102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

1968年，中國發現北朝鮮的獨立性太大，對北京不利，而且平壤有可能在違背中國意愿的情況下，再次把中國拖入與美國的戰爭。1月，北朝鮮在其領海以外的水域捕獲美國的電子間諜船“普布洛”號，在朝鮮半島引起了一場危機。更重要的是，1965—1969年間，北朝鮮一直在變本加厲地向南朝鮮滲透，不斷在非軍事區和南朝鮮境內采取軍事行動，大幅度增加軍事預算，使之達到了一直在增長的國民生產總值的30％以上。對北京來說更糟的是，平壤向蘇聯靠攏過去了，不但在意識形態方面是這樣，而且還接受了蘇聯大量的軍事援助。而且，中國的紅衛兵猛烈抨擊北朝鮮的“修正主義”，指名遣責金日成是“百萬富翁和貴族”。1968年，中朝兩國正規軍之間還發生過武裝沖突。這可能是由于中國人（像在克什米爾的拉達克山區那樣）在雙方一直承認是朝鮮人領土的地方修筑公路而引起的。[[103]](#_103_Qia_Luo_Er__Bei_Er___Zhao_X)所以，中國領導人在1968年和1969年決定改變這種違背中國利益的傾向。唯一的辦法是竭力與金日成拉關系交朋友：申明同志友誼；支持他對南朝鮮的政策；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在意識形態方面更寬容一些。這一切當然需要時間。此后幾年中，中國一直在修復與北朝鮮的關系。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這個階段，兩國關系的修復工作至少已開了頭。

每年投票贊成接納中國為聯合國成員國的國家數目的減少和這些年來社會政治的崩潰對中國外貿的影響，是中國對外關系跌入低谷的最后兩個標志。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北京會在1971年前好幾年就能獲得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1965年前的幾年中，由于中國對前殖民地國家和它們加入主要國際組織之事采取溫和的政策，投票贊成中國進聯合國的國家逐漸增多。但是，“文化大革命”改變了增多的趨勢。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期，北京因為進不了聯合國，所以常指責聯合國（雖然它已不再支持1965年印度尼西亞首倡的計劃——建立一個針對西方的“革命性”國際組織）。[[104]](#_104_Sai_Mou_Er__S_Jin____Zhong)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必然會影響中國的對外貿易。但是，中國的國際貿易總額下降不多，1965年是38億美元，1968年是37億美元，以后迅速上升，1971年達到45億美元。[[105]](#_105_A_H_You_Sa_Ke_He_R_E_Ba_Te)當然，絕對數字并不高，因為“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國與70年代后期以來的中國不同，還未成為貿易大國。由于某些原因，“文化大革命”對外貿的影響確實不太大。首先，對外貿易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其次，許多出口工業基本未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或者說受損頗輕。再次，北京的主要出口來源——農業也幾乎未受影響。凡貿易受到影響的，原因主要在于交通和某些特殊的行業遭到了破壞，而不在于普遍的動亂。這說明，“文化大革命”在某些特殊的地方和行業表現得很突出。此外，貿易總額的下降是由于中國人傾向于保持每年進出口總額的平衡。所以，當出口下降時，進口亦受到限制。由于糧食進口大幅度減少，按說中國人的日常食物和攝入體內的熱量會受到很大影響。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中國動亂主要發生在城市，農業基本上未受干擾。

有一項變化值得注意：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國的對外貿易從60年代初開始一直在擺脫蘇聯和東歐，轉向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當然美國除外）。1970年，與發達國家的貿易額占中國外貿總額的53％，而1965年只占39％，與共產黨國家的貿易額則從1965年的30％降至1970年的20％。這時，中國進口的工業品和技術的大部分、農產品的絕大部分均來自日本和西歐。結果出現了較大的貿易逆差，差額部分由與香港和不發達的非共產黨國家間的貿易順差來彌補。此外，中國與共產黨國家的貿易在1970年末也開始有了明顯的增加。1970年，中蘇貿易額減至4700萬美元，但次年又回升到14500萬美元。中國與東歐的貿易沒有像中蘇貿易那樣大幅度下降。

鑒于蘇聯軍隊的集結（將在下文述及）和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的政治后果，中蘇貿易在1971年就能恢復正常確實是出人意料的。原因似乎是，中國對莫斯科及其東歐仆從國愿意提供的東西——主要是民用飛機和機器零件——非常需要，而對俄國人的政治和軍事侵略進行懲罰的能力卻嚴重不足。這個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北京外交政策的總方向——實際上是變化無常——是一致的。但其絕對貿易額是如此之小，可以說這個階段中國的外貿主要是象征性的而非實質性的。只是到后來，中國才把外貿當成了一種主要的政策手段。

## 1969年的中蘇邊界沖突

1969年初，北京決定把長期存在的中蘇邊界爭端軍事化。如果沒有這個過分稱強的決策，“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外交關系的總體發展可能只會造成不幸但無大礙的畸變。中國為什么要這么做（尤其是在中國國力尚弱的時候），至今仍是一個難解之謎。1969年3月2日烏蘇里江珍寶島上發生武裝沖突的原因，至今仍沒有一種令人信服的解釋。[[106]](#_106_Lu_Bin_Xun___Zhong_Su_Bian)下文試作一些綜合分析，盡管主要的事實也許永遠不會為人所知。邊界事件的發生，大大改變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方向和“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中美蘇戰略三角關系的整體格局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107]](#_107_Fu_Nong__A_Si_Pa_Tu_Li_An)

中蘇邊界爭端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中國和俄國簽訂第一批條約的17世紀。[[108]](#_108_An_Tai_Shun__Yin_____Zhong)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幾年中，中蘇之間無邊界爭端，直到50年代末蘇共和中共發生爭吵，邊界問題才再次凸現出來。因此，邊界問題不是造成北京和莫斯科不和的原因，但邊界卻常常是表現中蘇分歧的地方。另外還有一些與邊界有關的特殊問題造成了中蘇關系的緊張，如在某些不動產的確切位置和所屬權方面的分歧；與締結邊界條約的歷史過程有關的問題；關于履約的分歧；邊界地區的管理問題，包括界河航行、島嶼和江岸的歸屬權等爭議問題。[[109]](#_109_Tong_Shang_Shu__Di_58__90Ye)

在意識形態分歧導致莫斯科和北京軍事同盟解體以前，上述問題常被有意淡化，或者也比較容易解決。中蘇分裂之后，此類遺留問題再次凸現，成為中蘇之間主要的分歧問題。1966年左右軍事化傾向的加劇，使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起邊界問題了。這使中蘇兩國的關系更趨緊張。這些分歧遲早會演變成暴力沖突，并喚醒潛藏的種族、歷史和本能的互相提防和擔憂。

1960年以來，邊界事件日趨增多。俄國人聲稱，從1962年夏開始，中國“蓄意挑釁”的次數逐年增加。到1967年，邊界形勢已相當嚴峻。不但有報道說1967年1月雙方在烏蘇里江發生了一次沖突，而且俄國人還對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瘋狂的挑釁行為進行了公開指責。1967年12月7—9日和23日，以及1968年1月末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又發生了一些事件。邊界事件雖然在1969年3月2日發生武裝沖突以前一直沒有中斷過，但俄國人逐漸掌握了一種不用武力解決邊界糾紛的辦法。在3月份的珍寶島事件中俄國人就使用了這種辦法。[[110]](#_110_Lu_Bin_Xun___Zhong_Su_Bian)

這好像證實了蘇聯的說法，中國人對俄國人的指責只始于1967年1月23日“入侵”珍寶島。中國人指責俄國人“撞我漁船，搶我漁網，用高壓水龍頭噴射我漁民，甚至綁架我漁民”，打傷中國邊防戰士，搶劫武器彈藥，侵犯中國領空。后來，中國還指責蘇聯的坦克、裝甲車和汽艇侵入中國領土領水，“強行驅逐我國居民，搗毀房屋，搗壞生產和生活用具”。[[111]](#_111_Xin_Hua_She_Xiao_Xi_1969Nia)這些互相指責當時還不過是對邊界某些地段的劃分存有分歧和發現邊界是表現緊張關系的主要窗口的兩個不友好國家之間發生的一些普通事件。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都越來越嚴肅地看待對方的行動。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奪權活動開始后，中蘇雙方也開始了針鋒相對的報復活動。為什么會這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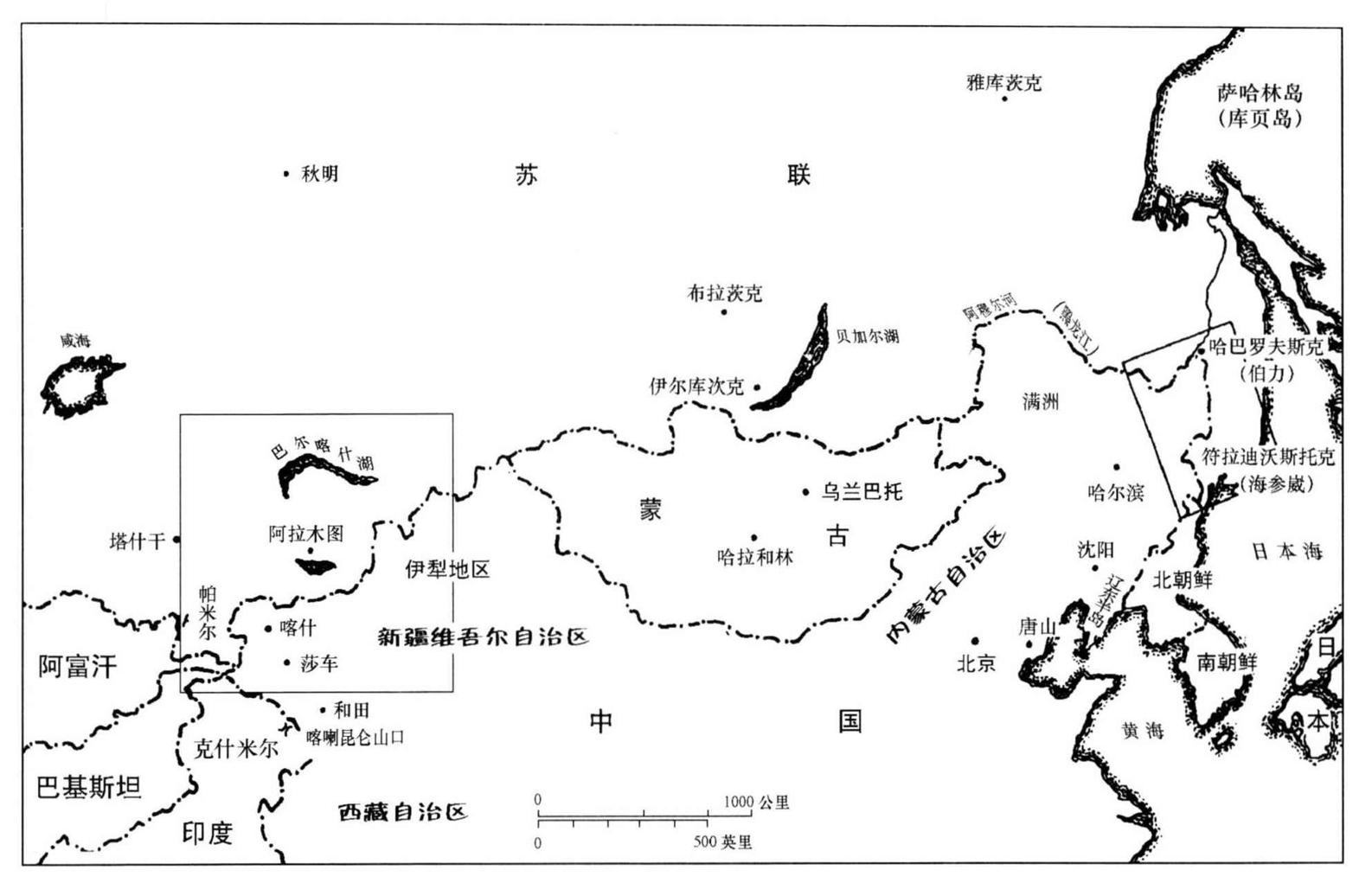
長期以來，中蘇雙方在邊界部署的軍隊數量大體相當：中國人在東北邊界占優勢，俄國人在新疆地區占上風。蘇軍武器和后勤供應較占優勢。1959年以前，中國人對這種狀況既不擔心，亦未提出挑戰，俄國人也不仗勢欺人。60年代初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分裂后，雙方軍隊的部署仍保持防御性態勢。由于邊界事件在1959年至1969年間每年都有增加，雙方可能都相應地加強了邊防部隊。但在1967年以前，雙方都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增兵，也未改變傳統的軍事部署。然而，從1965年末開始，蘇軍進入了更高的戰備狀態，配備了更多更好的武器，部隊人數也有所增加。蘇聯還與蒙古簽訂了一項新的軍事協定，獲得了在蒙古駐軍和保持基地的權利。[[112]](#_112_Lu_Bin_Xun___Zhong_Su_Bian)

中國方面沒有采取相似的行動。1965年中，中國人正在進行軍事戰略的爭論。“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權力斗爭使總參謀長羅瑞卿遭到了清洗。由于林彪竭力運用毛澤東思想提高軍隊的素質，致使軍隊喪失了戰斗力。此外，越南戰爭使中國人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南方。因此，中國人對蘇軍的所有軍事動作都未作出相應的反應。[[113]](#_113_Ha_Li__Ge_Er_Man____Su_L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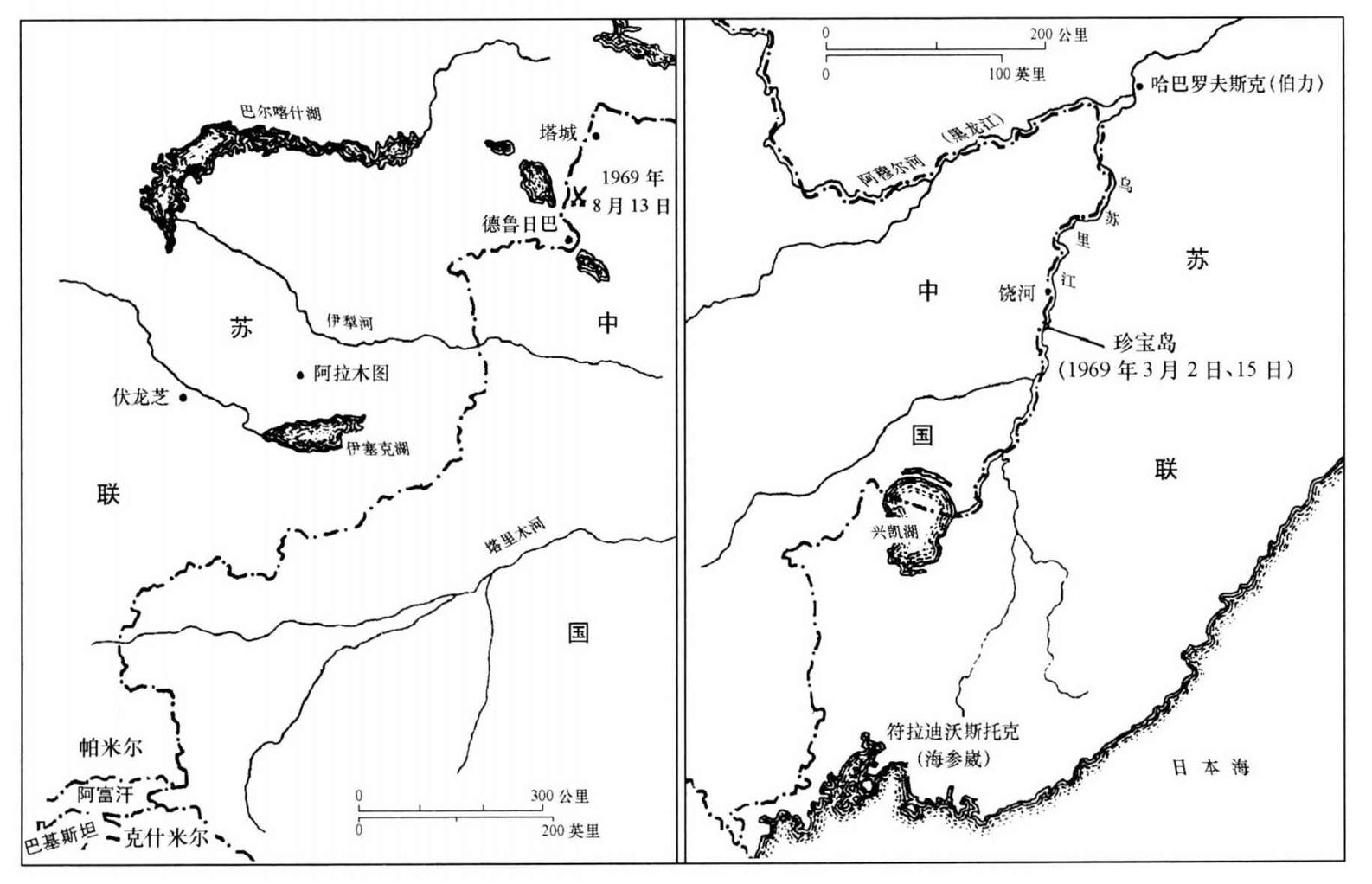
1967年，因“文化大革命”而生的邊界事件層出不窮，這在蘇聯人看來成了越來越不祥的征兆。他們增加了邊防軍的數量，因而引起了陳毅的公開指責。[[114]](#_114___Lian_He_Chu_Ban_Wu_Yan_Ji)蘇聯軍事集結最重要的步驟是在蒙古領土上部署了戰斗力很強的部隊。到1967年11月，幾個師的蘇聯軍隊已部署在蒙古的永久性基地上。這一大規模的集結打破了雙方的軍事平衡。中國人竭力調整軍事部署，從福州軍區抽調了幾個師到中蒙邊界。北京還開始高度重視邊疆各省生產建設兵團的重要性。[[115]](#_115_Jiang_Yi_Shan___Gong_Chan_D)但是，中國領導人顯然在考慮采取更直接的行動。

1969年3月1日深夜，大約300名身著白色偽裝的中國邊防軍和正規軍從中國一側的岸邊越過烏蘇里江上的冰層來到珍寶島，在一片樹林中挖好掩體，架好通往指揮所的電話線（指揮所位于烏蘇里江中國一側），在草墊子上潛伏下來。[[116]](#_116_Lu_Bin_Xun____Zhong_Su_Bian)3月2日清晨，珍寶島以南的蘇聯哨所里值勤的哨兵向上級報告了江岸上中國人的活動情況。上午11時左右，二三十名中國人邊向珍寶島前進邊高呼毛主義的口號。蘇聯指揮官斯特列爾尼科夫率部分人員乘兩輛裝甲運輸車、一輛卡車和一輛指揮車駛向珍寶島。抵達該島后，斯特列爾尼科夫和幾個人走下車來，像往常一樣警告正在逼近的中國人。俄國人按照平常應付此類情況的辦法，把自動步槍挎在胸前，挽起胳膊阻止中國人通過。這時雙方發生了爭執。中國人列隊前行，看上去沒帶武器。但當他們走到離俄國人約20英尺時，第一排的人突然散開到兩旁，第二排的人迅速從大衣底下抽出手提機關槍向俄國人開了火。斯特列爾尼科夫和另外六人當場斃命。與此同時，埋伏在俄國人右側散兵坑中的300名中國人也開了火，打了俄國人一個措手不及。迫擊炮、機槍和反坦克火箭筒也從中國一側的江岸上吼叫起來。后來，中國人向俄國人發起沖鋒，雙方展開了肉搏戰。最后，蘇聯人被擊敗了。中國人（據俄國人說）帶走了19名俘虜并很快加以殺害。他們還帶走了蘇軍的武器裝備（后來進行了展覽）。

珍寶島以北蘇聯哨所的指揮官布別寧看到發生了戰斗，即率部趕往出事地點。他乘坐一輛裝甲車來到中國軍隊的右側，迫使他們分散了火力。但他也進入了中國人為斯特列爾尼科夫準備的伏擊圈。布別寧的裝甲車被擊中，他受傷后暈了過去。醒來后他設法爬進另一輛裝甲車，繼續指揮戰斗。此后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后來，俄國人占了上風，一度曾包圍了中國人，最后迫使剩下的50—60名中國人退回了烏蘇里江中國一側。



地圖3 中蘇邊界



地圖4 中蘇沖突（1969年3月、8月）

3月15日的戰斗有些不同。[[117]](#_117_Lu_Bin_Xun____Zhong_Su_Bian)雙方的準備都很充分，投入的兵力較多，損失更大，戰斗持續的時間更長。雙方都是有備而來。與3月2日的沖突不同，說不清究竟是哪一方先挑起3月15日的沖突的。3月14日深夜，俄國的一個偵察小隊潛伏在珍寶島，引誘中國人發動正面攻擊。中國人說蘇方在凌晨4點左右向該島和江灣派了“許多”坦克，襲擊了中國的巡邏兵。不知道襲擊中國的巡邏兵何以需要如此多的部隊。俄國人說他們的兩輛裝甲車在凌晨巡邏時發現了一隊中國人，據說他們是第一天夜里埋伏在珍寶島上的。無論起因如何，戰斗在上午打響了，中方江岸上的迫擊炮和大炮吼叫了起來。

中國此次投入的兵力超過了一個團（約2000人）。他們沖過冰層攻占了珍寶島的一小部分。當俄國人看到中國人沖過來，即從裝甲運輸車中以機槍掃射，試圖阻止他們前進，但當他們發現中國人較多時，即撤退了回去。（俄國人報道說中蘇兵力是10∶ 1）。中國人的炮火不但轟向蘇聯軍隊，而且轟向烏蘇里江主航道以東冰面，試圖阻止蘇軍重型車輛的運動。俄國人采取美國人在朝鮮戰爭中運用的戰術，先讓中國人靠近，然后以大量坦克、裝甲車和裝甲運輸車發起反擊。下午1點，蘇軍大炮形成猛烈的阻擊火網，向中國江岸上的陣地縱深處猛轟，最遠達到了四英里。蘇軍共發動了三次反攻，三次都攻破了中國人的陣地。前兩次反攻因彈藥耗盡而退回，但第三次反攻擊潰了中國人，迫使他們帶著傷員和尸體撤回了江岸。晚7時，持續九個多小時的戰斗終告結束。蘇方損失約60人（包括邊界哨所的指揮官）；中方損失800人，雙方的數字可能都包括死者和傷者。

#### 1969年3月邊界事件的原因

由于我們研究的是一個獨立的事件，且缺乏高質量的第一手資料，所以不可能對中國人在1969年3月2日打響第一槍的原因作出最后的結論。或許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一些探索：中國的地方局勢；中國首都的政治斗爭；外交政策方面的動機。[[118]](#_118_Ci_Chu_Can_Kao_Le_Lu_Bin_Xu)

就地方局勢而言，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中國邊界地區的地方指揮官可能有在邊界形勢特別緊張時采取軍事行動的自由。授予較大軍事單位的指揮官以自由處置之權，是守衛漫長國境線的一種合理的管理辦法。考慮到地方政治形勢變幻莫測，特別是1969年初軍隊開始在全國行使權力，很可能有性急的指揮官擅自行動。但是，中方的行動實際上（如果我們相信的話）是有計劃有準備的。這說明行動是受上級控制的。

第二，3月2日發生的事也可能是偶爾在珍寶島上相遇的普通巡邏兵之間的局部性沖突。這似乎與一年前中國和印度的沖突相同。如果真是這樣，蘇聯人就會聲稱中了中國人的埋伏，以此掩蓋其作戰失利的事實，中國人則會閉口不言，希望不要招致俄國人的報復。這實際上是根據統計資料說話，很難被駁倒。結論是此類事件或遲或早總會發生，終于于3月2日在珍寶島上發生了。然而，俄國人提供的戰斗過程的詳細程度，以及他們表現出的極大的義憤，又不能不使人相信，這次事件確實是經過周密策劃的。

第三，在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沈陽軍區、珍寶島當地的中國指揮官以及他們在北京的上級領導之間可能存在意見分歧和通信不靈的情況。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可能想對林彪顯示自己的重要性，或者是地方指揮官想對陳顯示他們的重要性。但是，軍隊通常不會這么做。軍隊是從上到下指揮系統十分嚴密的組織。如果真的發生了此類竭力顯示自己恪盡職守的事情，考慮到它給中國帶來的可怕后果，那么有關的當事人肯定會被立即解除職務。但是，就我們所知，沒有人因此而被解除職務。

更具說服力的解釋也許在國內的政治斗爭方面。最大的可能性是，北京的派系斗爭非常激烈，某些派系意識到他們實際上是在為生存而戰，因而采取了極端措施。1969年初，中國有許多派系在爭奪權力，中央“文革”小組的理論家，周恩來手下的政府官員，林彪領導的軍隊，尚存的群眾革命組織和——借不停頓的動亂來提高自己的權威——毛澤東。然而，有動機、有權力、有指揮系統下達伏擊蘇聯軍隊的命令的只有毛澤東和林彪兩人。江青及其追隨者缺乏指揮系統，周恩來不會那么傻，會認為中國能采取這種大膽的行動而不受到任何懲罰。

林彪確實有許多理由要加強自己的權力。他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但他尚未獲得能夠幫助他度過繼承權力后的危險期的那種支持。另外，他不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樹敵不少，而且未能使大家（毛澤東除外）相信他是合適的接班人。在應該由軍隊還是由政府在“文化大革命”的新階段（始于1968年9月1日）中控制全國一事上，林、周之間顯然存在嚴重分歧。林也許覺得外國的威脅會給繼續實行軍管提供更充分的理由。這樣，他長期掌權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中國問題學者可以找出充分的證據來證明這種可能性，特別是考慮到隨后的權力斗爭導致了1971年下半年林彪的死亡。[[119]](#_119_Guan_Yu_Lin_Biao_Shi_Bai_He)

第二種可能性是，中央領導層（毛、林、周、江青）一致認為有必要以邊界沖突來轉移民眾對國內緊張局勢的關注。隨之而來的戰爭恐慌和由此激發的民族主義情緒，可能會使領導層得以完成基于意識形態觀念制定的重建中國的長遠規劃。這些規劃是以前制定的，但被行政官僚們破壞了。顯然，到1968年底或1969年初，有些人希望改變“文化大革命”的進程，恢復社會秩序。另一些人則想繼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所謂“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據說它能保證中國永遠擺脫“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這兩派人之間顯然存在嚴重分歧，且相持不下。如果我們假定毛、林和江青贊成走后一條路（周會被迫追隨），那么他們可能會認為采取一次驚人的突然行動才是打破僵局的最好辦法。讓蘇聯人出點血會使大眾情緒高昂，還可克服政府官員的拖拉作風。這當然有前提條件：蘇聯的確是個紙老虎，換句話說，即莫斯科的反應是有限度的。如果俄國人反應強烈，那么他們的行徑可以被當作證明社會帝國主義的可怕本質——一個國家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后會發生什么——的最生動的例子。

最后一個方面是北京外交政策的動機。第一（也是最重要的），1968年8月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克里姆林宮對勃列日涅夫主義的宣揚，貝加爾湖以東紅軍力量的加強和蘇聯邊界巡邏兵的挑釁行為，都使中國人大為驚恐。毛和其他領導人也許認為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盡早采取行動，給俄國人迎頭一擊，警告他們不要繼續進行軍事冒險。中國人不得不冒蘇聯軍事報復的風險，因為俄國的坦克無論如何都能迅速集結在中蘇邊界。

第二（與第一點密切相關），每當中國共產黨發覺敵人的優勢兵力即將發動進攻時，其應對策略（這是從上海、江西和延安時期的痛苦經驗中總結出來的）都是：在他們自選的時間和地點先發制人，不但能使敵人措手不及，甚至可能完全阻止敵人前來進犯。這就是珍寶島沖突的由來。[[120]](#_120_Wei_Lian__W_Hui_Te_Sen____Z)

第三，毛也許擔心，盡管他讓中國人民了解了以修正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帝國主義的種種罪惡，但仍需采取一些補充措施，因為修正主義的毒素依然沒有根絕，依然存在于中國的政治肌體中，為防止其蔓延，還需要打預防針。這樣，中國人民才會永不再受“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的誘惑。制造珍寶島事件是為了在中蘇之間播下不和的種子。

最具說服力的解釋也許是上述三種動機（它們是相輔相成的）和政治斗爭方面的兩種動機的綜合。后兩種動機也是相互關聯的，并可作為前三種動機的旁證。而且，這兩個方面都還有另外的證據。就國內而言，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領導層對如何回應蘇聯的威脅進行過爭論。在此之前有過多次爭論（最后一次是前文述及的1965年的“戰略之爭”），其中確實有過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它表明各派之間在這個問題和其他更廣泛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布拉格事件后再未發生爭論，表明領導層的意見比較一致。這也許意味著各派之間的分歧尚不尖銳，也許意味著（這一點更有可能）所有的人都認識到了外來威脅的嚴重性，意識到如果俄國人發動進攻，“文化大革命”甚至中共的統治都有可能被推翻。

就國際方面而言，北京顯然認為蘇聯的威脅非常嚴重，中國應該尋求其他外國的援助。不論這對中國某些領導人如何難以置信，當時中國所能求助的國家確實唯有美國。所以，從1968年晚秋開始，中國謹慎地對1965年以來約翰遜政府經常發出的信號作出了試探性的回應。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停止了對華盛頓的口誅筆伐，并建議恢復華沙談判。[[121]](#_121_Tuo_Ma_Si__M_Ge_Te_Li_Bu)1969年3月以前，中美會談沒有取得多大進展。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人不認為中國應該利用另一個核超級大國的利益和政策手段來求得對付俄國人的安全保障。

這樣，中國的外交政策在這個階段結束時又回到了開始時的狀態。中國的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又緊緊地纏繞在一起。中國深深地卷入了蘇美紛爭，其政策取決于美蘇兩國的力量消長。當然，這一點是幾年之后才變得十分明顯的。在這期間，中國因侵犯蘇聯和違背本國的利益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它失去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外交政策方面暫時獲得的行動自由（不管這種自由究竟有多大）。毛的首要目標是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但其革命性因毫無意義的反蘇示威和大挖防空洞的活動而消逝了。

#### 緩和邊界危機，1969年

從第二次珍寶島沖突開始，蘇聯采用了向中國實行壓力外交的新策略。這個策略把外交和軍事壓力結合在一起，旨在使中國明白，蘇聯不但愿意談判邊界問題，而且希望以邊界爭端的解決為契機全面改善兩國關系。這樣一來，邊界地區的壓力就有了雙重目的：一是解決蘇中關系中存在的重大問題，二是與北京一起就解決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方面的分歧進行“會談”。克里姆林宮認定邊界爭端的“成功解決”（邊界會談將導致一個談判解決）是值得全力爭取的，縱然這可能會使其他方面在短期內停頓不前。

蘇聯人冒險采用了壓力外交的策略。外交活動與懲罰性的軍事行動以及制造中國將會遭受更慘重損失的威脅并舉。他們還認為有必要加強其在整個蘇聯—蒙古—中國邊界線上的軍事力量，以支持新發起的政治軍事攻勢，防止第一次珍寶島事件的重演。克里姆林宮試圖通過常規部隊的絕對優勢控制地區局勢，通過諸軍兵種部隊（包括核武器在內）的絕對優勢控制戰略局勢。這意味著反華的大規模升級。這必然打亂蘇聯的經濟秩序，把北京推向西方。當時，為了維護蘇聯邊界的安全，莫斯科抱有投機心理，認為它可以應付中國的任何長期性反應以及任何短期性的反蘇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現在看來，這是一次得不償失的冒險。蘇聯的邊界安全雖然得到了保障，但付出的代價太大：（1）引起了中國的擔心和敵視；（2）促使中國下決心實現經濟和軍事的現代化，以便與蘇聯相抗衡；（3）難以實現簽訂邊界條約的目標；（4）導致了以美國和中國為首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強國結成反蘇聯盟的危險。

關于這些軍事舉措的嚴重程度以及它們的內在聯系有多大，是否對邊界談判及中蘇總的關系形成一股壓力（或成了這兩方面狀況的指示器），這個問題如果沒有更準確的資料，是不可能得出站得住腳的結論的。不過，從1969年3月的沖突到9月11日周恩來和柯西金在北京的會晤，蘇聯顯然一直在利用邊界沖突作為向北京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以求恢復1964年末中斷的邊界談判。自9月會晤和10月20日談判恢復之后，雙方對發生事件的公開報道大體上能反映出談判進入了哪個階段，而事件發生的次數、地點和規模則能反映出談判的進展情況。即使在雙方都不公開承認發生了邊界事件的時候，雙方仍在利用軍事沖突來試探對方的防衛能力和加強己方在談判中的地位。

1969年3月以后的邊界事件可分為兩類：周恩來和柯西金會晤之前發生的為一類，會晤之后發生的為另一類。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發生后不久，蘇聯即發起了一場反華運動，并輔以暗示要進行核攻擊，要給中國造成災難性的后果。這場運動在8月末達到了高潮。雙方公開承認的沖突發生在6月10—11日，7月8日和22日，以及8月13日。[[122]](#_122_6Yue_10__11Ri_De_Shi_Jian)兩國政府還指責對方在4月到7月間挑起了另外數十次沖突事件。[[123]](#_123___Zhong_Guo_Da_Lu_Bao_Kan_G)

公開報道的沿著邊界發生事件的地點相當分散：有些在烏蘇里江，就是爆發3月沖突的地方；有些在黑龍江中的島嶼上；有些在中蒙邊界，而更多的則在新疆和哈薩克斯坦交界的地區，距中國的核試驗基地羅布泊和歷史上兩國間的入侵路線準噶爾山口不遠。鑒于中國軍隊專注于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事務，鑒于蘇聯在戰略上占有優勢，鑒于蘇聯曾暗示，如果中國拒絕恢復邊界談判，它將采取更嚴厲的措施，所以很難想象這些沖突是中國首先挑起的。在某些時候，不排除有中國軍隊先發制人以防蘇聯發動進攻的情況。[[124]](#_124_Zhong_Gong_Jun_Dui_Li_Lai_B)但這絕非中國整體戰略的一個部分，因為中國的實力相對而言比較弱。相反，我們應該看到，1969年9月11日以前是莫斯科使用政治、軍事和宣傳手段的典型時期，目的是逼迫中國恢復邊界談判（若非如此，中國會拒絕談判的），并教訓中國人不要再重演珍寶島沖突之類的驚人事件。

因此，蘇聯在采取這些軍事行動的同時，還向中國發出了一系列照會，表明了它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還建議通過簽訂一項邊界新條約一舉解決所有分歧。莫斯科對中國人根據自己的歷史觀或思想觀提出的詰問避不作答，卻始終以軍事行動配合外交照會。蘇聯在3月29日的聲明中要求恢復談判，[[125]](#_125_Ta_Si_She_Xiao_Xi____Zhen_L)4月11日又重申了一次。[[126]](#_126___Su_Lian_Dong_Tai____1969N)早在3月21日，蘇聯總理柯西金就曾打電話給中國領導人，但被潑了一頭冷水：林彪拒絕與他通話。[[127]](#_127_Lin_Biao___Zai_Zhong_Guo_Go)中國領導人顯然擔心，如不同意恢復談判，蘇聯必會采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所以他們拒不與蘇聯直接對話。蘇聯人繼續挑起邊界事端，逼迫中國人坐到談判桌邊，同時試探中國人的反應。4月1—24日，中共召開了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毛當時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在會上說，中國政府對蘇聯的建議正在“考慮給予答復”。中國實際上是在拖延時間。[[128]](#_128_Lin_Biao___Zai_Zhong_Guo_Go)

俄國人決定通過界河航行談判來試探一下中國人是否已做好全面恢復邊界談判的準備（自1951年以來這種談判每年都要舉行）。所以，4月26日莫斯科建議雙方于5月在伯力恢復這個低級別的會談。[[129]](#_129___Zhen_Li_Bao____1969Nian_5)中國人遲至5月11日才作出肯定的答復，建議6月中旬舉行會談。[[130]](#_130___Zhong_Guo_Dong_Tai____196)俄國人于5月23日宣布接受中國的建議。[[131]](#_131___Su_Lian_Dong_Tai____1969N)會談如期舉行，但在議事日程方面雙方未達成一致意見，7月12日蘇聯人聲稱中國人已“斷然拒絕”繼續會談。這顯然是中國人試圖把不平等條約問題列為會談內容而造成的。像在1968年毫無結果的會談一樣，北京希望這么做能使俄國人拂袖離去。但是，這次俄國人堅持不走，并顯然在借助進一步的軍事行動（7月8日在黑龍江上發生了一次事件，當時蘇聯的太平洋艦隊正在黑龍江江面上“操練”）威脅中國人，在他們發表聲明后數小時，中國人就“決定留在伯力，同意繼續進行會談”。[[132]](#_132___Su_Lian_Dong_Tai____1969N)后來，談判內容超過了原先議定的維持界河航行和制定新的航行條例的范圍，雙方于8月8日分別公布了達成的一項新協議（俄國人強調它對進一步談判邊界問題有重大意義，但中國人卻淡化這次會晤）。[[133]](#_133___Niu_Yue_Shi_Bao____8Yue_9)

這次試探使莫斯科確信，只要給予適度的壓力，北京是可以坐到談判桌邊并簽署協議的。蘇聯使用的主要手段仍是武力威脅。此外，蘇聯人還堅持在外交和意識形態兩方面孤立中國人。莫斯科的對美政策存在固有的矛盾：一方面繼續緩和雙邊關系，另一方面又與美國在第三世界爭奪勢力范圍，并加強其戰略力量以與美國爭高下。蘇聯立場的這個弱點不久因中美的和解而暴露無遺。

然而，莫斯科在共產主義世界中擁有重要地位，能夠獲得盟國對其既定立場的支持。有段時間，莫斯科一直在努力召集所有支持它的執政和在野的共產黨舉行大會，討論當時意識形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問題，像往常一樣，發表一項全體成員都同意作為行動準則的集體宣言。中國當然拒絕參加此類活動，也未參加1969年6月5—17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全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134]](#_134_Zhe_Ci_Hui_Yi_De_Jiang_Hua)會前，蘇聯人曾向羅馬尼亞共產黨和其他黨保證，他們既不會把會議變成批判中國的大會，也不會宣告把北京排除在共產主義運動之外。然而，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發表的重要講話卻對中國領導人充滿了敵意。在邊界問題上，他指責中國蓄意挑起沖突并且把戰爭看作“積極的歷史現象”。他再次建議通過談判解決爭端。勃列日涅夫對中國“毫無根據的領土要求”進行了猛烈抨擊，并說：“今后發生的事情會表明，中國領導人是不是真的愿意談判并達成一項協議。”[[135]](#_135___Dang_Dai_Su_Lian_Bao_Kan)大會通過的正式文件只字未提邊界局勢或中國，遵守了蘇聯人關于不涉及該問題的承諾。[[136]](#_136___Zhen_Li_Bao_______Xiao_Xi)然而，勃列日涅夫會后在《共產黨人》雜志發表的文章中卻提到了該問題，聲稱毛的政策“在大會上受到了嚴厲譴責”。[[137]](#_137___Gong_Chan_Dang_Ren____Di)

對于蘇聯人提出的恢復談判的建議，中國人經最大限度的拖延之后才作出了答復。5月24日，他們又就邊界問題發表了一個長篇聲明。[[138]](#_138_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聲明提出了中國就一項新條約進行談判和劃定邊界線的五個前提條件。這些條件申明了中國在以后的談判中的立場，摘要如下：

蘇聯人必須承認有關目前中蘇邊界條約的不平等性質；如果蘇聯人承認了這一點，中國愿以這些不平等條約“為基礎，確定兩國邊界的全部走向，解決邊界上存在的一切問題”。

俄國人據說是通過違反不平等條約而占據的中國領土，“原則上”必須歸還中國。做到了這一點，就“可以根據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原則，對邊界的個別地方作必要的調整”。

蘇聯人必須停止一切“挑釁和武力威脅”，包括炮火襲擊和核攻擊。

雙方均不將邊界實際控制線向前推進。至于邊境河流中的島嶼，雙方以主航道中心線（就是河流中最深處線）決定其歸屬權。

在明確劃定界線之前，一方居民在另一方領土上“按照慣例”進行的“正常生產活動”（如珍寶島等島嶼上的居民和帕米爾地區的牧羊人等）不受干擾。

聲明還說，如果蘇聯同意這些條件，中國就恢復談判，以便達成一項平等的協定。前兩項條件正是造成1964年談判破裂的原因。如果莫斯科同意了第一條，就有可能得歸還17—19世紀俄國占領的大片中國領土，或使克里姆林宮一開始就白白地丟掉進行討價還價的一個重要砝碼。第二條也許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因為俄國人不可能歸還如此大面積的領土）。由于邊界的劃分從未達到讓雙方均滿意的程度，也由于1917年以前俄國人確實占據了中國所宣稱的是屬于它的大片領土，如果蘇聯同意這項條件，不但會把對這個問題的所有決定權送給北京，而且還得把諸如黑瞎子島一類的大片土地還給中國。黑瞎子島位于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交匯處，是伯力的天然屏障。鑒于蘇聯一直拒不接受中國關于這段邊界的劃界建議，中國在聲明中提出舉行談判的五項先決條件就顯得不太認真。此外，后三項條件的目的在于保衛中國領土，防止蘇聯的進攻。這將使俄國人無法保衛本國的領土，使之免受中國人在珍寶島上發動的那種突然襲擊，將迫使莫斯科承認，迄今由蘇聯控制的主航道中國一側的島嶼的主權屬于中國，還將使中國人像過去的許多年中一樣，繼續在蘇聯領土上四處活動，因此（在新的緊張環境中）而使發生軍事沖突或宣傳戰的可能性大增。

不過，中國人畢竟稍稍開啟了恢復談判的大門。蘇聯人看重這一點，所以沒有完全拒絕中國的要求。在1969年6月13日給中國的照會中，[[139]](#_139___Zhen_Li_Bao____1969Nian_6)蘇聯在拒絕中國五項條件的同時，對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作了詳細的闡述，建議雙方在兩三個月內舉行會談，達成一項明確的協議。蘇聯的這種克制態度在照會中表現得很清楚：

蘇聯方面贊成下述各點：（1）對邊界線上沒有爭議的地段，雙方申明一致意見，并以條約文本為基礎，經共同協商，就邊界線的勘定達成一項諒解；（2）對發生了自然變遷的地段，雙方可以根據已有的條約，本著互諒互讓的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邊界線進行劃分；（3）雙方簽署共同認可的文件，把達成的協議記錄在案。

關于條約，蘇聯堅持的是“信守公約原則”，而對邊界線的勘定，則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變遷部分和對已有邊界作更精確的劃分上。中國對條約堅持“情勢不變原則”，提出了恢復談判的先決條件，但對邊界的劃分，也同樣注重已發生的自然變遷——當然是有利于中國的——部分。[[140]](#_140_Xin_Shou_Gong_Yue_Yuan_Ze_S)

由于存在這些分歧（它們源于中共和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不同立場，更源于俄國人的軍事優勢），談判并未馬上恢復就不足為奇了。由于中國人的拖延策略，且不愿與蘇聯人面對面進行談判，莫斯科不得不做出抉擇：或者讓問題繼續懸而不決，或者迫使其有所進展。由于1969年春末夏初邊界事件仍持續不斷（這顯示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危險性），也由于邊境河流航行談判已表明中國人可以被推到談判桌邊，所以莫斯科決定通過集結軍隊、有分寸地擴大邊界沖突、威脅使用更嚴厲的暴力手段和要求在不帶先決條件的情況下舉行談判，以迫使北京就范。這個過程貫穿于整個1969年夏，但直到9月初，中國人仍不屈服。就在這個時候，胡志明逝世了。他在遺囑中特別要求俄國人和中國人了結他們的分歧，他在河內的葬禮可為中蘇雙方代表提供一個中立的會面場所。莫斯科馬上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建議，但是北京不愿在整個夏季都遭受軍事打擊和核威脅以及中國國內局勢仍不穩定的情況下與蘇聯會談。所以，由周恩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在碰到參加葬禮的蘇聯代表團之前，就離開河內回國了。[[141]](#_141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9Ni)

然而，俄國人還是給北京送去了明確的信息。蘇聯代表團團長柯西金在從河內回國途中（他的飛機已降落在蘇聯的塔吉克共和國），接到了莫斯科要他前往北京與周恩來會晤的電報。9月11日，這兩位政治家舉行了歷史性的會晤。[[142]](#_142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9Ni)曾竭力避免與俄國人見面的中國領導人明確表露了他們的不快：會晤只持續了不到三個半小時，而且是不顧蘇聯人的反對在北京機場而不是在市內舉行的。此舉與過去幾個世紀中國人對外國人的蓄意侮慢是一脈相承的。然而，二人達成的協議實現了蘇聯一直尋求的目標：恢復邊界談判，停止邊界沖突。雖然雙方都未正式公布機場協議的內容，但據半官方消息透露，柯西金提出了下述建議：[[143]](#_143___Shi_Jie_Bao_____Ba_Li__19)

1.維持邊界地區的現狀。

2.避免再發生軍事沖突。

3.在邊界地區的某些地點建立非軍事區。

4.恢復邊界談判，以已有條約和邊界現狀為談判的基礎，對邊界線進行調整。

5.恢復邊界居民的遷移活動，特別是蘇聯工人在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黑龍江沿岸地區的遷移活動。

就蘇方對要談的問題和談判的基礎所作的狹窄的理解而言，這顯然是一個勝利。不過，前三點對中國也有好處，因為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蘇聯的軍事威脅。在何處建立非軍事區及非軍事區面積的大小問題將使雙方產生爭議，中國人將利用這些問題阻止或拖延有關邊界問題的實質性會談。不管怎么說，中國人終于同意恢復談判作為消除蘇聯的威脅的一種手段，而這也正是俄國人所希望的。

9月11日機場會晤之后，情況馬上發生了有益的變化：蘇聯人停止了對中國人的抨擊；[[144]](#_144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9Ni)邊界事件未再發生；[[145]](#_145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9Ni)貿易談判得以恢復；[[146]](#_146_1969Nian_9Yue_25Ri_De___Niu)此外，兩國都在采取步驟互派“文化大革命”初期召回本國的大使。不過，中國人還在拖時間。恢復談判的確切日期尚未確定，人們至今甚至也不清楚中國人在北京是否同意了柯西金的建議。況且，即使達成了一項協議，雙方的解釋也會是大相徑庭的。事實上，除9月11日發表了一份簡短的無具體內容的公報之外，[[147]](#_147_Zhong_Guo_Fang_Mian_Fa_Biao)沒有跡象表明雙方達成了協議，甚至沒有就努力達成一項協議取得一致意見。

身為間諜的蘇聯新聞記者維克多·路易斯于9月17日在倫敦《新聞晚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發出了蘇聯要對中國采取進一步軍事行動的暗示性恫嚇。文章特別提到了勃列日涅夫主義的內涵——斷言蘇聯有“權”單方面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事務，也提到了對羅布泊核基地動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這是雙方未達成協議的證據之一。證據之二是當時的全蘇工會主席亞歷山大·謝列平在東京的一篇訪談。[[148]](#_148_Lu_Tou_She_Xiao_Xi_1969Nian)謝列平說：“中國人對解決邊界問題的態度看上去是積極的”以及“我們希望談判……得以恢復”。這表明中國人尚未接受蘇聯的建議，甚至在9月30日尚未給予莫斯科正式的答復。據駐莫斯科的外交官報告，北京甚至在10月1日的國慶節之后仍未作出答復。[[149]](#_149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9Ni)

如何在不失面子的情況下作出必要妥協，以使談判得以恢復，這副擔子現在落到中國人肩上了。中國人分別于9月18日和10月6日向俄國人遞交了正式信件（在此期間，蘇聯顯然作過答復，但內容一直未披露），[[150]](#_150_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最后又于10月7日和8日公開發表了重要聲明。在10月7日的聲明中，中國宣布兩國政府已同意恢復1964年中斷的邊界談判。聲明還說，中蘇兩國將在北京舉行副部長級談判（高于莫斯科最初提出的談判級別）。聲明還明確指出，雙方在領土問題上的分歧是由俄國或蘇聯違背“不平等”條約的規定進一步侵占中國領土所造成的。對此，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時交換的中國地圖上（未公開出版）有詳細的標示。10月8日的聲明駁斥了蘇聯6月13日的照會。[[151]](#_151_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不過，在聲明的最后，中國提出了解決邊界問題的五項原則。這些原則確立了北京在即將舉行的談判中所持的立場。就其實質而言，前三項原則與上文述及的中國政府在5月24日的聲明中提出的條件是一致的。后兩項原則重復了柯西金9月建議的許多內容。這首次表明，中國人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不過，這些原則也顯現出了中蘇之間的兩點重要分歧。

第一，中國人想以重新劃定兩國邊界全部走向的新條約代替過去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這與他們在1964年的立場沒有區別，但與蘇聯的建議相去甚遠。蘇聯建議對現有邊界作更精確的劃分，但不同意在新條約簽訂之前取消所有舊條約并承認其“不平等”的性質。第二，中國重申了原來的主張：為全面解決邊界問題，雙方都撤出一切有爭議的地區，如中國人所說的俄國人違反“不平等”條約而占據的那些地區。蘇聯人顯然不可能同意這個條件，因為它威脅到了伯力和其他重要地區的安全。

然而，蘇聯對中國的聲明作出了積極的反應。1969年10月20日，談判終于開始了。這樣，在珍寶島事件發生六個月之后，兩國又同意——主要是由于蘇聯的壓力——和平解決邊界問題了。對中國來說，談判的恢復至少可以部分地減輕蘇聯的軍事壓力。現在看來，1969年北京顯然根本不打算達成任何妥協性的協議，即不符合它所闡述過的諸項“原則”的協議。參加談判的蘇聯代表團于10月19日抵達北京，團長是外交部副部長庫茲涅佐夫，另有成員七名。中國代表團以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為首，也另有成員七名。[[152]](#_152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9Ni)

## 1969—1975年的中蘇邊界談判

中蘇談判開始后，公開報道的邊界事件減少到每年一至三次，而且嚴重程度大為降低。[[153]](#_153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9Ni)總的來說，中蘇雙方在1969年9月以后都嚴密防守邊界線，同時也采取嚴格措施預防地區性沖突的突然發生，防止因沖突升級而使用殺傷力更大的武器或者投入大量的軍隊。在大多數情況下，蘇聯投入的都是受克格勃控制的邊防軍，中國投入的則是生產建設兵團。[[154]](#_154_1969Nian_3Yue_Zhen_Bao_Dao)1969年3月以后，雙方沿邊界地區部署的軍隊數量顯然有了大幅度增加，但公開報道的沖突事件卻明顯減少了。這表明雙方心照不宣或明確同意了1969年10月8日中方提出的建議：在共同劃定確切的邊界線以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沖突，停止向爭議地區派遣軍隊。[[155]](#_155_Zhe_Xiang__Jian_Yi__Zhi_Shi)

在進一步研究談判的各個階段以前，我們先簡單考察一下伴隨談判而來的一系列事件的總趨勢。北京協議導致邊界地區的沉寂、雙方軍事力量的集結和邊界談判的開始。雙方似乎都不希望時常兵戎相見，雖然偶爾也發動一些有預謀的襲擊以探測對方的抵抗能力。每一方都指控另一方的這種行動——蘇聯人指責中國人在離中蒙邊界僅數米遠的地方進行軍事演習，中國人則指責俄國飛機常常侵入中國領空數公里——但雙方的反應都不激烈。雙方都同意不報道可能會使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消息。例如，據傳1974年在新疆和哈薩克斯坦交界地區發生了大規模軍事沖突，但卻未見報道。同年11月，莫斯科和北京都否認西方關于中蒙邊界發生了五次戰斗的報道。[[156]](#_156___Mei_Ri_Dian_Xun_Bao____19)

還發生了一些與邊界緊張局勢有關的特殊事件：1974年，駐北京的兩名蘇聯外交官以間諜罪被逮捕并驅逐出境；[[157]](#_157_Xin_Hua_She_Xiao_Xi__1974Ni)一架蘇聯直升機及機組人員被中國扣留，俄國人聲稱該機是在執行醫療救護任務時迷失航向并耗盡了燃料；[[158]](#_158_Su_Lian_Zhi_Sheng_Ji_Yu_3Yu)夏季枯水期，蘇聯禁止中國船只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在伯力附近的通江（蘇聯稱卡扎凱維切瓦水道）航行；[[159]](#_159___Dang_Dai_Su_Lian_Bao_Kan)海南附近發生的一次海運事故；[[160]](#_160_Xin_Hua_She_Xiao_Xi__1971Ni)雙方在簽訂年度航運協定方面動作遲緩甚至無所作為等。

更廣泛些說，雙方都在本國境內采取措施發展經濟，增加人口，投資擴建基礎設施，強化少數民族對中央的忠誠，從核心地區向邊疆地區派遣大批主要民族的居民（中國尤其如此）。蘇聯政府給愿意到邊界附近定居的人發放額外津貼以資鼓勵。蘇聯開始修筑貝加爾湖至黑龍江的鐵路，在界河中以前無人居住（或偶爾有人居住）的島上建立集體農莊，千方百計證明爭議地區歷來居住著目前屬于蘇聯的民族，還把許多邊界城鎮的名字改得更斯拉夫化。[[161]](#_161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

蘇聯人顯然還懷有把新疆變成蒙古那樣的緩沖國的強烈野心。一直有報道說蘇聯當局組織了一個本身擁有軍事力量的“自由土耳其斯坦運動”（應為“東土耳其斯坦運動”——譯者），其成員均是1962年伊犁騷亂時逃離新疆的人。該運動以阿拉木圖為基地，由久經考驗的原維吾爾族領導人祖農·太也夫[[162]](#_162_Zu_Nong__Tai_Ye_Fu__Ceng_Re)將軍領導，在70年代初達到了高潮。后來，蘇聯對該運動的支持大為減少，因為中國政府派大批原來的紅衛兵到新疆，使漢族居民的數量猛增到了500多萬（新疆總人口近1000萬人）。[[163]](#_163_Ha_Li_Sen__E_Suo_Er_Zi_Bo_L)俄國人指責中國強行同化邊境地區，特別是內蒙占地區（據說在內蒙古平息了一次暴動）的少數民族。中國還把15萬余名原來的紅衛兵送到黑龍江省擴充生產建設兵團，并開始大規模的考古活動以證明邊境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164]](#_164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3Ni)

#### 第一階段，1969—1970年

舉行秘密會談是雙方議定的恢復談判的條件之一。因此，人們除知道那些明顯的事實談判未達成協議，未取得進展外，看不到有關談判進程的任何官方資料。不過，根據非官方的消息（大部分來自中國方面）、筆者與參加談判或與談判有密切關系的人的談話記錄、新聞報道以及蘇中兩國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動向，我們還是可以比較清楚地勾勒出談判進程的輪廓。例如，1969年9月以后，中國領導人顯然不顧內部的反對，很快做出了回到談判桌邊的決定。[[165]](#_165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0Ni)后來，隨著林彪和毛澤東之間矛盾斗爭的曝光，國內的反對來自何方就清楚了。此外，談判開始尚不到一個月，北京就向外界透露談判陷入了僵局。11月6日，中共控制的香港《大公報》稱，“關于邊界問題的談判，進展并不順利”，蘇聯人未接受中國的“原則”（特別是未撤出“有爭議的地區”）。文章說，蘇聯方面試圖擴大會談的范圍，把全面和解和“其他目標”包括進來，而且在陳述其主張時“仗勢壓人”。文章還說，如果俄國人停止這項妨礙談判的活動，雙方是有可能達成一項協議的。[[166]](#_166_Zhe_Pian_Wen_Zhang_De_Yi_We)最后一點無異于承認，在邊界地區的軍事力量和戰略力量大體平衡以前，中國不可能與蘇聯簽訂邊界條約。由于蘇聯一直保持著軍事優勢，此后15年中兩國未達成協議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人的打算是，保持蘇聯人對談判的興趣，讓談判持續下去，或從另一方面來說，不讓莫斯科發現談判無所進展，從而找到中斷談判和發動軍事進攻的借口。不過，在談判仍在進行的同時，中國領導人并不打算改變對蘇聯領導集團及其各項政策進行宣傳攻勢的總路線。因此，中國人是在走鋼絲。莫斯科可能隨時中斷談判，而北京為了保持對內政策的一致性和發展勢頭，只能繼續對俄國人進行口誅筆伐。中國代表團顯然得到了毛的指示，既不同意莫斯科的建議，也不在諸多的“原則”問題上讓步。所以，中國人只能就一些非實質性的問題做些努力。其一是軍事平衡問題，但這需要時間，特別是在解放軍卷人了行政管理事務和已顯端倪的毛、林沖突的情況下。其二是努力緩和與美國的沖突，特別是在臺灣問題、越南戰爭、外交承認以及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等問題上的沖突。其三是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建立第三世界國家的反蘇聯盟，或者至少阻止莫斯科組成這樣的一個反華聯盟。北京試圖在維持談判進行的同時，在上述問題上都取得進展。我們只有記住這一點，才能理解1969年以來在談判中發生的許多事情。

中國人沒有停止、甚至沒有減少對蘇聯的口誅筆伐。而且，1969年10月20日以后的一個月中，他們多次直接抨擊了蘇聯對邊界問題的立場。[[167]](#_167___Hua_Sheng_Dun_You_Bao)由于與會者在公開場合的姿態可以比較準確地反映出秘密談判的進展情況，所以，庫茲涅佐夫及其副手于12月14日借口要參加最高蘇維埃會議（他是代表之一）而離開北京，使會談“暫時中止”是毫不奇怪的。[[168]](#_168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9Ni)同時，蘇聯人對談判未獲進展公開表示失望，指責中國人應對此負責，并恢復了對中國領導層的直接攻擊。[[169]](#_169_Tong_Shang)庫茲涅佐夫在莫斯科說，雙方甚至未能就議事日程達成一致意見。中國人希望談判內容僅限于邊界問題，而蘇聯人則想擴大范圍，討論中蘇之間的所有分歧問題，并通過在貿易、文化和外交代表的級別等方面的成功進展，最終訂立一項邊界條約。[[170]](#_170___Niu_Yue_Shi_Bao____12Yue)庫茲涅佐夫還說，雙方共會晤了12次（約一星期會晤一次多一點），他本人一直是北京的大字報攻擊謾罵的目標，東道主還禁止他進行社交活動。[[171]](#_171_Tong_Shang)

1970年1月，中國公開承認談判開始不久即陷人了僵局[[172]](#_172___Yuan_Dong_Jing_Ji_Ping_Lu)：中國提出的在新條約簽訂之前，莫斯科承認已有條約的“不平等”性質的建議，遭俄國人斷然拒絕，后來提出的蘇聯人在談判取得進展以前撤出爭議地區的要求，其命運亦是如此。在此期間，中國恢復了與美國在華沙的接觸——開始了通往1972年2月發表《上海公報》的漫長而又微妙的進程；中國還采取了親日政策，試圖借此擺脫與最重要的非共產黨周邊國家之間在外交上的隔絕狀態。

1970年1月2日，庫茲涅佐夫返回北京（這次未帶副手、邊防軍司令瓦金姆·A.馬特洛索夫少將）。[[173]](#_173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9Ni)1月14日，談判再次開始。[[174]](#_174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但是，由于雙方在周恩來—柯西金協議（如果真有這個協議的話）的解釋、會談的范圍和議事日程等問題上分歧太大，談判很快又陷入了僵局。[[175]](#_175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據說庫茲涅佐夫曾表示愿意把烏蘇里江上的許多島嶼（包括珍寶島）移交給中國，還愿意商討中國提出的帕米爾地區的邊界問題，以便清除締結一項全面的邊界條約的障礙。[[176]](#_176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作為交換，中國應該放棄關于不平等條約的觀點。但是，中國人拒絕讓步，堅持要俄國人按北京的理解來執行九月協議。3月中旬，莫斯科公開承認談判已經陷入僵局，并警告說，如果沒有突破性進展，庫茲涅佐夫將被召回蘇聯（即被低級別的談判代表取代）。[[177]](#_177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這時候，又出現了發生邊界沖突的傳言。[[178]](#_178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蘇聯不得不發表正式聲明，否認將要對中國發動一次全面的進攻。[[179]](#_179_1970Nian_3Yue_14Ri_De___Niu)

這時，雙方的宣傳攻勢達到了高潮。中國希望借大聲疾呼蘇聯的進攻迫在眉睫來防止它的任何進攻，蘇聯則肆意污蔑毛本人的過去。莫斯科警告中國不要借污蔑和中傷謀求蘇聯在談判中作出讓步，北京則在紀念列寧誕辰一百周年的一篇重要社論中，指責勃列日涅夫奉行的是希特勒式的對華政策。[[180]](#_180___Zhen_Li_Bao____1969Nian_3)蘇共中央宣傳部長弗拉基米爾·斯捷帕科夫是負責攻擊中國和毛澤東的人。蘇聯任命他為駐華大使。這是對中國莫大的侮辱，[[181]](#_181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后來北京宣布不接受他，他的任命被撤銷）勃列日涅夫還就此發表了公開講話。[[182]](#_182___Zhen_Li_Bao____1970Nian_4)

在雙方的互相攻擊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庫茲涅佐夫于1970年4月22日返回莫斯科，待了17天。[[183]](#_183_Lun_Dun___Tai_Wu_Shi_Bao)返回前，他顯然為打破僵局做了進一步努力，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把[蘇聯]軍隊撤出“爭議地區”的建議。[[184]](#_184___Luo_Shan_Ji_Shi_Bao____19)未經證實的報道稱，蘇聯在接受此建議的同時，仍拒不同意中方提出的維持邊界地區的軍事現狀的要求，并堅持要雙方集中討論具體的領土糾紛問題，而不是籠統的“不平等”條約問題。當中方拒絕了蘇方的建議后，庫茲涅佐夫便啟程回國了。盡管他打破僵局的努力失敗了，盡管中國人在列寧的誕辰紀念日對蘇聯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庫茲涅佐夫還是于5月7日回到了北京。但是，談判沒有取得絲毫進展。1970年6月20日，庫茲涅佐夫被送回莫斯科，[[185]](#_185___Su_Lian_Dong_Tai____1970N)據說他是生了病。不管怎樣，他以后再未去北京。雙方的宣傳攻勢逐漸減弱了。不過，莫斯科于5月18日曾對北京進行過猛烈抨擊，以回擊4月26日中國對勃列日涅夫的攻擊。值得注意的是，蘇聯人在攻擊中國人的同時，只把邊界爭端視為全部中蘇分歧的一個方面。[[186]](#_186___Zhen_Li_Bao____1970Nian_5)此后一段時間內，中方那種大張旗鼓的攻擊也停止了。

柯西金對第一階段九個月的談判做了總結。6月10日，他在最高蘇維埃的“選舉演說”中，指責中國奉行的政策是“不讓我們雙方總體關系的正常化得以實現或是在北京的邊界談判取得進展”。不過，他又說：“盡管北京的談判十分復雜（這是中方設置障礙造成的），蘇聯仍打算繼續談下去，以便達成一項符合蘇聯、中國和全世界利益的協定。”[[187]](#_187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蘇維埃最高主席團主席波德戈爾內和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類似的談話中重申了這些觀點。

談判完全破裂并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這可能會使中國在軍事防衛力量仍然虛弱和外交活動仍無頭緒的時候，遭到蘇聯的進攻。莫斯科也不希望談判破裂，因為在迫使中國人回到談判桌邊的過程中，它已耗費了如此大量的精力和外交聲望。此外，對莫斯科和北京來說，談判破裂只會進一步加大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這是雙方都不希望的，而且戰爭一旦發生，雙方都會遭受慘重的傷亡。所以，雙方竭力維持談判的進行。他們又采用了上一次的辦法，先進行每年一次的界河航行會談。6月，雙方同意在7月10日開始會談。[[188]](#_188___Zhong_Guo_Dong_Tai____197)這次會談很快就因雙方在程序問題和一些實質性問題上的分歧而陷入困境，六個月后會談結束。即使到這個時候，中國人也拒不承認簽署了一項新的年度協議，而只是（和以前一樣）聲稱在一份會談“紀要”上簽了字。[[189]](#_189___Ji_Du_Jiao_Ke_Xue_Zhen_Ya)

#### 第二階段，1970—1973年

俄國人的下一個招數是更換首席談判代表。1970年8月15日，蘇方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列昂尼德·伊利切夫接替庫茲涅佐夫。這表明蘇聯準備打持久戰。此外，談判的外交級別也降低了。伊利切夫原是蘇共的宣傳專家，蘇聯可能指望他對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指責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190]](#_190___Yuan_Dong_Jing_Ji_Ping_Lu)蘇聯還收回了對斯特帕科夫的駐華大使任命，代之以列寧格勒市委書記瓦西里·S.托爾斯季科夫，中國方面則提出外交部副部長劉新權駐莫斯科大使的任命。[[191]](#_191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11月底，這幾個人分別赴任了。[[192]](#_192___Zhen_Li_Bao____1970Nian_1)最后，兩國邊界省的官員簽署了一項在黑龍江兩岸進行貿易的地區性協定。[[193]](#_193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這些行動表明，兩國都不愿看到雙邊關系惡化到除了兵戎相見之外別無選擇的地步。在進行了18個月的談判之后，雙方于11月23日宣布簽署了一項為期一年的貿易協定。[[194]](#_194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

1970年秋，伊利切夫顯然曾向中方建議，以8月莫斯科和西德簽訂的條約為藍本，簽署一項互不侵犯條約。關于這項建議，我們知之甚少，只知道它很快即被中方拒絕了。[[195]](#_195___Yuan_Dong_Jing_Ji_Ping_Lu)12月3日，伊利切夫飛回蘇聯，中國駐蘇大使劉新權也于是日在莫斯科拜會了庫茲涅佐夫。[[196]](#_196_Zhuan_Nan_Si_La_Fu_Tong_Xun)直到最高蘇維埃會議（伊利切夫是代表之一）結束后，伊利切夫才于1971年1月14日回到中國。[[197]](#_197___Zhen_Li_Bao____1971Nian_1)這一次的談判情況仍未透露，只知道伊利切夫、托爾斯季科夫、周恩來和姬鵬飛（他是外交部代部長）在北京舉行了一次未報道詳情的會談。蘇方認為這次會談很重要，在《真理報》上做了報道。4月，伊利切夫和托爾斯季科夫返回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四大，于4月19日回到了北京。[[198]](#_198___Zhen_Li_Bao____1971Nian_3)好像是為了表明談判處在停滯不前的境地，蘇聯代表團被準許參加了每年一次的外交使團在中國的參觀旅行。本來中國是把蘇聯代表團排除在外的，因蘇聯公開提出抗議，中國才允許他們參加。[[199]](#_199___Zhen_Li_Bao____1971Nian_2)

后來的事實表明，有兩個因素使中國不可能簽訂一項邊界條約。較重要的一個是，毛—林間的權力斗爭已到最后關頭。根據林彪死后對他的指控，他反對毛把談判作為防止蘇聯進攻的手段的策略，不同意毛的反蘇軍事戰略，甚至希望在邊界問題上與莫斯科全面妥協。這些情況使中國根本不可能有必不可少的團結一致在軍事或政治上來面對蘇聯。所以，中國在國內政治秩序得到恢復以前，最好的辦法就是拖延時間。實際上，中國的國內局勢直到1971年底和1972年初仍未見有好轉的跡象。這時候，由于中美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人發現把談判拖延下去對中國更有利。這是邊界條約難以簽訂的第二個因素。1971年夏，當時實際主持美國外交事務的亨利·基辛格邁出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步，秘密前往北京，商定了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的訪華事宜。

這些事件使中國難以進行嚴肅認真的談判：如果中國人能夠把中美兩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分歧暫時擱置，并開始全面恢復與美國的外交關系，北京即可拖延與莫斯科的談判，直到中美關系解凍的影響力得到充分發揮為止。在美國總統訪華和《上海公報》發表——這是北京和華盛頓建立新關系的大綱——之前，中國人不會設法讓邊界談判取得進展。1971年秋冬的幾個月中，邊界談判處于停頓狀態。[[200]](#_200_Xuan_Chuan_Gong_Shi_Reng_Za)

1972年，莫斯科再次提出了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1970年曾提出過此建議并遭中國拒絕的情況，就是這次透露出來的。[[201]](#_201___Zhen_Li_Bao____1972Nian_9)1972年3月20日，伊利切夫返回北京。這項建議顯然是他回京后再次向中國代表團提出的。3[[202]](#_202_Ta_Fan_Hui_Le_Mo_Si_Ke__Yi)1971年12月6日開始的邊境河流航行談判未達成協議，于1972年3月21日暫時中止。[[203]](#_203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2Ni)中國方面更換了首席談判代表，以級別稍低的外交部副部長余湛接替了喬冠華。[[204]](#_204___Ji_Du_Jiao_Ke_Xue_Zhen_Ya)蘇聯代表團無事可干，又對中國的一些城市做了一次訪問旅行。[[205]](#_205___Su_Lian_Dong_Tai____1972N)9月，伊利切夫回國“度假”，10月17日才回到北京。[[206]](#_206___Bei_Jing_Zhou_Bao____Di_3)雙方的宣傳攻勢在這一年漸漸停了下來，雖然還不時看到中國的攻擊言辭，聽到蘇聯否認或指責中國人的言論。所以，1972年對中國和蘇聯而言，都是等待觀望的一年。

1973年，談判仍然處于停頓狀態。北京發現可以和以前一樣，繼續借助拖延談判來推遲解決邊界問題。此外，談判大廳之外的事態對談判進程的影響更為重大。1973年8月，中共召開了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導致十大召開的是（紅衛兵）各派、官僚和軍隊三個方面之間的復雜矛盾，又一次使中國未能團結一致反對蘇聯。雖然莫斯科的權力斗爭沒有北京激烈，但克里姆林宮對外交的注意力已被轉移到了其他方面，如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華盛頓的高峰會談。水門事件、與歐安會有關的各種活動，以及是年晚些時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在應付中東戰爭時產生的危機等。對中美蘇大三角關系影響最為重大的也許是越南戰爭：隨著美國1972年和1973年逐漸從越戰中脫出身來，以及隨之而來的中美和蘇美和解進程走走停停的發展特點，莫斯科和北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戰略三角關系的美國方面。最后一點，直到尼克松訪華之后，北京才開始認真對待加強中國邊界地區軍事力量的問題，更換了一批軍官和政治干部。蘇軍的大規模集結——為此中國需要花數年的時間使軍事力量更趨于平衡——也是刺激中方推遲達成協議的因素之一。

這樣，俄國和中國都把賭注押到了蘇美和中美關系的變化對中蘇沖突的影響上。莫斯科很想與華盛頓和解，原因之一是為了孤立北京，或者至少防止出現一個新的中美組合。這個組合可能包括西歐和日本，成為一個廣泛的反蘇同盟的中堅力量。北京也在竭力緩和與美國的關系，目的就是將來——不管是多么不現實——搞成這樣一個組合以對抗蘇聯。

因此，中蘇談判在1973年也未取得進展。蘇聯對中國的批評隨國際形勢和中國對蘇聯的抨擊程度的變化而變化。[[207]](#_207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2Ni)關于越南問題的巴黎會談開始時，莫斯科停止了對中國的攻擊謾罵，試圖促成反對美國的中蘇聯合陣線。[[208]](#_208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3Ni)中國指責莫斯科正在對中國進行軍事威脅，[[209]](#_209___Luo_Shan_Ji_Shi_Bao____19)柯西金對此予以否認。《真理報》發表了署名“亞歷山大羅夫”的文章，對中國的指責進行了反駁。6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又提出了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遭中國人拒絕（蘇聯領袖哀嘆道，中國人“甚至不屑作出答復”）。[[210]](#_210___Luo_Shan_Ji_Shi_Bao)

1月5日至3月5日，中蘇國境河流航行聯合委員會舉行了例會，但和以前一樣，沒有任何結果。[[211]](#_211___Zhong_Guo_Dong_Tai____197)蘇聯代表團又在中國各地游歷了一圈。[[212]](#_212___Zhen_Li_Bao____1973Nian_5)7月19日，伊利切夫回國度假并接受指示。但這次他在國內整整待了一年。[[213]](#_213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3Ni)所以，談判實際上在1973年年中就中斷了。

中國人似乎沒有為這個危險的信號而感到特別不安，因為他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共“十大”上。周恩來在向大會作的報告中重申，只要蘇聯不使用武力或進行武力威脅，中國愿意解決邊界爭端。周對中蘇關系的評論意味深長，表明中國已不再擔心蘇聯會馬上發動進攻；相反，中國警告西方，俄國人目前正在“聲東擊西”。可能同樣重要的是，周聲稱北京愿意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改善中蘇關系，其中可能包括邊界爭端的解決。[[214]](#_214___Bei_Jing_Zhou_Bao____Di_3)10月底，在周會見C.L.舒爾茨伯格時，[[215]](#_215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3Ni)在為紀念“十月革命”而發給最高蘇維埃（不是給蘇共中央政治局）的賀電中，中國方面都重申了這些觀點。[[216]](#_216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3Ni)

#### 第三階段，1974—1975年

1973年年中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談判的第二階段就結束了。直到1974年6月20日他回到北京后，談判的第三階段才開始。[[217]](#_217___Luo_Shan_Ji_Shi_Bao____19)1月，北京驅逐了幾名被指控為蘇聯間諜的人；3月發生了直升機事件；中國在離南越不遠的西沙群島采取了軍事行動；雙方還在卡扎凱維切瓦水道問題上發生了爭議。由于上述事件，當時的中蘇關系已進入新的低點。前兩件事顯然是造成伊利切夫1974年初無法返京的原因，因為他在莫斯科參與了使直升機和機組人員安全獲釋的努力。[[218]](#_218___Zhen_Li_Bao____1974Nian_5)第三件事引起了莫斯科的關注，因為它是中國總的邊界政策的體現。[[219]](#_219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4Ni)最后一件事則促使伊利切夫回到了北京。

1974年5月22日，蘇聯外交部就通江（蘇聯稱卡扎凱維切瓦水道）問題給北京發出了一份照會。通江在西南面把黑瞎子島與大陸分隔開來，是這一三角形島嶼的一個邊。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形成了該島的另兩條邊，伯力在兩江交匯處的江岸上，與該島的東北角隔江相望。蘇聯在照會中認為兩國應以水道而不是兩條大江為界。[[220]](#_220___Zhen_Li_Bao____1974Nian_5)照會對中國提出的在（夏季）枯水期水道不能航行時，中國船只可通過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匯處的“要求給予有利的對待”，但首次提出中國船只每次通過前均須預先通知。照會稱蘇聯方面有權這么做，其根據是“中俄條約的有關文件”，可能是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之后的有關文件。[[221]](#_221_Jian_Nei_Wei_Er__Ma_Ke_Si_W)中國人立即拒絕了蘇聯的觀點，[[222]](#_222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4Ni)但是他們無法在枯水期駕船駛過流經伯力的江面，因為1967年以后，蘇聯在通江和黑龍江的分岔處一直配備有炮艇。[[223]](#_223_Ma_Ke_Si_Wei_Er___Zhong_Su)蘇聯人此時提出這個問題，其動機是很明顯的：促成直升機機組人員的獲釋，促使中國人同意全面恢復邊界談判；反駁中國援引主航道中心線為界的原則而提出的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上大部分島嶼的主權歸中國所有的主張；[[224]](#_224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4Ni)迫使中國簽訂一項新的界河航行年度協議（界河航行談判已于3月21日再次停止，無任何成果）。[[225]](#_225___Zhong_Guo_Da_Lu_Bao_Kan_G)

蘇聯此舉至少實現了部分目標，因為邊界談判于1974年6月底重新開始了。一個月后，談判仍無進展，伊利切夫離京返國。后回京不久又于8月8日啟程前往莫斯科。[[226]](#_226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4Ni)考慮到過去的談判一無所獲，我們有理由相信，談判從此以后不會再恢復了；由于北京把談判作為對付蘇聯的權宜之計，故危險期度過以后，談判有可能被完全放棄。8月，為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羅馬尼亞解放30周年紀念大會，柯西金、李先念——周恩來的親密戰友之一——和余湛都到了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人想乘此機會居中斡旋，但他們所能做到的僅僅是促成雙方徒具形式的握手而已。[[227]](#_227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4Ni)

然而，1月6日中國人又把談判的大門開啟了一道誘人的縫隙（或者也許是蘇聯人通過一些尚不為人所知的勸誘活動使事情有了轉機）。這一天，中國為慶祝十月革命給莫斯科發去了一份賀電。在這份不太引人注目的賀電中，中國指出：

中國政府一再建議雙方真誠地進行談判。……首先需要簽訂一項互不侵犯和互不使用武力的條約，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沖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然后，通過談判徹底解決邊界問題。（著重號為作者所加）[[228]](#_228___Man_Che_Si_Te_Wei_Bao)

為什么這時候中國人同意了蘇聯人在過去三年中提出的建議呢？我們可以做出下述幾種解釋。

第一，中國人提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態度是否嚴肅，還不十分清楚，因為這一條是連帶其他建議一同提出的，都不是新東西；某些建議（如蘇聯撤出北京聲稱其擁有主權的那些地區等）過去已遭莫斯科拒絕，現在也不可能被接受；而且所有這些建議——包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在內——都是作為進一步談判的先決條件提出來的。第二，由于中國在此之前拒絕了蘇聯的所有建議，所以需要策略地重申本國對邊界問題的主張；提出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是作為奪回一直掌握在莫斯科手中的外交主動權的一種手段。第三，有跡象表明，中國提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更多地是為了引起華盛頓而不是莫斯科的注意。中國人發現，美國人只想讓中美關系處在互設聯絡處的階段而不想進一步改善，因為當時華盛頓在北京和臺北都駐有大使級的外交代表。毛澤東向蘇聯邁出一小步是為了讓華盛頓知道，美國不能指望借中蘇沖突來迫使北京改變反對美國承認并保護臺灣的一貫立場。北京似乎是在告訴華盛頓，中國和美國一樣，也可以利用國際政治的大三角關系新格局為本國謀求利益。

致使中國外交政策發生變化的這些原因之間并非沒有矛盾，但是中國爭取主動權的做法（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達到了預期的目的，至少對莫斯科來說是如此。開始時，蘇聯的反應很謹慎，態度不明朗。[[229]](#_229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4Ni)隨后則是堅決拒絕。11月26日，勃列日涅夫在烏蘭巴托解釋了中國11月份的電文不值得蘇聯作出積極反應的原因：

實際上，北京提出的先決條件就是要蘇聯邊防軍撤出一些所謂的“爭議地區”。這些地區本來屬于我國，中國領導人對此提出了領土要求，并稱之為“有爭議的地區”。北京公開聲稱，只有在上述要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它才會同意舉行有關邊界問題的談判。……這一立場是絕對不可接受的。[[230]](#_230___Zhen_Li_Bao____1974Nian_1)

同一天，克里姆林宮在致中國的一份正式照會中說：

你方在今年11月6日的賀電中表示要解決中蘇關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并提出了各種先決條件。這是中國領導人以前所持的立場的重復，當然不足以作為達成諒解的基礎。[[231]](#_231___Zhen_Li_Bao____1974Nian_1)

后來，蘇聯的反應發生了變化。1975年2月初，莫斯科派伊利切夫來到北京，邊界談判再次開始。[[232]](#_232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4Ni)蘇聯的目的在于察看中國的立場是否真的發生了變化。對中國的電文，他們私下里的反應不同于公開的反應。[[233]](#_233_Zhi_Dao_2Yue_Fen_Tan_Pan_Ca)另外，周恩來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的講話中關于邊界問題的說明，有尋求和解的傾向。周對莫斯科數次提出的互不侵犯條約和以互不侵犯的原則為基礎的條約作了區分，據稱，后者是1969年他和柯西金機場會晤的成果。雖然周和往常一樣把它與蘇聯撤出“爭議地區”的要求聯系了起來，但他確實呼吁俄國人“老老實實坐下來談判，解決一點問題，不要再玩弄那些騙人的花招了”。[[234]](#_234___Bei_Jing_Zhou_Bao____Di_4)莫斯科聽信了周恩來的話，派伊利切夫到北京觀察情況是否確有變化。

事實上，情況并無多少好轉。中國人表示要審訊蘇聯直升機機組人員。若果真如此，必會招致蘇聯實質性的報復。[[235]](#_235___Su_Lian_Dong_Tai____1974N)12月，《歷史研究》雜志復刊，其中的一篇文章猛烈抨擊了蘇聯的邊界政策，要求俄國人撤回駐在蒙古的軍隊，停止在邊界地區進行軍事演習，把邊界地區部隊的數量減至1964年的水平。[[236]](#_236___Li_Shi_Yan_Jiu____1975Nia)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新憲法正式把反蘇主義列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237]](#_237_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莫斯科則繼續展開對北京的宣傳攻勢，指責中國沒有對蘇聯的一系列建議作出反應，并譴責中國領導層以毛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作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238]](#_238___Zhen_Li_Bao____1974Nian_2)還呼吁中國人朝邊界問題的解決邁出“真正具有建設性的步伐”。[[239]](#_239___Dang_Dai_Su_Lian_Bao_Kan)

盡管如此，伊利切夫和新上任的中國代表團團長韓念龍（他接替了余湛，據說余湛病了）還是于1975年2月16日舉行了會晤。[[240]](#_240_Lu_Tou_She_Xiao_Xi__1974Nia)除了程序和外交禮節問題外，蘇聯可能還想把直升機機組人員和黑龍江一烏蘇里江交匯處的航行問題引入議事日程，因為這些問題已對邊界問題的談判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干擾。然而，談判和前幾年一樣，不易獲得進展，故蘇聯代表團不久（4月份）又游覽中國南方的一些城市。[[241]](#_241___Su_Lian_Dong_Tai____1975N)1975年中，人們甚至不清楚，這種時斷時續的談判是否仍在繼續。

這樣，自1964年雙方初次會晤后的12年中，邊界談判沒有取得明顯的進展。爭端的解決實際上取決于談判大廳以外的事態發展，特別是毛澤東的長壽和中國關于繼承人問題的政治斗爭格局。不過，1969年以后的幾年時間并未白白流逝。中蘇雙方都明晰對方的立場，如果政治形勢發生變化，雙方可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達成協議。但至少在隨后的15年中，這種政治形勢沒有出現。

## 附錄 中國和蘇聯的軍事集結，1969—1975年

上文已詳述了俄國人和中國人的外交活動。無論這些活動多么重要，但與軍事集結活動比較起來，它們都不過是次要的。正是蘇聯軍隊大規模的迅速增加，才引起了中國人對蘇聯入侵的擔憂，并嚴重破壞了70年代初蘇聯國內經濟，而且把北京推入了張臂以待的美國人的懷抱。但是，中國后來增加了兵力，足以使俄國人的大規模地面進攻付出慘重的代價。人民解放軍雖然不可能阻止紅軍攻占大批領土，但到70年代中期，中國已集結了大量的地面部隊，開始將陸軍部署到靠近邊界的地方。另外，中國還部署了少量的戰術和戰略核武。這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70年代初的實力不平衡。

蘇聯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向中國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地面進攻，推翻中國政府或奪占中國領土。蘇中兩國都希望確保邊界不受對方掠奪性的破壞。雙方的軍事集結計劃都比較有理智。雙方均改變了對美國的立場，使華盛頓緩和了與蘇聯的關系，結束了越南戰爭，恢復了與中國的外交接觸。

莫斯科對中國在珍寶島上采取的行動確實大為吃驚，認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氣氛和毛澤東個人的背信棄義造成的。所以，克里姆林宮決定派重兵駐守中蘇（和中蒙）邊界，使中國再制造1969年3月發生的那類邊界事件時將付出慘重的代價，并通過要采取更廣泛的軍事行動的威脅手段，迫使中國領導人恢復邊界談判。為此，蘇聯把邊界地區部隊的數量從15個非滿員師增至40個師，后來更超過50個師，還讓部隊進入了更高級別的戰備狀態。[[242]](#_242___Yuan_Dong_Jing_Ji_Ping_Lu)蘇聯還配備了最先進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導彈和戰術核彈頭；補足了邊界地區各師的兵員；經常在水陸邊界線上巡邏；加強了在中國核彈射程之內各城市（這樣的城市逐年增加）的民防措施；[[243]](#_243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9Ni)開始實施一項大規模土建工程，以修建永久性后勤供應基地。[[244]](#_244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

雖然俄國該項計劃的目的在于防御，但中國人卻認為它具有威脅性。由于北京因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對蘇聯人抱有根深蒂固的疑慮，也由于北京須從能力和戰術方面（蘇軍戰術常常是進攻性的）來對蘇聯軍事機器作出判斷，所以它不得不增加軍隊的數量，調整其部署，并改進其裝備。這很快就使中國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文化大革命”的期限被迫縮短；解放軍必須既承擔行政和工業企業的管理工作，又負起訓練和保家衛國的職責；不得不把對巴基斯坦和北越等盟國的支持放到第二位，而把抵御蘇聯的威脅放在第一位；為避免兩面受敵，不得不在臺灣問題上對美國作出讓步。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雖不及蘇軍的先進，但在數量上與蘇軍不相上下（盡管他們直到1972年，即蘇軍開始集結后的第四個年頭，才向邊界地區增派大批軍隊）。[[245]](#_245___Zhong_Gong_Yan_Jiu____Di)他們增加軍事預算，[[246]](#_246___Hong_Xing_Bao____1972Nian)派大批城市青年前往北方和西部各省，補充新組建的生產建設兵團，[[247]](#_247_Ju_1970Nian_10Yue_17Ri_De)強化民兵組織，[[248]](#_248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9Ni)開始進行應急性的民防活動，其中包括眾所周知的在各大城市大挖防空洞的活動，[[249]](#_249___Ji_Du_Jiao_Ke_Xue_Zhen_Ya)對省界劃分作出一系列的行政調整——包括把內蒙古的很大一部分劃歸鄰近各省（據說是為了軍事需要）。[[250]](#_250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0Ni)到1974年，這些變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1969—1976年軍事力量的不平衡。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仍在繼續進行研制核武器和導彈的計劃，不過其主攻方向已有變化，表明蘇聯威脅增大，而美國的威脅減小了。為抵御蘇聯的威脅，中國特別重視短程和中程導彈，把它們分散部署在各地半堅固的地方，放棄了部署洲際導彈的計劃（美國原是這樣估計的）。中國仍在繼續實驗和生產核武器。由于原來就有噴氣式轟炸機，加上生產能力有所增加，故而中國的空中運載力量有了很大提高。[[251]](#_251___Niu_Yue_Shi_Bao____1969Ni)由于飛機散布在離中蘇邊界較近的大約200個中國空軍基地上，即使蘇聯先發制人，亦不能確保徹底摧毀中國的報復能力，確保蘇聯的任何一個城市（或一小部分城市）不被中國摧毀。因此，到70年代中期，沿邊界地區核力量的不平衡已得到了部分的但意義重大的彌補。

對蘇中兩國軍隊部署的詳情，我們很難作出描述與估計，因為詳情是雙方都嚴格保守的秘密。部隊的構成也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例如，據說到1975年蘇聯共調集了45個師的地面部隊，其中包括駐在蒙古的2—4個師和隸屬于大貝加爾湖軍區、可以迅速增援邊界地區的一些師。這些部隊中，只有大約1/3處于最高戰備狀態。但是，考慮到蘇聯自1969年以后在后勤供應、建筑和武器裝備的貯存方面投入了巨量的財力物力，調集的部隊肯定遠遠超過45個師。中國方面的情況大體相似。到1975年，沈陽軍區和北京軍區約有50個師，蘭州軍區有15個師，新疆可能有8個師。和蘇聯一樣，并不是所有的部隊都承擔了守衛邊界線的任務，不過，遇到緊急情況，更多的部隊會被迅速從其他地區調往前線。兩國都保留了一定數量的軍隊以應付其他地方的事態發展：蘇聯要關注東歐、西歐和中東；中國要留意南亞、福建海峽（原文如此——譯者）和朝鮮。兩國（特別是中國）還保留了大批部隊以擔負國內的任務。因此，在不知詳情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對雙方的軍事力量做出準確的估計。

地理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俄國和中國軍隊的部署計劃，也是導致莫斯科和北京采取不同戰略的重要因素。由于俄國在西伯利亞和遠東部分的人口大都集中在西伯利亞大鐵路沿線，又由于這條重要的交通大動脈距中蘇邊界不遠，所以莫斯科不得不把大部分部隊和武器裝備部署在鐵路以南靠近邊界的地方。北京當然把這種部署視為對新疆、甘肅、內蒙古和黑龍江的一種威脅。由于俄國人在北方除了凍土帶和冰（或者濱海地區的海水）之外，別無退路，所以莫斯科只能采取這種策略：防止中國軍隊入侵，斷然拒絕中國提出的雙方軍隊都撤離邊界線的建議。這種情況的嚴重性對海參崴和伯力而言尤為突出，伯力與中國提出領土要求的島嶼隔江相望。

中國軍隊不敢過于靠近邊界，因為如果靠得太近，就有在新疆、甘肅和內蒙古的沙漠中被蘇軍摧毀或包圍的危險。此外，中國的居民絕大多數都生活在離邊界很遠的地方。生活在邊界附近的是少數民族，他們與蘇聯一側的居民有血緣關系。他們（如新疆的哈薩克族）試圖與對方重新合并。中國的戰略和軍隊的部署情況是：主力部隊留在后方保衛重要城市（如北京等）和軍事基地（如羅布泊和雙城子的核武器和導彈發射基地等）；向邊境地區遷徙大量漢人以監視和壓制少數民族，這些漢人同時又是阻擋蘇軍進攻的準軍事人員。他們通過散布各地的農業移民，形成了一道抗擊侵略者的長城；一旦蘇軍入侵中國，軍隊和人民（大部分是公社社員）將聯合起來，利用正規防御戰術和游擊戰術（即“人民戰爭”）來抵御俄國人。隨著移民活動的發展和軍事力量的不斷壯大，中國軍隊可能推進到了距中蘇邊界更近的地方。與此同時，邊防部隊增加了具有挑釁意味的巡邏和監視活動，這也許是為了預防入侵或對蘇聯可能的進攻給予警告。

中蘇兩國戰略的中心是雙方均擁有大量的核武器。莫斯科的核武器很多，足以對中國的任何入侵活動給予嚴懲。然而，1969年的邊界沖突發生之前，這僅僅是一個背景因素，而且，即使在1969年以后，核武器的使用在通常情況下也并不是一種可行戰略，只有在最嚴重的關頭方可使用。盡管可以談論蘇聯會采取先發制人的手段，打擊中國的核武器生產和實驗場所、火箭和核武器貯存處及空軍基地，但實際上這是不大可能的。[[252]](#_252_Ji_Xin_Ge____Bai_Gong_Sui_Y)不過，一旦蘇聯的地面部隊全面展開，中國軍隊的整個防線就會從戰略和戰術上都受到威脅，因為蘇軍各師都配備有戰術核武器，且受過在核戰場上作戰的訓練。當時，蘇聯有能力先發制人，摧毀中國幾乎所有的核武器和導彈基地、空軍基地、海軍基地和地面部隊，占領大片中國領土，包括首都地區在內。數以億計的人將遭到滅頂之災，其中包括鄰近國家的許許多多人。但是，由于核戰爭會使鄰國遭殃，加上蘇聯因此將會在戰略上遠遜于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各國肯定會形成反蘇聯盟，上述慘景出現的可能性非常小。然而，中國人必須高度重視這種可能性，并相應地調整其軍事和外交立場。

北京還得面對另外一些情況，其中最嚴重的是蘇聯可能介入中國國內為爭奪毛的繼承權而展開的斗爭，支持軍方的某一派別，幫它建立一個親蘇聯的政府。如做不到這一點，蘇聯軍隊也可能乘領導層爭奪繼承權時期中國虛弱之機，侵入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新疆、黑龍江等邊界省區。雖然蘇聯方面認為不存在這些可能性，并馬上否認有任何發動進攻的意圖，但中國人只能從最壞處做準備，因為他們估計到了蘇聯軍隊的實力，且有猛烈抨擊蘇聯意識形態方面的諸項政策的傳統。因此，正是強大的蘇聯軍隊部署在中蘇邊界附近的核力量，迫使中國加強了邊界防務，在70年代初增加了國內常規武器和中短程彈道導彈的生產份額，把解放軍從政治經濟部門的行政管理事務中解脫了出來，部署在更靠近中蘇邊界的地方，還中斷了紅衛兵的革命活動，把他們中的許多人分派到了邊界附近的生產建設兵團。

到1975年，中國在彌補軍事力量的不平衡方面已取得了一些進展。中國把一個步兵師改建成了裝甲師。這至少表明北京有進行此類改建的生產能力。北京擁有充足的核報復能力，足以威懾蘇聯先發制人的進攻，并可威脅到蘇聯歐洲部分的重要城市（包括莫斯科在內），因此，中國原來微弱的威懾因素已經發展為以分布在各處的地下掩體的導彈（彈頭瞄準蘇聯國土）為基礎的威懾戰略了。

中蘇兩國軍隊構成和部署變化情況，詳見表1和表2[[253]](#_253_Zhe_Xie_Zi_Liao_Chu_Zi_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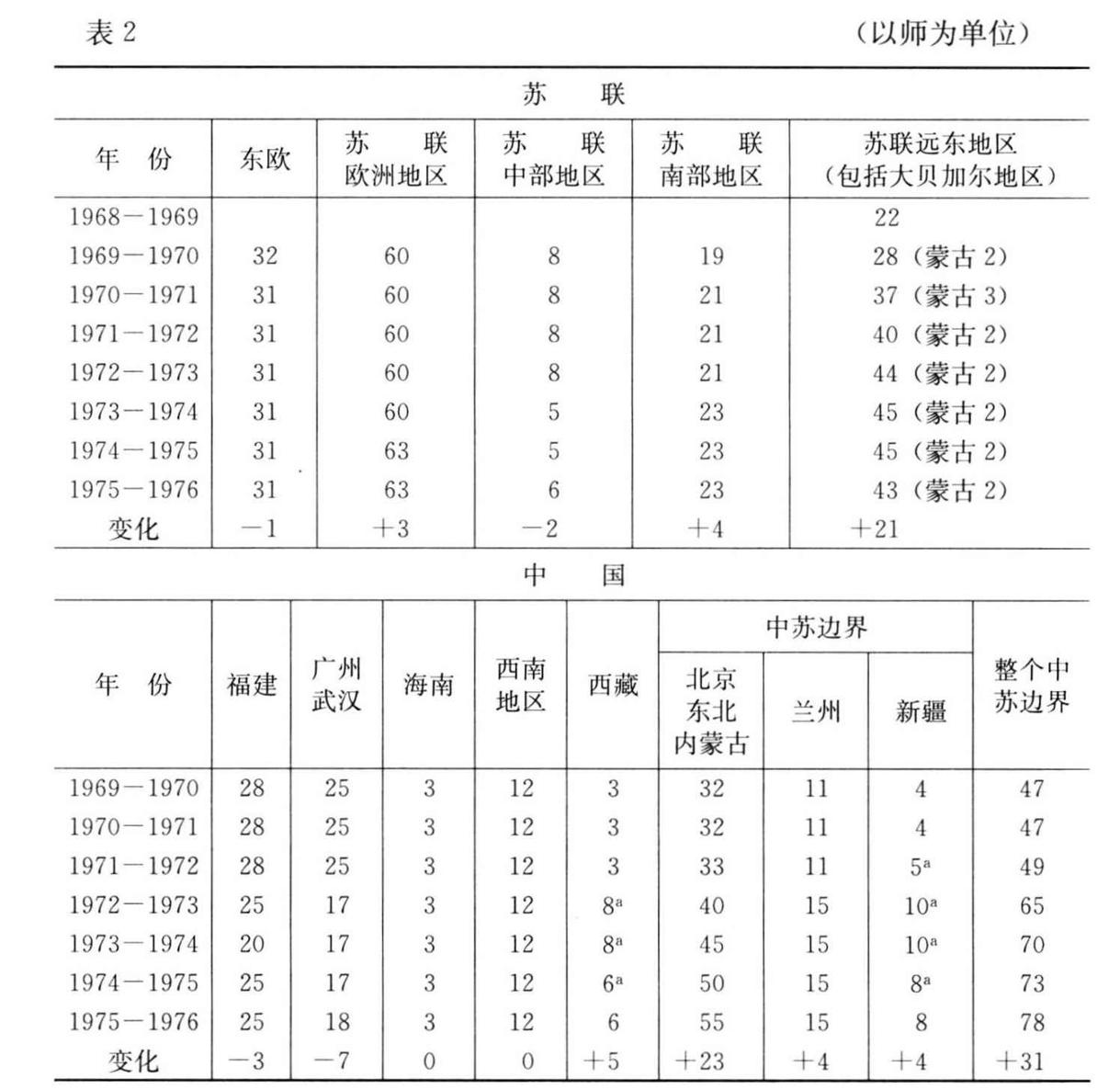
表1顯示了兩國地面部隊的總數和構成。1969—1975年間，中國陸軍的數量大幅度增加，大約增加了30萬人。地面部隊從118個師增至142個師，凈增24個師。1975年以前增加的人絕大多數是從與“文化大革命”有關的行政管理事務中脫出身來返回部隊的官兵。這批官兵有將近20萬人。僅此一點就可看出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卷入國內非軍事性事務的程度有多深。此外，官兵返回部隊的時機與外國旅游者觀察到的解放軍在工廠、事業單位和行政機關的時間是基本一致的。

表1 中蘇兩國軍隊的數量，1969—1971年



a.包括防空部隊。  
b.只包括主力部隊各師，不包括地方部隊各師。資料來源：《軍事平衡》（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年刊）和筆者1974—1984年間與美國、中國和蘇聯官員的談話記錄。

蘇中兩國軍隊的部署，1969一1976年



a.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這幾個年份的《軍事平衡》把西藏軍區和新疆軍區的部隊數量合并列出。此表假定比率和前幾年的一樣，即西藏3個師，新疆 4個師。

蘇聯軍隊部署和構成情況的變化也可從表中看出來。1969—1975年間，中蘇兩國軍隊數量的變化有一些驚人的相似之處。與中國相比，蘇軍總數凈增27.5萬人，而陸軍又凈增32萬人，摩托化步兵師從90個增至110個，凈增20個。這些新增的部隊都用于抵御來自中國的威脅。裝甲部隊和空降部隊的數目幾乎沒有什么變化，這與中國的情況十分相似（當然，不同之處是蘇聯的這兩種部隊原來就比中國多得多。這表明蘇聯的工業基礎更雄厚）。蘇聯邊防部隊增加了大約6萬人，這些人可能都被用于巡邏中蘇邊界。不過，蘇聯邊防部隊的總數約有30萬，與中國邊防部隊的總數相等。總之，中蘇兩國軍隊新增加的人數是大體相等的。考慮到雙方都把對方的威脅看得十分嚴重，而雙方軍隊新增人數都不很多就顯得有些奇怪了。這也許表明，雙方戰略的實質都是防御。兩國軍隊增加的人數大體相等表明，莫斯科和北京都意識到，一方大規模擴軍會使另一方急起直追，從而促成一場雙方都得付出極大代價的軍備競賽。

雙方軍隊在邊界地區的部署情況，可作為這些結論（有少數例外）的佐證。表2顯示的是1969—1976年間，每年駐守在有關地區的中蘇兩國軍隊數目的變化情況（以師為單位）。原來，中國在北京、東北、內蒙古、蘭州和新疆等邊界地區部署的軍隊比蘇聯在遠東部分和南部有關地區（如土耳其斯坦地區）擁有的軍隊要多。到1968年，中國在這些地區有47個地面師，蘇聯在上述地區可能有22個師（遠東部分15個，南部有關地區可能是7個）。表2清楚地表明，70年代初蘇聯軍隊的集結速度非常之快，而在同一時期，中國軍隊只略有增加。到1973年底，蘇軍的集結已大體完成。此后增加的主要是后勤供應部隊和武器裝備，此外還提高了現有戰斗部隊戰備狀態的級別。中國軍隊到1973年才開始大舉增兵，在18個月中從47個師增至70個師，1975年中達到了78個師。中國軍隊動作遲緩的原因主要在于國內的政治斗爭和北京與華盛頓的關系：直到1971年底林彪的問題解決之后，毛及其追隨者才得以調集部隊，更換將領；[[254]](#_254_Ru_Yao_Le_Jie_Xiang_Qing__K)直到1972年初尼克松訪華后，北京才感到南方的安全有了保障，可以把駐守在與臺灣隔海相望的福建前線的主力部隊調到北方了。1972—1974年間調兵活動比較頻繁，在這之后的兩年中，中國只向邊界地區調遣了8個師的地面部隊。這期間，中國還通過擴建生產建設兵團、訓練更多的民兵和加強民防來彌補不足。

雖然通過這些統計數字和部隊的部署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到1975年中蘇兩國在邊界地區的軍隊數量大體相等，但我們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認定兩國軍隊的構成和火力強弱也是相等的。表3羅列了中蘇兩國軍隊擁有戰略和戰術核武器的數目。蘇聯的核武器運載工具遠遠多于中國，核彈頭也比中國的多。雖然蘇聯得保留很大一部分核武器用于遏制美國，或者在歐洲和其他地方對美國及其盟國發動戰爭，但所剩的用于對付中國的核武器仍然非常之多。這意味著（假定每個運載工具運載的核彈頭平均超過一個）蘇聯擁有非常可怕的破壞力量。到1975年，中國擁有大約430件核武器運載工具（不包括米格—19、米格—21和F—9型戰斗機，它們是用于攔截、偵察和戰術支援的），而蘇聯則擁有4735件（不包括數量很大的噴氣式戰斗機，其中很多是可以攜帶核武器的）。只要把其中的20％用于中國戰場，也有大約950件之多。蘇聯擁有強大且分散的防空系統，足以攔截和摧毀中國的大部分伊爾—28和圖—16型飛機。還有一點，蘇聯的每個地面師都擁有核武器，如地對地導彈或小型的便攜戰術核武器。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統計，1970年蘇聯擁有此類核彈頭3500枚。假定這些核彈頭被用于對付中國的比例和紅軍被用于對付中國的比例（1975年166個師中有43個師用于對付中國，約占26％）大體相當，那也有880枚之多，更不用說莫斯科在常規武器、火炮、裝甲車和戰場上的機動性方面均占有絕對優勢了。因此，到1975年為止，蘇聯的軍事力量一直占有很大的優勢。

表3 蘇聯和中國的核武器運載工具，1969—1976年



注：以1975年為例，如果蘇聯把核武器總數的20％用于對付中國，可得出下列數字：洲際導彈329枚；中短程導彈125枚；潛艇發射彈道導彈175枚；米亞—4型飛機27架；圖—16型飛機95架；圖—22型飛機34架；地對地導彈200枚；合計總數985枚（架）。  
a.地對地導彈數采用的是國際戰略研究所的統計數字。這些導彈掌握在地面部隊手中。除了地對地導彈之外，還有戰術核彈頭，但因沒有準確的估計數字（國際戰略研究所估計1970—1971年有3500枚，其中可能包括900枚地對地導彈），所以沒有列入表內。  
b.合計總數不包括蘇聯的任何戰斗轟炸機（如米格—17，米格—19，米格—21，米格—23等等）。這些飛機都有運載核武器的能力。據估計，這些飛機和中國的同類飛機一樣，其職責是空中攔截或給予非核性的空中支援。

[[1]](#_1_2)這個觀點來源于托馬斯·W.魯賓遜：“中國外交政策的政治與戰略層面”，載唐納德·赫爾曼編《中國與日本：新的均勢》，第197—268頁；托馬斯·W.魯賓遜：“1959—1976年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三部曲”，載K.J.霍爾斯蒂等編《國家為何重組：戰后世界各國外交政策的調整》，第134—171頁。

[[2]](#_2_2)參閱喬納森·波拉克撰寫的本書第5章；G.W.喬德赫里：《世界事務中的中國：1970年以來的中國外交政策》；托馬斯·芬加等編：《中國對獨立自主的追求：20世紀70年代的政策演變》；羅伯特·薩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國外交政策》。

[[3]](#_3_2)這一觀點出自筆者未發表的手稿：“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解釋：作用因素與分析水平”。

[[4]](#_4_2)1956—1964年間中蘇爭論的資料非常豐富。關于其他事項，見唐納德·S.扎戈里亞《中蘇沖突（1956—1961）》；威廉·E.格里菲思：《中蘇分裂》、《中蘇關系（1964—1965）》；亞歷山大·達林編：《國際共產主義的分歧：1961—1963年間的文獻》；理查德·洛溫塔爾：《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世俗信仰的崩潰》。

[[5]](#_5_2)有人重印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見哈羅德·C.欣頓編《1949—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獻概覽》第2卷，第1051—1193頁。

[[6]](#_6_2)譯文見《毛澤東思想雜錄》，另見約翰·布賴恩·斯塔爾和南希·安妮·戴爾編《解放后毛澤東的著作：書目和索引》。

[[7]](#_7_2)關于這個時期的權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鮑姆《革命的序幕：黨和農民問題（1962—1966）》；張旭成：《中國的權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里克·泰維斯：《中國的政治和清洗：整頓與共產黨準則的衰落（1950—1965）》；威廉·F.多雷爾：“中國‘文化大革命’”發起階段的權力、政策和意識形態”，載托馬斯·W.魯賓遜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第21—112頁。

[[8]](#_8_2)張旭成：《中國的權力和政策》，第147—156頁；鮑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頁；安炳炯：《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頁。

[[9]](#_9_2)泰維斯：《中國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頁；安德魯·C.沃爾德：《張春橋和上海一月風暴》；理查德·鮑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維斯：《四清：1962—1966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托馬斯·魯賓遜：《林彪的政治軍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10]](#_10_2)斯坦利·卡諾：《越南史》；萊斯利·H.蓋布爾和理查德·K.貝茨：《越南的諷刺》。

[[11]](#_11_2)唐納德·S.扎戈里亞：《越南的三角關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內》。

[[12]](#_12_2)查爾斯·紐豪澤：《第三世界政治：中國和亞非人民團結組織（1957—1967）》。

[[13]](#_13_2)艾倫·S.惠廷：“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美國政治和社會科學院年刊》第402期（1972年7月），第55—66頁；艾倫·S.惠廷：《中國的威懾微積分學》第6章。

[[14]](#_14_2)艾倫·S.惠廷：“我們是怎樣幾乎與中國開戰的”，《展望》第33期（1969年4月29日），第6頁；埃德加·斯諾：“毛澤東訪談錄”，《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頁。

[[15]](#_15_2)《戰略概覽（1966）》，《紐約時報》1965年1月17日、1966年8月12日。

[[16]](#_16_2)泰維斯：《中國的政治和清洗》，第546頁。“二十三條”的譯文見鮑姆和泰維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書的“附錄F”。

[[17]](#_17_2)威廉·E.格里菲思：“中蘇關系（1964—1965）”，《中國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66—67頁。

[[18]](#_18_2)哈里·哈丁和梅爾文·格托夫：《清洗羅瑞卿：中國戰略計劃中的政治斗爭》；鄒讜編：《中國在危機中》第2卷，《中國在亞洲的政策和美國的選擇》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亞撰寫的章節；邁克爾·亞胡達：“蘇聯政策研究和中國的戰略爭論（1965—1966）”，《中國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32—75頁；唐納德·S.扎戈里亞和尤里·拉阿南：“論蘇聯政策研究——答邁克爾·亞胡達”，《中國季刊》第50期（1972年4—6月），第343—350頁。

[[19]](#_19_2)這個階段，毛對美國和蘇聯的抨擊都很猛烈。例如，1966年3月29日他對來訪的日本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見邁克爾·B.亞胡達《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第185頁；另閱1966年8月12日發表的《公報》，見《北京周報》第34期（1966年8月9日），第4—8頁。

[[20]](#_20_2)羅瑞卿：“紀念戰勝德國法西斯，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紅旗》1965年第5期；《北京周報》第8卷第20期（1965年5月14日），第7—15頁。

[[21]](#_21_2)斯諾：“毛澤東訪談錄”，《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頁。

[[22]](#_22_2)詳細情況參閱《劍橋中國史》第14卷中肯尼思·利伯撒爾撰寫的章節。

[[23]](#_23_2)阿瑟·J.多門：“印度尼西亞的未遂政變”，《中國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144—170頁；“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26期（1966年4—6月），第222—223頁。

[[24]](#_24_2)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北京周報》第8卷第36期（1965年9月3日），第9—30頁。

[[25]](#_25_2)許華茨關于“毛主義戰略的基本特征”的論述，見《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第189—204頁。

[[26]](#_26_2)托馬斯·W.魯賓遜和戴維·P.莫津戈：“林彪論人民戰爭：中國重新審視越南。”

[[27]](#_27_2)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上海《文匯報》1965年11月10日；《解放軍報》1965年11月10日。

[[28]](#_28_2)惠廷：《中國的威懾微積分學》第3—4章，第22—28頁；J.切斯特·鄭編：《中國紅軍的政治》。

[[29]](#_29_2)詳細情況參閱紐豪澤《第三世界政治》；彼得·范內斯：《革命與中國的外交政策：北京對民族解放戰爭的支持》。

[[30]](#_30_2)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周恩來在非洲的足跡》。

[[31]](#_31_2)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非洲和北京的統一戰線”，《時事》第3卷第26期（1965年9月1日），第1—11頁。

[[32]](#_32_2)W.A.C.阿迪：“周恩來在出訪中”，《中國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174—194頁；唐納德·W.克萊因：“北京駐非洲的外交官”，《時事》第2卷第36期（1964年7月1日），第1—9頁；于之喬：“中國與非洲關系概覽”，《亞洲概覽》第5卷第7期（1965年7月），第321—332頁；布魯斯·D.拉金：《中國與非洲（1949—1970）：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第38—88頁。

[[33]](#_33_2)詳細情況見紐豪澤《第三世界政治》。

[[34]](#_34_2)丹尼爾·D.洛夫萊斯：《中國與泰國的“人民戰爭”（1964—1969）》。

[[35]](#_35_2)巴巴尼·森·格普塔：《亞洲的支軸》，第141—241頁。

[[36]](#_36_2)安東尼·C.A.戴克：《“紅野牛”精神：處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1959—1965）》，第479頁；約翰·休斯：“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失敗的羅曼史”，《時事》第19期（1969年11月4日），第1—15頁；戴維·P.莫澤戈：《中國對印度尼西亞的政策（1949—1967）》，第303頁；謝爾登·W.西蒙：《破裂的三角關系：北京、雅加達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674頁；賈斯特斯·M.范德克羅弗：“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伙伴關系”，《環球》第8卷第2期（1964年夏），第332—356頁。

[[37]](#_37_2)“中共中央[關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16日，見《北京周報》第21期（1967年5月19日），第6—9頁；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見《中國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4期（1969/1970年冬季號），第42—62頁。

[[38]](#_38_2)拉金：《中國與非洲》，第167—193頁。

[[39]](#_39_2)塞西爾·約翰遜：《共產黨中國與拉丁美洲（1959—1967）》。

[[40]](#_40_2)拉金：《中國與非洲》，第167—193頁。

[[41]](#_41_2)《紐約時報》1966年7月1日第4、11版。

[[42]](#_42_2)惠廷：《中國的威懾微積分學》，第170—183頁。

[[43]](#_43_2)《紐約時報》1968年11月1日，第1、10版。

[[44]](#_44_2)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第226—269頁。

[[45]](#_45_2)卡諾：《越南史》第12章。

[[46]](#_46_2)紐豪澤：《第三世界政治》第4章；外國廣播信息處：《遠東動態》1966年8—10月。

[[47]](#_47_2)關于秘密信件及有關事情，參閱“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26期（1966年4—6月），第216—217頁；關于界河航行規定，見《人民日報》1966年4月20日；蘇聯人未接受這些規定，如果接受的話，他們就等于承認中國對所有的有爭議的島嶼和這兩條界河的航道都擁有主權。

[[48]](#_48_2)W.A.C.阿迪：“中國與越南戰爭”，《密宗》第8卷第6期（1966年11—12月），第233—241頁；安泰順（音）：“中蘇爭端與越南”，《環球》第9卷第2期（1965年夏季號），第426—436頁；哈羅德·C.欣頓：“中國與越南”，見鄒讜編《中國在危機中》第2卷，第201—236頁；約翰·W.劉易斯：《中國與越南》，見芝加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編《中國簡報》，第53—56頁；勞倫斯·普拉特：《北越與中蘇緊張關系》，第197頁；羅伯特·A.魯本和羅伯特·法雷爾合編：《越南與中蘇爭端》，第120頁；唐納德·S.扎戈里亞：“莫斯科、北京、華盛頓與越南的戰爭”，見阿倫·A.施皮茨編《當代中國》，第14—20頁。

[[49]](#_49_2)尤金·K.勞森：《中越沖突》；廖廣勝（音）：《中國的排外主義和現代化：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間的聯系（1860—1980）》；戴維·W.P.埃利奧特編：《第三次印度支那沖突》中由薩特、波特和加雷特撰寫的章節。

[[50]](#_50_2)唐納德·欣德利：“印度尼西亞的政治權力與1965年10月政變”，《亞洲研究雜志》第27期（1969年），第237—249頁；多門：“印度尼西亞的未遂政變”，第144—170頁。

[[51]](#_51_2)“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28期（1966年10—12月），第193頁；第29期（1967年1—3月），第196—197頁。

[[52]](#_52_2)《遠東動態》1967年1月30日。

[[53]](#_53_2)“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29期（1967年1—3月），第193—195頁；第30期（1967年4—6月），第242頁。

[[54]](#_54_2)“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30期（1967年4—6月），第244頁。

[[55]](#_55_2)O.B.鮑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蘇中關系（1945—1970）》，第294—295頁。

[[56]](#_56_2)《蘇中關系（1945—1970）》，第304頁。

[[57]](#_57_2)1966年9月至1967年夏的每一期《北京周報》上至少有一篇這樣的文章。

[[58]](#_58_2)托馬斯·W.魯賓遜：“中蘇邊界爭端：背景、發展和1969年3月的沖突”，《美國政治學評論》第66卷第4期（1972年12月），第1177—1183頁。

[[59]](#_59_2)威廉·希頓：“毛主義的革命戰略與現代殖民：“‘文化大革命’在香港”，《亞洲概覽》第10卷第9期（1970年9月），第840—857頁；愛德華·厄爾·賴斯：《毛的道路》，第364—375頁；“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212—217頁。

[[60]](#_60_2)《中國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221—223頁。

[[61]](#_61_2)后面將更多地談到姚登山的情況。

[[62]](#_62_2)《紐約時報》1967年5月25日；《遠東經濟評論》1967年8月1日，第229頁。

[[63]](#_63_2)“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36期（1968年10—12月），第172頁。

[[64]](#_64_2)“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219—221頁；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225—226頁；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頁；第35期（1968年7—9月），第194—197頁；拉金：《中國與非洲》，第125—147頁。

[[65]](#_65_2)羅杰·M.史密斯：《柬埔寨的外交政策》；邁克爾·萊弗：“柬埔寨與中國：中立主義、‘中立’和國家安全”，見A.M.哈爾彭編《對華政策：六大洲的觀點》；邁克爾·萊弗：《柬埔寨：尋求安全》；梅爾文·格托夫：《中國與東南亞，生存的政治：外交政策相互影響研究》第3章。

[[66]](#_66_2)格托夫：《中國與東南亞》，第77—78頁。

[[67]](#_67_2)同上書，第79—81頁。

[[68]](#_68_2)同上書，第121頁。

[[69]](#_69_2)同上。

[[70]](#_70_2)格托夫：《中國與東南亞》第4章。

[[71]](#_71_2)約翰·H.巴杰利：“緬甸與中國：一個小鄰邦的政策”，見哈爾彭編《對華政策》，第303—328頁；羅伯特·A.霍姆斯：“1962年以來緬甸的對華政策”，《太平洋季刊》第45卷第2期（1972年夏），第240—254頁；林恩·B.帕斯科：“中緬關系（1949—1964）”，見安德魯·科迪埃編《哥倫比亞國際問題論文集（1965）》；弗蘭克·N.特拉格：“中緬關系：友好時代的結束”，《環球》第11卷，第4期（1968年冬季號），第1034—1054頁；賈斯特斯·M.范德克羅弗：“中國在緬甸的顛覆活動”，《印度共產黨人》第3卷第1—2期（1970年3—6月），第6—13頁。

[[72]](#_72_2)格托夫：《中國與東南亞》，第107—108頁。

[[73]](#_73_2)格托夫：《中國與東南亞》，第114頁。

[[74]](#_74_2)同上書，第115—116頁。

[[75]](#_75_2)同上書，第116頁。

[[76]](#_76_2)同上書，第117—118頁。

[[77]](#_77_2)梅爾文·格托夫：“‘化大革命’期中國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務”，見魯賓遜《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第317—318頁。（以下簡稱“外交部和外交事務”）

[[78]](#_78_2)同上書，第318—322頁。

[[79]](#_79_2)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務”，第322—325頁。

[[80]](#_80_2)當時只有黃華一人未被召回的原因，現在仍不太清楚。也許是中國領導人認為，在國門之外至少需要留下一名資深的觀察員，尤其是在中國在非洲惹出的麻煩已迫使那里的許多外交人員撤回國內的情況下。

[[81]](#_81_2)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務”，第326—331頁。

[[82]](#_82_2)“外交部和外交事務”，第332—336頁。

[[83]](#_83_2)“外交部和外交事務”，第347頁；托馬斯·W.魯賓遜：“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魯賓遜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第259—265頁。

[[84]](#_84_2)托馬斯·W.魯賓遜：“武漢事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地方沖突和省級官員的造反”，《中國季刊》1971年7—9月，第413—438頁。

[[85]](#_85_2)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務”，第347—351頁。

[[86]](#_86_2)《紅衛報》1967年9月15日。

[[87]](#_87_2)于爾根·多梅斯：《中國國內政治（1949—1972）》，第188—199頁。

[[88]](#_88_2)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務”，第364—366頁。

[[89]](#_89_2)賴斯：《毛的道路》第24和25章。

[[90]](#_90_2)欣頓編：《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79）》第4卷，第425和439號文件；“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34—37期的有關部分。

[[91]](#_91_2)亨利·S.阿爾賓斯基：“越南危機中中國和蘇聯的政策”，《澳大利亞季刊》第40卷第1期（1968年3月），第65—74頁；陳慶：“河內與北京：政策與關系概述”，《亞洲概覽》第12卷第9期（1972年9月），第807—817頁；G.P.施德潘德：“中國與越南”，《國際問題研究》第12卷第4期（1973年10—12月），第568—581頁；伊什沃·C.歐嘉：《中國對談判解決越南問題的態度的變化模式（1964—1971）》，第23頁；D.R.薩德薩：“中國與越南的和平”，《中國報告》第5卷第3期（1969年5—6月），第13—18頁；布里安·肖：“中國與北越：兩條革命道路”，《時事》第9卷第11期（1971年11月），第1—12頁；向乃光（音）：“河內與北京的關系”，《中國共產黨事務》第1卷，第4期（1964年12月），第9—21頁；亞歷山大·伍德賽德：“北京與河內：革命伙伴關系剖析”，《國際問題雜志》第24卷第1期（1968/1969年冬季號），第65—85頁；姚孟賢（音）：“中國共產黨人與越南戰爭”，《問題與研究》第1卷第9期（1965年6月），第1—13頁。

[[92]](#_92_2)“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35期（1968年7—9月），第119頁。

[[93]](#_93_2)1967—1968年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中的作者的觀察。

[[94]](#_94_2)參閱1968年8月23日周恩來的講話：“中國政府和人民嚴厲譴責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武裝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北京周報》第34期，附錄，第3—8頁。

[[95]](#_95_2)參閱三篇連載文章，見《共產黨人》第6期（4月），第102—113頁；第7期（5月），第103—114頁；第8期（5月），第95—108頁；第9期（6月），第93—108頁；第10期（7月），第90—99頁。

[[96]](#_96_2)“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32期（1968年4—6月），第189—190頁；第35期（1968年7—9月），第193—194頁；第36期（1969年10—12月），第172—173頁；第37期（1969年1—3月），第165—166頁。

[[97]](#_97_2)“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33期（1969年1—3月），第178頁。

[[98]](#_98_2)《人民日報》1967年12月28日第1版；格托夫：《中國與東南亞》，第129—137頁。

[[99]](#_99_2)“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35期（1968年7—9月），第196頁。

[[100]](#_100_2)《人民日報》1968年4月5日第1版；1968年2月28日第1版；李季銀（音）：《日本面對中國：戰后政治和經濟關系》，第49、163、188頁。

[[101]](#_101_2)“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頁；第35期（1968年7—9月），第195頁。

[[102]](#_102_2)“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225頁。

[[103]](#_103_2)卡羅爾·貝爾：“朝鮮與均勢”，《政治季刊》第25卷第1期（1954年1—3月），第17—29頁；唐納德·S.扎戈里亞：“北朝鮮與大國”，見威廉·J.邦茲、金泳昆（音）編《遠東事務中的兩個朝鮮》，第19—59頁；金日平（音）：“中國共產黨與北朝鮮關系的演變”，《亞洲研究雜志》第13卷第4期（1970年12月），第59—78頁；羅伊· U.T.金：“中國與北朝鮮的關系”，《亞洲概覽》第8期（1968年8月），第17—25頁；約瑟夫·C.庫恩：“北朝鮮：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間”，《中國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48—58頁；金鐘（音）：《夾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平壤：北朝鮮卷入中蘇爭端（1958—1975）》。

[[104]](#_104_2)塞繆爾·S.金：《中國、聯合國與世界秩序》，第99—105頁。

[[105]](#_105_2)A.H.尤薩克和R.E.巴特薩維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貿易”，見美國國會（第92屆）聯合經濟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評估》，第335—337頁。

[[106]](#_106_2)魯賓遜：“中蘇邊界爭端”，第1177—1183頁。

[[107]](#_107_2)弗農·阿斯帕圖里安：“70年代的蘇聯、美國和中國”，《概覽》第19卷第2期（1973年春季號），第103—122頁；威廉·E.格里菲思編：《世界與大國三角關系》；邁克爾·塔圖：《大國三角關系：華盛頓、莫斯科和北京》；羅納德·J.亞利姆：“三極與世界政治”，《世界事務年鑒》第28卷，第23—42期；托馬斯·W.魯賓遜：“緩和與中蘇美三角關系”，見德拉·W.謝爾登編《緩和面面觀》，第50—83頁；托馬斯· W.魯賓遜：“戰略三角關系中的美國政策”，見理查德·A.梅蘭森編《既非冷戰也非緩和？》，第112—133頁。

[[108]](#_108_2)安泰順（音）：《中蘇領土爭端》。

[[109]](#_109_2)同上書，第58—90頁。

[[110]](#_110_2)魯賓遜：“中蘇邊界爭端”，第1181—1183頁。

[[111]](#_111_2)新華社消息1969年3月3日；《人民日報》1969年3月4日，新華社關于邊界沖突的紀錄片的報道，1969年4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1969年5月24日，1969年5月24日新華社電訊，見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69年5月26日，A1—10；《打倒新沙皇！》，《人民日報》1969年3月3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4373期（1969年3月11日），第17—19頁。

[[112]](#_112_2)魯賓遜：“中蘇邊界爭端”，第1183—1185頁。

[[113]](#_113_2)哈里·格爾曼：《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集結和反華冒險》，第12—15頁。中國人顯然知道蘇聯在集結軍隊，還因此指責了莫斯科，參閱魯賓遜：“中蘇邊界爭端”，第1185—1187頁。

[[114]](#_114_2)《聯合出版物研究署》第36期，第136頁；《國際共產主義譯叢》第852期（1966年6月23日），第13—14頁。

[[115]](#_115_2)江一山：“共產黨中國的軍事（1968）”，《祖國》第59期（1969年2月），第20—36頁。

[[116]](#_116_2)魯賓遜：《中蘇邊界爭端》，第1187—1189頁。

[[117]](#_117_2)魯賓遜：《中蘇邊界爭端》，第1189—1190頁。

[[118]](#_118_2)此處參考了魯賓遜《中蘇邊界爭端》第1190—1194頁及所引用的有關材料。

[[119]](#_119_2)關于林彪失敗和死亡的文字材料雖然很多，但有許多是不可信的。這些資料還充滿矛盾，使用的時候應特別注意甄別，參閱姚明樂《林彪的密謀與死亡》。這本書基本上是偽造的。較為可信的是高英茂《林彪事件：權力政治和軍事政變》。另可參閱魯賓遜《林彪的政治軍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120]](#_120_2)威廉·W.惠特森：《中國的高層指揮：共產黨軍事政治史（1927—1971）》第11 章，“戰略與戰術”。

[[121]](#_121_2)托馬斯·M.戈特利布：《中國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與戰略三角關系的起源》。

[[122]](#_122_2)6月10—11日的事件，見新華社消息1969年6月11日；《紐約時報》1969年6月12日；《真理報》1969年6月12日。7月8日的事件，見新華社消息，《紐約時報》7月8日；《真理報》7月8日；莫斯科廣播電臺消息，7月10日；外國廣播信息處：《蘇聯動態》7月14日，A30—32。7月20日的事件，見《真理報》9月11日。8月13日的事件，見《真理報》8月13日；《紐約時報》8月14—16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69年8月14日；《蘇聯動態》8月15日，A1—4；《消息報》及蘇聯其他報刊，8月16日；《蘇聯動態》1974年2月28日，C2—3。

[[123]](#_123_2)《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4435期（1969年6月12日），第24頁；新華社消息，1969年8月19日；《紐約時報》1969年9月9日。

[[124]](#_124_2)中共軍隊歷來把先發制人的進攻當作一種實用戰術（而不是總體戰略）來加以運用，參閱惠特森《中國的高層指揮》。

[[125]](#_125_2)塔斯社消息，《真理報》，《消息報》1969年3月30日（譯文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69年4月16日，第3—5頁；《蘇聯動態》1969年4月1日，A1—7）。

[[126]](#_126_2)《蘇聯動態》1969年4月14日，A1。

[[127]](#_127_2)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周報》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3頁。

[[128]](#_128_2)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周報》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3頁。

[[129]](#_129_2)《真理報》1969年5月3日；《消息報》1969年5月5日（譯文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69年5月21日，第22頁）。

[[130]](#_130_2)《中國動態》1969年5月12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4417期（1969年5月16日），第21—22頁。中國的照會指責蘇聯上年未參加會談，認為中國這次同意參加新一輪會談是作了寬宏大量的讓步。

[[131]](#_131_2)《蘇聯動態》1969年5月23日，A4。中國人于6月6日作了答復，見《中國動態》6月9日，A3—4；《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4436期（1969年6月13日），第22—23頁。

[[132]](#_132_2)《蘇聯動態》1969年7月14日，A1；《紐約時報》1969年7月14日。

[[133]](#_133_2)《紐約時報》8月9日（蘇聯的聲明）；8月12日（中國的聲明）。

[[134]](#_134_2)這次會議的講話和文件的譯文，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69年7月2、9、16、23、30日；《蘇聯動態》1969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的重要講話，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69年7月 2日，第3—17頁；講話摘要，見《紐約時報》1969年6月8日。

[[135]](#_135_2)《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69年7月2日，第12頁。

[[136]](#_136_2)《真理報》，《消息報》1969年6月18日第14版。譯文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69年8月6日，第14—24頁；《蘇聯動態》1969年6月18日，A21—47。

[[137]](#_137_2)《共產黨人》第11期（1969年7月），第3—16頁（引文在第4頁）。（譯文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69年9月3日，第3—8頁。）

[[138]](#_138_2)“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1969年5月24日，見《中國動態》1969年5月26日，A1—10；《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4426期（1969年5月29日），第23—36頁。

[[139]](#_139_2)《真理報》1969年6月14日（譯文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69年7月9日，第9—13頁）。這是蘇聯回復中國5月2日的聲明和6月6日的抗議（《中國動態》1969年6月9日，A9—13）的一份照會。

[[140]](#_140_2)信守公約原則是“有義務執行公約的國際法原則”，意指簽約各方必須守信履約。與之相對的是情勢不變原則。國際法中的這個原則是指，當事人只有在“情勢不變”，即環境無實質性變化的情況下才守信履約。

[[141]](#_141_2)《紐約時報》1969年9月12、13日。

[[142]](#_142_2)《紐約時報》1969年9月12、13日。顯然，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充當了調解人。羅總理揚·杰奧爾蓋·毛雷爾奉命參加了胡志明的葬禮，然后前往北京，在柯西金抵達北京前數小時會晤了周恩來。

[[143]](#_143_2)《世界報》（巴黎）1974年11月10—11日。后來，周恩來講了他對機場會晤的意義的理解（雙方未簽署文字協議）。在周看來，雙方達成了如下共識：（1）在通過談判徹底解決邊界爭端之前，維持邊界地區的現狀；（2）雙方盡量避免進一步的武裝沖突，并撤走邊界線附近的軍隊；（3）雙方通過協商“重新劃定邊界線”，周認為“這個問題不難解決”，見《紐約時報》1973年11月24日（周與C.L.舒爾茨伯格的談話）；《共同社消息》1973年1月28日（周與日本眾議院議員的會談）。關于機場諒解的執行，周和柯西金的看法不同。第一，周認為，只有在其他方面的問題都得到重視之后，談判才能夠開始并持續下去，才能最終獲得結果。第二，雙方對“現狀”一詞的解釋不同。柯西金認為“現狀”指的是雙方都不再侵犯邊界，而周認為它不但指不侵犯邊界，而且意味著邊界地區的軍事平衡不發生重大變化。第三，雙方在非軍事區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柯西金顯然認為它指的是雙方軍隊均撤出某些已發生沖突或可能會發生沖突的地段。周（可能知道柯西金的解釋，也可能不知道）認為它指的僅是蘇聯軍隊撤出那些有爭議的地區，即中國提出主權要求的那些蘇聯領土。這些分歧是雙方難以達成協議的重要原因。

[[144]](#_144_2)《紐約時報》1969年9月17日。

[[145]](#_145_2)《紐約時報》1969年9月19日。

[[146]](#_146_2)1969年9月25日的《紐約時報》報道了美國共產黨領導人格斯·霍爾由河內返國途中拜會勃列日涅夫的情況。勃列日涅夫告訴霍爾，柯西金向周恩來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建議。其一與邊界有關，其二與外交代表須保持在大使級有關，其三是要擴大貿易規模。另據報道，10月初貿易談判已在進行，參閱《蘇聯動態》1969年10月3日，A4，該處轉述的是一位駐莫斯科的南斯拉夫消息靈通人士的話。實際上，貿易談判可能在8月份就開始了，見《中國動態》1969年10月7日，A2。

[[147]](#_147_2)中國方面發表的公報說，柯西金是“從河內回國途經北京”。這不是事實。它說明北京是被迫接待柯西金的。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4498期（1969年9月18日），第25頁；《遠東經濟評論》1969年9月25日，第759頁。

[[148]](#_148_2)路透社消息1969年9月30日；《紐約時報》1969年10月1日。

[[149]](#_149_2)《紐約時報》1969年10月4日。

[[150]](#_150_2)“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1969年10月7日，見《北京周報》第41期（1969年10月10日），第3—4頁；《紐約時報》1969年10月8日。

[[151]](#_151_2)“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1969年10月9日，見《北京周報》第41期（1969年10月10日），第8—15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4517期（1969年10月10日），第30—39頁。

[[152]](#_152_2)《紐約時報》1969年10月8、19、21日，《真理報》和《消息報》10月19日（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69年11月12日，第15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4523期（1969年10月24日），第30頁；第4524期（1969年10月27日），第27頁；《人民日報》1969年10月21日；《北京周報》第43期（1969年10月25日），第4—5頁。

[[153]](#_153_2)《紐約時報》1969年9月19日；1970年11月19日；1972年12月11日；《明報》1970年1月19日；《新時代》第36期（1973年），第19頁（指責中國在中蒙邊界舉行了151次“軍事演習”，蓄意進入蒙古境內1520公里不等，開槍射擊牛羊群，肆意辱罵邊防戰士，散發小冊子等宣傳品），《共青團真理報》1972年1月12日（見《蘇聯動態》，D7）；《洛杉磯時報》1972年12月11日；《蘇聯動態》1972年12月12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2年9月19日；《土庫曼火花報》1974年2月15日（見《蘇聯動態》1974年2月15日，R6—8）；《蘇聯分析家》1974年11月28日，第2頁（刊登了一位前蘇聯公民對中蒙邊界發生的一次大規模戰斗的描述。雙方均未公開承認這次死傷人數很多的戰斗）；《每日電訊報》1974年12月17日（見《蘇聯動態》1974年12月17日，W1—2）；戴維·弗洛伊德報道說11月份在中蒙邊界發生了五次沖突，但中蘇兩國政府均予以否認，見《中國動態》1974年12月19日，E2；《蘇聯動態》1974年12月19日，C1，尤睦佳·澤登巴爾（蒙古共產黨領導人）：“超越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遠東問題》第4期（1974年），第6—29頁。他在文章中宣稱，“成群的中國士兵越過邊界，砍伐樹木，在森林中縱火，還把感染上嚴重傳染病的牛群趕到蒙古境內”。《遠東經濟評論》（1974年1月28日，第18—19頁）詳細報道了1970年6月2日、1971年5月26日和1973年4月20日中國侵犯中蒙邊界的事件。

[[154]](#_154_2)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發生之后，中國組建了新的生產建設兵團（特別在內蒙古和東北地區），成員均是原來城市里的紅衛兵。

[[155]](#_155_2)這項“建議”只是重申了前5個月中中國政府在幾份照會中所持的立場，與蘇聯的建議實際上沒有差別。中國后來又提出，兩國軍隊均先從邊界線附近后撤一定的距離，欲以此作為達成協議的先決條件。

[[156]](#_156_2)《每日電訊報》1974年12月17日；《真理報》1974年12月20日；路透社和法新社消息，1974年12月17日（見《中國動態》1972年12月18日，E2）；塔斯社消息，1974年12月19日（見《蘇聯動態》1974年12月9日，C1）。

[[157]](#_157_2)新華社消息，1974年1月19日，見《蘇聯動態》1974年1月23日，A3—4；《紐約時報》1974年1月20、21、24日；新華社消息，見《中國動態》1974年1月23日，A1—5；《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4年1月25日；新華社消息，見《中國動態》1974年1月25日，A1—2；《經濟學家》1974年1月26日，第43頁。中國人聲稱他們“捕獲”了在北京城外的一座橋下向一名中國人提供間諜器材的兩名蘇聯外交官。那個中國人坦白罪行后，中國即驅逐了那兩名蘇聯外交官。蘇聯方面接著也驅逐了一名駐莫斯科的中國外交官。中國指責蘇聯在遠東進行大規模的間諜活動，參閱《阿特拉斯世界報刊評論》1975年2月，第15—20頁（轉載了《遠東經濟評論》上的一篇文章）。

[[158]](#_158_2)蘇聯直升機于3月14日降落在新疆阿勒泰地區的中國領土上，《真理報》1974年3月21日（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4年4月17日，第3頁）。中國人把該直升機放置在新疆的哈巴河縣（《北京周報》1974年3月29日，第5頁），指責俄國機組人員在執行軍事偵察任務。此后，雙方進行了一系列交涉。蘇方力求直升機和三名機組人員安全獲釋，而中方則利用此事大事宣傳，把它當作迫使蘇聯停止此類活動的手段。當中國人威脅說要審訊機組人員并把他們押往全國各地示眾時，蘇聯曾呼吁國際紅十字會進行調解，參閱《紐約時報》3月20、23、28、29日；5月3、6、9日；《蘇聯動態》（刊登了大量蘇聯方面的消息）3月29日，C1；4月5日，C1—2；4月29日，C1—2；4月30日，C1—2；5月3日，C1—2；5月6日，C1；5月7日，C6—7；5月13日，C1—10；5月16日，C5—6；5月23日，C1—2；6月10日，C1—2；6月24日，C1；6月28日，C1—2；8月8日，C1—4；11月4日，C3—4；《中 國動態》6月24日，A4；《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74年4月1—4日，第65—66頁；《經濟學家》1974年6月22日，第27—28頁；《每日電訊報》1974年6月26日。

[[159]](#_159_2)《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4年6月12日，第4頁）轉載了5月24日《真理報》的消息。

[[160]](#_160_2)新華社消息，1971年4月18日（見《中國動態》4月19日，A1）。據新華社報道1971年3月31日，蘇聯摩托艇“歐內斯特·臺爾曼”號撞沉了一艘中國漁船，造成了11人死亡11人受傷的嚴重海難事故。中國人說那艘蘇聯船沒有積極搭救30名幸存者。俄國人則稱（3月31日塔斯社消息），那艘中國漁船在行駛中沒有開燈。

[[161]](#_161_2)《紐約時報》1970年1月28日，2月2日，8月3日；1973年3月8日、25日，8月5日；1975年4月4日；新華社消息1973年3月6日。

[[162]](#_162_2)祖農·太也夫，曾任新疆軍區副參謀長，民族軍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譯者

[[163]](#_163_2)哈里森·E.索爾茲伯里：“馬可·波羅會承認毛的新疆”，《紐約時報雜志》1969年11月23日；《紐約時報》1970年3月3日，7月5日，8月16日；《遠東經濟評論》1971年1月16日，第46—47頁；《紐約時報》1973年8月5日，1974年1月3日；塔尼亞·雅克：“東土耳其斯坦還是‘新疆’？”《自由電臺研究》1975年3月7日。

[[164]](#_164_2)《紐約時報》1973年11月8日；《蘇聯動態》1974年6月18日，C1—2；《遠東經濟評論》1971年1月16日，第47頁；1974年4月8日，第5頁；《中國動態》1975年3月19日，E5—6。

[[165]](#_165_2)《紐約時報》1960年10月12日。

[[166]](#_166_2)這篇文章的譯文見《中國動態》1969年11月6日，A1。其他分析，見《紐約時報》11月6、20日；《洛杉磯時報》11月7日；《遠東經濟評論》1969年11月13日，第334頁；《華盛頓郵報》1969年11月21日。

[[167]](#_167_2)《華盛頓郵報》1969年11月21日；《洛杉磯時報》1969年11月24日；《遠東經濟評論》1969年12月4日，第484頁；《北京周報》第49期（1969年12月5日）。

[[168]](#_168_2)《紐約時報》1969年12月21日。

[[169]](#_169_2)同上。

[[170]](#_170_2)《紐約時報》12月31日。

[[171]](#_171_1)同上。

[[172]](#_172_1)《遠東經濟評論》1969年12月25日；1970年1月9日（譯文見《中國動態》1970年1月9日，A1）；《洛杉磯時報》1970年1月9日；《金融時報》1970年1月15日。

[[173]](#_173_1)《紐約時報》1969年12月30日；1970年1月2、3日；《中國動態》1970年1月2日，A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4574期（1970年1月12日），第43頁；《真理報》1970年1月3日；《北京周報》第2期（1970年1月9日），第31頁。

[[174]](#_174_1)《紐約時報》1970年1月14日；《華盛頓郵報》1970年1月2日。

[[175]](#_175_1)《紐約時報》1970年3月8日。

[[176]](#_176_1)《紐約時報》1970年3月1日；《中國動態》1970年1月13日，A31；1970年1月17日。

[[177]](#_177_1)《紐約時報》1970年3月20日。

[[178]](#_178_1)《紐約時報》1970年3月1日。

[[179]](#_179_1)1970年3月14日的《紐約時報》轉載了《真理報》的消息（譯文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0年4月14日，第19頁）。

[[180]](#_180_1)《真理報》1969年3月17日；《紐約時報》1969年3月20日、4月1日、15日，5月3日；《人民日報》1970年4月25日。

[[181]](#_181_1)《紐約時報》1970年5月3日。

[[182]](#_182_1)《真理報》1970年4月15日（譯文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0年5月12日，第1—4頁）。

[[183]](#_183_1)倫敦《泰晤士報》1970年4月22日；《紐約時報》1970年5月7日。

[[184]](#_184_1)《洛杉磯時報》1970年4月16日。蘇聯武裝力量似乎接受了中方單方面撤軍的建議，因為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重返這些爭議地區，也可以在不出兵的情況下，通過空軍和炮兵的火力控制這些地區。

[[185]](#_185_1)《蘇聯動態》1970年7月1日，A20，援引6月20日布達佩斯廣播電臺的消息。

[[186]](#_186_1)《真理報》1970年5月18日（譯文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0年6月16日，第1—7頁）；《紐約時報》1970年5月10日。

[[187]](#_187_1)《紐約時報》1970年6月11日；《遠東經濟評論》1970年6月18日，第4頁。

[[188]](#_188_1)《中國動態》1970年7月1日，A1；《遠東經濟評論》1970年7月9日，第4、16—17頁；《紐約時報》7月11日；《真理報》1970年7月11日（譯文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0年8月11日，第15頁）。

[[189]](#_189_1)《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0年12月22、24日；《紐約時報》1970年12月21日和25日；《中國動態》1970年12月24日，A1；《北京周報》第1期（1970年1月1日），第7頁；《真理報》1970年12月20日（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1年1月19日，第26頁）。

[[190]](#_190_1)《遠東經濟評論》1970年7月23日；《洛杉磯時報》1970年8月16日；《中國動態》1970年8月17日，A1；《北京周報》第32期（1970年8月7日），第8—9頁；《真理報》1970年8月16日（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0年9月15日，第8頁）；《紐約時報》1970年8月16日。

[[191]](#_191_1)《紐約時報》1970年7月3日，8月16日。

[[192]](#_192_1)《真理報》1970年12月3日，《蘇聯當代報刊文摘》第2卷第48期（1970年12月29日），第32頁；《紐約時報》1970年11月19日和24日。

[[193]](#_193_1)《紐約時報》1970年9月24日。

[[194]](#_194_1)《紐約時報》1970年11月24日。

[[195]](#_195_1)《遠東經濟評論》1970年10月10日，第4頁；《自由中國周報》1970年10月25日。

[[196]](#_196_1)轉南斯拉夫通訊社消息，《中國動態》1971年1月15日，A3；《真理報》1970年12月3日。

[[197]](#_197_1)《真理報》1971年1月15日，《當代蘇聯報刊文摘》第23卷第2期（1971年2月9日）。

[[198]](#_198_1)《真理報》1971年3月24日；《中國動態》1971年4月19日，A1。

[[199]](#_199_1)《真理報》1971年2月20日，《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1年3月23日，第20頁；《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1年5月29日；《中國動態》1971年5月24日，A11—12；《真理報》1971年5月22日，《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1年6月22日；《紐約時報》1970年5月22日。

[[200]](#_200_1)宣傳攻勢仍在繼續，參閱1971年7月1日《真理報》上發表的“亞歷山大羅夫”的文章（《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1年10月5日，第1—5頁）；《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1年3月18日；9月30日；《國際事務》（莫斯科）1971年11月，第17—24頁。

[[201]](#_201_1)《真理報》1972年9月23日；《紐約時報》1972年9月24日。

[[202]](#_202_1)他返回了莫斯科，以免與尼克松同在北京。

[[203]](#_203_1)《紐約時報》1972年3月27日和5月各日；《真理報》1972年3月21日（《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2年4月19日，第18頁）；《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2年3月27日。中國方面對伊利切夫返回北京一事未予報道。《中國動態》1972年3月22日，A1；《遠東經濟評論》1972年4月1日，第4頁；1972年4月8日，第9頁。

[[204]](#_204_1)《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0年8月26日。

[[205]](#_205_1)《蘇聯動態》1972年5月1日；《紐約時報》1972年5月1日；《中國動態》1972年5月2日，A5。

[[206]](#_206_1)《北京周報》第31期（1972年8月4日），第7—9頁；《真理報》1972年9月30日，《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3年10月25日，第16頁；《蘇聯動態》1972年10月17日，D1；《紐約時報》1972年10月18日；《中國動態》1972年12月15日，A1。

[[207]](#_207_1)《紐約時報》1972年8月3日，9月6日，11月9日，12月22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2年8月26日。

[[208]](#_208_1)《紐約時報》1973年2月25日。

[[209]](#_209_1)《洛杉磯時報》1973年6月6日；《真理報》1973年6月2日（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3年6月27日，第4、12頁）；《蘇聯動態》1973年6月1日，D1。

[[210]](#_210_1)《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1973年9月25日；《經濟學家》1973年9月29日，第42頁；《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3年10月2日；《國際事務》（莫斯科）第5期（1975年5月），第37頁。

[[211]](#_211_1)《中國動態》1973年3月9日，A3；《紐約時報》1970年3月9日。

[[212]](#_212_1)《真理報》1973年5月1日。

[[213]](#_213_1)《紐約時報》1973年7月20日。他是1月13日返回北京的，見《紐約時報》1973年2月25日。

[[214]](#_214_1)《北京周報》第35和36期（1973年9月7日），第23頁。對于這次代表大會的評論，見托馬斯·魯賓遜：“1973年的中國：復活的‘左’傾思想威脅著‘新事業’”，《亞洲概覽》（1974年1月），第1—21頁。

[[215]](#_215_1)《紐約時報》1973年10月29日。

[[216]](#_216_1)《紐約時報》1973年11月11日；《真理報》1973年11月10日（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3年12月5日，第6頁）。

[[217]](#_217_1)《洛杉磯時報》1974年6月26日；《紐約時報》1974年6月26日，30日；《蘇聯動態》1974年6月25日，C 1；《金融時報》1974年6月26日；路透社消息1974年6月26日；《中國動態》1974年6月21日，A1；《世界報》（巴黎）1974年6月27日。

[[218]](#_218_1)《真理報》1974年5月3日（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4年5月29日，第15頁）；《紐約時報》1974年3月21、24、29日；《經濟學家》1974年1月26日，第43頁；《蘇聯動態》1974年6月24日，C1。

[[219]](#_219_1)《紐約時報》1974年2月9、10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4年2月15日；瓊·里奧洛特：“蘇聯對西沙群島爭端的反應”，《自由電臺快訊》1974年2月11日。自1959年和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以后，這是中國首次動用武力解決領土問題。在莫斯科看來，這件事說明，一旦軍事形勢對中國有利，中國就會使用武力，為所欲為。

[[220]](#_220_1)《真理報》1974年5月24日（《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4年6月12日，第4頁）；《紐約時報》1974年5月24、25、28日；《蘇聯動態》1972年5月23日，C1。

[[221]](#_221_1)見內維爾·馬克斯韋爾：“中蘇邊界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段考”，《現代中國》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116—126頁。

[[222]](#_222_1)《紐約時報》1974年5月28日，6月1日；《中國動態》1974年5月31日，A1；《北京周報》第23期（1974年6月7日），第7頁。

[[223]](#_223_1)馬克斯韋爾：“中蘇邊界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段考”，第122頁。

[[224]](#_224_1)《紐約時報》1974年5月24日。馬克斯韋爾的觀點（看上去合理但缺乏有力的證據）是，莫斯科“堅決要按沿中國一側的江岸劃定界線，意在以此為條件進行討價還價，換取中國人在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問題，即以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匯處為界的問題上作出讓步”。

[[225]](#_225_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5582期（1974年4月2日），第33頁；《中國動態》1974年3月25日，A13；《遠東經濟評論》1974年6月3日，第14頁。

[[226]](#_226_1)《紐約時報》1974年8月19日，10月2日；《真理報》1974年8月19日（《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4年9月11日，第16頁）；《蘇聯動態》1974年8月19日，C1；《中國動態》1974年8月19日，D18；《真理報》1974年10月1日（《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4年10月23日，第7頁）。

[[227]](#_227_1)《紐約時報》1974年9月3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4年8月26日；《中國動態》1974年8月23日，A—2。

[[228]](#_228_1)《曼徹斯特衛報》1974年11月8日；《中國動態》1974年11月7日，A1—3；《紐約時報》1974年11月8日；路透社消息1974年11月8日。

[[229]](#_229_1)《紐約時報》1974年11月9日。

[[230]](#_230_1)《真理報》1974年11月27日（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4年12月25日，第1—6頁）；《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4年11月27日。在此之前，莫斯科曾通過匈牙利的新聞媒介表示，它將拒絕北京的建議，見《蘇聯動態》1974年11月15日。

[[231]](#_231_1)《真理報》1974年11月25日（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4年12月18日，第1頁）。

[[232]](#_232_1)《紐約時報》1974年2月13日、18日；《蘇聯動態》1974年2月12日，C1；《中國動態》1974年2月12日，A1；《每日電訊報》1974年2月13日。

[[233]](#_233_1)直到2月份談判才恢復，因為中國忙于籌備1月份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34]](#_234_1)《北京周報》第4期（1975年1月24日），第25頁；《華盛頓郵報》1975年1月24日；《遠東經濟評論》1974年1月31日，第14—15頁。

[[235]](#_235_1)《蘇聯動態》1974年10月15日，A13。

[[236]](#_236_1)《歷史研究》1975年第1期。

[[237]](#_237_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北京周報》第4期（1975年1月24日），第12頁。

[[238]](#_238_1)《真理報》1974年2月22日亞歷山大羅夫的文章，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5年3月19日，第1—5頁。

[[239]](#_239_1)《當代蘇聯報刊文摘》1975年3月19日，第5頁；《紐約時報》1975年2月23日。

[[240]](#_240_1)路透社消息，1974年2月17日；《金融時報》1975年2月19日；《中國動態》1975年2月18日，A1。

[[241]](#_241_1)《蘇聯動態》1975年4月30日，C1。

[[242]](#_242_1)《遠東經濟評論》1970年10月24日，第4頁；《中共研究》第3卷第7期（1969年7月），第9頁；《紐約時報》1969年8月7日；《經濟學家》1969年9月21—22日，1970年4月12日；《遠東經濟評論》1970年4月30日，第112—114頁；《紐約時報》1970年7月22日；《遠東經濟評論》1970年9月4日，第359頁；《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0年1月4日；亨利·布拉德舍：“蒙古的蘇聯化”，《外交事務》第5卷第3期（1972年7月），第545—553頁；《經濟學家》1972年5月6日，第49頁；《紐約時報》1972年9月11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3年9月10日、14日；F.O.米克舍：“蘇聯：紅色中國——在俄羅斯東部地區看世界第三大國”，《國防與經濟》1974年10月，第424—428頁；《世界報》（德國）1969年7月10日；《洛杉磯時報》1969年9月13日；《紐約時報》1969年11月30日、12月30日，1971年10月7日，1972年5月6日、9月10日，1974年2月24日；《世界報》（巴黎）1970年9月5日；《航空航天技術》1974年5月20日，第64頁。

[[243]](#_243_1)《紐約時報》1969年8月16日、10月28日、12月7日，1970年7月22日；《遠東經濟評論》1972年2月26日，第18—19頁；《紅星報》1970年3月5日第4版；南斯拉夫通訊社消息，1971年2月17日（見《蘇聯動態》1974年5月9日，R6—7）；《蘇聯動態》1974年6月17日，R19—22；《每日電訊報》1974年6月15日；《巴爾的摩太陽報》1974年8月5日；《明報》第103、104、105期（1974年7、8、9月）上刊登的黃辰時（音）等人的文章；《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5年4月23日。

[[244]](#_244_1)《紐約時報》1970年2月3日、5月19日，1971年11月1日；《蘇聯動態》1974年3月20日，V1。

[[245]](#_245_1)《中共研究》第3卷第7期（1969年7月），第9頁；《紐約時報》1969年7月6日，8月17日、30日，9月12日，11月30日；《經濟學家》1969年9月21—26日；《紐約時報》1970年4月12日；《遠東經濟評論》1970年9月4日，第359頁；米克舍：“蘇聯：紅色中國”，《國防與經濟》（1974年10月）；《世界報》（德國）1969年7月10日；《紐約時報》1972年7月25日；《每日電訊報》1974年7月15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4年11月7日。

[[246]](#_246_1)《紅星報》1972年2月25日第3版（見《當代蘇聯報刊文摘》第24卷第9期[1970年3月29日]，第1—4頁；《紐約時報》1972年2月26日）；《新時代》（莫斯科）1972年11月30日，第16頁；《遠東經濟評論》1972年8月5日，第23—24頁；《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3年3月23日；《中國動態》1973年12月13日，A4—6；《遠東經濟評論》1974年3月11日，第33頁；《中國動態》1974年4月8日，A12—13；《蘇聯動態》1974年7月16日，C1。

[[247]](#_247_1)據1970年10月17日的《遠東經濟評論》（第35—36頁）報道，新疆的生產建設兵團有60萬人，內蒙古有20萬人，黑龍江有20萬人，青海有10萬人；《紐約時報》1969年7月6日，11月7日，1970年1月28日，3月1日，7月22日；《中國動態》1969年9月30日，G1；《北京周報》1972年6月23日，第22—23頁；1973年6月2日，第14—15頁；《遠東經濟評論》1975年3月26日，第5頁。

[[248]](#_248_1)《紐約時報》1969年7月6日，11月30日；《遠東經濟評論》1971年1月16日，第46—47頁；《中國動態》1974年5月23日，K1—7；《每日電訊報》1974年7月15日；《中國動態》1974年8月5日，K1、L1；《遠東經濟評論》1974年11月29日，第30—32頁；《中國動態》1975年2月2日，第61—62頁。

[[249]](#_249_1)《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2年11月16日；《紐約時報》1969年11月21日，12月28日；《遠東經濟評論》1969年12月4日，第485—486頁；1970年1月22日，第4頁；《紐約時報》1971年1月4日，6月5日；《遠東經濟評論》1973年4月9日。

[[250]](#_250_1)《紐約時報》1970年6月21日，7月5日、20日；布拉德舍：“蒙古的蘇聯化”；1972年1月22日的《遠東經濟評論》報道了許多細節；《紐約時報》1973年7月5日，1974年1月2日。

[[251]](#_251_1)《紐約時報》1969年9月13日，11月2日；《紅星報》1970年1月21日第4版；《遠東經濟評論》1972年2月26日；《經濟學家》1972年5月6日，第49頁；《紐約時報》1972年9月10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3年9月14日；《世界報》（巴黎）1970年9月5日；《洛杉磯時報》1974年6月21日；《經濟學家》1973年8月4日，第36頁；《文學報》（蘇聯）1974年5月15日，第9頁（見《蘇聯動態》1974年5月21日，C1）；《蘇聯動態》1974年8月7日，C1—2；《紐約時報》1974年9月29日；《遠東經濟評論》1974年5月6日，第30—34頁；哈里·蓋爾伯：“核武器與中國的政策”，第13—17頁；拉爾夫·克拉夫等編：《美國、中國與軍備控制》，第140—143頁。

[[252]](#_252_1)基辛格：《白宮歲月》，第183頁。

[[253]](#_253_1)這些資料出自1968—1975年間的《軍事平衡》（年刊）和1969—1975年間的《戰略研究》（年刊）。這兩份刊物都是由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出版的。

[[254]](#_254_1)如要了解詳情，可參閱托馬斯·W.魯賓遜：“1972年的中國：社會經濟在不穩定的政治環境中的發展”，《亞洲概覽》1973年1月；魯賓遜：“1973年的中國”，《亞洲概覽》1974年1月。

#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為繼承權而斗爭，1969—1982年

##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問題和毛主義的終結

## 引言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規劃中國未來的一種嘗試，它的方法是改造中國人民的本性，以實現“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1]](#_1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_Zho)“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2]](#_2_Tong_Shang_Shu__Di_45__46Ye)，這些所謂的蘇聯式的修正主義分子，用剝削階級腐朽思想腐蝕群眾，以達到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通過進行一場針對這些當權派的階級斗爭，群眾將會實現自身的解放。通過教育、文學、藝術等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接受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民將自覺地形成對資產階級思想污染的抵御力。

毛澤東的目標是使中國成為一個雖然貧窮但卻保持社會主義純潔性的，更加平均主義、更少特權、更加集體主義、更少官僚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所有人像一個人那樣工作著。他們并非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是因為心里有根指南針——毛澤東思想——指引著他們奔向真正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

“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要解決：毛澤東之后，中國向何處去？而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解決：毛澤東之后，誰接班？假如那些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如國家主席劉少奇）接了這位主席的班，那么中國就會“改變顏色”。因此，中國不僅要有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指導，還必須“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3]](#_3__Guan_Yu_He_Lu_Xiao_Fu_De_Jia)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新的領導人將會在斗爭中產生，并經受鍛煉，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有朝一日將在他們手中大放異彩。

在過渡期間，毛澤東不得不清洗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安排一個他能夠絕對信任會堅持他的路線，并繼續傳下去的新的接班人。因此，他進行了本書第二章“中國在危機中”所描述的黨內斗爭和清洗。1969年春天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標志著毛澤東在這場斗爭中的勝利，大會按照他的指示，通過了他個人選定的接班人——國防部長林彪。但是，這又導致了一個新的謎一樣的難題：毛澤東之后，哪一種政治力量掌權？是由業已混亂一團、大批黨員已遭迫害的黨統治中國，還是由同樣具有光榮革命傳統、在三年“文化大革命”中逐漸崛起、成為國家控制者的另一種力量——軍隊來統治中國？這是一個與億萬中國人關系重大、極端重要的結構性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極少數領導人之間以斗爭方式解決的。他們在自己的家里謀劃，在中央會議上交鋒，以這個派別或那個集團在斗爭中失敗，最終形成了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法。

## 中國政治的軍事化

1969年4月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是林彪個人和人民解放軍在政權結構中的一次勝利。1966年8月十一中全會上林的地位已經僅次于毛，九大又肯定了他的這一地位。九大通過的新黨章，正式規定他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主席的—位親密戰友獲得如此殊榮，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第一次。[[4]](#_4_Shi_Ji_Shang__Zhe_Zai_Ge_Guo)林彪在軍隊中的同事，如第二章所指出的，在這次大會上十分突出，中央委員會里，軍隊代表由19％增加到45％；[[5]](#_5_Can_Kao_Di_Er_Zhang___Jian_Yu)在九大之后的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選舉中，進入政治局的現役軍人人數也顯著增加。[[6]](#_6_Can_Kao_Biao_4)

林彪和軍隊的上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革命一個合乎邏輯的演變結果，實際上也符合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權力更迭模式。在中國歷史上往往出現這樣的情況：每當政治控制由于經濟災難的影響而垮臺的時候，起義便爆發了。以暴力對抗暴力的結果，導致了政府高層的軍事化。最后，某個更具雄才偉略、雄心勃勃的起義領袖，有時是一位農民，更多的時候是一個貴族，乘機用暴力推翻舊的王朝，并消滅其他起義領袖，建立新的王朝。而那些在開國皇帝奪取政權斗爭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將軍們，在新王朝里，就會掌握重要的職位。[[7]](#_7_You_Guan_Xi_Han_Qu_Dai_Qin_Zh)

表4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政治局委員名單



續表



說明（1）（a）在1968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增選進政治局。  
　　　　 （b）在1969年九大后增選進政治局。  
  
　　　　 （c）在1956年和1958年八大的兩次全會上成為政治局成員的。  
  
（2）“文化大革命”前政治局23名成員中有14名落選。  
（3）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政治局16名新成員中10名是軍人。  
（4）新的政治局25名成員中，12名是軍人，其中10名是現役軍人。與1956—1958年的政治局相比較，那時26名成員中只有7名是軍人，而現役軍人只有2名。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文職委員占76.3％，解放軍占23.7％；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文職委員占52.5％，解放軍占47.5％。  
（5）“文化大革命”前在省里任職的政治局委員有3名，在這屆政治局中有8名。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中，各省委員占37％；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中占58.6％。

通常，新王朝取代舊王朝需要經過幾十年的時間，這是一個充滿戰亂的時期，但表面上卻是干凈利索地選定某年為新天子登基的開國元年，君權就此交替。這種做法掩蓋了戰亂的實質。這一點，在清朝走向衰落以至最后滅亡的相當長時間里，以及隨后幾個政權的爭奪權力過程中，表現得尤其明顯。這場長時間的斗爭，以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為標志達到頂點。

在清王朝于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中被英國人打敗之后，幾十年里，滿人同時受到了外國侵略和國內起義的困擾。清王朝的最初反應是按照傳統方式重新武裝起來，但實踐證明，這樣做是相當無效的。地方勤王大員因此不得不建立他們自己的武裝，以此來補充無能的帝國軍隊。[[8]](#_8_Can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u)最后，清王朝開始實行國防近代化，這方面的成功，促成了新軍的創建者袁世凱的崛起，使他成了政權經紀人和政權執掌人。作為政治權力的經紀人，他導演了1912年的末代皇帝退位，同時，作為政治權力的所有者，他支配了中華民國初年的中國政治，[[9]](#_9_Tong_Shang_Shu__Di_383__388)軍人執政的時期開始了。

袁世凱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妄圖建立一個新的王朝，但僅做了83天自稱的皇帝便一命嗚呼。此后，中國便進入軍閥混戰時期（1916—1928年）。在這個時期里，無論袁世凱從前的部下還是他的競爭對手，都未能取得足夠的優勢，替代袁世凱的角色。[[10]](#_10_Can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北京政府已名不副實，政府控制權又走馬燈似的從一個軍閥轉移到另一個軍閥手中。那些曾經密謀推翻清王朝，接著就被袁世凱排擠在一邊的革命黨人，由此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沒有自己的軍隊，就會一事無成，或受制于軍閥的不可靠的支持。就在那時，孫中山開始轉向莫斯科。1924年，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他的軍事助手蔣介石建立了黃埔軍官學校，以培養忠于國民黨的革命軍軍官。[[11]](#_11_Tong_Shang_Shu__Di_540Ye)

如果孫中山不是在1925年過早逝世，改組后的國民黨就可能發展為一個強有力的政治組織，能使它的軍隊為其革命目標服務。他逝世以后，國民黨內部發生了一場爭奪繼承權的斗爭。由于蔣介石握有軍權，他很快取得了這場斗爭的勝利。當蔣于1928年建立國民黨政府時，雖然國民黨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但軍隊卻是政權的最終力量來源。[[12]](#_12_Can_Jian_Yi_Lao_Yi___Liu_Cha)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新生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建立了統一戰線，共產黨的軍官和干部參加北伐，使蔣介石得以取得打倒軍閥的戰爭的勝利。但是，當蔣在1927年向共產黨人舉起屠刀時，毛澤東同當年的孫中山一樣，清醒地認識到，沒有自己的軍隊，中國的政治運動就沒有前途，槍桿子里面出政權。[[13]](#_13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在井岡山根據地和江西蘇區，他和他的同志們創建了革命軍隊，并形成革命戰爭的戰略，依靠這些，20年后，他們在內戰中打敗了國民黨。[[14]](#_14_Can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

在共產黨領導的、后來稱為人民解放軍的軍隊和蔣介石軍隊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毛堅持認為，黨應該指揮槍，而槍絕對不能指揮黨。[[15]](#_1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人民解放軍不能再是另一支軍閥部隊，甚至也不能像國民黨與其軍隊的關系模式（即軍隊占支配地位的黨軍關系模式）那樣，而應該是一支共產黨領導的、為實現黨的革命目標服務的革命軍隊。

但是，事實并不是如此簡單。在戰斗最激烈的關鍵時刻，當生死取決于軍事指揮員的決心時，黨領導軍隊的理論原則就難以付諸實施了。[[16]](#_16_Kang_Ri_Zhan_Zheng_Shi_Qi__P)如果誰像毛澤東那樣，既要依靠將軍們支持來奪取政權，又過分強調要將軍們服從，那就不是明智之舉了。[[17]](#_17_Can_Jian_Lei_Meng_De__F_Huai)確實，毛澤東的政治權力出自槍桿子；他的方法是保持對軍隊的政治控制，因為從1935年直至他逝世的40多年時間里，他一直擔任中央軍委主席。

而且，當將軍們立下了汗馬功勞，打下江山以后，怎能拒絕他們分享勝利果實呢？當然不行。50年代中期，當高崗謀取毛的接班人位置時，他就努力尋求那些他認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權力分配中所獲甚微的將軍們的支持。[[18]](#_18_Can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雖然高崗失敗了，但黨的領導層卻從中獲得了某種信息。林彪，一位似乎已經被高崗的觀點所吸引的軍人，很快被提拔進入政治局。1956年八大以后，十大元帥中有七人進了政治局。[[19]](#_19_Ming_Zhao_Kai_Guo_Huang_Di_Z)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當國防部長彭德懷對毛的“大躍進”路線明確提出挑戰時，軍隊在政權中的重要地位得到進一步證實。彭愿意出頭可能歸因于許多因素，但它的意義在于，只有軍隊的現任首腦——國防部長具有這樣的結構性權力基礎，去發動進攻，非難主席的能力和權威。毛一直以為，軍隊是自己的穩固堡壘，彭卻從這里發起突然襲擊，使毛感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和傷害。這一點，可以從他猛烈的反擊中衡量出來。在廬山會議上，只是當他最后把問題上升到要求大家在他和脾氣暴烈的國防部長之間做出選擇的程度時，才終于迫使其他元帥接受了彭的辭職。[[20]](#_20_Can_Kao___Jian_Qiao_Zhong_Gu)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彭德懷雖被貶黜，但解放軍在政權中的地位卻提高了。林彪取代彭擔任了國防部長。林從30年代初開始就是毛的信徒，這使主席更加堅信軍隊對他和他的思想的忠誠。當林彪提倡學習毛澤東思想，并且向軍隊發行第一套毛語錄的“紅寶書”時，人民解放軍被稱為榜樣，甚至是中國共產黨的學習榜樣。[[21]](#_21_Tong_Shang)

這樣，當毛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對黨的領導人發動突然襲擊的時候，他可以相信，另一個主要的革命機構將會支持他。后來，當紅衛兵發現打倒省里領導人比預料的要困難時，毛又能夠號召人民解放軍支“左”。而當因勝利而得意洋洋的紅衛兵陷人內訌，發生武斗，中國的許多城市成為武裝沖突的戰場時，吹響警哨的是一位將軍——那是1967年夏陳再道在武漢的事。雖然陳將軍本人因此受到紀律處分，但極“左”派干部也被清洗了。一年以后，毛號召紅衛兵上山下鄉，中央“文革”小組的群眾基礎被瓦解了，林彪和他的將軍們在九大取得勝利的道路暢通了。[[22]](#_22_Can_Kao___Jian_Qiao_Zhong_Gu)

對毛來說，這個問題是攻不倒地的，他在同事們中說蘇聯攻擊中國是“軍事官僚專政”簡直不值得一駁。[[23]](#_23_Zai_Zhong_Gong_Jiu_Jie_Yi_Zh)在其一生中，他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但在他逝世以后，前景卻是軍隊將支配黨。共產黨可能走國民黨的老路。他能接受這種前途嗎？

## 林彪的覆滅

在一定程度上，中共九大應該標志著正常狀態的恢復：毛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取得了支配地位，他的政敵被打倒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已經形成，內亂得到控制。早在1968年10月，毛就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在九大的政治報告中，林彪宣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24]](#_24___Dang_Dai_Bei_Jing_Cai_Liao)談到前途時，林彪說，要“繼續上層建筑領域里的革命”[[25]](#_25_Tong_Shang_Shu__Di_34Ye)，也就是建立一個發動“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新社會。對勝利者（如果不是對受害者）來說，當他們能夠最后重寫歷史時，“文化大革命”到此便應該結束了。1969年這一年，原預定標志著“文化大革命”后一個新的開端，就像20年前的解放那樣。

但假如這是一次“勝利者的大會”，它本應預示的平靜卻是短命的，就像人們用這一名稱所形容的1934年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后那樣。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精英們之間決定誰有權塑造未來的權力斗爭，它就遠未結束，而且實際上不久就發生了更危險的轉折。斗爭將在三個領域展開：黨的重建；國家機構的重建；以及外交事務。在所有這三個領域的斗爭背后，是林彪權力上升招致的波拿巴主義的幽靈。

#### 黨的重建

由于所有名正言順的下級黨委都遭到破壞，參加九大的代表恐怕只能通過地方革命委員會和“造反派”組織“協商”產生[[26]](#_26_Zhe_Li_Zhi_Na_Xie_Lan_Ling_G)，或簡單地根據上級的指定。[[27]](#_27_Jie_Fang_Jun_Zheng_Zhi_Xue_Y)既然解放軍控制著革命委員會[[28]](#_28_Zai_21Ge_Sheng_Ge_Ming_Wei_Y)，軍隊代表人數在九大急劇增加，就沒有什么好驚奇的了。隨著許多解放軍干部在九大上得到提升，地方黨的建設過程反映軍隊占優勢的現實，就更沒有什么好驚奇的了。

早在1967年10月“五十字建黨方針”的批示中，毛就指示，黨組織應該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號召開始黨的重建工作。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他重申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號召。雖然中央領導人希望從基層開始重建，1970年又大力宣傳北京大學、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以及上海國棉17廠的整黨經驗，作為各地整黨的樣板[[29]](#_29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_B)，但各地的黨支部仍然難以建立起來。

到1969年下半年，整黨重點轉到縣市一級，但即使在這一級，進展也十分緩慢。1969年11月至1970年11月，全國2185個縣中，只有45個縣建立了黨的委員會。大概認識到從基層建黨的做法已經失敗，中央指示先在省一級建立黨的委員會。1970年12月，毛澤東的故鄉湖南省第一個建立了中共省級委員會，一個叫華國鋒的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到1971年8月中旬，全國2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全部建立了黨的委員會，解放軍在其中占有明顯重要的地位。29個省委第一書記中，有22個由解放軍將領擔任；各省級黨委中62％的干部是軍人。[[30]](#_30_Can_Jian_Duo_Mu_Si___Zhong_G)

根據“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的報道，在黨的重建過程中，清除了大批老干部，同時接納了大批具有破壞性的“造反派”分子。1968年5月發動了繼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場運動重點雖是清除極“左”派分子，但據說網撒得太寬，無辜干部也遭到打擊。[[31]](#_31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毛對運動的發展趨勢很不滿意。看來他本是希望對有經驗的干部進行再教育后恢復他們的名譽，重新起用，以此作為恢復秩序和凝聚力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更為迫切的問題是林彪和軍隊顯然沒有接受毛的指示：要他們幫助重建文職官員的黨，使黨恢復對軍隊和國家的控制。[[32]](#_32_Li_Pu__Bu_Li_Qi_Hai_Mu___Lin)早在最后幾個省委組成之前，形勢已經十分明朗，解放軍要像控制省革命委員會那樣控制省委。而且，林彪也表明他要控制省和中央的政權機構。

#### 重建國家結構

1970年3月8日，毛提出了他的重建國家結構的意見。他提議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和通過新憲法，新憲法規定不再設國家主席。第二天，政治局同意了毛的意見，并在3月16日確定了有關四屆人大會議和修改憲法的幾項原則，送交毛審閱，得到了他的贊同。3月17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充實業已同意的事項。但不久林彪親自參與了有關設置國家主席問題的爭論。4月11日，他提出了一個書面建議，并請毛擔任國家主席，否則“就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狀態”。[[33]](#_33_Wang_Nian_Yi____Da_Dong_Luan)而在1959年，毛澤東就把此職交劉少奇擔任。毛澤東很快拒絕了林的建議，并在4月12日告訴政治局：“我不能再任此事，此議不妥。”在4月底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又引用公元3世紀三國時期的一個歷史故事進行類比，第三次明確表示他不會擔任國家主席，并且主張不再設置國家主席一職。

然而林彪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進行活動。他在政治局的兩個軍隊里的盟友——空軍司令吳法憲和海軍政委李作鵬——是憲法起草小組的成員，5月中旬，林讓他們在憲法修改草案里寫上國家主席一款。盡管7月中旬毛第四次表示反對，指出不可因人設事，林的夫人葉群在幕后仍不斷要林的支持者們提出設國家主席。葉抱怨地對吳法憲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擺？表明如果毛繼續拒絕擔任此職的話，林彪對國家主席一職有興趣。

為什么毛在黨章里正式確定的接班人會在這個問題上對抗他呢？為什么林要求得到國家主席這樣一個沒有實權的禮儀性職位呢？須知當國家主席的威信并不比他在黨內的地位高到哪里。菲利普·布里奇海姆認為，新憲法將使林彪在政府中的位置低于周恩來，周是總理，而他只是副總理、國防部長。而且，這暗示毛正在仔細考慮確立林、周聯合領導來接他的班，這使林彪很沮喪。[[34]](#_34_Bu_Li_Qi_Hai_Mu___Lin_Biao_D)我們也可以認為，毛曾經擔任過國家主席，給這個職位抹上了一層光輝，從而使它成為比總理更高的職位，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的經歷也已經表明，它意味著能在國際舞臺上頻頻曝光，并保證有很大的知名度。

不管怎么說，幾乎可以肯定，林彪在這件事中的行為，關鍵是反映了一種深深的不安全感。他的性格和疾病所造成的相對孤獨，又可能加劇了這種不安全感。[[35]](#_35_Can_Yue_Zhang_Yun_Sheng___Ma)早在1966年他就已經作為毛的主要伙伴出現，但他仍然要求得到從來沒有給予劉少奇的保證，在黨章里確定他為接班人。現在他又希望當上國家主席，尋取進一步的保障。撇開個人心態不說，這種不安全感可能部分地源于一種擔心，即他的權力上升的方式是不合法的，而且他同輩的領導人中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對此憤憤不平。如果他對毛的支持充滿信心，這也倒無關緊要。但毛曾向他建議，既然他（林）也老了，他也應該有一個接班人了，張春橋將是一個很好的候選人。對此他實在感到不安。[[36]](#_36___Da_Dong_Luan_De_Nian_Dai)林彪覆滅以后流傳出來的文件表明，他似乎已經把毛看成一個隨時準備在他最親近的伙伴背后捅上一刀的人：

今天他用甜言蜜語誘惑你，明天就會捏造罪名置你于死地。……回顧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你是否明白）那些他最初支持的人，誰最后沒有被他宣判政治死刑？……他以前的秘書，不是自殺就是被捕。他的少數幾個親密戰友或可以信賴的助手，也都已經被他送進監獄。[[37]](#_37_Gao_Ying_Mao____Lin_Biao_Shi)

那么，為什么林彪膽敢公然反抗毛呢？可能他認為主席會寬恕；可能他想利用這個問題試探一下毛對他的態度；也可能因為那些聚攏在他周圍的軍隊里的伙伴，使他感到自己現在已強大到足以迫使毛讓步；畢竟，由于紅衛兵的得勢，毛曾經依靠人民解放軍，但后來將軍們對局勢的憂慮，又促使毛對他們進行了壓制。難道將軍們在政治局里的支配地位，不能用來促進國防部長的利益嗎？

進一步說，在林彪追求國家主席一職的過程中，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盟友陳伯達——毛長期的意識形態顧問和一段時期的政治秘書。[[38]](#_38_You_Guan_Mao_Ze_Dong_You_En)陳從1966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起，就主持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這證明了他和主席的親密關系。不久他就擢升到中央領導層的第四位，緊靠毛、林和周恩來之后，從九大上攝制的照片證實了這種地位。然而一年以后，在多年忠誠地為毛服務之后，陳卻選擇支持林彪，置毛反復講的觀點于不顧。

一種解釋是，1969年下半年解散中央“文革”小組，剝奪了陳在九大后的群星中的明星地位，他可能已經感覺到反對極“左”派的運動對自己構成了威脅。[[39]](#_39_Bu_Li_Qi_Hai_Mu___Lin_Biao_D)同樣，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結成的支持毛的同盟，由于1966—1969年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影響，已經瓦解了。這可能使陳伯達感到孤立。上海“左”派張春橋、姚文元，通過江青（毛的夫人）這條線同毛聯系；確實，年輕的姚似乎已經取代陳伯達，成為毛寵愛的文件起草人。而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張、姚，甚至江青都曾是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的下屬。在籌備九大時，陳最初被選為林彪的政治報告的主要起草人，張和姚做他的助手；但當陳不能及時完成一個令人滿意的草案時，張和姚取代了他的工作，康生負責監督。康長期以來一直是毛在內部安全領域的助手，與江青是同鄉，并有密切聯系，陳伯達似乎已對康的這種聯系懷有妒忌心。[[40]](#_40_Can_Jian_Zhong_Kan___Kang_Sh)

另一方面，林彪以解放軍為基礎，鞏固了他的地位，似乎不再需要“左”派的支持了。確實，林彪和他的追隨者，同江青和她的追隨者逐漸分化為兩個互相對立的集團；雖然林可能對他的位置是否安全可靠長期以來一直抱有擔憂，但他似乎絕對相信短期內可以支配江的集團。可能陳伯達遠瞻未來，認為他最好的前途，是像他過去為毛服務那樣為林彪服務，[[41]](#_41_1980__1981Nian_Dong_Tian_She)當然，這個決定對陳個人的生涯是災難性的。

有關設置國家主席問題的斗爭，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達到高潮。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會議在避暑勝地廬山召開。毛又一次卷入一場與一位國防部長的斗爭，雖然這次他對自己的力量無絕對把握，也不能肯定這位部長是否敢于在這個階段冒直接對抗的風險。

會議開幕前夕，即8月22日，由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開會討論了全會的主要議題。毛著重強調了加強團結、避免宗派活動的必要性，這是他每次剪除反對派之前的習慣性動作。[[42]](#_42_Can_Jian_Mao_1959Nian_Zai_Lu)但林彪和陳伯達再次提出保留國家主席職位，要求毛擔任這一職務。毛又一次拒絕了這個建議，并一針見血地說誰想當國家主席誰就去當。[[43]](#_43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第二天，全會正式召開。周恩來宣布了全會的議程：討論修改憲法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戰備問題。沒料到，在沒有事先向毛打招呼的情況下，[[44]](#_44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n)林彪（在開幕式上——譯者）突然插入長篇講話，強調在新憲法中把毛的偉大領袖、國家主席、最高統帥的地位，以及毛澤東思想在國家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指導地位，用法律形式鞏固下來非常重要。他暗含著威脅：反對設置國家主席，就是反對毛主席。[[45]](#_45_Tong_Shang_Shu__Di_614Ye)

像過去一樣，林彪強調毛的卓越天才和偉大作用，以表明他的忠心，從而實現他自己的目的。甚至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似乎就對這種策略有所警覺，并且為此感到不舒服。[[46]](#_46_Can_Jian_1966Nian_7Yue_8Ri_M)但255位中央委員中的大多數人并不了解實情，他們以為林彪是代表中央領導在會議開幕時為會議所作的基調演說。因此他們幾乎不可能表示反對。林彪夫人葉群，則要求林彪在解放軍里的盟友吳法憲、李作鵬以及后勤部長邱會作，發言支持林彪的講話，并在他們軍種、部門的中央委員中進行游說，以取得足夠的優勢。林彪在解放軍的另一位支持者——總參謀長黃永勝，在北京接到電話，被告知了林的策略和措施。[[47]](#_47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在23日晚政治局舉行的討論經濟計劃的會議上，吳法憲提出修改第二天的日程安排，以便大會能夠聽到林彪講話的錄音，并對它進行討論。那天晚上，沒有經過正式同意，陳伯達就忙著起草新憲法中的國家主席一款，收集論天才的語錄。[[48]](#_48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_L)

毛是否參加了8月23日晚的政治局會議，尚不清楚。很可能沒有參加。也不清楚吳法憲的建議是否被采納，第二天上午，全會聽林彪講話的錄音。但8月24日下午，在就其行動計劃進行密商后，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分別在華北組、中南組、西南組和西北組的會議上發表講話贊同林彪的方針。他們向會議散發恩格斯、列寧和毛有關論天才的語錄，以支持林的觀點。陳伯達在華北組會議上說，誰要是反對毛擔任國家主席，誰就是反對毛澤東同志是天才的說法。他們在分組會議上的講話被印成簡報，四處分發。分組會議上沒有人提議林彪為國家主席。[[49]](#_49_Hu_Hua_Zhu_Bian____Zhong_Guo)

后來據說毛深諳林彪的目的是讓中央同意在新憲法中保留國家主席，如果毛堅持拒絕擔任這一職務，就由他自己擔任。[[50]](#_50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真是這樣的話，全會開幕前毛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可能是故意告訴林彪，他只不過是自己不想擔任這一職務，并非真的反對設置這個職位。這樣，林彪和他的支持者們將從中得到鼓勵，從而刺激他們提出設置國家主席的建議。而這就會為他們準備足夠的絞索。

林彪的支持者們在分組會議上的講話很快由江青和張春橋報告給了毛，他十分重視并在8月25日迅速采取了行動。后來毛澤東說，他的夫人江青在這次反對林彪的斗爭中立了大功。隨著紅衛兵上山下鄉和內亂得到控制，除了上海之外，江和張的政治基礎被瓦解了，因此他們可能再也不愿意看到林彪已經令人生畏的權力、地位進一步膨脹。確實，處于現在的形勢下，他們要繼承毛的政治遺產，只有摧毀林彪的地位。早在分組會議上，張春橋已經同吳法憲就林彪的綱領發生了沖突。[[51]](#_51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毛肯定已經意識到，林的支持者們行動如此迅速，如果他再不表明自己的態度，全會就可能在被瞞騙的情況下支持設置國家主席的建議。甚至張春橋的緊密追隨者，他在上海的副手王洪文，也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在上海的核心小組會議上，熱烈地，或說是天真地頌揚林彪的基調講話，還準備在華東組的會議上重申自己的觀點。[[52]](#_52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n)因此，8月25日毛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這是一次擴大會議，可能是為了讓江青、張春橋等毛的支持者與會。會議決定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收回登載陳伯達令人生氣的講話的華北組簡報，責令陳伯達檢討。[[53]](#_53__Jie_Fang_Jun_Zheng_Zhi_Xue)

8月31日，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為反擊定了調子。在這個文件中，他揭露自己以前的意識形態顧問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譴責他謠言惑眾，詭辯生非。毛的這篇文章，為在分組會議上批判陳伯達、吳法憲和林的其他支持者們提供了彈藥。[[54]](#_54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但只有陳伯達被罷了官，這可能是因為可以放心地譴責他為林彪理論觀點的代言人。可能更重要的是，陳伯達下臺，不會像解除林彪的一個軍事盟友的職務那樣，對林彪構成直接的威脅。毛了解林彪的實力，而且如同他后來承認的，他也沒有做好與林彪對抗的準備。他私下對林彪說，他的副手應該受到保護，但隨后又把這番話告訴了其他領導人。[[55]](#_55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n)

即使這樣，林彪已經獲得了確切的信息。在短短的兩天半時間里，[[56]](#_56_Ji_Cong_8Yue_23Ri_Dao_8Yue_2)林彪爭奪國家主席一職的努力就宣告失敗，這令人生畏地表明了毛控制黨的精英人物的力量。因此，在9月6日全會結束后離開廬山之前，林彪總結了教訓后對吳法憲說：“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57]](#_57_Can_Jian_Hu_Hua___Zhong_Guo)

#### 外交政策上的分歧

在黨的建設和重建國家結構兩方面的爭端基本上是權力斗爭。在毛和林之間似乎還有過一場政策爭論，雖然中國的有關材料對它甚少關注：中國對美國開放問題。既然本書其他部分已經討論這個問題，[[58]](#_58_Can_Jian_Ben_Shu_Di_5Zhang)這里僅僅大概描述一下。

導致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華的中美關系的驚人轉折，其根源已經人人皆知。1969年3月，中蘇在烏蘇里江的珍寶島發生了一次武裝沖突，兩國關系急劇惡化。這明顯地引起了北京的關注：莫斯科是否正在將迄今為止的一系列小的對抗逐步升級。隨后在中國西北邊境地區發生了一系列摩擦，尤其是8月在新疆發生了一次嚴重的摩擦，謠言開始從東歐方面流傳出來：蘇聯人已通知他們的盟友，它準備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打擊”。

9月11日柯西金總理和周恩來總理在北京機場的短暫會晤，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緊張局勢，但很明顯中國人仍然把危險看得十分嚴重。烏蘇里江摩擦發生的當天下午，北京的報紙就把它與1968年夏天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進行類比，蘇聯人用勃列日涅夫主義為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進行辯護，該主義主張蘇聯可以推翻任何一個它不同意的共產黨政府。中國領導人面臨著在新的環境里如何實現國家安全的問題。

有人認為，珍寶島沖突是由中國人的一場伏擊戰挑起的。林彪的意圖是：在邊境上點把火，促使參加中共九大的代表們認識到英雄的人民解放軍的重要性，證明它現在在黨內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59]](#_59_Yi_Wei_Can_Jia_Zhen_Bao_Dao)不管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毛和周恩來從邊境沖突中所汲取的教訓正好相反：蘇聯在邊境問題上將采取更加強硬的路線，[[60]](#_60_Li_Jian_Nei_Wei_Er__Ma_Ke_Si)而從邊境沖突的情況看，如果蘇聯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人民解放軍將難以有效地保衛祖國。因此北京接受了尼克松政府的主動表示。對華盛頓開放，使蘇聯不能無所顧忌地侵略中國，因而可以減少蘇聯侵略的危險性。實際上，甚至在中美建立聯系以前，尼克松就已經表明，莫斯科不能設想美國會在蘇聯侵略面前保持善意的中立。[[61]](#_61_Heng_Li__Ji_Xin_Ge____Bai_Go)最初，中蘇關系破裂的很重要原因，來自中國人對蘇美緩和的不滿；蘇聯人和美國人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以后，中國人開始譴責蘇聯共產黨領導層的修正主義；發動“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防止在中國出現類似的修正主義。所以毫不奇怪，中美關系的突破是需要費番口舌向中國人作出解釋的，[[62]](#_62_Li_Jian_Zai_Kun_Ming_Jun_Qu)因為中國人受到的宣傳教育是以意識形態的原則為重，而不以現實政治為然。

中美關系改善在林彪看來像蘇德條約在亞洲的翻版，他對此十分厭惡。他可能認為，如果中國確實不能單獨頂住兩個超級大國的同時進攻，那么與修正主義的蘇聯達成妥協，不是比與帝國主義的美國達成妥協要好？林彪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從來沒有得到充分的闡述。他后來被斥責為“孤立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63]](#_63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_D)反對與美國或蘇聯建立任何聯系，[[64]](#_64_Can_Jian_Ben_Shu_Di_San_Zhan)認為中國有足夠的實力保護它自己。毛告訴尼克松和其他外國客人，林彪反對與美國建立聯系。[[65]](#_65_Ji_Xin_Ge____Bai_Gong_Sui_Yu)

如果毛的話真實可信，那么很容易理解他的動機。在中國被孤立、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的權力就會大大膨脹。當國家處于危險狀態時，由一位偉大的革命元帥接毛的班，就無可爭議了。而和平與外交藝術（周恩來的所屬范疇）的地位就會下降。

對林彪不幸的是，毛感到必須用外交手段爭取時間。10月7日，新華社發表消息，中蘇邊界談判即將舉行。然而，毛仍然對蘇聯人存有戒心，10月中旬政治局決定立即警惕起來。1969年10月17日，顯然是根據毛對國際形勢的冷靜分析，林彪發布“一號通令”，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城市開始疏散。

林彪當時在蘇州休養，住在蔣介石夫人以前的別墅里。根據曾把林的命令給在北京的總參謀長黃永勝的林彪秘書的回憶，國防部長所關注的是，因為蘇聯談判代表團的到來，中國放松警惕，蘇聯人可能正在準備一場突然襲擊。在黃永勝收到命令前兩個小時，毛看來也收到了等待批閱的這份“一號通令”，他顯然沒有撤銷這個命令。后來林的命令遭到譴責，可能至少部分是因為蘇聯人、美國人以及臺灣當局迅速作出反應，引起了中國領導層的擔憂；這個明顯的備戰措施，可能被蘇聯人用作在邊境采取進一步軍事行動的借口。在林失寵以后，毛能夠就他自己引起的這個行動責怪林彪。[[66]](#_66_Zhang_Yun_Sheng____Mao_Jia_W)

邊界談判于10月20日如期開始。同時，中美雙方開始接觸，在20年的敵對和猜疑之后，雙方都謹慎地進行探索，亨利·基辛格后來稱這段時期的接觸為“復雜的小步舞曲”。[[67]](#_67_Ji_Xin_Ge____Bai_Gong_Sui_Yu)到1969年底，美國人明白，他們發出的信號、信件和暗示產生了效果。1970年，在林彪謀取國家主席的同時，中美聯系升級，到1971年4月21日當周恩來邀請基辛格訪問北京時，[[68]](#_68_Tong_Shang_Shu__Di_193__684)林彪和平奪權的道路已經走到盡頭，他被推上了一條更危險的道路。

#### “拋石頭，摻沙子，挖墻腳”

幾乎可以肯定，林彪決定武力奪權是由他在廬山會議上的政治失敗激起的，但促使他那時將計劃付諸實施的原因可能是廬山會議后毛發起的針對他的同黨的毫不寬恕的運動。1970—1971年之交的秋天和冬天，林彪肯定已經明白，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動，他就完了。毛的行動看起來像是挑釁性的，似乎他希望迫使林彪采取魯莽的行動。如果他采取這樣的行動，那就會自取滅亡。

全會以后批判陳伯達的運動采取以下幾種形式：首先，陳伯達自我檢討，并且批判了陳伯達反黨、假馬克思主義者的實質，1970年 11月至1971年4月逐漸展開。同時，號召高級干部學習馬列主義，向他們推薦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六部著作和毛的五篇文章，要求他們通過學習，提高識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能力。事實上，毛是在打擊林彪，因為，林彪過去不主張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把學習毛澤東思想也簡化為背誦語錄。葉劍英在福建、廣東和廣西調查了陳伯達的材料，以確定他的罪行。陳的罪行為發動一場整風運動提供了借口，而這場整風明顯是用來削弱干部對林的忠誠的。[[69]](#_69_Zhong_Gong_Zhong_Yang_Di_Yi)

毛后來形容他對付林彪及其追隨者的策略為“拋石頭，摻沙子，挖墻腳”。[[70]](#_70__Pao_Shi_Tou__Shan_Sha_Zi__W)“拋石頭”指鏟除林彪的同盟。在廬山，周恩來私下告訴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他們應該向中央作檢討。全會結束那天，在廬山腳下的九江機場，林彪與他們三人及黃永勝合影留念，與他們及葉群商議對策，擬定了穩住吳法憲，保住林彪和黃永勝，為了應付周恩來的命令，做一些表面的自我批評的策略。[[71]](#_71_Gao_Gao_He_Yan_Jia_Qi_____We)

但是當書面檢查于下個月放在毛的案頭時，他對批閱的每份檢查都寫下了不滿意的批語。1971年1月9日，軍委召開有143名軍官參加的會議，盡管毛一再嚴厲批評，林的同黨仍既不批判陳伯達，也不進行自我批評。毛對此極為不滿，命令將會議通過的有關文件作廢。最后，在4月29日召開的討論批陳整風運動進展情況的中央會議上，周恩來批評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和邱會作的宗派主義和在政治路線上的錯誤。[[72]](#_72_Hao_Meng_Bi_He_Duan_Hao_Ran)

“摻沙子”，指選派忠誠毛的人參加由林彪的人控制的機構。九大當選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和張才千將軍，于1971年4月7日被任命為軍委辦事組成員，以抵消黃永勝和吳法憲在軍委辦事組的權力。毛已經采取了其他組織措施，以保證對人事和宣傳的控制。1970年11月6日，成立了中央組織和宣傳組，直接對政治局負責，領導和監督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理論雜志《紅旗》、新華通訊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和其他一系列機構。該小組組長為康生，成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和李德生將軍。康生隨后因病退出，李德生于1971年1月擔任新成立的安徽省委的第一書記，毛的夫人和她的上海同僚留下負責，接管了曾經被陳伯達所把持的宣傳王國。[[73]](#_73___Zhong_Guo_Li_Shi_Shang_De)這樣，從紅衛兵運動結束以來，他們實現了對一個主要的國家權力領域的控制。[[74]](#_74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挖墻腳”，指改組北京軍區。在與他的國防部長緊張對抗不斷升級時，毛必須確保控制首都的部隊對他而不是對林彪的忠誠。1970年12月16日，他提議召開華北會議，討論華北局和華北軍區為什么允許陳伯達成為他們的太上皇。中央沒有授權于他。這種譴責也許有點道理——把書生氣十足的陳伯達描繪成林彪的代理人，比說他是某支部隊的幕后操縱者更容易些——但華北局和華北軍區聽從陳伯達的命令，可能僅僅反映了任何一位明智的黨的干部都會表現出的，對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常的尊重；很難想象會有人對陳伯達這樣的高官的身份提出疑問。然而這無關緊要，對毛來說，任何違反組織紀律的行為，都可能被他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1970年12月22日，華北會議宣布開始，周恩來主持了會議。會議表面上是要批判陳伯達及其在華北地區的追隨者，但實際上，在長達一個月的會議期間，改組了北京軍區的領導班子：撤換了林彪的追隨者，北京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委；38軍（它被認為忠于林彪）也被調出了北京地區。[[75]](#_75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 “571”：林彪的未遂政變

根據后來的證言，林彪于1971年2月攜夫人和兒子視察蘇州期間，授意制定政變計劃。政變計劃是以他兒子林立果為首、以空軍為基地的幾個較低級軍官具體負責制定。促使林彪這樣做的原因可能是毛在最近的軍委會議上譴責了林彪同黨的立場，以及北京軍區的改組。林彪將對此作何反應？他顯然認為以攻為守是唯一出路。

林彪奪權斗爭，除了不合時宜，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其如此脆弱的權力。盡管他身為國防部長，但他沒有依靠解放軍軍兵種領導人的政治局盟友。根據1980—1981年審判林彪那些幸存的支持者時出示的證據，不管他們在其他方面做了什么壞事，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都沒有參與謀殺毛的任何陰謀活動。[[76]](#_76_Can_Jian___Zhong_Guo_Li_Shi)

林立果在空軍的正式職務是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這是一個關鍵職位，所有文件都要經過這里——同時兼任作戰部副部長，他擔任這些職務，完全是由于林彪的影響。根據他的上司吳法憲在1980年審判中的證詞，從1970年7月6日起，“空軍的所有事情都向林立果報告，所有事情都得經他處理，聽他的命令”。[[77]](#_77_Tong_Shang_Shu__Di_93Ye)

林立果建立了他的陰謀小集團（參見表5），定名為“聯合艦隊”，該小組最初是吳法憲授權林立果成立的一個調研小組，絕大多數成員是人民解放軍空軍的軍官。林立果的“司令部”人員，除了他自己之外，全部來自控制華東的南京軍區。

表5 林彪集團：同黨和同謀者



a.在蒙古摔死。  
b.1980—1981年受到審判。  
c.“571”計劃失敗后自殺。

1971年2月，林立果帶著空軍政治部副主任于新野到杭州；而后又將另一位副主任周宇馳自北京召到上海，從3月20日至24日在上海與他們及空4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李偉信等召開秘密會議，根據他父親的命令，多次密謀。

從他們討論的情況看得出林氏家族對政治形勢的估計。他們認為出擊的時機幾乎成熟；在政局穩定的情況下拖延時間，會使文職領導人得以鞏固他們的地位；毛正采取利用一派打一派的習慣做法，逐步用張春橋來抵消國防部長的權力。[[78]](#_78_Gao_Ying_Mao____Lin_Biao_Shi)然而，即使在這個階段，權力“和平過渡”的可能性似乎仍未排除。另一種可能是被人搶班。令人驚訝的是，鑒于九屆二中全會及隨后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有些密謀者仍然認為在未來三年內搶班是不可能的。但林立果至少明白這種前途的危險性：“任何事情都難以預料。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說一句話，任何人都可能被趕下臺。”（實為“林彪隨時都可能被趕下臺”——譯者）于新野提出異議說，林彪是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林立果提醒他劉少奇也曾享受同樣的榮譽。[[79]](#_79_Tong_Shang_Shu__Di_92Ye)

林彪的第三種選擇是“提前”接班。他們考慮了兩套方案：搞掉林彪的競爭對手，主要是張春橋；搞掉毛澤東本人。密謀者們對后一套方案沒有感到什么不安，只是擔心如何向全國解釋，不產生消極影響。周宇馳建議，謀害毛澤東的罪名可嫁禍于他人，甚至嫁禍江青，但他補充道，從政治上考慮，林“將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最后議定：爭取和平（過渡）接班，作好武裝起義的一切準備。[[80]](#_80_Tong_Shang_Shu__Di_92__93Ye)

林立果決定將政變計劃定名為“571”，在漢語里“571”是“武裝起義”的諧音。毛的代號為“B—52”。在最初討論時，政變計劃僅僅是逮捕張春橋、姚文元，謀害毛的計劃似乎是那天晚上由周宇馳設計的，[[81]](#_81_Tong_Shang_Shu__Di_93__95Ye)可能是針對毛主席在南方的行動所作出的反應。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到南方許多省市作了一次短暫巡視，他主要訪問了武漢、長沙和南昌，接見了湖北、河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和福建各省黨、軍負責人，[[82]](#_82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和他們進行了談話，他把林彪的同黨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行為說成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因此，與同劉少奇、彭德懷、高崗和其他被打倒的領導人的斗爭具有同樣的性質。主席的任何其他行動，都沒有他的這些講話如此深思熟慮，使得林彪驚恐不安。

開始時，毛澤東并沒有直接點林彪的名，著重談了他的追隨者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表現，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是“突然襲擊和地下活動”。但當他談到“有人急于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于奪權”時，誰都能明白他實際上指的是誰。他最后提到林彪的名字時，更多的是悲哀而不是憤怒：“這次，要保住林副主席，不做個人結論，但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我們怎樣對待這些人呢？”[[83]](#_83_Gao_Ying_Mao____Lin_Biao_Shi)。

毛對他自己提出的問題的可能答案是什么，林彪一家是十分清楚的。同樣令人感興趣的是，主席在他的談話中，明顯表明了他進行這場針對他自己選定的接班人的斗爭的原因。一方面，他批評了地方黨委把他們的決定送交部隊黨委批準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修改了他以前提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加上了：“解放軍學全國人民”。[[84]](#_84_Tong_Shang_Shu__Di_64Ye)軍隊控制國家政權所構成的威脅，促使毛做出了以上選擇。

主席一定明白他的談話很快會傳到林彪那里，他也打算這樣做。事實上，他的談話于9月6日被報告給海軍政委李作鵬，李又分別告訴了總參謀長黃永勝、后勤部長邱會作。黃永勝立即用保密電話通知了葉群，她當時正與林彪、林立果在北戴河度假。兩天后，林彪簽發了他的武裝政變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同日，林立果飛回北京，為暗殺毛澤東進行最后安排。[[85]](#_85___Zhong_Guo_Li_Shi_Shang_De)

從9月8日到11日，林立果和他的“聯合艦隊”討論了在毛專列北上回京途中暗殺毛的一系列辦法：一是用火焰噴射器、四○火箭筒打B—52的火車；二是用100毫米口徑的改裝高射炮，平射火車；三是炸毀火車必經的橋梁；四是從空中轟炸火車；或者，用手槍面對面殺害毛澤東，這樣雖然缺少戲劇性效果，卻可能更可靠。[[86]](#_86___Zhong_Guo_Li_Shi_Shang_De)

實踐證明，所有這些計劃都是無效的，當林彪的同伙正在估摸毛的行動時，8月底主席在南昌聽到風聲，林彪可能正在籌劃什么陰謀。[[87]](#_87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因此，在返回北京途中，毛采取突然啟程、縮短停站時間等策略，出人意料地迅速離開上海，于9月11日開始返回北京，在陰謀者沒有準備好以前，專列通過了他可能遭攔截的各個地段。[[88]](#_88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n)9月12日下午，列車停在北京附近的豐臺車站，毛借停車機會把在京的軍政高級官員找來，在車上開了兩個小時的會議。晚上毛乘坐的列車駛進北京站[[89]](#_89_Hu_Hua____Zhong_Guo_She_Hui)。沒有說明毛澤東改變行程是否因為得到了有關陰謀活動的情報，細節就更無從知曉。也許是長期游擊戰爭中養成的求生本能，促使他這樣做的。不管他南巡的動機如何，這一行動促發了中國人現在所稱的“九·一三”事件。

#### “九·一三”事件

當林立果獲悉毛逃脫暗殺的消息時，他立即決定加速實施林彪和葉群此前設想的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其實，就在林立果主持籌劃暗殺計劃的同時，林彪、葉群便在著手準備南逃了。他們決定9月13日早晨8時離開北戴河，南逃廣州，與林彪的高級軍事盟友——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以及林立果的密謀助手在那里會合。在北京安排妥當后，林立果乘坐一架英國制造的三叉戟飛機飛往北戴河的機場所在地山海關。當時中國只有很少幾架三叉戟，為了讓他的父母順利出逃，[[90]](#_90_Gao_Gao_He_Yan_Jia_Qi_____We)他通過在空軍系統的支持者，秘密搞到了這架飛機。要不是她姐姐林立衡的干預，他可能已經成功了。

很多人都知道，林立衡昵稱豆豆，林彪很喜歡吃豆子，因而給女兒起了這個小名。豆豆與林彪關系很要好，與她母親葉群卻搞得很僵。葉群對她很粗暴，她和弟弟也不喊她媽媽，卻都叫葉群“葉主任”。[[91]](#_91__Sheng_Huo_Zai_Li_Shi_Yin_Yi)在被弄得發狂的情況下，豆豆開始懷疑葉群是不是她的親生母親，以至于不得不把當年在延安為她接生的大夫找來，證明葉群確是她的生母。[[92]](#_92__Sheng_Huo_Zai_Li_Shi_Yin_Yi)有一次，豆豆想自殺，葉主任聽到消息后說：“讓她去死”；沒有人把此事告訴林彪。[[93]](#_93___Hua_Qiao_Ri_Bao____1988Nia)

9月6日，借口她的父親生病，豆豆的弟弟把她從北京接到北戴河。她到達后，林立果向她通報了毛南巡的情況，告訴她這意味著林彪已無退路，并披露了他們設想的三種方案：謀害毛；在廣州另立中央；逃往蘇聯。豆豆與弟弟爭論了兩天，拒絕了所有上述三個方案，建議林彪像中國老帥朱德一樣，從眾人注目的政治中心位置退下來。[[94]](#_94_Tong_Shang)

根據豆豆的描述，她考慮的只是父親的安全。她布置服務人員偷聽林彪、葉群和林立果的談話，以了解他們想干什么；9月8日，她弟弟去北京后，她把情況報告了8341部隊。8341部隊是中央警衛團的番號，該部隊的一個分隊布置在她父母的住處附近，用以在任何情況下確保林彪的安全。[[95]](#_95___Hua_Qiao_Ri_Bao____1988Nia)盡管豆豆焦慮不安，渾身顫抖，但當時沒有人膽敢干預，尤其是葉群事先不斷散布豆豆因為談戀愛精神不正常等流言飛語；確實，她很快就要正式訂婚了。[[96]](#_96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n)

9月12日下午，在林立果從北京返回以前，林豆豆的訂婚儀式已經開始。到來后，他告訴姐姐他是專程趕來參加訂婚儀式的，但他隨即匆匆離去，與他的父母進行密商。他的舉動引起了她的懷疑。大約在晚上10時20分，豆豆親自向8341部隊副團長（原文為“團長”——譯者）匯報了情況，這次，這位首長立即報告了北京。[[97]](#_97_Gao_Gao_He_Yan_Jia_Qi_____We)

當周恩來在晚上10時30分接到報告時，他正在人民大會堂主持討論將在四屆人大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他立即打電話向吳法憲和李作鵬查詢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飛機在山海關機場。

與此同時，葉群在電話上與邱會作夫人閑談了一個小時，葉接到林立果系統的人報告說周恩來正查詢三叉戟飛機下落后，頓時警覺。晚11時30分，她打電話給總理，告訴他林彪一家想離開北戴河，去一個溫泉療養地。她想以此消除懷疑。當總理問她是空中動還是地上動時，她答道是空中動，但尚沒有安排飛機。周告誡她，最近天氣不好，他將與吳法憲討論林的飛行建議。[[98]](#_98_Yu_Nan___Zhou_Zong_Li_Chu_Zh)

葉群剛放下話筒，周立即又打電話給吳法憲和管山海關海軍航空兵基地的海軍負責人李作鵬，命令停在山海關機場的三叉戟飛機不要動，要動的話，必須有周、黃永勝、李作鵬和吳法憲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在北戴河，葉群在與周恩來通話后，立即采取行動。她與林立果一起，喊醒吃了安眠藥睡下的林彪，告訴他有人要來逮捕他。他們焚燒了文件，然后鉆進汽車，駛往機場。8341部隊警衛人員過于膽小，沒敢攔住他們。對叛逃者幸運的是，李作鵬篡改了周恩來的指示，告訴山海關基地，只要周、黃、李、吳四位首長有一個同意，三叉戟飛機就可起飛，而李自己批準起飛。夜里12時32分，林彪攜帶他的夫人和兒子起飛了。[[99]](#_99___Hua_Qiao_Ri_Bao____1988Nia)

大約午夜時分，周恩來得到報告，林彪夫婦已離開住所。聽到這個消息后，周立即命令吳法憲：關閉全國機場，所有飛機停飛，并派一位助手去吳的司令部監視吳法憲。[[100]](#_100___Dang_Shi_Yan_Jiu_____1981)隨后，周驅車前往中南海毛的住處，向他簡要匯報了情況。當雷達顯示林彪的飛機即將越過國境線進入蒙古時，吳法憲打電話請示是否打下飛機，周請示毛，據說毛意味深長地回答：“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沒法子的事，要他們去吧！”[[101]](#_101_Can_Jian_Hao_Meng_Bi_He_Dua)由于不了解林彪活動的詳細情況，為了毛的安全，周立即安排毛離開住處，轉移到人民大會堂。

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毛才命令周恩來召集在京的高級官員，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這最清楚地顯示了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方法。會議在凌晨3時舉行，但毛沒有出席，是出于安全考慮，還是由于他自己選定的接班人的背叛而感到尷尬，不得而知。周恩來向與會者通報了毛昨天下午返回首都以及林彪出逃的有關情況，告誡他們要對發生任何事情做好準備。[[102]](#_102___Dang_Shi_Yan_Jiu____1981N)直到9月14日下午，周才從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獲悉，林彪的三叉戟飛機于9月13日凌晨約2時30分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機上的8男1女全部摔死。[[103]](#_103_Tong_Shang)

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對“九·一三”事件的有關描述提出疑問，集中討論了以下問題：為什么林彪夫婦不按事先安排的那樣往南飛呢？該文認為，林彪一家并沒有立即放棄原先設想的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畢竟，他們只要飛8個小時，就可以實現該計劃。文章指出，這架三叉戟飛機在空中飛了近兩個小時，而這樣一架飛機從山海關飛到溫都爾汗要不了一個小時，因此，三叉戟飛機實際上首先往南飛了約10分鐘時間，然后掉頭返回山海關，但發現山海關機場已遵照周恩來指示關閉。為什么林彪一伙放棄南逃計劃不得而知，但該文暗示，是周恩來不讓林彪著陸，以迫使他飛往蘇聯，這樣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成為國家的叛徒。[[104]](#_104_Can_Jian___Hua_Qiao_Ri_Bao)不管真實情況如何，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毛的權力及其人身安全最危險的威脅解除了，波拿巴主義的幽靈從此驅除了。

#### 林彪覆滅的影響

林彪之死，使毛和周得以順利清洗他在政治局中的軍隊里的盟友。9月24日上午，周恩來召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以及解放軍總后勤部部長邱會作到人民大會堂，宣布解除他們的職務，要他們進行徹底的自我檢查，四人離開時都已被捕，并將最終接受審判。林立果聯合艦隊的幸存者也得到清除。

雖然人民解放軍失去了它在文職官員領導班子中最強有力的人物，它的崇高形象也受到損害，但這遠非人民解放軍在文官政府中結構性支配地位的終結，軍隊在黨政部門中的重要作用仍然在運行。十大元帥之一、周恩來長期的盟友葉劍英，主持改組后的中央軍委，負責調查林彪在各大軍事單位的活動，[[105]](#_105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政治作用。他對毛和周的忠誠是可靠的，但他畢竟是軍隊的代表。[[106]](#_106_Zai_Mao_Ze_Dong_1971Nian_Xi)汪東興是8341部隊的負責人，對主席更加忠心耿耿。他主要是一位國家安全官員，而不是軍隊的一名軍官，[[107]](#_107___Zhong_Guo_Ren_Min_Jie_Fan)但他的確不是文職干部。與林彪相比，在毛還政于民、重建文官政府的不斷努力過程中，將忠誠地支持毛。

軍隊干部在省級地方政府中的權力繼續得到維持，這可由政治局內的三位將軍仍然繼續擔任省級最高領導職務這一點反映出來：許世友，江蘇省革委會主任，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遼寧省革委會主任，沈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安徽省革委會主任，安徽省軍區司令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都站在毛的右邊。

比較難估量的是林彪覆滅對毛澤東所造成的影響。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時候，當毛積聚了足夠的力量，從而獲得了更換一位領導人所需要的廣泛支持時，劉少奇被搞掉了。甚至劉少奇原來的秘書鄧力群后來也承認，1966年時，他也感到毛的接班人應是一位既能處理黨務又能處理軍隊事務的人，這樣一種看法可能是對的；而且他證實這是當時黨內一種普遍看法。[[108]](#_108_Can_Jian_Deng_Li_Qun___Xue)林彪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英雄，無疑也是毛長期以來的信徒。主席認為林彪是比劉少奇更合適的接班人這樣一種估價，可能招致劉少奇在黨內的追隨者的反感，但卻可能在政界的更大范圍內，為人毫不置疑地接受。

但實踐證明，這位“最好的學生”不僅不合格，而且，如同周恩來要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所披露的那樣，甚至陰謀暗殺毛主席本人。[[109]](#_109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毛怎能在這樣長的時間里一直沒有識破他呢？他于1966年寫給江青的、表達對林彪的行為的憂慮的信件，很快在黨內公布，[[110]](#_110_Hao_Meng_Bi_He_Duan_Hao_Ran)但這并沒有為毛挑選這個危險的人物作為正式指定的接班人的失誤提供辯解，而是使得這種失誤更加突出了。難道主席不能在那些數十年來一直在自己身邊的人中，辨別出叛徒和假馬克思主義者嗎？

可能同樣具有破壞力的是，林彪的覆滅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充滿著類似傳統中國宮廷政治里的背叛和陰謀，充滿大量明顯類似皇后和太監、官員和將軍的傳統禮節。難道“文化大革命”要實現的純潔政治就是這個樣子？“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騷亂和清洗，可能使毛絕大多數最親近的同事的幻想破滅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林彪的覆滅，使這種幻滅感在更大的范圍內擴散。[[111]](#_111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在毛澤東逝世后，他的接班人撥亂反正時，這將是政治冷漠的一個根源。

## “四人幫”的興衰

#### 接班人問題

這時，毛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重建高級領導層，特別是選擇一個可靠的接班人。他曾經希望建立一套培養和選拔接班人的程序，以避免其他極權主義國家所經歷的在接班人問題上的斗爭，就像蘇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那樣。但他的幾次努力都失敗了。50年代，他設計了“二線”機制，使他的同僚有機會在一線鍛煉、曝光，而他自己在二線進行控制。劉少奇代替毛擔任國家主席，就是這種努力的一個部分，但是它在劉少奇逝世之前就不存在了；同樣地，“最好的學生”模式也在林彪墜死之前失敗了。[[112]](#_112_Guan_Yu_Mao_Ze_Dong_He_Deng)主席將如何解決“毛之后，誰接班”的問題呢？更關鍵的是，他將如何解決“毛之后，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呢？

林彪覆滅以后，三種勢力開始在政治局里崛起：激進派，“文革”中的幸存者，“文革”的受益者。激進派是原來圍繞在毛澤東身邊的極“左”派的余黨，就是他們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利益迅速分化，構成了矛盾，但在重要問題上他們仍然保持一致。隨著林彪及其集團的瓦解，以前的聯盟只剩下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謝富治。謝富治原來不屬于集團核心人物，但由于他擔任公安部長，處于十分有利的地位，當“文化大革命”蓬勃發展時他對核心集團就十分有用了。康生，由于他日益惡化的健康狀況，似乎越來越扮演一個名義上的角色；謝富治死于1972年。這樣，就剩下了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

幸存者指那些高級官員，盡管肯定他們都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但他們都一直與毛澤東進行合作：總理周恩來、副總理李先念，代理國家主席董必武以及朱德、劉伯承和葉劍英三位老帥。所有這些人中，只有周、李和葉在政治上發揮積極的作用，其他三位之所以留在政治局，是因為他們幾乎在任何情況下對毛都是忠誠可靠的；確實，劉伯承雖然智力超群，但眼睛失明，沒有政治活動能力，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員”主要是對革命元勛的優遇。

林彪事件以后，毛似乎感到有必要加強同這些幸存者的關系，因此同意為一批高級官員平反昭雪，恢復名譽，重新安排工作。這些官員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曾對此提出過尖銳批評，即所謂“二月逆流”，并因此被打倒，現在把打倒他們的罪責全部推給了林彪。當其中一位元帥、前外交部長陳毅于1972年1月逝世時，毛出人意外地參加了他的追悼會，并高度評價了這位老師。[[113]](#_113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一件將對中國歷史具有深遠意義的事是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前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平反昭雪。1969年10月，根據林彪的疏散命令，鄧和他的一部分家眷從北京轉移到江西省，在一個縣的拖拉機廠擔任鉗工，每天工作半天。當林彪覆滅的消息傳來時，他在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兩次給毛寫信，請求允許他為黨和國家再做些工作。在收到第二封信后，毛對鄧小平的革命功績作了贊許的批語，同意他返京工作，1973年3月，有關他返京的手續辦完，鄧小平返回北京。[[114]](#_114_Can_Jian_Gao_Gao___Yan_Jia)至于鄧小平第二次崛起的原因及其后果，本章后面將要探討。

第三種勢力是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由于他們的上司遭到清洗，同時也由于他們控制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復雜政局的能力，他們在中國政壇上逐漸上升。林彪覆滅后立即涌現出來的這些官員主要是軍人：許世友、陳錫聯、李德生和汪東興；但其中也包括一位文職官員紀登奎，他參與了對林彪余黨的清洗，逐漸提高了自己的地位。[[115]](#_115_You_Guan_Ji_Zai_Qing_Xi_Lin)

毛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在這三組人中，顯然沒有一位合適的能夠捍衛“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接班人。無疑，周恩來是毛屬下最高級的官員，如果主席認為他是自己合適的接班人，他早就可以這樣做了，而且能得到廣泛贊同。但是，毛不準備把他的極“左”綱領委托給任何一位幸存者。而且，不能想象周會比毛長壽。1972年5月，在例行體檢中，發現他患有癌癥，是早期。[[116]](#_116_You_Guan_Zai_5Yue_Fa_Xian_A)

原中央“文革”小組的余黨，顯然是毛尋找一位可靠接班人的地方。但主席一定早已意識到，人民解放軍不可能接受一位江青、張春橋那樣的，曾經煽起暴力沖突和流血，挑起動亂的人，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中，也沒有誰具有崇高的威望，從而獲得廣泛的支持和主席的認可。

在這種困難情況下，毛采取了非常措施。他把一位基層激進派成員像坐直升機似的，迅速提拔到最高領導層。王洪文，在林彪覆滅時年僅36歲，原是上海一家工廠的保衛干部，在上海“一月風暴”期間支持張春橋、姚文元，因而迅速崛起，到1971年他已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左”派大本營上海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上海警備區政委。[[117]](#_117_You_Guan_Wang_Hong_Wen_De_S)1972年秋天，王洪文被調到北京，10月，在人民大會堂慶祝西哈努克親王50壽辰的宴會上公開露面，令中國一般官員們大惑不解。[[118]](#_118_Ju_Zai_Chang_De_Zuo_Zhe_Suo)1973年5月，根據毛的指示，他又引人注目地進入政治局。同時進入政治局的還有“文化大革命”的兩位受益者：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他似乎在清除林彪余黨的過程中嶄露頭角）；[[119]](#_119_Can_Jian_Ding_Wang___Hua_Zh)以及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120]](#_120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很顯然，王洪文的崛起，旨在為激進派提供一個易于為人接受的形象。37歲的王洪文，英俊瀟灑，是“文化大革命”中兩種最重要的力量的象征：青年和工人。激進派希望通過王洪文，重新激起青年人因紅衛兵運動瓦解而消失的熱情，同時，王洪文的無產階級出身，也可以用來吸引城市工人的支持。而且，不管他在上海扮演了什么角色，沒有一位將軍可以就1967年和1968年全國性的城市無政府狀態譴責他。

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王洪文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從而上升為黨內第三號人物。[[121]](#_121_Zhong_Guo_Ren_Dui_Wang_Hong)這樣，后來的“四人幫”的第四個成員出臺了，他的地位僅次于毛和周恩來。王洪文僅僅只有六年革命斗爭經驗和政治經歷，卻要他趕上像周恩來那樣的經歷了大革命、國內戰爭、外敵入侵、黨內斗爭的60年風風雨雨的老同志，并且與他們抗衡，這確是一場實力懸殊的較量，是另一場毛主義者將遭受失敗的政治賭博。

#### 周恩來的反“左”攻勢

當王洪文到達北京時，他的激進派同僚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正處于守勢。他們從林彪及其軍事集團的毀滅中獲得了利益，搬掉了他們繼承毛的衣缽的一個主要障礙；但林彪的行動玷污了“左”派的事業。他所招致的一些恥辱，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他以前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盟友。

周恩來利用“九·一三”事件之后激進派的混亂和被動局面，恢復了他的長達一年的運動，以穩定局勢，促進經濟發展。1971年12月，他要求國家計委官員努力消除工業管理制度的無政府狀態，恢復經濟秩序和責任心。由于受到“左”派的威脅，工廠管理者長期以來不敢維持生產秩序和紀律。但是，在周的推動下，由國家計委制定的管理規定，卻遭到了張春橋的否決，因此不能作為正式文件下發。雖然沒有統計數字證實，據稱這些規定對工業生產無疑具有有益的影響。[[122]](#_122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在農業方面，周恩來指示，各地必須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學習大寨經驗，只有在地方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才能模仿大寨大隊的平均主義做法。[[123]](#_123___1981Nian_Jue_Yi__Zhu_Shi)這種平均主義的一個內容是把核算單位由生產隊換成生產大隊。在“大躍進”后可怖的荒年里，對農民最重要的是如何刺激生產的發展。因此中央決定將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是農村人民公社三級組織中最小的、最基層的組織，是農村中最具凝聚力、最和諧的集體單位。在生產隊一級核算，意味著收入在生產隊里進行分配。把核算單位由生產隊轉移到生產大隊，在貧隊和富隊之間進行收入再分配，這就導致了平均主義，因而引起不滿。從1968年開始，激進派號召向大隊核算轉變，但這種做法在周恩來反擊以前，已于1970年被制止了。[[124]](#_124_Can_Jian_Dai_Wei__Ci_Wei_Ge)農村激進主義的另一個標志是要收回農民的自留地，這個方面，他們似乎也早在林彪覆滅以前的1970年就往后退了。[[125]](#_125_Dai_Wei__Ci_Wei_Ge____Zhong)統計表明，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糧食產量并沒有顯著增加，農業生產也沒有普遍增長。[[126]](#_126_1969__1973Nian_Liang_Shi_Ch)

然而，1972年可以稱為周恩來年。文化領域出現松動，在周的鼓勵下，一位著名學者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要恢復教育改革和科學研究。雖然這篇文章沒有能夠在激進派控制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并且遭到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反擊，但畢竟最后還是在其他報刊上發表了。[[127]](#_127_1972Nian_Shi_Zhou_En_Lai_Ni)在1972年5月20日至6月底于北京召開的有300多位中央和地方高級干部參加的一次重要會議上，周深化了對林彪的批判，并且贏得了毛的堅決支持。[[128]](#_128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但是，周恩來沒有能夠摧毀“左”派，因為說到底，激進派仍然得到毛的支持。到1972年12月，毛澤東感到反“左”浪潮走得太遠了。在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強烈要求下，他最后裁定，林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129]](#_129_You_Guan_Zhe_Xiang_Zai_Zhen)激進派抓到這根救命稻草，重新開始了進攻。

####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3年8月24—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負責為十大起草三個主要文件：政治報告、修改黨章的報告、新黨章草案。[[130]](#_130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這表明激進派在意識形態領域里重新取得了優勢地位。

在十大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盡管九大以來中國的領導層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兩個報告和新黨章仍然反映了九大的路線，這并不令人感到驚奇。用王洪文的話說：“四年多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131]](#_131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自然，林彪的名字在新黨章中被劃掉了，但激進派不會拋棄這個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的理想和成就的文件，相反，他們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在新黨章的總綱部分加進這樣的語句：“這樣的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132]](#_132_Tong_Shang_Shu__Di_45Ye)無法了解他們是否企圖使周恩來說類似的話，但在周的報告中，確實沒有發現這樣的觀點。[[133]](#_133_Wei_Lian__A_Yue_Se_Fu_Ren_W)

新黨章增加的其他內容，反映了激進派關注的其他問題：批判修正主義；反潮流；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必要性；堅持黨對其他國家機關，尤其是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不允許壓制批評。[[134]](#_134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

在十大結束后召開的黨的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了中國共產黨新的中央領導班子。選舉結果反映了激進派的復活，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大大增加，九大時5位常委，現在增加到9人。9名常委中，毛澤東、王洪文、康生、張春橋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目標的堅決支持者；朱德（86歲）和董必武（87歲）是兩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沒有什么政治影響，他們當選為常委主要是滿足那些懷舊的高級官員，但（假如與他們協商）他們幾乎肯定會支持毛澤東；隨后擔任沈陽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是一匹黑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對激進的要求態度曖昧，可以算作激進派的機會主義的支持者。這樣，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周恩來和葉劍英代表了穩健派的聲音。

新當選的政治局成員，如華國鋒、吳德、陳永貴（斯達漢諾夫式的農民，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幾乎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因此可以想象他們會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李先念、譚震林等高級干部，在周恩來短暫的反“左”期間，經過周的努力，得以重新工作，進入中央委員會，但未能返回政治局。

當激進派經過林彪事件的打擊，在十大上取得勝利之后，他們便秣馬厲兵，準備向他們最可怕的敵人周恩來總理本人發動攻勢了。

#### “批林批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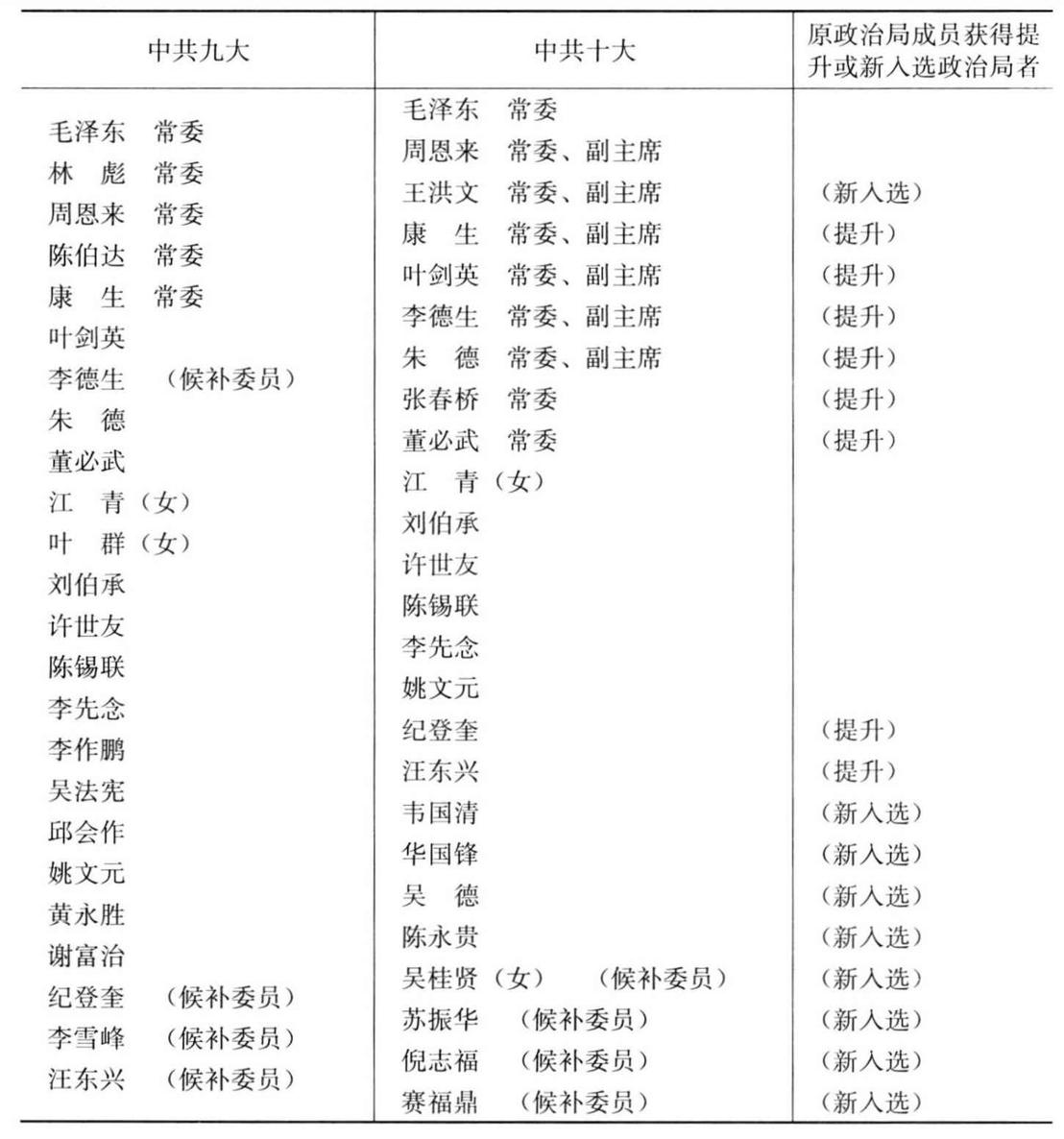
1974年1月18日，毛批示同意轉發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135]](#_135__Lin_Biao_Yu_Kong_Meng_Zhi)根據一份材料的記載，最初允許進行這種看來稀奇古怪的聯系的，是1973年8月毛對清華大學一個學習小組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毛指出可以將批林批孔結合起來進行。[[136]](#_136_Le_Dai_Yun___Qia_Luo_Lin__W)但是，清華大學的學習小組肯定已經從毛在1973年3月召開的、旨在批判林彪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得到啟示，毛在講話中認為既需要批判林彪，也需要批判孔子。在5月和8月的兩首詩中，毛澤東強化了他發出的信息。毛寫這兩首詩意在批評中國一位高級知識分子郭沫若，因為郭沫若稱贊儒家，謾罵儒家的主要反對者，中國的第一個皇帝秦始皇。[[137]](#_137_Dang_Shi_Jiao_Yan_Shi____Zh)中國人常不適當地把毛比作類似秦始皇的開國皇帝，[[138]](#_138___Peng_De_Huai_Shi_Jian)而秦始皇是遭到中國歷代歷史學家辱罵的專制統治者。

到8月，毛的講話肯定已經在政治鑒賞家中廣泛地傳開，激進派控制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位廣東教授撰寫的文章，提出了隨后的批林批孔運動的一些主要觀點，其中包括與當代中國政治關系最密切的那個觀點。他引用了孔子的《論語》中的一段話：“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雖然轉彎抹角，卻明白無誤地批判了周恩來重新起用一些高級干部的措施。使人產生這種感覺的一個原因是周的姓氏的緣故，他所批判的一位公元前12世紀偉大的政治家周公，正好與周恩來同姓[[139]](#_139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原文如此——譯者）。

當這篇文章在中國上下討論的時候，江青跑到清華，組建了一個班子，為全國性的官方批判運動提供理論武器。[[140]](#_140_Le_Dai_Yun___Qia_Luo_Lin__W)該小組由前中央警衛團、人民解放軍8341部隊政委遲群領導。遲群當時是清華大學革委會主任，同時負責首都另一所重點院校北京大學的教育改革。他的助手是謝靜宜，也來自8341部隊，曾做過江青的秘書（原文如此，實際上，謝在“文革”前是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譯者），后來調到清華大學擔任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41]](#_141___Zou_Jin_Bao_Feng_Yu_____D)

1973年秋天，遲群和謝靜宜組織了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12位（后來增加到32位）學者，專門進行研究，撰寫文章，把林彪和孔子聯系起來，為了現實政治的迫切需要，去進行歷史類比。這個理論批判隊伍被稱為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簡稱“梁效”（兩校）。梁效成員搬進專門的辦公地點，配給特供伙食，從事收集材料的工作，而這又常常是據江青授意進行的。[[142]](#_142___Zou_Jin_Bao_Feng_Yu_____D)他們成為“四人幫”在全國上下建立的幫派體系的核心。[[143]](#_143_Jin_Chun_Ming_____Wen_Hua_D)1974年1月18日發布的文件，是“梁效”的第一個重要成果。

表6 1969年4月至1973年8月領導班子的變化



說明：兩次大會中只有主席和副主席排了名次，其他人皆按姓氏筆畫排列，九大以后政治局的名次重新進行了排列，以便干表明1969年至1973年之間政治局領導成員的變化。

這標志著官方的“批判林彪，批判孔子”運動（“批林批孔”）的正式開始，它由江青和王洪文一手策劃，1974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了元旦社論《元旦獻詞》，為大張旗鼓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作輿論準備，預示著它的到來。[[144]](#_144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這看起來像是不斷深入的清除林彪在黨內和軍內的支持者的運動，但又進一步擴大，實際上這場清除余黨的運動后來被稱為“讀書班”，由王洪文負責，企圖乘機控制軍隊。但由康生起草的這個社論，真實目的在于搞垮周恩來，這從上年8月第一個借口出臺時，就已經昭然若揭了。[[145]](#_145_Hu_Hua____Zhong_Guo_She_Hui)

1月24日，據說未經毛澤東批準，但可能得到毛的首肯，江青等人召開了在京部隊單位“批林批孔”動員大會；第二天，又召開了在京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她和姚文元、遲群、謝靜宜都在會上作了講話。[[146]](#_146_Ge_De_Man____Zhong_Guo_De_Z)隨后，她和她的大批判組四處活動，甚至插手高度保密的軍事機構，發表講話，或如后來人們描述的那樣到處“點火”。[[147]](#_147_Le_Dai_Yun___Qia_Luo_Lin__W)這場“批林批孔”運動控制了全國城鄉各單位的政治行動，批判文章充斥了新聞媒介。[[148]](#_148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

批判保守勢力的復辟是這場運動的一個主題，強調在要求前進的人和企圖倒轉歷史車輪的人之間，進行長期不懈的斗爭。[[149]](#_149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另一個主題是在儒家和為秦始皇服務的法家之間進行比較，[[150]](#_150_Tong_Shang_Shu__Di_408Ye)正是法家向秦統治者證明了實行嚴刑峻法的必要性。他們可能希望通過這種類比，進一步深化反復辟的階級斗爭。在大量的講話和文章中，周公的罪行遭到了嚴厲的批判。[[151]](#_151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

不管這場喻古諷今的大批判對活著的周的心理影響如何，由于身患癌癥，總理的身體日漸衰弱，約會也被迫削減了，最后不得不同意手術。[[152]](#_152_Zhou_Jian_Chi_Yao_Zai_De_Da)1974年6月1日，他離開中南海辦公室，住進北京醫院，在那里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后18個月。[[153]](#_153___Zhou_Zong_Li_Sheng_Ping_D)從那時起，他主要是為了重大政治目的進行出擊，[[154]](#_154_Zhou_Yin_Wei_Qing_Gan_Yuan)才偶爾離開醫院。但如果激進派認為他們長期以來窮于對付的對手將要消失，并為此而得意忘形，那么他們的滿足只是十分短暫的。周身患絕癥，促使毛著手解決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他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令他的激進的追隨者沮喪透頂。

#### 鄧小平的復出

毛必須找到一個人來接替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雖然主席認為大亂達到大治，可能也為全國性的動亂激動不已，但他同時清醒地認識到，需要一種穩定力量，以避免全面的混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甚至在更早些時候如“大躍進”時期，周恩來一直發揮這樣的作用。雖然他為應付局面（或是為應景）仍可從病床上挺身而起——最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1月13日他離開醫院，在四屆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但他已不可能為處理國家每件重大事務而長時間地辛勤工作了。

對毛來說，不幸的是，王洪文令他大失所望。王在上海工作時，毛以為他在這個年輕人身上發現了一些政治技巧。[[155]](#_155_Wang_Hong_Wen_Zui_Yin_Ren_Z)但王并不具備這些技巧。更重要的是：盡管王洪文地位很高，實踐證明他不過是江青和張春橋手中的玩物，[[156]](#_156_Jin_Chun_Ming___Wen_Hua_Da)這就破壞了他作為一種獨立的新生力量的可信度。雖然“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的歷史學家另有所圖，但似乎沒有理由懷疑他們的證據，即在“批林批孔”運動期間，王洪文和江、張靠得這么緊，以至于促使毛澤東意識到，他不是接替周恩來的合適人選。到毛開始警告王不要與江青拉幫結派時，已為時太晚了。[[157]](#_157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至于江青，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代表毛從事一些政治活動外，中國2000多年延續下來的男人當權的政治文化，以及植根于這種文化的偏見，使她通往權力的大門向她關閉了。毛意識到，作為一個婦女，江青是一個政治包袱。因為婦女統治違背了儒家的父系繼承制度，因為，女性統治者的所謂錯誤行為歷史上都受到男人歷史學家們的譴責。從1974年起，江青一直試圖改變西漢呂后和唐代武則天女皇的反面歷史形象。呂后、武則天，以及晚清的慈禧太后，向來是歷史學家主要的攻擊對象。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雖然江青和她的上海幫仍然在推動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目標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在這段時期里，毛不時對他們提出批評，表示不信任，顯出一種分離的傾向。婚姻沖突是一種可能的解釋。根據特里爾的記載，1975年江青搬出中南海（中國領導人住在里面），搬進了釣魚臺國賓館。特里爾的材料說，這是她和毛澤東之間政治上發生了分歧，而不只是感情糾紛。[[158]](#_158_Te_Li_Er____Bai_Gu_Jing)毛也要人產生這種印象。1974年3月21日他對江青說：“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 1974年7月，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主席在他們的同事面前第一次公開批評其夫人的政治行為，把她和她的盟友稱為“四人幫”。他告訴大家，江青“只代表她自己”，她“有野心”，“想當黨的主席”。[[159]](#_159_Tong_Shang_Shu__Di_324__325)但在中國政治圈子里廣泛流傳的一個故事是，江青之所以搬家，是因為她對毛澤東個人生活中某些事情的不滿，江青對此曾大發雷霆。然而，還有另一種說法，不管江青對毛澤東這些生活中的事情怎么看，她實際上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搬出了毛的住處。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在政治上毛和江青仍然互相需要，不管他怎樣責難她，他堅持強調她的錯誤是可以改正的。[[160]](#_160_Te_Li_Er_Zai___Bai_Gu_Jing)一位中國觀察家提供的一項證據表明，毛對“四人幫”的攻擊是為了解除他們敵手的武裝所放的煙幕的一部分，暗示他與他們已分道揚鑣。若果真如此，那么他主要想蒙騙的是鄧小平。

1974年10月4日，毛再也不能忽視周恩來患病可能造成的影響，提議鄧小平接替周總理的位置，擔任第一副總理，主持政府日常工作。這樣，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的兩個主要受害者之一即將重新管理中國了。王洪文的直線上升已經夠異乎尋常的了，但重新起用鄧小平卻更令人大感意外。然而從上一年年底以來，人們都清楚知道。鄧小平這顆政治明星正在重新上升以及上升的原因，問題在于人民解放軍在政權中的作用如何。

在1973年12月12日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已經談到，他希望將各軍區的司令員對調。很顯然，他要剝奪他們長期占據的軍事指揮位置和已形成的關系網以及他們最近一段時期獲得的黨政職務。他抱怨說，政治局不管政治，軍委不管軍事。這是并不太隱晦地告訴軍隊：離開政治。為了減少將軍們對這些提議的不滿，毛做了兩件事：他提議鄧小平進入中央軍委，擔任總參謀長；他說林彪粗暴對待人民解放軍的革命英雄，他受了林彪欺騙，為此還作了自我批評。不管這種解釋是否使將軍們感到滿意，但畢竟他道歉了，并請求地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毛如愿以償了：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對八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同一天，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原文為“重新在中央軍委起重要的政治作用”——譯者），并決定他進入政治局。交易的成分顯而易見。作為對將軍們放棄政治權力的回報，他們得到許諾，權力將交到一位可靠的老同志手中。鄧小平后來贊許地，也許還有點驚訝地說，所有八個軍區的司令員都在10天以內到他們的新崗位報到了。[[161]](#_161___Zhong_Gong_Dang_Shi_Da_Sh)令“四人幫”感到不快的是，1974年4月，鄧小平被挑選率中國代表團參加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并在會上發表講話，向全世界介紹毛的三個世界理論。

毛重新起用鄧小平，削弱了“四人幫”潛在的最強大的對手——軍隊，“四人幫”至少可以因此得到一些安慰。但當毛在10月透露他準備讓鄧小平管理國家時，“四人幫”慌作一團，積極采取激烈的行動，試圖使毛放棄他的打算。10月18日，王洪文秘密飛往長沙去見毛，[[162]](#_162_You_Guan_Wang_Hong_Wen_Qu_C)通過王洪文和其他特使，“四人幫”誣蔑周恩來裝病，在醫院里與鄧小平秘密籌劃，首都現在的氣氛大有1970年廬山會議時的味道。毛不聽他們的抗議，表揚了鄧小平的能力。當周恩來不顧重病在身，于12月23日和王洪文同機飛往長沙去見他時，主席重申了他對鄧小平的信任，并提出要執行他早先的建議，任命鄧擔任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為了維持政治平衡，任命張春橋擔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副總理。1975年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十屆二中全會，十分警惕的周恩來主持了會議。會議正式通過了上述任命，并且作出了更令人震驚的決定，選舉鄧小平為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63]](#_163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這樣，毛生平最后一個大的運動的舞臺搭起來了。

#### 鄧小平主持工作的一年

1975年1月，在鄧小平接管黨政日常工作時，他并沒透露出他的想法。[[164]](#_164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難道他會相信毛已放棄了“文化大革命”并允許他恢復“文化大革命”前夕推行過的那些更為理性的政策嗎？

這里有某些令人鼓勵的跡象：對像他自己一樣的人即使不恢復原職的話，也進行了平反；在毛的支持下，周恩來在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長遠的經濟規劃和以后眾所周知的“四個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165]](#_165_Zhou_Zai_1964Nian_Di_Yi_Ci)更為重要的是，毛號召要安定團結，并批評了“四人幫”的宗派活動。同時，毛似乎想要在文化界恢復更為寬容的政策。他主張恢復周揚等一些官員的職務，并告訴鄧小平文藝應“百花齊放”。在毛的鼓勵（也許還是指引）下，鄧小平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葉劍英、李先念在5月和6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四人幫”提出的論斷——即第十一次“路線斗爭”正在進行，新的領導人犯有實用主義的錯誤。王洪文一直是個隨風倒的人，這次他作了自我批評，隨后回上海呆了幾個月。但他的三位同志仍頑固地保持沉默。[[166]](#_166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鄧奮力解決一些緊迫問題。[[167]](#_167_Guan_Yu_Deng_Xiao_Ping_Cong)首先是軍事問題。這是毛召鄧復職的一個主要動機。在《鄧小平文選》中重新發表的鄧在1975年的8次講話中，有3次是談軍事問題的。在他正式擔任軍事職務后不到3個星期，鄧就對人民解放軍機構臃腫、預算龐大、效率低、無紀律、干部隊伍中存在幫派主義等提出批評。他強調人民解放軍需要服從黨的政策。在以后的一次講話中，他在所列的軍隊的缺點中加上了自負和惰性。[[168]](#_168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n)

更為緊迫的問題是工人的騷亂。最引人注目的是蘇州、南京、南昌和其他地方的鐵路工人罷工和陰謀破壞活動，這顯然是“批林批孔”運動期間“左”傾分子煽動的結果。4條主要鐵路干線交通中斷，引起了巨大的經濟混亂。鄧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恢復了秩序，同時也恢復了中央的控制[[169]](#_169_Yu_Er_Gen__Duo_Mu_Si____Zho)。王洪文一直未能解決杭州“左”傾分子挑起的沖突。鄧就出動軍隊并逮捕了肇事者。[[170]](#_170_Yue_Han__Jia_De_Na____Zhong)

在尋求解決經濟方面根深蒂固、長期存在的問題的方法時，鄧召開了會議并采取了一系列主動措施。制定了三個重要的政策性文件：《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國家計劃委員會起草，8月18日公布）；《關于科學院工作的匯報提綱》（胡耀邦、胡喬木和其他人起草，9月26日公布）[[171]](#_171_Guan_Yu_Dui_Zhe_Liang_Ge_We)；《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鄧力群起草，10月中旬公布）。[[172]](#_172_Fang_Wei_Zhong____Zhong_Hua)

在“左”傾分子要求實行更加平均主義的工資制度的煽動下，這一年的6、7月份在華中、華南地區爆發了罷工浪潮。這個關于工業的文件解決了這次罷工浪潮的根源。[[173]](#_173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文件談到“一小撮壞人在‘造反’和‘反潮流’的旗號下陰謀破壞工作”；也談到了管理“混亂”；生產力低下、質量低劣、保養費昂貴、生產成本高、故障頻繁；特別是原材料、燃料和動力工業問題嚴重。[[174]](#_174_Qi_Xin_____Si_Ren_Bang__An)在這一文件提交給國務院時，鄧在批示中強調要支援農業，引進外國技術，加強工業研究，恢復管理秩序，把質量放在第一位，實施規章制度以及恢復物質刺激。[[175]](#_175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n)一個月以后，在討論《關于科學院工作的匯報提綱》時，鄧反復強調要加強培訓，提高教育水平，提拔更多的學有專長的領導，花更多的時間進行科研活動（這就暗示在政治上少花些時間）。[[176]](#_176_Qi_Xin_____Si_Ren_Bang__An)

正是《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這個文件對“左”傾分子進行了全面抨擊，大量地引用了毛的早期著作來闡明不能因強調革命而妨礙生產的觀點：“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生產搞得很壞，而硬說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騙人的鬼話。一旦抓了革命，生產就自然地并毫不費力地提高了，這只是那些縱情于神話的人才相信的觀點。”[[177]](#_177_Tong_Shang_Shu__Di_227Ye)難怪江青公開指責這三個文件為“三株大毒草”，而《總綱》則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宣言”。[[178]](#_178_Zhong_Guo_Ren_Min_Jie_Fang)

江青在農業問題上與鄧進行了交戰。在9月15日至10月19日召開的、有3700名代表參加的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她號召回到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期的公社理想上去，并強調平均主義和階級斗爭。在另一方面，鄧回顧了60年代初期，那時利用各種刺激鼓勵農民的積極性。[[179]](#_179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

另一個利用歷史或文學作品為當代政治目的服務的古怪例子是，江青在她的大寨講話中通過貶責一本著名的古典小說《水滸傳》中的男主人公來影射鄧小平。她宣稱，“必須認真閱讀這本書，看清這個叛徒的面目。……宋江那個人搞了許多兩面詭計”。[[180]](#_180___Zhong_Guo_Li_Shi_Yan_Jiu)“……宋江架空了晁蓋，難道剛才沒有人想架空主席嗎？我認為有幾個。”[[181]](#_181_Zhong_Guo_Ren_Min_Jie_Fang)尤為獨特的是，這種《水滸傳》比喻并不是她的思想，而是來源于毛對宋江的投降主義或修正主義的批判，“四人幫”中老練的辯論家姚文元迅速抓住了這一主題。[[182]](#_182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

在鄧小平當權的一年中，毛的行為是矛盾的。[[183]](#_183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他支持鄧的措施，保護它們免受“四人幫”的攻擊，但同時又提出了他自己的“左”傾思想，并允許張春橋和姚文元宣揚他們的“左”傾思想。他反對工資差別、按勞付酬和商品交換。他說，在這些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與1949年以前的中國差別不大，只是所有制發生了變化。由于受到毛的講話的鼓勵，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33條語錄。他們精心挑選了那些能說明他們自己觀點的評論。[[184]](#_184_Tong_Shang_Shu__Di_644__645)在毛的許可下，張和姚都寫了主要的注釋性理論文章，以論證他們自己或毛的觀點：關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極其重要性；關于商品交換削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危險性；關于物質刺激鼓勵下新生資產階級分子令人擔憂的崛起；關于向集體所有制更高階段進而向國家所有制推進的緊迫性；以及中國仍然存在變修的危險。[[185]](#_185_Yao_Wen_Yuan___Lun_Lin_Biao)

毛的模棱兩可可能反映出他舉棋不定。這是理智和感情的真正矛盾。這也可能是他身體日漸虛弱的表現。從1974年初至1975年8月，即在毛一只眼睛接受摘除白內障手術時，他已不能看書了。由于他的機要秘書生病住院，毛不得不依靠他的年輕女秘書張玉鳳給他讀官方文件和報紙。1975年底，毛患了帕金森氏病，已說不出話了，甚至在會見某些外國要人時，只能靠寫或發出只有他的隨從能理解的咕嚕聲與他們交談。根據張的回憶：

他講話困難，只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聲音字句。由于長時間在他身邊工作，我還能聽懂主席的話。每當主席同其他領導同志談話時，我就得在場，學說一遍。但到了他講話、發音極不清楚時，我只能從他的口型和表情上進行揣摩，獲得他點頭認可。當主席的語言障礙到了最嚴重的地步時，他老人家只好用筆寫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來，主席的行動已經很困難，兩條腿不能走路。如果沒有人的攙扶，連一步都走不動了。[[186]](#_186_Zhang_Yu_Feng___Mao_Ze_Dong)

毛的“左”傾侄兒毛遠新似乎在1975年9月底從東北調到北京，充當主席與政治局的聯絡員。他也反對鄧。毛遠新像埃古（莎士比亞劇作《奧賽多》中的反面人物——譯者）一樣，歪曲鄧的報告并把他對鄧對“文化大革命”忠誠的懷疑都送進主席的耳朵。他找到了一位富有同感的傾聽者。[[187]](#_187_Hu_Hua____Zhong_Guo_She_Hui)

所有這些因素對毛態度的改變都有關系。但考慮到毛與鄧交往甚長，毛不可能在1973年就會天真地認為這位從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第二號人物的本性已經變了，更有可能的假設是，毛提拔鄧小平是一個策略，其目的部分是為了蒙騙軍隊以更有效地解決“毛之后，哪一派統治”的問題；部分是為了贏得時間以解決“毛之后，誰接班”這一問題。他在1975年提出的觀點并沒有表示他已改變了他在“毛之后，怎么辦”這個問題上長期堅持的觀點。

#### 周的逝世和鄧的下臺

甚至在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以前，批判鄧小平政策的浪潮已逐漸興起。“四人幫”可能覺察到主席對鄧的容忍正在消失，于是決定發動一場運動打倒他。正如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初一樣，初戰戰場也是在知識界。

一位清華大學的黨員干部（或許受到鄧的支持者的鼓動）兩次寫信給毛，訴說了“四人幫”在清華的忠實追隨者遲群和謝靜宜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毛把這視為對“文化大革命”的攻擊。11月3日，遲和謝公布了毛支持他們的復信，這標志著“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開始。[[188]](#_188__Fan_Ji_You_Qing_Fan_An_Fen)他們還抓住這次機會攻擊教育部長周榮鑫，因為周應鄧的要求，堅持恢復教育標準。[[189]](#_189_Jia_De_Na____Zhong_Guo_Zhen)“文化大革命”尚存的遺產（或稱為“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之一即一種平均主義的教育制度——它強調更為簡單和實用的課程，以便讓工農兵更容易上大學[[190]](#_190_Qi_Ta__She_Hui_Zhu_Yi_Xin_S)——在毛和“四人幫”看來正處于危險之境。

11月底，在毛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召開“打招呼會議”。華國鋒在會上宣讀了毛的講話要點，然后將《要點》傳達到各省的高級黨員干部。毛的講話和隨后頒發的擁護毛的講話的中央文件的要點是：從7月到9月，政治謠言四起，有人企圖分裂最高領導層，攻擊“文化大革命”，力圖翻案。[[191]](#_191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毛有效地從鄧那里收回了他的權力，并使當時的運動成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正在此時周恩來逝世了，這突然引發了一場將在年內波及整個中國的政治危機。幾個月來，周一直不怎么活躍，但只要他還活著，他便是理性和克制的象征：不管國家變得如何混亂，在某個地方，總會有人來恢復秩序，并保護人們免受“文化大革命”的最壞影響。早在20年代初，鄧小平在巴黎勤工儉學時就和周在一起。他在周逝世4年以后，接受記者采訪時總結了人們對周的態度：

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他這樣做減少了許多損失。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192]](#_192__Da_Yi_Da_Li_Ji_Zhe_Ao_Lin)

周在逝世前一直擔任總理職務。現在選擇接班人不可能再推遲了。鄧是當然的候選人。選擇鄧將說明依然愿意保留一位溫和派人物掌舵。盡管“左”派對鄧的復舊主義政策的批判浪潮日益高漲，但他還沒有受到公開的羞辱，還讓他在周恩來的追悼會上致悼詞[[193]](#_193_Deng_De_Jiang_Hua_Kan_Zai_Z)。

但是毛必定已估計到，如果讓鄧繼承周的衣缽，這實質上將使鄧的地位不可動搖，在他本人逝世后肯定無法動搖。現在必須打倒鄧，否則他最終將除掉那些想真誠地保護毛主義和“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人。同樣的論據也妨礙了葉劍英、李先念等其他主要幸存者來繼承周的職務。

最有可能當總理的激進候選人是“四人幫”中最有能力的成員、位居鄧小平之后排名第二的副總理張春橋。但毛很久以前就已確定周的接班人不應是個激進分子。一位激進的總理不但不能維護毛主義，而且會突然引起敵對反應，結果人和綱領都會被推翻。

因此毛不得不選擇一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可能毛的精明設想是，這樣一個人會非常感激毛并一定能沿著“文化大革命”路線走下去。一個受益者或許也想在領導層中保留一個激進分子，以便平衡老干部對其地位的威脅。這樣，這支純潔的毛主義火炬會在政治局里繼續燃燒，即使不在它的鼎盛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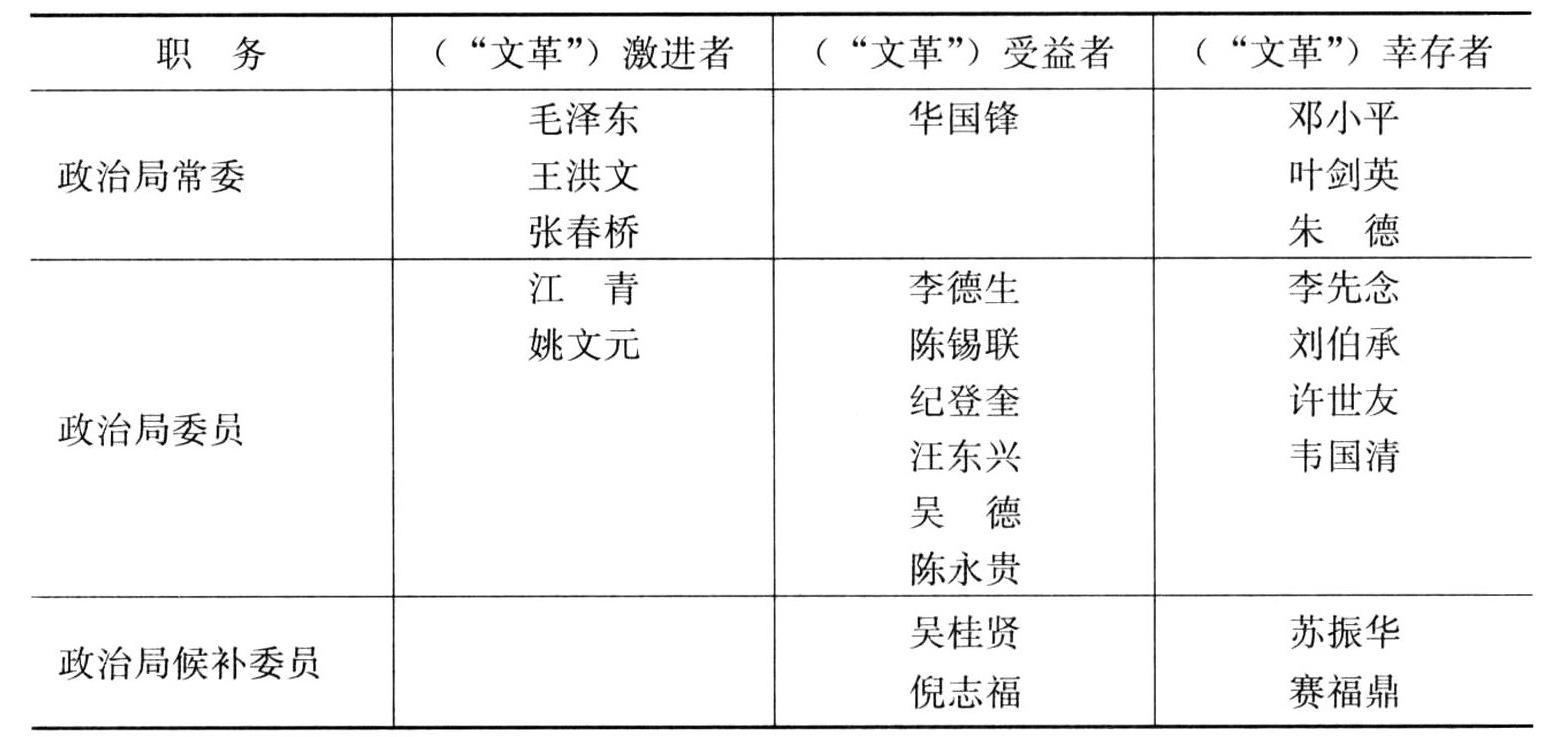
毛選上了華國鋒，其原因尚未被人所知；也許毛在選擇合適的繼承人時又犯了錯誤。華作為一位官員，在毛的家鄉湖南省的工作很早就受到了毛的注意和贊賞。[[194]](#_194_Mi_Xie_Er__Ao_Ke_Sen_Bo_Ge)也有人認為華在林彪事件后的清洗中起了關鍵作用，但另一位潛在的候選人紀登奎也是如此。華在一年前的四屆人大就任公安部長。毛可能認為這一職務會給這個未經考驗的繼承人奠定必要的權力基礎。在1月21日和28日，毛通知政治局，華應擔任代總理并代替鄧主管黨的日常工作。[[195]](#_195_Wei_Shi_Yao_Yao__Dai_Li__Ni)毛又命令“文化大革命”的一位軍隊的受益者陳錫聯代替鄧的盟友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這可能是為了防止華受到包抄。[[196]](#_196_Fang_Wei_Zhong____Zhong_Hua)隱秘的反鄧運動得到了加強。

#### “四人幫”的策略

“四人幫”對華國鋒的晉升十分惱怒，尤其是張春橋——他顯然對總理一職垂涎已久。[[197]](#_197_Guan_Yu_Zhang_Chun_Qiao_Dui)這導致他們犯下重大的戰略性錯誤。大概，這一錯誤使他們在毛死后保留權力的微小希望也化為烏有。他們沒有與潛在的同盟者合作，而是四處出擊，有權就搶。

此時政治局的政治形勢對“四人幫”是有利的（見表7）。“文化大革命”前老干部中的幸存者處于守勢，他們在管事的政治局委員中為數不多。由于鄧小平和葉劍英已靠邊站，王洪文和張春橋是本可以利用他們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有利地位聯合華國鋒控制黨的。華在此關鍵時刻本會歡迎這種支持的，特別是因為它會得到毛的贊許。“四人幫”的天然盟友是像華一樣的受益者。他們相對年輕和活躍；而且，正如毛可能已覺察到的，因為他們獲得權力的方式不同，他們會遭到幸存者的懷疑，同時他們也懷疑幸存者。而且，這些受益者包括軍界和政界的要人，他們在任何攤牌中都將是重要的同盟者。這些人是：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中央警衛部隊（即人民解放軍8341部隊）司令員汪東興；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198]](#_198_Zhe_Xie_Ren_Zuo_Wei_Ji_Jin)

表7 周恩來逝世后政治局的政治形勢



說明：a.康生和董必武在1975年去世。  
b.朱德和劉伯承由于年齡和健康原因在政治上已不活躍。  
c.不清楚是何原因，1975年1月在接管這個國家時，李德生“請求免去”他所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參閱《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391頁。在內戰時期，李一直是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的一位司令員。1982年，他為一本描寫他們輝煌的軍事業績的書寫了序言；參閱楊國宇等編《劉鄧大軍征戰記》，第1—4頁。

但由于沒有毛來進行嚴格的日常控制，“四人幫”又不能忍受任何妥協，反而使他們天生的好戰態度放任自流。直到最近一向習慣于充當主席的守門人和代表的江青，[[199]](#_199_Qi_Xin___Wen_Hua_Da_Ge_Ming)也不甘于為一位政治暴發戶充當二把手。早在前一年秋天學大寨會議上，崛起中的華國鋒想與江青一起努力實現他們的共同目標，江青就開始攻擊華膽怯，稱華為“馬林科夫式的好好先生”。[[200]](#_200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現在，“四人幫”不但沒有重新估價在華擔任代總理以后他們的地位，反而加快了他們反對華的行動。[[201]](#_201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這樣就使華不得不尋求幸存者的支持。于是，相互依賴的現實戲劇性地展現在了人們眼前。

“四人幫”不滿足于驅鄧損華，他們公然蔑視公眾對周恩來的感情（他們必定了解公眾對周的感情）。這位總理逝世時沒有發布公告說明他將被火葬，也沒公布追悼會在何時何地舉行。但消息還是走漏了，約有100萬人佇立在從天安門廣場到八寶山公墓的10里長安街上，許多人手捧白色的紙花表示哀悼。在一個地方，群眾紛紛擁上，阻止了送葬行列，要求按中國的習俗將周土葬。只有在周的遺孀鄧穎超從車上下來，向群眾說明火葬是周的生前愿望之后，送葬行列才得以繼續前進。[[202]](#_202_Luo_Jie__Jia_Sai_De____Huo)在隨后的幾個星期中，全國各地發生的情況表明：周是深得人心的，而他的敵人是不得人心的。[[203]](#_203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

“四人幫”的反應不是暫時有所收斂，而是公然反對對周的悼念。雖然周沒有被點名批判，但他們通過控制新聞媒介限制人們公開表達對周的哀悼，并同意對周的政策進行大肆攻擊。[[204]](#_204_Tong_Shang_Shu__Di_581__582)3月25日，他們終于出格了。由他們控制的上海一家大報《文匯報》在頭版發表文章，毫不置疑地把周恩來稱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南京，發生了由學生帶頭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活動。但是，新聞媒介沒有報道此一事件。學生用瀝青把標語寫在火車車廂上，消息就傳到了北京和其他城市。[[205]](#_205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此后，在首都的心臟，即天安門的毛的巨幅畫像的正前方發生了支持周、鄧，反對“四人幫”的更加激動人心的示威。“南京事件”正是這一示威的序幕。

#### 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

清明節是中國人懷念祖先和掃墓的傳統節日。幾年前，中共為了消除迷信，將這一天變成了緬懷革命先烈的日子。于是，北京人民利用這一機會來悼念中共最偉大的英雄并借以表達自己對時局的看法。

3月19日，北京牛街小學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旁擺上了第一只花圈。4天后，一個自安徽來的人放上了第二只，并附有悼詞。這兩只花圈很快就被警察移走了。首都公安局的首腦隱晦地發出了信號：“花圈背后有嚴重的階級斗爭。”3月25日拂曉，一所中學送來了一只花圈，沒過多久，一些工人送來了紀念匾。3月30日，出現了第一個人民解放軍的花圈。這些紀念物沒有再被移走，首都人民深受鼓舞。[[206]](#_206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

3月30日以后，紀念碑下的花圈越來越多，與北京市政府的命令背道而馳。一隊又一隊，一個單位又一個單位，成千上萬的人涌向廣場，送來了花圈、悼詞，還朗誦著他人的悼詞。清明節即4月4日這一天，剛好是星期天，大約有200萬人到過廣場。

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底座部分全部被花圈所覆蓋，在它的周圍，花圈擺了一圈又一圈。大多數花圈都是自制的，上面扎有寄托哀思的白紙花，周恩來的相片貼在中央，旁邊掛著兩根絲帶，寫有悼念的文字。許多花圈上還別有頌詞和詩歌，還有一些則張貼在紀念碑上。正是這些悼文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他們擠在一起，急于了解別人是否也和自己有著同樣的情感。[[207]](#_207_Jia_Sai_De____Huo_Yue_Qi_La)

有些純粹是悼念總理的：

他沒有遺產，他沒有嗣息，他沒有墳墓，他也沒有留下骨灰。他似乎什么也沒有給我們留下，但是，他永遠活在我們心里。他富有全中國，他兒孫好幾億，遍地黃土都是他的墳。他把什么都留給了我們，他永遠活在我們心里。他是誰？他是誰？他是總理！是我們最敬愛的總理！[[208]](#_208_Yin_Zi_Jia_Sai_De_De___Huo)

懷有這樣的情感當時非常普遍，但人們最熱心誦讀的還是攻擊“四人幫”的詩篇。其中有些比較隱晦，有些則一目了然：

某女士真瘋狂，

妄想當女皇！

給你個鏡子照一照，

看你是個啥模樣？

糾集一小撮，

興風又作浪；

欺上瞞下跳得歡，

好景終不長。……

若有人反總理，

如同狂犬吠日

——夢想！[[209]](#_209_Xiao_Lan____Tian_An_Men_Shi)

面對這些口誅筆伐，“四人幫”暫時認識到了現實。他們與政治局里的“文革”受益者們合謀采取強硬手段。本來，政治局在4月1日的會議上已經認定南京事件是分裂分子和鄧小平的支持者制造的。根據這一否定性的判斷，北京的警察在4月2日和3日開始采取行動，企圖阻止悼念者，搬走花圈。[[210]](#_210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4月4日晚，當清明節即將到來時，政治局又開會討論天安門廣場的形勢。政治局主要成員朱德、葉劍英、李先念等一些老革命家以及支持他們的許世友將軍都未參加，[[211]](#_211_Tong_Shang)鄧小平當然也不可能參加了。“四人幫”和“文革”受益者們完全控制了會議。華國鋒譴責了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挑動者，說有些詩是對主席的直接攻擊，很多是攻擊黨中央的，很惡毒。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則認為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并說1974—1975年鄧小平就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他說，“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212]](#_212_Hu_Hua____Zhong_Guo_She_Hui)江青問中央領導人的安全是否有保障，為什么還不將對手們抓起來。[[213]](#_213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

在這次會議上，“四人幫”和“文革”受益者們繼續合作的基礎變得更為牢固了，雙方都感到了威脅，他們的主張遭到人們唾棄。如果華國鋒的論斷是正確的，即毛澤東本人也成了一些悼念詩文攻擊的目標，這就意味著他們分享權力的基石已經動搖。[[214]](#_214_Dui_Mao_He_Ta_De__Feng_Jian)毛尚在世就發生了這種事情，那么他死后又會發生什么呢？這樣大規模的、前所未有的支持周恩來的高潮至少也說明人們不再把毛當成指引未來的、獨一無二的、神一般的領袖了。另外還有一條道路，他們選中了這條路，即他們也反對毛選中的接班人。人們對周的敬意表明他們想要鄧小平來接替他的職務，那天晚上與會的每一個人都清楚，鄧小平重握大權就等于是他們的災難。

這樣，就有必要迅速采取堅決果斷的行動。毛遠新將會議結論向他的伯父作了匯報，并且得到了毛的認可，于是，警察很快就開始行動。至4月5日凌晨4時，廣場上的花圈和詩文全被清除了；滯留廣場看詩文和守護花圈的人被逮捕。[[215]](#_215_Hu_Hua____Zhong_Guo_She_Hui)5時左右，王洪文來到天安門廣場，就白天如何行動對警察作了指示。[[216]](#_216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

當局采取行動的消息迅速傳開，人們開始從城市的四面八方向廣場匯集，這時的行動是個人的而非集體的。但是有一群人——10個中學生于早上6點鐘來到廣場準備敬獻花圈，沒料到他們的去路被擋住了，紀念碑周圍站滿了軍人和民兵，說紀念碑要清理。[[217]](#_217_Tong_Shang_Shu__Di_622Ye)一個8時左右到達廣場的外國人說，廣場上有1萬人，沖著廣場西邊的人民大會堂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218]](#_218__Huan_Wo_Hua_Quan__Huan_Wo)下令群眾解散卻又不解釋為什么移走花圈，這激怒了在場的人們。警方的一輛面包車被掀翻，車里的人因說人群是被“階級敵人”利用誤入歧途而被迫道歉。一個激進分子（可能是清華大學的旁聽生）在一旁指責送花圈是悼念“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他很快就被揪了出來并且被迫離開。午后不久，有好幾輛警車被焚毀，一個警察指揮部遭到襲擊并被付之一炬。[[219]](#_219_Jia_Sai_De____Huo_Yue_Qi_La)

下午6時30分，吳德通過廣場上的喇叭發出呼吁，要求群眾離開廣場。[[220]](#_220_Guang_Bo_Jiang_Hua_Nei_Rong)大多數人散去了，根據中國人的說法，只剩下幾百人還滯留在廣場。[[221]](#_221_Tong_Shang_Shu__Di_633Ye__H)到了晚上9點35分，廣場上的燈光突然全部打開，一片通明，擴音器里播放著軍樂，集結在天安門后故宮里的工人民兵、公安人員和衛戍部隊突然出現在廣場，他們手持棍棒開始毆打群眾。至9時45分，大打出手的場面結束了，受傷的群眾被帶走受審問。[[222]](#_222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當晚召集的會議上，政治局作出結論，認為這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4月7日，主席聽了毛遠新關于此事的報告之后，下令將《人民日報》關于整個事件的報道和吳德當時的講話一起發表。鄧被解除了所有職務，但允許他保留黨籍，以觀后效。不知鄧當時還發生了什么事，因為就在當天，他被人民解放軍神秘地轉移到了南方某安全地。他在政治局里的盟友許世友和韋國清控制著那里的駐軍。[[223]](#_223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

4月7日，毛作出了或許是他最重要的決策：命令立即將華國鋒提拔到總理和黨的第一副主席的職位上。[[224]](#_224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或許是因為形勢太危險不能再耽擱，或者是華已經受住了毛的考驗；無論如何，毛最后決定了他的接班人。3個星期后即4月30日晚上，毛聽了這位新的第一副主席匯報全國形勢后，對他說：“你辦事，我放心。”[[225]](#_225__Ni_Ban_Shi__Wo_Fang_Xin)這句話后來被華當成護身符。實際上，華的生存能力并不見得比前三任接班人強，只是毛永遠也不會知道這一點了。

#### 毛的逝世

對于講迷信、講傳統的中國人來說（也就意味著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1976年是充滿兇兆的一年。周恩來于1月去世，接著，89歲高齡的老革命家、老革命戰士朱德于7月逝世，在早年艱苦的環境中，正是由于他對毛的忠誠才確保了軍隊服從黨的領導。過了3個星期，華北煤城——唐山發生了大地震，死亡達24.2萬多人，重傷16.4萬人。[[226]](#_226_Fang_Wei_Zhong_Zhu_Bian)

整個國家動蕩不安，一方面是由于極“左”分子煽動反對鄧小平引起的，另一方面則是公眾對鄧遭清洗感到憤怒引起的。鐵路運輸再次發生堵塞；鋼產量在1976年的頭5個月比預定指標少了123萬噸；化肥、棉紗和其他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也迅速下降，導致國民財政收入減少了20億元。年度計劃的各項指標不得不重新修改。[[227]](#_227_Fang_Wei_Zhong_Zhu_Bian)

在自然災害、政治動亂和經濟崩潰同時發生的時刻，精英們也逐漸認識到毛的生命正在走向終結。[[228]](#_228_You_Guan_Mao_Zai_Chun_Jie_Q)在鄧被撤職卻還未徹底垮臺的形勢下，“四人幫”應在政治局里鞏固與“文革”受益者們在天安門事件中結成的聯盟，以確保安全度過前面幾周的危險風暴。這樣做才是理智的。但是，在7月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他們攻擊華國鋒，從而失去了最后的機會。很顯然，他們已決定必要時動用軍事力量，與“文革”受益者們對抗。8月，隨著毛的生命日近尾聲，他們自1967年以來一直苦心經營的上海民兵開始進入戒備狀態。[[229]](#_229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將軍們也開始動起來了。王震將軍勸說政治局委員老帥葉劍英與“四人幫”作斗爭。葉的老友聶榮臻元帥和楊成武將軍也經常與他聯系。葉還與其他政治局委員，包括華國鋒及其他遭“四人幫”冷遇的“文革”受益者們一起磋商。葉又到了他的故鄉——廣東，在這里他與鄧小平會了面，發現鄧也做好了戰斗準備：

我們要么任人宰割，讓黨和國家蛻化變質，眼看著讓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先烈用熱血換來的江山被這四個人毀滅，甘心歷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們就與他們斗爭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們贏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如果我們輸了，只要活著，我們就上山打游擊，或者我們也可以到國外找一塊庇護地，以待時機。目前，我們可以用來與他們作斗爭的力量至少有廣州軍區、福州軍區、南京軍區。如果再拖下去，連這一點本錢我們也會輸掉。[[230]](#_230_Yin_Zi_Jia_Sai_De___Huo_Yue)

但是葉還要等一等。他對王震說，毛沒死就采取行動不恰當，[[231]](#_231_Xue_Ye_Sheng_Bian____Ye_Jia)他以“投鼠忌器”[[232]](#_232_Wang_Nian_Yi____Wen_Hua_Da)這一成語來解釋為什么要再拖一段時間，意即他不愿毛還在世時，就把他的妻子當作反革命抓起來，這樣會使毛受辱。毛于9月9日午夜過后10分鐘去世，葉劍英做好行動的準備了。[[233]](#_233_Zai_Mao_Mi_Liu_Zhi_Ji__Suo)

#### 逮捕“四人幫”

“四人幫”戰略上的錯誤在于他們未能與“文革”受益者們建立共同的奮斗目標；戰術上的錯誤在于他們在毛死后全都留在北京。林彪曾有過在廣東另建一個中央的計劃，鄧小平下臺后躲到盟友的控制區里，實際上，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都為他們提供了這一教訓：面對強于自己的對手時，應另找一個安全據點。他們沒有吸取這一教訓。

江青及其同黨過于得意忘形了。由于毛的支持，他們扶搖直上，很快地、輕而易舉地攫取了大權；在毛的默許下，他們目空一切，大發淫威。他們每個人都濫用特權——中共曾發動一場革命來消滅的東西。但是，正如米洛萬·吉拉斯所說，特權是官僚獨裁制度的派生物，不可避免。[[234]](#_234_Mi_Luo_Wan__Ji_La_Si____Xin)在一個世紀以前，這些人就可能是宮廷里的一個陰謀集團，利用與皇上的親密關系，高高在上，卻不知圈外的權力現實。

與宮廷陰謀集團不同的是，“四人幫”在上海有相當大的權力基礎，他們本可到上海暫時退避一段時間的。然而相反，他們顯然以為與毛關系密切，是政治局常委，又控制了新聞媒介，這些加在一起足可以使他們具備奪取首都的權力的條件。因此，他們傾全力于奪權目標上。毛剛死，江青在黎明前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對毛的喪事安排并不關心，而急于馬上將鄧小平開除出黨。[[235]](#_235_Xue_Ye_Sheng_Bian____Ye_Jia)

“四人幫”的行動計劃似乎是三管齊下：堅持他們繼承毛思想的權利；控制黨中央；準備武裝對抗。在姚文元的指揮下，各主要新聞機構很快就大肆宣揚據說是毛的臨終囑咐的重要意義：“按既定方針辦。”如果不這樣做，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236]](#_236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顯然，他們的目標就是阻止任何逆轉反鄧運動方向、或（這更可怕了）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努力。

通過新聞界，“四人幫”制造了對他們有利的政治氣氛，影響下層干部對首都力量對比的判斷。[[237]](#_237_Ge_Sheng_Bao_Li_Ji_Kai_Shi)但這并不等于他們已真正接管了權力。毛死后不久，“四人幫”就想方設法維持他們對省級機構的控制。王洪文在中南海設立了自己的值班室，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給各省委下達指示，要求凡有重大問題都要找他。（[[238]](#_238_Zuo_Wei_Zheng_Zhi_Ju_Chang)9月12日起，“四人幫”發起攻勢向政治局施加壓力，要求任命未被定為接班人的江青為毛的接班人。[[239]](#_239___Kang_Sheng_Ping_Chuan)在毛的追悼會上拍下了許多別有用心的照片并公開發行，使人們以為江青就是毛的接班人。[[240]](#_240_La_De_Ni____Zhong_Guo_Gong)

“四人幫”步步緊逼，要求迅速作出決策。9月19日，江青要求政治局常委——這時只有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和張春橋四人——召開緊急會議，她和毛遠新要參加，但不讓葉劍英參加。會上，江提議授權毛遠新整理他伯父的各種文件，目的是要找或者至少要“發現”對江青奪權有利的毛的最后遺囑，最后通過表決決定由中央辦公廳封存毛的所有文件。[[241]](#_241_Jin_Chun_Ming___Wen_Hua_Da)

9月29日，政治局再次開會，江青和張春橋企圖強行討論江青今后擔當的角色問題，他們拒絕了葉劍英和李先念的意見（即毛遠新應當返回遼寧的本職崗位），提出反建議——授權毛遠新為下一次中央全會準備政治報告。[[242]](#_242_Jin_Chun_Ming___Wen_Hua_Da)然而“四人幫”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所以毛遠新只好返回遼寧，領導權的問題暫被擱置了。[[243]](#_243_Xue_Ye_Sheng____Ye_Jian_Yin)

“四人幫”的第三項措施是準備武力對抗。上海民兵（約10萬之眾）都發放了武器，并接到了準備戰斗的命令。與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也建立了秘密聯系。王洪文及其同黨在與下屬們的談話中都充滿了火藥味。[[244]](#_244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10月2日，毛遠新引起一陣恐慌。他命令[（沈陽部隊）——譯者]一個裝甲師開往北京；沈陽軍區司令部打電話向葉劍英報告，葉立即命令該師停止前進，返回原地。[[245]](#_245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盡管“文化大革命”變化萬端，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軍事指揮系統的隸屬關系紋絲不動，“四人幫”及其追隨者根本打不進去。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歷史學家們對“四人幫”搞軍事政變也許有些夸大其詞。無論怎樣異想天開，他們也應該想到以上海的民兵是無法與人民解放軍的大多數相抗衡的。上海可能成為他們最后的堡壘，但絕對成不了延安式的走向勝利的跳板。實際上，江青及其同黨們一直呆在北京，這就給人們一個印象：他們是在自欺欺人，以為即使毛死后，政治也會一如既往，斗爭只能按“文化大革命”的規則繼續進行下去，這些規則總是把他們帶到巔峰的。但是，他們的庇護者死了，而與他們作斗爭的是一批為建立新中國身經百戰的老戰士——這些人革命時就沒有尊重過任何規則，需要時能迅速無情地采取行動。

或遲或早，這樣的行動都將采取，原因就如鄧小平在他南方藏身之地所說的。葉劍英明顯地感覺到，由于華國鋒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他必須擔當一關鍵角色。葉發現華有些猶豫不決。華原打算通過召開中央全會來解決與“四人幫”的爭端，但是看到9月2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對抗，又得到葉的承諾——如果他勇敢地站出來斗爭，葉和其他老同志將支持他——之后，華認識到，通過正常程序來解決問題已不合時宜。[[246]](#_246_Xue_Ye_Sheng____Ye_Jian_Yin)

緊隨著江青與王洪文的挑釁性的講話之后，《光明日報》10月4日發表了一篇意識形態上要堅決斗爭到底的文章，根據一種說法，正是這篇文章最終導致了對“四人幫”采取行動。[[247]](#_247_Wen_Zhang_Shi_You_Liang_Xia)由于“四人幫”要其追隨者們10月9日聽好消息，人們普遍擔心他們正在策劃某種行動。頗為吃驚的葉劍英急忙隱蔽了起來。10月5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在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所在地西山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未叫“四人幫”參加）。會上一致同意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毛遠新及其主要支持者抓起來。汪東興和人民解放軍8341部隊負責具體執行。10月6日逮捕了“四人幫”。當江青在住處被捕時，她身邊的服務員朝她吐口水。“文化大革命”結束了。[[248]](#_248_Dui_Yu__Si_Ren_Bang__Bei_Bu)

## 空位期

毛逝世和“四人幫”被清洗后不久，國家迫切需要的是安寧和穩定。必須重新向黨、軍隊和人民保證：動蕩的年代已經結束，國家正處于堅定而溫和的領導之下。必須使人們有繼往開來這樣一種似乎有些矛盾的信念。

首先要解決的是那個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造成領導層分裂的問題，即：“毛之后，誰接班？”幸存的主要領導人葉劍英和李先念總覺得，僅僅3年時間，死的死，被打倒的被打倒，政治局委員已從十大任命的25人減至16人，再在政治局剩余的成員之間進行新的斗爭是不合時宜的。不論才干如何，華國鋒有合法的外衣，占據他的位置。他是主席選定的，他又在位，并且領導組成了反“四人幫”的陣營。9月7日（原文有誤，應為10月7日——譯者）中央發布了由華國鋒繼承毛擔任黨的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消息。由于華國鋒還保留著總理職位，他就正式成為毛澤東和周恩來二人的接班人。由于身兼這兩個人的職位，他似乎已處于堅不可摧的地位。然而，他將發現，職位固然帶來了威望和特權，但權力卻要有更深的根基。

政治局就新領導人達成一致意見。與此同時，政治局還須摧毀國內激進派的基地。幸運的是，上海竟然是一只紙老虎。由于失去了全國性的領導人，“四人幫”在上海的代理人舉棋不定，竟被一些極易識破的計謀引誘到北京，從而徹底崩潰，絲毫也未能實施他們要戰斗到底的威脅。結果是，只有持續一周的輕微武裝抵抗。政治局派出兩位候補委員蘇振華和倪志福去控制那里的局勢；許世友取代了不可靠的丁盛，臨時擔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以便為政治家們提供必要的軍事支援。[[249]](#_249_Gao_Gao___Yan_Jia_Qi_____We)上海問題解決后，就該由華國鋒來領導全國了。

#### 華國鋒的困境

從一開始，華國鋒的領導就陷于一種無法解決的困境，其標志是毛和周傳給他的遺產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毫無疑問，毛希望“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和成果能夠得到保持。否定“文化大革命”將損害選定華國鋒為接班人的那個人的地位，并在實際上否定那個使華國鋒從相對默默無聞達到今日顯赫名聲的整個時期。華國鋒合法地位的唯一根據是毛的支持，他迅速采取行動以便確保只有他控制著毛的遺產。10月8日，中央宣布《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將在華國鋒的指導下編輯出版。同時決定在天安門廣場建造毛主席紀念堂，這項決定違背了毛和他的同事們一致同意的歷時已27年的準則，即不仿效蘇聯形式，不以修墓和重新給城市和街道命名的做法來表達對領導人的尊敬。[[250]](#_250___Zhong_Gong_Dang_Shi_Da_Sh)華國鋒毫不懷疑毛繼續對自己具有重大意義；他，可能還有他的那些“文革”受益者的同事們，要把毛對這個國家的持久不變的影響力鐫刻入大理石中。

華國鋒的護身符是毛的“你辦事，我放心”這句不時重復的話。然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必須提出一個新口號，來表述毛主席紀念堂的象征意義：毛永遠與我們在一起。與此相適應，華國鋒批準了汪東興提出的似乎為毛澤東思想具體定調的準則，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他們的目的是阻止對毛澤東晚年的行為提出質疑，這有助于眾所周知的“凡是派”成員上臺。[[251]](#_251_Shou_Ci_Pi_Lu_Yu_1977Nian_2)況且，對毛個人崇拜的維護為對華國鋒本人個人崇拜的產生提供了依據和正當的理由，如果這位名氣不大的接班人想在黨和人民中間樹立自己的地位，這種做法是極為需要的。[[252]](#_252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

但是，華國鋒和“凡是派”想披上毛的保護衣這種嘗試已經受到在中國南方的鄧小平的保護人的挑戰。在致華國鋒的一封信中，許世友和韋國清質問，對毛澤東的缺點只是不提是否可取，而這些缺點是人皆共知的；信中說，毛對華國鋒作為接班人的支持缺少合法性，接班人的合法性必須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全會確定；信中明白地暗示，如果毛強加在鄧身上的錯誤定論不撤銷的話，他們將在中央全會上對華國鋒提出挑戰。[[253]](#_253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

華國鋒進行了反擊。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開的、討論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再次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反復提出的“兩個凡是”的準則，堅持認為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聲稱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是正確的。在努力為繼續執行“左”傾政策辯護時，華國鋒甚至譴責“四人幫”是極右分子（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幫”也曾使用過這一策略）。

華國鋒開始受到黨內老同志的責難，著名的老同志有陳云。二十多年前，陳云就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會成立前他也是黨的最高領導層中的一員，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為止。陳云和另一位批評者王震把重點集中在幾個相互聯系的問題上，即天安門事件的評價和第二次恢復鄧小平的名譽和要求。他們宣稱，這是大家的一致要求。華國鋒可能會問，這難道就是葉劍英許諾的老干部對他的支持，作為對他領導反“四人幫”斗爭的回報？無論如何，華國鋒拒絕了陳云和王震的要求，甚至不許把他們的發言打印在會議記錄中。[[254]](#_254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這次工作會議的材料中沒有提到葉劍英或李先念加入了老同志批評華國鋒立場的行列。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感情很復雜。對一名像葉劍英這樣的政治局常委來說，在一大批更年輕的黨的官員面前正式批評這個精英群體中的另一名成員是非同尋常的。更重要的是，葉劍英和李先念覺得華國鋒在一定程度上跟他們是同心同德的，現在，在某種意義上講，華國鋒既是毛澤東也是他們封授的。葉劍英和李先念毫無疑義地支持1975年期間鄧小平所做的一切事情，但在1977年，他們對鄧小平的復出抱著矛盾的心理。如果鄧小平不復出，他們作為政界元老，控制中國的政局，指導華國鋒；如果鄧小平復出的話，他們至少得把部分角色讓與鄧小平。而鄧小平將對他們采取何種態度呢？他會不會覺得他們像周恩來一樣，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生存下去而做了一些他們感到遺憾的事、說了一些他們感到遺憾的話呢？而如果是這樣的話，他會像寬恕死者一樣寬恕生者嗎？

然而，葉劍英和李先念正確地估計了黨和軍隊中感情的力量，意識到，毛澤東逝世后，堅持反對鄧的復出將是困難的。他們大概也知道，鄧小平可能比華國鋒更有能力駕馭“文化大革命”后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是眾望所歸。幾年來“左”傾分子煽動起來的政治混亂、宗派斗爭和無紀律狀態再次對經濟造成損害。罷工、蓄意破壞和鐵路交通再次癱瘓被廣為報道。1976年國民經濟計劃完成情況大大低于預期目標，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唐山大地震的影響。在“文化大革命”最后3年，即1974—1976年期間，各方面的損失估計為：鋼2800萬噸，工業產值1000億元，國家收入400億元。[[255]](#_255_Fang_Wei_Zhong____Zhong_Hua)華國鋒號召實現“大治”，但事實上只有鄧可能實現“大治”。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后，葉劍英和李先念可能忠告過華國鋒，抵制鄧對他來說將是一場嚴重的政治災難。最好的做法是讓鄧保證，他將既往不咎。1977年4月10日，鄧寫信給中央委員會，批評“兩個凡是”，并提出使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隨后，中央辦公廳的兩位“負責同志”來看他，其中一位可能是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試圖在“文革”受益者們即“凡是派”同意鄧小平復出之前與鄧達成一項妥協。鄧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不想與他們妥協，并指出，如果“兩個凡是”是正確的，就不可能名正言順地恢復自己的名譽和為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即使毛澤東本人也從未說過他講過的話都是正確的，馬克思和列寧也沒有。[[256]](#_256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n)

鄧的這封信從未發表過，因此無法確定當時的傳聞，即在這封信或是在以往的通信中，鄧是不是表示過，他愿意擁護華國鋒繼續做黨的領導人。[[257]](#_257_Jia_Sai_De____Huo_Yue_Qi_La)這樣的某種保證似乎是可能的，否則“凡是派”就沒有理由同意讓鄧出來工作。如果鄧做過某種保證，這可能是為什么這封信沒有收在《鄧小平文選》里的原因：這與華國鋒的最終命運形成鮮明的對比。

不管達成了什么樣的諒解，鄧出席了7月16日至2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并恢復了他的一切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副總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華國鋒的職位得到全會正式批準，他還固執地堅持對“兩個凡是”和對“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可見到的鄧講話的文本表明，他重申要完整地看待毛澤東思想，但這一次，他很謹慎，沒有正面抨擊“兩個凡是”。在他下次抨擊之前，他得做好準備。相反，他提倡毛的一句舊口號——“實事求是”，這句口號成了后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政策的精髓。[[258]](#_258__Shi_Shi_Qiu_Shi__Zhe_Ju_Ko)

在這次全會妥協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于8月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一次輪到華國鋒謹慎了，他不再堅持“兩個凡是”，也沒有重申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他清楚地意識到不能批評毛或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則會損害他自己的地位。相反，他以一大段熱情洋溢的頌詞開始，歌頌已故的毛澤東主席，接著重申“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成就、黨的十大（在這次大會上華國鋒被選入政治局）路線的正確性以及堅持階級斗爭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必要性；他還令人寒心地宣稱：“‘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259]](#_259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

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鄧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三號領導人出現，排在華國鋒和葉劍英（他作了關于新的黨章的報告）之后。鄧的簡短閉幕詞是另一篇僅有的、公開發表的講話。他稱華國鋒是“我們英明的領袖”，但沒有仿效華頌揚“文化大革命”。他避開爭論，號召恢復誠實和埋頭苦干、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當然還有實事求是。但他也不得不妥協，表示支持“抓住階級斗爭這個關鍵環節”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現行路線。這些教條后來受到中國黨史學家的斥責。[[260]](#_260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無怪乎鄧沒有把這篇閉幕詞收入他的“文選”中，盡管這是在十一大上作的閉幕詞，而十一大對他和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都很重要。

這次代表大會上產生了新的領導層，“左”傾分子被清洗了出去，但受“左”傾迫害的人并沒有受到特別的照顧。黨的十大中央委員中，有1/3的委員落選，其中75％以上系群眾組織代表。另一類很可能是“左”傾分子的人，新近入黨的也損失慘重，人數減少70％以上。

政治局也是一個妥協，但力量對比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文革”受益者，26名政治局委員中只有6名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趙紫陽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獲得了初步的立腳點，后來他成了鄧小平改革綱領的先鋒。在新的五人政治局常委中，鄧是后來嚴厲批評華國鋒和“凡是派”的唯一成員；華國鋒則得到“凡是派”主要擁護者汪東興的支持；汪東興因反對“四人幫”有功和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8341部隊首腦所擁有的權力而受到人們的重視；華的共同保護人李先念與葉劍英站在一起。[[261]](#_261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

#### 華的“大躍進”

華國鋒曾考慮過“毛之后，怎么辦”的問題。就華的設想而言，它似乎是60年代中期激進主義和50年代中期經濟學的結合，是難以實現的。可以肯定的是，華的雙份遺產中更為人普遍接受的部分是周恩來交托的中國四個現代化。除了最狂熱的“左”傾分子之外，其他所有人都能團結在這個目標周圍。而華國鋒確實設想了一個成功的發展計劃，以便為許多人悶在心里的問題提供答案，這個問題就是：華國鋒有什么權利位居最高職位。“文化大革命”前，他在省里的官僚經歷雖無大瑕疵，卻也平淡尋常；他年紀較輕從而沒有成為紅衛兵打擊的第一批省級官員；當形勢轉變再次需要有經驗的干部時，他又比較走運；當林彪事件在領導層中留下較大的權力真空時，他因有足夠的資歷而被調到北京；當王洪文使毛失望時，他由于有足夠的能力和比較“左”傾而為毛澤東所接受。沒有人能指責華運氣好。但是，當中央還有比他資歷更深和更高明的人可用時，難道是他的經歷使他有足夠的正當理由來領導毛和周之后的中國嗎？在許多中國人眼里可能并不這樣看，因而華需要證明自己的能力。

對華而言，不幸的是，他的承諾超過了中國的實際能力。在1978年2—3月舉行的新的（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華國鋒總理把他宏偉的十年規劃（1976—1985年）公之于眾，這個規劃周恩來在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最后一次報告中預示過。這個十年規劃的目標是，到1985年，鋼產量達到6000萬噸（1977年為2370萬噸），石油產量達到3.5億噸（1977年為9360萬噸）。華國鋒要求在剩下的8年時間里，建設120個大型項目，14個大的重工業基地，基建投資相當于前28年的基建投資總和。這個規劃沒有考慮到60年代的教訓和70年代的經濟損失。[[262]](#_262_Fang_Wei_Zhong____Zhong_Hua)如同本卷第6章中所說，這個規劃未經深思熟慮，缺乏精確的資料。想象中賴以擴大生產的油田原只是個想入非非的計劃。華的“大躍進”規劃嚴重依賴機械進口，外匯開支龐大。華不僅沒有繼承周的火炬，反而模仿毛的狂想。他非但沒有給自己帶來榮譽；反而把中國引向另一場經濟災難。這也會被人用來反對他。

#### 三中全會

鄧小平反擊華國鋒和“凡是派”的方式體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權力的神秘性質。在黨和國家的所有機構中，華是至高無上的領導人，而鄧不是。“凡是派”當權，而鄧的擁護者們并不掌權。然而，在1977年7月的十屆三中全會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間這段較短的時期內，權力關系發生了變化。變化的辦法似乎是通過報刊動員高層人物的輿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用筆名發表的文章（應為特約評論員文章——譯者），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成了擁鄧力量的第二次吶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當時是南京大學哲學系副主任、中共黨員。后來他自稱，1977年秋他把這篇文章送去發表，反對“兩個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動做的，因為他意識到，如果不駁斥“兩個凡是”那樣的教條，鄧就沒有重新掌權的希望。[[263]](#_263_Jian_S_Shi_La_Mu_Cai_Fang_H)這篇文章也許是胡福明自己想寫的，但刊登出來的文章卻以胡耀邦領導下的中央黨校的兩位理論家的意見為基礎進行了大量的修改和深化。[[264]](#_264_Li_Ru__Hu_Fu_Ming_De_Yuan_B)這篇文章抨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而無論是林彪、江青還是華國鋒表述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都認為，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是永遠不變的真理，無論環境怎樣改變，也不應該篡改。

令華和汪東興氣惱的是，這篇文章很快刊登在《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上，成為點燃如火如荼的全國性辯論的火花。[[265]](#_265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6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鄧自己也參加了辯論，當時他再次聲稱需要“實事求是”。[[266]](#_266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n)鄧機敏地運用毛著作中的引文，證明這個原則并不意味著反對毛，恰恰相反，它要恢復主席本人最優秀的傳統和實踐。[[267]](#_267_S_Shi_La_Mu___Jing_Ji_Gua_S)鄧并以夸張的辭藻得出結論：

同志們請想一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這是不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呢？這種根本觀點有沒有過時，會不會過時呢？如果反對實事求是，反對從實際出發，反對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那還說得上什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呢？那會把我們引導到什么方法去呢？很明顯，那只能引導到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只能引導到工作的損失和革命的失敗。[[268]](#_268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n)

在這個階段，這場斗爭遠非贏定了的。在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初期，華國鋒和葉劍英都發表過講話，但兩人都沒有贊揚鄧的真理旗幟。[[269]](#_269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6月24日，《解放軍報》發表擁護鄧的文章，《人民日報》馬上轉載。這篇文章是在羅瑞卿的指導下準備的。[[270]](#_270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羅瑞卿被免去總參謀長職務，但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重返中央委員會；如果在高層人物中都知道這篇文章的作者是羅瑞卿，那無疑會使許多高級官員投到鄧的一邊。確實，從這時起，辯論熱烈起來，到9月中旬鄧小平在東北的一次講話中恢復了對“兩個凡是”的攻擊[[271]](#_271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n)（而在6月份當華和葉劍英在場時，鄧避而未談這些事）。其時10個省已開會表示支持鄧的立場。[[272]](#_272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也許使“凡是派”氣餒的是，典型的“文革”中幸存者李先念已暗示，他準備拋棄華，支持新的路線。到11月，所有省和大軍區的領導人都倒向鄧一邊。也就在這個時候，最初由鄧于兩個多月前提議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于11月10日在北京舉行。[[273]](#_273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

這次會議的主要議程是如何恢復農業和制訂1980年經濟計劃。但是陳云再次帶頭，很快把會議轉變成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全面辯論。他要求公正地恢復薄一波的名譽（他的革命經歷已被玷污）；為已于1966年底倒臺的陶鑄恢復名譽；為于1959年被免職、并在60年代后期受到公開批判的彭德懷恢復名譽，以及應該承認康生所犯的嚴重錯誤。但是，對“凡是派”而言，陳云具有挑釁性的建議是他堅持天安門事件的積極性質應予以肯定。[[274]](#_274___Chen_Yun_Wen_Xuan_____195)

陳云的發言引發了一陣擁護性發言，著名的有譚震林，他要求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系列事件。[[275]](#_275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華顯然已預見到這次沖擊的發生，并很快使自己適應了這種情況。11月15日，宣布北京市委重新確定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次日，華親自為首次正式批準發行的《天安門詩抄》一書題詞。對南京、杭州和鄭州的類似事件也早已作了重新評價。[[276]](#_276_Jia_Sai_De____Huo_Yue_Qi_La)隨著“凡是派”立場的退讓，就不必奇怪他們也準備同意恢復“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譽了，大多數受害者的命運并不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

對華和“凡是派”來說，更危險的挫折發生在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這次全會的目的是使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成果正式化。在全會上，一批“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入選政治局，他們人數之多足以使領導層中的人數對比對鄧小平有利。陳云官復原職，任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并成為一個新機構即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第一書記，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清洗黨內的“文化大革命”“左”傾分子。[[277]](#_277_Deng_Xiao_Ping_Zai_Zhe_Ci_Q)其他三位鄧的擁護者胡耀邦、王震和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也被選人政治局。另外，9名資歷較深的受害者當選為中央委員。在12月25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重新設立處于萌芽狀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由胡耀邦任秘書長；同時免去汪東興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辦公廳具有書記處的職能。[[278]](#_278_Guan_Yu_Zhe_Ci_Zhong_Yang_G)汪東興和“凡是派”的其他成員仍保留其在政治局的職位，但對他們而言，這次全會是不祥之兆。

由于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央全會代表的路線明確拋棄“左”傾主義及其變種，“凡是派”的困境更加突出了。“兩個凡是”被否定了。階級斗爭不再是“綱”，四個現代化處于優先位置。“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被丟棄。鄧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發言中指出，全面評價“文化大革命”和毛本人的時機還未成熟。[[279]](#_279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n)但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政策標志著中國過去十年的政策有了根本的變化。

首先，十一屆三中全會采取措施，不再執行華國鋒頑固堅持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如同上文已指出的，在有關農村社會主義問題上，華與“四人幫”只存在步調上的分歧，而沒有目標上的差異。甚至在“四人幫”被清洗后，華國鋒仍堅持平均主義，如提倡生產大隊核算、限制自留地和農村集市貿易。到1978年年中，華地位削弱，[[280]](#_280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這些政策開始受到責難。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華國鋒的綱領和大寨模式。為了調動中國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三中全會恢復了60年代初期的政策，并搭起一個框架，作為中國農村徹底重建的開端：

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人民公社各級組織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281]](#_281_Yin_Zi__Mei_Ji_Da_Shi_He_We)

甚至在工業領域，華的綱領也沒有得到批準。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十年規劃沒有被提到。相反，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的影響再次明顯可見，三中全會要求更平衡和更穩定的增長，而不是華所主張的大規模投資重工業。[[282]](#_282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華在6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度會議上作報告時不得不宣布，三中全會以來國務院重新研究決定在1979—1981年期間對經濟進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而不再追求他一年前所贊成的頭腦發熱的速度。[[283]](#_283__Mei_Ji_Da_Shi_He_Wen_Xian)

#### 民主墻

華國鋒和“凡是派”在三中全會上的失敗主要是鄧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即那些一直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干部和軍官組成的“沉默的多數”）成功動員的產物。但這次工作會議和全會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首都出現了公眾對鄧路線強有力的支持，對天安門事件影響仍記憶猶新的領導層不能不受此形勢影響。

“天安門事件”表明，在50年代初期就受到灌輸的國家紀律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受到多大程度的削弱。毛曾宣稱，“造反有理”。1976年4月5日，首都成千上萬人起來造反了，反對毛為他死后選定的政治領導人和經濟、社會綱領。70年代中期，中國各地發生了罷工、怠工和純粹的流氓行為。這表明，不只是政治上已經覺醒的首都居民才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權威已受到嚴重削弱。

毛的逝世以及那些希望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人的逐步崛起，在首都又激起了一場支持這一進程的新的群眾活動。“天安門事件”是公眾為鄧和他所堅持的路線平反而進行斗爭的第一幕。其后插演的幕間節目是吳德市長下臺。吳德對鎮壓天安門抗議者負有重要責任，在經受了歷時18個月的報界隱蔽抨擊和大標語公開攻擊之后，吳德終于在1978年10月被撤職。[[284]](#_284_Jia_Sai_De____Huo_Yue_Qi_La)民主墻算是第二幕，但這一次由于鄧本人的反對，帷幕提前落下了。

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一個星期后，第一張大字報出現在長安大街（經過天安門，離廣場不遠的一條寬闊大街）的一堵墻上。[[285]](#_285_Yi_Xia_Dui_Min_Zhu_Qiang_De)這張由一名技工張貼的大字報，點名批評毛支持“四人幫”解除鄧小平的職務。早些時候另一張大字報稱鄧為“活著的周恩來”，并譴責當局對天安門事件的處理。第三張攻擊“一小撮高層人物”（顯然是指“凡是派”）阻礙對這一事件的所謂反革命性質的重新評價。

支持鄧、反對“凡是派”、批評毛成了許多大字報的主題。它們肯定使鄧和他在工作會議中的支持者有一種滿足感：即在此關鍵時刻他們獲得了民眾的支持。但這些寫大字報的人并沒有就此罷休。不久他們就發行小冊子、報紙和雜志；或成立討論組，“如人權同盟”和“啟蒙社”。在第一張大字報貼出的一個星期內，人們不再僅僅滿足于閱讀民主墻上的大字報，而且積極地爭論問題，甚至與外國人一起討論。11月26日，美國報業辛迪加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帶著人們給他提供的問題，準備第二天采訪鄧小平。27日晚，諾瓦克的同事，多倫多《環球和郵政報》駐北京記者約翰·弗雷澤向聽眾們發布了這樣一則消息：鄧已告訴諾瓦克，民主墻是件好事，“大混亂爆發了”。但是當激動的聽眾聽到鄧說，民主墻上所寫的東西并不都正確時，他們又冷靜下來了。[[286]](#_286_Fu_Lei_Ze____Zhong_Guo_Ren)鄧看到接著要發生的事情了。

民主墻是一種比“天安門事件”更為深刻的現象。后者是對毛和“四人幫”的憤怒的短暫爆發；大多數詩詞是悼念周恩來或譴責江青的。而在民主墻，中國的年輕人（主要是受過初中或高中教育的藍領階層）[[287]](#_287_Zhe_Shi_Dui_Yi_Wei_Zhong_Gu)對廣泛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進行探討。盡管他們經常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天真，但他們明顯地對中國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民主——的可能性極為熱心：

五屆人大開紅花，

起草人民新憲法。

八億人民齊歡唱，

同心建設新國家。

先烈鮮血沒白流，

換來今日新憲法。

保衛民主和民權，

促進四個現代化。[[288]](#_288_Li_Hong_Kuan__Yin_____Xian)

鄧小平接受諾瓦克采訪時的談話表明，鄧對這場民主運動的最初反應大體上是肯定的。就在那次采訪的前一天，鄧曾告訴一位日本領導人：“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評群眾發揚民主……群眾就要讓他們出氣！”[[289]](#_289_Jia_Sai_De____Huo_Yue_Qi_La)不幸的是，關于這場運動，鄧小平很快覺察到民主與四個現代化之間的矛盾。而且，不管他最早的反應如何，他發現民主墻在他當時的政治斗爭中與其說是一種有利條件，不如說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這種矛盾在于，政治大辯論可能失控并削弱安定團結（他說過，安定團結對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他肯定記得，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年輕人大串聯的時候，中國的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亂，中國的經濟遭受了10年中最嚴重的挫折。問題的棘手之處在于，由老干部和人民解放軍高級軍官構成的“沉默的多數”（鄧在與“凡是派”的斗爭中主要依靠他們的支持）對于對他們的權威和地位的新威脅感到不安。他們不愿看到推翻“四人幫”之后“文化大革命”又以某種新形式出現。

鄧于1月28日至2月4日訪美。由于擔心引起不利的輿論宣傳，鄧在訪美之前沒有采取任何措施。盡管鄧在國外取得了勝利，但是由于解放軍在2月中旬至3月中旬的中越邊境戰爭（鄧十分重視的一件事）中沒能給越南一次令人信服的軍事教訓，鄧在此后的地位也許暫時被削弱了。有報道說，在3月中旬，鄧還告訴他的高級同僚，鎮壓民主運動可能會導致不良后果：可以鎮壓反革命，也可以限制陰謀破壞活動，但回到壓制不同觀點和不愿聽取批評的老路上去，將會失去群眾的信任和支持。[[290]](#_290_Yin_Zi_Jia_Sai_De___Huo_Yue)但他同意服從多數意見，并于3月底宣布四個現代化要求國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291]](#_291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n)鄧在闡述提出這些標準的必要性時所作所為的講話令人想起了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時毛的所作所為。鄧說：

有些壞分子……提出種種在目前不可能實現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動誘騙一部分群眾沖擊黨政機關，占領辦公室，實行靜坐絕食，阻斷交通，嚴重破壞工作秩序，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

不但如此，他們還聳人聽聞地提出什么“反饑餓”、“要人權”等口號，在這些口號煽動下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謀讓外國人把他們的言論行動拿到世界上去廣為宣傳。有個所謂“中國人權小組”，居然貼出大字報，要求美國總統“關懷”中國的人權。這種公然要求外國人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是我們能夠允許的嗎？[[292]](#_292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n)

《探索》雜志的編輯、民主運動中的活躍人物魏京生指責鄧拋棄了“民主保護者的面具”。3天之后，北京當局頒布條例限制民主運動，第二天，魏被捕。在1979年10月的審判中，他被判處15年徒刑。[[293]](#_293_Jia_Sai_De____Huo_Yue_Qi_La)1980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同年2月中央全會的決議對憲法中保障公民言論自由和集會權利的條款作了修改，刪去了毛提倡的進行大辯論和貼大字報的權利。[[294]](#_294__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此時，民主運動已告結束。

#### 華國鋒下臺

中國黨史專家正確評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認為它是1949年以后這個歷史時期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如果華國鋒有足夠的機智或靈敏的話，他本來可以與那些在民主運動問題上反對鄧小平的老干部形成共同的事業。也許正是擔心真會這樣，鄧才如此迅速地改變了策略。但事實上，華和“凡是派”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不能自拔，因此即使有這種聯盟，也不過是短暫的成功。

結果，華孤立無援，眼巴巴看著一個反“凡是派”聯盟在最高領導層中形成了。在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召開的四中全會上，趙紫陽被提拔為政治局委員。前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他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繼鄧小平和劉少奇之后職位最高的受害者）也回到了政治局。另有11名杰出的老干部重新進入中央委員會。

在1980年3月23日至29日召開的五中全會上，鄧實現了更大的突破。華在“凡是派”中的支持者——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即“小四人幫”）被免去一切黨政職務。來自大寨的模范農民領袖陳永貴（他被認為無能但沒有惡意）被免去政治局委員職務。胡耀邦和趙紫陽被提升為政治局常委。胡是鄧的忠實追隨者，他在50年代一直擔任共青團書記。現在他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自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撤職后，這一職位一直空缺。新建立的書記處幾乎由清一色的鄧的支持者組成。最后會議同意，對“文化大革命”中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所有指控都是錯誤的，應為他平反。[[295]](#_295_Zi_Liao_Zu____Zhong_Guo_Gon)

鄧的下一個步驟是要消除“凡是派”在國務院的影響。根據五中全會的決議，1980年4月，副總理陳錫聯和紀登奎被撤職。但是要免除華國鋒的總理職務則較困難。鄧主張黨政分開，并建議除華之外，一大批老干部（包括他自己）辭去副總理職務，這樣也可使國務院成員年輕化。盡管鄧要消除兩個機構重疊的愿望是真誠的，但這一策略本來就騙不了人，更不用說華了。華本來可以利用其軍委主席的職位去尋求軍隊的支持；但一則關于華在1980年5月的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的簡報表明，他原來可能希望在共同堅持毛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形成忠誠的紐帶。[[296]](#_296_Hua_Qiang_Diao_Dao_De_Jia_Z)但是即使軍隊將領們開始對鄧的某些政策感到不安，他們也不可能選華作為他們的領頭人。

在8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每年召開的人大會議因此推遲到月底召開）之后，高層領導同意由趙紫陽來接替華的總理職務。鄧小平、李先念、陳云和其他三位老干部適時地辭去了副總理職務，陳永貴也被免去了副總理職務。[[297]](#_297_Deng_Yu_Qi_Ta_Wu_Wei_Lao_Ga)新任命了三名副總理，其中包括外交部長黃華。至此，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受益者都被清除出國務院，國務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天下。[[298]](#_298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

下一階段就是敗壞華的聲譽和撤除其保留的職位。在11月至12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在一大批高級干部的請求下，華的履歷受到了無情的審查。會議肯定了華國鋒在幫助粉碎“四人幫”的斗爭中所立下的功勞，但指責他在一系列原則問題上沒有糾正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甚至他在表面上已糾正的錯誤也再次被指了出來。

華一直堅持使用“文化大革命”的口號；他未曾主動去修補“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繼續發動反鄧運動，拒絕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為此，他再次受到攻擊。他對匆匆作出建立毛主席紀念堂和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決定負有責任（這兩件事可能得到葉劍英和李先念的同意）。他因阻礙對“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進行平反而受到指責。在對待毛問題的態度上和在支持“兩個凡是”中，他一直是“固執己見”。他對前兩年經濟上的盲進及其造成的嚴重損失負有很大責任。[[299]](#_299_Hao_Meng_Bi___Duan_Hao_Ran)總之，這次會議認為華“缺乏黨的主席所應具備的政治和組織才能。人人都知道，他本不該擔任軍委主席”。[[300]](#_300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

華信譽掃地，顏面無存，請求免去他所有的職務。但考慮到禮儀的需要，或許為了給葉劍英留點面子，[[301]](#_301_Zheng_Ru_Wo_Yi_Zhi_Chu_De)華沒有受到致命的一擊。在中共六中全會作出正式決議之前，他不會被免除黨的主席和軍委主席的職務。然而，盡管到1981年6月底，他還一直保留著他的頭銜（1981年6月底以后，他被降為黨的副主席），但他的職位卻立即由別人取代了：胡耀邦任黨的主席，鄧小平任軍委主席——大家都認為他早該擔任軍委主席了！

最后，由于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延期召開，[[302]](#_302_Duo_Mu_Si_Zhi_Chu__1980Nian)華保留其中國高級領導層中名義成員身份的時間比原計劃延長了約18個月。但在1982年9月，華國鋒被降為中央委員。他從前的合作者汪東興降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最后一名。華的時期正式結束。

## 鄧小平的綱領

#### 毛之后，誰接班？

1978年12月召開的三中全會清楚地表明，無論華國鋒的頭銜多么耀眼，他只是一位臨時繼承人，毛的真正繼承人將是鄧小平。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鄧的最終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本人的行為造成的。假如在周生病時毛不把鄧召回，那么在總理缺位時，鄧也不會成為統治中國的一位顯要人物。假如在周死后毛不再將鄧打倒，那么鄧也不會成為替代“文化大革命”的新政治秩序的象征。當然，由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組成的“三駕馬車”本來可能具有更強的優勢，從而使那些憤怒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不得翻身。

鄧獲得權勢的令人注目的特點在于，從一開始，他就避免對他的權力進行有名無實的肯定。在葉劍英不再當毛死后的權力經紀人后很久，鄧仍堅持在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上位居葉劍英之下。[[303]](#_303_Ye_Zai_Gei_Liu_Zhong_Quan_H)沒有跡象表明，鄧在任何時候想過要攫取黨的主席、總書記或總理職務。相反，他卻迅速地把他預期的接班人聚集在他的身邊，給他們職位和職責，以便使他們能獲得經驗和尊敬。這是毛曾提到過但從未付諸實施的一種接班人培養方法。

鄧自我克制的主要原因是他決心避免給人以他想扮演毛一樣的角色的印象。的確，為了防止任何人企圖繼承毛的地位，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取消了黨的主席一職。另外一個預防措施就是企盼已久的對毛的重新評價，其目的是通過冷靜地估價毛的功與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功與過，使毛那種神一般的形象非神秘化。中共在對待毛的問題上比蘇共對待斯大林問題顯得更有勇氣。據報道，1956年赫魯曉夫在作揭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時，有人指責赫魯曉夫也是個同謀犯，并大聲叫喊：“同志，當所有這一切發生時，你在哪里？”而當毛的過錯最終被羅列起來時，鄧作為一個受害者，沒有理由害怕發生這樣的問題。

然而，比起1/4世紀以前的赫魯曉夫，鄧更有理由謹慎從事。無論中國人可能認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多么偏激，赫魯曉夫一直認為蘇共還有尚未受到玷污的列寧的形象可資利用。對于中共，毛既是列寧又是斯大林。如果不謹慎處理對毛的評價，兩個形象均可能受到損害，這對黨的合法性將造成無可估量的影響。

此外，即使在指責“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中間，也有許多人想使毛得到保護，使毛的一些行動得到肯定。特別是人民解放軍的將領們不想過分地譴責這個曾領導他們走向勝利的人，也不愿過分譴責他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一個策略就是盡可能多地譴責林彪和“四人幫”。從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中國當局對還活著的“文化大革命”的領袖們進行了一次紐倫堡式的審判。

這次審判公開了許多他們所犯罪行的證據。據估計，差不多有73萬人受到誣陷和迫害，其中，近3.5萬人被“迫害致死”。大多數被告溫順地承認了他們的罪行，并與法庭進行了合作。而張春橋在整個審判過程中保持沉默；江青則聲嘶力竭為自己進行了辯護，反復聲稱她只做了毛要她做的事。[[304]](#_304___Zhong_Guo_Li_Shi_Shang_De)

這個審判是一種有效的手段，它使那些受害者看到迫害他們的人已蒙受恥辱和懲罰，甚至使某些人能夠在公開場合譴責他們。但是，江青的證詞說明毛是罪魁禍首，黨將不得不尋找某些手段與這一事實達成妥協，以避開對他們進行追根究底的譴責，因為追根究底對幸存者也極為不利。最初曾有跡象表明，毛將被指控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犯了罪”，但后來并未成為事實。那個時期人民解放軍的行為受到了肯定。鄧是不會讓坐在輪椅里空想的歷史學家損害他在人民解放軍中的支持者的。[[305]](#_305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

因此，鄧在對《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人員的初次講話中，就堅持認為最核心的第一條是：

……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306]](#_306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n)

3個月后，當鄧發現剛起草的決議草稿在這一問題上講得不夠充分時，他說：“不行，要重新來。”整個文件的調子“太沉悶”；“單單講毛澤東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307]](#_307_Tong_Shang_Shu__Di_282__283)在此后的意見中，他強調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對毛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鄧在此暗示人民解放軍也可能通不過。[[308]](#_308_Deng_Zai_Zhe_Li_Zhi_De_Shi)

成千的官員和歷史學家進行了一年多的討論之后，這一決議于1981年7月1日在中共六中全會上被通過——此時正值中國共產黨建立60周年。它直言不諱地將“文化大革命”歸咎于毛：“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309]](#_309___Guan_Yu_Jian_Guo_Yi_Lai_D)在分析了這一時期的所有罪行和錯誤后，決議補上了鄧堅持要加的東西。它指出，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左”傾錯誤終究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在他的晚年混淆了是非，錯誤地認為他的“左”傾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310]](#_310_Jiang_Mao_Miao_Shu_Cheng_Yi)雖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因保護過一些干部，批斗過林彪、揭露過江青，并執行了一項成功的外交政策而受到了表揚。[[311]](#_311___Guan_Yu_Jian_Guo_Yi_Lai_D)決議最后指出，雖然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312]](#_312___Guan_Yu_Jian_Guo_Yi_Lai_D)

在解釋毛為什么犯錯誤時，決議取得了鄧所想要的平衡。隨著毛的威望的提高，他逐漸驕傲起來并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他的同事沒有采取防范行動，結果黨的集體領導被削弱了。沒有把黨內民主加以制度化；制定的法律缺乏應有的權威。斯大林主義的領導模式和中國長期的“封建專制主義”都有它們的影響。[[313]](#_313_Tong_Shang_Shu__Di_48__49Ye)對毛的評價聽起來是正確的，但是在解釋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領導的制度下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或使法律受到尊重這一問題上，鄧的決議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比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好多少。

如果鄧不想放棄他曾協助創建的這一制度，他本人將盡力從毛的領導中吸取反面教訓。然而，雖然他放棄了毛的頭銜和個人崇拜，但他仍沒有處理好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傾向。鄧曾教訓華，職位并不能帶來權力或權威。現在他本人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推論：簡單地放棄頭銜并不能推掉權力和權威，而黨的決議也不能驅除帝王的傳統。盡管他堅決地聲明，他每年只參與一兩次關鍵決策，但沒有人相信他的話。盡管他已放棄了日常的行政工作，但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把他看作最后的決策者。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代際問題。在斯大林以后的俄國，只有幸存者和受益者仍活著。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毛以后的中國，許多毛的受害者（他們也參加了長征）仍還活著。[[314]](#_314_Ru_Guo_Bu_Ha_Lin_Bei_Yun_Xu)他們重新上臺，沒有因毛的錯誤而受到玷污，反而由于他們的革命成就而受到表彰。鄧可以說他有權利接班，是合法的。像胡耀邦和趙紫陽（鄧選他們為他的接班人）這樣的人就不可能獲得鄧那樣的合法性了。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關系問題。鄧在黨和軍隊里有一張由朋友、同事、熟人組成的關系網。這些人對于鄧成功地推行政策至關重要，胡耀邦，在較小程度上，還有趙紫陽也都有他們自己的關系網，但他們在權力和威望方面還不足以成為統治中國的人的盟友。

在某種程度上，這還是個已經浮出水面的派系斗爭的問題。在毛逝世后初期，這些重掌權力的受害者一致認為當時的緊迫任務是撤掉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并摒棄那個時代的政策。在這一任務將要完成時，原先的聯盟在下一步該如何走的問題上開始分裂。以重新復職的兩位德高望重的“文革”受害者陳云和彭真為例，鄧并不總是同他們有一致的看法。假如鄧能退休，他的同伙也都退休，讓胡和趙去應付他們自己的那一代人，那么接班問題本可以比較容易解決。但由于鄧的老戰友們不愿離開政治舞臺，鄧只得繼續留下以防他們利用老資格干擾他的傳人。

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個才干問題。鄧小平無疑是出類拔萃的領袖，即使在老一輩革命者中，也是如此。但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沒能證明自己是同樣杰出的繼承人。

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反映了一個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誰將統治中國，共產黨還是人民解放軍？

#### 毛之后，哪一派統治？

1980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在總結華的缺點時，更多考慮的是他作為軍委主席的權力，考慮他領導中共的權利則少之又少。然而，在一個黨指揮槍的國家里，黨選出的任何領袖本應自然地受到將領們的尊重。顯然這并不符合華的情況。1976年華成為軍委主席，據推測，這是因為當時那位當然的候選人葉劍英元帥堅持這樣做，并站在華一邊，授予他權威。當鄧在1977年年中作為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重新掌權時，這些將領們可能更不理睬華了。當鄧1980年下半年出任軍委主席時，他們的世界似乎重新走上正確的軌道了。

鄧也許已感到他除了擔任毛的頭銜中的這一頭銜之外別無選擇，但他這樣做引起的問題與解決的問題一樣多。它使軍隊將領們認為他們有權只受國家中具有最高權威的人指揮，他們不受各級官僚的干預而與最高層有著直線聯系；雖然國防部長對總理負責，總理又對黨負責，但這些都無關緊要，因為所有的大事都在軍委討論解決。因此它證實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人民解放軍是一個分離的機構，只是何時需讓將領們步調一致而已。

鄧的目標是要恢復軍隊的紀律，結束軍隊不愿服從命令和執行中央制定的政策的狀況。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在1975年就提出了這些問題，但他現在承認這些問題尚未解決。[[315]](#_315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n)他有理由認為只有他才能管好軍隊。從他遇到的困難來看，也許他是正確的。這些問題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機制上的問題。

1980年5月對劉少奇的平反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這一舉動動搖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主要理由，因此也是對毛的直接否定。軍隊將領一直要求維護毛的聲譽。葉劍英和許世友（許在1976年曾保護過鄧）沒有出席為劉少奇平反的追悼會，以示不滿。[[316]](#_316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1980年底和1981年初兩次大幅度地削減軍事預算也激怒了這些將領。人民解放軍內發動了一場思想教育運動，部分原因可能是為克服上述問題。但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這些將領要想反對由鄧和那些改革者所竭力倡導的更寬松的政治氣氛，因為這種寬松的氣氛侵犯了軍隊的特權。部隊作家白樺挨批，就是殺雞敬猴，是給所有持批判態度的知識分子看的。

面對人民解放軍明顯的憤怒，鄧決定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刪掉批評人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論述。但這并沒有平息將領們的不滿情緒。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前夕，《解放軍報》發表文章，攻擊“理論界、文藝界、新聞界的個別負責同志”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鄧對這種公然違反軍紀政紀的行為迅速作出了反應。十二大閉幕后不久，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韋在1976年也曾保護過鄧）和海軍司令員二人都被解職了。[[317]](#_317_Duo_Mu_Si____Zhong_Hua_Ren)

鄧顯然認識到人民解放軍與中共之間的關系中存在的機制問題。他試圖解決但沒有成功。在1982年底召開的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上通過的新的國家憲法中，包括一項重要的制度改革：建立中央軍事委員會，該委員會對人大常委會負責并指導人民解放軍。根據彭真在全國人大的講話中所作的解釋，“在國家的中央軍委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并不會改變。《序言》里明確肯定了黨在國家生活中的領導作用，當然也包括黨對軍隊的領導”。[[318]](#_318___Di_Wu_Jie_Quan_Guo_Ren_Mi)彭真沒有明確指出的是，《序言》中沒有談到作為領導機構的黨的軍事委員會。那么，黨的軍事委員會與這一新機構是什么關系呢？

黨的雜志上曾發表一篇文章，對要發生的事提供了重要的暗示。這篇文章詳細介紹了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歷史，指出某些時期它是黨的機構，而在另外一些時期它則是國家的機構。兩種形式的軍事委員會都是合法的。在談到成立這一新的國家機構時，作者斷言，軍事委員會將作為黨的機構繼續存在。然而，其含意是：斷絕中共與人民解放軍的直接聯系，并像在其他大多數國家一樣，使人民解放軍只成為國家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時候已經到了。人民解放軍的歷史說明，這是經常發生的正常的慣例，因此沒有什么可擔心的。[[319]](#_319_Yan_Jing_Tang___Zhong_Yang)為了獲得雙重保證，鄧除了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外，也擔任人大軍事委員會主席，從而使這一新機構獲得了合法性。

如果鄧的目標是為取消中央軍事委員會打下基礎，那么他并未取得成功。這個新的委員會提高了人民解放軍在國家機構中的地位，使軍隊不再隸屬于國務院的一個部，而隸屬于全國人大的一個委員會。但是似乎沒有任何將領準備把它當作軍事委員會的替代物加以接受。相反，正當鄧和他的同事們力圖全面削減行政開支時，國家卻存在著兩個相同的軍事委員會，——兩者都由鄧小平和楊尚昆（作為常務副主席）領導。

甚至當鄧在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最終決定率所有的老同志從政治局退下來的時候，他仍不能辭掉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黨章規定，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是政治局常委，因此鄧贊同修改黨章，以便讓他繼續留任。[[320]](#_320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鄧讓新上任的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擔任軍事委員會的第一副主席，這意味著中央軍事委員會仍將被保留下來，而新的國家軍事委員會則形同虛設。

中央軍事委員會最近的歷史證實了這幾年以來人民解放軍已牢固地保持了它在中共機構中的地位。在鄧的領導下，文職人員將逐漸控制人民解放軍，特別是在1985年9月舉行的幾次主要的中央會議期間，他巧妙地安排幾乎所有將領退出政治局并果斷地減少人民解放軍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之后。但是軍事委員會問題表明，文職人員對軍隊的控制仍要按照人民解放軍提出的條件實施：即必須通過中央軍事委員會，而中央軍事委員會必須由鄧來領導，時間越長越好。也許只有當那些參加過革命的將領們由于退休和死亡退出人民解放軍，并且長征成為一段歷史而不是一種記憶時，鄧以后的一代中共領導人才能取得對軍隊的領導權，并使它在國家體系中起著常規作用。到那時，可以認為，人民解放軍——在革命期間它是奪取勝利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它是權力的來源[[321]](#_321_Zai_Tao_Lun___Guan_Yu_Jian)——仍將是國家政治中的一個主要因素。如上所述，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影響會起什么作用，將取決于中共的綱領和政策。

#### 毛之后，怎么辦？

人民解放軍將領們的保守主義是鄧小平在振興中國的運動中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因素，因為鄧的改革綱領不僅向“文化大革命”中毛主義的極“左”路線提出了挑戰，而且向毛和他的同事們在50年代照搬蘇聯模式時所奉行的所謂“中國化的斯大林”路線提出了挑戰。不僅如此，改革還放松了中央的控制并允許更多的思想和行動自由。但這種寬容對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動亂后維護法律和秩序的人們來說，是不受歡迎的。

本書第6章詳細論述了經濟改革及其影響。[[322]](#_322_Guan_Yu_Zao_Qi_Nong_Cun_Gai)鄧廢除了1958年“大躍進”期間建立的公社制度，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以來第一次將生產的主動權交還給農民家庭。政府也許會聲稱沒有進行任何意識形態的變革，因為土地名義上仍由集體所有，它只是承包給了農民。農民能自由選擇種植方式，自由雇用勞力幫忙，在農村自由市場上自由出售部分產品。[[323]](#_323_Can_Jian_Te_Li__Xi_Ke_Le)但農民也許擔心他們新獲得的這些自由可能因為政策再來個180度的變化而被突然奪走。但事實上，私人耕作已得到恢復，甚至在那些農民不愿喪失集體農業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如此。[[324]](#_324_Ha_Te_Fu_De_Ti_Chu__Bing_Bu)

正如第6章所說，農民的第二次解放，由于國家提高了收購價格而得到了支持，它對生產和農民收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政治含意也是極為重要的。由于8億農民中大多數已與鄧的改革綱領有很大的利害關系，所以當保守思想之風從北京冷冷地刮來時，他們就要發抖。但是，甚至像陳云那樣的中國新保守派領導人也曾支持60年代初期所進行的短暫的農業責任制試驗。很明顯，沒有一個北京政界人物對這場農村新政提出挑戰——除非它的經濟合理性大大變弱，或它對農村和地區平等的消極影響引起階級斗爭的嚴重危險。

農村干部起初對他們的新任務和被削弱的控制權深感不快。[[325]](#_325_Can_Jian_Li_Cha_De__J_Lai_S)但是當他們開始利用他們的政治手腕和關系網來維護他們的地位，并通過充當經濟人角色來增加其收入時，他們開始認識到這種新政對他們也是有利的。[[326]](#_326_Zhe_Yi_Ping_Lun_Shi_Gen_Ju)從長遠的角度看，這場改革對共產黨意義重大，相形之下老年干部對這場改革的不信任就無足輕重了。充滿活力的富裕農民（往往是從前的干部）被捧為模范，并被吸收為黨員。有時，這種情況引起了人們的嫉妒。[[327]](#_327_Guan_Yu_Jin_Xing_De_Yi_Ci_T)但是只要這種發展黨員的政策不變，那么共產黨將由一個貧窮農民黨轉變為一個富裕農民黨。這對階級態度和意識形態將具有相當大的意義。中共“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氣質必定會摻進“致富光榮”的成分。幾乎可以肯定，這反過來又將使中共繼續避開階級斗爭，把經濟發展當作它的主要目標。

正如德懷特·珀金斯所指出的，工業改組和市場改革的復雜性給鄧小平和他的同事們帶來了更為重大的問題。這不像非集體化那樣，采取一個單一的步驟就能取得不可否認的經濟突破。相反，城市改革會給許多人造成損失：由于更大的自主權讓給了國營企業的經理，官員們喪失了權力；國營企業的經理羨慕“集體”和私營公司享有更大的自由；國營企業中的工人在追求效益的改革中懼怕工作艱苦，就業沒保障；他們甚至羨慕非國營企業的工人和鄉村農民收入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包括知識分子和學生）因改革引起物價上漲而受到損害。

可以隱約看到的改革綱領對中共的正統觀念也有一種根本的威脅。黨員干部被告知要“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們必須接受教育，獲取知識，以便迎接新時代的到來。中共黨內“紅”（政治熱情）與“專”（專業技術）兩者之間長期存在的緊張關系，過去往往偏重于“紅”，而現在則似乎已偏重于“專”了。

這對大約50％的黨員干部是個潛在打擊。因為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入黨的，主要擅長于政治煽動。但這也給共產黨自身的作用打上了一個問號。像蘇共和其他黨一樣，中共關于其先鋒作用的主張，深深植根于它的意識形態。即中共由于掌握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永遠正確的意識形態，因此，能夠有把握地理解現在，計劃將來，而這一點是非馬克思主義者難以做到的。但是，如果現在要從實踐或事實中尋求真理的話，那么意識形態有什么作用呢？

意識形態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夸張和賦予毛澤東思想的那種幾乎超越自然的力量而被大大地貶值了。[[328]](#_328_Can_Jian_Qiao_Zhi__E_Ben_Bi)重新強調實踐對它是一個嚴重打擊。鄧小平宣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是不容置疑的。但這并沒能解決問題。[[329]](#_329_Can_Jian__Jian_Chi_Si_Xiang)雖然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但現在似乎只有以它的能力和成功來證明它是合理的，而且由于毛之后的中國面臨著不少問題，它的基礎是不穩定的。極權主義意識態說它能夠解釋世界和世界上人的地位。在中國政治文化里，極權主義深深植根于官僚精英這一觀念，因為官僚精英誓死捍衛，且又諳熟官僚精英統治。如今對官僚精英的推崇岌岌可危了。

改革者試圖把黨政職能分開，這使黨的作用日益削弱。[[330]](#_330__Dang_He_Guo_Jia_Ling_Dao_Z)把黨政職能分開的目的，據說是要黨的干部集中精力處理全局性的原則和路線問題。地方政府官員和管理人員（他們并不都是黨員）有更大的空間來搞好本職工作，無需考慮意識形態問題。

但在一個高級政府官員實際上都是黨的高級干部并參與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議事的國家里，“純粹”的黨務工作者的作用是什么？這一點并不清楚。當然，他必須開動黨的機器，但是在一個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已讓位于經濟發展的時代里，它的作用也是不明確的。[[331]](#_331_Zhe_Zhong_Kun_Jing_Da_Zhi_S)胡耀邦在任中共總書記期間，忽視了黨政職能的分離，似乎想要作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有權對國家生活中的所有方面發表意見。他多次出國訪問，仿佛他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332]](#_332_Zai_1981Nian_6Yue_Zhong_Gon)

1982年召開的十二大通過了新黨章，其中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就進一步限制了黨的權力。胡耀邦在報告中解釋這一“極其重要的原則”時說，現在從中央到基層，一切黨組織和黨員的活動都不能同國家的憲法和法律相抵觸。[[333]](#_333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黨章的一條條款本身不算什么保證。但是三中全會以后強調法治（——它是對這些精英們曾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的無政府狀態的反作用），并通過了各種法律法規，至少第一次使人們懂得黨的無限權力最終會危及每個人。[[334]](#_334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_G)

對黨進行正式限制的同時，也采取了克服“官僚主義”的具體措施。官僚主義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

根據鄧的說法，這些行為“不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335]](#_335__Dang_He_Guo_Jia_Ling_Dao_Z)

對官僚主義的攻擊在中共黨內并不是新鮮事，它至少可以追溯到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風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本身可以解釋為毛為激發群眾純潔的革命熱情而力圖摧毀官僚主義的最后的、也是最具破壞性的嘗試。鄧的方式更少具有破壞性，他想激發群眾，但其目的是為了創造財富而不是制造革命。為此，黨員干部再次被推到一邊。

盡管對黨的權威有這些限制，但普通農民、工人、管理人員，或知識分子在共產黨官員面前仍謹慎行事。習慣于服從和對受苦的記憶抑制了過分地考驗這種新的寬容的任何嘗試。官僚們也許處于守勢，但他們仍有很大的權力。

那也許是歷史學家對“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定論。到1982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文化大革命”對黨的權威的削弱，隨后實行的防止濫用權力的措施，意識形態力量的衰落，農民積極性的發揮和搞活城市經濟的嘗試——所有這一切顯示了社會對國家的潛在作用。這個潛在作用可能比從前中國統一在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任何時候都大。毛曾一直強調，壞事能變成好事。在1989年的天安門示威中，這些萌發的社會力量最終對國家權威的統治提出了挑戰。

[[1]](#_1_3)“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聯合研究所：《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第42頁。

[[2]](#_2_3)同上書，第45、46頁。

[[3]](#_3_3)“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第477頁。這是1963—1964年中國共產黨為批判蘇聯共產黨的“修正主義”所發表的九評中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評。這些文獻對理解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夜所關注的問題，是十分關鍵的。

[[4]](#_4_3)實際上，這在各國共產黨歷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只有中國共產黨曾把接班人寫進黨章。沒有公開出版的周恩來在九大的講話中對林彪的過分吹捧，證明了林彪的新的地位；周的講話收在一個16頁的（九大）大會講話匯編中，被邁克爾·舍恩哈爾斯譯成外文并加了注解。  
　　一位黨史學家稱，在任命九大主席團時，毛提議由林當主席，他當副主席，這只受到了林彪高呼  
“毛主席萬歲”的干擾。  
　　這位黨史學家還說，毛早在1956年初就有意提議林做他的接班人。似乎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投票時，毛只差一票就是一致通過了。據確認，毛沒有投他自己的贊成票，也沒有投二號人物劉少奇的贊成票，而是投了林彪的票！見譚宗級：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崛起及其覆滅”，載《教學參考：全國黨校系統中共黨史學習討論會（下）》〔以下簡稱《教學參考（下）》〕，第40、42頁。作者非常感謝米切爾·舍恩哈爾斯讓他使用這兩條資料。

[[5]](#_5_3)參考第二章。鑒于中央領導班子里的每一位老同志在他革命生涯的某個時刻實際上都參加了武裝斗爭，因此計算中央委員會里的軍隊代表人數，常常是一個占多少比例的問題。《中國歷史季刊》（第39期[1969年6—9月]，第145頁）估計約有40％的軍隊代表；高英茂〔《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72—1973年秋冬季號），第8頁〕則估計約有38％；而根據多姆斯的估計，八大中央委員中，解放軍代表占40.3％，九大占50％，參考于爾根·多姆斯《中國國內政治（1949—1972）》，第210頁。

[[6]](#_6_3)參考表4。

[[7]](#_7_3)有關西漢取代秦朝的情況，請參考《劍橋中國史》第1卷，第110—127頁；隋唐變遷，則可參考《劍橋中國史》第3卷，第143—168頁；元明變遷，可參考《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4—106頁。

[[8]](#_8_3)參見《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4章。

[[9]](#_9_3)同上書，第383—388、529—534頁，以及第12卷第4章。

[[10]](#_10_3)參見《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6章。

[[11]](#_11_3)同上書，第540頁。

[[12]](#_12_3)參見易勞逸《流產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

[[13]](#_13_3)《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224頁。

[[14]](#_14_3)參見《劍橋中國史》第13卷第4章。

[[15]](#_15_3)《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224頁。

[[16]](#_16_3)抗日戰爭時期，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明顯違反了毛確定的避免沒有勝利把握的大的攻勢的原則。在彭的回憶錄中，他承認沒有同中央軍委協商就考慮該戰役，包括過早地進攻，是錯誤的，但他同時引用了毛的一份電報，作為毛同意發動該戰役的證據。當事情過去1/4世紀的“文化大革命”中，彭仍然在這個問題上受到猛烈的批判，似乎當初發動這場戰役，違背了毛的意愿，或者至少違背了他更高明的判斷，他的同意，可能僅僅意味著以此維持一個團結的門面。有關毛澤東的抗日戰爭戰略思想，請參考《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180—183、227—232頁；有關彭德懷的觀點請參考他的《一個中國元帥的回憶錄》，第434—437頁。

[[17]](#_17_3)參見雷蒙德·F.懷利《毛主義的出現：毛澤東、陳伯達和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第68—71頁。

[[18]](#_18_3)參見《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2章。

[[19]](#_19_3)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通過長期戰爭奪取政權，他登基后不久，很快就謹慎地授予所有大將以尊貴的爵位。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105頁。

[[20]](#_20_3)參考《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7章。

[[21]](#_21_3)同上。

[[22]](#_22_3)參考《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2章。

[[23]](#_23_3)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95頁。

[[24]](#_24_3)《當代背景材料》第880期（1969年5月9日），第37頁。

[[25]](#_25_3)同上書，第34頁。

[[26]](#_26_3)這里指那些藍領工人的組織，紅衛兵組織已經被解散。

[[27]](#_27_3)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第559頁。

[[28]](#_28_3)在21個省革命委員會中，有20個省革委會的頭兒是軍隊干部。見多姆斯《中國國內政治》，第205頁。

[[29]](#_29_3)郝夢筆、段浩然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下），第610頁。

[[30]](#_30_3)參見多姆斯《中國國內政治》，第215頁。

[[31]](#_31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下），第608—611頁。

[[32]](#_32_3)利普·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滅”，《中國季刊》第55期（1973年7—9月），第429—430頁。

[[33]](#_33_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92—394頁；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13頁。

[[34]](#_34_3)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滅”（英文版），第432—433頁。

[[35]](#_35_3)參閱張云生《毛家灣紀實》，書中隨處有這方面的描述。從1966年8月19日至1970年11月17日，張一直是林彪的秘書之一。林似乎怕光、風、水和寒冷，怕出汗。他不愛洗澡，不吃水果。他堅持他的居室保持恒溫攝氏21度，上下不超過半度。（葉群喜歡她的居室溫度在攝氏18度！）但是，就林彪行使他的職責來說，他的條件最差的方面，是他沒有能力或者不愿意閱讀文件，因此他的秘書不得不在送到他的辦公室的大量文件中，進行挑選和概括，使他能在30分鐘內閱讀完畢。同上書，第8—12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73—375、377頁。

[[36]](#_36_3)《大動亂的年代》，第387—388頁。

[[37]](#_37_3)高英茂：《林彪事件：權力政治和軍事政變》，第87頁。這些話可能由林彪兒子所寫，但明顯反映了更成熟的人的知識和經驗。

[[38]](#_38_3)有關毛澤東有恩于陳伯達的情況，參見懷利《毛主義的崛起》，隨處可見有關描述。

[[39]](#_39_3)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滅”，第432頁。

[[40]](#_40_3)參見仲侃《康生評傳》，第15—16、146—147頁。關于陳伯達對康生的妒忌，請參閱張云生《毛家灣紀實》，第190—192頁；關于陳在九大上的問題，請參閱該書第210—211頁及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第387頁。根據該書的介紹，陳伯達發了脾氣，并繼續進行他的起草工作，但經過幾次修改，最后毛采用了張一姚的草案。林彪似乎僅僅對毛介入并最后確定的報告有興趣。

[[41]](#_41_3)1980—1981年冬天審判時，陳伯達說，僅僅是在他“意識到林彪和江青之間的權力斗爭之后，才開始同情林彪”；《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審判》，第116頁。關于兩個對立的集團的發展和他對林彪集團的信心，參見張云生的《毛家灣紀實》，第382—389頁，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第382—388頁。

[[42]](#_42_3)參見毛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的行為；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220頁。

[[43]](#_43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13—614頁。

[[44]](#_44_3)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第348頁。

[[45]](#_45_3)同上書，第614頁。

[[46]](#_46_3)參見1966年7月8日毛給江青的一封信，該信收在《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73年夏季號），第96—99頁。那年年底，林彪在軍事學院的講話中以把學習毛主席著作推向一個新階段為主題，吹捧主席為“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要求每個人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過程中，要用99％的精力學習和領會毛主席的著作；參見《問題和研究》第8卷第6期（1972年3月），第75—79頁。

[[47]](#_47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14頁。

[[48]](#_48_3)《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第561—562頁。

[[49]](#_49_3)胡華主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第300頁；《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第562頁；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8頁；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14頁。這些講話的摘要，參見該著作，第614—615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98—399頁。

[[50]](#_50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15—616頁。

[[51]](#_51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16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402頁。

[[52]](#_52_3)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頁。在毛干預以后，王迅速改變調子，轉而批評陳伯達。

[[53]](#_53_3)（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第562頁。

[[54]](#_54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16頁；毛的講話全文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403—404頁。

[[55]](#_55_3)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350頁。

[[56]](#_56_3)即從8月23日到8月25日中午；《“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頁。

[[57]](#_57_3)參見胡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第302頁。

[[58]](#_58_3)參見本書第5章。

[[59]](#_59_3)一位參加珍寶島沖突的29歲的指揮員孫玉國，由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介紹到九大，受到了毛的激動人心的歡迎；參見毛在九大上的簡短講話，該講話收在“九大主要講話匯編”中，現藏在哈佛費正清中心。

[[60]](#_60_3)例見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所報道的一名參加了這場沖突的中國軍官的估計，“中國對1969年珍寶島之戰的看法”，載《中國季刊》第56期（1973年10—12月），第734頁。亦見本書第3章。

[[61]](#_61_3)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第184頁。

[[62]](#_62_3)例見在昆明軍區內部傳閱的有關文件。這些文件收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第115—145頁。

[[63]](#_63_3)《中國共產黨的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第132頁。

[[64]](#_64_3)參見本書第三章。

[[65]](#_65_3)基辛格：《白宮歲月》，第1061頁；1972年7月28日《紐約時報》引用的布里奇海姆的“林彪的覆滅”第441—442頁中的一段話。也可參見本書第五章。但林彪的秘書證實，他后期實際上對外交政策沒有什么興趣，參見張云生《毛家灣紀實》，第329—333頁。

[[66]](#_66_3)張云生：《毛家灣紀實》，第316—323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372頁。張的描述使人們清醒地看到，中國領導人中有些人在采取可能導致戰爭的行動時，是多么輕率。這道疏散命令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動機：把那些對林彪的權力構成潛在威脅的高級干部遣送出北京。好幾位元帥被沿著京廣線疏散：陳毅去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徐向前去開封，葉劍英去長沙，劉伯承去杭州，朱德和原計委主任李富春去廣東省從化縣。這其中有些人在不久前的廬山會議上曾聯合反對林彪；除了李富春之外，所有人都是林彪運用軍事手段奪權的潛在障礙。關于疏散過程，請參考聶榮臻的《聶榮臻回憶錄》第三部分。葉劍英因為調查陳伯達的任務，不久返回北京。新華社有關中蘇談判的報道，引自基辛格的《白宮歲月》第186頁，也可參考本書第三章。

[[67]](#_67_3)基辛格：《白宮歲月》，第187頁。

[[68]](#_68_3)同上書，第193、684—703、714頁。基辛格推測，當中美關系正在改善時，7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斗機試圖在中國海岸線100英里以外攔截美國偵察機的行動，可能反映了北京的內部權力斗爭；同上書，第697頁。鑒于林彪與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的密切關系，這可能是一個合理的推測。

[[69]](#_69_3)中共中央第一個反陳文件于1970年11月16日發布，列舉了他的主要錯誤事實：反黨、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和陰謀家。1971年1月26日，中央又發布了陳在整個生涯中的“罪行”材料匯編。2月21日和4月29日，中央發布兩個通知，指出了批陳整風的具體實施方法。見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17—618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406—409頁。有關葉劍英的調查情況，見《縈思錄：懷念葉劍英》，第265、294、301—304頁。

[[70]](#_70_3)“拋石頭，摻沙子，挖墻腳”，《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3—4期（1972—1973年秋冬季號），第38頁；胡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第302頁。

[[71]](#_71_3)高皋和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350頁。

[[72]](#_72_3)郝夢筆和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19—620頁；胡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第302頁；《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3—4期（1972—1973年秋冬季號），第38頁。

[[73]](#_73_3)《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審判》，第226頁。

[[74]](#_74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18頁。

[[75]](#_75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18頁；胡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第302頁。

[[76]](#_76_3)參見《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審判》，第117—125頁。有關林彪政變陰謀的材料從各種渠道匯集起來，但實際上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描述，由勝利者寫的或基于他們提供的證據寫的。關于一位接班人死亡這樣重大的事件，有許多理由說明證據一定得經過加工處理的。一旦某一天中共中央內部檔案開放了，不能保證不出現另一種解釋。為了解剖當時中國政治的實質，似乎仍有必要對流行的最可信的說法進行探究。任何經過修改的描述可能都強調了，中國的命運是由極少數鋌而走險的領導人和他們的家庭的野心和陰謀決定的。

[[77]](#_77_3)同上書，第93頁。

[[78]](#_78_3)高英茂：《林彪事件》，第90—91頁。

[[79]](#_79_3)同上書，第92頁。

[[80]](#_80_3)同上書，第92—93頁。

[[81]](#_81_3)同上書，第93—95頁。

[[82]](#_82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1頁。

[[83]](#_83_3)高英茂：《林彪事件》，第57—61頁。

[[84]](#_84_3)同上書，第64頁。

[[85]](#_85_3)《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審判》，第96—97頁。根據后來采訪林彪女兒林豆豆所獲得的大量材料，黃永勝于9月5日電話通知葉群。但既然黃永勝打電話時林豆豆不在北戴河，而審判時又出示了電話記錄，所以9月6日似乎更可能是黃永勝打電話通知葉群的時間，參見“生活在歷史陰影下的林豆豆”，《華僑日報》1988年6月15日第3版。可是，大陸最近出版的一本史書稱，林立果是由參加毛于9月5日深夜召集的會議的一位與會者直接告知的；見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1頁。

[[86]](#_86_3)《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審判》，第97頁。

[[87]](#_87_3)郝夢筆、段浩然：“生活在歷史陰影下的林豆豆”，《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2頁。

[[88]](#_88_3)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79—380頁。

[[89]](#_89_3)胡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第309頁。

[[90]](#_90_3)高皋和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1—383頁。

[[91]](#_91_3)“生活在歷史陰影下的林豆豆”，《華僑日報》1988年6月14日。根據一條公認可疑的信息，林豆豆于1941年出生在蘇聯。當時正是林彪在蘇聯養傷三年的最后一年；參見姚《毛繼承人的密謀與死亡》，第130頁。

[[92]](#_92_3)“生活在歷史陰影下的林豆豆”，《華僑日報》1988年6月14日。可能正是以這個故事為依據，雅普·馮·吉內肯斷定豆豆是林彪第一個夫人劉小萌所生，葉群和林彪直到1960年才結婚；《林彪沉浮錄》，第263、272頁。葉群嫁給林彪的時間有待確定；見克萊恩、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辭典（1921—1965）》第1卷，第567頁；但40年代中期在延安居住過的一個人確認，林彪和葉群是在那時結婚的。有關豆豆在林—葉家庭中的不愉快生活，請參見張云生《毛家灣紀實》，第256—292、429頁。盡管張對葉群的行為進行了批評性的描述，但他斷定，為葉群工作比為江青工作要稍好一些；同上書，第429頁。

[[93]](#_93_3)《華僑日報》1988年6月15日。

[[94]](#_94_3)同上。

[[95]](#_95_3)《華僑日報》1988年，6月15日、16日。

[[96]](#_96_3)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4頁。

[[97]](#_97_3)高皋和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4—386頁。另一種說法是豆豆在大約晚上8時30分報告了警衛團副團長（原文為“團長”——譯者）；參見“生活在歷史陰影下的林豆豆”，《華僑日報》1988年6月16日。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427—430頁，記載了9月11日和12日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所目睹的有關事情。

[[98]](#_98_3)于南：“周總理處置‘9· 13’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經過”，《黨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431頁；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2頁；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6頁；《華僑日報》。《華僑日報》1988年6月16日認為是周給葉打電話。

[[99]](#_99_3)《華僑日報》1988年6月16、17日；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2頁；《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審判》，第99頁；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7—391頁。根據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第432頁的說法，飛機要起飛，還必須得到毛的批準。

[[100]](#_100_3)《黨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頁。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沒能阻止林立果聯合艦隊的一些成員乘直升機逃跑；《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審判》，第99—100頁。

[[101]](#_101_3)參見郝夢筆和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3頁。

[[102]](#_102_3)《黨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頁。這篇文章部分目的在于辟謠——周只是在飛機即將越過國境線時，才從毛那里獲得林彪出逃的消息。一些學者提供的一個嗅覺欠佳的觀點認為，毛似乎故意放林彪逃走的態度，表明中國空軍夜間作戰能力太有限，以至于無法迫降叛逃飛機。

[[103]](#_103_3)同上。

[[104]](#_104_3)參見《華僑日報》1988年6月17日。一種解釋是三叉戟飛機沒有直接飛往蒙古，而是轉了幾個彎，以避開攔截。另一種說法是由中國一位前國家安全官員向一位學者透露的，當時周恩來成功地勸說飛行員返回中國領空，但這個飛行員隨后被林立果槍殺，林立果接替了飛行員，但他不能很好地駕駛飛機，致使它墜毀。另一篇由一位自稱“了解內幕的人”撰寫的著作提出了一種更聳人聽聞的說法：9月12日，林彪在參加毛澤東舉辦的宴會后返回途中，8341部隊根據毛的命令，在北京郊外設置埋伏，用火箭射擊汽車，搞掉了林彪。參見姚《毛繼承人的密謀與死亡》第16章。

[[105]](#_105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4頁；《縈思錄》，第305—308、346頁。有關林的高級軍事盟友的清洗，參見《黨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頁。

[[106]](#_106_3)在毛澤東1971年夏天南巡期間發表的一系列講話中，他在8月28日的講話里，提到1935年他與張國燾的斗爭中葉劍英對他所表示的忠誠。要求大家對葉劍英這種在危機的關鍵時刻立場堅定的精神表示尊敬。這段評價，可在毛澤東講話的一個未經刪改的手稿中找到，現藏在哈佛費正清中心圖書館，它既表明毛澤東永遠不忘一恩一怨，也表明葉劍英在這次毛處理軍隊有關領導人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十分感謝邁克爾·舍恩哈爾斯提請我注意這段講話。

[[107]](#_107_3)《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第1、2卷，在為“汪”姓將領寫傳記時，沒有列人汪東興。

[[108]](#_108_3)參見鄧力群：“學習‘關于建國以來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問題和回答”，該文收在《黨史會議報告集》第153頁。譚宗級：“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崛起及其覆滅”，《教學參考》（下）第42、43頁對這個問題也有類似描述，說明鄧力群的觀點不是偶然的。根據后一篇文章，當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遭到批判時，必須在政治局常委里找到一位新的二號人物。鄧小平因為也受到批判，被排除在外；陳云，則因為最右；朱德，因為他太老了；周恩來，因為毛澤東對他不滿意，而且周自己過去也常說，“我這個人是不能掛帥的”，這樣，就只剩下林彪了。參見譚前引文，第42頁。

[[109]](#_109_3)《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5—6頁。

[[110]](#_110_3)郝夢筆和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5—626頁；也可參見該書注釋[43]。在林彪死后，毛公布這封信如此方便，以至于“文革”結束后，中共黨史學家似乎對它的真實性提出了懷疑。為了回答這種懷疑，一位老歷史學家回顧了以下一段情節：當林彪知道毛1966年的那封信后，他極為焦慮，以至于毛決定不將它公布，并且確實命令銷毀它。但正要銷毀時，左派宣傳家戚本禹向周恩來抗議說，毛的話太珍貴了，不能用這種方式毀壞；總理反復向他保證說，已命令那時的宣傳部長陶鑄復制一份。林彪摔死后，公布的是這個復印件的復制品，因此容易引起對有關真實性的懷疑。請參考譚宗級在《教學參考》（下）中的描寫，第41頁。這段關于周恩來和林彪的有趣的軼事，最初是由邁克爾·舍恩哈爾斯注意到的。

[[111]](#_111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4頁。作者那些經歷了那個時期的幻滅感的中國朋友，也向作者表達了這種觀點。

[[112]](#_112_3)關于毛澤東和鄧小平接班人問題的比較充分的討論，參見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北京的交接班”，《紐約書評》第35卷第2期（1988年2月18日），第21—22頁。

[[113]](#_113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4頁。毛在最后一刻決定參加1972年1月10日陳毅的追悼會，并在追悼會上對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說，陳毅一直支持他，而林彪卻反對他。有關的描寫，請參見張玉鳳寫的11篇文章：“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載1988年12月26日至1989年1月6日的《光明日報》。這是毛澤東最后一次參加此類活動。

[[114]](#_114_3)參見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28—530頁；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4頁。有關鄧小平居留江西期間更詳細的描述，參見襲之倬：“鄧小平在1969—1972年”，載《新華文摘》1988年第4期，第133—155頁。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的信的復印件現藏在哈佛費正清中心圖書館。在這封信中，他表達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指出，沒有這個“無比巨大的照妖鏡”，就無法使林彪和陳伯達這樣的人暴露原形，由邁克爾·舍恩哈爾斯推薦給我的這封信，是吹捧和自謙的結合，也反映對林、陳事件的個人看法。

[[115]](#_115_3)有關紀在清洗林彪余黨過程中的作用，參見《華僑日報》1988年6月18日。有關紀在毛的庇護下逐漸上升的描寫，參見王靈書：“紀登奎談毛澤東”，載《瞭望》（海外版）1989年2月，第6—13頁。

[[116]](#_116_3)有關在5月發現癌癥的描述，參見高皋和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4頁。《不盡的思念》，第583頁，提供了早期癌癥的有關信息，描述了毛命令成立一個專家小組，專門負責周的治療。《周總理生平大事記》，第494頁，卻僅僅提供了發現癌癥的年份。

[[117]](#_117_3)有關王洪文的生平，參見丁望《王洪文張春橋評傳》，第49—134頁。也可參見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42—448頁。尼爾·亨特的《上海日記：“文化大革命” 目擊記》和安德魯·G.沃爾特的《張春橋和上海“一月風暴”》，描述了王洪文崛起時期的有關事件，但對王本人描述較少。

[[118]](#_118_3)據在場的作者所見，在北京王洪文與要人們如年老的和身體健康的周恩來、李先念、外交部長姬鵬飛等一起握手時，官方并未能說明王洪文擔任什么職務。有趣的是，在為西哈努克親王舉行的一次宴會的同樣使人驚奇的場合（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也是初次露面，回到公開的生活中。見約翰·加德納《中國政治和對毛的繼承》，第62頁。

[[119]](#_119_3)參見丁望《華主席：中國共產黨人的領袖》，第77—80頁。

[[120]](#_120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8頁。

[[121]](#_121_3)中國人對王洪文直線上升的驚愕，不禁使人想起，當1988年美國總統競選中，副總統布什挑選41歲的普通參議員丹·奎爾做自己的副總統候選人時美國政治家和報刊輿論所表現的難以置信。而且，丹·奎爾一旦當選副總統，并不像王洪文那樣僅僅擁有潛在的權力。

[[122]](#_122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6頁；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414—416頁；這些年鋼產量數字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233頁載，1969年是1330萬噸，1970年是1770萬噸，1971年是2130萬噸，1972年是2330萬噸，1973年是2520萬噸，在這幾年（包括林彪的垮臺）比以前大幅度增長。閻方鳴和王亞平：《70年代初期我國經濟建設的冒進與調整》（1985），第55—60頁；對于1967—1968年后“文化大革命”對工業的輕微影響的分析，見本書第6章。

[[123]](#_123_3)《1981年決議·注釋本》，第416頁。

[[124]](#_124_3)參見戴維·茨威格《中國農業的激進主義（1968—1981）》，第57—60頁和第5章；還可參見他的“政策執行策略：中國農村的政策‘風’和大隊核算（1966—1978）”一文，載《世界政治》第37卷第2期（1985年1月），第267—293頁。

[[125]](#_125_3)戴維·茨威格：《中國農業的激進主義》，第57—60頁和第6章。

[[126]](#_126_3)1969—1973年糧食產量統計數字：1969年是210.9萬噸；1970年是239.9萬噸；1971年是250.1萬噸；1972年是240.4萬噸；1973年是264.9萬噸。參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158頁。

[[127]](#_127_3)1972年是周恩來年這一估價，出自拉斯茲洛·萊德尼《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1921—1985）：自畫像》，第355—356頁。該書討論了本章涉及的有關問題。周試圖利用這個機會，徹底駁斥他在1932年曾經叛黨的說法，這種說法看來是在康生和江青唆使下精心羅織的。雖然他四處散發毛對他表示信任的簡短講話，幾乎直到他逝世為止，“四人幫”仍繼續利用這項罪名攻擊他。參見《關于國民黨造謠誣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文件》，《黨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8頁；伍豪是周恩來當時的化名。參見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6—627頁，該書討論了周培源論教育改革的文章；默爾·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建議和異議》，第162—166頁，討論恢復科學研究的嘗試。有關周無力控制《人民日報》的情況，參見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203—204頁。

[[128]](#_128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5—626頁。

[[129]](#_129_3)有關這項在政治上必要、在理論上卻站不住腳的重新評價，參見王若水的10篇系列文章：“從批‘左’倒向反右的一次個人經歷”，載《華僑日報》1989年3月12—21日。

[[130]](#_130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28頁。

[[131]](#_131_3)《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42頁。周恩來在報告中實際上使用了同樣的語言；同上書，第9—10頁。

[[132]](#_132_3)同上書，第45頁。

[[133]](#_133_3)威廉·A.約瑟夫認為，周的報告中含有微妙的暗示，林彪實際上是極“左”而非極右。參見他的《評1958—1981年中國的極“左”思潮》，第138—139頁。果真如此的話，那么可以設想，周在王和張向他呈送報告草案之后，他曾修改過。

[[134]](#_134_3)《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47、48、50、52、55頁。

[[135]](#_135_3)“林彪與孔孟之道”，胡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第316頁。

[[136]](#_136_3)樂黛云、卡羅林·韋克曼：《走進暴風雨：奧德賽——一位中國革命婦女》，第323頁。

[[137]](#_137_3)黨史教研室：《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第568頁。毛在他與一位神秘的來訪的埃及領導人的談話中，把孔子和秦始皇帝進行了比較；同上書，這里我不能引用有關資料。毛習慣于用郭沫若的詩作陪襯來賦詩填詞；例如可參考《中國文學》1976年第4期，第43—44、48—50頁。但在《沫若詩詞選》中沒有收集毛澤東答郭沫若的任何一首最近的詩。

[[138]](#_138_3)《彭德懷事件》，第36頁。

[[139]](#_139_3)“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57期（1974年1—3月），第207—210頁。周恩來就他長期以來一直主管的外交事務發表的講話，在毛的提議下，1973年11月受到政治局的批評，當然使“四人幫”以為他們的機會來了；王：《大動亂的年代》，第417頁。

[[140]](#_140_3)樂黛云、卡羅林·韋克曼：《走進暴風雨》，第323頁。清華在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江青與這所大學的聯系，表明她最初可能是從毛澤東那里得到指示的。

[[141]](#_141_3)《走進暴風雨》，第303頁。有關江青和這兩人之同的談話記載，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479—489頁。

[[142]](#_142_3)《走進暴風雨》，第323—326頁。樂對這個批判組的了解很多，因為她的丈夫湯一介是梁效班子的12位學者之一。

[[143]](#_143_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194頁。

[[144]](#_144_3)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5頁。

[[145]](#_145_3)胡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第316頁。有關“讀書班” 目的的描述，參見《縈思錄》，第295—296頁；關于這些學習小組，邁克爾·舍恩哈爾斯曾請我注意參閱《中共中央黨校年鑒》（1984）第4頁，該書認為它們沒有什么野心勃勃的目標。有關康生的作用，參見仲：《康生評傳》，第310—311頁。默爾·戈德曼認為周恩來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批林批孔運動，參見《中國的知識分子》，第166—176頁。梁效的一位主要成員曾聲稱，他從來沒有寫過或領導寫過有意針對周恩來的文章。

[[146]](#_146_3)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39頁；《大動亂的年代》，第489—494頁。

[[147]](#_147_3)樂黛云、卡羅林·韋克曼：《走進暴風雨》，第325—327頁；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6—497頁；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34頁。

[[148]](#_148_3)“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58期（1974年4—5月），第407頁；第59期（1974年7—9月），第627—630頁。

[[149]](#_149_3)“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58期（1974年4—5月），第407—408頁。

[[150]](#_150_3)同上書，第408頁。

[[151]](#_151_3)《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第569頁。

[[152]](#_152_3)周堅持要在得到毛的批準之后，再去做手術；參見《不盡的思念》，第583頁。關于他1975年3月寫給毛，詳細報告他的健康狀況、請求允許他第三次做手術的信，參見《周恩來書信選集》，第633—635頁。

[[153]](#_153_3)《周總理生平大事記》，第504頁；《懷念周恩來》，第585—586頁。

[[154]](#_154_3)周因為情感原因也至少離開過醫院一次。1975年9月，他在北京飯店最后一次拜訪了他20年的理發師；《周恩來傳略》，第184頁。

[[155]](#_155_3)王洪文最引人注目的失敗——1975年未能平息杭州武斗，恢復社會秩序，此類事情還會繼續發生；參見加德納《中國政治和對毛的繼承》，第74頁。

[[156]](#_156_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187頁。

[[157]](#_157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38頁。

[[158]](#_158_3)特里爾：《白骨精》。

[[159]](#_159_3)同上書，第324—325頁；威特克：《江青同志》，第476頁；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37—638頁。

[[160]](#_160_3)特里爾在《白骨精》中記述了這一情節。

[[161]](#_161_3)《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386頁；有關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分析，參見該書第57頁。關于鄧小平的命令，參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97頁。

[[162]](#_162_3)有關王洪文去長沙見毛澤東的描述，見周明《歷史在這里沉思》第2卷，第196—203頁。

[[163]](#_163_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37—639頁；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30—537頁。大陸近期的歷史學家們不肯就張春橋如何被任命之事表態，也許他們是想避免把他們關于毛在此時恢復鄧的工作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的設想弄得一團糟。關于毛重召鄧的目的，在中國目前仍很流行的一種替代解釋是，他想用鄧頂替周恩來。據此情形說明，毛擔心周可能比他活得長；這位總理患了癌癥，但據說主席也在1972年底患了嚴重的中風，這使他相信他可能先死。毛提名鄧可能部分是因為他認為他是“四人幫”不那么難對付的一位對手；也可能考慮到他倆早些年的密切關系——鄧在毛處境非常困難時仍對他忠心耿耿；關于毛、鄧之間的關系，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140—145頁。

[[164]](#_164_3)郝夢筆、段浩然主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39—640頁。

[[165]](#_165_3)周在1964年第一次提出“四個現代化”時，他并沒有提到毛的支持。參閱加德納《中國政治和對毛的繼承》，第67頁。

[[166]](#_166_3)郝夢筆、段浩然主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45—647頁；房維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第544—545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2頁。政治路線斗爭當然是黨內爭論的最嚴重的形式：林彪事件已被列為第十次路線斗爭。清除劉少奇是第九次。

[[167]](#_167_3)關于鄧小平從1975年1月到10月（從10月開始，鄧不能行使有效的權力）這段時期的活動，可參閱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40—641頁。

[[168]](#_168_3)《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11—13、27—42頁。

[[169]](#_169_3)于爾根·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過渡時期》，第127頁，房維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第541—543頁。這些鐵路干線是：天津—浦口；北京—廣州；隴海線（連云港—天水），連接沿海的江蘇和西北的甘肅的主要東西干線；連接杭州與南昌的浙贛線。

[[170]](#_170_3)約翰·加德納：《中國政治和對毛的繼承》，第74頁。

[[171]](#_171_2)關于對這兩個文件的起草的分析，參閱肯尼思·利伯撒爾《中國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政治》，第33—49頁。

[[172]](#_172_2)房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第550—555頁。

[[173]](#_173_2)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28頁。

[[174]](#_174_2)齊辛：《“四人幫”案》，第246、247、257頁。

[[175]](#_175_2)《鄧小平文選》，第43—46頁；房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第550—552頁。

[[176]](#_176_2)齊辛：《“四人幫”案》，第287—295頁。

[[177]](#_177_2)同上書，第227頁。

[[178]](#_178_2)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第576頁。

[[179]](#_179_2)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29—130頁；《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第552—553頁。

[[180]](#_180_2)《中國歷史研究》第12卷第1期（1978年秋季號），第55頁。

[[181]](#_181_2)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第574頁。

[[182]](#_182_2)《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第573—574頁。關于《水滸傳》事件的詳細論述，參閱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201—213頁。

[[183]](#_183_2)郝夢筆、段浩然主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48頁。

[[184]](#_184_2)同上書，第644—645頁。

[[185]](#_185_2)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186]](#_186_2)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羅斯·特里爾在他的著作《毛澤東》的第395—397、400—401、411—413、417—418頁追溯了毛在1976年夏接見連續來訪的外賓時所表現出來的日益惡化的健康狀況。

[[187]](#_187_2)胡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第328頁；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48—649頁。有報道說毛遠新到1975年12月就不與他的伯父在一起了，但另有跡象表明，直到毛逝世，他一直留在毛的身邊。

[[188]](#_188_2)“反擊右傾翻案風”，參閱郝夢筆、段浩然的《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49頁。

[[189]](#_189_2)加德納：《中國政治和對毛的繼承》，第75—76頁。關于對“文化大革命”期間教育發展的詳細分析，請參閱第7章。

[[190]](#_190_2)其他“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包括：江青的革命京劇；農村“赤腳醫生”（或護理人員制度）；“五·七干校”（干部要花數月，有時數年時間在那里進行體力勞動）；大寨大隊的集體主義競賽。參閱1976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社論：“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191]](#_191_2)郝夢筆、段浩然主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49頁。

[[192]](#_192_2)“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載《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303—312頁。有人說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態度。請參閱周：《歷史在這里沉思》第1卷，第57—58頁。

[[193]](#_193_2)鄧的講話刊載在“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66期（1976年6月），第420—424頁。

[[194]](#_194_2)米歇爾·奧克森伯格、惲賽充（音）：“華國鋒‘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的歲月（1949—1966）：一位政治多面手的成長”，載《中國季刊》第69期（1977年3月），第29—34頁。

[[195]](#_195_2)為什么要“代理”呢？可以想象，這是出于禮儀上的原因：直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命華為總理以前，不能正式稱華為總理。但當他在4月獲得總理頭銜時，那也不是某種憲法程序的結果。毛可能意識到，王洪文沒有受到考驗就被提拔擔任高級職務，這是一個錯誤。所以毛要試用華一段時間以盡量減少損失——如果華被證明是同樣無能的話。或者毛可能想以此暗示鄧不是永遠被開除而是暫時靠邊站，從而避免老同志的反對。后一個假設也許可以解釋：毛在攻擊鄧時，為什么謹慎地說鄧的罪行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可以得到解決。參閱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50頁。

[[196]](#_196_2)房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第559頁。根據這一論述，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代替葉，但由于我看到的其他論述（例如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49頁；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5頁）都沒有把它當作一個動機來提，人們必須假定它是由葉對毛有關華的決定的憤怒引起的一種政治病。可以肯定，葉身體一直很好，他參加了1月15日舉行的周的追悼會。

[[197]](#_197_2)關于張春橋對他個人所受挫折的反應，見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5—576頁。

[[198]](#_198_2)這些人作為激進者的同盟的恰當性由于這樣一個事實——即鄧小平在毛死后重新掌權時堅持要他們辭職——而得到了進一步證實。這三人和紀登奎一起被稱為“小四人幫”。

[[199]](#_199_2)齊辛：“文化大革命”，第191—192頁。

[[200]](#_200_2)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30頁。

[[201]](#_201_2)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6—577頁。

[[202]](#_202_2)羅杰·加賽德：《活躍起來！毛之后的中國》，第8—9頁。

[[203]](#_203_2)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82—586頁。

[[204]](#_204_2)同上書，第581—582頁。

[[205]](#_205_2)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86—597頁；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52頁；加賽德：《活躍起來！》，第160—164頁。

[[206]](#_206_2)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98—599頁。

[[207]](#_207_2)加賽德：《活躍起來！》，第115—136頁。加賽德是一個會說漢語的英國外交官，他于1976年1月來英國駐北京大使館，親眼目睹了這一系列悲哀的事件。中國有關這些事情最完整和最生動的描述或許是高皋和嚴家其所著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第598—637頁；4月4日到過廣場的大致人數也來源于此書的第611頁。本文作者4月1—4日雖在北京，但文中的敘述主要來源于前兩種資料。

[[208]](#_208_2)引自加賽德的《活躍起來！》第117頁。

[[209]](#_209_2)蕭蘭：《天安門詩抄》，第29—30頁，選的這一段只是這本詩集中的一小段，當時廣場上張貼著許多類似的詩文。可參見兩卷本的《革命詩抄》，后來童懷周選編成《天安門詩文集》出版。

[[210]](#_210_2)郝夢筆、段浩然主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52頁。

[[211]](#_211_2)同上。

[[212]](#_212_2)胡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第331頁。

[[213]](#_213_2)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19頁。

[[214]](#_214_2)對毛和他的“封建式”崇拜的最明顯的動搖不能不提到秦始皇，人們常將主席與他相提并論：“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引自加賽德《活躍起來！》，第127頁。

[[215]](#_215_2)胡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第331頁。

[[216]](#_216_2)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 十年史》，第621頁。

[[217]](#_217_2)同上書，第622頁。

[[218]](#_218_2)“還我花圈！還我戰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401頁；加賽德：《活躍起來！》，第129頁。

[[219]](#_219_2)加賽德：《活躍起來！》，第129—131頁。

[[220]](#_220_2)廣播講話內容見高皋、嚴家其所著《“文化大革命” 十年史》，第629—630頁。

[[221]](#_221_2)同上書，第633頁；郝夢筆、段浩然的《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53頁提到有388人被捕。加賽德的《活躍起來！》第132頁說約4000人在吳德講話后仍留在廣場，這也是估計數，并非警方記錄。

[[222]](#_222_2)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53頁；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34—635頁。加賽德引用當代一些非共產黨的報道，指出有100人被殺，《活躍起來！》，第132頁。

[[223]](#_223_2)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32頁。我尚未發現有任何中方的資料以證實鄧的安全是怎樣保護的。

[[224]](#_224_2)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53頁。

[[225]](#_225_2)“你辦事，我放心”，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頁。

[[226]](#_226_2)房維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第568頁。

[[227]](#_227_2)房維中主編：《中華人國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第567頁。有關擁鄧的群眾運動的報道見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41—659頁；對“左”傾分子騷動的分析見前引書第662—676頁。

[[228]](#_228_2)有關毛在春節前后病情惡化的報道，見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

[[229]](#_229_2)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54—655頁；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78—679頁。9月上旬，江青再次來到大寨大隊，這時突然接到北京來的急電，告知主席病情惡化，據說她并未馬上動身，而是繼續與衛兵和身邊的醫護人員玩撲克；高皋、嚴家其，前引書，第691頁。

[[230]](#_230_2)引自加賽德《活躍起來！》，第140—141頁；引語的來源不甚清楚。加賽德也并未探討鄧提到的“國外庇護地”的含義。（本段引文無法核對。——譯者）

[[231]](#_231_2)薛冶生編：《葉劍英光輝的一生》，第342—343頁。以前，葉和聶都被授予元帥銜，但“文革”前在林彪的領導下，軍銜都被取消。

[[232]](#_232_2)王年一：“‘文化大革命’錯誤發展脈絡”，載《黨史通訊》1986年10月。

[[233]](#_233_2)在毛彌留之際，所有政治局委員都一個接一個地與毛作最后的告別，見范碩文“暴風雨般的十月——‘四人幫’覆滅記”，載《羊城晚報》1989年2月10日、2月19日，被翻譯轉載在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第17頁。

[[234]](#_234_2)米洛萬·吉拉斯：《新階級：共產主義制度剖析》，第42—47頁。特里爾花了很大篇幅論述江青的特權生活，并將她與中國歷史上一些著名的皇后相比較，見《白骨精》第317—323頁。

[[235]](#_235_2)薛冶生編：《葉劍英光輝的一生》，第342頁。

[[236]](#_236_2)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56頁。根據“文革”后的有關報道，1976年4月30日，毛的確對華國鋒說過“照過去方針辦”；見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頁。有人分析了這兩種說法的不同，認為“四人幫”的說法表明要遵循他們代表毛所提出的某些政策，或者要按他們能在毛的文件中找到文字根據的某些政策辦；而華國鋒的說法僅僅是含糊的連續性。見加德納《中國政治和對毛的繼承》，第111—113頁。

[[237]](#_237_2)各省報立即開始轉載毛的臨終囑咐；見胡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第335頁。

[[238]](#_238_2)作為政治局常委，王這樣做是否真的如后來所說的超越了他的權限，這一點仍不很明確。兩年前，王就曾試圖將上海的干部安插進中央和政府部門，到底取得多大進展，不甚清楚；見仲侃《康生評傳》，第316頁。

[[239]](#_239_2)《康生評傳》，第334—335頁；《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403頁。

[[240]](#_240_2)拉德尼：《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1921—1985）》，第385頁。親眼目睹9月18日葬禮的敘述，見加賽德的《活躍起來！》，第147—149頁。9月下旬，一份聲稱是毛遺囑的油印本流入香港，根據該材料，毛在6月份曾對一些領導干部提出要求，讓他們在其死后幫助江青“舉起紅旗”。見丁望《華主席》，第112頁。

[[241]](#_241_2)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頁。另一說法提到江青和毛遠新曾強迫毛的秘書交出一些文件，只是在華國鋒干預之后才歸還；見丁望《華主席》，第111頁。

[[242]](#_242_2)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頁。

[[243]](#_243_2)薛冶生：《葉劍英光輝的一生》，第345頁。

[[244]](#_244_2)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55—666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頁。

[[245]](#_245_2)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頁。

[[246]](#_246_2)薛冶生：《葉劍英光輝的一生》，第344—345頁。

[[247]](#_247_2)文章是由梁效班子中的兩個人寫的，顯然是在《光明日報》編輯的催促下寫成的。作者之一說，文章是事先并未與“四人幫”商討而倉促成稿的。盡管如此，它卻足以使政治局委員之一的陳錫聯立即從唐山返回北京與葉劍英進行磋商。

[[248]](#_248_2)對于“四人幫”被捕時具體情況的描寫沒有一致的說法。根據范文“‘四人幫’覆滅記”第21頁的描寫，（可能是由華國鋒）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最后校訂和研究在天安門廣場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議案。王洪文、張春橋作為政治局常委理當出席，他倆于上午8時來到中南海的懷仁堂。而姚文元則以他是全國頭號宣傳家，如果毛選出版前需作最后修改或修飾，顯然需要他去執行，以此為借口也邀請他出席。當他們每人到達后，華國鋒向他們宣布：中央認為你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并決定調查你們的問題。調查期間，不得與外界接觸（意譯）。于是汪東興的手下押走了他們。與此同時，江青和毛遠新也分別在他們的住處被捕。

[[249]](#_249_2)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703—708頁；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57頁；《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405頁。多姆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38頁的敘述中認為曾有過更大規模的流血沖突。

[[250]](#_250_2)《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405頁。

[[251]](#_251_2)首次披露于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社論中；《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406—407頁；《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70頁。

[[252]](#_252_2)《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70頁。中國出版界大量出版關于華國鋒的書籍和小冊子。根據S.施拉姆1984年撰寫的作品，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卡片索引中，約有300種關于華國鋒個人崇拜的書籍和小冊子，根據施拉姆的判斷，這只是全國出版的此類圖書和小冊子的一小部分；S.施拉姆：“‘經濟掛帥？’：三中全會以來的意識形態與政策（1978—1984）”，《中國季刊》第99期（1984年9月），第417頁，注1。這時，華國鋒最受人喜愛的宣傳照片是他和毛在一起——可能是已故的毛主席說那番不可思議的祝福詞的時候。有些觀察家發現，華國鋒改變發型以使自己像毛澤東的樣子。

[[253]](#_253_2)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46—147頁。

[[254]](#_254_2)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70—671頁；《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407—408頁。陳云發言的要點見《陳云文選》，（1956—1985），第207頁。

[[255]](#_255_1)房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第573—574頁；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40—142頁。

[[256]](#_256_1)《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51—52頁；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71頁。

[[257]](#_257_1)加賽德：《活躍起來！》，第174頁。關于在跟華國鋒談話中鄧表示對他的擁護，見1976年10月26日，華國鋒看望鄧小平和在醫院中的劉伯承的手稿備忘錄，被哈佛費正清中心圖書館收藏。我感謝邁克爾·舍恩哈爾斯使我注意這條材料。

[[258]](#_258_1)“實事求是”這句口號源于漢朝；《鄧小平文選》，第55—60頁；《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409—410頁。

[[259]](#_259_1)《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52頁。

[[260]](#_260_1)《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91—195頁；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74頁。有報道說，鄧小平原計劃作的關于實事求是的報告由胡喬木起草，但是，當鄧小平被委派致閉幕詞時，聶榮臻上交了胡喬木的文章，后來發表在《紅旗》雜志上，但沒有作為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感謝邁克爾·舍恩哈爾斯提供了這條材料。

[[261]](#_261_1)《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227—236頁。關于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構成的更詳細的分析，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50—151頁。

[[262]](#_262_1)房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第595—596頁。

[[263]](#_263_1)見S.施拉姆采訪胡福明的報告，載于施拉姆所著“經濟掛帥？”一文中，《中國季刊》第99期，第417—419頁。

[[264]](#_264_1)例如，胡福明的原標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一個標準”，被修改為“實踐檢驗是所有真理的標準”，而最后刊登時又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邁克爾·舍恩哈爾斯曾詳細調查過這篇文章產生的過程，1989年2月3日，他在哈佛費正清中心提交了這個課題的研究報告。

[[265]](#_265_1)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80—683頁；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87頁。據舍恩哈爾斯說，胡福明聽到主要政治家的消極反應后，變得如此憂慮以至不承認與這篇文章（在內部通報上報道過此消息）有關聯，因為這篇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由于羅瑞卿的干預，胡耀邦兩名助手中的一位寫的補充文章刊登在《解放軍報》上；這是羅瑞卿1978年8月去世前最后一項重要的政治行動。

[[266]](#_266)《鄧小平文選》，第127—132頁。《人民日報》編輯胡績偉因轉載這篇文章受到該報前任主編吳冷西的斥責，而胡喬木因胡耀邦屬下的行為而指責了胡耀邦。因而鄧小平的干預是決定性的進展，胡績偉在《人民日報》上給以大力宣傳。見舍恩哈爾斯研討會。

[[267]](#_267)S.施拉姆：“經濟掛帥？”，第419頁。

[[268]](#_268)《鄧小平文選》，第132頁。

[[269]](#_269)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56頁。

[[270]](#_270)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82頁。邁克爾·舍恩哈爾斯告訴我，《解放軍報》上的文章是第一篇批判“兩個凡是”的文章。

[[271]](#_271)《鄧小平文選》，第141頁。

[[272]](#_272)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57頁。

[[273]](#_273)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82—683、686—687頁。當時鄧小平正在東南亞訪問，會議開始時不在。

[[274]](#_274)《陳云文選》（1956—1985），第208—210頁。

[[275]](#_275)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689頁。

[[276]](#_276)加賽德：《活躍起來！》，第200—201頁；北京市委聲明的文本在“每季大事和文獻”中，《中國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659頁。

[[277]](#_277)鄧小平在這次全會上的發言中明確說，他痛恨那些搞“打砸搶的、幫派思想嚴重的、出賣靈魂陷害同志的、連黨的最關緊要的利益都不顧的人，對于看風使舵、找靠山、不講黨的原則的人，也不能輕易信任”；《鄧小平文選》，第160頁。

[[278]](#_278)關于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果以及產生這些成果的一些事件的詳細摘要，見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資料組編《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下），第274—280頁。

[[279]](#_279)《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160—161頁。

[[280]](#_280)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63—164頁。

[[281]](#_281)引自“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170頁。

[[282]](#_282)“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169頁。

[[283]](#_283)“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79期（1979年9月），第647頁。

[[284]](#_284)加賽德：《活躍起來！》，第194—196頁。

[[285]](#_285)以下對民主墻的簡要概括主要根據加賽德就親眼所見寫的報道《活躍起來！》，第212—298頁；加拿大新聞記者約翰·弗雷澤的《中國人：一個民族的肖像》，第203—271頁；戴維·S.G.古德曼的《北京街頭的呼聲：中國民主運動的詩歌與政治》中的分析和詩詞。加賽德和弗雷澤與這場“民主運動”的參加者有多次接觸。

[[286]](#_286)弗雷澤：《中國人：一個民族的肖像》，第245頁。

[[287]](#_287)這是對一位中國參與者的分析。引自古德曼《北京街頭的呼聲》，第141頁。此人于1979年5月被捕，他批評了知識分子的“傲慢”，并指責他們沒有參加這場運動。

[[288]](#_288)李宏寬（音）：《憲法頌》，引自古德曼《北京街頭的呼聲》，第70頁。

[[289]](#_289)加賽德：《活躍起來！》，第247—248頁。

[[290]](#_290)引自加賽德《活躍起來！》，第256頁。

[[291]](#_291)《鄧小平文選》，第172頁。

[[292]](#_292)《鄧小平文選》，第181頁。

[[293]](#_293)加賽德：《活躍起來！》，第256—257、262頁。

[[294]](#_294)《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文件》，第169頁。

[[295]](#_295)資料組：《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下），第281—289頁。

[[296]](#_296)華強調道德價值與物質刺激并重。參見“每季大事和文獻”，《中國季刊》第83期（1980年9月），第615頁。

[[297]](#_297)鄧與其他五位老干部辭職的通告與陳永貴辭職的公告是分開的，措辭也稍有不同，這表明，陳是不體面地離開，而且不是光榮引退。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文件匯編》，第175—176頁。

[[298]](#_298)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73—175頁；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下），第705—709頁。

[[299]](#_299)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下），第709—710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438—439頁；資料組：《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下），第290—291頁。

[[300]](#_300)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76頁。

[[301]](#_301)正如我已指出的，葉對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保留華的領導職務和在1977年勸說華重新承認鄧的領導職務負有某種責任。1981年6月六中全會開會時，葉劍英沒有出席，表面上說是生病了，但他寫信表示同意這次人事變動和對華國鋒的批評。一份正式的黨的報告書認為有必要發表這封信的摘要，以免人們對他的缺席產生誤解。資料組：《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下），第293頁。

[[302]](#_302)多姆斯指出，1980年2月的五中全會曾決定提前召開中共十二大，即在1982年十一大的五年任期結束前召開。他認為原先預期召開的時間是1981年年初，但由于在對毛的評價問題上和行政改革上出現分歧，會議被迫延期。這樣，十一大任期仍按期結束。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83頁。

[[303]](#_303)葉在給六中全會的信中，曾建議政治局常委前三名的排名順序應是胡耀邦、鄧小平、葉劍英，這就顛倒了他與鄧的排位。這也許是出于禮貌，也許是在葉所保護的華國鋒下臺后的一種現實主義的考慮。但鄧卻讓葉的名字仍然排在他前頭。

[[304]](#_304)《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審判》，第102—103頁。關于受害者的具體數字見第20—21頁。對這次審判的一篇很好的分析（附有摘要）收在戴維·邦納維亞《北京裁決：審判“四人幫”》一書中。關于審判過程的官方的全文本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江青的表現可參見第117—121、194—199、227—241、296—302、341—347、399—414頁。

[[305]](#_305)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80—182頁。

[[306]](#_306)《鄧小平文選》，第276、278頁。

[[307]](#_307)同上書，第282、283頁。

[[308]](#_308)鄧在這里指的是：在人民解放軍士兵們讀到鄧在接受一位外國記者采訪時對毛的有關評論時，他們表示認可。即：人民軍隊密切關注著外界輿論對毛的評價。

[[309]](#_309)《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32頁。

[[310]](#_310)將毛描述成一位悲劇性英雄是對中共在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后，對斯大林的提法的重復。事實上，這一概念是一種突破。迄今為止，蘇聯和中國都曾像摩尼教徒一樣強調善與惡、黑與白的簡單并列，不允許作模棱兩可的區別。如果一個人犯了錯誤，他要么全面洗雪自己的罪名，要么被指控為一名反動分子或反革命分子，這種對犯了錯誤的領導人的評價模式對政治和文學都有相當的意義。

[[311]](#_311)《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41—42頁。

[[312]](#_312)《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56頁。

[[313]](#_313)同上書，第48—49頁。

[[314]](#_314)如果布哈林被允許活下來的話，到斯大林死時，他只有64歲。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時，鄧已74歲了。

[[315]](#_315)《鄧小平文選》，第29、30、97—98頁。

[[316]](#_316)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71—172頁。多姆斯認為，至于許，他因沒有被任命為國防部長或總參謀長而深感憤怒，這也許是他在此時作出這一行為的另一動機。

[[317]](#_317)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第178—182、185頁。

[[318]](#_318)《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第94頁。

[[319]](#_319)閻景堂：“中央軍委沿革概況”，載朱成甲編《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下），第567 587頁。

[[320]](#_320)《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85頁。

[[321]](#_321)在討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有人建議黨的九大應宣布為非法，也有人提出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應被認為已不存在。鄧對此非常氣憤。可能因為他意識到這種提法意味著正式承認人民解放軍是十年動亂中唯一起作用的革命組織，而且也承認在中共不存在的時候它仍然存在，在中共沒有統治中國的時候它統治著中國。見《鄧小平文選》，第290—291頁。

[[322]](#_322)關于早期農村改革的各種形式，可見凱思林·哈特福德：“社會主義農業死了；社會主義農業萬歲！：中國農村組織的變遷”，伊麗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編：《毛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第31—61頁。

[[323]](#_323)參見特里·西科勒：“近期改革風中的農村市場和交換”，載佩里和汪編的《毛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第83—109頁。

[[324]](#_324)哈特福德提出，并不是所有農民都歡迎摧毀公社制；前引書，第138—139頁。

[[325]](#_325)參見理查德·J.萊瑟姆“農村改革對基層干部的影響”；前引書，第57—73頁。

[[326]](#_326)這一評論是根據作者本人和其他人在中國的觀察和交談所做。

[[327]](#_327)關于進行的一次討論，參見伊麗莎白·J.佩里：“社會騷動：增長中的怨言”，載約翰·S.梅杰編《中國簡況（1985）》，第39—41、45—46頁。

[[328]](#_328)參見喬治·厄本編《毛主席的奇跡：忠誠文學概要（1966—1970）》，第1—27頁。

[[329]](#_329)參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172—174、179—181頁。其他三項原則是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

[[330]](#_330)“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同上書，第303頁。

[[331]](#_331)這種困境大致上與西歐民主國家中黨的官員的情況有類似之處。在野時期，黨作為黨的生命力顯得突出。因為它是國家中用以發動“階級斗爭”的煽動性工具，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罷黜現政府。如果策略是成功的，并且黨的領導人成為政府部長，那么黨的作用將大大地減弱，因為它的領導人將集中精力管理國家并保證經濟的繁榮。從那時起純粹的黨的官員將起到次要作用，很少干預政府政策，但同時要求普通黨員保持對政府政策的忠誠。

[[332]](#_332)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后，即在胡擔任中國共產黨主席的短暫時期內，這也許有某些道理。但在1982年9月的十二大以后，即主席一職被取消，胡專任總書記之后，這就沒有道理了。我使用“形式上”一詞，是因為最終的權力當然是在鄧手上，不管他名義上的頭銜是什么。

[[333]](#_333)《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49頁。

[[334]](#_334)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強調法治引起了不少問題。關于對其中某些問題的討論，可參見R.蘭德爾·愛德華茲、路易斯·亨金、安德魯·J.內森《當代中國的人權》。

[[335]](#_335)“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310頁。

第五章 [[1]](#_1_Ben_Wen_Zhong_De_Guan_Dian_Sh)對美開放

在毛澤東時代的遺產中，對美開放可說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毛執政27年間所采取的主動外交行動中，中美和解最能表明他欲確立中國在世界上大國中的合法地位的決心。就近期意義而言，中美關系的恢復完全改變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在國際上的隔離、孤立處境；而其長遠意義則是結束了中美間外交長達20年之久的不正常狀態。如果沒有中美關系的恢復，北京在70年代和80年代登上國際舞臺將是很困難的，成就可能要小些。

從1968年開始出現中美和解的跡象起，毛就對和解的進程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盡管他明白中國與西方接近是戰略上的必需，但他對中國長期加入現行國際體制是極其不情愿的。戰略與政治上的需要使中國同資本主義世界和好，特別是要與美國及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主要對手日本和解。由于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毛很少承認他所采取的行動是虛弱無力所致，甚至也很少承認中國像它宿敵一樣都在積極謀求和解。因而毛從不完全接受將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起來后的種種后果。毛的這種態度一直持續到他去世；所以他一直支持其“文化大革命”的盟友反對那些更愿承認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后帶來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方面影響的領導人。

由于那些力圖執行毛的外交政策指示的領導人忙于解決中國內政的一些危急問題，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一波三折極不順利，也不完善。國際局勢的動蕩也干擾了中國的外交進程，致使中國雖然卸掉了以前外交政策所積累下來的沉重包袱（特別是與越南的關系），但是并沒有完全解決與美國和日本的長遠關系問題。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國領導人更迭的影響；領導人的更迭屢屢妨礙了中國許多重大的外交政策目標的實現。由于中央沒有明確一貫的外交政策指示，70年代大部分時間內中美關系在飄忽不定中發展。只是到了70年代末，客觀的需要和鄧小平在國內政治上的復出才使將近10年前便開始的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得以圓滿結束。

中國與西方國家關系的發展，與其說是雙方精心計劃的產物，不如說是中美政治制度不斷斗爭和經常對抗的結果。當毛主席、周恩來總理及其后的鄧小平試圖恢復自中國內戰以來即近乎中斷的中美關系時，頭幾年只是試探性的，極其脆弱。由于中美關系正常化的設計者是少數高層領導人，因此較易取得最初的突破，但同時也使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變得極易停滯不前，或發生逆轉。毛的日益衰老，周恩來健康狀況的不斷惡化，加上尼克松總統政治地位的脆弱，使早日完成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變得更加復雜。毛澤東與周恩來都未能見到他們為之奮斗的目標的實現；理查德·尼克松則因一些與此沒有關系的事件而被迫下臺，眼看著吉米·卡特奪去了自己巨大外交勝利的榮耀。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兩次被毛趕下政治舞臺的鄧小平與20世紀意識形態最強烈、長期以來主張與臺灣保持密切關系的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一起制訂了中美關系的原則，這些原則不依賴雙方關系的親密度，而是依賴共同的安全目標。

是何原因促使中國要與美國恢復關系？北京領導人對此有何爭論？出于何種愿望有關領導人才主張建立中美友好關系的？這些愿望是否已實現？中美和解的進程對中國后來看待外部世界有什么影響？這些變化對中國內政有什么影響？最后一個問題，向西方開放是否標志著中國真的與過去作了歷史性的告別？抑或是不會持久，僅僅是出于國家安全的緊急需要才這樣做的？在談論這些問題之前，有必要首先簡述一下該時期制定外交政策的特點及其對政策變化所產生的影響。

## 政治進程與中國的外交政策

對美開放反映了長期以來的戰略發展變化；這些變化直接影響了北京的安全考慮。下述三點變化特別重要：（1）由于美軍在越南的數量逐漸減少，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存在也相應縮減；（2）與此同時，蘇聯加緊在亞洲部署常規部隊和核力量，直接威脅著中國的安全；（3）尼克松政府公開宣布不參與蘇聯強壓中國的圖謀，這是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與領土完整的一種心照不宣但極為重要的承認。北京不可能忽視如此重大的戰略發展變化。在此情況下，擺脫“文化大革命”的那種孤立、仇外狀態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地緣政治學的邏輯并不能完全解釋北京的反應，還必須考慮到負責中國外交政策的個人和機構所起的作用。在考慮到的眾多內部因素中，有三點最為重要。第一是領導者個人的作用。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三位中國官員的獨一無二的權威極大地影響著中國與西方和解的進程。從60年代末開始對中美關系和解的重新研討，到70年代初兩國關系的初步突破，到70年代末中美全面外交關系的建立，再到80年代初兩國關系的再度疏遠和重建，他們一直掌管著中國的外交戰略決策。其他老資格的官員，特別是極少數高級軍事戰略家以及外交部內與周恩來長期共事的少數人員，也都在幕后對中美關系和解的進程起著極大的作用。但毛、周及其后的鄧對中國政策擁有最后決定權。

1949年以后的絕大部分時間里，這些領導人至高的職權與外交政策高度集權的特點密切相關。雖然其他人對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也有貢獻，但是很少有人說自己影響了中國外交政策“大政方針”的制定。比如，在外交與軍事事務上，只有毛的名望在他去世后的10年中仍舊保持著光彩。正如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決議中所肯定的那樣：

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并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2]](#_2___Guan_Yu_Jian_Guo_Yi_Lai_Dan)

看來沒有理由對這些評論提出疑問，毛的言行在超過1/4世紀的時間里主宰了中國的對外關系，其中包括指導中國與美國關系的恢復；周的聲望在國際上同樣很高；而（從某種更具隨意性的政治角度看）鄧小平對中國外交政策發展的影響也同樣是巨大的。

而在與美國官員的交往中，每位中國領導人都有自己鮮明的風格。就中國官員而言，個性與政策問題是合而為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因此說，中美關系最初的突破主要取決于亨利·基辛格、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建立起來的那種個人與政治的和諧一致；但是這種和諧一致卻從未在鄧小平與基辛格之間得到發展，特別是當中美外交政策出現分歧的時候更是如此。鄧小平明確表示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比賽勒斯·萬斯好；其部分原因是這兩位美國高級外交官的不同政策傾向，同時也是因為他倆截然不同的個性。從一開始中國高級官員就注重并著力與美國歷屆政府中的某一官員建立較密切的個人關系。如果缺少這種關系，中美關系就會破裂，或進一步惡化。理查德·所羅門抓住了這種個人之間交往的實質：

中國人與人打交道的最基本的特點是，首先設法認清外國官員中誰同情他們的事業、在他們的對手中培養一種友誼和責任感，然后，通過各種計謀來利用這種友誼感、責任感、自疚感和依賴感以達到他們的目的。[[3]](#_3_Li_Cha_De__H_Suo_Luo_Men____Z)

80年代中美關系完全正常化以后，這種現象在維持關系上就不常見了，重要性也下降了。

第二個因素是外交決策的不穩定性。盡管極少數官員決定了中國外交政策策略，但是他們的決定仍要受到中國官僚體制中當時進行的更為廣泛的戰略和政治論爭的影響。[[4]](#_4_Can_Jian_Li_Cha_De__Wei_Xi)在關鍵的外交政策問題上的意見一致也是與在國內政策問題上的意見一致相關聯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周的采取積極外交行動的主張是與他重建中國黨政機構的工作密切相關的。而那些對中國同時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行動最高興的人在混亂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沖擊也最少。[[5]](#_5_Tuo_Ma_Si__M_Ge_Te_Li_Bu____Z)盡管有時難以看清這種相關聯的政策立場，但周和鄧在特定情況下的重要政治地位是明顯地影響著他們的外交決策的權能的。

這種相關聯的特性還表現出了體制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又體現了個人權力之爭。官場上有句經典格言：“你的立場取決于你的地位。”像對美開放這樣具有戲劇性的政策變化，對官場上的政治組合和有限的財富的分配有著實質性的影響。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國防部長林彪。他的政治權力和對財富的擁有權實際上直接隨著中美關系突破的進展越來越小。關于林彪權勢在國內的喪失與毛、周同美國成功地建立起關系之間的某些聯系，將在下文探討。

第三點是個人之間激烈的政治斗爭，而不是既定外交政策的明確一貫性。政策的爭論僅僅是中國政治進程中固有的激烈的個人權力斗爭的一種手段。政策上的分歧雖然曾影響過這種權力斗爭，但與政治體制中的宗派傾向相比一般居于次要地位。[[6]](#_6_Lu_Xi_En__W_Pai_Yi____Zhong_G)這種現象最典型的事例是70年代初期和中期為繼承毛的位子而展開的激烈斗爭。盡管“四人幫”對周、鄧以及其他官員的攻擊以意識形態為掩護，但實際上是在毛暮年為爭取政治優勢而進行的一場重大權力斗爭。

中國人多次否認派系或權力斗爭與外交政策有任何聯系。這種否認反映了中國在審查其國家安全戰備問題時所存在的固有的微妙性與神秘感。如果讓人知道主要領導人在外交政策上有分歧意見，就會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削弱中國的談判地位。所以說，“四人幫”與鄧小平之間的斗爭完全是個人之間的斗爭，并不涉及到全球戰略問題。這似乎有悖于毛、周倡導的地緣政治邏輯。但不幸的是，毛對與西方發展關系既贊成，又討厭，舉棋不定，因為他不放心與西方發展關系給他國內政治帶來的后果。盡管條件已經具備，然而響個不停的仍是準備開場的鑼鼓。

因此，上述三點在不同時期影響了中國外交政策的走向。毛深信與美國建立關系很有必要，從而為中國全球戰略制定了新的方針。毛盡管愈來愈孤獨、衰老，但在中國外交事務領域里至高無上的威望與權威則是毫無異議的。然而主席對外交關系的興趣愈來愈小了，因為他在考慮過世后會產生的政治反響。周恩來身體的日益虛弱意味著毛將不會再有可信任的副手來負責中國的外交政策。因此外交政策便成了鄧小平與江青各自領導的敵對集團之間進行的廣泛權力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盡管60年代末那種極度孤立和仇外狀態已經結束，但是中國內部的政治斗爭仍在阻礙著對外關系的發展。7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國國家安全的需要與國內敵對勢力之間的互相斗爭一直交織在一起。因而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外交活動時斷時續，一直處于探索狀態。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事態發展的相互關系，我們必須先回顧一下促使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進行戰略思考的有關事件。

## 通往北京之路，1968—1972年

如前所述，對美開放起因于對兩個超級大國對中國威脅程度的重新評估。“文化大革命”期間，不斷傳出有關中國內部對美、蘇的看法的爭論情況；[[7]](#_7_Ru_Guo_Xiang_Kan_Bei_Kua_Da_L)但是北京的領導人似乎在忙于處理當時正在進行的派系斗爭及其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尚無暇對中國的安全狀況作出明確的評估。只是到1968年8月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們才注意中國的安全問題，因為當時同時出現了下面三種情況：（1）中國黨政權力機構的重新組建；（2）美國國內不斷高漲的厭戰情緒預示著美國將從越南撤軍；（3）蘇聯在中蘇邊界爭議地區不斷集結軍隊，心懷叵測。

（毛提到尚未解決的領土糾紛問題和中國針對蘇聯的仇外情緒引起了蘇聯的恐慌，）蘇聯1965年初開始在中蘇邊境加強軍事部署。早在1966年初，中國發言人就注意到了蘇聯在原來防衛力量較少的中蘇邊境的增兵活動。蘇聯增派地面部隊是準備使用的，首先是進行帶有挑釁性的邊境巡邏。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隨后發表的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論”（即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義”）使蘇聯有可能發動針對中國剛剛起步的核武器研制計劃的威脅性的、討伐性的軍事進攻。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周及其他中國領導人開始將蘇聯說成是“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即名為社會主義實為帝國主義的國家，認為蘇聯很可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突然襲擊。

在此情況下，周開始重新考慮在與兩個超級大國關系中堅持“兩大敵人”的概念的后果。盡管中國在其聲明中仍然強調美蘇之間的所謂“互相勾結”，但是，蘇聯直接的軍事挑釁與美國對中國所造成的威脅顯然是大不一樣的。雖然莫斯科不會輕易采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攻打中國，但是中蘇之間漫長的邊境線，使中國極易受到攻擊。1945年的滿洲之戰，使蘇軍總參謀部十分熟悉中國境內一些可能發生戰斗的地區的地形。另外，蘇聯還掌握所有中國武器系統的詳盡情況。盡管蘇聯東部地區遠離其軍事供給地，但是不久蘇聯的后勤供應能力便會得到改善。更為可怕的是，1969年夏蘇聯人已將轟炸機從東歐部署到了中亞。美國情報機構認為這些部署可能是在作襲擊中國核設施的準備。[[8]](#_8_Ai_Lun__S_Hui_Ting___Zhong_Me)美國主要依靠其部署在遠離本土幾千英里外的空軍和海軍力量“遏制”中國；而蘇聯則有其固有的地理優勢，它的軍事力量（包括地面部隊、空軍和核武器）就部署在蘇聯本土上，對中國的工業中心和北京新興的戰略武器都構成了長期的直接威脅。

緊張氣氛最終釀成了1969年冬的邊境流血沖突。沖突是因爭奪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而發生的。正如第三章所述，3月的敵對行動很可能是中國方面首先挑起的；中國人似乎想不僅是在口頭上、而且要在行動上警告蘇聯的軍事集結所造成的危險。然而，蘇聯方面隨后敵對行動的不斷升級和莫斯科蘇軍總參謀部的公開警告，使大規模毀滅性的沖突隨時都有可能發生。8月末，在新疆發生的敵對行動以及蘇聯官員私下做出的有關可能對中國發動懲罰性戰爭的不祥暗示，表明情況越來越糟。北京的官員看來是真的擔心莫斯科會發動大規模的武裝進攻了。

中國對蘇聯軍事、政治壓力的不斷升級主要做出了以下三點反應：（1）在近期，通過與蘇聯直接談判以控制發生大規模軍事沖突的危險；（2）從長遠考慮，在不過分惹惱莫斯科的前提下于中蘇邊境部署大批裝備精良的軍事力量；（3）主動積極從事政治、外交活動，包括直接向華盛頓作出某種表示。這三方面的工作在同時進行，然而第三條，也許是最關鍵的一條“腿”卻行動得最為緩慢。

1969年夏是中國最有可能受到蘇聯突然襲擊的時期，但是直到1971年春末，北京才不再含糊地表示準備接受美國的高層使者。為什么時間拖得這么長？首先，新上臺的尼克松政府對中國想重新改善與美國關系的最初表示沒有迅速作出反應。1968年11月2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布中國準備來年2月底恢復與美國在華沙的大使級談判。更重要的是，這位發言人還說中國有興趣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是中國長期以來發展國家間關系的準則，但6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對美國的政策中卻缺乏這一點）的基礎上與華盛頓達成協議。尼克松新政府雖然同意了北京提出的談判時間，但是尼克松總統原先的對華看法減少了中美關系近期改善的可能性。1969年1月24日，中國一位低級外交官在荷蘭尋求政治避難；中國為此提出了抗議，但是一直等到2月18日（預定恢復大使級談判的前兩天）才宣布不參加談判。一直到1970年1月華沙談判才得以恢復。

盡管中國尋求中美和解的意向比較明顯，但是美國對中國最初的和解表示卻未能積極響應，從而妨礙了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提出的積極外交政策的實施。[[9]](#_9_Guan_Yu_Yin_Ru_De_Ci_Zhong_Ta)10月19日，中國打破了對美越巴黎和談長達5個月的沉默，第一次含蓄地聲明支持美越通過和談結束戰爭。11月底，北京重新發表了毛澤東在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其中有段引人注目的話是：“我們不應當怕麻煩、圖清靜而不去接受這些談判……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此外，北京將美國描繪成一副孤獨、衰敗的景象，并發表了尼克松宣誓就職的演說詞以資證明。

然而1月底，毛自八屆十二中全會以來第一次公開露了面。中國高層領導人的大型聚會表明上層可能存在著緊張狀態；這種緊張狀態可能是國內外事態發展造成的。當中國取消即將開始的中美華沙談判時，它的外交政策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外交人員的叛逃被說成是“美國政府精心策劃的嚴重反華事件”，尼克松與林登·約翰遜被視為“一丘之貉”。對美國的評價重又強調了美蘇“勾結”；而這一點在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是不怎么提了的。所有這些都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所倡導的強硬外交政策的特性。隨著1969年初中蘇緊張局勢的不斷加劇，中國外交政策短暫的緩和趨勢停止了。中國越來越立足于戰爭了，其突出表現是沿中蘇邊境集結軍事力量。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開始認真地在內部對中國的戰略和外交政策做出廣泛的重新評估。[[10]](#_10_Ci_Bu_Fen_Shi_Yi_60Nian_Dai)“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及其親信完全控制了軍事指揮部門，實際上在中國國防戰略的制定和執行上取代了其他幾位尚健在的元帥。最大的犧牲者是陳毅，他是外交部長，是周恩來最親密的政治盟友之一。他雖然受到了沖擊，但仍是中國軍事事務上的一個骨干。1968年后期，國內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穩定，中國外交政策又開始趨于正常。中蘇邊境沖突爆發以后，周恩來立即將能起主要政治、戰略作用的陳毅放到真正能起積極作用的位子上。

3月5日在珍寶島發生了第一次沖突，周恩來命令陳毅召集一次國際形勢特別討論會，參加會議的有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在此之前，毛澤東顯然已提出要成立類似的組織，只是中蘇沖突促使其立即誕生罷了）。在外交部官員的參與和協助下，討論會從1969年3—10月總共召開了23次會議，向黨中央提出了許多重要報告。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便是蘇聯是否有向中國發動直接軍事進攻的能力和意圖，另外尚有美蘇是否會互相勾結共同反華的問題。陳毅認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仍然是首要的，實際上是否認了美蘇聯合反華的可能性。據稱，陳毅是與會者中第一個作出這一判斷的人，其他人后來也同意了他的觀點。陳毅元帥給毛的一份報告中提出，激烈的邊界沖突使中國有必要采取積極的外交姿態，首先應立即恢復中美大使級華沙談判。一年多之后中美會談終于得以恢復。

尼克松政府公開聲明美國不會參與蘇聯威懾中國的圖謀；顯然北京領導人受到了這一聲明的鼓舞。此外，美國領導人也開始發出信號，有意與北京打開關系。1969年8月1日，尼克松總統（當時正在巴基斯坦訪問）向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表示他有意與北京打開關系，并要葉海亞·汗把他的意思轉告中國。[[11]](#_11_Heng_Li__Ji_Xin_Ge____Bai_Go)然而，中國人由于起初未能與美國取得政治上的突破，所以沒有很好地直接利用美國政策立場的這一轉變。對中國人來講，避免戰爭的關鍵所在是與莫斯科會談；因此，北京很快就邀請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在參加完9月份舉行的胡志明葬禮后訪問北京（柯西金接受邀請時，已準備返回莫斯科了，但還是接受了邀請。這表明局勢是非常緊張的）。周恩來與柯西金達成了10月份恢復中蘇邊界談判的協議，中蘇關系的嚴重危機期總算過去了。盡管中蘇邊界談判沒有什么突破，但是正常的政治、外交接觸的恢復卻避免了最糟糕的事情的發生。尼克松政府盡管當時對中蘇對抗的危險十分敏感，并開始了對中國政策的重大變革的探討，但也只是才開始尋找與中國對話的渠道。

不過，雖然尼克松政府不斷表示有意改善同北京的關系，但1969—1970年美國的政策中仍然有著許多不利于中國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東西。在1969年11月尼克松和佐藤發表的聯合公報中，日本第一次公開聲明對臺灣和南朝鮮的安全負有責任。該公報很難使北京相信美國有與中國和解的意圖，也使北京在1972年以前一直警惕并抨擊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盡管尼克松表示有意從越南撤軍，并鼓勵其亞洲盟國對自己國家的安全負起更大的責任來；但是美國在越南卻越陷越深。1970年5月美國侵入柬埔寨；1971年初南越侵入老撾。這些侵略行動無疑拖延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與越南的友好關系對北京來說還是很重要的，除非與美國關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十分明朗了，否則中國人不想破壞與河內的關系。

再者，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外交機構依舊處于混亂狀態。直到1969年5月，北京才開始在一定的限度內重派駐外大使。周恩來只有少數幾個忠于他的人可以使用。外交部長陳毅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能夠重新起用的其他高級官員又正忙于黨政機關各部門的重建工作。大多數在40年代即熟悉美國、并與美國官員打過交道的人（特別是喬冠華和黃華）在其政治健康狀況允許的情況下被指派處理事務。有關的人員再多，他們的政治權力再大，對中美關系正常化都不起決定性作用；只有周和毛本人才能保證政策的實施。

從中共九大結束到林彪死亡這段時間內的政治組合情況一直是十分微妙的。林彪及其親信直接控制的人民解放軍是中國當時最強有力的機構，而軍隊又擁有獨立的運輸與通訊系統。林彪及其同黨在中央委員會與政治局中占有極大的優勢，任何有悖于他們利益的重大決策都很難實施。當中蘇邊界談判于10月份恢復的時候，林彪及總參謀長黃永勝便發布了一號通令，聲稱其目的是為了“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這些活動很可能是林彪個人搞起來的，沒有得到毛澤東的首肯；林彪想借此鞏固對軍隊的控制和強化對政治權力的把持。[[12]](#_12___Nie_Rong_Zhen_Hui_Yi_Lu)一號通令不僅使所有的部隊處于戒備狀態，還使林彪將其他大多數元帥疏散出北京，名義上是為了保證他們的安全，實際上則是將他們排擠出決策圈子之外。人們不清楚當時政治局是否仍在正常發揮作用。毛對林彪及其軍事小集團的懷疑已相當嚴重，他搬出了中南海，很長一段時間里住在北京他認為更安全的地方。[[13]](#_13_Luo_Ke_Shan__Wei_Te_Ke____Ji)

由此看來北京認為對中美初期的接觸要絕對保密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兩國參與談判官員人數少對保證談判的成功是重要的。尼克松和基辛格認為，依靠常規的官方渠道將使他們的努力歸于失敗；而周可能認為這事與其政治生命休戚相關。

中國人從來沒有正面詳細報道過林彪反對中美和解的情況，他們主要指責他謀害毛澤東的陰謀和后來叛逃蘇聯的罪行。[[14]](#_14_Hua_Fang__Yin____Lin_Biao_Li)官方在提及林叛逃時，也沒列出林與蘇聯有什么直接聯系的證明，只說林希望能得到蘇聯的支持。只有周一些婉轉的講話和毛的比較具體的言論可以證實林反對中美關系正常化的說法。周在其1971年4月21日的信中突出表示北京歡迎美國派遣特使；他說之所以拖了3個月之久才回復尼克松總統1月初的信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形勢”。[[15]](#_15_Ji_Xin_Ge____Bai_Gong_Sui_Yu)基辛格推測周恩來是指2月份南越對老撾所采取的行動，或是由于北京當時正在尋找與華盛頓聯系的更安全的渠道；而更為合理的解釋應是毛與林之間日益緊張的冷淡關系。隨著冬末林政治狀況的不斷惡化（林彪開始失去國防部長的權力），1971年春，中美和談的速度在加快。尼克松訪華期間，毛進一步指出，“有一伙反動分子反對我們和你們搞好關系……結果，他們乘飛機逃到國外去了。”[[16]](#_16_Tong_Shang_Shu__Di_1061Ye)

其他證據也表明，中國軍方在對中美和解開始階段是持反對意見的。據基辛格回憶，1970年7月有兩架米格19飛機企圖“攔截并想擊落”一架在離中國海岸數百英里以外的上空執行例行搜集情報任務的美國飛機。中國空軍進行此類攔截活動已達5年之久。[[17]](#_17_Ji_Xin_Ge____Bai_Gong_Sui_Yu)由林彪的親信吳法憲指揮的空軍已堅定地站在“文化大革命”激進派一邊，擊落美國飛機很可能使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出現偏差，至少會拖延時間。就在基辛格秘密訪華幾周后，總參謀長黃永勝在慶祝1971年建軍節的重要講話中對美國的越南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說美國與蘇聯一樣對中國的安全構成了威脅。《紅旗》雜志在發表黃永勝講話的同時，刊登了一篇為對美開放進行辯護的權威性的文章。該文對美國和蘇聯的威脅作了明確的區分，與兩個超級大國互相勾結的論點截然不同。[[18]](#_18_Zhong_Gong_Hu_Bei_Sheng_Wei)周恩來（在黃永勝發表講話時正接見詹姆斯·雷斯頓）說黃永勝總長的講話并不反映中國外交政策的實質，強調中國愿意進一步改善與美國的關系。[[19]](#_19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1Nia)葉劍英元帥是唯一一位公開支持中美關系正常化的軍人，7月初，他曾到北京機場迎接基辛格。

然而，說林彪為了與周恩來的聯美政策相抗衡而采取了“親蘇”立場似乎令人懷疑。林彪死后，一份黨內文件曾引用了林彪的一句話（可能只是句氣話，而不是有意識說的）：“如果周恩來能邀請尼克松，我就能邀請勃列日涅夫。”[[20]](#_20_Si_Tan_Li__Qia_Nuo___Lin_Bia)1973年8月中共召開十大，周恩來在報告中譴責林彪及其同伙“要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聯合帝、修、反，反華反共反革命”。[[21]](#_21_Zhou_En_Lai___Zai_Zhong_Guo)但這些指責并沒提出林彪等人從事積極親蘇活動的“證據”來。如果說有什么證據的話，可以列出這么兩條：人民解放軍在中蘇邊境進行挑釁性的巡邏及后來全國總動員令的下達。1969年夏和初秋，戰爭謠言四起，形勢十分緊張；在這種氣氛中，與蘇聯的軍事對抗使林彪獲得最直接的政治利益。直到9月周恩來在北京機場與蘇聯總理柯西金會談后，特別是雙方決定恢復1964年停止的中蘇邊界談判后，中蘇緊張局勢才得到緩和。是毛和周，而不是林認識到了無限期地立足于打所存在的潛在危險。

林的最大問題是他與毛的關系。1970年末、1971年初，他意識到主席對他越來越失望，實際上他也肯定毛已做出要將他趕下臺的決定。如果說存在什么林彪與蘇聯“狼狽為奸”的令人信服的證據的話，那可能就是他的不可饒恕的政治變節了。后來對他的大量指責說明了這一點。但這些指責并沒說到點子上。確切地說，所謂的林彪親蘇傾向主要表現在他叛逃和在廣東組建獨立的政權基地，正如一份內部文件所說的那樣，林彪要“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林彪還企圖勾結蘇修，對我實行南北夾擊……”[[22]](#_22__Guan_Yu_Lin_Biao_Fan_Dang_J)如果林彪在1971年9月真的能到蘇聯，他的背叛對莫斯科來講是宣傳與情報上的最大勝利。然而，此事沒能成為現實。

在處理中國與兩個超級大國關系上，林彪“兩面樹敵”。他這樣做既有政治上的考慮，又有本部門利益上的考慮。作為60年代后半期的國防部長，林大大地增加了中國的軍費開支，這表明中國在南北邊界線上抵抗軍事壓力的能力十分薄弱。1965—1971年間，中國國防開支每年平均增加10％；考慮到“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經濟狀況和混亂情形，這個數字是十分驚人的。這些軍費開支主要用于購買武器裝備和在中國內地建設新的軍事設施上；這表明中國軍隊在這時期承擔了更多的作戰責任。[[23]](#_23_You_Guan_Xiang_Qing_Can_Jian)很難說林歡迎這樣的外部軍事壓力，也很難說他希望中國在同時與華盛頓和莫斯科的對抗中處于孤立與易受攻擊的狀態。然而，林確實是這種形勢下的最大受益者，因為國內的混亂和來自國外的威脅使主席感到林及其軍事力量不可或缺。1969年制定的黨章規定林彪為毛的接班人；在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中人民解放軍的勢力也進一步加強。這樣，林彪的地位實際上已是固若金湯了。

然而，中國政治進程的變化——可能主要是年邁的黨主席對林彪的野心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懷疑——使形勢急轉直下。回顧一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幾乎在林成為毛的法定繼承人之日開始，毛就想除去林了。[[24]](#_24_You_Guan_Dang_De_Wen_Jian_Hu)盡管對林后來的政治失敗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主要是說他想謀害毛，其實，所有這些說法中最基本的一點是對權力的不懈爭奪。

說林反對與美國改善關系便是這方面最好的證明。在正常情況下，作為軍事長官的林對與長期的對手和解，是應該十分謹慎的。當毛和周開始主動表示與尼克松言和時，美國尚深陷在越戰之中，還對中國安全形成嚴重的威脅。但是，這時候是不正常的時期。林成了毛的接班人后，毛決定重新組建在“文化大革命”中嚴重受損的黨和政府權力結構。這些決定對周及其政治伙伴非常有利，而對林的權威和長期的政治地位則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林對中國外交政策發生重大轉變的形勢頗感不安，因為他肯定中國與華盛頓的和解是動搖他政治權力的步驟之一。

1970年8、9月間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后，毛加強了對林的攻擊，與此同時，他對美國的態度也日益好轉了。10月1日，埃德加·斯諾及其夫人在周恩來的陪同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站在毛的身邊，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他們在一起合影留念。這不僅是一個美國公民第一次享此殊榮的問題；毛借此首次公開表示有意改善與美國尚處于試探階段的關系。[[25]](#_25_Ji_Xin_Ge____Bai_Gong_Sui_Yu)周與尼克松政府的初步聯系（1970年12月一1971年1月）表明林同毛一樣是贊成與美國進行高層接觸的，[[26]](#_26_Ji_Xin_Ge____Bai_Gong_Sui_Yu)但是，林在中美和解過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周在1971年5月末的信中邀請基辛格秘密訪問，同時邀請尼克松隨后公開訪華，信中只說是得到了毛的贊同，并沒有特別提林的名字。[[27]](#_27_Ni_Ke_Song____Ni_Ke_Song_Hui)如果還需要進一步說明的話，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首次訪華期間，周恩來的行為便是很能說明問題的。當這位國家安全顧問向中國高層領導人贈送禮品的時候，周代表中國領導層向他表示了謝意，但是沒有提及林的名字。[[28]](#_28_Suo_Luo_Men____Zhong_Guo_Ren)事實上，林從一開始便是中美和解進程中的多余人物。自從中蘇沖突開始以后，林就很少參與制定中國許多重要的外交政策了；這說明他的政治地位在迅速下降，1971年9月他不光彩地叛逃蘇聯時就全完了。

林似乎完全贊成“文化大革命”的孤立政策和好斗情緒；這與1970年初已發生變化的形勢很不相宜，當時蘇聯被看成是頭號敵人，美國是第二號對手。后來一篇文章評論道：

林彪說什么“我們同帝、修、反沒有共同的語言，要同他們劃清界線，要同他們斗爭，要同他們對立，而不能同流合污”。……對敵斗爭的一個最主要的戰略思想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組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集中主要力量，去打擊最主要的敵人。……“四面出擊”還把馬列主義者所制定的許多對敵斗爭的重要策略思想踐踏得一塌糊涂。……實行“四面出擊”的結果，自然是造成到處樹敵，使我們瀕于孤立的處境。[[29]](#_29_Zhang_Ming_Yang___Lin_Biao_H)

正如阿爾巴尼亞的一份文件所述，與美國和解標志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終結：

隨著尼克松的訪華，中國加入了重新劃分世界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陣線和競爭者的行列；中國在想要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尼克松的訪問為中國開辟了與美帝國主義及其同伙和解與聯合的道路。同時……與美國結盟標志著中國領導層已脫離了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脫離了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爭。[[30]](#_30_1978Nian_7Yue_30Ri__Zhi_Zhon)

最重要的一點是，對美開放結束了中國對內對外長達10年之久的意識形態僵化狀態。尼克松訪華是中美和解進程中對美開放的重大步驟。中國外交政策擺脫了僵化的教條狀態；主要的受害者是林彪。

中國的資料對北京沒有回答的1968年末的那個建議只是一筆帶過；又只是附帶說一下這可能拖延了中美和解的進程。這些資料還對1969年北京對蘇聯發動攻擊的可能性的嚴重擔憂作了輕描淡寫的敘述。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卻常被描述為急切盼望中國人邀請他們訪問北京的人。埃德加·斯諾說，1970年11月初周恩來對美國的意圖提出了懷疑：

〔周〕 回憶說，1969年尼克松剛上臺時，他聲明愿意緩和緊張局勢，并且想與中國談判。尼克松還進一步表示，如果華沙地方不合適，和談可以在中國舉行。北京回答說，這樣很好。討論臺灣問題，尼克松本人來行，他派使者來也行。然而，尼克松對此沒有作出反應。繼而在1970年3月發生了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國人據此認為對尼克松的言行不能太認真了。[[31]](#_31_Ai_De_Jia__Si_Nuo____Man_Cha)

但是，這個月底尼克松的另一封私人信件又使北京受到了鼓勵，但是否作出反應仍有疑慮。12月中旬，毛對埃德加·斯諾說：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國人左、中、右都讓來。為什么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決，在暫時。……我說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32]](#_32___Mao_Zhu_Xi_Hui_Jian_Mei_Gu)

與此同時，毛還非常關注尼克松訪華對美國的政治影響：“談到尼克松可能的中國之行，主席特意問到1972年是否要舉行總統選舉？然后他又說，尼克松先生可以先派一名特使來，他本人在1972年初以前似乎不宜來北京。”[[33]](#_33_Si_Nuo____Man_Chang_De_Ge_Mi)在中美最初進行試探性接觸的時候就出現了“誰需要誰”的爭論。首先，北京不希望以需要者的身份出現；是美國想進行這樣一次會談，也是美國想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來解決棘手的臺灣問題。

尼克松訪華前夕，周恩來在內部作了一個報告，這份自信充分反映在這份報告中：

美帝國主義頭子的訪問……使美國對華政策破了產……蘇修利用美國侵略越南的時機，極力擴張其在歐洲與中東的勢力范圍。美帝國主義沒有任何選擇，只能同中國改善關系，以便與蘇修相對抗。……由于尼克松內外交困，所以，他強烈要求訪華，他來時，不得不帶些東西來。否則，他會發現他回國后無法向國人解釋清楚。[[34]](#_34_Zhou_En_Lai___Guan_Yu_Guo_Ji)

周對國內的聽眾說，尼克松急切地、嚴肅地要求與中國建立關系。毛和周認為，他們只是順應美國要建立這種關系的熱切愿望。他們聲稱，尼克松不應空著手來。

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盡管中國人說是尼克松政府（更不用說追求總統職位的許多民主黨人了）急于要求得北京之行的準許的，但是中國自己的動機卻是掩蓋不住的。基辛格秘密訪華兩周后，《紅旗》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最坦誠地公開講述了對美開放的正當理由：竟不含糊地區分了兩個超級大國對中國威脅的程度及其對北京安全考慮所產生的影響。雖然名義上是在評價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戰略，但是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差別做了區分卻有鮮明的現實意義。文章的作者認為，無產階級應把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作者還指出，“毛主席制定的對敵斗爭策略原則是堅定的原則性和高度的靈活性的辯證統一”。[[35]](#_35_Zhong_Gong_Hu_Bei_Sheng_Wei)

中國人與尼克松政府私下達成的諒解依然是個讓人琢磨的問題。許多觀察家認為，尼克松和基辛格為了使中國人支持美國在其他地區的政策，曾就一些重要問題向中國提出過私下保證。[[36]](#_36_Li_Ru__Xi_Mo__He_Shi_De___Qu)十有八九，臺灣問題算是其中之一。1970年末，毛告訴埃德加·斯諾：“除非尼克松想談臺灣問題，否則他就不能來。”[[37]](#_37_Yin_Zi_Shang_Shu__Di_367Ye)（毛主席的原話是：“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來，他自己不來，要來談是那個時候。”——譯者）的確，美國駐華沙大使沃爾特·斯托賽爾在1、2月份已經向北京轉達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重要讓步，美國保證減少（并暗示要最終撤出）其駐臺灣的兵力。米歇爾·奧克森伯格說斯托賽爾與中國代辦雷陽在1970年的兩次會晤是“非同一般的”。奧克森伯格說：“美國第一次承認，這是一個要由中國人自己來和平解決的問題。而中國人則放棄了他們以前的立場：即問題不解決，關系就不會改善。”[[38]](#_38_Mi_Xie_Er__Ao_Ke_Sen_Bo_Ge)作為這種保證的回報，中國人對基辛格和尼克松發出了訪華邀請。[[39]](#_39_Xi_Mo__He_Shi____Quan_Li_De)但是，美國當時主要關心的是越南問題，尼克松政府竭力想使中國至少悄悄同意美國撤出這場沖突的戰略。

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后，中國人開始敦促河內在維持南方西貢當局現狀的情況下與華盛頓達成和解。[[40]](#_40_Tong_Shang_Shu__Di_375__376Y)越南外交部發布的白皮書聲稱，北京勸告河內“抓住有利時機，首先解決美軍撤出越南的問題，并注意解決美國戰俘問題。推翻西貢傀儡政權要從緩而行”。然而這份文件表明，中國有其明確的解決問題的次序：

1971年7月13日，中國高級代表團（由周恩來率領）說：在與基辛格會晤期間，印度支那是討論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基辛格說，美國將這個問題與臺灣問題的解決聯系在一起。美國聲稱，只有美軍撤出印度支那以后，才能撤出臺灣。對中國來說，美軍撤出南越比中國進入聯合國更重要……

1972年3月初……中國領導人的一位代表解釋說，要使中美關系得以正常化，使遠東局勢得以緩和，就必須先解決越南和印度支那問題。我們不要求先解決臺灣問題，因為這是個次要問題。[[41]](#_41__Guo_Qu_30Nian_Yue_Zhong_Gua)

越南堅持認為中國人口是心非。越南外長阮基石說：

尼克松訪華以后，毛澤東告訴范文同總理，他的掃帚要想打掃干凈臺灣還不夠長；我們的掃帚要想將美國人掃出南越也還不夠長。他要阻止我們統一，迫使我們承認南越傀儡政權。他為了美國而犧牲了越南。[[42]](#_42_Jian_Ruan_Ji_Shi_1982Nian_3Y)

根據華盛頓的指示，北京向河內傳達了美國的警告：如果越南拒絕美國的談判建議，戰爭就有重新升級的危險。[[43]](#_43__Yue_Zhong_Guan_Xi_Zhen_Xian)中美和解首先最嚴重地損害了中越關系；這使越南后來認為，加強與莫斯科的關系對減輕來自北京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是至關重要的。

1971年春，中美進行著高度秘密的正式接觸；中蘇邊境最嚴重危機已經過去。盡管沖突的爆發仍然沒有完全排除，但是爆發的可能性已很小了；這主要是因為軍隊對中國內政的影響消失了，文官權威恢復了。由于中國所受到的壓力減弱了，而尼克松又急切期望在1972年大選之前使中美關系有所突破，毛和周認為他們手里的牌好多了。

然而，當尼克松即將來訪之際，國內的對立再次干擾了中美關系。江青及其同伙清楚地認識到即將到來的總統訪問會給周恩來帶來政治機會，據說他們公然反對這位總理一手掌管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實施。[[44]](#_44_Shang_Mian_Zhe_Duan_Hua_Zhon)在11月基辛格第二次訪問和1972年1月亞歷山大·黑格先遣訪問期間，激進派可能曾提出他們有權指導與尼克松會談的要求。他們反對的不是中美和解本身（特別是因為毛在和解過程中的核心作用），而是反對總理獨掌中國外交政策的大權。黑格訪問北京期間，激進派發表了一篇猛烈抨擊“美帝國主義”的文章。看來周對這篇文章的發表很生氣；他說這篇文章違背了毛主席的戰略指示，并不反映中國的外交政策。雖然周把這篇不合時宜的文章所帶來的損失限制在了最小范圍內，但是林彪死后4個月中，激進派的阻礙作用又表面化了。江青用革命現代舞劇招待尼克松一行，表明她贊成對美開放。這也許是周的有意安排，讓激進派表面上介入中美和解的進程。

尼克松訪問期間所下的賭注太大，不允許有任何失敗。從1972年2月21日周在北京機場柏油路上迎接尼克松總統的那一刻開始，實際上就保證了尼克松訪問的成功。雖然美國不能保證毛會與尼克松見面，但尼克松到達北京的第一天晚上便造訪中南海，這使美國人大為釋懷。第二天，《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了毛澤東對這次訪問的贊揚。美國記者注意到，周恩來在參加完宴會后親自校對了校樣。毛說他在1968年就“投過你（尼克松）的票”，1972年仍投他的票。由于毛將自己嚴格地限制在幕后，所以毛保證要使尼克松的訪問成為周的成功。

尼克松訪問期間，雙方都十分關心起草一份確定指導未來中美關系的廣泛原則的文件。1972年2月28日發表的《上海公報》就是這樣一份精心擬定的文件。公報同時發表了各自國家的方針政策。[[45]](#_45_Suo_You_Yin_Yan_Suo_Yong_De)對中國人來說，公報有四個方面最為重要：第一，雙方保證“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一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第二，共同聲明“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第三，共同反對“任何大國與另一大國進行勾結反對其他國家，反對大國在世界上劃分利益范圍”。第四，美國方面關于對臺政策的一段長篇聲明：

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要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盡管美國在支持中國堅持的一個中國的立場上的態度不是毫不含糊的，但是尼克松政府決定不支持中國和臺灣統一的主張。美國的兩位政策分析家在其早些時候出版的著作中提到，美國的立場是“一個中國，但不是現在”。[[46]](#_46_Li_Cha_De__Mu_Er_Si_Ting___M)周同他的助手們（特別是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在這一敏感問題上毫不妥協。為了避免僵局以及保持1970年初在華沙曾私下表明的立場，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得不同意中國對臺灣擁有主權的觀點。

這樣，中國人感到在會談中贏得了一大勝利。他們在公報中只作了最小限度的讓步；而美國則面臨微妙的任務：即作為執行一項最終撤出臺灣的長期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先行實現其減少駐臺美軍的承諾。在至關民族利益的問題上，中國人認為他們沒有為了中美和解而出賣原則。然而，毛和周同意了無限期地延長中國與臺灣的分離狀態。

中國人認為國家安全的需要比立即解決臺灣問題更重要。基辛格在其回憶錄中說道：與美國建立可靠的關系改變了中國與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性質，使中國免去了兩線作戰的威脅（況且兩面的敵人都很強大），迫使莫斯科在考慮對中國施加壓力或公然進攻中國時要三思而行，并使北京不再擔心莫斯科和華盛頓會互相勾結實施反華戰略。[[47]](#_47_Ji_Xin_Ge____Bai_Gong_Sui_Yu)1971年8月，美國又私下保證，如果蘇聯把因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戰爭而日趨緊張的中蘇關系升級為武裝沖突的話，美國將給予中國軍事援助。[[48]](#_48_Tong_Shang_Shu__Di_906__910)盡管這種可能性與基辛格所講的相差甚遠，但卻使北京更加相信華盛頓是把中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點的。

無論就所做的還是就所說的而言，中美和解對地區安全的意義也是十分重要的。當尼克松總統表示無意威脅中國時，毛回應道：“我們既不威脅日本，也不威脅南朝鮮。”[[49]](#_49_Mao_Ze_Dong_He_Ni_Ke_Song_De)這些諒解不僅使美國部署的反對中國的軍事力量減少了，同時表明中國默認了美國軍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存在，也默認了美日共同安全條約。后來透露出的消息表明，中美關于日本作用問題的爭論非常激烈。60年代末、70年代初，無論就個人還是就政治而言，北京都十分討厭日本佐藤政府；這不僅僅是因為佐藤同情臺灣，還因為1969年11月發表了尼克松—佐藤聯合公報。這位日本首相在公報中首次聲稱：“大韓民國的安全對日本自身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還說：“維護臺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也是日本安全最重要的因素。”[[50]](#_50_Yin_Wen_Jian_Li_Ji_Yin__Yin)美國應允日本在該地區擴大防御作用的前景使中國感到很擔心，因為正面對蘇聯強大的軍事壓力的中國在與美國建立互相依賴的關系之前，可能要面對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

因此，周和毛曾竭力要尼克松和基辛格澄清日本在該地區的安全作用。對北京來說，一個與美國結盟的日本當然比獨自實現防御目標的日本更為有利，哪怕這種防御作用要受美國的允許和支持。根據尼克松后來的披露，雙方就安全保障條約是否合宜問題有過“艱苦的談判”。尼克松說：“我們告訴他們，如果你們試圖阻止我們保護日本人，我們就讓他們擁有核武器。”中國人則說：“我們不希望這樣。”[[51]](#_51_Ni_Ke_Song_De_Ping_Lun_Biao)我們無從證明這些講話的可信度；但是，這種直率的交談使我們更容易理解為什么中國當時一再發出“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警告了。這也有助于說明為什么《上海公報》中要提及中國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和向外擴張”和支持一個“獨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日本”了。[[52]](#_52_Yin_Zi_Suo_Luo_Men___Zhong_G)

盡管存在著爭議和不確定性，1971—1972年中美關系的突破還是使中國在中美關系方面的投入得到了較大的收獲。尼克松的訪問也為加速改善中日關系鋪平了道路。但直到佐藤下臺，北京才表示有興趣全面恢復與日本的外交關系。[[53]](#_53_Li_Ji_Yin__Yin_____Ri_Ben_Mi)一位以前曾極其仇視中國共產主義的美國總統的訪華極大地提高了北京的聲望；而一位曾經是中日戰爭中的一名步兵的田中角榮首相的訪華就更具有深遠意義了。在極短的時間里，毛和周解決了林彪的問題；1971年10月25日臺灣被逐出聯合國，而當時基辛格正在中國進行第二次訪問；蘇聯孤立中國的幻想破滅了，北京的政治和外交威望極大地提高了。所付出的最大的政治代價是北京與其共產主義世界的長期盟國（特別是越南和阿爾巴尼亞）的關系（疏遠）。然而，與地拉那關系的惡化只是個小小的代價；而北京謀求盡快結束越南戰爭，雖然可能河內將其忠誠轉向莫斯科，但與美國密切關系卻是件無價的大事。對美開放起初只是順應60年代末形勢的深刻變化，但這一進程的開始卻影響了整個東亞局勢的發展。

## 停滯與動亂，1973—1976年

1973年初，展望中美關系似乎很樂觀。尼克松總統取得了1972年11月大選的巨大勝利；1973年1月23日，美越簽署了巴黎和平協議。這些不僅預示著中美關系將穩步發展，也緩和了東亞地區的緊張局勢（顯然，這與美國人從臺灣撤軍有關）。中國多半期待著美國在尼克松第二個任期結束之前斷絕與臺灣的關系、并在北京建立美國大使館，然而不知道是否有美國官員曾對此作過明確的表示。[[54]](#_54_You_Guan_Hou_Yi_Ge_Wen_Ti_De)另外，中美關系的發展將不再會有越戰的干擾。盡管河內領導人十分懷疑中美兩國在以犧牲越南利益和使柬埔寨的戰爭繼續惡化為代價而互相勾結，但是這一地區的前景總的來說比以前樂觀了。

1973年2月基辛格的訪華證實了這種樂觀情緒。[[55]](#_55_Heng_Li__Ji_Xin_Ge____Dong_L)毛和周對基辛格的熱情接待說明19個月來兩國關系的改善有了巨大進展。中國領導人由于對中美關系的前景越來越有信心，所以就廣泛的戰略和外交政策問題進行了討論。出乎基辛格的意料，周提議在兩國首都設立聯絡處，在兩國全面建立外交關系以前作為大使級的代表。盡管周以其嫻熟的外交技巧向世人宣稱，這個提議來自美國；但是中國人已決定盡快鞏固與美國的關系。

然而，1973年初的樂觀情緒是短暫的。數月時間，水門事件的危機困擾著尼克松，使他在政治上難以有所作為，并于1974年8月辭去了總統職務。毛個人對此感到迷惑不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會使在職的美國總統下臺，真不可思議。后來在與訪華的泰國領導人克立會談時，毛說他正在琢磨美國的科技發明（比如磁帶錄音機），并且堅持說他難以理解為什么尼克松在白宮用了錄音系統便被說是犯了罪。[[56]](#_56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5Nia)毛除了對美國法律程序不甚了解之外，還很可能懷疑是那些反對與中國建立關系的美國人在政治上找尼克松的麻煩，因為他們希望中美關系進程出現偏差。

然而，并不僅是美國國內的政治問題影響了中美關系的改善，中國國內正在醞釀著的政治風暴也嚴重地束縛住了北京在外交政策執行方面的手腳。造成這種不穩定局勢的直接原因是周恩來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壞。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周已經知道自己得了癌癥，并婉轉地向尼克松與基辛格提及自己的健康狀況。[[57]](#_57_Suo_Luo_Men____Zhong_Guo_Ren)周由于知道自己身體狀況正在不斷惡化，所以急于要解決他擬議中的三大政治問題：擴展中國的外交活動（包括加強與美國的關系）；國內轉向實現經濟現代化；全面重建黨政權力機構。其中第三個問題最重要，爭議也最大，因為要為“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倒的一批高級官員“翻案”。首先要為鄧小平翻案。1973年2月，鄧小平返回北京，4月首次在外交場合露面。不管鄧小平復出的原委如何，誰當毛與周的繼承人這一政治問題顯得十分緊迫了。

外交政策（特別是與華盛頓的關系）與繼承人的斗爭有什么聯系呢？即使回顧歷史，也很難弄清那時令人震驚、極富個人色彩的政治狀況。解釋不清的主要原因在毛。毛在1976年初周去世之前一直不愿采取使鄧小平第二次下臺的果斷行動。1973年2月這位主席在與基辛格會晤時說，中美的貿易狀況是“令人遺憾的”，但稱贊了聯絡處的開設。基辛格回憶道，毛還承認“中國……必須向外國學習”。[[58]](#_58_Ji_Xin_Ge____Dong_Luan_Nian)在11月份與基辛格的另一次會晤中，是毛而不是周提出解決臺灣問題的辦法；而中國人實際上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期限。毛當時說：“我認為，我們目前不統一臺灣也可以……世界上的事情不用辦得太快，為什么要這么著急呢？”[[59]](#_59_Tong_Shang_Shu__Di_692Ye)基辛格把他與毛的這次非常詳細的談話看成是他任國務卿期間保留下來的“中美關系的圣經”。[[60]](#_60_Tong_Shang_Shu__Di_697Ye)最后，毛警告說，中國女人“會帶來災難”，基辛格對她們要小心。[[61]](#_61_Tong_Shang_Shu__Di_68__694Ye)

幾周后，江青及其同伙便發起了反對周、鄧以及與西方和解政策的非常規的戰斗。1973年底周已從中美關系的進程中退了出來，把中國的外交政策交給了身體健康的鄧小平。基辛格注意到，在后來的會談中與他談判的中國對手一次也沒有提到周的名字，只提了主席的指示和講話。總理的退出看來既有健康原因也有政治原因。由于周的有限精力集中到了其他事務上，所以他幾乎不再參與外交事務了。

除了中國的政治動亂以外，美國外交政策的戰略計劃使中美關系的改善更加困難。當美國結束了越南戰爭，開始重新評估其長期戰略目標的時候，周恩來和毛開始懷疑美國可能認為與蘇聯的關系更加重要，從而越來越忽視中國。盡管華盛頓不斷向北京保證將向中國通報美國全球戰略的各個重要方面，但是早在1973年2月初周就說美國很可能將“蘇聯這股禍水東引”。[[62]](#_62_Ji_Xin_Ge____Dong_Luan_Nian)當逐漸失勢的尼克松不能使中美關系正常化，特別是當他尋求與蘇聯保持并加強合作時，這些懷疑就更加嚴重了。

杰拉爾德·福特爬上總統寶座并沒有給中國人帶來什么保證。美國外交輪廓總的未變，仍是基辛格堅持的與蘇聯緩和。北京領導人認為，基辛格努力加強與莫斯科的關系，表明美國一直在幻想著軟化蘇聯的實力，也說明美國根本不考慮兩個超級大國發展關系對中國安全的影響。1974年11月福特與勃列日涅夫的高峰會晤突出表明美國根本不重視中國的利益。蘇美不僅就新的戰略武器控制條約達成了初步協議，而且在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舉行了會晤：這顯然表明美國默許和承認了蘇聯對有重兵駐守的一直有爭議的中蘇邊境地區的戰略要求和政治要求。翌年夏，在赫爾辛基簽署的東西方協議使中國人更加不安，因為這些協議使西方接受了戰后歐洲的分裂現實，使莫斯科得以抽身在政治上干涉亞洲事務。

毛和周對基辛格提出警告是很客氣的；但鄧小平卻沒有同樣的克制。1974—1975年間，鄧小平的政治地位穩步上升；他的直率性格加深了與華盛頓的分歧。據說基辛格認為鄧是個“討厭的小個子”；而鄧同樣、甚至更加蔑視他的對手。這種互相敵視還表現在鄧的助手與其談判對手交換意見的時候。中美高級官員之間的個人聯系就像其建立起來那樣很快就消失了。1972年毛知道尼克松訪華將有助于他連選連任；而鄧卻沒有向福特總統發出訪華的邀請，反而有意識地邀請了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基辛格的主要政治對手）和民主黨的重要政治家訪問中國。1975年底，福特訪華，但成果甚微，只進行了正式的官方的針鋒相對的會談。

然而，這場交鋒的發起人是毛和周，而非鄧。[[63]](#_63_Tong_Shang_Shu__Di_47__70Ye)1973年初，當基辛格希望與莫斯科就軍備控制和國際安全進一步談判時，周便明確地表示了他的懷疑。在這位總理看來，美國的戰略目標是建立并指導一個聯盟，以限制蘇聯的野心，使莫斯科難以讓西方國家具有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基辛格希望蘇聯會愿意認真地進行談判；周對此嗤之以鼻。毛同意周的觀點；并強調指出，在蘇聯勢力不斷發展而不是削弱的時候，虛假的緩和是危險的。基辛格則認為，越南戰爭的結束使美國有了更大的選擇余地；而中國除了依靠美國來限制蘇聯的襲擊外則別無選擇。基辛格在給尼克松的私人信件中說，美國可以“既有茅臺，又有伏特加”。他認為，如果由美國來左右這兩個共產主義大國，它們之間的矛盾就得不到解決。

基辛格的過分自信來源于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節制和準備公開承認美國東亞地區的安全部署。[[64]](#_64_Ji_Xin_Ge____Dong_Luan_Nian)1973年周在與基辛格會談時，沒有提及危言聳聽的日本軍國主義幽靈復活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雙方早期討論的一個主要問題。相反，這位總理著實稱贊了一下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樣，毛指出，美國軍隊在亞洲的部署“太分散了”。毛與周的意圖十分明顯：通過承認美國的地區安全作用和警惕蘇聯的帝國主義計劃，北京希望尼克松政府能夠認清加強與北京的密切關系要比注重與莫斯科的不穩定的、帶有危險性的和解好得多。

另外，基辛格還夸大言辭，說1973年將是“歐洲年”，這就是說，美國對各地區和各國的政策是有先后安排，而無戰略區分。基辛格講話中流露出的一種霸氣，視中美關系如草芥。北京對此是不會無動于衷的。盡管北京仍準備尋找機會與美國建立更全面的關系，但基辛格的話使中國人專就中美分歧展開了爭論。

周帶頭表示不同意美國的戰略思想和決定。這位總理又回到了1972年毛與尼克松會談時提出的問題：即蘇聯長期戰略的重心問題。毛雖然自認十分擔心蘇聯在不斷加強針對中國的軍事力量，但堅持認為莫斯科的首要戰略目標是歐洲而不是亞洲。同樣重要的一點是：盡管蘇聯針對中國的軍事力量在不斷增加，但到70年代增加的速度開始減緩了，這表明莫斯科在中蘇邊境部署軍隊的能力是有上限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美國安全保證（與美國發展關系的動因）的需求就不太急迫了。1973年5月周第一次指出，蘇聯的突然襲擊已被制止住了。[[65]](#_65_Ma_Kui_Si__Cai_Er_Zi___Tong)

蘇聯軍隊集結速度的減緩使周得以重申毛的觀點，說蘇聯軍事威脅的主要目標是西方而非中國。毛最擔心的事一直是蘇美和解可能使蘇聯對中國增加其政治、軍事壓力。由此產生了三種結論：第一，是否全部解除蘇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直接威脅，北京并不十分看重；第二，北京強調歐洲不斷增大的軍事危險，希望華盛頓與莫斯科把注意力集中在遠離中國國土的地區；第三，北京強調其與第三世界擁有共同的利益，認為第三世界是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獨立的政治、經濟力量。

周在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很精辟地闡明了中國對這三個問題的基本看法。[[66]](#_66_Ben_Zhang_Jie_Zhou_De_Ping_L)這位總理試圖避開來自敵人和假定的盟友的雙重挑戰。談到莫斯科時，他說，中國盡管“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但是歷史證明，中國“這塊肉很硬，多年來誰也咬不動”，更不用說獨“吞”了。70年代初中國官員曾不祥地說過，“蘇聯在中國邊境陳兵百萬，威脅著中國的安全”（這一聲明使用了不規范的數學表達法，多說兩倍以上的數目）。而現在則說區區百萬大軍不足以人侵和征服中國。一場蘇聯侵華戰爭制止住了，那是因為沒有人會重犯30年代日本人致命的戰略錯誤。談到兩個超級大國時，周說它們之間的“爭奪是絕對的、長期的；勾結是相對的、暫時的”。因此，任何反對中國的活動都是佯攻，而不是真的要征服中國，因為“它們爭奪的戰略重點在歐洲”。周還強調說，第三世界的“覺醒和壯大”是“當代國際關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中國主張建立“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統一戰線。

周盡力將中國與爭權奪利的大國分開，以便有效地避免對中國的壓力和威脅。在美國與其對手蘇聯的競爭中，中國不想被美國利用——正如毛早先所說的那樣，“站在中國肩膀上與莫斯科打交道”。[[67]](#_67_Ji_Xin_Ge____Bai_Gong_Sui_Yu_1)同時，周抨擊了認為超級大國的緊張關系已趨于緩和的觀點，認為蘇美之間的斗爭是長期持久的——這反映了兩國的“爭霸野心”；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總有一天會導致世界大戰”。中國不在此列，因為中國在本質上不是帝國主義的，而且也不是“超級大國爭奪的焦點”，中國將站在一切受壓迫的國家一邊，置身于超級大國競爭之外。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這種說法都有其現實意義。通過不參與（至少是口頭上的）超級大國間的爭斗，周盡量不引起“左”派的批評。“左”派認為，積極的外交政策會破壞中國的意識形態準則。

“四人幫”對周與鄧的懷疑與仇視越來越重，但是，他們只能暗地里攻擊中美關系的改善。由于毛個人對中美和解的贊同和林彪不光彩的死亡（更不用說中國在與西方的關系中獲得的戰略利益了），使這些激進派很難對中美關系進行正面攻擊。然而，周與鄧都極易受到間接的批評。與西方不斷加緊的接觸使中國卷入了“大國政治”的旋渦，從而危及中國對第三世界的立場，破壞了中國在國家發展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相信了美國在遵守《上海公報》中確定的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忠誠和友善。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江青和她的同伙支持仇視外國人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就潛伏在中國的國內政治之中。

中美關系的停滯不前并沒有妨礙鄧小平采取與西方和解的主要行動。要說有什么區別的話，只是他猛烈地抨擊了美國對蘇聯的政策。這種批評顯示了他的勇氣。在與美國公開或私下解決棘手問題時，鄧小平從來沒有被指責為“對美國軟弱”過，他的國內政策含有希望西方廣泛參與中國現代化的成分；這使他的政治對手得以攻擊他為了迅速發展經濟而出賣國家的獨立與主權。然而，指責美國軟弱與姑息退讓的是鄧而不是激進派。蘇聯斷言：國際安全的需要使中國必須盡快發展經濟與技術；鄧認為，中國要擺脫衰弱和落后必須不斷把蘇聯的這一說法放在心上。

由于沒有受中美間政治問題的干擾，中美兩國的貿易在70年代初發展很快（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農業歉收）。70年代中期，中國糧食進口數量減少；這使美國向中國出口的糧食數量驟減；與此同時工業品的貿易額仍很低。雖然華盛頓在向北京轉讓西方先進技術方面邁出了第一步，但是，日本仍是中國工業設備和整座工廠的主要供應者。迅速增長的石油生產使中國石油出口日本的數量上升，償還了這些設備所欠下的債務。但是，這些卻使鄧小平遭到了“左”派的攻擊。

盡管有這些嚴厲的批評；但鄧仍然繼續挑美國外交政策的毛病。毛使鄧接受了他的政治開放方針；他曾直率地對基辛格說：“他認為美國未能有效地制止住蘇聯的擴張主義政策。”[[68]](#_68_Ji_Xin_Ge____Bai_Gong_Sui_Yu)這位主席晚年的思想一直很矛盾；他想反蘇，而不愿付出意識形態上的代價。1975年1月，毛沒有參加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周則是最后一次公開露面；他在會上提出了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各種措施。毛此時卻私下會見了保守的巴伐利亞領導人弗蘭茨·約瑟夫·施特勞斯，此人以反蘇而聞名。毛在這兩件事上的表現明顯地表明了他的矛盾行為。蘇聯的擴張與國內修正主義都是重要問題，但毛不認為有必要區分孰輕孰重。

無論是北京還是華盛頓都沒有必要的辦法和領導能力去鞏固、完善兩國的關系。鄧指責基辛格和其他美國官員對蘇聯的不斷挑釁所表現出的軟弱，以及在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中所表現的無能。但是，他避免提及他自己的不利境況。70年代中期，派系斗爭劇烈，鄧沒有贏得談判突破的政治自由。毛極為衰弱、變化無常；周自我引退，實際上沒有參與任何活動，而鄧則忙于迫使他的政敵無法施展其能量。

由于與美國的關系毫無進展，中國人便無意看好美國的力量了。1973年石油危機，尼克松總統政治上失勢，蘇聯在第三世界連連得手，西貢政府的垮臺，在發生所有這些之后，中國人認為美國并非是堅定、可靠的伙伴。特別是在1975年4月南越政府倒臺后，這種傾向更加明顯了。雖然中國領導人一直在期待這一結局，但這件事使他們更加相信美國是消極被動的，它在戰略上是軟弱無力的。也就是說，與美國發展親密關系對北京來說雖然是重要的，但其價值已大大降低了。

1976年1月周逝世、4月鄧第二次下臺后，中美關系突破的前景黯淡無光了。為了獲得本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福特總統不愿意為同中國和蘇聯建立密切關系而冒犯、疏遠保守勢力。任何進一步削弱美國與臺灣關系的行動都會嚴重損害福特與共和黨右翼的關系。為此，福特總統選擇了維持原狀。美國這種無作為政策又給北京重新得勢的“左”派提供了攻擊目標。7月，副總理張春橋在會見來訪的美國參議院代表團時，全然不顧周和鄧先前實施的外交政策，尖刻地指責了美國對臺的政策，甚至警告說中國很可能對臺北動武。當兩種政治制度均面臨領導人更迭之時，張春橋講話使用的語言明顯地反映了中美關系的滑坡，同時也反映了政治的不確定性。

1976年9月9日毛的逝世和10月份“四人幫”的被捕并沒有立即改變上述形勢。新近出人意料地上升到黨和國家高級職位的華國鋒同時擔任了中共黨的主席和政府總理；但他缺乏決定外交政策的威望、經驗和政治能力。這一年中國的政治變化太大了，不可能采取大膽的戰略行動。華當政期間，各派都在起作用；而在排除“四人幫”的斗爭中起重要作用的可能是包括葉劍英在內的高級軍事領導人。這一時期的工作重點在國內而不是國外；而中國幾個月前剛遭遇政治與天災浩劫，正苦苦掙扎。推動中美和解的政治與安全形勢并沒有多大的變化，新上臺的領導難以作出決斷。毛死后中國斷然拒絕蘇聯有關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建議，也正表明了當時的形勢：世界秩序靜止不變。

1976年11月，北京全然不了解的一位民主黨人當選為總統；這又引起了新的不穩定。雖然70年代中期中國與尼克松、福特政府吵架日益增多，但中國高級領導層對美國官員（特別是對基辛格）是非常熟悉的。水門事件已使中國人開始了解美國的憲法程序；總統選舉也已使他們對選舉進程的千變萬化有了認識。由于兩種制度和解的締造者們都已退出了舞臺，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不穩定、需要重新調整的時期。

## 通往正常化之路，1977—1979年

新總統的當選既給北京帶來了憂慮，也帶來了希望。一方面，吉米·卡特總統不必背上最終困擾著尼克松和福特的國內政治負擔；另一方面，這位新總統對中國人還是一個未知數，因而，北京不得不與基本上不相識的美國高級官員開展培養個人關系的艱苦工作。與此同時，1976年是中國一個不尋常的年份，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鄧小平第二次下臺；華國鋒出人意料地出任總理和黨的主席；唐山大地震；“四人幫”的垮臺，等等，反映了中國政治與人事的巨大變化。中國需要喘息的時間。

不過，到這年夏末，萬斯國務卿訪問北京時，中國的政局已開始趨于穩定。1977年8月，雖然名義上由華國鋒主持了黨的代表大會，但是，鄧小平的復出更引人注意，鄧是在剛剛舉行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職務的。華對中美關系改善說了幾句不咸不淡的贊許話，強調說，由于美國對中國軍事威脅的消除，情況變得有利起來。華還引用列寧的話提醒他的同事：“要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只有……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69]](#_69_Hua_Guo_Feng___Zai_Zhong_Guo)

如果北京領導人曾希望卡特政府迅速行動，那么，他們的期望很快成為泡影。盡管與中國改善關系是優先考慮的重要政策。但是，在新總統上任伊始的議事日程中，其他問題更為重要。一位參加過這一時期有關中國問題政策制定的政府官員說：1977年，卡特政府“忽視了中國”。[[70]](#_70_Ao_Ke_Sen_Bo_Ge____Zhong_Mei)確實，此時，美越關系的正常化是更優先考慮的政策。當萬斯國務卿訪問北京時——顯然是向中國人傳達卡特政府有意與中國建立全面外交關系——中國人強烈反對美國提出的與臺灣保持非官方關系，以及萬斯堅持的有權向臺灣出售武器的主張。[[71]](#_71_Ao_Ke_Sen_Bo_Ge____Zhong_Mei)盡管國務卿重申了《上海公報》，并保證從臺灣撤走美國的剩余部隊，但是，外交部長黃華卻認為，這些保證只是說說而已，是應付中國再三主張的實現全面外交關系的三個條件的外交辭令。[[72]](#_72_Sai_Le_Si__Wan_Si____Jian_Na)中國方面提出的三個條件是：華盛頓停止承認臺北為中國政府；廢除美國—中華民國共同防御條約；撤出美國在臺灣的余留軍事人員。同樣，鄧小平（在萬斯到達北京的前幾個星期剛剛復職）指責美國采取的新立場從福特政府的保證中退卻了，卡特政府仿效“日本做法”，這種策略使東京在正式承認北京的同時，與臺北仍保持密切的非官方關系。正如萬斯所說：“看來中國人并不準備認真談判。”[[73]](#_73_Tong_Shang)

中國人以公開和私下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不滿。當卡特總統有意將萬斯之行說成是一次成功的訪問時，北京的高級官員（包括鄧）很快予以否認。在萬斯訪華的幾個星期里，中國發表了一些傲慢的言論，對美國關心他們“臺灣的老朋友”表示不滿，聲稱兩國關系正常化后，仍與臺灣進行武器交易，是“令人難以容忍的”，將“逼使中國對臺灣動用武力”，“臺灣這么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的存在，意味著國家統一“非用武力不可”。[[74]](#_74_Ha_Li_Sen__E_Suo_Er_Zi_Bo_Li)看來，中國對他們在臺灣問題上所表現的靈活性特別生氣。米歇爾·奧克森伯格認為，鄧“由于新近復職，他的權力仍在鞏固當中，因而不能貼出‘靈活’的標簽來，美國必須毫不含糊地切斷與臺灣的官方關系，對中國這一原則，他不能容忍有任何誤解”。[[75]](#_75_Ao_Ke_Sen_Bo_Ge____Zhong_Mei)

同樣明顯的，中國人很快又重新對福特當政期間首先發起的緩和運動進行攻擊，這意味著國務卿萬斯是對蘇聯采取“姑息”政策的擁護者之一。根據中國一份權威性的估價報告，蘇美關系的改善，既加強了蘇聯的力量，又對中國構成了直接威脅：“……西方又出現了類似30年代的綏靖主義思潮。……當代的綏靖主義者也像他們的先輩一樣，妄圖把蘇聯這股禍水引向東方，引向中國。……用20年后中國將成為第三個超級大國這種虛妄的‘預見’來嚇唬蘇聯。……只要看一看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拼命散布‘緩和’幻想，竭力鼓勵西方的綏靖思潮，就可以明白。”[[76]](#_76_Ren_Gu_Ping___Mu_Ni_Hei_De_B)

與同福特政府打交道的初期一樣，北京決定在卡特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競爭對手中選擇已占優勢的一方。1978年冬，中國兩次向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發出訪華邀請。米歇爾·奧克森伯格認為，“中國人求助于世界觀與他們較為接近的官員”。[[77]](#_77_Ao_Ke_Sen_Bo_Ge____Zhong_Mei)

鄧十分了解布熱津斯基與萬斯明顯的個性差異及政策傾向。華盛頓政策制定者中間的分歧既反映了美國官方的不一致，也反映了美國對中國與蘇聯策略上的重大分歧。萬斯國務卿認為，美國有必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間“掌握平衡”。在萬斯看來，與蘇聯搞好關系，以及簽署長期拖延的第二次限制戰略武器協議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他認為，致力于與中國戰略合作會激怒蘇聯，甚至有可能使美蘇關系更為緊張。[[78]](#_78_Jian_Wan_Si___Jian_Nan_De_Xu)

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特別是前者）不同意萬斯的觀點。在國務卿看來，布熱津斯基和布朗都認為在關系正常化之前，各種（與中國）“加強安全”的措施（互派武官，向中國轉讓技術，通過第三國向中國出售武器裝備，以及其他方式的合作）只會警告而不會激怒莫斯科。由于蘇聯在第三世界不斷取得進展，布熱津斯基向卡特總統爭辯說：“與中國的關系有助于向蘇聯顯示，蘇聯的做法是適得其反的，是不能不付出代價的。”[[79]](#_79_Yin_Wen_Yuan_Zi_1979Nian_10Y)

圍繞著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計劃，中國領導人一致同意與資本主義世界保持更加密切的技術和經濟聯系。在1978年2月的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華國鋒提出了十年發展規劃，包括建設120個大型工業項目，估計需要投資6000億美元，其中約600億—700億美元用于購買進口的技術與設備。[[80]](#_80_Li_Cha_De__Bao_Mu_De__Yin_Ya)盡管后來的結果表明中國的目標大大超出它的國力，但是，這項規劃的目標意味著北京將向國外越來越多地尋求它的發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資金。1978年2月，中國便開始與日本簽訂了200億美元的貿易協定。

其他方面的發展推動著中美關系的進程。美國在阻止蘇聯勢力滲入第三世界方面不斷受挫，使布熱津斯基更加積極地制定有關中國的政策。與此同時，鄧的權力也在不斷鞏固。中越關系的迅速惡化又提供了行動的契機。1978年5月，布熱津斯基訪問北京時，中越關系幾乎破裂。晚春時節，越南驅趕了成千上萬的中國僑民，并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中國后來斷絕了與越南的所有經濟與技術聯系。7月末，中國發表聲明說：“在越南當局每一個反華步驟后面，都有著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巨大陰影。……莫斯科需要的是，爭霸東南亞和亞洲的‘前哨’。……為了迂回包抄歐洲，孤立美國。”[[81]](#_81___Hong_Qi____Za_Zhi_Ping_Lun)美國對蘇聯侵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顧慮與中國對東南亞地區安全的擔心聯系在一起。“反對霸權主義的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終于開始形成，其中包括美國。

中國的政策假定美國實際上成了國際舞臺上的溫和力量：

……蘇聯還是兩個超級大國中更兇惡、更冒險、更狡詐的帝國主義，是最危險的世界戰爭策源地。……（美國） 當前不能不力圖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總的戰略上不能不處于守勢。……蘇聯決定……削弱和排擠美國在世界各個地區的勢力。……[[82]](#_82___Ren_Min_Ri_Bao____She_Lun)

同時，布熱津斯基在與鄧的討論中堅持認為，在臺灣問題上，卡特總統“已下了決心”，這表明美國愿意就這一問題與中國進行會談，尋找一個中國可以接受的方案。卡特總統受國家安全顧問訪華成功的鼓舞，于6月份決定，到這年年底大力推進與中國全面的外交關系。作為附加的結果，到10月中旬，他中止了使美越關系正常化的所有計劃，以便不致使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復雜化。雖然卡特政府沒有將這一決定通知中國人，但是，正式的通知似乎是多余的，因為美國與河內的談判已經失敗，而與北京會談的節奏卻加快了。

中國已經取得重大的突破：現在顯而易見的是，在美國政策制定過程中，美國人再三聲明與中國保持密切關系的重要性。美國準備使自己與中國的安全與發展目標更為一致，替中國向美國的盟友說情。作為美國政策的一部分，它有意修改協定，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包括可能的武器銷售和它的歐洲盟國擁有的相應設備。為了進一步表明愿意為中國作出努力，布熱津斯基還私下敦促東京盡早批準拖延已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83]](#_83_Bu_Re_Jin_Si_Ji____Quan_Li_Y)，該條約中反對霸權主義的條款有使日本與中國的反蘇戰略保持較為密切的一致的含意，而許多日本人不愿這么做。然而，中國發展的經濟機會，華盛頓對條約明白無誤的偏愛以及蘇聯對日本外交的強硬態度，加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勢頭，同時鄧也表明愿意聽從勸告，無限期地拖延釣魚島問題的解決，這一領土爭端曾使中日關系惡化，并有可能使這年春季簽訂的條約歸于失敗。中國向日本表示，中國不再恢復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因而不把日本看成是敵手，也證明中國對日本確有誠意。由于中國最終愿意接受最后文件中較為溫和的語言，和平友好條約終于于8月簽訂。[[84]](#_84_Ben_Jie_Suo_Yin_Yong_De_Geng)

毫無疑問，中國人在與美國和日本建立更密切的關系中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回報。盡管有旁證表明，鄧似乎能說服他那些疑心重重的同事，美國對華政策已邁過了一個重要門檻，但至今也難斷定其他高級官員的不滿和猜疑程度。例如，華國鋒就十分不滿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決定，當然這是一個中國領導人無法靈活的問題。鄧的靈活余地也有限，但這也是中國談判人員想要傳遞的信息，且不管國內辯論激烈到什么程度。

中國最終愿意接受美國與臺灣未來關系比較含糊的框架，其中包括美國聲稱的它有權向臺灣出售武器（這與北京的公開抗議不符）。美國不指望也沒有得到中國人對這些協定的明確的贊同或認可，但是某種程度的容忍已蔚然成風，況且在關系正常化最后會談的幾個月前，卡特政府拒絕了臺灣求購新式飛機的幾次要求，限制臺灣只能購買編制內飛機的數目。卡特總統還向北京表示，保留繼續“向臺灣出售嚴格選擇過的、不會對中國造成威脅的武器的權利”。[[85]](#_85_Ao_Ke_Sen_Bo_Ge____Zhong_Mei)

北京有充分的理由對這些規定感到欣慰，雖然近期美國不會終止向臺灣出售武器，但是美國的決定暗示，它準備向臺灣出售的武器系統質量是有高限的。美國保留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權利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美國將出售另外的武器，而是說可能出售。由于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中國就不宣布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意圖，但雙方有種默契。從中國政策聲明及減少針對臺灣的軍事部署看，從美國對其意圖作出保證和限制軍售看，中美政策有很重要的聯系，這只能意會，不可言傳。中國人似乎想說服臺北的領導人，他們不可能從卡特政府那里得到廣泛的承諾，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會取消其援助的。由于中國減少在福建省的軍事力量，并繼續對臺灣做出政治姿態，中國也期望美國盡早終止向臺灣出售武器。在12月中旬中美關系正常化時，華盛頓單方面聲明，保留繼續向臺灣有限度地出售防御武器的權利。這似乎是暫時保全面子的姿態，因為美國同意武器銷售暫停一年。

鄧得出結論：時間對中國有利。中國的克制態度以及愛國主義和國家統一的感召力最終會將臺北帶到談判桌上。1978年12月15日發表的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中的措辭，又增加了中國人的這一樂觀思想。公報中說：“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而，明確承認中國地位的語言取代了《上海公報》中的含糊詞句，所有“與臺灣的商業、文化、貿易以及其他關系”都將“通過非官方途徑進行”。[[86]](#_86_Jian_Suo_Luo_Men___Zhong_Guo)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臺灣寬宏大量和幾乎仁慈的未來政策的動機是不言而喻的。1979年1月1日即中美關系正常化和美國不再承認臺北政府的那一天，中國開始向臺灣呼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標志著大陸對臺灣占領的金門和馬祖島海岸炮轟的結束，并保證“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臺灣現狀……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87]](#_87___Bei_Jing_Zhou_Bao____1979N)這些聲明和其他聲明表明中國對美國傾心的和平解決臺灣未來很敏感。這些聲明特別強調北京的信念，即“臺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和重新統一祖國完全是中國的內部事務”。[[88]](#_88_Yin_Wen_Yuan_Zi_Zhong_Mei_Gu)

鄧認為，與臺灣相關問題的不確定性相比中國安全的增強和他本人的國內政治地位更為重要。鄧說中美兩國都是“從全球的觀點”出發建立了外交關系，這與1972年毛澤東在與尼克松和基辛格會談時所表達的觀點一致。[[89]](#_89_Deng_Xiao_Ping_1979Nian_1Yue)當中美關系首次獲得重大突破時，國家安全原則便決定了這一進程的方向和勢頭，這一原則允許讓步和冒險，否則要實現它是極為困難的。在鄧看來，美國決策中布熱津斯基比萬斯占上風是中美關系的最好保證。與基辛格不同，布熱津斯基實際上沒有與蘇聯領導人取得相類似的諒解的意圖。這對伙伴即中國的脆弱和需求與美國總統熱望建立與眾不同的全面外交關系之間的合作已經開始，擁護更密切的中美關系的人在各自的政府中取勝。

1978年12月中旬，即將宣布中美建交之際，中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在國際上的勝利也在這次全會上充分反映出來，中國政治的潮流決定性地偏向鄧小平一邊，他的經濟改革和重新調整，以及把他關鍵性的政治搭檔（包括胡耀邦）安排進政治局的計劃現在得到了認可。新上來的黨的副主席陳云及時壓縮了1978年春由華國鋒提出的宏大的發展計劃。不過，外交政策的突破與其說是鄧的國內政治力量加強的源泉，還不如說是一種反映。卡特政府的姿態及讓步對促進關系正常化的過程是至關重要的。但是，鄧在國內地位的鞏固使他擁有這種權威，沒有這種權威，雙方就不能達成協議，也就不能發生1979年1月鄧那次極為成功的美國之行。

#### 中國對越戰爭

鄧試圖立即考驗這種新的關系。在鄧1月份訪問華盛頓和東京期間，他非常關注中越邊境日益升級的緊張關系。1978年12月初，《蘇越和平友好條約》簽署。隨后，河內于12月底侵占了柬埔寨。這證實了中國關于“大小霸權主義者”的侵略意圖的斷言。由于中美建交協議的締結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批準，鄧更無顧忌地表示中國決心“給越南一次教訓”。在沒有獲得華盛頓或東京認可和同意的情況下，中國開始準備對越南發動一次進攻。

這次戰爭始于1979年2月17日，到3月15日結束。時間不長，但傷亡慘重。它使中美開始和解以來長期潛伏著的中越關系的惡化達到了極點。自從基辛格秘密訪華，特別是尼克松訪華以后，河內的領導人意識到中國與越南的利益開始發生分歧。盡管北京在70年代初仍試圖與河內維持著在幾十年反西方斗爭中建立起來的政治關系和私人聯系，但越南的需求愈來愈被置于中國更廣泛的安全考慮之下——這種考慮始于與華盛頓的關系。1974年1月，中國突然奪取了當時由越南占領的（中國）南海西沙（Hsisha）群島中的一些島嶼，然而這無助于消除河內對北京更為長遠的意圖的疑慮。這樣，越南戰爭后爭奪東南亞地區控制權的斗爭就實實在在地展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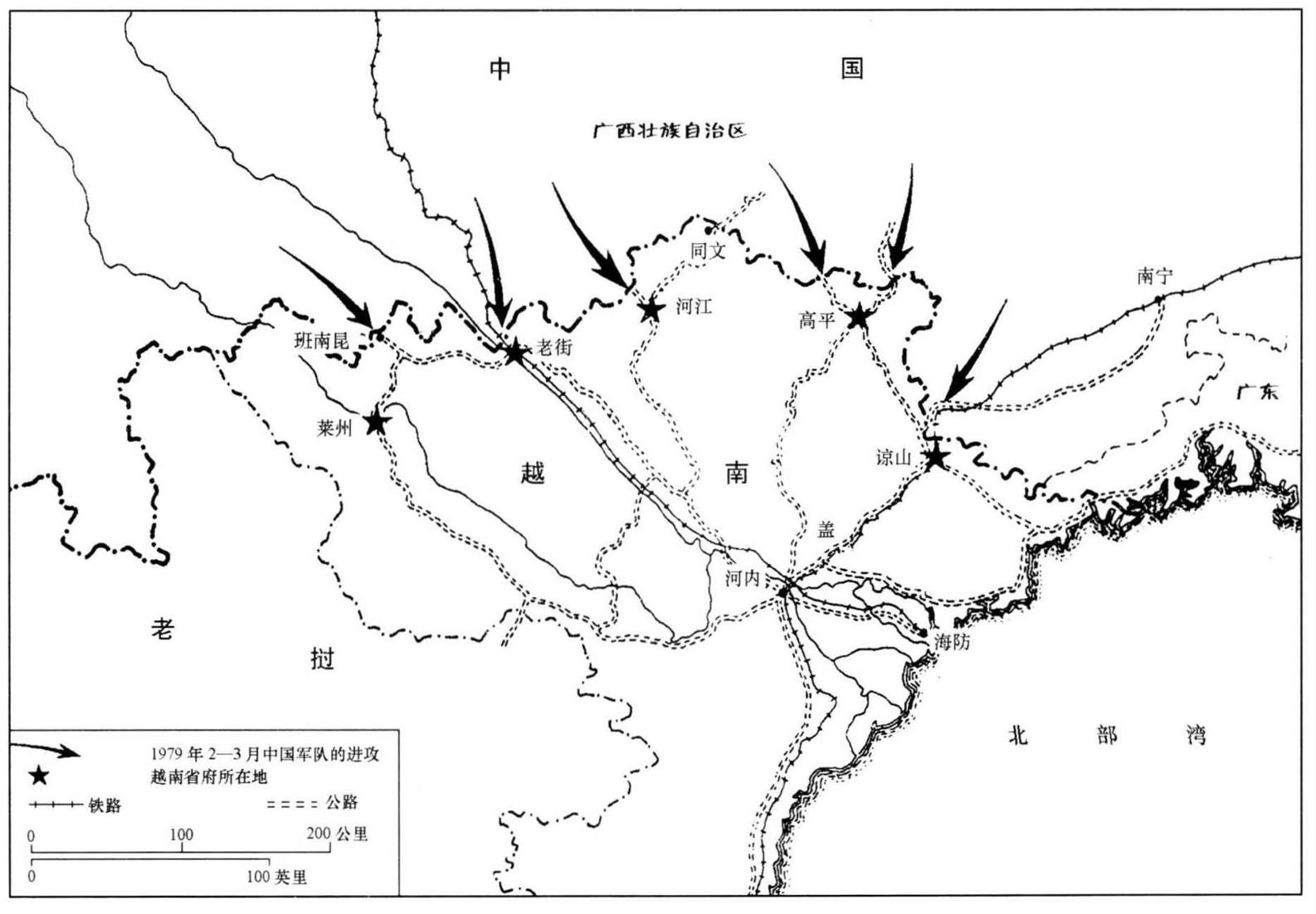
名義上，這場斗爭的焦點是柬埔寨。[[90]](#_90_Guan_Yu_Dui_Zhe_Fang_Mian_De)紅色高棉武裝在1975年春取得了勝利，并迅速而殘忍地推行一種可怕的原始農業共產主義制度，對柬埔寨社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壞，最終導致了近100萬柬埔寨人的死亡。紅色高棉的極端仇外行動主要針對越南人，波爾布特領導下的武裝力量決心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根除越南的影響（包括真實的和想象的）。紅色高棉需要外部支持，這不可避免地使它與北京的關系更加密切，因為70年代中期北京殘余的激進主義和潛在的排外主義與正在柬埔寨實行的教條式共產主義極為相稱。因此，北京的內部斗爭在印度支那產生了極其有害的后果，這表現在中國愈來愈支持金邊的極端主義政府。“四人幫”倒臺后，形勢仍未好轉，因為缺乏經驗的華國鋒很快就與紅色高棉簽訂了重要的、新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協定。

的確，中國和柬埔寨除了在意識形態上具有人們所推測的一致性外，雙方都強烈地敵視越南。1977年黨的十一大之后，鄧在政治上重新崛起。在尋求平衡（如果不是協調的話）北京與從前的河內盟友的政治和安全需要方面，他并沒有表現出周恩來的靈活或敏銳。越南在1975年取得全國勝利后，就認為沒有必要與中國保持先前的關系了。盡管直到1977年底或1978年初，越南倒向莫斯科還是態度曖昧或可以逆轉，但趨勢已很明顯：越南試圖與意欲包抄中國的蘇聯結成聯盟，以減少來自北方強大鄰國的挑戰。而且，蘇聯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援助使越南能籌劃推翻波爾布特政權，并在金邊建立一個親越政府。

到1978年春，北京和河內為避免雙方關系出現嚴重破裂所做的一切努力已告結束；雙方領導人都一心一意地尋求必要的外部支持以實現他們的長遠目標。鄧對越南的反感似乎是強烈的，而且幾乎是本能的。其他中國高級領導人對河內公然違抗中國并與莫斯科結盟的企圖公開表示強烈的不滿。同樣重要的是，中國認為越南是一個忘恩負義的盟友，因為在河內幾十年的反西方戰爭中，北京給河內提供了大量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援助，而越南準備對這種援助抹黑。無論如何，越南對中國華僑的迫害也許是對中國最嚴重的冒犯：在對所有中國人最敏感的問題上，河內公開對北京的領導人提出挑戰。

到1978年秋，越南已開始精心策劃對柬埔寨的侵略。河內可能估計到，采取強有力的突擊行動推翻紅色高棉政權僅能引起北京間接的政治報復，特別是在越南與蘇聯簽訂條約之后。這樣，莫斯科的安全保證與其說增加了河內的勇氣，還不如說消除了河內的疑慮，因為它們將可能是警告中國不要對越南采取任何重大的軍事行動。

在與河內關系日益緊張的情況下，鄧為取得中美關系突破所做的努力就顯得特別迫切。他很有理由推測，使用武力嚴懲那個剛使美國蒙受恥辱的國家，可以使華盛頓領導人從中獲得補償。盡管沒有必要取得華盛頓的明確支持，但與美國建立相當密切的關系，可以防止蘇聯領導人因北京對它的新條約伙伴采取行動而向中國報復。



地圖5 中國進入越南（1979年2月17日至3月5日

因此，1979年2月中旬中國對越南的進攻是對中美新關系的第一次重大考驗。鄧并沒有掩蓋他的意圖，在訪問華盛頓期間，他向卡特總統通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采取的軍事行動的規模和持續時間。布熱津斯基所謂的蘇中之間第一次“代理人的戰爭”非常短暫，持續不到20天。[[91]](#_91_Bu_Re_Jin_Si_Ji____Quan_Li_Y)鄧不愿使蘇聯介入一場有限的沖突，因此他不想或不要求美國提供援助。美國已承認中國，并不積極反對北京采取這樣的行動，這似乎就是足夠的支持。事實上，根據鄧的觀點，北京對越南的進攻履行了中美“反霸”協議中中國的義務。兩國都必須采取相似但又互補的措施懲罰“大小霸權主義者”的侵略行為，這樣就使他們更廣泛的戰略計劃復雜起來。在鄧看來，中國的對越戰爭只有放在全球性的而不是地區性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北京已承擔責任，否則，這責任會由美國來承擔。

中國的戰略思想是自己動手和自己完成。通過強調反越軍事行動方面的統一戰線以及突出河內與莫斯科的互相勾結，北京擴大而不是減弱了蘇聯在東南亞的利益和介入。雖然中國的直接軍事目標是有限的，但戰爭以后河內對莫斯科的依賴明顯增加。在幾個月內，蘇聯軍艦開始定期使用越南在金蘭灣的海軍設施。自從赫魯曉夫在1954年將旅順和大連港歸還中國以來，莫斯科首次獲得了太平洋上的一個前沿基地。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國的行動有助于實現中國的預言：即蘇聯將在東南亞尋找一個據點，以與它早先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所取得的突破相匹配。

至此，印度支那戰爭的戰線已畫定，它有效地說明了中國對東南亞政策的性質，直到不定的將來。中國試圖把抵抗越南占領柬埔寨的、各種利益根本不同的力量聯合起來，包括由忠于西哈努克親王的力量、宋雙領導的反共殘余分子以及被推翻的紅色高棉組成的不可靠的聯合。在中國看來，只有建立由“愛國力量”組成的具有廣泛基礎的聯盟，才能瓦解越南征服柬埔寨的長遠計劃。同樣重要的是，北京試圖通過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中那些最有決心抵制河內的國家進行密切合作，動員國際力量反對越南的占領。

對越南在柬埔寨行動的國際性譴責給中國提供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政治和外交機會。[[92]](#_92_Guan_Yu_Dui_Zhe_Yi_Wen_Ti_De)自從美國撤離南越，特別是西貢政權垮臺以來，北京試圖擴大與東盟國家的聯系，并使東南亞各國領導人放心，中國與殘余的共產黨游擊隊運動的聯系是暫時的、無關緊要的。然而，由于許多國家對中國在這一地區的長遠意圖仍持懷疑態度，因此他們不敢相信北京的保證。盡管東盟國家中極少對越南表示特別的同情，但北京準備對越南使用武力使許多國家深感不安，他們確信中國正在這一地區擴大它的政治和安全利益。

然而，中美和解和越南的入侵使中國在東南亞的形象更加高大。雖然美國沒有在政策上與中國進行廣泛的協調，但是華盛頓認為北京的政治和外交干預大體上是對美國利益的支持。美國可恥地從越南撤離，此事離現在太近了、太令人痛苦了，以致美國不可能重新直接干預該地區的安全。美國的克制政策使中國承擔起東盟國家，特別是泰國安全的間接保護人的角色。僅僅在幾年前，這種角色的轉換是不可想象的。鄧和其他領導人許諾，一旦越南進攻泰國邊境，中國將給予泰國軍事援助。

對中國來說，更加艱巨的任務是要這一地區的領導人相信，中國的聲明反映了中國支持東盟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真誠愿望，而不是損害越南利益去建立中國的勢力范圍。中國領導人反復強調，他們對這一地區沒有長遠的野心，他們只是試圖迫使越南吐出其侵略果實，最終建立一個獨立的、不結盟的柬埔寨。

盡管許多國家對中國的承諾仍表示懷疑，但北京在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在1981年7月聯合國召開的關于柬埔寨問題的會議上，中國堅決支持東盟國家，使中國這一進展達到了頂點。中國聯合泰國和新加坡，組成一個外交“統一戰線”，阻止了除社會主義集團外對由越南扶植的政府的廣泛承認。中國在東南亞也成功地孤立了越南。與此同時，北京在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聯系以及外交透明度大大地增強了。因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場對越南的懲罰性戰爭幫助了北京創造更大的長遠政治機會。

然而，從國內情況來看，中國的對越戰爭留下了一筆麻煩的遺產。鄧宣稱中國對越戰爭已取得了圓滿勝利，但這話似乎有些空洞。戰爭造成人和物的損失遠遠超過原來的估計，從而損害了中國軍隊的聲譽。越南在毗連中國的北方省份重新部署大量前線戰斗部隊，而對越南在柬埔寨的軍事行動卻沒有起到明顯的牽制作用。同樣，中國的軍事壓力并沒有迫使河內重新估價它對西方國家的政策。而且，戰爭的最大后果是，越南在安全方面更加依賴蘇聯了。

事實上，中國（而不是越南）不得不調整它的政策。由于1978年底無節制地購買外國設備和技術，中國的稅收負擔已很重。中越戰爭中更新所損耗的裝備的費用更使中國的預算資源幾近枯竭。不斷增加的預算赤字以及過分注重形象的外交政策加重了在新的政治形勢下中國潛在的負擔和危險。當初與美國和日本關系取得突破性進展所帶來的喜悅轉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冷靜地估價與兩國關系的潛力，特別是經濟領域的潛力。早在1979年2月，中國官員就私下通知日本公司由于預算的限制，中國不可能及時履行建造工業工廠的合同。由于對越戰爭的代價已完全清楚，因此需要大量縮減基本建設和購買技術的資金。這一問題馬上成了決策議程的中心內容，從而導致6月份宣布實施為期3年的“經濟調整”政策。[[93]](#_93_Liang_Qing_Guo_Fen___Zhong_G)

#### 中蘇關系的迂回曲折

雖然華國鋒因在1978年制定雄心勃勃的《十年發展規劃》而備受責難，但此間鄧的政治威信也受到損害。1979年4月初，卡特總統簽署了由美國國會通過的《與臺灣關系法》，這一法案所包括的條款和義務（特別是關于臺灣的安全）大大超過了卡特政府原來所期望的以及中國原來所預料的范圍和程度。[[94]](#_94_Yuan_Wen_Jian_Suo_Luo_Men_De)早在3月中旬，中國外交部就在私下和公開的聲明中警告說，該法案“違反兩國建交時雙方同意的原則”，這對中美兩國剛建立的新關系是“很有害的”。[[95]](#_95___Luo_Shan_Ji_Shi_Bao____197)4月份在會見美國參議院代表團時，鄧重復了這些警告，并提醒他們，該法案實際上使中美關系正常化協定失去效用。[[96]](#_96___Niu_Yue_Shi_Bao____1979Nia)與此同時，中美關系的全面恢復以及中國對越南的強硬外交都沒有導致美國外交政策議程中更廣泛的親北京傾向。甚至在默許中國今后在東南亞的軍事行動方面，華盛頓的官員們仍持謹慎態度。因為他們擔心這種默許只能進一步激化這一地區的政治和安全形勢。此外，卡特政府竭力達成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鄧和其他領導人強烈反對這一條約）表明，卡特政府優先考慮的是制定美國自身的政策，而不是鞏固與北京的關系。

因此，與美國的這種新關系似乎是喜憂參半，它很可能損害鄧的政治聲譽，如果不是他的領導地位的話。鄧比其他高級官員更熱衷于發展與美國的關系，包括與西方開展更廣泛的經濟和技術合作。在取消或推遲與外國公司簽訂的合同以后，這些機會就更靠不住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日本和西歐公司由于合同被取消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盡管它們在中國較早地獲得了立足點）。而且，鄧對南部鄰國的好斗姿態與他希望在少受蘇聯壓力干擾的情況下實施發展計劃形成了尖銳的沖突。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建議恢復與蘇聯的談判。1979年4月3日，外交部長黃華照會蘇聯大使，中國打算使1950年簽訂的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后不再延長。同時，黃華強調了中國的“一貫主張”，“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系”，并建議“就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改善兩國關系舉行談判”。[[97]](#_97___Bei_Jing_Zhou_Bao____1979N)這樣，中國主動要求就中蘇關系的各個方面進行不附帶條件的談判，這與1969—1978年之間的邊界談判不同。

盡管在70年代中期北京和莫斯科都不時努力減少或至少控制邊界的軍事緊張關系，但是兩國都不愿給對方的友好表示以回報。在中蘇關系的原則上，莫斯科贊成比較寬宏大量甚至有點夸張的提法，但中國發言人反復表示不能接受這些提法。雖然邊界談判仍不定期進行，但由于雙方提出的要求和條件相互沖突，這使得他們進退兩難，一籌莫展。中國的姿態更為慎重和有限，最引人注目的是，1975年12月中國送回一架蘇聯直升機的全體人員（1974年初，這架飛機因迷失方向進入中國領空。中國外交官承認，原先對他們進行間諜活動的指控根據不足，因此要釋放他們）。但是，這樣的善意姿態是罕見的，即使有的話，一般只在中等外交級別上進行，沒有來自高層政治領導人的支持表示。

因此，外交部的主動做法必然反映上級的決定：即試探一下與莫斯科改善關系，或至少為更廣泛地討論國家關系開辟渠道。確切地說，這與毛去世后不久中國斷然拒絕莫斯科的主動步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自從60年代雙方關系惡化以來，大門至少第一次微微開啟了。

河內與莫斯科的關系日益密切，這可能使鄧意識到，需要適當緩和與蘇聯的緊張關系。然而，由于經濟倒退、中越邊境戰爭以及領導層內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日益不安，鄧出乎意料地在政治上處于守勢，因此鄧更有可能同意那些外交措施，盡管這些措施削弱了他旨在加強與西方安全合作的計劃。[[98]](#_98_Zai_1981Nian_Chu_De_Yi_Ci_Hu)事實上這種通過與莫斯科談判來穩固中國的安全情勢的嘗試明顯帶有黨的副主席陳云（他是經濟調整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的印記。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陳就強調中國在購買外國設備方面“必須逐步走”，明確反對《十年發展規劃》中包含的過熱的建設速度。[[99]](#_99_Tong_Shang_Shu__Di_23Ye)同樣重要的是，1979年4月中旬，中國宣布恢復已去世的外交部官員王稼祥的名譽。1962年，王稼祥和陳云一道主張中國應緩和與它的外部敵人的緊張關系，以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解決國內經濟危機上。

如果中國愿意在不附帶任何先決條件的情況下進行談判，那么莫斯科樂于對北京的建議作出積極反應。即使談判會引起越南的猜疑，中國愿意討論重大問題還是明顯地對莫斯科有利，因為這也意味著中美和解是不穩定的，有其局限性。但在1979年12月中蘇談判開始時，鄧小平在國內的地位又上升了，因此北京立刻指責蘇聯在談判中缺乏誠意。事實上，鄧起初可能對這樣的談判表示默許，因為他相信談判也只會顯示莫斯科在關鍵問題上固執己見，毫不讓步。然而，由于那個月底蘇聯發動了對阿富汗的侵略，這使談判無限期地被延期了。

甚至當鄧同意進行中蘇談判時，他仍繼續試探與美國發展更為全面的關系的可能性。在4月份會見美國參議院代表團時，鄧首次提出與華盛頓進行公開的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包括軍艦互訪，購買美國武器（包括先進的戰斗機）以及（頗具諷刺性的）在中國領土上用美國監測站以核查蘇聯執行武器控制條約的情況。[[100]](#_100_Jie_Yi__Ma_Xiu_Si___Zhong_G)鄧認識到這三項建議都帶有實質性的問題，并具有敏感性，特別是在《與臺灣關系法》通過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鄧也知道美國的政策仍繼續阻止向中國出售任何軍事武器。而且，中國在大量削減預算的同時不可能大規模地購買武器。但是他們的大膽建議意味著他想做中美關系中異想天開的事。美國是否認為中國如此可靠和重要，所以應向它提供很敏感的技術、甚至主要的武器設備，或至少表示它愿意考慮這種可能性？美國是否充分注意到它的戰略地位的削弱，而把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看成是美國戰略利益的一項重要收獲，即使它使蘇美關系改善的可能性嚴重復雜化？

鄧明確表示，他愿意考慮美國向中國提供武器，但他沒有提出與美國進行更具約束力的防務合作的方式。中國領導人中沒有人——尤其是那個與華盛頓關系最密切的人——會感激和屈服于一個外國，特別是那個仍被指責為干涉中國內政的國家。然而，如果美國讓中國獲得這些敏感的技術，那么這意味著美國愿意把北京看作是一個準同盟者，同樣，這也表示華盛頓不再試圖在兩個主要共產黨國家之間實行等距離外交。

鄧充分意識到他的主動做法將對當時卡特政府中激烈的官僚爭斗產生直接影響。針對國務卿萬斯的反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國防部長布朗反復要求總統改變美國對中國的技術轉讓政策，并且如果西歐向中國出售武器，美國應保持“善意的中立”。由于伊朗局勢日益不穩，蘇聯愈來愈介入阿富汗和南也門，華盛頓的觀念發生了變化；1979年5月初，卡特總統向北京建議，建立一種他簡稱為“萌芽階段的美中軍事關系”。[[101]](#_101_Qia_Te_Zong_Tong_De_Hua_Yin)卡特政府內部就美中軍事關系的長遠方針上還未達成一致意見，但鄧有理由得出結論：美國的政策正在朝著他所希望的方向改變。

可是，北京也似乎對蘇聯擴張的可能性感到真正的憂慮。由于巴列維國王被推翻后西南亞局勢日益不穩，中國愈來愈擔心蘇聯會在波斯灣和印度支那取得大的突破。中國的戰略分析家一直在警告，從地緣政治上看，蘇聯可能分兩路向西南亞和東南亞進軍。他們斷言，如果莫斯科控制了重要的戰略要道和交通線，那么，它將在經濟上控制西方和日本，不提中國安全的本意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北京認為沒有必要讓人們注意到它自身的脆弱性。鄧在私下的談話中更為直率。在鄧看來，美國對驅逐巴列維的人的反應還遠遠不夠，他懷疑美國有抵制莫斯科在地緣政治上穩步前進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北京不能確信美國能否被當作抵消蘇聯力量增長的砝碼。

到11月初，《紅旗》雜志評論員生動地描述了西方脆弱性的黯淡景象，他認為，西南亞日益加深的不穩定“也許甚至會觸發超級大國之間的直接對抗”。令人滿意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已理解中國反對霸權主義戰略的全球性質，但這位評論員同時又警告說，在形勢要求作出更強有力的反應時，某些西方政治家仍企圖與蘇聯修好。他得出結論，需要“采取切實措施和實際步驟不斷打亂戰爭策劃者的擴張計劃，反對綏靖主義政策，在必要時對侵略者采取針鋒相對的行動”。[[102]](#_102_Suo_You_Yin_Wen_Chu_Zi_Ping)評論員的可怕估計似乎同樣針對那些仍想與莫斯科和解的中國領導人。

1979年12月底蘇聯入侵阿富汗充分證實了北京的可怕警告。1月中旬，在一篇關于蘇聯入侵的權威性評論文章中，《人民日報》觀察員將蘇聯的行動歸咎于阿富汗內部的不穩定和美國人的忍讓退縮。[[103]](#_103_Guan_Cha_Yuan_Wen_Zhang___J)不過，這位觀察員希望蘇聯的行動會促使西方對蘇聯的全球戰略提出更有力的挑戰。基于這種推測，美國過去的行為一直搖擺不定，但蘇聯昭然若揭的侵略行為肯定會改變美國的看法。正如《紅旗》進一步指出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瘋狂性和冒險性……得到了新的證實，再也不容人們置疑了。……那種把現在的蘇聯領導人說成是什么‘鴿派’，并把維持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這個‘鴿派’身上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104]](#_104_Ben_Kan_Ping_Lun_Yuan___Fan)

這些警告似乎是既說給國內人、也說給西方人聽的。中蘇第一輪談判于1979年12月初在莫斯科結束，雙方同意來年春天在北京繼續進行談判。然而，到1980年1月19日——即蘇聯入侵阿富汗后3個多星期——外交部宣布北京不準備繼續談判，因為在新的情況下，進一步談判是不合適的。某些中國官員似乎仍不愿放棄與莫斯科的談判機會，他們認為這次入侵是一種軟弱無能和孤注一擲的行為，而不是更廣泛和更具威脅性的戰略意圖的一部分。可是這種更為溫和的觀點明顯代表了少數人的觀點。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在西南亞和東南亞開始進行，它預示著“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應對越南和蘇聯施加壓力。在這種形勢下，擴大與美國的合作似乎非常迫切；對蘇聯和解和靈活性的暗示等于向華盛頓和莫斯科發出錯誤的信號。

#### 中國和南亞

由于莫斯科的入侵，中國對南亞的政策變得靈活了。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北京已把對南亞政策的重點放在維護巴基斯坦的安全與獨立上。1965年和1971年，巴基斯坦與印度發生兩次邊界沖突，均敗在占絕對優勢的印度軍隊手下，但巴基斯坦卻從中國得到了極為重要的政治與安全支持，其中包括大規模地重建其武裝部隊。與此同時，中國卻不拒絕與印度改善關系。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聯與印度關系的持續發展（特別是在軍事領域）以及1971年8月簽訂《印蘇條約》以后，使中印關系正常化的進程更加困難重重了。此外，中美關系的和解，又使中國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系因蘇聯和美國在南亞次大陸的利益沖突而逐漸定型。由于巴基斯坦在推進中美關系和解進程中所起的神秘而又卓有成效的作用（包括向北京傳遞尼克松政府最早的信息，以及基辛格利用巴基斯坦作“掩護”而秘密訪華），這一格局更加穩固了。

盡管如此，北京仍抱有希望，以促成巴基斯坦與印度關系的發展，而這在后來成了中國與新德里恢復關系的基礎。[[105]](#_105_You_Guan_Zhe_Ge_Wen_Ti_De_X)縱觀整個70年代，印度對北京的評論就不那么尖刻了。兩國關系在中斷了14年之后，1976年雙方又重新互派了使節。印度的政策不再放任擴大與蘇聯的關系，為新德里和北京之間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能。盡管中國領導人對這種可能沒有投入過分的熱情，但是，他們也不想阻止它。1979年初，印度外交部部長A.B.瓦杰帕伊訪問了中國，這是近20年來中印兩國之間的最高級接觸。

然而，瓦杰帕伊訪華期間，正值中國進攻越南，這使新德里很不愉快地想到了1962年北京與印度的邊界戰爭。部分是因為表示對河內的支持，但也因為北京仿佛漠視了印度人的感情，訪問還未結束，瓦杰帕伊就一氣之下離開了中國。中印雙方沒有機會認真探討有關邊界糾紛，以取得相互諒解。改善中印關系的進程遂告中斷。

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這使中印關系在短期內得到改善更是困難重重。新德里不愿將此作為大事與蘇爭論。莫斯科入侵阿富汗，大大加劇了蘇美在南亞地緣政治中的爭斗，也使北京和新德里的對立形勢越來越緊張。由于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北京進一步加強了對巴基斯坦的支持，既支持伊斯蘭堡面對蘇聯潛在威脅的決心，又為阿富汗境內的抵抗力量開辟了一條軍事援助的通道。中印關系若有可能發展，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消除政治和軍事上存在的緊張關系，和適當的外交往來。但在那個時候，這些東西都非常缺乏。

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和解的大門仍然是敞開著的，特別是80年代初，英迪拉·甘地總理開始使印度擺脫與莫斯科過分牽扯的關系。1981年4月，中國提出為改善中印關系進行談判，北京的積極姿態促成了這年6月黃華訪印。黃華的印度之行，是二十多年來中國外交部長的首次訪印。同年12月，雙方在北京開始了邊界談判。在這次談判以及1982年5月中印在新德里舉行的第二輪談判中，兩國代表團都重申各自在邊界問題上的一貫立場。盡管如此，雙方開始談判的意義超過了談判未能早早取得突破。[[106]](#_106_Jie_Luo_Er_De__F_Ai_Er_Jin)中印不太可能出現公開對抗的關系，但是，由于蘇聯不斷介入阿富汗，以及印度繼續擔心中巴關系，中印雙方政治關系的發展受很大束縛。

## 樹立獨立自主的形象，1980—1982年

蘇軍入侵阿富汗帶來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戰略后果。尤其是美國原先認為冷戰以來，蘇聯很少做出格的事，而莫斯科入侵阿富汗的行動改變了美國的看法，并導致了華盛頓修改對華關系的結果。當美國在對華政策上爭吵得沸沸揚揚、不可開交的時候，美國國防部長布朗于1980年1月初訪問北京，這是美國國防部最高官員的首次訪華，而蘇聯入侵阿富汗是促成這次訪華的決定性因素。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再把蘇美關系緩和置于優先地位。莫斯科不得不為其侵略行徑付出代價。卡特總統從美國參議院撤回對《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條約—Ⅱ》的進一步討論，對蘇聯實行谷物禁運，并抵制莫斯科奧運會。卡特總統還明確強調，波斯灣的安全對美國的安全利益至關重要。鄧幾年來的頻頻游說得到了報償：美國改變了所有關于中國安全問題的立場。同時，美國政府最終放松了向中國出口各種尖端技術的限制；美國在對中國和蘇聯的關系上不再維持等距離的形象了。由此，中國領導人更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對美國的政治和戰略價值。

然而即使在美國國防部長訪華的情況下，中國的態度仍是小心謹慎，十分暖昧。按道理，反蘇統一戰線已把中國拖入日趨惡化的超級大國的關系中，但中國無意陷進美國和蘇聯之間日趨緊張的沖突中。鄧十分清楚，中美關系現在是蘇美關系的晴雨表，中國是這一進程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中國領導人認為，兇神惡煞的擴張主義者蘇聯，其威脅的矛頭首先指向西方和日本，其次才是中國。[[107]](#_107_Zhe_Yi_Kan_Fa_Te_Bie_Zai)

1980年，鄧小平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元旦講話中表達了這種政治意圖。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召集的高級干部會議上，鄧在一個重要的政策報告中又對這種意圖作了進一步的闡述。[[108]](#_108_Deng_Zai_1Yue_Fen_De_Lun_Sh)鄧認為，80年代中國有三個主要目標：第一，“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是臺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要加緊經濟建設”。最后一個目標被認為是最重要的。雖然鄧承認和平的前景仍不明朗（“80年代是個危險的年代…… 80年代的開端就不好”），但他仍很樂觀：

我們有信心，如果反霸權主義斗爭搞得好，可以延緩戰爭的爆發，爭取更長一點時間的和平……不僅世界人民，我們自己也確確實實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所以，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

鄧小平斷言，“對國內形勢和四個現代化的未來持懷疑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但他并沒有明確指出，中國在反對蘇聯擴張的同時，如何避免戰爭。反霸統一戰線的概念仍很模糊。最后，鄧對臺灣的措辭雖然是例行公事式的，但暗示了這個小島的政治前途可能再次成為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爭斗點。

美國的對臺政策使臺灣問題撲朔迷離。僅僅在國防部長布朗抵北京前三天，卡特政府宣布恢復對臺灣的軍事援助。兩國關系正常化后，美國履行了暫停一年向臺灣出售新武器的諾言，而北京以為美國會在1980年繼續執行這種政策。相反，卡特政府甚至暗示，美國可能向臺灣提供新的戰斗機。雖然北京在當時沒公開抗議，但美國政府的這些言行無疑對中美關系產生了破壞性后果，使北京懷疑美國的誠意，北京原以為美國會支持它孤立臺灣的政策。

總統競選也日益臨近。對中國人來說，美國選舉程序的運行令人迷惑不解和無法預測。在尼克松和福特總統時期，中美關系遠未達到卡特政府時期的突破性進展，所以北京很希望卡特連任，使中美關系有一個鞏固和穩定時期。可是，卡特總統日益增長的政治威望，并未給他的連任前景帶來好兆頭。像他的前任福特一樣，他面臨民主黨內的重大挑戰。

但更多的隱憂來自共和黨右翼分子羅納德·里根的挑戰。早在四年前，里根就差一點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現在他迅速擊敗了共和黨內的競爭對手。然而，里根也不同于1976年時的卡特，他的政治態度很明確。一方面，他對美蘇和解進行了嚴厲的抨擊，而且醉心于向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優勢發起強有力的挑戰。但最重要的是，里根是個反共分子，公開對臺灣表示政治上的同情（事實上，尼克松總統1972年訪華后就派當時的州長里根去臺灣，就他訪華向蔣介石做解釋工作，使蔣放心）。里根也對卡特政府不承認臺灣的舉動進行了抨擊。他在爭取提名競選運動中聲稱，他打算把美國與臺灣的關系升級，有可能去掉“非官方關系”這塊遮羞布。

中國對這種前景放心不下，早在里根被提名前，就開始公開警告這種舉動會帶來的后果。當共和黨批準了涉及對臺灣關系的黨綱時，中國立即認為這是對它的嚴重挑釁。于是，里根派他的競選伙伴、前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向中國人解釋，力圖使中國人放心。盡管共和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這一招，但鄧小平和中國其他高級領導人仍在不安地注視著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中國經過長期努力與美國建立起來的關系處在危險之中，中國不得不再次估價與美國保持密切關系的價值，并在此基礎上重新制定了新的對美外交政策，決定對美關系較少建立在與美國高級官員的親密與直接的聯系上。

1980年11月，羅納德·里根在大選中徹底擊敗吉米·卡特，這一結果確實給北京帶來了麻煩。當中國猛烈抨擊美國對蘇聯的挑戰無能為力時，中國人意識到，卡特總統最終對北京采取了強有力的支持，這是尼克松和福特所不及的。然而，里根不僅不相信與中國密切合作的政治和戰略價值，反而多次強調要對臺灣的要求給予更多的關注。里根就任總統后不到一星期，臺北就重新提出他們對更先進戰斗機的長期需求。[[109]](#_109_Heng_Li__Si_Ke_Te__Si_Tuo_K)美國對臺政策最具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美國雖然不再承認臺灣，并承諾與北京保持明確的關系，但它不愿中斷與臺灣的非官方軍事聯系。北京認為，美國的新式武器僅僅是給臺灣壯壯膽，使海峽兩岸的統一成為一個難以捉摸的目標。因此，美國繼續對臺灣承擔義務的任何聲明以及美臺關系從非官方性質的任何升格都嚴重損害了北京對美國政策的信任感。這樣，很有可能在臺灣問題上，鄧在領導層中機動余地很有限。

為了證明中國對外政策異乎尋常的變化是正確的，鄧把中國說成是落后、脆弱和急需外援的國家。同時他認為蘇聯的挑戰是全球性的和咄咄逼人的，并號召受蘇聯霸權主義勢力威脅的所有國家加強合作，其中包括美國和中國。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不可能在其他問題上過分反對華盛頓，這就可能給了美國在不存在利益互補、不需要認識一致的問題上較自由的行動權。因此，作為美國新政府把支持和發展與北京的關系置于重要地位的重要標志，美國處理臺灣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美國對華政策的兩個重大決定（都是卡特政府遺留下來的問題）需要新政府逐漸解決，一是向臺灣出售新式武器；另一個則是允許中國人購買美國的武器和軍事技術。對中美兩國領導人來說，這兩個問題是交織在一起的。當美國前總統福特在1981年3月底訪華時，他提出一個解決方案（當然是里根政府的意圖）：美國可以向臺灣提供新式武器，同時允許把美國的武器賣給中國。[[110]](#_110_Mai_Ke_Er__Pa_Ke_Si___Fu_Te)

這樣，為了滿足臺灣對新式飛機的再三要求而不斷增加的壓力，與里根政府對華基本政策懸而未決的辯論匯集在一起。中國領導人不客氣地說：同時向北京和臺北出售武器的交易根本行不通，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向中國出售武器是不受歡迎的。結果，預期的美國向北京轉讓機密技術的事被擱置一邊，以待美國澄清它的對臺政策。中國官員不顧北京面臨的潛在危險，還是公開提出中國與華盛頓能否在對付蘇聯問題上進一步合作，要看是否能圓滿解決中美在武器出售問題上的爭執。

與美國的糾葛再次引起1980—1981年冬春期間長時間的半學術性辯論，辯論的內容是西化的后果及其危害，以及依靠外國的力量對中國安全和發展的危險。[[111]](#_111_Guan_Yu_Zhe_Xie_Bian_Lun_De)雖然這場爭論表面上主要集中在對19世紀各式各樣改革家的評價上，但毫無疑問，爭論與中國迫切需要經濟和技術援助有關。但同時，這些需求又被對外國勢力控制的恐懼抵消掉了。這些爭論空無一物，用語也不尖銳，與1973—1974年的批孔運動中對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影射批評，或者是1976年因莫須有的“崇洋媚外”罪名而對鄧的責難不同。

因此，這場新的、寓意豐富的辯論并不是一場重大的倒鄧運動的前兆。鄧小平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深入他從1980年以來所進行的影響深遠的政治和行政改革，其中包括對中共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領導人員的變動。[[112]](#_112_Guan_Yu_Ci_Shi_Geng_Guang_F)鄧小平的這些計劃到1981年初便停頓下來，主要原因：一是在貫徹經濟調整政策時遇到了新的困難；二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保守分子因對鄧改革計劃的后果產生懷疑而引起的抵觸行為。但這一切，都未能阻止鄧把華國鋒從領導崗位上換下來。1981年6月，華國鋒辭去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職務。1981年底，鄧又重新掌握了政治主動權，在198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這種主動權達到了頂點。在這次大會上，改革派牢固地控制了政權。

雖然鄧的政治勢力在1981年暫時還比較弱，但這并非由于對外政策受到挫折。然而，作為中美關系正常化的主要設計師，鄧小平因在中美關系中讓步過多而可能受到無言的指責。他極力避免因過分親近西方而受到譴責。因而，是鄧的政策而不是他個人重新受到檢查和挑戰。

對晚清政府改革的爭論表明，中國的改革有風險，即慢慢地把獨立交到邪惡的、反復無常的西方人手中。言外之意是，中國的長遠政策是解決這個國家真正的經濟和安全需要，同時避免過分依賴外國勢力的危險，因西方在華利益是自私的，對中國有潛在的危害。但是，恢復孤立的政策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在與外界日益增加交往中加強中國外交政策的獨立性和主動性，是對國家政策和對鄧本人最好的考驗和挑戰。

就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情況下，6月中旬，美國國務卿黑格訪問了中國。中國人很熟悉黑格，他積極參與了尼克松總統訪華的早期計劃。在里根新政府中，他和副總統布什一樣，是和中國人私交最深的高級官員。黑格在任期間，因白宮官員和國防部就政府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控制權問題進行了充滿敵意的爭論而引人注目。黑格也以對北京的同情而知名，他認為進一步發展對華關系在“戰略上是絕對必要的”。但是，中國人在參與美國的官僚和政策斗爭中似乎不像過去那樣自信。

黑格主張中美關系要更密切。中國人當然為此而歡欣鼓舞，但黑格的意見要在政府里占上風還需假以時日。甚至在黑格試圖讓北京相信美國的意圖時——包括美國政府公開表示，中國在武器控制清單上不再受先前規定的限制，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按個案處理原則購買最有殺傷力的武器，但是，中國官員還是表達了他們的擔心和不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聲稱：“我們已多次聲明，我們寧可不要美國的武器，也絕不同意美繼續干涉我國內政，售武器給臺灣。”[[113]](#_113_Xin_Hua_She_1981Nian_6Yue_1)正如一名新華社記者所評述的，“進一步發展中美兩國之間戰略關系的關鍵是美國停止同臺灣發展超出民間關系的一切行為”。[[114]](#_114__Reng_Shi_Yi_Zhu_Si_Qi___Xi)

中國人懷疑美國人的意圖，因而認為跟美國人合作好處不大。在宴會祝酒詞中，黑格熱情洋溢地陳述中國對美國利益的重要性。中國外長黃華的調子卻是謹慎而含糊不清的。黃華不僅沒有提到“蘇聯霸權主義”（以往中國聲明中對蘇聯的標準用詞），而且呼吁國際社會關注中東和南非問題，以及對“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需要，而美國和中國在上述問題上卻存在著尖銳分歧。[[115]](#_115_Xin_Hua_She_1981Nian_6Yue_1)

而且，對于黑格公開要人們注意中美兩國可能愿意擴大防務合作范圍，中國人似乎不太高興。新華社的一篇評論直接提出黑格關于兩國關系向前發展的聲明和里根總統對臺援助的新保證，稱，“美國與臺灣的關系，特別是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是中美關系發展的關鍵問題”。評論進一步說：

美國朝野始終有些人在謀求使臺灣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而取得國際地位。……美國朝野至今還有一種議論，認為中國是講大局的……中國會吞下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的“苦丸”。這顯然是一種被顛倒了的邏輯。[[116]](#_116__Fa_Zhan_Zhong_Mei_Guan_Xi)

中美兩國政治和安全方面的進一步合作似乎受到了損害。在與華盛頓的關系越來越不穩定的情況下，北京開始探索另外的政策。

這一轉變最顯著的標志是7月中旬鄧小平對香港一著名記者的談話。鄧小平一貫支持中國外交政策中明確體現的堅定的民族主義色彩。中國其他領導人也許會懷疑中美關系和解的邏輯，但鄧小平也明確表示，他不對美國感恩戴德：

美國認為中國有求于美國，其實中國無求于人……只是期望各國通力合作，中國希望中美關系向前發展，不向后倒退，但這不是片面的。……美國如果真的搞得中美關系倒退，也沒有什么大不了，就算倒退到1972年以前的情形，中國也不會垮……中國人是有志氣的，決不卑躬屈膝，向人哀求。[[117]](#_117_Jian_Deng_Zai_Xiang_Gang_De)

所以，中國開始尋求在未來的中美關系難以確定的情況下本國的政治地位。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就有必要調整中國的觀點和政策。整個70年代，由于中國與美國合作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北京不再堅持以前的提法，即贊賞第三世界聯合起來，反對兩個超級大國。中國號召建立國際新秩序，這一號召是更切合實際了。不再煽動重新分配地球資源，而是不斷強調需要各國聯合起來，反對蘇聯的對外擴張。然而，到1981年夏末，形勢又發生了轉變，北京重新開始批評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政策，并再次聲明支持不結盟運動。1981年10月，關于國際合作與發展的22國首腦會議在墨西哥的坎昆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國際外交事務）重申了中國對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支持，并進一步斷言：“兩個超級大國在全球范圍的爭奪，威脅和侵犯了許多國家的獨立和安全。”[[118]](#_118_Yin_Wen_Yuan_Zi_Zhao_Zi_Yan)至少從趙紫陽聲明的意圖來看，中國再次把美國和蘇聯聯系在一起，把它們視為國際安全的威脅者。

實際情況更加錯綜復雜。北京很清楚，里根政府今后會繼續考慮向臺灣出售武器，同時也會增加對中國的技術轉讓。但在后一個問題上，中國人小心翼翼，不表示過分的熱情，唯恐被誤認為中國默許美國重新向臺灣出售武器。中國政府估計，與美國保持距離的政治地位，暗示要對中國不利的行為進行政治報復的威脅，會為中國提供一定程度的行動自由和保護。

這種姿態也使中國與華盛頓恢復談判的大門敞開著。當里根政府對臺灣的防務需要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接近尾聲時，中國官員在討論美國今后售臺武器框架時，暗示會有某些靈活性。雖然北京不能明確同意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但中國人對美國行為的反應受這些交易的范圍和性質的制約。中國也許使自己與華盛頓之間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距離，但與華盛頓關系內在的重要性促使北京不愿把中美關系置于危險的境地。

1982年1月，使中美關系朝更積極方向發展的機會終于來了。美國通知北京，美國同意繼續與臺灣共同生產F—5E戰斗機，但拒絕了臺灣對F—5G—一種新的更先進的飛機型號的要求。最壞的事情沒有發生：通過暗示，里根政府規定了向臺灣出售軍事技術的最高限度，如果北京能對其鄰居繼續在政治上保持克制態度。1月底，中國第一次公開表示，如果中美雙方就美國最終停止向臺灣轉讓武器問題制訂一個方案，中國打算同意美國在一段時間內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北京方面聲稱，非正式的保證是不可靠的：如果沒有正式的協議，當美國向臺北交付額外的武器時，中美關系有可能倒退，甚至破裂。

華盛頓和北京之間長期的、緊張激烈的談判左右著隨后六個月的議程，談判涉及的內容是如何為今后的武器出售制訂一個合適的方案。整個談判期間，中方反復警告，中美關系已處在“重要關頭”，有“倒退”的危險。雖然北京從未明確表示，一旦未能達成滿意的協議將會采取什么行動，但是，雙方關系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堅持下來了（包括加強防務合作）卻是很清楚的。同時，中國對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行了一系列發自內心的抨擊，特別是在美國表示繼續對臺灣的安全履行責任時。臺灣對大陸的領導人來說仍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他們經常在私下或公開場合表露出強烈的民族主義論調，充滿憤怒。鄧小平和其他高級官員對美國的意圖保持著警惕和懷疑，這使他們只有很少的機動余地。

盡管談判充滿著緊張和對峙，但中美兩國還是于1982年8月17日達成協議，就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問題發表了聯合公報。于是，作為中美關系長期保障的第三個重要文件就這樣簽署了。華盛頓對北京做了重要的讓步和承諾：

美國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并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后的解決。[[119]](#_119_Yin_Zi_Mei_Guo_Guan_Fang_We)

雖然中美雙方官員立即對這個協議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釋，但是，聯合公報明確解答了中國人關心的問題，有助于減少北京對華盛頓的猜疑，因而為支撐兩國的未來關系建立了更加堅實的基礎。但是，對中美關系不容置疑的損害仍需一些時間去彌補。

兩國關系的長期不確定性和削弱了的信任都使兩國（特別是中國）重新估價中美關系的價值。中國已明確尋求不再依靠與美國親密關系的對外政策策略，特別是中國對蘇美爭霸的立場尤其如此。但是，從中國更為廣泛的利益和需要來說，看不出有什么變化。1982年4月中旬，《紅旗》雜志上的權威性評論文章，再次強調了中國加強與西方經濟聯系的重要性。這篇文章指出，吸引外國投資、引進先進科學技術，以及進一步擴大對外貿易，都是中國長遠發展計劃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120]](#_120_Bian_Ji_Bu___Guan_Yu_Wo_Guo)然而，正如趙紫陽幾乎同時對正在中國訪問的一位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所說的，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是強調中國屬于第三世界，反對霸權主義，尋求持久的國際和平。[[121]](#_121_Jian_Zhao_Zi_Yang_Yu_Ji_Nei)

因此，中國試圖維護和擴大其對外關系的這些方面，以此加強中國的實力和地位。中國重新闡述外交原則的努力似乎與中國對日關系有特別密切的關系。在主要資本主義大國中，日本最贊成與中國保持長期密切的關系。80年代初，中國對經濟的重新估價，以及中美關系的突然惡化，使東京非常不安，因為這些事態的發展削弱了日本假設的基礎，而70年代后期的中日合作就是以這種假設為根據的。因而中國領導人再三試圖向日本高級官員表示，中日關系不會受中美關系中的政治不穩定的影響。

但是，中國對美國的看法必然使北京帶上有色眼鏡來對地區政治和安全，包括中日關系進行評估。隨著同美國的爭吵不斷加劇，中國對日本軍事實力和政治作用的顧慮再次加重。1982年夏，日本文部省試圖在教科書中淡化關于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日本侵華的用語，激起了北京暴風驟雨般的抗議。從1972年中日關系正常化以來，中國人在重要的政策聲明中首次發出“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潛在危險的警告。中國人對《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支持也采取了更含糊其辭的態度。雖然日本隨后收回了擬議中的教科書修改計劃，平息了中國領導人的憤怒，但這件事不可避免地損害了中國與日本的政治關系。

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中國對華盛頓和日本開始實行雙重政策。在政治方面，中國斷然否認與美國和日本在這個地區存在明顯一致的政治和軍事戰略。但這種分歧并不影響中國加強與美國和日本的合作，因為這些關系對中國尋求經濟、技術和科學發展的愿望是至關重要的。中國確定了非對抗性的外交政策框架：為了現代化規劃的需要，中國尋求全面的合作，但中國避免卷入大規模的政治和戰略競爭中去，而這種競爭卻是東亞大國關系的特征。

中國把國際緊張和動蕩的局勢歸因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爭霸斗爭”。這樣，中國仍能自由確定莫斯科或華盛頓對中國的安全構成的威脅程度。在這一點上，中國想與兩個超級大國保持一定的距離，更多的是假設，而不是現實。無論是在公開聲明，還是在私下表述中，中國繼續認為蘇聯仍處于攻勢，對中國安全構成了直接的威脅。隨后，中國的戰略家們認為，美國可能對蘇聯進行更有效的挑戰，蘇聯也許會減少武力使用，可這一天還未到來。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永遠不在美蘇爭霸中充當小卒。正如1982年8月底中國外交部長黃華對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所說的：“中國不會依附任何一個超級大國，中國不會打‘美國牌’去對付蘇聯，也不會打‘蘇聯牌’來對付美國，也決不允許任何人玩‘中國牌’。”[[122]](#_122_Ju_Xin_Hua_She_1982Nian_8Yu)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這一立場正式得到認可。黨的主席（不久在新的黨章中改為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在1982年9月1日黨的代表大會上聲稱，“中國決不依附于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于任何大國的壓力”。[[123]](#_123_Ju_Xin_Hua_She_1982Nian_9Yu)至少，從理論上說，中國完成了向獨立自主形象的轉變。

這些情形仍使未來的中蘇關系的性質極不明確。鄧小平、胡耀邦和中國其他高級官員清楚地認識到，與中美之間的分歧相比，中蘇敵對是一個長期的、更難處理的問題。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蘇聯在整個亞洲的軍事活動，造成對“亞洲和平和中國安全的嚴重威脅”。胡耀邦敦促蘇聯領導人，“采取實際步驟，解除對我國安全的威脅”，這對莫斯科履行其改善中蘇關系的一貫保證是一個直接的挑戰。[[124]](#_124_Ju_Xin_Hua_She_1982Nian_9Yu)

在1981年的大部分時間及1982年間，中美之間的矛盾不斷發展，莫斯科唱起了贊歌，它顯然希望利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日益惡化的政治關系。當莫斯科從中美勾結的最可怕的噩夢中逐漸醒來的時候，蘇聯領導人顯然采取了積極的辦法，向北京暗示其靈活態度。但是，中國人仍心有余悸，特別是蘇聯毫不減弱它對阿富汗和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動，雖然兩國在國家關系方面都已定下了比較適當的調子，但它們在政治和安全問題上更為廣泛的分歧仍不見減縮。特別是中國不希望因它與華盛頓發生麻煩而迫使自己匆匆忙忙轉向莫斯科。

然而，到1982年秋，中蘇兩國的關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靈活松動的跡象。中國正式采取獨立自主的外交姿態是傳給莫斯科的一個信號，中國不再同美國在明顯是由于反蘇圖謀而產生的政策上合作，更為重要的也許是，關于武器出售的條約的簽訂，終止了中美關系潛在的滑坡，北京感到既然與美國的關系看起來不會再有危險，這就增加了對莫斯科的活動余地。中國人也想調整好自己，以便仔細觀察隨著勃列日涅夫日益虛弱而迫近的繼承問題所帶來的任何機會。

1982年10月，中國人決定探試一下蘇聯人的意向。作為對前年春天克里姆林宮提議的回答，中國人建議開始雙方副外長級的“磋商”，以討論中蘇關系正常化的可能性。這樣，由于蘇聯入侵阿富汗而取消的談判現在又重新開始，而且政治氛圍更為有利。雖然雙方誰都沒有預想外交關系能早早地、迅速地得到改善，但是，中國和蘇聯外交聯系的正常渠道又建立起來了。11月，由于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國人（以外交部長黃華個人名義）能夠直接向新的蘇聯領導人轉達這樣的信息：北京仍然為更全面地探討改善雙方的關系敞開大門。

與此同時，中國反復地明確表示，中蘇關系絕不會以損害中國與西方的關系為代價而改變。中國與美國、日本和西歐有著廣泛的經濟和技術聯系，這一利害關系太重要了，不能為了同蘇聯試探性的、仍然是充滿疑問的政治關系去冒風險。80年代初的不確定、不穩固狀態也一直牽制著北京。但是，與敵對國家和友好國家有更多樣化的外交關系至少為中國外交政策的長期穩定提供了可能，而這一問題曾如此長久地困擾著中國領導人。當1982年即將辭別之際，鄧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如果還不能感到滿足，起碼也有理由滿意了：持久可靠的外交路線如果還沒有完全實現，其輪廓也終于依稀可辨了。

## 中美關系的意義

中國對美國的開放，極大地改變了亞洲的國際關系，由于摒棄了朝鮮戰爭以來支配中美關系的敵對政策，北京開始了進行重新組合的過程，這一過程比中蘇沖突以來的任何事件都明顯地改變了國際秩序。然而，這種變化不論出現何種結果，都不是命中早已注定，中美兩國都必須把握住改善關系對他們各自的政治進程的影響。與此同時，雙方又都根據自己的需要解釋和解的意義和所取得的成果。此外，當雙方的注意力都從宏觀戰略迅速地轉向政治較量的時候，中美和解的設計者們便不能把他們最初的進展維持下去。

最初，毛澤東同意早點向美國開放。的確，沒有他的認可，中美關系的改善就會碰到障礙或被阻止。但是，毛對這一政策的認同并沒有多大保證。他既不能保護周恩來、鄧小平免受“崇洋媚外”的指責，也不能確保他始終如一地支持與美國的關系，毛深受蘇聯對中國構成長期威脅的困擾，認為誘導美國與北京建立關系會使美國提供中國的安寧所必需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然而，他的愿望并沒有完全得到滿足。更為重要的是，毛主要關心的是中國政治的連續性，他想限制他的下屬，特別是鄧的政治權力。因而，向美國開放的門并沒有完全打開。毛從來就沒有完全讓中國進一步介入國際事務，他把與美國改善關系更多地看成是解決中國在安全方面的嚴重困境的一個辦法，而不是一條通向經濟與技術進步的道路。

中國與西方和解的不平坦的道路，反映了在恢復關系的最初幾年，兩國都缺乏能夠持久發展的策略，每一方都有自己認為必需的政治要求，而雙方都不能在這些要求上作出讓步。兩國都在努力遏制蘇聯勢力的擴大。但是，要使這些考慮成為對雙方政治體制更多的諒解，是極為困難的。只是到70年代末，隨著鄧的第二次復出、地位不斷鞏固，以及歷屆美國政府與北京合作的更為明確的政策，全面外交關系才最終實現。然而即使這種關系也是短暫的，因為里根政府上臺不久，兩國關系受到嚴峻考驗，隨后又對此作了重新解釋。

70年代中美關系的改善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是，這為80年代更為多樣化的關系創造了條件。第一，由于雙方最高層達成了諒解，為雙方領導人經受反復的挑戰和壓力創造了基礎，更重要和更深層的關系最終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第二，向美國的開放，為中國更為全面地介入現存的國際體系鋪平了道路。中國進入聯合國也許是北京擺脫了“文化大革命”的孤立狀態后的必然結果。但是，中美關系的改善無疑加速了這一進程。

但是，從第一點上看，中國在國際場所的政策安排與美國的政策選擇分歧極大。尤其是，北京對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主張采取“重新分配主義”的辦法。[[125]](#_125_Can_Jian_Sai_Mou_Er__S_Jin)只有在中美統一陣線“高潮”的時候，北京才有意在共同反對蘇聯的講壇上，努力尋求與美國政策的共同點。80年代初，隨著對外交政策的重新估價，北京重新努力繪制它一整套獨特的，顯然再一次與美國不同的全球戰略，尤其在對第三世界的關系上。

第三，20年之久的孤立中國政策的結束，為中國更為全面地進入地區和全球性經濟發展敞開了大門。中國除了在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中采用“全球主義”傾向外，中國的實際行為則表明，它對國家的需求十分敏感。經過一段時間后，中國對國外的貸款、投資、技術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要求的不斷增長，這反映了中國在推動實現它所宣布的政策與其決心抓住每一個經濟發展的機會之間是有差別的。中國顯然想得到世界銀行的幫助。[[126]](#_126_Jian_Sai_Mou_Er__S_Jin___Zh)但是，如果中美關系的改善沒有得到明確的承認，那么，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幾乎全面合作似乎是極難成功的。這些影響對日本特別明顯，中美關系的改善無疑使日本得到最大好處，它已成為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

因此，到70年代末，中國被排除在東亞經濟政治之外的不正常現象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后較長時間的政治動蕩拖延了這一結合過程。但是，80年代初，隨著中國與其周邊國家建立更為全面的關系，這些影響很快就消失了，與此同時，北京的結論是，中美關系持久的結構不能過多依賴于戰略合作，還要在兩個體制之間建立更為多樣的一整套政治、經濟及法律制度關系。

但是，對外開放的最大影響是在中國制度內部。當北京尋求全面參與全球和地區性的政治事務后，中國的國際孤立主義的偏頗與幻想便迅速消失了。現代化建設的使命，以及中國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出現在世界上，以繼續進行國際合作為先決條件。一個好漢三個幫。雖然與美國關系的全面建立并沒有解決其國內長達一個多世紀的關于西方世界經濟和技術優越性的論爭，但是，中國已把這個爭論很久的問題提高到國內政治進程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因而，向美國開放既是結束，又是開端。

[[1]](#_1_4)本文中的觀點是作者的觀點，不反映蘭德公司及其任何一個政府資助單位的看法。

[[2]](#_2_4)《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第41—42頁。

[[3]](#_3_4)理查德·H.所羅門：《中國人的政治談判行為》，第2頁。

[[4]](#_4_4)參見理查德·維希《中蘇危機的政治》。

[[5]](#_5_4)托馬斯·M.戈特利布：《中國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與戰略三角關系的起源》。

[[6]](#_6_4)盧西恩·W.派伊：《中國政治的動力》。

[[7]](#_7_4)如果想看被夸大了的這些爭論的話，請參閱戈特利布《中國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與戰略三角關系的起源》，特別是第30—66頁。

[[8]](#_8_4)艾倫·S.惠廷：“中美緩和”，載《中國季刊》第82期（1980年6月），第336頁。

[[9]](#_9_4)關于引入的此種討論的更詳細的分析，見維希《中蘇危機的政治》。

[[10]](#_10_4)此部分是以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國進行的一些訪談和出版的關于中國外交戰略的描述為基礎的。參見鐵竹偉：“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載《昆侖》（1985年9月）第5期，特別是第140、142頁；以及軍事科學院葉劍英傳記寫作組《葉劍英傳略》，特別是第271—272頁。

[[11]](#_11_4)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第180—181頁。

[[12]](#_12_4)《聶榮臻回憶錄》，第865—866頁。

[[13]](#_13_4)羅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72頁。

[[14]](#_14_4)華方（音）：“林彪流產的反革命政變”，載《北京周報》1980年12月22日，第19—28頁。

[[15]](#_15_4)基辛格：《白宮歲月》，第714頁。

[[16]](#_16_4)同上書，第1061頁。

[[17]](#_17_4)基辛格：《白宮歲月》，第697頁。

[[18]](#_18_4)中共湖北省委寫作組編：“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學習‘論政策’”，載《紅旗》第9期（1971年8月2日），第10—17頁。

[[19]](#_19_4)《紐約時報》1971年8月4日。

[[20]](#_20_4)斯坦利·卡諾：“林彪據信已死”，載《華盛頓郵報》1971年11月27日。

[[21]](#_21_4)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73年8月24日所作）。

[[22]](#_22_4)“關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中發，1973年第34號，載高英茂編《林彪事件：權力政治和軍事政變》，第113頁。

[[23]](#_23_4)有關詳情參見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家對外評估中心《中國的防務開支（1965—1979）》，第2—4頁。

[[24]](#_24_4)有關黨的文件匯編，見高英茂：《林彪事件》。

[[25]](#_25_4)基辛格：《白宮歲月》，第698—699頁。毛澤東和斯諾的合影直到1970年12月26日毛生日那天才刊登在《人民日報》上。

[[26]](#_26_4)基辛格：《白宮歲月》，第701、703頁；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憶錄》，第547頁。

[[27]](#_27_4)尼克松：《尼克松回憶錄》，第551—552頁。

[[28]](#_28_4)所羅門：《中國人的政治談判行為》，第7頁。

[[29]](#_29_4)張明養：“林彪和‘四人幫’極‘左’外交路線剖析”，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2期。

[[30]](#_30_4)1978年7月30日“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信”，載外國廣播信息處《東歐動態》1978年8月1日，第17頁。

[[31]](#_31_4)埃德加·斯諾：《漫長的革命》，第11—12頁。除第一句以外，引文的其余部分都在被中方認可的原文中刪除了。

[[32]](#_32_4)《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也見斯諾《漫長的革命》，第171—172頁。

[[33]](#_33_4)斯諾：《漫長的革命》，第182—183頁。

[[34]](#_34_4)周恩來：“關于國際形勢的黨內報告”（1971年12月），參見陳慶編《中國與三個世界》，第137—138頁。周的報告由臺灣渠道獲得，看來是一份可靠的真實的文件。

[[35]](#_35_4)中共湖北省委寫作組：“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學習‘論政策’，載《紅旗》，第9期（1971年8月2日），第14頁。

[[36]](#_36_4)例如，西摩·赫什的《權力的代價：尼克松當政時期的基辛格》。

[[37]](#_37_4)引自上書，第367頁。

[[38]](#_38_4)米歇爾·奧克森伯格：“中美關系十年”，載《外交事務》第61卷第1期（1982年秋季號），第177頁。奧克森伯格的評論根據的是大量有關這一時期中美談判所得到的記錄。

[[39]](#_39_4)西摩·赫什：《權力的代價》，第361頁。

[[40]](#_40_4)同上書，第375—376頁。

[[41]](#_41_4)“過去30年越中關系真相”（1979年10月4日），國外廣播信息處印：《亞太動態》（增刊）1979年10月19日，第22頁。

[[42]](#_42_4)見阮基石1982年3月6日接受阿姆斯特丹《民族報》采訪時的談話。報道見外國廣播信息處《亞太動態》1982年3月17日，第2頁。

[[43]](#_43_4)“越中關系真相”，第22—23頁。

[[44]](#_44_4)上面這段話中的消息是由一位了解這一時期中美關系的中國官員給作者提供的。

[[45]](#_45_4)所有引言所用的文本見理查德·H.所羅門編《中國因素，中美關系和全球舞臺》，第296—300頁。

[[46]](#_46_4)理查德·穆爾斯廷、莫頓·阿布拉莫維茨：《重新制定對華政策：美中關系和政府的政策制定》。

[[47]](#_47_4)基辛格：《白宮歲月》，第765頁。

[[48]](#_48_4)同上書，第906、910—911頁。

[[49]](#_49_4)毛澤東和尼克松的談話在《白宮歲月》第1061頁有記錄。

[[50]](#_50_4)引文見李季銀（音）《日本面對中國：戰后時期的政治和經濟關系》，第85頁。

[[51]](#_51_4)尼克松的評論表明的日期是緊接著他在1975年辭去總統之職以后。這些資料引自赫什《權力的代價》，第380頁。

[[52]](#_52_4)引自所羅門《中國因素》，第297頁。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美國“對其同日本的友好關系給予最高度的重視”時，中美上海公報中并沒有提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

[[53]](#_53_4)李季銀（音）：《日本面對中國》，第106—111頁。

[[54]](#_54_4)有關后一個問題的證據含糊不清。據一位參加了與中國人的討論的美國人說，鄧對基辛格說“美國欠中國一筆債”，因為尼克松在1972年時曾承諾在他第二屆總統任期期滿之前完成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所羅門：《中國人的政治談判行為》，第11頁。

[[55]](#_55_4)亨利·基辛格：《動亂年代》，第44—71頁。

[[56]](#_56_4)《紐約時報》1975年7月10日。

[[57]](#_57_4)所羅門：《中國人的政治談判行為》，第7頁。一位奉命為周寫傳記的中國人斷言，在尼克松訪華期間，周的癌癥就已十分嚴重了。作者們進一步聲稱，1966年以后，周就一直因心臟不好而被困擾。方鉅成、姜桂儂：《周恩來傳略》，第115—116頁。

[[58]](#_58_4)基辛格：《動亂年代》，第67、69頁。

[[59]](#_59_4)同上書，第692頁。

[[60]](#_60_4)同上書，第697頁。

[[61]](#_61_4)同上書，第68、694頁。

[[62]](#_62_4)基辛格：《動亂年代》，第52頁。

[[63]](#_63_4)同上書，第47—70頁。

[[64]](#_64_4)基辛格：《動亂年代》，第56、67頁。

[[65]](#_65_4)馬奎斯·蔡爾茲：“同周恩來談話”，載《華盛頓郵報》1973年5月26日。

[[66]](#_66_4)本章節周的評論出自其“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73年8月24日），《北京周報》1973年9月7日，第22頁。

[[67]](#_67_4)基辛格：《白宮歲月》，第763頁。

[[68]](#_68_4)基辛格：《白宮歲月》，第1060頁。基辛格并未注明毛的那次談話是在哪一天，但卻暗示是在1975年底他幾次會見這位主席中的一次。

[[69]](#_69_4)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載《北京周報》1977年8月26日，第60—61頁。

[[70]](#_70_4)奧克森伯格：《中美關系十年》，第184頁。

[[71]](#_71_4)奧克森伯格：《中美關系十年》，第182頁。

[[72]](#_72_4)賽勒斯·萬斯：《艱難的選擇》，第82頁。

[[73]](#_73_4)同上。

[[74]](#_74_4)哈里森·E.索爾茲伯里：“一位高級領導人說，中國對卡特關照臺灣‘很不高興’”，見《紐約時報》1977年8月30日；路易斯·博卡迪：“鄧說萬斯之行使正常關系受到損害”，見《紐約時報》1977年9月7日；“中國高級領導人斷然反對臺灣與美國協調一致的做法”，見《華爾街雜志》1977年10月3日；“中國副總理重申在臺灣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叫嚷必然要使用武力”，見《華爾街雜志》1977年10月4日。

[[75]](#_75_4)奧克森伯格：《中美關系十年》，第182頁。

[[76]](#_76_4)任谷平：“慕尼黑的悲劇與當代的綏靖主義”，載《人民日報》1977年11月26日。

[[77]](#_77_4)奧克森伯格：《中美關系十年》，第183頁。

[[78]](#_78_4)見萬斯《艱難的選擇》，第120—139頁。

[[79]](#_79_4)引文源自1979年10月5日布熱津斯基給卡特總統的備忘錄。布熱津斯基在《權力與原則》第566頁中曾引用。

[[80]](#_80_4)理查德·鮑姆的“引言”，見理查德·鮑姆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新技術革命》，第4—6頁。

[[81]](#_81_4)《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從越南當局反華看蘇聯的戰略意圖”，載《紅旗》第8期（1978年8月1日），第101—104頁。

[[82]](#_82_4)《人民日報》社論：“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載《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日。

[[83]](#_83_4)布熱津斯基：《權力與原則》，第216—218頁。

[[84]](#_84_4)本節所引用的更為廣泛的討論，見丹尼爾·特雷蒂亞克的“1978年的中日條約：釣魚島事件的前奏”，載《亞洲概覽》第18卷第12期（1978年12月），第1235—1249頁。

[[85]](#_85_4)奧克森伯格：《中美關系十年》，第187頁。

[[86]](#_86_4)見所羅門《中國因素》，第300—302頁。

[[87]](#_87_4)《北京周報》1979年1月5日，第17頁。

[[88]](#_88_4)引文源自中美關系正常化協定簽署之際中國單方面發表的聲明，見所羅門《中國因素》，第304頁。

[[89]](#_89_4)鄧小平1979年1月5日會見美國記者時的談話，《北京周報》1979年1月12日，第17頁。

[[90]](#_90_4)關于對這方面的全面論述，參見納嚴·詹納達《兄弟仇敵：戰爭之后的戰爭》和羅伯特·S.羅斯《印度支那紛爭：中國的對越政策（1975—1979）》。

[[91]](#_91_4)布熱津斯基：《權力與原則》，第409—410頁。

[[92]](#_92_4)關于對這一問題的更廣泛的討論，參閱張保民（音）《處在中國和越南之間的柬埔寨》，特別是第113—133頁。

[[93]](#_93_4)良清國分：“中國對外經濟決策中的政治：取消與日本建造工廠事件”，《中國季刊》第105期（1986年3月），第23頁。

[[94]](#_94_4)原文見所羅門的《中國因素》，第304—314頁。

[[95]](#_95_4)《洛杉磯時報》1979年3月25日。

[[96]](#_96_4)《紐約時報》1979年4月20日。

[[97]](#_97_4)《北京周報》1979年4月4日，第3—4頁。

[[98]](#_98_4)在1981年初的一次會見中，鄧承認“我們，包括我自己，對經濟建設一直過于樂觀”。引自良清國分《中國對外經濟決策中的政治》，第39頁。

[[99]](#_99_4)同上書，第23頁。

[[100]](#_100_4)杰伊·馬修斯：“中國為美核查《限制戰略武器條約》提供便利的資料”，《華盛頓郵報》1979年4月20日。

[[101]](#_101_4)卡特總統的話引自布熱津斯基《權力與原則》，第421頁。

[[102]](#_102_4)所有引文出自評論員文章：“當前戰爭危險與保衛世界和平”，《紅旗》1979年第11期，第53—58頁。

[[103]](#_103_4)觀察員文章：“警鐘敲響了”，《人民日報》1980年1月15日。

[[104]](#_104_4)本刊評論員：“反面教員在給大家上新課——評蘇聯侵略和占領阿富汗”，《紅旗》第2期（1980年1月16日），第46—48頁。

[[105]](#_105_4)有關這個問題的詳細情況，見亞科夫·Y.I.弗爾茨伯格《中國的西南策略：包圍與反包圍》，第63—85頁。

[[106]](#_106_4)杰羅爾德·F.埃爾金、布雷恩·弗雷德里克斯：“中印邊界談判——新德里的觀點”，載《亞洲概覽》第23卷第10期（1983年10月），第1132—1134頁。

[[107]](#_107_4)這一看法特別在《人民日報》的特約評論員文章中有所反映。見《人民日報》1980年1月11日，“蘇聯爭霸世界的軍事戰略”。

[[108]](#_108_4)鄧在1月份的論述未見原稿，所有的引文源自“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載《鄧小平文選》，第203—237頁。（書中引文有誤。——譯者）

[[109]](#_109_4)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臺灣行政院長希望里根送新式武器”，載《紐約時報》1981年1月25日。

[[110]](#_110_4)邁克爾·帕克斯：“福特希望解決向臺灣出售武器問題”，載《洛杉磯時報》1981年3月28日。

[[111]](#_111_4)關于這些辯論的典型事例見楊東梁：“‘海防和塞防之爭’淺析”，載1981年2月10日《光明日報》，見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81年3月5日，第3—7頁；喬還田：“有關李鴻章洋務運動的討論情況”，載《人民日報》1981年3月30日，見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81年4月3日，第8—12頁，及喬還田：“不應把洋務派的外交活動從洋務運動中抽出去”，載《人民日報》1981年5月7日，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81年5月15日，第4—7頁。

[[112]](#_112_4)關于此事更廣泛的討論，見H.萊曼·米勒“中國的行政革命”，《當代史》第82卷第485期（1983年9月），第270—274頁。

[[113]](#_113_4)新華社1981年6月10日。

[[114]](#_114_4)“仍是一著死棋”，新華社1981年6月10日。

[[115]](#_115_4)新華社1981年6月14日。

[[116]](#_116_4)“發展中美關系的一個關鍵”，新華社1981年6月19日。

[[117]](#_117_4)見鄧在香港的一次會見有關人士的談話，《明報》1981年8月25日。此次會見發生在7月中旬，但直到8月底才見報。

[[118]](#_118_4)引文源自趙紫陽出席坎昆首腦會議后在墨西哥國會發表的講話。新華社1981年10月27日。

[[119]](#_119_4)引自美國官方文本《國務院公報》1982年10月，第20頁。

[[120]](#_120_4)編輯部：“關于我國對外經濟關系問題”，《紅旗》第8期（1982年4月16日），第2—10頁。

[[121]](#_121_4)見趙紫陽與幾內亞比紹共和國國家元首若奧·貝爾納多·維埃拉的談話，新華社1982年4月17日。（應為4月18日。——譯者）

[[122]](#_122_4)據新華社1982年8月22日電。（應是8月20日。——譯者）

[[123]](#_123_4)據新華社1982年9月4日電。

[[124]](#_124_4)據新華社1982年9月4日電。

[[125]](#_125_4)參見塞繆爾·S.金《中國、聯合國和世界秩序》。

[[126]](#_126_4)見塞繆爾·S.金：“轉變中的中國的世界政策”，《世界政策雜志》（1984年春季號），第603—633頁。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 第六章 中國的經濟政策及其貫徹情況

## 引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間（1966—1976年），幾乎沒有提出什么真正有新意的經濟思想或政策。盡管曾經有過一些經濟方面的爭論延續到并貫穿于“文化大革命”期間，但追根溯源，這些爭論卻產生于一個較早的時期，特別是在“大躍進”及緊隨其后的災難時期，當時，全國上上下下都在思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錯。

截止到1956年，中國政府完成了私人工商業的改造，農業也實行了合作化。這種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和管理的工具，是從蘇聯整套照搬來的。中國重視機械和鋼鐵的經濟戰略，實際就是30年代斯大林為俄國制定的發展戰略的翻版。

這種計劃工具和發展戰略的選擇，部分地反映了當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中存在的一種看法，即蘇聯代表了針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做出的一種現實的、也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抉擇。中國的領導人雖對蘇聯的成就也持同樣的看法，但從一開始，他們就對蘇聯經濟體制的許多特征感到擔心。這種擔心之所以產生，其原因在中國高級領導人中是因人而異的。一些人對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和管理體制的僵化表示擔心，而另外一些人則認識到，中國不能照搬蘇聯的模式而忽視農業。在某些方面，毛澤東與那些和他關系密切的人，對蘇聯制度滋生出來的、且與日俱增的社會官僚化，對它重視與資本主義而不是與未來共產主義理想更一致的價值觀的做法，感到不安。

因此，實際情況是，社會主義改造剛一完成，中國領導人便開始調整體制，使之更好地適應中國的需要，這些需要是他們憑直覺所認定的。1957年，他們做了一些減少過度集中的嘗試，措施是放松對某些私人市場的控制以及將一些決策權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機構。1958年和1959年，出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樣的激動人心的嘗試。1960年“大躍進”失敗后，他們又回到集中計劃上，同時加強市場作用、提高對個人的物質刺激，這特別體現在農業上，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在工業上。

在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的大多數時間中，那些后來被冠以“左派”和“右派”或“激進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東西之間的界限，尚未清楚地劃分出來。一方面，有些領導人，如陳云，親自過問經濟事務；而另一方面，毛澤東和多數黨的高級領導人關心的則是在政治上鞏固革命成果。然而大的問題，如合作化的速度問題，既涉及政治，也涉及經濟，因而這些要人所關心的問題卻也會相互重疊。但是，毛本人對經濟發展的中心問題并不特別在意。他在1956年的講話《論十大關系》，或許與其說是試圖深刻地闡明他個人的主張，毋寧說是集體創作，只是署了他的大名，以使文章更具權威。

后來，在1958年，毛親自介入經濟決策之中，對隨后20年產生了深遠影響。用毛本人的話來說：

去年八月（1958） 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對建設根本外行，對工業計劃一點不懂……但是，同志們，1958年，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過去責任在別人……大辦鋼鐵的發明權是柯慶施還是我？我說是我。[[1]](#_1_Mao_Ze_Dong___Zai_Lu_Shan_Hui)

如上一段話所示，毛在1958年和1959年不僅介入經濟決策，還將這種做法建立在他對經濟發展了解不多的基礎之上。事實上，“大躍進”的嘗試，更多地是政治理想，而不是某個人的經濟概念的產物。“大躍進”是一場很長的群眾運動，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促使中國迅速地跨入工業化國家的行列。關鍵的投入是人的努力——在自家院子里土高爐中生產鋼材的努力，為灌溉華北干旱的土地而搬移了數百萬噸土石的努力。

對這場群眾運動之后的災難性后果的完善分析，將在本章其他地方加以討論。這里，與此相關的關鍵一點是領導層諸位成員對這場災難的性質得出了迥然相異的結論。由于1959—1961年間氣候的惡化，更由于1960年蘇聯決定從中國撤走技術專家，要對已發生的這些事實進行分析，就不是那么簡單的了。因此，那些與毛看法相同的人便會辯解說，“大躍進”的基本思想并非不正確，只是因為貫徹得不力、時運不濟（氣候）以及蘇聯背信棄義，才導致了暫時的失敗；而另外一些領導人則持異議，他們認為，正是“大躍進”的觀念才是這場災難的主要根源。

60年代初期，由于人們一致認為恢復是當務之急，因此，這些觀點上的分歧，對經濟政策只產生了有限的影響。但到1962年，由于毛反對農村責任制，認為它破壞了農業合作化經濟，這時，意見不同的爭執的跡象才顯露出來。責任制最極端的形式，實際已被阻止并予以否定，直到80年代，它們才再度出現。然而，除了遏制放棄合作化的做法的努力之外，毛還把注意力轉投到他認為是問題的癥結之所在，即存在于絕大多數人民（包括許多中國共產黨黨員）中的那些尚未改造的價值觀和態度。其結果首先是改革軍隊的嘗試，接著，又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毛在60年代初期是否花了一些時間對其經濟發展思想進行反思和推敲，現在尚無證據證實這一點。毛那個時期的講話幾乎沒有任何經濟方面的內容，除了十分隨便地說幾句外。與毛觀點相近的那些人也沒能及時從“大躍進”中吸取精華，祛除糟粕，進而制定一個經濟發展戰略。

所以，當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之時，對那些想要提出一個更激進的新經濟路線的人來說，幾乎沒有任何指導方針可循。60年代初所做的增進財政指標和財政管理的作用的嘗試，被攻擊為“利潤掛帥”，而作為財政管理首倡者的孫冶方，也遭到貶斥。但除了“大躍進”的試驗之外，人們幾乎提不出任何經濟戰略，以取代在劉少奇和鄧小平領導下制定的政策。不過，也沒有一個人希望重蹈“大躍進”之覆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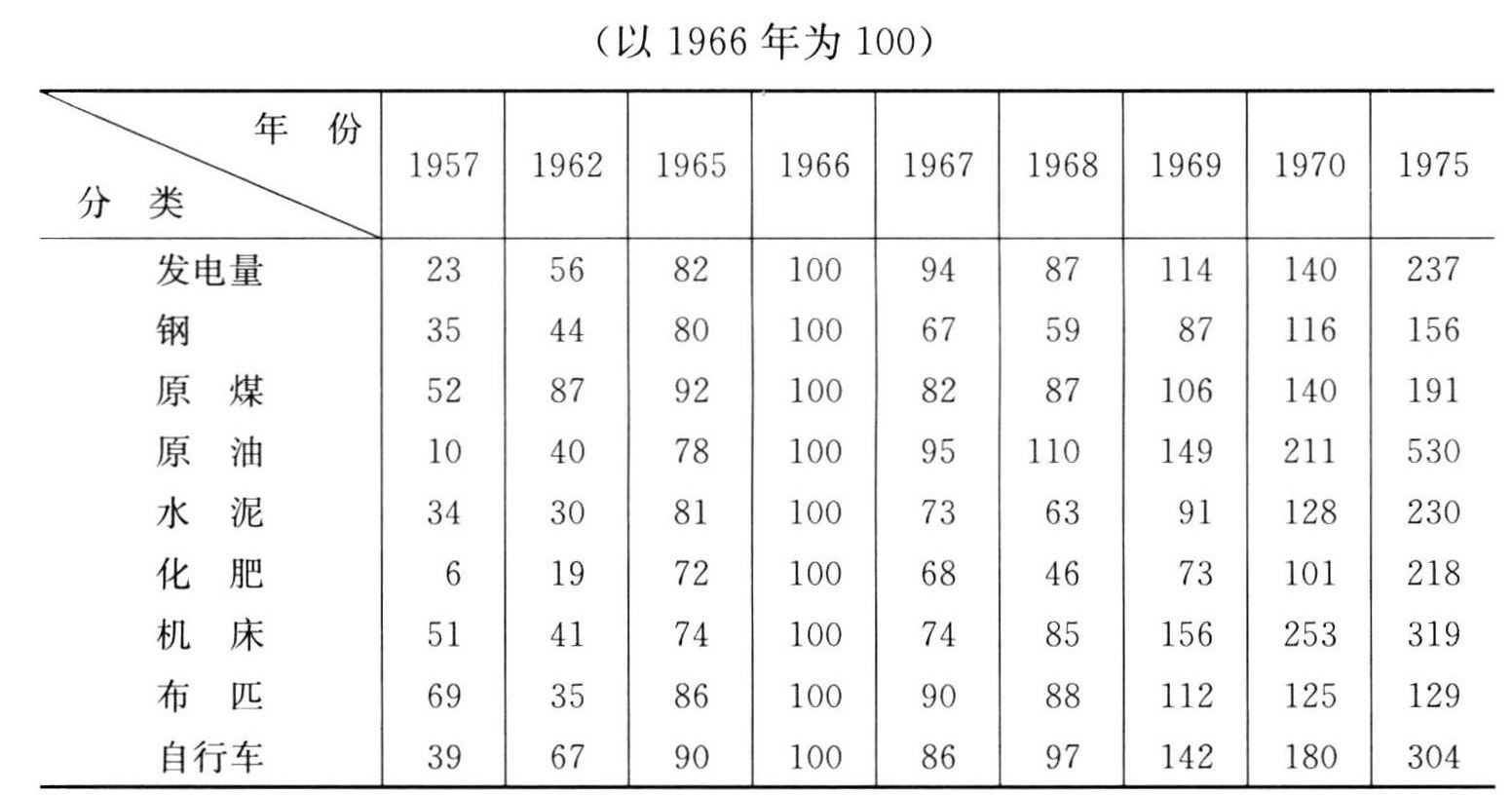
因此，1966年后所貫徹的政策，就是自50年代以來提出的并在60年代初期加以修改的并加進了1958—1959年間“大躍進”方式的某些部分的那些政策。關于這個戰略的性質，無需閱讀那些“左”傾或右傾的領導人的言論，只要仔細分析一下此后10年的經濟工作的實際情況，人們便可充分地了解。領導人中很少有人明確地表述一種戰略，這或許是由于以某種特定的方式處理日常事務在政治上更容易、更安全的緣故。可是，盡管所制定的政策只不過是出于短期考慮而產生的，但時間久了，它們便會匯成一種長期的戰略。

## 經濟混亂，1966—1969年

然而，在把目光轉向“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的發展戰略之前，我們必須首先論及這個觀點，即在這個時期，由于全國始終處于混亂狀態，中國根本就沒有一個前后一致的戰略。當然，政治往往是混亂的，但是，這里的問題在于，政治是否經常波及到經濟，導致工作的中止和更糟糕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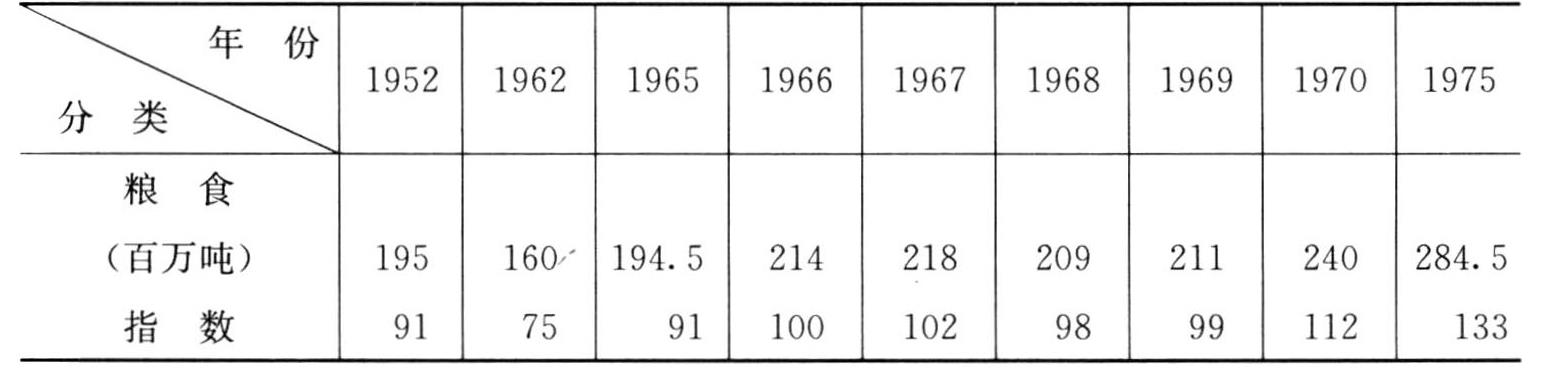
重要數據是本文分析的基礎，列于表8、表9和表10之中。這些表格所提供的信息既清楚，又連貫。首先，混亂的狀況只限于1967年、1968年和1969年三年。而工業和運輸業也只是在1967年和1968年才面臨巨大的困難。到1969年，很多工業已達到并超過1966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亂的年度中，工業產量與“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沒有下降得很厲害，何況還遠遠超過1962年蕭條時期的數字。盡管各個省份的混亂程度不盡相同，但絕大多數在1967年和1968年兩年中都經歷了嚴重的混亂。在這個格局中，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上海，這里的工業生產只在1967年一年中遭到較大程度的破壞。到1968年，上海的工業恢復并超過了1966年前的最高水平。[[2]](#_2_1966__1970Nian_Jian_De_Di_Qu)由于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領袖們的基地，他們如果搞了一套更具試驗性和潛在破壞力很大的經濟政策，便不會成為意料之外的事情了。不過，我們對上海在1966—1976年間的經濟情況一鱗半爪的了解告訴我們，上海情況與中國其他地區極其相似。在此期間，上海總的工業增長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965—1978年間上海為8.3％，全國平均增長率為10.2％），而這樣的結果是從50年代開始的那個政策的體現，其目的是將工業從沿海地區遷移開。

表8 “文化大革命”時期工業產量指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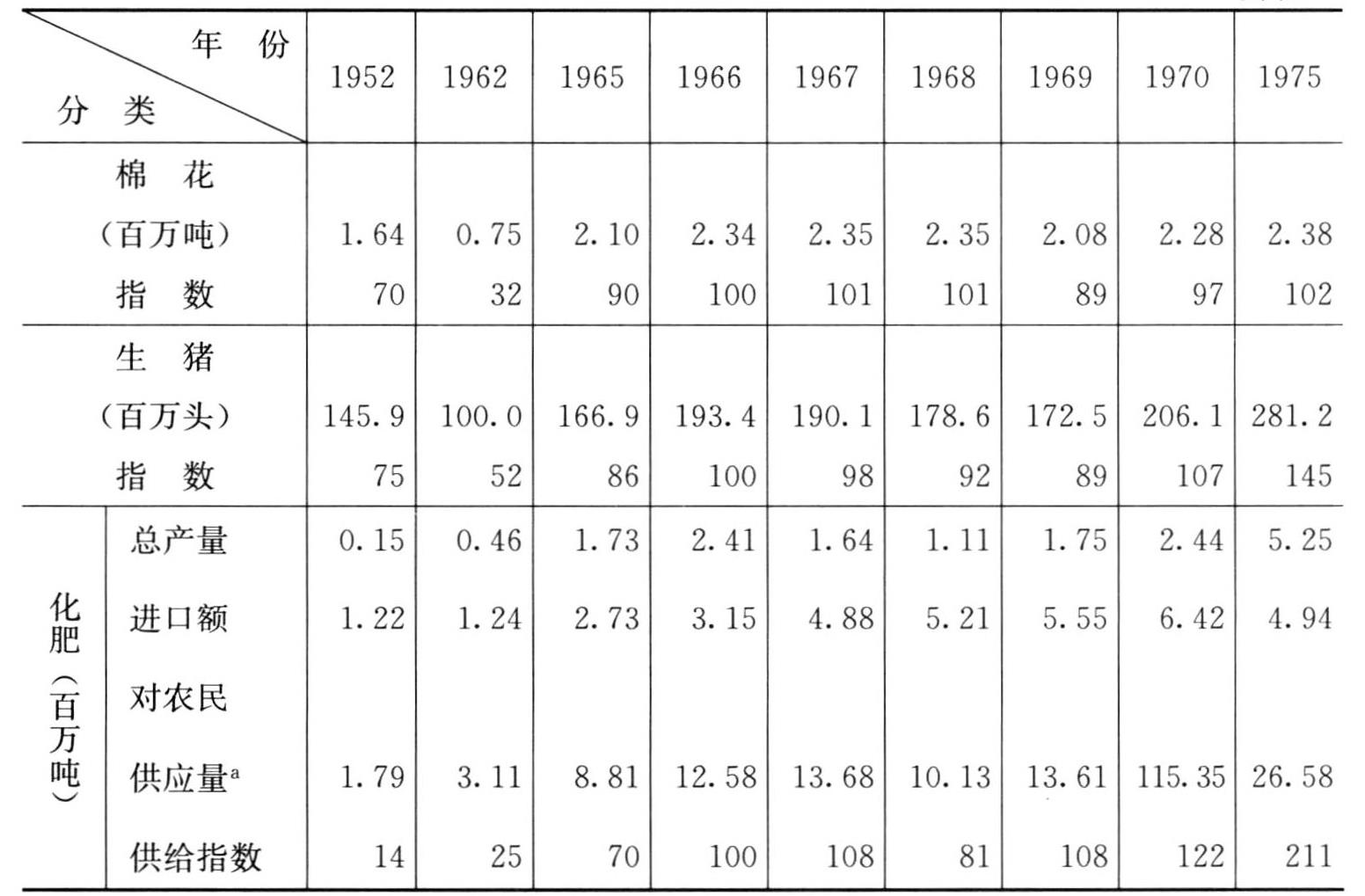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225—231頁。

表9 “文化大革命”時期農業產量和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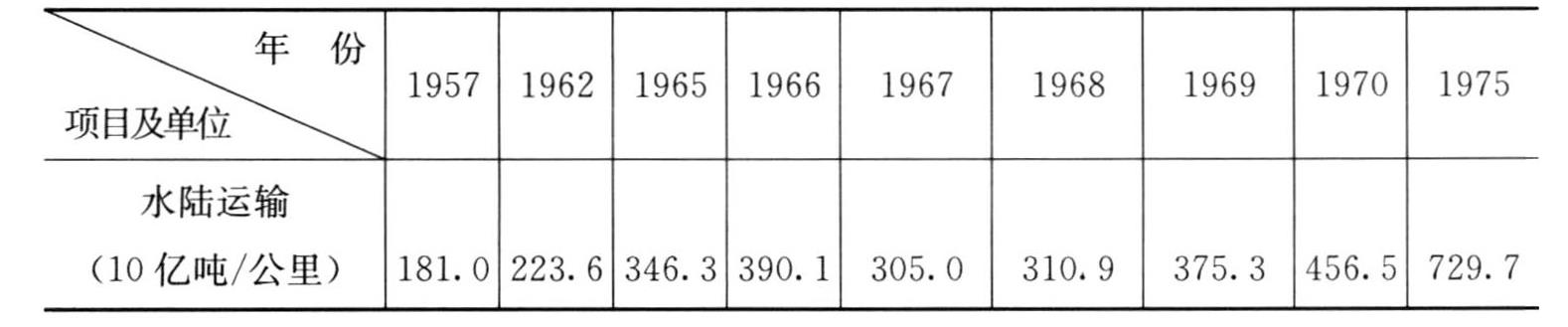


續表



a.這里的數字是以總重量計數的，而產量和進口的數字指的是肥料。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229、386頁；《中國農業年鑒》（1980），第34、40頁。

表10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運輸業和商業



續表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283、333、345、35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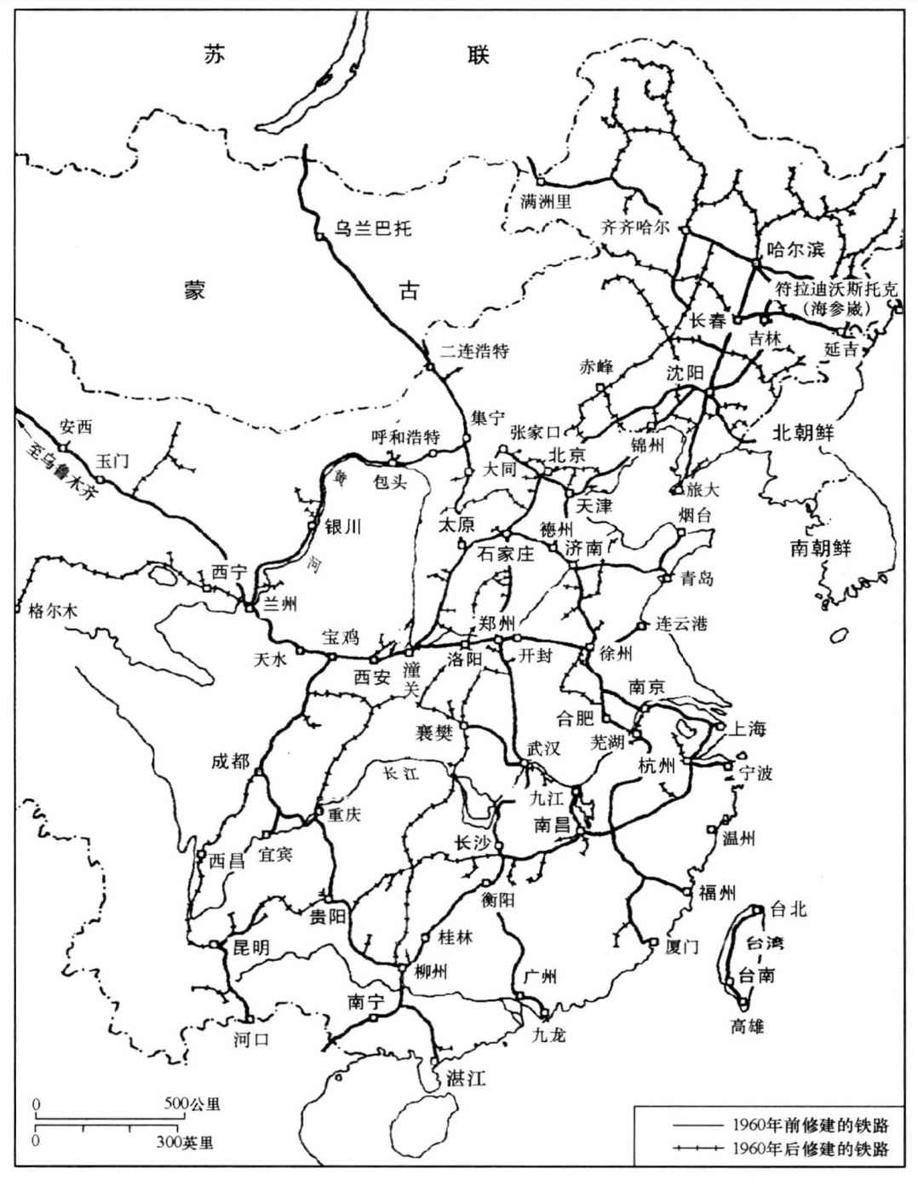
全國的農業與工業相比，所受的影響要小一些。1968年和1969年，糧食產量下降；1969年和1970年，棉花產量也下降。豬的頭數（通常能從中反映出自留地和自由市場情況）在1968年和1969年也明顯地下降了。農業產量下降，部分是由氣候惡化造成的，但1968年的主要問題是，化肥嚴重不足，其供應量下降了30％多。1966—1968年，化肥的進口量增加了65％，彌補了國內化肥生產的急劇下降，否則的話，化肥短缺的情況就會更加嚴重。這時，有人擔負起責任，以確保農民至少不會由于工業遭到破壞而損失慘重。

到1970年，工農業不僅恢復到而且超過了1966年或1967年所達到的最高水平，長期以來一直貫徹的方針也恢復了。簡言之，工人的罷工、工人與紅衛兵的沖突，用鐵路運輸將紅衛兵帶往全國各地串聯的做法，只使中國產量下降了兩年，僅僅如此而已，至少在短期內是這樣。而在較長的時期里，出于害怕政治報復，中國的計劃制定者們遇到新問題和新機會時，應變能力受到嚴重的壓抑，盡管這些壓制因素所造成的困難在70年代后期才充分顯示出來。對此，我們將在以下部分進行系統的論述。總的來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1966—1970年），國民生產總產量的年均增長率為6％。[[3]](#_3_Li_Ru__Bei_Shi_Wei_Nong_C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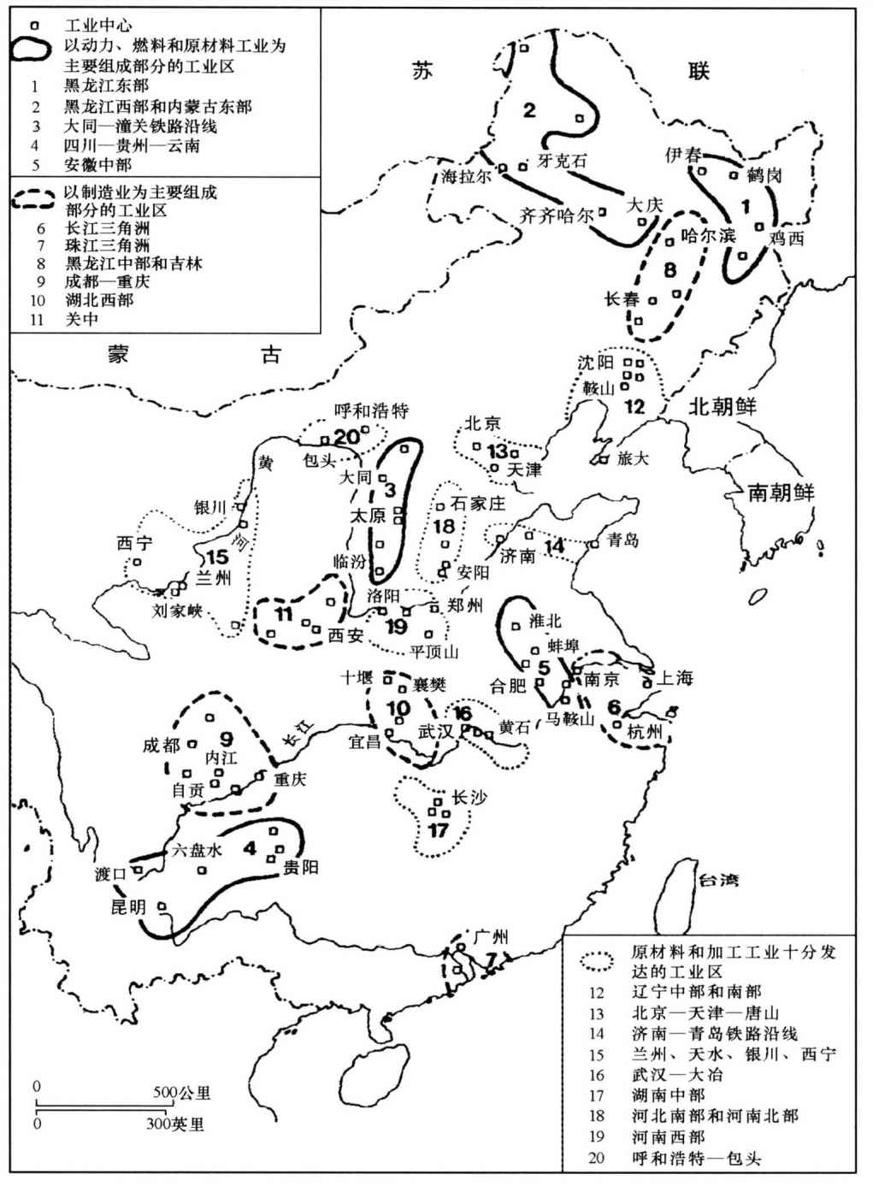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與“大躍進”造成的破壞相比，有著明顯的不同。“大躍進”之后，糧食產量下降了26％，棉花產量也與1958年的最高產量相差38％。[[4]](#_4_You_Guan_Nong_Ye_De_Shu_Ju__Q)1961年，私人農業活動事實上被消滅之后，生豬的頭數僅是1957年最高水平的52％。

關于“大躍進”及以后的災難期的工業數據，解釋起來較為棘手。不管怎么說，1961—1962年這段時間的工業總產量顯然要比1958—1959年間的最高產量低。由于物價上漲，也由于謊報成績，1958—1959年的最高產量被夸大了。另外，盡管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工業總產量與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工業總產量處于同一水平，然而，如果“大躍進”沒發生的話，僅憑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便開始興建的工廠和設備，1958年和1959年的工業產量也會迅速提高的。此外，從蘇聯購買的許多成套的工廠1958年和1959年均已到貨，因此，60年代初期，工業產量本應不斷地迅速增長。但事實卻是，工業產量在1961年和1962年急劇下降，最早到1965年才完全恢復。[[5]](#_5_Zuo_Wei_Zhe_Xie_Lun_Shu_De_Ji)當然，蘇聯在發出通知后僅兩個星期的時間里便撤走了技術援助，這多多少少地減緩了恢復的速度。

從許多方面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壞的程度，最好通過下一節的表14和表15對有關投資生產比（資本—產出的比率）的數據進行比較就可看出。這些數據表明，巨額的投資僅帶來了產量的有限增長，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增長。整個1958—1965年的國民收入增長率還不到1966—1978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時期的投資水平高出后一時期的一倍。簡言之，“大躍進”是一場代價極高的災難。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擾雖是嚴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暫的，是大多數國家都不時經歷過的。



地圖7 鐵路



地圖8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

“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壞性的后果，并不是紅衛兵年代的無秩序造成的，而是長期遵循一個獨特的發展戰略并由此戰略而產生的計劃和管理的質量所致。因此，要解決這個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不能僅憑用軍隊平息紅衛兵的辦法，而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戰略，但中國的計劃制訂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 工業發展戰略，1966—1976年

中國基本的工業發展戰略，是在1953—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提出的。蘇聯的現代化工業部門是突擊建成的，受此經驗鼓舞，中國希望從更落后的工業基礎上取得同樣的變化。這個進程的最初幾個階段在《劍橋中國史》第14卷中有所論述。這里的問題在于，“文化大革命”是否改變了這個戰略。“文化大革命”是否導致了部門重點的轉移——例如，從重工業轉為其他部門？

對這些問題簡明的回答是“否”；50年代制定的基本的工業戰略，在整個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始終沒有廢棄。事實上，1979年之前，大的方針并未發生什么重大的變化，而其他方面的變化在1977年前也未出現。這種政策上的連續性，究竟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計劃制訂者有意造成的，還是由于他們的工作停滯而導致的結果？思索一下這個問題還是饒有趣味的。有些外界的觀察家走得過遠，認為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幾乎沒有什么計劃存在；但是，表11的數據卻表明，計劃還是有的，而且除了遭到嚴重破壞的那幾年外，這些計劃與經濟成就還是有一定聯系的。鑒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府，尤其是計劃制訂者們軟弱無力，下面的解釋是合乎情理的：雖有計劃，但因為計劃制定者癱瘓了，所以不可能認真考慮發展重點的變化。如果大多數新觀念會受到攻擊，那么，最穩妥的辦法就是，以前怎么做，現在仍如法炮制。

表11 計劃指標的實現情況



資料來源：實際產量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225—231頁和《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246—248頁。計劃數據來自房維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第430—431、451—452、488—489、578、606、624頁。

由于在60年代后期，許多高層的經濟領導人要么受到清洗，要么至少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而他們的再度出山則往往是多年之后的事了，這個事實使人們愈加注意平時的謹小慎微。據估計，在316名最高層經濟官員中，可以肯定的是約有1/3受到清洗，而僅有1/4的人仍在公共場合露面，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他們仍在辦公室上班。況且，官職越高，受到清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關于“文化大革命”時期主管經濟的各部委的運行情況，我們仍有必要寫一部有深度的歷史，但本章沒有余地做此努力。然而，顯而易見的是，政府經濟機構失去了經驗豐富的領導。而政治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的行列里懂經濟、能接替他們的人，如果還有的話，也為數很少。在主管經濟的各部委中，有1/10仍被保留下來，他們力所能及地繼續開展工作。如果面臨重大變化但缺乏強有力的領導的話，最穩妥、也是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在決定生產什么、在什么地方投資等事情上，繼續按先前的路子走。

我們說下級經濟管理官員維持了經濟體制的運轉，如果我們的看法是正確的，那么這也解釋了為什么1971年林彪死亡對經濟工作影響甚微。在1972年和1973年中，絕大多數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所增長，基本建設的投資也保持在高于1966—1969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年嚴重的旱災造成糧食減產的情況下，農業收成也稍有增長。在1974年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業產品有所下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鋼和機床；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種產品的產量，即使在政治動亂的年月中，仍有所增長。因此，即使像1976年——那年，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后去世，還發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樣一整年處于混亂狀況，也不會對經濟工作產生持續的影響，其影響的程度與1967—1968年的情況相當，比“大躍進”的影響程度還要低。

中國的計劃制定者始終如一遵循的是怎樣的一種工業戰略呢？它的核心思想很簡單，可以在不破壞其真實性的情況下，用規范的數學模式描繪出來。這一模式是由蘇聯和印度的經濟學家各自獨立發展來的，因此，這個模式通常因其名而被稱為費爾德曼—馬哈拉諾比斯模式。這個模式提出了幾個重要的假設。[[6]](#_6_You_Guan_Zhe_Ge_Mo_Shi_De_Zui)在這里，我們將不完全展開這個模式，但必須得描述一下，因為，無論如何，中國的計劃制定者與他們的蘇聯同行一樣，都毫無保留地在同樣的原則下實行管理。

這個模式的關鍵在于這樣一種信念：計劃制定者面臨的最重要的抉擇是，對生產資料進行投資，還是對消費品進行投資？也就是說，對那些諸如機械和電力之類能用來制造出其他產品的項目進行投資，還是對那些諸如服裝和食品之類能用于消費的項目進行投資？如果要揭示出這個抉擇的深刻意義的話，下列兩個假設都是不可或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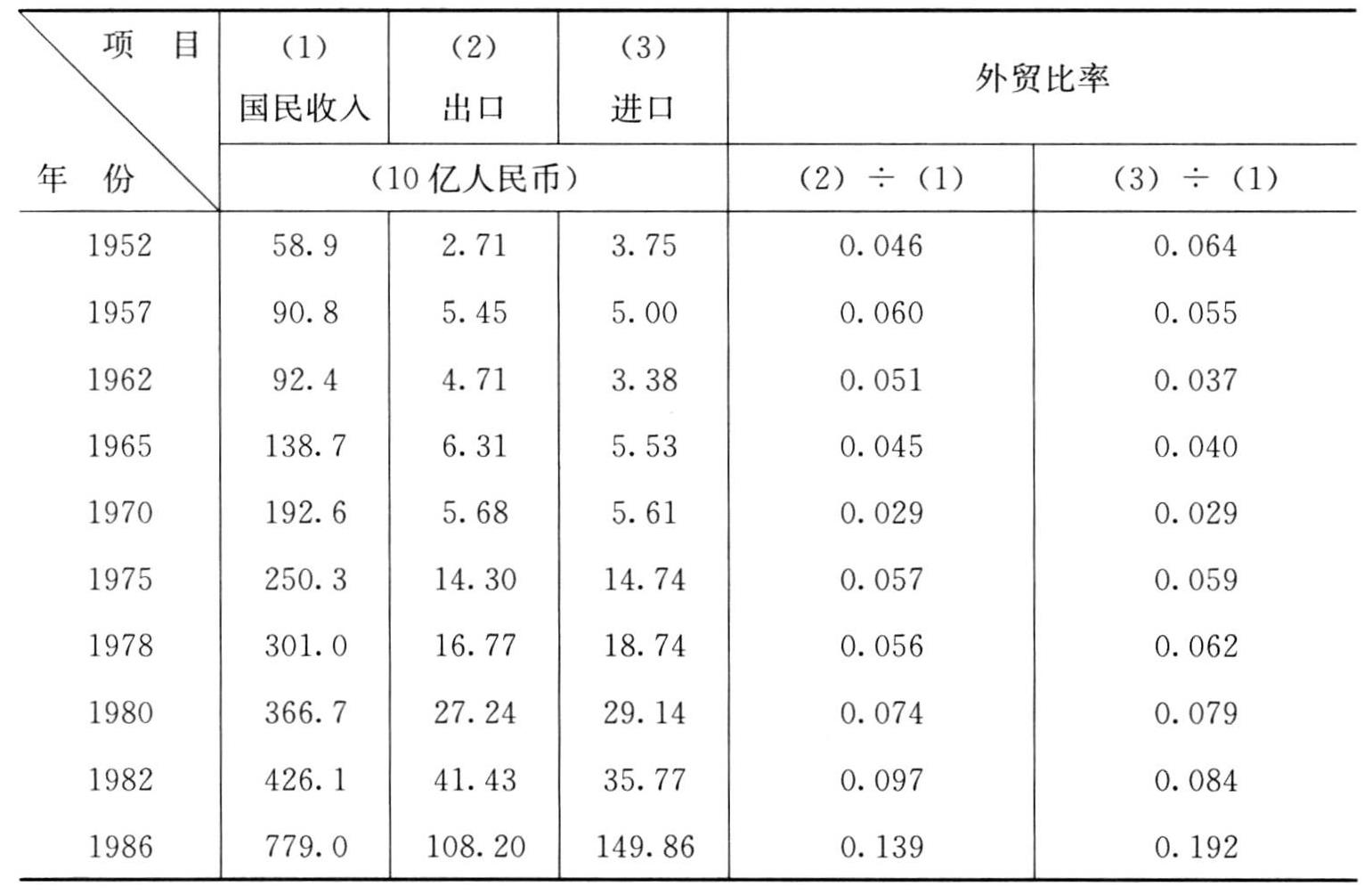
1.資本—產量的比率是一定的：就是說，一定的投資量每年都造成產量同樣的增長。

2.對外貿易與經濟規模和總投資的規模關系甚小：如果對外貿易與投資關系甚大，計劃制定者就會對消費工業進行投資，然后再出口這些產品，換取生產資料。如果對外貿易與投資關系甚小，這些生產資料就必須在國內制造，否則這個國家將短缺造新廠和新設備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經濟增長將停頓下來。

如果這些假設成立的話，那么，順理成章的是，對生產資料的投資額越大，經濟增長就越快。對生產資料的投資額要是提高了，消費便會在短期內遭受損失；但長遠來看，消費也將增長得更快，并且最終會超過首先向消費投入更多資本所能達到的水平。計劃制定者不會把最多的投資投向生產資料的唯一的理由是，短期內消費太低將導致人民挨餓（甚至造反）。

對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國而言，這個模式中的關鍵假設是否正確呢？低下的對外貿易比率或封閉的經濟的假設，是十分接近實際情況的一個。中國對外貿易和國民收入的數據見表12。70年代后期以前，進口額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通常在5％和7％之間上下波動。如果進口的都是需要投資的產品，那么，鑒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投資達到國民收入的30％，中國將近20％的投資產品仍需向外國購買。[[7]](#_7_Ru_Guo_Jin_Kou_Zhan_Guo_Min_S)而全部需要投資的產品的4/5僅須中國自產。其實，進口的1/3以上的東西，既是消費品，也是介于消費品和生產資料之間的中性產品，僅有相當于國民收入3％的需要投資產品要進口。[[8]](#_8_Zhong_Guo_De_Shu_Ju_Biao_Ming)

表12 外貿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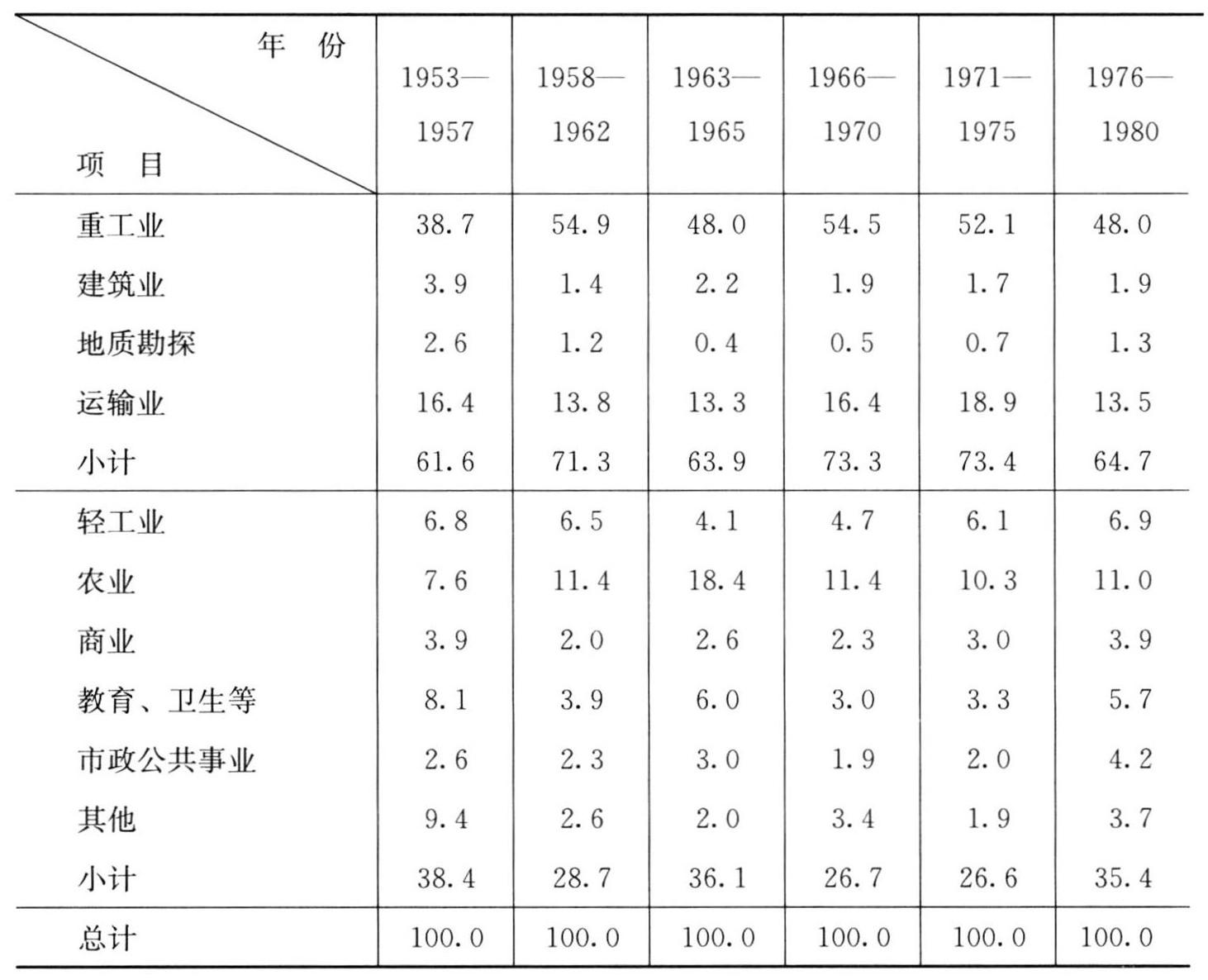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20、357頁；《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40、481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1987）》，第4、89頁。

對外貿易所占比率很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口眾多的特點，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由審慎的政策選擇造成的。人口眾多的國家的貿易量要比小國低一些（占國民生產量比例而言），其原因尚不全為人們所知。例如，60年代中期，印度的進口總額相當于其國民生產量的6％；日本是9％。與之相反，較小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和泰國的進口率則分別為41％和20％。[[9]](#_9_Zhe_Xie_Shu_Ju_Lai_Zi_Huo_Li)

但是，如果人們對1977年和1979年政策的變化及其后果進行討論的話，就會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國的計劃制定者愿意的話，中國的貿易率將會更多。然而，中國的計劃制定者卻同他們的蘇聯同行一樣，制定了最大限度地減少國家對外貿的依賴的政策，這一政策不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在50年代就已開始實行。如表12中的數據所示，外貿比率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起伏不定，找不出一個清晰可辨的趨向。60年代初和1967—1970年這兩個時期進口率處于最低水平。前者是由于嚴重混亂和1959—1961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后者是1967—1969年經濟混亂的結果。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反對盲目依賴國外產品和技術的言論，在當時有什么樣的影響呢？在60年代后期，鋼、銅、化肥及其他許多東西的進口達歷史最高水平。糧食和其他消費品進口下降，但這主要是國內收成較好使然。機械和設備的進口在1968和1969年中驟然下降，可能部分是由于“左”派敵視國外技術的緣故，而1967年和1968年工業遭到的全面破壞可能也是一個因素。[[10]](#_10_Ji_Xie___She_Bei_He_Ke_Xue_Y)總的來說，1966—1970年總進口額的票面價值，與1953—1957年大體相當；從票面價值來看，1971—1975年的進口額幾乎超過1953—1957年水平一倍以上。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增長，1966—1970年的外貿率就大大低于1953—1957年的水平了，而直到1975年才恢復到先前的水平。簡言之，即使在外貿方面，“文化大革命”時期依然保持著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制定的封閉的經濟戰略，而沒有偏離絲毫。

表13 部門基本建設投資（以％計）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300—30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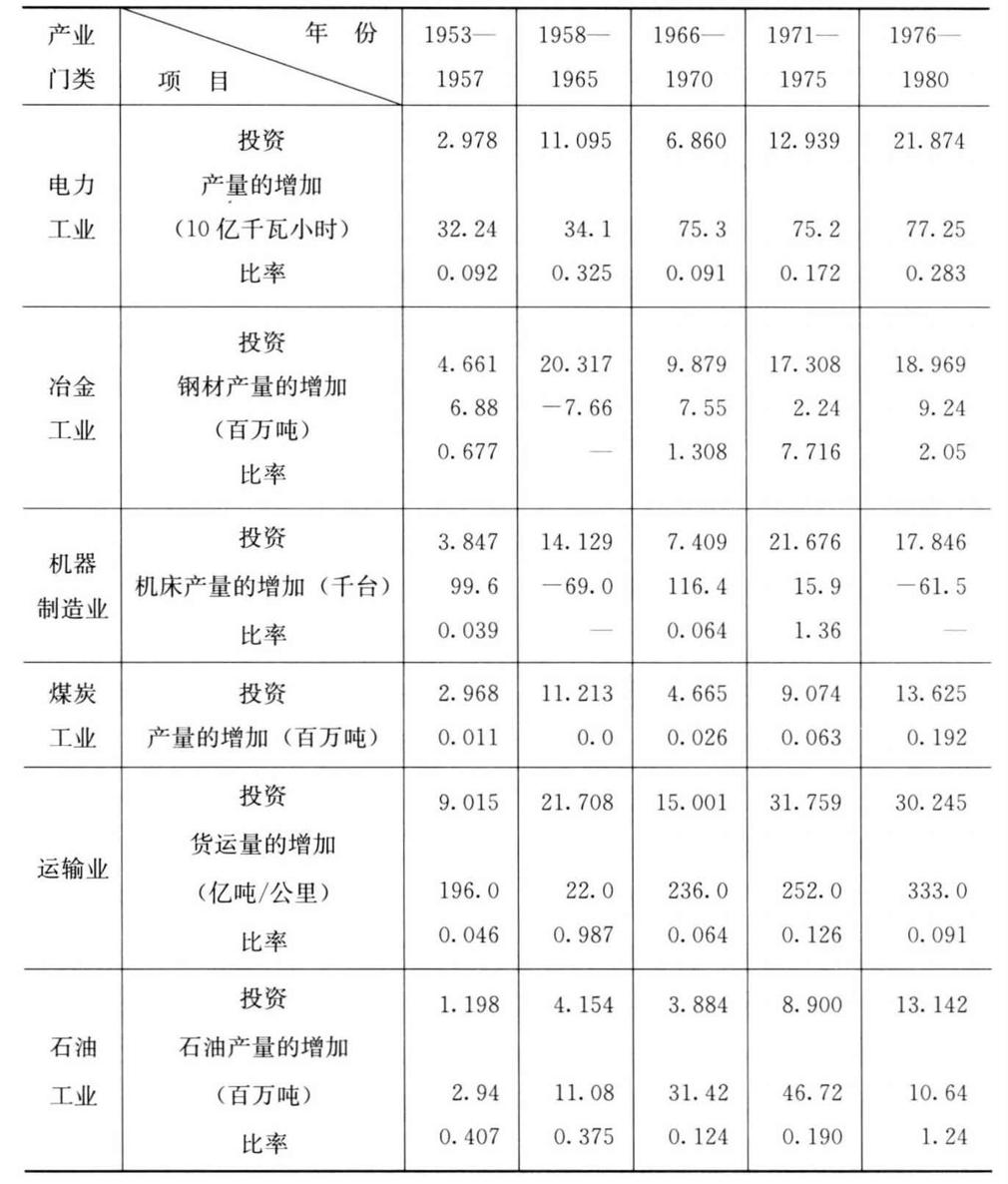
在封閉經濟的條件下，中國與早先的蘇聯一樣；遵循著費爾德曼一馬哈拉諾比斯模式中闡述的高速發展的主要原則。最大的投資被引到生產資料部門，而沒引向能生產出更多消費品的工廠。在表13中，項目的分類不甚精確，但基本信息還是清楚的。全部投資的3/4用來制造機器，目的是要制造更多的機器，或用來進行該部門的基礎建設。1963—1965年的生產資料投資額下降，但這更多地是由于1959—1961年的危機后恢復工作的需要造成的，而不是因為長期戰略發生了什么變化。在現有的工廠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而入民僅能勉強滿足他們最低生存需求的情況下，把大宗資金投入新型的重工業工廠是沒什么意義的。恢復時期結束后，投向生產資料的資金就一下子回到了“大躍進”時期的水平。

根據費爾德曼—馬哈拉諾比斯模式，這條戰略（它就是根據費—馬模式制訂的）不僅在國民收入和生產資料工業方面，而且在消費品和人民生活水準方面，都造成一個高速發展。實際上，這個模式提出的唯一正確的預測是，投資率將隨著國民收入的增長而提高。國民收入增長率不提高，投資率便會下降，消費增長率也將隨之下降。有關消費情況的數據將在以后提到，而當務之急是解釋為什么沒有出現中國的計劃制訂者所期望的、上述模式所預測的那些結果。

情況往往就是這樣，模式本身是不錯的，但這個模式發生作用的那些假設在中國是沒有根據的。最大的錯誤在于資本一產量比率固定不變的假設——一定的投資水平每年將造成相同的生產水平。而事實上，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國的資本—產量比率開始逐漸上升，而既定的投資水平造成的產量增長卻越來越小。

提出這種觀點所依據的材料是不夠充分的，但表14和表15中卻列舉了一些相關的數據。表14的統計數據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資本一產出比率，但在這些工業中，這些比率所發生作用的情況應與實際資本一產出的比率大體相當。表14中所列各部分，占全部基礎建設投資和絕大多數與生產資料部門相關的投資的60％。

表14 重點工業的投資一產量比率



說明：（1）全部投資數據以10億元為單位。（2）產量的數據在投資與產出之間以兩年為間隔。為消除某些年與年之間的起伏，這里使用了三年的平均值。因此，1953—1957年的產量增長，實際上就是1958—1960年與1953—1955年之間各年的平均增長，等等。1976—1980年的增長就是1980—1981年與1976—1978年間各年的平均增長。（3）比率獲得的方式，是把投資的數字用產量增長數字去除。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227—231、283、300—302頁。（煤炭工業欄漏掉產量增加的數字，只有投資和比率數。——譯者）

表15 邊際資本—產出比率



說明：物質生產凈值（中國的術語叫國民收入值）的增長率的估算，首先是取得部門通貨緊縮的指數，再利用這些通貨緊縮的指數，將物質生產凈值的時價折算成物質生產的不變價格。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40、41、4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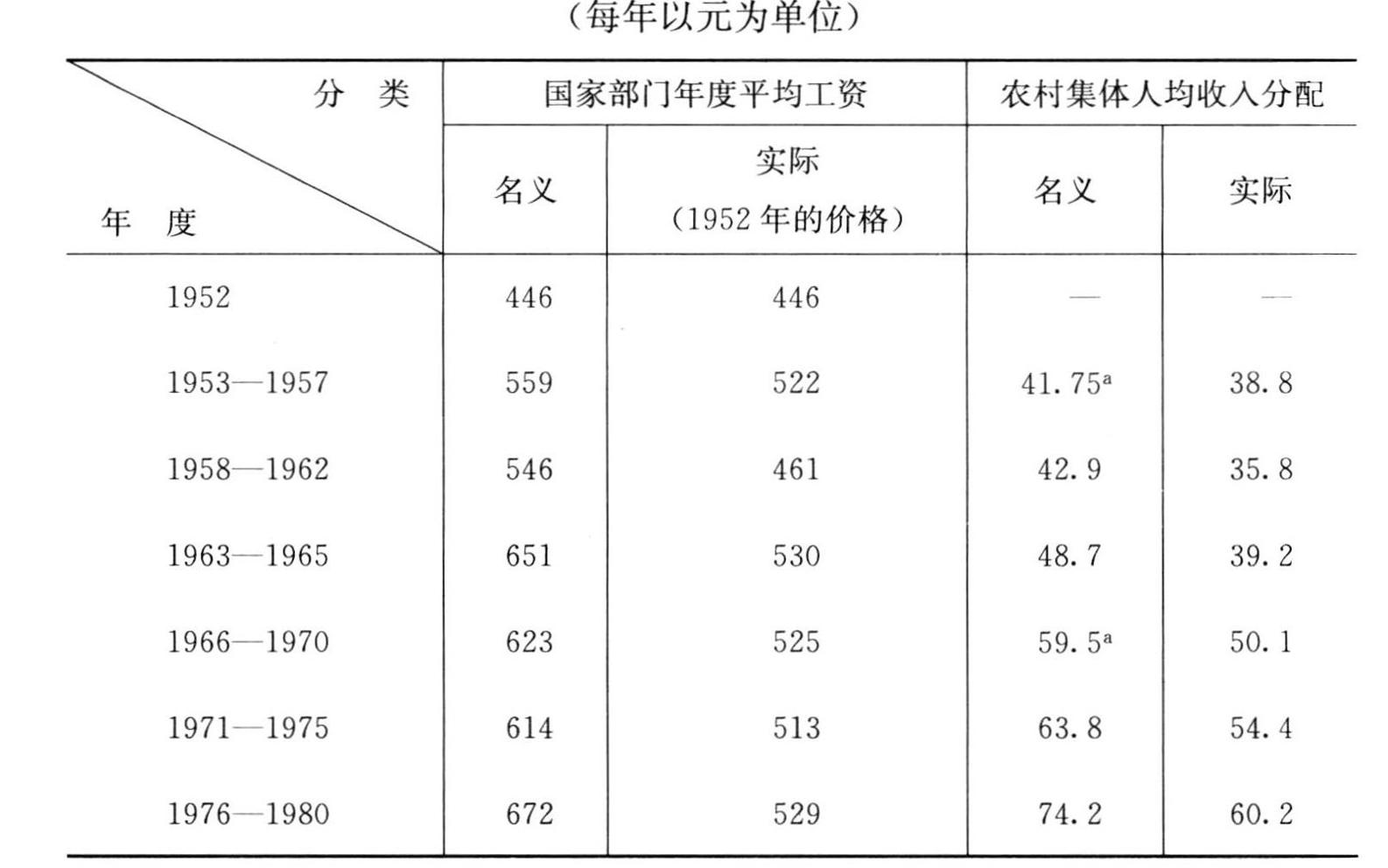
這些比率說明了什么呢？在第五個五年計劃（1976—1980年）期間，生產一千瓦小時的電所需投資，是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期間所需投資的三倍；生產一噸鋼所需投資近乎于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所需投資的兩倍；每噸運輸公里所需投資超過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所需投資的40％。從資本投下到開始生產需要一段時間。對此間隔時間長短有不同假設。除了通貨膨脹因素外，不同的假設將改變這些結果，但并不改變全部結論。[[11]](#_11_Zai_Zhe_Ji_Ge_Shi_Qi__Zhong)就付出的資本而言，中國所得到的收益越來越少。表15反映了全國范圍內所受到的影響。

我們在本章后面將對資本—產出比率高速增長的原因進行探討。工人物質刺激的減少和計劃不當，只是一部分原因。可能新油田是在條件更差的地方開發的，也可在地形條件極差的地方修建新鐵路。但無論是什么原因，國民收入增長率明顯地下降了，而由于投資率提高，消費資金幾乎沒有什么可增長的了。

國防開支迅速增加，也使60年代后期的消費額進一步壓縮；據西方的估計，國防開支在1965年為240億元人民幣，1971年增至400多億元。如果這些開支大部分投入到軍備生產的話，它的增長也將促進資本—產出比率的提高。不管是什么情況，林彪的倒臺使國防開支增長到了頭。1972年軍費預算減少了幾十億元；到1979年中國打入越南之前，軍費預算一直穩定在400億元左右。

從表16的工資和農業收入的數據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消費方面的一些情況。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實際工資幾乎沒有增長。農村集體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長，但增長率僅為平均2％以下。由于就業工人在家庭成員中的比率增大，城市的收入實際上也有所增長。總而言之，在1957—1978年間，國民消費量在人口增長率為2％的情況下，以每年年均4.5％和人均2.5％的比率增長著。[[12]](#_12_Zhe_Xie_Xiao_Fei_Gu_Suan__Sh)年均2.5％的增長率，將使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每28年翻上一番；與美英19世紀的水準相比，這個成就不可謂不很重大。但年均增長2.5％距年均增長5％的承諾相差甚遠，后者似乎是中國參考50年代蘇聯的增長模式提出的。5％的增長率，將使人均消費量在1952—1980年之間提高4倍，實際工資也將走出停滯狀態。

表16 實際和名義工資與農村集體收入



說明：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通過他們的實際工資除以生活費用指數獲得。對農村地區來說，沒有任何合適的價格指數，既能排除在購買工業品時價格的變化，又能排除所配給的實物價格的變化。由于沒有更好的選擇，所以使用了普通零售價格指數。  
a.這些數據僅是1956—1957年至1970年的。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年鑒（1980）》，第41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411—412、435—436頁。

## 工業戰略的變化，1977—1980年

1976年下半年，毛去世。這以后的兩年中，與以前相比，工業政策只發生了有限的變化。從工業戰略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變化是越來越重視出國學習國外的技術和重新依賴物質刺激促使工人農民工作得更加努力、更有成效。

然而，在1977年和1978年，計劃制定者似乎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強調點的變化對工業投資政策的意義。他們這時的想法體現在調整和貫徹毛去世前制定的“十年規劃”（1976—1985年）之中。[[13]](#_13_Gai_Shi_Nian_Ji_Hua_Yu_1975N)到1985年，鋼產量翻了一番多，達到6000萬噸，仍然被視為工業發展的“關鍵環節”。計劃中的120個大型工程中，鋼鐵聯合企業占了10個，有色金屬聯合企業占了9個，鐵礦占了8個，油田和天然氣田占了10個，發電站占了30個，新建貨運鐵路占了6個，重要港口占了5個。這10年中，僅其中8年的總投資額便將“大大超過”前28年的投資總額。簡言之，這個十年規劃簡直就是蘇聯式的對重工業進行高投資的計劃。

起草這個規劃時是否經過審慎思考是值得懷疑的。眾多重要的計劃制定者仍有待于恢復名譽和給予有實權的官職。統計數據仍然是在地方一級搜集的，但這些數據并未被反復核對過，甚至數據的編制往往也不是在國家一級進行的。[[14]](#_14_Jiu_Qi_Ta_Fang_Mian_De_Lai_Y)

這個計劃質量之差從一個地方便可看出：計劃把十個新油田——“十個新大慶”——的指標當作目標提出來。十個新大慶意味著，石油產量將從年產1億噸增至年產4億噸左右。這些新油田事實上只是白日做夢罷了。近海的勘探工作尚未開始，岸上的勘探工作也不充分。一個大慶尚未出現，更何況十個大慶了。這些油田只好留待時機成熟時再開發了。1978年初的實際情況是，中國石油產量正值高峰期，在1982年，中國至少全力以赴才能維持產量不下降；但是，規劃卻是以提高幾倍為基礎的。中國已經沒有大量的過剩能源可供出口，此后很長一段時期內，它將面臨能源短缺的局面。鋼鐵部門的計劃也比石油部門好不了多少。據西方的一項估算，中國人必須花費400億美元外匯，方能實現6000萬噸鋼材指標，[[15]](#_15_Mei_Guo_Guo_Jia_Dui_Wai_Ping)或者說，每年要花50億美元，而1978年全部出口所得只有97.5億美元。

這個規劃不只是雜亂無章和依據不足，正如已經指出的，經濟計劃制定人還決定更大限度地購買國外技術和提高工資與農產品的購價以增加刺激，但他們對此決定的深遠含義尚未能夠理解。要大量增加進口，中國要么必須有效地加強出口，要么必須大量地向國外借款。實際上，借款只是杯水車薪，絲毫滿足不了中國對外匯的需求，只有靠出口了。可是，中國有什么東西可望迅速擴大出口呢？

1977年和1978年，農業作為中國傳統的出口資源，直接或間接地提供了中國外匯的一半還要多。但農業是中國拖后腿的項目，政府為城市征收足夠的糧食都很困難，更談不上增加對外銷售了。況且，在富有物質刺激的新計劃下，國內對糧食的需求比以往增長得更快。降低人口增長雖能以另外的方式起些作用，但總的來說，中國不能通過出口更多的糧食來滿足進口需要。

十年計劃的起草者或許希望靠石油減緩一下蕭條狀況，但如已指出的，這個愿望是徒勞的。此外，唯有可能的是出口制造品，但出口哪一類制造品呢？該規劃要求生產更多的鋼材和機械，然而，中國會成為重工業產品的出口國嗎？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有此可能，但更有能力生產這些東西的典型國家是那些更發達的工業國，而不是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其余的便是消費品了。消費品是刺激中國的鄰國和地區——二三十年代的日本以及六七十年代的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出口的驅動力。

中國對物質刺激的重視，也助長了國家在工業和農業中更重視消費品的傾向。如果新增錢幣什么也買不到的話，工資和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將毫無意義。事實上，貨幣收入增長，而消費品生產卻沒有增長，這是反生產性的。不僅私人消費沒有增加，配給已有的產品也得緊縮，不是正式緊縮（發配給票證）就是非正式緊縮（排長隊）。

因此，在十年規劃的目標和正在出現的外向性的以物質刺激為基礎的戰略之間存在著一個基本矛盾。隨著1978年的進展，或是當時的政策制定者意識到了這個矛盾，或是始終意識到這個矛盾的那些人再次掌權，或是兩種人都有，不論是哪種情況吧，1978年12月做出決定：調整工業發展的重心，至少是暫時地調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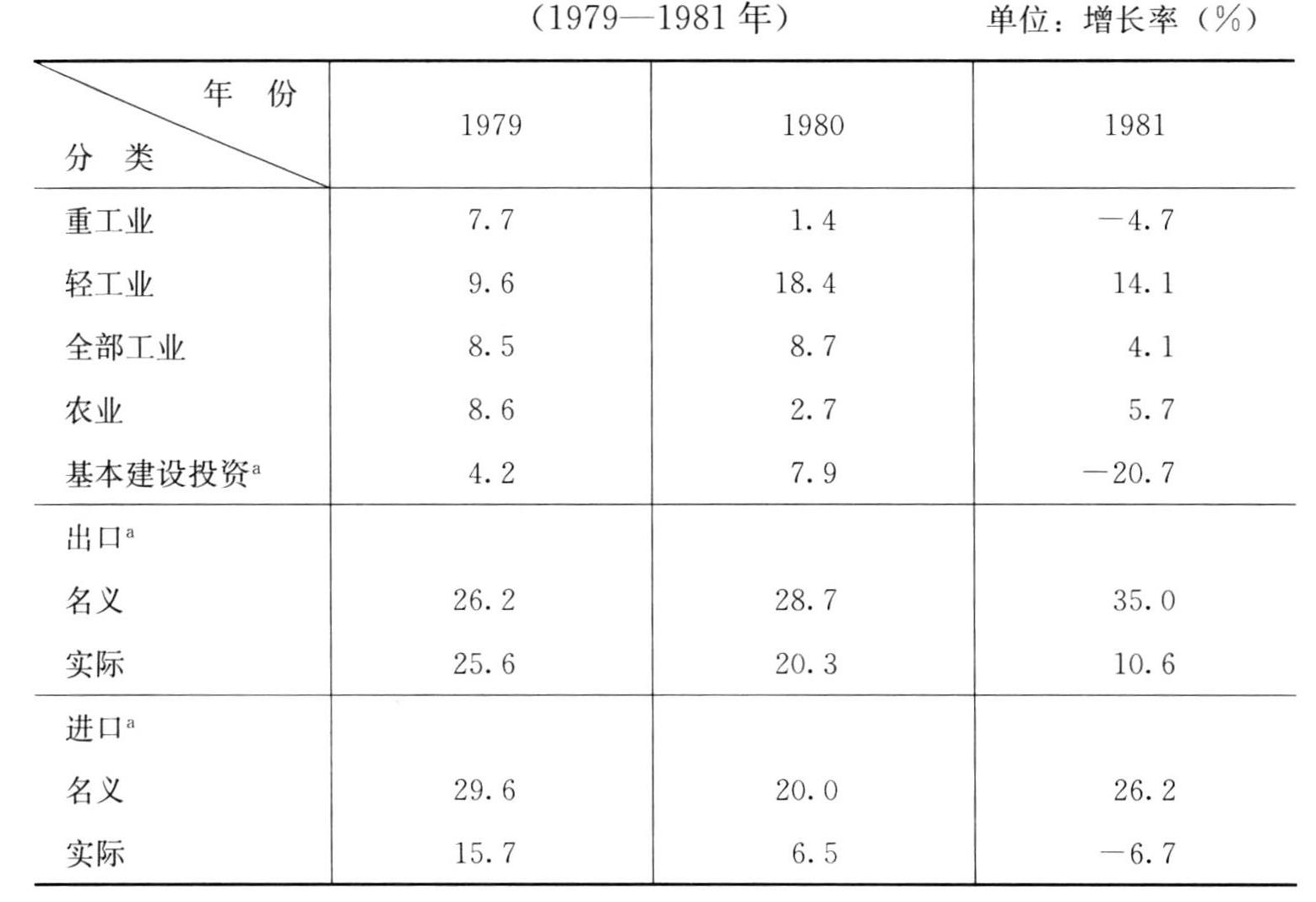
1978年12月22日發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表明了即將到來的政策。在公報中，討論的一半以上的經濟議案集中在提高農業產量和人民生活水平這些問題上。[[16]](#_16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_Di)更重要的是，陳云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陳云在1961—1965年期間，是恢復政策的設計者；在更早的時候，他曾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作過一個重要講話，提倡更大地發揮市場作用和限制過度的集中化。[[17]](#_17_Chen_Yun____Zai_Zhong_Guo_Go)當50年代引進蘇聯式的工業戰略時，他雖是經濟領域的中心人物之一，但人們都知道，他對過分強調重工業的危險作出了敏銳的評價。

1979年6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布了新的重心。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余秋里要求人們重視農業、輕工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將其作為首要的重點。就其發生的變化而論，1979年重工業的計劃增長率為7.6％，低于輕工業8.3％的計劃增長率。[[18]](#_18_Zhe_Xie_Shu_Ju_Lai_Zi_Yu_Qiu)重工業的投資也從1978年占總投資的54.7％縮減到1979年的46.8％，而全部投資額仍保持在與1978年相同的水平上。

計劃指標跟計劃執行的實際情況不總是一回事。蘇聯的計劃往往要求人們更重視消費品，但當一年結束時，重工業在資金和關鍵投入的實際分配中仍占優先地位。但在中國，重心轉移卻是實實在在的。

所謂“調整時期”前三年的有關數據列于表17中。重心的轉移表現得十分突出。在這前三年中，不僅輕工業年增長越來越快，而且重工業的產量在1981年實際上也下降了。最有意義的變化，或許是出口的增長。在1952—1978年間，出口增長率僅為年均7％，而就其實際增長而言，它應該更低。1979—1981年，名義上的增長率是原來增長率的4倍（每年29％），而實際增長是3倍（每年18.6％）。[[19]](#_19_Wo_Men_Zhi_Jin_Reng_Wu_Yi_Ge)增加的出口中，絕大部分是向國外銷售制造品，其中，紡織品是最大的項目，但絕不是唯一的項目。在出口物資中，“工礦業產品”份額的數據（不包括紡織品）從1978—1980年，從占總出口量的37.4％升至51.8％，這不僅是由于1979年石油價格提高的緣故，而且也是諸如自行車、縫紉機、瓷器甚至機床出口擴大的結果。[[20]](#_20_1981Nian_Zhong_Guo_Ren_Gai_B)到1981年，出口額升至國民收入的9.5％，將近前20年出口額的兩倍。[[21]](#_21__Guo_Jia_Tong_Ji_Ju_Guan_Yu)此外，中國不僅從日本和西歐，而且還決定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獲得大量資助性貸款。通過開放，中國經濟已不再是“封閉的了”，中國在制定未來發展戰略方面可選擇的機會越來越多。

表17 調整時期第一階段的經濟指標



a.基本建設投資、出口和進口的數據以時價計。其他的百分比全部得自不變價格的數據。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136、210、299、357、390頁。

軍費開支也降了下來。與越南的戰爭，造成1978年和1979年軍費開支的短期暴漲，但到1980年這項開支便縮減到70年代中期的水平。軍事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中的一項，但花費大宗資金增加過時的坦克和飛機的數量是毫無意義的。真正的現代化首先需要改進中國的技術，技術是奠定先進武器體系的設計和制造的基礎。

這個重心上的明顯改變的部分原因，或許是中國有意識地要沿著它的東亞鄰國的發展戰略方向進行，部分原因也可能是不得已而為之。不僅僅是投資的效益越來越少——這個問題可以設法從管理改革上解決而不致造成工業重心的改變。但管理改革并不能克服這個事實：中國的能源產量不足以維持一個高速增長的重工業戰略。

在1952—1978年間，能源生產總量每年以10.3％的速度增長著。煤的生產的增長率較為緩慢，但60年代和70年代初大慶、勝利和其他油田的迅猛發展足以彌補了煤的不足。在1978—1981年間，能源總產量的增長實際已處于停滯狀態，這三年中的增長率僅為微不足道的0.2％。早先幾年忽視勘探工作、忽視發展新煤礦，以及忽視修建能將煤運往能夠利用它的地方的鐵路，都是造成這個重大損失的原因。如果中國的計劃制定者還是繼續堅持以往低效率的重工業戰略，1978年后中國要想繼續發展，只有轉向單位產量耗電量較少的消費品工業部門，并對高效能源設備進行投資。計劃制定者還著手于一項重要的投資方案，開發新的石油和煤的資源，發展一套支援運輸網絡；但是，這些投資即使是有大國際能源公司的參與，在80年代中期以前也是不能獲得多大益處的。因此，調整時期實際上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工業戰略及其貫徹過程中的錯誤和低效的最終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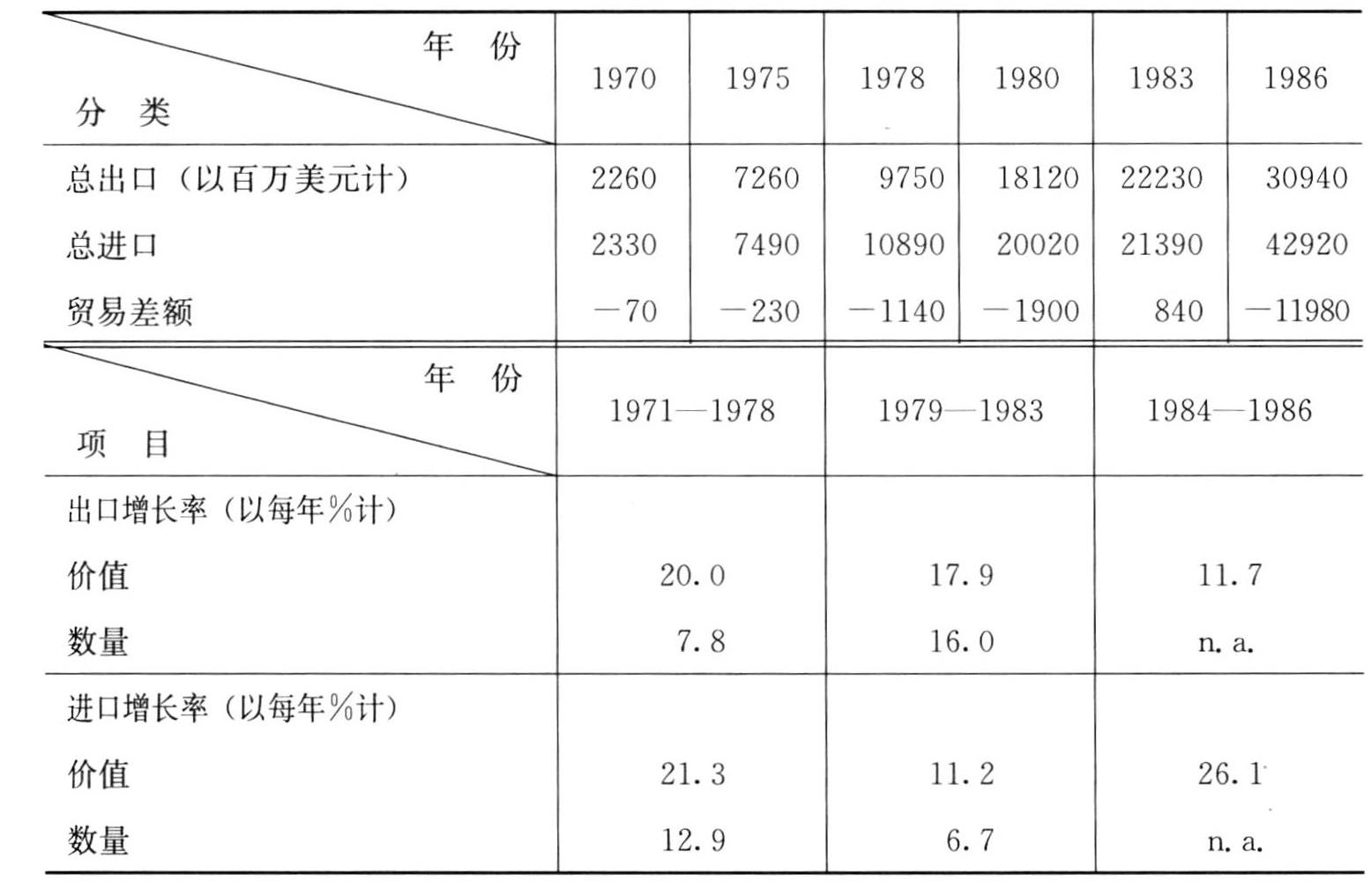
## 加速工業增長，1982—1987年

原估計工業調整時期將貫穿整個80年代的絕大部分時間，但結果卻是，只有1981年一年，總的增長便減到第六個五年計劃中規定的調整指標（即工業增長每年僅為4％）。[[22]](#_22__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到1982年，中國已處在持續80年代大部分時間中的經濟繁榮的早期階段。

由于發生幾個事件，這個調整計劃剛一提出便被廢止。首先，在1980年和1981年已經下降的能源生產總產量，在1982年恢復增長，而到1984年，能源產量的年增長率已超過9％，這個數字可與70年代初所達到的增長率相媲美，直到1986年才降回到僅為3％的增長率。近海地區并無重大的石油發現，也沒有發生使能源產量重新增長的其他方面的突破。能源的增長是大力發展原煤生產、運用引進的技術從現有油田中開采出比以往所探明的可能性更多的石油、水力發電的適度發展，特別是葛洲壩第一期工程完成的結果。中國工業對能源的需求大大超過了它所能供應的限度，但這種過度需求是蘇聯式官僚指令性經濟的一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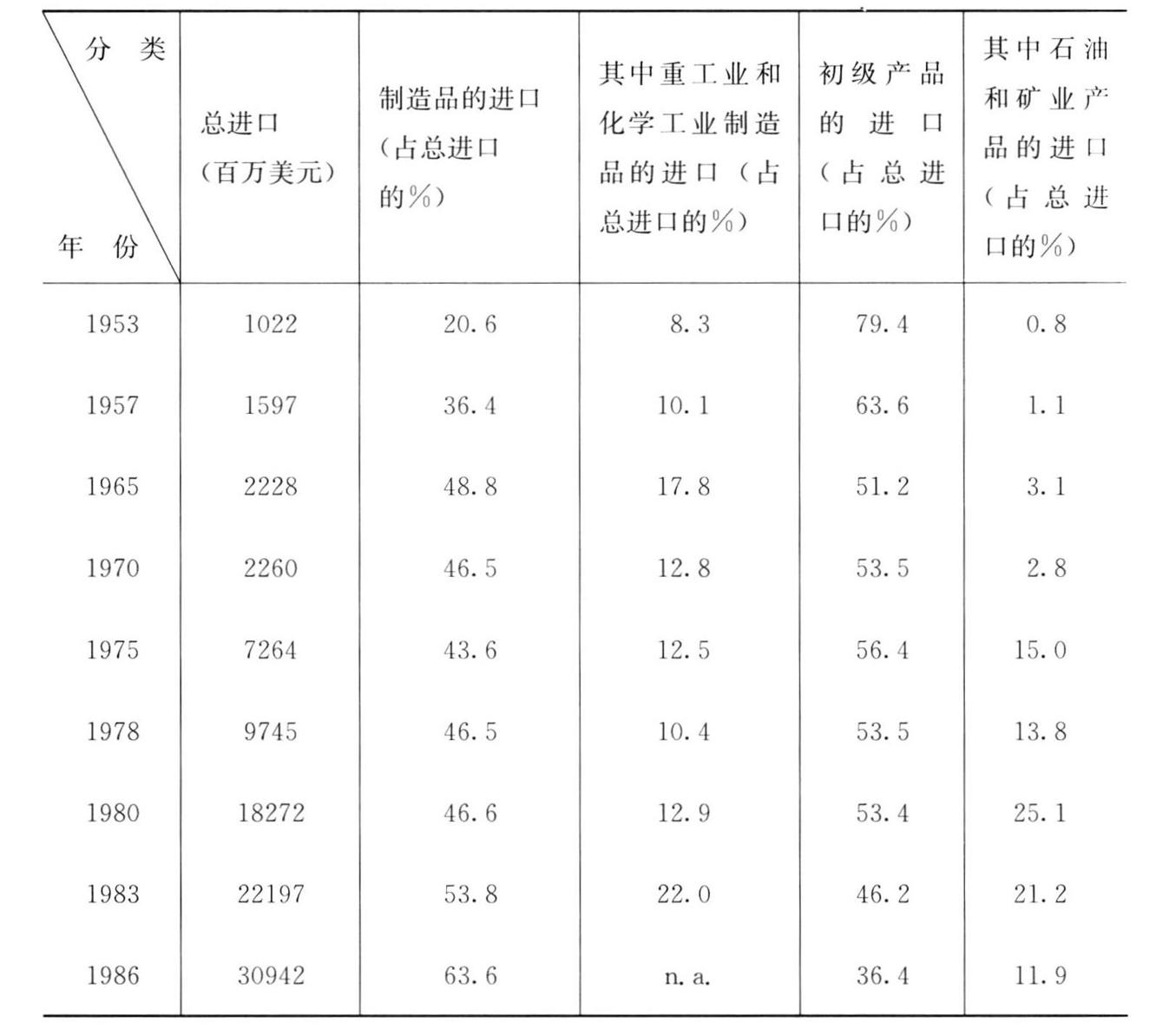
具有同樣或更大意義的是放松了對中國工業外匯的限制。中國擴大出口的最初嘗試，已被證明是極其成功的。在1978年之后的三年中，出口在名義上翻了一番多，盡管進口迅速增長，但到1981年貿易赤字已被消滅，并在1982年出現了大量順差（表18和表20）。出口的增長是擴大制造品出口和油價上漲的結果。簡言之，在油價下跌以及石油出口隨之下降之前，石油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量的1/4（參見表19）。

表18 外貿的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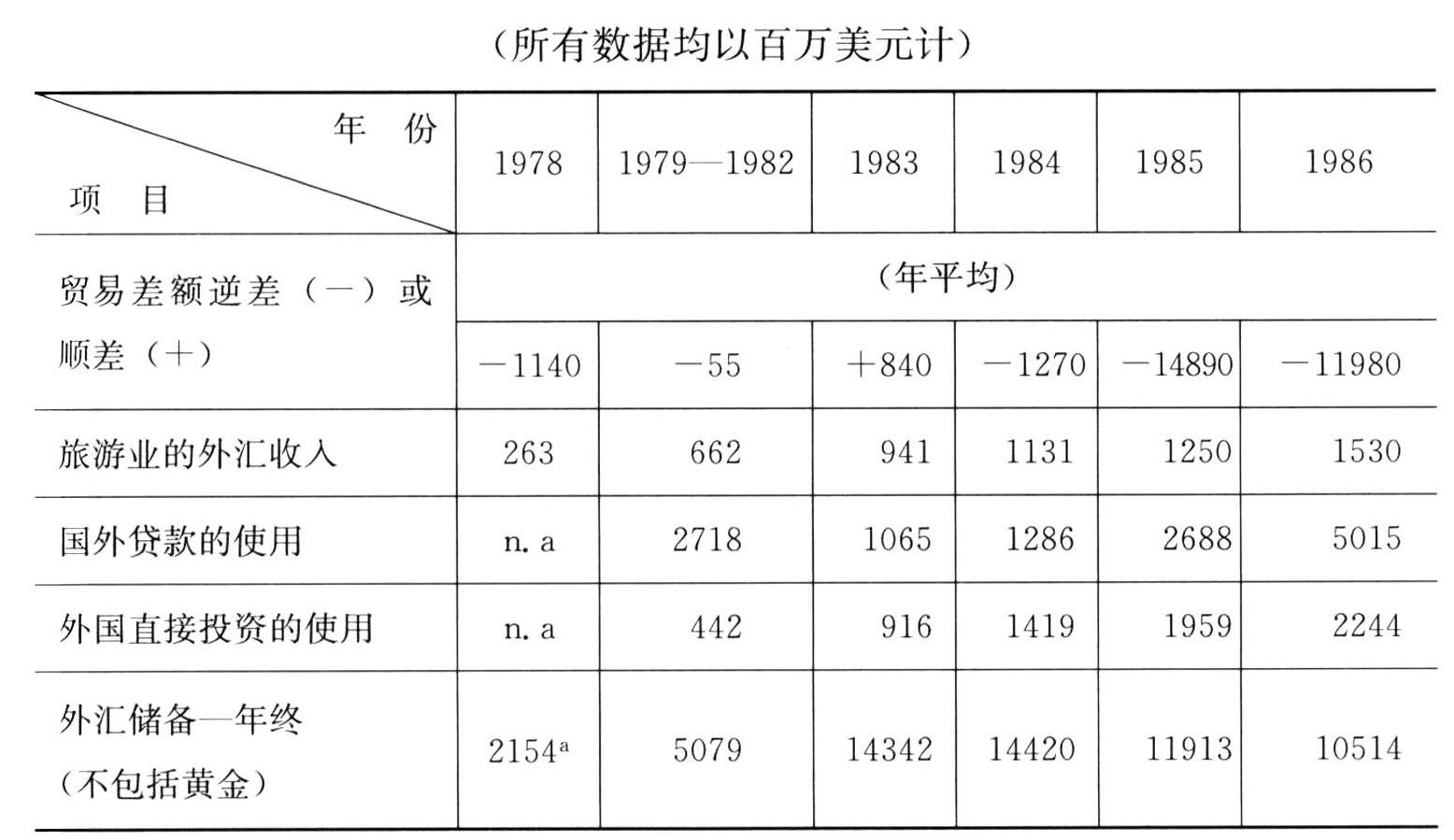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481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1987），第89頁；《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84）》第4卷，第5頁。

表19 中國的進口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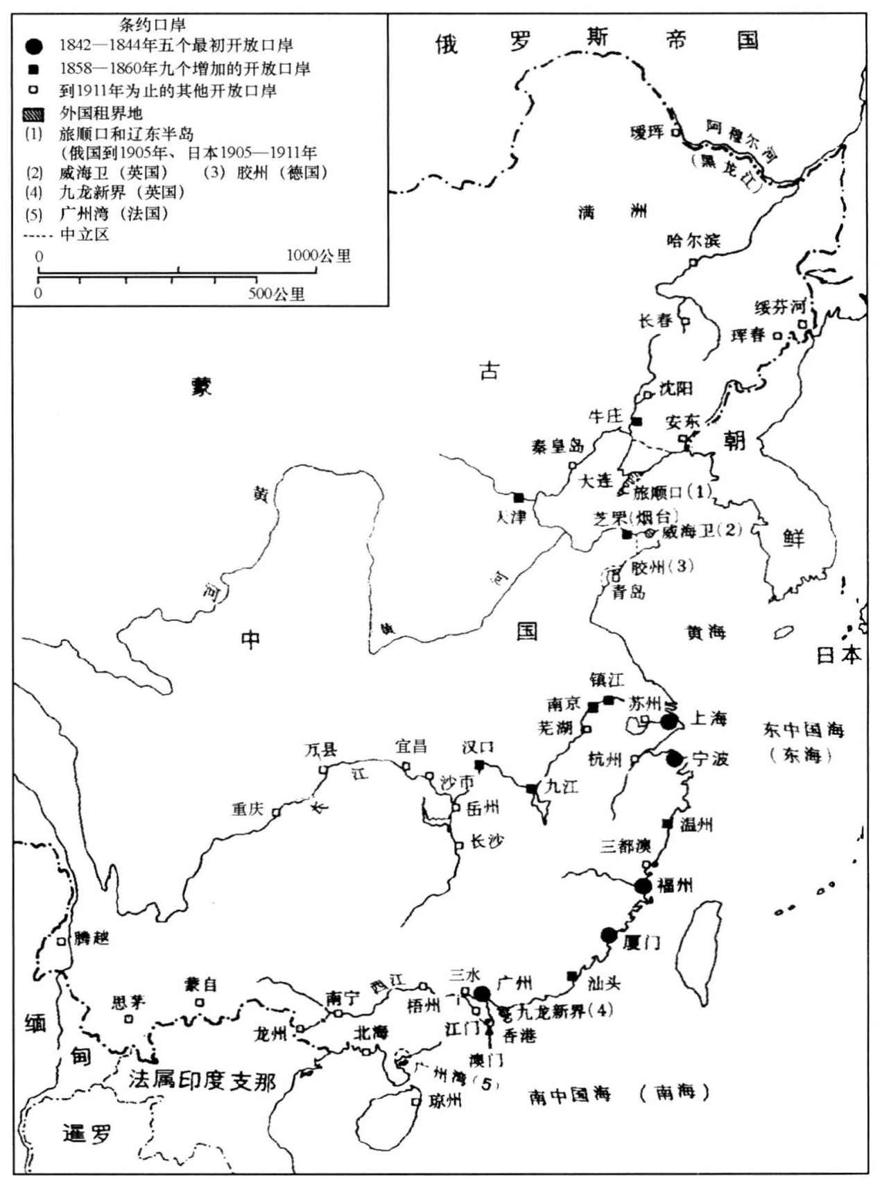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84）》第4卷第9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1987）》，第8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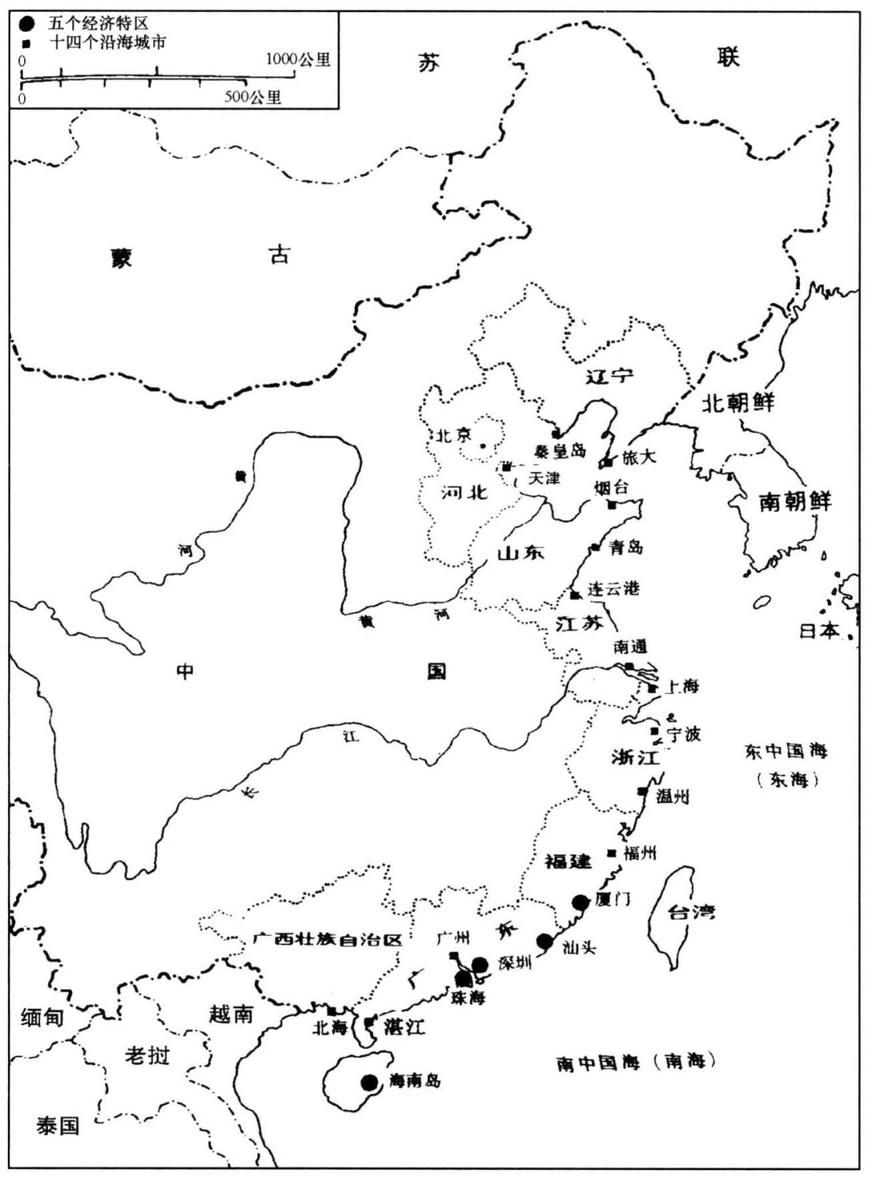
表20 為中國貿易逆差支付的資金



a.這個數字為1979年的數字。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499、530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1987）》，第80、93頁。



地圖9 至1911年的不平等條約下的條約口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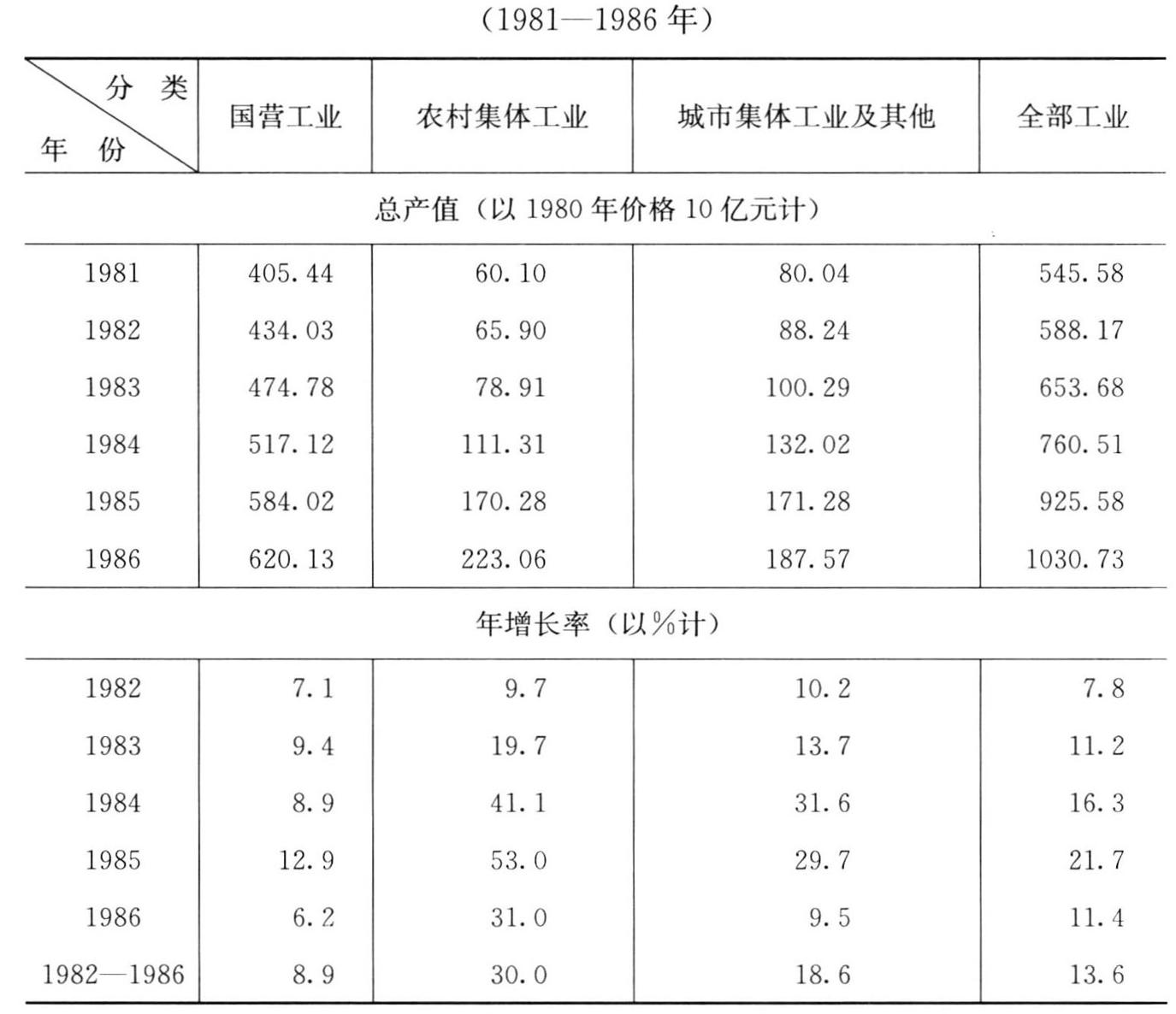


地圖10 1984年對外資開放的沿海地區

除了擴大出口外，中國開始大量向國外借款，并為大規模的旅游業敞開國門。最初，這些借款來自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采取了援助性信貸的形式。1980年，中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1981年世界銀行同意向中國提供第一批貸款。[[23]](#_23_Ha_Luo_De__K_Ya_Ge_Bu_Sen)此外，中國還決定同意外方以合資和其他方式直接進行投資。同意合資的決定意味著，中國必須正式擬訂合資法、新稅收法以及能保證將外方投資者和中國政府之間關系中的可預測性和穩定性引入其他法律。然而，卻沒有一部法典能充分保護外國投資者，使之能避免那種絕大部分投入的資金由國家分配而不是由市場自由獲得的經濟體制的不確定性。可是，日本和美國的公司仍開始大規模地投資，以期在將來獲得利潤。但是，直接投資最多的卻是香港，而且其投資主要投向與這塊殖民地相鄰的廣東省。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基于文化、語言和家族紐帶的私人關系恐怕是更好的保護，比國家不成熟的法律更可靠些，也可避免與政府做生意的不確定因素。

如表20中的數據所示，當中國貿易順差，或貿易逆差很小的時候，每年從旅游業、貸款和直接投資中獲得30億—40億美元。結果，中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增加，1982年超過110億美元，1983年更超過140億美元。盡管借款額增大，但中國仍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凈貸方。由于調整政策，中國投資減緩，而外匯又如此迅速增長，這就意味著，中國積累了多于它能有效利用的外匯。由于有了積累起來的外匯盈余，再繼續維持調整時期的低速增長率的指標，在經濟上就沒有什么意義了。

表21 工業增長



說明：“農村集體工業”和“全部工業”的數據，包括“村辦工業企業的產量”。中國的數據通常將村辦工業的產量包括在農業生產總值中。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1987）》，第24、38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130、227頁；《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194—195頁；《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21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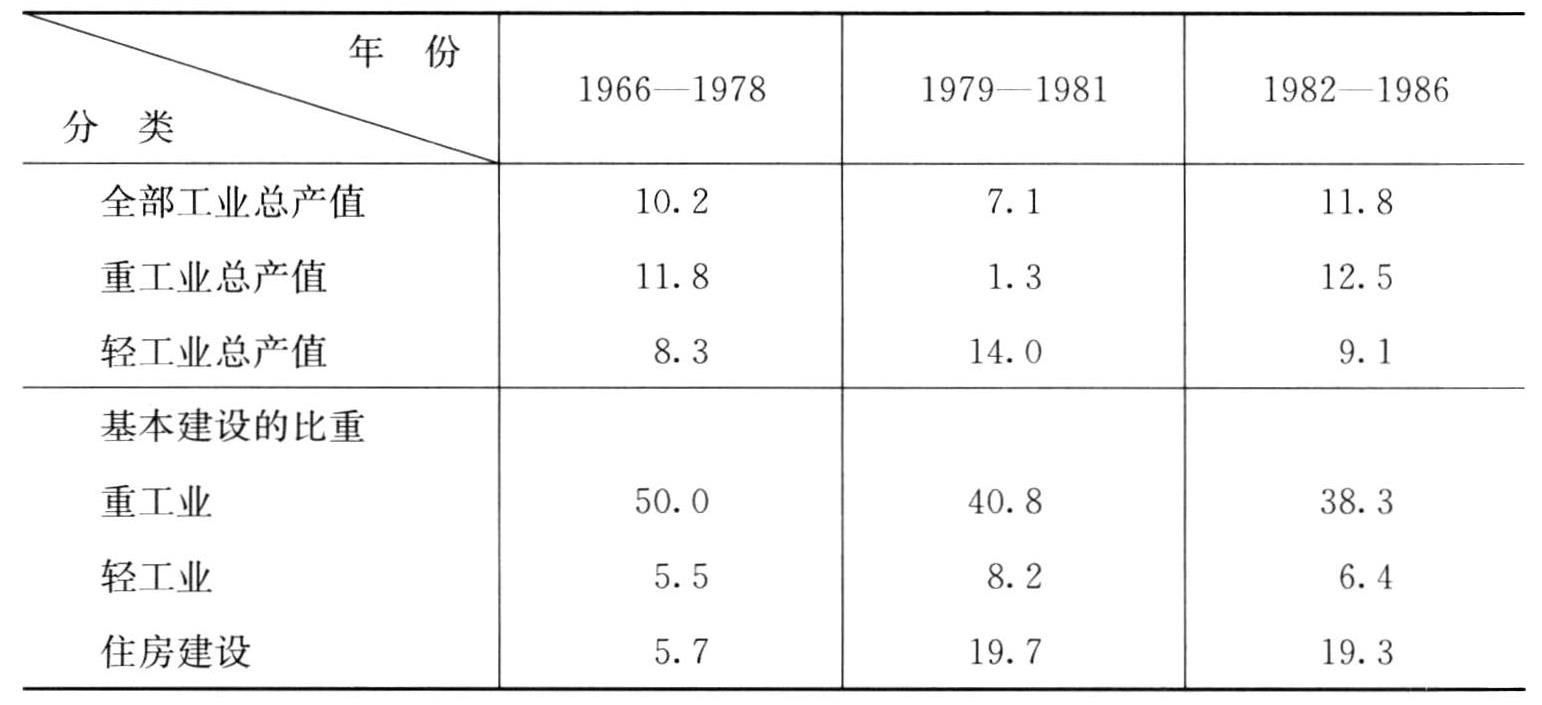
最后，令人吃驚的是，中國領導層竟發覺自己正處在80年代初期農業繁榮的時期。在兩個極好的年景之后，1980年一年收成欠佳，但到1981年農業產量回升，隨后，在1982年和1983年農業產量迅速增長。關于增長率上升的原因，我們將在本章后面加以討論。這里要提的一點是，農業的緩慢增長限制了工業發展的速度。農業是消費品工業投入資金的主要來源。農業出口是外匯的來源之一，農業進口是外匯的主要用戶。例如，中國糧食進口從1979年的880萬噸增至1982年的1610萬噸，但1985年便減至僅為600萬噸。[[24]](#_24___Zhong_Guo_Dui_Wai_Mao_Yi_N)僅糧食進口減少這一項便節約了10億多外匯。

對經濟上這三方面限制放松的同時，又實行進一步下放經濟決策權——包括投資分配——的政策。[[25]](#_25_Ba_Li__Nuo_Dun___Gong_Ye_Cai)例如，在1971—1979年間，對受國家預算控制的國有企業的投資，是對不受國家預算控制的國有企業投資的2倍。相反，在1980—1984年間，對預算外的國有企業的投資，比依照預算運行的國有企業的投資要高40％。[[26]](#_26_De_Huai_Te__H_Po_Jin_Si___Ga)因此，早在1981年便已開始的重申中央對投資的控制權的嘗試沒有成功。

如果中央政府更成功地重申它對投資的控制權的話，我們就很難弄清這怎么會給中國經濟帶來了純利潤。中國取得工業迅速發展的成就，部分原因是由于較早放權促成的。況且，工業的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集中在擁有大型企業的那些部門中。在1982—1986年這五年中，工業生產總值增長的一半以上，是來自集體所有制的中小型企業，而非國營企業；工業產量全部增長的1/3，是來自農村地區的企業。

在中國，農村的工業化開始于50年代，但由于“大躍進”（1958—1960年）的失誤，它的發展夭折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國再度努力發展農村工業，以向農業提供諸如化肥和水泥之類重要的投入物資；這在有關農業發展的部分中有詳細的論述。然而，80年代初的農業工業化，與先前的嘗試有著本質的不同。這些新興的農村工業，大多集中在距大城市較近的農村地區。最大的自成一體的中心在上海、無錫、南京以及這個地區其他大城市附近的江蘇省南部地區。這些新興工業多數與城市中的大型國營企業有分包合同關系。重視這些小規模生產，并非意味著這是調整時期重視消費品做法的延續。重工業方面的投資仍低于先前的水平，但鑒于輕工業增長率降至與1966—1978年接近的水平，重工業的產量躍居前茅。（參見表22）

表22 重工業與輕工業的產量與投資（％）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373、375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1987）》，第65—66頁。

1981—1986年，中國工業產量幾乎增長了一倍，但這種發展速度難以持續下去。歸根到底，對1984年和1985年工業特別迅速發展的限制來自外匯。在1985年，中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是由中央政府支配的那一部分，開始迅速下跌。只是通過大力擴大海外借款，才使外匯儲備沒有下跌到70年代以來未曾有過的低水平。結果中國外債總額增加了，到1987年已達200億美元。

通過年進口量的大大增長來刺激工業的加速發展，這只是需求方面的問題而已。而供應方面的問題，則是1981年后中國出口減緩造成的。1986年以后油價下跌，并未造成太大的影響。主要的困難在于，中國沒有能夠繼續維持以前的制造品出口的增長率。障礙并不在于保護主義的抬頭或全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蕭條，而是價格制度（包括匯率）有利于國貨的銷售，而不利于進口貨的銷售。企業仍可以通過國內市場的銷售獲得更大的利潤。1985年，隨著價格調整，中國也開始了貨幣貶值，這有助于改善這種局面。1986年，盡管油價暴跌，但制造品的出口仍提高了45％，或許這使總出口提高了13％。1987年，中國的制造品出口再次猛增，進口削減了；盡管工業增長率提高了，但中國貿易的賬目再次接近平衡。

在迅速增長的時期，工業發展的速度較大幅度地波動一般來說是正常的。在臺灣，70年代制造業的增長率最低為－6.3％（1974年），最高為25.6％（1976年）。[[27]](#_27_Jing_Ji_Ji_Hua_Yu_Fa_Zhan_We)同一時期的大韓民國，波動的范圍在11.6％（1970年）和35.7％（1973年）之間。[[28]](#_28_Jing_Ji_Ji_Hua_Wei_Yuan_Hui)日本在五六十年代達到長期國際收支順差以前，往往在經過了工業的迅速增長之后，便因國際收支緊張而出現一個發展緩慢的時期。因此，中國工業增長率的起伏，應被視為迅速發展中的相當典型的伴生物。在“大躍進”時期，工業生產漫無計劃和毫不協調，在兩年（1958—1959年）中增長了110％，最終帶來了災難性結果；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國工業運轉周期與“大躍進”情況是毫不相干的。中國第七個五年計劃要求工業年增長7.5％，[[29]](#_29__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這比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年）的指標更加現實。中國無論實現還是超過這個指標，都依賴于外匯緊張狀況的嚴重程度和經濟改革的全面進展。

#### 改革工業體制

中國為克服能源和外匯方面的障礙以加速工業增長所做的努力，僅僅是80年代工業政策的一部分。意義最為久遠的變化是在工業體制改革方面所做的嘗試。

中國70年代的城市工業體制，從許多方面來看，是蘇聯工業中官僚指令性體制的翻版。生產什么、投入多少，均由中央計劃制定者決定。企業直接從負責分配資金和物資投入的國家機構獲得它們所需一切。如果需要更多的投入，企業要么必須回到計劃制定者那里去索求額外的分配，要么不得不同某些擁有這種特定物資的其他企業去進行非正式的（往往也是不合法的）交易。由于沒有投資市場，因而也不可能通過市場獲得投入的資金和物質。

投資決策更加中央集權化。為造新廠而成立一些特殊企業；工廠造好就交給后生產性企業。造廠所需款項與生產性企業毫不相關，而是由政府預算調撥。銀行的首要作用不是作為提供投資基金的來源，而主要是監督企業對計劃的服從情況。

蘇聯模式的僵化體制，從一開始便困擾著中國的經濟學家。決策過分集中，已被看作造成本章前面所描述的工業效率日益低下的一個原因。80年代之前，解決這一弊端的主要辦法是把決策權下放到省甚至縣一級。但是，這種官僚指令性體制的基本特征卻仍舊未被觸動。關鍵的投入仍由政府機構按計劃分配。在這些決定中，市場幾乎或者說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1979年，中國的計劃制定者已開始了改革這種官僚指令性體制的試驗。這些最初的改革嘗試涉及這樣的措施：允許企業與其他地區的企業進行競爭，而在這之前每家企業在本地區的市場享有壟斷。[[30]](#_30_Wei_Lian__Bo_De_Deng_Bian)另外，他們還試圖重新利用獎金來刺激工人和管理人員，而且一改以往政府計劃只重視生產總值指標的做法，而更加重視利潤指標，以此從內部提高企業的效率。

這些早期的變化絲毫未改變中央計劃和官僚指令性體制的作用。市場力量的作用增加了，但仍明顯服從于計劃。擴大市場作用的努力遭到政治局某些成員強有力的抵制，他們阻止1982年和1983年激進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這次辯論中的核心人物又是那位陳云，不過這次他是站在阻擋進一步變革的那些人一邊的。他看到了市場的作用，但他仍堅定不移地相信計劃和官僚指令性體制應占主導地位。[[31]](#_31_Li_Jian_Chen_Yun_Zai_1979Nia)

并非是陳云的觀點改變了，事實是一個更加年輕、更加激進的改革集團獲得了既有權勢又有影響的地位。這個集團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趙紫陽，他于1980年出任總理。1984年10月“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就主要是由這些更激進的改革者起草的。[[32]](#_32__Zhong_Gong_Zhong_Yang_Guan)這個文件為掩飾其全部意圖使用了隱晦的語言，但事實上，它號召大力擺脫官僚指令性體制，各經濟部門都向發揮市場力量的方向發展。

在此后的三年中（1985—1987年），圍繞著適當地發揮市場力量的作用而出現的政治斗爭時起時落。主張市場化的那些人在1986年占了上風，只是在1987年胡耀邦被免職以及經濟領域之外的改革者受到清洗時，他們才遭受到挫折。然而，到1987年秋的中共十三大上，盡管在政治局常委中出現了兩名被認為是支持繼續發揮官僚指令性體制作用的成員，但向市場經濟方向發展的改革已回到正軌。

不管支持這個改革的政治基礎是什么，在1984年10月的文件公布之后的那幾年中，市場力量的作用被大大地增強了，但市場力量的擴大并未觸及中央計劃和指令性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要使市場機制提高經濟效益，就須有五個重要的因素：

1.首先，工業的投入與產出必須與市場的購買與銷售相適應。早在1985年上半年，對429個企業抽樣調查的結果是，市場銷售量從1984年占總銷售量的32.1％提高到43.8％。由市場提供給這些同樣的公司企業的物資投入，也從16.4％提高到了27.3％。[[33]](#_33___Gai_Ge__Wo_Men_Mian_Lin_De)從此以后這些百分比還大大提高了，但具體統計數據我們無法獲得。

2.企業管理人員必須依據市場規律行事，否則，市場力量將不能使企業產生有效的結果。到80年代中期，中國的企業管理人員不再像典型的蘇聯指令性模式中那樣，全然不顧市場機制，一味提高生產總值，這一點已毫無疑問。企業首次同利潤掛鉤，這些利潤可用來支付獎金、蓋住房，或為員工其他方面的福利。[[34]](#_34_Wei_Lian__Bo_De___Ji_En__Di)但是，對一個有效的市場來說，關鍵在于企業通過降低成本或提高銷售量來提高利潤，而不是想方設法從政府搞到資助。

然而，中國的企業仍嚴重依賴官僚體制提供各種資助。例如，隨著最近的一項改革，稅率應按一個固定的比率計算，但在實踐中稅率仍是商定的，以使企業免遭損失。[[35]](#_35_Li_Jian_An_De_Lu__G_Wo_Er_De)盡管銀行試圖提高提供貸款的條件，但企業仍然很容易以高額補貼的利率從銀行獲得貸款。批準破產法的工作正在做，但到1987年，這個法律仍處于試行階段。盡管小型的集體公司往往可通過或不通過破產法便被允許破產，但事實上，僅有一家沈陽的國營公司被許可宣告破產。

因此，在80年代中期，中國的企業管理人員對混合在一起的各種信號做出反應。與利潤掛鉤，使他們比在70年代或更早的時候更加注重市場的力量。但企業管理人員成功的關鍵，仍取決于他們迎合高層經濟官僚的愿望的能力。

3.改革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是，價格能反映出經濟中真正相對短缺的情況。如果價格不正常，投入和產出都不會投到或產自最需要的地方。但是，在諸如中國這樣的體制中，絕大多數的價格由國家制定，因此，進行價格改革極其困難。國家每改變一次價格，都會造成賺方（產品獲得更高價格者）和賠方（必須支付更高價格者）。賠方竭盡全力，抵制這個價格改革。就中國情況而言，賠方中有許多是為能源及其他投入物資支付更高價錢的大企業，因此，它們可以向制定價格的官僚機構施加相當大的影響。在80年代初期，物價改動的只有極少數，絕大多數物價仍穩定在20年前制定的水平上。

然而，隨著可以越來越多地從市場上獲得工業投入與產出，中國人發現在市場上價格波動所受的抵制越來越小。結果發展出了一套雙軌價格體系。官僚機構分配的貨物仍然按照國家制定的舊價格支付，而同種產品在市場出售，其價格就要由市場上的供求情況決定。因此，物價改革的關鍵在于，擴大在起輔助作用的市場上物資的范圍，在這個市場上的價格是不固定的。而事實上在1986年和1987年也正是這么做的。市場最終能否制定所有的價格，抑或國家能否繼續在價格制定上起主導作用，這仍是爭議頗大的問題。

4.擴大市場作用的主要原因是促進生產率的加速發展。但市場之所以能提高生產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通過市場能感受到競爭的力量。如果每個企業都壟斷了自己的市場的話，就不會有任何壓力去改善生產狀況了。在70年代初期的中國，甚至縣級企業都獲得對所在地的市場的壟斷權。企業之間的競爭并未集中在市場上，而是采取了趕超國家定額的形式；獲勝者可得到一面紅旗或一次到北京旅游的機會。

在80年代初期，國家行使的企業壟斷權開始消失。在商業領域，集體與個體的零售商直接和國家的零售商店展開競爭，因此，這很容易對已經改善的工作（更長的服務時間，服務更周到的售貨人員）造成進一步的沖擊。生產那些積壓商品的工業企業，也必須降低產品價格，改善產品質量，或者在產品銷售上投入更多的努力。問題在于，許多工業企業所面臨的市場，需求大大超過供給。對這些企業來說，幾乎沒有在競爭中改善生產狀況的壓力。即使質量不高，服務不周，銷售也是自動進行。增加競爭性并不僅僅意味著簡單地廢除國家行使的壟斷權，且要改革必須通過使管理人員按上述“2.”所描述的市場規律辦事，消除需求過大的根源。

5.最后，一個有效運行的市場，需要政府維持一個能為人接受的價格穩定水準。而什么能為人接受是由政治決定的。在中國，消費者長期以來已習慣于價格絲毫不提或一年中只提1％或2％。這種穩定性部分地是對40年代的惡性通貨膨脹所做的反應，那時的通貨膨脹削弱了國民黨統治的基礎，并導致了共產黨上臺。因此，中國的政治家很難容忍價格增長。當80年代價格上漲時，他們自然而然的本能就是重新控制物價。但面對過度的需求，再控制物價就造成了排長隊現象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定量配給，使經濟退回到官僚指令性體制的道路上。1985年和1986年，中國的問題尤其尖銳。在這兩年中，官方統計的城市生活費用指數分別提高了12％和7％。人們普遍相信，按非官方統計，物價增長率高得更多。這些增長特別給城市居民帶來了麻煩，他們的批評是市場取向改革放慢速度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改革者來說，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學會運用宏觀經濟控制，限制過度的需求，從而限制物價上漲的速度，進而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這個任務是艱巨的，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改革者尚無運用宏觀經濟政策的杠桿控制通貨膨脹的先例可循。

到1987年年底，中國工業部門在進一步向市場經濟體制邁進的過程中，在五個因素方面上都獲得了實質性進展。但是，官僚對企業行為，特別是對大型國家企業行為的控制，依然無處不在。也許改革者中沒有一個人會設想全面走向諸如在香港通行的那種自由市場體制的道路。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認識到，實行一種官僚指令性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體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種體制普遍具備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韓國的體制所具備的那些特征。中國與其東亞鄰國之間依然有個重大差別，這就是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程度。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省，盡管國有企業很多，但工業中占優勢的是私有制。在中國，事實上，所有未與外國企業合資的大型企業都屬國家所有，尚無計劃表明要把它們中的任何一個出售給私營部門。

在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前途并不僅僅取決于政治和政治局的組成。具有相同或可能更大意義的則是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情況。1986年有40萬個這樣的企業，它們的產量占中國工業產量的40％。中央沒有辦法通過計劃來控制這些企業。實際上，在80年代中期，這些企業的絕大多數都在市場上購買投入物資和出售產品。這些公司絕大部分是集體所有的，但公司中的私有制成分正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36]](#_36_Dui_Jie_Zhi_Dao_1987Nian_De)只要這些小型企業如此迅速地持續增長，國家就別指望退回到像1956—1957年或1963—1965年的那種完全蘇聯式的指令性體制上去。因此，80年代中期所進行的促進農村和其他集體企業發展的嘗試，起到了進一步向市場經濟方向發展的作用。

## 農村發展戰略

1978—1979年以前中國領導人之所以能做出忽視消費品投資的決定，是因為他們理論上對斯大林主義的或費爾德曼一馬哈拉諾比斯的發展模式中的一些說法深信不疑的緣故。但中國的計劃制定者還另有一個原因。使他們早些年不擔心忽視消費品投資所造成的后果。全部消費品的2/3—3/4由農業部門提供。[[37]](#_37_Zai_70Nian_Dai_Hou_Qi_He_80N)而就農業而言，中國有一個無需國家大規模對農業基礎設施進行投資的發展戰略。

這個農業發展戰略的核心思想是，農民可在沒有很多外援的情況下，滿足絕大部分的需求。“自力更生”一詞在中國過去30年中，含義不盡相同，但在六七十年代的農村地區，這個詞意味著一種戰略，依此戰略農民自己提供他們所需的大部分投入，不管是勞力、資金，還是諸如肥料之類的經常性投入。

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其他方面完全相同，構成這種自力更生戰略的思想起源于較早的時期——尤其是在1955—1956年全國性的合作化運動的第一階段，在1958—1959年的“大躍進”中則更為明確。這個戰略有什么特征呢？盡管側重點因時而異，但主要的組成部分在1978—1979年政策變化之前始終未變，而某些組成部分即使在政策變化之后依然存在。其主要特征如下：

1.相信中國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對發展來說，是一筆可以動員的財富。如果適當地加以激勵和引導，這些勞動力能為自己提供灌溉系統、道路和平整田地之類的基礎建設。關鍵在于如何提供必要的動力，而“解決的辦法”很多，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鼓勵人們為社會福利而忘我地工作，直至調整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公社，以確保農村建設有益于農民物質利益等等，不一而足。

2.尤其是在1959—1961年的歉收之后，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必須對農業投入更多的現代化物資，如化肥和機械，但問題仍然是，由誰來提供這些投入物資。在1966—1976年的大部分時間里，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著眼于農村地區的小型企業，而不是那些往往由國外引進的、位于城市工業中心的較大的工廠。

這兩個主要特征與70年代末以前的農村地區的實際情況有著清楚的關系。在公眾的言論中，往往還提到其他幾個重要的特征，但它們與實際情況的關系還不太清楚。人們強調過減少農村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差別。當時還提出過“以糧為綱”的口號，這導致了對經濟作物的忽視，但這個口號沒能堅持始終，只是偶爾被提起。按照某些分析者的解釋，“以農業為基礎”的口號，意味著在關鍵性物資的投入與分配上，農業享有首要的優先地位；但正如前文對投資重點的討論所澄清的，這個解釋并不符合事實。我們將返回收入分配和過分重視糧食的問題上，但首先，我們對自力更生戰略的中心特征以及對它們對生產與收入的影響的評價，需要一個更加清楚的了解。

#### 基本建設中的勞力動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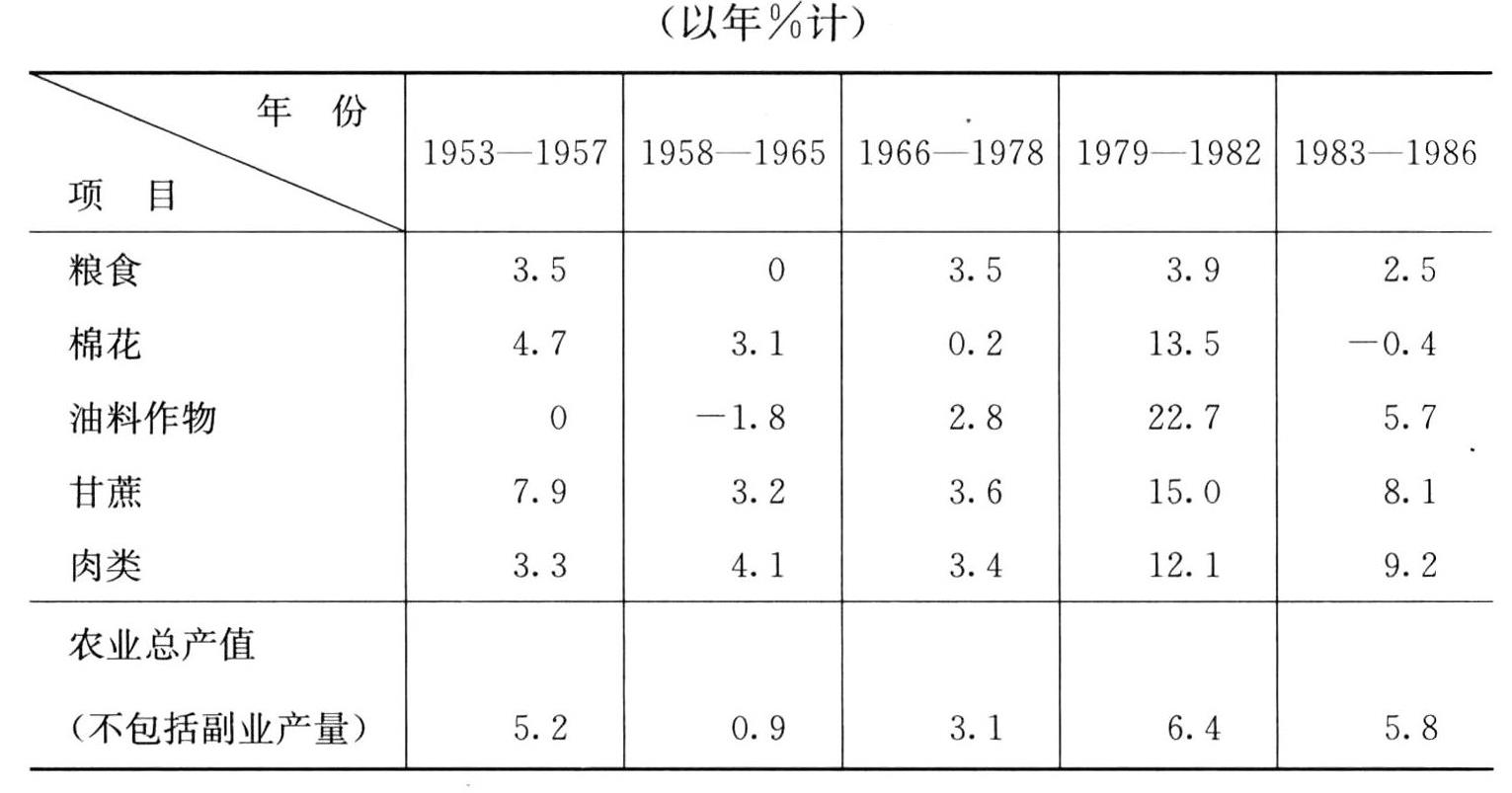
就1955—1956年農業生產合作社和1958年農村人民公社在全國范圍內的成立而言，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經濟方面的理由是，人們相信，它們的成立就有可能動員千千萬萬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來修建中國缺乏的灌溉系統、道路之類的基礎設施。這個觀念并不新奇。西方的經濟學家（納克斯、米爾德爾以及其他許多人）一直主張，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擁有大規模的尚未開發的農業勞動力資源，這些農民絕大多數以在小塊土地上種植莊稼為生。這個主張認為，這些農民能自己解決基本設備（鐵鍬、運土筐），利用農閑，從事掘溝挖渠、變多丘荒地為可耕田的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如果適當地加以組織，這類工作可在不影響中央政府的預算并在短時間中毫不減少農業產量的情況下進行。印度的社區發展規劃和世界性的農村工程項目，都是以過剩勞動力可以通過這種方式調動起來的信念為基礎的。結果，這些項目有許多完全失敗了，其余的只是在接受了中央政府或國際援助機構的大量資助后才得以存在。

然而，中國由于在絕大部分農業用地中廢除了私有制，情況便有所不同。私有制給使農村勞動力自愿從事公共工程項目的工作帶來了困難，因為，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往往得不到主要的好處。以一條新建的灌溉渠為例，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在渠邊擁有土地的人，他們用水最為便利。但那些從事這項工程的人，卻往往不得不從較遠的地方引水，況且，其中許多人是無地的勞動者或者佃農。他們要么根本認識不到生產力會提高，要么即使住得離水渠很近，能夠使產量提高，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增加部分被更高的費用抵消。

農業合作社及后來的公社的成立，使勞動與利益的結合成為可能。可以動員全村的人去修建一條水渠，但這條水渠僅能使全村1/4的土地增產。而村民（公社社員）將按其完成的工作量得到數額不同的“工分”。增加的產量并不歸耕種較豐產的1/4土地的那些人，而歸全村所有。全部產量，包括增加的那部分，將在村民中依所得工分多少，按比例分配。[[38]](#_38_Geng_Que_Qie_Di_Shuo__Zong_C)

遵循這個原則，中國在1956—1957年動員了上千萬的農民，而在1958—1959年動員的則更多。數量龐大的土石被搬走了，但隨后在1959—1961年，出現了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作物歉收。像“大躍進”時期的其他許多方面一樣，人們很難分辨清楚隨后的那些災難應在多大程度上歸咎于惡劣的天氣，應在多大程度上歸咎于管理不善，應在多大程度上歸咎于這個事實——首先勞力動員的觀念一直是基于錯誤前提之上的。由于缺乏明確的評判基礎，一旦從“大躍進”時期的作物歉收中恢復過來后，那些仍認為勞力動員是農業發展之關鍵的人，便又能重申他們的主張。由于將高低不平的干旱土地改造成大片的便于灌溉的平坦土地的成就，諸如大寨大隊和林縣之類的地方于是成為聞名全國的榜樣。雖然我們沒有可靠的數據說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勞力動員和完成工程的數量，但這些東西卻是實實在在的。但是，問題在于這些工程是否會對農業生產產生較大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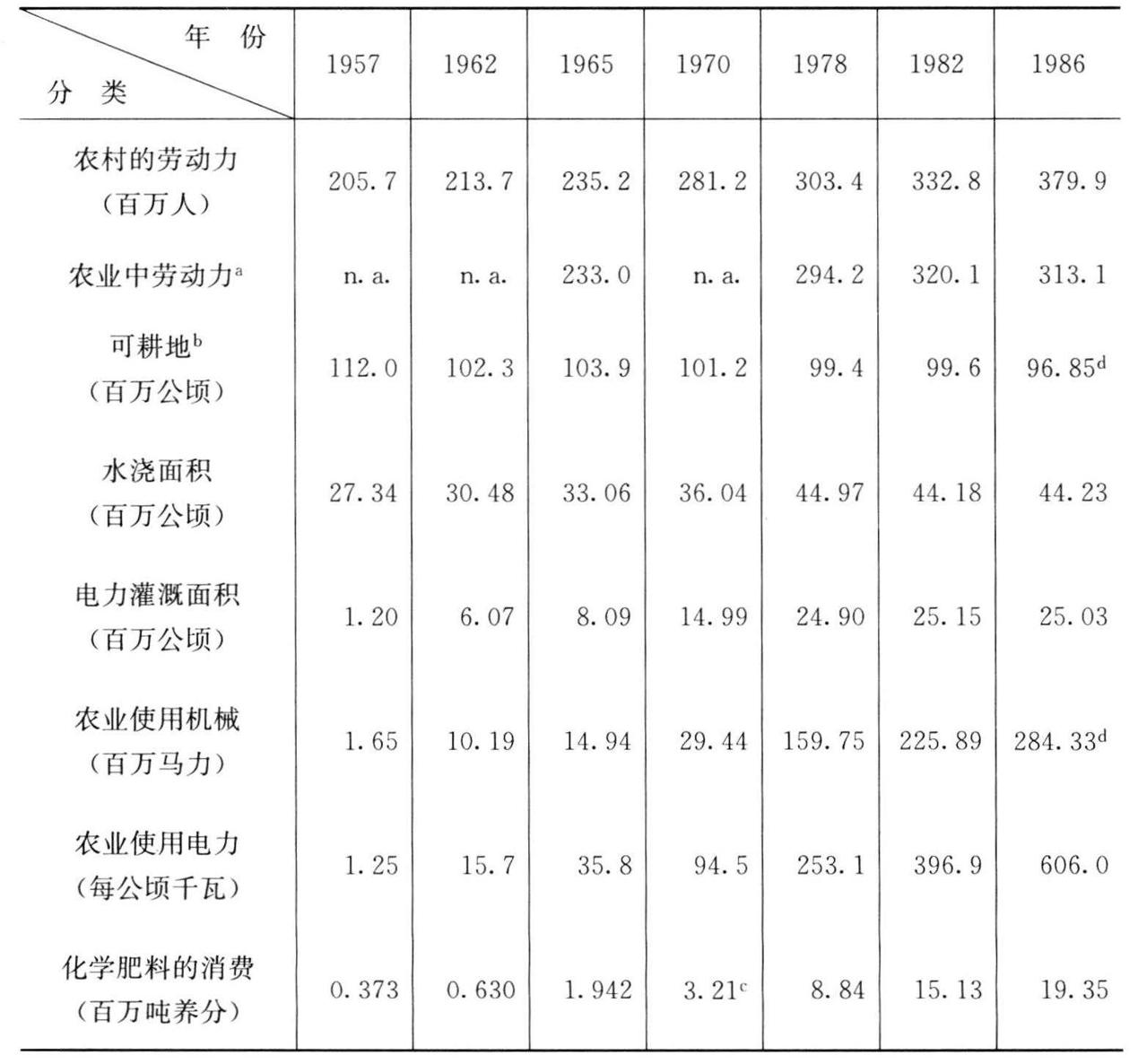
表23 農業產量的增長率



說明：副業產量絕大部分來自農村的工業，它們被從全部總產值中抽掉了；全部數據被轉換成1980年的價格，而這是從1971年中國農業總產量數字中得到的價格指數中得出的；1971年的數據既有1957年又有1970年的價格，1980年的則既有1970年的又有1980年的價格。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130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1987）》，第28—31頁。

有關中國農業產量的基本數據參見表23。這些數據表明，1966—1976年間，生產的增長率高于2％的人口增長率。問題是這種生產的增長是通過勞力動員實現的，還是由于增加了化肥之類的現代化投入物資的數量和改良了農作物品種的緣故。有關農業投入的數據，參見表24。

表24 農業的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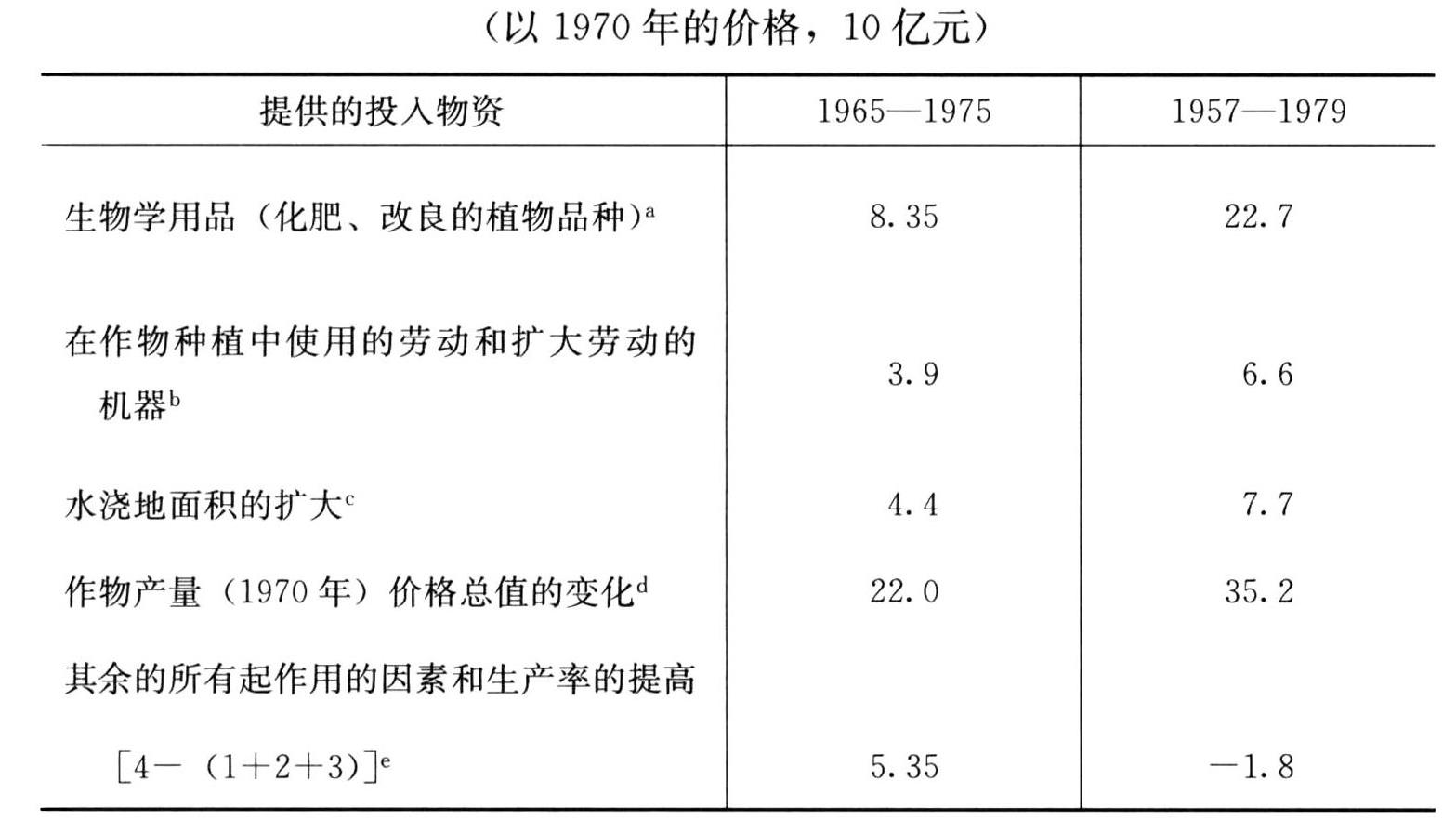
a.這些數據實際上是泛指農業方面的勞動力的，因此，包括少數非農業勞動者在內。  
b.土地數據部分來自機耕或灌溉土地面積以及機耕或灌溉地在全部土地中的百分比。人們普遍相信，土地數據被低估了。  
c.這些數據自包含0.202的營養成分（1981年的實際營養成分）的“標準重量”的肥料中得出。  
d.這些數據是1985年的。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年鑒（1980）》第4卷，第342—345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185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1987）》，第17、19、36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4卷，第111頁。

農村建設中勞力動員的目的，是為種植農作物增加土地數量，提高土地質量。但表24的數據卻表明，1965—1975年間可耕地的數量實際上減少了，而水澆地的面積卻增加了1000萬公頃，從1965年占全部土地的32％提高到了43％。由于人們普遍相信可耕地的數據被低估了，[[39]](#_39___Zhong_Guo_Jing_Ji_Nian_Jia)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可耕地可能是在純增長。另一方面，水澆地面積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在華北平原上引入機井這一事實，而機井的引入與勞力動員幾乎沒有什么關系可言。

農村建設的主要結果，或許不是在豐年中提高平均產量，而是保障農民在惡歲中免遭旱災和澇災之苦。但在1972年、1978年和1980年，旱澇災害直接影響的面積分別達到1720萬、2180萬和2230萬公頃。而僅在1960年和1961年這兩個災年中，受災面積就分別達2500萬和2880萬公頃，這是自1949年以來受災面積最多的。[[40]](#_40_Zhe_Xie_Shu_Ju_Lai_Zi_Guo_Ji)無疑，這些災害在70年代造成的后果要比以前小，所以，一些重要成果被歸功于農村建設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如果把它們與1956—1976年20年中所投入的巨額勞動時間相比，這些成果是微不足道的。

在如何看待勞力動員對提高農業產量所做的貢獻這個問題上，可供選擇的辦法之一是，首先不妨評價一下現代化投入物資對提高農業產量的貢獻，然后再對不能用現代化投入物資來解釋的其他因素做一個評價。這個方法被冠以“增長計算法”之名而為人所知，它常常被用來估價生產率的提高情況。[[41]](#_41_Zeng_Chang_Ji_Suan_Fa_Zheng)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進行這些計算所需的數據是未經整理過的，而且很可能是利用那些有爭議的假設獲得的。然而，表25中所列的統計結果還是有啟發的。如果將這20年（1957—1979年）的勞力動員視為一個整體的話，化肥、殺蟲劑和改良品種的增多等生物學方面的因素占作物產量總增長近2/3。而增加直接用于農作物生產的勞力，加上使用了節省勞動的機械[[42]](#_42_Ji_Xie_Hua_Wen_Ti_Shi__Wen_H)以及增加了使產量增長的水澆地等因素，占作物產量總增長的其余部分。而如早已指出的，水澆地面積的擴大，絕大部分是通過對動力傳動的現代化機井的資本投資帶來的，而不是通過大量的強迫勞役帶來的。1965—1975年的數據不完全可靠，但與真實情形相差不遠。對這個時期來說，留存下來的東西至少還是確實的，這意味著增長的農作物產量中有一部分并不是由于現代化投入物資的增加，也不是由于莊稼中直接使用了更多的勞動和機器，必然另有原因。

表25 中國農業增長情況



a.盡管由于地方條件有些不同，按養分測量的一噸化肥通常能使糧食產量增長10噸左右。化肥產量增長的情況從表24的數據可以得到。為了增加農業產量，化肥產量增長到了10倍，而且在1970年，糧食的平均收購價格提高到216.4元（《中國農業年鑒（1980）》，第381頁）。如果假定某些肥料用于經濟作物，總額就會更高一些。  
b.這個勞動估算包括了絕大多數以最不可靠的數據為基礎的假設。農村勞動力的數字來自表24。我們假定了每個勞動者一年中將130天專門用于種植作物。這個數字是1957年的，來自《統計研究》第8期（1958年8月23日），第8頁。最棘手的問題是，在事先未對農業生產函數作出估算之前，去估算那種勞動的邊際產量。一項中國的調查指出，集體勞動每天的人均（收入）值在1976年為0.56元，比1956年的0.70元和1957年的0.68元有所下降（《人民日報》1978年12月7日）。這些均是平均產量的數據，而既然它們在下降，這種邊際產量可能要比平均產量低。在這里，我們使用了0.50元的估算作為一日種植作物所耗勞動的邊際產量。  
c.有關水澆地面積擴大的數據來自表24。假定水澆地每年比非水澆地能多生產兩噸糧食的話，那么，按1970年的價格，每噸糧食216.4元。  
d.農業生產總值的數據，在1957年和1965年以1957年價格計算，在1970年、1975年和1979年按1970年價格計算，它們都來自《中國農業年鑒（1980）》，第41頁。1980年作物生產的有關數據，以1970年和1957年價格計算，這表明作物生產的通貨膨脹扣除率為1.35，這個數字與1970年高于1957年的1.33的農民購買價格指數大體一致。我運用1.35的數率將1957年的數據轉換為1970年的價格。1975年的作物產量的數字是采取了農業生產總值的70％為作物構成的辦法獲得的。  
e.這些數據，是通過從作物生產總值的變化（4） 中減去已被核實的投入物資（1，2，3）得出的。

假設稍有不同，結論也會稍有不同，然而，只有根本性的變化才能改變主要的結論。大規模動用農村勞力，對農作物產出的影響，無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影響都很小，或者是另外一種情況：影響確實很大，但都造成現代化投入物資的浪費，致使收成大減。更具體地說，如果化肥和相關物資投入能得到合理使用且獲得預期的產量，即1公斤養分生產出10公斤糧食，那么產量增加的原因有一半甚至多于一半要歸功于化肥。否則，肥料被無效使用，造成產量更低，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勞力動員進行的土地改良或許會在提高產量上作用更大。這里所重用的增長手段，不允許這兩種可供選擇的解釋之間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

這兩種解釋中，沒有一個能使人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村建設的勞力動員已被證明是中國達到農業產量增長的一個成功的手段。充其量它只是農業增產的一個輔助因素。效果不大的部分原因是公社體制存在管理和物質刺激方面的問題（公社是勞力動員戰略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但是，這種類型的農村建設工程，不是能給中國缺少灌溉系統的地區帶來灌溉系統改進的最適用的技術手段，原因也是如此。華南地區早在1000年以前便已開始修建這種灌溉系統，這些系統雖可改造，但這些改造工作所能帶來的收益是有限的。華北地區迫切需要一個更可靠的水源，但是，只在少數幾個地區，諸如大寨和林縣所在的太行山脈邊緣地區，才有可能僅僅通過勞力動員來顯著擴大水澆地面積。在其他地方，人們不得不更多地利用長江水，這就意味著首先要清除很多淤泥，而這項工作只有在制定了一個大規模的方案，在長江上游興建堤壩和發展綠地的條件下，才能進行。[[43]](#_43_Guan_Yu_Hua_Bei_Di_Qu_Yong_S)或者，就得像人們時時考慮的那樣，必須想方設法南水北調，把長江里的水往北引，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件小事，肯定不是，幾百萬農民扛著鋤和鍬，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能干的工作。

#### 農村的小型工業

盡管現代化的投入或許是農業產量提高的主要原因，但在1966—1976年間，這些投入物資至少多數是由農村地區很小的工廠提供的。如前文在工業戰略的討論中所提及的，與“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其他事情一樣，農村工業化的基本思想起源于“大躍進”期間。但“大躍進”的小型工業工程，設計上有很嚴重的缺陷。冶煉鋼鐵的土高爐比比皆是，便是工業重點的選擇不合時宜的一個最好的典型例子。這些高爐與其他大多數公社的企業一樣，既費物又費時，而生產出的價值卻微不足道。到1963年，公社企業的數量從1960年的11.7萬個減至1.1萬個，而1966年仍只有1.2萬個。[[44]](#_44_Guo_Jia_Tong_Ji_Ju____Zhong)

然而，1966—1970年間，社辦工業企業再次處于上升狀態，而且還有許多也屬于小型的新興縣級國有工廠加入進來。但是，與早在“大躍進”時期所進行的嘗試不同，這個方案并非建立在領導人某些烏托邦想法的基礎之上。這個時期的關鍵性觀念是明確的。農業需要現代化的投入物資，但是，如果這些投入物資要由大型的成套引進的企業提供，將造成國家投資和外匯預算的大規模轉移。而且，高額的農村運輸費用，使得將企業安置在既靠近原料產地，又靠近產品用戶的做法合情合理。把石灰石和煤作為投入生產出水泥。用水泥為例能說明這一點。中國多數農村地區都有石灰石和煤，因而，將水泥廠建在石灰石和煤產地附近，以滿足修建水渠和其他目的的要求，還是可能的。如果工廠不大，當地人只需利用有限的外部的技術監督，便能自建工廠。如果修建一個能生產100萬—200萬噸水泥的大廠，就能生產出更高質量的水泥，但絕大多數的公社要花費兩倍或三倍于生產費用，才能把水泥運到使用它們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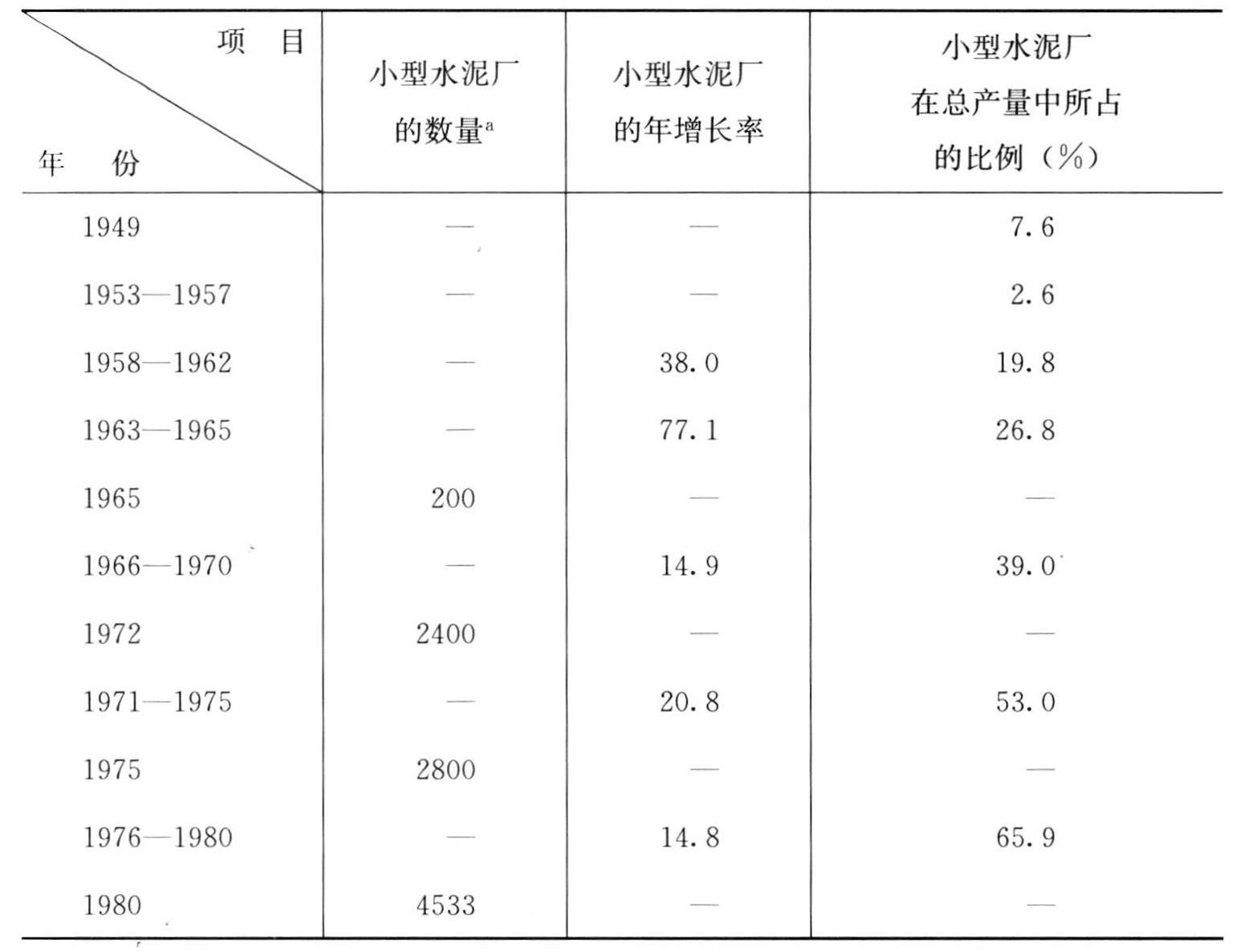
農業機械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把這些小工廠建在靠近產品用戶的優越性。拖拉機和其他機械故障頻仍。在工業國家，農民可以到附近的銷售者所設的修理店去更換零件。但在發展中國家中鮮有銷售商，而備用零件也不充足，甚至沒有存貨。農民為了修理起見，只能將拖拉機遠遠運到上海或北京，但這要花費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解決的辦法是在公社用戶的周圍設立修理單位。但是，大修需要有多種最初制造這一產品所需的技術和設備，所以，把大修單位改造為制造業企業并不困難，而中國所做的就是如此。[[45]](#_45__Da_Yue_Jin__He__Wen_Hua_Da)

1965—1970年，社辦小企業的數量提高到4.5萬個，而到1976年，數量達10.6萬個，差不多回到“大躍進”的水平。五種工業尤其受到重視——水泥、農業機械、化肥、鋼鐵以及電力。到70年代初期，中國水泥總產量的一半，或者說農村使用的幾乎全部水泥，都是由小型工廠生產的（見表26）。幾乎一半化肥也是來自小型工廠，這些化肥的構成主要是低質的碳酸氫銨。在70年代后期，中國開始關閉了許多小型企業，而這些都是屬于那些浪費原料且成本高得無法允許的企業。1966—1976年10年間決定修建許多工廠，并未充分考慮它們的經濟效益，這并不令人吃驚。令人吃驚的事是，沒有幾家工廠是因為低效率而關閉的，因為“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決定是在高度政治化的氣氛下做出的。[[46]](#_46_Dui_1976Nian_Yi_Hou_Na_Ge_Sh)

小型鋼鐵工業是遭受關閉打擊十分嚴重的部門，500家工廠中有300家（主要是最小的）被關閉。小化肥廠也頗遭非議，但在多家效率極低的工廠被關閉之后，這些工廠的化肥產量可以達到其最高水平的3/4。[[47]](#_47_Zhi_Shao_Shan_Dong_Sheng_De)可是，總的來看，小型工業仍以迅猛的速度持續增長。到1980年，共有18.7萬家社辦企業，比1976年多出8萬家。

原來的五種小工業中，有些（特別是水泥業）在70年代后期繼續增長（表26）。1979年，機械和建筑材料（磚和水泥）占了社級企業增長總值的一半以上，而化學制品和煤又占去13％。[[48]](#_48_Zhe_Xie_Shu_Ju_Lai_Zi___Zhon)但至少在城市工業中心周圍的公社中，人們日益嘗試著把社辦工業當作以城市為基地的大型企業的轉包者。這些和其他的變化，造成已經描述過的80年代發生的小型集體工業的迅速發展。但80年代的這個發展，只是中國工業化戰略的一部分，與農業發展只有間接的關系。由于這在工業戰略部分早有討論，因而這里不再贅述。

表26 小型水泥廠



a.小型包括縣也包括公社一級的水泥企業。  
資料來源：高文習（音）“中國的水泥工業”，《中國經濟年鑒（1982）》第5卷，第205頁；喬恩·西格森：《中國農村的工業化》，第153頁；美國小型工業代表團：《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的小型工業》，第86頁。

## 1979年以后農村政策的變化

在某些方面，特別是在小型工業的持續發展上，“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段時間繼續堅持1966年以來的方向。然而，其他方面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大寨大隊由于提出了錯誤主張，公然遭到人們的恥笑。征派大量勞動力從事農業基本建設的情況也許還存在，但已不再被強調。

在80年代初期的中國領導層看來，中國1977年全年的農業成就是不能滿足本國需要的，其失誤在于計劃不周和管理不力，在于農民缺乏努力工作和發揮積極性的動力。毛及其同僚依靠組織方式上的變化，通過大規模的勞力動員，以實現農業奇跡；鄧及其同僚同樣依賴改變組織方式——只是兩種組織變化十分不同——來提高農業生產率。

第一步是對農副業產品敞開市場，鼓勵農民不僅擴大集體收入，而且擴大個人收入。原則上，自由市場和個人家庭副業在1960年和1961年便已恢復，并在此后從未中斷。個人的家庭自留地在1960年也已恢復，60年代初期面積還稍有增加，[[49]](#_49_Li_Ru__Zai_Ba_Ji_Si_Tan_Dai)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一直保留下來。事實上，各種個體活動不斷受到負責集體生產的農村干部的壓制。這些干部的責任是，不僅要保證糧食及其他集體種植作物的產量和完成上繳指標，而且還要賦予農民社會主義價值觀和勞動作風。個體活動在集體勞動以外的時間進行，這助長了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因此，1979年以前，個體貿易活動只是小規模的，個人家庭活動可能也只是為了自家使用，盡管這個說法尚無任何公開的數字來核實。但到了1979年，個人活動不再被看作時乖命蹇的必需，而是受到大力的扶持，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農貿市場興旺發達，每天都有成千農民擁入城里，出售他們自留地上的產品。1964年，私人收入約占家庭收入的19％，1966—1976年間的數字可能更低；但是，根據一項調查，到1982年，個人收入可能已達家庭收入的38％。[[50]](#_50_60Nian_Dai_De_Shu_Zi_Chu_Chu)

到1979年，集體農業活動的組織方面正在發生一場意義更為深遠的變化。在中國最貧困的省份，特別是在安徽，中國領導層開始了叫做“生產責任制”的某些嘗試。從1962年起，貫穿整個70年代，集體的基本核算單位是生產隊，每個生產隊平均有25戶人家。[[51]](#_51_Zhe_Zhong_Shu_Zi_Nian_Nian_D)集體的農作物由隊里組織種植，社員的集體收入主要基于所在隊的產量。有些地方是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大隊平均由200個家庭組成，是公社組織結構中更高的一級單位——約占不到10％的農村人口。[[52]](#_52_Tong_Shang)但就絕大部分情況而言，大隊和公社一級僅負責市場與農村小型企業，而不管種植作物。因此，農業生產的主要單位不大，但形式仍是集體的。

在某些情況中，生產責任制保留了集體的或以組為單位的農耕，但在其他情況中，責任進一步下放到家庭中。到1981年或1982年，在最貧困的省份中，90％以上的家庭以戶而不是以生產隊為單位負責耕種以前的集體土地，這個制度在較富的省份中也日益推廣開來。在某些情況下，收入仍依賴全隊的成果；而在其他情況中，收入甚至由家庭自身的生產情況來決定。[[53]](#_53_You_Guan_1981Nian_Ge_Zhong_Z)

到1983年年底，甚至這些集體農業的痕跡，也大量地從中國農村消失了。在私人和集體之間劃分收入已沒有什么意義了。因為幾乎全部農業生產都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即使“公社”和“大隊”的名稱也被更古老的名稱“鄉”和“村”所取代。農業在經歷了1/4世紀的集體化嘗試以后，再次建立在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的基礎之上。[[54]](#_54_Guan_Yu_Xiang_Jia_Ting_Nong)

市場力量在農村地區的作用也進一步擴大。統籌和分配轉向市場體制，在農村地區本來就比在城市工業部門中要簡單得多。從一開始，就多數農產品而言，新興的市場便已存在，并被允許獲得更大的發展。如前所述，這在1979年就已經開始了。即使在1979年以前的集體經營下，就主要作物而論，市場也起到一定作用。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物的價格偶爾也會變化，而這些價格變化或許不會像城市地區的價格那樣，過多地背離相對短缺的實際。[[55]](#_55_Ran_Er__Yu_Shi_Ji_Que_Huo_Sh)或許最重要的是，農業家庭作為生產單位，自然而然地會按與市場需求一致的方式運作。由于對家庭成員來說，收益越高，便意味著生活水準也就越高，因此，農業家庭自然地成為收入或利潤的增進者。而且，增加利潤的唯一方式是增加產量或降低生產成本。與工業方面情況不一樣，沒有國家補助計劃或提供贊助的銀行家準備幫助那些始終處于虧損狀態的農業家庭擺脫困境。國家只有在農民面臨饑饉威脅時，才肯采取措施。最后，當人們對付的是幾億農業家庭時，要控制幾個特定市場的壟斷權是行不通的。不管官僚制度是否允許，競爭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市場運行良好的基本條件在中國農村是存在的。然而，這個事實并不意味著官僚政府對下列改革步驟是心甘情愿的：讓相對價格的變化來控制生產與銷售。但是，向市場體制的運動，在農業中比在工業中所取得的進展還是要大得多；到80年代中期，一項決定原則上使全部農產品的買賣都通過市場進行。國家對農民的強制性的購買額將被廢除，而代之以自愿性的合同。但是在實踐中，國家官僚不愿把更多的控制權拱手交出。至少在1987年年中，合同還不是完全自愿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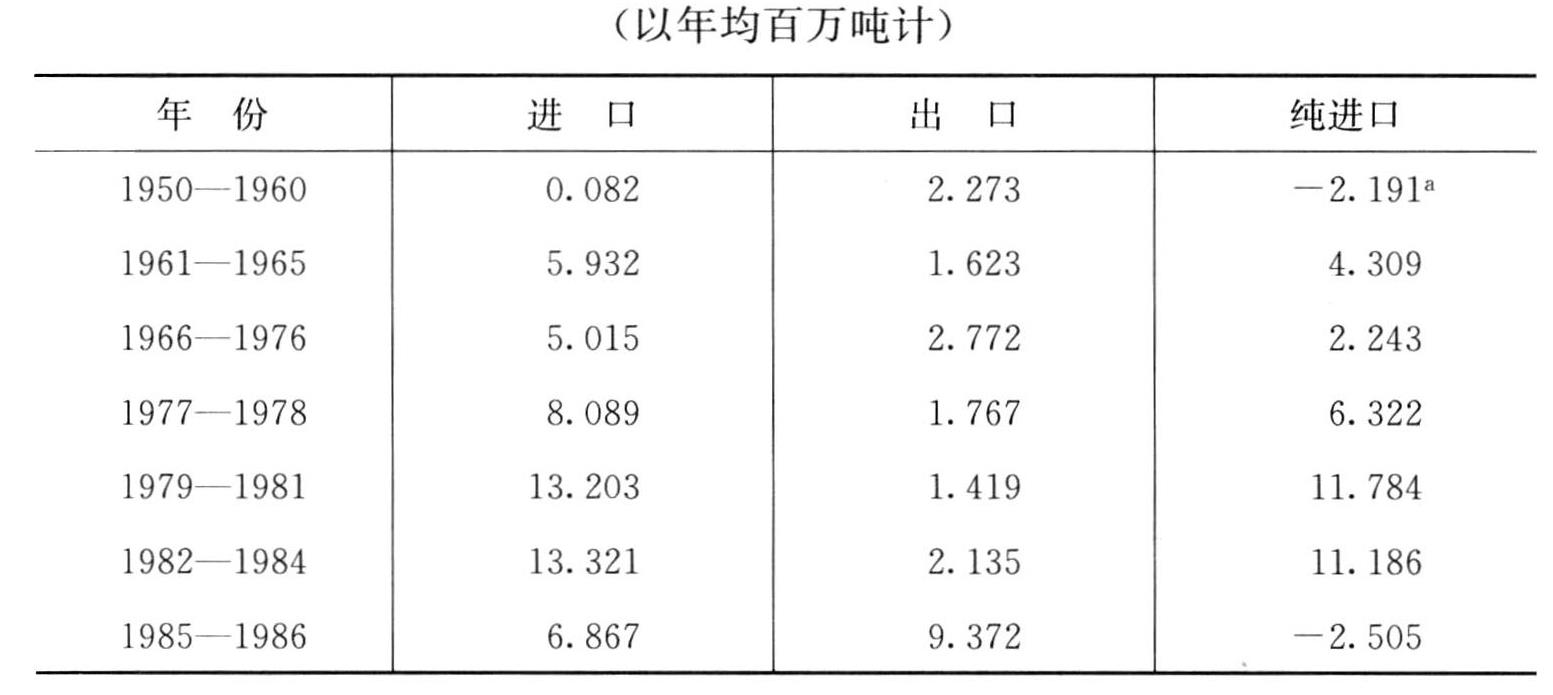
在那些更不情愿的改革者看來，問題的性質可以通過糧食市場加以說明。到80年代中期，由于要提供有關補貼的高額費用，中國政府的壓力更大，被迫減少它在糧食買賣中的作用。城市糧食售價要比付給農民的價格低得多，如果包括運輸和市場買賣的費用，那就更低了，由此而造成的損害大大地耗費了中央政府的財力。

完全放開糧食價格并非是一個容易為人采納的解決方案。城市糧食價格會立即迅速上漲，造成影響深遠的政治穩定方面的后果。這短期的危險緩解了，部分原因是由于4982—1984年糧食獲得大豐收。關于這次大豐收，我們在后文還將提到。由于大量的剩余糧食沖擊市場，糧價上漲本應緩和下來。然而，城市市場糧價在1985年仍比國家牌價高88％，因此，國家取消糧價將使價格大增，盡管不會大到88％的地步。[[56]](#_56_Ru_Guo_Shuang_Zhong_Shi_Chan)

即使眼下的政治問題能得到處理，從黨內保守派的觀點來看，還存在另外一個更基本、更長期的，與依靠市場提供基本食物相關的問題。在保守派看來，危險是如果市場不能促進糧食產量達到足夠的程度，那將怎么辦？嚴重的供應短缺，會造成價格迅速上漲或發生更壞的事情，甚至會造成營養不良，就像1960年和1961年中在國內部分地區發生的事情一樣。1960—1961年的那次危機是造成中國共產黨黨內分裂的主要因素，這次分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過火運動。1985年，經過連續三次創紀錄的豐收之后，這個危險似乎不很大；但到1987年年底，糧食收成連續三年沒有超過1984年的最高水平，因此，保守派的擔心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實際情況是，在80年代中期，中國糧食供給充足；而在1985—1986年，盡管人均消費有所增長，但中國仍然是一個事實上的純出口國（見表27）。而且，中國從出口中一年掙得300億美元。而相比之下，在1960—1961年所得還不到20億美元。1987年，中國可能以大約10億美元的價格進口了1000萬噸糧食。如果中國在1987年嚴重歉收，因而，比如說，要以當時的世界糧價進口5000萬噸糧食，費用將低于60億美元，或者說，還不到中國外匯收入的20％。即使世界糧價迅速上漲（這在中國如此大量購糧的情況下是可能的），中國也有外匯度過這次虧損，消費不會下降。無論如何，政府對農民可種什么的直接干涉（這是保守派對危險的回答），是制定一個有效的糧食保障政策的脆弱的基礎。政府規定的糧食上繳額并未考慮天氣惡劣的因素。過去，這些定額限制了農民能力的發揮，不能把糧食作物轉換成經濟作物，但代價卻是農業總產量低了。如果取消控制，農業總產量幾乎肯定要比這高。

表27 糧食進出口



a.負號表明純進口。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372、388、394、398頁；《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397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1987）》，第90—91頁。

中國農業的現實問題并不是面臨因天氣惡劣或糧價突然下降致使糧食作物大規模地改為經濟作物而造成的那種周期性衰退的危險。如果中國也像日本、中國臺灣、韓國一樣，給耕地以補助，那么它的農業和糧食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滿足國民迅速增長的食物需求。中國的東亞鄰國日益依靠食物進口來解決土地問題。例如，韓國在1979年全國每人年均進口糧食145公斤。而對中國來說，如果人均進口也這么高的話，就要從國外購入14500萬噸糧食。而在80年代，進口這么多的糧食將大大超過中國外匯支付的能力。

1980年作物產量下降，而緊接著在80年代初期就取得了幾次大豐收，這使得這個長期的問題變得令人捉摸不定。這幾次大豐收的原因各不相同。天氣好有一定的作用。放手讓農民自己決定在土地上種植什么，使得投入物資重新分配給經濟作物，這提高了整個農業生產率。但是，糧食產量在1982—1984年中也向前飛躍，這表明只要放松對農民的控制，就將產生積極的影響，這影響還不只局限于從糧食向經濟作物的轉變。在80年代，諸如化肥、農業機械和電力之類的關鍵性投入物資，也在持續增長著。本章沒有余地測算每一部分對產量增長的具體貢獻。一個部分的成效肯定會增強其他部分的影響。然而，如果不搞責任制，不搞家庭承包的話，毋庸置疑，農業生產的增長肯定要大大低于1980年初的水平。

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業生產的增長（不包括農村工業）年均高于9％；農業增長的這種迅猛勢頭，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其經驗看來只是由于拆除了農業有效生產的障礙后而出現的一次性增長。一旦達到更高的效率水平，中國農業增長率在1985—1987年便降回較為固定的水平。此外，更加惡劣的天氣有時也是一個因素。農業產量每年增長5％，按世界標準來看是高的，高于這個增長率的算是十分罕見的了。在東亞，由于耕地增產潛力有限和迅速的工業化，更低的增長率才是符合標準的。例如，在日本，80年代初期的農業產量與60年代中期基本相同，而人均糧食產量卻僅達60年代中期的一半。[[57]](#_57_Lian_He_Guo____Ya_Zhou_He_Ta)更為貼切的對比是，在韓國，農業在1965—1984年間年均增長4.3％，而糧食卻僅以一年1.2％的百分比增長著。[[58]](#_58_Jing_Ji_Ji_Hua_Wei_Yuan_Hui)對于臺灣來說，在同一時期的增長率可比數字是2.4％—0.3％。[[59]](#_59_Jing_Ji_Ji_Hua_Yu_Fa_Zhan_We)因此，對中國來說，農業生產一年4％的增長率和糧食生產一年2％—3％的增長率，可能也算是個成就了。

中國長時期的問題是，對農產品，特別是對糧食需求的增長高于3％—4％。例如，在1980—1984年間，中國對糧食的需求肯定是以一年5％以上的比率增長的，[[60]](#_60_Zhong_Guo_Ren_De_Shou_Ru_Nia)而產量增長卻達一年6％以上，這就造成了可能使中國在1985—1986年成為有盈余的純出口國。如果糧食產量是在一個持久不變的基礎上一年增長3％，那么對工業化和國民收入增長的需求，以現價計，如果不更高的話，至少也在一年中將增長4％，而中國也將重新變回與其東亞鄰國一樣的主要糧食進口國。

因此，責任制和由此產生的農業發展的突飛猛進，使中國得以在短時間內暫緩這個長期存在的全國性的農業問題。工業化得以向前波動；農村地區的人均收入，在食物需求未超出國內供應的情況下也能翻上一番。然而，到1987年，中國或許已經返回到一個更加正常的方向上，這個方向符合人均耕地0.1公頃的國情。因而，中國農業的未來選擇，可能與70年代后期所面臨的選擇更為類似。實際人均收入增長加快，可能使中國在農業中投入足夠的資金，確保這個部門的增長率足以保持在農業進口更迅猛的增長不超過中國掙取外匯支付進口的能力的水平上。由于農業投資有這種預期的后果，因此，與80年代初期發生的情況一樣，給農民以物質刺激，使他們充分利用這些投資和其他投入物資，達到最大效果，這也是必不可少的做法。

如果走回頭路，仍控制農業產量，那也能解決中國長期存在的對糧食的過度需求，主要是因為減少了物質刺激，收入的增長明顯減慢，所以需求也就下降了。以鼓勵出口戰略轉為向內，也會達到同樣結果。由于不僅糧食進口而且所有產品進口的增長減慢，全部國民收入的增長也減緩下來，這樣，對糧食的需求便能縮減了。另外，國家可以重新實行嚴格的分配制度，這種制度即使在收入迅速增長的情況下也能減小糧食需求。給出了這么多選擇方案，然而毫不令人驚奇的是，至少有些改革者主張更加市場化的改革，鼓勵農民生產，大力促進出口，以滿足糧食進口預期增長的外匯需要。[[61]](#_61_Li_Ru__Zai_1987Nian_11Yue_Za)

#### 收入分配

無論1966—1976年間組織農業生產的方式有多少優點和弊端，人們還是普遍地相信，這種制度至少減少了農村中的和城鄉居民之間的不平等。人們擔心1978年以后政策的改變，將會造成進一步的不平等。80年代初期公布的數字，提出了有關這兩種假設的問題。正如羅爾的評判所表明的，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造成占農村人口20％的最貧困者收入大增，而這絕大部分是在損害地主利益的基礎上取得的，地主喪失大部分財產，卻絲毫沒有得到補償。[[62]](#_62_C_R_Luo_Er___Zhong_Guo_Nong)在1953—1955年期間繼續存在的不平等，是在既定地區中富裕農民與貧苦農民之間和貧富地區之間的不平等。1955—1956年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立，消除了土地占有量上的差別。合作社（以及后來的生產隊）中仍然存在著差別，這是由各個家庭中健康的成年勞力與不從事勞動的受贍養者（孩子、上年歲的父母和病人）的不同比例造成的。盡管這些差別可能是千真萬確的，但它們與由占有不同數量的土地所造成的不平等大不相同。

對到過中國農村參觀的人來說，印象最深的是任何一個既定的集體單位都有的相對的平均主義結構。參觀者不能或沒有看到的是，在地區之間收入差別很大，集體化對這些差別可能根本沒有產生任何影響。與富裕郊區的農民一樣，貧困山區的農民也要和本地區的其他貧窮農民結合在一個生產隊中。山區境況較好的農民，盡管收入比全國農村平均收入要低得多，而他們集體后收入還會有所下降；而郊區不太富裕的農民，盡管收入往往高出全國農村平均收入一倍，但集體后他們的收入卻會有所增長。

對于最終的計算必不可少的數據現在還未找到，但羅爾的數據指出，即使在1956—1957年完全受集體影響的情況下，不平等也沒有減少多少。[[63]](#_63_Luo_Er_De_Shu_Ju_An_Di_Qu_Ge)地區性的差異大到這種程度：集體單位內無論如何縮小不平等，也不足以平衡地區間的差別。本章的中心問題是，1965年后采取的措施是否改變了這種地區懸殊的現象。

農村不平等的縮小是可以通過四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達到的：農村公社的累進稅或許能減少不平等，但中國稅制中幾乎沒有任何累進可言。給予最貧困地區的福利金也有助于不平等的縮小。盡管我們對中國農村的福利制度知之甚少，但地區間的相互調撥顯然是相當小的。面臨嚴重營養不良的公社，顯然可以獲得援助；但絕大多數的其他公社卻被要求自謀出路。第三種措施是使農民從最貧困的地區遷往較富裕的地區，但是，在一個幾乎沒有新的土地可供開展這項工作的國家中，這個辦法勢必會在農村導致嚴重的矛盾。最后，國家可以把投資和經常性投入指向最貧困的地區，或許國家偶爾也曾這樣做過。但是，由于在許多貧困地區，資金回收率在運轉過程中很低，這種政策經常是以生產率的緩慢增長為代價的。往往較富的地區供水充足，這為更多地利用化肥和改良植物品種提供了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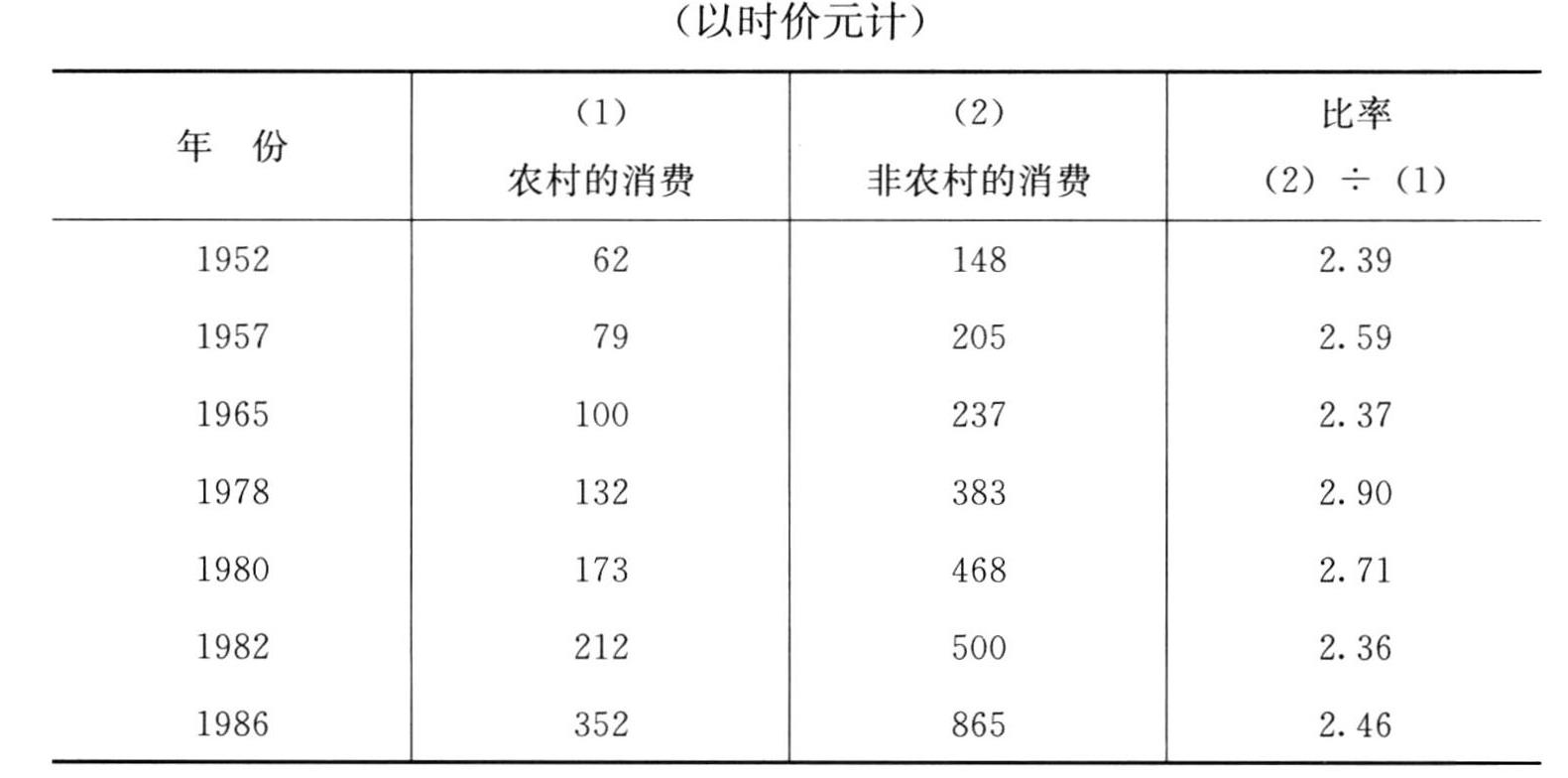
因此，幾乎沒有理由要求農村的不平等——盡管與絕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程度要低——在六七十年代減少很多，而且，似乎也找不到多少支持這種觀點的數據。測量不平等的標準方法是用基尼系數，這個系數的數值范圍是從“0”（完全平等）到“1”（完全不平等）。例如，有關1980年大隊集體收入分配的數據，提出一個0.232的基尼系數，這個數字事實上與從羅爾的有關土地改革之后和集體之前那個時期的數據中得出的0.227的系數完全一致。[[64]](#_64_Luo_Er___Zhong_Guo_Nong_Cun)各省的數據也加強了這一結論。各省的數據表明，各省之間人均農業收入的差異，70％能用人均擁有土地的數量和質量來解釋。[[65]](#_65_De_Huai_Te__Po_Jin_Si___Sha)由于各個地區間人均擁有土地的相對數量和相對質量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中幾乎沒有多少變化，相對收入也幾乎沒怎么變。

1978年后的變化是否改變了這種情況？一般來說，人們很難在短時期里分辨出收入分配的趨勢，而且，所能得到的中國數據根本也不適合于這種精確的計算。但是，城市和運輸干線周圍已富裕起來的公社，很可能從發展經濟作物和副業活動的良機中獲得大小不一的好處。畢竟，貧困的山區既不能為城市居民提供蔬菜，又不能為城市企業從事分包工作。因此，經濟控制自由化后，或許造成80年代初期不平等的某種程度上的增長。

然而，當我們轉向城鄉收入差別情況問題時，放松控制與不平等擴大之間的關系便不十分清楚了。事實上，放松控制在一定條件下，能較大地縮小不平等。

整個六七十年代的一個中心特征是，從農村向城市移民實際上是禁止的。此外，成百萬的城市青年被遣送到了農村公社和國營農場。如本章早已描述的，在同一時期，國家繼續源源不斷地把投資傾入以城市為基地的工業。在投資成為日益增長的資金動力時，城市地區對勞力的需求仍在穩步增長。這個需求可從已是城市居民的人中得到滿足，或從那些住在城市附近的公社中、能經常往來于城市之中而無需城市戶口的人中得到滿足。結果，在城市中，城市人口的勞動者與被贍養者的比率穩定地增長著，而對那些在國內已經是最富裕的公社來說，在城市中工作的機會增加了。如表28的數據指出的，工資雖未增加，但結果是，城市里人均消費比在農村增加得更快。有關郊區公社的類似數據無法得到，但這些數據或許將指明一個相同的趨勢。

表28 城市與農村的人均消費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1982）》第7卷，第28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1987）》，第98頁。

1978年以后發生了什么事情？部分答案是，從鄉村向城市移民并不是在那個時期所制定的放松控制的措施之一。許多被送到農村的城市青年，被允許或者已經自作主張地返回城市，而到80年代中期，一些農業人口也被允許遷入較小的城鎮，但是，農村居民仍然不能隨意遷往城市。雖然農產品收購價格的大大提高并未改善農村居民的相對地位，但是，由于城市食物的銷售價格沒有提高，因此，對中央政府的預算來說，這個措施的代價太大，不可能重蹈這個覆轍。[[66]](#_66_Zhe_Ge_Wen_Ti_Zai_La_Di_De)對城市住宅的大規模投資和城市工資的普遍增長，有助于城市居民保持他們優于農村地區的地位。無論如何，只要中國更貧困地區的農民離開本地區、遷往城市甚至縣城的做法受到阻止，迅猛的工業化便可能伴生出一個很大的、可能范圍很廣的城鄉收入差額。因此，1980年和1982年城鄉差距比1978年縮小了一些，但不應將此視為一個長期趨勢的開端。實際上差距在1986年確有擴大。不過表28的質量僅如此而已，我們不能從這些估價的微小差別中得出太大的結論。

## 結論

顯然，認為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根本沒有任何經濟發展戰略的說法是錯誤的。投資計劃是一個斯大林主義式重視機械與鋼鐵的計劃沒有改動的翻版。自力更生，或者說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國外進口和外國技術的依賴，在1966—1976年這10年間成了常用的術語，聽起來像是毛主義的調門。但在實際上，自力更生與50年代中國自給自足的政策或30年代俄國對外貿易的政策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差別。

在中國農村，政策受蘇聯影響極小。首先，人們認識到如果農業產量停滯不前，就是致命的大事。問題在于如何提高農業產量，而不是要不要提高。而中國采取了一種雙管齊下的戰略，將“實用主義”與“激進主義”的觀念不穩定地結合在一起。“實用主義”推動了化肥工業迅速發展并進口了大量肥料。那些與毛觀點接近的人搞了大規模的群眾勞力動員，還樹立了大寨榜樣。他們還力主農業所需的現代化投入物資大部分應由農村地區的小型工廠提供。

在形式上，計劃和控制的經濟體制依然沿襲蘇聯的集中化模式，只是60年代初期作了小小的修改。五年計劃或許始終都有問題，但年度計劃依然決定著一個企業生產什么。重要的物資和設備通過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場進行分配。工資依據蘇聯的八級制度來支付；而農村集體的收入，與50年代（不包括“大躍進”時期）和60年代初期一樣，是以所掙工分為基礎的。

如果形式上尚無不同的話，那么，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在這種形式的范圍內，政策的實際貫徹情況卻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蘇聯的八級工資制的意圖本是提供物質刺激，促使人們更努力地工作，但中國人以凍結工資級別和取消獎金的手段，撤銷這些物質刺激。在農村地區，政治態度在分配工分時，往往與所付出的勞動具有同樣重要的影響。在管理方面，企業繼續接受降低成本和投入的指標，但如果產量指標完成了，這些指標就不必認真地對待。此外，政治上的考慮常常干擾著評判標準，而在其他國家，這種評判工作是更加重視技術條件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政治干擾和取消物質刺激的嘗試，看起來并未減緩增長。但事實上，現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長情況的數據，使許多分析家大吃一驚的是，在此期間，除政治動亂達到最高峰的1967年、1968年兩年外，發展仍然相當迅速。但是，這種增長是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的投資和能源投入上的，而這些投資和能源投入的無效使用正與日俱增。只要這些投資能持續增加，大慶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斷地涌出，就會構成維持增長的可行手段，盡管這種手段對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作用不大。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經過20年實際工資的停滯之后，勞動紀律正受到破壞；大慶和其他油田的石油產量已達到頂峰，面臨著下降的危險。投資率雖然持續上升，但資本—產量比提高得則更快。無論由誰來控制政治局面，由于恣意濫用人力和物力，保持穩定增長的年月都是快到盡頭了。

隨著毛的去世和“四人幫”被清洗，中國在1977—1978年間的暫時領導人在一場加速增長的嘗試中，進行了明顯的外向型轉變，鼓勵企業大量引進國外技術；他們還同樣明顯地推翻了“文化大革命”反對物質刺激的政策，恢復了獎金，提高了農業收購價格，全面提高工資。但是，人們仍然重視機械和鋼鐵，這種重視與物質刺激和對外貿易的政策不相協調。

在1978年末和1979年初，中國的計劃制定者最終、至少暫時地放棄了斯大林主義的經濟學。消費品第一次不僅在國內消費，而且在出口方面，取得了優先于生產資料的地位。中國的發展戰略向它的東亞鄰國成功地遵循的那個模式邁出了意義深遠的一步。

改革時期第一階段的某些特征持續的時間并不太長。為“調整”經濟體制而全面減緩增長速度的做法并沒延伸到1981年之后。1981年，工業和農業的增長速度猛升。降低重工業重要性的做法也是暫時的。在1982—1986年這個時期，重工業與輕工業的增長比率回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通行的那個水平上。能源供應的不景氣狀況結束了，這個關鍵部門重新恢復了增長勢頭，這為再次推動能源消耗大戶的重工業部門的發展提供了可能。

但是，中國的部門發展戰略并未完全返回以前的模式。重視擴大出口、向海外借款和歡迎外國來中國直接投資的外向轉變，不僅得以持續，而且還有所發展，并在更多的領域中出現。降低輕工業和消費品重要性的做法與其說是真真實實的，倒不如說是表面現象。農業生產波浪式的發展意味著，消費品增加了，增加了的工資和獲得的獎金能買到東西。就部門發展戰略而言，中國邁出了引人注目的一步：沿著其東亞鄰國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戰略的方向前進。出口在中國的發展戰略中所起的作用，不如在韓國大，但是，這種情況更多地是說明中國幅員遼闊，也反映了這樣的事實：貿易在大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要比小國小。中國的貿易比率，盡管比韓國或臺灣小得多，但與日本60年代的比率非常相似。與周圍較小的國家相比，中國貿易的這種比率，是中國之所以在發展的早期階段更加注重重工業的一個重要原因；而相比之下，韓國在20世紀60年代集中發展輕工業，它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是通過進口得到滿足的。

部門戰略上的這些變化，僅僅是毛去世和1978年12月的三中全會之后所進行的改革的一個部分而已。具有更大潛在意義的是，為根本改革以前管理經濟的制度而采取的若干行動。

早在1977年中央便已開始放松對外貿易的集中管理，但是又不得不恢復控制，因為企業趁機簽訂了遠遠超過中國支付能力的進口合同。那些已延續下來的最初幾項改革措施中，有一項是取消對農村市場管理的控制。緊隨其后的是生產責任制推廣了，到1983年，合作制農業實際上被放棄了。在1979—1983年這短短五年里，中國已從一個受來自上級的國家定額和更多地來自黨的干部所堅持的那些標語的共同嚴格控制的合作農業體制，走向主要通過間接的市場機制控制的私人家庭農業體制。少數市場限額雖仍保留下來，但80年代中期已采取措施開始取消這些限額。

工業中蘇聯式的計劃和管理體制廢除的速度比較緩慢，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這里需要進行的改革比農村中的情況復雜得多。工業體制改革的試驗早在1979年便已開始。這些最初的嘗試，本質上是試圖使蘇聯式的官僚指令性體制能更好地運行。企業的內部管理作了一些改革，對地區市場的壟斷控制有所放松，以利于競爭；給予各種計劃指標的優先地位也進行調整，效益方面的指標越來越受重視，而產量指標卻越來越不強調了。

到1984年10月，部分地由于農業改革取得顯著成就，黨要求在工業部門進行更加徹底的改革。在接下來的三年中，中國采取了重要的步驟，使中國的工業管理和控制的體制擺脫以往集中化的官僚指令性體制，沿著一個將市場控制和統籌的方法與關鍵部門中繼續存在的官僚化的控制結合在一起的體制的方向變化。至少對某些改革者來說，目標是建立一個市場與國家控制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模式，就是60年代的日本和韓國搞的市場與國家控制相混合的那種體制的翻版。然而，到1987年年底，實際情況與這個目標相差甚遠。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上選出的某些政治局成員，仍然反對經濟體制上的這種巨大變化。同樣或更加重要的是，官僚化的控制體制根深蒂固，即使是最堅決的改革者，在試圖鏟除這些體制時，也面臨著許多阻力。

中國部門戰略的轉變和改革經濟體制的努力在許多方面反映出中國已認識到（雖已耽擱很長時間）國家的經濟資源。農業方面的問題是，如何從一個非常有限的土地和過剩的勞動力中獲得更多的糧食。通過大規模的勞力動員實現這個目標的嘗試失敗了。更多地使用化肥和改良的植物品種，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而同樣重要的是，必須更有效地使用這些投入物資。以家庭為基礎的農業在亞洲其他地方已被證實可有效地使用資源；在中國，這種農業在1981年后也被證明是同樣地行之有效。

同樣地，高度集中的計劃與控制體制，對控制與協調幾十萬個在各種不同條件下進行作業的小型生產單位來說也肯定是個效果不佳的手段。維護中央控制的嘗試導致局部性壟斷，并導致了若干嚴重妨礙小型企業發展和效率的其他措施的產生。一旦這些控制被撤除，這個工業部門便會興旺發達。

隨著農業和工業的迅速發展，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也提高了，其提高速度可與韓國、（中國）臺灣和日本在以前曾有過的那些發展相媲美。在從1977—1987年底這整整11年中，中國的純物質生產年均增長率達8％以上。以人均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然而，即使增長如此巨大，中國經濟以人均計，或許僅相當于60年代中期的韓國和幾年前臺灣的水平。中國勞動力大多數仍在農業之中，而更大比例的人口仍居住在農業地區。農村人口所占比例在80年代迅速下降了，但還需要10年或更長時間，這種發展勢頭才能將絕大部分中國人口和勞動力變為城市人口和工業勞動力。

中國人民已普遍享受了加速增長的第一階段所帶來的好處。事實上，由于農業地區首先經歷了經濟的興旺發展，很可能全國范圍的不平等現象比80年代初期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減少。城市里克服不平等的情況不及農村那么好，但城市的收入提高了，絕大多數家庭開始購買諸如電冰箱和電視機之類的耐用消費品。可以想見，基于市場原則的持續的迅速發展，會日益增加不平等。但在80年代后期，中國仍然采用高度平均主義的方法分配這些增長的利益。

因此，到1987年年底，中國在極大程度上并不是它的東亞鄰國的翻版。無論中國的改革者多么努力地發揮市場的作用，中國這種從蘇聯式集中計劃發展而來的社會主義體制的最終發展結果，與在東亞其他地方可以發現的、基于私有制的計劃與市場的混合體制，還是有幾分不同。中國與80年代后期東亞其他地區出現的城市繁榮仍有相當的距離。但到80年代后期，中國已從業已存在數千年之久、70年代初雖有改善但仍明顯可見的貧困的農業經濟中，向前跨了幾大步。

[[1]](#_1_5)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S.施拉姆編：《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42—143頁。

[[2]](#_2_5)1966—1970年間的地區數據必須根據分散的材料重新整理。這里的說法是以R.邁克爾·菲爾德、尼古拉斯·拉迪和約翰·菲利普·埃默森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諸省工業總產值的重新整理（1949—1973）》一書中的數據為基礎的。

[[3]](#_3_5)例如，被視為農產品中最重要部分的糧食的產量，1966—1970年年均增長率為4％。而能直接反映出工業部門情況的發電量，在1971年超過1965年71％，這說明五年之中年均增長率為11％。

[[4]](#_4_5)有關農業的數據，全部來自《中國農業年鑒（1980）》，第34—36、38頁。

[[5]](#_5_5)作為這些論述的基礎的工業方面的材料，出自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225—231頁。

[[6]](#_6_5)有關這個模式的最優秀的也是相當簡明的論述，參見海韋爾·G.瓊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導引》，第110—119頁。

[[7]](#_7_5)如果進口占國民收入5％，投資占30％，而且全部進口是由需要投資的產品構成的話，那么，投資的16.7％將由進口提供（5/30），而其余的則靠國內自產。

[[8]](#_8_5)中國的數據表明，全部進口的80％是“生產工具”，但是，中國的數據中包括許多中性產品，如紡織纖維、橡膠等。

[[9]](#_9_5)這些數據來自霍利斯·切納里和莫里斯·賽爾奎因《發展模式（1950—1970）》，第192—195頁。

[[10]](#_10_5)機械、設備和科學儀器的進口額，從1966年的34870萬美元，跌至1968年和1969年的13600萬美元和13180萬美元，此后，在1970年又急速回升到27660萬美元〔美國中央情報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貿易手冊》（1972年12月），第25頁〕。

[[11]](#_11_5)在這幾個時期，中國物價的增長率非常有限。

[[12]](#_12_5)這些消費估算，是采用中國對實際國民收入指數的估算獲得的，去掉供積累使用的資金，從而得出一個消費指數。中國在編排國民收入指數時，使用方法對增長率略有夸大，因而，消費增長率也被夸大了。

[[13]](#_13_5)該十年計劃于1975年夏由國務院討論，此后，計劃草案雖遭到“四人幫”的反對，但得到了政治局的批準。毛去世之后，該計劃經修改提交1978年2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參見華國鋒在1978年2月26日于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北京周報》第10期（1978年3月10日），第19頁。

[[14]](#_14_5)就其他方面的來源而言，這個說法是以1979年江蘇省統計廳在南京提供給美國經濟代表團的簡介為依據的。

[[15]](#_15_5)美國國家對外評估中心：《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的鋼鐵工業》。

[[16]](#_16_5)“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1978年12月22日通過），《北京周報》第52期（1978年12月29日），第11—13頁。

[[17]](#_17_5)陳云：《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18]](#_18_5)這些數據來自余秋里：“關于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人民日報》1979年6月29日第1、3版。

[[19]](#_19_5)我們至今仍無一個合適的價格指標能用來縮小中國這整個時期中的外貿數據。1979 1981年間實際意義上的數據，來自《中國對外貿易年鑒》（1984）第4卷，第5頁。

[[20]](#_20_5)1981年中國人改變了劃分外貿項目的方式，因而，要得出一個通行的數據，與1981年和更早幾年的類似范疇進行比較，是不可能的。

[[21]](#_21_5)“國家統計局關于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結果的報告”，《中國經濟年鑒（1982）》，第82—83頁。

[[22]](#_22_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第23頁。

[[23]](#_23_5)哈羅德·K.雅各布森、米歇爾·奧克森伯格：“中國與基本的國際經濟組織。”

[[24]](#_24_5)《中國對外貿易年鑒（1984）》第4卷，第118頁；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1987）》，第91頁。

[[25]](#_25_5)巴里·諾頓：“工業財政和計劃改革”，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面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第1卷，第604—629頁。

[[26]](#_26_5)德懷特·H.珀金斯：“改革中的中國經濟體制”，《經濟文獻雜志》第26期（1988年6月），表2。

[[27]](#_27_5)經濟計劃與發展委員會：《臺灣統計數據（1986）》，第83頁。

[[28]](#_28_5)經濟計劃委員會：《韓國經濟主要統計資料（1986）》，第83頁。

[[29]](#_29_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1986—1990）》，第23頁。

[[30]](#_30_5)威廉·伯德等編：《中國近期經濟改革：對兩個工業企業的研究》。

[[31]](#_31_5)例見陳云在1979年3月8日發表的、后重登在《北京周報》上的“計劃與市場”一文[第29卷第29期（1986年7月21日），第Ⅰ—ⅩⅥ頁]。

[[32]](#_32_5)“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4年10月20日），《北京周報》第27卷第44期（1984年10月29日），第Ⅰ—ⅩⅥ頁。

[[33]](#_33_5)《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第45頁。

[[34]](#_34_5)威廉·伯德、吉恩·蒂德里克：“中國工業中的部門配置”。

[[35]](#_35_5)例見安德魯·G.沃爾德：“企業財政改革的日常范圍”，見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面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第1卷，第630—645頁。

[[36]](#_36_5)對截止到1987年的農村工業化所做的最系統的研究，收在為1987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關于鄉鎮和私人企業的大會準備的論文中。

[[37]](#_37_5)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食品約占農村家庭預算的65％和城市家庭預算的60％以上。此外，服裝又占去家庭預算的另外12％—15％，而服裝的價值多來自棉花[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439、443頁]。

[[38]](#_38_5)更確切地說，總產量以及由此推算出來的稅收、投資、時價和福利基金的定額，由當時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合作社或生產隊計算。剩余的數額按工分總數均分，以決定單個工分的價值，而家庭集體收入是由家庭的工分總數乘以單個工分價值而得出的。

[[39]](#_39_5)《中國經濟年鑒（1981）》第6卷第9頁指出“可耕地面積的數據偏低，有待于今后核實”。

[[40]](#_40_5)這些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205—206頁。

[[41]](#_41_5)增長計算法正規地采取如下形式的生產函數：Q＝F（L，Ld，K，C，t），這里，Q是產量，L是勞動，Ld是土地，K是固定資本，C是經常性投入，t是時間。這里使用的規范形式包括：假定恒定的利潤，把與時間相關的方程式轉化成一個簡單的形式，得出如下公式：dQ/dt ＝ F/t ＋ F/C × dC/dt ＋ F/ L × dL/dt＋F/Ld × dLd/dt，其中，化肥是最近投入物資的代表，水澆地面積的增長僅僅代表了土地上的重要變化。

[[42]](#_42_5)機械化問題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及其以前的主要爭論點。機械化的實行部分地是為了克服勞動力短缺，諸如在一年兩熟或三熟的情況下，人們必須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期中收獲一季作物并換種另一季作物。然而，機械化也被看做是服務于社會政治目的的，諸如：減少城鄉之間勞動樣式的差別和鞏固集體經濟（拖拉機尤其在為集體所有的情況下，有助于補充集體所需的勞動力）。參見本尼迪克特·斯塔維斯《中國農業機械化的政治》。

[[43]](#_43_5)關于華北地區用水問題的討論，參見詹姆斯·E.尼克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水利工程和水力資源》；阿爾瓦·劉易斯·埃里斯曼：“引水灌溉華北平原的潛在費用與收益”；見德懷特·H.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第4頁。

[[44]](#_44_5)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207頁。

[[45]](#_45_5)“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小型工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例見喬恩·西格森《中國農村的工業化》；卡爾·里斯金：“小工業與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德懷特·H.珀金斯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的小型工業》，美國農村小型工業代表團的報告。

[[46]](#_46_5)對1976年以后那個時期所做的一項有用的研究是，克里斯廷·汪（音）：“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的工業化：‘文化大革命’10年的教訓”，見美國國會聯保經濟委員會《四個現代化下的中國》，第394—418頁。

[[47]](#_47_5)至少山東省的情況是如此（汪：“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的工業化”，第413頁）。

[[48]](#_48_5)這些數據來自《中國農業年鑒（1980）》，第368頁。

[[49]](#_49_5)例如，在巴基斯坦代表團所調查的10個公社中，個人自留地總共占全部可耕地的7.55％，而政府的指標是5％。沙義德·賈維德·伯基：《中國公社研究（1965）》，第35—36頁。

[[50]](#_50_5)60年代的數字出處見前引書，第40頁。1982年的數字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471頁。

[[51]](#_51_5)這種數字年年都稍有起伏。這里的數字是1965年的（《中國農業年鑒（1980）》，第5頁）。

[[52]](#_52_5)同上。

[[53]](#_53_5)有關1981年各種責任制的討論，參見劉緒茂：“我國農村目前實行的幾種生產責任制介紹”，《經濟管理》第9期（1981年9月15日），第12—14頁。在凱思林·哈特福德的“社會主義農業死了；社會主義農業萬歲！：中國農村組織的變遷”中，對這些制度也有大段論述，見伊麗莎白·J.佩里、克里斯廷·汪編《毛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第31—62頁。

[[54]](#_54_5)關于向家庭農業轉變的過程，許多作者曾做過描述和分析。這個過程中較早的部分能夠描述，這部分地是以第一手的村莊研究材料為基礎的，見威廉·L.帕里什編《中 國農村的發展：巨變》；又見戴維·茲維格：“對中國農村變革的反對：責任制與人民公社”，《亞洲概覽》第23卷第7期（1983年7月）；弗雷德里克·W.克魯克：“公社體制的改革與鄉—集體—家庭體制的興起”，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面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第1卷，第354—375頁。

[[55]](#_55_5)然而，與實際缺貨市價的背離，依然確實存在。例見尼古拉斯·拉迪：“中國的農業價格”。

[[56]](#_56_5)如果雙重市場（其中一個受控制）被一個單一的不受控制的市場取代，則輔助性市場的價格往往就反映不出可能發生的事情。這個統一市場上的價格將高出過去政府控制的價格水平。但是，較高的價格將造成糧食消費縮減，因此，供求通常能在低于輔助性市場的價格上達到均衡。然而，要確定所達到的具體價格，關系到種種假設。由于這些假設過于復雜，在這個注腳中我們不能涉及。

[[57]](#_57_5)聯合國：《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統計年鑒（1984）》，第277頁。

[[58]](#_58_5)經濟計劃委員會：《韓國經濟主要統計資料（1986）》，第75頁。

[[59]](#_59_5)經濟計劃與發展委員會：《臺灣統計數據冊（1986）》，第65、67頁。

[[60]](#_60_5)中國人的收入年均增長約為9％。對糧食需求（包括牲畜飼料）的收入彈性的保守估計可能是0.6，這將意味著糧食需求一年中以5.4％的速率增長。假設不同，得出的結果也就不同；但是，要提出一個在這個時期產生出不高于5％的需求增長率的合理假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61]](#_61_5)例如，在1987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一次關于鄉鎮企業的會議上，杜潤生在發言中清楚地指出了鼓勵進口的政策和解決糧食問題的方案之間的關系。

[[62]](#_62_5)C.R.羅爾：“中國農村收人的分配：30年代與50年代的比較”。

[[63]](#_63_5)羅爾的數據按地區給出了富裕的、中等的和貧窮的農民的收入。如果假設在既定地區富裕農民和貧窮農民的收入在集體之后與中等收入農民一樣，便能得出這個模擬分配的基尼系數為0.211，這個系數勉強低于集體之前（和土地改革后）的那些時期的0.277的數字。

[[64]](#_64_5)羅爾：“中國農村收入的分配”，第72頁。

[[65]](#_65_5)德懷特·珀金斯、沙義德·尤素福：《中國農村的發展》，第115—119頁。

[[66]](#_66_5)這個問題在拉迪的“中國的農業價格”一文中有更大篇幅的討論。

## 第七章 教育

## 學校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10年期間，教育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教育制度的改革是這場運動的最終目標之一。運動是從學校開始的，學生和老師被動員起來充當先鋒。它們的影響遠遠超出教育范圍，建立了教育改革及其他領域改革的舞臺。回顧過去，由于教育作用的雙重性常混淆不清，因此，本章將發起這場運動的動員階段和此后旨在使“教育革命”制度化的鞏固階段分開來談。[[1]](#_1_Zhe_Yi_Jie_Shi_Lai_Yuan_Jian)

1966—1968年的運動可看做這場大革命的動員階段，如同其他幾次運動（從40年代的土地革命開始）一樣，都打上了毛的烙印。這種說法認為，毛作為運動發起人，在他腦海里有一個宏偉目標。就是要保證中國革命沿著他自己的路線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沿著黨內其他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的路線發展。根據這種說法，權力之爭和群眾參加反官僚主義的斗爭，可以看做“文化大革命”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

毛的路線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已十分系統地采用過了。盡管這次冒進給經濟帶來了災難，但毛不愿放棄其目標。甚至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已使黨內領導分裂，反對他的意見日益明朗化時，他仍然如此。在他看來，只在經濟上搞社會主義改造還不夠，上層建筑領域也還有待革命化。為實現這一目標，全國上下與其觀點相悖的思想以及持這種思想的人都有待改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如《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9章所表明）已定下了這些目標，但與完成這些目標所擔負的任務又不相適應。因此，“文化大革命”又繼續擔當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未竟的任務。同時，又增加了執政黨內權力斗爭這個必要的組成部分。革命是連續不斷的。“文化大革命”是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民主革命經過28年（1921—1949年）才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又進行了17年（1949—1966年），毛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完成上述目標。[[2]](#_2__Zai_Zhong_Yang_Gong_Zuo_Hui)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標：

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為進行如此雄心勃勃的事業，既要糾正錯誤的思想，又要奪那些擁護這些思想的人的權，毛發動了這場群眾運動。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宣稱，“解放以來的經驗證明，如果充分發動了群眾，走群眾路線，使移風易俗成為真正廣大的群眾運動，那么，見效就可能快起來”。毛接著操縱這場群眾運動，向“目標”放出了“群眾”能量。他就是用這種方法在土地革命時期奪取了中國農村的政權。只要舊的政權機構統治著農村，土地改革就不會取得勝利。同樣，在那些反對他的勢力被推翻以前，毛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和政策也不會成功。不過，一個重要的區別是，那些反對他的當權派是他自己黨內的領導人，并都曾是整個革命事業過程中的先鋒。

這已不是毛第一次發動群眾來批評黨。但就這些對象的性質和范圍說，這是最大膽的一次實踐。這樣利用群眾有很多相關作用，是打擊對象的一種有效方法；由于允許群眾直接參與權力斗爭，因而，他們在這一過程中就有他們個人的利害關系；運動期間自然涌現出來的領袖人物成為接替被推翻的當權者的新的領導來源。總之，這可以使接班的那一代人在毛死后能繼續進行他的革命。

當然，這會產生“過頭事情”。但毛澤東早就發現過頭事情有一種功能。所以，只要這些過頭事情發生在“廣大群眾的自覺斗爭”時期，就是可以容許的。在運動的鞏固階段，當群眾痛恨的對象已被打倒，這種過頭事情就隨之被糾正，因此，認為運動高潮時期的所有情況到運動后期的溫和階段都會保留下來的看法，是不正確的。這就是毛澤東在以前群眾運動中采取的原則，先發動、促進，而后限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又采取同一方法。因而，從1966年5月起，他故意使這場運動走向極端。一方面允許運動按其原有的方式發展，另一方面又操縱被鼓動起來的群眾，攻擊包括黨內最高層領導人在內的被他指為批判對象的所有反對派。在破壞性階段似乎達到目的后，這些過頭事情就被糾正。然后，一個新的上層建筑就由一個新的或至少變乖了的領導班子來建立。

1968—1976年采取的教育制度變革可看做這次運動重建階段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這些變革不可能在1966年以前的領導班子下實行。整個教育制度在1976年毛死后，又突然被全面地恢復到1966年以前的形式和結構，而且在其他許多方面也是如此。這些情況為這一說法提供了又一個合理證據。即隨著權力的喪失，政策也隨之被輕而易舉地推翻了。1976年以后的逆轉情況，似乎最終證實兩條路線的斗爭確實存在，只是斗爭不按毛的條件，而是按其對手的條件來解決。他曾預言，需要一百多年，要再來幾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戰勝這些對手。在發動紅衛兵階段的第一年年底，他還說過：鞏固這場運動至少要十年。[[3]](#_3__Dui_A_Er_Ba_Ni_Ya_Jun_Shi_Da)

## 發動群眾

一開始，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聶元梓等人寫的大字報標志著遍及全國各校的政治活動得到了加強。聶是哲學系黨總支書記，也是北大支持1964年高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黨員之一。她在這次運動中，反對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她的大字報在1966年5月25日貼出，毛命令將大字報向全國廣播，然后又在6月2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大字報攻擊了北京市委的兩位委員及陸平，批評他們企圖以強調學術內容來阻止北大開展“文化大革命”，限制群眾參加，縮小運動的政治意義。

事實上，那年春天，學校的政治活動仍集中在學術問題上。批評教育制度的勢頭日益猛烈。批判的焦點還是集中在學校的課程、教材及政治學習上，論點與毛1964年春節談話相一致。關于劇本《海瑞罷官》的辯論，也仍然被看做學術論戰和學生作文的題目，而不被看做批評毛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政治攻擊。

聶元梓的大字報使這場運動聚焦在政治問題上，因而意義重大。大字報是在6月2日發表的，緊跟在6月1日具有同樣挑釁性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社論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

#### 批斗對象與運動參加者

全國高等院校入學考試不能如期于7月舉行的消息在6月13日宣布之后，學生們便把全部注意力轉移到這場運動上來。為使學校能進行“文化大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新生入學要推遲一個學期。特別是要實行一種新的招生方式，讓大量的工人、農民和士兵走進大學，可這又是一個權力問題。資產階級權威絕不會做一絲一毫的讓步。6月18日的《人民日報》宣稱：“他們是不斗不倒的，倒了還想爬起來。因此教育制度改革的過程，必然是一個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的過程。”

黨組織想繼續控制這場運動。如第二章中所講，6月初根據負責黨的日常事務的劉少奇和鄧少平的指示，工作組被派到全國各大中學校。工作組在大學里起了制造分裂的作用。他們試圖抑制運動的發展，限制群眾的參與和防止發生暴力，把活動限制在各校園內。有些地方，工作組想把學校黨的領導人列在運動對象之外。聶的大字報發表后，學校黨的領導人即受到攻擊。后來，工作組受到批評，被說成是“矛頭向下”，保護少數，打擊多數。工作組還反對前幾個星期表現最突出、對工作組企圖干涉這場新生運動表示不滿的積極分子。

在6、7月間，這種沖突還只是局限于校園里。但是，在全國不同的地方發展情況各不相同，對斗爭對象的性質也缺乏統一理解。由于運動是在黨外發動的，是反對黨組織的，因此，由上而下的正常領導渠道被中斷了。各省運動的進展只能根據當地對各種信息的反應，如國家新聞媒介提供的信息，還通過“北京來信”，或在各地串聯的北京積極分子的報告會這類非正式的傳播渠道得以加強。

在北京6、7月間，學校領導干部戴高帽子在校園內游街，在學校會議上挨批斗，批判他們的資產階級教育方針。在中學，召開批判大會批斗校長和黨支部書記。這是最早的“牛鬼蛇神”。在審訊和批斗期間，他們受到學生不同程度的拘禁，還關過“牛棚”。牛棚的含義并不是指“牲口棚”，而只是一個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對他們的斗爭終于結束了。他們被釋放出來后要接受群眾監督，被調離工作或“靠邊站”，從事某種卑下的體力勞動。

在運動發展最迅猛的北京，工作組試圖控制和阻止的正是這種行為，最終把清華大學蒯大富之類造反派學生定成目標。這時有八百多學生因參加這種活動而被定為“反革命”。[[4]](#_4_Wei_Lian__Xin_Dun____Bai_Ri_Z)他們自己也受到了管制和嚴格的監督，并在群眾大會上受到批判。

這一時期，一些黨外學術權威也受到批判并“靠邊站”。這些人很容易成為靶子。運動初期被列為靶子的人，如果不是因為階級出身不好，就是因為他們在1949年以前與國民黨有牽連，或者由于他們的右傾思想和死不悔改的行為。這種人常被稱為“黑五類”，意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黑五類時多時少，這主要取決于他們所在的社會團體。在此后兩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這些靶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監督。在中國一些地方，他們是首批“斗爭對象”。后來的運動僅僅反對行政領導和黨的領導，而以前人們只知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唯一的斗爭對象。

為了控制這場運動，工作組在每所學校都發動一些學生起來領導運動。他們雖然不能說全部是，但基本上都有很好的階級出身，也就是工人、農民、干部（特別是那些1949年以前入黨的）、軍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這些人被稱為“紅五類”。這些學生和那些支持工作組的學生，成了各個學校建立的“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的領袖。

7月底，毛以阻礙“文化大革命”發展為由，命令工作組從學校撤離。隨后，他又把6月10日至7月31日工作組時期的50天稱為“白色恐怖”時期。但工作組撤離時，留下出身好的學生作為運動的領袖。他們把后來這段時間自稱為“紅色恐怖”時期。在北京是人所共知的“紅八月”。

工作組撤出后，各種學生組織開始形成。學生在來自中央的各不相同的消息的推動下自然地作出了反應，他們沿著相應的路線發生了分裂。“保皇派”或保守派，并沒有采取像工作組那樣的行動去支持某位學校領導，據推斷，他們也沒有去支持劉少奇和黨的組織。學校籌備委員會是這些學生的領導。造反的學生（造反派）則站在相反的立場上。這種分歧發展成為互相對抗的紅衛兵組織。

盡管他們之間的分界線并不是絕對的，往往隨運動的發展而發生變化，有分裂，有聯合，但各地都形成了一種有普遍性特點的參加組織的模式。地方和軍隊干部及他們的子女往往站在保守派一邊，他們不愿攻擊黨組織，而是較積極地反對其他斗爭對象。中產階級和白領階層的人，如他們自己所說，既不紅也不白，站在造反派一邊。階級出身不好的人，如參加的話，也傾向于這一邊。這些人更激烈地攻擊黨的權力機構，而對那些與他們有諸多關聯的對象卻不太攻擊。那些出身于工人階級的人分成兩派，兩邊都有參加者。

許多教師和下級干部及職員——他們并不是運動對象，既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也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形成了他們自己的派系。他們也按類似路線分派，并與相應的學生組織結盟。有時候，比如在北大，學生和教師開始都參加同一組織。最典型的是絕大多數中學或大學教師有時加入這一派或另一派，理由不是出于積極性，就是出于同情心。比如，北大教授周培源，從1972年起與周恩來一起致力于提高大學教育水平，并因此而聞名，在1967—1968年間曾積極支持北大的“造反”派。這一派與當時還算“保守的”聶元梓的紅衛兵派是對立的，而后者對黨組織的態度要比造反派溫和一些[[5]](#_5_Li_Xiang_Yun__Yin_____Zhong_G)。

階級出身好的青年控制著最早的紅衛兵組織，它們形成于1966年8—9月。工作組撤走后，批判大會變得更猛烈了。對校長、黨委書記、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批判仍在進行，而且在批斗過程中，他們常常挨打，有人向他們扔墨水瓶，還受到其他侮辱。毆打和虐待的情況在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最嚴重的事件發生在各省的中學里。在“紅色恐怖”時期，斗爭對象的數量也有所增加。這時，斗爭對象已包括階級出身不好的學生和其他一些最初未被列入的人，包括從未被實際列為右派但被認為有右傾思想的老師，或者是那些家在海外或有海外關系的人，或者是那些在海外學習過而仍然欣賞國外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人，即使他們并沒有犯什么政治錯誤。

據作者在香港訪問過的前教師和學生說，每所大中學校里大約有10％或者略少一些的教師與一些老同志一起被當作“牛鬼蛇神”對待。在辦公室和研究機構工作的知識分子也受到同樣對待。隱藏的國民黨特務和壞分子也被查了出來。在此期間，這些斗爭對象常常被抄家，因為紅衛兵要尋找資產階級財產和其他罪證。他們的家屬也受到不同方式的羞辱和虐待。婦女被強迫在洗衣板上跪數小時，頭發被剃光，要寫自白書，還常常挨打。在這一時期，各地都有關于斗爭對象死亡或自殺的報道。

有時那些未正式被定為“牛鬼蛇神”的人也受到類似的體罰。教師也參加了這場運動——不愿參加這場運動的老師，學生會貼墻報批判他們。所有教師都要作書面檢討，分析自己是怎樣推行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所有學生都參加進來，批判他們的老師，評價老師的檢討。對大多數老師來說，事情就到此為止了。一些有嚴重“問題”的，即使沒有嚴重到要召開群眾批斗大會的程度，但也受到進一步調查和審訊。在這些過程中，如果他們回答問題稍慢些，有時還會挨打或受虐待。

就在這時，由于紅衛兵沖出學校破“四舊”而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紅衛兵們找到什么反什么。舊的街道名稱被更改，“封建的”藝術和建筑被毀壞。有些學校非常嚴格，只允許階級出身好的紅衛兵上街執行尋找和摧毀“四舊”的任務。但在其他學校，雖然每人分成不同的組，卻都愿與出身好的紅衛兵一起出去。而中產階級的年青人則跟他們自己的造反派一起活動。

也是在8月，紅衛兵及其他一些人開始免費在全國旅行，以“交流革命經驗”。北京的青年走向各省，各省的青年匯集到北京。在北京，他們參加了一系列大型集會，毛及其追隨者借此機會進一步動員和指導這場運動。第一次大型集會是在8月18日，毛親自參加，并接受了一幅紅衛兵袖章，表示他對他們行動的支持。那年秋天，在免費旅行取消之前，約有1300萬青年人來到北京。正是在這種串聯中，來自各省的紅衛兵，過去不知道，現在才知道了斗爭對象的真正性質。

秋天，毛及其在高層的追隨者在中央委員會下設立了一個中央“文革”小組，把運動的焦點直接指向首要斗爭對象。8月8日黨中央《十六條決定》及8月5日毛的題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發表之后，情況就更明朗化了。毛的大字報贊揚聶元梓的大字報，批評了在工作組的50天中試圖抑制“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干部，這就直接指向派遣工作組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十六條決定》指出：“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并指出右派分子和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是運動的對象。但“方針”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6]](#_6___Ren_Min_Ri_Bao____1966Nian)

對于主要斗爭對象，毛不能單靠那些出身好的紅衛兵，因為這些紅衛兵即使不受他要打倒的那些干部的子女所領導，至少也會傾向于保護這些干部。他們很容易被鼓動去攻擊那些級別較低的校長和黨委書記；而當矛頭明確指向上邊時，他們的作用也會發生問題。因此從6月開始，毛便在暗中支持那些處于守勢，還不能與工作組和早期的紅衛兵抗衡的造反派。在北京，造反派消除了他們原先的對立，控制了10月6日天安門廣場的集會。他們鼓勵每一個人（不僅僅出身好的），都參加到這場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斗爭中來。到1966年底，隨著階級出身好的人的排他思想受到批判，忠于他們的勢力被削弱，造反派得到進一步發展。一段時期內，他們似乎控制了這場運動。例如：有些高干的孩子和其他一些開始時領導過這場運動的人站到了造反派一邊；少數人成為反對現有機構的“極‘左’分子”，另外一些人由于運動目標逐漸牽扯到自己的家人而退出。

此時運動又向前發展了一步，允許學生進一步擴大他們的活動范圍，他們可以進入機關與那里的當權派進行斗爭。于是，運動由學校擴展到工廠和政府部門；學生也參加了他們的斗爭。這時官方禁止逼供信，這在反對學術權威初期尚未禁止。但新的斗爭對象仍然受到毆打和虐待。批斗大會上最常見的是“坐噴氣式”，或強迫被批斗者在會上彎腰站著，人在后面用胳膊架著他們。

#### 奪權

到1966年底，最大的斗爭對象被揭露出來了：劉少奇是要被打倒的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運動從學校升級到黨中央只用了半年時間。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層號召工人和農民加入到知識階層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斗爭中來。上海市的一月奪權斗爭被當做官方的政策而傳遍全國，波及到各級黨政機關。造反派與當權派之間的斗爭很快在全國各省、市、縣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反復進行；結果引起混亂，精心建立起來的深入到每一個工作單位和行政單位的黨組織停止了工作。群眾運動迅速擴大，除毛和林彪以外，整個黨的高級領導層以及各地的省級領導都受到了群眾的批判。[[7]](#_7_Zhe_Yi_Shi_Qi_Shou_Dao_Pi_Pan)凡當權派得不到保護的地方，當權者就會發現他們所受到的是與早先地位較低的和出身不好的人一樣的待遇。這一時期的運動以1967年4月由蒯大富及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組織的批判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批判大會為代表。在斗爭對象受到批判并被剝奪權力之后，漫長的和充滿分歧的建立權力機構的過程開始了。

毛顯然鼓勵全國青年做他的革命事業的先鋒，但要他把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交到被發動起來的革命群眾手里，似乎絕無可能。然而，毛當初利用群眾不只是要攻擊當權派，而且是要真正把當權派推翻。一些人認為，他的這一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特征，毛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出于這一目的。當然，對于一位黨的領導人來說，允許非黨群眾以這種方式來參加權力斗爭是前所未有的。1967年1月以后，群眾在日后掌權的希望逐漸受到傷害，并產生了失望。正是這個問題使運動重又分為“保守派”和“激進派”。

但是，人們可能永遠不會了解：全國已經起來的造反力量在從當權者手中奪權后，毛究竟打算讓他們分享多少權力；毛重建政權機構的計劃最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派系斗爭和一月風暴后官僚主義的抵制。很可能，毛當初只想指出大方向，并把群眾運動引向那個方向。同時像他過去多次所做的那樣，根據“群眾運動規律”，一面沿著那個方向走，一面考慮朝那個方向發展的細節。因此，1966年8月的《十六條》確實號召建立一個以巴黎公社為模式的永久性的群眾組織——“文化革命”委員會來領導這場運動（第九條）。但一月風暴后，所面臨的任務已不僅僅是建立群眾組織的問題，而是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行政權力機構的樣式的問題。毛選擇了一條更為“保守”的道路，從而為“左”勢力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尤其是在運動的主動力到了精疲力竭的時候。[[8]](#_8_Guan_Yu_Ji__Zuo__Lu_Xian_De_Z)

1967年2月，官方的政策轉為控制一月風暴無節制的奪權活動所產生的過頭事情。中央譴責無政府主義，號召加強革命紀律性，對改正錯誤的干部實行寬大處理。毛自己也認為革命委員會比巴黎公社式的政權形式更適合于作為重建國家權力機構的形式。新的革命委員會基本上是由革命干部、軍人和群眾領袖的代表組成的三結合組織。在重建過程中，毛還讓解放軍在重建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第一個復課鬧革命的號召是1967年初發出的，從春節之后的那一學期開始。同時，1967年3月，毛指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并且參與關于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斗、批、改的工作。”[[9]](#_9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_Zho)

中央這些關于奪權后的指示，給了干部和保守派所需的機會。造反派將這些對他們不利的變化稱為“二月逆流”。“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層接受了這一定論。這股保守潮流對當權派有利。為恢復平衡，中央于3月發出警告，群眾組織的領袖在革命委員會或“文化大革命”中的支撐作用不容忽視，否則，“文化大革命”就會被否定。這就掀起了批判副總理的高潮。這些副總理與周恩來一道，想使政府各部奪權時要有節制，這就助長了“二月逆流”。

不過，此后，中央再不讓造反群眾像1966年10月至1967年1月發動他們時那樣來控制這場運動了。3月，毛命令解放軍進駐學校，表明他要對此加以控制。此后，運動的發展主要是協調和平衡各派力量之間的權力。這些力量是以周恩來為首的黨政官員、以林彪為首的解放軍、中央“文革”小組（小組成員意見并不一致），以及互不相容的群眾組織。在全社會革命委員會中建立的三結合領導班子與最高層的三位一體是相一致的。毛通過這三位一體的權力機構來操縱這場運動。同樣，1967年1月以后群眾組織的分化也反映出在權力平衡中各主要派系之間方針的不同，盡管各自繼續宣稱他們忠于毛主席。

迫在眉睫的任務很讓人為難，對每一個受打擊的干部的案子要進行鑒定，要給他或她的錯誤定性，要用毛澤東思想對他們的立場做出判斷。“好”的干部可以復職，甚至可以成為新的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很多權力落到群眾組織手里，因為革命委員會是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由于在各學校和工作單位中分成了許多派別，因此，難題是怎樣在這些群眾組織之間以及在群眾組織內部取得一致意見。群眾對近幾個月的沖突仍然記憶猶新，有時很難容忍不同派系的人坐在一起，在誰當學校新領導的問題上也難取得一致。一個組織支持復職的干部自然會被其對手否決，其對手支持的干部也會遇到相同情況。隨著不同意見的增多，個別成員可能會退出這一派而參加另一派。

根據3月7日毛的命令被派到各校的軍代表成為決定性力量，如果不是特別指派，他們本來是不參加進來的。實際上，他們的任務是要把長期不和的各派重新組成一個統一的全校性的紅衛兵組織，然后參加組建學校的革命委員會。當初的目的，是要重建紅衛兵組織，以替代從前的共青團。

但是軍代表肩負一項不令人羨慕的任務：籌組大聯合、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而所做的一切都要與中央的階級路線保持一致。對于那些出身不好的壞分子本人（并不是他們的子女），如果他們在思想和行動上不肯悔改，就禁止其參加群眾組織，甚至不能重返工作崗位當教師或干部，大家對這一規定沒有矛盾。這些人被劃歸為以前所定的“牛鬼蛇神”之列。他們被遣送回鄉，在群眾監督下接受勞動改造。而那些出身好的則應作為學校中新的紅衛兵組織的“骨干”。這一規定卻引起了緊張局面。此外，“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學生，對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一貫在政治思想上表現比較好的，也可以參加”。[[10]](#_10__Zhong_Gong_Zhong_Yang_Wei_Y)

軍隊本身就由階級出身好的人所組成，在機靈的城市青年看來，它絕對是由“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占支配地位的。他們被訓練成服從命令聽指揮，不會花點時間理智地對互不相讓的中產階級造反派的革命精神進行評估。因此，軍隊支持那些出身好的人，并不在乎他們屬于哪一派，也不管在此之前他們曾做過些什么。當然，還是那些階級出身好的人才能成為新的紅衛兵組織的領袖，討論干部及其復職問題時也只有他們的話更起作用。一般說來，出身好的人聽中央的話，中央則要對干部寬大處理，故而他們成為學校中解放軍的天然盟友。

中產階級的學生對這種階級路線的重新出現十分不滿，因為這種路線當初曾使他們不能充分參加這場運動。現在要建立新的權力機構，他們又一次被降到次要地位。他們中有些人甚至被拒絕參加紅衛兵組織。正因為如此，1967年春天，保守派與激進派才又一次分裂。兩派的分野和從前一樣主要是在權力關系上，兩邊的參加者常常不總是站在原地不動。1966年后半年，由于放寬了參加運動的條件，斗爭對象也明確了，階級界限的劃分曾發生過變化。1967年，對象被打倒后，在誰能參加新的權力機構問題上，群眾組織又發生了分歧。

與激進派不同，保守派較愿意與前當權者妥協。階級背景問題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區別，盡管這種區別不總是絕對的。那些“紅五類”分子，尤其是生于當權者家庭的，往往傾向于保守派。盡管任何一個學校都存在著不同的組織，但在保守派與激進派之間的分裂中，這些組織不是站在這邊，就是站在另一邊。在全市或全省的派系實行大聯合后，這種分裂又進一步擴大。在北京，保守的組織把自己與“天派”聯系在一起，之所以稱“天派”，是因為北京航空學院的一個組織在其中占主導地位。與之對立的“地派”，是由北京地質學院的一個組織所領導的。在廣東省，保守派團結在“東風派”周圍，而激進派追隨“紅旗派”。

但是激進派在權力對比中無法奪回主動權，除非官方政策再回到1966年后期那樣使他們處于有利地位，而這沒有發生，顯然是因為毛是不會批準的。而且，中央的態度是妥協和模棱兩可的，官方一面想要保持“一月風暴”的革命勢頭，一面要在革命中探索一種可行的力量平衡。這給各派領袖留有很大余地，使他們能從各方面操縱群眾，直到他們之間發生武斗。對于產生的分歧，“文革”小組一般站在激進派一邊，解放軍站在保守派一邊。周恩來表面上在雙方之間斡旋，實際上則傾向于保守派。

在軍隊最初進入學校對全體人員進行軍訓時，其目的是要促進聯合，加強紀律性。從某種意義上講，實現了這一目的。天津的延安中學被樹為這方面的典型。[[11]](#_11__Zhong_Fa_85Hao__1967Nian__W)軍訓可能還做了一件事，即為武斗增加了一個機會。因為正是在1967年春季到秋季，很多地區的派系斗爭才升級為嚴重的武斗。現在，運動參加者把破壞性沖突的矛頭直接指向對方。

1967年7月發生了武漢事件，地方上的保守派居然綁架了中央“文革”小組派去的調查員，江青用其著名的口號“文攻武衛”把激進派推上了舞臺。此后，他們盜用部隊的武器，不久，兩派都有了武裝小分隊。這一時期激進派情緒再次高漲，有些組織開始攻擊整個權力結構和所有的干部，不管他們是不是“好”的毛主義者。有些人甚至要求繼續徹底重新分配社會和政治權力。同時，他們還攻擊政府領導人、保守派群眾組織和解放軍。

此刻，毛又出面干預，支持溫和派。8月初，激進的“五·一六”兵團被曝光，該組織是受中央“文革”小組某些成員領導的，矛頭指向周恩來。早已策劃好的反軍隊當權者的運動被取消。9月初，江青撤回她武斗的號召。宣布的新措施清楚地表明運動的鞏固階段開始了。秋天，又宣布了重建黨和清理階級隊伍的任務。工人，而不是學生，被正式稱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學生因犯錯誤受到批判。像春天那次一樣，他們又接到回學校復課的通知。1967年底，毛以同一種調子發出了一系列指示，目的是縮小斗爭目標，重申對干部采取寬大政策，維護解放軍的統一，使不和的各派群眾組織聯合起來。

在此基礎上各省的革命委員會才最后形成。省里爭權的領袖們，包括解放軍、干部和保守派與激進派的群眾組織代表，都被召到北京。在“文革”小組、周恩來及軍隊的積極監督下，他們自己商討解決他們之間爭端的辦法。但保守派與激進派的分歧并沒有因大聯合而消失，分歧被帶進新的執政的革命委員會。

當時，激進派對由解放軍支持的日漸強大的干部—保守派聯盟來說，明顯處于守勢。中央在1968年春天發動了最后一場反右傾運動。雙方利用從解放軍那里奪來的武器進行武斗，甚至把當地駐軍也牽扯了進去。激進的爭論者當時宣稱，“爭奪政治權力的斗爭的焦點始終是關于干部問題的兩條路線斗爭”。同時，“資產階級的”干部被復職，而革命干部卻靠邊站。而且激進派群眾組織的代表正在被擠出中學的革命委員會。在這些問題的斗爭還在進行時，有些激進分子就退出了斗爭，他們預料他們這一派會成為“為革命付出的代價”。[[12]](#_12__Dui_Guang_Zhou_You_Xie_Xue)

1968年7月中央發出嚴禁武斗的命令，毛召集北京的紅衛兵領袖開會，會上他嚴厲批評他們參加內戰。[[13]](#_13___Mao_Ze_Dong_Si_Xiang_Za_Lu)學生拒絕停止內戰，毛遂親自命令工人進入學校去阻止戰斗。他送給駐清華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巴基斯坦芒果被作為是毛支持工人進入學校的標志而傳遍全國。在學校，他們與解放軍一起制止武斗，并領導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還組織大家進行了大量的政治學習，做了許多毛澤東思想宣傳工作。清理階級隊伍的目的是要對這次群眾運動作最后的永久性的結論。

官方指明要正式撤職的對象，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黑五類”，如果必要，他們會受到懲罰。可是，每人都要受審查。所有的老師都要進行最后一輪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評價他們在運動期間和以前是否符合現在已拔高了的毛主義的標準。盡管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公平的，但到1968年后半年，由于新的革命委員會強調階級出身，工人和解放軍也進駐了大中學校，因此新出現的權力均勢不可逆轉地倒向保守派—干部一邊。[[14]](#_14__Wen_Hua_Da_Ge_Ming__Gong_Gu)

#### 鞏固階段

1969年4月的第九次黨代表大會肯定了這些發展。大會宣稱，作為政權機構的各省革命委員會已勝利建立。但革命還沒有結束，因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不會因奪取政權而消亡，還要繼續進入斗批改階段，還要“把上層建筑領域里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會議報告強調全國各單位的斗批改應分以下幾個階段進行：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開展群眾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鞏固黨組織，精簡行政機構，讓知識分子下去參加勞動。為把革命進行到底，當前必須貫徹執行毛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發布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決定”中規定的無產階級政策。[[15]](#_15_Di_Jiu_Ci_Dang_Dai_Biao_Da_H)

因此，“文化大革命”或多或少按毛最初制定的路線發展著：先奪取政權，然后利用它來改變上層建筑以適應他的路線。斗批改的主題是重申群眾運動的必然性，它貫穿于從“十六條”（第一條）到毛1967年3月關于派軍隊進駐學校以及從九大直到1970年初的整個過程。教育革命的政策路線作為整個運動的一部分，也同樣一開始就包括在1966年6月招生制度改革的決定及8月的“十六條決定”（第十條）中。

根據這兩項政策聲明，教育制度應該徹底改革。應設計一種大學和高中招收新生的新辦法，因為現有的辦法不能從資產階級考試制度的固有模式中解放出來。新的挑選方法應以推薦和無產階級政治為基礎，以使工人階級出身的青年有更多的機會升學。另外，教學、考試及升學等一切安排都要與教育內容的改革同時進行。學習的時間要縮短，課程要少而精。雖然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但是他們也要兼學別樣，如工業、農業知識及進行軍事訓練。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還要進行研究。

教材要簡化，新教材要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進行編寫。所有學生，從小學開始直到大學，都要學習毛的著作。這場更大的階級斗爭范圍內的徹底革命，要消滅資產階級權威在思想領域的一個重要力量基礎，要把精神貴族滋生地與他們的堂皇氣勢和世襲寵物一起摧毀。[[16]](#_16___Ren_Min_Ri_Bao____1966Nian)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

#### 毛主義者——紅衛兵對教育的批判

當教育改革在學校里展開時，就以這些原則作為這場運動三個階段（斗爭、批判及改革）的基礎。如前面所指出的，黨組織當初是想把運動集中在知識分子問題和教育改革上。[[17]](#_17_Zhe_Yi_Shi_Qi_Dui_Zhou_Yang)由于運動逐步升級，脫離了黨的控制，毛的教育原則于是就為批判教師及斗爭對象提供了基礎。在批判斗爭對象時言辭變成嚴厲的指責，仿照官方媒介的爭論路線，要“揪出”學術界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因為滋長精神貴族的溫床，就掌握在他們手中。

實際上，當時教育制度的改革問題已退居幕后，因為紅衛兵轉向社會，到處打擊當權派。教育改革本身是屬于運動鞏固階段的事。因此，不得不等派系沖突降溫。第一次“復課鬧革命”的號召是在1967年發出的。小學在2月春節后開始復課。中學教師和學生3月1日也接到通知，停止外出交流經驗，大學生被命令在3月20日前返校。[[18]](#_18_Gen_Ju_1967Nian_2Yue_He_3Yue)此后碰到的困難前面已有闡述。

然而，1967年秋季那個學期，在中央再次號召全國所有學校應立即復課時，一些派性沖突不嚴重的中學確實恢復了學校生活的原狀。[[19]](#_19___Jiao_Yu_Ge_Ming____1967Nia)在軍訓和學習毛澤東思想之間，組織學生批判他們的教材和學校體制其他方面的特征。1967年底，第一批高中學生畢業了，要第一次分配工作。1968年春那個學期，許多學校開始招收“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的第一批新生。老生先做新生的班長，然后逐漸被分配出去，大部分在農村或國營農場工作。對大學生的遣散工作到1968年才開始。1965年和1966年的畢業生在1968年得以分配工作。讓他們去的地方是“山區、農村和邊疆地區”。1967年和1968年的畢業班，根據國家政策，統一去軍隊農場勞動一年或更長時間之后才分配工作。從此結束了學生時代動蕩的紅衛兵生涯。

但他們對1966年以前的教育制度留下了詳細的帶有一定偏見的批評意見。由于這些批評意見基本上是1967—1968年遣散階段的產物，在紅衛兵組織重新統一以前，這些意見反映了他們所處的不同組織之間的利益沖突。在清華大學，斗士們仍沉浸在爭斗中，改革教育的號召遭到兩派領袖的抵制。他們爭辯說，權力是關鍵問題，在哪方控制學校的問題解決之前，討論具體改革是無任何意義的。

在廣東，保守派很快響應中央號召集中精力進行教育改革。激進派起初抵制這一號召，說這是保守派要阻止深入進行大革命的花招。他們繼續專注于其正在喪失的權力爭斗。一旦教育改革真正成為下一件要干的事，雙方便想從不同角度來解釋它。例如，由出身好的人領導的保守派，強調教師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對1966年前的修正主義路線負責，他們歧視工人和農民。由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領導的激進派則譴責當權者而不是教師，并把焦點放在他們主要的競爭對象——干部子女所享受的特權上。但是，不管看法如何，這些批判基本上是在中央指導下進行的。因此，從整體上看，它不僅提供了毛主義者對1966年前教育制度的詳細看法，而且指明了未來的新方向。

延安經驗與國民黨遺留的制度 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抗大）被捧為培養大批革命干部的無產階級教育典范。1949年以后，教育戰線面臨著一種選擇，是沿用延安的經驗來改造國民黨的教育體制，還是相反。據說毛贊成前者而劉少奇支持后者。劉與修正主義分子誹謗抗大式教育是“不正規”和“過時”的，是干部的品德教育班，是不適合全國采用的。

蘇聯的經驗 于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求助于蘇聯。教育制度、課程設置、教育內容、教學方法、考試方法，一切都照搬蘇聯的。有些走抗大路線的學校被重新組成“正規”大學。1949年以前老解放區發展起來的教育風格和形式也因此而消失了。

“大躍進” 1958年，毛發動了一場教育大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教育的壟斷局面被打破了，他們所領導的教育制度被當成封資修的混合體而受到批判。但毛的反對派攻擊教育革命中提出的具體政策和措施，稱之為“偏向”，并在60年代初開始把教育制度恢復到1958年前的樣式。實際上，1960年以來凡未經毛親自批準的教育上的每一步發展，都被重新解釋為偏離了毛的正確教育路線，而劉少奇被認為是反對毛路線的領袖。

領導權 毛的反對派鼓吹取消學校中黨支部的領導作用，把黨降為監督者的角色。領導權應交回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中；解放那些戴帽右派；尊重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工作的一切知識分子。

教育雙軌制 自60年代初以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的領導人將注意力放在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培養上。因此，他們重視的是各級正規的全日制學校。“大躍進”時為發展教育而建立起來的半工半讀學校大多數被關閉了，尤其是在農村。同時建立的校辦工廠也被關閉了。但是，當劉在1964年明白他不能超越毛改革教育制度的指示時，開始提倡“兩種教育制度”，把它作為戰勝毛路線的一個方法。劉（原文為“林”，有誤——譯者）的策略是在不改變全日制學校的同時，把毛對勞動鍛煉和實踐鍛煉的要求轉到半工半讀上來。其結果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雙軌”制相同，一種是天才和富人的教育，一種是勞動階級的教育。

重點學校 這些學校被說成是寶塔形，有級別，有層次。據說劉擁護具有舊時塔式形態的教育制度，在塔的頂端是重點學校，每上升一層所容納的進行研究和思考的學問人就越少。只有具有最高學歷的人才能占據最高位置。與此相類似，只有相當少的“最好的”學生才能在寶塔式重點學校學習，這些學校的環境是新建的且耗資不小。同時，普通學生要在普通學校學習，工人和農民有時無學可上。

社會成分 重點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公開了學生的階級出身。不同的組織根據自己的家庭出身將其批判放在不同的方面。但最后結果是相同的：重點學校中出身于干部和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最多；出身于工人階級家庭的青年占少數；出身于農民家庭的幾乎沒有。這種階級構成是優秀學業成績和好的階級出身雙重標準結合的結果。這個雙重標準在1966年以前不同程度上適用于這些學校的招生工作。在大學這一級，1958年和1959年根據推薦制度招收的工農學生被開除或退回，最終被清理。這是因為根據60年代初實施的更為嚴格的標準，他們跟不上功課。

教學方法和內容 毛以其多次引用的1964年春節講話為開頭的評論，親自為這個領域內的批評定了調子。后來，他也批評了學究式和不切實際的大學教育。他建議包括學校行政人員、教職員工和學生在內的每個人應當到農村去看看土地和人民。紅衛兵批評家詳細闡述了這些主題。教學方法以填鴨式和死記硬背課文為基礎，學生們從小學開始起就被鎖入考試的生活中。在此教育制度下，他們必須“關起門來”學習，脫離生產和實踐。

學習的目的 在政治和實踐受忽視的學校，主要目的是學書本知識，學生們肯定要死抱住分數、升級率和升學不放。這種教育制度以這種方式控制著學生，并將他們納入這種制度中。學生們最終被自私的目標所驅動，而不顧政治或社會目標。學校自身也會是這樣。采取一切策略提高及格率，而犧牲差分學生利益，目的是為學校贏得榮譽。學校里成立了特殊重點班；學生們按成績好壞分了開來；勸說分數低的學生在畢業之前退學，以便不影響學校的升學率。正規全日制學校的情況當時就是這樣。因此，學校的入學、考試和升學制度時刻受到萬一失敗就升不了學的威脅，這是“資產階級對教育實行專政的工具”，還把工農子弟排除在學校之外。這種學校是具有很高學術水平的最優秀的和最有經驗的教師的天堂。這些教師把他們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傳給了以后的各代學生。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理想的情況是，這一措施是有助于實現縮小城鄉差別的社會主義目的之途徑。現實中，這是對正規學校制度的補充。“最優秀”的城市青年上山下鄉了；品行、學習和階級出身不好的青年則在上完初中之后被送往農村，結果，甚至連農民都看不起他們。

毛的反應 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造完成之后，中央委員會內部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傾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就是其中的一個部分。這恰好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日益發展的修正主義傾向相吻合，為防止中國改變顏色，毛發展了其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理論及繼續革命的政策方針。毛把爭奪青年一代的斗爭視為“最重要的問題”，并斷言中國的年輕一代必須在階級斗爭風浪里經受革命鍛煉。在毛1964年春節講話發表的評論以后，他還親自發出許多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種制度，能消滅三大差別，即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差別，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差別。但僅僅改革課本和教學方法是不夠的。相反，必須“徹底批判和消滅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確立毛主席的教育路線，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及作為其一部分的教育革命是毛最終選擇為實現其目標的工具。[[20]](#_20_Ci_Ping_Lun_Shi_You_Xu_Duo_L)

#### 毛的改造：使全國采用延安經驗

1967—1968年間，官方報刊上搞教育革命的建議如潮水般涌來。大學、中學和行政區均被要求提出各自的建議。在這等毛澤東主義教育原則鼓舞下，在新匯編出版的毛關于教育的語錄（同樣體現了毛主義教育原則）的鼓舞下，[[21]](#_21_Li_Ru____Mao_Zhu_Xi_Jiao_Yu)它們很快把先前對1966年以前教育制度的批評來了個180度大轉彎，變成為改革開出良方。這些良方是試探性的和實驗性的，要在“革命實踐中進行試驗”。有幾個建議被選作典型和樣板，這暗示著它們特別為官方所稱道。

這個試驗的顯著特點是地方分權和彈性很大，盡管它總是在毛的教育原則的范圍之內。因此，如同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目的一樣，不能確定毛打算把最初提出的最激進的建議保留下來的程度，也不能肯定這些建議因70年代初遭到非常明顯的抵制而逐漸受到破壞的程度。似乎最可能的結論是，毛的用意僅僅是指引大的方向，開始時把它引向極端是為了保證發生他所期望發生的變革，讓運動發展來解決問題，他認為不時通過他必要的干涉，就能使發展中的教育制度按他所制定的路線發展。

應當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相互對立的紅衛兵被稱為“保守派—激進派”，但這稱呼意思與這些紅衛兵使用它們時的意思幾乎完全相反。因此，干部、軍隊及工人組成的“保守派”領導聯盟卻負責在學校中實行“激進”的教育革命。與此同時，前造反派和激進派又保守起來，對改革進行抵制。新激進派在中央的核心中央“文革”小組經1968年“左”派被清洗后，剩下的人由江青借用毛的名義領導，后來成了激進的“四人幫”及其追隨者。一致起來反對他們的是前知識分子造反派如周培源等人。他們受到周恩來支持最終與“文化大革命”主要靶子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結成同盟。

1968年以后出現的新教育制度從來沒有全國范圍的官方統一標準。在許多方面，其“試驗的”性質一直持續到1976年秋。結果該制度只是臨時性的，幾乎年年變化，細節上各地也不同。這也使觀察家們很難區分哪些變化是在中央方針精神允許范圍之內的，哪些變化是超出中央允許之外的。然而，中央方針規定了新的教育制度的基本參數。

領導權和管理權 公開宣布的目標是要打倒舊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統治。1966年，教育部和高教部在全國范圍內停止工作。如果回顧一下1944年的延安整風，以前教育官僚部門的權力也曾受到類似的限制。制定教育方針的職責被中央“文革”小組及其專門的教育委員會所接任。1972年，國務院下設科學和教育組。教育部直至1975年方恢復工作，當時其全部工作人員加起來僅有大約300人。

教育的行政管理被分散下放到省和省以下教育局。例如，大學里由國家教育部規定的統一課程、課本和教材都被廢棄了，各校設計自己的課程并準備自己的教材。中小學里，全國統一的課程和課本也被廢棄了，準備這些材料的責任被下放到省和省以下教育局。省市甚至公社決定學制長短、課程和學習計劃，而以前這是由中央決定的。高等院校入學統考也被廢除。大學的招生權轉移到了投考人的工作單位。中學畢業生不能直接上大學，而需要先工作一段時間，這樣，上大學的權力就給予其工作單位了。

在縣一級，國家教育部門賦予縣教育局的權力也被下放了。鄉村小學由公社生產大隊管理；現存的鄉村國辦小學亦要移交生產大隊管理。中學也由公社和生產大隊管理。

在實踐中，這意味著管理責任雙軌制。根據該制度，教育領導權由縣教育局和所在地聯合行使。例如，國家資金以不同方式在縣里各學校之間分配，然后由地方集體財政補充。地方投入資金，地方上的人就有權力或權利來聘用、解雇和調換教職員工。但該權力也是以不同方式由各方分享，因為典型的鄉村小學一些教師是通過教育局由國家委派和發給工資的，一些則是當地雇來的，并從生產大隊收入中以工分形式付給報酬。這實際是原“民辦公助”模式的或民辦學校模式的改頭換面——現在，其性質是集體的，國家給予幫助。

正規教育部門在各個學校的作用由革命委員會替代了。如人們所注意到的，最先的革命委員會是在干部、群眾組織和軍隊或民兵代表結合的基礎上組成的。紅衛兵這一代被擠退后，軍隊一般就從學校領導層至少是較低一級的領導層中退出。其在中學革命委員會中的地位及其作為紀律和秩序維護者的作用由工宣隊繼承下來。城市學校里的工宣隊直到毛去世后才正式撤離。農村學校中農宣隊更是個形式，往往只是臨時的。地方領導權在任何時候均由生產大隊黨支書和公社黨組織直接行使。

的確，在70年代初共產黨組織生活恢復后，學校黨支部及其革命委員會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它們構成一種統一領導的形式，整個教育系統從上到下都是這樣重復的。正是為了加強教育工作，70年代初，各級黨的第一書記均要負責教育工作。根據一條材料，毛親自“建議”，省、地、縣級黨的書記要主管教育。[[22]](#_22_Jiao_Yu_Bu_Gao_Jiao_Ju_Dai_B)

在各校，領導權的統一是通過在兩種機構中同時任職這一常見做法而取得的。學校黨支部的領導成員通常是校革命委員會成員。工宣隊隊長肯定是黨員，并同時在黨支部和革命委員會任職，作為該兩個機構的工人代表。學生群眾代表不久即被從革命委員會中趕出。紅衛兵學生領袖在畢業離校后沒有人接替他們，其群眾代表的位置被運動中或以其他方式表現積極的青年教師所替代。但這些群眾領袖很快就被吸收入黨，因此，他們以非黨員身份呆在革命委員會里的時間并不長。事實上，建立了許多不同形式的三結合，而革命委員會總是與黨支部緊密結合在一起。

至于干部代表，他們經常是從同一城市或縣里的其他學校調來的。這是為了避免某領導在回到其原來受到群眾批判的學校時會發生的尷尬而這么做的。不過，干部生活及工作的等級秩序本身從未被打破過。在運動的高潮時期，當權者蒙受了巨大的人身侮辱，還必須從事卑下的體力勞動。而一旦作出恢復其職務的決定，大多數情況下，都會分配給與其原來職務相當的工作。整個教育系統都經歷了這個過程，1973年鄧小平復出時，國家教育部門也經歷了這個過程，并被當做樣板。

“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在鞏固時期受到了比前當權者更為有效的限制。舊知識分子中那些被視為死不改悔的黑五類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被解職了。每個學校中這種人充其量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更多的是構成教師“骨干”的那些人，這在好的重點學校尤其如此。他們一般是有經驗的老教師，自己不是地主或資本家，但往往有糟糕的階級出身或者有某些給其政治履歷蒙上陰影的問題。這些教師一般被委派至新學校或被送到附近農村學校以加強其師資力量。他們把自己視為教育數量和質量并重這一新政策的“犧牲品”。[[23]](#_23_Guan_Yu_Zai_Mian_Lin_Qiang_D)

在這些改革的影響之下，教育行政管理中至少因此同時發生了三種相關的變化。其一是教育部門的權力下放；其二是人員非專業化，這是由于知識分子權威被打倒，由于前當權者的權威現在一部分被來自教育界以外的領導（即工人）削弱，另一部分被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年輕積極分子削弱。這個情況被概括為外行領導內行。第三個相關的變化是地方集團特別是當地黨組織對教育的控制加強了。因此，非職業化情況出現時，首先是在當地黨組織領導下采用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最初看起來要旨在減少黨的控制權范圍、遵從群眾的控制權，而1968年以后的變化實際上加強了地方黨組織對教育的領導。

這些變化遵循了延安的改革精神，而其目的是促進適合于各地生活和工作的一種教育制度的發展，但未將不同類型的學生明確分成兒個等級。靈活性是新制度的特點。在前幾個階段迅速發展和改革的時期里，在不斷變化的同時，正規學制或多或少地還像以前一樣在運轉。而在“文化大革命”10年的改革時期，整個教育制度被卷入運動之中。

中小學這兩級的數量和結構變化 全日制與半工半讀制學校之間的兩種體制的差別被廢除了，各種形式的特殊教育和尖子教育，包括重點學校、干部子弟學校、只招收女生或男生的學校、華僑學校及專為少數民族開辦的學校也被統統取消，大多數變成了就近上學的普通學校。這促進了共同發展，即全國性的學校發展計劃在這一時期得以持續下去。初中以上入學統考被取消了，學生就近入學。在小學尚未普及的地方要努力實現小學普及教育。上述地區主要是指農村。城鄉中學教育都有了發展。

人們重溫并經常引用毛1944年的一個講話以促進農村地區教育的發展：“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規的小學、中學，而日要有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學、讀報組和識字組。”[[24]](#_24_Yuan_Wen_Chu_Zi_1944Nian_10Y)因此，人們不曾努力去完全消除正規和非正規的區別。現在對“雙軌制”的批評不應太從字面上加以解釋。受到摧殘的是國家教育制度將學習分成固定的等級，而不是不平等，或學制不正規。

如同所指出的，70年代初普及農村教育的主要方法是采取民辦公助方式。發展教育的壓力來自上面并經黨的領導。但生產大隊和公社興辦學校，雇用足夠的當地老師，經常依靠下鄉的城市青年補充師資隊伍，并提供管理機構以維持農村學校網。而且，民辦公助方式依地區的財力不同及國家教育預算的大小而差異很大。該方式的變化和差異性質本身就是發展程度的標志。

因而，對“非正規學校”的偏見，例如60年代初地方反對辦農中，實際上一直存在，并在某種程度上對民辦小學也是如此。正如實際上50年代后期興辦的城市民辦學校很快不是被關閉便是被并入發展中的國家教育制度一樣，似乎有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即農村民辦小學在可能的情況下，也要求得到國家日益增多的支持。根本沒有學校時，問題也就不會產生。但當發展到學校不僅分布廣而且人們普遍接受小學統一學制的程度時——這本身就是過去30年發生在中國農村的一個重要變化——那么，要求平等的呼聲便出現了。人們的這一要求至少以下述方法表現出來：對明顯不好的替代辦法缺乏熱情。家長對上中學的性價比計算起來，感到復雜時，他們寧愿沒有學校也不要差的農中。在小學一級，農民愿意支持差的民辦學校，但并非不要求增加國家支持的數額。

因此，在廣東部分地區、在福建、在上海郊區，合適的方式可能是“國家興辦、集體支援”。據被采訪者——主要是這些地區以前的教師——告，許多農村小學到70年代中期已經主要由國家出資。不過，即使在這種學校，也總是要收學費，這多少會對教育預算起點兒作用。生產大隊主要是負責大隊雇用的教師的薪金，補充不足的房屋和設施保養費用。

在北京郊區某公社，據某前任教師說，甚至當地雇用的教師的薪金都是從國家下撥的教育預算中支付的，大家認為小學是“國辦”的。這個提供消息的人說，他一直認為民辦學校不過“只是用來為報紙作某些宣傳用的”。他和他的妻子兩人都在離北京或遠或近的幾個郊區公社工作了近20年，從未碰到一個民辦學校。按照更為“經典”的說法，人們的眼光應該放到教育更不發達的省，如云南和新疆。在那里，人們較容易見到公社和生產大隊自己興辦學校，并完全用集體收入辦學。不過，鄉村小學最普遍的方式是在國家資助的大范圍內，地方集體籌資和管理。正是這一方式和其他旨在提高入學率的措施一起，使得官方聲稱到“文化大革命”10年結束時小學教育“幾乎普及”，使95％的學齡兒童（或1.5億學齡兒童）入學。[[25]](#_25_Cai_Fang_Jiao_Yu_Bu__1977Nia)

被采訪人說，初等教育唯一沒有得到發展的地區是福建南部的華僑區。“文化大革命”10年間，華僑的資助大部分停止，招生人數不一定下降，但學校數目卻下降了。泉州地區的某些公社，實際上每村都有學校，近一半學校由東南亞華僑資助興辦和維持。由于來自個人和家族組織的慷慨捐助，這些學校經常提供免費上學。華僑資助方式持續到1966年，并在70年代后期又恢復了。

這些學校被認為是舊私立學校和家族學校的現代翻版，并不被視為民辦或集體籌資的學校。這些有外來資助的學校是一般規律中的例外。如果有選擇的話，地方社區寧愿完全由國家興辦學校，而不是當地資助的學校。海外愛國僑胞的資助非常慷慨，據說，他們資助的學校，特別是在1976年以后的恢復階段，有時比地方重點學校的設備還好。

“文化大革命”10年期間，農村中學招生人數的主要增長部分也歸功于民辦公助方式。一般做法是，根據官方的指導方針，將初等教育從六年減為五年，然后把為期一兩年的初中班轉到現有小學去作為它們的畢業班。不過，在公社中心區建立的正規中學通常主要是國家出資辦的。官方聲稱的招生人數的迅速增長（見表29），已被所有被采訪者所確認。據廣東、福建、浙江和山東的老師說，各公社正規中學至少必須達到所規定的四或五年制標準。云南遠遠落后于這個標準。上海和北京郊區1966年以前已大大超過該標準，并在現有基礎上得到了發展，修建了足夠的新學校以達到普及初中教育。到“文化大革命”10年結束時，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和廣州）已經達到普及十年中小學教育。

表29 小學和招生人數



a：官方在80年代初發表的“文化大革命”10年統計數字與在其他資料來源中較早提供的統計數字大抵相同。后來官方編纂中一個混亂的來源是未分清學年和日歷年的區別。表中所見的后來的統計數字和較早發表的統計數字之間的比較，見蘇珊娜·佩珀：“毛以后的中國教育”，《中國季刊》1980年3月，表6。一個主要的未解釋的差異出現在1965年的數字中。世界銀行的數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第3卷第134頁）表明，是682000個小學而不是所引資料來源給的數字1681900個小學，是所招收年齡組的70％，而不是84.7％。但在校學生人數和引用該數字的所有資料來源中的人數相同。資料來源：1949—1979年學校數字來源于《中國百科年鑒（1980）》，第535頁。1981年學校數字來源于1982年同一出版物，第568頁。1949—1965年的學生人數和年齡組來源于《北京周報》第5期（1978年2月3日）；1966—1981年的學生人數和年齡組百分比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441頁。1982年的學生人數來源于1983年的同一出版物，第511頁。1976—1977年底的數字“95％”以上是1977年7月19日教育部的一個代表與作者會見時與1.5億小學招生數字一起給的；又見《中國季刊》1977年12月第72期，第815—816頁。年齡組“93％”的數字來源于《中國社會廣義經濟的發展》第3卷，第134頁。

中小學的內容和質量 隨著群眾教育的發展，教育質量下降是不言自明的，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事實上，當地雇用教師、縮短學制（依地方決定，中小學從12年減為9年或10年）、減少課程這幾項因素合起來使教育的迅速發展成為可能，這自然對教育質量有不利影響。這一時期的格言可能也出自于延安時代：“反對千篇一律”，不必擔心“標準不一致”。既然如此，有的學校當然辦得比其他學校要好。影響教育內容和質量的主要變化情況如下：

主要用來決定入重點學校的小學入學考試被取消了。城鄉中學入學統考也被取消了；學生就近入學。但凡是在這種學校制度尚未普遍實行的地方，各學校通常實行入學考試，并將其作為招生的標準。

不僅重點學校制度遭到取消，而且各種形式的所謂“尖子”教育，諸如把學校的學生按成績分班的做法也受到禁止。同樣，也禁止讓學生留級的做法，但過去的教師指出，學生留級的情況仍然普遍存在，盡管這種做法僅僅是個例，而不是有明文規定的做法。

為適應縮短了的學制，課程與教材被壓縮、簡化和修改了。在此過程中，越來越多地強調實踐知識、政治和勞動課。物理、化學和生物這種課被全部修改以強調其在工農業中的應用。地理和外語常常是迅速發展的教育的受害者：教師缺乏，往往不可能開設這些課程。政治課有時和語文合并在一起上，因為它們通常使用同樣的教材（毛的著作）。到70年代中期，中學生每學年要參加約兩個月的體力勞動。因而，每個人實際上都在接受某種形式的半工半讀教育。更早的幾年里，學生們更多的時間花在了勞動上，因為要經常為興建新學校和其他地方項目而貢獻勞力。

為消滅20世紀50年代以來繼承下來的“分數掛帥”的方法，改革了教學和考試方式。教師們要設計更為靈活、非正式的教學和考試方式。所有被采訪的人都說，整個時期，期中和期末考試繼續進行，但嚴格的考試生活被有效地打破了，學生們往往都能通過考試關，一年一年地升級而不論其成績如何。但是，如個別學生需要留級，只有學生和學生家長同意這樣做才行。[[26]](#_26_Ye_Jian_Qiao_Na_Sen__Ang_Ge)

第三級 （似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所屬或與它們有關聯的學校，招收高中畢業學生入學——譯者）在第三級應用延安精神有更為嚴重的后果。1976年以后就“文化大革命”對教育的影響作的最有力批判也在這一級。多數第三級學校至少4年不招收新生。教師們被送到農村勞動，接受再教育。這些學校自1970年恢復后，他們才逐漸返回。當然，他們就像教育系統里的其他單位一樣，同樣的原則對他們也適用。

大學生的課程量從4或5年減到3年左右。課程內容被縮減和簡化了，重點強調實際應用。[[27]](#_27_Ru_Tong_Qi_Ta_Liang_Ji_Yi_Ya)甚至那些沒有參加“文化大革命”后期（1974—1976年）雄心勃勃的開門辦學教育實驗的學校，在校生的課程也表明被減少了近一半。課程修改了，所謂“適當的技術”也變了。原來的問題是一個不發達國家資源少得可憐，有能力用最先進手段對精英進行培訓否；如今在中國，這個問題就變成：不發達國家完全沒有這種培訓也行。

就教育革命的目的而言，為完成整個教育制度的改造，同樣重要的是要有相應的社會變革。所有的年輕人在離開中學以后，特別在上大學之前都必須參加體力勞動。這意味著，由于缺乏足夠的城市工作崗位，多數城市青年不得不接受在農村的工作分配。全國入學統考被取消了，正如已提到的，報考人是根據其工作所在地的推薦而遴選的。

這些變化對中國知識精英的傳統是明顯的打擊。其目的是建立結構和內容上更為平等的高等教育，不僅為工人和農民創造更大的受教育機會，而且產生出新型工農知識分子。這個目標明顯地超出了“文化大革命”前大學擴大招收工農的目的。強調教育制度性質本身必需改變，是基于這樣的假想：受過常規教育的工人、農民甚至革命干部子弟，可與其他人一樣容易進入知識精英之列。

此外，盡管招生方式改變了，以上這些類型的學生可能被大學錄取這一早期的設想看來并不完全正確。[[28]](#_28_Su_Shan_Nuo__Pei_Po___Jiao_Y)這一結論基于下面的材料，即70年代初大學招收的新生集中在被送到農村的城市青年中。后來與前農村教師的交談得知，這一招生模式并未統一遵循。此外，新的完全中學過多，這到70年代中期開始對農村學生進大學有利。這在恢復全國高等學校入學考試之后以及在開始關閉新的公社高中之前的1977年和1978年就看得很清楚了。來自這些新學校的農村學生的確上了大學，盡管一般是由不怎么有名的教師培養出來的，又上了一些農業課。公社和生產大隊干部的子弟似乎在這些農村大學生中占了不適當的比例。

在精英層，高干——一旦他們自己的政治問題得到解決——的典型做法是設法操縱有利于其子弟的入學方式。但白領中間階級（包括知識分子在內），其子弟在1966年以前與干部子弟在大學后備軍里平分秋色，這時則缺乏必要的地位優勢和好的階級出身優勢。他們的子弟在大學招生推薦制度下似乎是敗方。[[29]](#_29_Guan_Yu_Da_Xue_Zhao_Sheng_Ge)

逆流 毛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發動紅衛兵，以使其反對派名譽掃地。人們注意到這與以前的群眾運動有類似之處。“文化大革命”的不同之處在于靶子是執政黨自身。對毛而言，過去可以同聲名狼藉的地主階級進行妥協。如今再不需要。如果必要的話，他可使資本家甚至知識分子循規蹈矩。但黨的最高領導不能完全抹掉，可以推測，毛從未想過這么做。因此，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受到批判的各級各部門的干部1970年后就被“解放”了。很明顯，其設想是，這些人（其中以鄧小平為最突出）已經經歷了再教育和被改造過。

在教育界，情況不是如此。這到1973年已顯而易見。1972年，周恩來憑其威信要求提高高等教育的標準。周培源教授1972年10月6日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文章把這個要求公之于世，表明他有上層的支持。既然如此，它不會是無根據的要求。正是在1973年，提高教育標準的運動加快了步伐。那年夏天，各省實行了大學入學統考。這一新動向被激進分子視為企圖復辟資本主義，是由學術界及其政治靠山推動的復辟舊的教育秩序的“逆流”。

這引發了反潮流運動。此次運動是由遼寧省一名叫張鐵生的知青考生寫的一封抱怨1973年考試不公平的公開信而發動的。斗爭后來和批林批孔運動結合在一起。以后兩年，當學生們被再次動員起來在兩條教育路線斗爭中進行戰斗時，行動主義復活了。宣傳媒介在全國突出介紹以張鐵生的方式反抗其教師的學生。

在中學一級，行動主義往往變得具有破壞性。砸學校玻璃是一項廣為報道的消遣。來自一些而不是所有地區的當過教師的人回憶，正規的課堂活動再次被徹底破壞，隨便不上課，以示造反。與此同時，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開展了雄心勃勃的開門辦學和半工半讀教育實驗，使大部分學生在1974—1976年期間的一段時間內有幾個月離開校園。其他大學也如此。

不過，1975年初，周榮鑫被任命為1966年以來的第一個教育部長。從北大年底關于他的大字報上看，他任期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批判教育革命所推行的極端性上，特別是針對上層。他的觀點和鄧小平的觀點一致，鄧的觀點這時也廣為傳播并被激進分子貼上“毒草”的標簽。然而鄧和周的觀點本身并不極端。它們與過去幾個發展階段遵循的關于發展的觀點相類似。他們關心的是標準太低；教育僅僅與現在而不是將來的需要相聯系；大學不參與理論和科學研究；以及只要知識分子還被嘲笑為“臭老九”，就不能好好地工作。[[30]](#_30_Guan_Yu_70Nian_Dai_Zhong_Qi)

## 否定教育革命

1977年8月，就在毛去世一年以后，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兩個月后（在10月21日）宣布恢復全國高等院校入學考試。前10年產生的教育制度從而被摧毀。但這種全盤顛倒由于來得突然而讓人多少有些驚訝，因為它和在此之前的批判沒有直接關系。在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幫”后的一年多的時間里，官方在批判時對他們有關教育戰線的兩項主要指控似乎遵循了1975年溫和的批評路線。“四人幫”把黨的政策推向極端，并要利用教育作為其奪權的工具。“四人幫”的對手似乎不愿承認他們可能實際上正以“四人幫”在垮臺之前的論戰中所使用的方式把兩條路線斗爭的現實繼續到底。當然，在早期對“四人幫”的批判中，還沒有追究“文化大革命”或伴隨著它的教育上的變化的直接的責任。

但是，兩年后，情況明朗了，用1980年中國某大學一位領導在采訪時的話說，“文化大革命”被“完全否定了”。這時，整個十年的正式問題對研究中國教育問題的外國人還沒有公開。兩條路線斗爭不再存在，只有一條路線。這條路線在1966—1976年“十年災難”期間受到嚴重破壞，現在已恢復到其合法狀態。毛由于起了促使災難發生的作用而受到官方的批評。劉少奇和所有“文化大革命”的斗爭對象一起被宣布無罪。至少就不直接與國家安全相關聯的活動的各個方面而言，階級路線的政策被放棄了，理由是階級出身問題對1949年后生長的各代人不再適用了。敵人還存在，但他們是新的政治敵人，如死不悔改的激進分子，他們被嘲笑為來自“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保守的”毛主義的當權派（原文如此——譯者）。

教育方面，權力又回到學術權威手中，并集中在教育部領導的國家教育官僚機構里。教育部的人員到1980年為止很快從約300人增至500—600人，接近60年代中期700人的數字。[[31]](#_31_Su_Shan_Nuo__Pei_Po___Zhong)大中小學的課程、課本和教材在全國范圍內重新統一了。在教育的重新集權化和把權力交給內行的同時，又宣布了把黨的作用減小為監督者和保證者這一目標。然而學術自主的程度仍不清楚。因為這個新目標與吸收更多的知識分子入黨的新要求聯系在一起。

內行們權力恢復了，他們著手恢復“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并決心要對“群眾運動規律”作出合乎邏輯的結論。對“文化大革命”前政策、結構、名稱及象征——甚至在一些其教育價值被顛倒了的最有爭議的問題上——的恢復是系統而全面的。看來，所發生的與其說是以務實精神尋找最合理的教育發展形勢，不如說是為了在政治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實驗。在那10年里受到批判的每件事情均被宣布無罪，那時提倡的任何東西后來均名譽掃地，而不考慮“客觀”原因和社會原因。情況后來很明顯，不論在批判時對細節多么夸大，的確存在與權力斗爭相聯結的政策分歧及代表兩種不同發展戰略的分歧。

在兩者斗爭的過程中，情況也變得很清楚：每種發展戰略都以自己的方式發展，對教育發展的普遍問題作出反應，都有自己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但每種戰略都同樣沒有很好地解決每個問題。看來最好最合理的辦法就是，明智地把它們摻和在一起，這樣無疑會有最好的效果。可是，由于政治斗爭如此劇烈，兩種戰略要取得任何實質性的統一，看來似乎不可能。因此，毛以后的教育部只愿在沒有風險的領域和次要問題上作出妥協。

#### 小學教育

毛以后的政府公開批評其前任的平均主義思想。新領導人認為，唯物主義和發展過程的邏輯決定了為保證質量，在某種程度上必須犧牲數量，因為同時要達到兩個目的耗費太大，中國經濟無法承受。

在小學一級，毛以后的領導盡管沒有直接這樣說，但卻是在讓農業部門承擔損失。教育當局私下對外國人承認（雖然不能在國內公開），農民子弟需要了解的耕地知識，多數是從其父輩處學來的。因此，地方教育局不再推動不需要那么高的教育水平的農村地區去發展教育。這種“善意忽視”的態度替代了70年代初開始的對農村教育的積極推動。

這一新態度因許多有關的發展而加強了。其一是官方提出的想法，即國家應遵循全國教育正規化的發展趨勢承擔起所有農村小學的責任。再就是許多學校為了服從質量要求并適應勞動和實際知識突然遭到冷遇的狀況，停辦了各種農場、車間以及對學校預算也有幫助的項目。最后，農業的新責任制和非集體化削弱了支撐隊辦小學的結構。為了對有關關閉和合并70年代末這類學校的報道作出反應，1979年官方澄清說，國家不能立即對所有農村學校承擔責任。因此，地方應在過渡期間繼續興辦學校。[[32]](#_32___Ren_Min_Ri_Bao____1979Nian)

根據在香港會見的前教師的說法，各地正根據“地方興辦國家支援”的做法通過不同形式繼續維持其農村小學。對小學教育的主要影響來自新的個人承包責任制。該責任制導致了失學率的日益增長，這也是中國報刊普遍報道的一個現象。[[33]](#_33_Li_Jian___Zhong_Guo_Qing_Nia)據說，這表明農民寧愿讓他們的子女去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也不許他們的子女上完小學。根據新近全國重新統一的課程在恢復六年制小學方面，農村學校也落后于城市學校。

這些不斷變化的政策及實施這些政策的官方想法所產生的結果是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的比例不斷下降，即從1977年的“95％以上”下降到兩年后的93％。小學數量和招生人數的下降在官方統計中有記載，見表29。小學招生人數從1975年高達15094萬人下降到1982年的13972萬人。小學從1976年剛好100多萬個下降到1981年的89.4萬個。在1979—1981年之間，小學第一年的入學人數從3779萬人下降到2749萬人。[[34]](#_34_1979Nian_Yi_Nian_Ji_Zhao_She)據說上小學的人中約60％能上到畢業。[[35]](#_35_Zhang_Cheng_Xian___Ke_Fu__Zu)早些年的失學率估計數沒有得到。然而，應當指出，表里下降的數字應歸因于出生率的下降。在1975年之前節制生育執行得不平衡。某些地區，尤其是上海，那時因學齡人口的減少，已經關閉和合并了一些小學。

#### 中等教育

在中學這一級，據說，“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不僅想過早地普及中學教育，并要以一種不適宜中國需要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方式使教育單一化，就是使教育數量和質量“平等化”，新政策就是試圖改變“文革”的政策造成的數量和質量的“平等化”。1978年以來，中學人數急劇減少是人為的，隨之產生一些社會抗議。1965年，中國的中學全部學生人數是1400萬人，如表30和表31所示。1977—1978學年的人數是6800萬人。[[36]](#_36_1977__1978Xue_Nian_De_Zao_Qi)新政策于1978—1979學年開始實行，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萬多所中學關閉，到1982年，整個中學招生名額減少了2000多萬人。據1981年10月12日《光明日報》報道，高中減少得最多，1981—1982學年的招生人數與1978年相比，大約減少2/3。1981年，整個上海市7.5萬名初中畢業生中，只有2萬多即最多30％的學生能通過畢業考試升入高中。[[37]](#_37_Shang_Hai___Wen_Hui_Bao____1)與此相似，北京全部13.9萬名初中畢業生中只有5.4萬名即39％多一點的人能于1981年秋季學期升入高中[[38]](#_38___Ren_Min_Ri_Bao____1981Nian)。上海中學學齡人口數量小，反映了在這個城市較積極地注意計劃生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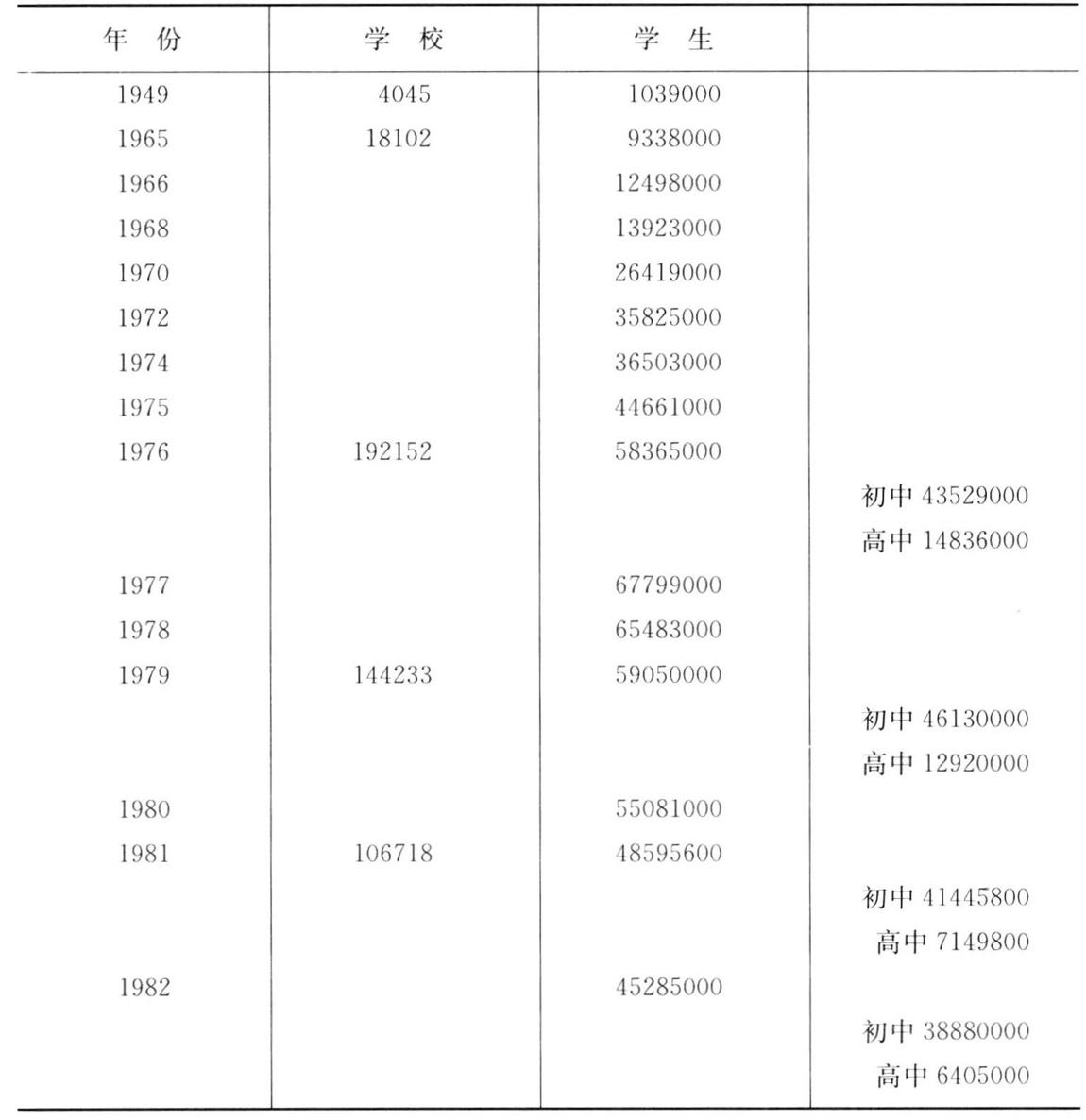
在農村，全國普遍實行的計劃是，關閉公社高中，只在每個縣保留一個或幾個高中。附屬于生產大隊小學的初中班也被取消。計劃在每個公社或相當于公社的地區（因為公社組織被取消了）保留一個初中。

當新成立學校的高中部于1979年開始關閉時，當地出現了各種不滿情緒。一個被采訪者描述了在山東一個縣城里，開了三次大會來安撫當地人民的不滿情緒的情形。教育局發的一份強迫他們接受的通知說，他們的孩子上大學機會那么少，卻要求為他們的孩子興辦代價高昂的高中，這是片面的、自私的。所以，從整體上講，為了民族的長遠利益，他們必須“犧牲當今一代”。

另外一個被采訪者在縣教育局公布這一最后決定前，離開了福建一個辦得很好的公社中學。公社社員要求允許繼續開辦高中班，作為民辦學校，雇用他們自己的教師，而不要永久關閉掉。第三個前教師也是福建人，他把這種請求說成枉費心機。他解釋道，關閉學校是當今“路線”的一部分，只要教育路線本身不變，只要決定路線的中央最高權力不變，每個地方還得執行。

如表30和表31所示，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要馬上將學生按比例從普通學校轉到技術學校，也沒有做任何工作使關閉中學與學齡人口的減少相適應。中等教育的縮減要馬上進行，而不考慮人口發展的趨勢，也不考慮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的發展。

表30 中等學校和學生：普通中學



資料來源：（1）學校：《中國百科年鑒（1980）》，第535頁；《中國百科年鑒（1982）》，第568頁。1976年、1979年學校的數目與其他資料提供的不一致，如，蘇珊娜·佩珀：“‘四人幫’以后就中國教育的變化進行的一次采訪”，《中國季刊》第72期（1977年12月），第815816頁；《中國經濟年鑒（1981）》第4卷，第205206頁；《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第3卷，第134頁。（2）學生：《中國百科年鑒（1980）》，第536頁；《中國百科年鑒（1982）》，第568頁；《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511512頁。

應該指出，中國正處于轉回到1966年前的12年學制的過程中，即小學6年，中學6年，后者又分初、高中各3年。據稱，這是必要的，因為新的全國統一的初、高中課程如按10年制教學大綱教完，學生壓力太大。

表31 中等學校和學生：中專



資料來源：1949—1979年：《中國百科年鑒（1980）》，第535—536頁；《中國經濟年鑒（1981）》第4卷，第205—206頁；《中國百科年鑒（1982）》，第568頁；《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511—512頁。

因此，從理論上講，高中學生數量的減少并不標志著總體教育的下降。假如普及小學和中學教育能保持的話，大多數人總的來說仍受9年教育。但是很清楚，情況并不如此，因為農村地區的輟學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人數比例日益增加。初中一年級的入學人數從1979年的1770萬人減少到1981年的1410萬人。總的中學入學人數從1979年的4610萬人減到1982年的3880萬人。[[39]](#_39___Zhong_Guo__She_Hui_Zhu_Yi)這樣，新的教育發展戰略的最終結果是向狹窄、尖細的金字塔發展：以質量和數量而言，少數人可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多數青年人實際上受到的教育更少，盡管他們所受的教育質量要比以前好。

盡管在中國談社會主義理想已不再時髦，但問題依然存在，因此，也有人提出了批評。理論刊物《自然辯證法通訊》發表的一篇文章宣稱，“以這樣一個人口結構去建設現代化的國家是不可想象的”。根據目前質量優于數量的教育政策傾向，作者估計，按照目前教育水平，到1980年，年齡6—18歲的32200萬名青少年可能會有以下情況：有約2000萬人成為文盲；至少13300萬人只有小學以下水平；而僅有1000萬人能得到某種專門的中等或高等水平的教育。他辯稱，數量和質量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他批評目前片面強調質量的做法。“我們現在就應該想到這一點，改變這一點，”他強調說，“不要等后代人寫歷史來總結教訓。”[[40]](#_40_Song_Jian___Ren_Kou_He_Jiao)

“文化大革命”10年間質量平等的情況被堅決顛倒了過來。起初，重要的問題是確定普通學校和中等專科學校的比例。事實上，前者總是占優勢的，但據說1∶1的比例最為合理，因為來自普通中學的畢業生需要2—3年的訓練才能工作，養家糊口。不過，把普通學校轉移為技工學校很快被認為是行不通的。如表31所示，這些學校增長很慢。一種可選擇的辦法是把職業課程引入普通非重點學校的高中課程中。目前正根據國務院1980年10月批準的教學大綱在這樣做。[[41]](#_41__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這種做法的結果是，這些學校的學生基本上不可能去為升大學而競爭，而向他們提供的實際訓練又不一定有用。中國人立刻遇到了其他國家在這一級學校引入職業訓練時所遇到的同樣問題。困難在于使教師和專業訓練計劃與學生畢業后可能做的工作相適應。例如，福建一個中學引進的第一批職業課程之一是服裝加工。有這種技能至少可使他們從事商業，做個體服裝制造商或裁縫。但是，這一地區沒有這類工廠，而學生又沒有學到加工整套服裝的技能。所以，開這項課程被認為是失敗的。

舊的半工半讀思想曾短暫地以農中形式恢復過。農業中學在70年代末曾被正式提倡。一些大學知識分子對農村一致反對辦這些學校表示驚訝不已。然而，地方官員卻痛痛快快地承認確實如此。20年前農民不愿把他們的孩子送到這些學校現在仍不愿意，理由相同。如果一個孩子進不了縣城的正規學校，那么上公社的類似學校也行。由于小學教育和初中教育發展了，要求進這種公社級中學的人也增多了。但是，進農中向有經驗的農民學習農業知識則是一種浪費。學生們可以從他們年長的人那里學到很多同樣的知識，而與此同時，還能開始掙錢。已建立的為數不多的這類學校到1981年正逐漸減少，如表31所示。

如果說農村是這一戰略的敗方，那么這個戰略支持的城市重點學校或第三級學校則是它所引以為驕傲的。作為大學后備力量的重點學校已完全恢復到過去的狀況，并得到慷慨的財政預算支持，完善了破舊的設施。受到稱贊的從小學到大學層層建立起來的求學“金字塔”，在全國各地恢復起來。有些城市甚至宣布重建重點幼兒園。新的全國統一的課程和課本，特別在理科教育方面得到了加強和更新，以便能適應這些學校學生的水平。

現在官方政策明確表示，對接收新生的政策和對不同學生給予不同教育的做法所產生的社會后果不用考慮。企圖提拔工、農知識分子的嘗試被公然嘲笑為縮小城鄉差別、腦體差別的不成熟企圖。給予工人階級的青年以入學資格照顧的早期做法和后來片面照顧“出身好”的考生的做法都已被取消。現在每人或多或少是“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學生要進入各級學校的大門，都要經過統一考試。從這種體制中最能得益的，據說是干部、知識分子的孩子，現在他們想在重點大學爭得一席之地已全無障礙。大多數進重點中學的學生來自重點小學或普通小學的重點班。在小學里，老師們表示要考慮孩子父母的情況，因為受過教育和經濟上可靠的父母的孩子一般在學校里表現都比較好。

可是，當地官員坦率地承認，“在社會上”存在著對恢復的重點學校的批評。這就引發了對重點學校的一片反對聲，這在1981年底的報刊上短暫地出現過。這種評論從本質上說（即使程度不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音的共鳴。有關反對這些學校的論點，自 1976年以后還是首次出現在報刊上。一位作者列舉了三點反對理由，建議再次取消重點學校：（1）它們對普遍提高教育質量起不到作用，因為它們壓抑絕大多數教師和學生的學習熱情，而只使少數人得益；（2）它們無益于整個民族素質的全面提高，因為它們片面強調升學率，對學習有損害；（3）它們不利于普及教育，因為它們浪費財力、物力。[[42]](#_42___Zhong_Guo_Qing_Nian_Bao)但是，公開爭論很快就中止了，沒有取得實質性結果。

這種突然爆發的對重點學校的反對，是正在發生的爭論的一部分。所爭論的問題是：有關“分班制”的做法，或者說，對不同層次的學生要根據他們的能力分別施教；由于每一級學校須有升學考試，使教育制度重新采取不靈活的僵硬做法；為爭取提高升學率而隨之出現競爭。所有消息來源認為，填鴨式教學和競爭情況比1966年以前更為厲害。老師們幾乎一致贊成“正規化”，贊成有明確標準和要求的全國統一教學課程：固定的課程進度，并通過一整套的小測驗、平時考試、期中和期末考試來強化，所有這一切就是要徹底恢復1966年前的制度。不過，針對這些細節而進行的爭論中的合理教學意見在某種程度上被采納了。例如，教師們欣然承認，把學生按智力劃分成不同班，教學固然較方便，但這樣做僅對最聰明的學生有益。因此，如聽任這種制度的缺點泛濫，甚至老師也會有理由批評。但是，任何糾正措施都要由負責制定這一制度的集中統一規則的領導部門來下達。可以預言，假定兩條路線斗爭還存在另一邏輯的話，那就是，糾正措施不會指責新制度，而是指責新制度的前身。

在答復1981年12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代表們提出的批評意見時，教育部長蔣南翔承認，由于有那么多弊端，升大學的競爭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激烈。但他解釋說，重要原因是，中等教育和第三級學校不成比例地高速發展。他回顧說，當50年代初期首次采用大學統一入學考試時，也沒有造成追求升學率的現象，因為在早先那些年中，甚至還沒有那么多中學畢業生能滿足大學的招生人數。接近60年代，高中教育大力發展以后，升大學的各種競爭情況才出現。他認為，那時高中畢業生上大學的比例在30％—40％之間。改變這種狀況的原因是，1966—1976年10年間過早普及高中教育。結果每年高中畢業生中只有4％—5％的人能上大學。這位部長最后說，這一“極其激烈的競爭”并不是恢復入學考試的結果，而是由于數量龐大的高中畢業生和數量很少大學招生名額之間空前尖銳的矛盾所致。[[43]](#_43_Xiang_Gang___Wen_Hui_Bao)

因此，所有爭論意見得出同一結論：中等教育的目的是為升大學做準備，既然只有很小一部分畢業生能繼續深造，所以解決的辦法就是縮減中學招生名額，重新把人力物力資源集中在重點學校上。根據這一判斷，高中畢業生人數從1979年的720萬人的高峰降到1981年的480萬人。在三年內，將另減100萬人。1981年接收的高中一年級新生只有320萬人。[[44]](#_44___Zhong_Guo_Bai_Ke_Nian_Jian)

#### 高等教育

不過，在第三級，在所謂彌補“文化大革命”十年損失的努力中，這些數目都在反向變動。那些認為對國家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是科學技術的意見受到特別重視。全國入學總人數從1976年的56.5萬人上升到1981年的130萬人，同期高校數目從392所上升到704所。[[45]](#_45___Zhong_Guo_Bai_Ke_Nian_Jian)國際發展方面的專家們認為，像中國這樣規模的國家應有約200萬大學生，這是1990年的目標。1949年以來，中國第一次直接轉向西方資本主義，把其作為獲得援助和專門技能的來源。世界銀行給中國提供的第一批貸款是用于高等教育的，用于購置設備，并為進一步發展全國電視大學網絡提供資金。在1978—1981年間，有萬余名中國學生和學者被派到國外學習和研究，大多數去了西方國家和日本，到美國的人數最多。[[46]](#_46___Zhong_Guo_Bai_Ke_Nian_Jian)

在這一體制中，其他各級所必須堅持的集中統一的傾向，在第三級學校一級也是明顯的。全國課程統一，由教育部準備。全國的學生和教師都得接受其規程，不可改變。正如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時首次引入中央統一課程時那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在《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9章中有闡述）靠半工半讀教學大綱維持的全省分支網絡被取消了，保留下來的主校則采納了這種統一的課程及教育部頒布的“正規”農業大學的全日制教學大綱。

同時，大學知識分子，至少是老一代知識分子認為是從毛主義壓抑下30年解放了出來。實際上，所有過去的右派分子和階級敵人都被平了反，分配了工作。所有這些人都成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而且他們的生活及工作條件很快得到了改善。不過，很多人仍不滿足似的回顧他們的過去，看看國外同行，比比自己，仍不甘心。他們的這些傾向在某種程度上與毛以后領導人的興趣是一致的，他們想使西方技術成功的秘訣適用于現代化建設。而他們初期努力的成果是鞏固50年代從蘇聯模式中吸取來的教育制度的某些特色；同時把西方教育特色尤其是美國教育特色摻到蘇聯模式中去。這個有爭議的混合物，究竟能演化成什么樣的新形象，仍有待來日決定。

中國共產黨和知識分子對這一方式尚不滿意，并不贊同，這表現于70年代后期在現代化口號下而奇怪地又復活了的20世紀初的一場論戰中。所辯論的問題是，中國社會要有多大變化才能使西方科技滿足其經濟繁榮的希望。到1983年，黨的領導人十分憂慮地發起了一場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其目的之一是反對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的一切東西。但在一件事情上，現任黨的領導和大學知識分子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根據延安經驗而取得的任何經驗應該堅決地放回到最初產生它們的農村中去。

#### 就業與青年

在農村，年輕人從童年開始就成為勞動力，實際上，他們輟學是為了從事各種不同的農副業，以增加家庭收入。在城市，這樣的機會就不太多。毛以后的政府在處理城市青年就業問題方面采取與其前任十分不同的策略。“文化大革命”十年提供了一個雙管齊下的解決方案。第一個措施是促進中等教育的普及，當時的原因是擔心青年人可能會上街。中國學校行政管理人員和香港被采訪者均引用過這個原因，說正是由于這一原因，當1978—1979年首次宣布政策時，一些地區起先拒絕減少中學的招生名額。第二個措施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采取的把城市青年分配到農村去工作的做法。

為“文化大革命”十年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付出代價的是幾百萬年輕人，他們從來就沒有與農民結合為一體，即使他們可能學會了與農民一起生活。他們想盡一切辦法逃離農村。正是在這批知青中（在“文革”十年中下鄉的），產生了不同政見的傾向——好像他們仍然生活在“造反有理”這句毛主義的老口號中。這個口號在60年代后期把他們鼓動了起來。有些人要求社會主義制度自由化，有些人則全盤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實際上，所有的這一代人都回到了城市，即使他們自己沒有找到回城市的途徑，但由于1978—1979年政策的改變，他們仍會被允許返城。他們的返城引起了一個大量失業的問題。這一問題隨著后來允許他們從事個體或集體經營而逐漸緩解，而以前這是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而禁止的。城市的知識青年以后都允許留在城市。可是，還得尋找辦法來處理許許多多在小小年紀便走出校門，而生活前景又不十分光明的年輕人的問題。理想的解決辦法是，既降低出生率，又提高城市就業機會。同時，小學入學年齡在70年代后期正式規定為6歲，但后來，為與縮減中學入學名額的決定相協調，很快改定為7歲。這使年輕人“步入社會”推遲了一年。但是，他們的問題依然存在。

據說這些年輕人無視法律的情況呈上升趨勢。這一趨勢在1983年下半年被一場全國性打擊犯罪運動暫時制止了。但是，由于沒有再給青年下鄉運動賦予政治意義，因此當政府號召城市青年自愿去邊疆地區落戶時，并沒有指望得到熱烈響應，這次是號召幫助開發偏遠的青海省。碰巧，這一號召與打擊犯罪運動同時發生，大量城市犯罪青年被送往青海以接受改造和教育。因此，1966年以前那些決定城市的失敗者和落伍者命運的遷移計劃所沒能實現的意圖，現在立即實現。大學行政當局1980年的報告說，甚至在國家的精英中，說服他們的畢業生到遠離家鄉的地方接受毫無吸引力的工作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毛以后的官方信條認為，一個人能通過為自己的利益服務而為國家的利益服務，這個信條不是沒有弊端的。但是，黨的領導人不承認其中有些社會問題是他們自己政策矛盾造成的結果，反而發動反“精神污染”運動，反對一切機械地照搬西方的東西，并駁斥社會主義制度里能存在異化的主張。

## “中國模式”在第三世界的前景

對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問題的共同關心和1970年后中國新的“文化大革命”政策的出臺，產生了各種“學習中國模式”的國際運動。探討向中國學些什么，中國哪些經驗可被其他國家采用，成了時興的事情。[[47]](#_47_Li_Jian_Luo_Na_Fa__Duo_Er)單純追求發展經濟，使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出現了令人難忘的經濟增長率。但是，不論在國際還是在國內，工業化了的富人與農村窮人之間的差距不一定縮小，實際上可能已經擴大了。如果我們發現世界有如此多的人并沒有從經濟增長率中獲益，那么這個經濟增長率的概念就有新的含義了。因此，聯合國第二個發展10年（1970—1980年）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于探索更有意義的發展定義和戰略上。70年代要優先考慮的，是把開發力量集中在農業而不是工業上，集中在農村而不是在城市里，集中在采取辦法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而不是單單提高國民生產總值上。

在教育發展領域里，也發生了輕重緩急要重新安排的問題。原先學院式的教育傾向向職業和技術訓練轉移。但這方面的努力沒有成功，特別是在職業學校方面，因為很難使職業課程與現有的工作崗位相適應，還因為許多人認為，職業學校低人一等是為不能進入高校的人準備的。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注意力轉到上學難的問題上，特別是在農村，盡管大家認識到農村的難題主要不在教育上，但是，教育者對解決農業現代化這種如此基本的問題不愿等待，因此，他們著手尋找解決辦法，以使教育能適應發展中的農村地區。“非正規教育”是一種辦法，“農村化”的課程是另一種辦法。然而這些解決辦法的難題是，這些辦法使那些接受這些辦法的學生被限制在這些辦法本身造成的隔離區內，并有意使目前勞動分工中固有的不平等得以擴大，還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敢于提出措施的計劃者們和大學教師的下一步合理措施，是改革整個教育制度。甚至對膽子不大的人來說，分散性、多樣性、靈活性、活到老學到老等標語口號都成了教育發展的口號。其目標是使教育制度建立在這些概念之上，即允許課程和一個年級按智力劃分的班組之間能上下或橫向運動，至少使教育隔離減少到最小限度。因此有了“文化大革命”產生的試圖沿這條路線改革中國教育的激情。國際發展社會并不認為社會主義是個解決辦法。但是，由于中國人正在解決相似的問題，并且彼此條件也一樣，所以有一種感覺，即他們的經驗似乎可用于其他地方。至少有一個國家，坦桑尼亞，正認真地在這樣做。在這種意義上，中國教育并不像公眾所認為的，在毛死后只是重新融入世界其他地區而已。在那個時期，中國的經驗已經成為有關教育發展的國際爭論的一部分，此外，其他地區那時還問他們應向中國學些什么。后來，毛以后的中國領導人不承認有過這種情況。他們唯一關心的是怎樣忘記過去，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他們能學到的東西。

的確，學習中國模式的做法在毛死后確實突然中斷了。那時，中國人宣稱世界如此認真學習的這種模式是假的。顯然是有兩種中國模式，而不是一種；引起國際那么關注的那種模式，還沒有機會充分發展就被否決了。這就使得對中國人的經驗進行評估很困難，而且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學習，這些教訓只能留待學者們去估量。但是，國際發展社會的變化無常也許情有可原。一旦毛以后的領導人開始著手工作——拋去毛主義的戰略，從公開記錄中抹殺它的成就，除了否定“文化大革命”10年的各個方面外，什么事也不準做——每個人，不管愿意與否，都要受這一新的官方路線的支配。當所有其他消息來源被切斷時，即使抱懷疑態度的人也找不到別的解釋。

世界銀行很聰明，當它為中國準備第一份國別報告時，除非絕對必要，它不讓自己卷進兩條路線的斗爭中去。世界銀行僅僅重新提供了1979年所得的資料，以統計術語闡明了中國教育制度的優劣，也指出了兩種戰略。這些資料是在1979年收集的，那時正是毛以后新的政策要開始實施的時候。中學的縮減和各級優秀重點學校的重建，對教育制度的影響尚未完全記錄。

在小學一級，學齡兒童的凈入學率達到93％，中國比其他92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入學率高30％。全部小學生中45％為女生（不發達國家平均為43％），這也許表明，7％沒有上學的學齡兒童中大多數是女孩子。在中學一級，整個入學率是46％（包括未到年齡和超齡的學生）。與此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例只有26％。在小學一級和中學一級，人數增加最多的是在毛的戰略居統治地位時期，即50年代后期的“大躍進”時期，另一個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間。[[48]](#_48___Zhong_Guo__She_Hui_Zhu_Yi)

中國25歲以上未受過教育的人口比例估計為38％。相比之下，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未受教育”的比例是：巴基斯坦，81％；印度，72％；新加坡，48％；泰國，34％；香港，29％；日本，1％。[[49]](#_49_Tong_Shang_Shu__Di_135Ye)

1979年，全國初級教育的全部經費（44億元）中，估計有56.8％從國家預算中撥出；27.2％的資金來自地方，包括農村的生產大隊和城市的企業單位；個人繳納的學雜費占15.9％。[[50]](#_50_Tong_Shang_Shu__Di_181Ye)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在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普遍是地方和父母承擔較多的經濟負擔。因此，中國過去的民辦學校，在國家支援和指導的全國框架里加以推廣和提高，使一個基本上是農業國的國家基本上達到普及小學。

與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小學數量顯示相比較，高等教育卻是這樣的記錄：中國每1萬人中，只有10.5個大學生。在印度是60個。印度高等教育發展的這個數字與中小學相比是比例失調的。美國每1萬人中有500名大學生。然而，中國的小學、中學入學率，在整個70年代都遠在其他92個發展中國家之上。在高校一級，入學率在60年代初期落后于這些國家，“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幅度下降，1979年仍然遠遠落在后面。[[51]](#_51___Zhong_Guo__She_Hui_Zhu_Yi)

可是，整個制度的另一個特征是：人員超編，使用率低，不經濟。因此，中小學教師每星期授的課時要比其他國家的同類人員少。在中國的小學里，學生與老師的比例是27∶1，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比例是38 ∶ 1—34 ∶ 1。中等專科學校的學生與老師的比例是19 ∶ 1，其他發展中國家是22 ∶ 1或23 ∶ 1。在中學一級，每星期教學工作量通常只有12—13小時。在高校一級，這一體制的效率甚至更差，全國的學生與老師的比例只有4.3 ∶ 1。[[52]](#_52_Tong_Shang_Shu__Di_150__154)因此，擴大高校招生名額和提高初、中等學校教學質量是可通過更有效地利用現有人員和設備取得的，而不必浪費地關閉學校和減少招生名額。工作人員的削減沒有根據學生減少的人數按比例進行。因此，到1982年，學生與老師的比例更不經濟：小學是25.4 ∶ 1；中學是16.4∶ 1；高等學校的新比例是4 ∶ 1。[[53]](#_53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

毛主義戰略的優勢明顯在于其有決心、有能力推動農村地區群眾普及的教育，并使不同種類的學生所受教育的質量、數量得到平衡。這一戰略的特別明顯的弱點在于對高校領域的處理，農村社會主義者對統治教育領域的西方化城市知識分子的懷疑，使毛教育戰略的弱點更為突出了。毛的戰略的另一個特點是通過群眾運動這個工具來實現的，通過伴隨毛戰略的動員取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從克服阻力所必要的“過頭事情”來說，這種方法本身的代價是高昂的。同時，在運動鞏固階段，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浪費和不滿。毛去世后，他的發展戰略和推動這種戰略的延安經驗，作為教育制度的模式被拋棄了。甚至民辦學校模式也只是被容忍了，作為在農村維持普及小學教育的唯一方法被保留下來，但不會為它歡呼。

1976年以后，決定著教育制度性質的各種力量的對比情況同50年代反右斗爭開始以前那段時間相似。那時，蘇聯式的結構和親西方的知識界主宰著正規學校制度，這種制度本身卻是注意力的焦點。可是這種力量對比仍然與其所依賴的群眾基礎之間保持著不穩定的關系。關于關閉學校，以及建立在毛以后戰略基礎上的、顯示了緊張關系的重點學校制度的精英主義，都遭到了“社會”抗議，既有來自城市的，也有來自農村的。黨的領導人本身對他們政策所鼓勵的親西方傾向毫不擔心，并不像他們對“精神污染”所表現的那么憂慮。

外界觀察者無能為力，只能推測而已，推測毛如能設法控制群眾運動所釋放出來的能量，并利用這種能量搞出一種破壞性不大，但有同樣明確性的方法來實現他的目標的話，可能會有什么樣的結果？也許其結果是不會那么令人難忘。然而由于“過頭事情”少了，所以付出的代價也小了，對“過頭事情”產生的不可避免的反抗也可能不會那么過激了。

[[1]](#_1_6)這一解釋來源見本章[此處注釋](#_11__Zhong_Fa_85Hao__1967Nian__W)，參見后文中朱莉婭·匡（音）《中國學校中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羅：《文革之子》；安尼塔·詹：《毛的孩子們》。

[[2]](#_2_6)“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5日，載于《萬歲》（1969年），第658—659頁。

[[3]](#_3_6)“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講話”，1967年5月1日，載于《萬歲》（1969年），第677頁。

[[4]](#_4_6)威廉·欣頓：《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第55頁。

[[5]](#_5_6)李翔云（音）：《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個案研究》，第210頁。

[[6]](#_6_6)《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

[[7]](#_7_6)這一時期受到批判并被撤職的負責教育和文化的部長、副部長名單見朱莉婭·匡（音）《轉變中的中國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曲》，第157頁。

[[8]](#_8_6)關于極“左”路線的最著名論述是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大聯合委員會（“省無聯”）1968年1月的“中國向何處去？”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4190期（1968年6月4日），第1—18頁。

[[9]](#_9_6)“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文件”，譯文見《當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96頁。

[[10]](#_10_6)“中共中央委員會關于當前正在大專院校進行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管理規定（草案）”，1967年3月7日；及“中共中央委員會關于中學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1967年2月19日。二者均被譯在《當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87、100頁。

[[11]](#_11_6)“中發85號（1967年）文件”，1967年3月8日，譯文在《當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96—98頁；反映這一時期中學情況的兩個論文集，參見《當代背景材料》第846期（1968年2月8日）和第854期（1968年5月24日）。

[[12]](#_12_6)“對廣州有些學校作出糾正右傾翻案的決定的調查報告”和“踏遍青山人未老”，均載于《紅色造反者》新第2期（1968年6月），譯文在《當代背景材料》第861期（1968年9月30日），第1—2、20—21頁。

[[13]](#_13_6)《毛澤東思想雜錄》（1949—1968年），第469—497頁。

[[14]](#_14_6)“文化大革命”鞏固階段的最后歷史尚未寫出；本文的論述是根據現在香港的參加過這場運動的學生和教師的描述，及以下論述，安炳炯：《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大革命”》；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斯坦利·羅森：《紅衛兵的派性與廣州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戴維·密爾頓、南希·達爾·密爾頓：《風不會減弱：在革命的中國的歲月（1964—1969）》；欣頓：《百日戰爭》；戈登·A.貝納特、羅納德·N.蒙塔珀圖：《紅衛兵：戴小艾政治傳記》；尼爾·亨特：《上海日記：“文化大革命” 目擊記》；珍妮·多比爾：《中國“文化大革命”史》；肯林：《上天的報應：一個中國青年的日記》；魯思·厄恩肖·洛、凱瑟琳·S.金德曼：《在外國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位美國婦女在中國》；安妮塔·詹：“中國社會結構的反映”，載于《世界政治》（1982年4月），第295—323頁。

[[15]](#_15_6)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文件，見《當代背景材料》第880期（1969年5月9日），參見第904期（1970年4月20日）。

[[16]](#_16_6)《人民日報》1966年6月18日及8月9日。

[[17]](#_17_6)這一時期對周揚1961年后暗中破壞1958年教育革命的批判及對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前部長張文松的批判，見《解放日報》1966年8月11日及《北京日報》1966年6月21日，譯文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增刊）第155期（1966年9月28日），第121頁。

[[18]](#_18_6)根據1967年2月和3月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的對三種學校的指示，均譯在《當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62、87、99頁。

[[19]](#_19_6)《教育革命》1967年11月17日，北京，譯文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增刊）第218期（1968年2月20日），第1頁。

[[20]](#_20_6)此評論是由許多來源的資料拼湊而成。獨一無二的內容最為豐富的官方文本是1967年5月6日北京出版的《教育革命》所載的“十七年來教育戰線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該篇譯文載于彼得·J.西博爾特編《中國的革命教育：文獻和注解》，第5—60頁。亦見于1967年7月18日、10月28日、11月21和22日的《人民日報》以及欣頓《百日戰爭》，第20—40、139、171—178頁。紅衛兵的變化及地方上的詳細情況見羅森：《紅衛兵的派性》第一部分；斯坦利·羅森：《下鄉青年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廣州實例》；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78—84、306—308頁。

[[21]](#_21_6)例如，《毛主席教育語錄》（東方紅公社，1967年7月）；以及“毛主席論教育革命”，譯文在《當代背景材料》第888期（1969年8月22日）。

[[22]](#_22_6)教育部高教局代表張學新（音）1977年7月19日在北京和作者的會見；以及廣東電臺1972年8月21日的廣播，見《聯合出版物研究署》第69期，第5頁。

[[23]](#_23_6)關于在面臨強大的反面壓力時教師的政治作用及其促進其團體利益時的堅韌精神，見戈登·懷特《黨和專業人員：當代中國教師的政治作用》。

[[24]](#_24_6)原文出自1944年10月20日（此日期有誤，應為30日——譯者）“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引自《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及《紅旗》1971年第6期第38頁，《紅旗》1973年第6期第75頁。

[[25]](#_25_6)采訪教育部，1977年7月19日，也見表29。

[[26]](#_26_6)也見喬納森·昂格爾《毛統治下的教育：廣州學校中的階級與競爭（1960—1980）》，第二部分。

[[27]](#_27_6)如同其他兩級一樣，關于高等教育一級的教育革命的建議和文章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中國報刊上有很多。美國駐香港的總領事館收集了許多這樣的材料并把它們譯成了篇幅很長的名為“社會主義大學”的《當代背景材料》叢書，見《當代背景材料》第881、890、916、923、945、955、975、996、1007期。

[[28]](#_28_6)蘇珊娜·佩珀：“教育和革命：修正過的‘中國模式’”，《亞洲概覽》1978年9月，第871頁。

[[29]](#_29_6)關于大學招生更進一步的結論來自于香港的采訪資料；又見于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大學：毛以后的招生政策及其對中等教育結構的影響》表13；又見于羅伯特·泰勒《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政治與大學招生（1949—1978）》。

[[30]](#_30_6)關于70年代中期的教育的論戰，陳錫恩：《1949年以來的中國教育：學術和革命模式》，第121—152頁；昂格爾：《毛統治下的教育》，第188—205頁。盡管周榮鑫患嚴重疾病，但還是被迫在1976年1月離開醫院，反復受到審查。他于1976年4月12日一次審查會之后去世。

[[31]](#_31_6)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大學：社會民主和行政改革的新試驗”，《現代中國》1982年4月，第190頁。本篇論文及已被引用的關于大學招生政策的專題文章是以作者1980年在中國三個半月的研究旅行期間收集的數據為基礎的。材料主要是通過在20個大學和8個中學的會見而收集的。由于在教育部先前訂有協議，問題被官方限制在1976年以后，因為對“文化大革命”的10年進行正式調查“還為時過早”。

[[32]](#_32_6)《人民日報》1979年8月12日；《光明日報》1979年7月24日；長沙湖南電臺1979年5月29日消息；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79年5月31日，第4頁；沈陽遼寧廣播電臺1979年5月21日，《世界廣播新聞概要》，FE/6126/BⅡ/8，1979年5月26日。

[[33]](#_33_6)例見《中國青年報》1981年5月9日；《光明日報》1981年10月5日；《廣州日報》1981年8月4日。趙紫陽總理也于1981年底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承認了這個問題。

[[34]](#_34_6)1979年一年級招生數字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第3卷，第205頁；1981年的數字來自于《中國百科年鑒（1982）》，第568頁。其他數字的來源表29中予以注明。

[[35]](#_35_6)張承先：“克服‘左’傾思想影響，搞好教育調整”，載《紅旗》1981年第3期，第28頁。

[[36]](#_36_6)1977—1978學年的早期數字是：有6890萬名學生在普通中學，另有80萬名在中專（克拉克·克爾等編：《中國的教育和勞動關系評論（1978年春）》，第3頁；中專招生名額出自《人民日報》1979年7月28日。新的官方數字列于表30）。

[[37]](#_37_6)上海《文匯報》1981年10月21日第4版。關于上海中學學齡人口數量少的情況，見《文匯報》1982年2月25日。

[[38]](#_38_6)《人民日報》1981年11月12日。

[[39]](#_39_6)《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第3卷，第205頁；《中國百科年鑒》（1982），第568頁。

[[40]](#_40_6)宋健：“人口和教育”，載《自然辯證法通訊》第3期（北京）（1980年6月），第1—3頁，譯文在《聯合出版物研究署》第77745期，《中國報告：政治、社會學和軍事事務》第178卷第3期，1981年4月3日，第43頁。

[[41]](#_41_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北京第16號（1980年12月1日），第493頁。

[[42]](#_42_6)《中國青年報》1981年11月21日，此期間的其他批評性評論參見《中國青年報》1981年10月31日、12月5日、12月12日；《文匯報》（上海）1981年10月21日、1981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1981年12月12日；《光明日報》1981年11月7日、11月16日、12月5日；也見《國際先驅論壇報》紐約時報發行處，上海，1981年12月21日。

[[43]](#_43_6)香港《文匯報》1981年12月17日；《北京日報》1982年1月3日。

[[44]](#_44_6)《中國百科年鑒（1980）》，第538頁；《中國百科年鑒（1982）》，第568頁。

[[45]](#_45_6)《中國百科年鑒（1980）》，第535—536頁；《中國百科年鑒（1982）》，第568頁。

[[46]](#_46_6)《中國百科年鑒（1982）》，第573頁。

[[47]](#_47_6)例見羅納法·多爾《文憑病：教育、資格和發展》。

[[48]](#_48_6)《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第3卷，第147、152—153、211頁。

[[49]](#_49_6)同上書，第135頁。

[[50]](#_50_6)同上書，第181頁。

[[51]](#_51_6)《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第3卷，第135、164、211頁。

[[52]](#_52_6)同上書，第150、154、168頁。

[[53]](#_53_6)《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514頁。

## 第八章 文藝創作與政治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文藝創作就與政治生活緊密相連。“文化大革命”不但證實了這一點，而且表明在這種密切的關系中還可能蘊藏著千變萬化。早些年相對輕松的政治氣候，曾使文學一度成為含蓄地抨擊時事的媒介，但到了1966年，這種政治氣候卻突告結束。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中國領導人轉而反對一些文學著作和戲劇作品，并且極力要以新的文藝作品來取而代之。他們對藝術思想的恐懼似乎比任何一個民主政府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幾乎所有著名的作家都遭到迫害，而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幫常常自愿或不自愿地匿名發表作品的無名之輩。

所有這些，都可以通過各種不同方式來加以解釋和描述。其中之一就是把“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文藝創作看做政治對藝術干預的結果：對個別作家進行猛烈的思想攻擊，對文化機構進行徹底改組，甚至解散，使文藝生活幾乎窒息；另一種則是僅限于對文學體系的變化進行研究。這種變化，盡管緣于政治，但影響文學的風格體系，諸如故事的結構、詩歌的形式以及舞臺的套路。雖然政治對文藝生活的干預與文學體系的變化兩者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但以后還是要把它們分開來談；事實上，這些事件也可以按年代順序來加以區分：思想批判文章剛剛出現的時候，人們根本弄不清楚文藝創作是否能滿足新制定出來的要求。而幾部代表新藝術的樣板作品也只是在經過相當一段時間后才出版，但即使依據當時的新標準，這些樣板作品的質量也令人懷疑。

## “文化大革命”的發端：作家遭受思想攻擊，文化機構陷入混亂

1966年4月19日，“偉大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后來正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經過精心策劃后，通過《人民日報》正式宣布開始。1964—1965年間，數名知識分子受到批判，其中如哲學家楊獻珍、歷史學家周谷城、評論家邵荃麟等。對這些人進行批判，尤其是對思想極為接近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邵荃麟的批判，使文化機構受到削弱。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文章，辛辣地批判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指責他的歷史劇《海瑞罷官》（1961年曾作為京劇演出）是對毛主義政策進行含沙射影的攻擊。海瑞是明朝官吏，吳晗在其他的作品中也寫過他。毫無疑問，吳晗是在“借古諷今”，因為他早年的作品已表明他自己是清楚這種手法的。吳晗筆下的海瑞是清官，他站在百姓一邊，要退田與民、為民申冤。因此，姚文元說吳晗實際上是煽動解散人民公社。他這一理解并不十分牽強附會。其他激進的評論家則把海瑞比作彭德懷元帥。彭于1959年對災難性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制度力陳己見，結果招致罷官免職。當然，也有的觀點是支持《海瑞罷官》的。[[1]](#_1_Zhan_Mu_Si__R_Pu_Xi____Wu_Han)除了這些政治解釋外，還有人認為《海瑞罷官》頌揚一種剛正不阿的道德觀是離經叛道。這一點，在1965—1966年上半年中國報刊發表的關于吳晗的數以百計的文章中，也進行了反復的爭論。那種認為封建社會偶爾也會有清官的觀點，被視為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水火不相容。激進的評論家認為，所謂“清官”，是一個矛盾的說法，因為這些人混淆了階級斗爭，因此阻礙了歷史的進步。

對吳晗的攻擊并不只限于《海瑞罷官》，而且還禍及他的其他歷史著作和評論文章。1961—1964年間，吳晗與北京市委成員廖沫沙、北京市委書記鄧拓一起為《前線》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定名為《三家村札記》；1961—1962年間，身為《人民日報》前總編、具有相當政治分量的鄧拓，發表了題為《燕山夜話》的一系列類似的文章，后來還重印成五個小冊子。這兩個作品都受到了嚴厲的攻擊。1966年5月初，攻擊的矛頭直指鄧拓。姚文元在他的一個小冊子里，指控鄧拓為了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濫用其作為《前線》主編和北京市委書記的權力，宣揚“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路線”。這種批判顯然與文學關系不大，而更多的則是思想意識和政治上的問題。吳晗、廖沫沙、鄧拓因通過報刊不加掩飾地批評毛主義政策而備受責難。他們用來表達自己觀點的文學形式，是魯迅最拿手的諷刺散文——雜文，而毛澤東在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則反對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使用雜文。

盡管雜文便于進行隱晦的和公開的斗爭，但從文學的角度看，雜文并不是主要的文學流派。在吳晗、廖沫沙、鄧拓由于政治原因遭到攻擊之前，他們的雜文也不怎么有名。他們被選為替罪羊，是因為通過批判他們的文章，就可以為攻擊北京的黨政領導開路，矛頭對準的是吳晗和鄧拓的頂頭上司、北京市市長、市委第一書記彭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中國共產黨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從1966年5月開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圖日漸昭然，而開創文學創作生動活潑局面卻沒有什么起色。

1966年7月1日，《紅旗》雜志發表批判文章，一口咬定周揚自1949年負責文藝工作以來所推行的文化政策是全盤錯誤的。周揚被說成是王明一類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周揚的右傾在1936年已很明顯，因為那時他曾表明支持機會主義者的口號“國防文學”，以反對更能代表無產階級的魯迅思想——“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據說，評論家們在爭論中翻舊賬是空見慣的事，但要追溯到30多年前去發現周揚原來是一個修正主義者，或更糟的其他什么，豈不令人瞠目。

評論家們把周揚樹為魯迅的敵人，是為了利用一些作家和讀者出于各種原因對周揚及其負責的文化機構的不滿，求得嘩眾取寵之效。1967年1月3日，姚文元在《人民日報》撰文稱，毛主席過去曾多次訓斥過周揚的修正主義思想，但毫無作用。姚文元認為周揚必須為其1961年在某文學雜志上發表的關于題材問題的文章負責。周的文章認為，文學的目的應是反映紛繁復雜的世界，并建議不要把所有的生活現象都簡單地以階級斗爭來劃分。姚文元把這看作是企圖為“叛徒、走狗、流氓、地富反壞右分子歌功頌德”。他說，1959年，赫魯曉夫表揚米哈伊·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時，稱贊故事“描繪平民百姓復雜而豐富的內心世界”，周揚與赫魯曉夫正好臭味相投。按照姚文元的邏輯，周揚自然也認為中國作家應出版類似的“叛徒文學”。

把周揚和赫魯曉夫的階級斗爭觀念聯系起來，這點很重要。從姚文元對引言和事實的理解來看，其謾罵并不一定站得住腳[[2]](#_2_Mai_Qi_Gao__Ke_Lai_Ni____Zhon)，但周揚的確在1962年的一次演講中使用過“全民文藝”這一術語，這自然使人聯想到赫魯曉夫式的定義：“全民國家”、“全民黨”。周揚由于支持邵荃麟的觀點，認為動搖于兩個階級之間、階級立場不明確的“中間派”，也應成為文學作品描繪的對象，因而易受到攻擊，被指控支持“人性論”的觀點，即認為人類的某些特性超越階級界限。這種理論不管是在1964年對馮定的批評中，還是在更早時候毛的延安《講話》中都被批判過。

周揚不僅僅是因為對適合文學的題材持不同看法而使他與強硬的“毛主義”立場格格不入，他還一而再地強調藝術與科學、文學與思想的區別。周揚對創作和文學的作用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依賴從19世紀的評論家別林斯基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蘇聯文學理論傳統，因此，他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概念，諸如別林斯基“藝術是寓于形象的思維”的觀點。自然，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即遭到炮轟。早在1966年4月，后來加入權傾天下的“文革”小組的鄭季翹，在《紅旗》雜志上發表文章，認為“形象思維”不能達到抽象歸納，因而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相抵觸。[[3]](#_3_D_W_Fu_Ke_Ma___Ai_Er_Lu_De__Y)這一點對否定周揚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另外，鄭季翹的文章認為，必須約束作家為了富有想像力的創作所要求的相對自由。至于其他激進的評論家，則否認作家可以通過藝術手法接近現實。他們鼓吹一種樸素的與蘇聯美學相去甚遠的唯物主義文學觀念。如果將這種文學觀念進行邏輯推理，得出的結論必然和恩格斯對巴爾扎克的著名評價相抵觸。按照恩格斯的評價，巴爾扎克作為作家，盡管觀念保守，但其作品對社會的藝術洞察的結果，卻是進步的。

新的、嚴格的唯物主義文學創作理論強化了對文藝作品的思想審查。任何藝術作品，任何新形象、新典型都被認為是以抽象歸納為基礎的，作者再也無法憑借模糊的比喻或直覺的認識來逃避思想管制。

激進的文藝創作觀，大部分是以1966年2月林彪和江青在上海組織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一份報告為基礎的。如果把上海座談會看做與北京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唱對臺戲，或許并沒有什么不對。“五人小組”1966年2月初在北京曾為吳晗一案準備了一份報告，試圖把批判引向沒有政治后果的學術爭論。[[4]](#_4_Mo_Er__Ge_De_Man____Zhong_Guo)上海座談會的結果并沒有馬上發表，直到一年多后《紅旗》雜志才刊登了座談會的紀要。[[5]](#_5___Hong_Qi____1967Nian_Di_9Qi)

上海座談會《紀要》總的來說，支持毛在延安《講話》的原則，但同時也提出某些方面需要具體甚至是一邊倒的觀點。延安《講話》強調文學必須為政治斗爭服務，而現在，政治斗爭則被具體解釋為一種反對“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逆流”的斗爭，或簡言之是一種反對“黑線”的斗爭。這種斗爭被說成是艱巨的、復雜的、“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但對中國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的勝利都是很有必要的。《紀要》否定過去20年的文藝創作，認為不符合延安《講話》所表明的毛主義標準；否定不同時期作家所喜歡的各種文學流派，諸如秦兆陽1956年提出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取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及邵荃麟在1962年為之捍衛的“中間人物”論。

然而，爭論盡管沒有點周揚的名字，但總的說來，實際已形成了對周揚的批判。比如，《紀要》猛烈攻擊“30年代文藝”，但當時周揚的政策則是要盡可能地保持大作家如茅盾、巴金和老舍的傳統；《紀要》反對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其他蘇俄評論家提出的文學觀念，但周揚則極力支持把這些人的作品譯成中文并且吸收他們的文學觀和文學創作的思想；《紀要》不贊成歐洲、包括俄國的傳統名著在中國如此受歡迎，而負責歐洲尤其是俄國作品的翻譯和發行的，又正是周揚，他本人也十分熟悉俄國文學，能閱讀原著。《紀要》認為，斯大林對蘇聯及歐洲的傳統名著的態度也過分寬容，暴露了《紀要》對外國影響的極端嫌惡。《紀要》說斯大林“對俄國和歐洲的所謂經典著作都無批判地繼承，后果不好”。

上海座談會明確規定，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題材應是工農兵英雄模范、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以及解放戰爭中的一些戰役。對文學主題的限制也十分具體：描寫戰爭，不要在描寫戰爭的殘酷性時去渲染或頌揚戰爭的恐怖，以免產生資產階級和平主義；描寫英雄人物，不要寫他們違犯黨的紀律；描寫敵人，要暴露其剝削、壓迫人民的本質。顯而易見，這樣做的結果，是使故事情節一看開頭便知結局。

《紀要》談到詩歌的地方不多，但其中“工農兵發表在墻報、黑板報上的大量詩歌”，被認為是“劃出了一個完全嶄新的時代”。事實上，與敘事文學、劇作相比，詩歌更不能被看做傳達政治信息的工具。在戲劇方面，《紀要》為現代革命京劇的出現而歡呼，并提到了其中幾出，這在本章后面的部分還要談到。同樣，題材問題在這里也有決定性意義。1967年5月，刊登《紀要》的《紅旗》雜志還在同期發表了一個聲明，說毛澤東在1944年曾批評傳統中國戲劇“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而“人民卻成了渣滓”。《紀要》強調革命京劇所依據的正是這個指示。

上海座談會討論的問題其實并不新鮮，只是與早期的文學藝術理論相比，其側重點又有所不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美學觀，黨從思想意識上對現實的理解是一方面，文藝對生活的藝術表現則是另一方面，兩者之間總存在著不符。換言之，按馬克思主義的說法，黨性原則和典型原則之間總有一種辯證關系。上海座談會過分強調了黨性，以致沒有給藝術創作留下多少余地。這在下一部分將舉例說明。

## 文學體系的變化

由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緣故，同時也由于上海座談會的緣故，“文化大革命”對文學創作是不能容忍的。對吳晗和鄧拓的思想的批判，顯然就是一種用來削弱毛澤東和林彪的政敵的政治武器。同樣，對其他作家的批判，諸如巴金、老舍、曹禺、羅廣斌、周立波、趙樹理、柳青、楊沫、梁斌、吳強、周而復等，也主要是為了政治目的。這些作家均受到政治審查，常常被看成是罪犯。巴金的公民權被剝奪，多年來一直被軟禁在家，其他作家也都被囚禁多年。老舍、羅廣斌自殺或被迫自殺；趙樹理、柳青和吳晗死于獄中；鄧拓1966年5月被捕后不久即遭殺害（也有人說是自殺）。不但是作家，另外還有畫家（如齊白石、林風眠）、音樂家（如《東方紅》的曲作者賀綠汀——原文如此——譯者）以及一大批導演和演員都受到批判、迫害。“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和被殺害的知識分子人數并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所以他們所受的苦難也就無法估量。如果將這些年的恐怖和流血比作蘇聯30年代斯大林時期的鎮壓和納粹德國的大屠殺，并不算夸張，只不過中國的迫害速度比較緩慢，屠殺也不很系統。

然而，“文化大革命”支持者的生活也并不安逸。他們陷入了派系斗爭，時常不知如何捍衛自己的毛理想，以抵抗現實的需要。1966年夏天，陶鑄不很情愿地接替陸定一出任中宣部部長，但同年不久即被捕死于獄中，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接替陶鑄的是極“左”派王力，但任期不足8個月便下臺。1967年9月，“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被任命負責中央宣傳領域。令人避之猶恐不及的“文革”小組，從1966年夏開始活動頻繁，但一年后便亂成一團：1967年9月，其最激進的少壯派王力、林杰、關鋒和穆欣被捕；1968年2月，一貫利用義和團起義宣揚對外國人的仇視，以此作為與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作斗爭的武器的戚本禹受到批判，并從此從政治舞臺上消失。至此，“文革”小組實際上只剩下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幾個人，此外還有顧問康生。1970年，陳伯達因據說陰謀反對毛主席而被清洗掉。

由于內部的紛爭和外部的壓力，“文革”小組從來就缺乏權威，不能對文藝創作進行有效的指導，因此，除了促進現代革命京劇的發展外，它對文藝生活的干預根本就看不見成效。和別的行政部門一樣，文化機構也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如果“文革”小組真的希望在文學領域采用“大躍進”時期的政策，那么，它顯然就無力指揮和監督詩歌創作的另一場群眾運動。況且，人們很快就明白，“文革”小組要的是權力，而不是思想改革。在爭奪權力的斗爭中，文學和藝術并非是首當其沖的。

“文化大革命”頭幾年的文化生活幾乎停滯不前，這不足為怪。那時，作家被當做修正主義者或異端分子而遭到批判，而文學故事則往往被認為是作家政治信仰的表露。作者與故事主人公沒有區別，甚至故事里某一人物的政治信仰都可以直接認為是作者的政治信仰。上海座談會之后，政治短文和文學小說之間的明顯區別被取消，結果，毛澤東在延安《講話》中提到的“通訊文學”便成為最受歡迎的文學類型。據林彪女兒林豆豆所言，林彪贊揚報告文學是一種集小說和散文的功能于一體的寫作風格，與政治生活更貼切，有說服力，能在對人民群眾進行的現實主義教育中發揮更大的作用。[[6]](#_6_Lin_Dou_Dou___Lin_Fu_Zhu_Xi_L)林豆豆本人也從事報告文學創作，其中有些作品還被譯成英文，并于1967年在《中國文學》上發表。

然而，報告文學不大適合延安《講話》以及“座談會紀要”所反復強調的要求，即文學“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7]](#_7__Zuo_Tan_Hui_Ji_Yao___Di_231Y)這種幾乎是亞里士多德式的文學觀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幾年里完全被忽視，作家除了寫些對當前政治目的表示積極支持的作品外，對其他任何題材均不敢輕易動筆。1967—1971年期間，《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從來沒有肯定地評論過一篇現代或古典小說，也沒有肯定地評論過任何一位詩人的一篇詩作。當然，毛澤東的詩是例外。但是，這些詩盡管在政治論文中常被引用，卻從來不會受到文學批評。

1971年9月林彪死后，文學創作的局面才有所改觀，變化的標志是《人民日報》于1971年9月19日刊登了郭沫若的幾首詩。我們不妨回憶一下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布開始前，郭沫若受命充當的角色，就是用可憐的自我批評形式告知全國等待著知識分子的將是什么。他此次發表的詩，主題是政治的勝利以及由此而贏來的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郭沫若通過對新疆生活和自然風景的描寫，借機激發作家們重新提起他們的筆桿：

云箋天上待詩篇。

一池濃墨盛硯底，

萬木長毫挺筆端。[[8]](#_8_Yin_Zi___Zhong_Guo_Wen_Xue)

1971年11月，郭沫若還發表了一部研究李白與杜甫的著作，旨在鼓勵對古典文學進行更多的研究。盡管郭沫若沒有回避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但其作品得以出版這一事實已意味著恢復了對歷史的研究。

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講話：“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問世”，證實了文化氣候的轉變。毛的干預只能被解釋為試圖將文學從被“文化大革命”拖入的死胡同里解救出來。林彪墜機后，他和江青組織的上海座談會的觀點不再被采納，因此亟須重新闡明文藝政策。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試圖填補這一空白。社論強調中國文學的連續性，認為文學必須為工農兵服務，而文學中的英雄人物都應有無產階級背景，從這一方面來說，“革命樣板戲”如現代京劇，就值得學習。社論說，必須繼續批判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所鼓吹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肅清“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余毒”。然而，僅僅批判是不夠的，還應當有新的、富有創造力的作品問世。因此，凡具有革命內容、形式健康的文學作品，不管是業余作者或是專業作家創作的，都應予以鼓勵；而只要作者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指導，任何文藝流派都可以發展。

雖然“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指導”這一條是潛在的嚴格約束，但社論對新的文學創作仍是一種鼓舞。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合著或無名氏的詩集出版，諸如《頌歌獻給毛主席》、《千歌萬曲獻給黨》等，這些詩集都保持了“大躍進”期間所形成的業余寫作的傳統。如今，詩人單獨出版自己的詩集再次成為可能。1972年，張永枚、李學鰲、李瑛和賀敬之（《白毛女》原著作者之一）都出版了詩集。這些詩集在“文化大革命”前曾出版過，所以包括了早期版本的一些詩作。毫無疑問，他們的作品對生活充滿了馬克思主義的樂觀態度，但斗爭的主題相對不明顯，而更多體現的是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神話。李瑛的作品尤為如此，他極力要把鄉村的生活寫成“世外桃源”。[[9]](#_9_Jian_Ta_De_Shi__Xiao___Zai_Li)

小說創作的恢復，只有在把虛構的文學故事與政治文件材料區分開后才有可能。1954年因猛烈抨擊俞平伯對《紅樓夢》的解析而開始其評論家生涯的李希凡，“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一直保持沉默，但1972年卻發表了一篇論述魯迅的重要文章。李希凡認為，故事的主人公沒有必要就是故事的作者。他說，魯迅的故事都是虛構的，并不是發生在魯迅身上的事。[[10]](#_10_Li_Xi_Fan___Jiu_Shi_De_Zhi_S)李希凡的觀點不但使對所謂修正主義作家的批判失去根據，而且對新小說的創作也起了鼓勵作用。小說不同于報告文學，也不同于歷史紀實。高玉寶在談他的小說《高玉寶》是如何寫成的時，也提出了這個觀點。《高玉寶》首版于1955年，英文版譯為《我的童年》。1972年小說的修訂版發行時，高玉寶聲明：《高玉寶》不是自傳，我是把它當做小說來寫的。高玉寶引用延安《講話》解釋道，小說所反映的生活應具更高層次，比現實生活更具典型性。[[11]](#_11_Gao_Yu_Bao___Wo_Shi_Zen_Yang)

1972年出版的小說絕大部分是再版本。李云德、黎汝清、高玉寶以及浩然的小說均屬此列。盡管浩然同時還開始寫一部新的小說——《金光大道》，但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爭卻避而不談。事實上，絕大多數在1966—1976年發表作品的作家都小心翼翼地繞開1960年以來的政治發展。1967年，有消息傳胡萬春正著手寫一部關于紅衛兵的小說和一篇關于上海“一月風暴”的短篇小說。[[12]](#_12_Hong_Wei_Bing_Bao_Zhi___Jing)但由于官方對紅衛兵和上海“一月風暴”的評價不斷改變，所以，這兩篇小說最終沒有問世，其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

金敬邁提供了另一個相反的例子。1965年，他的小說《歐陽海之歌》在《收獲》雜志上發表，同年又出版成書，1966年4月，出了修改后的第二版，后來又作了進一步的修改，并于1967年5月再版。[[13]](#_13_Xiang_Xi_Qing_Kuang_Jian_D_W)歐陽海1963年死于一次事故，這位軍隊英雄的事跡是金敬邁這部小說的主要素材。在小說第一版里，金描寫了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對歐陽海的積極影響，后來他修改了這一段，加進了涉及毛主席著作的內容，還贊揚了林彪。1971年林彪失寵，這種改法又過時了。最后，到1979年出了新版，但又出早了，它沒來得及增加對已故的劉少奇的贊頌。

《歐陽海之歌》的命運代表了中國小說家進退兩難的處境。一方面，他們有責任表現社會主義革命中英雄人物的形成，但是一旦進入細節，提及最新的政治指示和文件，他們就冒著這樣的風險：在其小說準備付印時，黨的路線可能已經變化。如果黨的路線不因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動而變化，或至少不像60年代末和70年代那樣變得眼花繚亂，那么，服從黨的路線（黨的精神）和藝術概括（典型化）之間的進退兩難的處境就會有所好轉。

小說除了要優先反映人民共和國的早期歷史外，還有其他許多禁錮。小說是沒有什么心理活動余地的，因為小說的主人公都要有幾分馬克思主義知識，而馬克思主義有使主人公在困難的情況下化險為夷的威力。小說的作者及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性格外露的人，所進入的是一個假想的客觀世界，沒有時間也沒有理由去反省和懷疑，因為據說馬克思主義能為實現正確的目標提供正確的指導。如果主人公的動機沒有心理條件為基礎，作者就必須從社會和經濟的決定因素中尋找動機——總而言之，從階級沖突中尋找。實際上，1966—1976年間的所有小說都是沖突的小說，所有的沖突，根據毛澤東的說法，歸根結底都是階級的斗爭（階級斗爭是不可能和人性發生沖突的，因為毛澤東不承認超越階級差別之上的人性的存在。此外，與自然災害的斗爭也被當做階級斗爭來解釋，因為不同的階級對災難會有不同的反應）。

不過階級斗爭可用不同的手法來處理：（1）公開的階級斗爭，它的弊端是從開頭就能預知到結局；（2）隱蔽的階級斗爭，它卻可能引誘作家以贊賞的筆調描寫階級敵人，以懷疑的手法寫無產階級英雄；（3）類似階級斗爭，把斗爭變為一種誤會，一次考驗，一場玩笑。中國作家一直很喜愛這后一種辦法，如浩然，他在作品中用類似階級沖突的手法描繪出相當于一首文學的田園詩，一個沒有麻煩問題的社會。[[14]](#_14_Ru___Yan_Yang_Tian_____Yi_We)

雖然人物刻畫的規則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時有變化，但下面的概括是有根據的：70年代初，小說中（以及小說外）的階級敵人以前是一個地主或富農，一個國民黨員，一個書呆子，一個官僚，或一個自私自利的人，通常他是一個老頭，如果是年輕人，他受了在資本主義舊社會腐化了的老者的欺騙。階級親人是窮人，出身無產階級，是黨委委員，他們與其他進步人士保持良好關系，并關心別人。

還有下列變化：“文化大革命”頭兩年中，一種傾向是把共產黨員的黨票授予有缺點的英雄，如1967年版《歐陽海之歌》中的一些章節。但很快就不允許了，黨員的身份留給了完美的英雄，如同“文化大革命”前一樣。學習材料也從“文化大革命”頭幾年贊揚有缺點的英雄變為后來幾年贊揚完美的英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的作者驕傲地把其中的一章定名為“我要讀書”。中國作家須為某種政治目的而改變敵人和英雄的性格，這使作家的創作任務更加艱難了。事實上，作家在寫小說時便是當時政治形勢的俘虜，他必須不時修改寫作計劃，以適應要他遵守的政治指示。一旦政治形勢變化，作者必須修改作品，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幾位作家一樣。

長篇小說適應不了這種變化的要求，而短篇小說和詩歌這樣較短的形式則游刃有余。這種要求也有利于舞臺演出：京劇、歌舞及現代話劇，它們都靠口頭表演，因此容易隨莫測的政治氣氛的變化而作出調整。

## 現代革命題材的京劇樣板戲

1949年以來一直在進行京劇現代化的嘗試，《白毛女》是（1958年）第一批現代京劇之一，它源自一出傳統秧歌戲，“文化大革命”期間，它的情節被編為一出同名芭蕾舞，并被列入幾出“革命樣板戲”之列。“革命樣板戲”這個名詞是江青1967年11月12日提出的，[[15]](#_15_Can_Jian_D_W_Fu_Ke_Ma___Mao)她把這一時刻視作與文化部門在演出傳統戲問題上作斗爭的一個勝利（雖然事后發現這場勝利付出了很大代價）。在1964年6—7月間舉行的現代題材京劇匯演中，彭真、陸定一堅持仍可上演歷史劇。陸定一主張上演那些“好的傳統劇目，例如三國戲，水滸戲，楊家將戲等。也不反對演出一些好的神話戲，例如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等”。[[16]](#_16_Lu_Ding_Yi___Zai_Jing_Ju_Xia)在參加匯演的戲劇工作者出席的一個座談會上，江青的講話卻大異其趣：

當然，要在不妨礙主要任務（表現現代生活，塑造工農兵形象）的前提下來搞歷史劇。傳統戲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戲和歌頌投降變節的戲以外，好的傳統戲都盡可上演。[[17]](#_17_Jiang_Qing___Tan_Jing_Ju_Ge)

這里，陸定一和江青都提到了那些將鬼神擬人化的戲應否上演的問題。1961年，吳晗曾從歷史觀點為上演鬼戲辯護。[[18]](#_18_Wu_Han___Shen_Hua_Ju_Shi_Bu)

然而，這不單單是岌岌可危的鬼戲上演的問題，而且也涉及神話及傳統道德的價值。在《矛盾論》（1937年）中，毛澤東曾分析道：“最好的神話具有‘永久的魅力’（馬克思）。”[[19]](#_19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吳晗曾引用了這句話。對禁演傳統戲的反抗加強了，這顯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人民日報》1966年12月4日報道，江青對京劇現代化的嘗試由于缺少京劇團體的合作而長期受挫，到1966年，北京京劇一團、中國京劇院及其他幾個劇團并入軍隊并實行軍事化管理后，情況才得以改變。直至此時，擁有人民解放軍文藝工作顧問正式頭銜的江青，才得其門而入，著手實施她的京劇現代化計劃。從意識形態觀點來說，這項工作極其重要，但也應該提提數量方面的問題。現代話劇從來沒有像京劇那樣普及。1964年，中國有3000個專業劇團，而據江青說，只有不到100家劇團在演現代戲，2800多個專演各種傳統戲。[[20]](#_20_Jiang_Qing___Tan_Jing_Ju_Ge)

1967年11月被江青封為戲劇樣板的五個現代題材的京劇劇目是：《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紅燈記》、《海港》。其中沒有一個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頭兩個戲的劇本最早完成于1958年，其他幾個1964年以后就有了。[[21]](#_21_Can_Jian_Zhao_Cong___Zhong_G)不過，在重新改編后的劇本里，舞臺上再現了毛主義的道德觀，并試圖制造一個毛主義的新神話。

除《海港》外，它們的題材都涉及戰爭和反抗。新的毛式英雄的確切形象應該怎樣，并不是一下就明白了的，劇本經過了反復的修改。《智取威虎山》劇本1967年有一版，1969年10月又出了一個修改本，它沒有提到前一個版本，這是一個獨特現象，好像要有意抹掉歷史。《智取威虎山》的劇情取材于1957年出版的曲波的長篇小說《林海雪原》。與上述情況相類似的是，在歡天喜地討論這出戲時，卻完全對原小說置之不理，這也許可解釋為對劇本歷史的一種否定態度。有一次還以詆毀的態度對1967年以前該劇本的歷史進行了討論。在眾多劇本的修改過程中，主要人物的形象都曾作了美化，這一點是很明顯的。為了增加可信度，楊子榮最初被描繪成一個帶有土匪習氣的人，他哼著黃色小調，和他的對手座山雕的女兒調情。但“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有人對此作了重新審議，并刪去了上述情節。楊子榮原來的形象被斥為“宣揚劉少奇反革命盲動主義、冒險主義、軍閥主義軍事路線的活典型”。[[22]](#_22_Shang_Hai_Jing_Ju_Yuan___Zhi)重新塑造的楊子榮這一角色，為仿造毛式英雄提供了榜樣，并被賦予了清教徒式的面目。

1963年開始宣傳戰士模范和工人模范，京劇樣板戲中英雄人物的道德風范從這些英雄模范中獲得靈感。雷鋒、歐陽海、王杰、麥賢得是這些模范人物中的著名榜樣，而他們又是從張思德的事跡中得到了啟發。在中國，模仿英雄人物的歷史就同儒家學說那樣源遠流長。紀念張思德就是制造毛式英雄的肇始，張思德因毛澤東1944年發表的簡短而重要的講話《為人民服務》而名垂千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篇文章是所謂的“老三篇”之一，并印行數百萬冊。張思德是中共中央警衛團的戰士，1933年參加革命，經過長征，在執行任務時負過傷。1944年在陜北安塞縣山中燒炭時，因炭窯突然倒塌而犧牲。他死于大火。

張思德能作為所有現實和文學作品中毛式英雄榜樣的原因，在于他為革命而盡職盡責，為革命而英勇犧牲。他在軍事和生產戰線兩方面都很出色，這是典型之處。在張思德身上，人們看到了從事生產的游擊戰士和隨時準備戰斗的工人的形象，很重要的是，他沒有看到共產黨政權的建立，他不過是從不間斷的革命連環中的一環，這場革命是永無止境的。1967年秋，以他的事跡為劇情，上演了一出名叫《張思德》的戲，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興趣。

京劇現代戲中的英雄人物，包括清教徒式的楊子榮，都與張思德有許多共同特征。他們與張思德一樣，對毛澤東忠貞不渝，富有紀律性和戰斗精神，毫不利己，堅信共產黨一定勝利，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個英雄人物是樣板戲《紅燈記》里的李玉和。1970年發表在《紅旗》雜志上的該劇劇本是根據翁偶虹和阿甲的老劇本改編而成的，以適應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鐵路扳道工李玉和須將一份密電碼送到一支游擊隊手中，但未能完成任務，他的女兒繼承了他的事業，這樣，革命工作沒有中斷。由這位扳道工的紅燈所代表的革命傳統由父親傳給了女兒。他在日本人的嚴刑拷打下堅貞不屈，為使革命繼續進行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這出戲沒有什么戰斗場面，李玉和在日本人的監禁下頑強反抗是本劇的主題。按京劇套路所要求的傳統方式，李玉和受刑后在舞臺上跌跌撞撞，控制著自己的姿勢，他的身上血跡斑斑，而其精神卻是不可戰勝的。

為表現符合毛主義道德規范的英雄，京劇這個形式顯然是提供了受人歡迎的機會，它場面壯觀，故而心理刻畫雖大大減少但仍引人入勝。在京劇場面里，有傳統的唱段和音樂，有高度表達主題的手勢和動作，有武打動作以及舞臺藝術。但是為了表現革命的理想而回到傳統的風格，頗有點自相矛盾。在道德標準上，毛主義和儒家學說有某些相似之處，但不很多。儒家學說也樹立楷模，也是教訓人的，毛主義和儒學都從空想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儒家理想中的廉正的清官（如《海瑞罷官》所表現的）是從他們個人的義務感和誠實感中汲取道德力量的，這與列寧的順從思想是不相容的——列寧將革命比喻成機器，人則是機器中的一個“齒輪”。這一差異可能與當代遠為發達的通訊系統有關（但不能完全這么解釋），如果沒有無線電和電話，“文化大革命”也許不可能發生，這個假定似乎是正確的。

在某種程度上說，毛式英雄與儒學以外的傳統有關，例如俠客傳統，他們機靈、愚忠、扶弱濟貧，這些品格在傳奇小說均有描述。一個不同點是，毛式英雄盼望共產主義社會，而俠客通常忠于被推翻的朝代；另一個不同點是，如同詹姆斯·J.Y.劉[[23]](#_23_Zhan_Mu_Si__J_Y_Liu____Zhong)所解釋的那樣，俠客一般都是獨來獨往我行我素的江湖英雄，自己認為怎么合適就怎么干，無須征求他人意見，也不管當權者持何態度，而毛式英雄符合列寧的比喻，必須遵守黨的紀律，必須按最新的意識形態規定來表現。作為政治家手中的工具，毛式英雄在制造一個新的神話方面是不成功的，京劇樣板戲的觀眾們對于傾軋、敲詐、非法拘監、自殺、暗殺太了解了，他們是不相信那些戲劇化的共產黨員的行為舉止的。

## 1976年和“傷痕文學”的產生

1976年4月的清明節幾乎是專門用來紀念當年1月逝世的周恩來總理的。在北京，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他們獻花圈、發表講演、朗誦詩歌，想以此來悼念總理，聯想到“五四運動”，這次自發的示威被冠以“四五運動”之名。但是，工人民兵、警察被用來鎮壓這場示威，4月8日的《人民日報》稱示威為反革命運動。“四人幫”的這個定性直到兩年多以后，即1978年11月21—22日，才被揭發和推翻。此后，過去只能秘密流傳的悼念周恩來的詩集，得以正式出版。

只是在推翻了對天安門事件的結論以后，文化氣候才開始有了決定性的變化。“文化大革命”期間受批判、遭逮捕的作家恢復了名譽，這又被看做新的信號：新政治領導人贊成對文學藝術采取一項不同的政策。

1978年公開平反的有：艾青（詩人，1957年遭批判，1958—1976年被送到新疆勞動改造）、周立波（小說家，1966年受迫害）、周揚（文藝理論家，官員，1966—1967年坐牢）、劉白羽（短篇小說作家，官員，1967年受批判）、夏衍（劇作家，官員，1965年受批判）、歐陽山（小說家，1965年受批判）、王若望（評論家，短篇小說家，1957年和1962年受批判、坐牢）。

1979年平反的有：陳荒煤（評論家，1966年遭迫害）、周而復（小說家，1969年遭批判）、廖沫沙（雜文家，1966年遭批判）、劉賓雁（短篇小說家，1957年受批判）、丁玲（小說家，1955年、1957年遭批判，1958—1970年被送到東北勞改，1970—1975年坐牢，1975—1978年在人民公社）、王蒙（短篇小說家，1957年遭批判）、吳強（小說家，1968年遭批判）、陽翰笙（劇作家，1966年遭批判）、楊沫（小說家，1967年遭批判）。

對有些作家來說，平反來得太遲了。1978—1979年間，被宣布平反的已故作家有：趙樹理（小說家，1967年遭批判，1970年死于獄中）、馮雪峰（評論家，詩人，1957年遭批判，1976年因長期患病而死）、老舍（小說家，1966年遭批判，同年自殺或他殺）、柳青（小說家，1967年被捕，約在1977年死于獄中）、羅廣斌（小說家，1966年遭批判，1967年自殺或他殺）、邵荃麟（文藝理論家，評論家，1964年遭批判，1971年死于獄中）、陶鑄（評論家，官員，1966年被捕，1969年死于獄中）、鄧拓（雜文家，1966年遭批判，同年自殺或他殺）、田漢（劇作家，1964年遭批判，1966年被捕，1968年死于獄中）、吳晗（劇作家，雜文家，1965年遭批判，1966年被捕，1967年自殺）。

平反通常是無條件的。鄧拓的《燕山夜話》（1961—1962年）曾于1966年5月遭到最殘酷的批判，1979年，北京出版社重印了15萬多冊。其他在“文革”期間受迫害的作家的作品也得以重新發行。最后，胡風（1955年被捕）于1981年獲得平反。同時，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及30年代的文學作品、歐洲文學作品被重新發掘出來了。1978年出版了巴爾扎克、高爾斯華綏、薩克雷、馬克·吐溫、莎士比亞作品的譯本，這一勢頭在以后幾年里繼續發展。

在新作家中，劉心武是第一個尖銳地涉及“文化大革命”惡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班主任》（1977年）引起了全國的矚目，[[24]](#_24_Liu_Xin_Wu____Ban_Zhu_Ren)它觸及了被“文化大革命”犧牲了的年輕人的犯罪及犯罪滲入他們正常生活的后果，盧新華是另一位很快就聲名鵲起的年輕作家，在小說《傷痕》（1978年，也譯作《傷口》）中，他按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捕后劇烈變化的政治氣氛，分析評價了一個所謂進步的女兒和她所謂修正主義分子的母親之間的關系。這篇小說獲了獎，并被收入一短篇小說集再次發行。[[25]](#_25_Lu_Xin_Hua____Shang_Hen)這部短篇小說集引起了廣泛的注意。盧新華的小說成了“傷痕文學”的典型，這是描寫正直的人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文學。這種暴露文學確實具有真誠的激情，但看來它們也服務于一個政治目的：加強了旨在徹底消除“文化大革命”后果的鄧小平派的力量。加入清算“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隊伍的作家還有：陳國凱、茹志鵑、高曉聲、王亞平。他們的作品也時常影射“大躍進”。劉賓雁和王蒙是1956—1957年“百花齊放”期間活躍一時的作家，現又重新登場，并異常活躍。

偶爾也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夸大“文化大革命”的消極面是否明智？1979年7月31日，李準在《人民日報》提出對（“文化大革命”中）道德敗壞和經濟混亂情況的描寫要有節制。王若望，這位反右運動的受害者在談到同一問題時則為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傷痕小說辯護。周揚以全國文聯副主席的身份支持王若望的觀點。[[26]](#_26_Zhou_Yang_De_Yi_Jian_Jian)周揚在度過了10年牢獄生活后，已恢復了1966年以前的眾多官銜，但是他的權威已不能同“文化大革命”以前同日而語了，這不光是因為他老了，而且他現在也希望與他過去在反右運動中反對過、甚至將他們投入監獄的作家如劉賓雁（短篇小說家，1957年受批判）、丁玲、王若望等人合作。在為王若望辯護時，他解釋道，延安《講話》提供了行動的準則，但不能作教條的理解。與上海座談會相反，他強調文學創作的特殊性：“領導經濟工作，不能違反經濟規律……領導文藝工作，也應當按照藝術規律辦事，否則，也會失敗。”[[27]](#_27_Zhou_Yang___Ye_Tan_Tan_Dang)雖然周揚沒有詳細闡述“文藝規律”，但在黨性與人物典型化的緊張關系中，他打算把全部重點放在藝術創作，或者說“典型化”之上，這一點是很明確的了。和周揚一樣，其他評論家也都提到了“百花齊放”時期曾經爭論過的問題，舊話題又被重新提起，有時是被原來的同一個倡導者——如果他們幸免于“文化大革命”之難的話。開明的評論家強調藝術和宣傳的不同，并倡導擴大現實主義這個概念的內涵，王若望和秦兆陽是其中的兩位。

1981年因劇本《苦戀》而引起的爭論，在國內和國外都被認為是對創作自由的一個考驗。4月20日，《解放軍報》指責作者白樺否定愛國主義，對黨的政策不滿。白樺和劉賓雁曾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上最大膽的直言者中的兩位，他們悲嘆虛偽在增加，不敢相信朋友，不敢保留日記。白樺還贊揚了獨立思考的青年作家的勇氣和能力。[[28]](#_28_W_J_F_Zhan_Na___1979Nian__Zh)兩年后，他的作品遭到了批判，在評價這廣泛批判時，不應忽視的是白樺是解放軍文化部門的一名軍官，這使他的案件特別微妙。此外，人們從一開始就被告知，這場批判不是一場反對作家的運動的開端。遲至1983年7月，《北京周報》突出報道了白樺在繼續從事創作，最近曾有他的一出戲在北京上演。對白樺的批判不僅顯示了創作自由的限度，而且還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兩難困境：如何允許中國知識分子有相當程度的自由，而又不使這種自由打亂以至完全破壞黨所喜愛的意識形態結構。也許，這種兩難困境只有到共產黨停止對文化生活的監督以至最終解除黨對文學藝術新潮流的責任之時才能擺脫。

保守的共產黨領導人及他們在知識界的代理人日益擔心中國知識分子使用與“公開性”（glasnost）相類似的用語。他們利用鄧小平本人對混亂局勢的憎惡，于1983年下半年至1986年初發動了短暫但有恐嚇性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并于1987年初清理了像作家劉賓雁、物理學家方勵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蘇紹智、大編輯王若水這樣杰出的知識分子。這場清理是緊隨1986年學生示威、胡耀邦被撤銷總書記職務之后的事。但是，作家的自由仍然比1949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大。至少，文學創作很快就與“文化大革命”時代大不相同。雖然社會和政治條件仍決定著文學的主題，但也與“文化大革命”時的情況有極大的不同，流行題材很多，有官僚權力與個人責任之間的關系、希望與幻滅、母女關系、父子關系、愛情、藝術創作、貪污、犯罪、裙帶關系等。

由于有了心理描寫的新的機會，王蒙（后來當了文化部長）和茹志鵑便嘗試運用意識流的技巧及敘事手法。意識流可以不遵循事件的時間順序。中國小說中出現的自我反省，作為一種文化價值，其重要性估計再高也不算過分。每人憑自己良心作出決定，而不再無條件服從黨的指示。不管這一趨勢的政治前途如何，至少它產生了活生生的、多種多樣的文學成果，完全使江青曾經保護過的十幾個樣板戲作品黯然失色。

[[1]](#_1_7)詹姆斯·R.普西：《吳晗：借古諷今》，第35頁。

[[2]](#_2_7)邁其高·克萊尼：《中國文藝與政治評論：周揚的文藝政治觀》，第193頁。

[[3]](#_3_7)D.W.福克瑪、埃爾魯德·伊布斯奇：《20世紀的文學理論》，第107頁。

[[4]](#_4_7)默爾·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建議和異議》，第123—124頁。

[[5]](#_5_7)《紅旗》1967年第9期，第11—21頁。

[[6]](#_6_7)林豆豆：“林副主席論寫作”，《火炬通訊》（1968年7月）。

[[7]](#_7_7)“座談會紀要”，第231頁。

[[8]](#_8_7)引自《中國文學》英譯本第1期（1972年1月），第52頁。

[[9]](#_9_7)見他的詩“笑”，載李瑛的《棗林村集》第71—73頁；《中國文學》英譯本第8期（1972年8月），第33—35頁。

[[10]](#_10_7)李希凡：“舊式的知識分子”，《中國文學》第12期（1972年12月），第24—32頁。

[[11]](#_11_7)高玉寶：“我是怎樣成為一名作家的”，《中國文學》第6期（1972年6月），第111—118頁。

[[12]](#_12_7)紅衛兵報紙《井岡山》1976年4月7日；《北京工人》1967年5月27日。

[[13]](#_13_7)詳細情況見D.W.福克瑪：“‘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文學”，《東西方文學》1969年第13期，第335—358頁。

[[14]](#_14_7)如《艷陽天》，譯文出自《中國文學》第4期（1972年4月），第13—28頁。

[[15]](#_15_7)參見D.W.福克瑪：“毛主義的神話及其在新京劇中的體現”，。《亞洲季刊》1972年第2期，第341—361頁

[[16]](#_16_7)陸定一：“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開幕式上的講話”，載《文化戰線的一個大革命》，第68頁。

[[17]](#_17_7)江青：“談京劇革命：1964年7月在出席京劇現代戲匯演的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文學》第8期（1967年8月），第120頁。

[[18]](#_18_7)吳晗：“神話劇是不是宣傳迷信？”，《中國青年》1961年第15期。

[[19]](#_19_7)《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41頁。

[[20]](#_20_7)江青：“談京劇革命”，第119頁。

[[21]](#_21_7)參見趙聰《中國大陸的戲劇改革》。樣板戲被拍成了電影，它們是“文革”期間制作的僅有的幾部電影，1966年前拍的電影幾乎全被打人冷宮。見保羅·克拉克：“70年代的電影業”，載于邦尼·S.麥克杜格爾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通俗文學和表演藝術（1949—1979）》，第177—196頁。

[[22]](#_22_7)上海京劇院《智取威虎山》劇組：“努力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贊揚楊子榮等英雄形象的塑造”，《中國文學》第1期（1970年1月），第62頁。

[[23]](#_23_7)詹姆斯·J.Y.劉：《中國文史中之俠》。

[[24]](#_24_7)劉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第16—29頁；英譯本《中國文學》1979年1月號，第15—36頁。

[[25]](#_25_7)盧新華：《傷痕》，《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作品集》，第244—258頁。

[[26]](#_26_7)周揚的意見見《中國文學》第1期（1980年1月），第94—95頁。

[[27]](#_27_7)周揚：“也談談黨和文藝的關系”，《紅旗》1979年第11期，第27頁。

[[28]](#_28_7)W.J.F.詹納：“1979年：中國文學的新開端”，《中國季刊》第86期（1981年6月），第294頁。

# 第四篇 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生活和文學

## 第九章 共產主義統治下的農村

毛澤東在他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描述了“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這些繩索代表了四種權力的束縛：

（一）……國家系統（政權）；（二） 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 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1]](#_1_Mao_Ze_Dong___Hu_Nan_Nong_Min)

為取得政權，中國共產黨人努力通過砸碎這些權力的束縛建立起一個農民支持的政權基礎，并且他們在1949年取得政權后，仍堅持不懈地實現這一進程。雖然他們所做的努力確實促成了中國農村生活結構的重大變化，但傳統的農民生活方式似乎比共產黨指望的更具有彈性，生活方式方面實際發生的變化也與他們的初衷大相徑庭。

## 建立一個新的經濟和政治制度，1949—1955年

#### 中國農村社會的結構

即使在今天，當中國農民討論他們村莊的大小時，也通常指有多少戶而不是有多少人，這是把個人主要看做一個家庭（他的或她的）的親屬的長期傳統的結果。作為中國農村基本生活單位的家庭，最理想的是一對夫婦和所有的兒子、兒媳及孫子、孫女幾代同堂。然而，實際上，這種大家庭的理想很少能實現，因為維持這樣一個大家庭需要中等以上的家產，并要依賴十分嫻熟的理家經驗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2]](#_2_Guan_Yu_Zhe_Fang_Mian_De_Fen)比較典型的家庭通常只有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可能還包括丈夫年邁的雙親。中國家庭基本的社會結構歷來是家族制和家長制，丈夫比妻子權大，父母比兒子權大，年長者比年輕人權大。把家庭看做凌駕于家庭成員中的任何個人之上已經成為一種生活的準則。某種程度上，家庭除在世的外，還包括死去的祖先，由此產生的特定的倫理責任是基于一種廣泛的血緣關系。在這種廣泛的血緣關系里，以叔叔、伯伯、侄子、堂兄弟等為代表的男性通常靠直系的關系形成了家庭中的核心。在共產黨解放中國以前，這個家庭單位的經濟基礎是一小塊土地，擁有一小塊土地是他們的理想，但通常只能租地，生產的糧食除了自己家里吃以外，還拿到當地市場上變賣，換一些生活必需品。

雖然家庭是農民社會生活的中心，但傳統的中國農民家庭生活是不能自給自足的。許多戶農民同住在一個村子里，戶與戶之間經常沾親帶故，他們以復雜的方式進行互相協作、互相競爭。[[3]](#_3_Jian_Mo_Dun__Fu_Li_De___Zhong)村民們經常到村外去買和賣、借和貸，為他們的兒子尋媳婦、為女兒找婆家。或是尋找政治保護和求神靈保佑。這些活動通常集中在一個市鎮上，市鎮可能是18個左右村莊的經濟和社會中心。在這樣的市鎮里，你會發現糧店和木匠鋪、診所和錢莊，以及各種各樣的酒店、茶館和寺廟。定期地，也許每五天，或者有時每三天或每隔一天有次集市，周圍村里的人們混雜在人群中與來回吆喝的小販們討價還價。集市上，從蔬菜、家畜到衣服和手工農具等東西都可以買賣。

然而，這種本地市場關系從來不純粹是經濟關系，還受習俗的驅使和深刻在人們心中的人與人交往中的忠誠的影響。臺灣的一位農村婦女，在與人類學家馬杰里·沃爾夫談起農村小店店主的苦衷時，指出：

如果你沒有很多錢，開一個鄉村小店真很困難，因為你認識了幾十年的鄰居和所有親戚沒錢卻來要東西，你不得不給他們。你知道，有時如果你賣給這個人東西，他卻不給你錢，當你要他付錢時，他就會暴跳如雷，說你不尊重他，并且跑到周圍的人那兒說你侮辱了他的家庭。假如你不賣給這些人，他們就對你很生氣，但如果你給了，你就不可能賺錢。在鄉村開店確實很難。[[4]](#_4_Ma_Jie_Li__Wo_Er_Fu____Li_Jia)

中國農民經常談起每天生活所必需的超越家庭關系的一個詞“Kan ch’ing”，這詞的實際意思就是“感情”，這種關系通常的意思是指施恩的長者與接受恩惠的少者之間的聯系。在傳統的農村生活中，每份“感情”皆有所不同，其力量和彈性取決于親屬一方的個人性格和通過各種關系換來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精確的數量和質量，以及“感情”發展的特定歷史。[[5]](#_5_Mo_Dun__Fu_Li_De_Zai___Zhong)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后，中國人生活的這種基本結構在社區安排方面在全國各地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村子的規模和社區固定的方式南北方各不相同，南方一些地方每個村莊可能有500戶人家（約2500人），每家都認為他們是同祖同宗，組成了單一的共同家族，這個家族中的幾個長者是正式的領袖。[[6]](#_6_You_Guan_Zhe_Fang_Mian_De_Qua)而中國北方一些地方的社區可能只有50戶家庭，這些家庭代表幾個不同的家族。市場網絡的規模和復雜性方面也不相同。

經濟和社會差別的具體情況在村與村、集市區與集市區之間也有很大的不同。幾乎所有的村都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家族土地很多，而另一部分則很少。那些土地很多的家族自己種不過來，就把他們剩余的地租給那些缺地的人家。一些地主通過出租土地獲得的收入就足以養活自己，因此他們不需要自己再下地干活。其他不夠富裕的地主除了出租土地獲得的收入外，自己也種地。完全靠租地耕作的家庭，常常必須把40％的收成作為租金交給地主。在大部分村，總有一些無法租到土地的家庭，因此就被迫做雇工。但是地主與“貧雇農”的比率各地差別很大。在一些土壤非常肥沃的地區，地里收成很好，擁有土地便成了一項非常賺錢的投資，村里貧富兩極分化，一部分是家產萬貫的地主，另一部分是一大群佃農。在土地較貧瘠的地方，有一小塊能養活自己的土地的中農居多，只有少數地主過著表面富足實際貧窮的生活，貧農和雇農相對也要少一些。同樣，有些集市區是由財富和勢力相當的村子組成，而其他集市區則明顯不同。[[7]](#_7_Zai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

地多與地少的人之間的關系在本質上也很不一樣。許多有錢的地主已經離開村莊到了城里。家里沒有人來管他們的佃農。因此，往往由當地一些殘酷的中間人來代管，窮人非常恨這些貪得無厭的寄生蟲。其他地主，可能還不是特別有錢，仍住在本村，他們靠血緣關系或者靠強有力的“好感”來管理他們的佃農，血緣關系和“好感”至少使一部分佃農對這些地主很忠誠、很尊敬。[[8]](#_8_Mo_Dun__Fu_Li_De____Zhong_Guo)

每個社區貧富的實際情況各不相同，并不斷在變化。即使在收成好的年份，許多窮人家庭糧食還是不夠吃，更不要說治病和婚喪嫁娶了。農閑季節家里的一些人能到城里干點手藝活的這種家庭一般能維持生計。三四十年代社會和政治的動蕩引起巨大的社會變遷，因此，許多地主因戰亂、經商虧本、抽鴉片或賭博而破產。也有許多中農甚至貧農一下子暴富起來（絕大部分是通過走私鴉片等非法活動發家的）。[[9]](#_9_Guan_Yu_Zhe_Zhong_Fu_Za_Qing)

所有這些復雜的因素常常導致中國共產黨所稱的中國農村“階級覺悟水平低”。貧雇農沒有充分意識到為了共同利益，須要團結起來反對本村有錢的地主。的確，當大多數農民第一次聽到共產黨的階級分析理論時，覺得這套理論是外來的，感到很新奇。這個理論首先包含了一些新術語：鄉村社會被分成“地主”、“富農”、“中農”（以后更進一步分成“上中農”和“中農”）、“貧農”和“雇農”。雖然村民們都清楚地知道他們在當地社區中的經濟和政治差別，但他們平常不愛使用這些詞，來明確與有權有勢階層之間的差別。[[10]](#_10_Li_Cha_De__Ma_De_Sen____Zhon)甚至當他們學會使用這些詞時，他們也不一定認識到他們以前的忠誠是由這種差別決定的。共產黨的土地改革運動就是根據這種設想，認為人的主要利益和人的主要義務應該這樣來決定。

土改運動的目標是瓦解這種“封建家長式”的關系（地方社會就是通過這些關系而組成復雜形態的），并以重新組織的、階級分明的結構取而代之。但中國社會的結構與這種簡單的劃清界限是相抵觸的。當土地改革的進程觸及那種生活結構時，它產生了豐富多彩的人類實踐經驗的類型，而這些類型與共產黨對土地改革應該如何進行的官方規定又不完全適合。

#### 土改

土改的歷程各不相同，這首先取決于土改發起的確切時間。在共產黨所稱的“老革命根據地”，如陜西延安周圍，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就已經建立了共產黨，這里的土改是在迫在眉睫的內戰煙云籠罩著政治和心理的氣氛下，于1946年剛過就開始的。指導這次土改的政策是激進的，強調徹底剝奪富人的財產，鼓勵使用暴力。在這種情況下，常常發生如劉少奇后來所述的“不加區別的亂打濫殺現象”。[[11]](#_11_Liu_Shao_Qi_1950Nian_6Yue_14)有時一些村民把土改作為清算個人宿怨的借口，將自己在村里的冤家對頭劃為地主，而實際上這些人最多只能劃為中農。當“斗爭的成果”——重新分配的富人財產——根本不足以使貧農們擺脫貧困時，貧農們就試圖把那些僅比他們擁有稍多一點土地的農民重新劃為地主和富農。[[12]](#_12_Xin_Dun____Fan_Shen_____Di_2)這些漫無約束的農民的激進主義常常由于其摧毀了擅長耕作的農民從事農耕的積極性而導致經濟上的危機。毛澤東1948年春的一次講話標志著激進路線的結束。他指出前一時期的土改路線是基于絕對平均主義的“左”傾。土改的直接目的是發展農業生產，這就要求土改必須采取“循序漸進、區別對待”的方法。農民被重新劃分了階級成分，那些曾經被不恰當地剝奪了財產的人獲得了補償。[[13]](#_13_Tong_Shang_Shu__Di_479__508Y)

在“老解放區”（像中南部省份湖北和湖南），土地改革始于1948年左右或者1949年初，這是在溫和得多的路線起作用后在共產黨已有把握將最終戰勝國民黨的形勢下進行的。群眾被較為嚴密地控制，地主被允許保有足以謀生的財產，富農則繼續擁有其大部分的土地、農具、牲畜。[[14]](#_14_Guan_Yu_Gai_Di_Qu_Tu_Gai_Xia)

在“新解放區”（如南部省份），土改在1949年之后才開始，它遵循1950年6月頒布的更為溫和的土地改革法，強調保持“富農經濟”的必要。然而到了1950年10月，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開始執行的是一個強硬得多的土改路線。大約有80萬地主最終作為“反革命”被處決。[[15]](#_15_Ben_Ni_Di_Ke_Te__Si_Ta_Wei_S)

土改通常在村一級開始，隨著一個由十多個外來干部組成的“工作隊”進駐而展開。這十多個干部里約半數是熟悉當地情況的農民，半數是城里人，通常是知識分子，被下派到農村，以證明他們對黨的事業的忠誠以及在土地革命的烈火中培養革命精神。一個地區土改的基調，通常是根據工作組在精心選定的幾個村作“試點”取得的最初經驗而定。

工作隊在最初幾個星期里生活在村里，幫助農耕，熟悉本地情況。在附近城里的上級官員的密切監督下，工作隊對村民家庭的階級狀況作一個大致的估計。階級成分的劃分依據是村民們當時（或土改三年前）擁有的土地數量以及他們的收入中來自于出租土地及雇工等剝削收入所占的比重。貧雇農被邀請參加貧農團（貧農團由工作隊密切指導，工作隊本身由一個黨組織機構嚴密指導）以幫助決定村民們各應屬于什么社會階級。最初劃分的成分可能根據農民的意見或上級指示而多次修改。

將村民劃分階級是土改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一個人的名字在工作隊張貼于村中心開會處的官方公告中所列的位置將不僅決定他在土地再分配中的得失，而且決定隨后數十年官方對其政治可靠性的評判。在有些場合下，這一劃分甚至可以決定其生死。農民認識到劃分誰應該屬于什么階級的過程肯定是極不精確的，這肯定已引起許多農民的極大不安。

在土改初期，決定誰是地主、富農……的官方標準是模糊不清的。即使后來一個詳細規定如何劃分階級的細則取代了原來那個草略的大綱，大量模糊不清之處依然存在。一個家庭究竟擁有多少數量的土地？即使丈量可以得到這一精確數字（由于缺少官方記錄，通常這也是一個棘手的難題），仍須考慮這些土地中究竟有多少是價值高的肥沃土地，有多少是只能勉強耕作的土地，從而決定這些土地的真正價值。由于一個家庭擁有的土地通常是以小塊形式散布村中，作出這一估價將極為困難。一個人的收人究竟有多少來源于“剝削”？由于缺少系統的文字記錄，這一數字也很難得到。但是，這些數字很可能決定他被劃為富農還是中農。一個家庭的農具究竟值多少？其犁具是否已破爛不堪到不能使用，或者是還有價值的農具？其水牛或騾子是役齡將滿還是尚可長期役使？這些問題的不同答案就有可能使他被劃為中農或者貧農。一個看起來富裕的人有多少收人來源于其合法擁有的商業企業，如一個小藥店，又有多少來自于他在村中出租的小塊土地？這可能是區分他是一個地主或者只是一個小土地出租者的依據——在土改的某些時期，這一區分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生死。[[16]](#_16_Mu_Ji_Zhe_Guan_Yu_Zhu_Ru_Ci)

在政治高壓氣氛下，沒有經驗的工作隊干部們，他們自己也會處于來自上級相互沖突的政治壓力之下，可能會試圖向目不識丁的農民解釋這些復雜的差別。而農民與同村村民的關系有親有疏，為忠于某一派而不明事理。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能指望作出的結論會客觀準確而不帶感情色彩。事實正是如此。土改工作隊難以避免的錯誤帶來的遺產之一是一系列持久不斷的怨恨。這些幽怨成了隨后數十年形形色色的個人及政治沖突的根源。舉例來說，如果許多村民認為老王實際上應劃為富農而不是中農，如果老王具有全村里許多村民討厭的個人性格，村民們就會對老王發泄私恨，而這種發泄就可能引發或大或小的沖突。或者假如小李被劃為富農，而許多熟悉他的人認為他只應劃為中農，那么他的朋友們就會對負責把他劃為富農的人永遠耿耿于懷。

準確劃分農村人口階級成分的壓力使得在農村基層指導這一任務的工作隊干部們付出了代價。許多干部是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真心實意地試圖圓滿地完成這一任務。然而，他們不僅要對付當地農民的隱瞞行為和各種伎倆（傳統上這些農民不相信外人），例如地主將財產“贈送”給親友或將財產隱匿起來，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像窮人；再如，貧農們說，他們有些日子過得稍好一些的鄰居實際上比表面上更富有，等等；工作隊的干部們而且還要對付政府政策上的變化，諸如這個月說“地主”的界限要放寬些，而下個月則要求更嚴格些。有時候，他們還要在自己的良心和政府政策之間取得平衡，不管他們實際調查結果如何，政府至少含蓄地下個指標，要求在村里一定要劃定若干比例的地主名額。作為經歷如此遭遇的后果，有些干部政治上被毀了，或是心理上垮了，而不是在革命斗爭中鍛煉得更堅強。[[17]](#_17_Guan_Yu_Zhe_Fang_Mian_De_Xi)

階級成分劃定后，土改中的“斗爭階段”也就開始了。最壞的地主——其中那些曾犯有殘酷剝削和虐待佃戶罪行的人被稱為“惡霸”，另一些人則稱為“土豪”和“反革命”——被帶到村民大會上。在工作隊的指導下，村民們開始控訴，有時候是毆打（有時甚至打死）這些從前的地方精英。通常剛開始時，村民們不太愿意以這種方式批斗地主，或許他們與地主有著血緣或個人情感上的聯系，或許僅僅是出于對這些從前村里的頭面人物的尊重，有時則是擔心有朝一日地主會重新掌權。有時基層工作隊不愿積極消除農民的敵意，必須由上級向他們施加壓力，以推動農民們參加階級斗爭。一旦階級斗爭的冰蓋被打破，當地積極分子（通常是一些活躍而有政治抱負的年輕人）便開始出面帶頭斗爭地主，大量的批斗常常隨之而來。在醞釀對這些前地方精英發起群眾斗爭的過程中，共產黨試圖摧毀農村中這些地方精英傳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看來在很大程度上共產黨取得了成功。[[18]](#_18_Jian_Fu_Lang_Zi__Shu_Er___Go)

從中國共產黨的觀點看，摧毀中國農村中傳統權力結構這一政治性的任務才是土改的主要目標，然而，在農民看來，土改的主要目標則是經濟性質的。絕大多數貧農參加土改是出于獲得財富的愿望。在對地主（激進政策時期還包括富農）進行剝奪后，其絕大部分土地，連同由傳統組織如家庭、寺廟所擁有的全部土地，被重新分配給窮人。這一分配通常是經過誰是真正的窮人以及誰需要多少土地的激烈辯論之后進行的。如此重新分配的結果常常是村里每戶人家都擁有一小份土地：中農們保有其曾經擁有的土地，地主（那些幸免于被打死和被處決者）留下與中農相當的財產，富農（至少是在“維持富農經濟”政策時期）被允許留下其大部分土地和牲口，貧農獲得與他們從前曾經租耕的面積相當的土地（實際上常常就是其過去耕作的同一塊地），雇農獲得與貧農一樣多的土地。[[19]](#_19_Guan_Yu_Ge_Di_Shi_Ji_Tu_Di_F)不過，土地重新分配是以村為單位，而不是幾個村子在一起分，因此，一個富裕村里的貧農最終可能獲得比另一個貧窮村里的中農更多的土地和糧食。

#### 互助

20世紀50年代最初幾年里流行的官方口號是“發家致富”——鼓勵個人享受土改的成果。但是，絕大部分貧農幾乎沒有致富的現實希望，至少在近期內如此。的確，他們不必再為其耕作的土地繳納地租，但他們仍然要為其產品納稅。在50年代早期，雖然稅收政策也同其他政策一樣有很大波動，各地干部收稅方法也不盡相同，但是農村總的稅收負擔要比在舊政權下為重，盡管稅收負擔比過去要均勻得多。[[20]](#_20_Zhe_Zhi_Shao_Shi_Yang_Qing_K)雖然貧農在納稅后的盈余比在舊制度下交租后的盈余要多些，但他們仍窮；因為在舊制度下他們貧窮的一部分原因是要為其耕作的小塊土地交租；同時，也因為貧農在經濟、社會及個人方面都存在一些難以克服的制約因素。他們缺少農具及牲口，以便能夠有效地耕作其土地，同樣更為經常的是他們缺少信譽，借不到錢來改善其農業生產或者幫助家庭渡過難關。被困于不幸境地而難以脫身的窮人們還常常因為他們不能適應在村中具有支配地位的親情關系網，或者是因為其他什么的，而使他們逐漸疏離傳統上將村鄰們聯結在一起的良好情感這一紐帶。有些人的貧困則是因為家中缺少強壯的勞力，或者是因為缺乏從事有效勞動所需的技能、積極性、紀律。[[21]](#_21_An_Ni_Ta__Zhan___Li_Cha_De)

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是只靠簡單地重新分配村中的土地就能解決的，而有些問題甚至因為土改而變得更糟了，例如缺少農具和牲畜這些有效耕作所需的最重要因素，土改后農村中為購買農具和牲畜提供信貸的來源幾乎完全枯竭了。過去，主要的信貸來源是本地地主和富農的高利貸（提供信貸實際上是他們權力的主要來源之一），雖然利率可能會因為借貸人之間有著良好的私人感情或者借款人處境非常艱難而有所降低。土改后，只要利率適中，私人借貸在法律上仍然是許可的，但是即使那些富裕農民有錢可以出借，他們也不愿意這樣做，因為借錢極其明了地顯示了一個人的財富。而在新社會，這是一樁危險的事，因為新政府沒有明確保證這些借款將來必須償還。[[22]](#_22_Wei_Wei_En__Shu____Guo_Du_Zh)在這種情況下，窮人的農業生產和可支配收入都停滯不前，貧農和富裕農民的不平等狀況依然如故。有時，這種差距甚至擴大了，以至貧農由于沒能靠新獲得的土地生活而開始成為富農的雇工。

為解決這些問題，政府不可能向村民們額外提供更多的土地，以及至少在目前，也不可能增加資本數量，所以政府主張采取建立互助組這一解決辦法，據認為這一辦法可以較好地利用有限的生產資源。從形式上看這是一個溫和的革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村民們被建議以傳統的合作形式為基礎建立互助組。在此之前，鄰近的家庭已經習慣于根據親情關系組成小組，在搶收搶種等農忙季節里合作安排農事。起初這些新的互助組約由三五個過去農忙時曾經互相幫助的農戶組成，它們基本上是舊式互助的翻版，主要的區別在于新式互助組的勞動交換較之過去的互助形式有更為正式的記賬程序，并且全年可進行換工。[[23]](#_23_Jian_Wei_Lian__Xin_Dun___Fan)

擴大勞動交換的一大傳統障礙是如何才能確保平等互利。例如，如果一家比另一家有更強的勞力和更好的農具，那么為什么這家的人要在鄰居的田里花上一天，而換取的只是其鄰居帶上其較粗陋的農具用較弱的勞力所作的較低質量的一天勞動呢？過去村民們解決或避免此類問題的辦法之一，是將合作互助范圍限制在一個相互間有著緊密的親朋關系、家庭條件大致相當的小組里，以促進相互信任；辦法之二是將勞動互換范圍限制在某些易于監督管理的特定農活上。但是，如果找到了一個更好的辦法，能對每家每戶就某一共同事業所作貢獻進行客觀估價，如果有個制度能保證每家都承擔起應作貢獻的份額，那么參加合作的戶數將增加，勞動交換的數量和質量也將提高。這將提高勞動生產率并有助于改善那些進行互助合作的農民的生活。

因此，盡管在共產黨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早期互助組與傳統的勞動交換小組很相似，它還是有兩點重要的革新：一是有一個官方指定的領導人負責管理互助組，二是以“工分”制來記錄每一個組員的貢獻大小，并根據“工分”計算報酬。一旦有了這兩項革新，地方官員就可以推動互助組擴大范圍，互助組規模變得更大，而且由只在收種季節合作發展到全年合作。

不過，擴大互助組規模和功能的每一步都牽動著農村傳統的生活架構，從而引起緊張和沖突。互助組成員的范圍愈是超出鄰居和親情的小圈子，據以維系組中成員相互信任與理解的紐帶也愈是脆弱，對于合理的領導、勞動分工、生產計劃等的意見也愈難達成一致。簡·邁爾達爾曾采訪過一位農民，這位農民這樣描述了那些困擾著他的羽毛未豐的互助組的沖突：

互助組中有八戶，我們擬定了一個時間表，今天為這家、明天為那家干活……但是，制定這樣的時間表并非易事，為此有著許多爭吵。李仲銀（音）爭吵得最厲害。他總想占先，因為誰先耕種常常是重要的。結果我們同意輪著來，可他從未滿意過。[[24]](#_24_Jian__Mai_Er_Da_Er____Lai_Zi)

互助組越大，組員們擁有資源的種類也就越多，互助合作的潛在利益也越大。但是同樣，互助組越大，那些擁有較好農具和耕作技術以及具有較高工作熱情的組員們就越有理由擔心他們是在貼補那些生產能力差或者懶惰的組員。政府官員們不得不一再向村民們施加壓力（這在有些地方更為成功些），以抵制所謂“將找將、兵跟兵”的傾向，即家庭境況較好的農民之間組成互助組，他們排斥家境較差的農民（不過，富農被排除在互助組之外，政府將互助組作為孤立他們的一種手段）。互助組規模和多樣性的擴展為組內長期不斷的沖突提供了基礎。

互助組內工作種類的增加也可能引發持久的沖突。組員間的勞動類別越是不同，越是難以確定每一種勞動的相對價值，對于每個人的勞動究竟應得多少報酬的潛在爭議也越大。邁爾達爾曾采訪過的那位農民說道：

當勞動互助組的頭頭是一樁吃力不討好的差事。每天總有人說“你不公平”，例如有時候某人會嚷著“轉過身來，轉過身來看看，你沒看到我田里的草比他田里的草多得多嗎？草可不會輪流長。如果今天你們不為我除草，那我可就苦了”。后來，我們選派了一個小組，專門對付諸如此類的問題……但正如我所說，這不容易……怨怒和爭吵有的是。[[25]](#_25_Jian__Mai_Er_Da_Er____Lai_Zi)

要是互助組規模擴展慢些，要是組員能看到他們能從政府所曾寄望的生產的擴展中明顯得益，這種緊張便會減少到最低限度。然而，在對互助組進行了數年相當謹慎的試驗之后，到1953年末，政府開始加快建立和擴展互助組的步伐，而這種擴展只給農民帶來了一定的物質利益。實際上，建立互助組并非單純是給農民指出一條提高生活水平的道路，而是為了更好地控制他們以便從農村獲取更高的農業剩余去支持城市重工業。[[26]](#_26_Wei_Wei_En__Shu____Guo_Du_Zh)

獲取這種農業剩余的辦法是1953年秋開始推行的“統購統銷”。這一制度取消了農村中獨立的糧食市場。糧價由國家規定，每個地方都有交售公糧的指標。向每個農戶下達這樣的指標是不可能的，但對于像互助組這種規模的團體則是可能的。因此，要求每個農戶都加人互助組也就勢在必行。在農民們看來，互助組已成為社會控制的工具，用以強化貫徹政府以極低價格獲取農民辛勞所得糧食的意圖。這個辦法很有效，到1954年底，有許多地區報告缺糧。[[27]](#_27_Ai_Zi_La__Wo_Ge_Er____Gong_C)

當農民不僅發現他們要在一個新的組織里與那些他們曾不愿與之聯系在一起的人在一塊兒勞動，而且發現他們辛勞所得的收入也在減少時，他們的不滿是自然而然的。不過這時他們不滿的焦點常常不是共產黨政府，因為至少在終于獲得一些屬于自己的土地的前貧農中間，新政府擁有很大的合法性。此外，新政府也太過于強大，難以向其公開挑戰。這樣一來，經濟窘迫的壓力造成的常常是互助組成員之間的爭執。正如上文引述的那位農民（他自己就是個互助組領導）的話所示，爭吵的矛頭常常指向互助組領導和記工分的方法。“大家總是不滿意，總有人指責你不公平和偏心眼兒”。[[28]](#_28_Jian__Mai_Er_Da_Er____Lai_Zi)對領導和工分的爭吵將始終伴隨農村向更高級的集體化組織過渡的每一新的步驟。

農村確實在向更高程度的集體化邁進。不管普通農民是否認識到這一點，互助組只不過是走向徹底集體化的準備。

## 社會改造，1955—1963年

#### 集體化

在農村中建立互助組的方法預示了農業集體化的過程。首先是聲勢浩大的宣傳，以使農民確信新農業組織形式是自己的長遠利益所在。然后是在自愿的基礎上建立這種新的農業組織形式，新形式與農民過去所習慣的形式只是稍有不同，而且顯然符合許多農民的最大利益。接著是那些控制著農村經濟命脈的國家機構的轉變——這種轉變使得農民如果抵制加入新組織，他們在經濟上就將處于不利地位。同時，新組織也朝著有利于國家把農業剩余輸往城市工業的方向發展。許多農民對此感到氣憤，但并沒有直接抵制，因為絕大多數農民在還沒有完全弄清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就已經發現他們被以隱蔽的方法置于一種新的境地。有少數幾個確曾抵制的，恭候他們的是迅速而強大的政治壓力。[[29]](#_29_You_Guan_Ji_Ti_Hua_De_Xiang)

第一個集體農耕組織叫“農村生產合作社”，是自愿參加的。雖然如此，許多合作社的“先驅們”仍是帶著相當大的驚恐邁出這一步的。對普通農民來說，生產合作社是一個急劇的轉變，與他們追求的美好安定生活的基礎背道而馳，比互助組的震動大多了。在舊社會，每個中國農民的目標是盡可能多地擁有土地，正如維維恩·舒所指出的，“在中國農村這不是致富的唯一方法，但它可能一直是最安全和最光榮的辦法，假如這辦法成功了，農民富了，其后代就繼承了一份寶貴的家產”。[[30]](#_30_Wei_Wei_En__Shu____Guo_Du_Zh)在新的生產合作社里，農民用家中最重要的有形財產，他們的土地，換來了一些希望的許愿。山西省長弓村的農民曾經這樣說：“三人一條心，黃土變成金”，[[31]](#_31_Xin_Dun____Fan_Shen_____137Y)逐步完善的合作將促使提高生產力，并使農民有更多的收入，公平分配。

生產合作社能提高生產力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每個農民一般都有幾小塊分散的土地，每塊土地用小田埂與鄰居的土地隔開。如果所有土地都合在一塊兒，去掉這些浪費的田埂，成為連成一片的土地，那就可以有秩序地、合理地耕作了。然而，發展生產力的機遇受一些危險因素所制約。如果合作社的成員合作得不順利，比較合理的統一耕作的優勢就很容易失去。當然，在首批合作社里，因合作社組織的規模相對較小，這種危險要小一些。首批合作社一般只有約30個農戶，通常是村里同姓或左鄰右舍組合而成——人們以血緣關系或長期以來彼此的熟悉了解而聯系在一起。這種合作社一般都比較成功，麻煩不多。

合作社建立之初，當局說集體生產會增加糧食，合作社社員將得到一份公平的收人。這種許諾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土地較多和耕作能力較強的農戶自然會擔心合作社里較窮的人沾他們的光。雖然政府特別希望并鼓勵貧農加入生產合作社，但同時也希望中農參加合作社，事實上，如果合作社想得到適當的資金和耕作技術的話，就得需要這些中農。把中農早先帶到合作社的財產總數與其報酬密切結合起來，因而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中農入社的障礙。中農加入合作社時，不是把其財產貢獻給合作社，而是租給合作社使用。除了勞動所得之外（通常是采取打工分的辦法），合作社還定期地付給他一定的財產租借費。政府規定租借費總量不能高于合作社社員的收入總額，但沒有規定不能低于多少。勞動力和土地股息的收入比率變化很大：勞動力收入從60％—80％不等，土地股息從40％—20％不等。起初，為了爭取中農參加，股息收入的比率定得比較高，但不久就被削減。中農們不禁想知道（而且擔心）其財產的股息究竟多久才能付完。政府說付股息就付，全憑它一句話，但政府政策的主要趨勢是推行平均主義，清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不平等狀況。政府也真的這樣搞了。對此，中農們反響很強烈，經常對本地官員大發牢騷。[[32]](#_32_Wei_Wei_En__Shu____Guo_Du_Zh)

令中農憂慮的另一方面是他們借給合作社的牲畜和農具的命運。適度的經濟保障的關鍵不僅是一個人擁有土地的數量，而且要有管用的農具。在土改中，那些被劃為中農的人家通常有一頭牛、或一頭驢、或一頭騾子、或一匹馬，以及可用的犁。富農一般有幾頭牲畜和若干農具。在財產的再分配中，中農和富農都設法保住了這些主要財產的大部分。地主則失去了絕大部分財產，但這些被征用的牲畜和農具仍不能滿足眾多貧農的需要。因此，絕大多數貧農和雇農仍然沒有牲畜和農具，只好望田興嘆。得到這些東西的那些人（一般都是土改中的“積極分子”），或者那些在以后的土改中有錢買這些牲畜和農具的農戶，在經濟地位上，逐漸與中農不相伯仲。他們事實上也被稱為“新中農”。那些沒有得到這些財產的農戶們沒有擺脫貧困。合作社對那些仍很窮的農民來講，最大吸引力是可以使用牲畜和農具。中農們（和那些被拒之于互助組門外、現在迫于壓力也加入了合作社的富農）最主要的憂慮是失去他們的牲口和農具。合作社的新章程規定，合作社作為集體可租用中農和富農的牲畜和農具。可是，那些有牲口和農具的人沒法不擔心，他們的財產一旦被借出去，就會被損壞殆盡。合作社社員為了從這些牲口中盡快地榨干油水，常常超載或鞭打這些牲口，看到自己的牛或騾子負荷過重和被社員抽打，他們（中農）心里非常難受和憤怒。[[33]](#_33__Zhi_Yu_Jie_Yong_De_Sheng_Ko)

在爭取一部分農民在“自愿和互利基礎上”加入合作社（第一批加入者中的許多人是帶有某種政治動機的“積極分子”）和最成功的合作社顯示出贏利之后，政府積極穩妥地推動發展合作社成員。發展合作社成員最有效的方法是抽走農民單干的一切好處。取消私人借貸之后，政府辦了信用社，信用社成為貸款的唯一來源，信用社不貸給農民個人；隨著取締商品自由市場之后，供銷社成了唯一的收購糧食和出售農具的地方，這些都給生產合作社帶來有利條件。糧食定額制度也不利于單干者，對想加入合作社的農民和富農實行優惠政策。[[34]](#_34_Wei_Wei_En__Shu____Guo_Du_Zh)

因此，由于政府的積極推動，合作社在1954年和1955年在規模和范圍上又獲得新的進展。那些對合作社不感興趣的人感到了政府施加的極大壓力，這部分人主要是中農和富農，此外，一些人不喜歡或不信任他們鄰居的貧農，一旦加入，就得和他們一起合作。政府壓力是廣泛的、復雜的，不單單指一些來自說得出姓名的官僚或當地干部的、看得見的人格化的壓力，它是一種無法讓人直接責罵、反駁或拒絕的壓力。由于這些農民是被迫加人合作社的，所以他們就消極對抗，表現形式是對苦活累活缺乏主動性和熱情。

由于產量下降，中央一些對此感到憂慮的官員要求放慢合作化的步子，減少合作社農民上交的糧食。但正如《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2章敘述的那樣，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主張加速合作化的進程，他們占了上風。因此，不僅合作化的步子很快加速，而且擴大了原有的規模，其內部機構也進行了改革，所以，合作社的性質不僅僅是“半社會主義”，而完全是社會主義的了。

新的“高級合作社”比低級社或原來的合作社要大近十倍，一般要求平均達到200—300戶（大約1000—1500人）。所有加入高級社的社員都處在一個起點上，沒有人再從合作社那兒收到土地和農具的租借費。富農和中農的財產實際上已被充公。在推進這一工作過程中，政府再一次舉起了階級斗爭的旗幟。

如果說加入高級合作社對所有人都有好處的話，那么有好處的是貧農。在這場合作化斗爭中，貧農充當了英雄的角色，而富農則被當做反面角色。那些曾用摧殘其牲口等方式反對過征用他們牲口和田地、或曾經公開抱怨政策的富農經常在“批斗會”上被懲罰。從這時起，富農加入了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行列，被稱為“四類分子”——在政治地位上屬于最底層，這些人實際上已喪失了公民權，不斷被“批斗”，而且幾乎無法摘去這頂帽子，這帽子還要按男性系統傳給下輩。

中農雖沒有被列為賤民階層，但也不斷地被排擠出權力位置之外——此時的政策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但階級斗爭的新動向迫切需要重新劃分階級成分。土改完成后，大多數村民在政府的新階級劃分中掉進了“中農”的行列，因為大多數（不是所有的）原先的貧農家庭已經有了相當于中農的土地。在以后緊接著的土改的年代里，正像我們所知道的，一部分新的中農分到了牲口，靠莊稼地里的好收成或開小作坊富了起來。然而，其他人實際上仍很窮。雖然他們也有跟其他中農差不多的地，但缺少牲口、農具和其他財產，因而無法保障地盡其利。從1955年起，這些農民都被劃為“下中農”，其政治地位實際上相當于貧農。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那些政府依靠的對象——好的階級，通常被簡稱為“貧下中農”。[[35]](#_35_Can_Jian_Li_Cha_De__Bao_Mu)強調從這一階層中吸收積極分子來鞏固和加強高級合作社。

新的合作社在規模上超過了絕大多數自然村落的聯系網絡，由此使得農村的聯系變得不方便。在中國南方，一個村子一般有1000—2000人，這里一個村子就是一個合作社。而在村子較小的其他地區，合作社由幾個自然村組成。盡管農民們已習慣于被管理——通過這種組織從上頭層層管下來——但他們不習慣在這樣大的組織里與其他社員合作一起從事共同的經濟活動。各種不同的血緣之間、村與村之間以及鄰居之間的公仇和在這種大合作社中不同家庭之間的個人宿怨損害了合作的基礎，破壞了增加農業生產的必要前提。

盡管存在這些問題，高級社仍受到了不少這場農村運動的投機者的歡迎。許多當地干部，尤其是那些曾經當過貧下中農、在早期的合作社中攫取了領導位置的干部，都擁護合作社進一步向高級合作社發展。他們覺得依據一個既不清楚又經常變化的標準付給中農和富農額外的股息，已經成了一件難以承受的事情。當這些事情妨礙他們行使權力時，就必須予以解決，他們決定取消這種做法。此時他們已從負擔中解放出來，擁有了比以前大得多的管理地方經濟事務的權力。這種地方干部成了人民政權群眾基礎的一部分，毛將此稱為“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36]](#_36_Wei_Wei_En__Shu____Guo_Du_Zh)

那些被政府定為貧下中農的有抱負的年輕人自然就形成了那種政權基礎的另一部分。對他們許多人來說，這無疑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時代。他們有機會獲取村領導的權力。他們所要做的是積極推動合作社化的進程，堅決譴責富農和其他所有在向社會主義金光大道邁進中拖他們后腿的人。但是，對中農和上中農來說，日子則很暗淡。而那些被劃作富農的人，就更慘——他們失去了所有的財產和政治權利。

對許多已到中年的貧下中農來講，這也是個充滿未知數的時代。雖然間接地得到了使用富農和中農財產的機會，但更多的是他們失去了對自己工作的控制權。他們到處受合作社干部的擺布，這些干部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屬于別的村、別的家族、別的姓和另一輩——這些人不欠他們的情，因此有可能對他們毫無同情心和忠誠感。然而當這些農民們所擔心的問題將要解決的時候，又出現了更大的問題。1958年，毛主義者的政府開始了“大躍進”。

在普通農民看來，“大躍進”初期是好的。大量城里的干部被政府派下來，開始進駐村里，幫助提高糧食生產，直到此刻，大部分城里的干部受到了歡迎。他們將幫助農民播更多的種子，打更多的糧食。但許多人擁進農村，以及這時新出臺的大部分政策——也帶來了問題：政府總是把好事一下子送得過多。太多的城里人下到村里，村里難以消受。[[37]](#_37_Wo_Ge_Er____Gong_Chan_Zhu_Yi)

城里干部下到農村與政府不斷升溫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同時發生，實現這個口號的方法之一是在農閑期間，組織數以千計的農民修建堤壩，興建更新、更好的水利工程。從此，季節性的工作節奏被打亂。這時候已不存在“農閑季節”，耕種和收割之間不再有空閑時間，以前農民們在這個時候可以在家里放松一下或搞些個人副業。如今一年四季都得參加集體或公益勞動。每年定期的播種季節到來時，農民們就被要求采用一些新的耕作和播種技術。他們告訴農民，如果田能犁得更深些，行距密一些，糧食產量就將大幅度提高。根據“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建立新的村辦工業，如“小高爐”。這些煉鐵爐一般技術都很簡單，勞動強度很高。[[38]](#_38_You_Guan_Gong_Chan_Zhu_Yi_Yu)

這個時期幾乎所有的新的改革措施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從哪里來？來源之一是農村的婦女，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她們傳統上是不下地的，只被限制在家里做家務和手工活。農村自由市場取消之后，她們幾乎再也無法靠手工紡織為家里增加收入了，但又仍然需要干家務活和照看小孩。在河南省，當地干部搞了一個公社集體食堂，目的是為了把婦女從鍋臺上解放出來，使她們在農業和水利建設中能與男人并肩勞動。年輕姑娘和年歲大的婦女被安排照看公社的小孩、病人和老年人。家庭生活的節奏從此改變了。

所有這些活動怎么協調？高級社的規模太小，無法完成這一任務。解決的辦法是把生產合作社聯合起來搞成更大的合作組織。河南省在1958年中期在這方面做了嘗試，新建立的組織稱之為“人民公社”。這年的8月，毛主席視察了河南第一個人民公社，宣稱“人民公社好”，在短短幾個月之內，中國的所有地方都建立起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在規模上要大大超過傳統的社會和經濟合作組織。新的公社可能包括10—20個村，平均人口約25000人，一般相當于幾個當地的集市。[[39]](#_39_Ran_Er__Gong_She_Gui_Mo_Bu_J)這樣的大單位在其轄區內有很多公共財產——田地、牲口、工廠，等等。那些農民一直認為不可剝奪的私人財產，如首飾、炊具，甚至屋里的金屬門閂，也經常擅自被拿到落后的煉鐵爐上熔化來生產鋼，或者賣掉為發展新的公共經濟提供經費。人民公社空前的規模使得管理成為一個難題。[[40]](#_40_Zai_Wo_Ge_Er_De___Gong_Chan)公社指揮部是決策的中心，對公社范圍內的工程項目，如如何實施水利建設或煉鋼，或者關于種什么作物，在哪兒種以及怎么種等事項作出決策。然后，指揮部從公社的各個村中選派排組和隊（軍事術語，管理公社確實須要一種集體合作和高度統一的精神）的人去干。指揮部為數不多的干部，在時間非常緊的情況下，怎么決定哪些民工干哪些活？由于不可能對這種事情作出非常準確的判斷，因此大量勞動力浪費掉了。指揮部的干部也不可能知道每個民工所干的工作以及應該付給他們多少報酬，因此每個人得到的都一樣。1958年秋，在第一個成立公社的熱潮期間，為了擺脫剝削，刮起了“共產風”（村民們現在還這樣叫），這種想法叫人難以理解，其后果實際上是爆炸性的：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而不僅僅是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至此，政府的口號不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需分配”。

起初，相當多的農民好像歡迎這股共產風。確實，在某些地方，好像來了一位財神爺，一股狂喜有點類似于中國歷史上不時出現的狂熱一樣：當起義領袖號召農民起來造反，并許諾即將建立的新世界會給他們帶來好處時所激起的熱情一樣，在這種情形下，有充裕的食物經常是人們最主要的夢想。在“大躍進”期間，許多農民陶醉于這個夢想而幸福地忘我工作。當所有人不用付錢，都可以到公社食堂隨便吃以后，似乎烏托邦的理想社會變成了現實。廣東的一位農民對看似豐富的免費吃飯制度至今還留有美好的記憶，“我們走到哪兒吃到哪兒，啊，開始的時候，我們吃得都很胖，我們什么時候想吃，就什么時候都可以到公社食堂里去吃。”[[41]](#_41_An_Ni_Ta__Zhan___Li_Cha_De)公社運動的早期被一些農民叫做“吃光”階段，因為一個人一天經常要到公社食堂去吃五六頓。[[42]](#_42_Tong_Shang)

但這種無節制消費的夢想不久變成了一個噩夢。高層領導下達指示，要求試行不切實際的新耕作方法。那些對此有不同看法的地方領導被說成是“右傾”。面對不合理的要求，他們只好謊報，投其所好，上面領導在生產增長方面想聽到多少，他們就報實現了多少。有些革新，如密植，結果使整塊地的糧食都浪費掉。工作安排不合理，因此，在完成一項重要工作之前，農民經常被從一個地方調到另一個地方。農民們吃光了他們公社集體食堂的所有糧食，就只好讓別的村幫助其解決種子問題。公社化的整個過程，就如一些農民形容的“太早、太快、太急”。[[43]](#_43_Yin_Zi_An_Bing_Jiong_De__Zhe)這股“共產風”導致了社會的混亂，1959年十分惡劣的天氣造成的自然災害加劇了社會混亂。

所發生的饑荒是20世紀最大的人類悲劇之一。根據最近的人口統計分析，1959—1962年，大約2000萬人直接或間接死于饑荒。1960年死得最多，而有些農村地區一直到1962年還有人餓死。這個數字表明在這次饑荒中農村人口損失要比城市多得多。[[44]](#_44_Guan_Yu_Zai_Ji_Huang_Qi_Jian)

然而，令人驚奇的，幾乎找不到有關記載這次人類悲劇所遭受的損失方面的材料。假如這么嚴重的災害發生在世界別的任何地方，旅游者和社會科學家就會根據所看到的情況大量報道和描述其情形。但是，中國作家在當時不讓報道饑荒，外國記者一般都被拒之門外（這時候極少數來到中國的外國記者是中國的“老朋友”，像埃德加·斯諾和韓素音，他們相信主人的話——雖然有些困難，但沒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自覺地遮掩這次饑荒的一些情況）。[[45]](#_45_Han_Su_Yin_Shi_Shi_Jie_Xing)在70和80年代被采訪的農民都不愿意談他們那時候的遭遇。他們即使談了，也談不出更具體的情況。

20世紀80年代，根據臨時湊合在一起的目擊者的大致回憶，出現了下面一幕在饑荒中人們吃草根情景。糧食吃完后，農民們開始吃村周圍能吃的青草、樹根和野獸。[[46]](#_46_Li_Jian_Shi_Di_Wen__W_Mo_She)在一些饑荒特別嚴重的地方，他們只好背井離鄉，四處要飯——自然，如果附近地方真有多余的糧食，如果那些瀕于絕望的人有錢購買，外出才能解決一點問題。[[47]](#_47_Peng_Ni__Kai_En____Zhong_Guo)生產隊和大隊——這是公社所屬單位，是按農民居住的自然村劃分的——把剩下的所有糧食救濟那些急需的家庭。“大躍進”期間，有些生產隊和大隊在某種程度上抵制了集體化的最“左”的指示，或把要在公社范圍內進行一平二調的糧食藏了起來。他們此時的境況要好一些，比那些順從聽話的大隊和生產隊能較好地照顧自己的社員。那些有余糧的大隊和生產隊對外來買糧的人經常毫無顧忌地要高價。[[48]](#_48_Zai_Xin_Dun___Fan_Shen____Di)

死于饑荒的人大多數是小孩和老人。成年男人在數量極少的糧食供應中，享有第一優先權。原因是他們要在地里干活，必須有足夠的能量才能去種新的谷物。[[49]](#_49_Qing_Jian_Kai_En___Zhong_Guo)至少有一個地方，許多婦女不得不離家去要飯——再也不回到她們的丈夫那兒。[[50]](#_50_Zhe_Ge_Li_Zi_Chu_Zi_Fei_Xiao)為了節省能量，小孩被迫停課。[[51]](#_51_Wei_Lian__La_Fu_Li_Suo_Zuo_D)《陳村》一書曾引述了一位農民的大致回憶：“一些人病了，一些老人死了。我們村變得很寂靜，好像人都死了。”[[52]](#_52_An_Ni_Ta__Zhan___Li_Cha_De)

當時死一般的寂靜可能表示了人們因衰竭而不再活動。共產黨宣傳說要有遠見，反對傳統的農民社會的宿命論，宣傳說，中國共產黨將從根本上破除農民的迷信，使農民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開始時，讓人覺得似乎共產黨真要實現這個目標。土改的目標不僅為了土地，而且也是為了自主。貧農將不受地主和高利貸者意志的擺布。土改開始不久，看起來確實不錯，貧農似乎終于獲得了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力。他們參加農會組織，斗地主，分田地。后來，農民們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礎上加入了互助組。但集體化運動實際上使他們失去了很多自主權。隨著運動的深入，政府逐漸用強制的權力把農民的生活控制得越來越緊。到了50年代后期，農會作為一個群眾組織已名存實亡。[[53]](#_53_Wo_Ge_Er____Gong_Chan_Zhu_Yi)如果農會還存在的話，它們也不過充當政府的宣傳渠道和完成上級制定的政策的組織罷了。同時，那些宣傳越來越荒唐，政策也越來越多變。

共產黨政府的官員能夠把農民控制起來，這種控制對農民來說比地主更令人痛苦。隨著公社的建立，農民們看到干部們住在遠處的指揮部里發出荒唐的命令（出于上頭很大的壓力），這些沒同任何“群眾”商量過的命令導致了可怕的破壞性后果。此外，還有些干部拿走農民的個人財產，強迫他們到公共食堂吃飯。

在公社運動中，農民們經常抱怨公共食堂，以此來表示他們無權的情緒。他們經常抱怨飯菜質量差，并懷疑廚師和干部多吃多占。他們抗議要在規定的時間到公共食堂就餐，抗議吃那些不合他們胃口的飯菜。燒飯和吃飯在過去一直是家里的事情。事實上，所謂一家一戶，其定義就是一個有廚房的家庭單位。飯菜不是在自己家里做的，被迫吃別人做的飯，吃飯的次數、環境皆由別人操縱，這些在農民心態中，也許就是無權的中心內容。

“大躍進”的失敗越來越顯而易見，饑荒也開始橫掃鄉村，此時農民恨透了“命令主義”。當地干部天黑以后不敢單獨出門，害怕被人打，這成了當時人們的話題。[[54]](#_54_Tong_Shang_Shu__Di_255Ye)然而，農民對他們命運的抱怨極少變成行動上對應對他們這種狀況負責的權力制度的反抗。如果村里變得“很安靜”，那是消極抵抗，表明其本身毫無生氣，以及當務之急是活下去而不是公共福利。部分原因無疑是饑餓引起的身體虛弱造成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無能為力所產生的精神上的絕望。政府的政策再次教育他們要相信命運。

“大躍進”是建筑在對人類本性極其樂觀的看法的基礎之上的——相信中國人民一旦給予適當的機會，灌輸適當的政治思想，就會激發極大的熱情為公共利益而勤奮工作。“大躍進”顯而易見的錯誤管理方法破壞了寄予希望的一切基礎。即使到1962年，糧食供應開始有所好轉，也很少有農民再愿意好好干，尤其是如果賣力氣干并不比偷懶的鄰居多給家里帶來好處時。很少有農民再關心公共利益。在集體田里干活的農民在收割東西的時候常偷偷地給自己留下一部分。[[55]](#_55_Ceng_Bei_Guo_Min_Dang_Qing_B)

#### 勤儉節約

為了緩和“大躍進”帶來的經濟災難，政府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因此，當饑荒遍及全國的時候，政府宣布了確定新的農村政治經濟秩序的計劃，其實質是重新給予農戶以更多的經營自主權，而這些自主權在集體化的激進階段已經被取消。這一新秩序體現在1962年9月頒布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案中（即大家熟知的“六十條”）。

作為1960年就已開始的一系列農業改革的最終成果，新的條例在名義上保存了人民公社制度，但在具體做法上已經作了根本的改變。首先，公社的規模縮小了，平均大約只有原來土地和人口的1/3，通常接近于傳統的區域集市規模。更為重要的是，公社一級不再負責日常的農事安排，而是負責對基層的農業計劃進行總體協調，以及管理某些企業和公共事業，如中學、醫院、小工廠、修理鋪，等等，在村一級經營管理這些企事業是不可能富有效率的。公社的下一級行政機構是“生產大隊”，這是一個大約由200戶家庭的大村莊或幾個小村莊組成的單位，相當于過去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些生產大隊的職責是指導基層民兵組織，維護當地的公共安全，充當基層宣傳機構，負責本地的小學，興修小型水利設施，調整農民之間的經濟規劃。但是對于普通農民的日常經濟生活，這種控制是很有限的。平時的農業經營和集體生產財富的分配，由生產隊一級來負責，生產隊是個大約有20戶家庭、100人的組織，通常是由鄰居和親屬組成，其規模和結構形式相當于過去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56]](#_56_Guan_Yu_Gong_She___Da_Dui_He)

生產隊是最基層的集體所有制單位，是土地、牲畜、大型農具的所有者。農民無須再聽從陌生人的命令，該播種什么，選擇哪里，如何種植莊稼，自己就可以做主。生產隊由領導們決策（領導是經過當地黨組織的嚴格考驗從候選人中選舉出來），[[57]](#_57_Zhan___Ma_De_Sen_He_Ang_Ge_E)只要不超出政府的規定范圍，能夠自行決定如何合理使用土地和合理安排勞力。相互熟識的人組成了生產隊，勤勞的農民可以自得其樂地享受勞動所得，無須擔心本地域外不相識的人來分享勞動財富。社員們共同分配生產隊的集體勞動所得，因而條件好、又善于管理的生產隊的社員們的所得自然比命運不好的鄰隊多。較熟練、較勤勞的農民不用再擔心缺少技術和積極性的他人會得到同壯勞力一樣多的紅利分配。生產隊的利潤是通過工分制分配給社員們的，社員們多勞多得報酬。

政府允諾，“六十條”將成為未來30年農業組織的框架性文件，事實上，在此后的15年里，他們確實這么做了。這是個靈活的框架。新文件明確規定了生產隊領導如何行使權力、安排勞動和取得勞動報酬。政府官員借此得以允許中國農業朝著類似于私人農業或者半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業的方向發展。

20世紀60年代初期，政府為了刺激生產力的發展，便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制定政策，它使農民覺得仿佛又回到了社會主義以前的私人農業經營時代。[[58]](#_58_Pei_Er_Ze_Er_Zai_Qi_Suo_Zhu)生產隊僅僅負責把大量農業任務分配給小組，這些小組僅由二三戶家庭組成。這些小組只要每年向政府送交定額的定購糧食，就可以隨意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即包產到組——譯者）。集體勞動實際上意味著處于互助的初級形式。在一些地方，生產隊把農事責任分別落實到了每個農戶身上（即包產到戶——譯者）。諸如此類，生產隊指定每戶一小片土地，而每戶與生產隊協商達成合同，確定每年以政府規定的低價送交一定定額的糧食。農戶想方設法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只要履行責任完成送交定額糧食就行。超過定額的余糧，農民可以自留或者以集市價出售。

然而，這并非是真正回歸到商品經濟制度，因為，當時沒有農民出售必須生產的基本商品的自由貿易市場。政府規定，農民必須“以糧為綱”，不能想種什么就種什么，絕大部分田地必須種糧食。農民也不能在自由市場上出售糧食，而必須以人為規定的低價，交售給政府固定數量的糧食。

但是至少農民不需再和不相干、不相識的生產隊農民爭執誰掙多少工分了；也不需要生產隊領導來命令每天該干什么。勞動掌握在小部分相關的私人小組而非大的公共組織手中。僅此就似乎起到了積極的效果，刺激了農民的主動性，提高了他們的士氣。

隨著有限的自由市場的恢復，私人經營范圍也越來越擴大，1956年社會主義高潮時期砍掉的農村集貿市場，現又恢復了。新的規定允許每個農戶有一小片自留地（土地面積按照家庭的人口數分配，但被指定作為自留地的整個面積僅占村社土地的5％—7％）。自留地上所種蔬菜，除家庭食用外，可拿到最近恢復的集市上賣掉。農民能夠利用有限的時間去搞副業了，諸如手藝活、養蜂或飼養家禽，都能拿到市場上賣掉。有手藝、有干勁又善于管理的家庭搞私人企業，就能獲得整個收入的30 ％。

諸如這些措施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然而也造成了農民的不平等并使農民漠視公共利益。盡管在同一大隊，所有家庭所利用的生產資料都是相同的，而每戶的生產能力卻有差別。因此，在分散的生產制度下，一些農戶不僅完成定額任務，甚至還有相當多富余供自己使用，而另一些農戶——病殘戶、不善籌劃者、或者懶惰者，在完成定糧之后就所剩無幾了，溫飽都難以維持。成功的愈來愈紅火，貧窮的愈來愈困難，因此，生產隊——傳統的鄰里或村莊——再次出現貧富分化。農民更傾向于關心自留地，照料自家的豬群，忙于出售農副產品，農民無心關照整個集體的公共利益。[[59]](#_59_Guan_Yu_Zhe_Yi_Shi_Qi_Cun_Li)

至少中央政府領導中的毛主義者是這樣看的，并將深切地感到“自發資本主義勢力”在農村復辟了，于是中央政府在1964年開始改變農村管理和勞動報酬制度，以利于農村工作朝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它提議，生產管理的絕大部分責任應落實到生產隊領導身上。拋棄了包產到組、分田到戶的做法，又重新合并成集體耕作的大田。在分配上，工分制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在調動生產隊里每個農民的積極性，還是在推進這一集體的平等與團結方面，工分制都成了越來越重要的方式。而提高農民積極性的代價卻是增加了生產隊里的不平等現象。

在“六十條”框架內這些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運動也永遠不能產生根本的平等和十分合理的勞動管理。生產隊是基層集體所有制單位，它的規模被控制在這樣的范圍內：能與當地農村生活的傳統社會倫理、親屬關系、鄰里關系相適應。因而，農村仍存在著相當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在生產隊之間比在生產隊內部成員之間可能會更大。在同一農業生產地區，如一個隊的條件好，有健康強壯的勞力，又有好領導，自然就比鄰隊富裕。一個工分值多少錢是衡量富裕程度的一個指標。由于一個工分能給予社員一份生產隊的紅利，利潤高的生產隊的一個工分就比利潤低的生產隊的一個工分掙的錢多。例如，廣東省的陳村生產大隊，由5個相鄰的高產的生產隊組成，1971年，10個工分值1.10元，而由于領導不力、勞動力差而低產的生產隊，10個工分僅值0.70元。即便在人民公社時，陳村也比鄰村窮得多，然而這個公社平均生活水準也比中國其他貧窮省份的人民公社高得多。[[60]](#_60___Chen_Cun____Di_247Ye_Zhu)

盡管生產大隊（比生產隊高一級的行政單位）能夠在學校、小型工廠、抽水站，諸如此類，投入一小部分物力，動員一些生產隊的勞動力投入，但它要想讓農民在大隊的工作項目上與其他生產隊的人共同合作的話，進展就很緩慢了。60年代和70年代要想動員農民進行公社一級共同項目的勞動，這種進展就更為緩慢。大部分農村勞動和勞動分工局限在生產隊范圍內。

的確，在60和70年代，在“六十條”還生效期間，農村的社會生活變得多姿多彩，超過了以往幾十年。在中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里，農村總是向外面世界的社會開放，村與村因有無數關系而結成當地統一的（雖然是松散的）市場網絡。如前所述，他們常把女兒嫁到外村，又從外村娶回媳婦。他們定期在附近的集貿市場上和外村人做生意。有時候，他們甚至離開家鄉，移居城市或者土地可能會更肥沃的其他地方。但是，現在許多交換的途徑被取消了。

到1958年，政府規定，適當限制農民往生產隊外流動，除非經特殊允許。但這并不能立即凍結農村人口，因為隨著“大躍進”時期大規模基建項目的建設，成百萬的農民，大部分是單身漢，作為合同工被帶到城市工作。但是隨著“大躍進”而來的經濟滑坡，政府又把勞動力送回農村人民公社，還有城市無業居民也被送到農村公社。1961—1962年，總計有2000萬人從城市來到農村。絕大部分人都不愿去農村，而絕大部分農村公社，剛從饑荒的最險惡歲月中恢復過來，仍面臨著痛苦的食物短缺，也不愿接受他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采取強制手段，強行禁止人們流動，不準遷往他們所向往的地方。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幾乎所有人口流動都是從城市遷往農村。農民想從農村往城市流動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且想在農村自由流動也變得十分困難。

當地的自由集市是村民和本地區其他居民進行聯系的重要渠道，它在60年代初還被允許存在，但到了60年代中期，以迅速向社會主義發展為名，自由集市也被禁止了。村民們通常都是從外村娶進媳婦，同村村民禁忌通婚，但當政府譴責這個傳統為封建迷信時，這種最親切不過的社會交換形式，在某些地方也被取締了。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政府在中國社會上大肆宣傳，目的是使公民意識到自己是屬于國家社會，但是六七十年代農村政策的一個沒有想到的結果卻是抵消了這種宣傳效果，因為它鼓勵當地社區轉向自己依靠自己。[[61]](#_61_Pa_Li_Shi_He_Huai_Te____Dang)

60年代中期，政府努力的另一個結果，本想促使生產隊的內部機制更加社會主義化，而隨之而起的是爆發了內部無休止的爭吵，抑制了農民的積極性，降低了生產力。這些爭端集中體現在工分制問題上。

在50年代互助組和集體化運動期間形成的工分制度復雜多樣。[[62]](#_62_Tong_Shang_Shu__Di_59__71Ye)這個制度主要分為兩大類：計時制和計件制，在計時制中，每個生產隊隊員通過集體討論，一年一次或兩次給每個有勞動能力的社員排個等級。通常25周歲至45周歲的健康男子得到的工分最多，一天的勞動一般能得9分到10分，婦女能得7分或8分，孩子只有6分。一個社員想要計算他所掙的工分數，只要簡單地把他或她的工分定額乘以勞動天數就行了。在計件制中，各種各樣的工作都定了一套工分，譬如耕一塊地值50個工分。一個農民完成這項勞動后就能得到這么多工分。計件制積極地鼓勵了個人，同時也使身強力壯、有雄心的勞動力大受裨益。一人完成個人的工作越快，所掙的工分也就比其他社員越多。但是，同樣的原因，計件制消極地阻礙了社員們的協作精神。他們刺激了個人只關注自己的勞動數量，卻忽視了對勞動質量的關注，同時，他們也鼓勵了個人狹隘地關心自己的個人勞動，而忽視了該勞動應如何和他人的工作相協調的問題。例如，婦女按計件制插秧播種的工作，有時為了圖快，盡可能多插幾行，但秧插得太淺，當稻田灌上水后，秧苗根就松動了。

另一方面，計時制卻鼓勵個人關心集體勞動的整體質量，原因是一個人的工分額—部分要取決于他在團隊勞動中的總體表現。計時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扶助了弱者，抑制了強者。因為一等勞力和二等勞力差別相對來說很小，不過是一天9個工分和10個工分的區別而已（其實全天僅值5分或1角人民幣）。計時制也比計件制更社會主義化。盡管大多數生產隊使用計時和計件兩種混合制度，然而，政府提倡提高農村社會主義組織的水平，所以更傾向于計時制。

更具社會主義性質的工分制度是“大寨工分制”。大寨是山西省一個模范生產大隊。從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晚期，政府一直提倡農民“農業學大寨”。雖然這件事真相很模糊，但大寨卻被公認為是個典型的具有自力更生、集體團結精神、平等和高度的政治覺悟的生產大隊，并因此而聞名。大寨發展了工分制度，像計時制，所有勞動力都排了等級，不過男勞力之間和女勞力之間級差很小。但是大寨工分制不僅基于勞動能力，而且基于政治覺悟，是在一個人完成階段性工作之后，經過在大庭廣眾的大會上評論后認定的，不像以前計時制那樣認定。大寨的經驗迫使生產隊社員們互相進行嚴格的監督，要求社員們用無形的尺度評估對方。60年代末農村政策激進時期，大寨的經驗被廣泛推廣。但是絕大部分地區推行大寨經驗，其結果卻是令人啼笑皆非，引起爭執和譏諷。農民們常常因私憤而利用——或者彼此懷疑利用——所謂的政治標準給自己的同伴評低工分。有時，工分評值大會通宵達旦卻沒能取得決定性的結局。要求高度的“社會主義意識”，這遠遠超過了農村居民力所能及的范圍，所以政府號召各生產隊推行大寨經驗不久，大寨經驗就不得不被廢除了，至少它的純潔形式已被取消了。[[63]](#_63_Zhan___Ma_De_Sen_He_Ang_Ge_E)

從90年代的高度看，這些失敗的教訓現在是非常清楚不過了，即使在60年代對共產黨領導階層中毛主義者還不十分清楚的話。農戶能自行安排他們勞動的程度越大，他們與數不清的其他人在生產上協作的必要性就越小；他們獲取自己主動創造的勞動所得越多，他們的生產力就越高。盡管毛主義者在60年代就意識到了這是一種實情，但他們仍主張，要是農民階級的信念變了，農民就會變得更平等、團結，同時更富有生產力。這是60年代中期把社會主義社會價值觀念灌輸到農民心中，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大規模新運動的理論基礎。

## 塑造“社會主義新人”，1963—1976年

#### 領導權之爭

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努力是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形式出現的。社教運動的目的是提高農村基層干部的思想品質。這是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八屆十中全會上應毛澤東的請求發起的，毛提出，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這位主席擔心，如果再不制止，帶有舊統治階級特點的統治方式就會通過政權本身的行為、地方政府及黨的官員的活動在農村重新復活。[[64]](#_64_Bao_Mu____Ge_Ming_De_Xu_Mu)

共產主義運動伊始，中國共產黨就在培養和訓練本地干部上投入了巨大的力量。盡管諸如農村土改這樣的重要運動是由外地干部組成的工作組發起的，但一個工作組的首批任務之一通常是尋找當地的積極分子，他們成為即將開始的運動的“骨干分子”。[[65]](#_65_Guan_Yu__Ji_Ji_Fen_Zi__He_Da)那些在隨后發生的斗爭中證明自己是忠誠的和有效的積極分子將被吸收進中國共產黨。每一個重要運動——土改、互助組、合作化、“大躍進”——都有大批新人入黨。不過，中國共產黨總是一個高度排他的團體，而且黨員數量即使增加，在總人口中也不占多大比例。土改后，不到1％的農村人口入了黨。到1960年，這一比例提高到大約2％，到了80年代，這一比例稍稍超過了3％。[[66]](#_66_Dao_1960Nian_Nong_Cun_Di_Qu)為了控制當地村社的政治和經濟事務，黨的基層干部必須依靠許多非黨員本地干部的幫助。而且，為了使工作富有成效，當地黨的干部就得依靠他們自己村社中的人民對他們的普遍尊敬和忠誠。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的不同階段，吸收黨員和選拔當地領導干部時，他們的社會成分是不盡相同。土改期間，工作組找那些貧農出身的、魯莽而又大膽的年輕男人（或許還有幾個婦女）在反對舊統治階級的斗爭中打頭陣。就是這些人被吸收進中國共產黨，并成為支持當地農民協會的領導力量。但是，如果他們要使像農民協會這樣的團體得到農民的尊敬，中國共產黨至少也應該羅織（如果不是正式吸收）一些年齡較大、德高望重、善于妥協和施以小恩小惠來拉攏“感情”的人。這樣的領導通常來自中農。這些中農領導干農活一般都比較熟練，在指導生產時經常顯得特別重要。[[67]](#_67_Wei_Wei_En__Shu____Guo_Du_Zh)

隨著中國共產黨的目標的變化，隨著“發家致富”的政策讓位于強調互助和合作化的政策，在早期運動中上臺執政的當地領導的大雜燴會變成實施這些新政策的障礙。因為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運動危及許多中農的利益，因此，不能依靠有這種背景的干部來執行黨的政策。就此而言，許多出身貧農的干部也不能依靠，因為他們利用土改期間取得的地位發了財，變成了“新中農”。所以，中國共產黨要想執行政策，就必須把他們小心翼翼地撇到一邊。

通常都是通過發動“整風運動”來實現此目的，在整風運動中，干部要被調查，其胡作非為的事都要查出來，干部被迫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有時以折磨人的群眾聲討會的形式進行。只要適當地加以懲戒，一般說來，他們就會樂意追隨黨的正確路線，至少暫時會這樣。同時，那些年輕的、雄心勃勃的、在揭露莫須有的瀆職行為中發揮領導作用的本地積極分子都被吸收為黨的新成員。[[68]](#_68_Dui_Zhe_Xie_Yun_Dong_De_Shen)

土改期間主要是整頓農村干部，特別是懲處年輕的、在自己的工作中沒能嚴守道德紀律私吞斗爭果實或因保護富裕農民而受賄的本地干部。1955年，在大力推行合作化的前夕，一場反對“隱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給那些支持農民脫離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村干部打上了反革命的印記。合作化開始后，農村干部因太同情中農而被迫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大躍進”開始后，干部因太謹小慎微、太拘泥傳統方式而受到批判。在“大躍進”之后，他們因為太專斷，把村社飯廳建得太遠以及太多的私有財產集體化而受到懲罰——對這些錯誤，一般說來，他們的上司應比他們負更多的責任。

除了容易受上級的公開批評以外，本地干部還經常受群眾私下里的抱怨。一個本地干部對威廉·欣頓說：“群眾對待你就像背著兒媳過小溪的公公。他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得到的回報除了咒罵外什么都沒有。為什么呢？因為別人懷疑他想把兒媳摟在懷里，想擁抱她。兒媳覺得老人放肆無禮，兒子認為老爹調戲他的新娘。”[[69]](#_69_Xin_Dun____Fan_Shen_____Di_1)

既然這個職務這么讓人不踏實和易受批判，為什么一些人還想當干部呢？說得出口的是，當干部的高尚動機是渴望為人民服務，至少有一些當地干部，在他們踏上仕途之初，滿懷理想致力于提高自己村社的福利。但對一個雄心勃勃的貧農來說，當干部無論如何是他們在社會上掌權和提高聲望的唯一途徑，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所能撈取的實惠可能超過表面上的風險。

不管怎樣，1962年后，地方干部的品德問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關鍵問題。根據1963年5月發起社教運動的關鍵文件即“前十條”，至關重要的不外是這樣的問題，即“這是關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是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70]](#_70_Yin_Zi_Bao_Mu_De___Ge_Ming_D)盡管有點夸張，但這個提法并非完全不準確。好的本地領導對集體農業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集體勞動應該比個人勞動好，因為集體勞動效率較高，因而對那些參加者更為有利。但是如果某處的本地干部不誠實，私吞了一些集體財產，或如果他們不公正，通過分派稱心如意的工作和評定高工分照顧親朋好友，那么，農民的士氣和信心就會下降，隨之而來的將是集體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

因而，在社教運動的第一階段，中國共產黨發起了一場“四清運動”，以清理農村干部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經營管理方面的錯誤。然而，要清除的主要問題是經濟方面的。干部因貪污集體資金和濫用公共財產受到指控。他們主要因受賄，用公款吃喝旅游而受到指責。他們之所以犯這些錯誤，據說是因為，盡管他們出身于貧農家庭，但其思想覺悟受到了舊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思想意識形態的腐蝕。[[71]](#_71_Bao_Mu____Ge_Ming_De_Xu_Mu)

對許多村民來說，“四清運動”看起來像土改運動。先從試點村社開始，再向外擴展，由外地干部組成的工作組進駐村子，他們住在村里并“扎根”好幾個月；找出對現狀不滿的貧農并從中吸收積極分子；準備告發當地生產小組和生產隊的領導干部，最后發動本地農民在憤怒的“斗爭會”和“批判會”上譴責那些發現有罪行的干部。[[72]](#_72_Zhan___Ma_De_Sen_He_Ang_Ge_E)

如果嚴格按照反腐敗的規章來辦事的話，那么，大多數本地干部確實有一些錯誤。像別人一樣，本地干部也從集體獲得一份利潤，他們的工分比其他任何好勞力略高一些。他們——和其他許多同鄉村民——通常認為：對他們的辛勞給予非正式補償，或是因為參加工作會議而有好吃好喝，或接收一些請求給予特殊照顧的村民的“禮品”，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他們還覺得非得要給親朋好友以特別的關照不可。只要這種行為不過分，許多村民就不會譴責它。但是，現在外地來的工作組要求嚴格按照法律條款制裁這種不正當的行為。因這些壞事受到譴責的干部（工作隊通常有一個要抨擊的本地干部的定額，而且要在持續一晝夜的審問中強迫他們坦白）被剝奪了職務并被迫將他們據說是不正當獲得的東西交還給群眾。正如土改摧毀了鄉村的舊精英，“四清”到它結束時，也摧毀了新的本地精英。

“四清運動”一個令人不安的方面是階級斗爭思想的復活。據說，腐化干部之所以犯錯誤，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舊階級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確實是舊階級的成員，因此，應受到激烈的斗爭。但事實上，大多數干部是貧農出身。如果一個人的個人行為（或者，就這一點而言反映了一個人的內心意識）現在成了判定一個人是好階級還是壞階級成員的決定性因素，而不是根據一個人客觀的社會出身來判定，那么，這就為武斷地判定誰是階級朋友和誰是階級敵人的極端專橫的做法敞開了大門。武斷的階級斗爭邏輯在“四清運動”中得到了實踐，還成了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特征。[[73]](#_73_Ma_De_Sen____Zhong_Guo_Nong)

其實，階級分析的整體含義與農村生活發展中的現實是脫節的，二者沒有聯系。在土改中，中國共產黨使用了階級分析這一詞匯，在60年代中期，它又成了政治術語中的一個主要論題。貼有“地主”或“富農”標簽的人現在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富裕，而且由于他們經常遭到有意的歧視，所以，事實上他們比較貧窮。而另一方面，許多貧農變得相對富裕了。一個人的興旺富裕取決于一大堆復雜的因素，這些因素沒有涉及官方對階級剝削的解釋。一旦農業集體化了，經濟成功就取決于下列這些因素：一個人有多么強壯，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況如何（當然，反過來，這與一個人所處的生命周期所在的階段有關）；一個人與親屬和鄰居的關系是不是好（這取決于一個人能否適應貫穿全村生活的血緣關系網）；政府考察一個人過去的政治關系是否有利；或一個人有多守紀律、多勤奮和有多少雄心壯志。[[74]](#_74_Zhan___Ma_De_Sen_He_Ang_Ge_E)上述這些因素加在一起產生了新的利益集團，而且有時在村民中導致了新的敵對情緒，如果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來看，這種敵對情緒就不可理解了。

村一級通常提到的社會階級更像是一種新的種姓等級制度。每個人都貼了一個階級標簽，不是土改時授予的，就是從父系繼承的（如果在50年代初他還太小而不能得到自己的成分）。盡管這種分類與一個人現實的經濟狀況僅有間接的聯系，但它是一個人政治和社會地位強有力的決定因素。如果一個人是“貧農”或“下中農”，他就有資格被考慮提升為干部并享受政府的一切優惠待遇。如果一個人是“中農”，極能干又極可靠，他就可能有資格當小干部，但他通常多少要受點政治責難。如果一個人是“四類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或“壞分子”之一，這個人就會永遠洗刷不掉這個污名。這個人就沒有權利出席生產小組或生產隊的會議（盡管在會議結束后，這個人會被派去打掃會議室），他在生產小組或生產隊選舉時不能投票，他對自己命運的一些怨恨會被解釋為反革命行動并有可能受到嚴厲的懲罰——而且沒有貧農或下中農與其結婚，除非是這些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

到了60年代，這些階級標簽已固定下來。大家都被徹底歸了類，誰都甭想從中有所變動。盡管對約占人口總數6％屬于四類壞分子的人來說肯定是悲慘的，但對大多數被劃分貧農和下中農的人來說還是有些安全感的。良好的階級成分為后者提供了政治資本的基礎，在正常情況下，它是不會喪失的，除非這個人犯有重大的反革命罪行。但在“四清運動”的理論中，貧農、下中農以及出身于這種背景的干部由于犯了一些較小的錯誤，現在就可能會失去好的階級成分。在當地的政治斗爭中，階級成分成了致命的武器。[[75]](#_75_Jian_Li_Cha_De__Ke_Te__Ke_La)

“四清運動”引起的政治戰爭不像土改對舊的鄉村精英斗爭時那樣你死我活。盡管一些本地干部的仕途生涯被打斷，還有報道說至少有一些人自殺，但新精英的毀滅并不像地主的毀滅那樣是決定性的。本地干部中的大部分，除了那些犯有最嚴重罪行的人，都能使對他們的指控得到修改，并被恢復原職。不過，他們受到的懲戒通常足以（至少暫時可以）制止搞特殊關系和私吞公款。而且他們必須與新的、年輕的干部分享一些本地權力，這些新干部是工作組從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隊伍中吸收來的。

社教運動的“四清”階段結束后，下一個階段則更為積極。在此階段，村民學會珍惜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并把這些價值觀念較全面地付諸實踐。就在1965年和1966年前后，對毛的狂熱崇拜傳入鄉村。農民們參加學習小組，背誦從毛的著作中選出來的一些段落（例如題為《為人民服務》的文章），學唱革命歌曲，聽老農民富有感情地憶苦思甜，并討論無私地為人民服務的重要性。這些（憶苦思甜大會）經常與諸如推行大寨的工分制這樣的社會主義改革聯系在一起。[[76]](#_76_Ma_De_Sen____Zhong_Guo_Nong)

由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農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大公無私、毫不利己”的新強調或許暫時為大家所樂于接受。總的說來，恰恰是從“大躍進”后的幾年自然災害以來，經濟增長了。一些資金被用來改良種子和購買化肥。60年代中期，農村的許多地方通了電。由當地醫務人員行醫的農村衛生所廣泛地成立起來。物質生活的質量逐步提高。或許許多農民認為這些改善和提高都是因為有了毛主席，由于龐大的宣傳機構的努力，毛幾乎以神化的形象出現在他們面前。不過，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這個信念受到嚴重的考驗。

####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對農村的影響主要是間接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震撼全中國的大規模社會運動是以城市為中心的。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主要由學生和城市工人組成。但是，城市的不穩定不可避免地擴散到了農村。受影響最大的是那些與城市聯系最密切的農村。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來到郊區農村，而且有時甚至到較為偏僻的地區傳播造反信息。在60年代初“被下放”的城市青年受到革命熱情的感染，并在所在農村組織了紅衛兵派別。企圖逃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的城里人逃了出來，去看望他們在農村的親戚。[[77]](#_77_Zhan___Ma_De_Sen_He_Ang_Ge_E)

通常在外來鼓動者的推動下，一些年輕的村民組成了他們自己的紅衛兵組織，但一般說來，這些似乎是對其城里的榜樣相當淡漠和無力的反應。一些紅衛兵組織開始在生產隊“奪權”，他們接管了官員們使用的辦公室公章，并宣布現在由他們來負責本地事務。盡管對許多本地農民來說這是暫時的破壞且令人討厭，但這些事件并沒有深刻改變當地的政治形勢。村民們沒有理由尊敬干這種事的年輕人或與之為伍。許多公認的本地干部經常仍在處理當地事務，至少也是非正式的。不過，鄉村還是感受到了1967年發生在較高層的省、縣一級而且有時是公社總部的奪權的影響。當這些單位被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的聯盟（主要是城市）接管后，鄉村和外部世界穩定的政治聯系就被切斷，對本地村社來講，這是一種混亂的且有潛在破壞性的經歷。不過，國家權力崩潰造成地方上不穩定的潛在危險通常并沒有變為現實，因為此事發生時農民正忙于收獲和播種，還因為軍隊采取行動及時重建法律和秩序以防止發生重大分裂。帶來混亂的這種沖擊的最重要影響不是政治的，而是心理的，最終是文化的。如果沒有別的什么的話，“文化大革命”強化了農民的傳統思想，即外部世界是一個危險的地方，他們常常害怕、躲避而不是信任那些陌生人，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因此，“文化大革命”將社教運動所取得的進步化為烏有，社教運動曾在農村造就了一批熱心公益、具有新道德的社會主義新人。村民又轉回來求助于根植于傳統的宗教和禮儀之中的較為古老的道德和價值源泉。

#### 宗教和儀式

從傳統來看，農民對生活意義的想法、感覺，以及對道德規范的根本要求，都由一種構思完整的宗教系統來解釋和證實究竟是否正當。這種神圣看法的核心是一個有神、鬼和祖先的圣殿。在農民的想象中，神比生活中的政府官員形象要大，是天國之君主管轄下的有自己官階的官員。鬼是附著陰魂的平民，是死去的陌生人的危險的靈魂，而好的靈魂則是那些死去的、自己祖先的靈魂。一年之中，農民要定期，以及不定期地（如在人生的重要關頭）舉行儀式，展現他們這種世界觀的種種方面，慶祝生活的意義。[[78]](#_78_Dui_Zhong_Guo_Da_Zhong_Zong)

重要的節日如陰歷的新年、清明節、中秋節和冬至的中心內容是祭祖，為一個家族死去的祖先上供并慶祝這個家族現在的團結。生喪嫁娶的宗教儀式的規模大小象征著這個家族的完整和向心力，表明了它與過去的聯系和對未來的希望。像餓鬼節這樣的節日，其目的在于安慰那些所有在農村游蕩的、危險的鬼。另外，迷信的農民還經常搞一些日常儀式，以保護自己免受陌生人的充滿敵意的靈魂之侵害。最后，每個村社都有自己的土地神，在天國官員的級別中，它是自己本地的守護神，其生日必須慶祝。在宗教方面精于世故的村民還要撫慰其本地神的上司——附近的城隍——和較高級別的神，它們都定期巡視其轄區各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盡管執政的共產黨信奉無神論思想，但古老的宗教習俗并沒有消失。官方對宗教的政策還算寬容。雖然宗教是虛偽錯誤的，但只有政治上最危險的、對社會最有害的方面應受到直接壓制，其余的宗教習俗就像經濟剝削的苦難隨著社會主義的改造消失了一樣自然衰亡。[[79]](#_79_Guan_Yu_Bian_Hua_Zhong_De_Zo)在農村，實際上這意味著，屬于大家族祠堂的地產和其他財產應該沒收。大家族祠堂建立了崇拜共同的祖先的制度，它為大的家族集團和家族祠堂的聯合提供了基礎，隨其而來的是大筆的捐款；還為政治上抵制中央權威提供了一個道德和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是不能容忍的。也不允許本地的土地爺有寺廟，因為土地廟為村社團結反對外部世界提供一個中心；也不能容忍專職的宗教執事，如薩滿教巫師、算命占卜者和巫醫，因為這類獨立經營的政治經濟必須受政府控制。但對本家族的祖先在家內祭拜是允許的，對不時打斷生活周期的事情舉行傳統儀式也是允許的，只要這些儀式不興師動眾、大操大辦，且不破壞農業生產。以驅除惡鬼和帶來好運為目的的一點兒私人宗教儀式仍受到官方的嘲笑，但在實際上并不怎么管，只要它們本質上仍是私人的。

然而，“文化大革命”有一部分對大多數農民產生了直接影響，那就是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運動。實際上，這是一次對傳統宗教習俗的沖擊。紅衛兵（主要來自城市）要求毀滅所有的傳統祭奠的物件。他們強迫農家搬出并毀掉他們最崇拜的圣物，搗毀刻著歷代祖先名字的牌位，這些牌位供奉在正房的祭壇上。他們沒收并燒毀了含有宗教內容的舊書籍，摧毀神像和護身符，至少在一個地方，他們甚至打碎了模具，這是家庭主婦用來做帶有傳統的護身符的米餅的。在“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反宗教狂熱的重壓下，許多農民避而不搞以生喪嫁娶為目標的傳統儀式。[[80]](#_80_Zhan___Ma_De_Sen_He_Ang_Ge_E)

“文化大革命”產生了許多代替舊神的新神和鬼。毛（“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成了一個圣人。他的畫像和語錄被刻在所有農村的墻上。每家都要買幾套充斥他的語錄的紅寶書，家里曾經供奉祖先牌位的祭壇現在擺放了數套四卷本毛選。一些地方的村民在開會之前，甚至要握拳宣誓和跳“忠字舞”，這種舞和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的旋律，跳起來很像弗吉尼亞舞蹈。如果說毛代替了神，那么階級敵人就代替了鬼。不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而且在更早些的運動中，人們打擊的對象在官方文獻中經常被稱為“牛、鬼、蛇、神”，這個傳統的稱呼由一些危險的超自然怪物的同義詞構成。新政府的節日，如元旦（按西方日歷）和10月1日的國慶節，在其意義和重要性上都是舊節日的對立物。[[81]](#_81_Ma_De_Sen____Zhong_Guo_Nong)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之一是，它提出的新神象征是如此的不可信。在毛的名義下，一群失控的烏合之眾大行暴虐。由于獲得了現代大眾傳播的手段，大部分村民都知道了困擾中國大城市的那種無政府狀態。如果說這些事件太遙遠沒能對農民形成一場深刻的道德和感情上的沖擊的話，那么，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時期，在1968年發起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與農民的關系就太密切了，這場運動旨在懲處破壞法律和秩序的人。

清理階級隊伍確實波及了一些農村地區，它要求農民們在同村居民中找出一批（定額約3％）要對“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壞性的部分負責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間肇事者相對少一些的村子也必須捏造出幾人。按照毛主義者社會階級的理論，階級出身好的人通常不會搞反革命活動。所以，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浩劫的工人和貧農可能不是好階級的真正成員，而是受到了壞階級血統中隱藏的污點影響的人。如果公開的肇事者帶有壞階級出身的隱藏的污點，那么，這種隱藏的污點甚至會影響那些顯然沒做過任何明顯錯事的人。在廣東“陳村”附近地區，至少這是對沒有人緣的村民進行政治迫害而使用的邏輯。這些沒有人緣的村民包括愛說閑話的老婦，村民說她們在土改期間被錯劃了成分，或是與錯劃了成分的人有近親關系。所有這些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最狂熱的時候，以毛主席的名義干的。它導致了正義公理的公然失敗，以至許多農民對毛是光榮的、革命新道德的源泉的說法完全失望。[[82]](#_82_Ma_De_Sen____Zhong_Guo_Nong)

隨后在70年代初期發動了其他運動，例如1971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和1973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所有這些運動都是在毛的名義下發動的，結果造成了一種印象：政府在農村采取完全不合理的舉動。批判林彪運動向人們展示了這樣一幅景象：林彪從尊貴的地位上跌下來，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被告知，林彪是毛最親密的戰友。既然毛的形象已變得如此暗淡，那還有什么值得人們信任呢？

或許，許多農民通過回到自己的家庭獲得了安慰。不管已為人們投身公益事業打下了多么堅實的基礎，不管已為農村社會主義樹立了多么好的道德基礎，所有這一切都被“文化大革命”深深侵蝕了。這是一大諷刺，因為“文化大革命”公開宣稱的目的是創立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道德。由于害怕因用殘存的傳統方式祭拜祖先或進行婚喪嫁娶而受到懲罰，許多古老的家庭禮儀悄悄地復活了。不過，各家必須謹慎，不要明目張膽地進行這種“封建迷信”，他們還須臨時湊用一些儀式物品，例如用幾盤蚊香代替真正的炷香。傳統的公共儀式或許永遠消失了。沒有對一個家族共同祖先的祭拜。沒有對本地土地神或城隍的有組織的祭拜。不僅因為這些儀式被官方禁止，而且還需要支出一筆公共基金。而公共基金自土改以來就沒有了。但是現代公眾慶典——慶賀毛主席，慶賀國家或人民解放軍——明顯地喚不起人們的激情，而且除了獲得幾小時不工作的機會外沒有什么意義。盡管（或許是由于）有中國共產黨20年的宣傳，農民仍生活在以家庭為中心、基本上是在自己的道德觀念的世界里，不適應社會主義要求的集體紀律。[[83]](#_83_Pa_Li_Shi_He_Huai_Te____Dang)

#### 受圍攻的農村

除了對農村進行大肆宣傳，以圖加強農村與國家政體的道德和社會聯系外，毛主義者的政府還從城市派來了數百萬年輕人。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政府實際上禁止農民移入城市。事實上，跳出農村的唯一機會是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然后，這個人便能周游全國，可能有機會學會像開卡車這樣的一門技術，它能使這個人在縣城，甚至是大城市里找到職業。然而，人民解放軍只挑選一些最強壯的、政治上最積極的農村青年。

在城市和農村之間設立障礙的最終結果是兩個獨立的、但無疑是不平等的社會的形成。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工作、社區和文化生活方式有著極大的差異。城里人傾向于把農村看成野蠻的、奇怪的和危險的地方，鄉下人絕對低城里人一等。農民承認其生活低城里人一等。

為了彌合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距，為了緩和城市過分擁擠引起的人口問題，60年代初期，政府開始派少男少女“上山下鄉”。首先，這個活動是自愿的。政府鼓勵滿懷理想的中學生獻身于建設農村這一光榮的工作中去。然而，甚至在用這些理想化的術語表述時，到農村去的基本思想也承認：這是一種獻身行為，言下之意是農村生活水平比城市低。在這個運動期間，從1962—1968年，約有120萬城市青年“下鄉”。1968后，這一活動大大增加了。1968—1978年間，1200萬左右的城市青年被下放，這個數字約占城市總人口的11％。不過，此時這個運動看不到一點自愿的樣子了。[[84]](#_84_You_Guan_Zhi_Shi_Qing_Nian_S)

甚至當為數較小、動機很好的年輕人到農村后，他們也經常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他們對農村生活中的骯臟和不講究衛生情況感到吃驚。他們不會農活，卻堅信自己文化上高人一等。許多城市青年很快就喪失了理想主義并企盼回家，正如一位前上山下鄉的青年在與B.邁克爾·弗羅利克談話時指出的，想回到“文明世界”。[[85]](#_85_B_Mai_Ke_Er__Fu_Luo_Li_Ke)對村民來說，城市青年農活做得不夠多，養活不了自己，他們是“飯桶”，是本地經濟的一個負擔。甚至當他們想為貧下中農服務時，這些城市青年也因為以恩人自居的態度而招致農民的反感。有時，農民把城市青年當成是有利可圖的人。前上山下鄉青年回憶起許多軼事時說，農民侵吞國家為照顧城市青年提供的款項，挪作本村使用，而且還有相當多的農民對城市女青年進行性虐待的例子，這刺激了農民傷風敗俗的丑惡陋習。[[86]](#_86_Zhan___Ma_De_Sen_He_Ang_Ge_E)

在知識青年下鄉活動的最初幾年，有時在發展城里人與農民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方面取得了真正的進步；而且城市青年幫助農村提高識字率以及在醫療保健和新型工具的使用方面發展本地的技術專長。但自從1968年后大批青年被派往農村，這些有益的事情就很少能實現了。第一批到農村的人中，許多是以前那些無法無天的紅衛兵，他們把自己被派往農村看成是對他們在1966年和1967年敢于造反的懲罰。他們沒有使自己融入農民生活的良好愿望，只是耗費農村的資源，還抱怨自己命運不佳，惹是生非，有時還從他們寄宿的房東那里偷糧食和蔬菜，而且冥想苦思能離開他們所在的農村。[[87]](#_87_Xu_Duo_Lai_Zi_Zhong_Guo_Guan)到70年代初，政府頒布政策，每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中學畢業后可以留在城市；這就是說其他所有孩子都必須去農村。不想去農村的城市人口大量流入農村，數量之大經常超過了農村所能承受的。

因此，青年下鄉活動不僅沒有縮小城鄉之間的差別，總的說來，反而使城鄉差別進一步擴大。村民們可能把自己的村社看成是城市過剩人口的傾銷地，城市青年可能自認為被拋棄了，“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正如一個這樣的青年所指出的。[[88]](#_88_Ma_De_Sen____Zhong_Guo_Nong)城鄉之間的敵對情緒增加了。對許多村民來說，外部世界——城市和政府的世界——似乎必定是弊多利少的根源。

這種感受由于70年代前半期制定的許多不切實際的農業政策而更強烈。例如，中央政府中的激進派開始發布一刀切的命令，要求各地應種植某種作物，這完全脫離了經濟現實。例如，命令華南的農民種棉花和小麥（基本的理由是，在蘇聯進攻時，中國北方種植的這些作物可能會受到危害），即使這些作物在亞熱帶氣候的華南不能很好地生長。[[89]](#_89_Zhan___Ma_De_Sen_He_Ang_Ge_E)在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不管存在其他什么問題，政府對農業的做法通常至少是有助于增加生產的。現在，許多農民又必須對付政府日益僵化的命令，這些命令不符合現實情況，而農民最熟悉他們當地的情況——這卻是成功經營農業的條件。

他們也必須對付日益增加的強征糧食。政府以各種借口，要求農民把較大數額的糧食以國家規定的人為低價出售，留給農民自己消費的數量極少。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下降，在整個70年代，農業生產率逐漸下降。

這些驚人的趨勢由于村一級小規模工業化的成功而得到部分緩解。到70年代初期，農民應該“以糧為綱”的口號被修改為“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在農村組織的公社一級和生產隊一級，在政府鼓勵下，當地干部建立了許多小工廠，用于制造和修理農具、制造化肥、加工糧食等。這些工業為本地提供了受歡迎的新式服務，使公社更加自給自足。工業上的利潤也增加了經濟的影響力，公社，尤其是生產隊因此而能對自主的生產小組施加影響。新式企業為農民提供了一種新的、“現代”型的工作經歷，農民用機械工具進行穩定的室內勞動，而不是靠自己的雙手隨季節變化在戶外勞動。新工業中的職業是吸引人的，而且把農民的胃口刺激得更大。[[90]](#_90_Zhan___Ma_De_Sen_He_Ang_Ge_E)

不過，這些不可否認的積極發展有時會產生農民與國家日益疏遠的效果。當地人在很大程度上憑自己的力量出人頭地。現在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在經濟上都更為自給自足。就改善生活質量而言，他們似乎對政府沒有太多的需求，實際上，政府索取的比給予的更多。

較年輕一代農民似乎尤受這種疏遠感的影響。看到新的雖然不是很大經濟發展景象，接觸到大眾傳播媒介傳送的大量信息，自己至少具備小學教育知識以及聽到下鄉的城市青年講述的關于城市生活享樂的故事——所有這些都助長了無法滿足的奢望。一個廣東農民說：“我父母僅想能填飽我們全家的肚皮，我們年輕人想要從生活中得到比這更多的東西。”[[91]](#_91_Zhan___Ma_De_Sen_He_Ang_Ge_E)但在70年代中期農村經濟停滯的時候，更多的只能是想想而已。

## 復舊，1977年以后

#### 非集體化

70年代即將結束時，農民的情況發生了突然而富有戲劇性的變化。鄧小平鞏固了他對政治聯盟的控制（這個政治聯盟是繼毛澤東和他的被免職的擁護者之后出現的），他的政權就開始發布農業非集體化的命令。

新的農業體制在1979年12月后的兩年間生效了，但各地執行情況又有相當大的差異。這個新體制還不是完全的非集體化。農民不能正式擁有土地，就是說他們不可以買賣和租讓土地。但在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生產責任“被分散到農戶家里”。至少在一些地方，土地根據1949年前農民的地契來劃分，不過，這一做法受到了官方的批評。[[92]](#_92_Yu_Er_Gen__Duo_Mu_Si___Gong)在這種受歡迎的、“責任制”下，每一家農戶以自己認為合適的任何方式獲得耕種一份土地的責任，這份土地以前是由集體耕種的。在賣給國家一定數量的糧食和其他產品后（國家通常詳細規定地里必須種植什么作物），農戶可隨意處理其產品。這是一種事實上的租佃，國家現在充當了地主。

新體制也允許農民多留自留地。現在，將近25％的可耕地可以留作自留地，在這塊土地上，農民可以種想在自由市場上出售的任何東西。隨之而來的是，副業生產的范圍大大擴展了。在10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量被取締的農村市場，帶著自50年代初期以來從未有過的生機，現在也獲準重新開張了。城市近郊農民也獲準在城里設立“農副產品市場”，這種事情自1958年以來一直是被禁止的。生產隊仍是擁有牲口和大型農具的單位，生產大隊是擁有大型機械如拖拉機、小型工廠、車間和衛生所的單位。但在一些地方，甚至連這些公有財產都出租給個人以賺取利潤。[[93]](#_93_Zhan___Ma_De_Sen_He_Ang_Ge_E)

個人追逐利潤被當做社會主義的對立面批判了20多年，現在則成了被贊譽的事情。一個流行的口號是“致富光榮”。這是一個絕大多數農民欣然接受的政府口號。農村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承包運動，個人首創精神帶來了農業生產的大幅度增長。現在比以前能買到的消費品更多了，新富裕起來的農民用新式家具、自行車、收音機甚至電視機裝飾自己的家。盡管他們生活在名義上還是社會主義的體制之下，但農民也許感到現在經濟上比從政府開創社會主義道路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自由。

然而，隨這種經濟自由而來的是，社會主義已部分緩和了的許多問題又重新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了。到80年代初出現了“新富農”的說法，其中一些人成了萬元戶，與新中國成立前舊社會的富裕地主的收入一樣多。不過，與舊的地主統治階級不同，這些新富農主要不是從地租而是從商業活動中賺的錢。或許，致富的最快途徑是壟斷當地一項重要的服務行業（如運輸）。在公共設施如卡車運輸方面的實際壟斷權有時可通過與干部們的特殊關系而獲得，這些干部負責給他們發放許可證。與當地干部確立“好感”關系經常是通過行賄來實現的。有時，本地干部親自開辦有利可圖的新企業。所以，隨著經濟的發展，使本地干部腐敗的誘惑也增多了。[[94]](#_94_Zhan___Ma_De_Sen_He_Ang_Ge_E)

此外，經濟自由的好處卻為老、弱、窮和不走運的人帶來日益增多的不安全感。伴隨著致富的新機會而來的是變窮的新的可能性。如果農戶因生病、計劃失當、自然災害或只是運氣不好，他們就無法從承包的土地上打出足夠多的糧食，無法在完成國家定額后還能獲得足夠的收入，幫助他們擺脫困難的途徑更少了。新體制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在一個各自獨立的小的承包人世界里，諸如灌溉系統的維持和發展這樣的公共工程將如何管理。[[95]](#_95_Duo_Mu_Si___Gong_She_De_Xin)

中國人生活的特征是家庭關系網。在舊社會，對窮人、弱者和老人的幫助（如果真有此等幫助的話）是來自這張關系網。[[96]](#_96_You_Guan_Zhao_Gu_Lao_Ren_De)同樣，對村社范圍的公共工程的經濟支持也是按擴大了的血緣關系界限來組織的。在新的自由企業體制下，傳統的血緣關系、朋友關系和良好的人際感情有可能替代公社體制下提供的社會福利安排。然而，正當家庭關系對農民的長遠福利比對這一代人的安逸變得更為重要的時候，政府強制推行了會從根本上削弱農民家庭能力的政策，使他們無力提供那種福利。

#### 婚姻和家庭

為了理解這些新政策的重要性，我們應該回顧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政府的政策對家庭生活的影響。新政府的首批法令之一是1950年頒布的一個全新的婚姻法，它廢除了“建立在男尊女卑基礎上，且無視兒童權益的專制的封建婚姻制度”[[97]](#_97_Zhong_Yang_Ren_Min_Zheng_Fu)。但由于這個法律在農村并沒有得到大力推行，所以，它對農村家庭生活的基本結構沒有產生深刻影響。農民還像共產黨上臺之前那樣結婚、生育和撫養孩子。

新婚姻法以“自由選擇伴侶……及婦女和兒童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為基礎，其主要前提是這樣一個原則：婚姻是通過兩個平等個人的自由選擇建立一個新的家庭，而不是由雙方家庭一手包辦，根據家庭的整體利益安排子女的婚姻。盡管根據新的婚姻法，婚姻由男女雙方自己做主，但實際上，在訂婚時父母的意見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有一點可以肯定，與20世紀初相比，子女在選擇配偶上逐步獲得了更多的發言權。1949年以前，由父母包辦子女的婚姻，常常是新郎新娘直到舉行婚禮那天才得第一次見面。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數十年間，父母對婚姻安排的控制明顯地減弱了。現在，即使有時父母主動為子女安排婚姻，通常也是事先與結婚雙方商議過的。青年男女通過一塊兒上學或在同一個生產單位勞動，互相了解的機會越來越多；他們常常自己向對方表露愛慕之情，盡管隨后的發展仍將受到父母的極大影響。這些變化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婚姻基本上是由雙方家庭，而不是由個人安排的。[[98]](#_98_Jian_Pa_Li_Shi_He_Huai_Te)

新婚姻法也以“兩性權利平等”為基礎，不像那些使婦女明顯地從屬于男人的傳統習俗。不過，在中國的農村地區，婦女的地位仍明顯低于男人。婚姻仍是男方的事，女人“嫁進其夫之家”（通常意味著嫁入其他村子）并有義務為其婆家的幸福做貢獻。所以，兒子仍然比女兒更得寵——生兒子稱“大喜”，而生女兒是“小喜”，因為把女兒養大后，她將為別人家服務。在家里，妻子的地位明顯低于丈夫，實際上也低于公婆。盡管婦女像在傳統時代一樣，經常最終設法在家里獲得不少的非正式權力，但最后的決定權仍在她丈夫或許甚至是公公手里。

雖然1949年后的30年，農村婦女的生活確實有了一些改善，但這些改善并沒有產生或導致傳統的家長制的根本改變。婦女在社會主義改造后下田勞動時，她們獲得了一些地位。現在，她們掙得的工分是家庭收入必不可少的部分。隨著婦女在經濟上變得更有價值，新郎家付給其未來的媳婦家的聘禮也有所增加。在家里，男性家長的專斷統治似乎有所削弱。然而，婦女去集體農田勞動得到的工分總是比男人少一些，她們的收入沒有分給她們自己，卻給了她們家里。除了做農活外，她們還要做所有的家務活。此外，農村絕大多數干部是男人。生產隊一級唯一的婦女干部通常是婦聯主任。如果丈夫把妻子打得很嚴重，足以造成嚴重的傷害，丈夫現在可能會受到懲處，但丈夫打老婆的事情仍然常常發生。人們對丈夫的性不忠看得較平淡如妻子性不忠那就嚴重得多了。[[99]](#_99_Pa_Li_Shi_He_Huai_Te____Dang)

家長制持久不衰，其根本原因是它為其家庭成員、尤其是病人和老者提供福利方面發揮了極重要作用。當老夫老妻無法養活自己時，他們的兒子和兒媳將照顧他們。反過來，當兒子和兒媳工作時，年邁的父母會照料他們的孩子。因此，大家庭的古老理想又復活了，在這種家庭中，已婚的兒子和他們的家人共同生活在一個年邁的家長的權威之下。像過去一樣，這種理想在大多數家庭只是部分地實現了。最常見的模式是：老兩口與他們已婚的兒子之一（通常是長子）住在一起；其余的已婚兒子在離父母住房非常近的家中各自居住。[[100]](#_100_Dai_Wei_Si__Fu_Li_De_Man)但有一些跡象表明：在經濟狀況改善了的今天，與1949年以前相比，有更多的家庭生活在大家庭的傳統理想之外。[[101]](#_101_Fei_Xiao_Tong___Guan_Yu_Zho)

在社會主義農業體制下，那些無兒無女的老人應受到“五保”的保護：保吃、保穿、保住、保醫療保健和喪葬費用。每個生產隊都應從年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以支付貧困老人的上述費用。不過，這種社會福利制度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的：僅幾個老人需要五保，因為絕大多數老人有其子女照料。盡管政府規定他們應受到很好的照料，但是許多農村老人得不到任何一個已婚兒子的照料，他們生活在可憐貧窮的境地。[[102]](#_102_Dai_Wei_Si__Fu_Li_De_Man)

隨著70年代末農業的非集體化，五保戶農民的情況甚至變得更加不穩定。新體制的一些條例規定：應當保證老、弱、鰥、寡和孤兒的生計。但由于生產隊和生產小組失去了對農戶的許多權力，誰能保證這樣的社會福利計劃最終能有充足的資金呢？

在這種背景下，農民極為關注維護傳統家長制家庭的完整，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正當經濟和政治自由的新階段似乎正給農村帶來繁榮興旺之時，政府開始通過強有力的行動打破這種完整，這就是每家只能生一個孩子。

計劃生育運動在農村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政府開始做出巨大的努力以限制農村地區家庭的規模（計劃生育運動于50年代中期在城市開始，但在“大躍進”中被人口越多越好的教條所中斷）。有一些跡象表明：許多農民，尤其是年輕一代農民贊成限制生育。良好的衛生條件降低了嬰兒死亡率。要求婦女下地干活更增加了她們照料大量孩子的負擔。由于跳出農村的機會受到限制，由于用于集體生產的土地不會有什么增加，生許多孩子將給家庭帶來經濟負擔。但限制家庭規模的一些傾向被生兒子的重要性所抵消。大多數家庭希望有兩個兒子，以便能至少保住一個，與他們一起生活、共同工作并在晚年照顧他們。但起碼至少要有一個兒子。[[103]](#_103_Pa_Li_Shi_He_Huai_Te____Dan)

在70年代初期，由于促進計劃生育的政治和技術手段變得相當發達——國家和省級計劃生育委員會可以直接對基層干部（大部分是男性）施加壓力，干部有權對生三個以上孩子的家庭實行物質制裁；避孕方法更加有效，并且形成了由當地衛生所發放避孕用具的更完善的網絡——農村的出生率明顯下降。官方有關家庭規模的口號是：“一好，二足，三多，四超”。不論是出于遵守政府的政策，還是（這更可能）出于對經濟收入的考慮，大多數家庭至少部分地遵循了這個口號，不超過三個孩子，在許多情況下只有兩個孩子，特別是如果這兩個都是兒子時。但是如果一對有三四個女兒而無兒子的夫婦繼續生育直到有一個兒子時，農民、甚至當地干部中也很少有人反對。

不過，到70年代后期，鑒于眾多的人口給中國現代化造成的潛在困難，中央政府迅速實施了每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嚴厲政策。在許多地區，政府全力對付那些違反新政策的人。事實上還有這樣的報道：懷孕達八個月之久的婦女被強迫去做人工流產。也有跡象表明：由于父母擔心出現年邁時沒有一個成家的兒子在身旁照料的悲慘結局，溺殺女嬰的事件開始急劇增加，盡管這個關于家庭規模的殘酷政策在整個80年代中期一直實行，但有一些跡象表明，它是采用一種更靈活的方式來執行的。[[104]](#_104_Huai_Yun_Hen_Chang_Shi_Jian)

鄧小平政權的改革大大拓寬了農村經濟和政治自由的范圍。除了允許更多地利用當地市場因素外，這個政權還放松了許多毛時代非常苛刻的政治約束。大多數地主和富農“摘了帽子”；也就是說，為他們消除了階級成分的政治污點并允許他們作為全權公民參加當地活動。[[105]](#_105_Gen_Ju___Bei_Jing_Zhou_Bao)在日益武斷的階級斗爭概念下進行強暴的政治改造的時代已經結束，至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是一去不復返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計劃也結束了，從而去掉了壓在農村和城市人民肩上的一大負擔。但在農民生活的最重要方面（對此頗有爭議），即家庭生活的性質中，政策力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顯著。

## 結論

一面推行農村經濟自由化，一面又強制實行計劃生育，這種諷刺性現象說明，要斷定農民是如何評價我們所描述的這些復雜的歷史性變遷是多么的困難。大多數對農民肯定有好處的變革與一些似乎有壞處的變革緊緊交織在一起。年輕一代歡迎的變化不一定能得到老一代的贊同；而且，甚至那些對大多數農民有利的變化也經常會對相當多的少數人不利。

從農村經濟史中可以找出這種固有的、模棱兩可的例子。根據1978年中國政府的統計數字，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人均糧食產量幾乎沒有增長。[[106]](#_106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但是，即使村民可得到的平均糧食總數沒有增加很多，經濟發展卻給許多村社普遍帶來了根本的物質利益：良好的公路、一些電力和大眾信息傳播、新的衛生所和改善了的健康狀況。農村人口增長雖然可能會給整個國家帶來經濟問題，但它卻是物質生活改善的一個標志。而且作為在這里敘述的30年歷史的結果是：這些物質利益在村民中間比革命前分享得更公平了。

在土改時期，大多數村民是貧農，因而他們有理由感激對村社的經濟進行改造。但如果在土改時期，他們的年齡大得足以參加這項運動，那么他們也會記住60年代初期的大災荒，那時，政府為創立一種激進形式的社會主義而進行大錯特錯的嘗試，其結果是：如此多的人遭受苦難，甚至死亡。他們也可能考慮這些問題：自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以來，他們得為集體的事業多工作多少小時，婦女如何不得不走出家門去干農活，而且農閑季節如何不得不獻身于集體舉辦的公共工程項目——而且他們會驚詫：從額外的勞動中獲得了多少，政府拿了多少給城市，又有多少浪費在錯誤指導下的農業規劃中。

然而，總的來說，老年人可能比年輕一代有更多的感激。中國共產黨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代價是限制城鄉之間流動。年老一代的許多農民，由于祖祖輩輩生活在本地的村社，對能否遷到城市不太關心。但年輕的農民，特別是當他們從報紙和收音機以及現在日益增多的電視機中了解到更多的外部世界后，他們可能感到沮喪。1979年在一所農中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僅6％的學生想當農民；在一所城市小學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只有0.5％的學生想當農民。[[107]](#_107_Chen_Yue_Fang___Zhang_Bai_C)隨著農民受教育的機會日益增多，年輕人比老年人更意識到地區之間和鄉村之間存在的不平等，而且來自較貧困地區的那些人會驚奇為什么會存在這種不平等。

不過，從大部分農民的觀點來看，政治領域的好壞比例比經濟領域成本與利潤之間的平衡更為含糊不清。現在農民不必像在30年代和40年代那樣感到害怕，那時，他們常受到當地惡霸地主的脅迫、凌辱和剝削，或受到土匪惡棍的搶劫盤剝，或被入侵的軍隊殺死。共產黨政府給他們帶來了至少比那時多的秩序和穩定。土改期間，共產黨把貧農和雇農組織起來參加群眾運動，打倒當地農村最大的剝削者。盡管中國共產黨相繼剝奪了農民協會的權力，但它仍繼續組織貧下中農，至少讓他們討論如何處理當地事務。雖然新體制一點也不民主，但貧下中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正式、更有組織地參與決策，管理當地的村社。[[108]](#_108_Zhe_Shi_Pa_Li_Shi_He_Huai_T)

此外，管理生產隊和生產大隊的基層干部幾乎全都來自他們管轄的相同的鄉村或小村莊。他們容易受到鄰居和親戚的各種非正式的社會監督，甚至在他們因有腐敗跡象而受到上級領導的審查時，也是如此。盡管有這些缺點，村民們還是有了比革命以前更負責任，而且總的說來更誠實、更守紀律的土生土長的領導。正是這樣一種體制，可能使村民對日常生活的集體監督意識比以前更多了。

但不管本地干部對村民有多同情，他們只有受到上級黨的領導的嚴格審查后才被提拔，并仍受黨和國家官僚組織機構的巨大權力的支配。由于政府不斷改變其政策，對農民來說，這樣的政府似乎是危險的和反復無常的。傳統上，農民學會躲避政治，讓本地名流調解糾紛和維持秩序，并對政府官員敬而遠之。但是，現在中國的政治與他們息息相關。50年代，政府的經濟政策引起大規模的饑荒；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對階級斗爭不切實際的想法，政治運動毀滅了他們的前途，有時奪走了無辜的生命。

盡管政府的宣傳充斥農村，試圖為它的政策辯護，并給農民一種參與了超越他們本地地區界限的政治事業的感覺，而且把以下作為其最大目標：試圖從根本上將農民意識改造成新型的“社會主義的”思維方式——但農民的心態在許多方面對政府政策持懷疑態度，并且仍然緊密集中于村社和家庭生活。可以肯定，一些農民，例如當地黨的干部和復員的人民解放軍戰士，比起其他人來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的熏陶更系統，因而有時會使他們對自己在國家政體中的地位有一點粗略的了解。年輕一代，其中大多數到現在已至少完成了六年的小學教育，對政府意識形態的基本信條比他們的父輩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但是，甚至連這些人最關心的也仍然是農村生活，其原因很簡單，就是在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下，他們幾乎無望離開農村，因此，也無法直接參與更廣泛的公共事務。

中央政府仍是一個遙遠的、神秘的、但強大的實體。這里所敘述的30年歷史中的某些時期，至少對貧下中農來說，政府似乎是一個本質上仁慈的、包含著一個幾乎神圣的道德承諾的實體。60年代中期，許多農民敬畏毛，甚至把他作一個神來膜拜，就像在以前的時代對待皇帝一樣。但“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政策及其后果似乎抹去了中央政府的神秘色彩。到70年代中期，政府在許多農民的心目中變成一個危險的、外來的、愛管閑事的力量。50年代末期，政府還能通過干預農村生活為其冒進的“大躍進”政策激起至少一陣短促的熱情爆發，而在70年代末期，它主要是通過撤銷對地方經濟的控制來激發農民的熱情。

農民對他們社會生活方式中的變化的評價可能會產生一種積極與消極判斷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比起由關于政治和經濟生活的評價所造成的張力要小，因為他們社會生活模式的變化畢竟不像他們的政治和經濟生產的變化那樣急劇。與50年代一些西方社會學家的估計正好相反，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家庭的結構，或解體村社生活的傳統組織結構。當共產黨為緊緊圍繞傳統的農村社會生態學的集體農業建立新的組織結構時，其社會主義改造的嘗試最為成功。當他們確實試圖解體一些傳統社會生活的基本模式，尤其是當組織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時，結果造成了經濟和政治的混亂。所以，他們最終還是同意大體上保留這些模式。

所以，在一個人的生活中，傳統家庭仍是最重要的道德、感情和經濟表現形式。血緣關系仍是父系的，家庭住地仍是父家的，而且家庭仍是夫權制。老人仍與成家兒子中的一個住在一起。兒子們仍然承擔著照顧年邁父母的義務，而且實際上至少在一般情況下都屈從于他們的權威。幾個已婚兒子及其家庭與他們的父母居住在同一個院子里，吃同一鍋飯，這樣的大家庭至少在一些地方甚至比過去更為普遍，而且由于農村人口流動的限制，越來越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對年邁夫婦至少有幾個已婚的兒子，他們住在鄰近的獨家小院，但仍保持贍養父母和在經濟上互相合作的關系。

把出自同一個祖先的數百家糾合進一個正規組織的共同宗族已經成了歷史，他們共有的財產和祠堂都被共產黨政府沒收了，而且他們的權威遭到壓制。甚至在共產黨掌權之前，這種家系組織就已開始衰落。[[109]](#_109_Jian_Yang_Qing_Kun___Gong_C)然而，即使在今天，遠親關系在由“感情”形成的特別的人際關系網中也還起著重要的加固紐帶作用，正是這種關系網構成了各種地區聯盟和合作的模式。

進入80年代后，最具社會破壞性并且令人不滿的、政府要改變社會生活的嘗試是它的一對夫婦只能生一個孩子的政策。不過，要評判這個計劃的效果仍然為時過早。發生在農村家庭中的大部分持久的變化并不是由于政府直接的壓力，而是由于農村生活中不斷變化的機會結構而逐步產生的。父母包辦婚姻不再多見，部分原因是：年輕人在學校或生產小組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未來的配偶。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因為現在她們的田間勞動具有更重要的經濟價值。這些變化可能會受到大多數年輕一代的歡迎；而且這些變化還不足以強烈和迅速到嚴重冒犯老一代的程度。一些年輕人確實希望農村家庭生活中發生更迅速的變化。尤其是婦女，她們的負擔只是有稍許的減輕。雖然她們希望減輕負擔，但是她們似乎并沒有形成能系統地促進其地位改善的思想方式和組織形式。

因此，無論好壞，毛在20年代發現的束縛農民的至少三條“極大的繩索”，現在仍然粗壯而牢固。舊的政治權威的束縛已被解放，但取而代之的是強大的新束縛。家庭生活的束縛仍然很緊。而且婦女仍然束縛于丈夫的權威。第四條繩索——傳統宗教的束縛又怎么樣了呢？

西方對這個題目研究得很少，舊神是官僚體制下政治秩序的神圣化身。現在看來舊神的權威基本上消失了。大的神廟（就像臺灣農村中常見的那些）都消失了。不再有為紀念這些圣物而舉行的繁雜而豪華的公眾慶祝活動。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政府試圖用崇拜毛來代替崇拜傳統的神。但對毛的狂熱崇拜失敗了，而且官方的政治性慶祝在農村幾乎沒產生多少感情上的共鳴。然而，農民神圣的祖先仍受到紀念和崇敬。“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毀壞或藏起來的祖先牌位現在又被重修或找了出來。農民仍然慶祝用以紀念祖先和維護其子孫團結以及他們家庭命運的主要節日。盡管薩滿教僧和占卜算卦者已被取締，但政府在70年代末就注意到，其中一些人仍在從事“封建迷信”活動。[[110]](#_110_Li_Cha_De__Ma_De_Sen___Zong)至少還有一些鬼怪，作為由從事這種宗教活動的人所引出的代表險惡、異族和非理性的傳統象征，盡管是非法的，但似乎仍然沒有絕跡。

[[1]](#_1_8)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4頁。

[[2]](#_2_8)關于這方面的分析，請看林耀華《金翅：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楊慶堃：《共產主義革命中的中國家庭》；馬杰里·沃爾夫：《李家：一個中國農民家庭的研究》。

[[3]](#_3_8)見莫頓·弗里德《中國社會的組織：對中國一個縣城的社會生活的研究》；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亞洲研究雜志》第24期（1964—1965年）。

[[4]](#_4_8)馬杰里·沃爾夫：《李家：一個中國農民家庭的研究》，第22頁。

[[5]](#_5_8)莫頓·弗里德在《中國社會的組織》一書第99—134頁中提供了有關這些忠誠方面最系統的分析。

[[6]](#_6_8)有關這方面的權威的社會學研究，請看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國東南的家系組織》。

[[7]](#_7_8)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前，就有不少人論述這種差別，如楊慶堃《一個向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鄉村》；威廉·欣頓：《翻身：中國鄉村革命的證據》；伊莎貝爾和戴維·克魯克：《一個中國鄉村的革命：十里店》、《十里店：一個中國鄉村的群眾運動》；莫頓·弗里德：《中國社會的組織》。

[[8]](#_8_8)莫頓·弗里德：《中國社會的組織》，第104—109頁。

[[9]](#_9_8)關于這種復雜情況的分析，見楊慶堃《一個向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鄉村》。

[[10]](#_10_8)理查德·馬德森：《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權力》，第72—80頁。

[[11]](#_11_8)劉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上所作“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見《劉少奇選集》，第29—47頁。

[[12]](#_12_8)欣頓：《翻身》，第280—475頁。

[[13]](#_13_8)同上書，第479—508頁。毛的這一講話發表于1948年4月1日，在《翻身》一書中錄有其摘要，第486—487頁。

[[14]](#_14_8)關于該地區土改詳情，請看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1949—1956）》。

[[15]](#_15_8)本尼迪克特·斯塔維斯：《中國的農業機械化政治》，第29—30頁。

[[16]](#_16_8)目擊者關于諸如此類錯誤的陳述，見欣頓《翻身》，第280—475頁，以及楊慶堃《一個向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鄉村》，第131—152頁。

[[17]](#_17_8)關于這方面的戲劇性事例之一，見欣頓《翻身》，第364—368頁。

[[18]](#_18_8)見弗朗茲·舒爾《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第431—437頁。

[[19]](#_19_8)關于各地實際土地分配差異的例子，見欣頓《翻身》，第592頁；楊慶堃：《一個向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鄉村》，第146—152頁；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61、90頁。

[[20]](#_20_8)這至少是楊慶堃在《一個向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鄉村》里的結論（第155—157頁）。這一時期稅制的詳細論述見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102—143頁。

[[21]](#_21_8)安妮塔·詹、理查德·馬德森、辛格森·昂格爾：《陳村》，第52頁。

[[22]](#_22_8)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247—250頁；楊慶堃：《一個向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鄉村》，第163—165頁。

[[23]](#_23_8)見威廉·欣頓《翻身：一個中國村莊的繼續革命》，第76—93頁；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153—191頁；以及楊慶堃：《一個向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鄉村》，第203—214頁。關于共產黨時代之前的互助，莫頓·弗里德：《中國社會的組織》，第117—120頁。

[[24]](#_24_8)簡·邁爾達爾：《來自一個中國村莊的報告》，第140頁。

[[25]](#_25_8)簡·邁爾達爾：《來自一個中國村莊的報告》，第141頁。

[[26]](#_26_8)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185、195—245頁，

[[27]](#_27_8)埃茲拉·沃格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一個省城的規劃與政策（1949—1968）》，第138—142頁。

[[28]](#_28_8)簡·邁爾達爾：《來自一個中國村莊的報告》，第141頁。

[[29]](#_29_7)有關集體化的詳盡分析，請看維維恩·舒所著的《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275—317頁；楊慶堃：《一個向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鄉村》，第203—237頁；埃茲拉·沃格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第146—177頁；欣頓的《翻身》第81—166頁中冗長的闡述。

[[30]](#_30_7)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276頁。

[[31]](#_31_7)欣頓：《翻身》，137頁。

[[32]](#_32_7)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299—300頁，農民們的收入主要來自于租息和勞動兩部分；欣頓：《翻身》，第126—143頁。

[[33]](#_33_7)“至于借用的牲口……主人很可能繼續有所有權并負責飼養，合作社使用時要付費；或者主人對這些牲口還得保留所有權，但讓合作社飼養，合作社想用時，就有權使用，合作社最后付給租金，或者主人把牲口賣給合作社，合作社在幾年以內分期付款。在前兩種情況下，如果一頭牛死了或傷了，主人反而遭受責備。因此，一次性購買牲口是最好的辦法，合作社成立后一般都這么做。合作社付給農民征用牲口、農具以及其他東西的費用，標準相差很大。”（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290頁）關于征用牲口的價格如何有利于合作社，請參閱欣頓《翻身》第144—149頁。《翻身》第149—151頁還記述了農民看到自己的牲口征用后被超載或抽打后的一些令人傷心的煩惱的故事。

[[34]](#_34_7)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284—285、299—300頁。

[[35]](#_35_7)參見理查德·鮑姆《革命的序幕》。

[[36]](#_36_7)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300頁。

[[37]](#_37_7)沃格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第228—229頁。

[[38]](#_38_7)有關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好的例子，請看沃格爾的《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第243—252頁；弗朗茲·H.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第474—482頁；安妮塔·詹、理查德·馬德森、喬納森·昂格爾：《陳村》，第24—26頁；欣頓：《翻身》，第169—247頁。

[[39]](#_39_7)然而，公社規模不盡相同。參見安炳炯：“中國人民公社的政治經濟：變化與連續性”，《亞洲研究雜志》第34卷第3期（1975年5月）。

[[40]](#_40_7)在沃格爾的《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第233—270頁和舒爾曼的《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第464—490頁中作了非常精彩的論述。

[[41]](#_41_7)安妮塔·詹、理查德·馬德森、喬納森·昂格爾：《陳村》，第25頁。

[[42]](#_42_7)同上。

[[43]](#_43_7)引自安炳炯的“政治經濟”，第634頁。

[[44]](#_44_7)關于在饑荒期間死亡人數的總數，參見尼古拉斯·拉迪：“重壓下的中國經濟（1958—1965）”，第376頁；彭尼·凱恩：《中國的饑荒（1959—1961）：人口統計和社會影響》，第89—90頁。根據拉迪的統計，死亡人數為1600萬—2700萬。凱恩的估計是1400萬—2600萬。我要特別感謝凱恩所提供的信息。

[[45]](#_45_7)韓素音是世界性的作家，其母親是中國人，父親是比利時人。她在1980年的回憶錄中寫了她是如何出于對祖國的忠誠，隱瞞了饑荒的真相。“我虔誠地、全身心地護著中國，甚至面帶微笑地向那些外交官和好刺探消息的記者撒謊。因為只有中國是我的‘心臟’，流淌在我的血液中，遍布于我全身的每一個細胞。我別無選擇，中國選擇了我。在寒風凜冽、寒冷侵襲大地的時候，整個世界似乎都幸災樂禍地威脅中國。然而，我首先是中國人。”韓素音：《我的屋子有兩扇門》，第296頁。

[[46]](#_46_7)例見史蒂文·W.莫舍《破碎的大地：農村的中國人》，第50頁。

[[47]](#_47_7)彭尼·凱恩：《中國的饑荒》，第118頁。

[[48]](#_48_7)在欣頓《翻身》第251—252頁中有這樣一個例子。

[[49]](#_49_7)請見凱恩《中國的饑荒》，第116—118頁。

[[50]](#_50_7)這個例子出自費孝通在1980年前后會見開弦弓的幾個男人，詢問他們為什么離婚的材料。

[[51]](#_51_7)威廉·拉夫利所作的統計數字表明，四川南充絕大部分兒童的教育在三年自然災害中被耽誤了。見“中國農村生育率的變化：來自四川什邡縣的報告”，載《人口研究》1984年第38期，第370—371頁。

[[52]](#_52_7)安妮塔·詹、理查德·馬德森、喬納森·昂格樂：《陳村》，第25、53頁。

[[53]](#_53_7)沃格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第315頁。

[[54]](#_54_6)同上書，第255頁。

[[55]](#_55_6)曾被國民黨情報機構掠去的并在臺灣出版的福建省連江縣的一系列檔案中也坦率地承認問題出自較低的農民覺悟，參看C.S.陳所著的《連江縣的農村人民公社》。

[[56]](#_56_6)關于公社、大隊和生產隊組織和管理的情況，請看安：“政治經濟”；約翰·C.佩爾澤爾：“中國大躍進后一個生產大隊的經濟管理”，載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鮑大可、埃茲拉·沃格爾合著的《共產黨中國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權》中也有此類論述。

[[57]](#_57_6)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66—71頁。從采訪中國各個地方的人中了解到，實際選舉的程度因地而異。

[[58]](#_58_6)佩爾澤爾在其所著的“中國大躍進后一個生產大隊的經營管理”中描述道：廣東省的生產大隊是一個負責把大部分生產任務派到生產隊的小組的組織，小組通常有兩個友好和合得來的家庭組成。兩個家庭中有一個缺勞力，而另一個則勞力富余。

[[59]](#_59_6)關于這一時期村里不平等的普遍狀況，參看詹、馬德森和昂格爾的《陳村》，第50—54頁。陳的《連江縣的農村人民公社》提供了縣級干部對這一現象的看法。

[[60]](#_60_6)《陳村》第247頁注。將此與梁恒的報告相比，1968年前后在湖南省的一個貧困地區，10個工分僅值1角4分。梁恒、朱迪思·夏皮羅：《文革之子》，第172—173頁。關于影響工分價值各因素的詳細論述，威廉·L.帕里什和馬丁·金·懷特：《當代中國的村莊和家庭生活》，第47—72頁。

[[61]](#_61_6)帕里什和懷特：《當代中國的村莊和家庭生活》，第302—308頁。

[[62]](#_62_6)同上書，第59—71頁。另一個關于生產隊收入分配的問題是口糧定額的制定。正如帕里什和懷特所述：“糧食分配是與工分相分離的。工分影響一個家庭的收入，糧食分配則影響其支出……糧食分配通常有三種方法，首先是按人頭分配，由各人的年齡和性別決定口糧數額。因為這一數額不因該年的勞動而變，這樣分配的糧食被稱為‘基本口糧’。這一方法為每個村民提供了一定的緩沖保險。第二種方法按照每個家庭成員當年的勞動量，或更不確切些，按所掙工分進行糧食分配。當糧食分配以工分為基礎時（這稱為‘工分口糧’），能勞動掙工分的人才能分到糧食。第三種方法是將小部分口糧（通常是10％）用于鼓勵人們將糞肥交給生產隊，這部分的口糧稱為‘肥料糧’”（第65—66頁）。“基本口糧”的比重越大，一個生產隊中消費的平均程度也越高，強壯勞力的勞動積極性也越差（如果這種勞動的唯一動力是經濟上自利的話）。隨著60年代后期要求農村更“社會主義”化的壓力，基本口糧的比重上升，而工分口糧的比重則下降了。

[[63]](#_63_6)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91—93頁；帕里什和懷特：《當代中國的農村和家庭生活》，第63—71頁。

[[64]](#_64_6)鮑姆：《革命的序幕》，第11—59頁；馬德森：《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權力》，第67—101頁；詹、馬德森、昂格爾：《陳村》，第37—73頁。

[[65]](#_65_6)關于“積極分子”和黨的領導的關系的簡明分析，見理查德·H.所羅門：“關于積極性和積極分子：把國家和社會聯系起來的動機與政治作用的毛主義者的思想”，《中國季刊》第39期（1969年7—9月），第76—114頁。

[[66]](#_66_6)到1960年農村地區黨員的統計數字，見沃格爾的《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第371—372頁。我還沒能找到此后農村地區黨員的精確數字。1982年中共十二大報告指出，在中國10億多人口中，黨員總數3900萬。

[[67]](#_67_5)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95—96頁。

[[68]](#_68_5)對這些運動的生動描述，見欣頓《翻身》，第319—400頁。50年代廣東省影響到農村干部的各種運動的編年史，見沃格爾的《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尤其是第109、133、153頁。

[[69]](#_69_5)欣頓：《翻身》，第157頁。

[[70]](#_70_5)引自鮑姆的《革命的序幕》，第24頁，譯文和有關社教運動的其他文獻，見理查德·鮑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維斯《四清：1962—1966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關于這一時期當地領導理解學習的特征，見米歇爾·奧克森伯格：“中國農村的本地領導人（1962—1965）：人品、官職政治補充”，載鮑大可編《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治》，第155—215頁。

[[71]](#_71_5)鮑姆：《革命的序幕》，第11—41頁；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37—40頁；馬德森：《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權力》，第68—72頁。

[[72]](#_72_5)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41—64頁。

[[73]](#_73_5)馬德森：《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權力》，第72—80頁。也見維維恩·舒的分析《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第339—341頁。

[[74]](#_74_5)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52—53頁。

[[75]](#_75_5)見理查德·柯特·克勞斯《中國社會主義中的階級斗爭》，尤其是第39—114頁；馬德森：《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權力》，第75—80頁。

[[76]](#_76_5)馬德森：《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權力》，第130—150頁；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74—102頁。

[[77]](#_77_5)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103—140頁；欣頓：《翻身》，第451—553頁；梁恒、朱迪思·夏皮羅：《文革之子》，第161—188頁；理查德·鮑姆：“農村的文化大革命：剖析一種有限的造反”，載托馬斯·W.魯賓遜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第347—476頁。

[[78]](#_78_5)對中國大眾宗教的規模大小的最系統分析是以臺灣的人類學實地調查為根據的，見阿瑟·P.沃爾夫：“神、鬼和祖先”，載阿瑟·P.沃爾夫編《中國社會的宗教和儀式》；也見楊慶堃《中國社會的宗教》。

[[79]](#_79_5)關于變化中的宗教政策的材料，見唐納德·E.麥克因尼斯編《共產黨中國的宗教政策及其實踐》。

[[80]](#_80_5)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118頁。

[[81]](#_81_5)馬德森：《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權力》，第130—150頁；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169—174頁；帕里什和懷特：《當代中國的農村和家庭生活》，第287—297頁。

[[82]](#_82_5)馬德森：《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權力》，第195—198頁。

[[83]](#_83_5)帕里什和懷特：《當代中國的農村和家庭生活》，第266—272、287—297頁。

[[84]](#_84_5)有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最詳細的研究是：托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鄉：中國青年從城市走向農村》；也見彼得·J.西博爾特編《中國城市青年的農村生活：一段社會經歷》；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8—11、103—111、231—235頁；馬德森：《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權力》，第105—129頁。

[[85]](#_85_5)B.邁克爾·弗羅利克：《毛的人民：革命中國的十六個生活肖像》，第48頁。

[[86]](#_86_5)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51—53頁。

[[87]](#_87_5)許多來自中國官方出版物的文章之譯文見西博爾特《中國城市青年的農村生活》，它們反映了部分官員對城市青年較低的思想水平的看法，反映這種基本思想水平喪失的生動例子，見梁恒、朱迪思·夏皮羅《文革之子》，第189—192頁；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226—235頁；弗羅利克：《毛的人民》，第42—57頁。

[[88]](#_88_5)馬德森：《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權力》，第129頁。

[[89]](#_89_5)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236—243頁。有關類似大錯的消息定期出現在1978年的中國刊物上。

[[90]](#_90_5)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213—223頁；德懷特·珀金斯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的小型工業》；瑪麗安·巴斯蒂：“經濟決策的級別”，S.施拉姆編：《中國的權力、參與和文化變化》，第159—197頁。

[[91]](#_91_5)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25頁。

[[92]](#_92_5)于爾根·多姆斯：“公社的新政策：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筆記（1976—1981）”，《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2期（1982年2月），第264頁。

[[93]](#_93_5)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272—273頁。

[[94]](#_94_5)詹、馬德森和昂格爾：《陳村》，第276—279頁。

[[95]](#_95_5)多姆斯：“公社的新政策”，第264—265頁。

[[96]](#_96_5)有關照顧老人的安排的詳細研究，見德博拉·戴維斯-弗里德曼《長壽：中國的老人與共產黨革命》。

[[97]](#_97_5)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5月1日頒布的婚姻法的譯文，楊慶堃：《共產主義革命中的中國家庭》，第221—226頁。

[[98]](#_98_5)見帕里什和懷特《當代中國的農村和家庭生活》，第155—199頁。

[[99]](#_99_5)帕里什和懷特：《當代中國的農村和家庭生活》，第200—221頁；朱迪思·斯特西：《中國的家長制和社會主義革命》；凱·安·約翰遜：《中國的婦女、家庭和農民革命》；瑪杰里·沃爾夫：《把革命放在次要地位：當代中國婦女》。

[[100]](#_100_5)戴維斯-弗里德曼：《長壽》，第34—46頁。

[[101]](#_101_5)費孝通：“關于中國家庭結構的變遷”，譯文見《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第16卷第1—2期（1983—1984年秋冬季號），第32—45頁。

[[102]](#_102_5)戴維斯-弗里德曼：《長壽》，第85—95頁。

[[103]](#_103_5)帕里什和懷特：《當代中國的農村和家庭生活》，第138—154頁。

[[104]](#_104_5)懷孕很長時間后做流產和殺女嬰的提法見史蒂文·W.莫舍在《破碎的大地》第224 261頁的描述。不過，諾馬·戴蒙德在“中國農村的集體化和非集體化——一篇評論文章”（《亞洲研究雜志》第44卷第4期（1985年8月），第785—792頁）中指出：莫舍看到的發生這些極端行為的地區不具代表性。

[[105]](#_105_5)根據《北京周報》（1980年1月21日），超過99％的地主和富農被摘掉了“帽子”，曾有不下400萬地主富農，現在僅有5萬“死不改悔的分子”。

[[106]](#_106_5)《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2頁的統計曲線表明：從1956—1958年糧食產量大約增長50％（當然，“大躍進”期間有一個陡降，隨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有一個持續的回升），同時，中國的人口大約也增長了同樣的百分比。

[[107]](#_107_5)陳月芳、張百川、余團康：“小學生的志愿和學習興趣一覽”，譯文見《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第16卷第1—2期（1983—1984年秋冬季號），第145—158頁；藍成東、張崇舉：“當年高中畢業生的志愿和愛好：上海三所高中一覽”，譯文見同一版本的《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第159—169頁。

[[108]](#_108_5)這是帕里什和懷特的觀點，見《當代中國的農村和家庭生活》，第327—328頁。

[[109]](#_109_5)見楊慶堃《共產主義革命中的中國家庭》，第191—196頁。

[[110]](#_110_5)理查德·馬德森：“宗教和封建迷信”，載《清風》，第110—196、217—218頁。

## 第十章 人民共和國的城市生活

中國共產黨1949年奪取了政權以后，它就從一個控制全國廣大農村地區的運動而形成了中央政府，不得不處理城市中紛繁復雜的各種問題。當然，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并非是農村鄉巴佬：在1927年揭竿而起之前，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曾有過城市生活的體驗。盡管如此，把城市納入新政府的規劃之中也不是一件舉手之勞的事。因為這些城市不僅曾是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中心，而且也是上個世紀外國勢力在中國影響和滲透的焦點。由于城市具有世界主義特征，這就很難把它們改造過來，使之適應中國新統治者的民粹主義思想。當時，一些城市精英和外國人都自命不凡地認為他們的地位不會受到任何威脅，因為中國共產黨人既不會經營發電站，也不精通對外貿易之道，更無法處理城市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的復雜問題。中國共產黨人不依靠他們依靠誰呢？

事實證明，這種狂妄自大的估計是大錯特錯了。中國共產黨人試圖從根本上改造城市機構和社會生活。改造城市的記錄說明，共產黨人的努力有成功亦有失敗。在短時期內，新政府的成就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克服了許多似乎是難以克服的困難，改變了不少不可改變的行為方式。但是，在長時期內，管理中國城市生活的困難又帶來了諸多新的問題和危機，單憑組織技巧和追求理想的熱情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在以后城市發展過程中，民眾早期那種好感逐漸煙消云散，當市民們回顧以往三十多年的歷史的時候，留下來的是耿耿于懷的惆悵和失意。

想把劇烈的社會變化給人類所帶來的影響表述得一清二楚，恐非易事，尤其在當代中國問題上更是如此。人們的感覺往往會囿于主觀王國之內，對過去發生事件的記憶也常常是模糊不清，甚至面目皆非。多數可資參考的材料也難免存有偏見或缺乏典型性。而且，城市情況又千姿百態，各不相同。身居北京和上海的人，其經歷就與在廣東和重慶的人不同；城市居民和縣城及城鎮相比，懸殊就更大了。知識分子在觀察問題時的角度與干部、工人、學生和士兵不一樣；有海外關系的人、基督徒、穆斯林、經過長征的老戰士和家庭主婦的經歷也不可與其他的城市居民相提并論。此外，由于1949年以后的中國政策多變，又搞了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許多人遭受打擊，這些人的經歷也千差萬別——在校學生，或是在不同的時期剛剛踏上工作崗位，或是分別了一兩年的人，也往往有著迥異的生活經歷。因此，一般的敘述（像本文一樣）是不可能全面詳實地介紹這色彩斑斕的城市生活的。但是可以討論一下中國人城市生活的總的趨勢和印象，把焦點對準大城市，偶爾也看看城市社團的各種反應。本章是描述群眾感情的，重點不在于介紹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和城市精英們的反應，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從“老百姓”的觀點來看待這些事件，換言之，從城市平民，如工人、店員、學生、技術人員等其他普通居民的角度來觀察中國城市的歷史的變遷。[[1]](#_1_Zhe_Yi_Zhang_Shi_Yong_Le_Duo)

中國共產黨人并不滿足于就城市來管理城市。雖然多年來有過幾次重要起伏，但城市某些總的方向和政策仍清晰可辨。中國的城市看上去具有許多消極的特征：它們建立在資本主義的財產關系和市場交換基礎之上；刺眼的不平等、驚人的浪費、貧困、乞丐、失業以及貧民窟惡劣的居住條件；極易爆發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受教育和其他方面享受種種特權；外國勢力和文化影響高度集中；城市官僚專橫腐敗，對平民的需要麻木不仁；犯罪、賣淫、吸毒以及黑社會敲詐勒索猖獗；城市不關心農村的需求；到處充斥著實利主義、玩世不恭和異化了的人們。

中國共產黨決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城市的特征，而不單純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的問題。中國新的領導人想擺脫上述種種城市罪惡，重建新型的城市——穩定的、生產性的、平等的、斯巴達式的（艱苦樸素的）、具有高度組織性的、各行各業緊密結合的、經濟上可靠的地方；減少犯罪、腐敗、失業和其他城市頑疾。他們還期望調整城市發展方向，為農村地區服務，縮小“城鄉差別”。這些努力就意味著限制城市化的發展，特別要控制大城市，主要是沿海城市的發展；同時，鼓勵內地的小型和中等城市的發展。[[2]](#_2_Zhong_Guo_Gen_Xu_Duo_Zhi_Min)

中國新的領導人希望實現這些目標的進步過程，能造就一代參與奮斗、有忍耐性、樂觀和勇于犧牲，為改變國家面貌作出貢獻的公民。對中國城市社會的主要特征評估盡管是否定的，但如將中國共產黨簡單說成是“反城市”的就十分錯誤了。中國共產黨的精英們承認中國城市具有雙重性——它是許多社會罪惡的中心，同時也是未來經濟和技術進步必不可少的中心。打個比喻吧，他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避免宰殺“會生金蛋的鵝”，而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的天鵝。如上所說，盡管取得了開始的勝利，改造、利用和控制中國的城市仍非易事。

## 早期年代，1949—1956年

由于過去國民黨統治最后幾年城市的秩序普遍混亂，因而（共產黨）鞏固對城市地區的控制和贏得民眾支持的工作比預期的要順利一些。下面的事人所皆知——（國民黨）官方腐敗、昏庸無能、野蠻殘暴、通貨膨脹失去控制、犯罪和其他烏煙瘴氣的混亂情況，所有這一切便把國民黨因抗日戰爭勝利而獲得的“天子”般的特權掃得蕩然無存。從1948年中國共產黨進入城市起，城市里人的態度很不統一，但總的來說是希望有個改變和改進。多數國民黨的忠實擁護者、許多相信他們將失去一切的人和有能力逃跑的人紛紛到了臺灣、香港或海外其他地方。一些財產較少辦法不多的市民則逃往山中避難，他們害怕新的統治者——謠傳說中國共產黨實行共妻、破壞家庭、強迫穆斯林吃豬肉和其他駭人聽聞的暴行。另外一方面，一些市民，特別是學生和激進的知識分子，則急切地等待著機會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到來。然而，大多數市民不愿意走極端，他們懷著無可奈何和等一等看一看的態度期待著新統治者帶來的變化。許多人覺得，新的統治者不可能比國民黨還差勁。即便是如此，他們也還是擔心，不知未來的變化將對他們和他們親人產生何種影響。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進城的時候，一般的反應是鎖上大門，關上窗戶，把傳家之寶埋在地下，他們認為一場掠奪怕是在劫難逃。許多市民從緊掩的窗戶縫里偷偷向外窺視那些進城的軍隊。一兩天后，一些人鼓起勇氣，小心翼翼地走出去，他們看到了外面的變化，感到了安全。

在短暫的恐懼之后，中國的市民們對眼中看到的一切的初步反應幾乎完全一致：喜出望外。中國人民解放軍顯然訓練其部隊在進城時，給市民留下良好印象，特別是在奪取大城市時更小心謹慎。市民們對已經被打敗的國民黨軍隊蠻橫無理和缺乏紀律的行為已司空見慣，現發現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展現出一個嶄新的形象。在這個時期，到處充滿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軼事和看到解放軍戰士彬彬有禮地問路，幫助市民干家務活，不要市民送給他們食品或其他物品，拿了也要付錢給市民，個個還是干體力活的能手，市民們充滿了感激之情。甚至一位在中國待了23年，后被囚禁又驅逐出境的堅決反共的美國牧師在談到這一時期時說：“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和最有組織紀律性的軍隊。”[[3]](#_3_Ma_Ke__Tan_Nan____Wu_Mi_Ke_Ba)然而，市民對解放軍的反應不是完全一樣都深懷敬意，幾乎與此同時，有關挖苦農村招來的“鄉巴佬”士兵故事也開始流傳起來。其中最有趣的一個笑話是講一位士兵把西式抽水馬桶當成洗米設施，結果一下把自己的口糧沖跑了。的確，農民出身的士兵與他們所處的城市環境形成的反差很大，以至于一位在中國最大的國際化大都市的記者把這種現象比喻為“火星人在上海”。[[4]](#_4_Luo_Bo_Te__Ji_Lai_En_Zai_Yu_A)這些故事和謠傳大概能幫助人們了解占領軍是用心善良的，即使是一幫質樸的士兵。

由于中國共產黨接管城市采取了其他措施，所以城市過渡得以順利完成。尤其重要的是初期在“新民主”的口號下，推行了寬大政策。盡管國民黨到處散布謠言，說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到處是新政府的犧牲者流下的血跡，但是中國共產黨一再使平民大眾相信，只有一些組織，特別是與國民黨要害人物有直接聯系的組織才會成為專政的對象，廣大民眾在新社會都能各得其所。開始，這些允諾似乎是兌現了，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很多非共產黨著名人士和一些有名的國民黨告密者以及其他敵對的人物都得到了寬恕。當然，后來這種寬大政策逐漸消失，但此時中國共產黨控制的整個城市地區業已得到了鞏固。

對新政權印象最深的，莫過于人們從親身參加的種種似懂非懂的新鮮事物中所得到的感受。當時，幾乎所有的大學生、知識分子和骨干企業的工人開始投身到一系列新奇的活動中去。頻繁的會議、政治學習、定額的體力勞動和運動動員大會——這便是新政權的特點和標志。人們被迫去熟悉那些他們原本非常陌生的哲學家及其思想——不僅有馬克思、恩格斯，而且還有康德和黑格爾。他們被組織在一起，討論進化理論，接受人是由類人猿進化而來（對于學生和知識分子來說不是新觀點，但對于大多數市民來說就很有點振聾發聵了）的觀念。這時，有一系列的成語和政治術語必須得掌握。滿懷激情的學生們掀起寫日記的時尚，將自己的思想記錄下來。年輕人，特別是參加示威和游行的年輕人，學會并且表演表達豐收喜悅的“秧歌舞”成為時髦之舉。曾經一段時期，他們站在平房頂上富有激情地宣講最新事態和報道新聞。

各種各樣的活動都在等待愿意的人去參加。1949年新加入的人被組成“南下工作隊”，開赴南方，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道進入其他城市，幫助建立起當地政權。學生和其他人組織起來，投入清理城市陰溝、整修貧民窟地區、修理河道防護堤岸和其他改善城市環境活動的熱潮中。隨后，大批高等院校學生、知識分子和其他人奔赴指定的農村，在工作隊干部們的帶領下，用數周的時間去視察農村土地改革進行的情況（工作隊干部也是比他們早一點響應號召的人）。有組織的市民們同通貨膨脹展開斗爭，他們在全市動員積極購買公債，警惕投機商人。與此同時，戲劇團也組織起來，演出揭露舊的婚姻傳統弊端的短喜劇，幫助宣傳新的1950年婚姻法。還有一些人參加了掃盲隊，教他們的鄰居學文化。1950年底中國參與朝鮮戰爭后，又開展了一系列的類似活動——賣公債、給在前線的戰士寫信交“筆友”、組織戲劇團到工廠和礦山巡回演出愛國短劇。在這期間，甚至連和尚和尼姑都被動員起來，加人了愛國游行的行列，有趣的是人們發現他們在行進的隊伍中，出現了與整個氣氛不協調的場面。

對這突如其來的各種新的活動，反應不盡相同。有人懷疑許多活動是否有價值，例如，這幾年學生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走出教室而沒有能在學校里學習更多的東西。還有一些新活動，引起了朋友間和家庭里相當激烈的沖突。例如，一些父母得知自己的孩子（特別是女兒）想加入南下工作隊或是解放軍后，感到非常著急甚至氣憤。還有一些家長在兒女們用新的婚姻政策來反對他們包辦的婚姻時，感到難以接受，沮喪至極。

并非所有的變化都受歡迎。例如，官方決定，所有的狗必須從市區內消滅，隨之派出專人在大街上見狗就殺，使得狗的主人苦惱不已，而當局并沒有對此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5]](#_5_Dui_Mie_Gou_Shi_Jian_You_Duo)一出控訴人民痛苦生活的革命劇《白毛女》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無論在哪里上演都是人山人海，但是在這期間上演的一些改編過的傳統劇目，則遭到人們的反對。德克·博德曾記下了在北京期間的頭一年第一次演出傳統劇時的情景，觀眾高喊著“清除封建制度的殘余”并拒絕離開劇院，當一位官方發言人出來安撫他們的時候，觀眾向他扔西瓜籽。[[6]](#_6_De_Ke__Bo_De____Bei_Jing_Ri_J)起碼在開始，許多市民發現接受新的行為方式對他們來說很困難——積極參與而不是避開政治；直率地對他人提出批評而不是把沖突隱藏在和諧的表象之下等等。

另一方面，許多市民發現這些新活動非常有益，令人振奮。對學生、年輕的干部和一些沒有受過什么教育的市民來說尤其如此。威廉·休厄爾還描述了當時參加一項世俗的甚至是卑下的——城市陰溝清理——工作時所產生的興奮情緒：“這是一個難以忘懷的日子：一起干活時的興奮、充滿了成就感、喧鬧聲和色彩紛呈。”[[7]](#_7_Wei_Lian__Xiu_E_Er____Wo_Zai)休厄爾還敘述了他在四川教書時的一件事：當大學里的工人和服務人員與全體教師和管理人員在一起討論政治和學校管理問題并參與決策時，他們表現出極大的滿足。他寫道，玩麻將的人、愛嘮叨的老太婆和學校里看大門的人都在新的政治活動中成為極富熱情的參加者。他發現，“新生活道路所產生的一個出人意料的后果，是它給本毫無色彩的生活帶來了歡樂”。[[8]](#_8_Tong_Shang_Shu__Di_107Ye___Zh)

新政府所造成的積極印象，不單是它發動人民參與了眾多的新的活動，而且還有其他的因素。特別是新政府辦事時說話算話和效率很高給人以深刻印象。在中國社會長期存在而成了慢性病的一些問題迅速得到了控制和消滅——吸鴉片、乞丐、賣淫、扒手、秘密社團敲詐勒索等等。處理這些問題所使用的戰術是一個模式。首先，在一個時期內宣布寬大政策，使那些沾有上述惡習的人到當局自首并表示悔過。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學習和相互揭發，當局認為已獲得了他們足夠的證據時，便會突然禁止他們進行的活動。乞丐和娼妓被集合起來分配去作“誠實的勞動者”或是被送回鄉下老家。如果再有人因參加已禁止的活動被抓獲，他們就會遭到逮捕和監禁，負隅頑抗者將被處死以警示后人。在一二年內，這種戰術曾帶來了巨大變化。

政府的效率在其他許多方面也顯而易見。對新政府如何管理復雜的城市持懷疑態度的人，很快便發現電、煤、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比過去都更有保證。通貨膨脹似乎難以克服，但是到了1951年，盡管中國參加了朝鮮戰爭，通貨膨脹也已得到了控制。在大城市，一些貧民窟得到了修整，新的工人公寓樓開始拔地而起，有效的城市管理環境開始形成。針對“壓榨”（輕微的行賄受賄）而開展的戰役揭開了序幕，要求收據的規定和強有力的檢查制度迅速改變了過去的交易方式。那位英國觀察家評論上海政權更迭之初所產生的影響時說（也許有些夸張）：“在上海，5月24日你可以向任何人行賄，但在5月26日你就不能賄賂任何人了——一百多年來這恐怕還是第一次。”[[9]](#_9_Dai_Wei__Mi_De_Er_Di_Qi__Zhua)強制性規定百貨商場的收費標準和嚴令禁止收小費也同樣有效。就連被觀察家稱之為中國最底層的“粗魯的三輪人力車夫”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以前為了爭顧客而彼此反目，或是為討價還價而爭論不休；現在大伙輪流接客，并接受了統一的收費標準。1951年燕京大學的一位教師記錄了這種明顯的變化：“我們終于有了一個期待已久的政府，這是一個不只是說說而已，且腳踏實地辦事的政府。”[[10]](#_10_Zhuan_Yin_Zi_La_Er_Fu__La_Pu)一位英國傳教士教授也同樣感受深刻，“北京的生活效率普遍提高……對于一個深諳舊中國生活的人來說，簡直難以相信。”[[11]](#_11_Zhuan_Yin_Zi_La_Er_Fu__La_Pu)

對新政府日益增強的敬意，不但來自于其高效率，而且新領導人作風讓人佩服，他們被認為是努力工作、很少腐敗、比他們的前任更加平易近人。這個時期的驚人的記錄，是發現干部們在辦公桌前勤勤懇懇，而不是打瞌睡；他們往往工作到深夜；他們也參加政府規定的各項新的鬧哄哄的活動——政治學習、集體唱歌等等。在早些年，老干部仍過著早年供給制生活，不領取月工資，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因而他們看上去似乎沒有從自己的服務中獲得多少物質利益。一位英國觀察家曾有感于親身經歷的一件事：他在北京火車站碰上一位來自天津國家安全局的官員，后來他了解到，這位官員在火車站等了整整一個下午也沒能買上車票，最后只得買站票返回天津。這位觀察家（奧托·范·德·斯普倫克）寫道：“作為一個國家官員，他不利用職務，采取最簡單的辦法——將幾個乘客從火車里趕下去——給自己搞個座位，這是世界上向平民大眾展示他們是什么樣的領導人和公仆的最好的宣傳。”[[12]](#_12_Fan__De__Si_Pu_Lun_Ke_Deng)

甚至高層領導人也努力為他們自己塑造生活艱苦樸素和平易近人的形象，盡管他們的許多活動是鮮為人知的。但是他們通過巡視農村和工廠、做規定的體力勞動和定期會見“群眾代表”便能加深給人的印象。在50年代，許多在首都工作的年輕干部都對國家高級官員同年資較低的同事一起跳舞、游泳和以當時流行的方式參加其他休閑活動留下難泯的記憶。拉爾夫·拉普伍德總結了這些干部得到的肯定印象：“不計報酬地工作便是人民政府能成功地動員起億萬中國人民參加有效行動的秘密武器……”[[13]](#_13_La_Pu_Wu_De____Zhong_Guo_Ge)

這種觀點是同1949年以前的官員作的比較，包含了一些夸張成分，其實新干部對野心和私利不是毫不沾邊的。我們掌握的這些年新官僚機構中的情況，也給我們畫出另外一幅不盡相同的圖畫。一位隨同南下工作隊到武漢的干部描述他的同伴在辦公室的空間和家具間玩起“游擊戰”，另有人刻畫官僚機關內部鉤心斗角，為級別待遇發牢騷，說這些成了這些年來國家機關里的頑疾。[[14]](#_14_Liu_Shao_Tong____Zou_Chu_Hon)此外，供給制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干部生活在平等待遇的基礎上。供給制是分等級的，單是進餐就有三種規格，坐車也有級別等等。因此，人們對地位的競爭，絕不會漫不經心。不過，由于早些年的一系列干部整風運動，起碼大多數城市居民相信，干部中腐敗和紀律問題一露頭，新政府就會毫不留情地嚴肅處理的。[[15]](#_15_Dui_Zhe_Xie_Zao_Qi_De_Zheng)就總體而言，對新的領導人員的印象是肯定的。

在早些年，民族感情的凝聚力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1943年，外國人在中國享受的治外法權終結，但是直到1949年，在中國的主要城市，外國人擁有的權力和影響還很大。幾年之后，西方人的影響便大大削弱，一部分被蘇聯人的影響所取代。開始，至少在大城市，外國人曾獲益于全面的寬大政策，當局出于城市形勢的復雜性和獲得外交承認的考慮，舉止謹慎。但從一開始變化已顯露端倪——過去用英語書寫的城市的標志和官方的照會變成了中文；在制成品上印刷的商標也同樣發生了變化；法庭審訊和其他官方文書也都用中文書寫。外國人被告知，只要他們不違反新政府的法律和各項政策，他們就可以繼續在中國生活和工作。我們不知道這種允諾的真實性有多大，因為1950年朝鮮戰爭的爆發，改變了當時的氣氛。許多外國人被迫離開，或是被捕最后被驅逐，一個從事間諜活動的偏執狂使得留在那里的人無法再過舒適的生活。一些想離開的外國人，遇到了官僚主義設置的障礙，讓他們耐心等待。這也是中國的新統治者有意向他們顯示，中國人才是他們自己土地上的真正主人。

1950年以后，全國掀起削減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影響的運動。好萊塢的電影受到了批判，后來遭到禁演，蘇聯和中國的電影取而代之；西方人的服裝和西服受到批判，旗袍和其他被視為“資產階級的”中國服飾也遭到了批判；開始流行中國式的服飾：各種各樣的制服大行其道，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山服、解放服或叫列寧裝，以后國外管它們叫毛澤東裝。在很短時間內，人們把高跟鞋、皮貨、美國陸軍剩余下的夾克和其他過時的東西包包扎扎收藏起來或變賣出去（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被一批批蜂擁而來的蘇聯游客劫走了），化妝品從女性的臉上消失，有些人因為穿了“資產階級的”服裝而受到批評，但許多人則認為這是新社會的風尚，他們自覺自愿地跟上了前進的步伐。在政治學習會上開展自我批評，那些受西方影響的中國人被迫承認他們有“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亮”的感覺，并發誓要改正這種錯誤的觀點。

反擊外國影響的措施并不僅僅是象征性的。許多西方人擁有的商業被迫關門或被接管，一些受外國人資助的醫院、學校和其他組織都被收歸國有，在所有的組織中，中國人都要起主導作用。1950年起，政府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并發起“三自”運動，旨在使基督教會割斷同外國的聯系和接受政府的領導，如果他們還想在中國生存的話。在有的情況下，使用了極端的戰術，煽動對外國人的敵對情緒。在許多不同的城市里，天主教修女們曾辦起了育嬰堂，收留那些被遺棄的嬰兒和孤兒。1950年以后，這些育嬰堂被指控玩忽職守甚至暗殺和肢解中國人的嬰兒。報紙印發了聳人聽聞的照片，畫面上是發掘出來的據說是被害者的骨頭，那些修女被拖進體育場，站在充滿憤怒的暴民們的面前，接受批斗。[[16]](#_16_You_Guan_Ci_Lei_Shi_Jian_De)

通過這一系列措施，西方人在中國的勢力和影響急劇減弱。一位印度觀察家評論說，英國在1952年時對中國的影響已退回到110年前的鴉片戰爭之前，在香港擁有基地和一些領事，但是沒有常駐北京的大使。[[17]](#_17_Fu_Lan_Ke__Mo_Li_Si____Mao_D)對這些年來針對西方的攻擊，有種種不同的反應。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和其他同外國人保持長期接觸的人感到非常恐懼，有的人被監禁或被處死。但就一般的市民特別是那些沒有從外國人那里得到多少好處的普通工人和農民出身的市民而言，他們對這種變化感到自豪。他們看到自己的政府在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次能夠勇敢地面對外國人并且結束了他們在中國的特權。朝鮮戰爭加深了人們的這種感覺，這個時期，市民們滿腔愛國熱忱，對自己的祖國在現代化的聯合國軍隊面前的表現感到無比的驕傲。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治上的團結，經濟建設上的初步成就，并對外國勢力和特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打擊，所有這一切都激發起民族自豪感，政府則盡最大努力來擴大和增強這種自豪感。

誠然，這些年也是仿效蘇聯模式、“一邊倒”的幾年，但是蘇聯的出現，似乎無損于新的民族自豪情緒。有的中國人懷疑蘇聯人的動機，懷疑蘇聯1945年后從滿洲撤走工業設施等行為。他們覺著徹頭徹尾地照搬蘇聯模式——在學校里用蘇聯的五分等級制代替沿用了多年的百分制——并不是一個好主意。但是政府強調，蘇聯的建議和專家是應邀來中國的，而不是強加給我們的，學習蘇聯“老大哥”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因為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蘇聯的現在，就是中國的未來”。

公眾對于成千上萬像潮水般擁進北京友誼賓館和其他城市里類似賓館的蘇聯專家看法不一。年齡的差異是產生這種認識區別的重要原因。那些當時還是青年學生的人回憶說，他們被那個時期翻譯過來的蘇聯衛國戰爭小說里的男女英雄們所鼓舞，一些人還給自己起了俄羅斯名字，并和蘇聯的筆友建立通信聯系。當得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許多人痛哭流涕。不少中國成年人也同蘇聯專家建立了個人關系，因為他們對蘇聯政府早期執行的一些措施，比如不允許到中國觀光的蘇聯專家顧問乘坐人力車等，留下極其美好的印象。但是許多年齡較大的中國人，抱著懷疑的態度，甚至是厭惡的表情看著那些出出進進的蘇聯客人。盡管蘇聯人采取了一些公關措施，但是，中國人還是很快就發現，許多蘇聯客人看上去有相當多的“資產階級”情調——他們的服飾、行為、挽著妻子，特別是他們對旅游、購物和閑聊表現出強烈的興趣。[[18]](#_18_You_Guan_Zhe_Bu_Fen_Sheng_Do)人們發現有些蘇聯專家非常傲慢和苛求，他們認為，中國人全盤接受他們的建議和以蘇聯人的方式去做事是很自然的。總之，許多被蘇聯老大哥派到中國來的代表，其所作所為實在是與小說中的英雄人物相去甚遠。

盡管蘇聯人沒有給中國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正如一位中國人曾把一些蘇聯人稱為“無產階級的王子”，蘇聯仍沒有像西方那樣被認為是對中國主權構成威脅的國家。因此，新政府并沒有因為與蘇聯結成的關系而影響它巧妙利用人們的愛國感情這方面。一位來自香港的中國記者（此君1952年后被監禁了幾年，直到1957年才被允許離開中國），看了1956年10月1日的游行后寫了下面一段回憶：“我必須承認，我幾乎被那不可用語言來表達的感情噎死——我從未感到過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如此的驕傲”。[[19]](#_19_Ai_Li_Ke__Qiao____Nan_Ren_Bi)

然而，對于新政府的支持，恐怕沒有什么影響比經濟安全和經濟條件改善更重要的了。中國共產黨是在各方面條件都十分不穩定的情況下執掌政權的。由于通貨膨脹，一杯咖啡在上海的價格超過300萬元（這是被認為是“不怕通貨膨脹”的新“金圓圈”），四川一個看門人的月工資，只夠往歐洲發三封航空信。[[20]](#_20_Guan_Yu_Ka_Fei_De_Jia_Ge__Ca)有效地控制通貨膨脹只是變化的一個部分，但不是全部。也許新政權采取的一個更為重要步驟是加大了流動的機會。死了和走了的人，需要有人替代，處于蓓蕾狀態的官僚機構需要增添職員，即將到來的工業化需要技術人才，這就導致了一場大規模的個人進修活動——短期的訓練課程、“革命大學”、干部學校等等。全日制學校也迅速擴大，由于學校實現了國有化，學費大幅度削減，所以在大城市里的絕大多數小學注冊人數幾乎滿員。這樣，許多有志的年輕人認為是政權的改變才使得學校的大門向他們敞開。農民也加入了社會流動的大軍。當局在50年代不斷做出努力，試圖把那些來自農業地區的盲流，引回到他們鄉下老家，但是在接近50年代末的時候，這些努力并不十分成功。在此期間，許多農民挖空心思在城里找到了落腳點，并加入了城市工人的行列。[[21]](#_21_You_Ren_Zuo_Guo_Gu_Ji__Zai_1)

不僅就業機會增加，在國營企業（甚至在一些大的私人企業）里工作的人在工資、工作條件和數額不大的補助等方面也逐漸實現了標準化和制度化。起初，政府在提高工資問題上猶豫不決，開始是鼓勵工人對資本家提出要求，后來又迫使工人滿足于他們的低工資以確保商業的穩定。但是，市民們對（政府）在食品供應和銷售體系的改進以及努力降低價格等方面，印象極佳。有了這些固定的工資收入，他們就可以購買高質量的糧食（米、面，而不是玉米和大麥），其他食物如魚類也比40年代末買得更經常了。隨著1956年整個工資待遇的提高，人們改善生活條件的自信心也增強了。[[22]](#_22_Yi_Wei_Xi_Fang_Ren_Ceng_Nu_L)另外，小額補助制度也得到了完善，其中包括醫療保險、傷病工資、產假工資和退休金等等，這些措施給大多數在職人員提供了安全保障，須知他們以前對這些社會保險措施聞所未聞啊（雖然這些優惠并沒有照顧到所有的勞動力方面）。總之，在這個時期，人們對生活條件將會改善和流動機會將會增加都普遍持樂觀態度。

自相矛盾的情況發生了。不斷改善的經濟條件和小額優惠政策的逐漸擴大，居然發展成一種中國共產黨政策明確要避免出現的趨勢：與使革命走向勝利的農民相比較，市民的優越地位不斷增長。在城市里，由國家負責提供“一攬子福利”待遇，社會主義從而被認為是前途光明的；但是在農村，提供任何福利的負擔，最終都不是落在國家而是落在集體和農民自己的身上。結果經濟改善的情況比城市少得多。總體而言，1949年以后，中國城鄉差別在收入、獲得消費品、文化娛樂和有保障的工作以及福利待遇等方面逐漸擴大，使得城市居民越來越意識到城市生活的優越，也使農民越來越羨慕城市生活。也就只有在住房方面，農村居民有一定的優勢，到70年代末期，典型的農民居住面積擴展到平均約為每個市民的3倍。[[23]](#_23_Ju_1982Nian_Gong_Bu_De_Shu_Z)但是即便如此，絕大多數市民仍可用很少的錢來付房租——通常是他們收入的5％或者更少——而農民在投資建房及維修時，只能掏自己的腰包。

當然，也有人倒霉的，以前的城市精英們就失去了很多利益，有的甚至丟了性命。不過，由于幾個因素的作用，人們頭腦中并沒有因這而改變了生活確有改善的印象：例如，那些失利者比起得利者在數量上還是占少數，況且他們那部分利益早已引起了別人的不滿。在不少情況下，他們雖摔倒，但不很痛——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資本家根據官方對他們資本的估計獲取利息（在多數情況下，資本家還有滿意的工資），原來薪金豐厚的人仍拿“保留工資”，保留工資比新的標準工資要高。收房租、拿版稅和其他非工資收入的取消是一個漸進的而非突然的過程。

在20世紀50年代，或許最重要的事是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后代在不同程度上都從新的機會中獲得益處。盡管官方偏愛工人和農民，但是新政府同樣急需高技術人才，因此那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城市學生，被鼓勵鉆研學業，在新社會里能擔任好的工作。只要他們愿意遵循新政策，在形式上批判他們父母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念（只要他們的父母沒有介入嚴重的政治斗爭），他們就可以從事高尚的職業，并有光明的前途。在50年代，社會上人際關系注重階級背景的風氣還沒有滲透進學校里，學校里注意階級出身還是后來的事。那時，學生之間建立友誼的基礎是成績接近，或個人的興趣愛好相投，而不是后來那種以階級背景和政治因素來取舍朋友，總的來說，那時還沒有人感到為了一個有希望的機會需要進行非常緊張的競爭。在50年代一段時期，事實上高等學校招生人數比當年畢業的高中學生還要多。[[24]](#_24_Gen_Ju_Luo_Bo_Te__Tai_Le)到了60年代，在理論上被稱為“壞階級”（資本家、商人等等）家庭出身的子女，平均來說，仍然比工人家庭的孩子更有前途。[[25]](#_25__Zi_Chan_Jie_Ji__De_Hai_Zi_Z)

30年之后，許多市民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覺著有許多事情值得懷念。秩序恢復了，外國的特權結束了，經濟條件正在逐漸改善，政府看上去富有效率且關心人民，就連犯罪的危險也大大減少了。尤其是那些當時還在學校里讀書的人，回想起來那些令人激動和有意義的事——刻苦學習，振興中國，從事業余愛好，徒步旅行，閱讀蘇聯和中國的英雄人物小說，加入宣傳隊到農村和工廠巡回演出，把他們在學校里取得的成就和喜悅帶給他們的父母。這是一個十分樂觀的時期，此時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能創造許多奇跡，城市居民，尤其年輕人能實現生活中許多美好的理想。

然而，如果要說城市居民從起初對新政府的懷疑、觀望一下子變為對新政府無限的熱情的話，這也失之偏頗。從一開始，起碼有不少人對新秩序的一些方面就感到是不祥之兆。例如，新政府對人口采取了比其前任更為高度嚴密的組織和控制措施，滲透到了市民私人生活之中，對市民施加了更大的壓力來改變個人的行為方式和私人關系。在起初的仁慈政策之后，這種嚴密的組織控制措施逐漸升級和有區別地進行。新政府執政后幾天，新聞控制和審查制度就生效了，但是美國電影一直上演到1951年。大學學生立即組織政治學習、勞動和上街游行，他們仍可以選擇自己宿舍的室友和想學的專業。到了1951—1952年度，學生住宿就統一安排，專業成為強制性的，一年后，建立了大學統一招生和統一分配制度。新政府執政的頭幾周內，國營紡織廠的工人成立了由官方發起的工會，但對那些小廠子里的工人和從事手工業勞動的工匠以及小商販的管理非常松散，直到50年代中期才組織起來。在城市家庭生活中，開始變化不太大，可是到了1954年，成立了標準的居民組織——居民委員會，并開始對每個人的活動施加影響。[[26]](#_26_Guan_Yu_Zhe_Ge_Jian_Jin_De_B)

雖然這些變化在某些方面是漸進的，但是到了50年代中期，新的組織體制開始出現，這就使得比從前能夠更有效地進行控制和動員市民。1949年之前城市里的集團——同業公會、同鄉會、小集團、秘密社團、街坊協會等等或被取消，或加以改造。取代它們的是一個新的在共產黨絕對控制之下的城市基礎結構。城市的每個街區，都成立了在政府官員和警察局領導下的居民委員會。委員們既組織有益的服務活動，如打掃街道衛生，設立修理自行車的小攤和急救站，也對當地居民的生活進行控制——組織他們參加政治學習會，檢查沒有登記的個人和不正常的活動，進行夜間安全巡邏，后來發展到說服一些家長把他們的孩子送到農村和限制他們多生育。新的組織體制的另一個主要支柱，是工作單位。工作單位組織本單位人員的生活（包括上班和下班后的生活），并視此為己任。大的單位不僅為他們的人員提供住房、醫療和其他服務，而且還組織政治學習，管理業余活動，同意結婚或是離婚，監督釋放了的罪犯，并參加類似于居民委員會的其他各種社會控制的活動。

除了所在單位和居民委員會，許多市民還受一系列新的“群眾組織”的監督——共產主義青年團、婦女聯合會、工會、工商會、作家協會和獨立基督教協進會等。這些組織監督每人工作和業余時間的活動。越來越多的生活必需品是通過這些新的官僚體系發放，而不是由市場發配或由個人或由幾個人自愿結合的組織去搞。例如，在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作都是由官僚機構分配，基本上是終身就干這份工作。勞動力市場開始消失。這個時期的城市生活形式發生了一個轉變，即開始實行嚴格的配給供應制（由工作單位和居民委員會管理），購買基本食物和生活消費用品都受到控制，住房由單位或城市專門機構負責，私人行醫被取締，市民們對中國共產黨控制的新的官僚機構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其他地方的官僚制度也一樣，結果是個人常常失去了自己喜歡有的東西。例如，當配偶們發現他們被安排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時，他們不得不忍受兩地分居的苦楚，每年只有在一次很短的探親假時才能見上一面。

城市組織機構的轉變，導致了一系列重要的后果。中國城市的市容和聲響開始發生變化。商業的官僚化和標準化，使那些曾給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帶來生機和色彩的貿易和商販們——沿街叫賣的小販、修鍋補盆的工匠、代寫書信的先生、雕刻印章的藝人、走街串巷兜售小玩意的商人等等——逐漸消失了。由于國家接管了向城市居民提供需求的責任，也就沒有必要再用鮮艷的色彩標志和各式各樣的號子或大聲叫賣來吸引顧客了。

地位等級制度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城市精英、資本家、商人和知識分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從事服務行業的職工、小商販和從事宗教及其他儀式的專業人員等的處境也在下降。身居要位的高官（高干）和軍官控制著新的等級制度，高級知識分子和技術專家的地位居其次，但處于那些官僚權貴的牢牢控制之下。工人、技術人員和其他與工業生產有關系的人威信上升，而其他一些被社會所遺棄的團體（階級敵人、階級成分有問題的、被控對象）落入了社會的最底層。你在新的城市等級中處于何種地位、收入多少和有無大學文憑變得不那么重要了，官僚的頭銜和黨票則變得越來越重要。在什么單位和行政“系統”工作也很重要，其重要性幾乎同這垂直的等級制度中的位置不相上下。一些大型的和強有力的官僚機構，如軍隊和鐵路，能給他們的職工提供更多的利益和特權，規模小、聯系范圍小的單位如小學或是街道工廠，就很難滿足其成員的需求。所以，一個人在新城市結構中地位如何，要看他的單位怎樣，以及他自己頭銜有多大。

到1956年，中國的一些難駕馭的城市，也都逐漸控制在新的官僚制度之下，對此曾抱有懷疑態度的人驚慌失措了。熟悉1949年以前城市生活的觀察家們都知道中國城市行為方式中長期存在的無足輕重的弊病，如不遵守交通規則亂穿馬路、在街上隨地吐痰。在新政府的控制下，這些似已蕩然無存，他們無不感到震驚。1955年，在北京的一位敏銳的觀察家曾預言，“這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個由官方把計劃生育作為強制性措施的政權，可以肯定，這些規定將會被普遍服從。”[[27]](#_27_Wu_Ming_Shi_Guan_Cha_Jia_Yin)

這個嚴密的組織系統幫助解釋了為什么這個時期發生的理論上屬最主要的變化（1955—1956年城市經濟向社會主義形式的過渡）在某些方面完成得那么突然。國家對原材料、市場、信貸和其他方面的控制逐步加強；1951—1952年“五反運動”對資本家和對社會主義持非議的人的恫嚇；1955年鎮壓反革命運動；工會和黨控制的工商業聯合會在組織上施加壓力——到了1955年所有的這些使城市出現了一種局面：城市資本家和商人幾乎沒有自治權力和活動余地。是年后期，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運動加速發展時，基本上未遇到什么抵制，一切都比原計劃進行得迅速。在個別地方速度更為驚人，1956年1月，北京宣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整個運動已經全部完成，前后歷時僅僅10天。

然而，社會主義過渡運動也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組織系統存在著嚴重的弊端。例如，動員人們進行變革很容易，但是要使新建立的組織機構富有成效地進行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加速社會主義過渡，在許多方面成了“紙上成功”——工廠和商店的資本和存貨清單還沒有開列出來，新的簿記制度還沒有建立，缺乏受過訓練的管理人員和專業會計以及其他使社會主義企業運轉所必備的條件。因此還需要幾個月的工作來清理這些混亂狀況，然后現實方能接近運動口號提出的要求。

黨在進行運動時所使用的動員技巧是令人折服的，但帶來的變化卻是毫無意義甚至有害的。例如，在1956年社會主義過渡完成之后的生產運動“小躍進”時期，人們自力更生解決中國的問題的熱情被激勵出來了，結果出現了所謂的新發明“雙輪雙鏵犁”和一項控制生育技術——要求婦女吃大量的活蝌蚪。兩者都未取得成功。雖然這兩項發明很快就被拋棄了，但是，這種體制敢于置民眾的疑慮于不顧并使用新的技術和組織形式繼續蠻干的勁頭卻未收斂，而在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中更變本加厲地顯示出來，造成了更大規模的災難。

當局說，為了解決中國的許多問題，就需要有高度組織形式的生活，大多數中國人贊同這種論點。這樣的結果，就是使市民服從要求苛刻的當局日益加緊的控制，而當局卻不受公眾影響的左右。人們發現，許多人不得不改變自己珍愛的習慣和行為方式，以免與新當局的要求發生沖突。賭博、參加基督教會的活動、閱讀西方小說、請人算命、祭祀祖先和其他許多活動都變成了有疑問的事情——這些活動是不是違反了新規定？中國人好幽默，但是當局在涉及他們的想法和計劃時，是毫無幽默可言的，當人們聚集在一起開小組批判會的時候，大家知道這時不能說句俏皮話或開個政治玩笑。如今不只是像1949年前一樣，須防范幾個告密者，現在除了極少的幾個知心朋友和家人之外，對任何人也不能說句不該說的話。（然而，這種對人們相互交流的壓抑，主要是在干部、知識分子和學生中間，工人和其他社會地位較低的人相對要好一些。工人不會被懷疑有異常的想法，即使有，他們也很可能會被諒解，因為他們受的教育程度低。）

誠然，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已認識到他們必須適應新統治者的種種狂想才行，拋棄佛教是如此，蓄留起辮子是如此，搞“新生活運動”也是如此（這是30年代國民黨發起的促進道德復興的運動）。1949年以后情況不同之處在于，要求改變的范圍更大，為達到這些要求而進行的組織滲透更深。建國之初，一位老教授曾向威廉·休厄爾吐露，一切都會平安無事的，因為中國人不會當殉道者。“我們向竹子學到了訣竅，風來時它們彎下腰；當風停息后，它們又挺得筆直了。”[[28]](#_28_Xiu_E_Er____Wo_Zai_Zhong_Guo)但是，還過了不到一年，這位教授就因不能適應新社會導致精神錯亂而自殺了。

最初的仁慈寬大時期結束后，官方控制加緊，擴大了對個人和團體實行高壓統治的范圍。在“肅反”運動、“三反”“五反”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和挖出隱藏著的反革命分子運動中，大批的人被卷入政治斗爭，遭到逮捕或是被殺害。前國民黨官員及其支持者、秘密社團和宗教首領、資本家、包工頭、外國和本國的牧師、腐敗的干部、對政府不滿的知識分子、黑市商人和那些僅僅是在公共場所批評新政府的人，都發現自己陷入了嚴重的政治麻煩之中。監獄里塞滿了被捕的人，臨時湊合起監獄來關押過剩的犯人，其中很多人被殺害或是消失，從此杳無音訊。[[29]](#_29_Dui_Zhong_Guo_Zai_1949__1952)這個時期每次主要的運動，都引起那些成為或害怕成為斗爭目標的人自殺的浪潮。盡管新政府的官員們一再讓人們消除疑慮，說政府歡迎批評，鎮壓手段是用來對付一小撮階級敵人的，但是人們很快就明白了，絕不能對新政府有任何不滿，如果有人不信，那等待他的將是嚴厲的懲罰。

新政府實施嚴密的組織控制和大范圍的鎮壓，但它也做出了許多成就。市民思想中對這兩者是如何進行平衡的呢？對此有迥然不同的反應，一些集團對這個新秩序顯然反感，惶惶不安。但大多數市民并沒有因此而覺得受到威脅，有不少人甚至對此表示歡迎。我們已經說過，許多人認為有必要加強組織的嚴密管理。難道實現街區的安全、穩定貨幣、建立統一強盛的國家不需要付出這些代價嗎？同時，政府也相當成功地使市民相信，絕大部分鎮壓是有選擇地針對那些的確是罪有應得的人的。許多人認為，清除社會渣滓是一件好事。當局大講日本漢奸、國民黨特務、秘密社團頭目和天主教修女的邪惡行為，手段十分高明，在市民中果真對這些人產生了敵對情緒，當局又巧妙地利用了當時業已存在的憤恨情緒。

在這個年代，即使自己不是斗爭目標的城市居民，也各有不同的經歷。有些人的父母被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牢房；有些人的心愛的老師成了1955年肅反運動的對象，隨后就消失了；有的人的老朋友在新的政治壓力下被迫自殺了。[[30]](#_30_Xue_Li__Wu_De_Zai___Zhong_Gu)這種個人的曲折經歷，引起了他們對新社會性質的痛苦的反思。他們對新社會抱有樂觀態度，愿為之獻身，但從此產生了揮之不去的懷疑。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當局也可找出適當的理由來消除人們思想上的混亂。正如毛澤東很久以前就指出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在普遍的混亂之中，某些錯誤就在所難免。對許多人來說，一個合適的解釋是（獨裁政權慣用此法）——“如果毛知道就好了”。官方的政策和領導是英明和仁慈的，但是，那些顯然缺乏訓練和不守紀律卻在貫徹政策的基層干部出了“偏差”，他們濫用權力，而犯了大量錯誤。市民們希望在每次大的運動過后的總結檢查階段，能夠改正以前不公正的行為。所以，盡管這些年運用了大規模的鎮壓措施，許多市民還是認為這個時期是相當樂觀甚至是寬大為懷的。他們認為，大多數的鎮壓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稱贊的，錯誤不是全局性的，是執行有問題而造成的。所以，在這些年由于官方的鎮壓而導致的個人的痛苦，還不足以削弱新秩序帶來的公眾的積極參與和樂觀情緒。

## 中期年代，1957—1965年

早期年代的生活節奏不盡相同。一直到1952年，這幾年是充滿新奇和混亂的時期，搞了幾次運動，社會從而井然有序地運轉，人們學習了新的規矩。從1953—1956年，是結束朝鮮戰爭和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工作的重點更多地轉移到動員有效地學習和工作來幫助國家進行經濟建設上來，“超出課程之外”的各項活動減少到最低限度。1957年，以及隨后而來的“大躍進”，節奏又開始回到運動動員階段。中國陷入了先是政治而后是經濟的危機之中。不過，早年建立起來的信念和樂觀主義精神，仍在相當廣闊的范圍內繼續下來，使政府能夠相當成功地渡過了難關。

1957年一系列事件使人們感到心神不安。首先，中國人開始注意到了1956年發生在東歐的動亂，同年，有人知道了赫魯曉夫作了譴責斯大林罪惡的秘密報告。起碼他們已經模糊地意識到這些事件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憂慮，對社會主義的前途有些捉摸不定。然而，大多數人對中蘇沖突的最早跡象都不甚了解，對兩國保持友好的關系仍深信不疑。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和接著發生的反右運動可謂擊中要害了。人們對1956—1957年的自由化和中國共產黨號召對黨進行公開批評有不同的反應。在早些年的運動中，對政府提出批評意見的人遭到嚴厲的打擊，使人們謹慎小心，但同時不少人總的來說對自己周圍的社會和個人生活還是相當滿意的。經過了幾輪溫和的批評之后，1957年春天，終于爆發了涉及面廣、人們情緒高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批評運動，這次運動由重要的但是面很有限的一些城市社會部門發起——知識分子、學生、“民主黨派”成員和專業人員。這些人在理論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的親密盟友，他們認為自己的榮譽和自主權受到了嚴重的侵蝕。他們的批評意見形形色色，但是主要還是集中在知識分子與專業范圍內的自治同黨的控制的關系等方面。這些批評開始在黑板報和國家的報紙上逐漸登載，大多數市民沒有參與而以一種迷惑的態度袖手旁觀。許多人對中國共產黨能夠允許甚至鼓勵這種直率的批評感到不可理解，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對一些人氣憤的腔調感到震驚。1957年6月，當政府發動了反右運動進行反擊的時候，聲稱“群眾”要求那些愛挑剔的人閉嘴這一說法并不全錯。城市地區的許多非知識分子（甚至一些與知識分子合作的人）的確感到這種批評太過頭了，對革命帶來的進步和社會凝聚力構成了威脅。

黨的反擊得到許多人的支持。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表示懷疑。對于那些大學生和一些中學生來說，反右運動預示著一次不祥的變化。在前些年，他們全都參加過批判會，感受到針對各種組織的斗爭與壓制，但是現在，他們第一次被動員起來參加對他們自己同學的或多或少的生死斗爭。他們原是集中精力進行學習和參加有組織的娛樂活動，只是偶爾被政治干擾（1955年的肅反運動就是在暑假期間開始的，當時卷入的主要是老師），現在他們發現，他們的精力都集中在政治斗爭方面了。讓同學們相互告發的壓力特別大，許多學生感到非常苦惱，“指標定額”使他們必須給一些同學戴上“右派”的帽子，即使他們沒有犯什么嚴重的錯誤。

這樣做的后果是不太愉快的。許多被打成“右派”的人被帶走從事體力勞動——不僅是從學校帶走的人，而且還有從正如火如荼開展運動的單位里被帶走的人。[[31]](#_31_Zai_Ci_Qi_Jian__Yi_Wei_Ceng)一些被認為是不太嚴重的右派，不被送到勞動營去接受再教育，他們還可以留在所在學校或是工作單位，或是被調到一些不太敏感的單位去工作。但是，他們成為被社會遺棄的人。一位移居外國的人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他們仍然到辦公室上班，但是沒有人跟他們說話，也沒有人和他們在同一張桌子前就座，‘右派’分子們也彼此互不交談。以前的熟人在街上碰上他們，便把頭扭向另一個方向，他們別指望有人來訪、有電話找他們和有他們的信件。”[[32]](#_32_Mu_Fu_Sheng____Bai_Hua_Yun_D)在這樣的氣氛中，即使人們承認有必要反對那些提意見的人，有必要保衛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有時也還會有另外的想法。

1957年，開始了“下放”運動，把許多干部調到小鎮或是農村工作。大批在這次運動里被調到下面去的人中，起碼有一部分人被告知這次下放是暫時的；這是一項要求所有機關人員定期下放做體力勞動和做卑下的工作、使思想得到“凈化”的總政策的開始。許多不太重要的右派也自然在下放運動的旗幟下，被送往農村。對于那些已經看到生活和事業有了改進的城市人來說，深知政策如此靈活，有朝一日也可能向其他方向發展，即使你沒有犯任何政治錯誤也難保不會被下放，所以他們感到了威脅。

然而，1957年還發生了其他許多事件，使前幾年的樂觀主義因此而得以延續。在這一年里，蘇聯成功地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武漢長江大橋建成，許多新建的工廠開始上馬。豬肉漲價和棉花供應短缺，曾是“百花齊放，百花爭鳴”運動中批評政府的人指責經濟沒有改善的論據，但是政府接二連三地公布統計數字，證明情況卻與此相反。大多數城市居民接受政府的觀點。他們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來，新的學校開學了，越來越多的小說和翻譯著作出版了，總體來看，中國仍然在前進中。

從公眾對次年起始的“大躍進”的反應，可以看出人們的樂觀主義態度在繼續發揮著作用。加速經濟發展的步伐，用15年左右的時間趕超英國，迅速進入共產主義的富裕社會這一前景，激發了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豐富的想像力。此時許多更多更新和更激烈的活動又開始了，更刺激了這些飽滿的熱情。1958年春天，開展了一場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和麻雀——的戰役。一隊隊滿懷熱情的參加者，比賽看誰上繳的死蒼蠅多；他們站在高高的屋頂和圍墻上敲打著鍋盆和其他能發出噪音的東西，使麻雀不能停落，最后麻雀只有累死掉下來。[[33]](#_33_1949Nian_Yi_Hou__Mei_Nian_Du)在城市和農村地區，學生、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和其他人操作著著名的“土高爐”，讀著由當局準備的專業指導小冊子，使用著原始的工具和原料（包括垃圾桶、平底鍋和欄桿），那些從來沒有見過鋼鐵是怎樣生產出來的城里人建起了原始的磚爐，開始出產質量很差的鋼錠。在北京，各行各業的人被集合起來加入了極其勞累的、24小時不停的建設人民大會堂的人流，以驚人的速度，僅用了10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建設任務。好幾萬人被動員去首都郊區，通過手工勞動建設十三陵水庫，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給參加者留下深刻印象，他們親自參加了定額勞動，起碼是短暫地參加了這些勞動。其他城市也同樣搞起大型工程（雖不及人民大會堂宏偉），并搞起了植樹造林、建廠房及其他群眾勞動大軍參加的工程。

這也是農民大規模流入城市的時期。由于城市經濟的迅速擴展，向城市移民的控制暫時放松，一些雄心勃勃的城市企業積極從農村勞動力中招工，從而導致了以前控制城市規模的努力付諸東流。1958—1959年間，估計有2000萬農民變成城市居民，特別是在內地新興的工業城市尤為如此，引起了城市人口的擁擠并對城市資源造成嚴重壓力。[[34]](#_34_Can_Jian_Xiao_Ye_Jia_Yue_Zao)

“大躍進”初期的許多事件同50年代初很相似，組織之間的障礙被打破，不同工作單位、不同行業的人緊密地（即便是臨時地）匯集在一起，把早年（“袖手旁觀的人”）也動員進來了。特別是對那些家庭婦女來說，她們在動員下走出了家門，組織了縫紉組、加工工廠和參加其他經濟生產活動。為了便于她們參加工作，還開設了幼兒園、食堂、洗衣房和其他減輕家務負擔的設施。隨后，開始在城市建立一個全新的組織形式——城市公社——與當時正在成立的農村公社相呼應，但讓人不可理解的是其結果并沒有對公眾的意識產生什么影響。對于大多數城市居民來說，城市公社似乎僅僅意味著那些勞動組織和服務設施由街坊四鄰們管理，而不是由中國的領導人設想出來的那套居民委員會和生產單位進行綜合管理。（1960年以后，放棄了創立城市公社的努力，但是這些勞動組織和服務設施都保留下來了。）

“大躍進”又要求人們改變生活習俗，又回到了50年代初期時的情況。艱苦樸素的風尚受到贊揚，“資產階級”和傳統的行為方式受到批判。老百姓開始意識到，當局對那些祭祀祖先、鋪張浪費的婚禮以及繼續以傳統的方式慶祝中國的節日的人都表示不滿。這個時期，開始勸說城市居民接受火葬，并對想要進行傳統土葬的人設置重重困難。（許多棺材店和墓地被關閉；即便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仍有一些堅決的市民能設法搞到棺材并把死者運到農村去土葬。）這時期，各方協同努力，取締了私有企業最后的殘余勢力，對流動在大街小巷的小商販采取了嚴厲的打擊措施。也就在此時，一位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意識形態工作者張春橋聲稱，官僚主義和不公正已發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國應重新實行供給制度[[35]](#_35_Jian_Zhang_Chun_Qiao_De_Wen)（革命前酬勞官員的制度）。

對大多數城市居民，特別是對體力勞動者來說，“大躍進”最主要的是要加快工作步伐。在建國之初，蘇聯開創的各種社會主義競賽的方法被照搬過來，中國出現了一批自己的斯達漢諾夫式先進生產者。現在為了突破經濟發展的障礙，又更加緊推行了一些競賽措施。工人被動員起來保證完成越來越高的生產指標，在經常出現的生產高潮階段，工人們在各自的崗位上一干就是兩天或更長時間，以令人擔憂的高速度進行著。機器在超過其三四倍負荷中運轉著，機器和它們的操作者都繃緊了弦，走向其極限。即使非體力工作者也受到了影響。作家、記者和其他搞文字工作的人，都決心超過他們以前的工作量，保證完成多少數量的寫作計劃。一批批學生馬不停蹄地編寫自己使用的、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教科書。許多人睡在工作單位，一周回家一次與家人作短暫的團聚。學生把這一時期描繪成要求不斷變化、活動難以預料的時期——突然宣布去農村勞動，又一聲令下回學校學習，而后學習又被打斷，學生被動員起來參加游行示威，或是“向黨交心”，凈化思想。在整個社會，各種各樣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和活動充滿了日常生活。

對于這場波及全社會的高速度運動，反應有好有壞。許多人，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發現氣氛令人振奮，獲取豐厚物質財富的前景已經穩穩呈現在地平線上，令人陶醉。以前的一個學生這樣記錄下他的體會：“我第一次被卷入了這種令人迷茫不解的生活方式。看起來是無法逃避的，但也并不是一點意思也沒有。一切都是變化莫測的。”[[36]](#_36_Dong_Zhi_Ping__Yin____Han_Fu)甚至那些被體力勞動折騰得疲憊不堪的人，反應也是積極的。一位曾參加十三陵水庫建設的美國人記述了他的想法：“到周末，我們渾身上下滿是污穢；連個洗澡的地方也沒有。我感到十分疲憊，全身疼痛，極其厭倦。但當時的氣氛卻很好——一個大家共同的熱烈氣氛。這種場面也幫助了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參加此等勞動的意義。”[[37]](#_37_Wei_Er_Si____Pan_Tu_____Di_1)然而，其他一些人，特別是那些年歲較大的和有經驗的老工人、技術專家——他們的態度就不那么積極了。這些人對如此高的速度和如此創造發明是否明智持懷疑態度，他們能預見到會發生質量問題和工業事故，工人也會嘟嘟囔囔發牢騷（如此發展經濟當然會帶來這些問題）。但總的來說，大多數市民起初是愿意把“大躍進”設想為有益的，并希望它取得成功。

當然，結果并非是他們想象的那樣物質大大豐富起來，從1959—1961年中國進入了經濟衰退的“三年困難時期”。1959年食品供應急轉直下，大食堂的定量減了，全國出現了大范圍的饑荒。工作單位不僅取消了高速度，而且被迫削減工作量和減少其他活動，以便有更多的休息。考慮到人的熱量有限，工間操、民兵訓練和其他活動都被取消了。在此后的危機中，城市組織開始試制了一些食物代用品——例如，用海藻作為原料，從中提取一些有營養的特殊液體，雖然它不符合中國人習慣的口味。另外，人們體重普遍下降，終日處于困倦和饑餓之中，發病率和病假條猛增。一位年輕的中國人回憶當時長沙的情景時談道：“我所知道的許多老人和幾乎所有的兒童患上了‘水浮腫病’，即浮腫病，我們的肚子脹起來，退不下去。我們沒精打采地步行上學，等到了學校已是筋疲力盡。熟人相見，大伙相互掐彼此的腿，看看腫脹得怎么樣了，再檢查一下彼此的皮膚，看是否變黃了。”[[38]](#_38_Liang_Heng___Zhu_Di_Si__Xia)對食物的需求成為讓人著迷的頭等大事。有個人說，這段時期他在天津，每天早上3點就得起床，為的是在排得很長的隊中擠個位置，希望買到運到城里來的蔬菜。[[39]](#_39_Bao_Bai_Yi____Di_Ba_Ge_Yue_L)農村的情況更加嚴重，這個時期出現的非正常死亡大多數發生在農村。這種情況下，城市享有的特權是一個生與死的問題，正如我們那個來自長沙的小伙子的父親對他所說：“你是福氣好……生活在一個省會大城市，黨和毛主席從糧倉里給你們弄來食品。農民只能自己想辦法解決他們的問題。”[[40]](#_40_Liang_Heng___Zhu_Di_Si__Xia)

是否所有的城里人都在遭受同樣的苦難？對這個問題有種種不同的想法。很顯然，一些高級干部和其他人繼續享受許多優惠——在食堂的“小灶”里用餐。他們能得到較多較好的食物，在接待外賓的時候，他們可以參加奢侈的宴會等等。一位觀察家講道：“在困難時期，廚師和高級官員是中國唯一能保持體重不減的人。”[[41]](#_41_Wei_Er_Si____Pan_Tu_____Di_9)因此，有相當數量的人開始發牢騷。但很多中國人還是被知識分子和一些高層人物同其他人一起同甘共苦所感動。在“三年困難時期”就要結束的時候，一場小運動使他們更是深信不疑：一些組織的領導干部在他們的下級面前公開檢討，他們曾利用職務之便，為他們自己和家屬搞到了額外的食物。許多人相信，比起1949年以前來，這次起碼是大家一起挨餓的。中國共產黨注意了對那些利用職權吃得好的人進行懲罰。

“大躍進”失敗的后果，不僅僅是饑餓，還有其他副作用。經濟被迫進入緊縮時期，削減指標，一些小型工廠關閉，職工解散。工資開始凍結（除了少數例外，工資一直凍結到1977年）。原來國營企業里的一些職工，看到工廠的經濟前景暗淡，干脆辭掉工作，到集體企業干活，集體企業的利益分配原則似乎允許多掙一點。當局也被迫取消了對私人企業活動的種種限制，允許沿街叫賣的小商小販、馬路邊上的裁縫和賣小吃的攤主們重新開張。城市移民的限制大大加強，據估計，大約有2000萬剛剛招募來的城市工人被強制送回農村。[[42]](#_42_Zhe_Ge_Shu_Zi_Jian_Ceng_Zhi)幾年前，業已控制了的犯罪和黑市交易，以及乞丐等其他現象現因城市經濟惡化又故態復萌了。

對于“大躍進”的失敗，同樣有多種不同的反應。當然，有些對新秩序本來就不滿和一些對新秩序持懷疑態度的人，把這種危機看成是制度有缺陷的跡象，因為這種制度沒有能夠使錯誤的政策受到制止。一位經歷過這個時期的蘇聯觀察家，提供了一個與毛之后的領導有共識的評論：

人們可以把毛統治中國時的行為方式比作一個喝醉酒的司機開公共汽車那樣：酩酊大醉的巴士司機把他載滿乘客的車子開到了一條陡峭彎曲的山路上。許多乘客都意識到每時每刻都存在著危險，但是沒有人敢站出來讓司機靠邊，由他自己來負責把這輛車開到安全地帶。[[43]](#_43_Ke_Luo_Qi_Ke____Zai_Hong_Se)

當然，中國領導層內部也開始承認這個問題，但在新聞媒介中僅僅是隱諱地批評毛。（彭德懷起碼是直率地試圖使這個司機清醒過來，結果導致了彭在1959年被清洗。）那時，給公眾的解釋卻是很不一樣的。以官方的觀點而論，“大躍進”基本上是好的，但是由于惡劣的氣候，蘇聯在1960年背信棄義撤走了專家和援助計劃，基層干部的盲目沖動，結果導致了這場突然發生的災難。

作出有把握的判斷是困難的。但那時，如果不是大多數城市居民，起碼是許多人都接受了官方的大部分觀點。俄國專家突然撤走，就很容易被理解成蘇聯背信棄義，許多地方氣候確實惡劣，基層干部的狂妄自大和瞎指揮的例子也確實不難發現。與此同時，大多數市民仍然沒有意識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內部已經有人對毛提出了批評。當然，他們知道林彪在1959年代替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但是，至少在基層干部和知識分子當中對彭批評“大躍進”政策的詳細情況，并不都是十分了解的。有關彭對毛的不忠和同情蘇聯的謠言，又把這個問題攪混。即使在60年代初，當鄧拓、吳晗和其他黨內的高級知識分子開始出版他們對毛進行婉轉批評的作品時，大多數市民仍然沒有意識到毛就是被批評的對象（假如他們讀過他們作品的話）。

或許最重要的是，市民們總的說來相信官方的解釋，不管解釋如何難以令人置信。他們竭盡全力建起的幢幢高樓大廈和大型水庫竟是官方巨大失誤的組成部分，這種想法太讓人痛苦了，同樣，如果要說毛不僅難免犯錯誤而且有可能把中國帶向無秩序的混亂狀態，這也同樣是不可想象的。在內心深處，大多數市民依舊感謝發生在50年代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改善的變革，不愿意相信曾經使中國“站起來”的領導如今應該對“三年困難”負責。因此，對許多市民來說，盡管“大躍進”危機帶給他們難忘和痛苦的經歷，但卻不能泯滅他們在新秩序下建立起來的信心。[[44]](#_44_Si_Wen__Lin_Kui_Si_Te_Shi_Yo)

還應該注意的是，中蘇關系破裂（“大躍進”危機使關系破裂公開化）所引起的焦慮不似1949年后抵制西方而造成的那么多的不安和擔憂。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依賴蘇聯的時間比起早些時候與西方接觸的時間要短。事實上，這次對蘇聯的抵制并不是那么全面。即使同盟關系破裂了，許多引進來的思想和機構仍然存在。數以千計的被送到蘇聯學習的中國人，的確發現他們所掌握的專業知識有些已經不太需要了（俄語很快在中國失寵），但他們并不需要像以前許多在西方受教育的知識分子那樣斥責他們以前的生活和活動。因此，他們的事業沒有受到嚴重的損害。另外，中國公眾對蘇聯人一直就有某些看法：蘇聯專家狂妄自大和資產階級化，赫魯曉夫像個鄉下佬似的粗魯同毛的精明和教養形成對比，蘇聯的援助并非像他們說的那樣慷慨和不附帶任何條件。中蘇關系破裂時，利用中國公眾對蘇聯人的惡感是輕而易舉的事。所以，當形勢發生了反對蘇聯這一轉變的時候，沒有什么跡象表明公眾反對或是不滿。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變化意味著中國終于擺脫了從屬于外國勢力的最后一點殘余。

1962年以后，經濟狀況好轉，這是肉眼可見的。城市情況似乎也回到了“大躍進”以前的樣子。市場供應提高，就業問題得到了改善，1963年進行了部分工資調整——特別是提高了那些工資級別較低的階層的人的收入。犯罪問題、投機買賣和黑市交易似乎再次減少了，市民們覺得社會治安也得到了改善。在這個時期，發生了一些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事件——例如，1962年中國取得了對印度的邊境戰爭的勝利，1964年中國得到了法國的承認，同年，中國的第一顆原子裝置爆炸成功。雖然生活依然是一場斗爭——“大躍進”時期大多數被動員走上工作崗位的婦女現仍繼續她們的工作，不僅是出于社會主義的義務，而且也承認是生活所必需的——但是未來的前景似乎更明亮了。

這幾年，政府對修補被破壞了的士氣表示了極大的關注，這種努力采取了政治學習和宣傳的形式，最終形成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這場運動在有些地方引發了自土地改革以來規模最大的沖突；但是在城市，只是為了加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仰而進行的比較溫和的努力。為此開展了各種各樣的活動——學習雷鋒等先進人物；搜集整理足以說明共產黨的領導帶來了翻天覆地變化的家庭歷史和工廠歷史；聽飽嘗苦難的老工人和老農民憶苦；推廣在人民解放軍中使用的政治工作制度等。[[45]](#_45_Lei_Feng_Shi_Yi_Ge_Pu_Tong_D)這些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要讓一種思想深入人心，那就是如果中國沒有實行社會主義，那么三年困難時期的痛苦會更深，每人分攤的痛苦會更不平等。許多城市居民傾向于接受這種觀點。第二個主題是（1962年之后這個主題變得越來越重要）：潛伏的階級敵人企圖伺機顛覆社會主義，他們必須被鎮壓下去。開始，人們對誰是城市范圍里的敵人這個問題感到相當的模糊，但是，他們逐漸被所有的“憶苦”活動說服了——過去，老地主和國民黨分子是卑鄙的人。

然而，在恢復和改善的氣氛下，隱藏著一些不祥的傾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問題。在充滿樂觀主義的50年代，嬰兒出生率大幅度增長，學校迅速增加，另外，許多農民家庭舉家從農村流入城市（之后不是所有農村來的人都被趕出了城市）。到60年代初，大批大批的應屆學生從城市中學畢業，但是，在經濟領域和高等教育方面的緊縮措施，使得能夠接納他們的地方受到了限制。正如我們提到的，在50年代，曾有一段時期，高等院校招生人數比應屆高中畢業生還要多；到1965年，僅有45％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可能進入高等院校深造。[[46]](#_46_Shu_Zi_Yin_Zi_Si_Tan_Li__Luo)

這種人口形勢的變化所產生的結果是多方面的。高考的競爭更加激烈。有鑒于當時的學校制度，這意味著進入質量高的重點小學和重點中學，競爭就非常激烈，因在這些學校里就讀的學生，比其他學校里的學生有更多的機會考上大學。由于進大學機會的相對減少，中小學里競爭的氣氛愈演愈烈，由于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斷變化，圍繞競爭本身的一些不確定因素又增加了。對學校等級、考試分數、政治表現和階級成分的強調不斷變化，今年與明年就不一樣，學生按條件最有可能在競爭中取勝的，但條件變了，那些把自己的戰略建立在學習成績基礎上的學生發現，由于格外強調政治標準，他們上大學的機會正在減少。學生之間的關系也受到了影響，階級出身和其他政治因素現在成為友誼和學校小派系形成的主要因素。當時的教育政策事實上把學校分成三類：重點學校、國家開辦的普通學校和民辦學校，這些學校都招收城市的學生。在這種制度下的第二類、特別是第三類學校中的氣氛是不同的，普遍缺乏競爭。這些學校里的學生考上大學的機會很渺茫，充其量只能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這些學校學生的學習動力和紀律也明顯地差勁。[[47]](#_47_Zhe_Ge_Shi_Qi_De_Jiao_Yu_Qin)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前幾年，教育領域里已冒出一種前途難測的現象，很多有理想和有才華的年輕人在這種情況下對未來感到心灰意懶。很多人眼看著兄長姐姐就在幾年前輕而易舉地考上了大學并得到了稱心如意的工作，而自己的前途卻變幻莫測，因此特別感到痛苦。一位年輕婦女在回憶她當時極度痛苦的情形時這樣寫道：“才14歲，我的生活就定型了。今后的日子，就是在三年后當一名小學教師，每月掙32元錢。我就沒有必要想入非非再為自己未來進行設計了。”[[48]](#_48_Bao_Bai_Yi____Di_Ba_Ge_Yue_L)

對于大多數沒有指望上大學的城市青年人來說，考慮將來的工作更為現實，但就業形勢也同樣捉摸不定并且競爭很激烈。50年代形成的工作統一分配制度，是以經濟將持續蓬勃發展并能給新的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為前提的，但是，這種期望由于“大躍進”的失敗而受到了阻撓。由于控制非常嚴格，國營企業未經批準不得招收新職工，每年都有成批的學生離開學校，但是并沒有足夠的新的崗位容納他們。（50年代剛剛走向工作崗位的人都是相當年輕的勞動力，這就意味著每年因退休而騰出來的位置數目很小。）即便是農村人口被嚴禁流入城市，仍然沒有多少空余的工作崗位。有些畢業生被安排了工作，但其他畢業生則得返回家中，等待將來或許能給安排個工作。這些年輕人由城市居民委員會監督管理，有時他們參加一些建筑或運輸方面的臨時工作，雖然有極少數幸運的人最終還是被安排了一份永久性的工作，但是失業的人數在逐步擴大。這些沒有被分配工作的年輕人被稱為“社會青年”，他們被認為是這個時期的一個難題。居民委員會試圖組織他們進行政治學習，參加一些“健康的”活動，不時催促他們自愿到農村安家落戶。然而他們的人數迅速膨脹，處理他們的問題也就更加難。所以，同50年代的樂觀情緒相比，城市里的年輕人和他們的家長在60年代發現，競爭十分激烈，情況又不斷變化，想在此形勢下計劃他們的生活實在是太困難了。

對于那些已經在工作的人來說，其境況稍好些，但是氣氛同以前不大相同。在“大躍進”之前，大家感到新的機會是對每個人敞開的，那些學習勤奮并運用于實踐的人可能會在工作上得到提升，換一個更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每隔幾年就可以在工資方面得到晉升，到了60年代，這種形勢發生了變化。大多數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干同一種工作，工資凍結在同一水平，盡管當時還沒有發生通貨膨脹，他們已經在為能否養活越來越多的一大家人而殫精竭慮。雖然人們覺得自己的工作還是相當穩定的，也可從中得到皮毛的福利，但他們仍然覺著向下調的可能性比向上升的可能性要大。隨著經濟走出緊縮階段，他們承認，他們的命運已經和單位未來的前途聯系在一起，個人的努力和貢獻不會使他們的境況發生多大的改變。的確，由于無法擺脫的政治運動仍在繼續，階級斗爭一再強調，他們還是不得不擔憂，是否會因為一句沒有留意的言辭或行動而把自己置于極其危險的境地。

這種氣氛既未能產生多少英雄事跡，也沒有使人們去鉆研業務。在控制日益嚴格的基層組織，也就是工作單位中，人們趨向明哲保身，只求保住自己位置。開會時要注意留下好印象，同上級要搞好關系。總之，努力避免得罪任何人已蔚然成風。在這樣的結構中，那些感到遭受虐待或凌辱的人還不能輕易地發牢騷或是一走了之，只能把怨氣埋在心里，等到能夠發泄的時候再一吐為快。1966年，這樣的時刻來到了。

##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

在60年代初，幾乎沒有市民注意到即將發生的一場大動亂的苗頭。后來發生了一些事，如黨內知名知識分子發表的諷刺性文章，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被篡改，這些事被認為是其他人對毛權威的進攻。但當時的市民，如果確實已注意到這些事件，他們也會把它們看做中國政治潮流中的正常現象。即使對吳晗、鄧拓和其他人的攻擊到1966年初逐步升級的時候，大多數人也沒有感到有什么值得擔心的理由。過去的歷次運動常常是發生在文化領域，然后波及到其他部門，市民們個個身經百戰，沒有理由懷疑這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運動，沒有理由懷疑他們以往的經驗會在他們今后的日子里一無用處。只是到了1966年夏天，北京市市長彭真遭到清洗，紅衛兵在北京舉行大規模的集會和其他一些史無前例的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才認識到他們要參加新的運動了。而后，市民們開始專心致志地觀察事態的發展，既感到興奮，又覺得忐忑不安。

“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過程眾所周知，這里不再贅述。[[49]](#_49_Can_Jian_Li_Xiang_Yun__Yin)我們的目的旨在評論“文革”對人們生活和感情造成的影響，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是如此的復雜和多方面。不論這場運動是否已經成功，如口號所言已“觸動人們的靈魂”，很顯然，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內，各種各樣全新的令人產生強烈情感的經歷，成為市民們感覺的一部分——紅衛兵在全國各地串聯，揭露當權的領導人濫用職權和卑鄙的行為，中國共產黨癱瘓了，抄家搜尋隱藏著的與毛主義純潔性不一致的物件和標志，讓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官員在憤怒的人們面前示眾和丟臉，譴責17年來的許多文藝政策和作品，紅衛兵投入到了奪權和派系斗爭之中，在許多城市爆發了激烈的武斗，動用了機槍、迫擊炮甚至坦克，軍隊干預了民間社會，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同以前的情況一樣，人們對這種突如其來的事件的反應有明顯的差異。

對于許多城市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時刻，起碼開始時是這樣。他們不必再在競爭激烈的城市工作等級制中苦苦尋覓未來的機會，發現自己在更大更重要的舞臺上扮演著新型的革命先鋒作用。雖然大多數人仍然猶豫不決，甚至開始時有點擔心，對他們自己的老師和黨的領導人所犯下的“罪行”半信半疑，許多人很快發現，參加這些活動的報酬令人激動。他們不必整天再去學習，也不再受學校紀律的約束，他們通過在全國各地串聯發揮著新的作用，在國家領導人面前游行，去那些他們慕名已久的風景點去觀光，頻繁地同其他年輕人交流思想和經驗。他們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學校，起草新的規章和制度，使學校教師和管理人員忍受羞辱，搜查機密檔案，出版未經審查的小報。他們可以隨便闖入別人的家里，執行搜查“四舊”的東西和參加其他“共產風”的活動——賦予一些街道和組織以新的更革命的名稱。要求每個地方都張貼毛的畫像和語錄，毀損古代廟宇等。一些青年人甚至換了自己的名字，如把“梅花”改成“衛東”或“文革”等。紅衛兵開進了工廠、機關和其他機構。為了他們的革命，他們隨意改變宗教信仰，在有些情況下，他們甚至參加了當地的“奪權”斗爭，大概最重要的是他們感覺到毛特別選中了他們在建立一個更純潔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努力中起主導作用。他們從一個曾被高度控制的政治新手，轉眼之間進入了自由和權力的王國，在中國社會里獲得一個有價值的地位——這條道路上的障礙似乎已經不再存在了。在這種狂風暴雨式的氣氛中，年輕人的熱情一旦釋放出來，要收就非常難了，這一點已經不再有懷疑了。

然而，這些事情的展開，對不同年輕人有不同的影響。1966年已出現了派系間的分裂，導致了在1967年和1968年的暴力對抗，以后這種敵對情緒持續了很長時間。總的來看，階級出身比較好并掌握了學生組織領導權的年輕人，傾向于組織比較保守的派別；而那些“中間”階級（例如，小資產階級和專業人員等）出身的，則傾向于組成激進的派別。后者認為“文化大革命”是證明他們的革命氣概和對那些在學生集團內部曾對他們稱王稱霸的人進行報復的大好時機。奇怪的是，這場沖突造成的社會分裂正如1957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導致的社會分裂一模一樣，盡管在這次運動中所使用的手段及其結果有明顯不同。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在大部分時間里都靠邊旁觀了。因為他們看到即使他們參加了運動，也不會有機會讓他們證明自己，也無法避免麻煩事。[[50]](#_50_Can_Jian_An_Ni_Ta__Zhan___Si)由于派系間暴力沖突不斷升級，城市狀況日趨惡化。單位和居民區的大門都設立了警衛，以防受到外面的沖擊，即使到市場去采購，弄不好就會被派系間的交叉火力擊中，或被流彈打死。在這種環境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由于害怕和家長的懇求，從戰斗中退出來，把戰場留給雙方那些勇于獻身的參加者。

在工作單位，也發生了程度不同的騷亂，大多數“出身好”的人組成了保守派，打上中間標簽的人組成了激進派，少數出身不好的人則試圖置身于兩派斗爭之外。在單位里，派系之間還有其他的劃線標準，如，年輕人對歲數大的，臨時工對正式工，腦力勞動者對體力勞動者等，使得沖突復雜化了。[[51]](#_51_Li_Jian_Ma_Ke__Bu_Li_Qi___Ge)單位里發生的沖突比在學校要相對緩慢一些，因為成年人更關心生產的消長和他們自己的生命。但是，單位里實際上長期存在著不滿情緒，現在“文化大革命”允許人們表達自己的不滿，所以，在某些情況下，在單位里發生的一些沖突比起學校來更激烈，也更難以解決。在單位里由于起碼需要保證生產，至少是斷斷續續的生產，因而派系斗爭形勢很尷尬，工作上要相互合作，吃飯時彼此避免接觸，工作結束后，彼此進行惡毒的攻擊，即便如此，一些成年人起初對“文化大革命”充滿熱情，因為他們認為這場運動反對官僚主義，反對特權；但是當真刀真槍地打起來的時候，他們比年輕人退得更快，許多成年人撤回到家中，和家人在一起，瞧瞧發生在他們周圍的無秩序狀態，思考著這一切對中國的前途將意味著什么。

“文化大革命”導致的政治后果是很復雜的。起初，這場運動帶來了空前的自由。雖然一系列事件是由上面指揮的，但沒有受到嚴格控制，中國共產黨癱瘓了，嶄新的、相對自覺成立的造反組織成為政治角色。中國政治局面變了。俱往矣（暫時的），那些嚴格組織起來的、強迫別人贊成現行政策的政治學習小組！代之而起的是，人們可以隨意閱讀官方的或是紅衛兵的報紙，對各種活動也根據自己的興趣決定是否參加，調查生活和查閱個人的檔案材料以及參加其他一些自己認為是有益的活動。通過這些經驗，他們了解了被隱瞞起來的權貴們的特權，官僚的腐敗和相互傾軋，還有其他一些弊病。當他們四處串聯的時候，在相當自發自愿的氣氛中學習到了其他人的經驗；他們對那些農民、臨時工和許多人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因為這些人的生活同官方宣傳所描述的實在是天壤之別。不同派系間熱烈的辯論和同朋友夜半長談，使人們更深刻地思考這個社會。對于城市居民來說，相當普遍的反應，是他們感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太幼稚和容易上當受騙，但是，現在他們的“眼睛已經睜開了”。這是“文化大革命”所導致的一種反作用，即利用人們盲目的信仰最大極限地進行了動員，結果卻使人們覺醒并形成自己獨立的見解和意味深遠的懷疑主義。

“文化大革命”也改變了人們對政治生活的思想狀態。在這之前，大多數人覺得自己是受到信任的，不會有問題的，盡管他們承認官方的控制太嚴，對待階級敵人太殘酷。“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后進行的一些運動（例如，1968—1969年、1970—1971年，為進一步清除“隱藏的階級敵人”而搞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使安全感和信任感逐漸讓位于一種覺得當政者武斷專橫、惶惶不安的感情。階級斗爭范圍逐步擴大，許多原本認為自己會免除政治危險的人，突然發現他們成為攻擊的對象。例如，對許多干部和知識分子來說，蹲“牛棚”（在單位臨時建起來的監獄）的經歷，目睹父親被押到群眾大會上挨批斗時的情景，以及自己被強迫搬出寬敞的住房住進狹窄的茅草棚里，這一切使他們第一次清楚地認識到了所謂的政治犧牲品是個什么樣子。由于斗爭范圍不斷擴大，就連那些普通體力勞動者和商店小職員也開始日益擔心自己成為政治的犧牲品。[[52]](#_52_Yi_Xie_Zhong_Guo_Zi_Liao_Bia)

不但政治受害者的范圍在逐漸擴大，而且規則似乎越來越武斷和無法預測。有的人在組織里花了多年時間同領導建立起信任關系，但是，突然之間領導倒了，下面的人便失去保護。政治的激進化，意味著過去人們曾以其指導他們的生活的規則和程序不再有效，在政治的海洋里人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隨波逐流。在這種形勢下，有可能討好新的領導而獲得安全，但由于北京的政治沖突錯綜復雜，千變萬化，這是一個頗具風險的戰略。有些人希望賭注下對了并積極參加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運動中去，還有一些人則以請病假或以其他方法“中途退出”，也有人淡泊地面對自己將來的政治前途。

這些年政治上的覺醒和受害者的不斷增加同其他一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如林彪的死亡），增加了人們對高級領導人的懷疑和不信任。領導人的行為同過去的10年或是20年前相比到底變化了多少，誰也說不清。但是，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情況在惡化。領導人艱苦奮斗和大公無私的形象，開始被另外一種情感所代替，即權貴們關心維護自己的權力猶勝于關心造福社會。他們不僅能夠而且也急于通過使用他們的權力和“后門”等手段，為他們自己和朋友以及家屬謀取利益。新的領導人關心建立他們的地位和特權，正如被他們取代了的那些人一樣。當老干部們恢復了職務的時候，他們似乎一心想著重新獲得他們失去的種種特權，并且等待時機，報復那些曾經折磨過他們的人。因此，“文化大革命”增強了人們對官僚主義者驕橫的敏感性，但在克服官僚主義方面并沒有取得成功（甚至產生相反的效果）。50年代說干部的模范行為是促進民眾對新的政治制度產生敬意的主要因素，70年代，對于干部所作所為產生厭惡，表明人們越來越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幻想破滅。

政治領域混亂一團，經濟狀況也不斷惡化。毋庸置疑，一部分人從中得到了好處——一些臨時工在1971年轉成了正式工，派系斗爭中的勝利者被封官加爵，有些軍人擠進了市政府機關，有些軍人把他們農村的家屬辦進城市并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在醫院里，一些護士干起了醫生的活，衛生員干起了護士的活，而醫生則不得不去清理便盆和擦玻璃。在這10年中，對于一般的市民來說，前景不妙，由于政治上的錯誤而被降級和受處分的機會比以前增加了。給職工的獎金和其他工資外的津貼變成了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有的干脆被取消了，這樣就打擊了那些勤奮能干的人的積極性。工資晉級仍然被凍結著，只是在1971—1972年對那些低工資作過一些調整，因此，在長達15年甚至更長時期里，人們用同樣工資來維持家庭的需求。

在這種形勢下，社會上有幾部分人清楚地看出他們的處境每況愈下。那些與海外華僑有關系的人在住房、獲得消費品和其他方面都失去了很多特權，有時受到恫嚇不敢去領海外來的匯款。許多有政治問題或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趕進了狹小擁擠的小屋或被停發工資，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被注銷了城市戶口，全家被強制遷回他們的農村出生地（在許多情況下，有些人從未在那里居住過）。[[53]](#_53_Zhong_Guo_De_Zi_Liao_Biao_Mi)到了70年代，有一部分人取得了他們失去的部分東西，但其他人又倒霉了。例如，軍隊開始交出政府和文職機構的領導權，官方的政策要求從農村招募來的軍人在復員后必須返回他們土生土長的村莊，不能在城里安排工作。

除了前途不妙外，許多市民明顯感到這些年的市場供應和生活水平在下降，一些諸如收音機和手表等東西似乎比以前更容易買到，但是這并不能使人們對食品匱乏的不滿得到補償：食品更少，定量更緊，采購花的時間也越來越多，越來越使人垂頭喪氣。一位嫁給中國人的美國婦女曾對當時的景象作過如下描述：

在長長的革命混亂的年代里，可以得到的生活原材料一點點減少。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的飯桌上只有米飯和一個用花生油稍微炒一下的蔬菜……情況同饑荒不同，大米還有供應，但是想達到均衡飲食的標準已經是不可能了……幾乎每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幾乎整天都在為吃飯發愁……研究如何使用肉票的最佳方案，成為家里每天談話時的主要話題，一談就是幾個小時。[[54]](#_54_Lu_Si__Ai_E_En_Xiao__Luo_He)

一位曾在1975—1977年間生活在北京的澳大利亞學生，記述了當時在購物時最常聽到的四句話：“沒有”、“賣完了”、“明天再來”和“對不起”。[[55]](#_55_Bei_Fu_Li__Hu_Po____Bei_Jing)住房緊張也成為一個嚴重問題，因為50年代初興建住房的勢頭未能保持下來。盡管加強了對農村向城市移民的限制，也無濟于事。老房子一部分壞了，人們只得擠在更小的居住面積里湊合，那些想要新房的人得等好幾年。[[56]](#_56_Yi_Fen_Zai_1978Nian_Dui_Zhon)

“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后果之一，是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城市分配制度趨于平等。在收入和獲得消費品方面的差距逐步縮小。[[57]](#_57_Dui_Zhe_Zhong_Ping_Jun_Fen_P)然而，這種變化帶來的社會效果并不像中國平均主義改革家們所預期達到的那樣健康。當“餡餅”越來越大，每個人得到的越來越多的時候，那些處于社會最底層的人所得部分大得不成比例的時候，平均分配才是最容易的。社會底層的人們感到興高采烈的時候，而上層人物也不感到不快，這正是1955—1956年向社會主義過渡時使用的戰略。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情況并非如此。對于城市居民來說，“餡餅”在一天天縮小，要實現平等，只有削減各特權集團的利益，使他們的生活接近其他市民的水平。這樣，利益受損的集團感到不滿意了（完全可以理解），而社會底層的人們的生活也未看到如何提高。作為一種推行平均的戰略，它肯定引起了人們普遍的不滿。增加社會平等并未能取得有意義的效果，因為在許多市民看來，顯而易見的是分配制度本身就不如過去平等。[[58]](#_58_Ying_Gai_Ji_Zhu_Ping_Deng_Yu)那些工作更努力和貢獻更大的人并沒有發現這種分配上的變化使他們的工資袋充實了或是使他們能得到更多的消費品——或許更重要的是人們發現那些有關系的人能夠“超越這種制度”：他們能得到耐用的消費品、公費醫療、住房和其他一般人難以得到的緊俏物品。在當時供應緊張的條件下，每個人被迫去發展各種關系來滿足自己的需求，有的人能“走后門”，他們比其他人更成功些。顯而易見，那些身居要職的人在玩這種游戲時，肯定要比一般的市民強，對中國權貴們的不滿也會隨之增長。

在這些年，年輕人所面臨的問題最嚴重。在“文化大革命”開始階段，他們處在世界的頂峰；但是到了1968年，他們中很少有人能再獲天恩。大多數人不是被匆匆攆到了農村就是被下放到邊境地區安家落戶，成為農業勞動者。在以后10年里，有1700萬城市青年經歷了這樣的命運。上山下鄉雖在當時是光榮的使命，而且政府繼續以此作為處理城市過剩“知識青年”就業問題的一種有效手段，但是事實證明，就社會而言，這場上山下鄉運動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許多城市年輕人發現他們難以忍受農村艱苦的生活條件，所以不久就開始違反規定，跑回城市里呆上很長一段時間。由于他們已經被注銷了戶口，不能再被合法地雇用或得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他們不得不依靠家庭和朋友，或進行一些非法的活動。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這些返城的青年是制造城市犯罪的禍首。這些年輕人在城市系統中沒有一席之地，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對“文化大革命”憤怨不已，這些都促使他們成了膽大包天的犯罪分子——對他們的控制比起對一般市民來要困難得多，甚至比控制城市的農村盲流都困難。由此而產生的大量問題使得當局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更改過去的計劃，甚至在毛去世之前就著手改變——提供更多的資金來安置青年人，特別是把送青年人到農村去安家落戶的制度改為年輕人輪流到農村接受鍛煉的制度，在農村干了幾年的青年，如符合條件，就可以返回城市并給予安排工作。

除了以前的紅衛兵之外，其他人也受到了變幻莫測的形勢發展的影響。他們的弟弟和妹妹在這種學校制度下成長起來，其前途并沒有什么保障。隨著“文化大革命”時期教育制度的改革，他們很清楚他們不可能從中學直接上大學，其中大部分學生畢業后將送往農村。由于不再強調成績，每人每年自動升級，學生學習成績和在學校表現與來日的工作安排沒有什么聯系，因而城市的學生感到他們沒有什么理由再努力學習，或是循規蹈矩，安分守己。無論他們的表現如何，對于他們的未來都不會有什么區別。其結果，是使那些仍然在校的學生逃學曠課和違法亂紀的增加了。家長非常擔憂他們的孩子表現如何，但對于怎樣才能使他們的后代遵守紀律，卻又感到不知所措。有的年輕人和他們的家長忽然提出一條希望能夠奏效的戰略：培養他們體育或是音樂方面的專長，就有可能使他們對城里某個工作單位有吸引力。但是對于多數人來說，規劃未來幾乎是毫無希望的。一些年輕人開始請教算命先生或是尋找其他的神秘的答案來解決他們生活中的未知的將來。在人們普遍焦慮不安時，社會權貴們卻能夠給他們的子女在城里安排工作，或者把子女從農村“救”回來送去參軍或上大學，這就加劇了人們對當權者的不滿情緒。

“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城市的社會秩序，但是如上所述，1969年大動亂階段的結束并未能使社會秩序恢復到以往那種程度。黑市交易、非法買賣和投機倒把猖獗。在公共汽車和有軌電車上小偷肆虐，晾在外面的衣服及放在外面的自行車稍有不慎就會不翼而飛。人們在晚上獨自行走時比過去更加害怕，一些聳人聽聞的傳說如搶劫、強奸、謀殺更令人毛骨悚然。也許最使人膽戰心驚的是犯罪集團或“黑社會”開始在大城市出現，他們的犯罪方式同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樣——占據地盤，制造土武器，同敵對的集團進行火并。城市居民們越來越害怕到這些黑社會活動猖獗的地方去，他們也同樣擔心自己的孩子會受到這些黑社會勢力的影響。比較而言，中國城市犯罪率比世界其他一些國家低得多，然而，中國的市民們已感覺到他們曾無限感激的50年代里的社會安全和公共紀律現在已是蕩然無存了。

城市秩序的其他方面也下降了。隨手亂扔垃圾和在大街上吐痰的現象比以前更常見了。盡管廣泛宣傳毛的“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但是商店里營業員和飯店里招待員的態度卻越來越差。在公共汽車上，人們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樣樂意給老人讓座，汽車和火車也不如從前準時了，甚至連蒼蠅、老鼠和其他城市害蟲也都“殺回來了”，而在10年前或更早些時候，這些害蟲曾得到較好的控制。也許有些看法不太確切，僅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們的一種懷舊之情，但它的確表明了人們日益增長的看法：城市制度垮了。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強行與無產階級文化保持一致的巨大努力（官方說是無產階級文化，但未詳細解釋其定義）。這種努力滲透到了市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紅衛兵造反揭開了運動的序幕，以后幾年的政策，又使這種壓力得以保持下去。首先，這個政權不是自由主義的堡壘，因此，許多早年允許的表達形式、風俗習慣和文化物品，現在都被禁止了。[[59]](#_59_Yi_Ge_Sheng_Dong_De_Bai_Ming)

1966年紅衛兵破“四舊”期間，許多家庭的珠寶、祖傳的神龕、圣經、老式的衣服、香水、古書和一些傳家寶都被沒收了。就連那些沒有被抄家的人，也由于擔驚受怕而將他們的門神、外國書籍、古典油畫和其他容易引起麻煩的物品毀壞或是埋藏起來。這時候，在很多地方，即使連養金魚、養鳥和其他小寵物也被視為“資產階級”的生活作風。每個家庭都必須在家里顯要的位置張貼毛的畫像，并用毛的語錄作為家庭的主要裝飾。在一些單位，人們每天早晨給毛跳“忠字舞”，回電話時先說“毛主席萬歲”。[[60]](#_60_Ke_Lao_Di__Bu_Luo_Ye_Li___Ji)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們走在大街上，隨時都有可能被勒令停下來，如果他們的穿戴不符合無產階級的式樣，就會被剪掉頭發，撕爛衣服。在有的單位，淋浴室甚至洗衣間和其他一些服務設施都被認為是過分地迎合了“資產階級”的個人需要而被拆除。

書店和圖書館急忙把新近定性的禁書從書架上取下來，電影公司的影片和劇團也受到了同樣劇烈的沖擊。一些廟宇被損壞，寥寥無幾的基督教堂被關閉，那些希望以任何方式參加宗教儀式的虔誠的教徒們，只有偷偷地在自己的家中秘密地進行。許多娛樂性的活動，如跳舞、郊外野營和一些業余愛好俱樂部都被懷疑有“資產階級”傾向而遭到大規模的削減。當局還試圖通過鼓勵人們在傳統節日加班，并禁止人們吃月餅、焚香、賽龍舟和其他一些因節日而舉行的儀式，來阻止人們對傳統節日的慶賀。在大城市里，火葬開始越來越普遍，只有在小城鎮和農村仍然實行土葬。其他一些民間活動儀式也都受到了影響——豪華的結婚筵席、身著西服的結婚照以及傳統的哀悼儀式等，在這些年都在禁止之列。女傭人、武術教師、魔術師和其他一些行業的人都發現，他們的職業因為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毫不相干，所以都成了問題。在大城市里擁有不動產的私房主被迫交出他們的契約，然后開始為他們的住房付房租。小規模的有執照的小商販和個體工匠前幾年是可以經營的，現在又一次被禁止了；甚至一些集體企業也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不能給職工發放獎金。70年代對人口出生率開始進行嚴格的控制，人們生孩子和使用避孕物品情況都要檢查，以防止城市家庭生育兩個以上的孩子，到1977年一個家庭只能生一個孩子。（事實上，“大躍進”失敗后，在1962年城市地區就推行計劃生育，特別從1970年起在對計劃生育的宣傳和組織等方面都加強了。）

1976年前的一段時期，雖然有些限制開始有點松動，但“文化大革命”對大眾文化產生的效果就是破壞以前的風俗習慣，要求遵循經允許的、范圍有限的行為準則。人們在官方不斷變化的要求方面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新的控制措施如此之多，不少人仍感到懊惱，他們眼睜睜瞧著傳家之寶被砸爛，再不能像他們希望的那樣去求神拜佛，再不能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舉行各種婚禮或是喪葬儀式。另外一個結果，是使人們的文化和娛樂生活近乎于枯竭狀態。人們沒有機會參與各種各樣的活動，而是被強制性地反反復復參加一些范圍很窄的活動，最典型的是組織人們翻來覆去地看革命樣板戲。

允許搞的活動很少，在有些情況下這就意味著組織的活動確實不多了。而在過去，單位還經常在慶祝國慶節時給大伙發點好吃的東西，組織各種體育比賽，舉辦舞會和其他許多娛樂活動以示慶賀；到了70年代，有些單位在這樣的重大節日只讓職工聽個報告，然后就讓大伙回家了。學生們也發現，他們的課外活動和有組織的假期活動同過去相比少得可憐。娛樂活動上由多變少而產生的奇怪后果是：市民們在他們的業余時間，越來越退回到自己的家中和親近的朋友的小圈子里，而不像激進派們希望的那樣投身到大規模的集體事務中去。

所有這些變化對家庭生活的影響是復雜的。在“文化大革命”開始階段，人們已明顯感到緊張。年輕人參與了紅衛兵的活動，父母為他們擔憂，甚至嚇得心驚肉跳。在有的情況下，這些活動使年輕人同他們的父母發生了直接的沖突——參加破“四舊”的活動，到他們自己的家里翻箱倒柜進行搜查，譴責他們的父母甚至同他們斷絕關系。有時，對不同的派別的同情或是政治觀點上的分歧，也造成了夫妻間關系的緊張，有的甚至導致了離婚。以后，家長們因無力幫助孩子們免去農村或是不能幫助孩子們計劃生活，又感到痛心疾首，家家都在為那些在農村的孩子們能否在這幾年中料理好自己的生活而擔憂。許多成年人也被迫離開他們的配偶和子女，被送到勞改機構或是“五·七干校”進行“改造”。

盡管有不少高喊無限忠于毛澤東的浮夸之詞，然而總的來說，這個時期的家庭的關系和彼此的熱愛還是得到了加強，而不是削弱了。例如，家里有一個人遇到了麻煩，全家人能休戚與共分擔厄運，他們面對歧視，全家人抱成一團，同仇敵愾。我們已經說過，這個時期娛樂活動貧乏也加強了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關系網和“走后門”的重要性，也鼓勵著人們依靠親屬，而不去遵守官僚的規章制度。或許最重要的是，由于嚴重的破壞和生活貧困使人產生了尋找盟友和尋求保護的需要；但是由于政治風向的不斷變化，許多以前的同盟者不在了或不再可靠了，在處理各種變化無常的生活時，人們比以前更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家庭成員和親密的朋友。因此，在這期間，許多家庭都發現，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日益密切，家庭也更有力量和更加穩固。然而，盡管各個家庭全力以赴，他們還是發現一些重要的家庭目標是難以實現的。使家庭更加富裕，家庭成員能生活在一起，看著兒女們建立家庭并開創他們的事業，以恰如其分的方式慶祝家中喜事——所有這些都是人們希望有的家庭目標，而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這些非常基本的家庭目標都經常被挫敗，難以實現。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個時期，一個非常重要的親屬關系遭到嚴重的損害——城市居民和他們的農村親戚之間的關系。為對付城市生活的壓力，一個人當然首先要靠自己的家庭，住在本市其他地方甚至在其他城市里的親戚也常常給予幫助。許多市民都能講一些這樣的事：在其他城市里的親戚如何寄來了“小心輕放”的包裹，里面裝滿了那里供應比較豐富的物品；通過他們在那個市里的個人關系請專家大夫做特殊手術或是提供其他方面的幫助。但由于當時的其他一些因素，正如我們已經提到的——對移民的限制，城里禁止土葬，禁止祭祖，工作緊張以及工資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等原因——使得中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差距逐漸擴大，形成了兩個獨立的世界。[[61]](#_61_Zhe_Zhong_Cha_Yi_De_Xiang_Xi)一個人同其故鄉的紐帶關系，同農村的密切聯系，是以前傳統的中國城市的顯著特點，但是在革命后30年來，這種特點越來越不明顯了。這里有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1952年一位觀察家在上海曾寫道：“當春節就要到來的時候……幾乎所有的老人們都走出鄉村，肩上扛著年貨，到城里去看望他們的子孫。”[[62]](#_62_Wu_De____Zhong_Guo_De_Yi_Tia)這位觀察家提及的這種走訪活動，常常要持續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城鄉親戚之間相互饋贈食品、禮物和其他人們喜聞樂道的東西，但是到了70年代，這些現象就很難再看到了。

1976年毛去世時，許多重要的支持政府的力量都被侵蝕了，各種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下積聚起來。這時期嚴格的政治控制使得這些不滿隱伏下來，但是偶爾也有一些地方發生動亂，一些罷工活動、老年群體的抗議以及其他的類似事件確有發生。在看似平靜的外表下，問題成堆，1976年的幾個月里，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相繼去世，再加上毀滅性的唐山大地震，更加劇了人們對未來前途的憂慮。

## 毛澤東以后的中國，1977年及1977年以后

隨著毛的去世和一個月后毛的激進的支持者“四人幫”被捕，中國領導人在工作中不能不感到危機。危機來自多方面：人們工作不積極，黨的權威被削弱，權貴們搞特權遭人民憎恨，供應匱乏又怨聲載道，青少年犯罪不斷上升和其他緊迫問題。后來改革開始。改革采取旨在處理這些危機的多種方式：揭露和譴責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災難，削減把城市青年送往農村的計劃，逐步建立各項法規，對西方貿易和接觸實行新的開放政策，放松了對通信、文化和私人企業活動的控制，努力恢復“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和重新激活可預見的機會結構，重新強調尊重知識分子以及努力降低階級斗爭的重要性。總之，一種痛苦反思中國缺點的氣氛取代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那種革命的自滿熱情。

在經濟領域，毛去世后，食品和工業制品供應方面都有改進，人們的抱怨少了。1977年以后工資增加了幾次，工資長期凍結的局面宣告結束；勞動者又可以通過獎金和計件工資等方法，增加他們的收入；加快了城市住房建設，給那些住房條件惡劣，早該分房的人解決了住房問題；總的來看，這些變化是受歡迎的，雖然期望得到的東西很多，一時還難以得到充分的滿足。

在人員流動和提高地位方面，大批曾遭受污辱或被降級的人得到了平反和提升，許多有技術的人重新找到了更適合他們的工作，使他們能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海外華僑和知識分子等恢復了他們往日的特權，有的人甚至由于補發工資或房租，而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橫財（事實上，這種補償從1977年就開始執行了）。加速為下鄉青年在城里安排工作，對城市應屆中學畢業生下放到農村去的壓力有效地取消了。由于恢復了考試競爭、重點中學、從中學保送上大學等制度，城市青年們感到，要想以后獲得一份光宗耀祖的工作，現在主要必須清除一系列影響成績提高的障礙。表達個人的喜好和事業上的理想不再受到責難，有極少數的人甚至可以出國深造。以前絕對禁止私有企業和限制集體企業的做法業已否定，人們開始大量地以私營方式開飯館和做其他服務行業的生意，集體公司也如雨后春筍大量涌現出來，吸收了絕大多數還是第一次謀職的城市青年。這些變化以及在城市里農民“自由市場”的重新開放，給原本單調的城市生活注入了些許生機。

一些其他因素使市民們對眼前的變化并沒有像當局希望的那樣感到心滿意足。比如說在1979年之后，肉類、蔬菜和其他基本食品的價格上漲，政府控制物價顯有難色，引起通貨膨脹新高潮，使許多市民感到納悶，他們增加了的工資究竟能使他們多買多少東西。盡管那些獲得平反和恢復先前地位的人感謝他們獲得的改進，但他們主要的情感往往依然是為自己辯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感激之情又被怨恨沖淡。同時，由于變化緩慢和官僚們在這些變革問題上無休止的爭吵，許多人又感到著急和憤怒。

基本的問題是事實上所有的人都感到他們早該獲得這些改善了，但是在實施這些改革措施中，有一部分人受到青睞，獲得了實惠和特權，其他人卻沒有，從而引起更多的妒忌和怨恨。1977年以后，人們在單位里花費了無數時間開會討論誰應該漲工資，誰應該得獎金，有時一些沒有被評上的人甚至在同事和上級面前聲淚俱下，向他們訴說如果這次他們評不上，今后生活將會如何艱難。那些不在評選之列的人當然不會心甘情愿，有時他們會以別出心裁的方式來表達肚子里的怨氣，比如在工廠燒熱水的鍋爐工，用停止供應熱水的辦法來告訴其他人：他們對生產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63]](#_63_Can_Jian_Fa_Xin_She_Bao_Dao)因此，相當數量的市民開始意識到，他們并沒有從這些變化中得到足夠的利益。在當時懷疑一切的氣氛中，認為官僚和高級知識分子比一般老百姓得的好處多的觀點被廣泛接受了。之后，當局要“砸破鐵飯碗”以提高企業效率，解雇或開除那些素質不高和調皮搗蛋的工人，這些都使工人感到了威脅。

對于那些工作還沒有著落的年輕人來說，在這種形勢下，他們更是心急如焚。逐步停止“上山下鄉”運動，起碼使他們不再擔心會被流放到農村。但是大部分過去積極要求下放到農村的人仍然被困在那里，他們對自己的命運感到傷悲，當1978—1979年“民主運動”爆發的時候，他們中的一些人溜回城市并參加示威游行。即使那些能找到工作的年輕人也發現，他們大多數人都只能在集體或是新恢復的私營單位工作，這些工作大都收入微薄，沒有名氣，幾乎沒有福利，更談不上什么前途了。因此，一些年輕人雖然從農村返回了城市，但是在許多情況下因為不能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以實現自己的理想而感到悵然若失。由于被困在不體面的工作崗位上影響一個人的一生——不僅在收入方面，而且還在住房、找對象和其他方面——有些年輕人干脆拒絕接受給他們安排的工作而甘心待業，寄希望于最終能考上大學或是重新能被安排一個較好的工作。

改革后的學校制度，使大多數城市學生一心想上大學，然后在當時中國號召的“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中做一名備受尊重的專家。[[64]](#_64_Li_Ru__Yi_Wei_Dao_Zhong_Guo)但是，正在變化中的人口形勢，使得這種競爭比過去更加白熱化。1965年，超過40％的應屆高中畢業生都可以上大學（在1953—1956年曾達到100％），到70年代末，能夠順利上大學的不足4％。[[65]](#_65_Zui_Hou_Yi_Ge_Shu_Zi_Zhuan_Y)所以在毛澤東以后發生的變化恢復了一個清晰的機會結構，給人們以想象和希望，但只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希望而已。1979年以后，當局開始著手處理由此而帶來的問題，如把一些普通中學改成職業或技術學校，鼓勵父母提前退休以便讓自己的兒子或女兒接替。然而，如何安置大批失望了的城市中學畢業生（現在稱之為“待業青年”而不是“知識青年”或“社會青年”）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在70年代，市民們感到前途暗淡，也可以從另一個方面詮釋為什么官方的計劃生育政策能取得不同尋常的成功。這期間，在有的城市出生率下降到10‰。根據官方的說法，這個成功應該歸功于計劃生育運動本身。“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秩序使計劃生育政策受到挫折，1970年以后，這項政策逐步走向嚴格，每對夫婦只能生兩個小孩，并為實施該政策而建立了嚴格的獎罰制度，采取避孕措施有時甚至連婦女的月經期都受到了單位和鄰居的監視。但是官方的這種要求忽視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城市的出生率從60年代初就開始下降，到1971年已經降到很低的水平，此時官方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正出現方興未艾的勢頭。[[66]](#_66_Li_Ru__Can_Jian_Zhu_Di_En__B)由于人們對自己的孩子所面臨的未來茫然不可預見，再加上住房和日用消費品短缺，以及由于女性普遍都有工作而加重了撫養孩子的沉重負擔，使得限制只生兩個或只生一個孩子能被許多市民接受，因此，甚至在政府對他們提出這種要求之前他們就已經這樣做了。[[67]](#_67_Li_Ru__Gen_Ju_Dui_Zhong_Guo)

在任何復雜的經濟生活中，都存在這樣的難題：已有的物質產品和機遇與人們的愿望之間很難完全一致。而在中國，兩者之間的懸殊所帶來的后果，尤其令當局感到棘手。例如，長期被抑制的需求更刺激了愿望的增長，其增長速度之快使當局很難滿足其要求，原以為作了一些改善能使大家感激涕零的，但由于水漲船高的原因，人們感激的程度減少，甚至沒有了。另外，個人有了表達自己志向的新的機會，也可以傾吐自己的苦情和同情別人的遭遇；這樣市民就知道原來有如此眾多的人跟他們一樣都有被剝奪感。社會主義的性質使得這種情感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因為在這種制度下，國家就應該給人民提供更多的福利，所以當他們感到本應得到的被剝奪了的時候，他們就責備國家，而不去怨天尤人、嘆息自己命運欠佳或埋怨自己本領不濟或是其他什么“外部”因素。

最近的研究結果表明，愿望受挫本身并不能產生反抗或革命，但是由于人們備受挫折和對權貴們特權的不滿，要說服他們勤奮工作和馴服聽話就甚不容易了。今天，中國當局或許同意觀察家R.H.托尼在1932年所作的結論：“中國的政治勢力就像中國的河流一樣。河水對河堤的壓力已經很大，但卻看不見；只有等到洪水決堤的時候，才看到壓力何等之大。”[[68]](#_68_Zhuan_Yin_Zi_Ji_Er_Bo_Te__Lu)

對毛澤東以后政治領域的變化也可作與此相同的評論。政府試圖翻開新的一頁，從而使個人重新感到有了相對的安全，不再會成為政治犧牲品，相信政治機構的公平和效率，尊重共產黨和國家的權威。但是，這時期采取的一些變革在某種程度上恰恰起了相反作用。對當局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所實行的鎮壓和其他錯誤的揭露，不斷增長的言論自由和對政府公開的批評，這兩者結合在一起，使人們產生這樣的想法：中國的政治制度存在著腐敗，并在交流中發現不少人也贊成這樣的觀點。對中國政治采取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成為一股潮流，制定法規、整黨及新的規章制度和程序皆不能阻止這種潮流擴展。70年代后期和進人80年代以后，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普遍出現了當局陷入危機的跡象：政治性小冊子的發行量減少到最低限度，學生對要求他們上的政治課極其反感，在年輕人中進行的民意測驗顯示，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普遍產生懷疑，對權貴們的“特權”表示憤怒。邁克爾·林賽早在1950年就注意到，在中國政治中，兩種相互對立的傾向在交戰，“一方面是理性的思考，良好的管理和對普通人的尊重；另外一方面是盲目信奉教條，官僚主義，蔑視個人……中國發展的道路可能因哪一種傾向占主導地位而完全不同。”[[69]](#_69_Fan__De__Si_Pu_Lun_Ke_Deng)到1979年后期，許多市民遺憾地發現上述第二種傾向在中國政治中占了上風。

1979年之后，政府對這諸多問題的一個反應是再次處置持不同政見者——逮捕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取消了憲法中的“四大自由”，組織對那些偏離正統路線太遠的作家的批判。對有些市民來說，這些行動證明了當局更感興趣的與其說是對中國社會問題進行徹底反思，不如說是維護其對人民的控制。在這方面，由于1957年以來的變化，公眾對官方鎮壓措施的支持與反右運動時相比要弱得多，一部分市民不顧批評會受壓制的漫長歷史教訓，仍激烈地發表批評意見，這說明人們已經感到因發表不同政見而淪為政治的犧牲品的可能性似乎比過去小了。

政府試圖采取一系列措施，激發人們參與政治活動的熱情：召開工人代表大會，舉行無記名投票直接選舉地方和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以及其他方式。但是，在70年代發展起來的懷疑主義使許多城市居民不相信這些機構能擁有自主權，不相信黨能容忍敢坦率批評當局的人進這些崗位。由于市民們經歷了這些年來的許多事件，所以許多人都恢復了過去對政治的傳統觀點——政治是個不可預知的和危險的領域，必須盡可能地避免卷入。結果是政治氣氛發生了重要變化。市民急切地要求加人中國共產黨的人比以前少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人們競相表現自己的積極性，那些被認為在政治上“落后”的人常常處于遭受污辱的危險之中，而到了70年代末，感到孤獨和被人看不起的恰恰是這些積極分子。官方的政策幫助促成了這種局面：官方贊美專家們的貢獻和威脅要降那些文化水平低的干部的級。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又制造了一群心懷不滿的人——數以千計只憑政治積極性為自己贏得名聲，結果感到他們地位受到威脅的人。在80年代初，至少部分強調加強政治工作和“紅”的美德，也許對這些人從感情上來說是一個安慰。

植根于“文化大革命”的犯罪和青少年犯罪，到了后毛澤東時代還在延續，這使人們感到擔憂。的確，逐步結束城市青年上山下鄉計劃和允許滿腹牢騷的青年返城但又不能安排他們充分就業，可能又加重了城市犯罪問題。1979年以后，由于新的新聞政策允許對大的犯罪案情進行報道，加之對執行新刑法所作的廣泛宣傳，人們感覺到的犯罪危險或許比真正的犯罪率還高。人們留戀過去的好時光，那時候他們能在夜間獨自一人無憂無慮地散步，公共道德水準極高。在毛澤東以后時期，這種懷舊情感依然很強烈。

1976年之后，人們對文化生活和風俗習慣的傾向，總的來看大多數人采取了比較積極的態度。前10年對文學和藝術非常荒謬可笑的控制以及強行用刻板的社會主義清教徒式的習俗進行統一，不僅使文化生活不能滿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而且強迫市民取消了懷有情感的風俗習慣和行為方式。當種種限制在1976年稍稍放松之后，效果很大，變化明顯。新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層出不窮，雖然按國際標準還不夠大膽，但是顯然已經沖破了原來的條條框框。愛的感情，既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人也非十惡不赦的壞人，悲愴的結局——這些和其他因素都推動了中國文學多樣化的發展。書店、電影院和舞臺上開始出現斑斕的色彩——許多禁書和新作品問世。西方著作被允許引進的規模之大為過去30年所未見。外國的書籍被翻譯成中文，外國的電影和電視節目也可以公開上演，外國電臺的廣播也可以再次合法地收聽（雖然臺灣電臺和香港電視節目仍被排除在外）。對于城市群眾來說，實現由《紅色娘子軍》到《大西洋底來的人》（一部美國電視連續劇）的轉變是個令人驚嘆的變化。

被忽視了的單位里舉行的文化和娛樂生活也重新開始受到重視——學校課外活動豐富多彩，單位的聚會和社交活動增加，等等。宗教活動也開始被當局再次容忍，樸素的傳統節日慶祝活動也得到了恢復，有的家庭又重新養起了寵物，還有其他一系列曾被禁止了的民間活動都開始復活了。在家庭儀式方面，有的市民迫不及待地利用對自由主義放寬限制之機，在婚禮或喪葬時大肆揮霍浪費并舉行一些復古的儀式。總之，隨著人們從過去那種僵化死板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當時在社會生活和風俗習慣等方面出現了一種好像一切都“變活了”的趨勢，而且不出所料，這種轉變很快便會引起官方的注意，因為他們認為這種變化走得太遠了，官方勸阻舉行豪華的結婚筵席或效仿西式風尚及毛澤東以后時期出現的現象。自由化的趨勢并沒有擴展到所有的領域。如前所述，就在這個時期，老百姓傳統的多子多孫的愿望受到極其嚴格的限制，當局實行了獎罰分明的措施強制性推行一個家庭只能要一個孩子的政策。

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也受到廣泛的歡迎。一部分變化是人際之間那種極端偏執和小心謹慎情況有了緩和。偏執和謹慎是以往緊張的政治局勢造成的。但是，毛澤東以后時期的政策允許很多家庭把他們的子女從農村“領回來”；使大批被強制性工作安排而同其配偶分居的干部夫妻團聚，倆人并在同一個地方工作；大批曾被污辱的人得以平反昭雪，并可以著手修補被破壞了的親屬和朋友關系；那些在政治壓力下被迫離婚的夫婦破鏡重圓，甚至出現了一個復婚的小高潮。此時，在許多方面，市民們都可以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正在逐漸恢復接近正常狀況。當然，人與人相互接觸和聯系的恢復在某些情況下，起了使人們交流怨言和痛苦經歷的效果，對政府當局來說這種變化的含意就變得憂喜參半了。

在毛澤東以后時期，開始重新評價城市在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長期以來控制城市發展特別是控制大城市發展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雖然沒有系統發表城市人口的統計數字，但是很顯然，在共產黨統治下，城市發展的速度大大超過總人口增長的速度。1953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13％，1964年上升到18.4％，1982年上升到20.6％。[[70]](#_70_Zhe_Zhong_Bi_Jiao_Zhi_Shi_Yi)而且鑒于城市地區本身有特許權力的性質，如果不是那些年對農村流入城市移民的嚴格限制和把“過剩”的城市居民放逐到中國的農村地區的話，城市的發展速度一定還會更快。雖然有的城市如北京和武漢等發展迅速，但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人口增長速度還是受到了一定的控制，所以它的“老大哥地位”——它在城市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事實上下降了：1953年為8％，到1982年下降到4％。[[71]](#_71_Shi_Ji_Shang__Shang_Hai_Zhe)

然而，形勢的發展使人們越來越認清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對城市發展的控制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這些代價的一部分是幾年中成千上萬的人被迫離開城里家庭而產生的憤怒和痛心，以及那些最終返回了城市的人生活遭到的破壞。但是官方和政策也并沒有達到其促進城鄉結合的目的。到了70年代末，城市居民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同農民發生了很大的差異，這種差別比1949年之前要明顯得多。被剝奪了種種城市里才可能有的機會的農民常常對城里人抱著一種不滿和輕蔑的態度。[[72]](#_72_Zhi_De_Zhu_Yi_De_Shi__You_Yu)或許同樣重要的是毛澤東以后時期的領導人發現，中國的城市在刺激經濟發展和革新方面，沒有起到它們應該起到的促進作用。雖然這些領導人沒有拆除反對農民永久性向城市移民的障礙，但是他們采取了步驟加速城市企業的發展速度和創造力，稱贊大城市的主導作用，使許多中小型城市對其周圍的農村地區進行直接管理。這些措施表明，他們逐漸開始意識到，以前的政策防止了中國會像發生在第三世界其他地方很普遍的城市無計劃的蔓延和過度城市化等問題，或許由于同樣的原因，他們也阻礙了整個經濟的推動力，不僅僅損害了城市。究竟城市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應該起什么作用，仍將是今后有爭議的一個熱門課題。

## 結論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情況已經很明顯，創立一個有高度組織性的、平均主義的、艱苦樸素和生產性的城市社會的設想已出現了偏差，其結果是市民們遠非像當局希望的那樣都能夠積極參加和投身到建設之中。50年代成功地開創了一個新的城市形式，但是20年過去之后，人們不得不痛苦地對其錯誤進行重新評價，并努力尋找使城市擺脫困境的新答案（或恢復舊答案）。

中國在進入80年代之后，城市人口的情緒也不是千篇一律。多少年來世事和政策幾經巨變，使人們產生了不同的生活經驗，幾代人的經歷迥然不同，不同經歷的人對毛澤東以后時期城市的發展又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們無法在此對這些差異進行詳盡的分析，但是勾畫一個粗略輪廓還是可以一試的。[[73]](#_73_You_Guan_Nian_Qing_Ren_Zhong)

對于那些年過花甲的人，特別是那些已經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的人，他們有一種普遍的失落感，即他們的陽光日子到此結束了。他們中有的人能夠過著富裕悠閑的生活；也有的人回憶往事徒增傷悲，認為自己大部分才智在新社會里白白浪費了；還有些人則是苦了一輩子。進入80年代以后，四個現代化和未來對他們吸引力也不大，他們像其他社會里的老人一樣，只是從家庭和朋友那里得到一點簡單的樂趣，安度晚年。雖然很少有人能像傳統上大多數人孜孜以求的那樣無憂無慮地走完他們最后的路程——例如，他們大多數人得幫助兒女們照料孩子，做點家務，以便讓兒女們更專心致志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他們享受的社會保險和樂趣仍是很多的。大多數城市老年人都有退休金，享受公費醫療，同成年孩子中的一個生活在一起，由孩子照料并負責他們的后事。他們中大多數人仍然保持著與鄰居和以前的老同事的社交往來（政府對城市居民的居住和職業流動的限制加強了這種關系）。因此，盡管有許多例外，但總的來說，城市老年人和比他們年輕的人相比，傾向于安于現狀。通過下面一段這個年齡段的人對毛逝世的反應的敘述，可以印證我們以上提出的論點：

老人們總把現在跟過去相比，過去的（舊） 中國到處是疾病和饑饉、成群的乞丐和失業的游民。（現在）盡管供應不足，還有腐敗現象和政治上的不完善，但大多數老人都認為，毛主席的社會主義給他們帶來了比較好的生活。對他們許多人來說生活改善很小，但這關系不大。他們對毛充滿感激之情，當得知毛逝世的消息后，他們像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一樣悲痛欲絕。[[74]](#_74_Liang_Heng___Zhu_Di_Si__Xia)

80年代初，那些當時40—50歲的人，大多數是受所謂“輝煌歲月綜合征”影響的一代人。他們大多數人在1949年后不久就走向成熟并開始工作，并且被卷入到這個時期樂觀主義的洪流之中。當時他們認為新政府殘酷無情，要求嚴厲，但是這個政府創立了一個比較好的社會，并為人民帶來了比過去好的生活。他們為當局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并使自己的理想服從于國家大目標；但是現在許多人感到幻想破滅了。他們現在置身的社會，并不是他們當年努力工作而為之奮斗的社會，他們為發生的錯誤感到痛苦。他們這代人中許多人也感到憤憤不平和失望，但同時，大多數人并沒有與這種制度一刀兩斷。風華正茂時代不平凡的經歷，又使他們對過去懷有深深的眷戀，他們思念過去的一切并想著什么是本應該發生的事情。因此，雖然他們對現在的趨勢和官方的說法抱著懷疑的態度，但是許多這個年齡段的人仍然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75]](#_75_Yue_Han__He_Xi_Dui_Xu_Duo_Ta)

在80年代初，那些三十來歲的人對各種問題的看法則有點不同，尤其是那些紅衛兵出身的人更是如此。同樣，他們也是在一個充滿樂觀主義和革命熱情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雖然比起其兄姐來，他們經歷了一場更為激烈的競爭。由于他們難忘早年的樂觀主義和信念，他們1966年以后的生活現實卻是對他們最無情的打擊——派系間的暴力沖突，農村的流放生活，在受教育和婚姻方面的失望，以及最終雖返回城市卻干的是城市里最沒有地位的工作。他們這些人普遍感到被人欺騙了，進而對他們生活中的制度采取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并敢于批判這種制度。盡管其中有一些人的運氣不錯——上了大學或是在國營單位里有份有保障的工作——但對這制度也敬而遠之。1974年著名的李一哲在大字報上發表的一席話，或許是對他們這種情感的最生動的表述：“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兇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臉上留著爪痕，不是漂亮人物。”[[76]](#_76_Yin_Zi_Lin_Yi_Tang__Yin__Sou)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結束學業的年輕人又展示了另外一幅不同的畫面。他們在被破壞了的教育制度和經常發生運動的經歷中，與比他們歲數大的那批人不同，他們沒有被灌輸進去多少樂觀主義和信念之類的東西，況且那年頭不斷變化的標準和不可預見的事情的發生，使他們中許多人學會了對競爭對手進行恫嚇和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擇手段。由于這個年齡段的人起初的愿望就不太高，因此，他們的失落感和不滿與那些歲數較大的人相比就明顯要少一些。但與此同時，政治口號對他們來說已經沒有什么感召力了，他們中的許多人對獲得消費品和在某種程度上異乎尋常的生活方式更有興趣，他們的表現使那些歲數大一點的人感到震驚。這些年輕人中許多人對政治漠不關心，與其去抗議，不如躲得遠些。[[77]](#_77_He_Xi____Yi_Ge_Wei_Bei_Bu_De)

最年輕的市民，是那些在80年代仍在學校讀書的學生——政府努力通過重新建立各種規章制度、加強組織紀律性和灌輸道德教育等方式“撥亂反正”，給學生提供更多的可以達到的目標和機會。這種努力將會取得多大的成功，政府將如何為他們成年后提供更好的生活才能滿足這一代人的期望，尚未可知，仍有待于觀察。

在“文化大革命”后對過去的30年重新評價時，首先一個問題便是過去到底錯在哪里，一般人分析認為，應該譴責激進分子，特別是毛澤東，因為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和在此之前的其他錯誤導向的運動），破壞了人們正常的生活，摧毀了人們的希望。通過對以往城市狀況的回憶，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分析實在是過于簡單了。推動或是打擊了公眾對于政治制度熱情的因素是非常復雜的，而非這種觀點所能一言以蔽之的。

1949年后，在相當廣的范圍內，當局設想以加強組織制度的密度和對理想信念的灌輸為出發點，就能成功地解決城市問題。這種假設忽視了這樣的事實：人們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志向構成對政府當局的不同反應。1949年初的中國城市居民已經不是“一窮二白”、準備吞噬領導意志的大眾了，他們抱著具有悠久歷史的價值觀念和志趣，這些價值觀念和志趣使他們對新制度抱有各種期望，其中包括希望國家強盛和政治穩定、經濟有保障、平等和機會；關心控制犯罪、賣淫和其他社會罪惡；急切希望政治上獲得安全和信任；希望能有豐富的文化和娛樂消遣活動；渴望有良好的環境，使他們能完成和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密切關系。在50年代形成的相當高度的樂觀主義態度和信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人們普遍認為，這些愿望在1949年以后實現的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充分得多。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新政府采取了大量的行動和計劃的結果。后來這種美好感情給破壞了，同樣是因為人們日益感到這些理想不再可能實現了，日益感到政府的做法應當受到責備。

然而，這種感情的變化，不純粹是激進政策和錯誤導向的運動的產物。其中導致這些變化的有些因素，諸如不斷增長的人口問題和官僚結構老化問題，都是在樂觀的50年代發生的事件觸動下長期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其他有問題的政策——例如凍結工資或限制人口流動——也不單純是激進的運動刺激的結果。另外，有些激進的事雖被毛澤東以后時期的領導人譴責了，但在當時還是很得人心的——例如，1957年對右派的鎮壓，“大躍進”初期的總動員以及“文化大革命”對官僚特權的打擊。

此外，認為50年代公眾對政府的支持到80年代完全消失了的觀點有失偏頗。盡管在早些年，許多城市居民歷經了苦難和生活沒有保障，但是支持政府的強大力量仍然存在。一部分原因是中國有對統治者表示尊敬的傳統，對新政府也抱一定程度的“假定政府是無辜”的希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千百萬的城市居民——特別是在干部和體力勞動者中——認為雖然遇到了不少困難，但由于革命，他們的生活好多了，比以前更有保障了，他們依舊希望帶來這些改善的政治制度能處理好中國的新問題。那些享受公費醫療、購買新電視機、看著他們的鄰居組織起來打掃衛生消滅蒼蠅，或是安排他們的子女接自己班的城市居民仍念念不忘社會主義給他們帶來的好處。

最后，還有一個對當局支持的主要力量同其他力量一樣還沒有受到侵蝕——對國家的強大和獨立自主感到驕傲。在許多方面，80年代世界舞臺上的中國，與50年代相比，她更強大更有力量，中國人一個世紀以來念念不忘國家所蒙受的奇恥大辱和被出賣的歷史，作為后代，他們對中國強盛的每個跡象都感到由衷的自豪；無論是其駐聯合國代表富有成效的演講，還是外國元首懷著尊敬的心情到北京朝圣，或是中國人在國際排球錦標賽上取得勝利（與此相反的另外一面，則是做中國人的羞恥感和潛在的社會不安定因素。當中國人感到中國的一些決策失誤或被外國污辱時，他們感到羞恥）。

也應該注意的其他一些方面是，在中國政治的激進階段，人們的民族自豪感比其他溫和階段都要強烈。例如，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中國進行了成功的（普遍看法是這樣）反蘇斗爭，結束了外交孤立狀況，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大批的外國領導人——從理查德·尼克松到其他第三世界革命家——訪問中國。毛澤東以后時期，中國仍然相對落后于其他東亞發展中國家，而且越來越明顯；中國失去了對柬埔寨的庇護；同越南人進行了一場被認為是比較不成功的邊境戰斗；整個國家又陷人新的來訪者浪潮中，來訪的外國人不再是來尋求革命的真理，而是來要中國讓步、從中國攫取利益的（這是自革命以來從不曾允許的）。[[78]](#_78_Wai_Guo_Ren_Huo_De_De_Xin_De)如果強烈的愛國主義仍是人們支持政府的關鍵因素，那么將中國向世界開放的政策就會使當局恢復公眾對它支持的努力遭到破壞。

后毛澤東時期的領導人所面臨的問題，是“所有中國共產黨的臣民”展現出來的、一旦被破壞就難以再修復的問題。他們要重建50年代的樂觀主義精神和贏得公眾的支持。但是，那時賴以產生這種氣氛的條件已經不可能再恢復了——受教育的人不多，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官僚機構并配備相應的工作人員，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結束不久，人們記憶猶新等等——因此即使恢復以前政策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的。無論是加強組織紀律性還是進行新的思想教育運動，亦都將于事無補。只有在更廣泛的領域里，想法滿足城市居民的基本價值和需求，才有可能克服革命成功以來的三十多年中積累下來的各種危機。這種努力在90年代和以后更長的時期，將是一場對中國的精英們的技能的挑戰。

[[1]](#_1_9)這一章使用了多種有關城市生活的資料。首先是通過對幾個現已離開中國到香港的人采訪得到了最初的印象，特別是通過最近出版的一本由馬丁·金·懷特和威廉·L.帕里什寫的專題著作《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其次，獲益于一些個人出版的著作，其中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他們在過去的30年中曾生活在城市地區。以后，在合適的地方將引用他們的資料。另外還有一些補充材料，如中國的報紙、短篇小說、劇本和有關中國的第二手文學作品。在這章里論述的許多問題上，幾個資料看法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少觀點是憑印象得出的和有爭論的。作者感謝夏威夷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在他們的幫助下，作者才得以完成本章的寫作。同時，也感謝斯蒂芬·烏哈利、唐納德·克萊因——以及與我一起完成以后各卷的作者，感謝他們提出修改意見，但不是所有意見皆能吸收的。

[[2]](#_2_9)中國跟許多殖民地社會不同，城市人口不是集中在以發展對外貿易為主的沿海港口城市，中國中小型城市分布得相當均衡。通商口岸條約時代確是不合比例地產生了這些以外貿為主的城市，特別是像上海這樣的城市，因而中國共產黨希望調整這種狀況。參見克利夫頓·潘內爾《現代中國城市發展》，第91—113頁。據1953年人口普查表明，有13.2％的中國人口為城市居民，其中有不到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其最大的城市上海。（低收入國家的典型數字在大約20％—40％之間。）參閱莫里斯·厄爾曼“大陸中國的城市（1953—1959）”，載杰拉爾德·布里斯編《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第81—103頁。

[[3]](#_3_9)馬克·坦南：《無密可保》，第64頁。

[[4]](#_4_9)羅伯特·吉萊恩在與奧托·范·德·斯普倫克和邁克爾·林賽合著的《新中國：三家說》中使用了這個詞，見第84頁。

[[5]](#_5_9)對滅狗事件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包括環境衛生問題、狗攜帶病菌和喂狗浪費糧食以及堵住狗嘴滿足人類等。后來，養狗又蔚然成風，導致了1983年在北京進行了新的滅狗戰役。

[[6]](#_6_9)德克·博德：《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第235頁。

[[7]](#_7_9)威廉·休厄爾：《我在中國的日子》，第100頁。

[[8]](#_8_9)同上書，第107頁。政權的變化事實上并未給學生生活帶來多大的改變，在瑪利亞·嚴（音）的《宏大的園地：紅色中國學生生活寫照》中可以看出，新政權對改變學生生活明顯缺乏熱情。盡管如此，通過嚴的敘述（主要是北京大學），人們還是不難發現，大多數學生對給他們提出的要求的反應是充滿熱情的。

[[9]](#_9_9)戴維·米德爾迪奇，轉引自諾埃爾·巴伯《上海的陷落》，第159頁。

[[10]](#_10_9)轉引自拉爾夫·拉普伍德和南希·拉普伍德《中國革命縱覽》，第69頁。

[[11]](#_11_9)轉引自拉爾夫·拉普伍德、南希·拉普伍德《中國革命縱覽》，第124頁。

[[12]](#_12_9)范·德·斯普倫克等：《新中國：三家說》，第8頁。

[[13]](#_13_9)拉普伍德：《中國革命縱覽》，第61頁。

[[14]](#_14_9)劉少通：《走出紅色中國》，第109頁；參見埃斯特·周英《紅色中國鄉下的灰姑娘》。

[[15]](#_15_9)對這些早期的整風運動見弗雷德里克·C.泰維斯的《中國精英人物的訓練：整風的強迫與說服的方法（1950—1953）》。

[[16]](#_16_9)有關此類事件的敘述，如1951年的廣州事件，見坦南《無密可保》，第26頁。在土海，發生了天主教徒反對強制性同梵蒂岡斷絕關系的抗議，在其他地方一直持續到1960年。

[[17]](#_17_9)弗蘭克·莫里斯：《毛的中國的報告》，第170頁。

[[18]](#_18_9)有關這部分生動的描寫，請參閱米哈伊爾·克洛奇科《在紅色中國的蘇聯科學家》。

[[19]](#_19_9)埃里克·喬：《男人必須選擇》，第223頁。“無產階級的王子”的說法也來源于上書，第234頁。

[[20]](#_20_9)關于咖啡的價格，參見巴伯《上海的陷落》，第134頁。看門人的工資，參見休厄爾《我在中國的日子》，第38頁。

[[21]](#_21_9)有人作過估計，在1949—1957年，有2000多萬或更多的農民流入城市。參見小野家悅造：“中國城市人口地區分布”，《發展中的經濟》第8卷第1期（1970年），第92—122頁。最近的中國統計數字表明，這幾年有1850萬流動人口。參見張澤厚、陳玉昆：“人口結構和經濟發展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轉引自利奧·奧林斯：“中國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響”，載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四個現代化下的中國》第1卷，第279頁。

[[22]](#_22_9)一位西方人曾努力核實官方的報道，說城市生活水平即使與30年代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參見布魯斯·雷諾茲：“上海產業工人生活水平的變化（1930—1973）”，載于克里斯托夫·豪編《上海：一個亞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發展》。

[[23]](#_23_9)據1982年公布的數字表明，每個農民平均居住面積為10平方米。（參見《北京周報》1982年第20期，第8頁。）幾年前的1978年，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只有3.6平方米。參見周京：“九億中國人的住房”，載《北京周報》1979年第48期，第18頁。

[[24]](#_24_9)根據羅伯特·泰勒：《中國的教育與大學招生政策（1949—1971）》，第3頁。從1953年到1956年，大學里實際可容納的學生人數高于應屆高中畢業生15％。

[[25]](#_25_9)“資產階級”的孩子在“文化革命”中繼續得到好處的事例，參見懷特、帕里什《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第3章。

[[26]](#_26_9)關于這個漸進的變化，在雪莉·伍德的《中國的一條街道》中有生動的描述。

[[27]](#_27_9)無名氏觀察家引自羅伯特·吉萊恩《六億中國人》，第295頁。這位觀察家描述了居民委員會如何確定生育名額、做說服工作和“監視那些已婚夫婦”，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前身）在農村如何分配避孕用具和如何在農業生產計劃的基礎上增加再生產的任務。所有這些說法在70年代都靈驗了。

[[28]](#_28_9)休厄爾：《我在中國的日子》，第53—54頁。

[[29]](#_29_8)對中國在1949—1952年槍斃人數有各種各樣的估計，出入較大（沒有單獨城市槍斃人數的估計數字，農村土改運動中槍殺的人數較多）。有人認為數萬人（拉普伍德：《中國革命縱覽》，第146頁）；有的認為有80萬人（到1953年，出自一篇未公開發表的毛澤東1957年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轉引自《紐約時報》1957年6月13日，第8頁）；還有一說是200萬（莫里斯·邁斯納：《毛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第81頁）；有500萬之說（雅克·吉勒馬：《執政的中國共產黨（1949 1976）》，第24頁）；更有1500萬或更多之說（坦南：《無密可保》，第159頁；理查德·L.沃克：《人類的代價——共產主義在中國》，給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國內安全小組的報告，第16頁）。

[[30]](#_30_8)雪莉·伍德在《中國的一條街道》第107—108頁中提到，“在上海，幾乎每個人都說，解放后，他們曾同那些被鎮壓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多少都有點關系，政府對‘反革命’的鎮壓……使一部分人陷入驚恐之中”。

[[31]](#_31_8)在此期間，一位曾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印度人稱，該社的500名職工中，有30個被劃成右派，有四五個嚴重的人被劃成反革命分子。參見奧姆·普拉卡什·曼徹《在毛的中國的五年》，第31頁。在北京大學，有500名學生和100名教職員工被劃成右派。這個數字超過了整個大學總人數的7％。樂黛云（音）、卡羅林·韋克曼：《走進暴風雨：奧德賽——一位中國革命婦女》，第102—103頁。

[[32]](#_32_8)穆富勝：《百花運動的衰落：毛統治下的知識分子》，第173頁。另見莫里斯·威爾斯《叛徒：一個美國人在共產黨中國的12年》，第100頁。

[[33]](#_33_8)1949年以后，每年都要或多或少地進行消滅蒼蠅和其他害蟲的運動，但是1958年達到空前的規模。當然，隨之而來的便是由于消滅了太多的麻雀而造成的災難——昆蟲猖獗到無法控制的地步。所以臭蟲取代了麻雀成為被列為消滅的主要害蟲。一位頗有名氣的中國大夫曾告訴外國人，1949年前后城市最驚人的變化是1949年后徹底消滅了蒼蠅。參見威廉·凱森編《在中國的童年》，第189頁。

[[34]](#_34_8)參見小野家悅造：“中國城市人口地區分布”，第93—127頁。

[[35]](#_35_8)見張春橋的文章，載《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

[[36]](#_36_8)董志平（音）、漢弗萊·埃文斯：《思想革命》，第43頁；包柏漪：《第八個月亮》，第57頁。

[[37]](#_37_8)威爾斯：《叛徒》，第103頁。

[[38]](#_38_8)梁恒、朱迪思·夏皮羅：《文革之子》，第17頁。

[[39]](#_39_8)包柏漪：《第八個月亮》，第75—76頁。作者把她的籃子放到路邊，然后回家睡覺，六點再起來返回路邊等待。在路邊放個空籃子，不用去照看，就算是排隊占了位置，可見當地社會秩序還是很好的，有些人記述了這個時期的一些極端的做法，例如，北京的學生被迫吃春天的樹芽充饑。見斯文·林奎斯特《危機中的中國》。

[[40]](#_40_8)梁恒、朱迪思·夏皮羅：《文革之子》，第17頁。

[[41]](#_41_8)威爾斯：《叛徒》，第94頁。另見伊曼紐爾·約翰·赫維《在中國的一個非洲學生》，第79頁。

[[42]](#_42_8)這個數字見曾志先（音）：“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就業問題”，轉引自一篇未發表的論文，見奧林斯的“中國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響”，第279頁。

[[43]](#_43_8)克洛奇科：《在紅色中國的蘇聯科學家》，第211—212頁。

[[44]](#_44_8)斯文·林奎斯特使用了“日環食”這個詞語來概括三年困難時期的情緒，表達了中國人的普遍感覺，太陽（即好時光）將會再次到來，人民可以期待并計劃未來的普遍的感情。見他的《危機中的中國》，第35、116頁。

[[45]](#_45_8)雷鋒是一個普通的士兵，他死于一次事故。他死后留下了一本日記，記錄了他為其他戰友所做的好事和他對毛主席的忠誠。1963年以后，他的行為成為學生和其他人效仿的榜樣，他成為最受官方推崇的英雄。雷鋒的日記在他死后，似乎至少有一部分已出版。參見威爾斯《叛徒》，第127頁。

[[46]](#_46_8)數字引自斯坦利·羅森：“中國教育改革的障礙”，載《現代中國》第8卷第1期（1982年1月），第11頁。

[[47]](#_47_8)這個時期的教育情況，請參見蘇珊·舍克《競爭的同志：中國的職業性刺激與學生的策略》；喬納森·昂格爾：《毛統治下的教育：廣州學校中的階級與競爭（1960—1980）》；羅森：“中國教育改革的障礙”。

[[48]](#_48_8)包柏漪：《第八個月亮》，第71頁。

[[49]](#_49_8)參見李翔云（音）《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本卷第2、4章。

[[50]](#_50_8)參見安妮塔·詹、斯坦利·羅森、喬納森·昂格爾：“學生與階級斗爭：廣州紅衛兵沖突的社會根源”，引自《中國季刊》第83期（1980年9月），第397—446頁；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戴維·拉道克：《中國青少年的政治行為》。

[[51]](#_51_8)例見馬克·布里奇、戈登·懷特《當代中國的微型政治：對一技術單位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情況的分析》。

[[52]](#_52_8)一些中國資料表明，有將近1億人程度不同地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我們自己的研究結果則認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城市地區由于政治問題而在運動中受到沖擊的人超出總人口的5％。參見懷特、帕里什《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第9章。

[[53]](#_53_8)中國的資料表明，在1966—1976年，有1300萬城市人口被以這種方式下放到農村。參見卡姆·溫·詹、徐學強（音）：“1949年以來中國的城市人口增長和城市化：重建基數”，《中國季刊》第104期（1985年12月），第606頁。

[[54]](#_54_7)魯思·埃厄恩肖·洛和凱瑟琳·金德曼：《在外國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位美國女人在中國》，第209、283—284頁。

[[55]](#_55_7)貝弗利·胡珀：《北京內幕：一個人的報告》，第78頁。

[[56]](#_56_7)一份在1978年對中國的192個大城市的調查報告中指出，每個城市的住房面積在1949年以后下降了20％——每人從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參見周：“九億中國人的住房問題”，第8頁。其他一些材料以1952年為例，說那時人均占有住房面積仍有4.5平方米，參見周叔蓮和林森木：“談談住房問題”，《人民日報》1980年8月5日，第5版。

[[57]](#_57_7)對這種平均分配努力的效果，在懷特和帕里什的書中有詳細描述。參見《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第3—4章。

[[58]](#_58_7)應該記住平等與公平之間的區別。平等是分配方面的絕對差異。但是公平是指人們是否得到應該得到的東西（按當時的標準的水平）。這樣，一個比較平等的分配制度可能被認為是更公平的，也有可能是不公平的。

[[59]](#_59_7)一個生動的百名被放逐的紅衛兵的名單被譯在《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1970年春夏季號）第215—217頁上（材料來源于1965年9月北京的一份紅衛兵文件）。

[[60]](#_60_7)克勞迪·布羅耶利、杰奎斯·布羅耶利和伊夫林·奇爾哈特：《重新看中國》，第204頁。可能在1952年已經提到，拉弗爾·拉普伍德曾贊許地提到此事（參見《中國革命縱覽》，第81頁）。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學校的學生在早晨要向孫中山的畫像鞠躬，新政權沒有對毛澤東采用這種崇拜儀式。

[[61]](#_61_7)這種差異的詳細情況，請參見馬丁·金·懷特：“當代中國的城鎮”，載《當代城市研究》1983年第10期，第9—20頁。有關1949年以來農民和城市居民之間隔閡的詳細情況，請參見蘇拉米斯·海因斯·波特：“現代中國社會秩序中農民的地位”，載《現代中國》1983年第9期，第465—499頁。

[[62]](#_62_7)伍德：《中國的一條街道》，第149頁。

[[63]](#_63_7)參見法新社報道，北京，1979年2月4日，載外國廣播信息處《中國動態》1979年2月6月。

[[64]](#_64_7)例如，一位到中國訪問的人在觀看一場音樂演出的時候，發現女主角用歌詞表達了她希望把她紅色的花朵敬獻給的人：“多少年來我們贊美工人和農民而忽視了科學家，我留著這些，準備獻給那些努力學習將來成為科學家的孩子。他將領導中國的現代化。”W.E.加勒特：“中國著名景點”，載《國家地理》1979年第156期，第548—549頁。

[[65]](#_65_7)最后一個數字轉引自羅森：“教育改革的障礙”，第11頁。

[[66]](#_66_7)例如，參見朱迪恩·班尼斯特提供的關于上海的統計數字：“上海的人口死亡率、出生率和避孕措施”，載《中國季刊》第70期（1977年6月），第268頁。整個國家的情況，請查閱安斯利·J.科爾《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1952—1982）》，第5頁。

[[67]](#_67_6)例如，根據對中國兩個城市市民時間的安排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夫婦每天在家務活方面花費的時間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家庭要多。另外，在家務活上花費的時間與孩子多成正比——沒有孩子的婦女平均每天花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為3.4個小時；有一個孩子的婦女每天要花費4.3個小時；有兩個孩子的婦女則要花費4.7個小時。參見王雅林、李金榮：“城市職工家務勞動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1期，第177—190頁。

[[68]](#_68_6)轉引自吉爾伯特·羅茲曼編：《中國的現代化》，第310頁。

[[69]](#_69_6)范·德·斯普倫克等：《新中國：三家說》，第130頁。

[[70]](#_70_6)這種比較只是一個近似的比較，因為城市人口的確切統計數字隨時都在發生變化，城市的疆界也在變化之中（雖然這些關于城市地區的數字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但是它并沒有把城市周圍的縣級地區算進去）。這里的數字均來源于厄爾曼：“大陸中國的城市（1953—1959）”，第81—103頁；《北京周報》1982年第45期，第21頁。

[[71]](#_71_6)實際上，上海這個中國最大城市的人口隨時都在波動——從1949年的440萬人增加到1953年的620萬人；1958年達到720萬人；1971年降為570萬人；1982年則又增加到630萬人。參見班尼斯特《上海的人口死亡率、出生率和避孕措施》，第259—260頁。另見《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數字》，第14—15頁。顯而易見，這些城市的人口統計數字有時會使人誤入歧途，因為他們忽視了相當一大批在六七十年代進入城市干“臨時工”的農村人。在80年代，這些為數眾多的沒有戶口的農村人住在城市里，往往一呆就是很長時期，現在已經成為官方討論的一個潛在問題。

[[72]](#_72_6)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79年糧食收購價格上漲和農村組織和政策自由化，長期以來形成的趨勢扭轉了，至少暫時扭轉了。農民的收入和消費額在1979—1984年的增長速度比同期城市居民的要快。

[[73]](#_73_6)有關年輕人中年齡的差異問題，請參見托馬斯·B.戈爾德：“中國的年輕人：問題和計劃”，載《問題和研究》1982年第18卷第8期，第39—62頁。目前的討論受到了戈爾德文章的影響。

[[74]](#_74_6)梁恒、朱迪思·夏皮羅：《文革之子》，第263頁。

[[75]](#_75_6)約翰·赫西對許多他在中國遇到的老一代知識分子所表現出來的“衷心地向往中國光明的前途”感到吃驚。參見“一個未被捕的記者：回到家鄉”第3部分，載《紐約人》1982年5月24日，第61頁。反映這種感情的有關個人的敘述，請參見樂黛云和韋克曼《走進暴風雨》

[[76]](#_76_6)引自林一堂（音）搜集的《他們如是說：當前中國的地下出版物》第17卷。

[[77]](#_77_6)赫西（《一個未被捕的記者》，第65頁）把這些人描繪成具有“平淡無奇的、拐彎抹角的、冷嘲熱諷的和乳臭未干的”特點。

[[78]](#_78_6)外國人獲得的新的利益，不僅是可以在中國直接投資和大批外國人進人中國，而且還將著名的海濱避暑勝地北戴河工人休息的地方變成了接待外國人的賓館。1978年以后，在報紙上可以看到一些對新的開放政策表示反對的爭論：例如，19世紀西方化的中國人是好還是壞；指控由于外國的影響而使犯罪增加；偶爾還發生了一些更強烈的事件——中國人毆打外國游客或向外國游客臉上吐唾沫。請參見加勒特：“中國著名景點”，第552頁。在80年代中期，在北京和其他城市曾發生了嚴重的騷亂事件，起因于在一場足球比賽中中國隊輸給了香港隊以及在中國市場上被認為是不符合國際標準的日本商品泛濫成災。

## 第十一章 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文學

## 社會主義文學的建立，1949—1956年

#### 文學創作的組織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約三個月之前，有650名代表參加的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_1_Can_Kan___Liu_Shi_Nian_Wen_Yi)毛澤東、周恩來及其他國家領導人出席了會議，這顯示了他們對發展新型的社會主義文化和建立必要的指導機構的高度重視。這一組織后來（1953年）被命名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所有的文化活動都由這一組織協調。這個聯合會成立40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即1966—1976年中斷了10年）以來，共創設了10個分支機構，其中包括：作家協會（成員包括小說家和詩人）；戲劇家協會（因為它也吸收演員和劇作家，所以是最大的協會）；此外還有電影家、舞蹈家、美術家、曲藝家、民間藝人、兒童文學家和雜技家協會（最后一個協會直到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會才成立）。

盡管中國文聯在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1949年、1953年、1960年和1979年）負責全盤工作，但作家協會對新文學的指導和發展工作起了核心作用。該機構最早可追溯到老舍、郭沫若和其他優秀作家在1937年成立的一個愛國文藝團體（“抗戰文協”——譯者）。現在它為作家們提供了一個講壇，經常在全國各地舉行討論會。對文學、藝術理論和政策的研討，可以發表在中國文聯出版的《文藝報》上。中國作協也創辦了像《人民文學》這樣的一流雜志，發表代表國家水平的創造性作品。作協還制定刊物的編輯方針，開展與其他國家的作家、學者的交流活動，幫助和扶持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作家，派他們去有關單位搜集素材，為他們提供出差條件，等等。

1949年，中國文聯的首任主席是詩人兼劇作家郭沫若（1892—1978年），他出任此職直到去世。其后由第一副主席、小說家茅盾（1896—1981年）繼任。他死后由早年的第二副主席、評論家周揚（1908年— ）接任。

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的一個主要報告中，[[2]](#_2_Zhou_Yang___Xin_De_Ren_Min_De)周揚把作家們在解放區所取得的成就稱為“一個偉大的開端”，這是他引用毛澤東在1942年5月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話。周反復強調毛的主要觀點：文學藝術既是打擊階級敵人的武器，又是社會主義者建設國家的工具；應向廣大工人、農民和士兵提供“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作品；為了滿足這些要求，作家或藝術家有責任“消除與人民大眾的覺悟之間存在的差距，使自己成為群眾的一員”。藝術家必須具有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的立場觀點，必須歌頌他們的勞動和斗爭，并教育他們。藝術標準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像國家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樣，必須優先考慮文藝的政治標準。

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華北地區迅速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文學面貌。周揚在報告中用統計數字宣布了作家們的創作情況：在創作的177篇新作品中，101篇涉及戰爭題材，41篇反映農民生活，只有16篇描寫工業生產（現在這應該走在前列）。

周揚的報告還提到，這些作品的作者們已經成功地擺脫了“五四運動”時期知識分子的狹窄道路，首先使用了大眾語言。這方面趙樹理（1906—1970年）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但是，個別成就若與民間文化形式的藝術覺醒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扭秧歌”（一個新歌劇，唱腔以“插秧歌”旋律為基礎）和民間小曲，都是民間藝人喜歡的形式。新年來臨時，他們在村莊、部隊駐地或工廠表演，能即興發揮，創造出新的表現方式。

對已取得的成就給予適當的表揚之后，就該提醒今后如何進行了。傳統歌劇形式大受歡迎實是一個威脅：不健康的價值觀和習俗要頑固存在下去。戲劇改革必須著手進行。作家們必須創造出新形式來歌頌逐漸涌現的社會主義新人（男人和女人）的形象，使得文學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在趣味性和感染力方面不再超過正面人物。盡管必須提高創作和評論的水平——“我們還是不能忽視農村”——因為根本任務還是要為一向渴求文化的人提供大眾的文學和藝術。為此，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指示全國主要城市組建作家、藝術家分支機構，僅僅數月，不少于40個作家、藝術家的組織便成立了。

第一次文代會的主題之一是對戰爭年月在上海或重慶度過、迄今還不是延安共產黨機構中一員的作家們表示歡迎，歡迎他們參加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行列里來。然而這些男女作家們幾乎沒有人認為新的文藝方針適合于創工作。身兼作協主席的文化部長茅盾，放棄小說創作，而當文學評論家，評價每一批小說技術上的成就，對人物塑造和寫作風格提出意見。巴金（1904— ）1949年以后再沒有寫出新的優秀小說，而只寫了幾篇關于朝鮮戰爭的作品，使用了太多的夸張手法，以至于讀起來毫不真實。沈從文（1903年— ）處于矛盾之中，以前他寫的農民生活的小說極其生動，無人出于其右，但是，他對新時代的農村卻生疏了，不能按照要求去歌頌社會主義農村的改造。終于，沈從文找到了一個新的角色。從事對中國古代紡織品和服飾的研究；有關這方面的著述到了70年代后期才得以問世。而直到1981年，評論家才重新肯定沈從文那些四五十年前寫的小說。

#### 詩歌

許多早已成名的詩人，戰時和戰后是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度過的，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他們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與新時代的精神相一致。其中最突出的是郭沫若。他在50年代出版了幾本新詩集。郭沫若恢復了30年前曾使他詩名陡增的熱情奔放的特有的頓呼法風格，昂揚亢奮地贊美新時代的各種成就和期望：比如水庫、橋梁、周恩來萬隆會議的成功以及英國在蘇伊士危機時的惡劣表現，等等。郭沫若的詩作過于簡單膚淺，而且越來越變得感情外露。《百花齊放》（1958年）是他近年來詩歌創作中這方面毛病最明顯的例子，那時正是“大躍時”時期，“反右運動”已使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方針百無一用。此后，郭沫若除了偶爾和毛等國家領導人友好應對時寫點古典格律詩外，很少寫詩。馮至（1905年— ）早在1941年就以富有哲理靈性的“十四行詩”而聞名，這些恬靜的沉吟風格與新時代的喧囂很難協調一致，他便通過描述那些土改工作中涌現的民間傳奇和日常生活中的短小抒情詩，尋求新的表現手法。當他把自己和礦井的鉆機融為一體的時候，偶然間，一個新的強有力的隱喻誕生了：一個全新的工業經濟萌芽的心臟和地表上的人們的心臟何等相似：

山溝里的溪水日日夜夜地流，

鐵軌上的煤車日日夜夜地運行，

一百五十公尺下的煤層里，

電鉆的聲音日夜不停。

溪水兩岸是一片歡騰的市聲，

到處是婦女的笑語、兒童的歌唱，

可是人們聽不見地下的電鉆，

像是聽不見自身內跳動的心臟。[[3]](#_3_Feng_Zhi___Mei_Kuang_Qu___Xua)

在40年代沒有哪位詩人能比臧克家（1905年— ）更尖刻地公開鞭答社會的不公正。[[4]](#_4_Can_Kan_Zuo_Zhe_De__Ling_Du_S)盡管臧克家也寫頌歌，但50年代他的詩仍然回溯過去，控訴舊社會的黑暗。比如他那首《有的人》把最偉大的諷刺作家魯迅和那些“為了自己活就不能讓別人活”的人作對比。袁水拍（1919—1982年）的《馬凡陀山歌》鞭撻內戰期間的國民黨人，同時，這些詩也保持了他的諷刺性的詩體。但是，后來袁水拍的目標轉向了海外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者對新生共和國的敵視。

像卞之琳（1910年— ）和何其芳（1912—1977年）這樣有成就的詩人，在1949年后主要轉向文學研究與文學評論，只是偶爾動筆寫詩。何其芳是一個來自解放區的有聲望的作家，地位顯赫。他1954年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復強調繼承30年代現代詩的形式和格律的必要性。那些正處在自由體和民歌體之間猶豫不決的詩人們受到文章的激勵，紛紛進行“自由體四行詩”和其他形式的探索，這些形式通常都是押韻的。

與這些人相比，艾青（1910年— ）50年代已成為一個很活躍的新人，他出訪并贊美蘇聯，哀挽廣島悲劇，還把維也納比作：

像一個患了風濕癥的少婦，

面貌清秀而四肢癱瘓。[[5]](#_5_Jie_Xuan_Zi_Zhang_Zhong_Deng)

還寫了他所出訪過的拉丁美洲國家革命初期的熱情。新中國成立前艾青是左翼詩人中的一員主將。1942年在延安時期與丁玲等人一起受到批判。他那時期的作品初看起來相當單調，沒有夸張的筆法，沒有頓呼，著重于敘述和詳細的描寫。他的作品集中表現中國大地的富饒和人民的貧困，對比強烈。他詩里強烈、粗糙的措辭與他要表達的思想十分相稱。50年代初的作品中，他順從上級意圖，試寫以民歌節奏為基礎的結構很緊、分成幾節的詩，但詩人抗議的戰斗精神在選擇主題中表現得相當明顯。詩集《海岬上》（1957年）收入許多首自我意識濃厚的詩作，中心思想是將詩人自己比喻成捍衛自己獨立，捍衛自己話語權利的衛士。他的心有如一顆“珍珠之母”，慢慢地產生了他的信條的珍珠；他的人格像一塊礁石，穩固地迎接浪濤的一次次拍打。在一首寫于“百花齊放”期間的寓言詩里，艾青把詩人比作黃鳥。在麻雀的展翅鼓噪下，作為批評家的喜鵲啄擊黃鳥，但是，黃鳥毫不氣餒，依然歌唱。另一首詩（1956年），艾青因為里面有對明朝最后一個皇帝（在煤山樹上上吊自殺）的同情而受到批評。由于艾青堅持個性獨立，不妥協于以前對他的攻擊，還由于與“丁玲集團”過從甚密，使得他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樹為一個突出的靶子。兩年后，艾青就被送到新疆一個偏僻地區，直到1975年才被允準返回。艾青有20多年在詩壇上銷聲匿跡，是中國新詩遭受到的最痛苦的事件。

1949年，在53種重印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中，有兩部敘事長詩，是40年代新詩的代表，對以后詩的創作有重大影響。第一部是田間（1916年— ）的《趕車傳》。田間的詩藝原來是模仿“新月派”的，作、做詩講究標準化的韻律規則。但在蘇聯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影響下，田間作詩改為分行斷韻。《趕車傳》大概有1.2萬字，說的是車夫的女兒如何從惡霸地主魔掌中解放出來的故事。在以下段落中，車夫為了償還地主的債務不得不以女兒作抵押。直接、淺顯的現代口語是此詩的基本語言，詩句按平衡對稱原則構思得很巧妙，類似于古典民歌風格，有力的節奏高潮由諺語引出：

誰能猜，誰能猜

窮人的車呵

裝的淚載的仇

好比包著的大霧

又淋的暴雨

藍妮雖上車

人也哭車也哭

在不平的路上

哭聲四面傳來

車兒和藍妮

滾來又滾去

路呀，好難走

難走，好難走

走呵也是愁

不走也是愁

真是冤仇一日結

千年難割斷！（第29—30頁）

20年后，田間在另一首代表作《鐵大人》（1964年）中表明他已從鏗鏘有力的“擊鼓式節奏”轉向更加固定的句法結構。《鐵大人》告訴人們要對修正主義和陰謀破壞者繼續保持警惕，這些人（用詩里的話說）會扮成狐仙來麻痹公社的保衛者：

狡猾的狐貍你別妄想，

別想叫我放下槍。

你就是個大狐貍，

你想拉我下泥塘。

我為革命流過血，

我為祖國負過傷。

我還為公社植過樹，

如今梨花開滿樹成行。

明月要把紅心賞，

大樹應作社中梁。

你別想來誘惑我，

刀口上的蜜糖我不嘗。[[6]](#_6_Jian___Shi_Kan____1964Nian_Di)

這首詩特有的節奏令人想起詩人李季（1922—1980年）。李季是河南一戶窮苦人家的兒子，是他寫了第二部引人注目的敘事長詩《王貴與李香香》。該詩有近400行對句，每行大概是7個音節。評論家周而復把李季這部詩的出版描述為：“無疑，這首詩開創了中國新詩的一個新紀元，作者李季并不是一個文學工作者，也不是一個詩人，只是生活在人民大眾中的普通一員，熱愛文學的一員……這是一首真正來自人民內部的詩，想人民所想。詩的語言也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源自最可靠的人民大眾的核心。”[[7]](#_7_Zhou_Er_Fu____Xin_De_Qi_Dian)

《王貴與李香香》采用陜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特點是，每一組對句中先是一個比喻，然后是一個陳述，例如：

山丹丹花開紅姣姣，

香香人材長得好。

接著，與此并列的數句之后：

地頭上沙柳綠蓁蓁，

王貴是個好后生。

人物形象對應著眾所周知的有浪漫色彩的事物：

隔窗子了見雁飛南，

香香的苦處數不完。

人家都說雁兒會帶信，

捎幾句話兒給我心上的人：

“你走時樹木才發芽；

樹葉落凈你還不回家。”

年輕情侶羅曼蒂克的歡悅情調足以抵消詩文中的粗俗和韻味的不足。《王貴與李香香》繼承了“梁山伯與祝英臺”這一類傳統愛情歌謠的寫法，而為大眾所喜愛。

李季后來還寫過很多敘事詩，如歌頌玉門石油工人的詩。1958年，他寫了一部敘事長詩《楊高傳》，講述一個貧苦的放羊娃如何向一個盲人歌師學習民間歌謠的故事。盲人歌師也是一位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所以，《楊高傳》的許多章節涉及抗擊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的英雄事跡，但這不影響楊高后來參加土改運動，成為一個革命英雄。長詩的最后一部分描寫楊高來到玉門油田的故事。詩人擅長描寫地下儲藏的石油波瀾起伏的景象，以及處理敘事詩行的跳躍。李季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急于讓人一目了然，這就導致詩句在具體事物的描寫方面顯得蒼白無力、瑣碎雜亂。但是，李季可能依然是新中國具有最為廣泛的讀者群的詩人。后來，李季擔任《人民文學》和《詩刊》兩家刊物的編委，在促進新詩的大眾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50年代初，邵燕祥（1933— ）是廣播電臺的一名年輕記者，他以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熱火朝天的建設為題材做詩、作曲，高度頌揚工業戰線的建設者。在詩集《到遠方去》中，邵燕祥描寫了一批趕赴遙遠的建設工地的城里青年：

在我將去的鐵路線上

還沒有鐵路的影子

在我將去的礦井

還只是一片荒亂

但是沒有的都將會有

美好的希望誰都不會落空[[8]](#_8_Shao_Yan_Xiang____Dao_Yuan_Fa)

此外，孫友田（1936年— ）這位淮南煤礦的詩人描寫了工業戰線建設者的形象，從而也為中國詩歌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而李學鰲（1933年— ）則在1956年出版了詩集《印刷工人之歌》。

#### 農民題材的小說

前些年，趙樹理（1906—1970年）寫農村題材的小說得到高度評價，并有許多作家紛紛模仿。1943年，趙樹理發表了《小二黑結婚》，用直率簡單的方法描寫農村男女青年婚姻自主。小說中的青年人要克服保守的父母的壓力，破除農村迷信，其活生生的代表分別叫“三仙姑”和“二諸葛”。趙樹理創作這篇小說時有意識地吸收了他的家鄉山西山區農村民間藝人的說書藝術，用語樸素、簡單，并盡量使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語言，善于制造懸念，闡說情節的發展，以保證吸引讀者，他的小說以嫻熟的寫作技巧，即刻抓住讀者的興趣。趙樹理這種小說寫法雖然開始時只在局部地區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很快，許多地方的記者都有意識地把趙的手法當做新時代作家的榜樣來學習。他的小說不屬于都市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傳統，而是真正具備農民背景的創作。的確，趙樹理本人來自農村。趙樹理在文學上很快聲名鵲起，無疑是因為他作為一名黨的宣傳工作者，其作品堅持了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

繼《小二黑結婚》之后不久，趙樹理又發表了小說《李有才板話》，這無疑是作者最心愛的一部長篇小說。在《李有才板話》的開場白中，很明顯地流露了趙樹理在他所選擇的社會總體環境的制約下獨有的、具體而簡明的手法：

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窯。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從西到東都是一道斜坡。西頭住的都是姓閻的；中間有姓閻的，也有雜姓。不過都是些本地戶；只有東頭特別，外來的開荒的占一半，日子過倒霉了的雜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閻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產賣了房子才搬來的。（第1頁）

因為當地統治者姓閻，所以，這是不足為奇的。鄉村歌師李有才編了一段快板諷刺統治者，并教育村民，向黨的新政權指出他們的錯誤：

村長閻恒元，一手遮住天，

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

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

選來又選去，還是閻恒元。

不如弄塊板，刻個大名片，

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爛。

趙樹理第一部長篇小說是《李家莊的變遷》（1946年）。這部小說表現了地主（以李如珍為代表）與受壓迫農民（以張鐵鎖及其伙伴為代表）之間反復交錯的拉鋸戰。小說的故事發生在20年代山西北部的一個鄉村。在這部小說里，作者原來擅長的幽默風格變得冷峻起來，敘述也經常客觀冷靜：在鎮壓共產黨武裝最嚴厲的時期，挖出雙眼、砍斷雙手，太陽穴直冒鮮血；最終人民群眾將地主李如珍五馬分尸（盡管后來黨組織知道后曾經批評過這種報復手段）。反動派狡猾的詭計，以及生動地描寫農民日益自信他們的力量，加上趙樹理經常使用活潑通俗的語言，使這部小說在50年代初非常暢銷。直到丁玲和周立波更成熟的農村小說出現以后，趙樹理這部小說的地位才被取代。

1955年，趙樹理響應領導關于合作化運動的號召，用他最富于雄心的著作，再次顯示他善于接受艱巨任務的能力。盡管我們可以從他的《李有才板話》或他的短篇小說《登記》、《傳家寶》等反映農村生活變化尤其是反映農村婦女的小說看出，這并非趙樹理的專長。《三里灣》描寫一個遙遠的北方農村新生的農業合作社建設一項水利灌溉工程的故事。村民們在干部帶領下，采用了新方法，克服了唯利是圖的包工頭和自私自利的中農分子設置的種種障礙，從而使他們 受到現實的教育。在這部小說里，趙樹理重新撿起了早期作品中的幽默風格，尤其表現在描寫青年人溫柔的愛情追求方面。但從總體上看，趙樹理的涉及面太廣了，《三里灣》顯得不夠緊湊。最為遺憾的是，他的《靈泉洞》始終未能完稿，該書的第一部分于1959年首先發表。他的這部作品描寫山西鄉村人民在1940—1941年間抗擊日本侵略者和四處搶劫的國民黨殘余部隊的故事，這代表了作者回到了早期拿手的寫作風格。作者從往昔陳舊的軍事題材中，從容地呼喚英雄形象，挖掘豐富的鄉村文化，用令人輕松而不是粗野嘲弄的筆法處理小說中的巫術、迷信成分。

60年代，趙樹理僅僅寫了少量不甚出眾的短篇小說。后來他受到批判（錯誤是突出了中間人物），“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間，他在一次愚昧的動亂中慘遭迫害致死。

丁玲（1907年— ）在1948年出版了一部反映土改的著名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該小說榮獲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40年代末，土改運動隨著共產黨軍隊橫掃華北大地而蓬勃發展，這時，丁玲的那部小說才由原來粗糙的、公式化的框架發展成鴻篇巨制。小說揭示了一個基本的道理，教育農民清楚認識到地主就是他們的剝削者。地主在富農中尋找聯盟，尋找易受他們欺騙的追隨者。他們的詭計欺騙了幼稚的干部，但到最后，村民們在經驗較為豐富的外來干部的幫助下取得了進步，識破并阻止了地主的反動計謀。

丁玲憑借她所受的幾年訓練，成為一名作家，她早期的小說是富有浪漫色彩的獨白，延安時期，她以現實主義的手法暴露社會，這使她在40年代初期遇到麻煩。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盡管從未承認過這一點）的創作手法，給年輕一代的作家們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比如丁玲用的是田園詩般的優美筆調，描寫受到人們高度贊美的蘋果園：閃光的露珠晶瑩透明，村里的頑童光著屁股無憂無慮地玩耍……丁玲詩意化的語言足以驅散任何理想化的懷疑。丁玲在這部小說里，用較短篇幅勾勒了頑固的地主錢文貴，他的侄女兒黑妮和程仁之間錯綜復雜的相互關系。程仁以前是錢文貴的幫工，也是黑妮的情人，現在，他是農協主席，威信漸長，錢文貴企圖通過黑妮引誘程仁。顧涌是一個勉強接受共產主義改造的中農，但最后，他卻向人游說尊重他好不容易得到的農民身份。這部小說的反面人物很有意思，但沒有正面人物形象那么光彩。比如，小說嘲諷一位教師的無恥，這位教師喜歡替地主撥弄是非、販賣謠言。他制造的謠言是地主的主要資源之一；又如那個傲慢自大的文采，他讓人明白他所學到的書本上的社會主義理論是荒唐的，不適用于他所面對的客觀現實。

另一部獲得斯大林文學獎的土改小說《暴風驟雨》也發表于1948年，作者周立波（1908—1979年）是位老黨員。小說的標題指的是毛澤東曾經用來形容覺醒的農民運動席卷中國大地的景象。周立波曾經翻譯過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暴風驟雨》模仿了該書的寫法。當然，周立波本人也沒有自詡過是一個搞創造的作家。《暴風驟雨》盡管很翔實地描繪了農民生活，這表明他觀察生活很細致，但是，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還是缺乏丁玲小說人物的深度和細膩。作者較滿意的作品是他后來的《山鄉巨變》（1955年），小說描寫了50年代中期湖南的一個鄉鎮為成立農業合作社而展開的斗爭。但是，周立波把筆墨著重于性格堅強的硬漢，以及他筆下人物的婚姻關系上，這使他遭受了批判，給他帶來了痛苦。但是，正是他這種對于人性基本因素的細致關注，才使得人們深信，《山鄉巨變》是新作品中最成功的五六部長篇小說之一。

#### 戰爭小說

在西方現代文學看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事實上已經宣告了贊美戰爭勇士的終結。而恰恰與此相反，中國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小說根本沒有顯示出對戰爭厭倦的跡象，中國作家不知疲倦地謳歌中國人民解放軍及其領導者在抗日戰爭、國內戰爭、朝鮮戰爭時期的勇敢、智慧，謳歌他們如何痛擊敵人，歌頌軍民親如一家的魚水之情。

《新兒女英雄傳》是夫妻作家孔厥和袁靜所著，他們早在1947年就寫過反映農民和部隊生活的短篇小說《受苦人》。但是，他們50年代初離婚，文學上的合作關系也結束了。

19世紀滿族文人文康寫過《兒女英雄傳》，那里面試圖教育青年人通過盡孝道才能建功立業。而孔厥和袁靜筆下的人物是“新”英雄。主人公牛大水和他的妻子楊小梅，以及他們的同志受新道德（即對國家、對黨的忠誠）而非舊道德的影響。八年抗戰影響了生活在河北白洋淀的人們，小說的主人公就是八年抗戰的中心人物。小說細致地描寫了共產黨的抵抗規模如何逐漸擴大，從搜集潰逃的國民黨遺棄武器的小股行動，發展到攻擊敵汽艇、占領敵碉堡，乃至最后對城墻環繞的大小城市發動全面進攻。小說揭示了這樣的道理：隨著對革命新道德的不斷認識，革命勝利果實日益擴大。小說有點說教的味道，但是，作者嫻熟的敘述技巧引導讀者的興趣，而把說教的功能掩蓋了。

孔和袁后來寫了一部反映朝鮮戰爭的小說《生死緣》，想再次獲得成功，結果卻不很成功。

第二部表現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作用的重要小說《呂梁英雄傳》，也是一部合著之作，影響很大。作者之一的馬烽（1922年— ）是在延安部隊里成長起來的作家，在50年代以短篇作品多產達到其創作頂峰。《三年早知道》、《飼養員趙大叔》是他最好的小說，表現了學會合作的農民的活生生的形象。

另一位作者西戎小馬烽一歲，盡管其文學成就不如馬烽，但經歷基本相同。《呂梁英雄傳》采用章回體的形式、別具一格的語言，符合老式草莽英雄傳奇的傳統，所以，立即贏得了廣泛的聲譽。全書由100多個章節組成，雖然其中的很多章回可以自成體系。但是，小說的背景都發生在山西的山區，而且都圍繞著一個村莊的民兵活動而展開，從而使整部小說統一起來。《水滸傳》及與其相似的小說是這種生動活潑的傳奇寫法的典范，《呂梁英雄傳》繼承并發揚了這種中國民族文化的特點，因而可以說它是較好地符合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要求：作家要寫出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

40年代和50年代初，戰爭為短篇小說和長篇作品提供了大量素材。劉白羽（1916年— ）原來寫類似小說的報告文學，此時，他繼續從事這方面的創作。最近，他寫了一篇關于華北油田的小說。但是，縱觀他的作品，其中大部分英雄人物是與軍人——日本鬼子、國民黨軍隊和朝鮮戰爭中的美國兵——作斗爭，而不是以大自然為對手。因為他是部隊的一名重要的文化工作者，他這樣寫符合他的身份。也許是因為他太關注部隊生活，劉白羽多產的作品描寫的大部分是不怕敵人槍彈的那種喜劇性的英雄形象。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是短篇小說《火光在前》（1952年），該小說描寫內戰中搶渡長江的戰斗經歷。不久以后，劉白羽轉向寫朝鮮戰爭。但是，也許還是楊朔（1913—1968年）的《三千里江山》更能代表這段歷史的小說創作，這可又是一部短篇小說。這部小說以刻畫中國人民志愿軍的火車司機吳天炮不屈不撓的精神為中心內容。

這些作家所面臨的技術性問題是，應該多圍繞戰爭場面的急劇變動來寫，從令人興奮的戰斗而不是孤立的游擊戰，到描寫大規模的戰役。1951年，柳青（1916—1978年）寫了《銅墻鐵壁》，小說寫的是建造糧倉，而不是寫某一個英雄人物，作者試圖在小說中解決上述問題，但總的來說，嘗試是失敗的。小說寫到青年干部史鐵夫被國民黨抓到后，敘述的思路才清晰起來。從這以后，糧庫轉入背景，作者描寫抵抗和逃亡的驚險故事也變得流暢了。楊朔的《三千里江山》成功地設計了一列給前方部隊運送軍火的列車，大膽地想象列車藐視隱蔽的敵機投下的炸彈。但是，可能由于要為志愿軍戰士樹碑立傳，小說幾乎沒有嘗試在戰略部署方面花大量筆墨來刻畫戰爭場面。

從這一方面看，1954年出版的杜鵬程（1921年— ）的長篇小說《保衛延安》達到了新標準，至今仍是戰爭題材的優秀小說。小說描寫主角周大勇是一尊帶著“一雙炯炯有神眼睛的鐵鑄塑像”。1947年，國民黨發動大規模攻勢，企圖占領共產黨的政權所在地延安。周大勇便出現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中。共產黨主要的戰略家在小說中出現，最著名的就是脾氣倔強的彭德懷。主人公所受的政治教育是他對最高指揮部真實的戰略意圖的認識不斷提高的關鍵。在共產黨守衛部隊暫時撤離延安時，周大勇大膽地裝出假象，引誘國民黨主力部隊遠離其供應補給線。周大勇由于魯莽，幾乎使他陷入絕望。不過，這也使他逐漸認識到，個人英雄主義行為必須在整個戰略部署指導下，把敵人緊緊拖住，直到敵人弱點暴露才可向敵人發起進攻。與打日本侵略軍不同。打日本占領軍多為零星襲擾性的，共產黨現在面對的是能在一次戰役中投入幾十萬部隊的敵人。周大勇戰勝了創傷和疲憊，戰勝了一次又一次差些把他的小股兵力擊潰的強大的敵軍，他的勝利被牢牢地置于紅軍從防御轉向進攻，乃至最終取得全面勝利的那種鐵一般的宏大的整體框架之中。

1959年，彭德懷由于直言上諫、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運動而被貶職。杜鵬程和他那氣勢磅礴的小說連帶遭殃，《保衛延安》成為禁書，1963年被勒令銷毀版型。盡管杜鵬程以后還繼續寫關于公社化及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品，但是，他再也沒有嘗試寫像《保衛延安》那樣的大部頭作品了。

#### 工人題材的小說

1942年毛澤東延安講話確立工人、農民、軍人為新文學的服務對象。三者之中，工人題材的作品出現得最晚。除了巴金描寫煤礦生活的《雪》（該作品深受左拉《萌芽》的影響）、張天翼（1906年— ）和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以外，以前幾乎沒有工人題材的小說。小說家們從蘇聯文學中找到了樣板，比如格拉特科夫的小說《水泥》，還有厄普頓·辛克萊，他們在30年代就馳名中國。

在以中國工人生活為題材的小說中，第一部重要的作品是草明（1913年— ）所寫的《原動力》。草明是廣東主要作家歐陽山（1908年— ）的妻子。新中國成立后的恢復時期，草明曾在東北地區的水力發電廠和鋼鐵廠從事過政治思想工作，她的工作為她的創作提供了素材。盡管草明在《原動力》里把老工人老孫放在筆墨的中心，但她還是把建設水電站本身當做該書的一種群體形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日本鬼子和國民黨軍隊撤離時搗毀的工廠像一片廢墟，遺棄在東北冬季嚴寒的天地里。當工廠修復后，發出隆隆之聲，重現出它的活力時，草明寫了好幾段文字，深情地歌詠工廠的變遷（如第九章，寫婦女們在湖邊采花時工廠成了田園牧歌式背景的一部分）。

一開始，老孫就顯示了英雄人物的品性，如奮不顧身地從冰封的池塘搶撈出寶貴的油料。老孫既堅忍不拔，又機智樂觀。小說中有一段小插曲表現老孫的外交手腕，甚至有點“狡猾”——他哄騙當地農民交回他們偷來的屋頂鐵蓋板。被任命為廠領導的王運明是一位有事業心的干部，他運用群眾路線，意識到要信任這位老工人，而不是殷勤的工會主席及受日本教育的技術專家，從而使自己受到了政治教育。根據毛澤東后來所用的語言，與這些人的緊張關系是非對抗性矛盾，是先進的工人階級自身內部的矛盾。但是，這一充滿戲劇效果的情節主要還是從與國民黨故意破壞搗亂的對抗性矛盾中產生出來的。這些沖突表明《原動力》屬于早期的工業恢復階段的小說。

草明早期寫過反映農民生活的短篇小說，而繼《原動力》之后，她又寫了《火車頭》（1950年），題目喻指馬克思主義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火車頭。小說反映的是火車上的工人和干部政治覺悟的不斷提高。1959年，草明又寫了長篇小說《乘風破浪》，歌頌“大躍進”的大煉鋼鐵運動。不過，后來的這些小說大不如《原動力》影響巨大，《原動力》有不少模仿者。柯巖1954年發表了《王青春的故事》，雖然小說中的英雄，即這部虛構的自傳體小說的主角是老孫的晚輩，但這部小說重復了通過生產過程的考驗使政治覺悟不斷提高的主題。雷加（1915年— ）的《春天來到了鴨綠江》（1954年）探索了與《原動力》類似的主題，只是水力發電廠的背景換成了造紙廠，再有，這時的工人們要克服他們與黨干部之間的官僚障礙，還要應付復雜的機器和人民的（階級）敵人，雷加這部小說是他《潛力》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以前，雷加也寫過許多反映勞動人民生活的短篇小說。

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的實施，重工業，尤其是鋼鐵生產成為人們引以為驕傲的地方。來自東北“鋼都”鞍山的一位小說人物王青春是一位建設者。但鑄造廠的工人形象更為突出，這就是繼《原動力》之后又一部反映工業方面的重要著作《百煉成鋼》中的主人公。這部小說于1957年發表，作者艾蕪（1904年— ）是新中國成立前具有左翼傾向的一位多產作家。艾蕪在這部作品里顯示了他的創作技巧，尤其是為了適應讀者的趣味，作者有幾段文字詳細地描寫高爐的操作過程，說明其中的問題。主角秦德貴是一位煉鋼工人——工業驕子，工業題材小說沒有哪一個形象超得過他的魅力。小說一開頭，就有秦德貴一個特寫鏡頭，他利索地脫掉帶著火焰的石棉手套出現在高爐口邊。那時正值反對“又紅又專”的當口，秦不如他的授業師傅袁廷發熟悉業務，也沒有他那么強的競爭意識，但他比袁要“紅”，他受為國家進步事業獻身的思想意識的支配，而不是因為個人虛榮或物質待遇。他所取得的真正成績與其說是煉鋼，打破鋼鐵產量的紀錄，不如說是“鍛煉”他的同志們，因為他的工作是在領導干部的指導下解決廠里的主要沖突。這種沖突就是，一方面加快生產，一方面提高工廠和工人的福利。這些兩難的要求使小說的情節固定在一系列真實的問題上，人們不會對這些問題提出疑問。但同時，掩蓋了適合小說情節的破壞者的搗亂企圖，而這就削弱了作品的結尾。

1958年，主要的戰爭小說《保衛延安》的作者杜鵬程又寫了長篇小說《在和平的日子里》。和《保衛延安》相比，被列為工業小說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容量要小得多。這部作品的背景是發生在四川省的寶成鐵路施工，但實際上，這是杜鵬程描寫戰爭小說的一種繼續。小說的主要人物都是戰斗英雄，為了適應和平和重建的需要，這些人相應地成了該小說的主角。閻興天生是一位領導，卻能使自己屈從于群眾的意志。而梁建在戰爭年代能出生人死，但在長期的和平環境影響下，有濃厚的個人主義意識。梁建因為悲觀主義而消沉頹唐，但閻興卻每每在艱難困境中顯示出力量。杜鵬程沒有浮夸的、感情奔放的語言，但他像在戰爭小說里一樣，充分發揮了擅長描寫野外場景和與大自然抗爭的優勢。他寫作中的浪漫熱情使人想起了羅曼·羅蘭。在下面的一段文字中（工人們手挽手正在搶運大袋水泥），他寫道：

閻興感覺到：狂風抽打工人們，好像在激發人們無窮的力量！浪花拍擊工人們，好像要使人們的情緒更加昂揚！電光閃閃，好像在給工人們照路！[[9]](#_9___Zai_He_Ping_De_Ri_Zi_Li)

#### 新戲劇

50年代初期，許多城市的舊劇院修葺一新，新劇院平地而起，表演學校紛紛創辦，古裝傳統戲劇作品得以編輯和再版。周恩來這位古裝戲迷對此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1952年，第一屆地方戲劇藝術節在北京召開，20多種傳統劇目重新上演；1957年舉辦的第二屆地方戲劇藝術節增加了上演的劇種。對劇目進行了聯合審查：凡淫穢臺詞和姿勢一律禁演，所有上演的京劇和其他傳統曲目，其內容如果被判定為過于迷信或“封建的”，也一律禁演。

然而，改寫比徹底禁演更習以為常。一出戲因改寫而得救的有趣的例子是《白蛇傳》，它已被大劇作家田漢（1899—1968年）作了較大的檢查和處理。傳統的劇本并無隱晦之處，但總的來看，白蛇雖然以人體的妖魔之美出現，但顯然貼有邪惡的標簽，最終被方丈法海的佛力給鎮住了。田漢的劇本把角色顛倒了過來，改為法海及其迷信的妖術被挫敗，劇終時白蛇在暮日之中消失（這是被解放的婦女的縮影）。白蛇和侍女小青蛇這一對，由于將其原來令人神魂顛倒的魅力修改為只是贊頌女性之美，必然失去了某些戲劇效果，但該劇通過了審查，得以繼續上演。1956年，經過刪節，劇情更顯緊湊的蘇州昆曲《十五貫》也作為“推陳出新”政策的優秀成果，受到了熱烈歡迎。

50年代初，有兩部劇作以話劇形式反映了當代社會問題。話劇是20年代以后在中國發展起來的。杜印（1916年— ）等人在1951年寫的《在新事物的面前》考察了一位身為沈陽一家煉鋼廠廠長的轉業軍人干部與他所必須依靠的能使鋼廠恢復運轉的技術人員之間的緊張關系。夏衍（1900年— ）在1953年寫的《考驗》與該劇題材相類似但卻更為復雜。夏衍曾經是30年代左翼劇作家的主要組織人，寫過幾部戰時的劇本，對中國電影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夏衍的“工業”劇本《考驗》以“三反”運動為背景，尤其在那位西方培養的工程師同官僚管理的斗爭中，表達了對他的同情，并通過該劇，較為克制地發出了在使知識分子為國家服務的過程中應給予耐心和理解的呼吁。

1954年，曹禺（1910年— ）寫了一出與上述劇作主題相近的話劇《明朗的天》，描寫了北京一家美國人創辦的醫學院里，人們如何逐漸克服自身接受美國科學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另一位公認的劇作家宋之的（1914—1956年），以其描寫朝鮮戰爭的《保衛和平》和描寫社會主義農業改造的《春苗》（1956年），而對50年代的話劇作出了貢獻。

陳白塵（1908年— ）也屬于中國的老一代劇作家。50年代末，他寫了幾部諷刺美國“紙老虎”的劇本，但此后過了幾乎20年，在周恩來和毛澤東逝世之后，他的下一部劇作《大風歌》才在1977年問世。

1954年，夏衍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四年以后，他把茅盾在1932年寫的中篇小說改寫并拍成了很有影響的電影《林家鋪子》。

1963年，代溝成為兩部劇本的主題：一是陳耘等人的《年輕的一代》，二是叢深（1928年— ）的《千萬不要忘記》。代溝是當時十分要命的問題：擔心青年人身上的革命精神會逐漸失掉，他們不太明白為他們曾付出了多大的犧牲，把新社會誕生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有不知不覺地墮入資產階級只顧自我的危險。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是，他們不情愿去農村。在這兩部劇作中，思想變修了的青年主人公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嚴重錯誤之中而不能自拔，然后在引導下認識到了錯誤。

在30年代的小說中，很少有比老舍（1899—1966年）的小說讀來更膾炙人口的了，尤其是他1933年寫的諷刺小說《貓城記》，以及1937年寫的名著《駱駝祥子》。《駱駝祥子》描寫的是一個農村小伙子在腐朽的、無法忍受的北京街面上為生存而苦苦掙扎的悲慘故事。中日戰爭期間，老舍作為國統區愛國作家組織的一名領導人，練就了運用民歌和短劇作為宣傳工具的本領。1949年以后，除了那部我們可視為未完稿但卻令人悅目的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之外，老舍沒寫任何新小說。這本寫于60年代初的小說，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出版。然而，老舍的確在劇作家這門新行當里獲得了驚人的成功。他的20多部劇本中，《龍須溝》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他最早獲得成功的劇作之一，但1957年問世的《茶館》雖然最初反應冷淡，但如今被認為是他最好的劇本。后來，《茶館》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且于1979年赴歐洲巡回演出。老舍以其對北京的風情，尤其是對城里窮人生活的十分的熟知，為上述兩出話劇增添了激情，劇中妙語連珠。“龍須溝”是一條臭水溝的雅稱，由于舊的腐敗政府的忽視而造成的惡臭沖天是對生活在溝邊的窮人命運的不折不扣的象征。然而這種慘景并沒有使市政當局對這些棲身之地免征“衛生稅”。共產黨政權成立后，排掉了溝里的臭水，修建了排水道，居住在上面的人們開始了生產活動。這個城市恢復了活力的心臟地帶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類似這樣的新舊社會的對比還貫穿于老舍的后一個劇本《全家福》中：民警為了使一個在舊社會因各種原因失散的家庭重新團圓而不遺余力。

話劇《茶館》通過對北京一個茶館的老茶客生活的三個階段的描寫，準確地追述了這個“舊社會”的衰落。這三個階段是：1898年（第一幕），滿清沒落的年月；1916年（第二幕），北京控制在軍閥手里；1946年（第三幕），國民黨人無望修補戰爭的創傷。隨著時代的變遷，茶館發生了許多變化，一個變得越來越顯著的特征是：一組告誡“莫談國事”的字幅。如果在第三幕（最后一幕）結束時，觀眾中憤世嫉俗的人想象第四幕會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茶館里會出現更尖刻的字幅，這就不在老舍所能寫的范圍之內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到來時，老舍作為一名具有頑固不化信念的資產階級作家而受到嚴厲的攻擊，一般都認為他是因被紅衛兵惡棍們毆打致死的。[[10]](#_10_Bao_Luo__Ba_Di___Si_Wang_Yu)

## 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56—1965年

#### 小說中的批判現實主義

劉賓雁（1925年— ）和王蒙（1934年— ）在讀者腦海里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他們兩人都是在1956—1957年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期間，推出對官僚主義進行大膽批評的作品而一舉成名的。兩人后來都被打成右派，20年沒有發表作品。而且兩人都是在推翻“四人幫”后，又拿起筆桿從創作生涯曾經中斷的地方繼續前進。劉賓雁主要是記者，仍在噴射他的憤慨。王蒙則早在他22歲時寫的第一篇小說中，就表現出他的成熟和敏銳的洞察力。他現在被認為是中國最有成就的短篇小說家。

劉賓雁的作品屬于報告文學類型，這一類文學作品或是揭露性的，或是歌功頌德的（這居多），允許使用事實材料，并且不拘泥于形式，雖然它應該是有很大一部分“逐字逐句”的對話。他的第一篇作品是《在橋梁工地上》，由于它達到一種空前坦率的程度（對1956年4月來說）而引起了軒然大波。作品中，橋梁工地上的工程總指揮和總工程師兩人都是入黨多年的老黨員，都有赫赫戰功，但都安于現狀，因循守舊，在任何困難面前，總是將他們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者將他們的所作所為的一些細節作了詳盡陳述：在他們的墻上有一個意見箱，但是箱子上的鎖銹死了。一個熱情洋溢的年輕工程師被調離工地，而當報道者，即文章中的敘述者與他的老朋友工程總指揮闊別數月之后再次造訪他時，發現他的管理方式沒有一絲一毫的改進。

《本報內部消息》是一篇更長的報告文學，1956年6月和10月分成兩部分發表。[[11]](#_11___Ren_Min_Wen_Xue____1956Nia)這篇作品揭露編輯們對真相的歪曲和壓制，他們或自高自大，或麻木不仁，主要是些自私自利的官僚主義者。故事視線中心是個年輕女記者能否入黨問題，而這個問題最終仍未解決。看來她如要想入黨就不能不對當地礦山及其他地方的情況作出肉麻吹捧的報道。“原來他是這么個主意！為了入黨，倒可以不來維護黨的利益！為了入黨，倒要壓制自己的意見！”（第21頁）

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于1956年9月，[[12]](#_12___Ren_Min_Wen_Xue____1956Nia)跟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一樣，都是刻畫官僚政治的惰性的，但它是一篇更具匠心的作品。文章主線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愛情故事，相當隱晦，不是一眼能看穿的。在當時以愛情為主線本身就是富于革命性的；周揚曾經否定了愛情作為一個重要主題的可能性：

在新的農村條件下，封建的基礎已被摧毀，人民的生活充滿了斗爭的內容。戀愛退到了生活中最不重要的地位，新的秧歌有比戀愛千萬倍重要，千萬倍有意義的主題。[[13]](#_13_Zhou_Yang____Biao_Xian_Xin_D)

評論家黃秋耘在這同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歸納了當代作家表現出來的幾種愛情類型：

……“見面就談發明創造”式的愛情，“扭扭捏捏、一笑就走”式的愛情，“我問你一個問題，你愛我不？”式的愛情，“由于工作需要而屢誤佳期”式的愛情，“三過家門而不入”式的愛情……（最后一種類型原指的是一個古代神話中的英雄，他為了大眾幸福而怠慢了他的妻子）。[[14]](#_14_Huang_Qiu_Yun___Tan_Ai_Qing)

林震和趙慧文的關系是“新來的青年人”里的故事線索。林震原是學校教員，調人一個工廠黨委組織部工作，他從那位幻想破滅的領導、與丈夫分居的妻子趙慧文身上得到了鼓勵和支持。故事很巧妙地把兩個年輕人拉在一起，他們的接近成了冷漠無情、索然無味的黨的官員活動天地里的一塊綠洲，在這個天地里剔著牙齒的黨的官員使人想起30年代張天翼筆下的那些小無賴；在這個天地里組織部長也承認他干枯、乏味、缺少情趣——“據說，炊事員的職業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飯菜是他們做的，他們整天和飯菜打交道。我們，黨工作者，我們創造新生活，結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勵我們……”（第40頁）——在這個天地里，一個黨委組織委員在和林震的第一次談話中顯露出他的厭煩和嘲諷態度：

“一九五六年第一季度，你們發展了幾個人？”

“一個半。”

“你的‘半’個是什么意思？”

“一個我們報上去了，區委拖了兩個多月還沒有批下來。”（第31頁）

總之，王蒙的故事勾畫出一幅干部卷入廠里一場爭論的畫面，如此逼真，使人信服。參加爭論的所有的人——干部、工人、管理人員、工長——走在一種偏向和另種偏向之間的刀刃上。

1957—1958年中其他有影響的小說也被抨擊為異端，是修正主義甚至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因為這些小說很明顯是干部文學，是為知識分子寫的而不是為工農兵大眾服務的。它們包括《美麗》（豐村），《來訪者》（方紀，1919年— ）。在豐村的故事中，“美麗”指的是當今青年的思想，對工作的獻身精神及自我犧牲精神，但小說實際上講的是一個年輕女干部為了加班加點工作，而不得不放棄談戀愛找對象的令人沮喪的故事。方紀的“來訪者”是一個被他唱大鼓的情人弄得心灰意冷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要傷感得多的人物。這篇故事和唐代一個著名的羅曼史《李娃傳》有相似之處。《李娃傳》的主人公因長安名妓之故趕考落第，斷送了仕途前程，但他仍得到名妓的幫助。方紀筆下的年輕助教則企圖自殺，轉而向黨組織求援，向一個無動于衷的干部記者傾訴他的往事，最后以接受勞教結束。這兩篇小說不僅都以個人的愛情悲劇為中心，而且在背景中它們都刻畫出官僚作風的冷漠，在方紀的小說中甚至還有昔日煙花巷里的鴇母、掮客在新社會的殘留。

替以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為代表的作品進行最有力辯護的是秦兆陽（1916年— ）的文章。這篇文章出現在小說發表的同一月份里，即1956年9月，是以“何直”這一假名發表的。[[15]](#_15_He_Zhi___Xian_Shi_Zhu_Yi)這是一個宣言，此等宣言為數不多，被要求有更多創作自由的作家舉為旗幟，一直舉到60年代中期。它也同樣多被好挑毛病的黨的辯護者們所引用。青年作家劉紹棠（1926年— ）響應了秦兆陽的主張，受到嚴厲的批判；秦兆陽本人有更強大的根底，他當時是首家全國性文學雜志《人民文學》的一名編輯。這兩個人口頭上都說了些要貫徹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對作家們所做的指示，劉紹棠將毛的基本原則復述如下：

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政治標準第一和藝術標準第二，作家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過去、現在，以至無窮遠的將來都同樣具有最根本的指導意義。這些原則和定理，是不容許修正或取消的，而且也是無法修正和取消的。[[16]](#_16_Liu_Shao_Tang___Wo_Dui_Dang)

但是毛的教導被曲解了，秦兆陽認為正確理解中最大的障礙之一，是1934年蘇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要求藝術家對革命發展中的現實作真實的、歷史的具體的描述，其中的真實和歷史的具體必須與思想改造和勞動人民的教育任務結合于社會主義精神之中。[[17]](#_17_Du_Wei__W_Fu_Ke_Ma____Zhong)

像劉紹棠所評論的：

如果不認為生活現實是真實的，并且寫作本身應該關照現實底“革命發展”的話，就會迫使作家們去粉飾生活而忽略生活真正的特征。按照“革命發展中的現實”原則，作家們就不應該反映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問題或者刻畫那些被忽略的社會層面，因為這些都是暫時的，可以解決的事情，可是，牽涉到現實主義時，“現實”的意義何在呢？

毛的指示很多地方得助于瞿秋白和瞿秋白對蘇聯模式的解釋，由于機械運用蘇聯理論和生硬執行毛的指示，近幾年教條主義盛行，單調和矯揉造作的文學作品充斥文壇。秦兆陽呼吁用“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他的“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只是重復了胡風的理論文章中的基本原則。胡風（1904年— ）剛于一年前成為那場最嚴酷的運動的犧牲品，運動的結果是將胡風作為反革命分子逮捕并將他逐出文學舞臺（1981年胡風得以平反）。現在秦兆陽的現實主義是一種更誠實、更持批判態度，同時更富人情味的現實主義，胡風的很多理論原則又重新出現了。更誠實意味著描寫非真實的社會主義天堂的夸張成分將會減少。更多批判的精神意味著允許在文學作品中反映和剖析新社會存在的現實問題。在“人情味”的名義下意味著個人可以抒發感情，可以對現實的各個方面發表看法，而不僅僅局限于階級斗爭。

過去的某些文學模式在胡風以及像秦兆陽那些人的理論文章中頻繁再現，這些人在百花齊放期間試圖擴展寫作范圍，而不局限于狹窄的正統思想領域之內。高爾基和魯迅是被引用得最多的，肖洛霍夫次之，而討論仍然集中在胡風的兩位偶像身上——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一位是舊基督教的保皇黨人，一位是神秘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的作品卻都構成了19世紀現實主義的基石，這就雄辯地說明了應把藝術家與特定的政治活動分開來。當時理論界和批評界討論的關鍵問題是：藝術家的自主問題，他們需要的創作時間，他們對思想改造的恐懼，他們對被擺布的反抗。一個作家可能受到的瑣細的清規戒律的約束情況，可以從姚雪垠（出生于1910年）講述的一樁趣事中窺見一斑：

我曾經寫過一部中篇小說，其中有一個次要角色是一個落后工人，有濃厚的宗派情緒和嫉妒心理。如果他看見別人裝錯齒輪，他會抄起雙手不管，機器從而不能正常運轉。出版社的某些編輯同志認為工人不會這樣的，要我把這個工人改寫成特務，我不同意，這部稿子就壓下來了。[[18]](#_18_Yao_Xue_Yin___Da_Kai_Chuang)

中國的讀者或許應該感激“某些編輯”，他們拒絕發表也許正促成了姚雪垠決心投身于遠離當代生活的題材創作，即一部宏偉的、多卷本的關于推翻明朝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1963年開始出版，最近幾年連續再版仍極受歡迎。

#### 革命浪漫主義：“大躍進”時期的詩歌

對要求自由的呼聲反擊最猛烈的文字，有些來自李希凡（1927年— ）和姚文元（1930年— ）。李希凡因于1952年批判俞平伯（1899年— ）而成名。他指責俞平伯對18世紀的古典名著《紅樓夢》作了“資產階級”的闡釋，這一中傷釀成了政府對知識分子思想進行控制的第一次重要運動。姚文元要晚一些，1965年他把吳晗（1909—1969年）的《海瑞罷官》定性為難以令人接受的針對毛本人的諷刺文學，從而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一名主要鼓動者出現。后來姚因是千夫發指的“四人幫”成員而遭人唾罵。發表正統路線的主要聲明的任務留給了周揚，他于1958年3月發表了一篇權威性的概說。[[19]](#_19_Zhou_Yang___Wen_Yi_Zhan_Xian)

周揚提倡的新公式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這是毛澤東的理論。周揚一提出，郭沫若立即表示歡迎。按照這一公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就成了強制性理論，大家對現實只能抱樂觀的、向前看的態度了，對剛剛掀起的“大躍進”來說這不失為一句極好的文學口號，“大躍進”也是把那些沒有被劃成右派而實際上已經保持沉默的作家如劉賓雁、王蒙等搞得無所適從的極好方法。

“大躍進”的總口號是“多、快、好、省”，這是各個生產領域的指導方針。夏衍為他的同行們將這句口號改了一下，要求“寫得又快又好且適于上演的大量的劇本”。[[20]](#_20_Xia_Yan___Duo___Kuai___Hao)各類作家宣布創作定額來響應這一口號：巴金在一年時間內承擔了一部長篇、三個中篇再加上一本譯著的任務。田漢宣稱他將寫十部戲劇和十個電影劇本。這些計劃無一完成，茅盾為他的短篇小說畫了一個一萬字的最適界限，并要寫五千到六千字半小說性的“報告”。[[21]](#_21_Mao_Dun___Tan_Zui_Jin_De_Dua)為湊指標，小小說受到青睞。

在寫萬首詩、唱萬首歌的口號推動下，詩歌領域率先完成了“大躍進”的創作指標。

自8世紀以來，五言或七言押韻的四行詩在中國詩壇占據了一個頗為榮耀的位置。在1958年的“大躍進”年代，五言和七言是創作高產詩的理想工具，它能抓住稍縱即逝的靈感。

花生殼，圓又長，

兩頭相隔十幾丈；

五百個人抬起來，

我們坐上游東海。[[22]](#_22_Yin_Zi_Zhao_Cong____1958Nian)

夸張到這等程度就變成了喜劇了，但當形象引人注目時仍然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稻堆堆得圓又圓，

社員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湊上太陽吸袋煙。[[23]](#_23_Guo_Mo_Ruo___Zhou_Yang____Ho)

不僅僅是大豐收（不管是已收獲的還是希望的），而且發電、油井、鋼廠、森林和漁場保護部門，以及每個生產領域都在這些“新民歌”中被贊美得無與倫比。“新民歌”是毛澤東提倡的，廣大民眾也蜂擁而上，彼此賽詩。其精華部分被選進郭沫若和周揚命名的《紅旗歌謠》中而備顯尊貴。“寫萬首詩、唱萬首歌運動”本身或許并不夸張，因為那時確實創作了大量詩歌。這場運動力圖將全國推進到共產主義的黃金時代，因為那時每個人不論男女，都成了詩人。舉辦詩會，優勝者獲獎。模范工人用同志們寫的贊美詩裝飾他們的車床。據稱光是在上海，就有20萬工人參與了文學活動，創作了500萬篇作品。

通過對紅花、紅太陽、“愚公移山”、萬眾一心重整山河的描繪，詩歌創作的浪漫主義漸漸達到一個高峰。詩人和勞動人民融合一體，成了一個巨人，一個高聳入云的普通人：

天上沒有玉皇，

地上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岳開道，

我來了！[[24]](#_24_Tong_Shang_Shu__Di_172Ye)

按郭沫若對“社會主義現實與共產主義理想結合”[[25]](#_25_Guo_Mo_Ruo___Jiu_Mu_Qian_Chu)這一形式的注釋，浪漫主義達到一個新的巔峰。激情的文字所創造的美境使人們眼中見到的現實難免遜色了。

“大躍進”時代的夸張當然不只限于那些新一代年輕的通俗詩人（經常是失誤的），甚至在卞之琳這樣的大詩人極有分寸的想象里，修建北京城外十三陵水庫的挖土工也成了巨人：

你這是干什么

一鏟又一鏟？

二十五萬畝水澆地，

要在我掌心里涌現！[[26]](#_26_Bian_Zhi_Lin___Dong_Tu_Hui_D)

對“新民歌”的這種貢獻使卞之琳得以在這個緊張的時代里有了一點機動余地，從而可以和何其芳及其他人一起，反對那些將這種簡單的小詩尊為新詩的唯一形式的人的論調。何其芳在50年代主張，除了自由、松散、敘述式的詩體外，還要發展格律形式嚴格的詩。何和卞都不是高產詩人，但何是從40年代解放區來的，政治地位無懈可擊，這使他頗具分量。

50年代早期出現的一個現象是在開發西部疆域中一大批年輕詩人從云南和西藏高原，從新疆和內蒙古草原和沙漠中涌現出來，他們將那些廣漠的疆土、個人領悟的激情都化成了高度浪漫化的抒情贊美詩。公劉（1927年— ）生于江西，1956年他遷居北京時拿柔弱的南方與堅硬的北方對比道：

綠色的南方向北方送禮，

禮物是水稻、樹苗和我的歌曲。

于是在匆忙中，我失落了葉笛。

但北方遞給我嗩吶，

并且說，“這是你的武器！”[[27]](#_27_Yin_Zi_Zhang_Zhong_De___Dang)

公劉因領導改編云南撒尼族的口頭敘事詩《阿詩瑪》為漢文版而成名。阿詩瑪是一位撒尼族姑娘，她因勇敢追隨她的戀人而死在狠毒的頭人手里，她的不朽形象鼓舞著當地人民尋求解放（當然最后總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一故事被改編成了一部很受歡迎的電影。

梁上泉（1931年— ）是四川人，他現在仍居住在四川。在50年代中期服完兵役后，他參加了內蒙古戰斗的尾聲——他的詩完全是從一個中國人的視點出發：

牛羊兒似珍珠，

顆顆閃光耀；

蒙古包似花蕾，

朵朵欲放苞。

臺上烽煙不再起，

眼望彩虹心含笑。[[28]](#_28_Liang_Shang_Quan___Chang_Che)

高平（1932年— ）有一首關于一個藏族女孩的長篇敘事詩。地主為了除掉她，派她去找尋根本沒有希望找到的羊群。（結果迷失在大雪紛飛中——譯者）她的故事是以第一人稱追溯直到她的死亡，隨著她不幸的命運背景漸漸明朗而感人至深。詩中對話簡潔，儼然是田間10年前寫的敘事詩《趕車人傳》的風格。

當少數民族開始有了他們自己能用漢文創作的作家，像藏族詩人饒階巴桑（1935年— ）和蒙古族短篇小說家瑪拉沁夫（1930年— ）后，他們借鑒當地的色彩的興趣就少了（雖然劇作家曹禺寫《王昭君》時，曾為內蒙古的絢麗色彩所吸引，《王》劇應官方之約寫成于1978年）。

“大躍進”對這些年輕詩人來說只是浪漫的樂觀主義的一種延伸，1959年梁上泉在抒寫公社的果林時將大自然人格化，這是“大躍進”詩中常見的：

河有多長，果林就有多長，

站在河岸就像儀仗隊，

迎接汽輪往高山上開，

投給客船以果實。[[29]](#_29_Liang_Shang_Quan___Cai_Se_De)

跟大多數人相比，梁塑造的形象更為精致，并且他的對比有特別敏銳的眼光。對革命者來說，塔是迷信的產物，是壓制力量的象征，壓制了某種圣者的遺跡，（像杭州著名的雷峰塔那樣，壓著一個被囚禁的仙子）梁上泉在他的詩《黑塔》中把這種建筑描寫成一個小鎮的主要特征。而這個小鎮現在建起了一個發電站：

我望著，我遠遠地望見，

又一座黑塔與它并排高站，

近看才知是火電廠的煙囪，

不息地吐著墨一樣的濃煙，

暗夜在地上繪出繁星般的燈火，

白晝在天上繪出黑色的牡丹。[[30]](#_30_Liang_Shang_Quan____Kai_Hua)

“大躍進”時代出現的雄心最大的詩篇之一是阮章競所寫，并從1958—1963年經五年修改的《白云鄂博交響詩》。阮1914年生于廣東，但他是由于一首關于大西北三個備受蹂躪的農婦“翻身”的長篇敘事詩而成名的。這就是《漳河水》。早在50年代初這首詩被譽為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的后繼者。而《白》詩與早期的成功之作是不能相比的。它的主題，即克服蒙古牧民們抵制工業化的迷信保守傾向，對過分浪漫化的敘事細線來說是太沉重了。而更糟的是，詩的開頭是草原牧歌式的幽美，接著講一位先人曾以鮮血去換取珍貴的水的粗獷的英雄行徑，又講老牧民保護神圣的泉水的決心——所有這一切使讀者也覺得為開發礦藏而將水源破壞實在可恨，直到最后我們也遠不能相信草原將“躍進到鋼鐵時代”——詩作者（兼宣傳家）沒有使我們相信他已摸準草原主人（牧民們）的心事。

#### 小說中的英雄和中間人物

“大躍進”時期的短篇小說中最受青睞的一個模式，是說明如何引導個人主義的農民或工人消除思想障礙，相信集體努力會迅速提高生產的過程。作家或是主要敘述者，重訪一個村莊或是工作點，驚異地發現一個典型的革命勞動者，正是兩三年前那個頭腦守舊、固執己見的人，并通過一系列倒敘了解到他這一轉變過程。大量這類故事中因其幽默魅力而引人注目的一個例子是馬烽寫的《三年早知道》，“三年早知道”是那個精明的農民趙的口頭禪，他想對互助組的養豬業作出貢獻，于是在途中埋伏下一只獎得的豬，等候鄰村的公豬經過。而鄰居家用以遮蓋的雜草堆太小了，于是他的計謀暴露無遺。趙的“成就”獎可悲地灰飛煙滅了，他受到教育而認識到自己行為的錯誤。故事結尾他變成了一個模范，阻止他的伙伴們掘溝使鄰村的水改道以供他們自己使用。

另一種對比是以英雄的現在與不幸的過去相比，從而表明模范工人在社會主義時代不可抗拒的勞動熱情。工人作家費禮文（1929年— ）在他的小說《船廠追蹤》中寫到兩個模范工人，他們回憶起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破爛不堪的船廠所受到的虐待，如今，即使拼命工作了一晚上之后他們仍然如此急迫地想返回到打鉚工場，其中一個被黨支部書記反鎖在老工人休息室里，那只有跳窗逃跑才能繼續他那已經遙遙領先的勞動額了，這種理想化的行為模式在這類小說中被競相模仿，其可信度并不高，而更重要的是船廠的廠景，它散發著現代化大工廠迷人的魅力，巨大的汽輪船體在黑夜中隱約可見，被高空中鉚工們的電筒突然照亮。

戰爭詞匯的廣泛使用反映了“大躍進”的迫切心態。最下層的勞動者變成了生產“大隊”里（此字英文亦作“旅”解——譯者）的“戰士”，“精銳”工人們組成“突擊隊”，他們在與自然力量斗爭時是“向天宣戰”。而真正的戰爭繼續為這一時期的英雄小說提供著素材，無論是紀念紅軍自己或是在過去年代戰斗精神飽滿的工人和學生。葛琴寫的《海燕》，刻畫了1926—1927年的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個年輕的女革命者形象。它采用電影劇本的結構，但并不乏充滿激情的段落：

一陣密集的驟雨般的槍聲，在鐵路兩側的工人們手中發射出來。這神圣雄偉的槍聲，它驕傲地震動著人心，震動著黑暗中的天空和大地。可愛的人們，站起來了，在暴風雨中勇敢地前進。[[31]](#_31_Ge_Qin____Hai_Yan_______Ren)

新社會里缺少令人滿意的反面人物。這就迫使小說家們不僅轉向戰爭主題，而且轉向1949年前黨的地下斗爭。兩部重要的長篇小說運用這類素材導致兩種大相迥異的結局。第一部《青春之歌》，作為小說及電影它對年輕人都構成非凡的吸引力。這是楊沫（1914年— ）1958年寫成的，她在她的女主角林道靜身上傾注了大量的浪漫希望。這個女孩在30年代早期由一個耽于空談的學生成長為一個謹嚴的地下工作者，對她的情人（自由知識分子胡適的一個崇拜者）漸漸增長的輕蔑主宰著她的生命和行為，她先后熱烈地獻身于兩位黨的宣傳工作者。《青春之歌》的風格和氛圍很讓人想起五四時期的左翼作家，例如胡也頻（原文如此——譯者）。女主人公受到的囚禁和拷問（她精神成長的巔峰狀態）甚至也被高度浪漫化了。

第二部反映共產黨地下工作的重要作品是《紅巖》，由羅廣斌（1924—1967年）和楊益言（1927年— ）寫于1961年。它與《青春之歌》的反差是明顯的。楊沫的作品在出版后不久的一場重要討論中受到批評，因為她的理想化的重要女主角的資產階級立場，尤其是她的想法、語言，她整個的對革命行動的思考，都和群眾的生活有著差距。楊沫令人感動地響應了這一批評，在修改版中加進了新的篇章，其中女主角林道靜很不協調地被“派下去”——她在一個地主家以教師身份開展工作。和農村生活這種理論上的合并，最終并沒有減輕我們如下感覺：作者和她的主人公都是透過五四知識分子玫瑰色的鏡片來看待學生運動、黨的地下工作以及整個革命進程的。

而與之相對，《紅巖》則和理想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的距離十分相近。它基本上是紀實性的。羅廣斌和楊益言沒有寫過別的小說。他們于1959年寫成一本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在烈火中永生》是寫重慶郊外中美合作社的一家集中營里的政治犯，以及像他們本人一樣的地下工作者的親身經歷。時間是最緊張的內戰后期，當時國民黨正在抗戰時的陪都作困獸猶斗。羅和楊據說花了10年時間將他們的回憶錄改編成小說，并將300萬字的草稿最后潤色成大約40萬字的《紅巖》本文。錯綜復雜的敘述關涉到犯人們對剝奪、審問、誘惑和拷打的反抗，以及他們堅持不懈并最終成功地與監外的黨的地下組織和當地的解放軍部隊取得聯系。《紅巖》提供了一系列堅定的男女革命者的群像圖而并非只有一個主人公，也寫到動搖分子和變節者，以及奸詐而絕望的國民黨秘密組織的官員們。此書宏大的篇幅和嚴酷的主旨通過一系列強化寫成的高潮場景而得到好評：許云峰在他單獨監禁的牢房嘔心瀝血地挖掘越獄的地洞，直到他英勇就義；江姐面對高懸的丈夫血淋淋的頭顱，鎮靜地開展她自己的工作；華子良為保持自己傳遞消息的角色而裝瘋三年。

《紅巖》是為那些在二十多年的地下斗爭中獻身的無數共產黨人樹立的感人至深的紀念碑。它也許比其他共產主義文學作品擁有更多的讀者，作為電影和舞臺劇，它也具有最廣泛的知名度。它所記敘的事件的性質和特征使它完全可以躋身于中國散文史詩的傳統行列。

在所有那些力圖反映中國新型的共產主義社會倫理的小說中，柳青寫于1959年的《創業史》最具可信度。這是四卷本中的第一卷，而第二卷的第一部分直到1977年即柳青去世的頭一年才出版。柳青的身份是無法指摘的。他于1916年生于陜西，20歲加入共產黨，1938年奔赴延安。他發表過短篇小說，1947年寫成他第一部長篇小說《種谷記》，這是以抗日戰爭時期陜西農村的互助組的發展為背景的。柳青在內戰中的經歷為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銅墻鐵壁》打下了基礎。這部小說中的中心人物石得富來自農村黨組織，無論是國民黨的嚴酷囚禁還是大規模戰役中的英勇經歷，都無損于他對農民兄弟們的忠心耿耿以及他和他們的緊密聯系，從而樹立起了一個嶄新的游擊隊英雄形象。

這種英雄模式在《創業史》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它基本是梁生寶的故事。這個青年農民對社會主義合作化意義的認識越來越高，對合作化給陜西農村帶來的好處看得越來越清楚，于是他成了一個帶頭人就是很自然的結果了。梁生寶的魅力是此書成功的關鍵。他或許是個英雄，但他是個含蓄地表現出來的英雄。他是被慢慢地、而且是間接地通過他父親梁三老漢充滿批評的口吻介紹出來的，生寶總是先于自家財產而考慮集體利益，梁三老漢頑固的個人主義思想便受到公然冒犯。梁三老漢自身就是個引人注目的形象，他長期冥頑不化但最后轉變成為關心集體、富于自我犧牲精神的新形象，并且作為合作化帶頭人的父親而獲得了一種新的尊嚴。在60年代中期一場大討論中，這個“中間人物”被頻頻引用，因為他占據了柳青太多的注意力，但是要求將重點更專一地放在正面的英雄身上的批評家們，沒有欣賞到這個乖戾的父親作為一種烘托對那個“社會主義新人”——他的兒子梁生寶的寶貴作用。

慢慢地出場，而后籠罩在一束并不顯眼的光束中，梁生寶在為合作社一次出差途中顯示出他十分節儉，小說結尾則說他沒有承擔另一項任務并且同戀人又分了手，因為戀人認為他們兩人的個性都太強而不適于結成一項成功的婚姻。

《創業史》中的一個中心情節是梁生寶組織的到山上砍竹子編掃帚的遠征故事。當時正值農閑，而合作社需要資金；但是對梁生寶來說更重要的是這是一次證明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的價值的機會。當他率領的人自動團結起來搭成一間草棚時，他在想象中獲得了一種新的信心：

大伙這種親密無間，樂樂和和的情緒，深深地感動了年輕的領導。生寶精神非常振奮，并不是因為自動要求他領導的人對他服從，而是他又從這種現象獲得了一種新的認識。以前，他以為要改造農民，好嘛，在近幾十年內，準備著年年冬季開通夜會吧！現在，他看出一點意思來了，改造農民的主要方式，恐怕就是集體勞動吧？不能等改造好了才組織起來吧？要組織起來改造吧？（第403頁）

在整部《創業史》中，柳青關注的是梁生寶本質上是個普通人，這位可信的英雄從日常生活體驗中學到的東西要比書本上的多得多。正是因為我們可以貼近小說中的中心人物，所以讀者更準備接受柳青自己熱情洋溢地抒發的對華北平原美麗田園的玫瑰色未來的幻想。

居于英雄和壞蛋之間的“中間人物”，對外界觀察者來說他比前兩種人更像人，他出現于文學作品中常常增加了作品的可信程度。他不會惡毒地阻礙人性向前發展，也不會暗中破壞革命——他并不是個壞蛋——但他將個人的舒適和利益置于第一位，因而落后于英雄人物，換句話說，就是那種中不溜的人，好幾百年來已在生活中和文學作品中為人們所熟悉。

在意識形態專家看來，這種人已從中國基本上消失了，而代之以周揚所稱的“新時代的人物”：

一些具有資產階級偏見的作家總是認為：我們所描寫的人民群眾中的先進人物是不真實的，只有灰色的“小人物”或者卑劣的反面人物才是“真實”的。他們的論據是：每一個人都有缺點和毛病，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都隱藏著光明和黑暗的斗爭，這就是他們的所謂“內心的復雜性”。我們反對把人物的內心簡單化。新時代人物的內心生活，正是最豐富又最健康的。他們知道應當如何對待勞動，對待友誼，對待愛情，對待家庭生活，他們當然也有苦惱和內心的矛盾，也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犯這樣或那樣的錯失；但是他們總是努力把共產主義的思想和道德作為他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準則。[[32]](#_32_Zhou_Yang___Wo_Guo_She_Hui_Z)

茅盾站在相同的立場上：

選擇題材中重要的是看它有沒有社會意義，能不能反映時代精神。在人物刻畫方面，要舍棄修正主義者按人物的本來面目描寫的原則；人物身上的缺點必須表現為暫時的，可以改正的，如果無法改正，那就屬于階級敵人特有的注定要失敗的象征。社會陰暗面要描繪成讓讀者明白這是消滅反動勢力和解決矛盾沖突中不可避免的。[[33]](#_33_Mao_Dun___Fan_Ying_She_Hui_Z)

因此，當邵荃麟（1906—1971年）、秦兆陽以及其他一些人緊接著1962年8月份在大連召開的一次研討會，提倡更多地關注中間人物以提高生活的真實性時，他們被指責為倒退甚至是反革命活動，企圖從獻身于“共產主義思想和道德”的英雄人物身上轉移注意力，而這類英雄人物，現在據稱在總人口中占壓倒多數。批判提倡中間人物主將們的文章一直在1964年晚期的《文學報》上連載，而且勢頭越來越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的爆發，這時所有的這類討論當然不合時宜了。

陳登科（1918年— ）是個出生于農民的作家，他在抗戰和內戰的故事中認識了人生。他的長篇小說《風雷》（寫于1964年）是關于50年代中期將合作化強加給一個落后的村子（就在陳的家鄉安徽省）的一部作品，敘述最為大膽，充滿暴力。克服農民對合作化的抵制也是白危（1911年— ）寫于1959—1963年的《墾荒去》的主題：在這篇小說中，河南省（作家1950—1954年曾在此工作）黃河泛濫成災，留下大片荒地，黨領導下的農民就是與這些荒地作斗爭的。

孫犁（1913年— ）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因他的關于農村生活的短篇小說而備受歡迎，這些小說描寫老少兩代人對合作化的不同態度，這多少有點趙樹理方式。

在文學作品中反映工廠和礦山的生活始于職業作家草明、艾蕪以及其他一些人，但到了50年代后期從工人隊伍中涌現出一批寫工業題材的年輕作家。唐克新（1928年— ）因為是無錫人，其作品（大多是短篇小說）是寫紡織工人的。紡織廠也許缺乏一種由鼓風爐或煤礦產生的高度戲劇潛力，相對來說又小又舊的生產規模（至少是老式的紡織機）在工人中產生了一種持續的相互作用，在唐的作品中這些工人永遠是嘻嘻哈哈、互相輕侮，但是到最后都互相激勵著改進態度，提高生產率。《沙桂英》是一篇中篇小說，寫的是一個模范青年紡織女工的成長過程。沙桂英的名字與古代女英雄穆桂英是同名不同姓，而穆桂英是評書和傳統戲劇愛好者很熟悉的古代女英雄。沙桂英以對集體利益的無私奉獻爭取了一個落后同志，她和她換織布機，情愿用差一些的機器工作（后來她進行了修理）。她的高度政治良知讓一個單相思者、男性沙文主義者邵順寶感到羞愧，當然，經過她的責任感的灌輸，他接受了批評。

胡萬春（1929年— ）和唐克新聯系很緊密，像唐克新一樣，他的大部分作品僅限于短篇小說（雖然他也寫過劇本和電影腳本），并且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里仍然活躍于上海。胡的背景是機械行業和鋼廠，他的大多數小說都取材于此。他是個出色的文體家，能將日常生活司空見慣的現象加以提煉，使用到作品中，他最好的一些作品關注到老工人，像《晚年》（發表于1962年）中的順發。順發退休以后產生無用之感，而當他認識到他的工作對社會進步的貢獻時感到一陣欣慰。胡筆下的年輕徒工身強體壯，有飽滿的革命熱情，但頭腦容易發熱；而那些老練的工人師傅則有一副令人敬重的尊嚴，因為他們是新社會的主人，有一種責任感。因此發表于1958年的短篇小說《步高師傅所想到的》的結尾，當煉鋼老師傅的生產紀錄剛被他的徒弟超過時，他感到的只是滿足：

天亮了，紅彤彤的太陽，放出了萬道金光。從那轟鳴著機器聲的軋鋼車間里，又傳出了咚咚鏘鏘的鑼鼓聲。原來楊小牛乙班的全體工人，創造了一個新的紀錄。人們是這么高興，這么有勁，生活呵！在奔騰地前進！[[34]](#_34_Hu_Wan_Chun____Te_Shu_Xing_G)

金敬邁發表于1965年的《歐陽海之歌》，現在也許可作為“文化大革命”狂熱的不祥前兆來讀。這位年輕戰士為阻止一場列車事故而獻出了生命。這種真實生活中的英雄行為被說成是他在舊社會不幸的童年以及毛澤東思想對他培育鼓舞的結果。但是令人困惑不安的是：只有病態般的視死如歸，不畏犧牲，才是成為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必由之路嗎？作品明顯地暴露出“三位一體”創作公式的弱點，這一公式是領導提出思想內容，群眾提供生活素材，而作者貢獻寫作技巧。

#### 60年代的詩歌

毛澤東曾在延安《講話》中提倡發展“民族形式”。1960年，在一篇重要的政策性報告中，周揚描述了這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在百花齊放和推陳出新的方針指導下，一方面繼承和革新我國優秀文學藝術遺產，使它們成為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使各種形式和體裁的新文藝具有更耀目的民族特色。[[35]](#_35_Zhou_Yang___Wo_Guo_She_Hui_Z)

毛本人可以作為所有詩人的典范：要用群眾語言進行創作，但又堅持徹底的傳統古典詩詞的風格。當然，毛能瀟灑自發地這樣創作，而他又輕描淡寫地說他的詩不能真正算作對新文學的貢獻。做詩填詞只是他的愛好，而不必當成榜樣去效法。然而請不要過于相信這句話：毛畢竟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在傳統的形式中融入了新的主題和意象，這就給其他詩人指出了一條道路，詩人們也很快效法起他來。

毛最好的詩寫于建國前，像《長沙》、《雪》等，但直到1957年除夕[[36]](#_36___Ren_Min_Ri_Bao____1957Nian)才在《人民日報》上第一次公開發表。我們可以用《游泳》一詞來說明他的成就，這首詞是為慶祝他1956年暢游長江而寫作的：

才飲長沙水，

又食武昌魚，

萬里長江橫渡，

極目楚天舒。

不管風吹浪打，

勝似閑庭信步，

今日得寬余。

子在川上日：

逝者如斯夫！

風檣動，

龜蛇靜，

起宏圖，

一橋飛架南北，

天塹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斷巫山云雨，

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

當驚世界殊！[[37]](#_37_Mao_Ze_Dong___You_Yong___Xua)

《游泳》一詞嚴格地按照“水調歌頭”這種古典詞牌對音節和韻律的要求填寫，運用了一首3世紀的民間小曲，提到新省會的建立和歷史上被形容為“天塹”的長江。龜和蛇是長江兩岸兩座山的名字，它們都在武漢市；“神女”顯然是指公元前3世紀的一首賦中一個帝王的情人，“子”就是孔夫子了。毛整首詞駁斥的正是孔子的時間不變的觀點（原文如此——譯者）。通過運用巧妙的反語，毛把三峽水庫和武漢新大橋這些今天的成就與古代引喻糅在了一起。從中可以看出它象征了毛的個人成就：鐵腕使他跨越時空，統一了全中國，并帶領中國進入現代社會。

像毛這樣投人古典詩詞創作的其他國家領導人中，陳毅大概要算最嚴肅的一位了。他曾是名叱咤風云的戰將，后來任外交部長。他是位為人熟知的人物：1979年沙葉新創作了一部詼諧的喜劇《陳毅市長》，頗受群眾歡迎。它刻畫了陳毅擔任上海市長[[38]](#_38_Sha_Ye_Xin_Huan_Shi_Zao_Zai)期間那足智多謀的形象。1979年出版了他的包括150首詩的詩集。盡管他對傳統風格的詩的技巧駕馭得不如毛那么嫻熟，也不如毛那樣高瞻遠矚，但他的詩的確比朱德、董必武的生動。

60年代，郭沫若轉向了古典詩的寫作，以便與毛和詩。其實，對許多作家來說，古典絕句確實是簡潔的，它的魅力是難以抗拒的。甚至它也吸引了像蕭軍這樣以現代寫實散文而著名的作家。早年，他因與黨的領導發生抵觸，在延安時期就被逐出了文學界。但是，在那些受屈辱、遭放逐的歲月中，他始終保持著自己精神上的獨立，在下面這首絕句中，他通過老虎這一象征表達了自己的信念：

虎嘯山林百獸驚，

曠野獨行月色昏，

饑寒刺骨雄心老，

決不搖尾媚他人。[[39]](#_39_Xiao_Jun_1981Nian_8Yue_Fang)（未注明出處，按英文譯出。——譯者）

毛新舊兼容的主張明確地體現在戈壁舟的詩中。戈壁舟1916年生，從50年代起就成了著名詩人。1962年他發表了4首《新北邙行》組詩，北邙是洛陽附近古代陵墓的所在地，也是一個為人熟知的傳統的供人憑吊的處所。但是，這組詩歌中卻絲毫不含悲哀的意思。第三首末尾是這樣的：

在這新洛陽市里，

舊洛陽哪里去尋！

彩霞里伊水似風舞，

白云中洛河如龍騰，

看茫茫綠樹大海，

排排煙囪森林，

座座工廠似戰艦成隊，

成隊的戰艦呵，

開始了萬里航程！[[40]](#_40_Ge_Bi_Zhou____Bei_Mang_Xin_S)

60年代初期，抒情詩人們的整體創作成績不如他們之前的50年代前輩們那般絢麗多姿。革命顯然還沒有消除階級特權，詩人們可以歌唱新社會的喜悅，但必須牢記還要挫敗可能會再次造成威脅的反動力量。1964年，陸魯琪（1931年— ）寫了一首組詩《重返楊柳村》（組詩在那時十分流行），其中有一首叫做《算盤響》，詩中描繪了一本給人以深刻印象的革命賬本。詩人所聽到的響聲不是擁擠在一處的牲畜發出來的，也不是公社豐收裝運糧食時發出來的，而是打算盤的響聲。這里，算盤象征著對舊社會苦難的累計，也象征著和地主“清算”血債的戰斗。而現在算盤的作用也“轉變”了，不是用來收租子而是用于算工分。[[41]](#_41_Can_Kao_Xu_Zai___Zhong_Hua_R)

嚴陣（1930年— ）最初以《老張的手》一詩獲得贊譽，這首詩集中描寫了一個寸地全無的農民的一雙手，生動地表現了他的“翻身”。這雙手先是為地主種地，隨后拿起了討飯碗，再后來在革命中扛起了槍，又參加了修淮河挖新渠的工作。最后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叩響了大地的門環”。

1961年，嚴陣完成了詩集《江南曲》的寫作，它表現了農村富于詩情畫意的美好生活，嚴陣將農村生活理想化了，使人想起舊戲中富于浪漫色彩的華麗辭藻。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他那微笑著的原野顯然也意識到了自己的冬天：

雪原上的松柏林：我贊美你，

你綠得濃郁啊，你綠得堅強。

深山里的臘梅花：我贊美你，

你開得熱鬧啊，你香得久長。

贊美啊，枝條正在雪下生添新綠，

贊美啊，根須正在泥里孕育芬芳，

冰塊下，激流正在日夜歡笑啊，

天空間，春雷正在云霞里蘊藏，

誰說冬天是風雷的世界呢？

不，風雷只是冬天的一種現象。[[42]](#_42_Yin_Zi_Zhang_Zhong_Deng_Bian)

寫這首《冬之歌》時，嚴陣正經歷1959—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他通過吟詠1月盛開的臘梅，贊美了人民那堅忍的耐力，而不像10年前那樣歌詠紅牡丹，那時幾乎是遵命而作。

郭小川（1919—1976年）40年代在延安時就開始了詩歌創作，到60年代，他成為主要詩人之一。郭小川嘗試過的詩歌形式和主題非常廣泛。他1959年創作的《望星空》節奏強烈、深刻感人，但卻被攻擊為有極端個人主義傾向，其實他的詩的主題通常是大眾化的，比如他1963年用“新辭賦體”創作的《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這片土地喲，一直如大夢沉沉！

幾百里沒有人聲，但聽狼嚎、熊吼、猛虎長吟；

這片土地喲，一直是荒草森森！

幾十天沒有人影，但見藍天、綠水、紅日如輪。

……

哦，沒有拖拉機，沒有車隊、沒有馬群……

卻有幾百畝土地——在溫暖的春風里翻了個身！

哦，沒有住宅區，沒有野店，沒有煙村……

卻有幾個國營農場——在如林的帳篷里站定了腳跟！[[43]](#_43_Guo_Xiao_Chuan____Gan_Zhe_Li)

這首詩共有17小節，由大段隔行押韻的排比句組成，有力地表現了詩歌的內容，謳歌了那片嚴峻、荒涼卻又值得奉獻的土地。

郭小川是一位認真投人的多產作家。對他來說，大海提供了象征著人民群眾革命力量的豐富隱喻，這在他的同時代人來看也是一樣的。在《致大海》一詩中，他對大海的呼喚帶有某種對詞語的硬性注釋：

我要像海燕那樣，

吸取你身上的乳汁，

去哺養那比海更深廣的蒼穹；

我要像朝霞那樣，

在你的懷抱中沐浴，

而又以自己的血液把海水染得通紅；

我要像春雷那樣，

向你學會呼喊，

然后遠走高飛去嚇退大陸地上的嚴冬；

我要像大雨那樣，

把你吐出的熱氣變成水滴，

普降天下，使禾苗滋長

使大海歡騰……[[44]](#_44_Yin_Zi_Zhang_Zhong_Deng_Bian)

郭小川較為著名的詩有：創作于1955年的組詩《致青年公民》；創作于50年代末期的《將軍三部曲》以及《甘蔗林——青紗帳》，在后一首詩中，他極其嫻熟而自如地運用風景對照描寫手法，列舉了祖國南北發生的社會主義變化。

和郭小川一樣，賀敬之（1924年— ）的詩歌創作也顯示出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影響。他直到現在仍不斷創作“樓梯式”風格的詩（即形式上不斷反復，詩行短小）。早期作品中，他則采用“信天游”對句的形式，這種形式是由民歌借鑒而來的，李季創作《王貴與李香香》時最先采用過。賀敬之的詩比郭小川的更明顯地帶有政治色彩。1956年，他創作了《回延安》，這一主題在當時十分流行。他于1963年創作的《雷鋒之歌》，謳歌了這位勇于犧牲的模范戰士，使其成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最好學習教材。這首詩在當時各種風格類型的大量詩篇中十分突出。

郭小川和賀敬之在他們的作品中都保持了那種無懈可擊的熱情，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使得他們在“文化大革命”那個相當貧乏的時期，仍能繼續成功地創作。

李瑛（1926年— ）在他創作的大約20個詩歌集子中，謳歌了30年部隊生活中的那些戰友們，贊美了他游歷過的大好河山。他曾就讀于北京大學，后來投筆從戎。在借鑒中國傳統古典詩詞時，他不是醉心于其中的引喻或過時的修辭風格，而是學會詩人用訓練有素的眼光去發現新鮮的意象。《邊寨夜歌》一詩用的是唐代神圣的主題，李瑛可能是希望求助于杰出的詩人李白：

邊疆的夜，靜悄悄，

山顯得太高，月顯得太小，

月，在山的肩頭睡著，

山，在戰士的肩頭睡著。[[45]](#_45_Yin_Zi_Zhang_Zhong_Deng_Bian)

盡管李瑛和其他詩人一樣，也感到有義務去寫具有明顯愛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主題的詩歌，但是他的創作主題更普遍地卻是寫戰士的日常生活，抒發看到日出的歡樂（像戈壁上的“雉雞的翎羽”），或是描寫海岸堤壩下那洶涌奔騰的大海。他總是從小的事物落筆，為一盞瞭望燈、一棵棗椰樹，或是一排防風竹籬，然后通過想象點出風景的神韻來。在堅定的浪漫主義到來之前，李瑛的詩也可能沉湎于感傷主義之中。他贊美一位炊事員走路比鹿輕，起得比鷹早，然而在詩的末了幾行，他因結尾幾行大膽描繪炊事員的形象而獲盛譽：那位炊事員挑著燒早飯的水桶，一個水桶里盛著紅太陽，另一個水桶里是藍色的小山。

聞捷（1923—1971年）是寫邊塞風光的詩人，1954年，他創作了《吐魯番情歌》，他后期的詩歌創作于60年代。這一時期，嚴辰（1914年— ）在他的詩中也熱情歌頌了祖國大地的美好。在毛以后的時代，他擔任了《詩刊》的主編，成為新詩最有影響的倡導者之一。

#### 歷史劇——一種表示抗議的工具

中國戲劇愛好者曾津津有味地講述一件軼事，這件事能夠說明傳統戲劇形式大受青睞的程度以及它對新話劇發展的阻礙。話劇剛出現，還是新生事物時，有一次，一位劇作家去參加他自己創作的話劇的首場演出，但他遲到了，可他發現雖然演出已經開始，卻仍有一群人在劇場門廳里閑蕩。他問他們為何不入場，他們說：“噢，演員們還沒演戲呢，他們正站在臺上閑聊”——顯然，缺少音樂、歌曲、舞蹈動作的東西就不會被看成是戲劇。

人們曾經認為戲劇的形式是中國舞臺上的精華，這導致了“革命現代戲”的發展，它成為“文化大革命”期間最高的表演形式（而且幾乎是唯一的成果）。這些作品的真正開先河之作是《白毛女》。

迅速的作曲配樂的采用，使這種宣傳形式很容易鼓動農民觀眾反對地主階級，抗擊日本侵略者，這構成了30年代以來解放區文化生活的一個特征。《白毛女》是超越這一傳統、最富雄心與創見的一部作品，這一整出戲都是根據40年代初發生在河北的真事寫成的。它由魯迅藝術學院的師生們集體創作，在賀敬之的領導下修改定稿，這出戲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頭幾年最受歡迎的舞臺劇之一。

這個故事講的是一位姑娘被惡霸地主搶去，后來逃了出來，在山洞中躲藏了數月，以樹根野果充饑。窮困的生活使她變得滿頭白發，迷信的村民們昏暗中遇見她都以為撞上了鬼。直到八路軍解放這里之前，地主一直利用“鬼”，以達到他那無恥的目的。姑娘以前的戀人跟著八路軍回來了，他勇敢地站出來，驅除了“鬼”，找回了失去的愛。姑娘在劇中的結束語里，喊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正義終于勝利地回來了。歌劇《白毛女》在1951年贏得了斯大林獎，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白毛女》的故事被改編成現代芭蕾舞劇，并搬上了銀幕，而不是“樣板歌劇”了。

田漢創作的《關漢卿》是新中國成立后上演的新戲中最感人的一出戲，同時也是最直露地要求給藝術家以自主權的一部作品。田漢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是位多產作家，他還擔任著戲劇家協會的主席。在《關漢卿》一劇的創作中，他對主題的選擇是高明的。13世紀是元雜劇的鼎盛時期，關漢卿是當時一位開風氣之先的劇作家。現在他被譽為具有戲劇表演和創作才能，對藝術有著深厚學術研究的民間藝術家。關漢卿可能行過醫，當過演員，除此之外，對他的生平知之甚少。然而重要的是，他在多部戲中，都表現了鞭笞肆虐的富豪惡霸，保護受壓迫婦女的立場。

田漢創作的《關漢卿》從本質上來說，表現手法是高度現實主義的，但是，其中又包含了很多像傳統戲劇一樣的快速變換場景的因素，帶上了大量的歷史色彩，又添加了一些關漢卿的杰作《竇娥冤》中的片斷。《竇娥冤》里有些臺詞是中國戲劇里最有煽動性的。縣衙門被描繪成一個倒扣著的碗，真理之光絲毫也不能透射進來，官吏們充耳不聞百姓的冤屈，竇娥這個年輕的寡婦被處決時，天氣顯現反常（時值盛夏，突降大雪——譯者），表明蒼天也認為她是無辜的。當時蒙古封建領主對這出戲中直露的內容不能容忍。命關漢卿修改劇本，以便為某位大臣表演時少一點攻擊性。但關漢卿拒絕修改，他的演員班子也支持他進行勇敢的抵制。威脅和懲罰都不能使關漢卿屈服。田漢十分注意這些情節，并在他的劇中用這些情節組織起主要矛盾和沖突。田漢的這出戲最終以關漢卿被放逐為結尾。田漢給《關漢卿》以及另一出戲《謝瑤環》設計的結局預示了他自己的命運：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死于獄中。

1961年發表的《謝瑤環》是田漢根據一部名叫《女巡按》的民間舞劇改編成的京劇。這部戲發生在唐朝武則天女皇統治時期，劇中，武則天被描寫成一位受蒙蔽的統治者，她言路閉塞，過分寵信野心勃勃而又暴虐成性的大臣。謝瑤環作為武則天的欽差大臣，被派往地方上去安撫農村剛剛興起的暴亂，這些暴亂是由那些大臣以及他們在地方上的爪牙的壓迫行徑所引起的，謝瑤環臨死前拼著最后一口氣提醒武則天皇帝要警惕大臣們所掌握的破壞性權力。

由于《謝瑤環》明顯涉及到即將出現的毛領導的失誤，這出戲被當做當代戲劇中的“三株大毒草”之一而遭到批判。另兩株“毒草”是孟超編寫的發生在宋代的鬼魂劇《李慧娘》，以及在《謝瑤環》前一個月發表的《海瑞罷官》，它是由杰出的歷史學家吳晗（1909—1969年）創作的，這出戲是所有這些作品中爭議最大的。吳晗從1949年起就極少發表作品，“大躍進”中他還受到了沖擊。他認為要樹立一個反對濫用權力的榜樣，海瑞這個歷史人物是一個最好的“古為今用”的典型。海瑞是16世紀一個學者型的官吏，明朝時有許多反對暴虐、仗義執言而犧牲生命的監察官、地方官和其他一些公職人員，海瑞是他們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他第一次上書勸諫皇帝，就被判處死刑。這段故事早已被上海的演員兼劇作家周信芳改編成了新歷史劇。吳晗按照傳統公案劇的方法塑造海瑞。劇中，一開始海瑞新被任命為地方官，來審理告老還鄉的太師之子犯下的行兇奪財案，海瑞站在受害農民一邊，拒絕了太師的賄賂和威脅。地方豪門及其同黨施展陰謀詭計，使海瑞被罷官解職。在戲的最后一場，海瑞拒絕移交官印，一直等到他聽見行刑炮聲已響，知道下屬已按他的命令將罪犯處決，才將官印移交給他的繼任者。

從形式上來說，《海瑞罷官》是標準的京劇，在九場戲中都有一些受人歡迎的老套套。例如，海瑞的老母多次重復孔子關于“德”的訓誡。這出戲剛上演時并未引起太大的波瀾。比起田漢的《關漢卿》，等鞭撻虛偽、暴虐的戲來要小多了，然而它最終卻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這種命運是批評家姚文元強加在它身上的。姚文元從1965年下半年開始了闡釋這出戲的工作，從一種先驗的結論出發，這出戲被讀解成替彭德懷元帥翻案的辯護狀，彭德懷元帥因為反對“大躍進”而遭降級并最終被清洗。那么海瑞就是彭德懷，而把土地還給農民就是主張解散人民公社，而在這一切（戲中強烈地暗示過的）的背后是被蒙騙的皇帝——毛澤東本人。

##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臺灣的新作家，1966—1976年

#### 革命樣板戲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曾是位演員，她致力于戲劇振興。1964年6月到7月間，在一次當代主題的京劇匯演中，江青作了一個發言，她批評傳統戲劇“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46]](#_46_Jiang_Qing___Tan_Jing_Ju_Ge)而這種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垃圾必須要從舞臺上清除掉，讓位于表現當代主題的作品，另外還要從傳統戲劇中、從西方流行的歌劇和芭蕾舞中盡可能地吸取音樂和舞蹈的營養。自60年代初起，出現了五出所謂的“樣板戲”。《海港》是五出戲當中唯一一出非軍事題材、具有嚴格當代主題的作品。它描寫了與海港上的破壞者進行的斗爭。《紅燈記》和《沙家浜》是五出戲中最受歡迎的。它們的故事都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前者謳歌了鐵路工人的英雄主義，后者講述了一個茶館的老板娘幫助抗日軍隊的故事。其余的樣板戲（最早的那一批——70年代初期又產生了幾出）有《智取威虎山》，寫的是1946年一個解放軍小分隊攻占匪巢的故事。還有一出是《奇襲白虎團》，是有關朝鮮戰爭中的故事。按照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及不斷創新的觀念，樣板戲經過了反復的修改。從早期版本到后來版本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矛盾沖突越來越尖銳，反面角色被臉譜化，灰色調完全從英雄身上消失，再也不存在任何資產階級的痕跡。《沙家浜》中的主角本來是茶館的老板娘——地下黨員阿慶嫂，可在作品的表演中，重點越來越落在郭建光和他所帶領的解放軍（原文如此，應為“新四軍”——譯者）戰士的身上。郭建光在舞臺上跳躍、造型時，他那令人目眩的白制服震懾著人們的雙眼。

盡管樣板戲充滿了善與惡簡單化了的表演，配樂也是為純粹的藝術家所反對的柴可夫斯基式的，道具和燈光效果過于精致，但它還是產生了短暫的戲劇性的光彩，實現了真正的大眾化，然而由于一再重復表演而削弱了它的影響。阿慶嫂是成熟的女演員想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為了打消別人懷疑她實際上是與共產黨聯成一氣，她聲稱對所有的茶客皆一視同仁，包括忠義救國軍軍官刁德一。“人一走，茶就涼”，阿慶嫂一邊唱，一邊恰到好處地將狼狽不堪的刁德一手中的剩茶倒掉。她最精彩的片斷出現在達到高潮的很長的第七場。偽軍拖出一個老村婦，要把她當成共產黨的奸細槍斃。忠義救國軍軍官們一直千方百計想揭開阿慶嫂那漠不關心的假象，這時候，他們盯著阿慶嫂——很快她就將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了。然而沉默了片刻，她忽地站起來，“司令！”阿慶嫂開口了，他們等待著，但是阿慶嫂非常輕松自然地接著說道：“我該走了。”反面角色的陰謀破產了。不久，他們特意留下老村婦的命，以便控制她作為誘餌，好抓住那謎一樣村莊中其他的共產黨員。

張永枚（1925年— ）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能夠創作的極少幾位作家之一：他在1974年發表的長詩《西沙之戰》得到了江青的首肯。張永枚長期創作軍隊生活的詩歌，將革命熱情融入作品之中。早在50年代初，他就創作了一首有關士兵傳奇故事的詩（即《騎馬挎槍走天下》，這是他最有名的一首詩歌），詩中，描寫了同志情誼，軍民“魚水”關系以及朝鮮、越南戰場上戰士們英勇抵抗的事跡。

#### 浩然的小說

至少對局外人來說，70年代的中國文壇除了修改革命現代京劇以外，唯一的創作就是浩然的短篇小說了。這位作家如此之多產，以致有人懷疑說“浩然”不過是一個“文化大革命”的寫作班子的共同筆名罷了。不錯，“浩然”正是梁金廣（1932年生）的筆名，他所寫的關于農民生活的小說是與趙樹理、柳青這樣的主流作家一脈相承的。

像搶救一匹瘦病馬、修理一輛小推車這種事情，浩然也能夠寫成短篇小說（《一匹瘦病馬》、《車輪飛轉》）。寫前面這篇小說時他運用了一個程式——這個程式雖非他首創，但他把它發展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敘述者——一個干部或者一個記者——重訪一個村子時發現一個大有進步的變化，這里說的是一匹毛色光滑、漂亮無比的拉大車的馬。令敘述者大為驚訝的是，這正是他上次來訪時所看到的那匹可憐的劣馬。接下來通過倒敘講了一個青年社員如何不使公社的寶貴財產受損失的奉獻故事。當然，最后不僅是馬得救了，更主要的是，主人公和他的同伴也上了一堂生動的自力更生的課。《車輪飛轉》也表現了同樣的主題，但敘述的方法用的是“遞進”——一種在中國小說的抒情傳統中所慣用的方法，微末瑣事，層層累積，終臻濃重效果。發生在小推車修理過程中的小插曲似乎瑣碎至極，對話也只有透過學校操場上少年的喧鬧才偶爾聽到一兩句。但是最后，在兩個青年戀人與勞動環境之間建立起一種令人信服的關系。浩然曾用一個吃甘蔗的小孩來描述對他的短篇小說的閱讀體會，那是說，你嚼的時間愈長，就愈有滋味。

從1956年發表第一批短篇小說至今，浩然的小說已愈百篇，收入多個集子。但他最知名的還是兩部多卷本長篇小說，一部是寫于1964—1966年的三卷本《艷陽天》，一部是寫于1972—1974年的兩卷本《金光大道》（與柳青的《創業史》有許多共同之處，這部書也和《創業史》一樣原打算寫四卷，但沒有能完成）。這兩部小說講的是農村合作化的曲折歷史，但在時序上正好相反：《艷陽天》的故事的發生限制在1957年夏天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里，正值夏收，進步的貧農起來斗爭，挫敗中農、富農等鄉鄰不顧公社利益試圖自肥的陰謀，這里浩然的方法是全景式的，許多性格鮮明生動的男女老少形象紛紜雜呈。《金光大道》故事結束的時候正是《艷陽天》的開始，前者大體上講的是50年代初貧苦農民組織起來戰勝貧窮，克服戰爭、饑荒和地主破壞所帶來的惡果；這一切努力時而顯得凄婉，但最終卻顯出英雄（主義）來。這部作品在時間跨度上更大（像柳青的《創業史》，有一個革命前的序幕），浩然更著力于展現一組先進的代表人物及其勝利的過程，或者一組落后的代表人物及其失敗的過程。這部作品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服務于“路線斗爭”，以“三突出”為結構原則。“金光大道”當然是社會主義者的道路：為相互的利益團結一致，為公眾的利益自我犧牲。小說再現了高大全及其同伴這樣的最貧苦的農民與地主、富農以及對地富分子懷有同情的誤人歧途的農民之間的對抗，后者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路線甚至不能使他們自己致富。“三突出”是那時為藝術創作所設定的一個公式的簡稱，這個公式受到“文革”領導人的贊賞：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像《創業史》里的梁生寶一樣，高大全得到黨支部書記和其他干部的引導，也從對毛主席著作的如饑似渴地學習中得到教益。不過，作為“文革”年代里意識形態強化的典型產物，《金光大道》也遍布著偉大舵手的黑體字的語錄。高大全比梁生寶更類型化：心理上更堅強，道德上更富于自我否定，革命熱情的火焰熊熊燃燒。他鶴立雞群，明顯地突出于同伴之上，那些同伴可能更激進，但缺乏頭腦；或者更謹慎，但少了魄力，一句話，高大全是個完人。惟其完人，卻也因此少了人情味兒。早在《艷陽天》里浩然就已露出好走極端的苗頭：“為了社會主義”，為了不錯過寶貴的夏收季節，黨支部書記肖長春中止了尋找他的年幼的兒子的工作——他的兒子被一個蓄意破壞的過去的地主劫持了。《金光大道》里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形夸張，時而失實。當高大全只手挽救傾覆的馬車，伸出膝蓋抵住，讓同伴把接榫扳回榫窩，又大無畏地沖下山道的時候，他就從一個可信的英雄降為民間傳說中那個大力神保羅·布尼安了。

《西沙兒女》寫于1974年，在這部關于海南島漁民民俗和漁民戰斗業績的中篇小說中，浩然發展到抽象的抒情浪漫主義的程度。批評家對此不能接受，他們把它看成是對江青的阿諛逢迎。隨著“四人幫”的倒臺，浩然也就失去了他作為中國最多產小說家的地位。

但是很難想象浩然不會卷土重來。在講故事的絕對流暢方面沒有誰比得了他。用精心選擇的細節來使人物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富于感染力，從庸常瑣碎中搶救出的小插曲也飽含寓意，而象征則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結之處蓄著力量的繩索——一個生動的故事所具有的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水般出自浩然。他在《西沙兒女》中的主要藝術（區別于政治的）缺點是他寫了他所不熟悉的題材；華北平原的農民生活才是他親切熟悉的，深切體驗過的，也是他能夠隨心所欲地表達出來的。

#### 臺灣新小說

作為一種歷史的諷刺，正值大陸文學受到嚴酷壓制之際，臺灣文學卻蓬勃發展起來。在臺灣發表作品的作家（包括不在臺灣居住的作家，如：張愛玲、白先勇長期居住在美國），沒有受到既定意識形態的控制，因而，他們從本民族的文學遺產中汲取精華的同時，也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圍內從各個時期不同的藝術思潮中吸取養料。他們之中一些卓越的詩人和小說家的優秀作品是現在活著的華人作家至今仍無法超越的。從1980年開始，已經有一部分作品陸續在大陸出版，當臺灣作家先進的創作技巧和大膽的社會批評態度被大陸作家發現后，將對大陸作家產生何種影響，這是今后發展的最有興趣的事情。

張愛玲（1921年— ）是在日本占領時期的上海開始她的創作生涯的。她的一些極其精美的短篇小說收集在她的小說集《傳奇》里。1952年，她離開大陸去了香港，創作了兩部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它們都是在1954年這一年寫成的，在這里，張愛玲表現了從共產主義“新”道德中醒來的痛苦，這種覺醒在時間上卻早了幾十年。雖然這兩部作品也可以稱得上是力作，但從藝術水平來講，卻無法與其1943年的作品匹敵。《傳奇》依然占據著張愛玲和她的讀者們的心。

《傳奇》中的《金鎖記》描寫了一個大家庭衰敗、墮落的歷程，故事的背景與張愛玲自己在上海和天津的家極為類似，她曾在那里度過了她悲慘的童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七巧是一個被賣給一個富貴人家的殘廢兒子做妻子的女孩兒，在這個封閉、幽暗的大家庭里，在癱瘓不起的丈夫身邊，她葬送了自己美妙的青春和生活的熱情，變得越來越衰老，越來越痛苦，甚至染上了鴉片癮，最后，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變態地）尋求報復。且不說這篇小說在文體上的簡約精致，單就其在感覺想象上的豐富、精微和在對人物行動觀察上的敏銳深入來說，也是十分令人稱道的。

自從1955年移居美國之后，張愛玲的健康狀況一直很糟糕，基本上是過著一種深居簡出的生活。1967年，她用英文出版了The Rouge of the North一書，它是對《金鎖記》的基本敘事主題的回復和擴充，1968年，經過翻譯和潤色后在臺北出版，中文名為《怨女》。

張愛玲認為罪惡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會根深蒂固，受扭曲心理驅使而變得更為復雜。她之所以精心地對《金鎖記》的故事進行重寫和擴充，就是要揭露這深重的罪惡。

自從18世紀的《紅樓夢》之后，中國的小說還從沒有如此深入地揭示過這一主題。《紅樓夢》這部中國古典名著，正是張愛玲藝術靈感的主要源泉。

1949年以后，臺灣真正杰出的小說并不是很快就涌現出來了。有一個人也許作了一點貢獻，他就是楊逵。他的小說以揭露日本占領期間的社會現實而聞名，但1949年他因批評國民黨而被關進監獄長達12年之久。70年代中期，他重新開始發表作品。作為臺灣本土出生的作家，他被當做臺灣“鄉土”文學運動的代表人物。另外，姜貴（1907年— ）1957年發表的《旋風》和陳紀瀅（1908年— ）的《荻村傳》也以他們對幾十年的動亂的生動描述引起了人們的注目。這些動亂最終以共產黨的勝利而結束。

朱西寧（1926年— ）是一位頗有天賦的作家，自從50年代以來，他一直在不停地發表作品，創作包括長篇和短篇小說。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曾在軍隊服役多年，他的作品以強烈的戲劇沖突展現了人們在道德上的兩難困境，從而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鐵漿》創作于1961年，他在這里描寫了一個英雄部落的首領，他為了迎接敵手的挑戰，以一種驚人的方式——喝下熔化的鐵水而自盡——來展示他的英雄氣概。在小說的敘述中，部落首領的壯烈犧牲成了英雄價值的象征和抗議現代入侵的宣言。他的另一部作品《破曉時分》發表于1963年，在這里，他講述了一個中世紀的中國故事（即《十五貫》或稱《錯斬崔寧》——譯者），但他以一個善于進行哲學反思的敘述者代替了傳統的“說書人”，從而大大改變了故事的敘述結構、敘述角度和主題內涵。但朱西寧對口傳下來的優秀故事仍十分喜愛。另外還有一位酷愛故事的作家，他就是司馬中原（1929年— ）——這是一位天生會講故事的人。這兩人年齡相仿，作品的基調也相似。

白先勇生于1937年，他是白崇禧將軍的兒子（白是國民黨最有實權的軍事領導人之一）。這就無怪乎他會在他那些最感人的作品里（如《梁父吟》）描繪了這位英年已逝的將軍的悲槍，和當他回憶往年戎馬生涯時為接受別人敬禮而將老態龍鐘的躬背挺直。1960年，他與王文興（生于1939年）一起創立了深具影響的《現代文學》雜志。在《現代文學》上發表作品的作家都是藝術造詣頗深的人，他們的寫作技巧在中國小說里是不多見的。其中，白先勇的貢獻尤為突出，完全可與張愛玲媲美。他將現代反思手法、時間的結構安排、敘述方式的多樣變化與他在選材和藝術趣味等華夏文化精髓方面的嫻熟技巧融為一體，這是他的突出貢獻。他的早期作品《玉卿嫂》十分鮮明地體現了蘊含在他全部創作中的幾個特點：敘述者的觀察、理解力是敏銳的，但卻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這篇作品里是通過一個男孩的追憶）；描寫下層人物（這里是一個青春已過的女仆）的深層情感；由極度的性激情而突變成駭人的暴力。白先勇最著名的作品是1971年出版的《臺北人》（小說集），其中，《永遠的尹雪艷》是第一篇由臺灣介紹到大陸的作品，登載在1980年的《當代》上。我們很容易明白這其中的原因：美麗的尹雪艷在精心的保養下青春長駐，而那個丑陋的大亨吳先生則眉毛都快掉光了，他們之間的關系反映了在新發跡的臺北又重現了資產階級上海墮落生活的丑惡本質。

王文興除一些短篇小說外，只創作了兩部長篇小說，但每部都引起了一陣轟動。《家變》創作于1972-1973年，這部作品在形式上進行了大膽的革新，語言上也打上了明顯的作家個人風格的印記，沒有明白確定的結尾，而這正蘊含了作者的深意。全書分為157個章節，其中一些章節只有幾行字，作為對范曄（書中主人公——譯者）的童年和青年時期的印象式記敘。全書的主要部分是表現范曄對其父由崇敬到鄙棄的轉變過程，巧妙的穿插部分則逐漸使我們明白范曄的父親3其實是被他的殘暴虐待趕走的，而范曄對其父所做的一次失敗的追尋則出于一種復雜的心理動機：好奇和悔恨。這部作品曾因其違反傳統道德而不被接受，而在很多情況下，讀者對其寫作形式的抗拒同與對其道德含義的抵觸同樣強烈。這一時期，王文興受到詹姆斯·喬伊斯的很大影響，因而在作品中很自然地顯示出喬伊斯的風格：語言的高度自覺，雕琢語句并創造新詞，對語音字形和超句法結構進行試驗。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他1981年創作的另一部作品《背海的人》，在這部小說里，他用了一大段對于猥褻情景的描寫作開頭（可能是為了從一開始就把那些不想成為超越性文學的讀者的人趕跑），并且，在接下去的文字中也繼續這種暴露性的描寫以構成一個失敗的、一個比《家變》中更虛無、更充滿道德焦慮的世界。

陳映真（1936年— ）是在臺灣出生的作家，他的影響大大超過了他為數不多的創作實績（一些短篇小說和散文），這部分是由于他對作家自由精神的英勇捍衛——為此，他曾被關押長達7年之久（1968—1975年），此后還進一步遭到騷擾。陳映真生長在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他的作品里也多次出現基督的形象，以在這個充斥暴政的世界里增添一種殉道者的神圣氣息。他是在大學里學英語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禁止離開臺灣。

他寫的都是一些平凡的、樸素的故事，有時帶有一點諷刺的筆調，但大多數的時候是充滿深深的同情的。他筆下的人物也大都是些不幸的、無家可歸的人，他寫他們面臨的失敗、忍受的痛苦和最終的死亡，并試圖揭示出關于生存的某些真理。他把他的主人公們置于難于應付的社會環境之中，因而使他們顯得有點狡猾，帶一點通俗喜劇的色彩。在他的小說世界里，會有無緣無故的死亡發生，而直到故事的結尾也將看不到什么出路存在。小說提出的理論、試想可以給人以巨大的鼓舞，但落實到具體實踐上則顯得有些抽象，無法貫之以行動。陳映真的代表作是《將軍族》，它的力度是20世紀中文短篇小說中沒有幾個能望其項背的。《將軍族》描寫了兩個樂師——一個年邁的大陸人和一個年輕得足以做他的女兒的妓女之間崇高而純潔的愛情。1967年出版的《六月里的玫瑰花》描寫了另一段絕望的愛情——在一個黑人美國大兵和一個與他一起從越南逃走的酒吧女招待之間，作品表現了屠殺者和被屠殺者，女友和母親以及無辜的越南孩子之間相互憐憫而又相互憎恨的情感。

對臺灣虛偽政治的強烈反對和他在作品中對臺灣當代社會深層問題的一再揭示，自然地把他推向了“鄉土”文學運動的前沿。“鄉土”文學運動興起于70年代，后逐漸發展起來，在推進嚴肅的中文創作方面與“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展開競爭。陳映真理所當然地成為這一運動的理論領袖。

聶華苓（生于1926年）、於梨華（生于1931年）和陳若曦（生于1938年）這三位著名的女作家也是身居美國，但仍在臺灣發表作品的作家。聶華苓和於梨華已從事創作多年，她們的作品帶有鮮明的女性特征，“受挫”是她們作品里經常表現的主題，不管受挫的是少女的愿望還是少婦的雄心。於梨華曾被當做“無根的一代”的代言人。聶華苓一部最重要的創新之作是她于1976年創作的《桑青與桃紅》，描寫了一個中國婦女的痛苦經歷，她在本國連年戰亂的顛沛流離中喪失了本真的自我，又在加利福尼亞遭受了如當年唐納會（Donner party，中國19世紀眾多涌向美國的華工中的一個組織）般悲慘的命運。

陳若曦在1967年隨丈夫回歸大陸以前已是成名的短篇小說作家。在大陸7年中（這正是“文革”開始的七年），她報效祖國的夢想徹底化成了理想幻滅的痛苦。離開大陸后，她于1976年創作了著名的《尹縣長》（短篇小說集），首次以令人信服的事實向外界揭示了“文革”期間中國人民所受到的壓抑、迫害。

“鄉土”文學運動在70年代蓬勃發展起來，創作出一批數量相當可觀的作品，尤其是在小說方面，它顯示出的原始的創造力和強健的生命力給讀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鄉土”作家，顧名思義，就是那些在臺灣出生的，沉醉于活生生的臺灣鄉村或小鎮生活，而避開那些流亡、懷鄉等創作主題的作家。陳映真自然是屬于這類作家，黃春明（1939年— ）、王禎和（1940年— ）和王拓也在此列，并且取得了更顯著的成就。他們深入細致地表現了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目不識丁者、耳聾口啞者、一無所成者所忍受的痛苦和他們面對生活的勇氣，當然，也有他們的幽默：黑色的幽默或荒唐的滑稽。黃春明的諷刺文體具有寓言的力量，如1975年創作的《小寡婦》，它描寫的一個精明機靈的商人有一天忽然靈機一動，想開一個酒吧，在這里，未婚少女可以將自己假扮成年輕的寡婦，穿上古典的服飾并效仿古代美女那樣優雅的舉止，以刺激那些興趣麻木的顧客。這是中國傳統的賣淫方式進入到現代商業社會的一個絕妙的象征。王禎和最著名的小說是1966年創作的《嫁妝一牛車》，它講述的是一個絕妙的古老的故事：妻子與人通奸。可憐的聾車夫萬發為了一輛牛車將自己奇丑無比的妻子讓給了一個比他有錢但卻在胳肢窩下長滿癬的令人作嘔的人。王禎和在作品里使用了大量的土語方言，常常多得不得不用腳注來加以解釋。這大大增加了他作品的現實感。比起黃春明和王禎和來，王拓的作品在思想意識方面更大膽潑辣，敢作敢為，1979年12月“高雄事件”之后，他與楊青矗等人一起被捕。楊青矗的作品與黃春明有不少相似之處，也描寫了窮人如何因貧困而墜入賣淫、墮落乃至殺人的深淵，但他的作品帶有更多的左拉式的性和暴力的成分。

恐怕在所有的海外作家中，沒有一個像張系國那樣繼續被中國人的身份問題苦苦糾纏，難以解脫。張系國1944年出生于重慶，他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數學家和工程師。他不僅創作小說，并且因對文學形式的探索和具有現代寫作風格的熟練技巧而出類拔萃。他創作過短篇小說、散文和長篇小說，其中最著名的是1975年創作的《棋王》。他筆下的主人公是一些處于政治兩難困境中的知識分子，在朋友的信義和愛國的原則之間進行抉擇，對20世紀后半葉做個中國人的含義進行苦苦的思索。

#### 臺灣新詩

盡管久居香港，余光中（1928年— ）仍是臺灣最負盛名的詩人之一。他于1954年參與創立的藍星詩社，是1948—1949年陸續來臺的大陸作家中率先促成現代新詩運動的形成和發展的詩社之一。藍星詩社具有唯美主義傾向和浪漫主義色彩，這些特點也曾是中國古典詩歌中固有的，并在五四之后經徐志摩和其他一些新月派詩人的改造而進入到現代詩歌創作之中。不過余光中從他創作的早期開始，就跨過了幾個重要的藝術過渡階段。他是一個多產的詩人，一直在不停地進行著試驗、探索。他努力運用大量的藝術技巧駕馭那些豐富的感性想象。1964年，詩集《蓮的聯想》出版，從而奠定了他在讀者中不可動搖的地位，尤其是在那些青年讀者中，因為其中很大一部分詩歌是關于浪漫愛情的。6年后，他又出版了另一本詩集《冷戰的年代》，在這個詩集里，他表達了對處于世界列強中的中華民族的命運的關注，并宣稱他信奉主觀抒情主義，以此來抗拒現代工業社會和它帶來的戰爭對人的精神、理想的摧殘。題為《蓮的聯想》的這首詩比較鮮明地體現了他的幾個典型的藝術特點，在他的所有創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意義。

已經進入中年，還如此迷信

迷信著美。

對此蓮池，我欲下跪，

想起愛情已死了很久。

想起愛情

最初的煩惱，最后的玩具。

想起西方，水仙也渴斃了：

拜倫的墳上

為一只死蟬，鴉在爭吵。

戰爭不因海明威不在而停止。

仍有人喜歡

在這種火光中來寫日記。

虛無成了流行的癌癥。

當黃昏來襲，

許多靈魂便告別肉體。

我的卻拒絕遠行。我愿在此

伴每一朵蓮

守小千世界，守住神秘。

是以東方甚遠，東方甚近。

心中有神

則蓮合為座，蓮疊如合。

諾，葉何田田，蓮何翩翩。

你可能想像

美在其中，神在其上。

我在其側，我在其間，我是蜻蜓。

風中有塵，

有火藥味。需要拭淚，我的眼睛。[[47]](#_47_Yu_Guang_Zhong_Zi_Yi_Shi__Yi)

紀弦（1913年— ）從30年代起就在戴望舒等象征派詩人的影響下在大陸開始詩歌創作。他是臺灣現代派詩歌的理論倡導者和親身實踐者，并在1956年正式宣告了臺灣現代詩社的成立。與藍星詩社不同，紀弦和他的同仁們十分重視西方文化的影響，大膽使用“晦澀”的意象，宣稱新詩乃是“橫的移植”（從西方）而非“縱的繼承”（從古典傳統）。并且要求詩從歌詞的狀態、過時的節奏和嚴格的韻律中解脫出來。紀弦對于詩壇強烈的震動沖擊可以看做痖弦（1932年— ）和洛夫（1928年— ）所創作的超現實主義詩歌的先聲。痖弦于1957年創作的著名詩歌《深淵》，是一首長長的關于現代社會弊病的總匯，讀起來就像是一首中國的《荒原》。痖弦還時常熱衷于諷刺，這表現在一些描寫城市（如羅馬、芝加哥）的詩歌中，雖然他并不一定到過那些地方。

雖然鄭愁予（1933年— ）與現代詩歌有著緊密的聯系，并且，他的作品偶爾也確有費解之處，但與現代派詩歌不同的是，他的詩歌中有一種超常的明朗、寧靜，充溢著一股濃郁的古典風情。雖然他算不上是一個高產詩人，但他那些令人迷醉的愛情詩卻為他贏得了眾多的讀者和熱情的崇拜者。比起我們上面提到的這些詩人來，老詩人周夢蝶（1920年—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比較小，他和鄭愁予一樣，從本民族文化的精華中得到了大量靈感。他明顯地受到了佛教的強烈影響，用禪宗中“悟”的方式觸及了一些先驗的命題和神秘的情境。

葉維廉（1937年— ）和楊牧（本名王靖獻，1940年—，創作前期曾用筆名葉珊）都僑居在美國，但仍不停地發表詩作。葉維廉的詩是很學院化的，頗有T.S.艾略特（葉曾翻譯過他的詩作）和埃茲拉·龐德（葉曾研究過他的作品）之風。他于1960年創作的《賦格》，是對人被放逐后的孤獨感和懷舊感所進行的一次高度抽象性的探尋，強烈的情感和音樂感沖破經過千錘百煉的嚴整措辭而噴發出來。臺灣是楊牧的故鄉，他那些如山水畫般的詩歌和他在創作中對臺灣民俗和傳奇故事的偏愛都流露了他濃郁的鄉情。他的詩劇《吳鳳》就是以臺灣歷史上的一個英雄為主人公的。

在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引進的過程中，一些追求者逐漸走上了一條偏路，他們征引一些鮮為人知的西方經典，并且吸收、運用的方式也是純粹個人化的。這種偏激的方式在70年代初激起了一股反對的浪潮，反對者要求詩歌能更直接地表現寬廣的現實生活，少一點對個性的開掘，多一點公眾性內容。1977—1978年的“鄉土”文學運動正是這股浪潮的自然頂峰。吳晟（1941年— ）是“鄉土”文學在這一時期詩歌領域的代言人之一。吳晟一直生活在農村，鄉村生活和家庭背景為他的詩歌提供了一種尺度，使其成為衡量現代異化生活的參照系。1974年，他借用母親的語氣，用新鮮而樸素的話語寫下了如下的詩行——《泥土》：

日日，從日出到日落

不了解疲倦的母親，這樣講——

清爽的風是最好的電扇

稻田，是最好看的風景

水聲和鳥聲，是最好聽的歌。

不在意遠方城市的文明

怎樣嘲笑，母親

在我家這片田地上

用一生的汗水灌溉她的夢。[[48]](#_48_Yi_Wen_Zai_Zhu_Li_Ya__Lin_De)

## 毛以后的時代

#### “傷痕文學”、暴露文學和新浪漫小說

毛澤東的去世和“四人幫”的倒臺，打開了各種文學創作的閘門。四五十歲的作家打頭陣，但很快又被更年輕的男女作家所取代。短篇小說一再走紅，成為受歡迎的形式，充斥著各種新的國家級的和地方性的雜志。饑渴已久的讀者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討論，因為新的小說、戲劇或電影一個接一個地引起轟動。

人們所關心的三個領域很快就形成了。首先是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荒謬的道德世界，以及它留在所有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心靈上深重的、也許是難以根除的傷痕。其結果是產生了“傷痕文學”。這個名稱得自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盧新華于1978年秋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傷痕》。這是關于一個積極的女青年的悲傷的故事，她不能同她的母親，一個在“四人幫”時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干部和解。

隨著反對“四人幫”及其追隨者的義憤心情開始減退，作家們意識到應該更深入地檢討50年代末期以來所發生的事情的全過程，檢討整個當代長期存在的弊病和不公平。隨著永遠是絕對真理的領袖神話的破滅，這一切如今反映在“暴露文學”中。1979年夏天開始了一個異常的開放時代，第二年作家們便趕緊描繪腐敗的官僚制度、偽君子和惡霸，使用了4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領域中所未曾使用過的方法進行譴責和諷刺。

毛以后的時代的作品的第三個重要主題是人生活中的個人價值、愛情在社會生活中的恰當地位、對愛情的否認帶來的危害——這一切首先是小說、傳奇文學（介于道德情節和狂想曲之間）和大量令人難忘的思想深沉的故事、詩歌和戲劇等所提出的問題。

“傷痕文學”的第一部作品，實際上是宣言，就是劉心武（1924年— ）（劉的出生年代應為1942年——譯者）的小說《班主任》（發表于1977年11月）。主角是一個以第一人稱敘述的高中教師，這是劉心武喜愛的敘述方式，在他后來的幾篇小說中同樣采用這一手法。《班主任》中這位教師講述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本身雖然平淡無奇，但卻簡練地烘托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年輕人。一個是“四人幫”時代遺留下來的失足少年。這位教師不顧同事們的種種猜疑，幫他恢復正常的生活。但是問題并不在于失足少年，而在于那位抱有成見的團支書的思想：她思想上不能容忍的程度比這個不可救藥的少年自暴自棄思想更甚。她過于積極和幼稚，動輒將她從未讀過的文學作品說成是黃色書籍。與之正面對照的是第三個學生，她的家庭環境保護了她，使她在動亂年代能繼續從書架上拿到托爾斯泰、歌德、茅盾和羅廣斌的作品，從而得到健全發展。

劉心武已成為正在涌現的青年作家的雄辯的發言人。在1979年11月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上，他用演講令人感動地介紹了100多個在1966—1976年10年中喪生的作家的名字，其中有許多人被暴力奪去了生命：

當年的左聯五烈士，他們被殺害時，是說他們是共產黨，是搞革命的，也就是說，是把他們當左派殺的。他們犧牲得慘烈，但我想他們的靈魂是并不痛苦的；而我們現代所悼念的這一大批犧牲者，他們被殘害時，給予他們的是些什么罪名呢？“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老右派”、“大右派”、“漏網右派”、“黑幫”……總而言之，統統是當成右的勢力來殘害的，那些沒能等到粉碎“四人幫”便犧牲掉的文藝烈士們，他們的靈魂一定受盡了痛苦的煎熬！面對著這份名單，當我們低首默哀時，我們不能不想到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在我們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投身為人民服務、為祖國繁榮富強的文藝事業，卻還要作好犧牲性命的思想準備？難怪當我開完那天的會，見到我的一些親友時，他們當中就有人充滿善意地說：“你不要以為你上了主席臺是件有福氣的事，文藝界，那是個地雷陣，你看光是一個‘文化大革命’就整死了多少人，現在你踩進那個圈子里去了，你作好被地雷炸死的準備了嗎？”[[49]](#_49_Liu_Xin_Wu___Xiang_Mu_Qin_Sh)

劉心武對于短篇小說技巧的駕馭能力提高極快。1979年6月他發表了《我愛每一片綠葉》，這篇小說成功地將隱喻、戲劇性事件和復雜的時間結構糅合成為一個讀者難以忘懷的畫卷，一個才智過人但卻遭受災難的離經叛道的人的肖像。這篇小說的一個中心形象，是主人公保存在桌子里的一張女人照片——他同她的關系并沒有明確的表述。當一個好管閑事的同事發現了這張照片并公之于眾時，他陷入了極度的痛苦之中。這個女人后來拜訪了他——顯然他在保護她，使她免遭政治攻擊。劉心武將這個隱藏的照片形象令人注目地比喻成這位知識分子的“自留地”。農民可以擁有自己耕種的自留地，知識分子難道不應該擁有自己的自留地，一個自主的心靈角落，一個精神上的棲身之處？在中國的傳統中，這是一個具有潛在爆炸能量的概念。

知識分子代替了前10年不可替代的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戰士的主人公形象，成為許多“傷痕文學”作品的主人公。有缺陷的和搖擺不定的中間人物自60年代中期銷聲匿跡以來又第一次與大家重新見面。好人仍遭受悲劇性命運。所有結局通常都是樂觀的；然而表現手法多少有點程式化，離不開對革命光輝前程的信念，而觸及現實的程度不如后來很快出現的作品，即被稱為“暴露文學”或被一些敵對的批評家稱之為“絕望文學”的作品。曹冠龍（1945年— ）的小說《三個教授》涉及的仍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創傷”，但其色調十分陰暗，因而仍可劃在“暴露”一類。這篇故事幾乎具有博格斯式的錯綜復雜，諷刺了對才智的摧殘。三教授之一的學生在獄中自殺了，這個男孩已完成的論文被沒收，鎖在一間上了新式鎖的房子里。這位教授在數學方面的天才使他得以破解這把鎖的奧秘。他坐在那間屋子里，沉迷于學生的論文中，邊讀邊修改，直到“他們”進來將他逮捕。這篇小說中一個令人難忘的特色（如其他一些青年作者的著作一樣）是對科學術語的想象性使用：教授的大腦全速運轉時好比顯像管上的熒光屏。作者還詳盡地描述了他用以開鎖的復雜途徑。

另一個例子是劉慶邦（1951年— ）的《看看誰家有福》，超出了1966—1976年十年浩劫的時間范圍，直接揭露了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農村的饑荒。一面描寫農民們的煮飯鍋被送進了小高爐后，如何為尋得一口糧食而不顧一切，一面鞭笞干部的昏庸無能和冷酷無情。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代的兩個“修正主義”作家劉賓雁和王蒙，自從粉碎“四人幫”之后重新引起了最大的關注。劉賓雁1979年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是一個暴露“四人幫”時代盛行的腐化墮落的極好例證。但是劉賓雁的奉獻精神和勇氣顯然在于他堅持認為這種腐敗仍然存在。劉賓雁筆下的罪惡之“妖”是王守信，一個“四人幫”時期的女干部，通過敲詐勒索、造謠惑眾、拉攏引誘、行賄受賄等各種手段，爬上了東北一個煤炭公司的經理和黨委書記的寶座。憑借這一基地，她建立了一個金錢和政治權力的私人帝國。劉賓雁的控訴不只限于1966年以后，他還描繪了早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在人民吃樹皮的時候，干部的孩子卻在大街上把肉包子扔給狗。劉賓雁的矛頭也不只是對準一個婦女，因為他簡略地勾畫了形形色色的諂媚的陰謀家。劉賓雁的最新作品更加注重語言的精煉、結構的精巧，而其基調也許變得更為刺耳了，這導致了1986年他被開除黨籍。

王蒙作為最多產和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出現在文壇上。他出任文化部長的幾年中，為使鄧小平政權迎合男女文人的需要做了不少工作。王蒙主要關心的仍是做官的道德，一個官員通過仕途生涯來維護統一，以及一個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時期的浩劫之后，為保持和重新獲得革命信仰而進行的斗爭。由于他樂意進行技巧革新的試驗，因而他的作品列在當前中國小說的前沿。在他著名的小說、1956年發表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作者與主角之間就已存在相當可笑的距離：雖然當年王蒙才22歲，但他不切實際的成分顯然比“新來的青年人”要少得多。因為王蒙脫離了天真的自敘傳，所以他最近的小說如《布禮》就具有特殊的力量。這篇小說中，一個地方官員描述了他自己對黨的態度的發展軌跡，從最初充滿熱情，中間成為右派和勞改犯所經歷的痛苦，直到最近重新入黨；在《夜的眼》中，一個知識分子在離開城市20年后重新回來時，面臨著“走后門”的腐敗問題。《悠悠寸草心》的中心人物是一個技藝嫻熟的理發師，他想“為黨服務”卻受到挫折，高傲自大又剛愎自用的干部壓制了他的報國之心，人們肯定會想到這也是作者自己的遭遇。王蒙這三篇小說均發表于1979年。

王蒙在他的小說中巧妙地設計出樂觀的結局（雖然這些結尾有時被看成是硬湊上去的“光明尾巴”），因而他在許多爭端和指責（指責他是消極主義）中挺住了。

在一個更加強調描寫真實、反對特殊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運動中，蔣子龍扮演了一個有趣的角色。他完全是一個主流作家而不是一個修正主義作家。他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于1976年（原文如此，實際上比這要早——譯者），遠在劉賓雁和王蒙這些被標上“右派”的作家允許發表作品之前。蔣子龍是毛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工人作家，他的主人公不屈不撓地排除困難進行生產。這些困難可能產生于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專家、自鳴得意的干部，或者是極“左”分子，視當時意識形態的氣候而定。但是蔣子龍已為自己的放膽直言拓開了一塊地盤，他的小說也可能為領導們所接受。他1979年的小說《基礎》描述了高級干部一個個推諉責任，甚至拒不承認一個沉重機器的水泥基礎已經破裂、動搖，完全不能用了。誠實的老班長鼓勵他的鋼鐵工人拆除基礎，以便重建，但是工人們因為停工待料而虛度了幾個月時光，他們的興趣僅僅在于假日為加班費工作。最后，一個女青年積極分子成功地使工人們投入行動，但這也是在她對下列事件表示了令人痛苦的憂慮之后工人才動起來的：中國不能在生產和技術上趕上資本主義國家。

作家茹志鵑（1925年— ）在1958年寫了膾炙人口的小說《百合花》，這篇小說以極其感傷的筆調描述了內戰中一個負傷死去的戰士。令人難忘的顯然是第一人稱敘述者的青年女干部被壓抑的性意識。茹志鵑對暴露文學的貢獻之一是1979年發表的《剪接錯了的故事》，這篇小說批評了“大躍進”的浮夸風和后來的掩蓋手段。

新創刊的地方文學雜志不同程度上鼓勵了作家的創作勇氣：其中安徽和廣東最傾向于支持作家放膽直言。1979—1980年發表的小說傾向于使大眾深切地認識到已經發生的錯誤，而這種細節的描述則是前些年所不曾見到的。地下的或“非官方的”雜志，在1979年“北京之春”時期大量產生。這些雜志也發表一些作家如詩人黃翔的抗議和警告。在1976年以前的年代里，黃翔被人揭發說他將手稿藏在一個蠟封的塑料包中，當政治氣候轉變、可以發表的時候便熔蠟取出他的作品。[[50]](#_50_Jian_Luo_Jie__Jia_Sai_De___H)在這些短命的雜志上發表的、躲過了出版審查機構審查的小說中有些引起了廣泛的注意。蘇明的短篇小說《可能發生在2000年的悲劇》是一支政治狂想曲，它斷言一代人所經歷的“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將再次降臨。《在廢墟上》雖然有力地喚起人們記住剛剛過去的年代所遺下的荒原，但仍在結尾時通過其主人公，一個老邁的教授對歷史作出的長遠的透視而展現了希望的光輝。

“暴露文學”的其他主要作品有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小說以一個新囚犯來到勞改農場開頭，以全副武裝的衛兵結束：玉蘭被無辜者的鮮血染紅了。劉真的《她好像明白了一點點》暴露了60年代早期的山村貧困引起的饑荒；竹林的《生活的路》報道了1975年農村存在的行乞現象。這個時候，高曉聲的小說雖然充滿機智和熱情，卻傳達了村民生活的陰郁凄慘，他的主人公為改變貧困的生活而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顯然前景暗淡。《李順大造屋》和《陳奐生上城》是他最為有名的小說中的兩篇。

有些小說使用一種框架，請讀者通過這個框架去品味他對殘酷現實的覺悟，居然與一位高級干部對殘酷現實的認識十分相似，而這位高干漸漸發現這些苦難正是他自己過去的行為所造成的。錢玉祥的《歷史啊，你審判我吧》就是這樣一部小說。另一些小說則把兩代人并列在一起，描繪了老干部和老知識分子認識到他們已使他們的青年繼承者失望了：陳村的《兩代人》和金河的《重逢》從不同的角度探索了這個主題。

紀念文人的文章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許多年來唯一允許的紀念主題是魯迅，但在1979年大量涌現了對黑暗的十年中遭受迫害的作家表示敬重的文章。邵荃麟及其妻子受到他們的女兒的紀念。邵荃麟是提倡小說描寫“中間人物”的主要倡導者，他在60年代中期成為教條主義批評家的主要攻擊目標。大量的這類文章中最為人欣賞的是巴金懷念他已故的妻子的作品。

對浪漫的愛情故事的偏愛只是一個征兆，預示著人們再次關心小說、故事對個人生活史的評估。諶容（1935年— ）1980年發表的小說《人到中年》，表現一個女眼科醫生，如今因為心臟病突發和精神崩潰，自己也躺在了病床上。通過她的回憶和思考，小說加深了當時的內省基調。充滿強烈感情色彩的散文傳達了醫學的浪漫；作為紀念品的是一個戲劇性的眼科手術；但是小說表現的基調是極度緊張、過度勞累、官僚主義的挫折和缺少報酬等感覺。諶容故事中的主角，一些年紀稍大的知識分子，背負起社會的重擔，但卻很少得到承認，很少受到注意。一個同事的出國移居計劃贏得了更多的同情而不是批評，事實上這位移民從機場的來信完全破壞了故事歡樂的結尾（一個老農民的痊愈）。

女作家張潔（1938年— ）于1980年發表的《愛是不能忘記的》由于勇敢地肯定了浪漫的愛情而受到歡迎，但也由于同樣的原因，她遭到攻擊，說是行為放蕩，道德不容。這個故事由一個女孩對她母親的悲慘回憶構成。她母親同一個平庸的丈夫結了婚卻愛上了一個老干部，老干部為了保護她而與她疏遠，和一個革命烈士的遺孀結婚了。他們的浪漫史就這樣保留著一絲缺憾。

有兩篇小說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論，因為它們被認為是在“人性”幌子下過分渲染了個人的或感情上的滿足。《第二次握手》是青年作家張揚的作品。它在60年代末以手抄本形式流傳，但到了1979年，作者從反黨罪的監禁中釋放出來以后此書才得以出版。這是一部關于著名的進步科學家“永恒的三角”愛情生活的無害的狂想曲。“第二次握手”意味著重新解放，意味著現代化，意味著對老式的言情小說之類“長時間閱讀的書”的需求。

戴厚英的小說《人啊，人！》于1981年出版，這部小說在小說技巧上更接近時尚，雖然同中國臺灣、日本或西方世界的小說相比，其內心獨白、夢境等“創新”，其象征和引喻的繁復使用實際上顯得略為平淡。這本書許多地方涉及圍繞出版一部關于“馬克思主義和人性”的爆炸性主題的手稿而展開的斗爭。這個主題也是長期壓抑的知識分子何荊夫的信條。何荊夫是孫悅的情人，孫悅則是作者的另一個自我。她對過去20年的回憶，表現了對階級斗爭是通向未來的鑰匙這一概念的極度幻滅，主張和呼吁回到更為人道的價值觀。

#### 抗議的新詩人

在近年來所有的舊體詩作者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無題詩，這種傳統的五言四行詩于1976年4月初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烈士紀念碑前，悼念三個月前舉行了葬禮的周恩來。當時一首優雅而精致的悼念詩引起了周恩來的敵人（臭名昭著的“四人幫”及其追隨者）的注意，這首詩也反映了他們在周恩來死后的表現：

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杰，

揚眉劍出鞘。

雖然《天安門詩抄》[[51]](#_51_Shi_Ji_You_Yi_Qun_Jiao_Shi_Y)中的詩歌大部分都使用現代語體和通俗的民歌形式，但另一些如上面引用的這種類型的詩歌卻發揮了它們傳統風格的作用，更加強了毛自己詩詞給人們的教益：古詩詞形式在新社會里遠未過時。

新詩人在暴露文學中起了一定作用。葉文福的《將軍，不能這樣做》，正如題目所暗示的，鞭笞了為個人目的而濫用職權的行為。韓瀚、雷抒雁和女詩人舒婷都寫了使人耳目一新的具有濃厚個人情感的詩歌；一些成名詩人如艾青和白樺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重新歸來，對任何專制壓迫的復辟提出了嚴厲的警告：

真理怎么能是某些人的私產！

不！真理是人民共同的財富，

就像太陽，誰也不能壟斷。[[52]](#_52_Bai_Hua___Yang_Guang__Shui_Y)

最為極端的形式回歸是回到惠特曼式的散文詩風格，使用無韻的、復雜的，但有節奏的分行形式。畢塑望在《只因》中使用了這種形式，為女干部張志新唱了一曲挽歌。張志新在1975年被殘酷地處死，這一事件成為“的重大罪行[在被帶到刑場上之前，她的喉嚨被鉆了一個洞，（原文如此，實際是割斷喉管——譯者）不讓她喊叫；據說一個衛兵見此慘狀當場暈倒了]。

以北島（趙振開，1949年— ）和顧城（1958年— ）為首的80年代早期的青年詩人，在關于“朦朧”的論爭中成為主要目標。朦朧對于訓練有素的詩歌之耳和詩歌之眼來說意味著含蓄之美，但對幾十年來獻身通俗化語言的批評家來說，則是一定程度的不必要的猜測的困難。像北島的《雪線》這樣的詩歌自然令人想起19世紀法國象征主義或30年代中國象征主義詩人：

忘掉我說過的話

忘掉空中被擊落的鳥

忘掉礁石

讓它們再次沉沒

甚至忘掉太陽

在那永恒的位置上

只有一盞落滿灰塵的燈

照耀著

雪線以上的峭崖

歷盡一次次崩塌后

默默地封存著什么

雪線下

溪水從柔和的草灘上

涓涓流過[[53]](#_53_Yi_Wen_Jian_Bang_Ni__S_Mai_K)

這些青年詩人是怎樣接受他們前輩的直接影響的，這一問題仍有待討論。

自1976年以來出現了許多女詩人，包括舒婷，她的《贈別》令人想起馮至的十四行詩的那種安詳的沉思，但卻流動著一股清流，力圖再現往日的美好；梅紹靜的《問》是對那些承受了20年沉默的人提出來的，他們像牡蠣一樣蜷縮在自己營造的重殼里，或者像蠶一樣為造絲而受煎熬。

詩人雷雯1979年12月發表的作品則表達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幸存者所必需的堅忍意志：

菱

沒有自己的泥土

……

因此

它用那帶刺的果實

保衛

艱辛的生活[[54]](#_54_Lei_Wen___Xiao_Shi_Yi_Shu)

一位至少最初是以詩而成名的作家現已轉向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徐遲（1916年— ）已將報告文學變成一種有趣的詩歌性散文樣式。1978年的《哥德巴赫猜想》和一些其他的作品描述了數學家、地理學家以及其他科學家的生活和成就，對科學的小說化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為那些創造科學知識的人偶然的乖僻行為辯護。

#### 新話劇

可能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非常過分地將革命樣板戲的唱段強行塞進觀眾嗓子之故，因而人們轉而鐘情于話劇。也許這個轉變是真正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僅僅是由于新一代的劇作家和戲迷認為這個更富當代意義的名詞更合胃口。無論出于何種原因，60年代早期引起爭論的話劇是披著歷史劇的外衣，而70年代后期的話劇則壟斷了新爆發的舞臺活動。

“四人幫”的倒臺，同諷刺他們濫用權力的戲劇在舞臺上的出現，中間只有短暫的一瞬。《楓葉紅了的時候》是一個表現“四人幫”追隨者企圖破壞一個研究所的工作的諷刺劇，這個研究所的成員哀悼毛逝世的同時，仍全身心投入重新開始的科研工作，以紀念毛。更為感傷也更受大眾歡迎的，是1977年蘇叔陽創作的《丹心譜》。這出戲的戲劇高潮是舞臺上收到了來自病床上的敬愛的領袖周恩來的電話。1976年4月天安門廣場的擁護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示威也是宗福先1978年創作的《于無聲處》的主題。趙寰等的《神州風雷》（1979年）中，周恩來被搬上了舞臺。朱德是這出通俗道德劇的另一個主角，反面角色是“四人幫”成員們。

1979—1980年，傾瀉了對“四人幫”的憤怒聲討之后，一大批對仍然存在的專權進行更深入探索的新劇又出現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邢益勛的《權與法》。這出戲上演于1978年5月，揭露了一個如今已恢復了權力的以前“四人幫”的受害者。這個人成功地掩蓋了他20年前犯下的罪行，包括因用救災款而導致許多人的死亡。人物的現實主義表現贏得了觀眾的同情，他們在他們自己和先輩們所開創的制度下，悲嘆這種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趙國慶的《救救她》探討了新近認識到的少年犯罪猖獗的問題。在一個干部子弟的引誘下，女主人公成了一個持槍流氓集團的成員，并且有了一個私生子，而她以前那個老實的男朋友在最后一幕又忠誠地接受了她。

1979年的戲劇《假如我是真的》，[[55]](#_55_Sha_Ye_Xin_Deng_Chuang_Zuo)標題表達了情節本身諷刺的循環：假如年輕的主人公確曾是高干的兒子，而不只是一個冒名的頂替者，那么他就能享有中國官僚主義的下屬們持續不斷的諂媚而給予他的各種特權。這出戲比它的模特，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更入木三分。它只上演了為數不多的幾場，也僅限于北京和上海的內部演出，并且當年年底便被禁演了。蘇叔陽1980年的《左鄰右舍》雖然由于對追求個人享樂的干部進行諷刺而仍然有著廣泛的影響，但卻更加顯得不關痛癢。這出戲通過1976—1978年國慶節對北京一個四合院的沖擊而展開，表現出作者對老舍及其《茶館》的借鑒。

王靖的《在社會的檔案里》是一部電影本，講述犯罪行為——強奸和謀殺——被保護高級官員的軍隊所掩蓋。李克威的《女賊》是另一部描寫青年人的電影，這些父母受迫害的子女或受到引誘的受害者與社會發生了沖突。同《假如我是真的》一樣，這些電影在1980年2月北京的一個大型討論會上討論過，在這次討論會上胡耀邦作了一個關鍵性的發言。大家都同意，作家不應忽視社會難題的長期性，但他們應該認識到舊社會殘余對造成這些問題的影響，應該關心突出新社會的積極力量，這樣就能產生新的面貌。總之，作者應該考慮他們作品的效果。

在大量新的通俗戲中，許多都探討了長期遭到壓制的羅曼蒂克的愛情主題。田芬和錢曼蘭1980年的《她》突出了成年人追求愛情和婚姻這樣一個誠實的主題。《她》重新肯定了一個年輕寡婦追求幸福的權利，她一直孝順地侍候婆婆；而男主人公則不顧自己家庭的反對去追求這個寡婦的愛。這一類戲劇堅決主張表現個人問題并解決這些問題，完全不同于那種統治舞臺多年的宣傳口號式的自我犧牲主張。

## 附言

《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是張弦1980年一篇小說的題目。可把這種措辭看成是對中國過去30年看法的象征，這是四十幾歲或更為年輕的作家們的觀點。他們自1976年以來就已統治了中國文壇。從遇羅錦的《一個冬天的童話》，到張辛欣《我們這個年紀的夢》（1982年），這類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它們常常實質上或樣式上是自傳性的，重新肯定了個人的價值，特別是婦女的價值，她們需要關懷，需要愛。

在這30年中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文學已為中國鄉村的文化沙漠儲存了一種肥料。它提供了英雄、主角模式以及社會主義實踐的課程。獲得公認的少數成功作品——《紅巖》、《創業史》以及少數詩歌和戲劇——不斷重版，反復肯定。同時，作家們力圖沿著現代主義方向改進技巧，并在他們的作品中正視新社會生活的真正難題，他們的努力仍碰上挫折。1981年對白樺《苦戀》的攻擊，是毛時代終結以來第一次對一部作品的大批判。周揚再次成為制定文藝政策的決定性人物[[56]](#_56_Zhou_Yang___Ji_Wang_Kai_Lai)。雖然胡喬木在1981年底說毛的文學原則與現實生活的相互關系不是一成不變的，但他重新強調了黨的一貫思想：作家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57]](#_57_Hu_Qiao_Mu___Dang_Qian_Si_Xi)

諷刺作家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借他自己筆下的一個人物之口對蘇聯作如下評說：

蘇聯的歷史實際上（而不只是顯然）是一部有關代表大會、會議、計劃、義務、起坐、征服新的領域、新的部門、游行、獎章、鼓掌、民間舞蹈、歡送典禮、歡迎儀式等等，簡言之，就是在蘇聯官方報紙、雜志、小說上所能讀到的一切，或在蘇聯電視上看到的一切，以及其他等等的歷史。有些蘇聯發生的事情并沒有出現在大眾信息媒介、教育、規勸和娛樂中。但所有這一切卻是無形的非歷史背景的蘇聯真正的歷史。對于沒有受過蘇聯生活方式這所大學校教育的外來觀察家來說，所有一切似乎都是謊言、煽動、形式主義、官僚政治喜劇、宣傳，實際上這一切卻表現了這種生活方式的血肉，實際上就是這種生活方式本身。而那些一切似乎是痛苦的真實，事物的實際狀態，常識性思考的東西等等，實際上只不過是這個真實過程的微不足道的外殼。[[58]](#_58_Ya_Li_Shan_Da__Ji_Nuo_Wei_Ye)

自從毛時代結束以來，這個“痛苦的真實，事物的實際狀態，常識性思考的東西等等”的外殼在中國文學作品中越來越自我顯露了。無論是新作家還是老作家都不斷地突破主題和技巧的邊界。一直在加強控制的過程現在已經放慢了，雖然尚不清楚這個過程是否已經被逆轉過來。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文學從強加給它的不可忍受的重壓下生存下來了。它反映了新社會締造者的許多夢想，如今，在它走向現代主義世界的緩慢進程中，將會開始觀照現實的更大部分。

[[1]](#_1_10)參看《六十年文藝大事記（1919—1979）》，這是為第四次文代會編印的文件（草案），對組織問題提供了權威性資料。

[[2]](#_2_10)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69—99頁。

[[3]](#_3_10)馮至：“煤礦區”，選自《十年詩抄》，引自S.H.陳：“隱喻與中國詩韻的意識”，西里爾·伯奇編：《中國的共產主義文學》，第52頁。

[[4]](#_4_10)參看作者的“零度生活”（1947年），一首描寫舊上海貧民區凍僵的兒童尸體的詩。或看許芥煜編：《20世紀中國詩歌選》，第289頁。

[[5]](#_5_10)節選自張鐘等編的《當代文學概觀》，第3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譯者）

[[6]](#_6_10)見《詩刊》1964年第7期，第4—7頁。譯文見許芥煜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第708—712頁。

[[7]](#_7_10)周而復：《新的起點》，第120頁。

[[8]](#_8_10)邵燕祥：《到遠方去》，第65頁。

[[9]](#_9_10)《在和平的日子里》，第93頁，引自邁克爾·戈茨：“中國當代小說中的工人形象（1949—1964）”，第96頁。

[[10]](#_10_10)保羅·巴迪：“死亡與小說——談老舍的自殺”，載《譯叢》第10期（1978年秋季號），第5—14頁。（更確切地說，老舍是投湖自盡的。——譯者）

[[11]](#_11_10)《人民文學》1956年第6期，第6—21頁；第10期，第48—59頁。

[[12]](#_12_10)《人民文學》1956年第9期，第29—43頁。

[[13]](#_13_10)周揚：《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第20頁。

[[14]](#_14_10)黃秋耘：“談愛情”，《人民文學》1956年第7期，第59—61頁。

[[15]](#_15_10)何直：“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人民文學》1956年第9期，第1—13頁。

[[16]](#_16_10)劉紹棠：“我對當前文藝問題的一些淺見”，《文藝學習》1957年第5期，第7—10頁。聶華苓編：《百花齊放的文學》第1卷，第63—71頁。

[[17]](#_17_10)杜威·W.福克瑪：《中國的文學教條與蘇聯影響（1956—1960）》，第116頁。

[[18]](#_18_10)姚雪垠：“打開窗戶說亮話”，《文藝報》1957年第7期，第10—11頁，譯文見聶華苓編《百花齊放的文學》第1卷，第81—96頁。

[[19]](#_19_10)周揚：“文藝戰線的一場大辯論”，《文藝報》1958年第5期，第2—14頁。

[[20]](#_20_10)夏衍：“多、快、好、省，量中求質”，《文藝報》1958年第6期，第26頁。

[[21]](#_21_10)茅盾：“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人民文學》1958年第6期，第4—8頁。

[[22]](#_22_10)引自趙聰：“ 1958年的中共文藝”，《祖國周刊》1959年第26卷第9—10期，第43—46頁。

[[23]](#_23_10)郭沫若、周揚：《紅旗歌謠》，第218頁。

[[24]](#_24_10)同上書，第172頁。

[[25]](#_25_10)郭沫若：“就目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答《人民文學》編者問——譯者），《人民文學》1959年第1期，第4—9頁。

[[26]](#_26_10)卞之琳：“動土回答”，《詩刊》1958年第3期，第10頁，由勞埃德·哈夫特譯，譯文在許芥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第380頁。

[[27]](#_27_10)引自張鐘的《當代文學概觀》，第63頁。

[[28]](#_28_10)梁上泉：“長城內外”，《山泉集》，第76—78頁。譯文在許芥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第181頁。

[[29]](#_29_9)梁上泉：“彩色的河流”，《詩刊》1961年第6期，第16—17頁。

[[30]](#_30_9)梁上泉：《開花的國土》，第67頁。

[[31]](#_31_9)葛琴：《海燕》，《人民文學》1958年第3期，第31—50頁引文見第44頁。

[[32]](#_32_9)周揚：“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文藝報》1960年第13—14期，第15—37頁。

[[33]](#_33_9)茅盾：“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人民文學》1960年第8期，第8—36頁。（原文只是茅盾文章的局部概要，而非節選。——譯者）

[[34]](#_34_9)胡萬春：《特殊性格的人》，第96頁，戈茨：《中國當代小說中的工人形象》，第265頁。

[[35]](#_35_9)周揚：“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第15頁。

[[36]](#_36_9)《人民日報》1957年1月1日。

[[37]](#_37_9)毛澤東：“游泳”，選自《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

[[38]](#_38_9)沙葉新還是早在1979年早些時候的《假如我是真的》一劇的作者之一，本章后面還要討論當時對他的爭論。

[[39]](#_39_9)蕭軍1981年8月訪問伯克利時，將寫有此詩的一幅墨寶送給了作者。

[[40]](#_40_9)戈壁舟：《北邙新詩四首》，《人民日報》1962年3月24日，譯自S.H.陳的《隱喻與意識》，第44頁。

[[41]](#_41_9)參考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第728頁上的譯文。

[[42]](#_42_9)引自張鐘等編寫的《當代中國文學概觀》，第74頁。

[[43]](#_43_9)郭小川：《甘蔗林——青紗帳》第3—7節，譯文見許芥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第685頁。

[[44]](#_44_9)引自張鐘等編寫的《當代中國文學概觀》，第82頁。

[[45]](#_45_9)引自張鐘等編寫的《當代中國文學概觀》，第55頁。

[[46]](#_46_9)江青：“談京劇革命”，《中國文學》1967年第8期，第118—124頁。

[[47]](#_47_9)余光中自譯詩，引自齊邦媛等編的《當代中國文學選集：臺灣（1949—1974）》，第103—104頁。

[[48]](#_48_9)譯文在朱莉婭·林的《中國現代詩》。

[[49]](#_49_9)劉心武：“向母親說說心里話”，《上海文學》1979年第12期，第80—85頁。由海倫娜·科倫達翻譯，譯文在霍華德·戈德布拉特編的《80年代的中國文學》，第137—138頁。

[[50]](#_50_9)見羅杰·加賽德《活躍起來！毛以后的中國》。

[[51]](#_51_9)詩集由一群教師以童懷周的集體筆名出版于1978年。

[[52]](#_52_9)白樺：“陽光，誰也不能壟斷。”

[[53]](#_53_9)譯文見邦尼·S.麥克杜格爾《太陽城的提示：北島的詩》，第73頁。（見《北島詩選》，新世紀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00頁。——譯者）

[[54]](#_54_8)雷雯：“小詩一束”，見《詩刊》1979年第12期，第56頁。譯文見W.J.F.詹納：“1979年：中國文學的一個新起點？”載《中國季刊》第86期（1981年6月），第274頁。

[[55]](#_55_8)沙葉新等創作，又名《騙子》。

[[56]](#_56_8)周揚：“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文藝報》1979年第11、12期，第8—26頁。

[[57]](#_57_8)胡喬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載《紅旗》1981年，第23期，第2—2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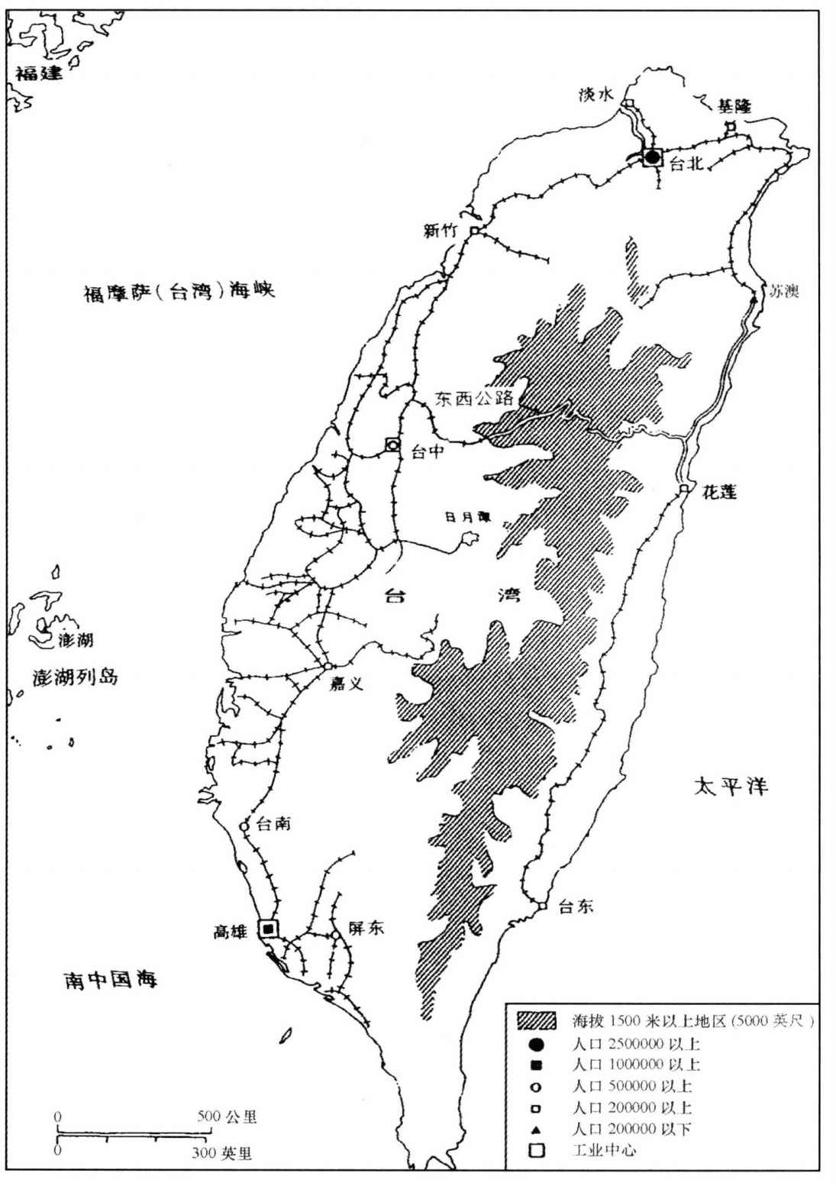
[[58]](#_58_8)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光輝前程》，轉引自克萊夫·詹姆斯：“黑暗中的笑聲”，《紐約書評》1981年3月19日，第20頁。

# 第五篇 分離的省份

## 第十二章 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1949—1982年

1945年10月25日，國民黨將軍陳儀在臺北接受日本投降，并出任臺灣省主席。他控制的這個地區，其歷史與中國其他地區差別甚大。中國人在臺灣定居較晚，是在16世紀和16世紀以后，當時一些福建人移居臺灣。1895年，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1]](#_1_Tai_Wan_Ren_Da_Bu_Fen_Wei_Fu)日本人統治臺灣的50年期間臺灣物質條件與臺灣人民態度的諸多變化，對國民黨統治之下的臺灣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

日本人早期的主要目標，是在這個偶有反抗精神的民族中建立法律和秩序。日本人首先采取軍事行動，隨后建立廣泛的警察機構和行政、法律制度，以保障臺灣社會的和平與安定。日本統治者非常嚴厲，有時甚至是獨裁，但他們在臺灣創造了一種有助于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的環境。這種情況與20世紀前葉中國大陸由于內戰、軍閥混戰、土匪橫行、日本軍事入侵而形成的局勢截然不同。



地圖11 臺灣

臺灣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為了日本帝國的利益，而不是為了臺灣人民。但是，其發展過程卻使臺灣人民的生活穩步提高。到1945年，臺灣人民的生活方式比中國大陸一般人要先進些。例如：20世紀30年代初期，臺灣擁有2857英里鐵路，而整個中國大陸只有9400英里。臺灣的發電量與整個中國大陸的發電量幾乎相等。[[2]](#_2_Qiao_Zhi__H_Ke_Er____Fu_Mo_Sa)日本人大大改善了臺灣的公共衛生條件，擴大了初等教育，修建港口與公路，并開始建立工業基地。他們通過土地勘察、明確土地所有權，革除了大規模逃避土地稅的舊習，從而理順了公共財政，并為后來國民黨政府實施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礎。日本人通過擴大灌溉設施、引進新的耕作技術、組織農業協會，使農業生產有了大幅度的增長。

臺灣人雖然為他們在日本統治下取得的物質成果感到高興，但對日本人把他們當做二等公民極為不滿。臺灣當局所有的高級職位，以及行政、管理、技術等部門的高級職務均控制在日本人手里。臺灣人中能夠受到小學以上教育的幾近于無。[[3]](#_3_Tong_Shang_Shu__Di_177Ye)臺灣活動分子為爭取在臺成立有代表性的政府，并在日本國會中有臺灣代表，進行了長期斗爭，但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為止收效甚微。一些日本自由主義人士同情臺灣爭取政治代表權的愿望，但是，日本統治集團的主流認為只有當臺灣人在語言、文化和為天皇效忠等方面完全被日本人同化時，才能給臺灣人以同等的政治權利。極端的日本民族主義者則斷然拒絕這些殖民地的臣民可能被同化并且成為真正的日本人的看法。

1945年戰爭結束時，臺灣人熱烈歡迎把日本人趕出臺灣，贊成臺灣歸屬中國，認為他們將繼承被充公的日本財產，繼任原先由日本人擔任的職務。但他們看到臺灣被一群新軍閥接管了。這些新軍閥的的確確是中國人，但操不同的方言，經常看不起甚至歧視當地人。他們大失所望。1947年臺灣人的憤懣情緒終于爆發成為暴力行動，大陸人和臺灣人之間的關系極為緊張，成了國民黨面臨的一個長期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

自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撤到臺灣以來，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臺灣的歷史貫穿著三條主線，即：要求臺灣成為國際社會里一個單獨的政治實體的斗爭；努力發展經濟；在情況不斷變化的壓力下調整內部政策。美國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作出了對臺灣安全的保證，20年中，這種保證為臺灣進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可靠的庇護。但是，在1971年尼克松總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開放政策及中華民國失去在聯合國的席位之后，臺灣人民對美國保證的連續性日益感到懷疑。美國從廣泛的地緣政治因素出發，認為1972年、1979年和1982年美國為維持與10億中國人民之間富有成果的關系，而在臺灣問題上對北京所做的讓步是必要的。可是，這些讓步引起了臺灣的不安，盡管美國對臺重新作了安撫。北京關于如果臺灣“回歸祖國”將允許臺灣政治上自治的承諾，對臺灣政府和人民來說是難以置信的。臺灣政府和人民認為，只有繼續保持其單獨的地位，才能更好地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臺灣的經濟發展是過去30年里最突出的成就之一。這是人們公認的事實。其發展之快，是由諸多不尋常的因素結合而形成的：日本人遺留下來的相對發達的基礎結構；擁有成千上萬的來自中國的訓練有素、富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商人和政府行政管理人員；前15年獲得的大量的美國經濟援助；政治穩定；上層官員愿意聽從專家的意見。進入80年代，臺灣已接近發達國家的地位，其人均生活水平在亞洲名列前茅，其經濟發展成果已使廣大臺灣人民普遍地得到益處。

臺灣沒有武裝暴亂和軍事政變的困擾。自1947年臺灣起義以來，極少發生許多發展中國家經常面臨的那種政治動亂及其他社會騷亂。面臨來自北京的威脅，自身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兩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與其子蔣經國——的統治的合法性為眾所公認，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有助于政治穩定。批評家們曾指責臺灣的政治制度僵化和不民主，反對大陸人通過國民黨一黨專權，反對取締反對黨，反對繼續實施軍事管制、逮捕政治上的反對派并限制新聞自由。但是，多年來臺灣的政局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數以萬計的臺灣人加入了國民黨，臺灣人在黨政部門也可擔任要職。獨立的政治家參與了地方和省的選舉，有時還在一些重要的競選中擊敗國民黨的候選人。自1969年以來，國家選舉機構不斷增選新成員。雖然仍禁止談論某些敏感問題，但近幾年來允許新聞界爭論的問題的范圍已有所擴大。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在政府內部和政治反對派之間都造成一種共識：政治改革必須加速進行。

當蔣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在臺北重新出山擔任中華民國總統時，形勢是嚴峻的。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防務崩潰之迅速比毛澤東預期的還快。由于國民黨駐濟南部隊司令投降，山東省1948年9月失守。緊接著，國民黨駐滿洲（東北）的精銳部隊亦被圍殲。共產黨的軍隊迅速包圍了北京和天津，同時集結部隊在南京以北進行了對勝負具有決定意義的淮海戰役。此一役，國共雙方共投入兵力100萬人。1948年12月，徐州要地失守，打斷了國民黨防御體系的脊梁，整個長江暴露于共產黨的攻擊之下。1949年4月，南京失陷。上海、漢口在5月失守。廣州也于10月失守。僅僅一年的時間，幾乎整個中國大陸都落入了共產黨手中。國民黨政府先從南京逃到廣州，再逃到重慶，爾后又到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逃至臺北。

軍事上的失利使人們對國民黨貨幣喪失信心。紙幣貶值。到1948年夏，紙幣價值僅僅相當于其印制成本。1948年8月發行新幣“金圓券”，金圓券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在數以千計的充滿信任的公民依法將手中的黃金、白銀和外匯兌換為“金圓券”之后，“金圓券”很快也變得分文不值了。

軍事失敗和經濟崩潰，使得國民黨上層要求蔣介石退位和同共產黨談判的呼聲越來越高。1949年1月，蔣到其故鄉浙江省奉化隱居，形式上將政府移交李宗仁。李成為代總統。然而，蔣并未辭去總統和國民黨總裁的職務。在隱居期間，他繼續干預國家事務，并著手準備在臺灣建立最后的立足點。蔣在隱退前不久，還親自委任其親信——50歲的陳誠將軍為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任命其子——40歲的蔣經國為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1949年2月，蔣沒有通知代總統，直接飭令中國中央銀行總裁將政府的黃金儲備悄悄地轉移到臺灣。1949年5月，蔣親自赴臺，在臺建了一幢住宅。他由中國大陸到菲律賓和南韓訪問期間，曾多次在該處居住。1949年12月，蔣最后一次離開中國大陸，是在共產黨占領成都之前不久，由成都飛往臺北的。

當蔣介石重新出任總統（代總統李宗仁拒絕赴臺，逃往美國）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已在策劃進入南中國海的海南島和上海東南75英里的舟山群島。上述兩地分別于1950年4月和5月為中共占領。“解放臺灣”已被宣布為中共1950年的主要任務，由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負責此項任務。對蔣介石來說，在軍事上唯一可以夸耀的是：1949年10月共產黨軍隊在攻打廈門外海之金門島時作戰失利，損失慘重。

蔣介石難以從美國得到什么援助。蔣夫人赴美尋求30億美元的援助，并要求美國委派一高級軍官來指導制定戰略和供應計劃，歷時一年未果，于1950年1月返臺。美國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占領臺灣的戰略后果極為關注，但不愿從其他更重要的地區抽調兵力來加以阻止。美國政府內外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有影響的共和黨參議員和參謀長聯席會議要求向臺灣提供軍事援助。但杜魯門總統鑒于國民黨政府在大陸表現不佳，予以否決。1949年12月，國務院向美駐外新聞官員下發了一個機密備忘錄，通報他們臺灣可能失陷，并指導他們如何應付此事，以使美國利益少受損害。1950年1月杜魯門總統宣布：

美國現時不想從福摩薩獲取特權或在福摩薩建立軍事基地，也不打算出動武裝部隊來干預目前形勢。美國政府將不奉行可能導致陷入中國內部沖突的方針政策。同樣，美國政府也不向福摩薩提供軍事援助和建議。[[4]](#_4___Guo_Wu_Yuan_Gong_Bao____195)

蔣介石在美國軍事援助和軍事干涉均無指望的情況下，迫于中共入侵的威脅，積極加強臺灣的防務。首先是改組從大陸撤到臺灣的80萬雜牌軍隊，清除共產黨的滲透。1949年12月，他任命受過美國教育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接替陳誠出任臺灣省主席，讓陳集中精力進行軍隊改組。陳遣散了數萬名超齡和低能的軍官，將部隊兵員削減了2/3。之后，蔣任命陳誠為行政院長，并委任受過美國教育、曾指揮美訓新1軍在緬甸和東北作戰、又在臺灣任編練司令的孫立人將軍為陸軍總司令。

蔣介石認為在大陸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個對武裝部隊實施政治控制并進行政治教育的機構。為此，他建立了國防部總政治部，由蔣經國出任主任，并在每個部隊設置政治軍官。同屬蔣經國督導的保安機構以“共產黨特務”的罪名逮捕了數百人，其中包括副參謀總長及其夫人。由于搜捕間諜和改善武裝部隊的組織指揮，臺灣防務大大加強了。但是，并沒能解決其缺乏武器裝備、彈藥和物資供應的問題。[[5]](#_5_Guan_Yu_Dui_40Nian_Dai_Mo_Qi)

## 鞏固基業，1949—1959年

#### 美國的干預

國民黨在聚集力量對付共產黨進攻的時候，碰上了好運氣。杜魯門總統改變了其撒手不管臺灣的政策。杜魯門總統及其顧問認為，1950年6月對南朝鮮的入侵是蘇聯支持的，目的是擴大蘇聯統治范圍，此后蘇還可能在美國及其盟國所設置的包圍圈上的薄弱環節進行試探。總統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允許臺灣為共產黨集團所控制是輕率的。而且，他如果繼續拒絕共和黨參議員支持國民黨保衛臺灣、防止中共進攻的要求，他所需要的兩黨對美在朝鮮軍事干預的支持將會減弱。因此，杜魯門總統宣布：

共產主義勢力占領福摩薩將對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美國在該地區執行合法的和必要的任務的部隊構成直接的威脅。為此，我已命令第7艦隊防止對福摩薩的任何進攻。由于采取了此種行動，我呼吁設在福摩薩的中國政府停止一切反對大陸的空中和海上作戰活動。第7艦隊務必要使這一點落實。福摩薩的未來地位須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得以恢復、與日本和平解決問題之后再確定，或由聯合國考慮予以解決。[[6]](#_6___Guo_Wu_Yuan_Gong_Bao____195)

中共武裝力量中，海、空軍力量甚小，難以對抗第7艦隊。他們不再準備入侵臺灣，開始加強海岸防務，并將其軍備重點轉向朝鮮邊境。美國為臺灣提供軍事保護之后，臺灣大大地松了一口氣，對其前途又看到了希望之光。美國立即制定了軍援計劃，增加了經濟援助，這使國民黨的士氣更加高漲。

朝鮮戰爭是美國對臺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態度的轉折點。種種跡象表明，中蘇合作關系密切，美國希望一種中國式的“鐵托主義”能在中國大陸發展起來的幻想開始落空。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11月派遣“志愿軍”跨過鴨綠江，給戰線過長的美國及南朝鮮軍隊以沉重打擊。這進一步加強了1950年2月簽訂的中蘇同盟條約。蘇聯人開始以大量現代化自動步槍、火炮、飛機、坦克、艦艇，有系統地裝備中共武裝力量。同時，他們還制定了大規模的經濟援助計劃，以發展中國的重工業。在美國人看來，50年代初期，中蘇聯盟已牢固地建立起來，并不斷發展，對其周邊的非共產主義國家構成了威脅。中共與美國軍隊在朝鮮開戰，加深了兩國人民之間的敵對情緒。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了一場惡毒的反美宣傳運動；在美國，參議員約瑟夫· R.麥卡錫肆無忌憚地攻擊共產主義，掀起了一系列恐共仇共活動。

全球冷戰愈演愈烈。在朝鮮已發展成為熱戰。這種情況改變了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對臺灣的態度。美國政府已不愿再容忍中華人民共和國占領臺灣，認為臺灣是正在迅速發展的西太平洋安全體系的重要環節。臺灣位于美國北方盟友日本與南朝鮮以及南方盟友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之間，戰略地位重要，對遏制共產主義在東亞的擴展具有重要作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1950年夏訪臺后，提出了一個使人難忘的觀點——臺灣是“不沉的航空母艦”。為了把臺灣正式納入美國發起的安全體系，并制定一個穩定的長期的對臺經濟與軍事援助計劃，美國于1954年12月與中華民國簽訂了共同安全條約。

同中華民國建立正式的防御同盟，給美國造成了一個問題，因為美國的目標與其盟友的目標不同。蔣介石的目標是反攻大陸，推翻中國共產黨政權，恢復國民黨的統治。蔣的軍隊占領著許多靠近大陸沿岸的島嶼，作為國民黨決心重返大陸的政治象征。但是，美國不愿支持此類冒險行動，美國所關注的僅限于臺灣和附近澎湖列島的防務。因此，在履行條約時，謹慎地局限于臺灣和澎湖列島的防務。在簽約后的一次換文中，中華民國同意除“顯屬行使固有自衛權力之緊急性行動”外，臺灣只在與美國“共同協議”的情況下，才會從臺灣、澎湖或其他沿海島嶼出動軍隊。[[7]](#_7_Qiu_Hong_Da_Bian____Zhong_Guo)

國民黨對沿海島嶼的占領，使美國處于尷尬的境地。丟掉一個較大的島嶼對其盟友來說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但是美國政府并不希望承擔保衛這些易受攻擊的島嶼的義務。1954年9月，在簽訂條約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猛烈炮擊了最大的海島——金門。1955年1月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棲部隊占領了浙江省沿海的大陳島。因為這些島嶼位于臺灣的空中支援范圍之外，國民黨在第7艦隊的援助下，撤走了他們的駐軍。為了防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擊其他沿海島嶼，艾森豪威爾總統于1955年1月下旬要求國會通過了“福摩薩決議案”。該決議授權總統，在他認為保證臺灣和澎湖防務所需要的時候，可以動用美國武裝部隊保衛臺灣和澎湖以及“友邦控制的該地區有關陣地和領土”，防止武裝進攻。[[8]](#_8_Tong_Shang_Shu__Di_257Ye)

其后3年，臺灣海峽再未發生嚴重的沖突。1955年8月，美國響應周恩來總理的建議，同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舉行大使級會談。中華民國強烈反對中美會談，擔心背著它達成某種交易。但是美國要考慮自己的利益，特別是要爭取釋放關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公民。由于在會談中達成了一項協議，大部分被關押的美國人被釋放了。但是，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議舉行外長會議、取消美國對華貿易禁運和交換記者等問題沒有達成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了美國關于不在臺灣地區使用武力的建議。會談于1957年12月暫時中止。

1958年8月，毛澤東決定考驗一下美國幫助中華民國保衛沿海島嶼的意志。他這樣做可能是受到蘇聯發射人造衛星和世界形勢發展趨勢的鼓舞。世界形勢的發展使毛于1957年訪問莫斯科時宣布“東風壓倒西風”。8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炮兵對金門進行了大規模轟擊，首次切斷了該地的供應線。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杜勒斯國務卿決心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占領該島，甚至不惜使用核武器。第7艦隊集結兵力，負責臺灣的空防，并開始為中華民國運輸艦護航至金門外3英里一線。在一個月之內，封鎖被打破。炮擊之后不久，恢復了大使級會談。會談中雖沒有就美國的停火建議達成協議，但是炮擊卻減少了，只在單日進行象征性的炮擊，以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停火，并顯示其能夠隨意阻止或允許對金門恢復供應。[[9]](#_9_Guan_Yu_Dui_1954__1955Nian_Yu)

1958年沿海島嶼危機對美國與中華民國同盟既有積極的影響，又有消極的影響。它表明了美國不允許金門被占領的決心，美國與國民黨軍隊合作，成功地迫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其切斷該島供應線的企圖。在戰斗過程中，國民黨為其軍隊獲得了先進的武器，主要為金門配備了8英寸榴彈炮，為空軍配備了“響尾蛇”導彈。另一方面，由于雙方在軍事行動上的分歧以及美國國內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盟國對美國政策的反對，該危機使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同盟受到極大的壓力。據國務卿杜勒斯說，艾森豪威爾政府在拯救金門的斗爭中，不得不使它同國會、同盟國的關系緊張，幾乎達到破裂的地步。蔣介石極力反對美國為實現沿海島嶼與大陸之間停火而作的努力，因為停火將削減這些島嶼作為反攻大陸跳板的象征性價值。實際上，杜勒斯勸蔣將其守島部隊削減1.5萬人作為增強海島守軍火力的交換條件，并發表一項聲明，表示中華民國收復大陸的主要手段將是通過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不是使用武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切斷臺灣與沿海島嶼聯系的做法是否明智的問題，作了重新考慮。在華沙會談中，美國強烈要求為這些海島建立一個特殊政權。聯合國和其他地方的輿論均贊成臺灣軍隊撤出這些島嶼，以減少該地區發生沖突的危險。但是北京贊成蔣介石“一個中國”的主張，對國際上支持臺灣獨立勢力的增長感到震驚。因此，國防部長彭德懷宣布改為單日炮擊時，對“臺灣同胞”廣播說他要他們能夠向沿海島嶼運送足夠的補給品，以便長期駐守。1958年12月，陳毅外長對駐京外交官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是或者一下子解放臺灣和沿海島嶼，或者維持現狀。

美國一面在安全方面支持臺灣國民黨政府，一面在外交上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也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50年代初期，美國對聯合國成員國的影響很大。1950年1月，美國在安理會組織力量擊敗了蘇聯提出的一項驅逐中華民國的決議，蘇聯代表退場，聲稱只要中華民國代表還留在安理會，蘇聯就不參加。朝鮮戰爭爆發時，蘇聯代表缺席，因此使安理會有可能通過了譴責北朝鮮入侵和呼吁聯合國成員國援助南朝鮮的決議。1950年7月，蘇聯代表重返安理會，進一步設法爭取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未獲成功。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干涉朝鮮之后，美國能夠使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譴責為進攻駐朝聯合國軍的侵略者。其后，在50年代，華盛頓年年都慫恿聯合國大會通過“不考慮”任何改變中國在聯合國代表席位的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兵朝鮮，嚴重地妨礙了她爭取恢復聯合國席位和獲得國際承認的努力。在美國，1954年成立了一個“百萬人委員會”，動員公眾輿論支持中華民國，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該委員會包括許多國會成員。每年美國國會都通過一項決議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在1950年1月，已有26個國家（大部分是蘇聯集團和中立國家）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在其后五年，再沒有一個國家承認之，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顯然已具備了被承認為中國合法政府通常所需的條件。許多國家政府本想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保持外交關系，但后兩者都不愿容忍雙重承認。由于必須做出抉擇，許多國家在放棄中華民國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因為它們或者不愿得罪美國，或者其領導人反共情緒強烈，或者它們希望聯合國帶頭。中華民國本身則積極爭取支持，特別是爭取新獨立的非洲國家的支持，邀請它們的領導人正式訪問臺灣，并隆重接待。

50年代末，臺灣中華民國的前景比10年前大有改善，已不再僅僅是一個沒有國際支持、面臨崩潰的、被圍困的逃亡政府。它同美國有正式的防御條約，得到大量的美國軍、經援助。在美國的幫助下，臺灣保留了其在聯合國的地位，建交國家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多。臺灣雖然對美依賴甚深，但卻不是美外交政策的被動工具；臺灣利用50年代的冷戰氣候，通過外交活動，在美國擁有巨大的影響。它雇用美國公共關系機構來宣傳它的事業。“院外援華集團”系由死心塌地反共的出版界人士、商人、國會議員組成，它不斷強調支持反共的臺灣作為反對中蘇集團的全球斗爭中的重要成員。臺灣在華盛頓官僚中也有贊助者。這些官僚與不斷增加的對臺軍、經援助計劃有利害關系。

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東亞形勢的發展使他們感到加強臺灣的力量，使臺灣成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是不無道理的。1954年法國人在奠邊府的失敗和印度支那的分裂，使中蘇集團取得進一步的進展，對東南亞其他地區構成了威脅。美國沒有在臺灣建立可與美在日本沖繩和菲律賓的軍事基地相提并論的軍事基地，只在臺駐有一個“斗牛士”導彈部隊，這種導彈能夠打擊中國大陸上的目標。美國還花費2500萬美元改建了臺灣中部的公館機場，作為B—52戰略轟炸機緊急備降機場。1959年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理論和政策分歧。這些分歧在大多數美國人看來只不過是中蘇合作大廈中的一條小小裂縫。很少人預見到這條裂縫將會很快擴大起來。[[10]](#_10_Guan_Yu_Wu_Liu_Shi_Nian_Dai)

#### 防務現代化

臺灣軍事當局鑒于不必再為應付迫在眉睫的進攻而進行緊急戰備，在美國幫助下，開始實施一項長期的軍事現代化計劃。首要的改革是以現代的招募與人事制度取代部隊忠于長官而不是忠于軍隊的傳統制度。為各軍種建立了新的軍事學院訓練年輕軍官，實行普遍的兩年或三年兵役制，保障了足夠的年輕兵員，從而使來自大陸的年老、病殘兵員退出現役。由美援基金贊助成立了退役軍人職業援助委員會幫助退役軍人尋找工作。建立了統一領導的現代財務制度，結束了指揮官克扣部分士兵薪餉的陋習。組建和擴大了后備力量。這種后備力量由服完現役的年輕人組成，每年征召復訓一次。為了提高專業技能，削弱高級軍官謀求政治影響的傾向，并為年輕有為的軍官開創前途，參謀總長和各軍種司令每2—3年更換一次。由聯合勤務部門統管各軍種財政和采購事宜，并管理兵工廠和軍械倉庫。

美國軍援顧問團負責執行軍援計劃，并向中華民國武裝部隊提供建議和訓練。首批人員由一名少將率領，到1960年已增加到2000人，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美國軍事顧問團之一。該顧問團監督用現代化自動步槍、卡車、通訊裝備、火炮、坦克、飛機、雷達、驅逐艦及其他海軍艦艇重新裝備臺灣武裝部隊。數以千計的軍事人員到美國受訓。到50年代末，這支由大陸逃臺的渙散不堪的敗軍已被改造成為一支擁有60萬人的現代化武裝力量。雖然在數量上不如海峽對岸的敵手，但卻是值得夸耀的。在1958年的海島危機中，中華民國的F—86戰斗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米格—15戰斗機作戰，擊毀率為8∶1。

#### 政治上的鞏固

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既是軍事上的失敗，又是政治上的失敗。[[11]](#_11_Guan_Yu_50Nian_Dai_He_60Nian)共產黨在組織能力和宣傳技術上，特別是在農村，都優于國民黨。當蔣介石將其政府撤到臺灣時，他知道必須優先建設一個更有效的政府和政黨，恢復士氣，嚴厲打擊貪污腐化和派別之爭。[[12]](#_12_Jiang_De_Mu_Biao_Shi_Ba_Tai)蔣介石威望下降，但他仍能通過其親信來控制主要的政權機構，如國家財政部門、各安全機構和軍隊中的精銳部隊。由于副總統李宗仁和其他政治對手不在臺灣，蔣的任務容易多了。沒到臺灣的要人包括：一些投降共產黨的軍閥和高級陸軍將領；蔣的親戚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他們有錢，在美國、香港或歐洲找到比臺灣更安全的避難所。一些由大陸跑到臺灣的高級政界人物由于他們與地方政治基礎的聯系被切斷，財源被卡，大部分人只好仰仗政府和國民黨來維持他們的地位和生計。

臺灣的條件在許多方面有利于國民黨重整河山。臺灣幅員小，日本人為其修建了許多鐵路、公路和電站。農業高度發達。經濟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破壞，但已很快恢復。文化教育程度遠遠高于大陸。臺灣社會秩序井然，組織良好，沒有盜匪和軍閥部隊的騷擾，也不像大陸大部地區那樣經常遭災。共產黨地下勢力不大，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的工作比大陸任何一個省都要容易得多。1946—1950年期間，200萬難民逃到臺灣，加重了臺灣的負擔。但是，難民中有數以千計的訓練有素和富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和高級官員，他們填補了遣返回國的日本人留下的空缺。這些日本人曾占據了臺灣所有重要職位。

國民黨把它的政府結構不加改變地從大陸移來。它是以中華民國締造者孫中山提倡的、由傳統中國政治觀念與西方政治觀念相結合的三民主義為基礎、依據1946年南京憲法建立起來的。政府包括：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和修改憲法）、立法院（通過各種法律）、行政院（執行法律）、司法院（解釋憲法并享有最后裁決權）、監察院（負責監督政府官員）、考試院（負責對文官考核）。國民代表大會、立法院與監察院的代表于1947年和1948年由中國各省選舉產生。上述機構許多成員未到臺灣，但“動員戳亂時期”采取的緊急措施使那些逃臺成員的任期得以延長，因此這些機構在缺員的情況下能繼續工作。

蔣介石既是國家總統，又是執政黨國民黨（孫中山于1919年在原先幾個革命黨的基礎上創建的）的總裁。蔣在國民黨內的地位由于其他有勢力的黨魁未到臺灣而得到加強。1950年他得到黨最高執行機構的贊同，展開清黨運動，清除動搖和不忠于黨的分子，為召開1952年的黨代表大會進行準備。1952年黨代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另有兩個小黨：中國青年黨和民主社會黨，它們與國民黨一起到的臺灣，但均系小黨派，無甚影響。臺灣的政治制度實質上是一黨制，不允許建立新黨。因此，臺灣要實施新政必須先改組國民黨。

蔣介石重新出任總統時，對政治穩定最嚴重的威脅除了共產黨之外，就是來自大陸的200萬難民與600萬臺灣本地人之間的緊張關系。臺灣人雖然講中國方言，并保持著他們來自大陸的祖先傳下來的中國文化傳統，但是，日本人50年的統治使他們養成了一種不同于新來的大陸人的意識。他們學過日語，有人在日本留過學。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日本音樂、報刊、電影和其他民間文化的影響。臺灣人曾希望自己在管理臺灣方面比日本統治時期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他們看到日本人撤走后遺留下來的位子被大陸人占據了，而許多大陸人只顧沒收日本財產中飽私囊，對建立公正有效的省政府不感興趣。對此，臺灣人感到沮喪。

1947年2月28日，臺灣人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發展成為動亂。動亂中，大陸人遭到很大傷亡。整個島上的臺灣人迅速地組織起來，要求國民黨省長陳儀將軍進行改革。[[13]](#_13__Er__Er_Ba_Shi_Jian__Hou__Ji)陳先采取順應群眾的姑息手段，待從上海開來的援軍抵臺后，對臺灣人進行了殘酷鎮壓，打死數千人，包括起義中的一些領導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處罰了陳，將陳撤職。但是“二·二八事件”造成了臺灣人對大陸主子的經久不減的惡感。有些臺灣人逃到香港，在香港組織了臺灣獨立運動。這一組織不久分裂成親共派和反共派。親共派遷到北京，主張“解放”臺灣，臺灣歸回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共派遷到東京，主張臺灣獨立。

除了大陸人的貪婪和“二·二八事件”引起的仇恨之外，大陸人和臺灣人之間還有更根本的分歧。蔣介石及其同僚的長遠目標是從共產黨手中收復大陸，臺灣的建設是次要的。另一方面，臺灣人主要關心臺灣的安全與繁榮。他們對收復大陸不感興趣，可能只希望多數大陸人在收復大陸后都回家去。在大陸人看來，國民黨政府原先是在大陸成立的，應是收復大陸的主要責任者。因此，國民黨政府必須在聯合國保持其中國合法政府代表席位，代表全中國人民，而不僅僅是代表臺灣人民。省和地方政府可以主要由臺灣人組成，但是如全國政府也主要由臺灣人組成則將削弱收復大陸的理論基礎。臺灣人自認為是臺灣人口的主體，不甘心在全國政府中被貶到次要地位，因為有關他們命運的重要問題都是由全國政府決定的。

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國民黨政府采取了許多緩解大陸人與臺灣人緊張關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措施。雖然這些措施無一是純粹為了這個目的，但多年以后，在它們共同作用下，卻取得了這種結果。

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措施大概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下實行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對臺灣經濟的大發展有著重大的貢獻。但最初進行土改主要是為了政治目的。國民黨領導人很清楚共產黨在大陸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貧農對地主的不滿情緒的。陳誠在主持臺灣土地改革之后寫道：

允許佃農和長工在地主的剝削之下呻吟，不僅是個土地和經濟問題，而且是個社會和政治問題。這個問題如不及時解決，必然會影響局勢的穩定甚至國家的生存。[[14]](#_14_Chen_Cheng____Tai_Wan_De_Tu)

土地改革時，臺灣50％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幾乎所有的農民都是臺灣人。土改中，迫使地主將土地賣給政府，政府再將土地賣給佃農。這樣，為數比地主多得多的佃農買到了自己耕種的土地，生活水平有明顯提高。土改的結果使鄉村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民黨在大陸搞土地改革沒有成功，而在臺灣卻成功了。究其原因有：地主與實施土改的官員沒有政治聯系；臺灣農村沒有內戰和共產黨的滲透；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已建立了精確的土地檔案。

土地改革為臺灣經濟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基礎。而經濟的迅速發展對大陸人和臺灣人都有益處。雖然大陸人為自己保留了政府、國民黨、國營公司和軍界中的高級職位，但城鄉的土地所有權主要在臺灣人手中。他們因土地價格上漲和私營企業（主要為臺灣人所有）的發展而獲得益處。經濟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臺灣人因被排斥于政權之外而產生的不滿情緒。

采取措施增加臺灣人在地方和省級參政的機會也有助于緩和臺灣人的不滿情緒。例如，在日本統治時期，在鄉、縣、省各級都建立了農民協會。這些協會為農民提供了多種服務，如貸款、儲蓄、銷售農產品、衛生服務、調解糾紛、供應日用品等。日本統治時期，各級農民協會的理事都是由日本官員指派的。國民黨統治時期改變了這種做法。規定協會會員中凡農業收入占家庭收人一半以上的均有選舉權，協會理事通過選舉產生。這樣，國民黨政府幫助大批臺灣農民家庭不僅獲得了耕田，而且能在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組織中起更大的作用。

國民黨還改進了省和地方各級的選舉方法。日本人不允許設立全島范圍的選舉機構。地方行政官員是指派的，地方議會半數議員也是指定的。蔣介石則決定縣、市議會以及縣長、市長均由普選產生，從1950年開始實行。1951年縣、市議會選舉了省議會。但在1959年之后，省議會也由普選產生。在地方和省級選舉中，所有20歲以上的公民均有選舉權。

省和地方選舉打開了臺灣人參加政治活動的渠道。由于禁止成立新政黨，大批臺灣人參加了國民黨。而國民黨在地方選舉中不得不提名臺灣人為候選人，以便爭取臺灣人聚居的選區的選票。地方黨部幫助有野心的臺灣人樹立威信，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授予任命權。這些人如果在地方選舉部門表現良好，有時還可向上爬，在省政府甚至全國政府中謀得職位。他們雖然不能成立自己的政黨，但他們可以無黨派獨立人士的身份與國民黨候選人競選，有時還能當選。國民黨候選人有黨的基金和組織幫助競選，而某些獨立人士盡管受到諸多限制，卻可以呼吁臺灣人反對大陸人所控制的國民黨，從而獲得勝利。省和地方選舉的經驗，在其后全國機構的補選中對國民黨和無黨派政客以及對選民都是寶貴的。

為逐步消除大陸人與臺灣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國民黨還采取了其他措施，如在學校教育中通用國語；中學和專科學校招生以及文官的招募均實行公平考試制度。國民黨曾經試圖在大陸推廣國語，因日本入侵和內戰而沒有實行。在臺灣推廣國語比較容易。從1946年起各學校均用國語教學。到50年代末，年輕的一代多數會講國語。臺灣人和大陸人之間的語言障礙逐漸消除。

不管是大陸人還是臺灣人都認為使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對家庭的未來至關重要。進中學和專科學校求學要通過統考。考生進名牌學校還是普通學校，要依考試成績而定。考試是極公正的。一個孩子能否考上學校或攻讀自選的專業均取決于考試分數，而不靠其父母的地位。文官考試也是如此。因此，雖然早些年大陸人的子女由于在大陸受到較好的教育曾占有一定優勢，但當考生都是臺灣學校1945年后培養出來的學生時，這種優勢就消失了。臺灣人感到在政權方面受歧視，但他們有平等地接受教育和考取文官的機會，這就避免了嚴重的社會分裂。大陸人和臺灣人在學校和政府機關中一起學習、工作，也有助于消除隔閡，增加交流。

雖然國民黨政府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引進了民主程序，但這并沒有根本改變它獨裁的性質。中央政府仍受蔣介石嚴格控制。這種做法起到了安全閥的作用，因它為許多臺灣人提供了實現政治抱負的機會。蔣于1954年和1960年連續當選總統。他詭計多端，通過高級軍、政官員的任命來平衡各派勢力，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力。1949年實施軍事管制，軍事法庭可對被指控從事顛覆活動的人進行秘密審判。由于美國卷入，擔心共產黨進攻的恐懼消失，使臺灣保安措施有了某些放松，但是保安機構仍很活躍。省主席吳國楨認為臺灣的氣氛使人窒息，因此他于1953年辭職赴美。吳致函國大和蔣介石，譴責臺灣缺乏民主，特務橫行。武裝部隊總司令孫立人將軍于1955年被撤職并被軟禁，罪名是有些心懷不滿的軍官居然在閱兵時上書蔣介石，孫對此負有責任。

#### 經濟穩定

當蔣介石1950年重新出任總統時，臺灣的經濟由于受到一系列打擊，十分脆弱。[[15]](#_15_Guan_Yu_50Nian_Dai_Zhi_70Nia)在日本統治下，臺灣經濟是外向型經濟。1937年出口占其生產的44％，主要是加工食品，幾乎全部輸往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臺灣受臺日航線中斷的影響，農業生產下降到1939年水平的一半。臺灣工業的3/4、發電廠的2/3、交通網的50％均被美國轟炸機炸癱。由于美國駐日本占領當局的命令，臺灣失去了在日本的傳統市場，因此轉而與中國大陸發展經濟關系。但是，到1948年，臺灣對遭受戰亂困擾的中國大陸的貿易僅達臺灣戰前外貿額的1/4。1949年上海陷落，臺灣失去了大陸市場，因此不得不尋找新的出口市場。1949年臺灣當局發行新幣，以黃金和外匯為十足準備，并與美元掛鉤，而同大陸國民黨貨幣脫離關系。然而通貨繼續膨脹，因為臺灣銀行為滿足極為巨大的軍費開支而印發紙幣。此外，臺灣物價從1946年起平均每年上漲一倍，1949—1950年度則上漲500％。

臺灣經濟盡管在40年代發生了金融危機，并遭到嚴重損失，但仍擁有很好的基礎，到50年代又得以復蘇和發展。臺灣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擁有人力資源。從亞洲標準來看，臺灣公共衛生條件良好，人民教育程度高，農民技術好、生產力高，同時還有一支小而精的工人隊伍。30年代，日本人即認識到臺灣的重要戰略地位，為了日本市場的需要，除在臺發展食品加工業外，還發展其他工業，建立了紡織廠、自行車廠、水泥廠、化工廠、紙漿與造紙廠、化肥廠、煉油廠、鋁廠和鋼鐵廠等。中國大陸逃臺難民中有許多管理人員、工程師和技術員，取代了約3萬離臺返日的日本人的職位。電站、鐵路和公路建設適當，一旦被戰爭破壞的部分得以修復，即能支援農業和工業重新發展。

到1950年，工農業發展勢頭明顯見好。工業與農業分別于1951年和1952年達到戰前最高生產水平。美國決定保護臺灣的安全起了穩定人心的作用；臺灣當局采取了限制金融的措施；從1951年開始，大量美援商品抵臺。由于這些因素，通貨膨脹才有可能得到控制。到1953年消費物價指數的增長已降到19％，1954—1960年期間年均在9％以下。

1949年開始土地改革，主要農作物的地租由50％降至37.5％。土改對農業生產和工業化有著重要的作用，并為六七十年代臺灣經濟的迅速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在土地改革的第二階段，政府向農民出賣了大量從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地。第三階段于1953年完成。在此期間，地主除保留3公頃水稻田或6公頃旱田外，必須將其余田地賣給政府，由政府轉賣給佃農。地主得到的補償是：獲得為期10年的實物（大米或甘薯）公債和在四大政府公司（沒收的日本財產）中分得股份。佃農買田的錢分10年付給政府。

土地改革極大地削弱了農村地主階級的勢力，使臺灣農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多數農民人均有2公頃以下的土地。這就增加了農民的收入。農民勞動積極，投入也多，農業生產率普遍提高。土地改革還削減了地主的財產，因為政府購買他們多余的田地時，購價低于市場價格，給他的公債利息也低于市場利率。土地改革還把四家大公司變成私營企業，使地主成為股東。

在臺灣實行土改，并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是由中美農村重建聯合委員會協助進行的。該委員會成立于1948年，由美援款項資助，由三名中國專員和兩名美國專員領導。蔣夢麟任聯合委員會主席多年。蔣系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部長。沈宗瀚為中方專員，獲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李登輝亦獲得康奈爾大學博士銜，是該委員會農業經濟專家（李在此之后任臺北市市長和臺灣省主席，1988年蔣經國去世后任中華民國總統）。該聯合委員會不算中國政府的正常機構，薪金高，能招聘到特別能干的農業專家。聯合委員會有雙重作用：代行中國政府農業部的職能；作為美國援助團的農業分支機構，負責將美國對臺經援的1/3用于發展農業。這幾乎占臺灣接受美國經援期間（1951—1965年）對農業凈投入的60％。中美農村重建聯合委員會進行了廣泛的農村建設活動，包括改良農、畜品種，興修水利，水土保持，改善農業組織、農業財政與農村衛生，進行農業研究等，被稱為發展中國家中推進農村全面建設的楷模。[[16]](#_16_Guan_Yu_Zhong_Mei_Nong_Cun_Z)

在土地改革與中美農村重建聯合委員會制定的農業發展計劃的共同促進下，從1952—1959年農業生產年均增長4％，超過了同期人口增長率（3.6％）。畜牧業生產增長了73 ％。美國經援（每年約9000萬美元）的1/4是以提供剩余農產品的形式給臺灣的。這樣，臺灣不僅有足夠的糧食來滿足人口迅速增長的需要，還能改善人民的營養狀況，維持農產品出口水平不變。農產品是這一時期臺灣主要的出口物資。

農業也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政府征收土地稅（收繳大米）；以低于市價的價格征購大米；實行大米、肥料的實物交換計劃。化肥由政府獨家經營。用化肥換大米是政府的一項巨大收入，可保證對軍政人員的大米供應，也可在市場上出售，以穩定物價。政府對主要糧食的控制使當局能保證對政府雇員的糧食供應，防止米價上漲和商人囤積居奇。國民黨在大陸時商人囤積居奇造成市場混亂不堪。

臺灣在早期即強調發展農業，使工農業能平衡發展。這在發展中國家中是不多見的。雖然為了工業發展提供資金，農業也受到“壓榨”，但其交換條件不像其他地方那樣對農業極為不利。土地改革增加了農戶的收入，為工業生產中的非耐用消費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過去的地主由于不能再興辦農場，也開始向工業投資。

臺灣當局早期作出的其他經濟決策，對50年代經濟均衡發展也有重要作用。50年代初，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國營公司（主要是化工、化肥和石油公司）占工業生產的56％。當時的領導人決定不再擴大國營企業，上述企業保持已有的水平，而將資金用于擴大基礎建設，并創造條件發展私營工業、生產消費品，以替代進口消費品。據此，政府開始投資擴建鄉村公路網，改善鐵路交通（鐵路密度在亞洲僅次于日本），增加電力生產，以滿足未來對電力不斷增長的需要。

由于采取措施鼓勵發展生產替代進口商品的工業，工業生產逐漸由出口食品加工業轉向生產紡織品、橡膠和皮革制品、自行車、木材制品等國內市場消費項目。生產這些商品需要資金不多，技術要求也低，因此可以由經驗不足的臺灣人辦的企業生產。為此，臺灣人在大城市四周或小城鎮興建小廠（可利用農村的剩余勞動力）。50年代，由于工業下放，農村人口擁向大城市的速度相對減緩。由于公共汽車和鐵路運輸的發展，許多新工人寧愿住在農村，乘車去城鎮工廠工作，也不愿遷入城市。“以工興農、以農促工”的格言，正付諸實踐。

50年代工業生產每年增長10％。到50年代末，生產替代進口商品的工業已發展到飽和程度。進口的消費品在全部消費品中僅占5％。在某些方面，生產能力已大于實際需要。這時政府需要決定是否將重心轉向生產原先進口的耐用消費品和重工業產品，還是出口已在生產的非耐用消費品。經過一段猶豫，政府選擇了后者。在作出這一決定之前，臺灣已明顯地增加了工業產品的出口。1952年，92％的出口商品是農產品和加工農產品，只有8％為工業產品。到1959年，工業品的出口已上升到總出口的24％。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外匯、金融和財政政策的一系列變化為工業品出口的迅速發展打開了大門。臺灣工業得以從主要利用國內原料為國內市場生產商品，轉向利用勞動密集工業加工進口原材料，生產出口產品。[[17]](#_17_Can_Jian_K_T_Li_1969Nian_Xie)

1960年的臺灣在幾個重要方面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它的農業不是現代化農場與大批落后農民并存，而幾乎全是小土地所有者。他們多數受過教育，生產效益較高。它的工業沒有搞國營重工業項目的跡象，而是集中力量進行基礎建設并創造有利氣氛，鼓勵私營企業從事勞動密集型的消費品生產。鄉村和城市工業平衡發展，收入分配比較平均。蔣介石及其同僚（包括嚴家淦、蔣夢麟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的著名技術專家）為六七十年代不尋常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

然而，1960年還沒有人預見到即將到來的經濟起飛。金門沖突記憶猶新。軍事開支占國民收入的11％。大陸中國糧食短缺，加之烏托邦式的“大躍進”失敗、蘇聯專家撤離，這些使臺北又有了希望：共產主義在中國就像杜勒斯國務卿所說，可能真是“一個瞬息而過的而不是永久的階段”。蔣介石和許多其他國民黨領導人依然認為臺灣建設的目的是準備有朝一日群眾起來反對共產黨統治時為收復大陸提供機會。

## 經濟起飛，1960—1970年

#### 國際地位

1961年，自從周恩來要求聯合國驅逐中華民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已經過了10年多了。聯合國成員國中反對擱置中國問題的越來越多。因此，美國及其盟國同意就中國席位問題進行辯論和表決，但他們提出一項議案，規定中國席位問題必須由2/3的多數通過才能解決，并動員成員國支持此一議案。在整個60年代他們借此議案成功地保留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繼續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排斥在外。但國際上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一再下降。這個趨勢只是因中國“文化大革命”在國際上引起惡感而暫時中止，然而不久又重新恢復。1970年，驅逐中華民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議案在聯合國表決中首次贏得簡單多數，但因未獲得2/3的多數而沒被通過。

整個60年代，中華民國除爭取保留其在聯合國的席位外，還在爭取國際承認方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較量。它邀請許多國家的要人訪問臺灣，觀察臺灣的進步，并于1961年制定了派遣技術人員援助發展中國家的計劃，主要幫助它們發展農業。到1970年，它在23個非洲國家中派有702名技術人員（包括短期和長期工作的），在11個亞洲和拉美國家派有111名技術人員。此外，它還在臺灣為發展中國家訓練了數以千計的技術人員。中華民國的富有想像力的外交使它同相當多的國家保持了外交關系。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于擁有控制著大陸中國的王牌，仍緩慢地走向勝利。法國、加拿大和意大利先后于1964年和1970年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到1970年，已有53個國家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另有68個國家仍然承認中華民國。

60年代期間，中華民國能夠保持其國際地位主要靠美國的政策。美國在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上擁有否決權。它每年都投入大量政治資本勸說其盟友和友好國家支持中華民國的地位。但是，美國的親密盟友，如法國、加拿大、意大利等在此問題上同美國背道而馳，說明美國影響在減弱。而且，美國人對中國問題的態度也在逐步變化。到60年代末期，沒有幾個美國人不認為中蘇分裂是真正的、嚴重的，并將長期持續下去。中蘇之間的論戰愈演愈烈。蘇聯人在中蘇邊境駐扎了重兵。1969年，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敵對情緒爆發，在珍寶島（達曼斯基島）發生了軍事沖突。50年代的兩極世界消失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識到，在已經出現的多極世界中，美國迫切需要同蘇聯的強大對手發展關系。

由于越南戰爭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美國官方未及時認真考慮改變對華政策問題。臺灣雖然不是美國的永久軍事基地，但在越南戰爭中卻是有用的輔助基地。美國在清泉崗（原稱公館）機場駐有一個C—130運輸機聯隊和一個KC—135空中加油機中隊。該機場的跑道是50年代美國出資擴建的，供美機在緊急情況下使用。駐菲律賓的美國第13航空大隊的兩個分隊也駐在臺灣。臺灣是西太平洋除日本之外最好的維修基地。美國戰斗機、坦克、裝甲人員輸送車均在臺灣進行大修。到60年代末期，美駐臺軍事人員（不包括家屬）近萬人。這樣，臺灣在美國作戰方面的實際價值、美國政府忙于進行一場日益不得人心的戰爭、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亂局面等，種種因素導致美國推遲重新考慮中國問題。

與此同時，美國與臺灣之間大量具有實際價值的關系也在四下輻射。整個60年代里，美國繼續向臺提供軍援，至60年代中期總額已超過30億美元。朝鮮戰爭中使用過的F—86戰斗機已由F—100、F—104 和F—5戰斗機所取代。中華民國獲得了C—119運輸機，并獲得特許與貝爾直升機制造公司聯合生產軍用直升機。奈克—大力神和隼式導彈加強了臺灣的防空能力。臺灣還得到了新型驅逐艦和登陸艇，增強了其向沿海島嶼運送補給的能力。更多的坦克和榴彈炮也已運抵臺灣。臺灣還發展了軍工生產，到60年代末已能生產M—14步槍、機槍、炮彈、迫擊炮以及其他軍事裝備。數千名軍人曾到美國受訓。

美國在1965年逐步結束了對臺灣的經濟援助。從1951年起美共向臺提供了14億美元的經援。臺灣已能在經濟上自立。美國官員宣稱臺灣是從美國經援計劃“畢業”的第一個發展中國家，并以此而自豪。美國實業家認為臺灣是一個宜于投資的地方，到1968年底，23家美國企業在其臺灣的工廠中雇用了2.2萬多中國雇員。兩家美國銀行在臺灣設立了分行。數以百計的美國牧師，因被拒絕進入中國大陸而定居于臺灣。美國的大學同臺灣的大學建立了各種交流關系，每年美國大學都招收數千名臺灣畢業生。

#### 經濟發展

臺灣60年代的10年是經濟全面突飛猛進的10年。人均收入增長率從50年代的年均2.7％，猛升至60年代的5.8％。工業品出口的增長是高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導致了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農業生產從1960年占國內生產凈值的33％降至1970年的18％，而工業生產從25％升至35％。工業生產中，國營部分所占比重從1960年的48％降至1970年的28％。而同期私營部分由52％升至72％。對外貿易從1960年的4.61億美元猛增至1970年的30億美元。工業產品在外貿中所占比例從1960年的32％躍升為1970年的79％。

臺灣在利用進口原料通過勞動密集型工業生產商品，促使出口迅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高速發展，這絕不是哪一個原因造成的，而是政治穩定，一貫強調發展50年代開創的農村經濟、采取新的外匯、金融與財政措施以促進出口等諸多因素結合的結果。

農業生產增長速度雖較50年代有所減緩，但發展勢頭依然良好。3.6％的年增長率仍然超出人口增長率。由于工業化影響和政府于60年代初期實行的鼓勵計劃生育的政策，人口增長率由1960年的3.5％降至1970年的2.4％。鑒于臺灣的可耕地幾乎已被全部利用，農業生產的增長只有靠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通過改良品種、增加勞力，特別重要的是增施化肥，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有了提高。大米在農產品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因為農民增加了更有利可圖的產品，如水果、蔬菜和牲畜等的生產，而群眾由于收入增多，也要求增加食品的品種。

60年代工業生產年增長率為20％，為50年代的兩倍。其產品主要是紡織品、木制品、皮革制品和紙制品，是當時臺灣出口活動中的尖刀商品。在60年代后半期，電子器材地位上升，外國制造商開始在臺灣建廠，利用臺灣廉價的受過簡單訓練的勞動力為他們的制成品生產部件，運到其他地區組裝。臺灣建立了出口加工區，可免稅進口原料，由臺灣勞動力加工而后出口，繁文縟節減到最低限度。這進一步促進了外商在臺灣設廠的積極性。

臺灣工業迅速發展有以下原因：有足夠的廉價勞動力；城鄉收入不斷提高，形成了一個不斷擴大的國內市場可以作為出口市場的補充；儲蓄增長，50年代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至10％，到1970年升至近30％。招工容易，農村收入增加（增長速度比城市稍慢一些），都與臺灣工業布局比較分散有密切關系。1956—1966年期間臺灣工人分布情況表明，臺灣16個最大城鎮的工業工人占總人口的32％，并呈下降趨勢。而農村中的工業工人由總人口的47％增至52％。[[18]](#_18_Jian_Gu_Si_Ta_Fu__La_Ni_Si)由于工業布局分散，到1972年，農戶一半以上的收入來自非農業生產。儲蓄增加，銀行存款額大幅度增長，為迅速實現工業化提供了資金。這是群眾信心提高、收入增加的反映，也是中國人攢錢備用的習俗的表現。1958年沿海島嶼危機的結局表明，臺灣不會遭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進攻。60年代期間，政府已采取措施，使通貨膨脹率降至每年2％—3％。銀行存款利率提高，經濟生機勃勃，失業率低，群眾對個人前途比50年代更有信心。

1965年美國終止對臺經濟援助時，曾引起政府官員的不安，但實際上對臺灣經濟發展未產生不良影響。1968年援款雖然用完，但外國私人投資卻有增加，其規模超過了過去美援提供的每年9000萬美元的數額。到1970年臺灣已積累了6.27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相當于5個多月的進口費用，完全有資格從外國銀行按商業利率獲得貸款。

#### 政治穩定

60年代，臺灣的政治體制沒有出現結構性的變化。蔣介石1960年重新當選為總統，1966年連任，1969年又再次被選為國民黨總裁。他不時重申中華民國是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并表示決心光復大陸。1947年和1948年在大陸當選并尚存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仍然繼續履行他們的憲法職能。政治穩定為臺灣經濟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而經濟發展為群眾提高生活水平帶來機會，從而又有助于維持政治的穩定。

雖然臺灣的政治體制未變，但政府的施政重點卻毫無疑問地出現了微妙的變化。那些把臺灣主要當做光復大陸基地的人們，他們的權勢在下降；而那些主要關心臺灣本身發展的人們，他們的影響卻加強了。重返大陸的希望，在1961—196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遭受嚴重經濟困難時，曾曇花一現。為了利用大陸可能出現的叛亂，蔣介石曾命令部隊作好戰備；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增兵福建，進行對抗。約翰·肯尼迪總統曾以公開的方式，并通過華沙的渠道，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反對在該地區使用武力，并且不會支持中華民國采取進攻行動。之后，除偶然發生過對大陸小規模的襲擾之外，中華民國的戰備完全用于保衛臺灣及沿海諸島。專家治國論者關心臺灣的經濟發展，他們的計劃和政策日益得到蔣介石的支持。

光復大陸的希望雖日趨渺茫，但大陸人統治集團并未因此動搖其繼續掌權的決心。他們仍然控制著國民黨內的高級職位、安全機構、武裝部隊以及財政和經濟各部。為了對付來自共產黨方面或臺灣獨立運動方面的威脅，他們有選擇地實施戒嚴令。有一位叫雷震的大陸人，是政論雜志《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編輯，曾企圖組建由大陸人和臺灣人共同參加的反對黨。此人于1960年被判處10年徒刑，罪名是隱瞞編輯部內的一名過去的共產黨員，未向當局報告。臺灣領導人不能容忍任何人進行有組織的反國民黨的活動。

國民黨的黨員人數在60年代末已接近100萬。該黨在維持臺灣的政治穩定上起著重要作用。它的一個主要職責是設置和控制公眾辯論的限度，手段是利用自己的宣傳媒介，并監督私營媒介，超出規定限度的便加以取締。該黨在地方和省級選舉中，都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在1964—1968年進行的選舉中，該黨候選人當選率達78％至92％。該黨通過中國青年團（前身是三民主義青年團）、農民協會、工會、漁民協會、合作社及婦女團體，在政府和人民之間溝通聯系。在校園內，黨的官員密切監視著學生的言行。

隨著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過去，大陸人同臺灣人之間的緊張關系開始緩和。但是，臺灣人對大陸人專權行為的抱怨并未消失。1965年，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原系主任彭明敏教授秘密印制傳單，號召臺灣人奮起反抗，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此人及另兩名同謀者因此被判處8年徒刑，之后被減刑，并逃離臺灣。臺灣獨立運動繼續煽動臺灣獨立。其活動主要在日本和美國進行。但該運動力量弱小，且受內部派系斗爭困擾，在臺灣本土影響不大。1965年，曾在11年前被東京的一群臺灣流亡者任命為“福摩薩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統的托馬斯·廖（廖文毅），脫離該運動并返回臺灣，之后其他一些人也效法他回歸臺灣。

以外國為基地反對國民黨的運動，之所以未能在臺灣產生大的影響，部分原因是島上安全機構的有效控制，雖然這種控制本身也引起了臺灣人的不滿。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得益于經濟的增長。因為這種增長為大批臺灣人提供了就業和經商的機會，并提高了他們的收入水平。特別是臺灣籍商人正同官僚機構中的大陸人發展關系，雙方對維持政治穩定都有共同的利益。此外，臺灣籍從政者正在更大范圍內尋求政治參與。雖然他們組織反對黨的權利被剝奪，但卻更加策略地以獨立人士的名義提出候選人，同國民黨候選人競爭。高玉樹（亨利·高）是一位在日本受過教育的臺灣籍工程師，他在1964年的選舉中智勝國民黨，第二次蟬聯臺北市市長。在同年的選舉中，獨立人士還贏得了基隆和臺南兩個城市市長的寶座，從而使臺灣五大城市中，有三個為非國民黨人擔任市長。為了在未來的臺北市市長選舉中不出現同國民黨競爭的局面，蔣介石于1967年將該市定為“特別市”，直屬行政院領導，并指定高玉樹為首任委任市長，從而巧妙地將臺灣人的不滿化為烏有。1969年，臺灣籍從政者首次獲得了參加全國性競選的機會。情況已很明顯，由于在大陸當選的代表敵不過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全國由選舉產生的一些機構的委員人數在迅速減少。因而，國民大會選出了15名新代表，立法院選出了11名新委員，監督院選出了2名新委員。這樣，在60年代，臺灣人通過商業上的成功、選舉上對國民黨的挑戰以及直接加入國民黨等方式，在大陸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找到了越來越多的擴大自己影響的途徑。

在整個60年代，蔣介石仍是無人與其挑戰的領導人。他自1938年以來是黨的首腦，自1948年以來是民國的總統，又是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掌握著任免全部高級軍政官員的大權，是所有重大問題的最高決策人。他以傳統的儒家方式實施統治：家長作風，遠離群眾，對群眾施恩并要求群眾對他本人效忠相報。他個人生活儉樸，也要求下屬節制。蔣在60年代初已年逾七旬，其繼承人的傳聞集中在副總統陳誠和蔣的兒子蔣經國兩人身上。蔣經國當時是臺灣安全和情報工作的總負責人。此二人在國民黨的高層人物中均不乏大量的支持者。蔣介石對此事不表態，相反卻抓緊權力不放，不允許其他任何人擁權過大。1965年陳誠去世，終年68歲，從而消除了蔣經國最大的競爭對手。1964年蔣經國任國防部副部長，次年出任部長。陳誠死后，普遍認為他正被培養為蔣介石的繼承人。

#### 社會變革

隨著60年代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在教育、都市化和勞動力組合方面，也出現了顯著的變化。中國人的教育程度長期以來與他們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有關。他們習慣為自己的孩子——特別是男孩，謀求最好的教育。在臺灣，早在1950年，相當數量的女孩也接受教育。當時，女生占小學人數的1/3以上，占中學人數的1/4。但在大專院校中，僅占11％左右。到1960年，女生人數的比例在小學上升到將近50％，中學上升到34％，高等學府上升到23％。在60年代，由于收入增加，父母竭力為自己的孩子謀求更多的教育。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970年，接受基礎教育的人口比例略有下降，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卻增加了一倍。文盲在6歲以上人口中的比例從27.1％下降到14.7％。女生人數在中學生中的比例達44％，在大學生中的比例達36％。1968年，免費教育從6年延長到9年，這是中學入學人數增加的原因之一。

大學畢業生大批聚集美國進行深造，每年去美人數平均為2000—3000人。其中很多人在美國定居不歸，因為在60年代，獲得博士、碩士學位的人才，特別在理工科方面的人才，在美國就業的機會很多。這個時期赴美國留學的人，僅有約5％回歸臺灣。這種“人才外流”利弊都有。它使臺灣失去了政府花了大量投資培養出來的人才。但另一方面，臺灣不可能吸收這樣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向他們提供他們所學專業的工作崗位。一群受過高等教育而又未充分就業，并且不滿現狀的過剩的年輕人，可能制造政治麻煩。去美國留學，使臺灣的許多優秀大學生把精力集中到學習上，而不是像有些發展中國家的大學生那樣，把精力轉向搞政治騷動。而且，在美國受過良好訓練的中國人日益眾多，是個人才庫，他們同在臺灣的家庭仍保持著聯系，當臺灣的工業和科研進一步發展后，他們仍可回臺工作。

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隨著工商業的發展，臺灣正變得更加都市化。在60年代，大城市人口增長87％，城鎮人口增長73％，而同期全臺灣人口僅增長35％。關于臺灣都市化對社會的影響，迄今還未徹底加以研究，但從現有資料即可得出某些結論。[[19]](#_19_Can_Jian_Ai_Mi_Li__Ma_Ding)臺灣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并不像其他許多地方那樣，是由于農村人口增長對土地產生壓力的結果。因臺灣的農業增產已大大抵消了農村人口的增長。這種人口的流動，似乎更多的是由于城市工商業就業機會的增加和農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而不是逃避貧困。都市化帶來了勞動力組合方面的巨大變化。在60年代，農、漁、林業的雇用人員僅增長16％，而商業、制造業和服務性行業的工作人口卻分別增長43％、82％和115％。臺灣的城鄉差別較小，因此這種人口流動對家庭生活和傳統價值觀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不像其他地方那樣嚴重。臺灣是個小島，公共汽車和火車運輸方便，因此去城市的移民較易同他們在農村的老家保持聯系。許多移民在城市呆了一段時間之后，又回到農村。有一份研究材料斷定，進入臺灣最大的幾座城市的每4個移民中，有3人離去。[[20]](#_20_Xiao_Ao_Er_Deng__Si_Pi_Er)由于有收音機（平均每10人擁有1臺）和全島范圍發行的日報，城鄉居民在了解信息方面已無差距。在60年代，報刊和書籍的出版發行量迅速增加。

## 新的挑戰，1971—1978年

到了70年代，臺灣在敵對環境中生存的能力受到自40年代末以來最嚴峻的考驗。它的國際地位和國內經濟遭受嚴重打擊。它還必須搞好從蔣介石統治到一位新政治領導人統治的過渡。臺灣接受了這些挑戰，并繼續發展和繁榮。這證明臺灣統治精英們在過去數十年所建立起來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正確的。

#### 外交上的挫折

1971年7月，華盛頓令人吃驚地宣布：理查德·M.尼克松總統打算訪問北京。對臺灣來說，70年代就這樣不祥地開始了。尼克松及其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亨利·基辛格曾斷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關系，有助于解決不得人心的越南戰爭，并使美國在對蘇聯的緩和攻勢中，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他們正確地判斷，在中國問題上，美國的輿論已經轉變，將會支持他們的行動。美國國會未按慣例作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決議，這是20年來的第一次。尼克松總統也不再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雖然他的代表也在為臺灣保留在聯合國的席位而活動。但就在聯大就此問題進行緊張的辯論時，他卻派出亨利·基辛格訪問北京。這表明他把這個目標放在較低的優先位置。1971年10月，聯合國通過表決，決定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驅逐臺灣，因為北京堅持如果臺灣仍為聯合國成員，它將不參加聯合國。

臺灣被逐出聯合國之后，大多數與它有外交關系的國家同它斷交，并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帶頭這樣做的國家之一便是日本。日本領導人對于尼克松總統未事先同日本商量就決定改變美國對華政策，感到十分震驚。1972年9月，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與臺灣斷絕外交關系。到1977年，同臺北仍維持外交關系的國家僅剩下23個。臺灣喪失在聯合國的席位之后，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更便于將其逐出其他國際組織。僅僅數年之間，臺灣幾乎喪失了所有的國際官方機構中的席位，而要保留在國際非政府組織中的地位也何等困難。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決心制止臺灣政府宣稱代表中國，而且拒絕國際社會將臺灣看做一個單獨的政治實體。對北京領導人來說，“一中一臺”和“兩個中國”一樣，都是不能容許的。

臺灣同大多數國家的外交關系斷絕之后，被迫采取異常的辦法以維持國際交往。由于出口占臺灣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對外貿易對其生存至關重要。日本是臺灣除美國之外最重要的貿易伙伴。1972年，臺日貿易占臺出口的12％和進口的42％。出于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東京和臺北雙方都希望維持密切的實質關系。正如日臺外交關系終止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對自由民主黨內的同事所說：“日臺之間存在著強大而深厚的關系。因此，即使外交關系中斷，雙方的行政關系必須受到尊重和珍惜。只要他們不觸犯維護日中關系的根本原則，我們愿意盡最大的努力保持日臺之間的行政關系。”[[21]](#_21___Zhao_Ri_Xin_Wen____1972Nia)

在日臺斷交3個月之后，雙方即同意作出非官方的安排，以取代外交關系。[[22]](#_22_Dai_Wei__Na_Er_Xun__Luo____F)日本建立了一個由一名前大使領導的交流協會，在臺北設有事務所，而臺灣也成立了亞東關系協會，在東京、橫濱、大同、福岡等地設有辦事處，由國民黨一位中央委員擔任會長。兩個協會的工作人員多是現任或已退休的外交人員，但以私人身份任職。雖然他們沒有享受給予外國外交官的全部優惠及豁免權，但仍充分享受特殊的待遇，以便他們能夠完成通常由外交使團執行的任務。日臺之間的貿易繼續進行，沒有發生中斷。1972—1979年，臺灣從日本的進口總值增長4倍，而對日本的出口增長6倍。日本在臺灣的投資，在停滯一年之后，又恢復向上發展的勢頭。

1974—1975年，由日臺雙方國家航空公司經營的航線被停止一年多，這是對日臺實質關系唯一嚴重的一次干擾。其原因是日本外相大平在宣布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航空聯系時，涉及對中華民國國旗的輕蔑處置，從而臺北命令雙方停飛。外國航空公司迅速填補了由日航及華航經營的這條航線，因此雙方的空中運輸并未中斷。經過交流協會同亞東關系協會長時間的談判，并且由大平的繼任宮澤喜一外相在日本國會發表了安撫性的談話之后，華航及日航的子公司——日本亞洲航空公司，終于恢復了這條航線。

為了促進在全球范圍內的貿易，臺灣建立了“中國外貿發展協會”。這是強制各出口商捐助而成立的民間組織，它在國外的辦事處有各種不同的名稱，這取決于駐在國的政治態度。在有些地方，當使用“中國”字樣可能帶來麻煩后，該辦事處就取名“遠東貿易服務中心”辦事處。由于在多數國家都沒有領事官員，臺灣想出許多辦法，為那些希望訪問臺灣的外國人提供簽證。例如在西德，人們可以從“臺灣旅行社”獲得“推薦函”，以此在臺灣入境時換取入境簽證。在東京，亞東關系協會提供的簽證上蓋的印章是：“中國大使館，漢城，韓國”。在馬來西亞和泰國，簽證由華航發放。由于同許多國家都沒有外交關系，致使臺灣在解決那些需要由政府出面解決的問題時，便感到更加棘手，在國際上采取行動時也產生不便和出現遲延。但所有這些，都沒有嚴重妨礙臺灣同其他國家保持實質關系。臺灣同其他國家的這種實質關系，使得它能在國際社會中作為一個單獨的政治實體繼續繁榮發展。

當然，在這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臺灣繼續同它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貿易伙伴——美國，保持著外交關系。在70年代，臺灣同美國的貿易，占臺灣進口的22％—27％，出口的34％—42％。1972年2月，在上海發表的經過仔細斟酌的聯合公報中，美國同意進行具體協商，以促進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正常化；但是，對何時和在何種條件下實現關系正常化，美國并未作出承諾。美方稱，它對海峽兩岸中國人主張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不持異議。美國重申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興趣，宣布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美國將減少在臺灣的軍隊和設施，直到全部撤出臺灣。該公報是華盛頓和北京同意暫時將臺灣問題擱置一邊，以便發展相互間的各種關系的象征。1973年，兩國在對方首都成立了聯絡處，使發展雙邊關系的工作有了執行機構。臺灣政府和人民對該公報以及互設聯絡處感到震驚，預感到這是他們今后前途的兇兆。但是，他們并不反對美國在發展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系的同時，加強同臺灣的經濟聯系。

尼克松總統訪華之后不久，美國進出口銀行總裁即去臺灣，向當地的公私項目提供長期信貸。到1975年，該行在臺灣的貸款和信貸保證已將近20億美元，是該行除在巴西之外投放資金最多的地區。1973年，美國在臺北成立貿易中心。美國私人投資繼續涌入臺灣。1972—1975年，加入臺北“美國商會”的美國公司從60個增至200個。從1971—1978年，臺灣從美國的進口總值增長6倍，向美國的出口增長5倍。1978年，美臺雙向貿易額達74億美元，而美中貿易額當時才11億美元。

在美臺經濟聯系加強的同時，軍事關系卻在改變。美國為履行《上海公報》的承諾，逐漸撤出在該島上的軍事人員，使其從1972年的1萬人減少到1978年底的750人。1974年，美國國會悄悄地撤銷了1955年的《福摩薩決議案》。臺灣雖仍繼續從美國獲得軍事裝備，但須以信貸或現金購買，而不是以贈送的形式進行。美國繼續幫助臺灣改善軍火工業，特別是批準諾斯普拉公司從1974年起，在臺灣合作制造F—5E戰斗機。

70年代，臺灣大學畢業生繼續流向美國，但返回臺灣的人數在增加。特別是70年代末，高級專業人才在臺灣就業的機會增多；而在美國，因經濟衰退，工作機會減少，回歸的人更多。許多父母送孩子去美國留學，不僅是為了學習和改善經濟條件，也是為了當他們的孩子在美國獲得永久居住權或加入美國國籍之后，一旦臺灣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這些孩子可以為他們提供出逃的去處。因此，他們申請在美國享有永久居住權的“綠卡”，“綠卡”成為這些人的珍貴財產。

#### 經濟上的壓力

臺灣經濟經過了20年的高速發展之后，在70年代首次遭到嚴重的衰退。在這10年的前三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13％。但是，這種高增長率因石油價格猛漲而迅速停滯下來。因為臺灣完全依賴進口石油，油價上漲對其打擊特別大。1974年，臺灣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下降到1.1％，工業生產20年來首次下降4.5％，消費品價格指數上揚47％。但是，在對付這次危機上，臺灣顯示出它特殊的靈活應變能力。“十大建設”（本節以后將予以討論）在70年代初即開始進行。雖然當時有些經濟學家持反對態度，認為在過熱的經濟中，政府不應投入太多的資金；但是，為了抵消私營工業生產下滑帶來的影響，這些工程被證明是有益的。1975年初采取殘酷措施，當年的通貨膨脹率便下降到5％。紡織業因國際市場萎縮受到打擊，大批年輕紡織女工失業而回到她們的農村家園。這些工人沒有失業保險，家庭代替了這種保險。1975年，經濟逐漸恢復，達到4.5％的中等增長水平，之后幾年又進一步回升。從1976—1979年，平均年凈增長率達12％。

70年代，農業生產增長速度放慢，平均年增長率為2.3％。大米生產持平，增長主要來自蔬菜、水果和畜牧業。農村收入與城市相比，一直呈下降趨勢。政府為維護農村收入的增長，完全改變了過去的政策。1973年廢除了大米換化肥的做法，從而使化肥降價，并得以大量使用。政府不但取消了以低價強制收購大米，相反還以高于市場的價格購買，以此作為對米農的補貼。這樣，政府放棄了過去為了工業而榨取農民資金的做法，轉而像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那樣，對農業實行補貼。同其他地方一樣，這些補貼使大米大量過剩，成為國庫開支的很大負擔。但為了縮小城鄉在收入上的差別，防止農民政治不滿情緒的增長，這樣做是必要的。到1970年，農業工人的數量已飽和。農村勞動力的日趨短缺，刺激了機械化的發展。投入使用的動力耕作機、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稻米干燥機、動力噴水機的數量，相當迅速地增加。但是，由于農場規模小（平均每戶僅約1公頃土地），難以單獨投資搞機械化，使機械化進程受阻。為了推進機械化，政府在農民中間促進多種形式的合作，但收效不大。這樣，到70年代末，政府需在諸多相互矛盾的目標中作出困難的決策：是否仍以家庭農場為標準單位，如何以機器代替日益緊缺和昂貴的農業勞動力，如何避免大米極度過剩和國庫的沉重負擔，如何縮小城鄉收入上的差別，以及如何保持臺灣的基本糧食品種自給自足。

在70年代，工業生產的增長速度也慢了下來，但仍然取得了年均增長15％的突出成就，雖然其間1974年是下降，1975年增長較小。這種增長較50年代快，但比60年代末期慢。工業生產中，私營部分對公營部分的比重一直持續上升，但這種增長勢頭到70年代宣告結束，公私營部分的比例大約穩定在19％∶81％。這種變化反映出：在基礎工業及私營企業無力投資的大型項目上，政府需作更多的投資。政府投資的“十大建設”，包括臺中新港的修建、蘇澳港的擴建、南北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以及一個新的國際機場、一個聯合鋼鐵廠、一個大型造船廠和幾個石油化工廠的興建等。

臺灣的進出口貿易從1971年的39億美元猛增到1979年的310億美元。其中工業品的比重從1971年的81％逐漸上升到1979年的91％。臺灣的生存仍然依賴對外貿易。為了同勞動力便宜的國家（如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競爭，臺灣政府認識到需要不斷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和技術水平。70年代，臺灣開始將勞動密集型工業轉變為資金和技術密集型工業。本地制造的機器設備日益取代過去的進口產品，資本貨物開始向東南亞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出口。臺灣領導人力圖將主要是一家一戶經營的小規模企業轉變為大型現代化企業，從而在高技術產品上適應國際競爭的需要，采取的措施是在教育和訓練方面下更多投資，政府要作更多的干預。

#### 政治過渡

1972年，蔣介石以85歲的高齡再次當選總統，任期6年。但他的健康日益衰退，已不能參加政府的日常工作。這時，培養蔣經國為其繼承人的工作早就開始了。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3年之后，于1972年出任院長。作為行政院長，他實際上是政府的最高決策人，但在重大問題上他仍請示他父親，以盡人子孝道。1975年，蔣介石去世。副總統嚴家淦按憲法規定繼任總統。嚴是個專家治國論者，沒有政治背景，蔣經國遂成為真正的領袖。蔣介石死后不久，蔣經國即當選為國民黨主席，1978年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

蔣經國執政后，臺灣政治體制的獨裁性質并沒有立即改變，但蔣經國的工作重點和統治方式，與其父迥然不同。他謀求在官僚體制的范圍內，建立較明確的責任制，而不太強調派系背景和同領導人的個人關系。他經常到島上各地旅行，身穿運動衫和寬松褲，直接傾聽士兵、農民、工人和漁民的意見。這種做法與其父高高在上的儒家作風大相徑庭。他大張旗鼓地發起反腐敗運動，使一些高級官吏被定罪伏法。他曾經當過21年的“中國青年團”的領導，因而仍然對青年工作感興趣，并重用年輕人。尤其重要的是，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臺灣人的地位。他任命臺灣人為行政院副院長、省長和其他高級官員。他特別關心農業改革，其目的在于提高幾乎全部是臺灣人的農民的生活水平。“二·二八事件”已過去25年，大陸人與臺灣人之間的關系已趨成熟。尼克松總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的改變，在臺灣不論對大陸人或臺灣人，都是很大的沖擊，使他們認識到彼此攜手合作以對付來自大陸嚴重威脅的重要性。

70年代，戒嚴令繼續執行，其他形式的政治控制也未放松。但蔣經國受到高層領導人中一些自由派人士的影響，允許在一定程度上放寬政治活動和言論自由。1971—1972年，在國立臺灣大學的知識分子中間，政治討論活躍，并見諸報端。這次討論涉及諸如學術自由的限度、治安警察的作用以及收入分配等敏感問題。臺灣政府和國民黨對此作出謹慎而有效的反應，使這次討論重新回到他們認為恰當的限度之內。有一家叫《臺灣政論》的月刊，曾大膽引用一位在國外的反國民黨知識分子的話說，臺灣人民的選擇只有兩條，一是推翻國民黨建立獨立國家，一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實行統一，兩者必居其一。該雜志僅出版了5期，1975年便被停刊。其編輯次年以煽動叛亂罪被叛處10年徒刑。有些問題在臺灣仍被列為禁忌。[[23]](#_23_Guan_Yu_70Nian_Dai_Chu_De_Zh)

70年代，許多因素結合起來，形成了必須進行政治變革的壓力。由于在大陸選出的全國代表機構里的委員亡故很快，更加突出感到必須重新考慮以下問題，即作為一項基本國策，這些機構必須在全中國都有代表性。1972年和1973年，新增選了少數國大代表、監察院和立法院的委員。但這僅是權宜之計，對于如何長期解決這一難題，并未找到辦法，只得將其束之高閣。臺灣籍的從政者謀求在現有體制下，并在允許的范圍之內，取得更大的勢力。因此，地方性的政治活動變得更為活躍。他們以各種花招爭取流入城市的大批移民。這些移民已不再被原來地方以政治忠誠和義務所束縛。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群眾關心選舉活動。富裕的臺灣籍商人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投巨資為某些候選人競選。在1977年的省級和地方選舉中，無黨派候選人首次在全島范圍內進行合作。有些人公開警告國民黨，不允許他們操縱選舉。在中壢，當一名國民黨官員涉嫌在選票上搞鬼之后，一群暴民騷亂，縱火焚燒了警車和消防車。政府平息這次騷亂時表現得十分小心。無黨派候選人贏得了1/5的席位，多于他們在1973年選舉中獲得的席位，但少于此前有幾次選舉中所獲得的席位。臺灣的第三和第四大城市——臺南和臺中，都由無黨派人士當選市長。無黨派從政者因這次選舉結果而歡欣鼓舞，他們認為這是向較為民主的制度邁進了一步，雖然微小，但很有意義。

#### 文化和學術生活

自從國民黨政府來到臺灣之后，從中國大陸移植到臺灣的中國文化經歷了巨大的變革。來自西方的新苗被嫁接在中國的砧木上，產生了形形色色的雜種。新的技術發展以及大規模的教育，產生出一種大眾文化。它幾乎立即傳播到全島，并日益緊密地同世界文化潮流結合在一起。雖然官方竭力鼓勵追求傳統的中國文化，但其崇拜者的隊伍卻日益縮小。

國民黨及其政府，在努力影響文化發展趨勢的過程中，曾受到各種反對力量的沖擊。為了反共求生，臺灣當局企圖利用文化，并爭取知識界，為其反共服務。例如早在1950年，政府即建立文學獎，鼓勵作家生產“反對集權主義和共產主義，捍衛人類自由的，有積極意義的文學作品”。[[24]](#_24_Qi_Bang_Yuan_Deng_Bian____Da)許多作品，特別是50年代的作品，帶有明顯政治色彩：須要用最重的筆把共產黨大陸描繪成漆黑一團；須要避免可被認為對臺灣政府有顛覆作用的主題。30年代中國的主要作家幾乎全是“左”傾分子，他們仍留居大陸，其著作在臺灣被列為禁品。

臺灣領導人將臺灣描繪成珍藏中國傳統文化的場所，宣傳中國共產黨人反復灌輸外國思想，正在摧毀中國文化。而大陸在反右斗爭中殘酷迫害知識分子，搞“文化大革命”，以及掃“四舊”運動中紅衛兵大量毀壞書籍和藝術品等，證明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指責言之有據。國民黨領導人認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十分重要。這不僅為了盡量劃清他們同共產黨人之間的界限，增加臺灣對海外華僑的吸引力，也是為了強調他們對“一個中國”的保證。

為了使臺灣人認識到他們屬于中國文化，政府禁止進口日本出版物及電影片，不允許地方電臺播放日本歌曲。并在學校課程中增設中國歷史及文明史，反復灌輸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諸如尊敬父母和尊重權威等。60年代，臺灣政府修建了“故宮博物院”，這是一個宏偉的展覽館，從大陸帶來的大批價值連城的中國文物珍品都在此展出。政府多次主辦在臺灣的藝術家的傳統中國畫和書法展覽，以及中國古典音樂表演。軍隊支持四個獨立的京劇團。這些京劇團不僅為臺灣及沿海島嶼的武裝部隊服務，也為公眾演出。[[25]](#_25_Can_Jian_Yi_Er_Mu_Jia_De__Yu)

學術生活仍由健在的“五四”運動時代的學者們領導。羅家倫負責文史館的工作，開始編輯辛亥革命史和中華民國史。傅斯年在1919年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之一，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他在大陸時領導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該所現已遷到臺北郊區南崗的新址，與其他研究所成了近鄰。它所公布的當時中國外交部（總理衙門）檔案中有關帝國主義戰爭及中國國內運動情況的文件，對全世界的歷史研究工作都有裨益。

大陸的某些大學在臺灣重新成立。北京的清華大學和上海的交通大學在新竹重新成立，并在該地為新竹科學工業場提供理工方面的援助。政治大學和中央大學原在南京，現分別重新安置在臺北和中壢兩地。東吳大學的校友們在臺北建設了一座新的東吳大學。羅馬天主教會過去曾資助過北京的輔仁大學，現又在臺北建立了一座輔仁大學。亞洲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在臺中創辦了東海大學。在臺北過去的帝國大學，變成了臺灣最有聲望的最高學府——國立臺灣大學。以上僅是臺灣105所高等院校中的一小部分。1987年，高校學生共有44.3萬人。

臺灣政府力圖將島上的知識分子團結起來，組成統一的反共隊伍，以保衛中國的傳統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做法同從西方——特別是從美國涌入的思想發生了日益嚴重的沖突。官方認為，臺灣既是中國傳統的儲藏所，又是自由世界的堡壘。為了從美國繼續獲得對臺灣生存至關重要的支持，臺灣當局在自由問題上雖耍些花言巧語，但也給予知識分子一些自由，且不允許兩者之間出現太大的差距。臺灣當局的上述政治需要，加上社會的迅速現代化，使知識分子，特別是在臺灣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在文學、音樂、戲劇、藝術和舞蹈上，更廣泛地應用西方的主題和藝術形式進行試驗。

臺灣文化變革最大的特點是大眾文化的傳播。這種集新舊為一體的文化因得助于現代科學技術而興起。半導體收音機很早就出現了，其數量很快成倍增加，使全島千百萬人能聽到新聞廣播、京劇及通俗音樂。之后，立體聲唱片或錄音帶（多是非法翻錄的，并且很便宜）開始普及起來。到1980年，臺北的許多出租汽車司機都在車上裝上了磁帶收放機，以便他們能欣賞自己喜愛的音樂。臺灣著名歌星演唱通俗歌曲的磁帶，是中國大陸城市中年輕人渴望尋覓的對象。

政府經營以及私營的電影制片廠生產的影片日益增多。這些影片供臺灣放映，并在香港及東南亞和其他地方的華僑中散發。到70年代末，臺灣制片廠年產影片150—200部，主要是歷史片、功夫片、愛情片及喜劇片。就質量而論，臺灣片不及日本最好的導演導制的影片，但上座率卻很高。到80年代初，電視已成為接近公眾最有效的手段。1979年，臺灣電視機總數已超過300萬臺，約每5人1臺。[[26]](#_26___Zhong_Hua_Min_Guo_Tong_Ji)臺灣電視節目受美國的影響，也結合變革后的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播放新聞和文娛節目。節目包括雜耍、臺灣劇、現代肥皂劇（日間播放的連續劇）、歷史劇，以及一些教育和公眾服務影片。全島3家電視臺靠廣告收入維持。到1979年，播送的節目幾乎全部是彩色的了。

過去30年來，臺灣發行的日報數量沒有大的變化，仍然保持在30家左右。但是，隨著識字率的提高和生活的逐漸富裕，特別是自1965年以來，受歡迎的日報的發行量大幅度上升。為了使島上各地的報道迅速傳送，安裝了高速印刷機和傳真排版機，從而使報紙的印刷能滿足需要。到1980年，全島四大日報（私營的《中國時報》、《聯合報》、《臺灣時報》以及國民黨辦的《中央日報》）的發行量將近300萬份。臺灣全部日報的總發行量為400萬—500萬份，平均約每4人有1份日報。[[27]](#_27_Xu_Chuo_Yun___Wen_Hua_Jia_Zh)各大報都預訂了國際主要通訊社及臺灣中央社國際部的新聞稿，因此這些報紙登載相當大量的國際新聞。《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還設有文藝副刊，為在臺灣的作家提供發表作品的重要園地。《聯合報》還在美國出版美洲版，供當地華僑閱讀。

文化生活還有其他方面，從臺灣傳統的“拜拜節”（在整個農村中大宴敬神，并伴有戲劇和木偶表演）到藝術家和作家種種標新立異的試驗（如西方的抽象派藝術及象征主義、存在主義作家的寫作方法）。當前正風行振興中國民間舞蹈，并使之現代化。一個生氣勃勃的青年舞蹈團——云門舞蹈團，將中國的和現代的舞蹈技巧很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已在美國和歐洲演出過。

自從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成立以來，在該地產生的中國小說已經歷了很大的變化。[[28]](#_28_Can_Jian_Zhen_Ni_Te__L_Fu_Lu)50年代，長短篇小說皆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反共作品，或是來自大陸的作家懷舊和逃避現實的作品。50年代末，夏濟安曾評論說：“過去10年在臺灣發表的長篇小說中，我沒有發現任何一部作品是嚴肅或詼諧地描寫工農生活，或教師、政府職員等小資產階級人物生活的。其實這些作家本身就屬于上述這些人，例外的幾乎沒有。”[[29]](#_29_Xia_Zhi_Qing____Xian_Dai_Zho)

但在1960年，一群有才干的年輕大學生創辦了《現代文學》雜志。他們利用這份雜志發表自己的作品，或翻譯介紹一些西方的現代作家，如卡夫卡、戴維·勞倫斯、弗吉尼亞·伍爾夫、喬伊斯、薩特、菲茨杰拉德、福克納和斯坦貝克等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這批年輕人不得不舍棄曾吸取過西方文學技巧的30年代中國文學主流派，而重新使西方的現代思想適應中國小說的創作。他們作品中的佼佼者，如白先勇的《臺北人》，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他的作品，以及他的同事王文興、陳若曦和歐陽子等人的作品，打破了50年代的舊框框，使臺灣文壇顯得更加生動活潑。但是，有人卻批評這些作家，說他們只關心形式而忽略內容，也說他們對當前臺灣人面臨的問題，缺乏從文化和歷史的角度進行深入的探索。[[30]](#_30_Li_Ao__Li_Ou_Fan__Yin____Tai)

70年代，臺灣小說界出現了一種新的聲音：臺灣出生的作家關心窮苦人民，特別是農村的窮苦人民和社會上被欺凌的人們的生活。這些寫所謂鄉土文學的人，如陳映真、王拓、王禎和、楊青矗和黃春明等，在他們的作品中，使用了不少臺灣方言，描寫來自農村的“小人物”在現代化帶來的社會快速變革中所遇到的苦惱。這些作家中，有人因參加政治活動而被捕。陳映真因“顛覆活動”罪被判7年徒刑，王拓和楊青矗因與1979年12月高雄暴亂有牽連，1980年被判12年徒刑。

在臺灣，如同在其他地方那樣，通俗小說作家的作品遠比“現代派”作家和“本土派”作家的作品暢銷（“現代派”作家力圖以革新的手法，在自己的小說中使用西方的文學技巧；而“本土派”作家則關心現代化對社會最底層人們帶來的影響）。最突出的例子是瓊瑤。她已寫出20部長篇小說，其中大部分已拍成電影。她寫的愛情故事有美滿的結尾，從而贏得了大批讀者。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1963年問世，迄今已再版30次。[[31]](#_31__Tai_Wan_Wen_Xue_De_Xian_Dai)

臺灣文化存在著三種趨勢：為保留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奮斗，知識分子為創造獨特新穎的文藝作品而努力，以及現代群眾文化的出現。所有這些趨勢在大陸也可以察覺到，但卻有很大的不同之處。不管在中國，或是在臺灣，孩子們不再單調地背誦儒家名篇，或花長時間用毛筆練寫書法。很少有官員能賦詩作畫。古典文藝也多被送進博物館而無人問津。但是，大陸較之臺灣，有更多的有利條件，即它擁有如長城和故宮等著名的歷史古跡。大陸的考古工作者還在不斷發掘古代的珍寶，包括蔚為壯觀的西安秦始皇陵墓（兵馬俑）。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壓制的傳統通俗文藝——京劇、雜技、木偶劇以及街頭賣藝的吞劍表演等，在70年代末迅速復蘇，使長期患娛樂饑餓癥的群眾十分高興。由于北京政府強調保護文物，院校又培訓了年輕的雜技演員、民間舞蹈演員、京劇和地方劇種演員，對群眾喜聞樂見的傳統通俗娛樂活動又全面放松限制，這樣，臺灣宣稱只有它才是中國傳統唯一保護人的說法就不那么理直氣壯了。

在受西方影響的現代大眾文化的沖擊下，臺灣的傳統大眾文化已在步步退卻。臺灣的大眾文化已日益國際化和商業化。在大陸，人們要求翻譯西方國家的書籍，播放極受歡迎的外國電影和電視節目，年輕人對來自臺灣和西方的音樂很感興趣。這說明，大陸的人們希望接觸早已席卷臺灣的世界文化，至少在沿海城市是如此。

在臺灣，有志于進行嚴肅的文藝工作的人們，在發揮自己的才能方面，比在大陸的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在共產主義制度下，以現領導人規定的辦法，迫使文藝“為人民服務”，使人們的創造性受到束縛。臺灣與此相反，國民黨雖限制接觸敏感問題，但并不強迫作家只搞一種模式。黨的官員可能不理解或不贊成抽象派藝術，但畫家和雕塑家仍有自由去進行試驗。這些年來，臺灣藝術家和作家的創造在生動和技巧方面有了進步。

到1980年，有些臺灣小說已在大陸出版。同時，二三十年代大陸的一些偉大作家，如魯迅和老舍，他們的著作雖仍在官方禁忌之列，但對那些知道何處有香港非法出版的版本的人而言，不難獲得他們的著作。因此，在80年代初期，大陸和臺灣雙方已開始互補而共同得益。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動倡議

尼克松總統在1972年訪華及《上海公報》發表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倍努力使臺灣政府和人民確信：“解放”臺灣不可避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人告誡說，美國不可靠，并號召臺灣當局就國家統一問題同大陸進行談判。北京過去發出這種號召時，幾乎完全針對在臺灣的大陸人，現在卻開始注意臺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很清楚，大陸人在臺灣政府中的統治地位終將結束，占人口大多數的臺灣人必將取而代之。他們認為，到那時，臺灣領導人繼續執行一個中國的政策是至關重要的。

70年代初，周恩來親自會見了幾批海外華僑，包括在臺灣出生的華僑。他向他們保證，臺灣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其生活水平將不會降低，而且臺灣社會和政治制度的改造將逐漸進行。他邀請臺灣的人們到大陸訪問，親眼看看大陸的情況。他還強調臺灣人在“解放”臺灣中的重要作用。在這類會見中，周恩來和鄧小平均強調，為了實現統一，需要長時間的耐心工作。但是如果和平方式失敗，他們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在向臺灣人民努力發出呼吁時，明顯地緩和了對臺灣獨立運動的態度，認為該運動的領導人雖然冥頑不化，但還可挽救。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注意做臺灣當地人工作的同時，并沒有忽視大陸人。它向這些大陸人保證，不管過去的罪惡多大，只要現在為臺灣回歸祖國工作，他們將獲得寬恕。它邀請他們公開或秘密地來大陸訪問。它釋放了幾百名已關押25年或更長時間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和相當一批在60年代捕獲的特務分子。如果這些人愿意，還允許他們去香港或臺灣。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呼吁，同過去一樣，對臺灣影響不大。1976年，行政院長蔣經國在立法院說：“我們的態度是：決不同共產黨人建立任何形式的聯系。”[[32]](#_32___Zhong_Guo_Dong_Tai____1976)在臺灣，幾乎沒有人（不管是大陸人或是臺灣人）認為，在北京控制臺灣后，他們個人會從中得到任何好處。相反，他們害怕，臺灣的生活會降低到大陸的水平，而且他們會同樣遭受強加在大陸中國人身上的那種難以忍受的控制。大批美國和日本的華僑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后，向他們傳達了在大陸的見聞，但與他們在臺灣相對舒適的生活相比，大陸的情況對他們沒有多大吸引力。

## 美中關系正常化以后的臺灣

1977—1978年，美國駐臺北大使曾預告臺灣領導人：美國政府正準備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盡管如此，當1978年12月15日吉米·卡特總統宣布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關系正常化時（此決定僅提前數小時通知蔣經國），臺灣政府和人民仍感到十分震驚。美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決定從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系，并同時廢除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系，從該日起的一年內終止同中華民國的共同防御條約，在4個月內撤出在臺灣的所有剩余軍事人員。經華盛頓和北京同意的聯合公報宣布：美國將與臺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及其他非官方的關系。美國也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在一項單獨聲明中稱：美國繼續對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感興趣，并希望中國人自己會和平解決此問題。中國政府則宣布，臺灣回歸祖國的方式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在宣布關系正常化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中國共產黨主席華國鋒透露，中美兩國政府在向臺灣出售武器問題上存有分歧。在會談期間，美國曾表示，將繼續向臺灣供應數量有限的防御性武器，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同意。

臺灣政府官員對上述關系正常化協議立即進行了尖銳的譴責。12月底，副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訪問臺灣，討論中美關系正常化后華盛頓和臺北的關系問題。當他的代表團抵達時，憤怒的群眾高喊侮辱性的口號，并沖破警察的保護圈，以棍棒擊打代表團的車輛。蔣經國要求，在終止外交關系后，華盛頓與臺北之間建立某種形式的政府之間的關系，遭到克里斯托弗的拒絕。因為，美國政府已保證，同臺灣只保持非官方關系。

美國國會議員們對行政部門事前未同他們充分磋商而表示不悅，對政府草擬的未來對臺灣關系法也表示不滿。他們對該法案進行了反復修改，于1979年3月底予以通過，這就是《與臺灣關系法》。[[33]](#_33_Gai_Fa_An_De_Yuan_Wen_Ji_Dui)該法案遵照卡特政府在與北京談判時同意的，即未來同臺灣的關系應是非官方關系的原則，并規定建立非官方機構——美國在臺協會，在華盛頓和臺北設辦事處，以處理雙方的這種關系。該法案還提供法律根據，即按照美國法律，繼續將臺灣作為一個法律實體對待，并在改變之前，使雙方現有的條約和協議繼續有效。還作出規定，允許美國官員暫時脫離其官方職位，以民間身份去美國在臺協會任職。

但是，對國會中設計此法案的主要負責人來說，該法案關鍵的規定著眼于，當其共同防御條約終止之后，臺灣的安全仍然有保障。該法案明確指出，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是基于：期望臺灣的前途以和平方式決定，而對于以和平方式以外的方式決定其前途的任何做法，美國都將嚴重關切。該法案還表示，美國有意向臺灣提供防御性武器；美國有意保持自己的能力，以抵抗任何人憑借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強制手段，危害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

臺灣當局對于美國大幅度改變對臺政策后可能出現的影響，雖然仍十分焦慮，但對《與臺灣關系法》卻表示歡迎，并開始使自己適應新的形勢。他們成立了一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作為美國在臺協會的非官方的對應機構，以行使過去由他們的駐美使館和各領事館執行的職能。中華人民共和國強烈抗議《與臺灣關系法》，認為該法違反了關系正常化協議的規定，構成了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但是，他們表明態度并記錄在案之后，并未糾纏下去。1979年和1980年，他們開始同美國建立廣泛的關系。

1980年下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關切美國同臺灣的關系。美國飛機公司同臺灣討論可能向臺出售一種先進戰斗機的要求，得到卡特政府的批準；同時，美國在臺協會同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簽訂協議，規定相互給予對方幾乎相當于外交使團享受的各種優惠和豁免權。這些事態發展使中國感到不安。在1980年的競選中，羅納德·里根總統發表了親臺灣的講話，其中包含有意使美臺關系“升格”的內容，使北京更感驚恐。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正式聲明和公開評論中，開始提醒華盛頓，中國從未同意美國繼續向臺灣銷售武器。因為荷蘭向臺灣出售兩艘潛艇，中國領導人為強調反對外國向臺灣提供武器，于1981年3月將同荷蘭的外交關系降為代辦級。1981年秋，他們警告華盛頓：除非美國規定出停止向臺出售武器的時間表，否則中美關系將惡化。

經過長期反復談判，雙方終于在1982年8月17日達成一個措辭嚴謹的聯合公報。鑒于自1979年1月1日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采取和解政策，以及在本公報中，中方重申和平統一臺灣是其“基本政策”，美國在公報中表示，美國不想執行對臺灣武器銷售的長期政策，美對臺的武器銷售在性能和數量上都不會超過近幾年來的水平，美將逐漸減少對臺的武器銷售，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后，使這個問題得到最后解決。[[34]](#_34_Lian_He_Gong_Bao_Quan_Wen_Ji)臺灣官方尖銳批評這個公報，認為它違反了《與臺灣關系法》的文字和精神。雖然美國決定延長合作制造F—5E戰斗機的協議，以便能再生產60架該型飛機，在一定程度上使臺灣安靜下來；但對于美國拒絕向他們出售更先進的戰斗機，他們表示遺憾。與此同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歡迎該公報的同時，宣稱“籠罩在中美關系上的烏云還沒有全部掃除”。該社論希望“美國政府切實履行自己的諾言，實實在在而不是敷敷衍衍地減少對臺灣的武器出售”，以使這個問題“早日徹底解決”。[[35]](#_35___Hua_Sheng_Dun_You_Bao____1)

#### 北京—臺北的相互影響

美國同意逐漸減少對臺灣的武器銷售時，十分指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臺灣與大陸和平統一的建議。北京在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同時，宣布停止向沿海島嶼發射散發宣傳品的炮彈。從60年代初以來，一直是每逢單日發射這種宣傳品。大陸的電視臺還首次播放了一部顯示臺灣風景區和鬧市情況的紀錄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聞媒介不再稱臺灣領導人為“蔣幫”，而代之以“臺灣當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呼吁臺灣批準同大陸通商、通航、通郵和實行人員往來，并稱中國尊重臺灣的現狀，將采取合理政策解決統一問題，以使人民免遭損失。鄧小平副總理在會見來訪的美國參議院代表團時，甚至保證說：在統一之后，臺灣將享受充分的自治，保持其現有的社會和經濟制度以及武裝力量。鄧還對這些參議員說，只有在臺灣當局無限期拒絕談判，或者蘇聯進行干涉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會對臺灣使用武力。

1981年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提出了一個關于統一問題的全面的九點建議，讓臺灣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享受“高度的自治權”。他說，中央政府將不干涉臺灣的地方事務，臺灣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與外國的經濟、文化關系不變。葉還許諾不侵犯私人財產的所有權、繼承權和外國投資。葉也答應向臺灣提供經濟援助，并在大陸的全國性政治機構中，為臺灣官員安排領導職位。他呼吁國共兩黨代表會晤，以便就統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36]](#_36_Ye_De_Sheng_Ming_Quan_Wen_Ji)

和過去對付北京的提議的做法一樣，臺灣當局斷然拒絕了葉的建議，重申他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談判、不接觸的政策。他們將葉的建議描繪成主要針對美國的宣傳，其目的是想說服美國：臺灣不需要美國武器。他們指出，葉在建議中允許臺灣保留自己的武裝力量，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竭力反對臺灣為這些武裝力量從美國或其他地方獲得新的武器，這兩者之間是矛盾的。他們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有誠意的談判建議，應該秘密提出，而不是通過公開的宣傳媒介。在臺灣政府內部和群眾中普遍存在的恐懼是：假如臺灣當局開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該島的歸并問題，他們將處于危險境地，最終將導致臺灣為北京所控制，并在臺灣強制實行共產主義制度。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的許諾缺乏信心，因為即使年邁的鄧小平有誠意，也不能保證他的繼承人會履行他的承諾。北京拒絕答應不對臺灣使用武力，更增加了他們的擔心。

雖然談判的道路走不通，但在1979—1982年間，臺灣人民和大陸人民之間各種形式的非官方接觸卻在穩步增加。1978年之前雙方微不足道的雙向貿易，到1981年發展到約5億美元（主要通過香港進行）。在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之后擴大到其他國際體育聯合會），雙方達成妥協：大陸體育組織稱“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而臺灣的相應組織稱“中國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從而使雙方的運動員都能參加國際體育比賽。臺灣和大陸的科學家日益頻繁地在國際會議上會晤。雙方在美國大學或其他地方學習的學者和學生，也走到一起相互了解。雖然臺灣政府仍然禁止臺灣和大陸之間直接通郵，但親戚之間通過在香港、美國或日本的親友交換信件，已變得日益平常。臺灣少數人甚至到大陸探親而未被政府拘捕，雖然他們這樣做如嚴格按照法律規定是非法的。通過各種形式的交流，人們對海峽兩岸的情況正在形成更加現實的看法。

#### 政治上的緊張和經濟上的衰退

臺灣原擬于1978年12月舉行立法院和國民大會的選舉。反對派政客在1977年的地方選舉中取得成功之后，在行動上更加放肆，并顯得更有信心。他們在全島范圍內更緊密地協調行動，并提出廢除戒嚴令、釋放政治犯和增加民選官吏等更大膽的要求。就在選舉即將舉行的前幾天，美國意外地宣布同北京關系正常化，使政府推遲了選舉。在美臺中斷外交關系之后的緊張氣氛中，政府以涉嫌通共罪，將一名臺灣籍的反對派政客和他的兒子投入監獄；對于參加游行、抗議這次逮捕的一名非國民黨縣長，也給以撤職處分。

國民黨內保守分子的勢力暫時上升，他們要求在國家危急關頭加強團結，因而公開辯論敏感問題的勢頭受阻，但這種勢頭又很快恢復。1979年2月，政府受具有自由思想的國民黨領導人的影響，取消了已實行一年的對新雜志不予登記的禁令，使新的政治性雜志很快出現。這些雜志在觀點上從鼓噪反共的《疾風》，到堅決反對國民黨的《美麗島》（《福摩薩雜志》），應有盡有。中間派的雜志受到國民黨內的溫和分子和走中間道路的反對派政客的支持。一場活躍的政治大辯論很快展開。這場大辯論公開討論了敏感問題，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評論家們提出了進行政治和司法改革的廣泛而具體的建議，并要求有組建反對黨的權利，同時猛烈批評國民黨。

以立法委員黃信介為首的一批著名的臺灣籍反對派政客贊成《美麗島》觀點（該雜志自詡為“臺灣民主運動雜志”）。《美麗島》集團的主要目標是：由臺灣人選舉成立自己的新政府，并且暗示，要建立一個獨立的臺灣國——雖然它不敢這樣公開宣布。該集團在臺灣各地迅速建立起10個支部，每個支部由當地一位著名的臺灣籍反對派政客領導，并開始舉行反國民黨的招待會和集會。這個集團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影子政黨。這個集團在反國民黨方面是團結一致的，但內部組織松懈，紀律渙散。它成了強硬派《疾風》的主要攻擊目標，被毒罵成親共分子。由于它組織的集會規模日益擴大，氣焰更加囂張，因而遭到不僅是國民黨內臺灣籍政客的批評，也受到溫和的臺灣籍反對派政客的非難。后者認為，刺激國民黨攤牌是不智之舉。

1979年12月10日，雙方終于進行了攤牌。在高雄，由《美麗島》集團組織的游行發展成為暴亂。為此，該集團有14名領導人被捕，其中8人（包括立法委員黃信介）以煽動叛亂罪被控，并被判處12年徒刑到無期徒刑。[[37]](#_37_Yue_Han__Qia_Pu_Lan____Jun_S)這樣，政府一下子就消除了臺灣籍反對派中極端分子的主要骨干。回顧起來，很清楚，《美麗島》集團過高估計了公眾的支持，過低估計了政府的決心和能力。政府絕不允許任何政治集團以“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的口號煽動群眾情緒，反對國民黨。雖然大多數臺灣人贊成臺灣人在政府中應有更大的影響，但許多人不同意《美麗島》集團所采取的方式。臺灣人和大陸人的一致意見是：應該有秩序和逐漸地進行政治改革，而不是同執政黨進行大規模的對抗，因為這種對抗只會危害政治穩定、公共秩序和幾乎所有人皆已得益的經濟增長。

高雄事件及其以后對一些人的定罪，引來了一段對政治言論嚴格控制的時期。立法院通過了新的選舉法。該法的目的在于保護國民黨的統治地位，防止選舉活動中發生群眾混亂，但仍允許有可能獲勝的反對派候選人參加競選。按照新的選舉法，1980年舉行了立法院和國民大會的選舉（原定1978年12月舉行，被推遲），1981年又舉行了省級和地方選舉，均能順利進行。雖然在省級和地方選舉中，候選人花的錢比過去哪一次都多。這種收買選票的做法，在宣傳媒介中曾遭到猛烈抨擊。

從1979年開始，世界性的經濟衰退也使臺灣遭到損失。但美國中斷同臺灣的外交關系對臺的經濟并未產生明顯的不利影響。1979年，臺灣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8％，1980年增長6.8％。1979年，新的外國投資額達到創紀錄的3.29億美元，1980年又猛升到4.66億多美元。臺灣在爭取外國貸款上毫無困難。1980年，臺灣向美國、歐洲和日本銀行共借貸12億多美元。臺灣的長期外債總額僅為50億美元，其償債率僅約6％，這在發展中國家中是異常低的。外國銀行都渴望在臺灣開設分行，而政府不得不在每年批準一定的數量，以抑制競爭。1980年，有8家外國銀行在臺北設立分行，其中5家為歐洲銀行。到1981年初，共有23家外國銀行在臺灣設有分行。

1980年，臺灣同100多個國家進行雙邊貿易，總額超過390億美元。經濟政策的決策人強調對西歐的貿易，部分原因是使臺灣的貿易伙伴多樣化，但也是為了增加歐洲人對臺灣的了解，以便將來爭取他們政治上的支持。臺灣同西歐貿易的增長率，高于臺灣全部貿易的平均增長率。1980年，歐共體各國超過日本，成為臺灣的第二大市場。臺灣還一改過去嚴格的反共立場，于1979年解除了不同5個東歐國家直接貿易的禁令，并允許同其他東歐國家進行間接貿易。

#### 回顧與展望

1949年以來，臺灣的歷史由兩個主要部分組成：對外是在巨大的威脅面前，為生存而斗爭；對內是使一個農業社會現代化。

由于臺灣同大陸之間有100英里之遙的海峽相阻，加上美國的支持和保護，臺灣的生存才有了保證。只要美國第7艦隊承擔防止入侵的任務，臺灣海峽這條海上屏障就能成功地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入侵。同時，一個海島防止滲透和顛覆，要比大陸的一個省容易得多。即使在1979年底美國同中華民國的安全條約被終止之后，臺灣海峽由臺灣的50萬美式裝備的部隊防衛，也是一個難于逾越的障礙。在安全條約終止之后，美國繼續是臺灣新式武器和軍火備件的主要供應者。美國不僅在防御上給予臺灣極其重要的支持，而且多年來維護了臺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并在經濟上向臺灣提供了對其經濟騰飛非常重要的援助。美國給予臺灣人民喘息的機會，而臺灣人民很好地利用了這個機會，從而到70年代，當美國為了照顧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建立的關系而減少對臺灣的支持時，他們更加自信，自立能力也更強大。

臺灣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繁榮昌盛。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50年代的約200美元，猛增至1982年的1800美元。在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中，臺灣大大地走在前列。它與南朝鮮、新加坡和香港一道，被稱為西太平洋的“四小龍”。在發展中國家中，它們以經濟的高速發展著稱，而這種發展主要依靠對外貿易。這些國家加上日本的榜樣，可能是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決心擴大對外貿易和使用物質刺激，以促進工農業生產的部分原因。但是，臺灣異常快的經濟增長，是由本章前面的部分討論過的許多因素決定的，不是都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抄襲的，例如：日本人在臺灣留下的相對發達的基礎；從大陸匯集來的大批有經驗的行政管理和技術人才；美國早年給予的大量經濟援助；土地改革；重視教育；60年代初，當世界貿易空前迅速發展時，決定轉變以出口帶動工業增長；對私營企業的鼓勵；保守但靈活的貨幣和金融政策；領導人依靠有才干的技術治國專家。

只有具有穩定的政治環境，才有可能取得經濟上的進步；而政治穩定也要有可觀的經濟上的進步，二者是相輔相成的。當人們看到他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而且有信心使自己的孩子今后生活得更好時，他們就不會輕易被革命的花言巧語所煽動，去參加對抗或使用暴力，以強制手段進行政治變革；大多數群眾就會同意政府強調法治秩序和實行逐步、漸進的變革。臺灣的政治穩定，還有一些因素不同于其他發展中國家：高層領導人的合法性被接受；國民黨實行堅定但適度壓制性的統治；以及大陸共產主義制度的威脅（這里廣泛認為大陸制度的壓制性更大）。此外，早先規定了地方選舉，大批臺灣人加入國民黨，任命臺灣人擔任政府和黨內日益高級的職務，也有助于緩和大陸人領導層同廣大群眾之間的矛盾。

20世紀80年代，雖然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放慢，但臺灣仍然擴大了自己的出口，并繼續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到1987年，臺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上升到5000美元，外匯儲備猛增至驚人的760億美元（這僅次于聯邦德國和日本）。由于美國對臺灣貿易出現大量赤字，雙方的貿易摩擦開始增多。在美國的壓力下，臺灣勉強同意減少貿易壁壘，使臺幣對美元升值。臺灣面臨幾個嚴重的經濟問題，特別是需要盡快將勞動密集型產品轉變為較高技術的產品，以保持對其競爭者的優勢。也需要使其銀行體制現代化，以刺激國內投資。臺灣面臨的超量出口、儲蓄和外匯儲備等問題，與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截然相反。臺灣有經驗的經濟管理人員，正為此作出必要的調整，前景看好。

為了對付日益富裕的中產階級及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的壓力，蔣經國于1986年宣布有意廢除戒嚴令，解除對成立新政黨的禁令，并允許辦新的報紙。1979年高雄暴亂被關押的多數反對派領導人被釋放。其中有些人成了新建立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的領導人。對政治言論的控制也大大放松，政治生活較前活躍。因各種問題而上街游行已司空見慣。到90年代初，1947年和1948年在大陸當選的幾乎所有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和國大代表，都將去世或退休，屆時他們的職位將被臺灣人民選出的較年輕的從政者所接替。國民黨可能繼續保持其支配地位，但將面臨民主進步黨和其他一些新政黨日益劇烈的挑戰。

民主進程不可逆轉，它將使越來越多的臺灣人走上國民黨和政府的高層職位，正如臺灣當地人李登輝那樣。1988年1月蔣經國死后，他立即就任總統及國民黨代理主席。領導層的“臺灣化”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新的領導人是否會放棄“一個中國”的立場而宣布臺灣獨立。為防止分裂，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使用武力相威脅。這對臺灣獨立是一個強大的威懾因素。但較大的可能是：臺灣以一個事實上獨立的政治實體這種不明確的身份，繼續存在下去；而臺灣和大陸之間的貿易及其他形式的相互作用進一步增加。在蔣經國于1987年決定允許臺灣人到大陸探親之后，這種趨勢日益發展。

假如臺灣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緊張關系進一步緩和，和平共處的穩定局勢不斷發展，對臺灣采取軍事行動的危險就會下降。美國根據1982年8月中美聯合公報的規定，減少向臺灣供應武器，將不會從消極方面影響到臺灣的安全。可是，不管何種原因，假如這種趨勢出現逆轉，則不但中國的兩部分，還有美國，都將面臨困難的抉擇。

[[1]](#_1_11)臺灣人大部分為福建省南部移民的后裔，講廈門方言。一小部分為廣東人的后裔，講客家話。這兩部分人通常統稱為“臺灣人”。臺灣的“大陸人”系由1945年以后由大陸移居臺灣的中國人組成。他們講多種方言，但其共同語言是以中國北方方言為基礎的國語。1982年，臺灣總人口為1800萬，其中200萬為“大陸人”及其子女。臺灣總人口還包括約20萬當地部族人，他們主要居住在山區，其祖先在中國人到來之前即定居臺灣。他們與馬來人有血緣關系，操多種語言。

[[2]](#_2_11)喬治·H.克爾：《福摩薩：特許的革命與地方自治運動（1895—1945）》，第185頁。

[[3]](#_3_11)同上書，第177頁。

[[4]](#_4_11)《國務院公報》1950年1月16日，第79頁。

[[5]](#_5_11)關于對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臺灣情況的估計，參閱約瑟夫·W.巴蘭坦《福摩薩：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問題》；弗雷德·W.里格斯：《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福摩薩》；董顯光：《蔣介石》；鮑大可：《共產黨接管前夕的中國》，第20章：“海島避難”；艾伯特·雷文霍爾特：“今日福摩薩”，載《外交事務》第30卷第4期（1952年7月），第612—614頁；馬克·曼考爾編：《今日福摩薩》，出自《中國季刊》專刊，1963年7—9月，第15期。

[[6]](#_6_11)《國務院公報》1950年7月3日，第5頁。

[[7]](#_7_11)丘宏達編：《中國與臺灣問題》，第250—253頁。

[[8]](#_8_11)同上書，第257頁。

[[9]](#_9_11)關于對1954—1955年與1958年沿海島嶼對抗形勢的具體分析，參見J.H.卡里基《中美危機的形式》。

[[10]](#_10_11)關于五六十年代美國與中華民國關系的發展，參見拉爾夫·N.克拉夫《島國中國》；福斯特·雷亞·杜勒斯：《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外交政策（1949—1969）》；丘宏達編：《中國與臺灣問題》；丘宏達編：《中國與臺灣爭端》；卡爾·洛特·蘭金：《在中國任職》。

[[11]](#_11_11)關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治形勢，參見克拉夫《島國中國》；丘宏達編：《中國與臺灣問題》、《中國與臺灣爭端》；道格拉斯·H.門德爾：《福摩薩民族主義政治》；彭明敏：《自由的體驗》；保羅·T.K.西編：《現代臺灣》。

[[12]](#_12_11)蔣的目標是把臺灣建成一個樣板省，作為收復大陸后進行建設的堅實基礎。參見董顯光《蔣介石》，第490頁；布賴恩·克羅澤：《丟掉中國的人》，第353頁。

[[13]](#_13_11)“二·二八事件”后，究竟死了多少人，沒有精確的統計。外國觀察家最翔實的描述是喬治·克爾的《被出賣的福摩薩》第14章“三月屠殺”。克爾系美駐臺北副領事。他估計大陸人死亡約30—100余人，臺灣人死亡人數可能像福摩薩作家經常使用的數字那樣約2萬人。然而，克爾說：各方面都夸大自己的傷亡數字。他在《福摩薩：特許的革命》中寫道，至少有1萬福摩薩人被殺死或監禁，數千人被迫逃往海外。另，維克托·H.李估計死亡“數千人”（“臺灣與美國的對華政策：引言”，載于李所編《臺灣的前途》第2頁）；約翰·斯里明的《青梅竹馬》第133頁說是“7000人”；道格拉斯·門德爾認為是“1萬至2萬人”（《福摩薩民族主義政治》第37頁，援引卡爾的數字）；林天奔（音）認為是“2萬人”（“黑色的1947年3月”）。

[[14]](#_14_11)陳誠：《臺灣的土地改革》，第21頁。

[[15]](#_15_11)關于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臺灣經濟發展最新和最全面的分析，請參見沃爾特·蓋倫森編《臺灣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中華民國戰后的經歷》；尼爾·H.雅各比：《美國對臺灣的援助：外援、自助與發展之研究》；T.H.沈編：《農業在發展戰略中的地位：臺灣經驗》；K.T.李：《臺灣經濟發展的經驗》；簡·S.普賴拜拉：《臺灣的財富、發展、穩定與公正的社會目標》；以及雪莉·W.Y.郭《過渡中的臺灣經濟》。

[[16]](#_16_11)關于中美農村重建聯合委員會的情況，參見約瑟夫·A.亞格爾《臺灣農業的改革：農村重建聯合委員會的經驗》。

[[17]](#_17_11)參見K.T.李1969年寫的文章：“公共政策與經濟發展”，載于李《臺灣經濟蓬勃發展的經驗》，第30—73頁。

[[18]](#_18_11)見古斯塔夫·拉尼斯：“工業發展”，載蓋倫森《經濟增長》，第224頁；塞繆爾· P.S.何（音）的“臺灣農村的非農業部分”，載《世界銀行就業和農村發展研究》第32卷。

[[19]](#_19_11)參見埃米莉·馬丁·艾亨、希爾·蓋茨編《臺灣社會的人類學》；詹姆斯·C.熊（音）等編：《臺灣經驗（1950—1980）》。

[[20]](#_20_11)小奧爾登·斯皮爾：“臺灣的都市化及人口移動”，載熊等人編《臺灣經驗》，第281頁。

[[21]](#_21_11)《朝日新聞》1972年10月1日。

[[22]](#_22_11)戴維·納爾遜·羅：《非正式外交關系：1972—1974年日本同中華民國的情況》，具體敘述了日臺建立特殊機構取代正式外交關系的情況。也可參閱克拉夫《島國中國》第7章。

[[23]](#_23_11)關于70年代初的政治趨勢，請參閱馬黃（音）《臺灣知識分子騷動：要求實行政治改革（1971—1973）》。

[[24]](#_24_11)齊邦媛等編：《當代中國文學選集：臺灣（1949—1974）》第2卷，第1頁。

[[25]](#_25_11)參見伊爾姆加德·約翰遜：“臺灣的京劇改革”，載《中國季刊》第57期（1974年1—3月），第140—145頁。

[[26]](#_26_11)《中華民國統計年鑒（1980）》，第595頁。

[[27]](#_27_11)許綽云：“文化價值和文化的連續性”，載熊等人編《臺灣經驗（1950—1980）》，第24頁。

[[28]](#_28_11)參見珍妮特·L.福洛特編《臺灣的中國小說：批評的觀點》。

[[29]](#_29_10)夏志清：《現代中國小說史（1917—1957）》，夏濟安的附錄，第511頁。

[[30]](#_30_10)利奧·李歐凡（音）：“臺灣文學的現代派和浪漫主義”，載福洛特《臺灣的中國小說》，第6—30頁。

[[31]](#_31_10)“臺灣文學的現代派和浪漫主義”，第22頁。

[[32]](#_32_10)《中國動態》1976年9月20日，B1。

[[33]](#_33_10)該法案的原文及對該法案的分析，請參閱丘《中國與臺灣爭端》；其他分析參閱鮑大可《美國的武器出售：中國—臺灣纏結》；羅伯特·L.唐恩：《重大的憂慮：進入80年代的美臺關系》；威廉·金特納、約翰·F.科珀：《兩個中國問題：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中國—臺灣問題》；埃德溫·K.斯奈德、A.詹姆斯·格雷戈爾、瑪麗亞·張霞：《與臺灣關系法和中華民國的防務》。還可參閱1980年6月給美國參議院外委會的報告：《與臺灣關系法的實施：第一年》；美國參院外委會、國會研究所、國會圖書館1980年6月發起的專題討論會：《臺灣：美中關系正常化一年后》；1980年5月14日美國參院外委會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小組的聽證會《與臺灣關系法的疏漏》。

[[34]](#_34_10)聯合公報全文見《紐約時報》1982年8月18日。

[[35]](#_35_10)《華盛頓郵報》1982年8月18日。

[[36]](#_36_10)葉的聲明全文見《北京周報》1981年10月5日，第24、40頁。

[[37]](#_37_10)約翰·卡普蘭：《軍事法庭上的高雄被告》。

# 后記 統一的重任

在第14卷中，我們說過，只有在一個世紀之后，才有可能就中國共產主義事業提出全面的看法。為中國兩千年歷史的最后一卷寫結束語是件冒險的工作。但是，我們的著述既已涉及現實狀況，如果不提出一些當代的看法（即使這種看法可能只會成為未來歷史學家的笑料），似乎過于怯懦。

我們在最后這兩卷的導言（即第14卷第1章）“中國的再統一”中指出：“生活在歐洲和美洲的10億左右歐洲人，分成約50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而10億多中國人卻生活在一個國家中。”[[1]](#_1_Can_Jian_Fei_Zheng_Qing___Zho)歐洲人沒能恢復羅馬帝國，而中國卻成功地恢復了自己的帝國，這單純從地理上和民族差異上來解釋是不夠的。與此相反，我們認為，戰國時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的混戰局面使中國的政治哲學家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為最高理想，統一成了壓倒一切的政治目標。一旦統一實現了，就建立官僚政府加以維護。[[2]](#_2_Tong_Shang)政府因有全國統一的象征——皇帝，而順利行使其職能，因有全國統一的社會意識形態而合法化。政府又是意識形態的保護者。

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中國共產黨可被視為另一個統一的“朝代”。他們擁有“帝王”式的主席、“帝王”式的政府和“帝王”式的意識形態。然而，他們的成就，對當代人來說，雖然十分驚人，但與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隋（公元589—617年）相比卻相形見絀。秦朝結束了戰國時期的混亂局面，成立了第一個真正的帝國。隋朝，在歷時三個世紀的分裂之后重建了秦漢制度，使統一再次成為政治組織的準則，并延續了1300年。而毛及其同僚在近40年的混亂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其功績與漢、唐、明、清等朝代（均較快地接管了政權）更為相似。

不管其成就多大，共產黨要求統一，就得到了所有愛國的中國人的支持。國民黨顯然希望在它的旗幟下統一中國，沒有一個人對統一這個古老的理想持懷疑態度，特別是在經歷了1916—1928年軍閥割據之后。的確，如果統一使改朝換代合法化（像我們所說的那樣），那么，共產黨成功地統一了中國大陸（蔣介石從未做到這一點），它就獲得了傳統的“天子”地位。

許多中國歷史書中都承認并推崇中國爭取統一的政治斗爭。[[3]](#_3_Can_Jian_Fei_Zheng_Qing___Zho)但是，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在共產黨統治40年后，中國人這一歷史性成就的消極后果已開始顯露出來。

正如我們所指出的，治理中國眾多的人口是一項“巨大的任務”。按照傳統，皇帝對臣民的生死和思想擁有絕對的權力。實際上，帝王文官制度的框架只能對法治和經濟保持一般的和表面的監督。特別是在18世紀人口爆炸之后，它完全依賴地方豪紳對社會進行具體監督。地方豪紳贊成政府要求穩定的意愿和儒家的意識形態，但帝王統治模式允許廣大群眾有不同的習俗和信仰以及經濟活動的自由。共產黨卻打破了中央和地方、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這種平衡關系。

共產黨在執政前的數十年中，已在毛的領導下被磨煉成控制和動員群眾的有力工具。“中國共產黨幸運的是，現代運輸和通訊工具以及火力和警察網絡的發展，使新的人民共和國政府擁有各種手段來控制國家，并曾一度控制著中國社會。”[[4]](#_4_Yuan_Wen_Que_Zhu_Shi_Wen)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深人到各個最偏僻的農村。

中國共產黨雖擁有高超的組織和技術手段，但這并不使它與傳統的政權機構有何區別。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生氣勃勃的改造自然的強烈要求。這種與順其自然的傳統截然不同的社會氣質的變化可與秦、隋時期的改革性突破相媲美。過去的政府旨在維持一個穩定的農業社會，而現在共產黨則決心把中國改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而且還要高速度地實現這一目標。

中國由于具備有利條件，在經歷了數十年分裂后，到1957年已根據其既定目標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由于在朝鮮戰場上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打成平手，中國的民族自豪感和國際威望有了巨大的增長。中國在工業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社會制度已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以比較平穩的方式進行了改造。[[5]](#_5_Fu_Lei_De_Lei_Ke__C_Tai_Wei_S)

在國外，特別是在亞洲非共產黨國家中，中國共產黨的成就引起了人們的畏懼。

但是，在頭腦發熱、盲目追求某種目標的時候，成功的工具也會成為破壞的武器。中國共產黨能夠將備受壓迫的農民訓練成為戰績赫赫的戰士，將小土地所有者變成集體農民，但也可動員他們投入使數百萬人喪生的災難性的“大躍進”運動。[[6]](#_6_Can_Jian_Ni_Gu_La_Si__La_Di)只有在像中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受嚴格控制的國家中，才可能發生這樣一場可怕的全國性災難。

如果說“大躍進”突出了改革目標與動員本領相結合的消極面，那么，“文化大革命”則暴露了新發現的由中央直接向全國灌輸意識形態教育的災難性后果。帝王時代的儒家學說滲透到民間基層時已不可避免地會摻雜別的內容，而純正的毛澤東思想卻可以通過廣播電臺、電視臺和散發數以百萬計的“紅寶書”直接傳播到全國各地。

“文化大革命”也突出地顯示了傳統的政治文化的另一個方面：帝王象征的權力。過去的皇帝主要依賴理智的朝廷命官和豪紳來擴大和維護民眾對他的敬仰，而朝廷命官和豪紳都有自己的全國和地方議事日程。但是，對“帝王”式主席的崇拜卻是由毛與狂熱的紅衛兵和機會主義助手直接聯系而培育起來的，并通過他們和新聞宣傳機構廣為散播。在毛及其思想的名義下，無數暴行得以發生，整個國家可以被推到無政府狀態的邊緣。

傳統上強調統一，動用傳統的政治工具——帝王、官吏和意識形態教育——來維護統一，并使之與現代宣傳和組織相結合，再加上改造社會的現代目標，這種種因素結合在一起所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到1976年毛逝世時已昭然若揭。上述因素結合在一起其威力之大已多次使中國經濟上瀕于崩潰和政治上陷于無政府狀態的邊緣。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再次出山掌握最高權力后，他所采取的行動表明，他至少已記取了一些教訓。他沒有放棄統一的思想，因為統一是共產主義革命最主要的目標。他也沒有放棄改造社會的希望，因為改造社會是革命的另一個重要目標。但是，他確確實實地改變了傳統政治工具的作用，節制使用那些曾使傳統政治工具起破壞作用的現代技術。他試圖削弱“帝王”象征的重要作用，本人不擔任黨和國家的正式最高領導職務。他與毛不同，真心實意地擴大他所選定的接班人的權力。他削弱了意識形態的作用，并鼓勵把社會從官僚統治束縛中解放出來。這個解放進程是毛在“文化大革命”中開創的。

長期以來，毛不斷批評官僚，特別是當他感到他們企圖束縛自己手腳的時候。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是在壓制人民而不是解放人民。鄧似乎與毛有同樣的看法，但他主要指黨的控制對經濟的扼殺作用。他削弱了黨的作用，把農民從集體主義中解放出來，在城市中鼓勵發展私營企業。他否定了意識形態的作用（這種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后已在不斷減弱），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宣傳媒介不再主要是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工具。

但是，毛、鄧之間存在著一個深刻分歧：毛看來喜歡“亂”，而鄧卻痛恨“亂”，特別是他看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全國動亂和個人悲劇之后，更是如此。像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家一樣，他追求和平與秩序，并把國家團結視作必要的前提。

然而，鄧的改革計劃破壞了原有的保證安定團結的象征與工具，也沒能提出新的代替措施。社會上開始出現各種各樣的活動，并從80年代中期開始提出新的要求。當時，國家只有一件保證安定團結的工具，即中國人民解放軍。

1989年年中天安門廣場事件，暴露了中國改革計劃中的政治真空。它把一個繼續存在的根本問題展現在試圖把中國引人現代世界的中國政治家面前：在允許人們享有充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自由，以使國家繁榮昌盛的同時，如何維護10億人的團結？

中國共產黨像他們之前的儒家一樣害怕宗派主義，并曾鎮壓過地方主義。這是他們維護統一的責任。從這一角度來看，歐洲沒能保持或恢復羅馬統一不是失敗，而實際上是實現歐洲多元化前程的關鍵。吉本在分析西羅馬帝國失敗的影響時指出了這種益處（對中國人來說，這可能是一種痛苦的經驗）：

歐洲現在分裂為12個強大（雖不平等）的王國、3個令人尊敬的政治實體和許多較小的獨立國家。政府官員因統治者增多也相應的增加了……由于恐懼與羞恥的相互影響，各種暴政受到制約。共和制國家社會秩序良好，局勢穩定。君主制國家或者吸收了自由的原則，或者采取了溫和的政策。隨著時代的發展，那些缺陷最多的憲法也引進了一些榮譽感和正義感。和平時期，如此眾多的活躍的國家之間的競賽，加速了知識和工業的進步。戰時，歐洲各國軍隊在適度的和非決定性的斗爭中得到鍛煉。[[7]](#_7_Ai_De_Hua__Ji_Ben____Luo_Ma_D)

吉本進一步指出，歐洲在舊帝國分崩離析的基礎上形成了許多獨立的小國，而正是由這些國家組成的歐洲政治體系保證了歐洲現代化的自由。國家之間的對立競爭與均勢比帝國時期那種沉悶的、死氣沉沉的單調一致狀況好得多。人們經歷了20世紀的大屠殺，對吉本18世紀關于“適度的和非決定性的”戰爭的輕描淡寫心寒膽戰。但是，吉本關于不重建羅馬帝國對歐洲人有利，因為它打破了單調沉悶的局面并鼓勵有益的國際競爭的滿懷信心的論斷，適合當今的情況，特別適合中國的情況。

在當今這個民族主義時代，特別是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時代，沒有一個中國政治家敢設想解散這個已有2000年歷史的國家。但是，北京的政治家們必須承認，進行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機構改革是必要的。因為許多中國和外國觀察家已告訴他們，不允許思想自由市場的存在，就不可能走向商品自由市場，不建立政治交流和參與的渠道，就不可能調動經濟上的主動性。

在這個發展的尖端問題上，歷史可以提供若干啟示。臺灣和新加坡成功的歷史表明，在商品交換社會中，強有力的、支持商品交換的政府可以維持政治上的控制而同時允許并鼓勵工商業的發展。在香港，中國企業家已經證明，他們甚至可以在一個允許發展貿易但持袖手旁觀態度的外國政府控制下，求得迅速的發展。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了5個經濟特區和14個對外貿易開放口岸，這表明了大陸經濟改革者的誠意。政治上可能采取什么樣的相應措施呢？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政治歷史最久的國家如何改造其政治體制呢？20年代，有人曾考慮實行美國式的聯邦制。到1990年，在臺灣、東歐乃至蘇聯，政黨的獨裁統治都在變化。

當然，管理三條“小龍”的操華語的官員們只需考慮其域內遠較大陸為少的人口，而且他們管理的公眾主要生活在城市，是從事商業而不是仍然以農業為主的偏僻農村中的居民。這更說明中國共產黨如果想不使中國的現代化計劃走向失敗，就迫切需要尋求分割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形式，不能再允許中央獨裁之手扼殺人民的才智。

毛和鄧對此都很理解，但拿出的對策略不相同。1957年7月，毛號召他的同僚“創造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8]](#_8_Yin_Zi_Mai_Ke_Fa_Kua_Er____We)作為中國建設的基礎。在1978年12月具有歷史意義的三中全會上，鄧重申了這一號召，并更具體地闡述如下：

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須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現在敢出來講話的，還是少數先進分子……這種情況不改變，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四個現代化怎么化法？[[9]](#_9_Jian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

鄧看到了中國和歐洲的不同，以及中國的巨大幅員和以農業為中心的經濟給他和他的同僚帶來的束縛：

我國有這么多省、市、自治區，一個中等的省相當于歐洲的一個大國，有必要在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之下，在經濟計劃和財政、外貿等方面給予更多的自主權。[[10]](#_10_Tong_Shang_Shu__Di_157Ye)

當然，難就難在這里。“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這無疑是理想的。但是，對一個擁有10億多人口的政治實體來說，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如果要使思想得到發展，這樣做也是不利的。在國家和黨、警的強制下的“統一認識”是無效的空門面。這里，統一這個概念只能是自我拆臺，是無法實現的。

本卷中的主要論述截止于80年代初期，以便提供一些歷史背景。80年代初期是充滿希望的歲月，人們真正感到在鄧的領導下，已有了新的開端。中國人民開始顯示，他們愿意，也能夠利用新的自由來改善自己的命運。

但是，中國領導層內關于統一和多元化的爭論仍在繼續。整個80年代，鄧全力支持經濟多元化，并使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以鼓勵經濟多元化。但是他對外國影響腐蝕中國政治統一的狀況日益感到不滿。因而他采取行動，對被他自己的改革調動起來的正在發展的社會勢力，重新從中央加強了政治控制。1983—1984年他采取了短暫的行動。1986—1987年，他采取了更嚴厲的措施，1989年夏甚至動用了軍隊。

毛和鄧都無法完成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既保持統一，又同時允許自由。鎮反運動、反右斗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門廣場事件等悲劇就是足夠的證明。總而言之，就中國領導人而言，統一及作為其基礎的紀律嚴明的秩序似乎總是更重要的，而自由及其造成的失控則是太危險了。

但是，中國領導人承擔的維護統一的重任是中國人民日益沉重的負擔。如果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40年的歷史中有一條有歷史意義的教訓而需要記取的話，那就是，多少世紀以來把中國人民聯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必須作根本的改變。否則，正在發展中的、日益自信的社會將產生越來越大的壓力，最終使這一制度完全崩潰。在90年代及90年代之后，只有實行多元化，才能維護統一。

[[1]](#_1_12)參見費正清：“中國的再統一”，載于《劍橋中國史》第14卷。

[[2]](#_2_12)同上。

[[3]](#_3_12)參見費正清：“中國的再統一”，載于《劍橋中國史》第14卷。

[[4]](#_4_12)原文缺注釋文。——譯者

[[5]](#_5_12)弗雷德雷克·C.泰維斯：“新政權的建立與鞏固”，載《劍橋中國史》第14卷。

[[6]](#_6_12)參見尼古拉斯·拉迪：“困難重重的中國經濟（1958—1965）”，載《劍橋中國史》第14卷；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躍進”（1958—1960）》。

[[7]](#_7_12)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的衰亡》第2卷，第95頁。

[[8]](#_8_12)引自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287頁。

[[9]](#_9_12)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155、156頁。（中文版為134頁。——譯者）

[[10]](#_10_12)同上書，第157頁。（中文版為第135頁。——譯者）

# 附錄 會議與領導人

表32 正式的a高層黨的會議



　　a.正式會議是用來區別其他高層會議，如經常于中共各屆全會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工作會議。關于正式和非正式會議的目錄可參看利伯撒爾和迪克遜編寫的《黨中央和政府會議研究指南（1949  
—1986）》。   
　　b.一中全會通常在全國黨的代表大會后立即召開，以便正式選舉新的政治局及其他中央機構如書記處等的成員。   
  
　　c.這份資料中注明是8月31日，但其他資料上是8月30日。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下），由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資料室編輯。

黨的領導人

表3 （1965—1969年）a



　　a.某位領導人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罷黜的確切日期，并不總是很容易確定的。   
　　b.中共中央主席。   
  
　　c.中共中央副主席。   
  
　　d.總書記。   
  
　　e.除了毛和林彪，中共九屆代表大會后的政治局成員中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不容易確定，其他如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都是按姓氏筆畫排列的。   
  
　　f.林彪和葉群在1971年9月13日逃離中國時因飛機失事而喪生。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和黃永勝于1971年9月24日被逮捕。

黨的領導人

表34 （1973—1982年）



　　a.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于1976年9月9日去世。華國鋒于1976年10月7日成為主席，但在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年6月27  
—29日）上被胡耀邦所取代。   
　　b.總書記。這次會議廢除了主席這一職位，總書記正式成為黨的領袖。   
  
　　c.中共中央副主席。   
  
　　d.  
“四人幫”于1976年10月6日被逮捕。   
　　e.這些成員是按姓氏筆畫排列的。   
  
　　f.鄧小平是在1973年12月被重新選進政治局的，并在十屆二中全會（1975年1月8  
—10日）上被補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取代了李德生的位置，后者仍為政治局委員。   
　　g.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是按姓氏筆畫排列的。只有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候補政治局委員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   
  
　　h.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  
—22日）上增補的。   
　　i.十一屆四中全會（1979年9月25  
—28日）上增選的政治局委員。   
　　j.十一屆五中全會（1980年2月23  
—29日）上增選的政治局常委。   
　　k.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免職的。   
  
　　l.在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年6月27  
—29日）上胡耀邦取代了華國鋒。華國鋒降為副主席。   
　　m.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任命為副主席。   
  
　　資料來源：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紅旗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郝夢筆和段浩然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下）。

國家領導人

表35 （1965—1983年）a



　　a.這些任命是在第三屆（1964年12月21日  
—1965年1月4日）、第四屆（1975年1月13—17日）、第五屆（1978年2月26日—3月5日）、第六屆（1983年6月6—2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分別做出的，在這些會議之間進行的免職和增補都有注釋。   
　　b.遵照毛澤東在1970年提出的意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職位在第四屆和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頒布的新憲法中被取消了。   
  
　　c.周恩來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華國鋒于同年2月3日成為代總理，4月8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決定：華國鋒不再是代總理，從此行使總理職權。   
  
　　d.華國鋒的總理職位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被趙紫陽取代。   
  
　　e.1965年去世。   
  
　　f.李先念是1965年當選的副總理中歷經  
“文化大革命”唯一在位的，其他人的正式罷免日期很難確定。   
　　g.1976年10月6日被捕。   
  
　　h.1980年9月辭職。   
  
　　i.1980年4月被免職。   
  
　　j.王任重在1978年12月被任命。其他人的任命時間是：陳云、薄一波和姚依林在1979年7月，姬鵬飛在1979年9月，趙紫陽和萬里在1980年4月，楊靜仁、張愛萍和黃華在1980年9月。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次會議文件匯編》；郝夢筆、段浩然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

# 參考文獻介紹

## 第一章 1949—1976年的毛澤東思想

這一章是1987年出版的《劍橋中國史》第14卷中有關1949年前的毛澤東思想一章的續篇，對1949年后毛澤東思想的研究由于許多決定性的文章無法得到而長期沒有進展。那些在中國發表的文章通常都經過大量的修改以致很難從中追溯其最初的說法。雖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量以前未發表的文件被廣泛傳播，但直至今天，尚沒有一個中文原版的1949年后毛澤東著作的綜合版本能與在日本發行的、20卷本的毛澤東早期著作的匯編相匹敵。《有關這個由竹內實指導編寫的1949年以前毛澤東著作匯編的詳情，請參看第13卷中截至1949年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文獻。）

由官方在1977年出版的包括1949—1957年間著作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同時有英譯本）是經過多方篩選的。現在已經因在編寫過程中受極“左”思潮影響而停止發售。1980年，中共中央委員會下設的一個機構——中央文獻研究室奉命出版幾本專題資料匯編，包括書信和一些在報刊上發表過的文章。但直到1987年，被認為非常完整的按年代順序編寫的第一卷才開始有限地發行（參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卷，1949年9月至1950年12月）。這卷覆蓋時間僅包括一年零一個季度卻長達784頁的文稿足以向人們顯示要完成截至1976年的文稿的編輯工作將需要多么大的勞動量，花費多么長的時間。

同時，德國、美國、日本的學者們為了分別用德文、英文、中文編輯出版毛澤東的著作，在毛去世不久便開始搜集有關的材料。最初的一批人在赫爾穆特·馬丁的領導下，用了幾年的時間成功地完成了這項工作（參看原文《毛澤東》）。然而，他們的高效率卻得到了相反的酬勞。當他們的最后一輯將要出版時，一大批新材料如洪水般涌來。這一方面由于上面提到的中國官方的活動，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編輯物在海外更加廣泛的傳播。在這種新形勢下，德國的版本雖然仍舊有用（特別是因為它包括許多中文原文作為附錄），但卻已顯得過時而無法令人滿意。

相反，由竹內實和中村公義帶領的一批日本學者卻決定放棄繼續編寫1949年10月以后中文毛澤東著作匯編的努力。因為所有關鍵的手稿和文件都在中共權威機構的控制下，要與之競爭是毫無希望的。（當然，這時的情況與《毛澤東集》中所涉及的時代已大不相同。那時，毛的許多文章在寫出后便立刻發表了，因此可以在許多圖書館里找到。）

美國的一批學者，在高英茂的指導下，努力嘗試在這兩個極端中找出一條中間路線。他們編輯的文稿第一卷（包括截至1955年的文章） 目前已經問世。[參看《毛澤東文稿（1949—1976）》，由邁克爾·高英茂和約翰·K.龍（音）編寫，第1卷，1949年9月—1955年12月）]他們正在努力翻譯所有新出版的中文材料，把它們收進這套匯編中，或者收入按年代編輯的部分，或者收入一個最后的增補本中。

但是，就目前來看，有關這方面的資料無論是中文的還是外文的，都不夠完整和實用，而在近期內出現令人滿意的版本的希望也很微小，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些對毛澤東的思想有興趣的人不得不依靠不同的專家和機構根據他們自己的觀點所做出的選擇。

大量十分有用的、但不是最好的紅衛兵材料的譯文由聯合出版物研究署在1974年以《毛澤東思想雜錄》的書名出版，共兩卷。最近出版的一個重要文集，收集了20余篇新近得到的非官方資料，書名為《毛主席的秘密講話》（1989年），由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吳編輯。一卷的毛澤東于1956—1971年的談話和信件的書在1974年用英文出版，書名為《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美國版名為《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由S.R.施拉姆編輯。還可參看杰羅姆·陳編輯的《毛澤東的文章與目錄》（1970年）和由莫斯·羅伯茨翻譯的毛澤東的《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的論點匯編》（1977年）。

在西方人對毛的思想的闡釋中，由約翰·布賴恩·斯塔爾所著的《繼續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年）是一部概述。它具有把毛從1920—1970年所寫的一切都看做一個整體的傾向。它用這樣一種方法來分析毛的思想，認為毛的整個生活和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頂點。弗雷德里克·E.韋克曼在他的《歷史與意愿》一書中同樣把五四時期毛澤東的思想與其后期思想相聯系，但不像前書那樣過于簡單化和不加鑒別。在早期的一些著作中，阿瑟特·科恩所著的《毛澤東的共產主義》（1971年[1964年]）強調了毛澤東的思想中的斯大林主義根源。詹姆斯·熊（音）的《思想與實踐》則強調了毛的思想與中國傳統的關系。雖然他把毛澤東的思想作為知識分子活動的獨特的中國模式這一點與西方通用的系統教義大相徑庭，并因此引起爭議，但他的研究從總體上來說無疑是有關這個題目的最富積極意義的工作之一。這可參看S.施拉姆編寫的《毛澤東的政治思想》（1969年修訂本）。另外，在迪克·威爾遜所著的《在歷史天平上的毛澤東》（1977年）一書中可以看到對毛澤東在各方面的貢獻所進行的一系列雖不太成熟、但卻是有益的評價。

在最近出版的關于1949年以后毛澤東思想的著作中，有兩本文集或許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本是莫里斯·邁斯納所著的《馬克思主義、毛主義和烏托邦思想》（1982年），書中提出這樣的觀點：雖然毛倡導的社會目標是秉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但他為達到這個目標所使用的手段卻不是。邁斯納認為毛在“大躍進”，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動有著深刻的、積極的歷史影響。今天，沒有多少中國人會同意這個觀點，但邁斯納花費了大量精力來進行論證。另外一本是鄒讜所著的《“文化大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1988年），書中進行了更客觀、更審慎和深刻的分析，其中大半涉及毛晚年的理論和政策。

許多有關毛的思想的最有趣和最新穎的著作目前出現在中國國內，那里原文的準確程度和學術獨立性都有了很大改善。官方對毛澤東歷史地位的評價包括在1981年6月27日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中。當然，其中某些方面涉及毛的思想。但是，要使中國學者在幾年的時間里脫離過去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不過這些束縛還是不斷遇到挑戰或被給以非常靈活的解釋。這種靈活性在《毛澤東思想研究》雜志的文章中很少看到。該雜志在成都出版，處于楊超的影響之下。楊是毛在延安的哲學學習小組的活躍分子，也是該小組成員中目前尚健在的唯一一人。另外一些不太正統的解釋也在公開發行的文章中出現，如在由蘇紹智主編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楊超的《唯物辯證法的若干理論問題》（1982年）最初名為《論毛主席哲學體系》（1978年），幾乎發表于毛在世的年代。像由蕭延中編寫、由李銳撰寫序言的《晚年毛澤東：關于理論與實踐的研究》這一類的著作，是絕不可能在毛在世時出版的。在內部還發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分析文章，如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刊物《文獻和研究》上以及其他內部刊物上等。確實，前面所提到的有關毛晚年的文章，其資料很多來源于這些內部刊物。

## 第二章 中國陷入危機

事實上，像任何一個其他城市機構一樣，中國官方的出版事業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受到嚴重破壞，幾乎沒有什么新書出版，實際上，所有專業性雜志都停刊了。甚至黨的理論刊物——《紅旗》雜志也有幾個月暫停出版。國家的宣傳機器的確仍在運轉——主要有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北京周報》這些刊物和宣傳機構進行了大量論戰性和言過其實的宣傳，這些思想貧乏的文章的絕大部分都被美國駐香港的總領事館譯成了英文并發表在他們的三份雜志上，這三份雜志是：《中國大陸報刊概覽》、《中國大陸雜志選》和《當代背景材料》。此外，美國和英國政府都設有機構不斷監聽和翻譯中國國家和各省的電臺廣播，并把結果記錄在外國廣播信息處的《動態》和《世界廣播概要》上。

中國的中央當局試圖通過發布一系列中央指示和傳播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講話來維持“文化大革命”中的社會秩序，大部分這種指示和講話都通過內部渠道傳達，但是有許多被紅衛兵組織公布出來，然后被外國研究機構搜集在一起。其中有用的綱領性文件有《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有關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集”、“外傳的中共領導人1966年7—10月的講話和言論”。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發表的最重要的講話可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由杰羅姆·陳編的《毛澤東的文章與目錄》、《毛澤東思想雜錄（1949—1968）》，由S.施拉姆編寫的《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1956—1971）》。這些資料都被約翰·布賴恩·斯塔爾和南希·安妮·戴爾按目錄分類并編制了索引收進《解放后毛澤東的著作：目錄和索引》中。由邁克爾·高英茂編輯的《林彪事件：權力政治和軍事政變》一書包括一個類似的林彪講話選集。

非官方出版的過多的報紙、雜志彌補了官方出版物的缺乏。它們都是由各種不同政治傾向的紅衛兵組織出版的。這些出版物包括對中央及各省領導的極富煽動性的譴責；對1949年以來的主要政策批判性的評論；“文化大革命”的年表以及對在不同的單位和機構中派性斗爭的感情激動的敘述。某些紅衛兵出版物還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主要受害者的自我批判。當然，紅衛兵傳播媒介的準確程度是十分值得懷疑的，但如果使用謹慎，它們仍然是一種無法估量的研究工具。

由于從表面上看，在中國國內保存的紅衛兵出版物數量很少，因此，有興趣的學者必須依靠在中國以外保存的資料集。在華盛頓的中國研究資料中心收集了八批紅衛兵資料，用微縮膠卷和照相復制本分發給各個對此有興趣的圖書館。許多這些出版物被依次譯出并刊登在《中國大陸雜志選》和《當代背景材料》中。對這些紅衛兵出版物的最好的文獻指南是李翔云編輯的《紅衛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6—1969）》。此外，聯合研究所和密執安大學都出版了他們自己所擁有的紅衛兵資料的目錄：《聯合研究所所藏紅衛兵出版物目錄》及由湯img文和馬唯一編輯的《有關紅衛兵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資料》。

自從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覆滅、華國鋒去職以后，人們試圖對“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及結果作一次廣泛的評價。作為這種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國又出現了關于“文化大革命”出版物的第二次高潮。在這些新出現的資料中，有對“四人幫”和林彪的支持者進行審判的記錄：《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審判——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1980年9月—1981年1月）》。同樣重要的有對“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和評價，包括在官方發表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該歷史決議的起草和頒布為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詳細材料的出版提供了機會，如：全國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會議和紀念中國共產黨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秘書處編輯的《黨史會議報告集》；中共黨史研究會編寫的《學習歷史決議專集》和孫敦璠等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

1976年以來，一批回憶錄和個人傳記相繼問世。其中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有趣的資料和特殊的細節。陳再道的“武漢‘七·二○’事件始末”詳細敘述了他在1967年7月武漢事件中的經歷。中國最高級的軍事將領之一聶榮臻的回憶錄在1983—1984年出版，也揭示了許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由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撰寫的“在江西的日子里”講述了她父親在1967—1973年間受管制和在國內流放的情況。一本對周恩來進行廣泛贊揚的《周恩來傳略》由方鉅成和姜桂儂撰寫。對康生進行了深刻批判性研究的是仲侃撰寫的《康生評傳》。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傷痕文學”對中國知識分子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解依據，一些故事集披露出運動對個人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包括陳若曦的《尹縣長的處死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故事》；佩里·林克編的《頑固的毒草》和《玫瑰與刺：中國小說的第二次百花齊放（1979—1980）》；海倫·F.綏和澤爾達·斯特恩編寫的《毛的收獲：中國新一代的呼聲》。

對所謂“北京之春”運動的抗議文學作品以及其他近期所寫的分析文章，都對當代知識分子如何解釋和評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過程和結果提供了思路。王希哲的“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一文對該次運動進行了最無情的譴責，其程度遠遠超出了官方的解釋。由更年輕的知識分子撰寫的一本有趣的文選于1986年春天在紐約出版，書名是《知識分子》。

在中國之外，“文化大革命”曾經是一系列的次生文學的題目，這些作品有很多被詹姆斯·C.F.王（音）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書目注釋》一書中所引用。最早的著作由西方記者和政府官員所寫，很多成書于香港。雖然這些著作不具備事后認識和觀察的便利條件，但它們大部分最能代表中國觀察家的思想。其中特別有價值的是兩份香港的時事通訊：《中國新聞分析》，由L.萊德尼神父編撰；《中國新聞概覽》，由英國政府出版。更為詳細的、相對來講更全面的當代的評述有羅伯特·S.埃勒根特所著的《毛的大革命》；斯坦利·卡諾的《毛與中國：從革命到革命》和愛德華·E.賴斯的《毛的道路》。具有同樣價值的還有由美國政府的一位分析家菲利普·布里奇姆所編輯、收在《中國季刊》的系列文章：“毛的‘文化大革命’：起源和發展”，“毛的‘文化大革命’：奪權斗爭”和“毛的‘文化大革命’：鞏固權力的斗爭”。

所有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政治史都包括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評論，其中最好的是帕里斯·H.張的《中國的權力和政策》（第二次編輯）；于爾根·多姆斯的《中國國內政治（1949—1972）》；雅克·吉勒馬的《執政的中國共產黨（1949—1976）》和莫里斯·邁斯納的《毛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有趣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的學術性研究尚付闕如。例外的是瓊·多比爾著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史》，該書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按照毛主義的觀點來寫的。此外還有更客觀一些的，有李翔云（音）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個案研究》以及安炳炯的《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政治進程動力學》。雖然該書主要是關于60年代早期的情況的，但也包括對“文化大革命”前幾個月的詳細評述。

要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只有通過對該運動在某些具體的地方和單位開展的方式進行考察，對“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主要省市展開時的典型事例進行研究。這方面的成果有：維克多·福肯漢的“廣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加德爾·福爾塔多的“黑龍江和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1966—1968）”；尼爾·亨特的《上海日記》；保羅·海爾和威廉·希頓的“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維克多·倪的“革命和官僚政治：‘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及安德魯·G.沃爾德的《張春橋和上海“一月風暴”》。

對在特殊的基層單位開展的“文化大革命”活動的比較分析研究有：馬克·J.布里奇和戈登·懷特所著的《當代中國的微型政治》；威廉·欣頓的《百日戰爭》；戴維·密爾頓和南希·戴爾·密爾頓所著的《風不會減弱》以及維克多·倪的《北京大學的“文化大革命”》。

另一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考察積極投身于這個運動中的個人。令人感興趣的是，雖然關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章通常也是毛傳記的結尾，但卻只有很少的著作把視點集中于毛在該運動中的作用上，更多的則是對其他領導人的描述。如對周恩來，可參見魯賓遜編的《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一書中由托馬斯·W.魯賓遜撰寫的文章“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關于劉少奇，可看洛厄爾·迪特默的《劉少奇與中國文化革命》；有關“文化革命”人物江青的最著名的兩篇傳記是羅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和羅斯·特里爾的《白骨精》。此外，幾部關于當年的紅衛兵的回憶錄也已出版，包括戈登·A.貝內特和羅納德·N.蒙塔珀圖的《紅衛兵》；高原的《生來紅：文化革命記事》；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羅的《“文革”之子》以及肯林的《上天的報應：一個中國年輕人的日記》。

在“文化大革命”中卷入最深的三個社會集團是被當做運動目標的黨和國家的干部，作為打擊武器的紅衛兵和主要的直接受益者人民解放軍。對國家官員試圖在紅衛兵的掃蕩中逃生的描述與分析可看帕里斯·H.張的“省級黨的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存策略”和理查德·鮑姆的“困難條件下的精英行為”。關于“文化大革命”對黨政中樞構成的影響有以下文章和著作：理查德·K.迪奧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經濟界精英的影響”；唐納德·w.克萊恩的“國務院和‘文化大革命’”；查爾斯·紐豪瑟爾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共機器的影響”和弗雷德里克·C.泰維斯的《中國的省的領導層：“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關于中共九大所作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變動的分析可看唐納德·W.克萊因和洛伊斯·B.黑格的“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和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的“中共領導層的變化”。

關于對紅衛兵運動及致力于領導這個運動的激進的知識分子的研究，下列著作是比較值得注意的：安妮塔·詹的“中國社會結構的反映”；帕里斯·H.張的《中國文化革命中的激進分子和激進思想》；克勞斯·梅內爾特的《北京和國內外的新左派》；斯坦利·羅森的《紅衛兵的派性與廣州的“文化大革命”》；馬丁·辛格的《受過教育的青年與“文化大革命”》。托馬斯·P.伯恩斯坦的《上山下鄉》描述了當年的紅衛兵在1968年運動結束后被送往農村地區的情況。

有關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有以下著作：錢玉生（音）的《衰退的中國革命》；于爾根·多姆斯的“‘文化大革命’與軍隊”和“軍隊在革命委員會成立中的作用（1967—1968）”；哈維·W.內爾森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軍事力量”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軍隊官僚”。

其他社會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影響較小，如關于農民的可看理查德·鮑姆的“農村的‘文化大革命’”，關于知識分子的可看默爾·戈德曼的《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及安妮·F.瑟斯頓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看不見的創傷”。

最后，還有一大批對“文化大革命”進行闡釋的文學作品，它們考察“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評價它的結果，從更加客觀的理論和歷史的視角來確定它的地位。一般來講，在毛去世和“四人幫”覆滅之前所撰寫的著作對“文化大革命”有更多的同情，自那之后的著作則更具批判性。理查德·鮑姆和路易斯·B.貝內特編寫的《中國在騷動：“文化大革命”透視》就是一個實際的例子。其他值得注意的闡釋性文章有安炳炯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國對政治秩序的尋求”；約翰·伊斯雷爾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羅伯特·杰伊·利夫頓的《革命的不朽》；莫里斯·邁斯納的文章“列寧主義和毛主義”；S.施拉姆的“從歷史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理查德·所羅門的《毛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以及鄒讜的文章“‘文化大革命’與中國的政治制度”。約翰·劉易斯的《中國的黨的領導和革命權力》一書中的三篇文章同樣很有價值，它們是：倫納德·夏皮羅與約翰·威爾遜·劉易斯的“在極權主義領袖之下堅如磐石的黨的作用”；許華茨的“在美德統治下”以及S.施拉姆的“中國共產主義思想意識中的黨”。

## 第三章 中蘇對抗：中國北部邊疆地區的戰爭與外交

除了正式的（經常是宣傳性的）官方聲明，從當時北京制定外交政策的兩個機構外交部和中國共產黨得到的原始資料十分有限，因此，除紅衛兵的材料之外，專家們只能主要依據講話、官方報紙的評論、政府出版物透露的消息、宣傳小冊子以及對電臺廣播的監聽——所有這些都必須謹慎使用，因為首先，不同文字間的分析技術不夠完善，其次，在這一章的事例中使用的是非中文材料，大部分是英文和俄文的一手或二手資料。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文材料取消了限制，諸如回憶錄、可靠的中國方面的分析資料及內部材料等仍見得不太多。但愿這種狀況在不久的將來會改變。

關于中國外交政策的著作需要使用所有可能的資料并附加一些輔助材料，即：在中國文件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導論，再結合以外部來源的資料。人們必須在各種各樣的資料中尋求邏輯上的一致性。由于在這一章的事例中大部分材料都不是中文而是俄文的，很多重要時期的材料在事件發生后不久便得到了，因此審慎地篩選和壓縮將會得出比較滿意，有時是決定性的結果。

紅衛兵的材料目前全被圖書館控制著。參見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出版的《紅衛兵出版物》（23卷并8篇附錄），美國主要的大學研究圖書館都有大量中國資料集刊（伯克利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密執安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它們都有自己的目錄索引，國會圖書館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人們還必須借助正式的中國官方出版物，如《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北京周報》、《世界知識》、《紅旗》雜志，然而，目前最重要的資料來源是美國政府出的譯文集《中國動態》，由國外廣播信息處出版。（總的來說，英國刊物《世界廣播概覽：遠東》并不能與《動態》完全重疊，兩種刊物須相互補充。）沒有《動態》，撰寫有關中國外交政策的著作均會感到相當的不便并留下很多空白。當然，也還需其他美國政府的譯文集作為補充。如：《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譯文集》（根據題目附有不同的小標題），由聯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中國大陸報刊概覽》及與此相關的較次要的資料集，由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一直出版到1977年9月30日。蘇聯的資料與中國官方資料一樣有其局限性。這包括俄國的《真理報》、《消息報》和塔斯社。對蘇聯資料來源的必不可少的參照是外國廣播信息處的《蘇聯動態》和《當代蘇聯報刊文摘》。

有一些中國文件集包括中國對外政策以及中蘇關系方面的主要公報和聲明。它們是：哈羅德·欣頓編的5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79）》（還有兩卷增補本《中華人民共和國（1979—1984）》）；約翰·吉廷斯編的《中蘇爭論概觀》以及詹姆斯·T.邁爾斯編的2卷本的《中國政治：文件和分析》。令人遺憾的是，權威的《現代中國社會》（由施堅雅主持編寫）卻未收進中國外交政策的條目。

一些中文的研究著作、回憶錄和有關外交政策方面的文集在1980年開始出現。這包括高皋和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鄭德榮等編的《新中國記事（1949—1984）》、《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當代中國外交》；郝夢筆和段浩然編的《中國共產黨六十年》。

一些英文雜志對研究中國外交政策也是十分有用的，特別是不可或缺的《中國季刊》，它有一個季度年表和文件表，按照國家和專題對中國的外交關系進行觀察。同樣有參考價值的還有《問題與研究》（臺北）、《亞洲概覽》、《共產主義問題》、《遠東經濟評論》、《時事》（香港，1961—1972年）、《當代中國》（19 74—1979年）、《中國大陸評論》（香港，1965—1967年）、《太平洋事務》和《中國新聞概要》。非常有用的還有韓國雜志《中蘇關系》，它有一部分內容是英文的。還有兩份臺灣雜志經常包括一些在其他地方無法得到的信息，但使用時必須謹慎。它們是《大陸中國內幕》和《中共研究》。最重要的俄文雜志是《遠東問題》，它主要研究中國問題。其他有關的俄文雜志有《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共產黨人》和《國際事務》。還可參看內部年鑒《中國的國家和社會》，該年鑒資料由莫斯科東方研究所的中國科編寫，其中經常包括一些關于蘇聯對中國政策的洞察與分析。

有關中國外交政策的文獻為數不算多。一些特殊題目的原始資料只有在國會圖書館的計算機復制服務處能夠得到。但必須注意在關鍵詞句上不要探究和解釋得過寬或過窄。托馬斯·W.魯賓遜有一部未發表的著作《中國對外關系文獻目錄（1949—1975）》，它有3637個條目；并有作者和題目的雙重索引。另外還有杰西卡·S.布朗等編的《中蘇沖突：歷史文獻目錄》。更近期的英文著述資料有《外交事務》，著作有《近期國際關系叢書》，系列文章有《政治學ABC》和《有關中國問題的博士論文》。《亞洲研究雜志》確實在它的年鑒文獻中編列了中國外文政策的資料欄，但內容每年出入相當大。在蘇聯方面，《斯拉夫評論》出版了一個年鑒文獻，但有著同樣的局限。幸運的是，俄文材料的索引很完善。首先，有V.P.朱拉夫勒瓦的《中國文獻》年鑒。它是由P.E.斯卡奇科夫編寫的早期的一份同名的傳統年鑒的補充（但那份年鑒至今仍未作為單獨的一卷出版）。除此之外，還有《遠東問題》雜志的評論專欄，《人民中國》年鑒、《亞非人民》雜志以及正式的俄文著作、文章和重要的報紙（《當代蘇聯報刊文摘》上附有《真理報》和《消息報》的英文索引）。

關于中蘇關系的著作數量相當大，大多數是對基本政策的分析。下面所列的只是使用原始資料及分析質量很高的著作。遺憾的是，篇幅有限，因此只能容納與本章所涉及的時期有關的著述，且對每個大的領域只能收入一部典型著作。

奧頓·安布羅茲的《世界權力的改組》；安泰順（音）的《中蘇領土爭端》；鮑大可的《中國和東亞的大國》；羅伯特·博德曼的《英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74）》；O.B.鮑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的《蘇中關系（1940—1973）》；O.埃德蒙·克拉布的《中國和俄國的“重大比賽”》；丹尼斯·J.杜林的《中蘇沖突中的領土要求》；赫伯特·J.埃利森編的《中蘇沖突》；戴維·弗洛伊德的《毛反對赫魯曉夫》；雷蒙德·L.加特霍夫編的《中蘇軍事關系》；哈里·格爾曼的《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集結和反華冒險》；喬治·金斯伯格和卡爾·F.平克勒的《中蘇領土爭端（1949—1964）》；約翰·吉廷斯的《中蘇爭論概觀》和《世界與中國（1922—1972）》；托馬斯· M.戈特利布的《中國外交政策的不同的派系和戰略三角關系的起源》；威廉·E.格里菲斯的《中蘇關系（1964—1965）》和《中蘇分裂》；梅爾文·格爾托和汪永木（音）的《處于威脅下的中國》；莫頓·H.霍爾珀林編的《中蘇關系與軍備控制》；哈羅德·欣頓的《熊在門口》及《三個半大國》；G.F.赫德森、理查德·洛溫撒爾和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的《中蘇爭論》；C.G.雅各布森的《毛以來的中蘇關系》；杰弗里·朱克斯的《蘇聯在亞洲》；基辛研究報告《中蘇爭端》；米哈伊爾·A.克洛奇科的《在紅色中國的蘇聯科學家》；肯尼思·G.利伯撒爾的《70年代的中蘇沖突》；阿爾弗雷德·D.洛的《中蘇爭端》；克勞斯·梅內爾特的《北京和莫斯科》；喬納森· D.波拉克的《聯盟政治的教訓》、《80年代的中蘇沖突》及《中蘇敵對與中國安全之論爭》；托馬斯·W.魯賓遜的《邊界談判和中美蘇關系的前景》及《中蘇邊界爭端》；哈里森·E.索爾茲伯里的《中俄戰爭》；格雷特津·安·桑德勒斯的文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眼中的蘇聯形象（1949—1979）》；哈里·施瓦茨的《沙皇、大臣和政委》；巴巴尼·森·格普塔的《70年代以后蘇聯同亞洲的關系》；理查德· H.所羅門等編的《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集結》、《核對峙與亞洲的安全》；羅伯特·G.薩特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的外交政策（1966—1977）》；羅杰·斯韋林根的《蘇聯和戰后日本》；唐納德·B.S.扎戈里亞的《中蘇沖突（1956—1961）》；肯尼思·G.韋斯的《炮艦里產生的力量：中蘇危機中的美國》；艾倫·S.惠廷的《中國威懾微積分學：印度和印度支那》；理查德·威奇的《中蘇危機的政治》；邁克爾·B.亞胡達的《中國在世界事物中的作用》；唐納德· S.扎戈里亞編的《蘇聯在東亞的政策》、《中蘇沖突（1956—1961）》和《越南三角關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內》。

雖然關于這個題目的俄文書籍經常是宣傳性的，但也有幾本杰出的分析性的作品問世。另外，一些關于中國其他方面的俄文材料表面上似乎與中國對外政策無關，實際上卻包含著相當有用的資料。由于俄國人傾向于不直接說出其真正的興趣所在，故下面所列著作雖從標題上看并不明顯，但的確是與該題目相關的。

O.B.鮑里索夫的《中國70年代的對內對外政策》；O.B.鮑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合著的《1945—1970年的蘇中關系梗概》；費德爾·勃拉茨基的《毛澤東：一幅意識形態和心理肖像》；L.P.德留辛的《毛主義的社會政治本質》；K.A.伊格洛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機構（1967—1981）》；V.G.吉爾布拉斯的《中國：危機在繼續》；B.N.戈爾巴切夫的《中國軍隊的社會和政治作用（1958—1969）》；L.M.古德什尼科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結構》、《中國：社會與國家》、《中國：尋求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中國：傳統與現實》、《中國鄰邦》、《中華人民共和國（1973—1979）》；L.S.丘扎基里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形態運動（1949—1966）》；M.I.馬卡洛夫等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雷莎·米洛維茨卡婭和尤里·西姆尤諾夫合著的《蘇中關系簡史》；G.N.莫斯克的《中國軍隊：毛主義者冒險政治的工具》、《危險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工人階級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蘇聯中國問題研究的題目》；A.M.魯緬采夫的《“毛澤東思想”的來源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外國對當代中國的研究》；S.L.齊赫文斯基的《中國的歷史和現在》；O.弗拉迪米洛夫和V.伊亞贊切夫合著的《毛澤東：一幅政治肖像》及B.扎尼津、A.米洛諾夫和伊亞·米哈伊洛夫合著的《論中國的發展》。

##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問題和毛主義的終結

“文化大革命”以前，西方對中國政治的研究只是為了搞到資料。因為只有十分有限的中央報紙和雜志、數量很少的公開講話以及個別流落到香港的難民可資詢問。一些省內報紙的復印件被偷帶到香港，省里的電臺廣播與北京的電臺一樣受到監聽。即使這些簡單的傳遞工具也仍然需要進行大量的釋讀和甚至更多的翻譯工作，但它畢竟是一個容易掌握的資料基礎。

在“文化大革命”中，這類資料被一大批新的和不同類型的材料所補充，它們大部分由那些搜查被罷黜的官員的紅衛兵所披露。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迄今未發表的毛的講話集，這類材料令人迷惑地使用同樣的題目，最常見的是《毛澤東思想萬歲！》，它們的譯本以不同形式出現，最著名的是S.施拉姆的《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1956—1971）》（美國版名是《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杰羅姆·陳的《毛澤東》及《毛澤東的文章與目錄》；由聯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的兩卷本的《毛澤東思想雜錄》以及有爭議的《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4，9.3，9.4，10.2，10.4，11.4），這些選集明顯地被不同的機構收集到一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許多新版本仍舊在中國不斷出現。結果導致由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吳編寫的一套新譯本《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的問世。一部1949年以后毛的著作全集正在由高英茂和約翰·K.龍（音）編輯并整理，該書名為《毛澤東文集（1949—1976）》，第1卷已經出版。但是，這些文集中的大部分材料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時期，1966年之后的講話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68年夏天紅衛兵上山下鄉之后才解禁。

其他大部頭的、由紅衛兵出版的資料是報紙。這些刊物經常對當時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國事務進行傾向性極明顯的評論。但它們已被李翔云精心整理后收進《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一書中。還有，這些材料只包括到1968年夏天這個時期，在那以后，雖然中國公開了關于林彪事件的內部文件，但資料來源明顯地減少了。另外，70年代來中國的西方人增多，導致了一些目擊者的報道。如羅杰·加賽德的《活躍起來！毛之后的中國》，盡管書名如此，但仍包括從1976年1月開始的一些事件。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一大批關于1969—1976年的新材料才得以面世。它們以不同的形式出現。盡管官方對這個主題的研究有限制，但仍出現了一些綜合性的評論，最可靠和最全面的是王年一的《1949—1989年的中國：大動亂的年代》。作者是國防大學的一名教授，顯然掌握著一般人無法得到的材料。一部更早的非常可信的著作由政治學家高皋和嚴家其（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原文如此——譯者）撰寫，書名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該著作在出版前夕被查禁，最初的版本在香港發行，但最初的天津版的版本在西方也流傳很廣。作者感到只利用公開的材料局限性太大，但卻又因其他材料使用不當造成一些錯誤而受到指摘。第二版顯然接受了批評進行了修改。第一版的英譯本在臺灣出版。在一般的西方著作中，于爾根·多姆斯的《中國國內內政（1949—1972）》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把廣泛地描寫和對特殊事件的嚴密分析結合起來。《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1921—1985）：一幅自畫像》由香港時事通訊《中國新聞分析》的長期編輯在對中國進行了多年觀察的基礎上撰寫而成。

還有一些中文的文章選集，涉及不同方面的問題、事件或“文化大革命”的經歷。周明的《歷史在這里沉思：1966—1976年紀實》共6卷。第一卷論及那10年中高級領導人的活動及其命運，包括一些幸存的親屬所寫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劉少奇的孩子。第二卷涉及那段歷史本身的一些事件，如1965年武漢的武斗、1967年的“二月逆流”和1971年的林彪事件。第三卷重又描寫個人的命運，如一些級別較低的高層官員和知識分子，同樣有這些人的親屬所寫的文章，如陶鑄的妻子。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論析》是一本文章集，由黨的資深歷史學家撰寫，論述這10年中的主要事件，其中包括與本章所論及的時期相關的有趣資料。《十年后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由譚宗級和鄭謙編著，是同樣類型的著作。

更全面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材料現在已可以從各省的出版社得到，大部分是重復的，但在一些有趣的題目上作一番瀏覽還是值得的。這樣你可以看到表面上在某處是很明顯的一個事實，在其他地方都并非如此。例如：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講義》看來似乎是第一部這樣的著作。它透露了1959年在廬山的工作會議和中央全會之間，還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會上彭德懷受到了批判。所有有關這個范圍的著作都被當代的作者研究過，最全面的、有準確的資料以及會議參加者名單的著作是郝夢筆和段浩然編的《中國共產黨六十年》，該書第二卷包括1949年以后的時期，同樣非常有用的是稍后黨的歷史學家中的老前輩胡華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9—1981）》是在中共成立60周年之際由中共出版的文獻，作為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年代的評價和總結。對于它的解釋性的著作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以上兩本書都是確定官方對重大事件態度的基本讀物，與胡華的著作一樣，后者在公開發行之前在西方也有內部版本流傳。

另一類有價值的資料是編年史，它并不僅僅是簡單的資料的重復，同時包括頗有用的主要會議和事件的概要。這些重要的材料包括：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編的《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房維中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該書涉及的人遠遠超出經濟學家的范圍。

另一類作品致力于單個事件的描述，包括黨代會、人代會等。這些會議都有官方出版的文獻，如《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關于林彪事件的文件從來都不是官方發表的，但是在西方也有匯編和譯本，如高英茂編的《林彪事件》；另有一部中文的分析著作是于南的“周總理處置‘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況”；由荷蘭記者雅普·馮·吉內肯撰寫的一部西方評述性著作是《林彪浮沉錄》；更近的有關這一事件的譯本，是以林彪女兒的陳述為基礎的，原文是《華僑日報》上的連載文章“生活在歷史陰影中的林豆豆”（1988年6月14—23日）；另有譚宗級發表在《教學參考》（下）上的“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崛起及其覆滅”；《華僑日報》上還有另一篇由王若水撰寫的連載文章“從批‘左’倒向反右的一次個人經歷”，描寫了林彪從一個極“左”的樣板轉變為極右派的道路。

“四人幫”的寫作班子“梁效”的活動被它某位成員的妻子在樂黛云和卡羅林·韋克曼所著的《走進暴風雨》中進行了描述。該書是一部極其吸引人的著作，它敘述了1949年以后的全面清洗，全書從一個背離了黨的路線從而犯了嚴重錯誤的黨員的角度來進行描述。在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后為紀念周恩來所作的詩被收進《革命詩抄》和《天安門詩文集》中，還有一個英文版本的由蕭蘭編的《天安門詩抄》。官方對“四人幫”進行審判的正式文本可以參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中國還出版了較短的中、英文版本的《歷史的審判》、《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審判》。戴維·邦納維亞的《北京裁決》中有譯成英文的實況廣播報道的摘錄。正像其題目提示的那樣，約翰·加德納所著的《中國政治和對毛的繼承》一書討論了許多這類的事件，默爾·戈德曼在《中國知識分子》一書中詳細論及了知識分子的內訌。戴維·茨威格的《中國農村的激進主義》敘述了“四人幫”為在重要的中國政治舞臺制定一條極“左”路線所進行的活動。這部書是第一批從漫長的對中國農村的研究中受益而寫成的專題著作中的一部。

以上提到的胡華也是大部頭系列叢書《中共黨史人物傳》的主編。該書30多卷在他去世前已成書，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概要，每一卷包括至少12個已去世的黨的領導人的傳記。通常是把早期的烈士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仍健在的國家領導人混合編排在一起。

自從這些叢書的第一卷于1980年出版以后，有關人物生平的專著、對某位領導人的回憶文章集和他們的著作選都陸續問世。其中有許多比胡華的叢書中的短文更為詳細。雖然有些很明顯是杜撰的，包括許多令人懷疑的談話記錄，但總的來說還都是有參考價值的。對于這章所涉及的時期，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是《周恩來書信選集》、《周恩來選集》（下）、《周總理生平大事記》；關于周的還有《不盡的思念》。關于其他人的有《鄧小平文選（1975—1982）》；張云生的《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南枝的《葉群野史》；朱仲麗（前高級官員王稼祥的遺孀）的《女皇夢：江青外傳》；葉永烈的《張春橋浮沉史》；仲侃的《康生評傳》；林青山的《康生外傳》；薛冶生編的《葉劍英光輝的一生》；《縈思錄：懷念葉劍英》；《聶榮臻回憶錄》（下）。關于個人的文章通常先發表在期刊上，然后才被收進各類書籍中。《新華月報》和《新華文摘》有專欄刊登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

西方關于中國領導人生平的詳細著述要少得多，這類書包括戶西恩·派伊的《毛澤東：領袖人物》（這是一部心理分析的作品）；迪克·威爾遜編的《在歷史天平上的毛澤東》。在毛去世后不久，一系列由著名專家撰寫的專著陸續出版。它們有：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及《白骨精》（關于江青的）；羅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該書主要根據江青會見作者時的自述寫成；羅杰·法利格特和雷米·考夫的《康生及其在中國的秘密工作（1927—1987）》；丁望的《王洪文、張春橋評傳》和《華主席：中國共產黨人的領袖》。

很明顯，僅僅依靠中文（和西文）的著作是遠遠不夠的。關于黨史的中文雜志和其他出版物，很多曾屬于內部刊物，目前可以得到復印件，也很有參考價值。如《黨史研究》（1980—1987年）曾經是內部刊物，現在已用《中共黨史研究》的刊名公開發行（1988年— ）。此外還有《黨的文獻》、《黨史通訊》、《文獻和研究》、《黨史研究資料》、《內部文稿》、《黨史資料征集通訊》。在以上雜志及文選上刊登的文章偶爾在其他刊物上也可看到，最著名的是由朱成甲編輯的3卷本的《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但是，接觸這些更秘密的材料并未使人們忘記這樣的事實，即重要的文章經常在定期刊物上出現。

目前在中國的各種刊物中出現這樣多的材料，以致一批較年輕的西方學者在蒂莫西·奇克的指導下編輯了《中國共產黨研究通訊》（1988年秋— ），以便在這個領域中向大家通報出現的最重要的新材料。這份雜志是那些尋求及時接觸有價值的新資料的人所必讀的。希望當代中國的權威人物們注意到這份雜志并意識到在開放的年代“內部”已經成為完全過時的分類方法，對于哪些資料是真正需要保密的這個問題將會出現一種更現實的看法。

在那些更加普及的西方雜志中，《中國季刊》和《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志》刊載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較多。《中國季刊》的“每季大事和文獻”欄也是很有參考價值的，臺北的《問題與研究》經常最先登載重要的共產黨文件的譯文。

在中國出版物中，對“文化大革命”后這段時期的政治進行嚴密分析的著述較少。這主要是因為，在1976年以后的年代里，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仍健在并主管國家事務，另一方面，當代資料的性質與過去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不同。這類材料汗牛充棟，著作和期刊的出版都出現了空前的爆炸，官方出版物更趨真實，更少宣傳性，同時可以把它們與公開表達的各種觀點進行對照。此外，中國政治進程的透明度也比過去高得多，因此，對上層爭論的詳細報道很快就會在香港刊物《爭鳴》和《九十年代》等上面出現。

另一方面，內容集中于毛以后時代的編年史是很重要的。著名的有李盛平和張明澍的《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記》；黃見秋、孫大力、魏新生、張占斌、王洪模等編的《新時期專題記事（1976年10月—1986年10月）》；李永春、史遠芹、郭秀芝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體制改革大事記》。一部極有價值的編年史的西方譯本是肯尼思·利伯撒爾和布魯斯·J.迪克森合編的《黨中央和政府會議研究指南（1949—1986）》。

除《鄧小平文選（1975—1982）》外，已經被引用的還有一部主要的文獻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2卷）。從不同角度來看待這段歷史時期的、由西方人編的文獻集是約翰·P.伯恩斯和斯坦利·羅森的《毛以后的中國的政策沖突》；以及肯尼思·利伯撒爾、詹姆斯·唐和惲賽充（音）編的《中共中央和政治局文件》，該書解釋了這類文件是如何產生及傳達的。

西方對鄧小平改革運動的報道數量驚人，從一般的著作、專題文章到記者的分析等應有盡有。在綜合性的著作中，最好的有鮑大可和拉爾夫·N.克拉夫編的《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哈里·哈丁的《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戴維·M.蘭普頓編的《毛以后的中國政策的實施》；伊麗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編的《毛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鄒讜的《“文化大革命”與毛以后的改革》。一部十分有用的背景材料是一年一本的《中國簡報》，由亞洲協會中國委員會出版。專著有戴維·S.G.古德曼的《北京街頭的呼聲》；埃利斯·喬菲的《毛以后的中國軍隊》；肯尼思·利伯撒爾和米歇爾·奧克森伯格的《中國政策的制定》，該書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及其以后的能源工業。瓊·C.奧伊的《國家和當代中國的農民》，該書從50年代中期寫到80年代末，同茨威格的書一樣，也是得到了這個時期之后農村研究的一些資料才寫成的。

許多西方報社駐中國的記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或像美國記者那樣，在“文化大革命”后，很快接受有關中國的訓練或很快了解中國的情況。在早期報道性的著作中，最優秀的有理查德·伯恩斯坦的《從世界的中央尋求關于中國的真相》；戴維·邦納維亞的《中國人：一幅肖像》；福克斯·巴特菲爾德的《中國：生活在苦海中》；約翰·弗雷澤的《中國人》；杰伊和林達·馬修斯的《十億：中國記事》；菲利普·肖特的《龍和熊》；史蒂文·W.莫舍的有爭議的《破碎的大地：農村的中國人》，這本書是根據一個人類學博士生的報道寫成的。這個博士生是那些1979年1月中美復交后第一批到中國農村考察的美國學者之一。西蒙·利斯是一位學者兼隨筆記者，他的作品交織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尖銳的評論和對許多關于中國的西方著作中的空話的揭露，他的主要著述有《中國的陰影》、《毛主席的新衣》、《破損了的偶像》。

## 第五章 對美開放

雖然有大量的第二手資料，但人們對中共九大和十大之間的中國外交政策仍然研究得很不夠。主要的障礙來自資料方面：現有的資料難以對這個時期中國的決策過程作出全面的描述。中國人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內幕一直十分敏感。這些禁忌近年來已有所緩減，人們已經能夠和與外交事務有關的官員和研究機構進行較密切的接觸了。但是，對于外交政策的討論和制定，對于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在領導層斗爭激烈的時期），現有的歷史資料卻什么也沒有告訴我們。

然而，由于官方越來越鼓勵人們做整理檔案的工作，中國的研究人員已經編成了更全面的中國外交史（包括20世紀70年代）的檔案資料書籍。這些活動的高潮是《當代中國外交》的出版。這本書簡要敘述了這個時期的外交事件，具有權威性，盡管它沒有透露政策制定方面的情況。此外，高級官員的一些回憶錄和回憶文章對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的外交政策作了較深入的重估，盡管還不十分詳細。其中有：《聶榮臻回憶錄》；鐵竹偉：“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見《昆侖》）；葉劍英傳記編寫組：《葉劍英傳略》。亨利·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前，埃德加·斯諾與中國高級官員的談話記錄也是珍貴的資料，它們都完整地發表在斯諾《漫長的革命》一書中。

美國官員們關于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的著作也使學者們獲益匪淺。這些著作包括：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權力與原則》；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動亂年代》；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憶錄》；米歇爾·奧克森伯格：“中美關系十年”（見《外交事務》）；理查德·H.所羅門：《中國人的政治談判行為》；賽勒斯·萬斯：《艱難的選擇》。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資料的主要來源，仍然是中共主要的新聞媒介，特別是《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的社論和評論員文章。關于重要的外交政策聲明，《北京周報》亦有很高的參考價值。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恢復了1966年中斷的探討外交事務的重要期刊的出版工作。這些期刊包括《世界知識》和《國際問題研究》，這兩種雜志都是由外交部出版的。要探討外交政策的發展動態，美國政府出版的外國廣播信息處的《中國動態》和英國廣播公司出版的《世界廣播概要：遠東》是兩種基本的參考資料。美國政府出版的聯合出版物研究署的系列期刊中也有一些極為重要得文件和資料。

此外，鄧小平的講話（包括一些評論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講話）都收錄在《鄧小平文選（1975—1982）》中。流傳到臺灣或西方的中國內部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可作為這些資料的補充。雖然有時候人們對這些材料的可信程度有爭論，但其中的許多材料還是提供了發生重大政策沖突時的重要情況。收錄了這些文件的兩部書籍是：陳慶編：《中國與第三世界》；高英茂編：《林彪事件》。反映中國內部對敏感的外交問題進行爭論的諷刺文章是另一個重要的資料來源，雖然有些學者懷疑其價值。關于此類資料的解釋，請參閱肯尼思·G.利伯撒爾：“諷刺文章中反映出的外交政策爭論（1973—1976）”（見《中國季刊》）；哈里·哈丁：“中國全球姿態中的內部政治（1973—1978）”，見托馬斯·芬格等編的《中國對獨立自主的追求》。

盡管資料有限，學者們還是寫出了關于某些具體事件和某些時期的一些專著和一些重要得多卷本著述。關于多卷本著述，特別請參閱約瑟夫·卡米萊里：《中國的外交政策》；戈蘭姆·W.喬德赫里：《中國在世界事務中》；哈里·哈丁編：《80年代中國的對外關系》；塞繆爾·金（音）編：《中國與世界：毛以后時代中國的外交政策》；理查德·H.所羅門編：《中國因素》；邁克爾·亞胡達：《孤立主義走向盡頭：毛以后的中國外交政策》。

促成中美和解的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中蘇發生軍事沖突之后北京改變了安全計劃。關于這個論題，參閱約翰·W.加弗：《中國決定與美國和解（1968—1971）》；哈里·格爾曼：《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集結和反華冒險》；托馬斯·M.戈特利布：《中國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與戰略三角關系的起源》；梅爾文·格托夫和汪永木（音）：《處于威脅下的中國》；蕭錚和邁克爾·魏圖恩斯基編：《中美關系正常化及其政策深意》；理查德·威希：《中蘇危機的政治》。

許多單卷本和多卷本專著還對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美關系和中蘇關系的全球戰略環境的變化進行了研究。這些專著有：赫伯特· J.埃利森編：《中蘇沖突》；班寧·N.加勒特和邦尼·S.格拉澤：《戰爭與和平》；肯尼思·G.利伯撒爾：《70年代的中蘇沖突》；喬納森·D.波拉克：《中蘇敵對和中國的安全之辯論》、《聯盟政治的教訓》；杰拉爾德·西格爾：《毛以后的中蘇關系》；道格拉斯·T.斯圖爾特和威廉·T.托編：《中國、蘇聯和西方：80年代的戰略和政治面面觀》；蘇吉（音）：《蘇聯對中國的想像及其對華政策（1969—1979）》；羅伯特·G.薩特：《中國外交政策：毛以后的發展》；艾倫·S.惠廷：《西伯利亞的發展與東亞：威脅還是承諾？》。

與中美關系和中蘇關系相比，中日關系研究得還很不夠。然而也有一些成果，參閱羅伯特·E.貝德斯基：《脆弱的協定：1978年中日和平條約的全球透視》；李季銀（音）：《日本面對中國》、《中國與日本：新的經濟外交》；羅伯特·泰勒：《中日軸心：亞洲的一支新生力量？》。關于中日關系的重要文章，有新木內江藤：“日本和中國——一個新階段？”（見《共產主義問題》）、“近期中日關系的發展”（見《亞洲概覽》）；良清國分：“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制定中的政治”（見《中國季刊》）。

中國與東南亞關系（特別是中越關系的惡化）的有關資料既豐富又詳細。特別引人注目的著作是納嚴·詹達：《兄弟仇敵：戰爭之后的戰爭》。另閱張保民（音）：《北京、河內、華僑和處在中國與越南之間的柬埔寨》；威廉·J.杜克爾：《中國和越南：沖突的根源》；尤金·K.勞森：《中越沖突》；羅伯特·S.羅斯：《印度支那紛爭：中國的對越政策（1975—1979）》。

關于70年代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再次出現的意義，塞繆爾·S.金的《中國、聯合國和世界秩序》一書作了詳盡的研究。關于對70年代中國外交政策中經濟方面的評析，參閱鮑大可：《從全球角度看中國經濟》；艾倫·S.惠廷：《70年代中國的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

## 第六章 中國的經濟政策及其貫徹情況

有關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和著述是與改革本身同步的。關于“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7年）經濟政策及其實施情況的研究工作也剛剛起步。論述六七十年代中國經濟的文章和書籍確實很多，但論述當前中國經濟的著作卻不得不依據數量有限且可靠程度大有疑問的資料。事實上，西方關于“文革”時期中國經濟的大部分文獻資料都集中在對農業、工業、國民總產值和其他許多項目的重建成就的估計上。盡管有這些限制，但也不乏有價值的著作。對寫于六七十年代的有價值的英文著作有興趣的讀者，可查閱德懷特·H.珀金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之研究：概覽”（見《亞洲研究雜志》）一文中的書目索引。

從1979年開始，中國政府又恢復了對官方統計資料的公布和出版。這項工作已中斷了將近20年，這期間中國把所有的經濟資料都當做國家機密。1979年統計工作的規模很小，進入80年代以來，規模就越來越大了。最有用的資料是國家統計局用中英文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該年鑒始于1981年，以后每年一版，收錄的資料越來越多，其中不但有80年代的，而且有更早時期的。1989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共1029頁，而50年代的主要統計資料《偉大的十年》（國家統計局編）只有200余頁，且開本要小得多，二者顯然不可同日而語。目前尚有數十種各部門的專門統計年鑒（如《中國農業年鑒》），各省的統計年鑒（如廣東統計局的《廣東省統計年鑒》）以及許多專項研究資料（如國家統計局編的《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1950—1985）》）。

除這些統計資料外，依據在中國的實地調查資料寫成的英文著作也越來越多，有一些實地調查工作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的合作項目。這些合作項目的兩項重要成果是吉恩·蒂德里克和陳毅遠編的《中國的工業改革》和威廉·伯德和林青松編的《中國的鄉鎮企業：結構、發展和改革》。

在依據新獲得的材料對六七十年代的中國進行的各種研究中，對中國農村的研究成果最多。根據中國的實地調查資料對改革前后農村的研究，參閱威廉·L.帕里什編：《中國農村的發展》。對1949年以來中國農業的發展進行的較廣泛的經濟分析（利用了一些新資料），參閱尼古拉斯·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德懷特·珀金斯和沙義德·尤素福：《中國農村的發展》。僅依據80年代新獲得的資料對六七十年代中國工業的發展的研究成果很少，較卓著者是巴里·諾頓的“三線：在中國內地保衛工業化”（見《中國季刊》）。

有一些綜合性的論文集集中討論了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成就的有關問題。此類著作有：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編：《面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2卷）；伊麗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編：《毛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目前出版的許多論文集是中外經濟學家合作的結晶，其中最有用的是布魯斯·L.雷諾茲編的《中國的經濟改革》（《比較經濟學雜志》專刊）。世界銀行大約每隔四年推出一本關于中國經濟的綜合性著作。德懷特·H.珀金斯的“改革中的中國經濟體制”（見《經濟資料雜志》）一文從總體上分析了中國的改革活動，文中附有很多書目索引。

80年代與六七十年代的一個不同之處是，80年代中國學者的經濟研究成果越來越多了。這些成果有的發表在數十種經濟學雜志上（其中許多雜志在1979年以前是不存在的），有些發表在各種報紙上。上海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在組織文章辯論經濟改革的爭議問題方面尤為活躍，讀者群很廣。然而，此類文章大部分是用中文寫的，雖然其中的一些被譯成了英文以便讓其他國家的讀者閱讀。最值得注意的英文譯文集是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編輯、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國的改革：挑戰與選擇》（布魯斯·L.雷諾茲寫了引言）。該公司還定期出版名為《中國經濟研究》的專門刊登經濟論文譯文的雜志。

最后，還有一類討論中國經濟的著作。這類著作主觀上主要是寫給生意圈中的人看的，但其中亦有論述當前人們普遍感興趣的經濟問題的文章。這類著作中較著名的有美中貿易委員會出版的《中國貿易評論》和日本海外貿易組織出版的《中國通訊》。著重討論貿易問題的一本有用的論文集是尤金·K.勞森編的《美中貿易：問題與前景》。

## 第七章 教育

本章是《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4章和第9章的續文。那兩章中所述的資料和研究方法是筆者在此處提供資料和進一步評論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材料。總的來講，官方的中文報刊雜志仍是主要的資料來源，但某些變化值得注意。從50年代末開始，中國政府限制報紙在境外發行，使香港聯合研究所剪報的用處減少了許多。不過，聯合研究所的剪報一直保持到了70年代初。最后，當該研究所于1983年關閉時，始于1950年的剪報全部移交給了香港浸禮會學院圖書館。此外，紅衛兵編印的大量非官方出版物記錄了1966—1968年間發生的事件，并對“文革”前幾年的事情做了重要的回顧。然而，當紅衛兵“復課鬧革命”后，他們的獨立出版活動就停止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1976年）中，地方政府的報紙一直在出版，只是在1967—1969年動亂最嚴重的時期在各地曾有過簡短的中斷。

不過，這些出版物在境外的發行仍受到嚴格限制。所以，1969—1976年間，外國人所能接觸到的中國新聞媒體基本上限于“兩報一刊”。這些都是由毛的中央政府控制的國家出版物，作為建立中央政府在紅衛兵群眾運動階段結束以后謀求建立的新秩序的輿論工具，它們擁有絕對的權威性。《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加上緊緊追隨它們的《光明日報》和后來的《學習與批判》，是“教育革命”試驗及1968—1976年間發生的事件的主要資料來源。偶爾也有地方出版的研究刊物被帶出中國，例如廣東師范學院出版的《教育革命》和上海師范大學出版的《教育實踐》等。

這就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口述歷史方法流行的客觀環境。當時，學術界和其他行業對中國的興趣都很高，在新聞媒體受到嚴格控制的情況下，采訪離境的中國居民實際上是唯一可行的一種辦法。在那些年中，這些采訪活動主要由在香港的美國教授和研究生們主持，他們以成立于1963年的大學服務中心為主要研究基地，該中心是從中國大陸遷來香港的。正如在第14卷的書目說明中指出的，主要依據口述資料寫成的關于教育的書的作者是斯坦利·羅森、蘇珊·舍克和喬納森·昂格爾。他們三人都是在大學服務中心開始博士論文的撰寫工作的。

1976年以后官方出版物的激增和向境外銷售限制的放寬，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前10年文件資料的匱乏。目前最值得人們注意的是香港的大學服務中心于1987年獲得的大批省級報紙。1987年后，該中心已不再是獨立的研究機構，但它的圖書館坐落在香港中文大學，仍然是收藏中國國家級和省級報紙最全、查閱最方便的地方。實際上，各省從1949年一直到今天出版的報紙該圖書館都有。這些報紙收藏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10年的獨一無二的資料來源，亦可替代大學服務中心收藏的早些年間的剪報，因為（據出版的索引介紹）那些剪報的來源——各省的報紙很不完備。此外，這些報紙收藏還優于中國本土的報紙收藏，原因有二：一是它們很容易借閱，二是中國的圖書館沒有把如此大量的報紙收藏在一處供人使用。

1976年之后，關于教育、青年和科學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出版物也極為豐富。到80年代中期，花費筆墨集中討論這些主題的報紙主要有：《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教育文摘》、《教師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少年報》、《科技日報》、《科學文化報》、《兩用人才報》（專登軍隊教育方面的消息）等。中國人民大學的報刊資料選編有一些與上述主題有關的系列專集，收錄的與教育問題有關的文章雖然不很完備，但很有利用價值。

主要的刊物有：《人民教育》、《教育研究》、《高教戰線》（80年代中期改名為《中國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理論與實踐》、《教育與職業》、《教學通訊》。各省市都有這些專業報刊的復印資料匯編本，其中的大部分都與教育有關。北京、上海和其他許多省市還出版自己的刊物，如《上海教育》、《山西教育》和《福建教育》等。這些省市級教育刊物在形式上都是相似的，刊登的主要是與教學有關的消息，面向的是教師。

另一個資料來源是絕大多數高等院校出版的學報。這些刊物所登的學術論文的面非常之廣，主要討論教育問題的是師范院校出版的刊物，如《北京師范大學學報》、《華東師范大學學報》、《華南師范大學學報》、《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和《東北師范大學學報》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的出版物數量大增的同時，各個翻譯機構譯出的成果卻日趨減少。各個方面的主題（特別是與教育有關的主題）的譯文數量都減少了。美國政府主要的翻譯材料（報刊概覽、報刊摘要、《當代背景材料》和附錄）都于1977年并入了外國廣播信息處的《中國動態》中。這份刊物簡要摘發每天的重大新聞。據美國駐香港領事館人員講，決定合并的原因是（決定是他們于1976年做出的），當時把持中國官方新聞媒介的“兩報一刊”使大規模的翻譯活動成了多余之事。但是，由于美國政府的中國問題專家在預料事情的發展方向一事上發生了一系列歷史性的失誤，這個決定今天看來是個錯誤。合并計劃剛執行完畢，中國的出版物就如雨后春筍般大批出現了。這就需要對越來越多的資料進行整理。這種需要于1979年導致原來的美國聯合出版物研究署變成了出版系列專業叢刊的機構。1979—1987年間，聯合出版物研究署和外國廣播信息處聯合出版的《中國報告：政治、社會和軍事事務》中譯載了關于教育和青年問題的文章。80年代中期，聯合出版物研究署各類叢刊進一步專業化。以1987年為例，有三種叢刊譯載有關教育問題的文章，它們是：《中國地區報告》、《中國——紅旗》和《中國——國務院簡報》。科技文章的譯文由一份專門的叢刊發表。然而，遺憾的是，1977—1979年間，這些叢刊對教育問題的興趣雖然極高（當時毛主義的實驗正在被推翻），但當教育制度恢復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狀態后，討論教育問題的譯文的比例很快就大幅度下降了。結果，大約從1980年開始，想要單純依靠英文譯文對教育戰線的發展做一個概括的了解都成為不可能的事了。對不懂漢語的人來說，《中國教育譯叢》是一份很好的雜志。1977年前，它由國際藝術和科學出版社出版，1977年后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這份雜志一年出四期，譯文的面雖然不寬，但都非常好。

除了某些專業領域之外，中國方面可能仍對中國國內和世界各地政治模式和公眾情緒的變化特別敏感（包括中國的和外部世界的）。特別是，外國研究者感到驚訝的、能提示當代中國的情況的變化，就是那里發生的政治事件的反映，其結果與對中國人自己一樣令人感到冷諷挖苦。所以，盡管自1976年以來我們通過親身體驗和出版物對中國的了解有了大幅度增加，但目前有興趣的英文讀者所能看到的資料卻沒有相應的增加。不過，這類英文資料也許足夠了，因為有興趣的讀者群本身已經減小了。中國先是作為敵人，后來又作為新朋友，曾引起人們的強烈關注，這種關注以各種形式持續了30年。但到了1980年，原來的傾向性已經過時，后來的新鮮感已開始消逝。1976年后重新推行開放政策的中國自認是一個貧窮落后、尋求西方援助、謀求讓西方社會接受的國家。就引起人們的好奇這一點而言，作為友好親善的第三世界國家的中國與70年代初期使得觀察家們以同情的心態觀察其革命實驗的中國是完全不同的。

就同要在該領域吸引公眾更大的興趣一樣，學術研究為得到鼓舞也花費了許許多多的精力。1945年以后的冷戰造成了這樣的心態：開始是竭力證明中國是亞洲的頭號共產黨敵國，后來則竭力證明中國不是頭號敵國。到1980年，這兩種任務都成為過去，沒有與之相比的新任務出現。這些變化和另一些事情促成了40年代末以來知識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出現史無前例的沉寂狀態。學者們爭相尋找采訪對象，了解某項政策在某市或某村的實施情況及發現一些新文件即可引起轟動的日子突然間一去不復返了。另外也不僅僅是獲得的“內部”文件太多和潛在的情報提供者的人數太多以至于敗壞了胃口的問題。人們對許多論題的研究和探索仍很不充分，盡管可供研究的資料比以前多得多。

對中國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所有這些研究政治和各代人的傾向的中心。50年代的研究中，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主要的課題。“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與教育社會學和教育發展有關的課題很快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此后，這些課題一直引人注目，因為毛的“教育革命”深深觸動了世界各地那些極想知道中國的實驗能否大規模推廣以及會留下什么樣的教訓的人的神經。然而，當毛以后的中國政府無條件地自動放棄那些實驗時，早先為革命運動說好話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記者的聲譽受到了損害。所以，學者們和公眾對教育問題的關心程度大為減輕。毛的繼任者是否能長期把教育從中國國內對公共政策的爭論中擺脫出來，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但是，目前的事態發展有效地抑制了外國人對中國教育經驗的廣泛興趣。當然，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歷朝歷代和歷屆中國政府都通過夸大本朝的成就和詆毀前朝的政績來強調自身的合法性。但到80年代末，人們普遍缺乏興趣和好奇心去證實新政府就與教育有關的問題和其他許多問題而對本屆政府和以前的毛主義者的政府發表的聲明。結果，中文資料查閱環境的改善所造成的綜合運用文件和實地調查資料進行研究的機會在許多領域里都提供了便利條件。

最后，除上面已提到者以外，還有一個因素是造成對中國教育研究的落后現狀的重要原因。這與中國大批知識分子得到“解放”有關，他們以前被當做革命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敵人而處在受懷疑的地位。他們被“解放”后還出現在國際學術界，作為各國學者的朋友和同事對中國教育作權威性的演講。但是在這互相影響的過程中，外國研究人員越來越難以區分這些中國知識分子所扮演的各種角色了，他們關于“文化大革命”以及專門的教育問題的觀點和著述與毛以后中國政府的傾向性完全一致，使人難以分清他們是學術研究人員還是中國政治圈子中的人物。把教育置于中國的傳統環境來觀察，人們也許會認為，知識分子官僚化的體制的建立是為了幫助新政府重寫歷史。把教育置于1949年以來的歷史環境來觀察，人們也許會認為，被平反的知識分子階層是革命的受害者，就承擔的義務和自身利益而言，他們又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秩序的忠實同盟者。也許，還需好多年才會使每個人從1949—1979年動亂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只有到那時，中外學術界才可能重新獲得培養研究教育問題的新一代學者的必要的見識和動力。

## 第八章 文藝創作與政治

描述“文化大革命”時期知識分子的生活（特別是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命運）的資料可分下述四類：（1）中國出版的漢文資料；（2）國外出版的漢文資料；（3）中國出版的英文資料；（4）國外出版的英文和其他語種的資料。

1.第一類除小說、詩歌、雜文、戲曲劇本和評論之外，還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報紙。《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刊登顯示文化界動態的重要官方文件；紅衛兵自編自印的小報的主要消息來源是謠言，不可盡信，只能使人們對“革命氣氛”產生深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學術刊物的數量大幅度減少，70年代才逐漸恢復出版。

2.在“文化大革命”進行過程中，臺灣和香港出版的漢文資料很有價值。開始時，這些資料的出版是為了參加“兩條路線斗爭”。例如，1967年6月香港自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紅皮小冊子——《劉少奇語錄》，與《毛澤東主席語錄》唱對臺戲。然而，嚴肅可靠的研究著作是趙聰的《中國大陸的戲劇改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3.中國出版的英文資料的長處在于它刊登重要文件和報告的官方譯本。“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一份著名刊物是《有關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匯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直出版的《中國文學》（只在1967年有過短暫中斷），是對我們的論題極為重要的一份刊物。毛澤東逝世之后作家和藝術家得到平反的情況，不但見于中文報刊，而且常出現于英文版的《中國文學》上。

4.除香港的聯合研究所出版的英語刊物和臺灣出版的《問題與研究》（只偶然涉及文學、藝術和知識分子的生活）之外，歐洲和美國還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和書籍。不過，對目擊者的報告和專家學者的分析應加以區別。

有些目擊記是歐洲人寫的，出版很快；有些是中國人寫的，主要是80年代出版的。俄國社會學家阿列可謝·澤羅克霍夫契夫寫的報告是1968年在《新世界》月刊上出版的，該書的德文譯本名為《中國“文化大革命”探微》。在德文中，作者的名字被拼為A.N.Schelochowzew。和這個階段蘇聯的其他出版物一樣，本書的調子很不友好，充滿攻擊之詞，但它對“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描述是準確且相當可靠的。V.A.基維佐夫、S.D.馬爾可夫和V.F.索羅金合編的《文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命運（1949—1979）》一書也充滿著攻擊之詞。澤羅克霍夫契夫和馬爾可夫還出版了更多關于“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文學的著述。荷蘭外交官D.W.福克瑪的《來自北京的報告》是根據親身經歷集中描述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問題的一本書。法國外交官讓·埃曼寫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一書。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羅合寫的《“文革”之子》一書，根據親眼所見的事實描述了一位12歲即成為紅衛兵的中國青年的興衰榮辱，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現為北京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的樂黛云向卡羅林·韋克曼講述了自己遭受迫害和僥幸生存下來的經歷，后者據此寫成了《走進暴風雨》。

在學術研究著作中，默爾·戈德曼的《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書很出色，它對1960—1980年間的政治史和知識分子史作了全面且可靠的概括性論述。在這本書之前還有許多著作，如理查德·H.所羅門：《毛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托馬斯·W.魯賓遜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羅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是一本獨一無二的資料，它主要是依據江青對作者的講述寫成的。

論述文學和藝術的著作較少。黃胄的《共產黨中國的英雄和壞蛋：從當代中國小說看現實生活》一書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階段。許芥煜的《中國文壇》既有分析研究，又有訪談記錄。毛澤東逝世以后，特別是西方社會學家注意到“傷痕文學”現象以后，出現了論述這一文學現象的著述，此處只能提到其中的一部分，如戴衛·S.G.古德曼：《北京街頭的呼聲》；霍華德·戈德布拉特編：《80年代的中國文學》；沃爾夫岡·庫賓和魯道夫·G.瓦格納編：《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學批評文集：1978年柏林會議論文集》；魯道夫·G.瓦格納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和政治》；杰弗里·C.金克利編：《毛以后的中國文學和社會（1978—1981）》；邁克爾·S.杜克：《繁榮與爭論：毛以后時代的中國文學》。

## 第九章 共產主義統治下的農村

1949年以前，世界上一些最出色的農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是在中國進行的，其中一部分是由西德尼·甘布爾、莫頓·弗里德等西方人搞的，而大部分是由費孝通、林耀華和楊慶龢這些才華橫溢的中國社會科學家搞的。這些學者的著作，著名的有西德尼·甘布爾的《定縣：中國北方的一個農村社會》；莫頓·弗里德的《中國社會的組織》；費孝通的《中國農民的生活》；林耀華的《金翅》。這些著作對了解共產黨奪取政權前10年中國農村生活的經緯，提供了厚實的基礎。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不久，新政權壓制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其理由是它們傳播資產階級的理論。除此而外，對像費孝通這樣的極出色的學者也進行了悲劇性的迫害；壓制社會科學的研究也極大地損害了國際間的了解。關于中國廣大農民的經歷的完整材料，外國人簡直一點也得不到。

中國各地出版了大量的各種各樣的地方志，經常以豐富的、引人入勝的章節來描述一個村莊、公社或縣。可是，這些文獻通常發行量非常有限，在中國境外是見不到的。在其他國家可以買到的中文文獻，或者是在外國的圖書館里可以借到的中文文獻，主要是有關農村的土改、合作化、“大躍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是用一成不變的言辭對其進行贊揚的。它們被現實的政治路線所渲染，以至于沒有多少普通農民對這些事件的真實想法的第一手可靠資料。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期間，大量的報刊文章和書籍贊美山西省的一個生產大隊——大寨，這個生產大隊被認為是經濟上豐產且具有革命精神的樣板。這類著作中一本用英文寫的優秀代表作，名為《大寨：中國農業的旗手》。但是，到了70年代末，鄧小平及其伙伴們推翻了毛主義者以后，官方出版物宣稱大寨的成功是虛構的，把大寨的英雄式的領袖陳永貴貶稱為騙子。

通過對一份《連江文件》的研討，可以得到其使用的豐富的、直言不諱的資料的線索。該文件是一份有關福建省在‘大躍進’以后的問題的地方報告，被臺灣的文化特務搞到了，這類文獻通常對外國人是保密的。這些文獻現在已經被譯在C.S.陳編寫的《連江縣的農村人民公社》一書中。

然而，在這期間，即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出版的，而且能在西方找到的中文報紙、書籍、期刊，還是提供了大量線索，說明中國農村正在干什么。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西方的中國專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來篩選和解釋這些線索。采用這種方法整理出來的關于農村生活的報告，最成功的是弗朗茲·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埃茲拉·沃格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理查德·鮑姆：《革命的序幕》；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楊慶龢：《共產主義革命中的中國家庭》、《一個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鄉村》。楊的兩本著作把共產黨執政前夕在廣東一個村莊進行的人類學分析和對50年代發表的關于農村生活的謹慎分析結合在了一起。

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采訪了從中國去香港的移民。移民的談話越來越多地補充了從中國官方出版物中獲得的線索。然而，使用這種方法去認識中國農村生活的演變過程固然不錯，但有一個問題：大部分移民是來自中國的城市，而不是來自農村。因此，當西方學者寫到農村生活時，他們使用的資料充其量不過是二手資料，是那些市民（通常是來自廣東地區）憑記憶敘述的農村生活。這些人在農村只度過一段時間（常常是不自愿地被下放到農村去的）。在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有許多主要是依靠這些采訪材料寫成的著作，約翰·C.佩爾澤爾的“中國‘大躍進’后一個生產大隊的經濟管理”（載W.E.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則是這類著作的佼佼者。到70年代初跑到香港來的人多了，這些人都在農村呆了很長時間。探尋這些人的住址和采訪他們的方法都精細了，因而獲得了一些極有參考價值的材料。威廉·L.帕里什及馬丁·金·懷特的《現代中國的農村和家庭生活》，使用了量多質優的社會學分析，描繪了一幅廣東省農村地區社會連續性和變遷的復雜圖畫。安尼塔·詹、理查德·馬德森和喬納森·昂格爾的《陳村》以及理查德·馬德森的《一個中國農村里的倫理和權力》，使用了來自廣東同一個村子里的移民們的敘述，從而構成了一份那個村自1950—1980年的上下連貫的社會歷史。

此外，有些外國人由于有特殊關系訪問了中國農村，目睹了農村的生活情況。他們的叢書又補充了那些從外部了解中國的專業社會科學家的研究工作。其材料經常缺乏科學的分析，加之他們信仰中國革命而擔負的政治義務，材料就蒙上了濃厚的色彩。不過，其中最好的著作也生動、詳細、真實地敘述了農村的生活，甚至這些敘述并不符合作者對社會主義的期望。而這類著作中最出色的是威廉·欣頓的《翻身》和《身翻》——山西省“長弓村”盛衰興敗目擊記。這類書的其他著作還有：杰克·陳的《福星高照的一年》；伊莎貝爾和戴維·克魯克的《一個中國鄉村的群眾運動》，以及簡·邁爾達爾采訪柳林農民的錄音——《來自一個中國村莊的報告》；簡·邁爾達爾和岡·凱斯勒的《中國：革命在繼續》；簡·邁爾達爾的《重返一個中國村莊》。

到了1978年，中國小心翼翼地開始允許專業社會科學家到農村去進行科研工作。他們去了以后的第一批成果是史蒂文·莫舍的《破碎的大地：農村的中國人》，這是史蒂文在廣東一個村莊里呆了一年的研究成果，但是卻引來了非議，因為中國人指責作者使用了不道德的研究方法。戴維·茨威格的《中國農村的激進主義（1968—1981）》，是在南京附近進行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寫成的。愛德華·弗里德曼、保羅·G.皮科韋茲及馬克·塞爾登的《中國的村莊，社會主義國家》是在河北省研究了八年的基礎上寫成的。在離他不遠的地方，西德尼·甘布爾也在為其《定縣》而進行實地考察。《華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農村革命的幫兇》一書，則是海倫·綏在廣東進行研究之后寫成的。

對系統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生活更具長遠重要意義的是，80年代社會學作為合法的學科再次在中國學術生活中出現，速度雖然慢些，但很穩健。費孝通再次披掛上陣，重新去開弦弓農村進行調查研究。這里是他1939年出版的經典名著《中國農民的生活》的基礎。一系列文章已源源不斷地刊登在《社會》等雜志刊物上，這些皆是費孝通和其他中國農村社會學學者研究的成果。費孝通新的研究成果有些已譯成英文，刊登在費孝通的《中國農村特寫》一書中。

關于中國人口統計學及農村經濟的大量統計數字將會涌出，社會學家和研究中國農村的其他學者將受益匪淺。直到80年代初，根本找不到準確、詳細的人口和經濟統計數字。在此以前發表了經過編纂的統計數字，不過這些數字皆屬于“社會科學小說”特征的一類。國家統計局發表的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頭十年的統計數字，《偉大的十年》便是一例[譯本1974年由華盛頓州立大學（東亞研究項目）發表]。就像處理科學小說一樣，真正的事實可能埋藏在想象的敘述中，需花大力氣才能把有用的事實挖掘出來。

由于中國在80年代推行改革政策和對西方開放，搜集統計數字和公開發表許多統計匯編的工作也專業化了。1982年使用最現代化的技術，進行了全國范圍的人口統計。人口調查取得了豐富的資料，對研究農村人口發展趨勢的學者非常有用。人口調查的資料譯成英文發表在《1982年中國人口普查》和《新中國的人口》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每年發表“中國人口年鑒”。

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和國家統計局發表了由薛暮橋主編的《中國經濟年鑒》（附1949—1980年經濟統計數字）。此后每年由中國統計資料及咨詢服務中心發表一本《中國統計年鑒》。自1981年起還發表了《中國經濟年鑒》。絕大多數省份也發表各自的經濟年鑒，西方主要研究中心的圖書館都有這些材料。

## 第十章 人民共和國的城市生活

自1949年以來，用中文寫的有關城市社會組織和生活方式的一般作品實為鳳毛麟角。不過，有兩份主要的中國城市規劃的刊物《建筑學報》和《城市建設》刊登關于城市政策和城市某特定地區進行改造的文章，能提供不少信息。此外，有關官方城市政策和計劃的作品、文章也很多。參見賴志衍編的《接管城市的工作經驗》；劉少奇等的《新民主主義的城市政策》；盧蕻的《論城鄉合作》、《論城市關系》、《祖國新型城市》；武漢市城市規劃設計院的《城市規劃參考圖例》。還有幾本有關幾個特殊城市變遷的著作。參見老舍：《我熱愛新北京》和《肇家浜的變遷》（肇家浜是上海的一個貧民區）。自1979年以來，幾種新社會學雜志開始發表關于城市社會生活的帶有資料的經驗主義研究。可特別參見：《社會科學戰線》、《社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還有一本中國出版的英文版《中國社會科學》及一本西方翻譯過去的刊物《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不時地發表有關城市社會模式的有意思的文章。

西方學術界對1949年以前的中國城市組織和社會生活也有許多有益的研究，這些研究為了解1949年以后的變遷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其中特別重要的著作有：施堅雅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馬克·埃爾文和施堅雅編的《兩個世界之間的中國城市》；威廉·羅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團（1796—1895）》；西德尼·甘布爾的《北京：社會概覽》；喬治·凱茨的《豐收的年歲》；奧爾加·蘭的《中國的家庭和社會》；愛德華·李的《現代廣州》；莫頓·弗里德的《中國社會的組織》；H.Y.洛的《吳的歷險記》；羅茲·墨菲的《上海：開啟現代中國之門的鑰匙》和艾達·普魯伊特的《韓的女兒和尹老夫人》。

一些學者的研究興趣集中在1949年以后個別城市的變遷。可特別參見埃茲拉·沃格爾的《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林恩·T.懷特第三的《在上海的經歷》和肯尼思·利伯撒爾的《天津的革命與傳統（1949—1952）》。也可參見克里斯托弗·豪編的資料豐富的會議文件集《上海：一個亞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發展》。總的說來，有關1949年以后中國城市組織結構變化的最出色的研究成果還是弗朗茲·舒爾曼的《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第6章）。約翰·劉易斯編的《共產黨中國的城市》是一本非常有用的關于城市組織和發展趨勢的會議文件匯編，一直收集到“文化大革命”。馬丁·金·懷特和威廉·L.帕里什的《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一書，就中國城市是以什么方式組織起來的，以及中國城市的獨特的社會生活類型問題，提供了一部社會學研究的概覽，其重點集中在70年代。蓋爾·亨德森和邁倫·S.科恩的《中國的醫院》一書，則呈現給讀者一幅人種分布的肖像圖和對武漢一所醫院的社會生活模式的分析。

一些專題論文和論文集論述了1949年前后城市人口發展趨勢、城市地理和城市規劃等。參見吉爾伯特·羅茲曼的《滿清和日本德川時期的城市網絡》；C.K.龍（音）和諾頓·金斯伯格編的《中國：城市化與國家的發展》；莫里斯·厄爾曼的《1953年和1958年的大陸中國城市》；羅茲·墨菲的《正在消失的毛主義幻想》；勞倫斯·馬和愛德華·漢頓編的《現代中國的城市發展》；埃德溫·溫克爾和珍妮特·卡迪編的《中國的城市規劃》；以及理查德·柯克比的《中國的城市化》（也可參見施堅雅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勞倫斯·馬也提供了一份同一個主題的、非常有用的書目提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城市和城市規劃》，并參見利奧·奧林斯關于中國官方城市人口統計混亂的討論；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編的《四個現代化下的中國》第一卷中的“中國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響”和柯克比的《中國的城市化》。

一些剛剛引用的成果涉及限制人口增長的努力的效果，這個效果也是一些專題論文論證的中心。例如田心源的《中國的人口戰》；托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鄉》；以及朱迪斯·班尼斯特的“上海的死亡率、出生率及避孕措施”。有關城市就業問題的有查爾斯·霍夫曼的《中國的工人》；克里斯托弗·豪的《1949—1957年中國城市的就業和經濟增長》、《現代中國的工資類型和工資政策（1919—1972）》；托馬斯·羅斯基的《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有關城市的社會管理問題在下面這些文章中提到了：約翰·劉易斯主編的《共產黨中國的城市》；艾米·威爾遜、西德尼·格林布拉特和理查德·威爾遜編的《中國社會的不正常現象和社會控制》；以及杰羅姆·艾倫·科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程序入門（1949—1963）》（特別是第2章）。

還有許多以前曾經在中國不同的城市居住過的中國人和外國人，他們以第一人稱的手法敘述的材料，給我們提供了他們當時生活情況的生動畫面。材料特別豐富的是德克·博德的《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伊曼紐爾·約翰·赫維的《在中國的一個非洲學生》；貝弗利·胡珀的《北京內幕》；米哈伊爾·克洛奇科的《在紅色中國的蘇聯科學家》；拉爾夫和南希·拉普伍德的《中國革命縱覽》；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羅的《“文革”之子》；斯文·林奎斯特的《危機中的中國》；魯思·厄恩肖·洛和凱瑟琳·金德曼的《在外國人眼里》；羅伯特·羅的《逃出紅色中國》；彼得·盧姆的《1950—1953年的北京》；包柏漪的《第八個月亮》；威廉·休厄爾的《我在中國的日子》；董志平（音）和漢弗萊·埃文斯的《思想革命》；雪莉·伍德的《中國的一條街道》；埃斯特·周英（音）的《紅色中國鄉下的灰姑娘》；瑪麗亞·嚴（音）的《宏大的園地》以及樂黛云和卡羅林·韋克曼的《走進暴風雨》。M.伯納德·弗羅利克的《毛的人民》一書中的一些描寫和陳若曦的《尹縣長的被處死》中的虛構故事，描述得同樣栩栩如生。眾多記者的報道對于評論中國城市在特定時代的環境同樣有用，例如：理查德·伯恩斯坦的《從世界的中央尋求關于中國的真相》；福克斯·巴特菲爾德的《中國：在苦海中生存》；詹姆斯·卡梅倫的《紅衣官員》；約翰·弗雷澤的《中國人》；羅伯特·吉萊恩的《六億中國人》；弗蘭克·莫里斯的《毛的中國的報告》；弗雷德里克·諾薩爾的《北京快訊》；魯思·賽德爾的《豐盛之家》；威廉·史蒂文森的《黃風》和羅斯·特里爾的《鐵樹開花》。畫冊和導游書也對中國的首都有出色的描繪，例如：胡佳（音）的《北京今昔》；奈杰爾·卡梅倫和布賴恩·布雷克的《北京：三個城市的故事》；弗利克斯·格林的《北京》；藤彥太郎的《北京》和奧迪爾·凱爾的《北京》。

## 第十一章 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文學

研究當代中國文學的主要資料是發表的書籍（小說、劇本、短篇小說集、論文、理論著作及詩刊）和文學雜志。最近幾年，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發行每個年度的獲獎作品選集或者其他新的文學作品選集。在毛以后的時代，期刊如雨后春筍。早期創刊的雜志中，“文化大革命”期間停刊、現又復刊的有《人民文學》（刊載創作性作品）、《文藝報》（理論性探討）、《文學評論》（發表評論文章），它們都傾向于代表自己既定的觀點。在發表新作品方面更勇于冒險的是《收獲》、《十月》、《當代》；特別是省級辦的刊物，像廣東的《廣州文藝》和《書評》，湖北的《湖北文藝》、《長江文藝》，遼寧的《鴨綠江》，《安徽文學》和《上海文學》。有關劇本方面的專業雜志包括《劇本》、《戲劇報》和《上海戲劇》。電影方面的有《中國電影》。新詩的主要期刊是《詩刊》、《星星》和《詩探索》。《文藝學習》、《文藝研究》和《讀書》刊載重要的評論文章。上海圖書館編輯的《全國報刊索引》是一份期刊索引，每月出版一期，包括文學雜志。上海的《文學報》則是一份時事通訊周刊。一些大陸的地下出版物自1980年開始被臺灣翻印成叢書——《大陸地下刊物匯編》，由臺北的中國共產主義問題研究所出版。

密切注視中國文學發展情況的香港刊物包括《九十年代》、《動向》和《明報月刊》。美國伊利諾伊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出版了《現代中國文學通訊》。關于當代文學的論文時常出現在《亞洲研究》、《中國文學、論文、文章和評論》、《當代中國》和倫敦的《中國季刊》上。臺灣的新作品主要發表在《純文學》、《中外文學》、《現代文學》、《臺灣文藝》和《幼獅文藝》等主要雜志上。

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許多現代大陸作品的英譯本。該社《中國文學》每月還刊載新的翻譯作品。這本雜志的索引（包括1976年以前的）已分別由漢斯·J.欣魯普和唐納德·吉布斯出版。由已故的許芥煜主編的兩本重要的文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和《二十世紀中國詩歌選》。聶華荃兩卷本的《百花文學》則是一部記述1956—1957年那個極重要年代的，集創作、評論和理論諸論題、作品為一書的很有益處的集子。霍華德·戈德布拉特主編的《80年代的中國文學》是一部關于“第四屆作家和藝術家代表大會”的文件集。毛以后時代的創作成果被翻譯并發表在邁克爾·S.杜克編的《當代中國文學》上；李怡編的《新現實主義》；佩里·林克編的《玫瑰與刺》、《頑強的毒草》；斯蒂芬·C.宋（音）和約翰·明福特主編的《高山上的樹木》；以及海倫·F.綏（音）和澤爾達·斯特恩主編的《毛的收獲》。齊邦媛出版了兩卷本的《臺灣當代中國文學選集（1949—1974）》，收集了各種文體的臺灣文選，并將其翻譯成英文。

蔡美西（音）的《當代中國小說和短篇小說（1949—1974）：書目提要》用途很廣。包括更多的書目提要材料的書是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會為1979年底召開的第四次代表大會準備的《六十年文藝大事記（1919—1979）》。陳若曦的“民主墻與地下刊物”則提供了一份1978—1979年間地下文學的細目。《中國當代作家小傳》和香港出版的《中國文學家的昨天》則是兩本有助于研究的傳記辭典。

兩部關于當代文學史的主要的新著，已由幾個大學的學者組成的寫作組編纂而成，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以后部分）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分別出版，書名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兩卷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已由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林曼叔等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的內容截止到1956年。在夏志清的《現代中國小說史》中，作者對大陸的一些主要作家沒有表示同情。科林·麥克拉思的《現代中國戲劇》中的后幾章，提供了自1949年以來這一時期的有價值的資料。而一本更早、更詳細的研究成果是趙聰的《中國大陸的戲劇改革》。杰伊·萊德的《電影》一書主要講的是1949年以后的電影。朱莉亞·林的《當代中國詩歌》是對大陸詩人的研究。

有關評論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是張鐘主編的《當代文學概觀》、《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講》（1980年整理收集），以及有關毛以后時代的新作家的《文學評論叢刊》第10集（《當代作家評論》專集）。夏志清在《新文學的傳統》中對當代臺灣作家提出了個人見解。何欣的《中國現代小說的趨兆》也包括了臺灣小說。葉維廉編的《中國現代作家論》和尉天聰主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則是兩本重要的評論論文集。

歷次學術討論會的內容已經匯編成評論性的論文集。較早的見西里爾·伯奇編的《中國共產主義文學》。較近年代的著作包括：沃爾夫岡·庫賓和魯道夫·G.瓦格納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學批判文集：1978年柏林會議論文集》；邦尼·麥克杜格爾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通俗文學和表演藝術（1949—1979）》，文章來自1979年在哈佛舉行的會議，以及杰弗里·C.金克利編的《毛以后：中國的文學和社會（1978—1981）》（是1982年在圣約翰大學舉行的會議論文選）。1979年在得克薩斯大學舉行的關于臺灣小說的會議論文收集在珍妮特·L.福洛特編的《臺灣的中國小說》中。

一些論文對1949年以來的大陸文學形式也進行了探討。亞羅斯拉夫·普魯賽克的《解放后的中國文學及其民間傳統》是對早年使用民間形式創作的一種有益研究。D.W.福克瑪的《中國的文學教條與蘇聯的影響》和默爾·戈德曼的《共產黨中國的持不同文藝見解者》兩書都記載了50年代的主要爭論。黃胄的《共產黨中國的英雄和壞蛋》分析了主流小說的重要作品，而邁克爾·戈茨的“當代中國小說中的工人形象（1949—1964）”是一篇未發表的論文。邁克爾· S.杜克的《繁榮與爭論：毛以后時代的中國文學》則分析了最近的作品。關于作家個人的最出色的研究是梅儀慈的《丁玲的小說》。理論家姚文元（“四人幫”成員）則是拉斯·拉格瓦爾德的《作為文學評論家和理論家的姚文元》的主題。

## 第十二章 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1949—1982年

臺灣作為1885年后中國的一個省的10年歷史，在《劍橋中國史》（第11卷）中作了評鑒，對精力充沛的、主張現代化的巡撫劉銘傳（1885—1891年）領導下的臺灣稅制改革和西方化建設項目作了詳細介紹。作者K.C.劉教授和R.J.史密斯教授引用了威廉·M.斯派德爾、郭丁一（音）、倫納德·H.D.戈登和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有關1949年以前的臺灣歷史的第二手英文資料是：詹姆斯· W.戴維森的《福摩薩島》；W.G.戈達德的《福摩薩》；喬治·W.巴克利的《殖民地的發展與臺灣的人口》；以及喬治·H.克爾的《福摩薩》；薛光前編的《現代臺灣》涉及1949年以前的臺灣歷史。謝覺民的《臺灣—厄爾巴—福摩薩》（1964年出版），雖然現在過時了，但仍不失為一本出色的地理學著作。

日本從1895年以后統治臺灣達半個世紀之久，臺灣1945年以來的歷史當然受日本統治時期的影響很深。《劍橋中國史》沒有涉及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下的臺灣，這可以理解，但也令人遺憾。《劍橋中國史》沒有一卷追溯20世紀初葉中國人在日本帝國范圍內的生活經歷。雖然近數十年來日本對其帝國的研究已拓寬了，使用了許多材料，問題也討論了，但比較而言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還不夠。中國歷史學家應該從中找到更多的機會進行深入的研究。

一位研究1895—1945年時期臺灣的主要學者是拉蒙·邁爾斯，他寫了不少關于臺灣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以及臺灣在日本人統治下的農業經濟的文章。此后又由他和馬克·R.皮蒂編了一本專題論文集《日本殖民帝國（1895—1945）》，還有14位撰稿人參加編寫，皆來源于1979年的一次研討會。這本論文集主要討論如何集中探討日本的動機、管理、經濟動力以及關于朝鮮和臺灣的歷史編纂工作，但是若干章節提供了不少資料，并引用了已發表的關于臺灣歷史幾個特殊方面的材料。請參見陳青直（音）寫的第五章（“帝國的警察和社會控制系統”）；陳以德寫的第六章（“統一帝國的嘗試”）；塞繆爾·何保山（音）寫的第九章（“殖民主義與發展：韓國、臺灣和廣東”）；敏行溝口和有三山本寫的第十章（“臺灣和朝鮮資本的形成”）；以及拉蒙·H.邁爾斯和山田三郎寫的第十一章（“帝國的農業發展”）。一部開拓性的專著是帕特里夏·楚魯米寫的《日本在臺灣的殖民教育（1895—1945）》。

收錄了636條1945—1979年間出版的有關臺灣內容的文獻目錄，請參見1980年第3期《臺灣近代史研究》雜志。英文出版物請參見J.布魯斯·雅各布斯、瓊·哈格和安妮·塞奇利合編的《臺灣：一本包羅萬象的英文出版物文獻目錄》，布魯斯·雅各布斯為其寫了引言。

對1949年以來臺灣發展的研究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的研究相比較，成果要少得多，雖然臺灣大部分課題的研究資料更豐富，更容易得到。歐洲和日本學者很少有人對臺灣產生興趣，這個領域全由美國學者壟斷了。而且，美國學者的成果高度集中在美國對華政策因美國與臺灣的關系而造成的難題上。

研究臺灣的作品題目，除美一臺關系外，就是臺灣的經濟發展。由于經濟建設上的成功，臺灣被視為一個樣板，為了可能將其經濟政策應用到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人們對其進行研究。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約瑟夫·A.亞格爾寫的一份見識廣博的研究報告《臺灣的農業改造：農村建設聯合委員會的經驗》。1950—1979年間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不準進入中國大陸，他們只得去臺灣作實地考察，并發表了許多著作。70年代臺灣的詩歌、小說引起了比較文學學者越來越多的注意。比較而言，對臺灣軍事部門及政治演變的基礎性研究，就幾乎等于零了。另外一個被忽視的方面是自中華民國失去了在聯合國的席位，并與大多數國家斷交后臺灣對外關系的情況。

研究臺灣的重要原始資料來源，是臺灣當局和省政府各機構發表的數量眾多的出版物。最有用的刊物包括：《中國年鑒》（政府新聞署）；《統計年鑒》（預算、會計、統計總署）；以及《臺灣統計資料冊》（經濟計劃與發展委員會）。臺北國民黨總部也發表有關國民黨的資料。報紙很多，特別是《中央日報》（國民黨黨報）、《中國時報》（私營）以及《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在美國有中文版。政治刊物如《時報周刊》、《八十年代》、《深耕》以及《黃河》等，刊載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當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看法。由于作者不得不回避敏感的問題，如蔣經國的接班人問題、對北京的政策問題，政治分析發表以后還必須采訪臺灣消息靈通人士加以補充。無以數計的經濟、文學及其他專題的期刊，皆唾手可得。

美國對臺政策方面的原始資料有《美國對外關系》叢書的中國卷（現已出到1957年）、《中國白皮書》（1949年，斯坦福大學1968年以上下兩卷重新發表），以及每月一期的美國《國務院公報》。國會不時舉行對華政策聽證會，提供了很珍貴的材料，特別是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和眾議院對外事務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可資使用的回憶錄有：哈里·S.杜魯門的《面臨決策的一年》（1955年）、《考驗與希望的歲月》（1956年）；迪安·艾奇遜的《欣逢肇始》（1969年）；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受命變革（1953—1956）》（1963年）和《締造和平（1956—1961）》（1965年）；小阿瑟·M.施萊辛格的《一千天》（1965年）；西奧多·索倫森的《肯尼迪》（1965年）；以及羅杰·希爾斯曼的《推動一個國家》（1968年）。《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是不可缺少的資料來源。華盛頓特區國會季刊公司出版的《中國與美國的遠東政策（1945—1967）》（1967年）和《中國與美國的外交政策》（1973年）包括了美國對華、對臺政策的總結，使用非常方便。

香港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和《亞洲華爾街雜志》周刊經常刊登有關臺灣的文章。《遠東經濟評論年鑒》和《亞洲概覽》每年1月份和2月份發表的年度調查文章，皆對臺灣上一年的發展情況作一總結。《中國季刊》和《亞洲研究雜志》有時也刊載關于臺灣的文章。

《人民日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臺政策和對美國的臺灣政策發表看法的原始資料。最重要的社論和政府的政策聲明用英文登在《北京周報》上。華盛頓特區外國廣播信息處出版的《中國動態》則是最重要的英文資料，內有中國廣播內容的譯文。中國雜志如《世界知識》、《國際問題研究》等刊登關于臺灣和美國對臺政策的文章。北京辦的香港報紙，如《大公報》和《文匯報》亦是如此。

全面探討臺灣經濟、軍事、政治和外交關系史的書幾乎沒有幾本。最全面的要屬拉爾夫·N.克拉夫的《島國中國》（1978年）。丘宏達編的《中國與臺灣爭端》（1973年）以及《中國與臺灣問題》（1979年），包括了臺灣早期歷史、政治經濟發展的章節，并匯集了很有價值的文件。以上這三本書都特別強調了美—臺關系。詹姆斯·熊（音）等編的《臺灣經驗（1950—1980）》（1981年）摘錄了許多書和文章里的有關內容，涉及的面很廣，包括文化價值、教育、社會狀況，法律與正義，以及防務政策等問題。喬云萬（音）編的《臺灣的未來？》（1974年）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臺灣，而維克托·H.李編的《臺灣的本來》（1980年），包容了美國華人的一場辯論，對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的關系的看法五花八門。

關于美國對華政策中的美—臺關系書籍，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還有：福斯特·雷亞·杜勒斯的《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外交政策（1949—1969）》；羅斯·Y.凱恩的《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威廉·J.巴恩茲編的《中國與美國：尋求新的關系》：鮑大可的《對華政策：外匯決定》和《美國武器出售》；拉爾夫·N.克拉夫、羅伯特·P.奧克斯南和威廉·瓦茨合著的《美國與中國》；杰羅姆·科恩、愛德華·弗里德曼、哈羅德·欣頓和艾倫·S.惠廷合著的《臺灣與美國的政策》；理查德·穆爾斯廷和莫頓·阿布拉莫維茨合著的《重新制定對華政策》；前駐中華民國大使卡爾·L.蘭金的《在中國任職》；鄒讜的《金門紛爭：毛、蔣和杜勒斯》；拉蒙·H.邁爾斯主編的《兩個中國》；埃德溫·K.斯奈德、A.詹姆斯·格雷戈爾及瑪麗亞·張霞（音）合著的《與臺灣關系法和中華民國的防務》；羅伯特·L.唐恩的《重大的憂慮》；威廉·金特納與約翰·F.科帕合著的《兩個中國問題》。J.H.卡利基的《中美危機的模式》剖析了1954—1955年和1958年在沿海島嶼的對抗。

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分析，請參見尼爾·H.雅各比的《美國對臺灣的援助》；陳誠的《臺灣的土地改革》；沃爾特·蓋倫森編的《臺灣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約翰·C.H.費、古斯塔夫·蘭尼斯和雪莉·W.Y.郭合著的《公平發展》；楊懋春的《臺灣土地改革的社會經濟效益》；安東尼·Y.C.顧（音）的《土改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T.H.沈（音）編的《農業在發展戰略中的地位》；A.詹姆斯·格雷戈爾與瑪麗亞·張霞、安德魯·B.齊默爾曼合著的《意識形態與發展》；簡·S.普賴拜拉的《臺灣的財富、發展、穩定與公正的社會目標》；李國鼎的《臺灣經濟蓬勃發展的經驗》；雪莉·W.Y.郭的《過渡中的臺灣經濟》。同樣有興趣的是勞倫斯·J.勞（音）編的《發展模式》。

關于臺灣政治發展的主要著作是：喬治·H.克爾的《被出賣的福摩薩》；彭明敏的《自由的體驗》；道格拉斯·門德爾的《臺灣民族主義的政治》；馬黃（音）的《臺灣知識分子的騷動：要求實行政治改革（1971—1973）》；阿瑟·J.勒曼的《臺灣的政治》；J.布魯斯·雅各布斯的《在一個農村中國文化環境中的地方政治》。上面提到的丘宏達編的兩本書和薛光前的一部著作中也有臺灣政治發展的章節。最新的一個研究成果是約翰·F.科帕與喬治·P.陳的《臺灣的選舉》（1984年）。亦請參見《中國季刊》第99期（1984年9月）的臺灣專刊。

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包括：埃米莉·馬丁·艾亨和希爾·蓋茨編的《臺灣社會的人類學》；邁倫·L.科恩的《團結的屋子，分裂的屋子：臺灣的中國家庭》；伯納德·加林的《臺灣的新星：一個變化中的中國村莊》；沃爾夫岡·L.格里奇丁的《1970年臺灣的價值體系》；伯頓·帕斯特納克的《兩個中國村莊的親戚關系和社會》；理查德·W.威爾遜的《學做中國人》；理查德·W.威爾遜和艾米· A.威爾遜、西德尼·L.格林布拉特編的《中國社會的價值變化》；諾馬·戴蒙德的《昆沈：一個臺灣村莊》；以及托馬斯·B.戈爾德的最新成果《臺灣奇跡中的國家與社會》。

有關蔣介石的傳記，請參見董顯光的《蔣介石》；布賴恩·克羅澤的《丟掉中國的人》。

關于軍事能力，請參見斯圖爾特·E.約翰遜、約瑟夫·A.亞格爾的《東北亞的軍事平衡》和威廉·H.奧弗霍爾特的“東亞的核擴散”。

戴維·納爾遜·羅的《非正式外交關系》是臺灣被逐出聯合國后唯一探討臺灣的國際關系的專著。丘宏達與冷少珅合編的《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七十年》里有一章探討從1949年到1981年臺灣的國際關系。

臺灣的主要文學作品是：齊邦媛等編的《當代中國文學選集：臺灣（1949—1974）》（第一卷：詩歌和隨筆；第二卷：短篇小說）；維維安·蘇林（音）編的《同根生：現代中國婦女故事》；黃春明（音）（譯名為霍華德·戈德布拉特）的《一個墮落的壞女人及其他故事》；約瑟夫·S.M.勞和蒂莫西·A.羅斯編的《臺灣的中國小說（1960—1970）》；珍妮特·L.福洛特編的《臺灣的中國小說》，包括對臺灣主要作家的評價和臺灣小說的趨向。也可參見西里爾·伯奇在本書第11章中對臺灣新小說和新詩的討論。

# 參考書目

[1]Acheson，Dea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Norton，1987[1969].

迪安·艾奇遜：《欣逢肇始：我在國務院的歲月》

[2]Adie，W.A.C.“Chou En-lai on safari.”CQ，18（April-June 1964），174—194.

W.A.C.艾迪：“周恩來在出訪中”

[3]Adie，W.A.C.“China and the war in Vietnam.”Mizan，8.6（November-December 1966），233—241.

W.A.C.艾迪：“中國與越南的戰爭”

[4]Agence France Pressc.Press service.Paris.

法新社

[5]Ahern，Emily Martin，and Gates，Hill，eds.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埃米利·馬丁·艾亨、希爾·蓋茨編：《臺灣社會的人類學》

[6]Ahn，Byung-joon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dynamics of PolicyProcesses.Seattle：Universl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6.

安炳炯（音）：《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政策進程的動力》

[7]Ahn，Byung-joon，“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hina's search for political order.”CQ，58（April-June 1974），249—285.

安炳炯：“文化大革命和中國對政治秩序的尋求”

[8]Ahn，Byung-jo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eople's Commune in China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JAS，34.3（May 1975），631—658.

安炳炯：“中國的人民公社的政治經濟：變化與連續性”

[9]Ai Ch’ing.“Liao-chieh tso-chia，tsun-chung tso-ehia”（Undertstand writers，respect writers）.CFJP，11 March 1942.

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10]Albinski，Henry S.“Chinese and Soviet policies in the Vietnam crisis.”Australian Quarterly，40.1（March 1968），65—74.

亨利·S.阿爾賓斯基：《越南危機中中國和蘇聯的政策》

[11]Ambroz，Oton.Realignment of World power：the Russo—Chinese schism under the impact of Mao Tse-tung's last revoiution.2 vols.New York：Spelcer，1972.

奧頓·安布羅茲：《世界權力的改組》

[12]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See Gould，Sidney H.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Quarterly.Washington，D.C.：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06—.

美國科學促進會。參見西德尼·H.古爾德《美國政治學評論》

[13]An-hui wen-hsueh（Anhwei literature）.Monthly.Hofei：1979—.

《安徽文學》

[14]An Tai-sung.The Sino-Soviet territorial dispute.Philadelphia：Westminster Press，1973.

安泰順（音）：《中蘇領土爭端》

[15]An Tai-Sung，“The Sino-Soviet dispute and Vietnam.”Orbis，9.2（Summer 1965），426—436.

安泰順：《中蘇爭端與越南》

[16]Ando Hikotar.Peking，Tokyo：Kodansha International，1986.

安藤彥太郎：《北京》

[17]Ashbrook，Arthur G.，J r.“China：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in U.S.Congress[97th]，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1.99—118.

小阿瑟·G.阿什布魯克：“中國：經濟現代化和長期成績”

[18]Asia Quarterly：Journal from Europe.Quarterly.Bruxelles：Centre d’etude du Sud-Est asiatique et de 1’Extrême-Orient，Institut de Sociologie，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1970—S.upersedes Revue du Sud-Est asiatigue et de l’Extreme Orient.

《亞洲季刊》

[19]Asian Survey：a monthly review of contemporary Asian affairs.Monthly.

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16—.

《亞洲概覽》

[20]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Weekly.[Hong Kong]：Dow Jones，April 30，1979—.

《亞洲華爾街雜志》

[21]Aspaturian，Vernon D.“The USSR，the USA and China in the Seventies.”Survey，19.2（87）（Spring 1973），103—122.

弗農·D.阿斯帕圖里安：“70年代的蘇聯、美國和中國”

[22]Atlas.See World Press Review.

[23]Atlas World Press Review.See World Press Review.

[24]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The，Semi-annual.Canberra：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79—.

《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志》

[25]Australian Quarterly.Quarterly.Sydney：Australia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1929—.

《澳大利亞季刊》

[26]Aviation Week＆Space Technology.Weekly.New York：McGraw-Hill，1916—.

《航空和空間技術周刊》

[27]Badgley，John H.“Burma and China：policy of a small neighbor”，in A.M.Halpern，ed.，Policies toward China，303—328.

約翰·H.巴利奇：“緬甸與中國”

[28]Bady，Paul.“Death and he novel：on Lao She's‘suicide’”.Renditions，10（Autumn 1978），5—14.

保羅·巴迪：“死亡和小說：談老舍的自殺”

[29]Balassa，Bela，and Williamson，JohnA.djusting to success：balance of payments policies in the East Asian NICs.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7.

貝拉·巴拉薩、約翰·威廉森：《為成功而調整》

[30]Ballantine，Joseph W[illiam].Formosa：a Problem fo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52.

約瑟夫·巴蘭坦：《福摩薩：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問題》

[31]Banister，Judith，“Mortality，fertilty，and contraceptive use in Shanghai.”CQ，70（June 1977），254—295.

朱迪思·班尼斯特：“上海的人口死亡率、出生率和避孕措施”

[32]Barber，Noel.The fall of Shanghai.New York：Coward，McCann＆Geoghegan，1979.

諾埃爾·巴伯：《上海的陷落》

[33]Barclay，George W.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Port Washington.N.Y.：Kennikat Press，1972；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

喬治·W.巴克利：《殖民地的發展與臺灣的人口》

[34]Barnds，William J.，ed.The two Koreas in East Asian affairs.New York：U-niversity Press，1976.

威廉·J.巴恩茲：《東亞事務中的兩個朝鮮》

[35]Barnds，William J.，ed，China and America：the search for a new relationship.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7.

威廉·J.巴恩茲：《中國與美國：尋求一種新的關系》

[36]Barnes，A.C.See Kuo Mo-jo.

[37]Barnett，A.Doak.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New York：Praeger，1963.

鮑大可：《共產黨接管前夕的中國》

[38]Barnett，A.Doak.China Policy：old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

鮑大可：《中國的政策：老問題和新挑戰》

[39]Barnett，A.Doak.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

鮑大可：《中國與東亞的大國》

[40]Barnett，A.Doak.The FX decision：“another crucial moment”in U.S.C-hina-Taiwan relation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

鮑大可：《外匯決定》

[41]Barnett，A.Doak.China's economy in global perspective.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

鮑大可：《從全球角度看中國經濟》

[42]Barnett，A.Doak.U.S.arms sales：the China-Taiwan tangle.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2.

鮑大可：《美國的武器出售》

[43]Barnett，A.Doak.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structure and process.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5.

鮑大可：《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

[44]Barnett，A.Doak，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鮑大可編：《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治》

[45]Barnett，A，Doak，and Clough，Ralph N.，eds，Modernizing China：post-Mao reform and development.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6.

鮑大可、拉爾夫·N.克拉夫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

[46]Barnett，A.Doak，with Ezra Vogel.Cadres，bureaucracy，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

鮑大可、埃茲拉·沃格爾：《共產黨中國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權》

[47]Bastid，Marianne.“Level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in Stuart R.Schram，ed.，Authority，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159—197.

瑪麗安·巴斯蒂：“經濟決策的級別”

[48]Bastid，Marianne，“Economic necessity and political ideals in educational reform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Q，42（April-June 1970），16—45.

瑪麗安·巴斯蒂：“‘文化大革命’期間教育改革中的經濟需要和政治理想”

[49]Baum，Richard.Prelude to revolution：Mao，the Party，and the peasant qestion，1962—19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

理查德·鮑姆：《革命的序幕：毛、黨和農民問題（1962—1966）》

[50]Baum，Richard，ed.，China's four modernizations：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0.

理查德·鮑姆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

[51]Baum，Richard.“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anatomy of a limited rebellion”，in Thomas W.Robinson，ed.，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367—476.

理查德·鮑姆：“農村的‘文化大革命’：剖析一種有限造反”

[52]Baum，Ricbard.“Elite behavior under conditions of stress：the lesson of the‘Tang-ch’üan p’ai’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Robert A.Scalapino，ed.，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540—574.

理查德·鮑姆：“困難情況下的精英行為：‘文化大革命’中‘當權派’的教訓”

[53]Baum，Richard，“China：year of the mangoes.”Asian Survey，9.1（January 1969），1—17.

理查德·鮑姆：“中國：醋泡黃瓜的年代”

[54]Baum，Richard，ed.，with Louise B.Bennet，China in ferment：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1.

理查德·鮑姆和路易斯·B.貝內特編：《中國在騷動：“文化大革命”透視》

[55]Baum，Richard，and Teiwes，Frederick C.Ssu-ch’ing：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1966.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8.

理查德·鮑姆、弗雷德里克·C.泰維斯：《四清：1962—1966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56]BBC.Se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57]Bedeski，Robert E.The fragile entente：the 1978 Japan-China peace treaty in a global context.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3.

羅伯特·E.比德斯基：《脆弱的協定》

[58]Bei Dao.See McDougall，Bonnie S.

[59]Beijing Review.See Peking Review.

《北京周報》

[60]Bell，Carol.“Kore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Political Quarterly，25.1（January-March and April-June，1976）.

卡羅爾·貝爾：“朝鮮與均勢”

[61]Bennett，Gordon A.China's Eighth，Ninth，and Tenth Congresses，Constitutions，and Central Committees：an institutional overview and comparison.Occasional Paper，no.1.Austin：Center for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Texas.1978.

戈登·A.貝內特：《中國的第八、九、十屆黨代會、黨章和中央委員會》

[62]Bennett，Gordon A，and Montaperto，Ronald N.Red Guard：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ai.New York：Anchor Books，1972；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1.

戈登·A.貝內特、羅納德·N.蒙塔珀圖：《紅衛兵：戴小艾政治傳記》

[63]Berninghausen，John，and Huters，Ted，eds.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an anthology.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6.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wo special issues of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8.1 and 8.2（January-March and April-June，1976）.

約翰·伯寧豪森和特德·哈特爾斯編：《中國的革命文學：詩集》

[64]Bernstein，Richard.From the center of the earth：the search for the truth about China.Boston：Little，Brown，1982.

理查德·伯恩斯坦：《從世界的中央尋求關于中國的真相》

[65]Bernstein，Thomas P.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托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鄉：中國青年從城市走向農村》

[66]Binder，Leonard，et al.，contribs.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Studi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no.7.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倫納德·賓德等編：《政治發展中的危機及后果》

[67]Birch，Cyril，ed.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New York：Praeger，1962.Published as special issue of CQ，13（January-March 1963）.

西里爾·伯奇編：《中國的共產主義文學》

[68]Birch，Cyril.“Fiction of the Yenan period.”CQ，4（October-December 1960），1—11.

西里爾·伯奇：“延安時期的小說”

[69]Blecher，Marc J.，and White，GordonM.icro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a technical unit during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9.

馬克·J.布萊克爾和戈登·懷特：《當代中國的微型政治》

[70]Boardman，Robert.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4.New York：Macmillan，1976.

羅伯特·博德曼：《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74）》

[71]Bodde，Derk.Peking diary：a year of revolution.Greenwich，Conn.：Fawcett Publications，1967.New York：Henry Schuman，1950.

德克·博德：《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

[72]Bonavia，David.The Chinese：a portrait.Harmondsworth：Penguin，1982；London：Allen Lane，1981.

戴維·邦納維亞：《中國人》

[73]Bonavia，David.Verdict in Peking：the trial of the Gang of Four.New York：Putnam；London：Burnett Books，1984.

戴維·邦納維亞：《北京裁決：審判“四人幫”》

[74]Borisov，O.B.Vnutrenniaia i vneshniaia politika Kitaia v 70—e god y（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 of China in the seventies）.Moscow：Politizdat，1982.

O.B.鮑里索夫：《七十年代中國的內外政策》

[75]Borisov，O.B.，and Koloskov，B.T.Sovet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1945—1970：Kratkii ocherk（Soviet-Chinese relations 1945—1970：a brief sketch）.Moscow：Mysl’，1972.

O.B.鮑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蘇中關系概述（1945—1970）》

[76]Borisov，O.B.[Rakhmanin，Oleg B.]，and Koloskov，B.T.[Kulik，S].Ed.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by Vladimir Petrov.Soviet-Chinese relations，1945—1970.Bloomington：Indiana Uiversety Press，1975.

O.B.鮑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蘇中關系（1945—1970）》

[77]Borisov，O.B.，and Koloskov，B.T.Sino-Soviet relations 1945—1973：a brief history.Trans.from the Russian by Yuri Shirokov.Moscow：Progress，1975.

O.B.鮑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中蘇關系簡史（1945—1973）》

[78]BR.Beijing Review

《北京周報》

[79]Bradsher，Henry，“The Sovietization of Mongolia.Foreign Affairs，5.3（July 1972），545—553.”

亨利·布雷德舍：“蒙古的蘇聯化”

[80]Breese，Gerald，ed.The city in newly developing countries：readings on urbanism and urbanization.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9.

杰拉爾德·布里斯編：《新的發展中國家的城市》

[81]Bridgham，Philip.“Mao's Cultural Revolution；origin and development.”CQ，29（January-March 1967），1—35.

菲利普·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起源和發展”

[82]Bridgham，Philip，“Mao's Cultural Revolution：the struggle to seize power.”CQ，34（April-June 1968），6—37.

菲利普·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奪權斗爭”

[83]Bridgham，Philip.“Mao's Cultural Revolution：the struggle to consolidate power.”CQ，41（January-March 1970），1—25.

菲利普·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鞏固權力的斗爭”

[84]Bridgham，Philip.“The fall of Lin Piao.”CQ，55（July-September 1973），427—429.

菲利普·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滅”

[85]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Part 3.The Far East.Caversham Park，Reading：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1966—C.ited as SWB.

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

[86]Brown，Jessiea，et al.Sino-Soviet conflict：a historical bibliography.ABC Clio Research Guides：13.Santa Barbara，Calif：ABC-Clio Information Services，1985.

杰西卡·布朗等編：《中蘇沖突》

[87]Broyelle，Claudie；Broyelle，Jacques；and Tschirhart，Evelyne.China：a second look.Trans.by Sarah Matthews.Brighton：Harvester Press；Atlantic Highlands N.J.：Humanities Press，1980.

克勞迪·布羅耶利、杰奎斯·布羅耶利及伊夫林·奇爾哈特：《重新看中國》

[88]Brzezinski，Zbigniew.Power and principle.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83.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權力與原則》

[89]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Quarterly.Boulder，Colo.：1969—.Continues CCAS Newsletter.

《亞洲學者簡報》

[90]Bulletin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oe's Republic of China.See Chung hua jen-min kung-ho-Kno Kuo-wu-yuan Kung-pao.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

[91]Bullock，Mary Brown.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瑪麗·布朗·布洛克：《美國的移植：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北京醫學院》

[92]Burki，Shahid Javed，A study of Chinese communes，1965.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9.

沙義德·賈弗特·伯基：《中國公社研究》

[93]Buriatsky，Fedor.Mao Tse-tung；an ide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ortrait.Moscow：Progress，1980

費德爾·勃拉茨基：《毛澤東：一幅意識形態和心理的肖像》

[94]Burns，John P.，and Rosen，Stanley，eds.Policy conflicts in post-Mao China：a documentary survey with analysis.Armonk，N.Y.：M.E.Sharpe，1986.

約翰·P.伯恩斯和斯坦利·羅森編：《毛以后中國的政策沖突》

[95]Burton，Barry.“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ultraleft conspiracy：the‘May 16 Group.’”Asian Survey，11.11（November 1971），1029—1053.

巴里·伯頓：“‘文化大革命’的極‘左’陰謀：‘五一六兵團’”

[96]Butterfield，Fox.China：alive in the bitter sea.New York：Bantam Books，1983；New York：Times Book，1982.

福克斯·巴特菲爾德：《中國：在苦海中生存》

[97]Byrd，William，et al.Recent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studies of two industrial enterprises.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s，no.652.Washington，D.C.：World Bank，1984.

威廉·伯德等編：《中國近期經濟改革：對兩個工業企業的研究》

[98]Byrd，William，and Lin Qingsong，eds.China's rural industry：structure，development，and refor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for the World Bank，1990.

威廉·伯德和林青松編：《中國的鄉鎮企業：結構、發展和改革》

[99]Byrd，William，and Tidrick，Gene.“Factor allocation in Chinese industry.”[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Chinese enterprise management，Peking，August 1985.]

威廉·伯德、吉恩·蒂德里克：“中國工業中的部門配置”

[100]Cail，Odile.Peking.New York；Mckay，1972.[Fodor's Peking，Eugene Fodor，ed.]

奧代爾·凱爾：《北京》

[101]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The（CHOC）.Vol.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 B.C.-AD..220，ed.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1986）.Vol.3.Sui and T’ang China，589—906，Part Ⅰ.ed.Denis Twitchett（1979）.Vol.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art Ⅰ.ed.Frederick W.Mote and Denis Twitchett（1988）.Vol.10.Late Ch’ing 1800—1911，Part Ⅰ，ed.John K.Fairbank（1978）.Vol.11.Late Ch’ing 1800—1911，Part 2，ed.John K.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1980）.Vol.12.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Part Ⅰ，ed.John K.Fairbank（1983）.Vol.13 Republica China 1912-1949，Part 2，ed.John K.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1986）.Vol.14.The People's Republic，Part 1：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ed.Roderik MacFarquhar and John K.Fairbank（198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劍橋中國史》。第1卷《秦漢帝國，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丹尼斯·特威切特和邁克爾·洛伊編；第3卷《中國隋唐，589—906年》上，丹尼斯·特威切特編；第7卷《明朝，1368—1644年》上，弗雷德里克·W.莫特和丹尼斯·特威切特編；第10卷《晚清，1800—1911年》上，費正清編；第11卷《晚清，1800—1911年》下，費正清和劉廣京編；第12卷《中華民國，1912—1949年》上，費正清編；第13卷《中華民國，1912—1949年》下，費正清和費維愷編；第14卷《中華人民共和國，上：革命的中國的興起》，J.R.麥克法夸爾和費正清編

[102]Cameron，James.Mandarin red：a journey behind the“Bamboo Curtain”.London：Michael Joseph，1955.

詹姆斯·卡梅倫：《紅衣官員：“竹幕”里的一次旅行》

[103]Cameron，Nigel，and Brake，Brian.Peking：a tale of three cities.Foreword by L.Carrington Goodrich.New York：Harper＆Row，1965.

奈杰爾·卡梅倫和布萊恩·布雷克：《北京：三個城市的故事》

[104]Camilleri，Joseph.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Maoist era and its aftermath.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0.

約瑟夫·卡米萊里：《中國的外交政策：毛主義時代及其后果》

[105]CAR.China Area Report.See JPRS，China Area Report（CAR）.

《中國地區報告》

[106]Carrère d’Encausse，Helène，and Schram，Stuart R.，comps.Marxism and Asia：an introduction with readings.London：Allen Lane，Penguin Press，1969.

卡雷勒·德昂科斯和S.施拉姆編：《馬克思主義與亞洲》

[107]Catalogue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held by URI.See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聯合研究所所藏紅衛兵出版物目錄》

[108]CB.See U.S.Consulate General.Hong Kong.Current Background.

見美國香港總領事館《當代背景材料》

[109]CCP.Chinese Communist Party.Chung-kuo kung-ch’an-tang.

中國共產黨

[110]CCP CC Documentary Research Office.Chung-kung chung-yang wen-hsien yen-chiu-shih.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11]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67.See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

[112]CCP Research Newsletter.3/yr.Colorado Springs，Colo.：Chinese Communism Research Group，1988—.

《中國共產黨研究通訊》

[113]CDSP.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當代蘇聯報刊文摘》

[114]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See Hua-chung shih-fan tahsueb hsueh-pao.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

[115]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See United State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中央情報局

[116]CFJP.Chieh-fang jih-pao.

《解放日報》

[117]Chan，Anita.Children of Mao：a study of politically active Chinese youths.London：Macmilla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5，With subtitl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安妮塔·詹：《毛的孩子們》

[118]Chan，Anita.“Images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the changing perspectives of Canton students.”World Politics，34.3（April 1982），295—323.

安妮塔·詹：“中國社會結構的反映：廣州學生的變化中的看法”

[119]Chan，Anita；Madsen，Richard；and Unger，Jonathan.Chen Village：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安妮塔·詹、理查德·馬德森、喬納森·昂格爾：《陳村：毛的中國的一個農村集體的近代史》

[120]Chan，Anita；Rosen，Stanley；and Unger，Jonathan，eds.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the Li Yizhe debates.Armonk，N.Y.：M.E.Sharpe，1985.

安妮塔·詹、斯坦利·羅森和喬納森·昂格爾編：《論社會主義民主和中國的法律體系》

[121]Chan，Anita；Rosen，Stanley；and Unger，Jonathan.“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CQ，83（September 1980），397—446.

安妮塔·詹、斯坦利·羅森、喬納森·昂格爾：“學生與階級斗爭：廣州紅衛兵沖突的社會根源”

[122]Chan Kam Wing and Xu Xueqiang.“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1949：reconstructing a baseline.”CQ，104（December 1985），583—613.

詹卡翁（音）、徐學強（音）：《1949年以來中國城市人口增長和城市化》

[123]Chanda，Nayan.Brother enemy：the war after the war.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6.

納嚴·詹達：《兄弟仇敵：戰爭之后的戰爭》

[124]Chang Ch’un-ch’iao.“P’o-ch’au tzu-ch’an-chieh-chi ti fac-h’uan ssu-hsiang”（Eliminate the ideology of bourgeois，right）.JMJP，13 October 1958.

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

[125]Chang Ch’un-ch’iao.“On exercising all-round dictatorship over the bourgeoisie”，in Raymond Lotta，ed.，And Mao makes 5，209—220.

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126]Chang Chung et al.Tang-tai wen-hsueh kai-kuan（Surve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Pek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80.

張鐘等編：《當代文學概觀》

[127]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Intro.by Franz Michael.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

張中禮：《中國的紳士：關于他們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的作用的研究》

[128]Chang Ming-yang.“An analysis of Lin Piao and the‘Gang of Four's’ultraleft foreign policy line.”Fu-tan hsueh-pao（Fudan journal），2（March 1980），in JPRS 76141 China RePort，103（30 July 1980），40—51.

張明養：“林彪和‘四人幫’極‘左’外交路線剖析”

[129]Chang Pao-minB.eijing，Hanoi，and the Overseas Chinese.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2.

張保民：《北京、河內和華僑》

[130]Chang Pao-min.Kampuchea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5.

張保民：《處在中國和越南之間的柬埔寨》

[131]Chang，Parris H.Radicals and radical ideology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Research Institute on Communist Affairs，School of Inter national Affairs，Columbia University，1973.

帕里斯·張：《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激進分子和激進思想》

[132]Chang，Parris H.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revised and enlarged ed.，1978.

帕里斯·張：《中國的權力和政策》

[133]Chang，Parris H.“Provincial Party leaders'strategies for survival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Robert A.Scalapino，ed.，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501—539.

帕里斯·張：“省級黨的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存策略”

[134]Chang Tse-hou and Ch’en Yü-kuang.“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Chung-kuo she-hui k’o-hsueh，4（1981），29—46.

張澤厚、陳玉光：“試論我國人口結構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關系”

[135][Chang Wen-t’ien].Chang Wen-t’ien hsuan-chi（Selected works of Chang Wen-t’ien）.Peking：Jen-min，1985.

《張聞天選集》

[136]Chang Wen-t’ien.“Lu-shan hui-i shang ti fa-yen”（Intervention at Lu—shan），in Chang Wen-t’ien hsuan-chi，480-506.

張聞天：“廬山會議上的發言”

[137]Chang Yü-feng.“Anecdotes of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in their later years.”kuang-ming jih-pao，26 December 1988—6 January 1989，trans.in FBIS DailyReport：China，27 January 1989，16—19 and 31 January 1989，30—37.

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

[138]Chang Yun-sheng.Mao-chia-wan chi-shih：Lin Piao mi-shu hui-i-Lu（An on-the-spot report on Mao-chia-wan；the memoirs of Lin Piao's secretary）.Peking：Ch’un-ch’iu，1988.

張云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

[139]Ch’ang-chiang Wen-i（Yangtze literature and art）.Monthly.Wuhan：1978—.

《長江文藝》

[140]Chao-chia-pang ti pien-ch’ien（The transformation of Chao-chia-pang）.Editorial.Group.Shanghai：Shanghai Jen-min，1976.

《肇家浜的變遷》

[141]Chao Shu-li.Li yu-ts’ai pan-hua（The ballads of Li Yu-ts’ai）.Peking：Chung-kuo jen-min wen-i ts’ung-shu，1949.

趙樹理：《李有才板話》

[142]Chao Ts’ung.Chung-kuo ta-lu ti hsi-chü kai-ko（The reform of drama in mainland China）.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69.

趙聰：《中國大陸的戲劇改革》

[143]Chao Ts’ung.“1958 nien-ti Chung-Kung wen-i”（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 and art，1958）.Tsu-kuo chou-k’an，26.9—10（June1959），43—46.

趙聰：“1958年的中共文藝”

[144]Chao Tzu-yang[Zhao Ziyang]，“Advance alo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report delivered at the 13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October 25，1987”，Beijing Review，30.45（9-15 November 1987），Ⅰ-ⅩⅩⅦ.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1—987年10月25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145]Che-hsueh yen-chiu（Philosophical research）.Peking：1956—.

《哲學研究》

[146]Cheek，Timothy.See MacFarguhar，Roderick.

[147]Chen，C.S.，ed.Rural people's communes in Lien—chiang：documents concerning communes in Lien-chiang county，Fukien province，1962-1963，Trans.Charles Price Ridley.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69.

C.S.陳：《連江縣的農村人民公社》

[148]Chen Cheng[Ch’en Ch’eng]Land reform in Taiwan.Taipei：China Publishing Co.，1961.

陳誠：《臺灣的土地改革》

[149]Chen，Ching-chih.“Police and community control systems in the empire”，in Ramon H.Myers and Mark R.Peattie，eds.，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213—239.

陳青直（音）：《帝國時期的警察和社會控制系統》

[150]Chen，Edward I-te.“The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 empire：legal perspectives”，in Ramon H.Myers and Mark R.Peattie，eds.，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270—274.

陳以德：《統一帝國的嘗試》

[151]Chen，Jack.A year in Upper Felicity：life in a Chinese villag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Macmillan；London：Coullier Macmillan，1973.

杰克·陳：《在上福村的一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一個中國鄉村的生活》

[152]Chen Jo-hsi.See also Chen Ruoxi.

[153]Chen Jo-hsi.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Trans.Nancy Ing and Howard Goldblatt.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

陳若曦：《尹縣長的處死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故事》

[154]Chen，King C.，ed.China and the three worlds-a foreign policy reader.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4.

陳慶編：《中國和三個世界》

[155]Chen，King C.China's war with Vietnam，1979：issues，decisions，and implications.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7.

陳慶：《中越戰爭（1979）》

[156]Chen，King C.“Hanoi vs.Peking：policies and relations—a survey.”Asian Survey，12.9（September 1972），807—817.

陳慶：《河內與北京：政策和關系管窺》

[157]Chen Ruoxi.“Democracy Wall and the unofficial journals.”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no.20.Berkeley，Calif.：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2.

陳若曦：“民主墻與地下刊物”

[158]Chen，S.H.“Metaphor and the conscious in Chinese poetry”，in Cyril Birch，ed.，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39—59.

陳世襄：“中國詩歌中的隱喻與意識”

[159]Chen，Theodore Hsi-en.The Maoist educational revolution.New York：Praeger，1947.

陳錫恩：《毛主義的教育革命》

[160]Chen，Theodore Hsi-en，Chinese education since 1949：academic and revolutionary models，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1.

陳錫恩：《1949年以來的中國教育》

[161]Chen Yun.See Ch’en Yun

[162]Ch’en，Jerome，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

[163]Ch’en，Jerome，ed.Mao.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9.

陳志讓編：《毛澤東》

[164]Ch’en，Jerome，ed.Mao papers：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陳志讓編：《毛澤東的文章與書目》

[165]Ch’en Pei-ouJ.en-min hsueh-hsi tz’u-tien（People's study dictionary）2nd ed.，Shanghai：Kuang-i shu-chü，1953.

陳北鷗：《人民學習辭典》

[166]Ch’en Tsai-tao，“Wu-han‘ch’i-erh-ling shih-chien'shih-mo”（The begining and end of the“July 20th incident”in Wuhan）.Ko-ming-shih tzu-Liao，2（September 1981），7—45.

陳再道：“武漢‘七·二○事件’始末”

[167]Ch’en Yue-fang；Chang Pai-chuan；and Yu Tuan-k’ang.“A surve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 aspirations and learning interests.”Trans.in C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gy，16.1—2（Fall—Winter 1983—1984），145—158.

陳月芳、張百川、余團康：“小學生的志愿和學習興趣一覽”

[168][Ch’en Yun]Ch’en Yunw en-hsuan（1956—1985）（Selected works of Ch’en Yun）.Peking：Jen-min，1986.

《陳云文選》

[169]Chen Yun[Ch’en Yun].Speech，in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2.157—176.

陳云：《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170]Chen Yun[Ch’en Yun].“Planning and the market.”Beijing Review，29.29（21 July 1986），14—15.

陳云：“計劃與市場問題”

[171]Chen ry，Hollis，and Syrquin，Moises，with the assistance of Hazel Elkington.Patternso f development，1950—197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for the World Bank，1975.

霍利斯·切納里、莫伊塞斯·賽爾昆：《發展模式（1950—1970）》

[172]Cheng，J.Chester，ed.，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ch’ing-Lien Han et al.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Red Army：a translation of the Bulletin of Activiti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66.

J.切靳特·鄭（音）等編：《中國紅軍的政治》

[173]Cheng-ming（Contention）.Monthly.Hong Kong：1977—.

《爭鳴》

[174]Cheng，Nien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New York：Grove Press，1987；London：Grafton Books，1986.

鄭念：《上海生死劫》

[175]Cheng Te-jung et al.，eds.Hsin chung-kuo chi-shih，1949—1989（Records of the new China）.Changchun：Tung-pei shih-fan ta-hsueh，1986.

《新中國記事》

[176]Ch’eng shih chien-she（Urban construction）.Bimonthly.Peking：1980—.

《城市建設》

[177]Cheo Ying，Esther.Black country girl in red China.London：Hutchinson，1980.

埃斯特·切·英：《紅色中國鄉下的灰姑娘》

[178]Chi Hsin.The case of th Gang of Four.Hong Kong：Cosmos Books，1977.

齊辛：《“四人幫”案件》

[179]Ch’i Pang-Yuan et al.，eds.and comps.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Taiwan：1949—1974.2 vols.Taipei：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1975.

齊邦媛等：《臺灣中國當代文學選集（1949—1974）》

[180]Ch’i Pang-yuan et al.，eds.Chung-kuo hsien-tai wen-hsueh-chi（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2 vols.Taipei：Shu-p’ing shumu，1976.

齊邦媛等：《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181]Ch’i Pang-yuan et al.，eds.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Taiwan，1949—1974.Vol.1：Poems and essays.Vol.2：short stori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7.

齊邦媛等：《臺灣中國現代文學選集（1949—1974）》第1卷，詩歌和散文；第2卷，短篇小說

[182]Ch’is-hih nien-tai（The seventies）.Monthly.Hong Kong：1970—1983.From 1984，title changed to chiu-shih nien-tai（The nineties）.

《七十年代》。從1984年起改為《九十年代》

[183]Chiag ch’ing.“On the revolution in Peking opera：speech made in July 1964 at a forum of theatrical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Festival of Peking Operas on Contemporary Themes.”Chinese Literature，8（August 1967），118—124.

江青：“談京劇革命”

[184]Chiang Yi-shan.“Military affairs of communist China，1968.”Tsu-kuo，59（February 1960），20—36.

江一山：“共產黨中國的軍事事務（1968）”

[185]Chiao-hsueh ts’an-k’ao：ch’üan-kuo tang-hsiao hsi-t’ung Chung-kung tangshih hsueh-shu t’ao-lun-hui，shang，hsia（Reference for teaching and study：national party school system's academic conference on CCP history，vols.1 and 2）.Anhwei：December 1980.Cited as Chiao-hsueh ts’an-k’ao，hsia.

《教學參考：全國黨校系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上、下）

[186]Chiao-hsueh t’ung-hsun（Teaching bulletin）.Various sources and editions.

《教學通訊》

[187]Chiao-hsueh Yü yen-chiu（Teaching and research）.Monthly.Peking：1953—.

《教學與研究》

[188]Chiao-shih pao（Teachers’news）.Formerly shan-hsi chino-yü pao（Shensi education news）.Weekly.Sian：1984—.

《教師報》，原名《陜西教育報》

[189]Chiao-yü ko-ming（Education revoiution）.Monthly.Canton：Kwangtung Normal College，1972—1976.

《教育革命》

[190]Chiao-yü li-lun yü shih-chien（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Bimonthly.Taiyuan：1981.

《教育理論與實踐》

[191]Chiao-yü shih-chien（Education practice）.Monthly.Shanghai：1975—1976.

《教育實踐》

[192]Chiao-yü wen-chai（Education extracts）.Fortnightly.Peking：1984—.

《教育文摘》

[193]Chiao-yü yen-chiu（Education research）.Monthly.Peking：1979—.

《教育研究》

[194]Chiao-yü yü chih-yeh（Education and occupation）.Bimonthly.Peking：1917—1949；1985—.

《教育與職業》

[195]Ch’iao Huan-t’ien[Qiao Huantian].“A discussion of Li Hung-chang's Westernization activities.”JMJP，30 March 1981，in FBIS Dally Report：China，3 April 1981，K8—12.

喬還田：“有關李鴻章洋務活動的討論情況”

[196]Ch’iao Huant-’ien.“The diplomatic activlties of the Westernization propo—nents should not be cut off from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JMJP，7 May 1981，in FBIS Daily Report：China，.15 May 1981，K4—7.

喬還田：“不應把洋務派的外交活動從洋務運動中抽出去”

[197]Chieh-fang-chün Pao（Liberation daily）.1956—.

《解放軍報》

[198]Chien-fang jih-pao（Liberation daily）.Yenan1.949-1946.Shanghai.1949—C.ited as CFJP.

《解放日報》

[199]Chien-chu hsueh—pao（Architectural journal）.Monthly.Peking：1954—.

《建筑學報》

[200]Chien-kuo i-la i…See Mao Tse-tung.

[201]Chien Yu-shen.China's fading revolution：array dissent and military divi sions，1967—1968.Hong Kong：Cent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1969.

錢玉生（音）：《衰退的中國革命：軍隊中的不同意見與軍隊的分化（1967—1968）》

[202]Chien-ko wan-ch’ü hsien-kei tang（A myriad of songs and poems devoted to the Party）.Shanghai：Jen-min，1971.

《千歌萬曲獻給黨》

[203]Chih-shih-fen-tzu（The Chinese intellectual）.New York：1984—1988，1989—.

《知識分子》

[204]Chin Chin-pai.“P’i-K’ung yü lu-hsien tou-cheng”（Criticism of Confu cius and two-line struggle）.HC，7（1974），23-34.Trans.in PR，32（1974），6 一10，12，and 33（1974），8—12.

靳志柏：“批孔與路線斗爭”

[205]Chin Ching-mai.Ou-yang Hai chih ko（The Song of Ouyang Hai）.Peking；Chieh-fang-chün wen-i-she，1965.

金敬邁：《歐陽海之歌》

[206]Chin Ch’un-ming，“Wen-hua to-ko-ming”Lun-hsi（An analysis of the“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Shanghai：Jen-min，1985.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

[207]Chin Chu’n-ming，“‘Wen-hua ta-ko-ming’ti shih-nien”（The decade of the“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in Chung-kung tang-shih yen-chin-hui，ed.，Hsueh-hsi li-shih chueh-i chuan-chi，144—169.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208]Chin，Steve S.K.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forma nd content.Hong Kong：Centre of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9.[Preface to Chinese edition dated 1976.]

史蒂夫·S.K.金：《毛澤東思想：形式和內容》

[209]China（CAR）.See JPRS.

[210]China briefing.Annual，New York：China Council of the Asia Society，1980—.

《中國簡報》

[211]China Business Review，The.Bimonthly，Washington，D.C.：National Council on U.S.-China Trade[name changed to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1974—.

《中國貿易評論》

[212]China children's News.See Chung-kuo shao-nien pao.

《中國少年報》

[213]China Daily，Peking：1981—.[Printed and distributed in Peking，Hong Kong，New York，et al.]

《中國日報》

[214]China Education News.See Chung-kuo chiao-yü pao.

《中國教育報》

[215]China Mainland Review，TheQ.uarterly.Hong Kong：Institute of Modern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65—1967.

《中國大陸評論》

[216]China News Analysis.Fortnightly.Hong Kong：1953—1982；1984—.[1953—1982 published by Fr.Ladany.]

《中國新聞分析》

[217]China News Summary.Hong Kong：British Regional Information Office.

《中國新聞概要》

[218]China Newsletter.Bimonthly：Tokyo：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JETRO），1975—.

《中國通訊》

[219]China Quarterly，The.Quarertly.London：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Paris），1960—1968，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68—.

《中國季刊》

[220]China / Red Flag（CRF）.See JPRS.

《紅旗》

[221]China Report.Quarterly since 1986（formerly bimonthly）.（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India）.Newbury Park，Calif.：Sage，1964—.

《中國報告》

[222]China：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See World Bank.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

[223]China/State Counil Bulletin（CSB）.Cited as CSB.See JPRS.

《中國/國務院公報》

[224]China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 Center.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Annual.

《中國統計年鑒》

[225]China Topics.Hong Kong：British Regional Information Office，1964—.[London：np..，“Y.B”[T.B.]，1961—Irregular].

《中國問題》

[226]China Yearbook.Annual.1957—1979.compiled by the China Yearbook Edi-torial Board.Taipei：China Publishing Company.Continues China Handbook 1937—1945.New York：Macmillan.continued by Republic of China 1983—.

《中國年鑒》

[227]China Youth News.See Chung-kuo ch’ing-nien pao.

《中國青年報》

[228]Chinese Agricultural Yearbook.See Chung-kuo nung-yeh nien-chien...

《中國農業年鑒》

[229]Chinese Agricultural Yearbook Compilation Commission.See Chung-kuo nung-yeh nien-chien.

中國農業年鑒編委會，見《中國農業年鑒》

[230]Chinese Communist Affairs：a quarterly review.Quarterly.Taipei：Institute of Political Research，1964—1969.

《中共事務評論季刊》

[231]Chinese Communist inter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reviewso n.Reference materials concerning education.Taipei：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74.

《中共內部政治和外交政策評論》

[232]Chinese Economic Studies，Armonk，N，Y.：M.E.Shape Quarterly，1967—.

《中國經濟研究》

[233]Chinese Economic.System Reform Research Institute.See Reynolds，Bruce，ed.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234]Chinese economic yearbook.See Chung-kuo ching-chi nien-chien.

《中國經濟年鑒》

[235]Chinese Education：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Quarterly Armonk，N.Y.：M.E.Sharpe，1968—.[Before 1977 published by IASP.]

《中國教育譯叢》

[236]Chinese Higher Education：See Chung-kuo kao-teng chiao-yü.

《中國高等教育》

[237]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Quarterly Ar- monk，N.Y.：M.E.Sharpe，Cited as CLG.1968—.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

[238]Chinese Literature.Monthly.Peking：FLP，1951—.

《中國文學》

[239]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Quarterly.Armonk，N.Y.：M.E.Sharpe，1968—.

《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

[240]Chinese statistical yearbook.See Chung-kuo t’ung-chi nien-chien，Cited as TCNC.

《中國統計年鑒》

[241]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Quarterly.Armonk，N.Y.：M.E.Sharpe，1967—.[Formerl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中國歷史研究譯叢》（原名《中國歷史和哲學研究》）

[242]Ching-chi kuan-li（Economic management）.Monthly.Peking：1979—.

《經濟管理》

[243]“Ching-chung ch’iao-hsiang hao”（An alarm has been sounded）.Observer.JMJP，15 January 1980，6.

“警鐘敲響了”

[244]Chinnery，John，“Lu Xu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CQ，91（September 1982），411—423.

約翰·欽納里：“魯迅與當代中國文學”

[245]Chiu，Hungdah，ed.，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documents and analysis.New York：Praeger，1973.

丘宏達編：《中國和臺灣問題：文件和分析》

[246]Chiu，Hungdah，ed.，China and the Taiwan issue.New York：Praeger，1979.

丘宏達編：《中國和臺灣問題》

[247]Chiu，Hungdah，ed.，with Leng，Shao-chuan.China：seventy years after the 1911 Hsin-Hai Revolution.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84.

丘宏達、冷紹佺編：《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70年》

[248]Chiu-shih nien-tai.See Ch’i-shih nien-tai.

《九十年代》

[249]Ch’iu Chih-cho.“Teng Hsiao-p’ing tsai 1969—1972”（Teng Hsiao-p’ing in 1969—1972）.Hsin-hua wen-chaff，4（April 1988），133—155.

裘之倬：“鄧小平在1969—1972年”

[250]CHOC.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The.

《劍橋中國史》

[251]Chou En-lai hsuanc-hi，hsia（The selected works of Chou En-lai，2）.Peking：Jen-min，1984.

《周恩來選集》（下）

[252]Chou En-lai shu-hsin hsuan-chi（Chou En-lai's selected letters）.Peking：Chung-yang wen-hsien，1988.

《周恩來書信選集》

[253]Chou En-lai.See Chou tsung-li…

[254][Chou En-lai].“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strongly condemn Soviet revisionist clique's armed occupation of Czechoslovakia.”PR，supplement to 34（23 August 1968.）Ⅲ—Ⅳ.

周恩來：“中國政府和人民強烈譴責蘇修叛徒集團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255]Chou En-lai.“Report to the T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delivered 24 August 1973）.PR，35 and 36（7 September 1973），17—25.

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256]Chou En-lai.“Internal report to the Party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in King C.Chen，ed.，China and the three worlds，137—138.

周恩來：“關于國際形勢的黨內報告”

[257]Chou Ern-fu.Hsin-ti ch’i-tien（A new start）.Peking：Ch’ün-i 1949.

周而復：《新的起點》

[258]Chou，Eric.A man must choose，New York：Knopf，1963.

埃里克·周：《男人必須選擇》

[259]Chou Ming，ed.Li-shin tsai che-li ch’en-ssu：1966-1976 nien chi-shih（History is reflected here：a record of the year 1966—1976）.vols.1-3：Peking.Hua-hsia，1986；vols.4—6：T’ai-yuan：Pei-yueh，1989.

周明編：《歷史在這里沉思：1966—1976年紀實》

[260]Chou Shu-lien，and Lin Shen-mu.“T’an-t’an chu-chai wen-t’i”（Chatting on the housing problem）.JMJP，5 August 1980，5.

周淑蓮和林森木：“談談住宅問題”

[261]Chou tsung-li sheng-p’ing ta-shih-chi（Major events in the life of Premier Chou）.Chengtu：Szechwan Jen-min，1986.

《周總理生平大事記》

[262]Chou Yang.Piao-hsien hsin-ti chun-Chung ti shih-tai（Expressing the new age of the masses）.Peking：Hsin-kua shu-tien，1949.

周揚：《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

[263]Chou Yang.The path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in China.Peking：FLP，1960.

周揚：《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

[264]Chou Yang.“Hsin ti jen-min ti wen-i”（The people's new literature and art），in Chung-hua ch’uan-kuo wen-hsueh i-shu kung-tso che tai-piao tahui chi-nien wen-chi，69-99.

周揚：“新的人民文藝”

[265]Chou Yang.“Wen-i chan-hsien ti i-ch’ang ta pien-Lun”（A great debate on the literary front）.Wen-ipao，5（1958），2—14.

周揚：“文藝戰線的一場大辯論”

[266]Chou Yang.“Wo kuo she-hui chu-i wen-hsueh i-shu ti tao-lu”Wen-i pao，13—14（1960），15—37.Trans.as Chou Yang，The path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周揚：“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

[267]Chou Yang.“The fighting task confronting workers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Speech at the fourth enlarged session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c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ld 26 October 1963）.PR，Ⅰ（3 January 1964），10—27.

周揚：“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面臨的戰斗任務”

[268]Chou Yang.“Chi wang k’ai lai，fan-jung she-hui chu-i hsin shih-ch’i ti weni”（Inherit the past and usher in the future prosperity of the literature and art of the new socialist age）.Wen-ipao，11-12（1979），8—26.

周揚：“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

[269]Chou Yang.“Yeh t’an-t’an tang ho wen-i ti kuanh-si”（Speaking agai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literature and the arts）.HC，11（1979），26—29.

周揚：“也談談黨和文藝的關系”

[270][Chou Yang].“Zhou Yang on reality in literature and other questions”，[Interview with Zhou Yang.]Chinese Literature，1980，1（January），92—96.

周揚：“周揚談文學和其他問題中的現實問題”

[271]Chou Yang.“Kuan-yu Ma-k’o-ssu-chu-i ti chi-ko li-lun wen-t’i ti t’an-t’ao”（An exploration of some theoretical questions of Marxism）.JMJP，16 March 1983.

周揚：“關于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

[272]Choudhury，G[olam]W.China in world affairs：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RC since 1970.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2.

G.W.喬特哈里：《世界事務中的中國：1970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

[273]Christman，Henry M.See Lenin，Vladimir Il’ich.

[274]Chu Ch’eng-chia，ed.Chung-kung tang-shih yen-chiu lun-wen hsuan，hsia（Selec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CP，vol.3）Chang-sha：Hunan Jen-min，1984.

朱成甲：《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下）

[275]Chu Chung-li.Nü-huang meng：Chiang Ch’ing wai-chuan（Empress dream：an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Chiang Ch’ing）.Peking：Tung-fang，1988.

朱仲麗：《女皇夢：江青外傳》

[276]Chu-shih-pen.See Kuan-yu chien-kuo-i lai…

[277]Chu-pen（Plays）.Monthly.Peking：1952—.

《劇本》

[278]Ch’ü Po.Lin hai hsueh yuan（Tracks in the snowy forest）.Peking：Tso-chia，1957.

曲波：《林海雪原》

[279]Ch’üan-kao Mao Tse-tung che-hsueh ssu-hsiang t’ao-lun hui lun-wen hsuan（Selected essays from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to discuss Mao Tse-tu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Nanning：Kwangsi Jen-min，1982.

《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討論會論文選》

[280]Ch’üan-kou pao-k’an so-yin（Index to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China）.Monthly Shanghai：Shanghai Municipal Library，1973—.

《全國報刊索引》

[281]Ch’üan-kuo tang-shih tzu-liao…See Tang-ship hui-yi pao-kao-chi.

《全國黨史資料》

[282]Ch’un wen-hsueh（Pure literature）.Monthly.Taipei：1967—.

《純文學》

[283]Chung，Chin O.P’ongyang between Peking and Moscow：North Korea's involvement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1958—1975.University：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78.

鐘金（音）.O：《夾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平壤：北朝鮮卷入中蘇論戰，1958—1975年》

[284]Chung-hua ch’üan-kuo wen-hsueh i-shu kung-tso-che tai-piao ta-hui chi-men wen-chi（Documents commemorating China's national congress of literature and art workers）.Peking：Hsin-hua shu-tien，1950.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

[285]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chiao-yü ta-shih-chi，1949—1982（Education chro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82）.Peking：Chiao-yük’o-hsueh，1983.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

[286]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ching-chi ho she-hui fa-chan ti-ch’i ko wunien chi-hua，1986—1990（The 7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86—1990）.Peking：Jen-min，1986.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

[287]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kuo-wu-yuan kung-pao（Bulletin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eking：State Council.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

[288]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ti-wu-chieh ch’üan-kuo jen-min tai-piao ta-hui tt-san-tz’u hui-iwen-chien（Documents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5th NPC of the PRC）.Peking：Jen-min，1980.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文件》

[289]Chung-So Yongu（Sino-Soviet Affairs）.Quarterly，Seoul：Institute for Sino-Soviet studies，Hanyang University，1980—.

《中蘇研究》

[290]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tsui-kao jen-min fa-yuan t’e-pieh fat’ing shen-p’an Lin Piao，Chiang Ch’ing fan-kom-ing ch’i-t’uan an chufan chi-shih（A record of the trial by the Special Tribunal of the PRC's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the principal criminals of the Lin Piao and Chiang Ch’ing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s）.Tsui-kao jenm-in fa yuanyen-chiushih（Research Office，Supreme People's Court）ed.Peking：Fa-Lü，1982.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

[291]Chung K’an.K’ang Sheng p’ing-chuan（A critical biography of K’ang Sheng）.Peking：Hung-ch’i，1982.

仲侃：《康生評傳》

[292]Chung-kung chung-yang tang-hsiao nien-chien，1984（CCP Central Party School Yearbook，1984）.Peking：Chung-kung chung-yang tanghsiao，1985.

《中共中央黨校年鑒（1984）》

[293]Chung—kung shih-yi-chieh san-chung ch’üan-hui yi-lai chung-yang shouyao chiang-hua chi wen-chien hsuan-pien（Compilation of major central speeches and documents since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2 vols.Taipei：Chung-kung yen-chiu tsa-chih-she，1983.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重要講話及文件選編》

[294]Chung kung tang-shih ta-shih nien-piao（A chronological table of major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hung-kung chungyang tang-shih yen-chiu-shih，ed.Peking：Jen-min，1987.

《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295]Chung-kung tang-ship yen-chiu（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CP）.Bimonthly.Peking：Chung-kung chung-yang tang-hsiap，1988—R.eplaced Tangshih yen-chiu.

《中共黨史研究》

[296]Chung-kung tang-shih yen-chiu-hui（Research Society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ed.Hsueh-hsi li-shih chueh-i chuan-chi（Special publication on studying the resolution on history）.Peking：Chung-kung chung-yang tang-hsiao，1982.

中共黨史研究會編：《學習歷史決議專輯》

[297]Chung-kung yen-chiu（Studies on Chinese communism）.Monthly.Taipei：1967—C.ited as CKYC.

《中共研究》

[298]Chung-kou chiao-yü nien-chien，1949—1981（China education yearbook，1949—1981）.Peking：Chung-kou ta-pai-k’o ch’üan-shu，1984.

《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

[299]Chungk-ou Chiao-yü pao（China education news）.3/yr.Peking：1983—.

《中國教育報》

[300]Chung-kou ching-chi nien-chien（Almanac of China's economy）.Annual.Hong Kong：Hsien-tai wen-hua ch’i yeh kung-szu，1981—.

《中國經濟年鑒》（香港）

[301]Chung-kou ching-chi nien-chien（Almanac of China's economy）.Peking：Chung-kuo ching-chi nien-chien yu-hsien kung-szu，1983—.

《中國經濟年鑒》（北京）

[302]Chung-kuo ch’ing-nien（China youth）.Monthly.Peking：1949—1966，1978—.

《中國青年》

[303]Chung-kuo ch’ing-nien pao（China youth news）.Peking：1951—.

《中國青年報》

[304]Chung-kuo jen-k’ou nien-chien（Chinese population yearbook）.Annual.Popul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1985—.

《中國人口年鑒》

[305]Chung-kuo jen-min chien-fang-chün chiang-shuai ming-lu（The names and records of marshals and general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Hsing-huo liao-yuan pien-chi-pu（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editorial department）.Peking：Chien-fang-chün，vol，1，1986；vol.2，1987；vol.3，1987.

星火燎原編輯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

[306]Chung-kuo kao-teng chiao-yü（Chinese higher education）.Formerly Kao-chiao chan-hsien（Higher education battlefront）.Monthly.Peking：1965—.

《中國高等教育》，原名《高教戰線》

[307]Chung-kuo kung-ch’an-tang.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國共產黨

[308]Chung-kuo kung-ch’an-tang chien-shih chiang-i（Teaching materials for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2 vols.Canton：Kwang-tung jen-min，1981.

《中國共產黨簡史講義》

[309]Chung-kuo kung-ch’an-tang li-shih chiang-i（Teahing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Wuhan：Jen-min，1984.

《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

[310]Chung-kuo kung-ch’an-tang li-tz’u chung-yao hui-i-chi（Collection of various important conferences of the CCP）.Chung-kung chung-yang tang-hsiao tang-shih chiao-yen-shih tzu-liao tsu，ed.Shanghai：Jen-min，vol.1，1982；vol，2，1983.

《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資料組編

[311]Chung-kuo kung-ch’an-tang liu-shih nien ta-shih chien-chien（A summary of the principal events in the 60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hung-chih hsueh-yuan Chung-kung-tang shih chiao-yen-shih，Cited as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for CCP History of the[PLA]Political Academy，Chung-kuo kung-ch’an-tang…Peking：Kuo-fang ta-hsueh，1985.

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

[312]Chung-kuo kung-ch’an-tang ti-chiu tz’u ch’üan-kuo tai-piao ta hui（huats’e）（Nin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ictorial volume]）.Hong Kong：San-lien shu-tien，1969.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畫冊）》

[313]Chung-kuo nung-yeh nien-chien（Chinese agricultural yearbook，1980）.Chinese Agricultural Yearbook Compilation Commisson.Peking：Agri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1980—.

《中國農業年鑒》（1980）

[314]Chung-kuo pal-k’o nien-chien（China encyclopedia yearbook）.Annual.Peking and Shanghai：Chung-kuo ta-pai-k’o ch’üan-shu，1980—.

《中國百科年鑒》

[315]Chung-kuo shao-nien pao（China children's news）.Weekly.Peking：1951—.

《中國少年報》

[316]Chung-kuo she-hui k’o-hsueh（Chinese social science）.Bimonthly.Peking：1980—.

《中國社會科學》

[317]Chung-kuo shih-pao（China times）.Taiwan.

《中國時報》

[318]Chungk-uo tang-tai tso-chia hsiao chuan（Brief bi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Paris：Centre de publication Asie Orientale，1967.

《中國當代作家小傳》

[319]Chung-kuo tang-tai wen-hsueh shih（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Comp.by Shantung and nineteen other universities.Foochow：Fukien jen-min，1980.

《中國當代文學家》

[320]Chung-kuo tang-tai wen-hsueh shih ch’u-kao（First draft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2vols.Ministry of Education editorial committee advised by ch’en Huang-mei.Peking：Jen-min wen-hsueh，1981.

《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

[321]Chung-kuo tang-taiw en-hsueh tso-p’in hsung-chiang（Lectures on selecte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Comp.by.sixtee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Nanning：Kwangsi jen-min wen-hsueh，1980.

《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講》

[322]Chung-kuo ti-san-tz’u jen-k’ou p’u-ch’a ti chu-yao shu-tzu（Main figures from China's third population census）.Peking：Chung-kuo t’eng-chi，1982.

《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數字》

[323]Chungk-uo tien-ying（Chinese film）.Quarterly.Peking：1958—.

《中國電影》

[324]Chung-kuo tui-wal mao-i nien-chien，1984（China's foreign trade yearbook，1984）.Peking：Chung-kuo tui-wai ching-chi mao-i，1984.

《中國對外貿易年鑒》（1984）

[325]Chungk-uo t’ung-chi nien-chien，1981（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1981）.Chung-hua jen-min kung-ho kuo kuo-chia t’ung-chi chü，ed.Peking：Chungkuo t’ung-chi nien-chien，1982.Cited as TCNC.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1）

[326]Chungk-uo t’ung-chi nien-chien（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1981）.Hong Kong：Ching-chi tao-pao she，1981—C.ited as TCNC.

《中國統計年鑒》（1981）（香港）

[327]Chungk-uo t’ung-chi nien-chien（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1983）.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kuo-chia t’ung-chi chü，ed.Peking：Chungkuo t’ung-chi nien-chien，1983.Cited as TCNC.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3）

[328]Chung-kuo wen-hsueh-chia tz’u-tien：hsien-tai（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riters：modern）.Hong Kong：Wen-hua tzu-liao kung-ying she，1979；part two，1980.

《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

[329]Chung-wai wen-hsueh（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Monthly.Taipei：1972—.

《中外文學》

[330]Chung-yang jih-pao（Central daily news）.Taipei：1947—.

《中央日報》

[331]Chung-yang wen-hsien yen-chiu-shih.Department for Research on Party Literature.

中央文獻研究室

[332]“Circular of[the]Central Committee of[the]CCP[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6 May 1966）.PR，21（19 May 1967），6-9.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

[333]CKYC.Chung-kung yen-chiu.

《中共研究》

[334]Clark，Paul.“The film industry in the 1970s”，in Bonnie S.McDougall.ed.，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177—196.

保羅·克拉克：《70年代的電影業》，見S.麥克杜格爾·邦尼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通俗文學和表演藝術（1949—1979）》

[335]Clark，Paul.“Film-making in China：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1981.”CQ，94（June 1983），304—322.

保羅·克拉克：《中國的電影制作：從“文化大革命”到1981年》

[336]CLEAR[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Madison，Wis.：Coda Press，1979—.

《中國文學、論文、文章和評論》

[337]Cleverley，John，The schooling of China：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Chinese education.London：George Allen ＆Unwin，1985.

約翰·克利弗利：《中國的學校教育》

[338]CLG.Chinese Law and Goverment.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

[339]Clough，Ralph N.Island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拉爾夫·N.克拉夫：《島國中國》

[340]Clough，Ralph N.，et al.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arms control.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5.

拉爾夫·N.克拉夫等：《美國、中國和軍備控制》

[341]Clough，Ralph N.；Oxnam，Robert B.；and Watts，William.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American perceptions and future alternatives.Washington，D.C.：Potomac Associates，1977.

拉爾夫·N.克拉夫、羅伯特·B.奧克斯南和威廉·瓦茨：《美國與中國》

[342]Clubb，O.Edmund.China and Russia：the“Great Game.”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O.埃德蒙·克拉布：《中國和俄國的“重大比賽”》

[343]Coale，Ansley J.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1952—1982.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4.

安斯利·科爾：《1952—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

[344]Cohen，Arthur A.The Communism of Mao Tse-tu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1964].

阿瑟·A.科恩：《毛澤東的共產主義》

[345]Cohen，Authur A.“How original is‘Maoism’？”Problems of Communism，10.6（November-December 1961），34—42.

阿瑟·A.科恩：“‘毛主義’是怎樣產生的？”

[346]Cohen，Jerome Alan.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63：an introduc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杰羅姆·艾倫·科恩：《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程序入門（1949—1963）》

[347]Cohen，Jerome Alan；Friedman，edward；Hinton，Harold；and Whiting，Allen S.Taiwan and American policy：the dilemma in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 Praeger，1971.

杰羅姆·艾倫·科恩、愛德華·弗里德曼、哈羅德·欣頓、艾倫·S.惠廷：《臺灣與美國的政策》

[348]Cohen，Myron L.House united，house divided：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 w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邁倫·L.科恩：《團結的屋子，分裂的屋子：臺灣的中國人家庭》

[349]“Collection of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CB，852（6 May 1968）.

《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匯編》

[350]Commentator.“Ts’ung Yueh-nan tang-chü fanh-ua k’an Su-lien ti chan-lueh i-t’u”（Soviet strategic intention as viewed from the Vietnamese authorities anti-Chinese activities）.HC，8（1 August 1978），101—104.

《紅旗》雜志評論員：“從越南當局反華看蘇聯的戰略意圖”

[351]Commentator.“Tang-ch’ien chan-cheng wei-hsien yü pao-wei shih-chieh hop’ing”（The current danger of war and the defense of world peace）.HC，11（2 November 1979），53—58.

《紅旗》雜志評論員：“當前戰爭危險與保衛世界和平”

[352]Commentator.“Fan-mien chiao-yuan tsai kei ta chia shang hsin—k’o：p’ing Su—lien ch’in-lueh ho chan-ling A-fu-k’an”（The teacher who teaches by negative example is giving everyone a lesson：commentary on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Afghanistan）.HC，2（16 January 1980），46—48.

《紅旗》雜志評論員：“反面教員在給大家上新課：評蘇聯侵略和占領阿富汗”

[353]“Communiqué of the Eleven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 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dopted on August 12，1966）.”PR，34（19 August 1966），4—8.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

[354]“Communiqué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dopted on 22 December 1978）.PR，52（29 December 1978），6—16.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

[355]Communist Affairs：documents and analyses.Quarterly.Guilford，Surrey：Butterworth Scientific，1982—.

《共產主義事務：文件與分析》

[356]Comparative Urban Research.New York：1972—1985.Continued by Comparative Urban and Community Research.

《城市比較研究》

[357]Compton，Boyd，trans.and intro.Mao's China：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194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1952]；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c.1952].

博伊德·康普頓譯：《毛的中國：黨改文件（1942—1944）》

[358]Congressional Quarterly，Inc.China and U.S.foreign policy.Ed，William B.Dickinson，Jr.Washington，D.C.：1973[2nd ed.].

《中國與美國的外交政策》

[359]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rvice.China and U.S Far East policy，1945—1967.Washingfon，D.C.：1967[rev.].

《中國與美國的遠東政策（1945—1967）》

[360]“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4（24 January 1975），12—17.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361]Contemporary China.vol.1.1955.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56.Vol.2.1956—1957，1958.Vol.3.1958—1959，1960.Vol.1.4.1959—1960，1961.Vol.5.1961—1962，1963.Vol.6.1962—1964，1968.

《當代中國》（香港大學出版社）

[362]Contemporary China.See Sorich，Richard.

《當代中國》

[363]Contemporary ChinaE.d.Edwin Winckler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October 1976—Winter 1979.

埃德文·溫克勒等編：《當代中國》

[364]Copper，John F.，with George P.Chen，Taiwan's elections：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Occasional Paper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Baltimore：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1984.

約翰·F.科珀和喬治·P.陳：《臺灣的選舉：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和民主化》

[365]Corbett，Charles Hodge.Lingnan University.New York：Trustees of Ling nan University，1963.

查理斯·霍奇·科貝特：《嶺南大學》

[366]Codier，Andrew W.，ed.Columbia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dean's papers，196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6.

安德魯·W.科迪埃：《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文集》

[367]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1986.Taipei：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1986.

經濟計劃和發展委員會：《臺灣統計數據冊》

[368]CQ.The China Quarterly.

《中國季刊》

[369]CRF.See JPRS.China/Red Flag（CRF）.

《中國/紅旗》

[370]Crook，Frederick W.“The reform of the commune system and the rise of the township-collective-household system”，in U.S.Congress，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1.354—375.

弗雷德里克·W.克魯克：《公社制度的改革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興起》

[371]Crook，Isabel，and Crook，David.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59.

伊莎貝爾·克魯克、戴維·克魯克：《一個中國鄉村的革命：十里店》

[372]Crook，Isabel，and Crook，David.Ten Mile Inn：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Pantheon，1979.

伊莎貝爾·克魯克、戴維·克魯克：《十里店：一個中國鄉村的群眾運動》

[373]Crozier，Brian，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Eric Chou.The man who lost China：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New York：Scribner，1976.

布賴恩·克羅澤：《丟掉中國的人》

[374]CSB.See JPRS.China/State Council Bulletin（CSB）.

《中國/國務院公報》

[375]CSCPRC.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對華學術交流委員會

[376]CSM.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377]CSYB.Chinese statistical yearbook.

《中國統計年鑒》

[378]Cultural Revolution.See 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文化大革命”，見《有關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

[379]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The.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1.

《省里的“文化大革命”》

[380]Current Background.See U.S.Consulate.General.

《當代背景材料》

[381]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The.Weekly.Columbus，Ohio：1949—.Cited as CDSP.

《當代蘇聯報刊文摘》

[382]Current History.9/year（monthly except June，July，August）.Philadelphia：Current History，Inc.，1914—.

《當代史》

[383]Current scene：developments in mainland China.Irregular.Hong Kong：The Green Pagoda Press，1961—1972.Supersedes mimeographed publication by the same title，1959—1961.After December 1972“no longer available for A-merican distribution.”

《時事》

[384]Daily Report：China.See FBIS.

《中國動態》

[385]Daily Report：Far East.See FBIS.

《遠東動態》

[386]Daily Report：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ee FBIS.

《中華人民共和國動態》

[387]Daily Report：Soviet Union.See FBIS.

《蘇聯動態》

[388]Daily Report：USSR.See FBIS.

《蘇聯動態》

[389]Daily Telegraph.London.

《每日電信報》

[390]Dake，Antonie C.A.In the spirit of the Red Banteng：Indonesian communists between Moscow and Peking 1959—1965.The Hague：Mouton，1973.

安東尼·C.A.達克：《“紅野牛”精神：處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

[391]Dallin，Alexander，with Jonathan Harris，and Grey Hodnett，eds.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a documentary record，1961—196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

亞歷山大·達林、喬納森·哈里森、格雷·霍內特編：《國際共產主義的分歧》

[392]Daubier，Jean.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Trans.Richard Seaver.Preface by Han Suyi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4.

瓊·多比爾：《中國“文化大革命”史》

[393]Davidson，James W.The island of Formosa：historical view from 1430 to 1900.London：Privately Published，1903.

詹姆斯·W.戴維森：《福摩薩島：歷史的觀點（1430—1900）》

[394]Davis-Friedmann，Deborah.Long lives：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德博拉·戴維斯-弗里德曼：《長壽：中國的老人與共產黨革命》

[395]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cern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Peking：FLP，1966.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396]“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re form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20 October 1984.Beijing Review，27.44（29 October 1984），Ⅰ—ⅩⅥ.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397]Deliusin，L.P.The socio-political essence of Maoism.Moscow：Novosti，1976.

L.P.德留辛：《毛主義的社會政治本質》

[398]Deng Xiaoping.See also Teng Hsiao-ping.

[399]Deng Xiaoping.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1975—1982）.Peking：FLP，1984.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

[400]Deshpande，G.P.“China and Vietnam.”International Studies，12.4（October-December 1973），568—581.

G.P.德什潘德：《中國和越南》

[401]Developing Economies，The.Quarterly.Tokyo：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Ajia Keizai Kenkyūshō，1962—.

《發展經濟學》

[402]Diamond，Norma.K’un shen：a Taiwan village.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69.

諾馬·戴蒙德：《昆沈（音）：一個臺灣村莊》

[403]Diamond，Nor“ma.Rural colléctivization and decolléctivization in China：a review article.”JAS，44.4（August 1985），785—792.

諾馬·戴蒙德：“中國農村的集體化和非集體化”

[404]Diao，Richard K.“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economic elite.”CQ，42（April-June 1970），65—87.

理查德·K.迪奧：“‘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經濟界精英的影響”

[405]Dickinson，William B.See Congressional Quarterly，Inc.

[406]Die Welt.Daily.Hambury：1946—.

[407]Dittmer，Lowell.Liu Shao-ch’i and，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群眾批評的政治》

[408]Dittmer，Lowell.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the post-liberation epoch，1949—198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洛厄爾·迪特默：《中國的繼續革命》

[409]Dittmer，Lowell.“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a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Gang of Four.’”World Politics，31.1（October 1978），26—60.

洛厄爾·迪特默：“中國政治的權力基礎：‘四人幫’垮臺的理論和分析”

[410]Dittmer，Lowell，and Chen Ruoxi.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no.19.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1.

洛厄爾·迪特默、陳若曦：《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倫理和修辭》

[411]Djilas，Milovan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New York：Praeger，1957.

米洛萬·吉拉斯：《新階級：共產主義制度剖析》

[412]“Document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9 October 1969）.PR，41（10 October 1969），8—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

[413]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eptember 1956—April 1969.See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文件集（1956年9月-1969年4月）》

[414]Documents of the Thir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1987）.Peking：FLP，1987.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1987）》

[415]Domes，Jürgen.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1949-1972.Trans.Rudiger Machetzki.New York：Praeger；London：C.Hurst，1973.

于爾根·多姆斯：《中國國內政治（1949—1972）》

[416]Domes，Jürgen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PRC：a time of transition.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5.

于爾根·多姆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政治》

[417]Domes，Jürgen.“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army.”Asian Survey，8.5（May 1968），349—363.

于爾根·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和軍隊”

[418]Domes，Jürgen“.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formation of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1967—1968.”CQ，44（October—December 1970），112—145.

于爾根·多姆斯：“軍隊在革命委員會成立中的作用（1967—1968）”

[419]Domes，Jürgen“.New policies in the communes：notes on rural societal structures in China，1976—1981.”JAS，41.2（February 1982），253—267.

于爾根·多姆斯：《公社中的新政策：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筆記》

[420]Dommen，Arthur J.“The attempted coup in Indonesia.”CQ，25（January—March 1966），144—170.

阿瑟·J.多門：“印度尼西亞的未遂政變”

[421]Doolin，Dennis J.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documents and analysis.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1965.

丹尼斯·J.杜林：《中蘇沖突中的領土要求：文件和分析》

[422]Dore，Ronald.The diploma disease：education，qual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6.

羅納德·多爾：《文憑病：教育、資格和發展》

[423]Dorrell，William F.“Power，policy，and ideology in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in Thomas W.Robinson，ed.，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21—112.

威廉·F.多雷爾：“中國文化大革命發起階段的權力、政策和意識形態”

[424]“Down with the new tsars！”Editorial in JMJP，4 March 1969，in SCMP，4373（11 March 1969），17—19.

“打倒新沙皇！”

[425]Downen，Robert L.Of grave concern：U.S.T-aiwan relation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1980s.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Georgetown University，1981.

羅伯特·L.唐恩：《重大的憂慮：進入80年代的美臺關系》

[426]Downen，Robert L.To bridge the Taiwan Strait：the complexities of China's reunification.Washington，D.C.：The Council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1984.

《中國重新統一的復雜性》

[427]Dual Purpose Personnel News.See Liang yung jen-ts’ai pao.

[428]Duiker，William J.China and Vietnam：the roots of conflict.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6.

威廉·J.杜克：《中國和越南：沖突的根源》

[429]Duke，Michael S.Blooming and contending：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

邁克爾·S.杜克：《繁榮和爭論：毛以后時代的中國文學》

[430]Duke，Michael S.，ed.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an anthology of post-Mao fiction and poetry.Ed.and intro.by Michael S.Duke for 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Armonk，N.Y.：M.E.Sharpe，1985.

邁克爾·S.杜克：《當代中國文學：毛以后的小說、詩歌集》

[431]Duke，Michael S.“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in Mason Y.H.Wang，ed.，Perspectiv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1—48.

邁克爾.S.杜克：“第二次百花齊放，毛以后時代的中國文學”

[432]Dulles，Foster Rhea.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1949—1969.Foreword by John K.Fairbank.New York：Thomas Y.Crowell，1972.

福斯特·雷亞·杜勒斯：《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1949—1969）》

[433]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See Huat-ung shih-fan to-hsueh hsueh-pao.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434]Eastman，Llogd E.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易勞逸：《流產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

[435]ECMM.See U.S.Consulate General.Hong Kong.Extract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

《中國大陸雜志摘要》

[436]Economic Planning Board.Handbook of Korean economy，1980.Seoul：Economic Planning Board，1980.

經濟計劃委員會：《韓國經濟手冊》（1980）

[437]Economic Planning Board.Major statistics of Korean economy，1986.Seoul：Economic Planning Board，1986.

經濟計劃委員會：《韓國經濟主要統計資料》（1986）

[438]Economist，The.Weekly.London：Economist Newspaper Ltd.，1843—.

《經濟學家》

[439]Education and Occupation.See Chiao-yü yü chih-yeh.

《教育與職業》

[440]Education Extracts.See Chiao—yü wen-chai.

《教育文摘》

[441]Education Practice.See Chiao-yü Shih-chien.

《教育實踐》

[442]Education Research.See Chiao-yü yen-chiu.

《教育研究》

[443]Education Revolution.See Chiao-yü ko-ming.

《教育革命》

[444]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See chiao-yü lt-lun yü shih-chien.

《教育理論與實踐》

[445]Edwards，R.Randle；Henkin，Louis；and Nathan，Andrew J.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R.蘭德·愛德華茲、路易斯·亨金、安德魯·J.內森：《當代中國的人權》

[446]Egorov，K.A.Gosudarstvennyi apparat KNR，1967-1981（The governmental apparatus of the PRC，1967—1981）.Moscow：Nauka，1982.

K.A.伊格洛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機構（1967—1981）》

[447]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Vol.1：Documents.Vol.2：Speeches.Peking：FLP，1981.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448]Eisenhower，Dwight.Mandate for change，1953—1956：the White House years.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3.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受命變革（1953—1956）》

[449]Eisenhower，Dwight.Waging peace 1956—1961：the White House years.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5.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締造和平（1956—1961）》

[450]Elegant，Robert S.Mao's great revolution.New York：World，1971.

羅伯特·S.埃勒根特：《毛的大革命》

[451]El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documents）.Peking：FLP，1977.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

[452]Elkin，Jerrold F.，and Fredericks，Brian.“SinoI-ndian border talks：the view from New Delhi.”Asian Survey，23.10（October 1983），1128—1139.

杰羅爾德·F.埃爾金、布賴恩·弗雷德里克斯：“中印邊界談判：新德里的觀點”

[453]Elliott，David W.P.，ed.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1.

戴維·W.P.埃利奧特編：《第三次印度支那沖突》

[454]Ellison，Herbert J.，ed.The Sino-Soviet conflict：a global perspectiv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2.

赫伯特·J.埃利森編：《中蘇沖突》

[455]Elvin，Mark，and Skinner，G.William，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馬克·埃爾文、施堅雅編：《兩個世界之間的中國城市》

[456]Enlightenment Daily.See Kuang-ming jih-pao.

《光明日報》

[457]Erisman，Alva Lewis.“Potential costs of and benefits from diverting river flow for irrigation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University of Maryland，Ph.D.dissertation，1967.

阿爾瓦·劉易斯·埃里斯曼：“引水灌溉華北平原的潛在費用與收益”

[458]Esherick，Joseph W.“On the‘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Mao and Marxist theory.”Modern China，5.1（January 1979），41—77.

約瑟夫·W.伊謝里克：“論‘資本主義復辟’：毛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459]Esmein，JeanL.a Révolution culturelile chinoise.Paris：Seuil，1970.

瓊·埃斯梅：《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460]Eto，Shinkichi.“Japan and China-a new stage？”Problems of Communism，16.6（November-December 1972），1-17.

衛藤沈吉：“日本和中國——一個新階段？”

[461]Evans，Humphrey.See Loh，Robert.

[462]Extract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See U.S.Consulate General.

《中國大陸雜志摘要》

[463]Fairbank，John 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費正清編：《在中國和美國的傳教事業》

[464]Faligot，Roger，and Kauffer，Remi.Kang Sheng et les services secrets chinois（1927—1987）.Paris：Robert Laffont，1987.

羅杰·法利格特、雷米·考弗：《康生及其在中國的秘密工作（1927—1987）》

[465]Falkenheim，Victor.“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wangsi，Yunnan，and Fukien.”Asian Survey，9.8（August 1969），580—597.

維克托·福爾肯海姆：“廣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

[466]Fan Shuo.“The tempestuous October-a chronicle of the complete collapse of the‘Gang of Four.’”Yang-ch’eng wan pao，10 February 1989，trans.in FBIS Daily Report：China，14 February 1989，16—22.

范碩：“暴風雨般的十月——‘四人幫’覆滅記”

[467]Fang，Percy Jucheng，and Fang，Lucy Guinong J.Zhou Enlai：a profile.Peking：FLP，1986.

方鉅成、姜桂儂：《周恩來傳略》

[468]Fang Wei-chung，ed.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ching-chi ta-shih-chi（1949—1980）（A record of the major economic events of the PRC[1949—1980]）.Peking：Chung-kuo she-hui k’o hsueh，1984.

房維中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

[469]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Weekly.Hong Kong：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Ltd.，1946—C.ited as FEER.

《遠東經濟評論》

[470]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Yearbook.Annual.Hong Kong：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Ltd.，1962—1972.Continues in Part：Far Eastern Eco-nomic Revlew…Yearbook and Asian textile survey.Continued by Asia Yearbook，1973—.

遠東經濟評論：《年鑒》

[471]Faurot，Jeannette L.，ed.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critical perspective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Symposium on Taiwan fiction，1979，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珍妮特·L.福洛特編：《臺灣的中國小說》

[472]FBIS.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外國廣播信息處

[473]FEER.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遠東經濟評論》

[474]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Preface by Bronislaw Malinowski.New York：E.P.Dutton，1939；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32.

費孝通：《中國農民的生活（江林經濟）——長江流域農村生活的實地調查》

[475]Fei Xiaotong[Fei Hsiao-t’ung].Chinese village close up.Beijing：New World Press，1983.

費孝通：《中國農村特寫》

[476]Fei，John C.H.；Ranis，Gustav；and Kuo，Shirley W.Y.Growth with equity：the Taiwan cas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for the World Bank，1980.

約翰·C.H.費、古斯塔夫·拉尼斯、雪莉·W.Y.郭：《公平發展：臺灣的情況》

[477]Feng chih.Shih-nien shih-ch’ao（Poems of a decade）.Peking：Jen-min wenhsueh，1959.

馮至：《十年詩抄》

[478]Feuerwerker Yi-tsi Mei.Ding Ling's fiction：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梅儀慈：《丁玲的小說：現代中國文學中的意識形態和敘事》

[479]Feurtado，Gardel.“The formation of provinci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1966—1968：Heilungkiang and Hopei.”Asian Survey，12.12（December 1972），1014-1031.

加德爾·福爾塔多：“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1966—1968）：黑龍江和河北”

[480]Field，Robert Michael；Lardy，Nicholas；and Emerson，John Philip.A reconstruction of the grossv alue of industrial output by provin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3.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Commerce，1975.

羅伯特·邁克爾·菲爾德、尼古拉斯·拉德、約翰·菲利普·埃默森：《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諸省工業總產值的重新整理（1949—1973）》

[481]Field，Robert Michael；McGlynn，Kathleen M；and Ahnett，William B.“Political conflict and industrial growth in China：1965—1977”，in U.S.Congress，Joint Economic Committee，the Chinese economy post-Mao，1.239—283.

羅伯特·邁克爾·菲爾德、凱思林·M.麥克格林、威廉·B.阿布尼特：“中國的政治沖突與工業增長（1965—1977）”

[482]Fifth session of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main documents）.Peking：FLP，1983.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重要文件》

[483]The Financial Times.Daily.London：1888—.

《金融時報》

[484]Fingar，Thomas，et al.，eds.China's quest for independence：policy evolution in the 1970s.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0.

托馬斯·芬格等編：《中國對獨立自主的追求：七十年代政策的變化》

[485]Fitzpatrick，Sheila，ed.Cultural Rvolution in Russia，1928—1931.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1978].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編：《俄國的文化革命（1928—1931）》

[486]Floyd，David.Mao against Khrushchev：a short history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New York：Praeger，1964.

戴維·弗洛伊德：《毛反對赫魯曉夫：中蘇沖突簡史》

[487]FLP.Foreign Language Press.

外文出版社

[488]Fokkema，D[ouwe]W.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1956—1960.Foreword by S.H.Chen.The Hague：Mouton，1965.

杜韋·W.福克瑪：《中國的文學教條與蘇聯影響（1956—1960）》

[489]Fokkema，D.W.Report from Peking：observations of a Western diploma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C.Hurst；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72.[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utch as Stand plaats Peking.]

D.W.福克瑪：《北京報道：一個西方外交官對“文化大革命”的觀察》

[490]Fokkema，Douwe W.“Chinese criticism of humanism：campaign against the intellectuals，1964—1966.”CQ，26（April—June 1966）.68—81.

杜韋·W.福克瑪：《中國對人道主義的批判：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1964—1966）》

[491]Fokkema，D.W.“Chinese literature und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iterature East and West，13（1969），335—358.

D.W.福克瑪：“‘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文學”

[492]Fokkema，D.W.“The Maoist myth and its exemplification in the new Peking Opera.”Asia Quarterly，2（1972），341—361.

D.W.福克瑪：“毛主義的神話及其在新京劇中的樣板”

[493]Fokkema，D.W.，and[Kunne—]Ibsch，Elrud.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structuralism，Marxism，aesthetics of reception，semiotics.London：C.Hurst，1986[1979，1977]；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

D.W.福克瑪、埃爾魯特·伊布斯奇：《20世紀的文學理論》

[494]Foreign Affairs.5/year.New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22—.

《外交事務》

[495]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Commerce，1941—.Cited as FBIS.The Daily Report of this agency has appeared in sections designated for specific regions but the names of these regions have been changed from time to time in a manner that makes it diffcult to construct a precise genealogy.These designations have been used at various times：Asia and Pacific，China，Communist China，East Asia，Eastern Europe，Far East，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USSR，USSR and Eastern Eu-rope.FBIS is discussed in CHOC 14.557 et passim.

外國廣播信息處

[496]Foreign Laneuages Press.Cited as FLP.

外文出版社

[49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66—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Cited as FR US.

《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866— ）》

[498]Formosa Taiwandang，The.Irregular.New York：Formosan Readers Association.

《福摩薩臺灣黨》

[499]Franke，Wolfgang.The reforma 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tsity，1972.

沃爾夫岡·弗蘭克：《中國傳統考試制度的改革和廢止》

[500]Fraser，John.The Chinese：portrait of a people.London；Fontana/Collins，1982；New York：Summit Books，1980.

約翰·弗雷澤：《中國人》

[501]Fraser，Stewart E.，ed.Education and communism in China：an anthology of commentary and documents.Hong Kong：International Studies Group，1969.

斯圖爾特·E.弗雷澤編：《中國的共產主義教育：評論和文件集》

[502]Free China Journal.Weekly.Taipei：Kwang Hwa Publishing Co.，1964—.（From 1964 to 1983 was Free China Weekly.）

《自由中國雜志》，1964—1983年名為《自由中國周刊》

[503]Free China Weekly.See Free China Journal.

《自由中國周刊》

[504]Freedman，Maurice.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London：Athlone Press，1958.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國東南部的家系組織》

[505]Fried，Morton H.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a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of a Chinese courty seat.New York：Octagon Books，1969；New York：Praeger，1953.

莫頓·H.弗里德：《中國社會的組織：對中國一個縣城的社會生活的研究》

[506]Friedman，Edward；Pickowicz，Paul G.；and Selden，Mark.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愛德華·弗里德曼、保羅·G.皮科威克茲、馬克·塞爾登：《中國的村莊，社會主義國家》

[507]Frolic，B.Michael.Mao's people：sixteen portraits of life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B.邁克爾·弗羅利克：《毛的人民》

[508]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對外關系文件》

[509]Fu-yin pao-ka’n tzu-liao（Reference materials reprinted from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Monthly.Peking：Chung-kuo jen-min ta-hsueh.

《報刊復印資料》

[510]Funya，Keiji，ed.Chiang Kai-shek，his life and times.New York：St.John's University，1981.[Abridged English edition/Chunming Chang？]

凱杰·芬雅編：《蔣介石》

[511]Galenson，Walter，ed.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

沃爾特·蓋倫森編：《臺灣的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

[512]Gallin，Bernard.Hsin Hsin，Taiwan：a Chinese village in chan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伯納德·加林：《臺灣新星：一個變化中的中國村莊》

[513]Gamble，Sidney D.，assisted by John Stewart Burgess.Peking：a social survey.Foreward by G.Sherwood Eddy and Robert A.Woods.New York：George H.Doran，1921.

西德尼·D.甘布爾：《北京》

[514]Gamble，Sidney D.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Foreword by Y.C.James Ye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4.

西德尼.D.甘布爾：《定縣：中國北方的一個農村社會》

[515]Gao Yuan.Born red：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高原：《生來紅：文化革命記事》

[516]Gardner，John.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succession to Mao.London：Macmillan，1982.

約翰·加德納：《中國政治和對毛的繼承》

[517]Gardner，John.“Edueated youth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ies，1958—1966”，in John Wilson Lewis，ed.，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235—286.

約翰·加德納：《受教育的青年與城鄉差別（1958—1966）》

[518]Garret，Banning N.，and Glaser，Bonnie S.War and peace：the views from Moscow and Beijing.Berkeley：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4.

班寧·N.加勒特、邦尼·S.格拉澤：《戰爭與和平：莫斯科和北京的觀點》

[519]Garrett，W.E.“China's beauty spot.”National Geographic，156（1979），536—563.

W.E.加勒特：“中國著名景點”

[520]Garside，Roger.Coming alive！：China after Mao.New York：McGraw-Hill；London：Andre Deutsch，1981.

羅杰·加賽德：《活躍起來！：毛以后的中國》

[521]Garthoff，Raymond L.，ed.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New York：Praeger，1966.

雷蒙德·L.加特霍夫編：《中蘇軍事關系》

[522]Garver，John，W.China's decision for rapprochementw ith the United State，1968—1971.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2.

約翰·W.加弗：《中國決定與美國和解（1968—1971）》

[523]Gelb，Leslie H.，with Richard K.Betts.The irony of Vietnam：the system worked.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9.

萊斯利·H.蓋爾布、理查德·K.貝茨：《越南的嘲弄》

[524]Gelber，Harry.“Nuclear weapons and Chinese policy.”London：IISS Adelphi Paper，no.99，1973.

哈里·蓋爾伯：“核武器與中國的政策”

[525]Gel’bras，V.G.Kitai：krizis prodolzhaetsia（China：the crisis continues）.

Moscow：Izdatel'stvo“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1973.

V.G.蓋爾布拉斯：《中國：危急在繼續》

[526]Gelman，Harry.The Soviet Far East buildup and Soviet risk-taking against China.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R-2943，August 1982.

哈里·格爾曼：《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集結和反華冒險》

[527]Gernet，Jacques.“Introduetion”，in Stuart Schram，ed.，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xv—xxvii.

S.施拉姆編的《中國國家權力的范圍》一書中由雅克·格內特寫的“引言”

[528]Gibbs，Donald A.Subject and author index to“Chinese literature”monthly（1951—1976）.New Haven，Cona.：Far Eastern Publications，Yale University，1978.

唐納德·A.吉布斯：《〈中國文學〉月刊的主題及作者索引（1951—1976）》

[529]Ginsburg，Norton.See Leung C.K.

[530]Ginsbury，George，and Pinkele，Carl F.The Sino-Soviet territorial dispute，1949—1964.New York：Praeger，1976.

喬治·金斯伯格、卡爾·F.平克勒：《中蘇領土爭端（1949—1964）》

[531]Gittings，John.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約翰·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

[532]Gittings，John.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a commentary and extracts from the recent polemics 1963—1967.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約翰·吉廷斯：《中蘇爭論概觀：近期論戰的評注與摘要（1963—1967）》

[533]Gittings，JohnT.hew orld and China，1922—1972.New York：Harper ＆.Row，1975.

約翰·吉廷斯：《世界與中國（1922—1972）》

[534]Gittings，John.“Army-Party relations in the 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John Wilson Lewis，ed.，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373—403.

約翰·吉廷斯：“從‘文化大革命’看軍隊與黨的關系”，載約翰·威爾遜·劉易斯編：《中國黨的領導和革命權力》

[535]Gittings，John.“The‘learn from the army’campaign.”CQ，18（April—June 1964），153—159.

約翰·吉廷斯：“‘學習解放軍’運動”

[536]Gittings，John.“The Chinese army's rol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Pacific Affairs，39.3—4（Fall—Winter 1966-1967），269—289.

約翰·吉廷斯：“中國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537]Goddard，W.G.Formosa：a study in Chinese history.Longon：Macmillan，1966.

W.G.戈達德：《福摩薩》

[538]Gold，Thomas B.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Armonk，N.Y.：M.E.Sharpe，1986.

托馬斯·B.戈爾德：《臺灣奇跡中的國家與社會》

[539]Gold，Thomas B.“China's youth：problems and programs.”Issues＆Studies，18.8（August 1982），39—62.

托馬斯·B.戈爾德：“中國的青年：問題和計劃”

[540]Goldblatt，Howard，ed.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1980s：the Fourth Congress of Writers and Artists.Armonk，N.Y.：M.E.Sharpe，1982.

霍華德·戈德布拉特編：《80年代的中國文學》

[541]Goldblatt，Howard.See Hwang Chunm-ing.

[542]Goldman，Merle.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New York：Atheneum，197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默爾·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持不同文藝見解者》

[543]Goldman，Merie，China's intellectuals：advise and diss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默爾·戈德曼：《中國知識分子：建議和異議》

[544]Goodman，David S.G.Beijing street voices：the poetry and politics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London and Boston：Marion Boyars，1981.

戴維·S.G.古德曼：《北京街頭的呼聲：詩歌與中國民主運動的政治》

[545]Goodman，David S.G.Centre and provi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ichuan and Guizhou，1955—1965.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戴維·S.G.古德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和省：四川和貴州（1955—1965）》

[546]Goodman，David S.G.，ed.Group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rmonk，N.Y.：M.E.Sharpe，1984.

戴維·S.G.古德曼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團體與政治》

[547]Gorbachev，B.N.Sotsial’no-politicheskaia rol’kitaiskoi armii（1958—1969）（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1958—1969]）.Moscow：Nauka，1980.

B.N.戈爾巴切夫：《中國軍隊的社會和政治作用》

[548]Gosudarstvoi obshchestvo v Kitaie.（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Annual.Moscow：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China branch）.

《中國的國家和社會》

[549]Gottlieb，Thomas M.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t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R—1902-NA，November 1977.

托馬斯·M.戈特利布：《中國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與戰略三角關系的起源》

[550]Gotz，Michael，“Images of the worke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1949—1964.”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Ph.D.dissertation，1977.

邁克爾·戈茨：“當代中國小說中的工人形象（1949—1964）”

[551]Gould，Sidney H.，ed.Sciences in communist China.Washington，D.C.：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1961.[A symposium presented at the New York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26—17 December 1960.]

西德尼·H.古爾德編：《共產黨中國的科學》

[552]Graham，Angus.The book of Lieh-tzu.London：John Murray，1960.

安格斯·格雷厄姆：《列子的書》

[553]Graham，Angus.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Chuang-tzu.”London：Allen＆Unwin，1981.

安格斯·格雷厄姆：《莊子》

[554]Gray，Jack，and Cavendish，Patrick.Chinese communism in crisis：Mao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Praeger，1968.

杰克·格雷、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危機中的中國共產主義：毛主義與“文化大革命”》

[555]“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a record of major events-September 1965 to December 1966.”JPRS，42，349 Translations on Communist China：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Information（25 August 1967）.

“‘文化大革命’記事（1965年9月—1966年12月）”

[556]A great revolution on the cultural front.Peking：FLP，1965.

《文化戰線的一場大革命》

[557]A great trial in Chinese history：the trial of the Lin Biao and Jiang Qing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s，Nov.1980—Jan.1981.Peking：New World Press，1981.

《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980年11月—1981年1月）》

[558]Greene，Felix.Peking.London：Cape，1978.

費利克斯·格林：《北京》

[559]Gregor，A.James，with Maria Hsia Chang and Andrew B.Zimmerman.Ideology and development：Sun Yat-sen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1.

A.詹姆斯·格雷戈爾、瑪麗亞·張霞（音）、安德魯·B.齊默爾曼：《意識形態和發展：孫中山與臺灣經濟史》

[560]Grichting，Wolfgang L.Thev alue system in Taiwan 1970：a preliminary report.Taipei：n.p.，1971.

沃爾夫岡·L.格里奇丁：《1970年臺灣的價值體系》

[561]Griffith，William E.The Sino-Soviet rift.Cambridge，Mass.：SMIT Press；London：Allen＆Unwin，1964.

威廉·E.格里菲思：《中蘇分裂》

[562]Griffith，William E.Sino-Soviet relations，1964—1965.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7.

威廉·E.格里菲思：《中蘇關系（1964—1965）》

[563]Griffith，William E.ed.Thew orld and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s.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5.

威廉·E.格里菲思編：《世界與大國三角關系》

[564]Griffith，William E.“Sino-Soviet relations，1964—1965.”CQ，25（January—March 1966），66—76.

威廉·E.格里菲思：“中蘇關系（1964—1965）”

[565]Gudoshnikov，L.M.Politicheskii mekhanizm Kitaiskoi Narodnoi Respubliki（Political mechanis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oscow：Nauka，1974.

L.M.古德什尼科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機構》

[566]Guillain，Robert.600 million Chinese.Trans.from the French by Mervyn Savill.New York：Criterion Books，1957.[Published in England as the blue ants.London：Secker＆Warburg，1957.]

羅伯特·吉萊恩：《六億中國人》

[567]Guillain，Robert.When Chinaw akes.New York：Walker，1966.

羅伯特·吉萊恩：《中國醒來的時候》

[568]Guillermaz，Jacques.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1949—1976.Trans.Anne Destenay.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6.

雅克·吉勒馬：《執政的中國共產黨（1949—1976）》

[569]Gurtov，Melvin.China and Southeast Asia，the politics of survival：a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ac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Lexington，Mass.：[Heath]Lexington Books，1971.

梅爾文·格爾托：《中國與東南亞，生存政治學：對外政策相互影響的研究》

[570]Gurtov，Melvin.“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in Thomas W.Robinson，ed.，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313—366.

梅爾文·格爾托：“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務”

[571]Gurtov，Melvin，and Hwang，Byong-Moo.China under threat：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

梅爾文·格爾托、黃永木（音）：《處于威脅之下的中國：戰略政治與外交》

[572]Halperin，Morton H.，ed.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7.

莫頓·H.哈爾珀林編：《中蘇關系與軍備控制》

[573]Halpern，A.M.，ed.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New York：McGraw-Hill，1965.

A.M.哈爾珀恩編：《對華政策：六大洲的觀點》

[574]Han Suyin.My house has two doors.London：Jonathan Cape；New York：Putnam，1980.

韓素音：《我的屋子有兩扇門》

[575]Hao JanY.en-yang t’ien（Bright days）.3 vols.Peking：Jen-min wen-hsueh，1964-1966.

浩然：《艷陽天》

[576]Hao Jan.Chin-kuang to-tao（A golden road）.2 vols.Peking：Jen-min wenhsueh，1972—1974.

浩然：《金光大道》

[577]Hao Jan.“Bright clouds.”Chinese Literature，4（April 1972），13—28.

浩然：“明朗的天”

[578]Hao Meng-pi and Tuan Hao-jan，eds.Chung-kuo kung-ch’an-tang liu-shihnien，hsia（Six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art 2）.Peking：Chieh-fang-chün，1984.

郝夢筆、段浩然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下）

[579]Harding，Harry.Organizing China：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1949—1976.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哈里·哈丁：《組織中國：官僚問題（1949-1976）》

[580]Harding，Harry，e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哈里·哈丁編：《八十年代的中國對外關系》

[581]Harding，Harry.China's second revolution：reform after Mao.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7.

哈里·哈丁：《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毛以后的改革》

[582]Harding，Harry.“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China's global posture，1973—1978”，in Thomas Fingar et al.，eds.，China's quest for independence，93—146.

哈里·哈丁：“中國全球姿態中的內部政治（1973—1978）”

[583]Harding，Harry.“Reapprai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Wilson Quarterly，4.4（Autumn 1980），132—141.

哈里·哈丁：“重新評價文化革命”

[584]Harding，Harry.“From China，with disdain：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Asian Survey，22.10（October 1982），934—958.

哈里·哈丁：“來自中國的蔑視：中國研究的新趨勢”

[585]Harding，Harry，and Gurtov，Melvin.The purge of Lo Jui-ch’ing：the politics of Chinese strategic planning.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R—548—PR，February 1971.

哈里·哈丁、梅爾文·格爾托：《清洗羅瑞卿：中國戰略計劃中的政治斗爭》

[586]Hartford，Kathleen“.Socialist agriculture is dead；long live socialist agriculture！：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s in rural China，”in Elizabeth J.Perry and Christine Wong，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31—61.

凱思林·哈特福德：“社會主義農業死了；社會主義農業萬歲！：中國農村組織的變遷”

[587]Hawkins，John N.Mao Tse-tung and education：his thoughts and teachings.Hamden，Conn.：Linnet Books/Shoestring Press，1974.

約翰·N.霍金斯：《毛澤東和教育：他的思想和教導》

[588]Hawkins，John N.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ew York：Praeger，1983.

約翰·N.霍金斯：《教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變革》

[589]Hayhoe，Ruth，ed.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London：Croom Helm，1984.

魯思·海霍編：《當代中國教育》

[590]Hayhoe，Ruth，and Bastid，Marianne，eds.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Armonk，N.Y.：M.E.Sharpe，1987.

魯思·海霍、瑪麗安·巴斯蒂編：《中國的教育和工業化世界：文化變遷的研究》

[591]HC.Hung-ch’i.

《紅旗》

[592]Heaton，William.“Maoist revolutionary strategy and modem colonization：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ong Kong.”Asian Survey，10.9（September 1970），840—857.

威廉·希頓：“毛主義的革命戰略與現代殖民化：‘文化大革命’在香港”

[593]Hellmann，Donald c.，ed.China and Japan：a newb alance of power.Lexington，Mass.：[Heath]Lexington Books，1976.

唐納德·C.赫爾曼編：《中國和日本：一種新的均勢》

[594]Henderson，Gail，and Cohen，Myron S.The Chinese hospital.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蓋爾·亨德森、邁倫·S.科恩：《中國的醫院》

[595]Hersey，John.“A reporter at large：homecoming，part 3.”The New Yorker，May 1982，44—66.

約翰·赫西：“一個未被捕的記者”第3部分

[596]Hersh，Seymour.The price of power：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New York：Summit Books，1983.

西摩·赫什：《權力的代價：尼克松當政時期的基辛格》

[597]Hevi，Emmanuel John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New York：Praeger，1963[1962].

伊曼紐爾·約翰·赫維：《在中國的一個非洲學生》

[598]HHPYK.Hsin-hua pan-yueh k’an

《新華半月刊》

[599]HHYP.Hsin-hua yueh-pao.

《新華日報》

[600]Higher Education Battlefront.See Chung-kuo kao-teng chiao-yü

《高教戰線》，見《中國高等教育》

[601]Hilsman，Roger.To move a nation：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ohn F.Kennedy.New York：Dell，1968.

羅杰·希爾斯曼：《推動一個國家：約翰·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的政治》

[602]Hindley，Donald.“Political power and the October 1965 coup in Indonesia.”JAS，27（1969），237—249.

唐納德·欣德利：“印度尼西亞的政治權力和1965年10月的政變”

[603]Hinrup，Hans J.An index to“Chinese literature”，1951—1976.London：Curzon Press，1978.

漢斯·F.欣魯普《（：中國文學）索引（1951—1976）》

[604]Hinton，Harold.The bear at the gate：Chinese policy making under Soviet pressure.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71.

哈羅德·欣頓：《熊在門口：在蘇聯壓力下中國政策的制定》

[605]Hinton，Harold.Three and a half powers：the new power balance in Asi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5.

哈羅德·欣頓：《三個半大國：亞洲新的均勢》

[606]Hinton，Harold C.，ed.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a documentary survey.5 vols.Wilmington，Del.：Scholarly Resources，1980.

哈羅德·C.欣頓編：《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79）》

[607]Hinton，Harold C.，ed.，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9—1984：a documentary survey.2 vols.Wilmington，Del.：Scholarly Resources，1986.

哈羅德·C.欣頓編：《中華人民共和國（1979—1984）》

[608]Hinton，Harolct C.“China and Vietnam”，in Tang Tsou，ed.，China in crisis，2.201—236.

哈羅德·C.欣頓：“中國和越南”

[609]Hinton，William.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Vintage Books，1967；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6.

威廉·欣頓：《翻身》

[610]Hinton，William.Hundred day war：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2.

威廉·欣頓：《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

[611]Hinton，WilliamS.hen fan：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Random House，1983.

威廉·欣頓：《身翻》

[612]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Peking：FLP，1959.

《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613]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Bolshevik）.Short course.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9.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614]History Writing Group of the CCP Kwangtung Provincial Committee.“The ghost of Empress Lü and Chiang Ch’ing's empress dream.”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12.1（Fall 1978），37—54.

中共廣東省委歷史寫作小組：“呂后的幽靈與江青的女皇夢”

[615]Ho，Samuel Pao-San.“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Korea，Taiwan，and Kwantung”，in Ramon H.Myers and Mark R.Peattie，eds.，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347—398.

塞繆爾·何保山（音）：“殖民主義與發展：韓國、臺灣和廣東”

[616]Ho Chih[Ch’in Chao-yang].“Sien-shih chu-i-kuang-k’uo ti tao-lu”（Realism-the broad highway）.Jen-min wen-hsueh，9（19566），1—13.

何直（秦兆陽）：“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

[617]Ho Hsin.Chung-kuo hsien-tai hsiao-shuo ti chu-ch’ao（Major trends in modem Chinese fiction）.Taipei：Yuan-ching，1979.

何欣：《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

[618]Ho-pei wen-i（Hopei literature and art）.Monthly.Shih-chia-chuang：1949—T.itle changed to Ho-pei wen-hsueh（Hopei literature）after 1987.

《河北文藝》（1987年起改名《河北文學》）

[619]Ho Ping-ti and Tsou，Tang，eds.China in Crisis：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Vol.1，in two books.Foreward by Charles U.Dal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何炳棣、鄒讜編：《危機中的中國：中國的傳統繼承和共產主義政治體制》

[620]Hoffmann，Charles.The Chinese worker.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5[1974].

查爾斯·霍夫曼：《中國工人》

[621]Holden，Reuben.Yale in China：the mainland，1901—1951.New Haven，Conn.：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1964.

魯本·霍爾登：《耶魯大學在中國大陸（1901—1951）》

[622]Holmes，Robert A.“Burm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since 1962.”Pacific Affairs，45.2（Summer 1972），240—254.

羅伯特·A.霍姆斯：“1962年以來緬甸對中國的外交政策”

[623]Holsti，K[al]J.[Kalevi Jaakko]，et al.Why nations realign：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war world.London and Boston：Allen＆Unwin，1982.

K.J.霍爾斯蒂：《國家為何重組：戰后世界各國外交政策的調整》

[624]Hooper，Beverley.Inside Peking：a personal report.Foreword by Stephen Fitz-Gerald.London：Macdonald＆Jane's，1979.

貝弗利·胡珀：《北京內幕：一份個人報告》

[625]Howe，Christopher.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China，1949—195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克里斯托弗·豪：《中國城市的就業和經濟增長（1949—1957）》

[626]Howe，Christopher.Wage patterns andw age policy in modern China，1919—197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克里斯托弗·豪：《現代中國的工資類型和工資政策（1919—1972）》

[627]Howe，Christopher，ed.Shanghai：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克里斯托弗·豪編：《上海》

[628]Hsi-chü pao（Theater news）.Monthly.Peking：1950—F.ormerly Jen-min hsi-chü（People's theater）.

《戲劇報》（原名《人民戲劇》）

[629]Hsia，C.T.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With an appendix on Taiwan by Tsi-an Hsi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1961）.

夏志清：《現代中國小說史（1917—1957）》

[630]Hsia，C.T.“The continuing obsession with China：three contemporary writers.”Review of National Literatures，6.1（1975），76—99.

夏志清：“對中國無限眷戀：三個當代作家”

[631]Hsia Chih-ch’ing（C.T.Hsia）.Hsin wen-hsueh ti ch’uan-t’ung（The tradition of the new literature）.Taipei：Shih-pao wen-hua kung-ssu，1979.

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

[632]Hsia yen.“To，k’uai，hao，sheng，liang chung ch’iu chih”（More，faster，better，more economically，seeking quality in quantity）.Wen-i pao，6（1958），26.

夏衍：“多、快、好、省，量中求質”

[633]Hsiang，Nai-kung.“The relations between Hanoi and Peiping.”Chinese Communist Affairs，1.4（December 1964），9—21.

向乃光（音）：“河內與北平的關系”

[634]Hsiao，Gene T.，and Witunski，Michael，eds.Sino-American normalizatio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New York：Praeger，1974.

蕭錚、邁克爾·威圖恩斯基：《中美關系正常化及其政策深意》

[635]Hsiao Yen-chung，ed.Wan-nien Mao Tse-tung：kuan-yü li-lun yüshih-chien ti yen-chiu（Mao Tse-tung in his later years：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Preface by Li Jui.Peking：Ch’un-ch’iu，1989.

蕭延中編：《晚年毛澤東：關于理論與實踐的研究》

[636]Hsieh，Chiao-minT.aiwan-Ilba Formosa，a geography in perspective.Washington，D.C.：Butterworth，1964.

謝覺民：《臺灣—厄爾巴—福摩薩》

[637]Hsien-tai wen-hsueh（Modern literature）.Bimonthly.Taipei：1960—1973，1977—.

《現代文學》

[638]Hsin-hua pan-yueh k’an（New China semi-monthly）.Peking：1956—1961.Formerly Hsin-hua yueh pao（New China monthly）.Peking：1949—1955.In 1962，again became known as Hsin-hua yueh-pao，the name it retains at present.

《新華半月刊》（1956—1961），曾名《新華月報》（1949—1955），1962年又恢復《新華日報》之名

[639]Hsin-hua t’ung-hsun-she（New China News Agency）.

新華通訊社

[640]Hsin Hua-wen.Tachai，standard-bearer in China's agriculture.Peking：FLP，1972.

辛華文（音）：《大寨：中國農業的旗手》

[641]Hsin-hua wen-chai（New China digest）.Monthly.Peking：1981—.Formerly（1979—1981）Hsin-hua yueh-pao wen-chai-pan（New China monthly digest）.

《新華文摘》，1979—1981年曾名《新華月報文摘版》

[642]Hsing-hsing（Stars）.Monthly.Chengtu：1957—1960，1979—.

《星星》

[643]Hsiung，James Chieh.Ideology and practice：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New York：Praeger，1970.

熊價：《意識形態和實踐》

[644]Hsiung，James C（hieh）.，et al.，eds.The Taiwan experience，1950—1980：contemporary Republic of China.New York：Praeger，1981.

熊價：《臺灣經驗（1950—1980）》

[645]Hsu，Cho-yun，ed.“Cultural values and cultural continuity”，Section 1 in James C.Hsiung et al.，eds.，The Taiwan experience，1950—1980，19—61.

許綽云編：“文化價值和文化的連續性”

[646]Hsu，Kai-yu，ed.and trans.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4.

許芥煜編：《20世紀中國詩歌選》

[647]Hsu，Kai-yu.The Chinese literary scene：a writer's visi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Vintage Books，1975.

許芥煜：《中國文學界：一個作家對人民共和國的訪問》

[648]Hsu，kai-yu，ed.，with Ting Wang，co-editor，and special assistance of Howard Goldblatt，Donald Gibbs，and George Chen.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

許芥煜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

[649]Hsu，Vivian Ling，ed.Born of the same roots：stories of modern Chinese wome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

維維安·蘇林（音）編：《同根生：現代中國婦女故事》

[650]Hsuehhsi-tzu-liao（Materials for Study）.

《學習資料》

[651]Hsueh-hsi wen-hsuan（Documents for Study）.1967.

《學習文選》

[652]Hsueh-hsi yü pi-p’an（Study and Criticism）.Monthly.Shanghai：1973—1976.

《學習與批判》

[653][Hsueh Mu-ch’iao]Xue Mugiao，ed.Almanac of China's economy，1981，with economic statistics for 1949—1980，Economic Research Centr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comps.Hong Kong：Modern Cultural Co.，1982.

薛暮橋編：《中國經濟年鑒》（1981）（附及1949—1980年經濟統計資料）

[654]Hsueh Yeh-sheng，ed.Yeh Chien-ying kuang-hui-ti i-sheng（Yeh Chienying's glorious life）.Peking：Chieh-fang-chün，1987.

薛冶生編：《葉劍英光輝的一生》

[655]Hu Ch’iao-mu.“Tang-ch’ien ssu-hsiang chan-hsien ti jo-kan wen-t’i”（Some current problems on the thought front）.HC，23（1981），2—22.

胡喬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

[656]Hu Hua.Chung-kuo she-hui-chu-i ko-ming ho chien-she shih chiang-i（Teaching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Peking：Chung kuo jen-min ta-hsueh，1985.

胡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

[657]Hu Hua，ed，Chung-kung tang-ship jen-wu-chuan（Biographies of personalit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ian：Shensi Jen-min.More than 40 volumes.

胡華：《中共黨史人物傳》

[658]Hu Hui-ch’iang.“Ta lien kang-t’ieh yun-tung chien-k’uang”（A brief account of the campaign to make steel in a big way）.Tangs-hih yen-chiu tzu-liao，4（1983），762—765.

胡惠強：“大煉鋼鐵運動簡況”

[659]Hu Shi Ming and Seifman，Eli，eds.Toward a new world outloo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6.New York：AMS Press，1976.

胡實明（音）、伊萊·塞夫曼編：《展望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資料》

[660]Hu Wan-ch’unM.an of a special cut.Peking：FLP，1963.

胡萬春：《特殊性格的人》

[661]Hu Yao-pang.“Li-lun kung-tso wu-hsu-hui yin-yen”（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work conference）.in Chung-kung shih-i-chieh san-chungch’üan—hui i-lai chung-yang shou-yao chiang-hua chi wen-chien hsuan-pien，2.48—63.

胡耀邦：“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

[662]Hua-ch’iao jih-pao（China daily news）.New York：1940—1989.

《華僑日報》

[663]Huac-hung shih-fan ta-hsueh hsueh-pao（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Bimonthly.Wuhan：1955—.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

[664]Hua Fang.“Lin Piao's abortivecounter-revolutionary coup d’état.”PR，23.51（22 December 1980），19—28.

華方（音）：“林彪流產的反革命政變”

[665]Hua Kuo-feng.“Political report to the 11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tst Party of China（12 August 1977）.”PR，20.35（26 August 1977），23—57.

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666]Hua Kuof-eng.“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at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26 February 1978.PR，21.10（10 March 1978）.

華國鋒：“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

[667]Hua Kuo—feng.“Unite and strive to build a modern，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delivered at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26 February 1978.”PR，21.10（10 March 1978），7—40.

華國鋒：“團結起來，為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在1978年2月26日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

[668]Hua-nan shih-fan ta-hsueh hsueh-pao（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Quarterly.Canton：1956—.

《華南師范大學學報》

[669]Huat-ung shih-fan ta-hsueh hsueh-pao（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Bimonthly.Shanghai：1955—.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670]Huai-nien Chou En-lai（Longing for Chou En-lai）.Peking：Jen—min，1986.

《懷念周恩來》

[671]Huang Chien-Ch’iu；Sun Ta-li；Wei Hsin-Sheng；Chang Chan-pin；and Wang Hung-mo，eds.Hsin shih-ch’i chuan-t’i chi-shih（1976.10—1986.10）（Important events and special problems of the new period）.Peking：Chung-kung tang-shih tzu-liao，1988.

黃見秋、孫大力、魏新生、張占斌、王洪模編：《新時期專題紀實》

[672]Huang ch’iu-yun.“T’an ai-ch’ing”（On love）.Jenmi-n wen-hsueh，7（1956），59—61.

董秋耘：《談愛情》

[673]Huang Ho（Yellow River）.Monthly.Taipei：1979—.

《黃河》

[674]Huang，Joe C..Heroes and villains in communist China：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al as a reflection of life.London：C.Hurst；New York：Pica Press，1973.

黃胄：《共產黨中國的英雄和壞蛋》

[675]Huang，Mab.Intellectual ferment for political reforms in Taiwan，1971—1973.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6.

馬黃（音）：《臺灣知識分子的騷動：要求實行政治改革（1971—1973）》

[676]Hudson，G.F.；Lowenthal，Richard；and MacFarquhar，Roderiek.The Sino-Soviet dispute.New York：Praeger，1961.

G.F.赫德森、理查德·洛溫撒爾、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中蘇爭端》

[677]Hughes，John.“China and lndonesia：the romance that failed”.Current Scene，19（4 November 1969），l—15.

約翰·休斯：“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失敗的羅曼史”

[678]Hung-ch’i（Red flag）.Peking：1958—1988.Cited as HC.

《紅旗》

[679]Hung-wei pao（Red Guard news）.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1966—1967.

《紅衛報》

[680]Hunter，Neale.Shanghai journal：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oston：Beacon Press，1971；New York：Praeger，1969.

尼爾·亨特：《上海日記：文化革命目擊記》

[681]Hwang，Chun-ming[Huang Ch’un-ming].The drowning of an old cat，and other stories.Trans.Howard Goldblatt.Blooming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

黃春明（音）：《一個墮落的壞女人及其他故事》

[682]Hyer，Paul，and Heaton，William“.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CQ，36（October-December 1968）114—128.

保羅·海爾、威廉·希頓：“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

[683]I-chiu-ch’i-pa nien ch’uan-kuo yu-hsiu tuanp’ien-hsiao-shuo p’ing-hsuan tso-p’in-chi（Critical selection of the best short stories of the whole nation published in 1978）.Peking：Jen-min wen-hsueh，1980.

《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集》

[684]IASP.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國際藝術和科學出版社

[685]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Peking：FLP，1970.

《有關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

[686]Index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China.Monthly plus annual cum.（New Canaan，Conn.：News Bank，Inc.，1975— ）.From 1975 to 1982，the index was published quarterly，but with Volume 9 in 1983，the publication became a monthly，with an annual cumulative index as well.Beginning in October 1977，FBIS began to compile an index to the Daily Report as well as the JPRS translations.With the fifteenth number in this series covering April to June 1981（published 28 August 1981），the series acquired the designation“For Official Use Only”and was no longer available to libraries.

《外國廣播信息處動態索引：中國》

[687]Inside China Mainland.Monthly.Taipei：Institute of Current China Studies，1979—.

《中國大陸內幕》

[688]International Affairs /Mezhdunarodnaya zhizn’.Monthly.Moscow：Vs esoyuznoe Obshchestvo“Znani”，1955—.Editions in English，French and Russian.

《國際事務》

[689]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aily.Paris.

《國際先驅論壇報》

[690]International Journal.Quarterly.Toronto：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46—.

《國際雜志》

[691]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Newbury Park，Calif.：Sage Publications.（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1961—Formerly International Studies Newsletter.

《國際研究》

[692]Iowa Review.Iowa City：School of Letters and the Graduate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Iowa，1970—.

《衣阿華評論》

[693]Israel，John.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約翰·伊斯雷爾：《中國學生的民族主義（1927—1937）》

[694]Israel，John.“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the ideology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in Chalmers A.Johnson，ed.，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3—46.

約翰·伊斯雷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

[695]Issues＆Studies.Monthly.Taipei：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64—.

《問題和研究》

[696]Izvestia.Daily.Moscow：Presidium of Supreme Soviet of the USSR，1917—.

《消息報》

[697]Jacobs，J.Bruce.Local politics in a rural Chinese cultural setting：a field study of Mazu Township，Taiwan.Canberra：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0.

J.布魯斯·雅各布斯：《在一個農村中國文化環境中的地方政治》

[698]Jacobs，J.Bruce；Hagger，Jean；and Sedgley，Anne，comps.Taiwan：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lanuage publications.Introduction by J.Bruce Jacobs.Bundoor，Victoria：Borchardt Library，La Trobe University；New York：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84.

J.布魯斯·雅各布斯、瓊·哈格、安妮·塞奇利：《臺灣英語出版物綜合目錄》

[699]Jacobsen，C.G.[Carl G.].Sino-Soviet relations since Mao：the Chairman's legacy.New York：Praeger，1981.

C.G.雅各布森：《毛以來的中蘇關系：毛主席的遺產》

[700]Jacobson，Harold K.，and Oksenberg，Michel.“China and the keyston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Unpublished manuscript，1987.

哈羅德·K.雅各布森、邁克爾·奧克森伯格：“中國與基本的國際經濟組織”

[701]Jacoby，Neil H.U.S.aid to Taiwan：a study of foreign aid，self-help and development.New York：Praeger，19 6 6.

尼爾·H.雅各比：《美國對臺灣的援助》

[702]Jacques，Tania.“Sharqiy Türkstan’or‘Sinkiang’？”Radio Liberty Research，RL 98/75（7 March 1975），1—4.

塔尼亞·雅克：“東土耳其斯坦還是‘新疆’？”

[703]James，Clive.“Laughter in the dark.”New York Reviewo f Books，19 March 1981，19—20.

克萊夫·詹姆斯：“黑暗中的笑聲”

[704]JA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亞洲研究雜志》

[705]Jen Ku-p’ing.“The Munich tragedy and contemporary appeasement.”JMJP，26 November 1977，PR，20.50（9 December 1977），6—11.

任谷平：“慕尼黑的悲劇和當代的綏靖主義”

[706]Jen-min chiao yü（People's education）.Monthly.Peking：1950—.

《人民教育》

[707]Jen-min ch’u-pan-she.People's Publishing House.Cited as Jen-min.

人民出版社

[708]Jen-min jih-pao Editorial Department.“Chairman Mao's theory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Marxism-Leninism.”PR，20.45（4 November 1977），10—41.

《人民日報》編輯部：“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

[709]Jen-min jih-pao（People's daily）.Peking：1949—.Cited as JMJP.

《人民日報》

[710]Jen-min jih-pao so-yin（Index to People's daily）.Peking：1951—.

《人民日報索引》

[711]Jen-min shou-ts’e（People's handbook）.Peking：1950—1953，1956—1965，1979.

《人民手冊》

[712]Jenmi-n ta hsien-chang hsueh-hsi shou-ts’e（Handbook for the study of the great pepole's constitution）.Shanghai：Chan-wang chou-k’an，November 1949.

《人民大憲章學習手冊》

[713]Jen-min ta hsien-chang hsueh-hsi tzu-liao（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great people's constitution）.Tientsin：Lien-ho t’u-shu，1949.

《人民大憲章學習資料》

[714]Jen-min wen-hsueh（People's literature）.Peking：1949—1966，1976—.

《人民文學》

[715]Jenner，W.J.F.“1979：a new start for literature in China？”CQ，86（June 1981），274—303.

W.J.F.唐納：“1979年：中國文學的一個新起點？”

[716]JMJP.Jen-min jih-pao.

《人民日報》

[717]Jo，Yung-Hwan，ed.Taiwan's future：Tempe：Center for Asian Studies，Arizona State University，1974.

喬云萬（音）編：《臺灣的未來》

[718]Joffe，Ellis.Party and army：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1949—1964.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5.

埃利斯·喬菲：《黨與軍隊：中國軍官的職業化與政治控制（1949—1964）》

[719]Joffe，Ellis.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埃利斯·喬菲：《毛以后的中國軍隊》

[720]Joffe，Ellis.“The Chinese army under Lin Piao：prelude to political intervention”，in John M.H.Lindbeck，ed.，China：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343—374.

埃利斯·喬菲：“林彪控制下的中國軍隊：政治干預的前奏”

[721]Johnson，Cecil.Communist China and Latin America，1959—196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

塞西爾·約翰遜：《共產黨中國和拉丁美洲（1959—1967）》

[722]Johnson，Chalmers A.，ed.Ideology and pol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3.

查默斯·A.約翰遜編：《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與政治》

[723]Johnson，Irmgard.“The reform of Peking Opera in Taiwan.”CQ，57（January—March 1974），140—145.

伊爾姆加德·約翰遜：“臺灣的京劇改革”

[724]Johnson，Kay AnnW.omen，the family，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凱·安·約翰遜：《中國的婦女、家庭和農民革命》

[725]Johnson，Stuart E.，with Joseph A.Yager.The military equation in northeast Asia.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9.

斯圖爾特·E.約翰遜、約瑟夫·A.亞格爾：《東北亞的軍事平衡》

[726]Joint Economic Committee.Se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

[727]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JPRS）.Washington，D.C.：U.S.Government.Various series.See Peter Berton and Eugene Wu，Contemporary China：A Research Guide.Standford，Calif.：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409—430，and M.Oksenberg summary in CHOC，14.557—558.Includes regional，worldwide and topical translations and reports.Pub lished periodically.The following items are cited in footnotes：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Miscellany of Mao Tse-tung Thought.See Mao Tse-tung，Miscellany…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Translations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developments.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Bibliography-index to U.S.JPRS research translations.See Kyriak，Theodore.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China Area Report（CAR）.1987—.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China report：Red Flag.Monthly.Continues Translations from Red Flag.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China/Skate Council Bulletin（CSB）.1987—.Cited as CSB.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China report：political，sociolog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1979—1987.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Translations on Communist China：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information.1962—1968.

聯合出版物研究署：

《毛澤東思想雜錄》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譯文集》

《美國聯合出版物研究署研究譯文書目索引》

《中國地區報告（CAR）》

《中國報告：紅旗》

《中國/國務院公報》

《中國報告：政治、社會和軍事事務（1979—1987）》

《關于共產黨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情報的譯文（1962—1968）》

[728]Jones，Hywell G.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New York：McGraw-Hill，1976.

海韋爾·G.瓊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導論》

[729]Joseph，William A.The critique of ultra-leftism in China，1958—1981.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威廉·A.約瑟夫：《評1958—1981年中國的極左思潮》

[730]Journal of Asian Studies.Quarterly（irregular）.Ann Arbor：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41—C.ited as JAS.

《亞洲研究雜志》

[731]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San Diego，Calif.：Academic Press，1971—.

《比較經濟學雜志》

[732]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Quarterly.Nashville，Tenn.：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63—.

《經濟文獻雜志》

[733]JPRS.See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734]Jukes，Geoffrey.The Soviet Union in Asia Sydney：Angus＆Roberts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杰弗里·朱克斯：《蘇聯在亞洲》

[735]Ka -ko：wo-men mien-lin ti t’iao-chan Yü hsuan-tzu（Reform：we face challenge and alternative）.General Survey Group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Systems Reform.Peking：Chung-kuo ching-chi，1986.

《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

[736]Kalick，J.H.The pattern of Sino-Ameriean cris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J.H.卡利基：《中美危機的模式》

[737]Kan yu ko yin tung ti ai（Dare a song to move the earth to grieve）.Hong Kong：Ch’i-shih nien-tai，1974.

《敢有歌吟動地哀》

[738]Kane，Penny.Famine in China，1959—1961：demograph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

彭尼·凱恩：《中國的饑荒（1959—1961）：人口統計和社會影響》

[739]Kao chiao chan-hsien.See Chungk-uo kao-teng chiao-Yü

《高教戰線》

[740]Kao Kao and Yen Chia-Ch’i.“Wen-hua ta-ko-ming”shih-nien shih，1966-1976（A history of the ten years of the“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Tientsin：Jen-min，1986.

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

[741]Kao-teng chiao-yü yen-chiu（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Quarterly.Wuhan：1980—

《高等教育研究》

[742]Kao Wen-hsi.“china's cement industry”，in Chungk-uo ching-chi nien-chien，1982，Part Ⅴ.

高文習（音）：“中國的水泥工業”

[743]Kao Yü-pao.“How I became a writer.”Chinese Literature，6（June 1972），111—118.

高玉寶：“我是怎樣成為一名作家的”

[744]Kaplan，John.The court-martial of the Kaohsiung defendants.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1.

約翰·卡普蘭：《軍事法庭上的高雄被告》

[745]Karnow，Stanley.Mao and China：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New York：Viking Press，1972.

斯坦利·卡諾：《毛與中國：不斷革命》

[746]Karnow，Stanley.Vietnam，a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New Virk：Viking Press，1983.

斯坦利·卡諾：《越南史》

[747]Kates，George N.The years that were fat.the last of old China.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6[1952].Intro.by John K.Fairbank.

喬治·N.凱茨：《豐收的年歲》

[748]Kau，Michael Y.M.[Ying-mao]，ed.The Lin Piao affair：power politics and military coup.White Plains，N.Y.：IASP，1975.

高英茂編：《林彪事件：權力政治和軍事政變》

[749]Kau，Michael Y.M.，and Leung，John K.，eds.The writings ofMao Zedong 1949—1976.Vol.1.September 1949—December 1955.Armonk，N.Y.：M.E.Sharpe，1986.

高英茂、約翰·K.龍（音）編：《毛澤東文選（1949—1976）》第1卷，1949年9月至1955年12月

[750]Kau，Ying-mao.“The case against Lin Piao.”CLG，5.3—4（Fall—Winter 1972—1973），3—30.

高英茂：“反林彪事件”

[751]Keesing's Research Report.The Sino-Soviet dispute.Bristol：Keesing's，1970；New York：Scribner，1969.

基辛的研究報告：《中蘇爭端》

[752]Kerr，Clark，et al.Observation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ducation and work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port of a study group.Berkeley，Ca-lif.：The Carnegie Council on Policy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1978.

克拉克·克爾等編：《中國的教育和勞動關系評論》

[753]Kerr，George H.Formosa betrayed.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5.

喬治·H.克爾：《被出賣的福摩薩》

[754]Kerr，George H.Formosa：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1895—1945.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4.

喬治·H.克爾：《福摩薩：特許的革命與地方自治運動（1895—1945）》

[755]Kessen，William，ed.Childhood in Chin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

威廉·凱森編：《中國的兒童》

[756]Kessler，Lawrence D.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1661—1684，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勞倫斯·D.凱塞勒：《康熙和清統治的鞏固（1661—1684）》

[757]Kim，Ilpyong J.“Chinese Communist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continuity and change.”JAS，13.4（December 1970），59—78.

金日平（音）：“中國共產黨與北朝鮮關系的演變”

[758]Kim，Roy U.T.“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Asian Survey，8（August 1968），17—25.

羅伊·U.T.金：“中國和北朝鮮的關系”

[759]Kim，Samuel S.China，the United Nations，and world ord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塞繆爾·S.金：《中國、聯合國和世界秩序》

[760]Kim，Samuel S.ed.China and the world：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Mao era.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4.

塞繆爾·S.金：《中國與世界：毛以后時代中國的外交政策》

[761]Kim，Samuel S.“Chinese world policy in transition.”World Policy Journal，1.3（Spring 1984），603—633.

塞繆爾·S.金：“中國轉變中的世界政策”

[762]Kinkley，Jeffrey C.，ed.After Mao：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1978—1981.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5.

杰弗里·C.金克利編：《毛以后：中國的文學和社會（1978—1981）》

[763]Kinmer，William R.，and Copper，John F.A matter of two Chinas：the China-Taiwan issue in U.S.foreign policy.Philadelphia：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1979.

威廉·R.金特納、約翰·F.科珀：《兩個中國問題》

[764]Kirkby，Richard.Urbanization in China：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1949—2000 A.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理查德·柯克拜：《中國的城市化》

[765]Kissinger，Henry.White House Years.Boston：Little，Brown，1979.

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

[766]Kissinger，Henry.Years of upheaval.Boston：Little，Brown，1982.

亨利·基辛格：《動亂年代》

[767]Kitai：obshchestvo i gosudarstvo（China：society and the state）.Moscow：Nauka，1973.

《中國：社會與國家》

[768]Kitai：traditsii i sovremennost（’China：traditions and the present）.Moscow：Nauka，1976.

《中國：傳統與現實》

[769]Kitai i sosedi（China and its neighbors）.Moscow：Nauka，1982.

《中國及其鄰國》

[770]Kitaiskaia Narodnaia Respublika 1973（—1979）.（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73[—1979].Annual.Moscow：Nauka，1975—1981.

《中華人民共和國（1973—1979）》

[771]Kiuzazhian，L.S.Ideologicheskie Kampanii v KNR 1949—1966（Ideological campaigns in the PRC 1949—1966）.Moscow；Nauka，1970.

L.S.丘扎基里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形態運動（1949—1966）》

[772]Klein，Donald W.“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John W.Lewis，ed.，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China，351—372.

唐納德·W.克萊因：“國務院和‘文化大革命’”

[773]Klein，Donald W.“Peking's diplomats in Africa.”Current Scene，2.36（1 July 1964），l—9.

唐納德·W.克萊因：“在非洲的北京外交官”

[774]Klein，Donald W.，and Clark，Anne B.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1965.2 v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唐納德·W.克萊因、安妮·B.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人名詞典（1921—1965）》

[775]Klein，Donald W.，and Hager，Lois B.“The Ninth Central Committee”，CQ，45（January-March 1971），37—56.

唐納德·W.克萊因、洛伊斯·B.黑格：“第九屆中央委員會”

[776]Klenner，Makiko.Literaturkritik and politische Kritik in China：die Ausein-andersetzungen um die Literaturpolitik Zhou Yangs.Bochum：Studienverlag Brockmeyer，1979.

邁其高·克倫納：《中國文藝與政治評論：周揚的文藝政治觀》

[777]Klochko，Mikhail A.Soviet scientist in Red China.Trans.Andrew MacAndrew.New York：Praeger，1964.

米哈伊爾·A.克洛奇科：《在紅色中國的蘇聯科學家》

[778]KMJP.Kuang-ming jih-pao.

《光明日報》

[779]Knight，Nick.Mao Zedong's“On contradiction”：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pre-liberation text.Griffith Asian Papers Series.Nathan，Queensland：Griffith University，1981.

尼克·奈特：《毛澤東的〈矛盾論〉：解放前的注釋譯本》

[780]Knight，Nick.“Mao Zedong's 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pre-liberation texts.”CQ，84（December 1980），641—668.

尼克·奈特：“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解放前的版本”

[781]Ko Ch’in.“Hai-yen”：（Stormy petrel）.Jem-minw en-hsueh，3（1958），31—50.

葛琴：《海燕》

[782]Ko-ming shih ch’ao（A transcript of revolutionary poems）.2 vols.Peking：Ti-erh wai-kuo-yü hsueh-yuan，1977.

《革命詩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783]Ko-ming-shih tzu-liao（Reference materials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Quarterly.Shanghai：1979—F.ormerly Tang-shih tzu-liao（Reference materials ofParty histroy）.

《革命史資料》，原名《黨史資料》

[784]Ko Pi-chou.Pei-mang-shan hsin-hsing ssu-shou（Four new songs of Peimang Mountain）.JMJP，24 March 1962.

戈壁舟：《北邙山新行四首》

[785]K’o-chi jih-pao（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3/week.Peking；1986—.

《科技日報》

[786]K’o-hsueh wen-hua pao（Scientific culture news）.3/week.Canton：1984—.

《科學文化報》

[787]Koen，Ross Y.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C.Kagan.New York：Octagon Books，1974；New York：Macmillan，1960.

羅斯·Y.科恩：《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

[788]Kokubun，Ryosei.“The politic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China：the case of plant cancellations with Japan.”CQ，105（March 1986），19—44.

良清國分：“中國對外經濟制定中的政治”

[789]Kommunist.18/yr.Moscow：Pravda Tsentral’nogo Komiteta KPSS，1924—.[Until 1952 published as Bolshevik.]

《共產黨人》（1952年以前為《布爾什維克》）

[790]Komsomolskaya Pravda.300/yr.Moscow：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YCL，1925—.

《共產主義真理報》

[791]Koo，Anthony Y.C.The role of land reform in economic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Taiwan.New York：Praeger，19 68.

安東尼·Y.C.顧（音）：《土改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792]Krasnaia Zvezda（Red star）.Daily.Moscow：1924—.[Central organ of Ministry of Defense of the USSR]

《紅星報》

[793]Kraus，Richard Curt.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理查德·柯特·克勞斯：《中國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

[794]Krivtsov，V[ladimir]A[leksaevich]；Markova，S.D.；and Sorokin，V.F.，eds.Sud’by kul’tury KNR 1949—1974（The fate of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4）.Moscow：Nauka，1978.

V.A.基維佐夫、S.D.馬爾科娃、V.F.索羅金編：《文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命運（1949—1974）》

[795]《Kuan-yü chien-kuo-i-lai tang-ti jo-kan li-shih wen-t’i ti chuehVi》chu-shihpen（hsiu-ting）.（Revised annotated edition of the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Peking：Jen-min，1985.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

[796]“Kuan-yü kuo-min-tang tsao-yao wu-mieh ti teng-tsai so-wei‘wu Hao ch’ishih’wen-t’i ti wen-chien”（Document on the problems of the Kuomintang maliciously concocting and publishing the so-called‘Wu Hao no tice’）.Tang-shih yen-chiu，1（1980），8.

“關于國民黨造謠誣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文件”

[797]“Kuan-yü wo-kuo ti tui-wai ching-chi kuan-hsi wen-t’i”（On the question of our country's external economic relations）.Editorial Department.HC，8（16 April 1982），2—10.

“關于我國的對外經濟關系問題”

[798]Kuang-chouw en-i（Canton literature and art）.Monthly.Canton：1973—.Formerly Kung-nung-ping wen-i（Worker-peasant-soldier literature and art）.

《廣州文藝》（原名《工農兵文藝》）

[799]Kuang-ming jih-pao（Enlightenment daily）.Peking：1949—.

《光明日報》

[800]Kubin，Wolfgang，and Wagner，Rudolf G.，eds.Essay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papers of the Berlin Conference，1978.Bochum：Germany：N.Brockmeyer，1982.

沃爾夫岡·庫賓、魯道夫·G.瓦格納編：《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學評論文集：1978年柏林會議論文集》

[801]Kuhn，Philip A.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aperback ed.with new preface，1980.

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和社會結構》

[802]Kun，Joseph C.“North Korea：between Moscow and Peking.”CQ，31（July-September 1967），48—58.

約瑟夫·C.昆：“處在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北朝鮮”

[803]Kung Yü-chih.“Fa-chan k’o-hsueh pi-yu chih lu—chieh-shao Mao Tse-tung t’ung-chih wei ch’uan-tai‘Ts’ung iVch’uan hsueh t’an pai-chia cheng-ming’i wen hsieh ti hsin ho an-yü”（The way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must follow-presenting Comrade Mao Tse-tung's letter and annotation relating to the republication of“Let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tics”）.Kuang-ming jih-pao，28 December 1983.

龔育之：“發展科學必由之路——介紹毛澤東同志為轉載‘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寫的信和按語”

[804]Kung Yü-chih.“Mao Tse-tung yü tzu-jan k’o-hsueh”（Mao Tse-tung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in Kung yü-chih et al.，eds.，Mao Tse-tung ti tu-shu sheng-huo，83—114.

龔育之：“毛澤東與自然科學”

[805]Kung yü-chih.“‘Shih-chien lun'san t’i”（Three points regarding“On practice”），in Lun Mao Tse-tung che-hsueh ssu-hsiang，66—86.

龔育之：“《實踐論》三題”

[806]Kung yü-chih，P’ang Hsien-chih，and Shih Ch’ung-ch’uan.Mao Tse tung ti tu-shu sheng-huo（Mao Tse-tung's reading activities）.Peking：San-lien shutien，1986.

龔育之、逄先知和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

[807]Kun-lun（Kunlun literary bimonthly）.Bimonthly.Peking：1982—.

《昆侖》

[808]Kuo-chi wen-t’i yen-chiu（Journal of interational studies）.Quarterly.Peking：1959—.

《國際問題研究》

[809]Kuo Hsiao-ch’uan.Kan-che-lin（Sugarcane forest）.Peking：Tso-chia，1963.

郭小川：《甘蔗林》

[810]Kuo Mo-jo.Li Po yü Tu Fu（Li T’ai-po and Tu Fu）.Peking：Jen-min wen-hsueh，1971.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

[811]KuoMo-jo.Mo-jo shi-tz’u hsuan（Selected poems of[Kuo]Mo-jo）.Peking：Jen-min wen-hsueh，1977.

郭沫若：《沫若詩詞選》

[812]Kuo Mo-jo.“Chiu mn-ch’ien ch’uang-tso chung ti chi-ko wenVt’i”（Some current problems in creative writing）.Jen-min wen-hsueh，I（1959），4—9.

郭沫若：“就目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

[813]Kuo Mo-jo.“Three poems.”Chinese Literature，1（1972），50—52.

郭沫若：“詩三首”

[814]Kuo Mo-jo.“On seeing‘The monkey subdues the demon.’”Chinese Literature，4（1976），44.

郭沫若：“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815]Kuo Mo-jo.“Kuo Mo-jo's poem.”Chinese Literature，4（1976），50.

郭沫若：“郭沫若詩詞”

[816]Kuo Mo-jo and Chou Yang，comps.Hung-ch’i ko-yao（Songs of the red flag）.Peking：Hung-ch’i tsa-chih she，1959.Trans.A.C.Barnes.Songs of the red flag.Peking：FLP，1961.

郭沫若、周揚編：《紅旗歌謠》

[817]Kuo，Shirley W.Y.The Taiwan economy in transition.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3.

雪莉·W.Y.郭（音）：《轉變中的臺灣經濟》

[818]Kwangtung-sheng t’ung-chi men-Chien（Kwangtung province statistical yearbook）.Kwangtung Statistical Office，1985—.

《廣東省統計年鑒》

[819]Kwong，Julia.Chinese education in transmon：prelude to the Cultural Revo -lution.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79.

朱莉婭·匡（音）：《轉變中的中國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820]Kwong，Julia.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May 1966—April 1969.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8.

朱莉婭·匡（音）：《中國學校中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969年4月）》

[821]Kyodo.News service.

共同社

[822]Kyoto Daigaku Jimbun Kagaku Kenkyusho.Mō Takutō chosaku nenpyō（Chronological table of Mao Tse-tung's works）.Vol.2.Goi sakuin（Glossary and index）.Kyoto：Kyoto Daigaku Jimbun Kagaku Kenkyūsho，1980.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毛澤東著作年表》

[823]Kyriak，Theodore，ed.Bibliography-index to U.S.JPRS resea-rch translations，vols.1—8.Annapolis，Md.：Research and Microfilm Publications，1962—.

西奧多·基里亞克編：《美國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研究譯叢書目索引》

[824]Ladany，Laszlo.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1921—1985：a self-portrait.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8.

拉斯茲羅·拉達尼：《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1921—1985）：自畫像》

[825]Lai Chih-yen，ed.Chieh-kuan ch’eng-shih ti kung-tso ching-yen（Experience in the takeover work in cities）.Peking：Jen-min，1949.

賴志衍編：《接管城市的工作經驗》

[826]Lampton，David M.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1985].

戴維·M.蘭普頓：《毛以后中國的政策貫徹》

[827]Lan Ch’eng-tung and Chang Chung-ju.“Aspirations and inclinations of this year's se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s：a survey of three high school in Shanghai.”Trans.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16.1—2（Fall—Winter 1983—1984），159—169.

藍成東、張鐘汝：“當年高中畢業生的志愿和愛好：上海三所高中一覽”

[828]Lang，Olga.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London：G.Cumberle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奧爾加·蘭：《中國的家庭和社會》

[829]Lao She.Wo je-ai hsin Pei-ching（I love new Peking）.Peking：Peking ch’upan-she，1979.

老舍：《我熱愛新北京》

[830]Lapwood，Ralph，and Lapwood，Nancy.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London：Spalding＆Levy，1954.

拉爾夫·拉普伍德、南希·拉普伍德：《中國革命縱覽》

[831]Lardy，Nicholas R.Economic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尼古拉斯·R.拉迪：《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分配》

[832]Lardy，Nicholas R.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尼古拉斯·R.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

[833]Lardy，Nicholas.“Prices，markets and the Chinese Peasant.”Center Discussion Paper，no.428.New Haven，Conn.：Yale Economic Growth Center，December 1982.

尼古拉斯·拉迪：“價格、市場和中國農民”

[834]Lardy，Nicholas.“Agricultural prices in China.”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no.606.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83.

尼古拉斯·R.拉迪：“中國農業的價格”

[835]Lardy，Nicholas R.“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stress，1958—1965.”CHOC.14.360—397.

尼古拉斯·R.拉迪：“困難重重的中國經濟（1958—1965）”

[836]Lardy，Nicholas R.，and Lieberthal，Kenneth，eds.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a non-Maoist alternative.Trans.Ma Fong and Du Anxia；introduction by the editors.Armonk，N.Y.：M.E.Sharpe，1983.

尼古拉斯·R.拉迪、肯尼思·利伯撒爾編：《陳云的發展中國的戰略：一種非毛主義的可取辦法》

[837]Larkin，Bruce D.China and Africa，1949—1970：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布魯斯·D.拉金：《中國和非洲（1949—1970）：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

[838]Lasater，Martin L.The Taiwan issue in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4.

馬丁·L.拉薩特：《中美戰略關系中的臺灣問題》

[839]Lasater，Martin L.Taiwan：facing mounting threats.Washington，D.C.：Heritage Foundation，1984[rev.1987].

馬丁·L.拉薩特：《臺灣》

[840]Latham，Richard J.“The implications of rural reforms for grass-roots cadres”，in Elizabeth J.Perry and Christine Wong，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157—173.

理查德·J.萊瑟姆：“農村改革對基層干部的影響”

[841]Lau，D.C.Menciu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0.

D.C勞：《孟子》

[842]Lau，Joseph S.M.“The concepts of time and reality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Tamkang Review，4.1（1973），25—40.

約瑟夫·S.M.勞：“現代中國小說中的時間概念和現實”

[843]Lau，Joseph S.M.“‘How much truth can a blade of grass carry？’：Ch’en Ying-chen and the emergence of native Taiwan writers.”JAS，32.4（1973），623—638.

約瑟夫·S.M.勞：“‘一葉小草能載多少真理？’：陳映真與臺灣鄉土作家的出現”

[844]Lau，Joseph S.M.，and Ross，Timothy A.，eds.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waann，1960—1970.Forewardb yC.T.HsiaN.ewYork：ColumbiaU niversity Press，1976.

約瑟夫·S.M勞、蒂莫西·A.羅斯編：《臺灣的中國小說（1960—1970）》

[845]Lau，Lawrence J.，ed.Models of development：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San Francisco：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1986.

勞倫斯·J.勞編：《發展模式：南朝鮮和臺灣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

[846]Lavely，W.R.“The rural Chinese fertility transition：a report from Shifang Xian，Sichuan.”Population Studies，38（1984）.365—384.

W.R.拉夫利：“中國農村出生率的變化：一份來自四川什邡縣的報告”

[847]Lawson，Eugene K.，ed.U.S.C-hina trade：problems and prospects.New York：Praeger，1988.

尤金·K.勞森編：《美中貿易：問題和前景》

[848]Le Monde.Daily.Paris：19 Dcember 1944—.

《世界報》

[849]Lee，Chae-jin.Japan faces China：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post-war era.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

李季銀（音）：《日本面對中國：戰后的政治和經濟關系》

[850]Lee，Chae-jinC.hina and Japan：new economic diplomacy.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4.

李季銀：《中國和日本：新經濟外交》

[851]Lee，Edward Bing-Shuey[Li Ping-jui].Modern Canton.Shanghai：Mercury Press，1936.

李平銳（音）：《現代廣州》

[852]Lee，Hong Yung.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a case stud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李洪勇（音）：《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個案研究》

[853]Lee，Hong Yung.Research guide to Red Guard publications，1966—1969.Armonk，N.Y.：M.E.Sharpe，1991.

李洪勇：《紅衛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6—1969）》

[854]Lee，Leo Ou-fan.“Modernism and romanticism in Taiwanese literature”，in Jeannette L.Faurot，ed.，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6—30.

李歐凡：“臺灣文學的現代派和浪漫主義”

[855]Lee，Leo Ou-fan“.Dissent literatur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LEAR[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1（January 1979），59—79.

李歐凡：“文化革命的異端文學”

[856]Lee Yee，ed.The new realism：writings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Hippocrene Books，1983.

李怡編：《新現實主義》

[857]Legge，James，trans.The Chinese classics.5 vols.Reprinted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1866].

詹姆斯·萊格譯：《中國古典名著》

[858]Lei Wen.“Hsiao-shih i-shu”（A handful of poems）.Shih-k’an，12（1979），56.

雷雯：《小詩一束》

[859]Leifer，Michael.Cambodia：the search for security.New York：Praeger，1967.

邁克爾·利弗：《柬埔寨：尋求安全》

[860]Leifer，Michael.“Cambodia and China：neutralism，‘neutrality’，and national security”，in A.M.Halpern，ed.，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329—347.

邁克爾·利弗：“柬埔寨和中國：中立主義、‘中立’和國家安全”

[861]Lenin，Vladimir 1.“The state and revolution”，in Henry M.Christman，ed.，Essential works of Lenin.New York：Bantam Books，1966，271—364.

列寧：《國家與革命》

[862]Lerman，Arthur J.Taiwan's politics：the provincial assemblyman's world.Washington，D.C.：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78.

阿瑟·J.勒曼：《臺灣的政治》

[863]“Lett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of Labour of Albania and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P.S.R.of Albania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July 29，1978.”Zeri i Popullit，30 July 1978，in FBIS Daily Report：Eastern Europe，1 August 1978，B 1—24.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和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信，1978年7月29日”

[864]Leung，C.K.，and Ginsburg，Norton，eds.China：urbaniz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Chicago：Department of Geography，University of Chicago，1980.

C.K.倫格、諾頓·金斯伯格編：《中國：城市化和全國發展》

[865]Lewis，John Wilson，ed.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約翰·威爾遜·劉易斯編：《中國黨的領導和革命的權力》

[866]Lewis，John Wilson，ed.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約翰·威爾遜·劉易斯編：《共產黨中國的城市》

[867]Lewis，John Wilson.“China and Vietnam”，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China briefing，53—56.

約翰·威爾遜·劉易斯：“中國和越南”

[868]Leyda，Jay.Dianying：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2.

杰伊·萊達：《電影：中國的電影和電影觀念的情況》

[869]Leys，Simon.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Allison＆Busby，1977.

西蒙·利斯：《主席的新衣：毛和“文化大革命”》

[870]Leys，Simon.Chinese shadow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8.

西蒙·利斯：《中國的陰影》

[871]Leys，Simon.Broken images：essays on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London：Allison＆Busby，1979.

西蒙·利斯：《破損了的偶像：中國文化和政治論文集》

[872]Li Chi.Wang Kuei Yǖ Li Hsiang-hsiang（Wang Kuei and Li Hsianghsiang）.Peking：Chung-kuo jen-min wen-i ts’ung-shu，1949.

李季：《王貴與李香香》

[873]Li Hsi-fan“.Intellectuals of a bygone age.”Chinese Literature，12（December 1972），24—32.

李希凡：“往昔的知識分子”

[874]Li Hung-k’uan.“Ode to the constitution”，in David S.G.Goodman，Beijing street voices：the poetry and politics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70.

李巷寬（音）：“憲法頌”

[875]Li Jui.Lun San-hsian kung-ch’eng（On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Changsha：Hunan k’o-hsueh chi-shu，1985.

李銳：《論三峽工程》

[876]Li Jui.“Ch’ung tu Chang Wen-t’ien ti‘Lu-shan ti fa-yen’”（On rereading Chang Wen-t’ien's intervention at Lu-shan）.Tu-shu，8（1985），28—38.

李銳：“重讀張聞天同志的‘廬山的發言’”

[877]Li，K.T.[Kuo-ting].The experience of dynamic economic growth on Taiwan.Taipei：Mei Ya Publications，1976.

李國鼎：《臺灣經濟增長動力的經驗》

[878]Li Sheng-p’ing and Chang Ming-shu，eds.1976—1986：Shih-nien cheng-chih ta-shih-chi1976—1986：（A record of the great politicai events of the ten years 1976—1986）.Peking.Kuang-ming jih-pao，1988.

李盛平、張明澍編：《十年政治大事記（1976—1986）》.

[879]Li-shih-ti shen-p’an（A historical trial）.Peking：Ch’ün-chung，1981.

《歷史的審判》

[880]Li-shih yen-chiu（Historical research）.Bimonthly.Peking：1954—.

《歷史研究》

[881]Li，Victor H.De-recognizing Taiwan：the legal problems.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77.

維克托·H.李：《不承認臺灣：法律問題》

[882]Li，Victor H.，ed.The future of Taiwan：a difference of opinion：a dialogue[among Trong R.Chai et al.]White Plains，N.Y.：M.E.Sharpe，1980.

維克托·H.李編：《臺灣的未來》

[883]Li Ying.Tsao-lin ts’un-ch（iJujube village collection）.Peking：Jen-min，1972.

李瑛：《棗林村集》

[884]Li Ying.“Hsiao”（Laughter），in Li Ying，Tsaol-in ts’un-chi，71—73.Trans.in Chinese Literature，8（August 1972），33—35.

李瑛：《笑》

[885]Li Yung-Ch’un，Shih Yuan-ch’in，and Kuo Hsiu-chih，eds.Shih-i chieh san chung ch’üan-hui i-lai cheng-chih t’i-chih kai-ko ta-shih-chi（A record of the major events of the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since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Peking：Ch’ün—ch’iu，1987.

李永春、史遠芹、郭秀芝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體制改革大事記》

[886]Liang Heng and Shapiro，Judith.Son of the revolution.New York：Vintage，1984；New York：Khopf，1983.

梁恒、朱迪思·夏皮羅：《“文革”之子》

[887]Liang Hsiao.“Yen-chiu Ju-Fa tou-cheng ti li-shih ching-yen”（Study the historieal experience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Confucian and Legalist schools）.HC，10（1974），56—70.

梁效：“研究儒法斗爭的歷史經驗”

[888]Liang Shang-ch’üanK.’ai hua ti kuo-t’u（Flowering homeland）.Peking：Chung-kuo ch’ing-nien，1957.

梁上泉：《開花的國土》

[889]Liang Shahg-ch’üan.Shan-ch’üan ch（iMountain spring poems）.Peking.Tsochia，1963.

梁上泉：《山泉集》

[890]Liang yung jen-ts’ai pao（Dual purpose personnel news）.Weekly.Cheng -tu：1984—.

《兩用人才報》

[891]Liao Kai-lung.Ch’üan-mien chien-she she-hui-chu-i ti tao-lu（The road to building socialism in an all-round way）.Yun-nan she-h ui k’o-hs ueh，2（March 1982），1—8，and Peking：Chung-kung chung-yang tang-hsiao，1983.

廖蓋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892]Liao Kai-lung.Tang-shih tan-so（Explorations in Party history）.Peking：Chung-kung chung-yang tang-hsiao，1983.

廖蓋隆：《黨史探索》

[893]Liao Kal-lung.“Kuan-yü hsueh-hsi‘chueh-i’chung t’i-ch’u ti i-hsieh wen-t’i ti chieh-ta”（Answers and explanations regarding some questions which have been pos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tudy of the“Resolution[of 27 June 1981]”）.Yun-nan she-hui k’o-hsueh，2（March 1982），101—110.

廖蓋隆：“關于學習《決議》中提出的一些問題的解答”

[894]Liao Kai-lung.“Kuan-yü Mao Tse-tung kung-kuo p’ing-chia ho she-hui-chui kao-tu min-chu-tui Shih-la-mn chiao-shou lun Mao Tse-tung ti chi p’ien wen-chang ti p’ing-shu”（Regarding the evaluation of Mao Tse-tung's merits and faults，and high-level socialist democracy—a commentary and evaluation on several articles by Professor Schram on Mao Tse-tung），in Liao Kailung，Ch’ü an-mien…，319—337.

廖蓋隆：“關于毛澤東功過評價和社會主義高度民主——對施拉姆教授論毛澤東的幾篇文章的評述”

[895]Liao Kai-lung.“Li-shih ti ching-yen ho wo-men ti fa-chan tao-lu”（The experience of history and the path of our development）.CKYC.9（September 1981），101—177.

廖蓋隆：“歷史的經驗和我們的發展道路”

[896]Liao Kai-lung.“She-hui-chu-i she-hui chung ti chieh-chi tou-cheng ho jenmin nei-pu mao-tun wen-t’i”（The problem of class struggle and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in socialist society），in Liao Kai-lung，ch’üanmien…，229—283.

廖蓋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和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897]Liao Kuang-sheng.Anti 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1860—1980：linkage between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Foreword by Allen S.Whiti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4.

廖廣勝（音）：《排外主義與中國的現代化（1860—1980）：國內政治與外交政策的聯系》

[898]Liberation Army News.See Chieh-fang-chün pao.

《解放軍報》

[899]Lieberthal，Kenneth.A research guide to central Party and government meetings in China 1949—1975.Foreword by Michel Oksenberg.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Special Number.White Plains，N.Y.：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1976.

肯尼思·利伯撒爾：《中共中央和政府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900]Lieberthal，Kenneth G.Sino-Soviet conflict in the 1970s：it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ategic triangle.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R-2342-NA，July 1978.

肯尼思·G.利伯撒爾：《70年代的中蘇沖突：演變及其對戰略三角的影響》

[901]Lieberthal，Kenneth G.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肯尼思·G.利伯撒爾：《天津的革命和傳統（1949—1952）》

[902]Lieberthal，Kenneth G.“The foreign policy debate as seen through allegorical articles，1973—1976.”CQ，71（September 1977），528—554.

肯尼思·G.利伯撒爾：“諷刺文章反映出的外交政策爭論（1973—1976）”

[903]Lieberthal，Kenneth.“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split in the Yenan leadership.”CHOC，14.293—395.

肯尼思·利伯撒爾：“‘大躍進’與延安領導層的分裂”

[904]Lieberthal，Kenneth，and Dickson，Bruce J.A research guide to central Party and government meetings in China 1949—1986.Armonk，N.Y.：M.E.Sharpe，rev.and expanded ed.，1989.

肯尼思·利伯撒爾、布魯斯·J.迪克森：《中共中央和政府會議研究指南（1949—1986）》

[905]Lieberthal，Kenneth，and Oksenberg，Michel.Policy making in China：leaders，structures，and process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肯尼思·利伯撒爾、米切爾·奧克森伯格：《中國的政策制定：領導人、結構和過程》

[906]Lieberthal，Kenneth，withnthe assistance of James Tong and Sai-cheung Yeung.Central documents and Politburo politics in China.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8.

肯尼思·利伯撒爾等：《中共中央文件和政治局政治》

[907]Lien-ho pao（United daily news）.Taipei：1951—.

《聯合報》

[908]Lifton，Robert Jay.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68.

羅伯特·杰伊·利夫頓：《革命的不朽：毛澤東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909]Lim T’ianbeng.“The Black March of 1947.”The Formosan Taiwandang（Spring 1969）.

李天奔（音）：“1947年的‘黑色三月’”

[910]Lin Ch’ing-shan.K’ang Sheng wai-chuan（An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K’ang Sheng），Peking：Chung-Kuo ch’ing-nien，1988.

林青山：《康生外傳》

[911]Lin，Julia.Modern Chinese poetry：an introduc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

朱莉婭·林：《中國現代詩歌介紹》

[912]Lin Man-shu et al.Chung-kuo tang-tai wen-hsueh shih-kao（Draft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Paris：Pa-li ti-ch’i ta-hsueh tung-ya ch’upan chung-hsin（University of Paris Ⅶ，East Asian Publication Center），1978.

林曼叔等：《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

[913]Lin Piao.“Long live the victory of People's War！”PR，8.36（September 1965），9—30.Also Peking：FLP，1965.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914]Lin Piao.“Report to the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R，12.18（30 April 1969），16—35.

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915]Lin Piao.“Address to Politburo”（18 May 1966）.CLG，2.4（Winter 1969—1970），42—62.

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916]“Lin Piao's speech at the Military Academy.”Issues＆Studies（Taipei），8.6（March 1972），75—79.

“林彪在軍事學院的講話”

[917]Lin Tou-tou.“Vice-chairman Lin Piao on writing.”Huo-chü t’ung-hsun（Torch bulletin[Canton]），1（July 1968）.Quoted from SCMM，630（1968），1—7.

林豆豆：“林副主席論寫作”

[918]Lin，Yih-tang，comp.What they say：a collection of current Chinese underground publications.Taipei：Institute of Current China Studies，n.d.[1980？].

林一堂：《它們如是說：當年中國的地下出版物集》

[919]Lin Yueh-hwa[Yao-hua].The golden wing：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48.Issu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林耀華：《金翅：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

[920]Lindbeck，John M.H.Understanding China：a report to the Ford Foundation.New York：Praeger，1971.

約翰·M.H.林德貝克：《了解中國：給福特基金會的報告》

[921]Lindbeck，John M.H.，ed.China：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1.

約翰·M.H.林德貝克編：《中國：一個革命社會的管理》

[922]Lindqvist，Sven.China in crisis.Trans.Sylvia Clayton.New York：Crowell，1963.

斯文·林奎斯特：《危急中的中國》

[923]Ling，Ken.The revenge of heaven：Journal of a young Chinese.Trans.Miriam London，and Lee Ta-ling.New York：Putnam，1972.

肯·林：《上天的報應》

[924]Ling，ken.Red Guard：from schoolboy to“Little General”in Mao's China.New York：Putnam，1972.

肯·林：《毛的中國的紅衛兵：從中學生到“小將”》

[925]Link，Perry，ed.，Stubborn weeds：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

佩里·林克編：《頑強的毒草》

[926]Link，Perry，ed.Roses and thorns：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1979—198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佩里·林克編：《玫瑰與刺》

[927]Literature East and West.Quarterly.New York：Modem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53—.

《東西方文學》

[928]Literaturnaya Gazeta.Weekly.Moscow：Soyuz Pisatelei SSSR，1929—.

《文學報》

[929]Liu Ch’ing.The builders.Peking：FLP，1964.

柳青：《建設者們》

[930]Liu Hsinw-u.“Pan-chu-jen”（The class teacher）.Jen-min wen-hsueh，11（November 1977），16—29.Trans.in Chinese Literature，1（January 1979），15—36.

劉心武：《班主任》

[931]Liu Hsin-wu.“Hsiangm nc-h’in shuo-shuo hsin-li hua”（Telling mother what's on my mind）.Shang-hai wen-hsueh，12（1979），80—85.

劉心武：“向母親說說心里話”

[932]Liu Hisn-wu“.Telling mother what's on my mind.”Trans.Helena Kolenda，in Howard Goldblatt，ed.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1980s…，137—138.

劉心武：“向母親說說心里話”，海倫娜·科倫達譯

[933]Liu，James J.Y.The Chinese knight-erra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7.

詹姆斯·J.Y.劉：《中國俠客》

[934]Liu，Kwang-ching，and Smith，Richard J.“The military challenge：The northwest and the coast.”CHOC，11.202—273.

劉廣京、理查德·J.史密斯：“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

[935]Liu Pin-yen“.Pen-pao nei-pu hsiao-hsi”（Exclusive-confidential）.Jen-min wen-hsueh，6（1956），6—21 and 10（1956），48—59.

劉賓雁：“本報內部消息”

[936][Liu Shao-ch’i].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1945—1957.Hong Kong：Union Research lnstitute，1969.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1958—1967.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68.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1945—1957）》

[937]Liu Shao-ch’i.“Report on the question of agrarian reform”delivered at the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14 June 1950，in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2.215—233.

劉少奇：“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

[938]Liu Shao-ch’i et al.Hsin-min-chu chu-yi ch’eng-shih cheng-ts’e（New democratic urban policies）.Hong Kong：Hsin-min-chu，1949.

劉少奇等：“新民主主義城市政策”

[939][Liu Shao-ch’i].Liu chu-hsi yü-lu（Sayings by Chairman Liu）Hong Kong：Tzu-lien，1967.

[劉少奇]《劉主席語錄》

[940][Liu Shao-ch’i].Liu Shao-ch’i hsuan-chi（Se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Peking：Jen-min，vol.1，1981；vol.2，1985.

《劉少奇選集》

[941]Liu Shao-t’ang“Wo tui tang-ch’ien wen-i wen-t’i ti i-hsieh ch’en-chien”（Some thoughts on literary problems today）.Wen-i hsueh-hsi，5（1957），7—10.

劉紹棠：“我對當前文藝問題的一些淺見”

[942]Liu Shao-tong.Out of Red China.Trans.Jack Chia and Henry Walter；introduction by Dr.Hu Shih.New York：Duel l，Sloan＆Pearce；Boston：Little，Brown，1953.

劉少通（音）：《走出紅色中國》

[943]Liu-shih-nien wen-i ta-shih-chi，1919—1979（Major cultural events of sixty years，1919—1979）.Peking：Institute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Research，Ministry of Culture，October 1979.

《六十年文藝大事記（1919—1979）》

[944]Liu Shu—mao.“An introduction to the several types of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systems currently in use in our rural areas.”Ching-chi kuan-li，9（15 September 1981），12—14.

劉緒茂：“我國農村目前實行的幾種生產責任制介紹”

[945]Lo Jui-ch’ing.“Commemorate the victory over German fascism Carry the struggle against U.S.imperialism through to the end！”HC，5（1965），in PR，8.20（14 May 1965），7—15.

羅瑞卿：“紀念戰勝德國法西斯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

[946]Lo Jui-ch’ing.“The people defeated Japanese fascism and they can certainly defeat U.S.imperialism too.”NCNA，4 September 1965，in CB，770（14 September 1965），1—12.

羅瑞卿：“人民打敗了日本法西斯主義，當然也能打敗美帝國主義”

[947]Lo，Ruth Earnshaw，and Kinderman，Katherine S.In the eye of the typhoon：an American woman in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troduction by John K.Falrbank.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0.

魯斯·厄恩肖·羅、凱瑟琳·S.金德曼：《在外國人眼里：一個美國婦女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

[948]Löfstedt，Jan-Ingvar.Chinese educational policy：Changes and contradictions，1949—1979.Stockholm：Almqvist＆Wiksell International；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80.

簡-英格瓦爾·洛夫斯泰德：《中國的教育政策：改革與矛盾（1949—1979）》

[949]Loh，Robert，as told to Humphrey Evans.Escape from Red ChinaN.ew York：Coward-McCann，1962.

羅伯特·洛：《逃出紅色中國》

[950]Look.Biweekly.Des Moines，Iowa：Cowles Pub，1937—1971.

《展望》

[951]Lord，Bette[Bao]，[Sansan，as told to].Eighth moon：the true story of a young girl's life in Communist China.New York：Harper＆Row，1964.

包柏漪：《第八個月亮》

[952]Los Angeles Times.Daily.LosA ngeles Times Mirror Co.：4 December 1881—.

《洛杉磯時報》

[953]Lotta，Raymond，ed.And Mao makes 5：Mao Tse-tung's last great battle.Chicago：Banner Press，1978.

雷蒙德·洛塔編：《和毛等于五：毛澤東的最后一次大戰》

[954]Lovelace，Daniel D.China and“People's War”in Thailand，1964—1969.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1.

丹尼爾·D.洛夫萊斯：《中國與泰國的“人民戰爭”（1964—1969）》

[955]Low，Alfred D.The Sino-Soviet dispute：an analysis of the polemics.Rutherford，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76.

艾爾弗雷德·D.洛：《中蘇爭端》

[956]Lowe，H.Y.The adventures of Wu：the life cyclce of a Peking man.Introduction by Derk Bodd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

H.Y.洛：《吳的歷險記》

[957]Lowenthal，Richard.World communism：the disintegration of a secular fai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理查德·洛溫撒爾：《共產主義世界》

[958]Lu Hsin-hua.“Shang-hen”（The scar），in I-chiu-ch’i-pa nien ch’üan-kuo yuhsiu tuan-p’ien hsiao-shuo p’ing-hsuan tso-p’in-chi，244—258.

盧新華：“傷痕”

[959]Lu Hung.Lun ch’eng-hsiang ho-tso（On urban-rural cooperation）.Peking：San-lien shu-tien，1949.

盧蕻：《論城鄉合作》

[960]Lu Ting-i.“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estival of Peking Opera on Contemporary Themes”，in A great revolution on the cultural front，78—86.

陸定一：“在現代戲觀摩演出京劇開幕式上的講話”

[961]Lum，Peter.Peking：1950—1953.London：Robert Hale，1958.

彼得·盧姆：《北京（1950—1953）》

[962]Lun Mao Tse-tung che-hsueh ssu-hsiang（On Mao Tse-tung's philsopohical thought）.Peking：Jen-min，1983.

《論毛澤東哲學思想》

[963]Lutz，Jessie Gregory.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ses，1850—1950.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

杰西·格雷戈里·盧茨：《中國與教會學校（1850—1950）》

[964]Ma，Laurence J.C.Cities and city plann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Washington，D.C.：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U.S.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1980.

勞倫斯·J.C.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城市和城市規劃》

[965]Ma，Laurence J.C.，and Hanten，Edward W.，eds.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1.

勞倫斯·J.C.馬、愛德華·w.漢頓編：《現代中國城市的發展》

[966]MacFarquhar，Roderick.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

[967]MacFarquhar，Roderick.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2：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躍進”（1958—1960）》

[968]MacFarquhar，Roderick；Cheek，Timothy；and Wu，Eugene，eds，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9.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蒂莫西·奇克、尤金·吳編：《毛主席的秘密講話：從百花齊放到“大躍進”》

[969]MacFarquhar，Roderick.“Passing the baton in Beijing.”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35.2（18 February 1988），21—22.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北京的交接班”

[970]Maclnnis，Donald E.，comp.Religiou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communist China：a documentary history.New York：Macmillan，1972.

唐納德·E.麥克恩斯：《共產黨中國的宗教政策及其實踐》

[971]Mackerras，Colin.The Chinese theatre in modern times，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day.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5.

科林·麥克拉斯：《1840年以來中國的戲劇》

[972]Mackerras，Colin“Chinese oper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0—1972）.”CQ，55（July—September 1973），478—510.

科林·麥克拉斯：“‘文革’后的京劇（1970—1972）”

[973]Madsen，Richard.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理查德·馬德森：《一個中國鄉村的倫理和權力》

[974]Madsen，Richard.“Religion and feudal superstition.”Chingfeng（Hong Kong），1980，190—218.

理查德·馬德森：“宗教與封建迷信”

[975]Major，John S.，ed.China briefing，1985.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7[1986].

約翰·S.梅杰編：《中國簡況》

[976]Makarov，M.I.，ed al.Vneshniaia politika KNR（Foreign policy of the PRC）.Moscow：Izdatel'stvo Mezdunarodnye Otnosheniia，197 1.

M.I.馬卡羅夫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

[977]Mancall，Mark，ed.Formosa today.Derived from a special issue of CQ，15（July—September 1963）.New York：Praeger，1963.

馬克·曼考爾編：《今日福摩薩》

[978]Manchester Guardian.Daily.Manchester：1 May 1821—22 Angust 1959.Continued by Guardian，24 August 1959—.

《曼徹斯特衛報》

[979]Mantri，Om Prakash.Five years in Mao's China.New Delhi：Perspective Publications，1964.

奧姆·普拉卡什·曼特里：《在毛的中國的五年》

[980]MaoChu-hsi chiao-yü yü-lu（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on education）.

Peking：Peking tien-chi hsueh-hsiao Tung-fang-hung kung-she（East is Red Commune of the Peking Electrical School），July 1967.

北京電機學校東方紅公社編：《毛主席教育語錄》

[981]Mao Chu-hsi kuan-yü kuo-nei min-fus wen-t’i ti lun-shu hsuari-pien（Selections from Chairman Mao's expositions regarding problems of nationalities within the country）.Peking：Kuo-chia min-tsu shih-wu wei-yuan-hui ti-san ssu（Third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Commission on Minority Affairs），Octoher 1978.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三司：《毛主席關于國內民族問題的論述選編》

[982]Mao Chu-hsi tui P’eng，Huang，Chang，Chou fan-tang chi-t’uan ti P’i-p’an（Chairman Mao's criticism and repudiation of the P’eng，Huang，Chang，Chou anti-Party clique）.Peking：n.p.，1967.

《毛主席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批判》

[983]Mao Chu-hsiw enh-suan（Selected writings by Chairman Mao）.n.p.，n.d.

《毛主席文選》

[984]Mao Mao.“In the days spent in Kiangsi.”JMJP，22 August 1984，in FBIS Daily Report：China，23 August 1984，K1—K6.

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

[985]Mao，MTHC.See Mao Tse-tung.Hsuan-Chi

《毛澤東選集》

[986]Mao Tse-tung.See also Mao Chu-hsi…

毛澤東

[987]Mao Tse-tung.Hsuan-chi（selected works）.Peking：Jen-min，vols.1—4，1960；vol.5，1977.Cited as MTHC.

《毛澤東選集》

[988]Mao，SW.see MaoTse-tung，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毛澤東選集》

[989]Mao Tse-tung.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English trans.].Peking：FLP，vols.1—3，1965；vol.4，1961；vol.5，1977.Cited as Mao，SW.

《毛澤東選集》英文版

[990]Mao Tse-tung.Selected readings.Peking：FLP，1967.Trans.of an earlier，and substantially different，version of Mao Tse-tung chu-tso hsuan-tu.

《毛澤東著作選讀》

[991]Mao Tse-tung.Miscellany of Mao Tse-tung Thought（1949—1968）.2 vols.Arlington，Va.：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Nos，61269—1 and—2，20 February 1974.[Trans.of materials from 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

《毛澤東思想雜錄》

[992]Mao Tse-tung.Pien-cheng wei-wu-lun：chiang-shou t’i-kang（Dialectical materialism：lecture notes）.Dairen：Ta-chung shu-tien，n.d.[c.1946]

《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

[993]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Long live Mao Tse-tung Thought！）.Peking：n.p.，1967 Cited as Wan-sui（1967）.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

[994]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Peking：n.p.，1967.Supplement.Cited as Wan-sui（Supplement）.

《毛澤東思想萬歲》（附錄）

[995]Mao Tse-tung ssu-hsiangw an-sui！Peking：n.p.，1969.Cited as Wan-sui（1969）.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

[996]Mao Tse-tung che-hsueh ssu-hsiang（chai-lu）（Mao Tse-tu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extracts]）.Compiled by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Peking University.Peking：1960.

《毛澤東哲學思想（摘錄）》

[997]Mao Tse-tung t’ung-chih lun Ma-k’o-ssu-chu-i che-hsueh（cha -lu）（Comrade Mao Tse-tung on Marxist philosophy[extracts]）.Urumchi：Sinkiang：ch’ingnien，1960.Compiled by the Office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Philosophy of the Party School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Sink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毛澤東同志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摘錄）》

[998]Mao Tse-tung chu-tso，yen-lun，wen-tien mu-lu（A bibliography of Mao Tsetung's writings，speeches，and telegrams）.Peking：Chung-kuo jen-min chiehfang-chün cheng-chih hsueh-yuan hsun-lien pu t’u-shu tzu-liao kuan，February 1961.

《毛澤東著作、言論、文章目錄》

[999]Mao Tse-tung.Selected letters.See Mao Tse-tung shu-hsin hsuan-chi.

《毛澤東書信選集》

[1000]Mao Tse-tung.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Peking：Jen-min，1966.

《毛主席語錄》

[1001]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Trans by Moss Robert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7.[A translation of Mao Tse-tung，“Tu‘cheng-chih ching-chi-hsueh…’”].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的論點匯編》

[1002]Mao Tse-tung shu-hsin hsuan-chi（Selected letters of Mao Tse-tung）.Peking：Jen-min，1983.

《毛澤東書信選集》（1983年）

[1003][Mao Tse-tung].Chien-kuo i-Lai Mao Tse-tung wen-kao（Draft writings by Mao Tse-tung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me）.vol.1：September 1949—December 1950.vol.2：1951.vol.3：1952.vol.4：1953—1954.Peking：Chung-yang wen-hsien，19 8 7—199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1004]Mao Tse-tung.Mao Chu-hsi Shih-tz’u san-shih-ch’i shou（Thirty-seven poems by Chairman Mao）.Peking：Wen-wu，1963.

《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

[1005]Mao Tse-tung chu-tso hsuan-tu（Selected readings from Mao Tse-tung's writings）.2 vols.Peking：Jen-min，1986.

《毛澤東著作選讀》（1986年）

[1006]Mao Tse-tung che-hsueh P’i-chu-chi（Mao Tse-tung's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philosophy）.Peking：Chung-yang wen-hsien，1988.

毛澤東：《矛盾論》

[1007]Mao Tse-tung.“Mao-tun lun”（On contradiction）.MTHC，1.278—326

毛澤東：《矛盾論》

[1008]Mao Tse-tung.“Ch’ing-nien yunt-ung ti fang-hsiang”（The orientation of the youth movement）.[Speech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MTHC，2.549—557.

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

[1009]Mao Tse-tung.“Chung-kuo ko-ming yü Chung-kuo kung-ch’an-tang”（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MTHC，2.615-650.

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1010]Mao Tse-tung.“Hsin min-chu chu-i lun”（On new democracy）.MHTC，2.655—704.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011]Mao Tse-tung.“Lun jen-min min-chu chuan-cheng：chi-nien Chung-kuo kung-ch’an-tang erh-shih-pa chou-nien”（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8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MTHC，4.1473—1486.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

[1012]Mao Tse-tung.“Tsai Sheng，shih，tzu-chih-ch’ü tang-wei shu-chi hui-i shang ti ch；ang-hua”（Talk at the meeging of provincial，municipal，and autonomous area Party secretaries）[27 January 1957].MTHC，5.368.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1013]Mao Tse-tung.“Kuan-yü cheng-ch’ueh ch’u-li jen-min nei-pu mao-tun ti wen-t’i”（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Talk of 27 February 1957].MTHC，5.392.

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1014]Mao Tse-tung.“Tso ko-ming ti ts’u-chin-p’ai”（Be promoters of progress）[Speech at the Third Plenum 9 October 1957）.MTHC，5.497.

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

[1015]Mao Tse-tung.“I-ch’ieh fan-tung-P’ai to shih chih lao-hu”（All reactionaries are paper tigers）.[Speech of 18 November 1957 in Moscow].MTHC，5.531.

毛澤東：“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1016]Mao Tse-tung.“Lun shih ta kuan-hsi”（On the ten great relationships）.MTHC，5.267—288.Trans.in Stuart R.Schram，ed.，Mao Tse-tung unrehearsed.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

[1017]Mao Tse-tung.“Report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March 1927].Mao，SW，1.23-59.（Pages vary in different editions.）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018]Mao Tse-tung.“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Mao，SW，3.69—98.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019]Mao Tse-tung.“Tu‘cheng-chih ching-chi-hsueh chiao-k’o shu’”（Reading notes on the[Soviet]text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Wan-sui（1967），167-247.The best English version is 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q.v.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020]Mao Tse-tung.“Tsai Hangchow hui-i shang ti chiang-hua”（Talk at the Hangchow meeting[December 1965].Wan-sui（1969）.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

[1021]Mao Tse-tung.“Tsai Ch’eng-tu hui-i shang ti chiang-hua”（Talks at the Chengtu conference）[March 1958].Wan-sui（1969），159—180.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1022]Mao Tse-tung.“Tsai Hankow hui-i shang ti chiang-hua”（Talk at the Hankow meeting[April 1957].Wan-sui（1969），180.

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

[1023]Mao Tse-tung.“Tsai k’uo-ta ti chung-yang kung-tso hui-i shang ti chianghua”（Speech at the enlarged Central Work Conference）[30 January 1962].Wan-Sui（1969），399—423.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024]Mao Tse-tung.“San-ko fu tsung-li hui-pao shih ti ch’ah-ua”（Interjections at a report meeting with three vice-premiers）[May 1964].Wan-sui（1969），494.

毛澤東：“三個副總理匯報時的插話”

[1025]Mao Tse-tung.“Ch’un-chieh t’an-hua chi-yao”（Summary of talk at the Spring Festival）[13 February 1964].Wan-sui（1969），455—465.

毛澤東：“春節談話紀要”

[1026]Mao Tse-tung.“Chao-chien shou-tu hung-tai-hui fu-tse jen ti t’an-hua”

（Talk with responsible Red Guard leaders from the capital）.Wan-sui（1969），687—716.

毛澤東：“召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的談話”

[1027]Mao Tse-tung.“Kei Lin Piao，Ho Lung，Nieh Jung-chen，Hsiao Hua chu t’ung-chih ti hsin”（Letter to Comrades Lin Piao，Ho Lung，Nieh Jungchen，and Hsiao Hua）[December，1963].[Mao]，Tzu-liao Hsuan-pien.Reproduced by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287.

毛澤東：“給林彪、賀龍、聶榮臻、蕭華諸同志的信”

[1028]Mao Tse-tung.“Kei yiny-ueh kung-tso-che t’an-hua”（Talk to music workers）.Trans.in Stuart R.Schram，ed.Mao Tse-tung unrehearsed，84—90.

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

[1029]Mao Tse-tung.“Tsai Chung-kuo kung-ch’an-tang ti-chiu-chieh chung-yang wei-yuan-hui ti-i-tz’u ch’üan-t’i hui-i shang ti chiang-hua”（Talk at the First Plenum of the Ni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28 April 1969].CKYC，4.3（March 1970），120—126.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1030]Mao Tse-tung.“Reply to Comrade Kuo Mo-jo”（17 November 1961）.Chinese Literature，4（1976），43.

毛澤東：給郭沫若同志的回信（1961年11月17日）

[1031]Mao Tse-tung.“Reply to Comrade Kuo Mo-jo”（9 January 1963）.Chinese Literature，4（19764）8—49.

毛澤東：給郭沫若同志的回信（1963年1月9日）

[1032]“Mao Tse-tung's private letter to Chiang Ch’ing（July 8，1966）.”CLG，6，2（Summer 1973），96-100.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

[1033]Mao Tse-tung.“Tsai Pei-tai-ho hui-i shang ti chiang-hua”（Talk at the Peitai-ho conference）[August 1958].Hsueh-hsi tzu-liao.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1034]MaoTse-tung.“Speech at the Lushan Conference”，23 July 1959，in Stuart R.Schram，ed.，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131—146.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1035]Mao Tse-tung.“Fan-tui pen-pen chui-”（Oppose bookism）.In Mao，Select-ed readings，48—58.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

[1036]Mao Tse-tung.“Tsai pa-chieh shih-chung ch’üan-hui Shang ti chiang-hua”（Address at the Tenth Plenum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24 September 1962].Wan-sui（1969），430—436.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1037]Mao Tse-tung ssu-hsiang yen-chiu（Research on Mao Tse-tung Thought）.Quarterly.Ch’eng-tu：1983—.

《毛澤東思想研究》

[1038]Mao Tun“.T’an tsui-chin ti tuan-p’ien hsiao-shuo”（On recent short stories）.Jen-min wen-hsueh，6（1958），4—8.

茅盾：“談最近的短篇小說”

[1039]Mao Tun.“Fan-ying she-hui chui-yueh-chin ti shih-tai，t’ui-tung she-hui chu-i ti yueh-chin”（Reflect the age of the socialist leap forward，promote the socialist leap forward）.Jen-min wen-hsueh，8（1960），8—36.

茅盾：“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的躍進”

[1040]Mao Zedong's“On contradiction.”See Knight，Nick.

《毛澤東的“矛盾論”》

[1041]Martin，Helmut，ed.Mao Zedong.Texte.6 vols.in 7.Munich：Carl Hanser Verlag，1979—1982.

赫爾穆特·馬丁編：《毛澤東》

[1042]Marx，Karl.“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Selected works.London：Laurence＆Wishart，1970，311—331

卡爾·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1043]Materials Group of the Party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CP Central Party School.See Chung-kuo kung-chan tang li-t’zu chungyao hui-i-chi.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資料組：《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

[1044]Mathews，Jay，and Mathews，Linda.One billion：a China chronicle.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3.

杰伊·馬修斯、林達·馬修斯：《十億：一部中國的編年史》

[1045]Matthews，Mervyn.Educ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since Stalin.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82.

默文·馬修斯：《蘇聯的教育》

[1046]Maxwell，Nevill.“The Chinese account of the 1969 fighting at Chenpao.”CQ，5 6（October-December，1973），730—739.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中國人對1969年珍寶島之戰的描述”

[1047]Maxwell，Neville.“A note on the Amur/Ussuri sector of the Sino-Soviet boundaries.”Modern China，1.1（January 1975），116—126.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關于中蘇邊界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段考”

[1048]McDougall，Bonnie S.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

邦尼.S.麥克杜格爾：《毛澤東1943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譯文及注解》

[1049]McDougall，Bonnie S.，ed.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邦尼·S.麥克杜格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通俗文學和表演藝術（1949—1979）》

[1050]McDougall，Bonnie S.，ed.and trans.Notes from the city of the sun：poems by Bei Dao.Ithaca，N.Y.：China-Japan Program，Cornell University，rev.ed.1984[1983].

邦尼·S.麥克杜格爾編譯：《太陽城的提示：北島的詩》

[1051]McDougall，Bonnie S.“Poems，poets and Poetry 1976：an exercise in the typ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Contemporary China，2.4（Winter 1978），76—124.

邦尼·S.麥克杜格爾：“1976年的詩、詩人和詩集”

[1052]Mehnert，Klaus.Peking and Moscow.Trans.Leila Vennewitz.New York：Putnam，1963.

克勞斯·梅內爾特：《北京和莫斯科》

[1053]Mehnert，Klaus.Peking and the New Left：at home and abroad.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9.

克勞斯·梅內爾特：《北京和國內外的新左派》

[1054]Meisner，Maurice.Mao's China：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Free Press，1977.

莫里斯·邁斯納：《毛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

[1055]Meisner，Maurice.Marxism，Maoism，and utopianism：eight essay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2.

莫里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主義和烏托邦思想》

[1056]Meisner，Maurice.“Leninism and Maoism：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Leninism in China.”CQ，45（January-March 1971），2—36.

莫里斯·邁斯納：“列寧主義和毛主義”

[1057]Melanson，Richard A.，ed.Neither coldw ar nor detente？：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80s.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82.

理查德·A.梅蘭森編：《既非冷戰也非緩和？：八十年代的美蘇關系》

[1058]Mendel，Douglas H.The politics of Formasan nationalism.Berkeley：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道格拉斯·H.門德爾：《臺灣民族主義的政治》

[1059]Mezhdunarodnaia zhizn’（International affairs）.Monthly.Moscow：“Znanie”，1955—.

《國際事務》

[1060]Miksche，F.O.“USSR：Rot-China—An der Ostgrenze Russlands Wacht die Dritte Weltmacht.”Wehr and Wirtschaft（October 1974），424—428.

F.O.米克舍：“蘇聯：紅色中國——在俄羅斯東部地區看世界第三大國”

[1061]The Military Balance.Annual.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1959—V.arious titles.

《軍事平衡》

[1062]Miller，H.Lyman.“China's administrative，revolution.”Current History，82.485（September 1983），270—274.

H.萊曼·米勒：“中國的行政革命”

[1063]Milton，David，and Milton，Nancy Dall.The wind will not subside：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64—1969.New York：Pantheon，19 7 6.

戴維·米爾頓、南希·多爾·米爾頓：《風不會減弱：在革命的中國的歲月（1964—1969）》

[1064]Ming-pao yueh-k’an（Ming Pao monthly）.Monthly.Hong Kng：1966—.

《明報月刊》

[1065]Mirovai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onthly.Moscow：Institut mirovoi ekonomiki imezhdunarodnykh otnoshenii，1957—.

《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

[1066]Mirovitskaya，Raisa，and Semyonov，Yuri.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a brief history of relations.Moscow：Novosti，1981.

《蘇中關系簡史》

[1067]Miscellany of Mao Tse-tung Thought.See Mao Tse-tung.

《毛澤東思想雜錄》

[1068]Mitchell，Ronald G.“Chinese defense spending in transition”，in U.S.Congress，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Ⅰ.605—610.

羅納德·G.米切爾：“中國變化中的防務支出”

[1069]Mizan.Bimonthly（irregular）.London：Central Asian Research Centre，1959—1971.Incorporating Central Asian Review.

《密宗》

[1070]Mizoguchi Toshiyuki and Yamamoto Yūzō.“Capital formation in Taiwan and Korea”，in Ramon H.Myers and Mark R.Peattie，eds.，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399—419.

溝口敏行、山本有三：“臺灣和韓國資本的形成”

[1071]Modern Chin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Quarterly.Newbury Park，Calif.：Sage，1975—.

《現代中國：歷史和社會科學國際季刊》

[1072]ModernC 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Semi-annual.Various publishers，1975—1978.

《現代中國文學通訊》

[1073]Montaperto，Ronald N.，and Henderson，Jay，eds.China's schools in flux：report.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9.

羅納德·N.蒙塔珀圖、杰伊·亨德森編：《中國處于變化中的學校》

[1074]Moorsteen，Richard，and Abramowitz，Morton.Remaking China Policy：U.S.C-hina relations and governmental decisionmak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理查德·穆爾斯廷、莫頓·阿布拉莫維茨：《重新制定對華政策：美中關系和政府的決策》

[1075]Moraes，Frank.Report on Mao's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54.

弗蘭克·莫里斯：《毛的中國報告》

[1076]“More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JMJP，29 December 1956，21—64.Trans.i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077]Mosher，Steven W.Broken earth：the rural Chinese.New York：Free Press；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83.

斯蒂文·W.莫舍：《破碎的大地：農村里的中國人》

[1078]Mosher，Steven W.Journey to the forbidden China.New York：Free Press；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85.

斯蒂文·W.莫舍：《禁地中國旅行記》

[1079]Mos’ko，G.N.Armiia Kitaia：orudie avantiuristicheskoi politiki Maoistov（The Chinese army：instrument of the adventuristic policies of the Maoists）.Moscow：Voennoe izdatel'stvo Ministerstva Oborony SSSR，1980.

G.N.莫斯克：《中國軍隊：毛主義者冒險政策的工具》

[1080]Mozingo，David P.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1949—1967.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

戴維·P.莫辛戈：《中國對印度尼西亞的政策（1949—1967）》

[1081]MTHC.See Mao Tse-tung.Hsuan-chi（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毛澤東選集》

[1082]Mu Fu-sheng[pseud.].The wilt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under Mao.New York：Praeger，1963[1962].

穆富勝：《百花運動的衰落：毛統治下的中國知識分子》

[1083]Munro，Donald J.“Egalitarian ideal and educational fact in communist China”，in John M.H.Lindbeck，ed.，China：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256—301.

唐納德·J.芒羅：“共產黨中國的平均主義思想和教育真相”

[1084]Murphey，Rhoads.Shanghai：key to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羅茲·墨菲：《上海：開啟現代中國之門的鑰匙》

[1085]Murphey，Rhoads.The fading of the Maoist vision：city and country in China's development.New York：Methuen，1980.

羅茲·墨菲：《正在消失的毛主義幻想》

[1086]Myers，James T.，Domes，J ürgen；and Groeling，Erik von，eds.Chinese pol itics：documents and analysis.vol.1.Cultural Revolution to 1969.Vol.2.Ninth Party Congress（1969）to the death of Mao（1976）.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6，1989.

詹姆斯·T.邁爾斯、于爾根·多姆斯、埃里克·馮·戈林編：《中國政治：文獻和分析》

[1087]Myers，Ramon H.，ed.Two Chinese states：U.S.foreign policy and interests.Introduction by Robert A.Scalapino.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8.

拉蒙·H.邁爾斯編：《兩個中國》

[1088]Myers，Ramon H.，and Peattie，Mark R.，eds.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1895—194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拉蒙·H.邁爾斯、馬克·R.皮蒂編：《日本殖民帝國（1895—1945）》

[1089]Myers，Ramon H.“Taiwan's agrarian economy under Japanese rule.”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7.2（December 1974），451—474.

拉蒙·H.邁爾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農業經濟”

[1090]Myers，Ramon H.，and Yamada，Sabur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mpire”，in Ramon H.Myers and Mark R.Peattie，eds.，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420—452.

克勞斯·梅內爾特：《北京和國內外的新左派》

[1091]Myrdal，Jan.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Trans.Maurice Michael.New York：Pantheon，1965.

簡·邁爾達爾：《來自一個中國村莊的報告》

[1092]Myrdal，Jan.Return to a Chinese village.Trans.Alan Bernstein.Foreword by Harrision E.Salisbury.New York：Pantheon，1984.

簡·邁爾達爾：《重返一個中國村莊》

[1093]Myrdal，Jan，and Kessle，Gun.China：the revolution continued.Trans.Paul Britten Austin.New York：Pantheon，1970.

簡·邁爾達爾、岡·凱塞爾：《中國：革命在繼續》

[1094]Nan Chih.Yeh Ch’ün yeh-shih（An unofficlal history of Yeh Ch’ün）.3rd ed.Hong Kong：Mirror Post Cultural Enterprises，1988.

南枝：《葉群野史》

[1095]NarodyAzii i Afriki（The peoples of Asia and Africa）.Bimonthly.Moscow：Nauka，1955—C.ontinues Problemy vostokovedeniia.

《亞非人民》

[1096]National Foreign Assessment Center.See United States.

國家對外評估中心

[1097]National Geogrsphic Magazine.Monthly.Washington，D.C.：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888—.

《國家地理雜志》

[1098]Naughton，Barry.“Finance and planning reforms in industry”，in U.S.Congress，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1.604—629.

巴里·諾頓：“工業財政和計劃改革”

[1099]Naughton，Barry.“The third front：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CQ，115（September 1988），351—386.

巴里·諾頓：“三線：在中國內地保衛工業化”

[1100]NCNA.New China News Agency.

新華社

[1101]Nee，Victor，with Don Layman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Peking Universit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

維克多·倪、唐·萊曼：《北京大學的“文化大革命”》

[1102]Nee，Victor.“Revolution and bureaucracy：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Victor Nee and James Peck，eds.，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from 1840 to the present，322—414.

維克多·倪：“革命與官僚：‘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

[1103]Nee，Victor，and Peck，James，eds.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from 1840 to the present.New York：Pantheon，1975.

維克多·倪、詹姆斯·佩克編：《中國不間斷的革命：從1840年至今》

[1104]Nei-pu wen-kao（Internal manuscripts）.Nos.7，13（1981），No.10（1987）.Peking：Hung-ch’i tsa-chih-she“nei-pu wen-kao”pien-chi pu.

《內部文告》

[1105]Nelsen，Harvey W.The Chinese military system：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2nd ed.，rev.and updated.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1[1977].

哈維·W.內爾森：《中國的軍事制度：人民解放軍體制的研究》

[1106]Nelsen，Harvey W.“Military force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Q，51（July-September 1972），444—474.

哈維·W.內爾森：“‘文化大革命’中的軍隊”

[1107]Nelsen，Harvey W.“Military bureaucrac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sian Survey，14.4（April 1974），372—395.

哈維·W.內爾森：“‘文化大革命’中的軍隊官僚”

[1108]Neuhauser，Charles.Third World politics：China and 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1957—1967.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8.

查爾斯·紐豪瑟爾：《第三世界政治：中國與亞非人民團結組織（1957—1967）》

[1109]Neuhauser，Charles.“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e CCP machine.”Asian Survey，8.6（June 1968），465—488.

查爾斯·紐豪瑟爾：“‘文化大革命’對中共機器的影響”

[1110]New China Monthly.See Hsin-hua yueh-pao.

《新華月報》

[1111]New China News Agency.（Hsin-hua-she）.Cited as NCNA.See Hsinhua t’ung-hsun-she.

新華社

[1112]New China News Ageney.Daily News Release.Hong Kong：1948—.

新華社：《每日新聞發布》

[1113]New China Semi-monthly.See Hsin-hua pan-yueh-k’an.

《新華半月刊》

[1114]New China's population.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English trans.New York：Macmillan，1988.

《新中國的人口》

[1115]New Republic：ajournal of opinion.48/yr.Washington，D.C.：1914—.

《新共和》

[1116]NewT imes.A Soviet weekly of world affairs.Moscow：Trud，1943—.

《新時代》

[1117]New York Review of Books，The.21/yr.New York：NYRB.1963—.

《紐約書評》

[1118]New York Times，The.Daily.New York：13 September 1857—.

《紐約時報》

[1119]New Yorker，The Weekly.New York：The New Yorker Magazine，1925—.

《紐約人》周刊

[1120]News from Chinese provincial radio stations.See United Kingdom Regional Information Office for Southeast Asia.

《中國省級廣播電臺新聞》

[1121]Niekum，James E.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water resour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tanford，Calif.：U.S.-China Relations Program，Stanford University，1977.[Report of the U.S.Water Resources delegation，August-September 1974.]

詹姆斯·E.尼庫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水力工程和水資源》

[1122]Nieh，Hua-ling，ed.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2 v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聶華荃編：《百花文學》

[1123]Nieh Jung-chen“.Several questions concerning Lin Biao”，Hsin-hua jihpao，18 and 19 October 1984，in FBIS，Daily Report：China 5 November 1984，K18—21.

聶榮臻：有關林彪的幾個問題

[1124]Nieh Jung-chen hui-i lu（Memoirs of Nieh Jung-chen）.3 vols.Peking：Chieh-fang-chün，1983，1984.

《聶榮臻回憶錄》

[1125]1982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major figures），The.Hong Kong：Eco-nomic Information Agency，1982.

《1982年中國人口普查（主要數字）》

[1126]Ning Lao t’ai-t’al.See Pruitt，Ida.

《寧老太太》

[1127]Nixon，Richard M.RN：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New York：Grosset＆Dunlap，1978.

理查德·M.尼克松：《尼克松回憶錄》

[1128]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See Tung-Pei shih-to hsueh-pao.

《東北師范大學學報》

[1129]Nossal，Frederick.Dateline Peking.London：Macdonald，1962.

弗雷德里克·諾薩爾：《北京電訊》

[1130]“Nothing is hard in this world if you dare to scale the heights.”JMJP，HC，Chieh-fang-chün pao（Liberation Army news）joint editorial，l January 1976.Trans.in“Quarterly chronicle and documentation.”CQ 66，（June 1976），411—416.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1131]Oi，Jean C.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瓊·C.奧伊：《當代中國的國家與農民》

[1132]Ojha，Ishwer C.The changing patterno f China's attitude towar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Vietnam，1964—1971.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3.

伊什沃.C.歐嘉：《中國對談判解決越南問題的態度的變化模式（1964—1971）》

[1133]Oksenberg，Michel.“Local leaders in rural China，1962—1965：individual attributes，bureaucratic positions，and political recruitment”，in A.Doak 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155—215.

米歇爾·奧克森伯格：“中國農村的地方領導（1962—1965）”

[1134]Oksenberg，Michel，and Yeung Sai-cheung.“Hua Kuo-feng's pre-Cultural Revolution Hunan years，1949—1966：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generalist.”CQ，69（March 1977），3—53.

米歇爾·奧克森伯格、惲賽充（音）：“華國鋒‘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的歲月（1949—1966）”

[1135]Oksenberg，Michel.“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 -fairs，61.1（Fall 1982），175—195.

米歇爾·奧克森伯格：“中美關系十年”

[1136]“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Editorial Department，JMJP，5 April 1956.Trans.i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137]Onoye，Etsuzō.“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The Developing Economies，8.1（March 1970），93—127.

小野家悅造：“中國城市人口地區分布”

[1138]Opasnyi kurs（Dangerous course）.Moscow：Politizdat，196 9—1981.

《危險的事業》

[1139]Orbis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Quarterly.Philadelphia：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1956—.

《世界事務雜志》

[1140]Orleans，Leo A.，ed.，with the assistance of Caroline Davidson.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利奧·A.奧林斯和卡羅林·戴維森：《當代中國的科學》

[1141]Orleans，Leo A.“China's urban population：concepts，conglomerations，and concerns”，in U.S.Congress，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1.268—302.

利奧·A.奧林斯：“中國城市人口”

[1142]Overholt，William H.“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Eastern Asia”，in William Overholt，ed.，Asia's nuclear future.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7，133—159.

威廉·H.奧弗霍爾特：“東亞的核擴散”

[1143]Pa-ship nien-tai（The eighties）.Monthly.Taipei：1979—.

《80年代》

[1144]Pacific Affairs：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sia and the Pacific.Quarterly.Vancouver，B.C.：1926—v.ols.1-33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vols.34-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Vancouver.

《太平洋事務：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國際評論》

[1145]Pai-chia cheng-ming—fa-chan k’o-hsueh ti pi-yu chih lu.1956 nien 8 yueh ch’ing-tao i-ch’uan hsueh tso-t’an hut chi-shu.（Let a hundred schools contend-the way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must follow.The record of the August 1956 Tsingtao Conference on Genetics）.Peking：Commercial Press，1985.

《百家爭鳴——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一九五六年八月青島遺傳學座談會記述》

[1146]Pai Hsien-yung.“The wandering Chinese：the theme of exile in Chinese fiction.”Iowa Review，7.2—3（Spring-—Summer 1976），205—212.

白先勇：“迷茫的中國人：中國小說中的流放主題”

[1147]Pan Ku.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Trans.Homer H.Dubs.3 vols.Baltimore：Waverly Press，1955[1944，1938].

班固：《前漢書》

[1148]Pannell，Clifton.“Recent growth in China's urban system”，in Laurence J.C.Ma and Edward Hanten，eds.，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91—113.

克利夫頓·潘內爾：“中國城市體系的新發展”

[1149]Parish，William L.，ed.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the great transformation.Armonk，N.Y.：M.E.Sharpe，1985.

威廉·L.帕里什編：《中國農村的發展：巨變》

[1150]Parish，William L.“Factions in Chinese military politics.”CQ，56（October-December 1973），667—699.

威廉·L.帕里什：“中國軍隊政治中的派系”

[1151]Parish，William L.，and Whyte，Martin King.Village and family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威廉·L.帕里什、馬丁·金·懷特：《當代中國的農村和家庭生活》

[1152]Pascoe，B.Lynn.“China's relations with Burma，1949—1964”，in Andrew W.Cordier，ed.，Columbia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dean's papers，1965，175—204.

B.林恩·帕斯科：“中國同緬甸的關系（1949—1964）”

[1153]Pasternak，Burton.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伯頓·帕斯特奈克：《兩個中國村莊的親戚關系和社會》

[1154]Payne，Robert.Chiang Kai-shek.New York：Weybright＆Talley，1969.

羅伯特·佩恩：《蔣介石》

[1155]Peck，James.See Nee，Victor.

[1156]Pei-ching jih-pao（Peking daily）.1954—（.Ceased publication for a time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北京日報》

[1157]Pei-ching kung-jen（The Peking worker）.Monthly.Peking：1984—.

《北京工人》

[1158]Pei-ching shih-fan ta-hsueh hsueh-pao（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Bimonthly.Peking：1956—.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

[1159]Peking Daily.See Pei-ching jih-pao.

[1160]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See Pei-ching shih-fan ta-hsueh hsueh-pao.

[1161]Peking Review.Weekly.Peking：1958—（.From January 1979，Bei jing Review.）

《北京周報》

[1162]Pelzel，John C.“Economic management of a production brigade in post-Leap China”，in W.E.Willmott，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387—414.

約翰·C.佩爾澤爾：“中國‘大躍進’后一個生產大隊的經濟管理”

[1163]Peng Dehuai[P’eng Te-huai].Memoirs of a Chinese marshal：the autobiographical notes of Peng Dehuai（1898—1974）.Trans.Zheng Longpu；English text edited by Sara Grimes.Peking：FLP，1984.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

[1164]Peng Ming-mi.A taste of freedom：memoirs of a Formosan independence leader.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72.

彭明敏：《自由的體驗：一個福摩薩獨立領袖的回憶錄》

[1165][P’eng Te-huai].The case of P’eng Te-huai，1959—1968.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68.

《彭德懷事件》

[1166]P’eng Te-huai.“Letter of opinion”，in The case of P’eng Te-huai 1959—1968，7—13.

彭德懷：“意見書”

[1167]P’eng Te-huai tzu-shu（P’eng Te-huai's own account）.Peking：Jen-min，1981.Trans.as Memoirs of a Chinese marshal.Peking：FLP，1984.

《彭德懷自述》

[1168]People's Daily.See Jen-min jih-pao.

《人民日報》

[1169]People's Education.See Jen-min chiao-yü

《人民教育》

[1170]People's Publishing House.Jen-min ch’u-pan-she.Cited as Jen-min.

人民出版社

[1171]Pepper，Suzanne.China's universities：post-Mao enrollment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of secondary education：a research report.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4.

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大學：毛以后的招生政策及其對中等教育結構的影響——一份研究報告》

[1172]Pepper，Suzanne.“An interview on changes in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the‘Gang of Four.’”CQ，72（December 1977），815—824.

蘇珊娜·佩珀：“‘四人幫’以后就中國教育的變化進行的一次采訪”

[1173]Pepper，Suzanne.“Education and revolution：the‘Chinese model’revised.”Asian Survey，18.9（September 1978），847—890.

蘇珊娜·佩珀：“教育和革命：修正過的‘中國模式’”

[1174]Pepper，Suzanne.“Chinese education after Mao.”CQ，81（March 1980），1—65.

蘇珊娜·佩珀：“毛以后的中國教育”

[1175]Pepper，Suzanne.“China's universities：new experiments i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a research report.”Modern China，8：2（A-pril 1982），147—204.

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大學：社會主義民主和行政改革的新試驗——一份研究報告”

[1176]Perkins，Dwight H.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1969.

德懷特·H.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

[1177]Perkins，Dwight，ed.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Report of the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德懷特·珀金斯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的小型工業》

[1178]Perkins，Dwight H.“Research on the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survey of the field.”JAS，42.2（February 1983），345—372.

德懷特·H.珀金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之研究概覽”

[1179]Perkins，Dwight H.“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6（June 1988），601—645.

德懷特·H.珀金斯：“改革中的中國經濟體制”

[1180]Perkins，Dwight，and Yusuf Shahid.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for the World Bank，1984.

德懷特·珀金斯、沙義德·尤素福：《中國農村的發展》

[1181]Perry，Elizabeth J.“Social ferment：grumbling amidst growth”，in John S.Major，ed.，China briefing，1985，39—52.

伊麗莎白·J.佩里：“社會騷動：增長中的怨言”

[1182]Perry，Elizabeth J.，and Wong，Christine，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5.

伊麗莎白·J.佩里、克里斯廷·汪編：《毛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

[1183]Pien Chih-lin.“Tung t’u wen-ta”（Dialogue of the earth movers）.Shihk’an，3（1958），10.

卞之琳：《動土問答》

[1184]Polemic on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The.Peking：FLP，1965.

《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辯論》

[1185]Political Quarterly.Quarterly.Oxford：Basil Blackwell，1930—.

《政治季刊》

[1186]Pollack，Jonathan D.The Sino-Soviet conflict in the 1980s：its dynamic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1981.

喬納森，D.波拉克：《80年代的中蘇沖突》

[1187]Pollack，Jonathan D.The Sino-Soviet rivalry and Chinese security debate.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R-2907-AF，October 1982.

喬納森·D.波拉克：《中蘇敵對與中國安全之辯論》

[1188]Pollack，Jonathan D.The lessons of coalition politics：Sino-American security relations.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R-3133-AF，February 1984.

喬納森·D.波拉克：《聯盟政治的教訓：中美安全關系》

[1189]Pollard，D.E“The short stor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Q，73（March 1978），99—121.

D.E.波拉德：“‘文化大革命’中的短篇小說”

[1190]Pollard，D.E.“The controversy over modernism 1979—1984.”CQ 104（December 1985），641—657.

D.E.波拉德：“現代主義之爭（1979—1984）”

[1191]Potter，Sulamith Heins.“The position of peasants in modern Chinas social order.”Modern China，9.4（October 1983），465—499.

薩勒米斯·海因斯·波特：“現代中國社會秩序中農民的位置”

[1192]Powell，Ralph L.“Commissars in the economy：the‘Learn from the PLA’movement in China.”Asian Survey，5.3（March 1965），125—138.

拉爾夫·L.鮑威爾：“經濟中的政委：中國的‘學習解放軍’運動”

[1193]PR.Peking Review.

《北京周報》

[1194]Pratt，Lawrence.North Vietnam and Sino-Soviet tension.Toronto：Baxter，1967.

勞倫斯·普拉特：《北越與中蘇緊張關系》

[1195]Pravda.Daily.Moscow：CPSUCC，1912—.

《真理報》

[1196]PRC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kuo-chia t’ung-chi chü.See Chung-kuo t’ung-chi nien-chie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1197]Price，Jane L.Cadres，commanders and commissars：the train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1920—1945.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6.

珍妮·L.普賴斯：《于部、指揮官和政委》

[1198]Price，Ronald F.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0；2nd ed.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1979.

羅納德·F.普賴斯：《共產黨中國的教育》

[1199]Price，Ronald F.Marx and educ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London：Croom Helm；Totowa，N.J.：Rowman＆Littlef ield，1977.

羅納德·F.普賴斯：《馬克思與俄國和中國的教育》

[1200]Problems of communism.Bimonthly.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 ice，1952—.

《共產主義問題》

[1201]Problemy Dal’nego Vostoka（Problems of the Far East）.Quarterly through 1986；bimonthly 1987—I.nstitute of the Far East，USSR Academy of Sciences.Trans.as Far Eastern Affairs.Moscow：Progress，1972—.

《遠東問題》

[1202]Problemy i protivorechiia v razvitii rabochego klassa KNR（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king class of the PRC）.Moscow：Insti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Movement，Academy of Sciences，1978.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人階級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

[1203]Problemy sovetskogo kitaevedeniia（Topics in Soviet Sinology）.Moscow：Institute of the Far East，1973.

《蘇聯的中國學主題》

[1204]Pruitt，Ida.A daughter of Han：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rking woman[by]Ida Pruitt，from the story told her by Ning Lao T’al-t’ai.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London：H.Mil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5.

艾達·普魯伊特：《老韓的女兒：一位中國勞動婦女的自傳》

[1205]Pruitt，Ida.Old Madam Yin：a memoir of Peking life，1926-1938.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艾達·普魯伊特：《尹老太太：對北京生活的回憶（1926—1938）》

[1206]Primgek，Jaroslav.Die Literaturdes befreiten China und ihre Volkstraditionen.（The literature of liberated China and its folk traditions）.Prague：Artia，1955.

亞羅斯拉夫·普魯賽克：《解放后的中國文學及其民間傳統》

[1207]Prybyla，Jan S.The societal objective of wealth，growth，stability and equity in Taiwan.Occasional Paper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no.4.Baltimore：University of Mary land School of Law，1978.

簡·S.普賴拜拉：《臺灣的財富、發展、穩定與公正的社會目標》

[1208]Pu-chin-ti ssu-nien（Inexhaustible memories）.Peking：Chung-yang wenhsien，1987.

《不盡的思念》

[1209]Pusey，James R.Wu Han：attacking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past.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9.

詹姆斯·R.普西：《吳晗：借古諷今》

[1210]Pye，Lucian W.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1976.

盧西恩·W.派伊：《毛澤東：領袖人物》

[1211]Pye，Lucian.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Mass.：Oelgeschlager，Gunn＆Hain，1981.

盧西恩·派伊：《中國政治的動力》

[1212]Pye，Lucian W.，with Mary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e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盧西恩·W.派伊和瑪麗·W.派伊：《亞洲的力量和政治》

[1213]“Quarterly chronicle and documentation.”CQ，in each issue.

“每季大事和文獻”

[1214]Ra’anan，Uri.“Peking's foreign policy‘debate’，1965—1966”，in Tang Tsou，ed.，China in crisis，2.23—71.

尤里·拉阿南：“北京對外政策的‘辯論’（1965—1966）”

[1215]Raddock，David.Politic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China.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7.

戴維·拉多克：《中國青少年的政治行為》

[1216]Radio Liberty Dispatch.Weekly.Various titles.From 1989 became Report on the USSR.New York：Radio Liberty Committee.

《自由電臺快訊》

[1217]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s on the Soviet Union.Weekly.Munich：RFERL，Inc.，1956—F.ormerly 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s.

《自由電臺蘇聯研究簡報》

[1218]Ragvald，Lars.Yao We-yuan as a literary critic and theorist.Stockholm：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University of Stockholm，1978.

拉斯·拉格瓦爾德：《作為文學評論家和理論家的姚文元》

[1219]Ranis，Gustav.“Industrial development”，in Walter Galenson，ed.，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206—262.

古斯塔夫·拉尼斯：“工業發展”

[1220]Rankin，Karl Lott.China assignmen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

卡爾·洛特·蘭金：《中國的分配》

[1221]Ravenholt，Albert.“Formosa today.”Foreign Affairs，30.4（July 1952），612—624.

艾伯特·雷文霍爾特：“今日福摩薩”

[1222]Rawski，Thomas G.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for the World Bank，1979.

托馬斯·G.羅斯基：《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就業》

[1223]Red Flag.See Hung-ch’i.

《紅旗》

[1224]Renditions：a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magazine.Semi-annual.Hong Kong：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s，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3—.

《譯叢：中英文翻譯雜志》

[1225]“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crimes of the Lin Piao anti-Party clique.”From Chung-fa，No.34（1973），in Michael Y.M.Kau，ed.，The Lin Piao affair，110—117.

“關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

[1226]Research Office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See 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1227]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7 June 1981].NCNA，30 June 1981；FBIS Daily Report：China，1 July 1981，K1—38；published as Resolution on CPC History（1949—1981）.Peking：FLP，1981.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228]Review of National Literatures.Annual.Whitestone，N.Y.：Council on National Literatures，Griffon House Publications，1970—.

《民族文學評論》

[1229]Reynolds，Bruce L.“Changes 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Shanghai industrial workers，1930—1973”，in Christopher Howe，ed.，Shanghai：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222—239.

布魯斯·L.雷諾茲：“上海產業工人生活水平的變化（1930—1973）”

[1230]Reynolds，Bruce L.，ed.and intro.Reform in China：challenges and choices.Chinese Economic System Reform Research Institute，Peking.Armonk，N.Y.：M.E.Sharpe，1987.

布魯斯·L.雷諾茲編：《中國的改革：挑戰與選擇》

[1231]Reynolds，Bruce L.，ed.Chinese economic reform.A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1.3（September 1987）.Boston，Mass.：Academic Press，1988.

布魯斯·L.雷諾茲：《中國的經濟改革》

[1232]Rice，Edward Earl.Mao's wa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

愛德華·厄爾·賴斯：《毛的道路》

[1233]Riggs，Fred W.Formosa under Chinese Nationalist rule.New York：Octagon Books，1972；New York：Institute for Pacific Relations，1952.

弗雷德·W.里格斯：《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福摩薩》

[1234]Riollot，Jean.“Soviet reaction to the Paracel Islands dispute.”Radio Liber-ty Dispatch（11 February 1974），1—3.

瓊·里奧洛特：“蘇聯對西沙群島爭端的反應”

[1235]Riskin，Carl.“Small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CQ，46（Apri-June 1971），245—273.

卡爾·里斯金：“小型工業與中國的發展模式”

[1236]Robinson，Thomas W.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background，development，and the March 1969 clashes.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RM-6171-PR，1970；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6.4（December 1972），1175—1202.

托馬斯·W.魯賓遜：《中蘇邊界爭端：背景、發展和1969年3月的沖突》

[1237]Robinson，Thomas W.，ed.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托馬斯·W.魯賓遜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1238]Robinson，Thomas W.The border negoti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Sino-Soviet-American relations.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P-4661，1971.

托馬斯·W.魯賓遜：《邊界談判與中蘇美關系的前景》

[1239]Robinson，Thomas W.“A politico-military biography of Lin Piao，part Ⅱ，1950—1971.“Draft manuscript，August 1971.”

托馬斯·W.魯賓遜：“林彪的政治軍事生涯”

[1240]Robinson，Thomas W.“Explain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contributing elements and levels of analysis.”Unpublished manuscript，1978.

托馬斯·W.魯賓遜：“解釋中國的外交政策”

[1241]Robinson，Thomas W.“Chou En-lai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Thomas W.Robinson，ed.，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165—312.

托馬斯·W.魯賓遜：“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

[1242]Robinson，Thomas W.“The Wuhan Incident：local strife and provincial rebell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Q，47（July-September 1971），413—438.

托馬斯·W.魯賓遜：“武漢事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地方沖突和省級官員的造反”

[1243]Robinson，Thomas W.“China in 1972：socio-economic progress amidst po-litical uncertainty.”Asian Survey，13.1（January 1973），1—18.

托馬斯·W.魯賓遜：“1972年的中國：社會經濟在不穩定的政治環境中的發展”

[1244]Robinson，Thomas W.“China in 1973：renewed leftism threatens the‘New Course.’”Asian Survey，14.1（January 1974），1—21.

托馬斯·W.魯賓遜：“1973年的中國：復活的‘左’傾思想威脅著‘新事業’”

[1245]Robinson，Thomas W.“American policy in the strategic triangle”，in Richard A.Melanson，ed.，Neither cold war nor détente？112—133.

托馬斯·W.魯賓遜：“戰略三角關系中的美國政策”

[1246]Robinson，Thomas W.“Political and strategic aspect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in Donald C.Hellmann，ed.，China and Japan：a new balance of power，197—268.

托馬斯·W.魯賓遜：“中國外交政策的政治和戰略層面”

[1247]Robinson，Thomas W.“Detente and the Sino-Soviet-U.S.triangle”，in Della W.Sheldon，ed.，Dimensions of detente，50—83.

托馬斯·W.魯賓遜：“緩和與中蘇美三角關系”

[1248]Robinson，Thomas W.“Restructur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1959—1976：three episodes”，in K[al]J.Holsti，et al.，Why nations realign：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war world，134—171.

托馬斯·W.魯賓遜：“1959—1976年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三部曲”

[1249]Robinson，Thomas W.，and Mozingo，David P.“Lin Piao on People's War：China takes a second look at Vietnam.”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Rm-4814-PR，November 1965.

托馬斯·W.魯賓遜、戴維·P.莫津戈：“林彪論人民戰爭”

[1250]Roll，C.R.“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income in China：a comparison of the 1930s and the 1950s.”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4.

C.R.羅爾：“中國農村收入的分配”

[1251]Rosen，Stanley.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case of Guangzhou.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1.

斯坦利·羅森：《下鄉青年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廣州實例》

[1252]Rosen，Stanley.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Canton）.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2.

斯坦利·羅森：《紅衛兵的派性與廣州的“文化大革命”》

[1253]Rosen，Stanley.“Obstacles to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Modern China，8.1（January 1982），3—40.

斯坦利·羅森：“中國教育改革的障礙”

[1254]Ross，Robert S.The Indochina tangle：China's Vietnam policy，1975—1979，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羅伯特·S.羅斯：《印度支那的紛爭：中國的越南政策（1975—1979）》

[1255]Rowe，David NelsonI.n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the case of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1972—1974.Hamden，Conn.：Shoestring Press，1975.

戴維·納爾遜·羅：《靈通的外交關系》

[1256]Rowe，William.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威廉·羅：《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會》

[1257]Rowe，William“.Urban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Hankow 1796—1889.”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0.Published as 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威廉·羅：“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社會：漢口（1796—1889）”

[1258]Rozman，Gilbert，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1973].

吉爾伯特·羅茲曼：《滿清和日本德川時期的城市網絡》

[1259]Rozman，Gilbert.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1978—198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關于蘇聯社會主義的辯論（1978—1985）》

[1260]Rozman，Gilbert，ed.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New York：Free Press，1981.

吉爾伯特·羅茲曼編：《中國的現代化》

[1261]Rumiantsev，A.Istoki i evoliutsiia Idei Mao Tsze-duna”（Sources and evolution of“Mao Tse-tung Thought”）.Moscow：Nauka，1972.

A.盧米安契夫：《“毛澤東思想”的來源與發展》

[1262]Rupen，Robert A.，and Farrell，Robert，eds.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New York；Praeger，1967.

羅伯特·A.魯彭和羅伯特·法雷爾編：《越南與中蘇爭端》

[1263]Salisbury，Harrison E.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New York：Norton，1969.

哈里森·E.索爾茲伯里：《中俄戰爭》

[1264]Salisbury Harrison E.“Marco Polo would recognize Mao's Sinkiang.”New York Times Magazine，23 November 1969.

哈里森·E.索爾茲伯里：“馬可·波羅會承認毛的新疆”

[1265]Sandles，Gretchen Ann.“Soviet imag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dissertation，1981.

格雷特津·安·桑德勒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眼中的蘇聯形象（1949—1979）”

[1266]SansanS.ee Lord，Bette[Bao].

[1267]Sardesar，D.R.“China and peace in Vietnam.”China Report，5.3（May-June 1969），13—18.

包柏漪：“中國與越南的和平”

[1268]Scalapino，Robert A.On the trail of Chou En-lai in Africa.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Rm-4061-PR，April 1964.

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周恩來在非洲的足跡》

[1269]Scalapino，Robert A.，ed.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

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英》

[1270]Scalapino，Robert A.“Africa and Peking's united front.”Current Scene，3.26（1 September 1965），1—11.

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非洲與北京的統一戰線”

[1271]Scalapinao，Robert A.“The transition in Chinese party leadership：a comparison of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ral Committees”，in Robert A.Scalapino，ed.，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67—148.

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中共領導層的變化：第八和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之比較”

[1272]Schapiro，Leonard，and Lewis，John Wilson.“The roles of the monolithic party under the totalitarian leader”，in John Wilson lewis，ed.，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1 14—145.

倫納德·夏皮羅和約翰·威爾遜·劉易斯：“在極權主義領袖之下堅如磐石的黨的作用”

[1273]Schelochowzew，A.N.See Zhelokhovtsev，A.Schlesinger，Arthur，M.，Jr.A thousand days：John F.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5.

小阿瑟·M.施萊辛格：《一千天：約翰·F.肯尼迪在白宮》

[1274]Schram，Stuart[R.].Documents sur la théorie de la révolution permanente”en Chine.Paris：Mouton，1963.

S.施拉姆：《有關中國永遠革命論的文件》

[1275]Schram，Stuart[R.].Mao Tse-tung.Rev.ed.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7.

S.施拉姆：《毛澤東》

[1276]Schram，Stuart R.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Rev.ed.New York：Praeger，1969.

S.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

[1277]Schram，Stuart R.Authority，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S.施拉姆：《中國的權力、參與和文化變化》

[1278]Schram，Stuart[R.].Mao Zedong：a preliminary reassessment.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3.

S.施拉姆：《毛澤東：初步再評價》

[1279]Schram，Stuart[R.].Ideology and policy in China since the ThirdPlenum，1978—1984.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84.

S.施拉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策》

[1280]Schram，Stuart R.，ed.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See Schram，Stuart R.，ed.，Mao Tse-tung unrehearsed.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

[1281]Schram，Stuart R.，ed.Mao Tse-tung unrehearsed：talks and letters，1956—1971.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4.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talks and letters 1956—1971.New York：Pantheon，1974.

S.施拉姆編：《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1956—1971）》

[1282]Schram，Stuart[R.]，ed.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and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5.

S.施拉姆編：《中國國家權力的范圍》

[1283]Schram，Stuart[R.]，ed.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and Hong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7.

S.施拉姆編：《中國國家權力的基礎與范圍》

[1284]Schram，Stuart R.“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Stuart R.Schram，ed.，Authority，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1—108.

S.施拉姆：“用歷史觀點看文化大革命”

[1285]Schram，Stuart R.“The party in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in John Wilson Lewis，ed.，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170—202.

S.施拉姆：“中國共產主義思想意識中的黨”

[1286]Schram，Stuart[R.].“Decentralization in a unitary state：theory and practice 1940—1984”，in Stuart Schram，ed.，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81—125.

S.施拉姆：“中央集權國家的分權：理論與實踐（1940—1984）”

[1287]Schram，Stuart[R.].“MaoTse-tung's thought to 1949.”CHOC，13.789—870.

S.施拉姆：“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1288]Schram，Stuart[R.].“Party leader or true ruler？Foundations and significanoe of Mao Zedong's personal power”，in Stuart R.Schrarn，ed.，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203—256.

S.施拉姆：“黨的領袖還是真正的統治者？毛澤東個人權力的基礎和影響”

[1289]Schram，Stuart[R.].“The Marxist”，in Dick Wilson，ed.，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35—69.

S.施拉姆：“馬克思主義者”

[1290]Schram，Stuart[R.].“Mao Tse-tu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1958—1969.”CQ，46（April-June 1971），221—244.

S.施拉姆：“毛澤東與永遠革命理論（1958—1969）”

[1291]Schram，Stuart R.“From the‘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to the‘Great Alliance.’”CQ，49（January-March 1972），88—105.

S.施拉姆：“從‘群眾大聯合’到‘大聯盟’”

[1292]Schram，Stuart[R.].“Chairman Hua edits Mao's Literary heritage：‘On the ten great relationships’”，CQ，69（March 1977），126—135.

S.施拉姆：“華主席編輯毛的文學遺產：‘論十大關系’”

[1293]Schram，Stuart[R.].“New texts by Mao Zedong，1921—1966.”Communist Affairs，2.2（April 1983）.143—165.

S.施拉姆：“毛澤東的新文選（1921—1966）”

[1294]Schram，Stuart[R.].“‘Economics in command？’Ideology and policy since the Third Plenum，1978—1984.”CQ，99（September 1984），417—461.

S.施拉姆：“‘經濟掛帥’？三中全會以來的意識形態與政策（1978—1984）”

[1295]Schram，Stuart[R.].“The Limits of cataclysmic change：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the‘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Q，108（December 1986），613—624.

S.施拉姆：“劇變的限度：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發展中的地位的看法”

[1296]Schram，Stuart[R.].“China after the Thirteenth Congress.”CQ，114（June 1988），177—197.

S.施拉姆：“十三大以后的中國”

[1297]Schurmann，Franz.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1966].

弗朗茲·舒爾曼：《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

[1298]Schwartz，Benjamin I.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1951].

許華茨：《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

[1299]Schwartz.Benjamin I.“The reign of virtue：some broad perspectives on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John Wilson Lewis，ed.，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149—169.

許華茨：“在美德統治下”

[1300]Schwartz，Benjamin I.“The primacy of the political order in East Asian societies”，in Stuart Schram，ed.，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l—10.

許華茨：“東亞社會中政治秩序的首要地位”

[1301]Schwartz，Harry.Tsars，mandarins，and commissars：a history of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Philadelphia：Lippincott，1964；Rev.ed.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3.

哈里·施瓦茨：《沙皇、大臣和政委：中俄關系史》

[1302]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77.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科學技術》

[1303]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See K’o-chi jib-pao.

《科技簡報》

[1304]Scientific Culture News.See K’o-hsuehw enh-ua pao.

《科學文化報》

[1305]SCMM.See U.S.Consulate General（Hong Kong）.Selection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

《中國大陸雜志選》

[1306]SCMP.See U.S.Consulate General（Hong Kong）.Survey from China Mainland Press.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

[1307]Segal，Gerald.Sino-Soviet relations after Mao.London：International l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Adelphi Paper，no.202，Autumn 1985.

杰拉爾德·西格爾：《毛以后的中蘇關系》

[1308]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Teng Hsiao-P’ing]（1975—1982）.Peking：FLP，1984.

《鄧小平文選》

[1309]Sen Gupta，Bhabani[Sena Canakya].The fulcrum of Asia：relations among China，India，Pakistan and the USSR.New York：Pegasus，1970.

巴巴尼·森格普塔：《亞洲的支軸：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和蘇聯之間的關系》

[1310]Sen Gupta，Bhabani.Soviet-Asian relations in the 1970s and beyond：an interperceptional study.New York：Praeger，1976.

巴巴尼·森格普塔：《70年代以后蘇聯同亞洲的關系》

[1311]Sewell，WilliamI.stayed in China.New York：A.S.Barnes，1966.

威廉·休厄爾：《我在中國的日子》

[1312]Seybolt，Peter J.，ed.Revolutionary education in China：documents and commentary.White Plains，N.Y.：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 Press，1973.

彼得·J.西博爾特編：《中國的革命教育》

[1313]Seybolt，Peter J.，ed.The rustication of urban youth in China：a social experiment.Introduction by Thomas P.Bernstein.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7[1976，1975].

彼得·J.西博爾特編：《中國城市青年的農村生活：一段社會經歷》

[1314]Shambaugh，David L.“China's America watchers：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1972—1986.”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dissertation，1989.

戴維·L.香博：“中國的美國旁觀者：對美國的想象（1972—1986）”

[1315]Shangh-ai hsi-chü（Shanghai theater）.Bimonthly.Shanghai：1956—.

《上海戲劇》

[1316]Shangh-aiw en-hsueh（shanghai Literature）.Monthly.Shanghai：1935—.Formerly Wen-i yueh-k’an（Literaure and art monthly）.

《上海文學》

[1317]Shao Hua-tse.“Kuan-yü‘wen-hua ta ko-ming’ti chi-ko wen-t’i”（On sever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in Tang-shih huii pao-kao-chi，337—392.

邵華澤：“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幾個問題”

[1318]Shao Yen-hsiang.Tao yuan-fang ch’ü（Far journey）.Peking：Tsochia，1956.

邵燕祥：《到遠方去》

[1319]Shaw，Brian.“China and North Vietnam：two revolutionary paths.”Current Scene，9.11（November 1971），1—12.

布賴恩·肖：“中國和北越：兩條革命道路”

[1320]She-hui（Society）.Bimonthly.Shanghai：1981—.

《社會》

[1321]She-hui k’o-hsueh chan-hsien（Social science front）.Quarterly.ch’angch’un：1978—.

《社會科學戰線》

[1322]Sheldon，Della W.，ed.Dimensions of detente.New York：Praeger，1978.

德拉·W.謝爾登編：《緩和面面觀》

[1323]Shen keng（Plow deeply）.Taiwan.

《深耕》

[1324]Shen，T.H.，ed.Agriculture's place in the strategy of development：the Taiwan experience.Taipei：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1974.

T.H.沈（音）編：《農業在發展戰略中的位置：臺灣經驗》

[1325]“Sheng-huo tsai li-shih yin-ying chung-ti Lin Tou-tou”（Lin Tou-tou who lives in the shadow of history）.New York：Hua-ch’iao jih-pao，14—23 June 1988.

“生活在歷史陰影中的林豆豆”

[1326]Shih-chieh chih-shih（World knowledge）.Monthly.Peking：1934—.

《世界知識》

[1327]Shih-chieh ching-chi tao-pao（World Economic Herald）.Weekly.Shanghai：1980—1989.

《世界經濟導報》

[1328]Shih Chung-ch’üan.“Tu Su-Lien‘cheng-chih ching-chi hsueh chiao-k’o shu’ti t’an-hua”（Talks on reading the Soviet text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in Kung Yü-chih et al.，Mao Tse-tung ti tu-shu sheng-huo，148—178.

石仲泉：“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1329]Shih Chung-ch’üan“.Ma-K’o-ssu so-shuo-ti’tzu-ch’an-chieh-chi ch’üan-li’ho Mao Tse-tung t’ung-chih tui t’a ti wu-chieh”（The“bourgeois right”referred to by Marx，and Comrade Mao Tse-tung's misunderstanding of it）.

Wen-hsien ho yen-chiu，1983，405—417.

石仲泉：“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和毛澤東同志對它的誤解”

[1330]Shih Chung-ch’üan.“Review of Mao Tse-tung che-hsueh P’i-chu-chi.”Chehsueh yen-chiu，10（1978），3—9，40.

石仲泉：“評《毛澤東哲學批注集》”

[1331]Shih-i chieh san chung ch’üan-but i-lai chung-yao wen-hsien hsuan-tu（Selected readings of important documents since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2 vols.Peking：Jen-min，1987.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

[1332]Shih-k’an（Poetry journal）.Monthly.Peking：1957—.

《詩刊》

[1333]Shih-pao chou-k’an（Sunday times weekly）.Taipei：1977—.

《時報周刊》

[1334]Shih tan-so（Poetry exploration）.Quarterly.peking：1980—.

《詩探索》

[1335]Shih-yueh（October）.Bimonthly.Peking：1978—.

《十月》

[1336]Shirk，Susan L.Competitive comrades：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蘇珊·L.舍克：《競爭的同志，中國的職業刺激與學生的策略》

[1337]Short，Philip.The dragon and the bear：inside China and Russia today.London：Abacus，1982.

菲力普·肖特：《龍和熊》

[1338]Shou-huo（Harvest）.Bimonthly.Shanghai：1957—1960，1964—.

《收獲》

[1339]Shue，Vivienn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1949—1956）》

[1340]Sicular，Terry.“Rural marketing and exchange in the wake of recent reforms”，in Elizabeth J.Perry and Christine Wong，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 o Ch ina，83—109.

特里·西科勒：“近期改革風中的農村市場和交換”

[1341]Sidel，Ruth.Families of Fengsheng：urban life in China.Baltimore：Penguin Books，1974.

魯思·賽德爾：《豐盛之家：中國的城市生活》

[1342]Sigurdson，John.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7.

約翰·西格德森：《中國農村的工業化》

[1343]Sih，Paul K.T.，ed.Taiwan in modern times.New York：St.John's Unive r sity Press，1973.

薛光前編：《現代臺灣》

[1344]Simon，Sheldon W.The broken triangle：Peking，Djakarta and the PKI.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9.

謝爾登·W.西蒙：《破裂的三角關系：北京、雅加達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

[1345]Singer，Martin.Educated youth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nn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1.

馬丁·辛格：《受過教育的青年與“文化大革命”》

[1346]Siu，Helen F.Agents andvictims in South China：uccomplices inrurul rev olution.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海倫.F.綏：《華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農村革命的幫兇》

[1347]Siu，Helen F.，and Stern，Zelda，eds.Mao's harvest：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海倫·F.綏和澤爾達·斯特恩編：《毛的收獲：中國新一代的呼聲》

[1348]Sixth Five-Year Pl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Economi and Social Development（1981—1985）.Peking：FLP，1984.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

[1349]Skinner，G.William，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1350]Skinner，G.William，et al.，eds.Modern Chinese society：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vol.1：G.W.Skinner，ed.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1644—1972.Vol.2：G.W.Skinner and W.Hsieh，eds.，Publications in Chinese，1644—1969.vol.3：G.W.Skinner and S.Tomita，eds.，Publications in Japanese，1644—1971.Stanford，Ca l 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施堅雅等編：《現代中國社會：有分析的書目》

[1351]Skinner.G.William.“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AS，Part Ⅰ，24.1（November 1964），3—43；Part Ⅱ，24.2（February 1965），195—228；Part Ⅲ，24.3（May 1965），363—399.

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

[1352]Slavic Review.Quarterly.Stanford，Calif.：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1941—.[Formerly 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斯拉夫評論》

[1353]Slimming，John.Green plums and a bamboo horse：a picture of Formosa.London：John Murray，1964.

約翰·斯利明：《綠色植物和一匹竹馬：一幅福摩薩圖畫》

[1354]Smith，Roger M.Cambodia's foreign polic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5.

羅杰爾·M.史密斯：《柬埔寨的外交政策》

[1355]Snow，Edgar.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Bantam，1978；1st rev.and enlarged ed.New York：Grove Press，1968；New York：Random House，1938；London：Godancz，1937.

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1356]Snow，Edgar.The long revolu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London：Hutchinson，1973.

埃德加·斯諾：《漫長的革命》

[1357]Snow，Edgar.“Interview with Mao.”New Republic，152（27 February 1965），17—23.

埃德加·斯諾：“毛澤東訪談錄”

[1358]Snow，Lois Wheeler.China on stage：an American actr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Random House，1972.

洛伊斯·惠勒·斯諾：《舞臺上的中國》

[1359]Snyder，Edwin K.；Gregor，A.James；and Chang，Maria Hsia.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Berkeley：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0.

埃德溫·K.斯奈德、A.詹姆斯·格雷戈爾、瑪麗亞·西厄·張：《美國與臺灣關系法和中華民國的防務》

[1360]Social Sciences in China：a quarterly journal in English.Quarterly.Peking.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1980—.

《中國社會科學》

[1361]Socialist upsurge in China's countryside.Peking：FLP，1957；and General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ed.Peking：FLP，1978.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1362]Soeya，Yoshihide.“Japan's postwar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China：three decades of non-governmental experiences.”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dissertation，1987.

“日本戰后對華經濟外交”

[1363]Solomon，Richard H.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理查德·H.所羅門：《毛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

[1364]Solomon，Richard H.，ed.The China factor：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scen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1.

理查德·H.所羅門編：《中國因素》

[1365]Solomon，Richard H.Chinese political negotiating behavior：a briefing analysis.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R-3295，December 1985.

理查德·H.所羅門：《中國人的政治談判行為：一份簡要分析》

[1366]Solomon，Richard H.“On activism and activists：Maoist conceptions of motivation and political role linking state to society.”CQ，39（July-September 1969），76—114.

理查德·H.所羅門：“關于積極性和積極分子：把國家和社會聯系起來的動機與政治作用的毛主義者的思想”

[1367]Solomon，Richard H.，and Kosaka Masataka，eds.The Soviet Far East mil-itary buildup：nuclear dilemmas and Asian security.Dover，Mass.：Auburn House，1986.

理查德·H.所羅門和高坂正堯編：《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集結》

[1368]Soo Chin-yee（Sansan）.Eighth moon.See Lord，Bette[Bao].

包柏漪：《第八個月亮》

[1369]Soong，Stephen C.，and Minford，John，eds.Trees on the mountain：an anthology of new Chinese writi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4.

斯蒂芬·C.孫（音）和明福德編：《高山上的樹木》

[1370]Sorenson，Theodore C.Kennedy.New York：Harper＆Row，1965.

西奧多·C.索倫森：《肯尼迪》

[1371]Sorich，Richard，ed.Contemporary China：a bibliography of reports on China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Prepared for 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New York：n.p.，1961.

理查德·索里奇編：《當代中國：美國聯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的關于中國的報告目錄》

[1372]Sotsial’no-ekonomicheskii stroi i ekonomicheskaia politika KNR（Soci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PRC）.Moscow：Nauka，1978.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

[1373]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See Huan-an ship-fan to-hsueh hsueh-pao.

《華南師范大學學報》

[1374]Soviet Analyst.Semi-monthly.Richmond，Surrey：np..[Ed.lain Elliot]，1972—.

《蘇聯分析家》

[1375]Sovremennyi Kitai v zarubezhnykh issledovaniiakh（Contemporary China in foreign research）.Moscow：Nauka，1979.

《外國對當代中國的研究》

[1376]Speare，Alden，Jr.“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in Taiwan”，in James C.Hs-iung et al.，eds.，The Taiwan experience，1950—1980，271—281.

小奧爾登·斯皮爾：“臺灣的城市化與移民”

[1377]Special Commentator.“Su-lien cheng-pa Shih-chieh ti chün-shih chan-lueh”（The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Soviet Union for world domination），JMJP.11 January 1980，7.

“蘇聯稱霸世界的軍事戰略”

[1378]“Speeches and statements alleged to have been made by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 in July through October，1966.”CB，819（10 March 1967），1—84.

“1966年7—10月中共領導人言論集”

[1379]Spence，Jonathan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80.

喬納森·斯彭斯：《為了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1620—1960）》

[1380]Spence，Jonathan.The Gate of Heavenly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95—1980.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82.

喬納森·斯賓士：《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

[1381]Spitz，Allan A.，ed.Contemporary China.Pullman：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7.

阿倫·A.施皮茨編：《當代中國》

[1382]Stacey，Judith.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朱迪思·斯特西：《中國的家長制和社會主義革命》

[1383]Stalin，Joseph.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Peking：FLP，1972.

約瑟夫·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

[1384]Stalin，Joseph.Marxism and problems of linguistics.Peking：FLP，1972.

約瑟夫·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

[1385]Starr，John Bryan，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約翰·布賴恩·斯塔爾：《繼續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1386]Starr，John Bryan“.Revolution in retrospect：the Paris Commune through Chinese eyes.”CQ，49（January-March 1972），106—125.

約翰·布賴恩·斯塔爾：“回顧革命：中國人眼中的巴黎公社”

[1387]Starr，John Bryan，and Dyer，Nancy Anne，comps.Post-Liberation works of Mao Zedong：a bibliography and index.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6.

約翰·布賴恩·斯塔爾和南希·安妮·戴爾：《解放后毛澤東的著作：目錄和索引》

[1388]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ulletin of.See 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kuo-wu-yuan kung-pao.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

[1389]State Statistical Bureau.Ten great years：statistics of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achieverne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troduction by Feng-hua Mah.Bellingham：Western Washington State College，1974.Information compiled.by t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Originally published 1960.

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

[1390]Shate Statistical Bureau.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Annual.1981—.Compiled by t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nglish edition.Hong Kong：Economic Information Agency，1982—.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

[1391]State Statistical Bureau.Chung-kuo t’ung-chi chai-yao，1987（Chinese statistical summary，1987）.Peking：Chung-kuo t’ung-chi，1987.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1987）》

[1392]State Statistical Bureau.Chung-kuo ku-ting tzu-ch’an t’ou-tzu t’ung-chi tzu-liao，1950—1985（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a）.Peking：Chung-kuo t’ung-chi，1987.

國家統計局：《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1950—1985）》

[1393]“State Stafistical Bureau report on the results of the 1981 National Economic Plan.”Chung-kuo Ching-chi nien-chien，1982，8.79，82—83.

《國家統計局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實施報告》

[1394]“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41（10 October 1969），3—4.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

[1395]“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4 May 1969.NCNA，24 May 1969.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

[1396]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Se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中國統計年鑒》

[1397]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Annual.Taiwan：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Executive Yuan，1975—.

《中華民國統計年鑒》

[1398]Stavis，Benedict.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

本尼迪克特·斯塔維斯：《中國農業機械化的政治》

[1399]Stevenson，William.The yellow wind，an excursion in and around Red China with a traveller in the yellow wind.London：Cassell；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9.

威廉·史蒂文森：《黃風》

[1400]Stolper，Thomas E.China，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together with an implication for Outer Mongolia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Armonk，N.Y.：M.E.Sharpe，1985.

托馬斯·E.斯托爾珀：《中國、臺灣和沿海島嶼及其對外蒙古和中蘇關系的含義》

[1401]Strategic Survey.Annual.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1967—.

《戰略概覽》

[1402]“Strive to create the brilliant images of proletarian heroes：appreciations in creating the heroic images of Yang Tzu-jung and others”，by the Taking Tiger Moutain by Strategy Group of the Peking Opera Troupe of Shang hai.ChineseLiterature，1（January1970），58—75.

“努力創造無產階級英雄的光輝形象”

[1403]Strong，Anna Louise.“Three interviews with Chairman Mao Zedong.”CQ，103（September 1985），489—509.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毛澤東的三次會見》

[1404]Stuart，Douglas T.，and Tow，William T.，eds.Chin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West：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in the 1980s.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2.

道格拉斯·T.斯圖爾特和威廉·T.托編：《中國、蘇聯和西方》

[1405]Study and Crticism.See Hsueh-hsi Yü P’i-p’an.

《學習與批判》

[1406]Su Chi.“Soviet image of and policy toward China，1969—1979.”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3.

蘇吉（音）：“蘇聯對中國的想象及其對華政策（1969—1979）”

[1407]Su Shao-chih.Tentative views on the class situ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Peking：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1981.

蘇紹智編：《試論我國現階段的階級狀況和階級斗爭》

[1408]Su Shao-chih，ed.Ma-k’o-ssu-chu-i yen-chiu（Research on Marx ism）.Peking：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1984.

蘇紹智編：《馬克思主義研究》

[1409]“Summary of Chairman Mao's talks to responsible local comrades during his tour of inspection（mid-August to September 12，1971）.”CLG，5.3-4（Fall-Winter 1972—1973），31-42.

“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摘要”

[1410]Summary o f the Forum on the Work in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Armed Forces with which Comrade Lin Piao entrusted Comrade Chiang Ch’ing.Peking：FLP，1968.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1411]“Summary of the Forum on the Work in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Armed Forces with which Comrade Lin Piao entrusted Comrade Chiang Ch’ing”，in 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reat Prolete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201—238.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1412]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Daily and weekly reports.Caversham Park，Reading：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Monitoring Service，1963—C.ited as SWB.

《世界廣播概要》

[1413]Sun Tun-fan，et al.，eds.Chung-kuo Kung-ch’an-tang lt-shih chiang-i（Teaching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2 vols.Tsinan：shan-tung jen-min，1983.

孫敦璠等編：《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

[1414]Sung Chien.“Jen-k’ou yi chüao-yü”（Population and education）.

宋健：《人口與教育》

[1415]Tzu-jan pien-cheng-fa t’ung-hsun（Journal of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3（June 1980）.Trans.in JPRS.77745 China report：Political，sociological，and military affairs，178，3 April 1981，43—47.

“自然辯證法通訊”

[1416]Sung-ko hsien-kei Mao chu-hsi（Odes to Chairman Mao）.Shanghai：Shanghai jen-min，1970.

《頌歌獻給毛主席》

[1417]Survey.1957，1962—1989.London and Paris：various publishers.For merly Soviet survey（1956—1957 and 1958—1961）and Soviet culture（1956）.Bimonthly 1961—1962；qaurterly 1963—1982；irregular，1983，1989.

《概覽》（1957、1962—1989）

[1418]Survey：a journal of East and West studies.London：Institute for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1959—.

《概覽：東西方研究雜志》

[1419]Sutter，Robert G.Chinese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7.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8.

羅伯特·G.薩特：《‘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國外交政策（1966—1967）》

[1420]Sutter，Robert G.Chinese foreign policy：developments after Mao.New York：Praeger，1985.

羅伯特·G.薩特：《中國的外交政策：毛以后的發展》

[1421]Suttmeier，Rechard P.Science，technology and China's drive for modernization.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0.

理查德·P.薩特梅爾：《科學技術與中國的現代化努力》

[1422]SWB.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1423]Swearingen，Rodger.The Soviet Union and postwar Japan.Stanford，Cah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8.

羅杰·斯韋林根：《蘇聯與戰后日本》

[1424]Swetz，Frank.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China：i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4.

弗蘭克·斯韋茨：《中國的數學教育》

[1425]Ta-kung pao（“L’Impartial”）.Hong Kong.

《大公報》（香港）

[1426]Ta-lu ti-hsia k’an-wu hui-pien（Collection of the mainland underground publications）.Taipei：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ommunist Problems.1980—.

《大陸地下刊物匯編》

[1427]Tachai.See Hsin Hua-wen.

《大寨》

[1428]T’ai-Wan wen-i（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art）.Bimonthly.Taipei：1953—.

《臺灣文藝》

[1429]“Taiwan briefing.”Special section on TaiwanC.Q，99（September 1984），462—568.

“臺灣簡報”

[1430]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Taipei：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Executive Yuan，1971—.

《臺灣統計數字冊》

[1431]Taiwan kingendaishi kenkyū（Historical studies of Taiwan in modern times），3（1980）.

《臺灣現代史研究》

[1432]Takeuchi Minoru，ed.Mao Tse-tung chi（Collected writings of Mao Tsetung）.10 vols.Tokyo：Hokuboshe，1970—1972，2nd ed.，Tokyo：Sososha，1983.

竹內實：《毛澤東集》

[1433]Takeuchi Minoru，ed.Mao Tse-tung chi pu chüan（Supplements to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Mao Tse-tung）.10 vols.Tokyo：Sososha，1983—1986.

竹內實：《毛澤東集補選》

[1434]Tamkang Revilew.Semi-annual 1970—1977：Quarterly 1978—T.aipei：Graduate Institute of We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Tamkang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1970—.

《淡江評論》

[1435]T’an Tsung-chi.“Lin Piao fan-ko-ming Chi-t’uan ti chueh-ch’i chi-ch’i fumieh”（The sudden rise of the Lin Piao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 and its destruction），in Chiao-hsueh ts’an-k’ao，hsia，38—57.

譚宗級：“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崛起及其覆滅”

[1436]T’an Tsung-chi and Cheng Ch’ien，eds.Shih-nien-hou-ti p’ing-shuo—“Wen-hua ta-ko-ming”shih lun-chi（Appraisals and explanations after one decade：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the“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Peking：Chung-kung tang-shih tzu-liao，1987.

譚宗級、鄭謙編：《十年后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

[1437]Tang，Raymond N.，and Ma，Wei-yi.Source materials on Red Guards and the Great Proletrian Cultural Revolution.Ann Arbor：Asian Library，Uni versity Library，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9.

湯遒文、馬惟一：《有關紅衛兵和“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史料》

[1438]Tang-shih hui-yi pao-kao-chi（Collected reports from the Conference on Party History）.Ch’üan-kuo tang-shih tzu-liao cheng-chi kung-tso hui-Yi ho chi-nien chung-kuo kung-ch’an-tang liu-shih chou-nien hsueh-shu t’aolun-hui mi-shu-ch’u（Secretariat of the National Work Conference on Collecting Party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eds.Peking：chung-kung chung-yang tang-hsiao，1982.

全國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會議和紀念中國共產黨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秘書處編：《黨史會議報告集》

[1439]Tang-shih t’ung-hsun（Party history newsletter）.Bimonthly 1980—1984；monthly 1984—1988.Biweekly 1989—T.itle changed to Chung-kung tandshih t’ung hsun.Peking.

《黨史通訊》（后改名為《中共黨史通訊》）

[1440]Tang-shih tzu-liao cheng-chi t’ung-hsun（Newsletter on the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on Party history）.Peking：Chung-kung tang-shih tzu-liao，1984—

《黨史資料征集通訊》

[1441]Tang-shih yen-chiu（Research on Party history）.Peking：chung-kung chung-yang tang-hsiao，1980—A.lso see Chung-kung tang-shih yen-chiu.

《黨史研究》

[1442]Tang-shih yen-chiu tzu-liao（Research materials on Party history）.Chengtu：Szechwan jen-min（for the Museum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80—.

《黨史研究資料》

[1443]Tang-tai（Contemporary）.Bimonthly.Peking：1979—.

《當代》

[1444]Tang-tai Chung-kuo wai-chiao（Diplomacy of contemporary China）.Peking：Chung-kuo she hui k’o-hsueh，1987.

《當代中國外交》

[1445]Tang-ti wen-hsien（Party documents）.Bimonthly.Peking：1988—.

《黨的文獻》

[1446]T’aoK’ai.“k’ai-shih ch’üan-mien chien-she she-hui-chu-i ti shih-nien”（The ten years which saw the beginning of the all-rou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in Chung-kung tang-shih yen-chiu-hui，ed.，Hsueh-hsi li-shih chuehi chuan-chi.

陶凱：“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

[1447]TASS News Agency.

[1448]Tatu，Michael.The great power triangle：Washington，Moscow，Pekjng.Paris：Atlantic Institute，1970.

米切爾·塔圖：《大三角：華盛頓、莫斯科、北京》

[1449]Taylor，Robert.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enrolment policies in China，1949—1971.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3.

羅伯特·泰勒：《中國的教育和大學招生的方針（1949—1971）》

[1450]Taylor，Robert.China's intellectual dilemma：politics and university enrolment，1949—1978.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nish Columbia Press，1981.

羅伯特·泰勒：《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政策與大學招生（1949—1978）》

[1451]Taylor，Robert.The Sino-Japanese axis：a new force in Asia？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5.

羅伯特·泰勒：《中日軸心：亞洲一支新的力量？》

[1452]Teachers’News.See Chiao-shih pao.

《教師報》

[1453]Teaching and Research.See Chiao-hsueh yü yen-chiu.

《教學與研究》

[1454]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n CCP History of the[PLA]Political Academy.See Chung-kuo kung-chan-tang liu-shill-nien ta-shih Chien-chieh.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

[1455]Teaching Bulletin.See Chiao-hsueh tung-hsun.

《教學通訊》

[1456]Teiwes，Frederick C.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China：the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Ithaca，N.Y.：China-Japan Program.Cornell University，1974.

弗里德里克·C.泰維斯：《中國的省的領導層：“文革”及其后果》

[1457]Teiwes，Frederick C.Elite discipline in China：coercive and persuasive approaches to rectification，1950—1953.Canberra：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78.

弗里德里克·C.泰維斯：《中國精英人物的訓練：整風的強迫與說服的方法（1950—1953）》

[1458]Teiwes，Frederick C.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1950—1965.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9.

弗里德里克·C.泰維斯：《中國的政治和清洗：1950—1965年的整風和黨的準則的衰敗》

[1459]Teiwes，Frederick C.Leadership，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Armonk，N.Y.：M.E.Sharpe，1984.

弗里德里克·C.泰維斯：《中國的領導人、合法性和沖突：從具有超凡魅力的毛到接班政治》

[1460]Ten great years.Se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偉大的十年》

[1461]Teng Hsiao-p’ing.Teng Hsiao-p’ing wen-hsuan 1975—1982.（Selected works of Teng Hsiao-p’ing）.Peking：Jen-min，1983.

《鄧小平文選》

[1462]Teng Hsiao-p’ing.Fundamental issues in present-day China.Peking：FLP，1987.

鄧小平：《我國目前的幾個基本問題》

[1463]Teng Hsiao-p’ing.“Memorial speech for Chou En-lai”，in“Quarterly Chronicle and Documentation.”CQ，66（June 1976），420—424.

鄧小平：“在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上的悼詞”

[1464]Teng Hsiao-p’ing.“Answers to the Italian journalist Oriana Fallaci”，in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Teng Hsiao-p’ing]（1975—1982），326—334.

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

[1465]Teng Hsiao-p’ing.“Uphold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in Teng Hsiaop’ing，Selected works，166—191.Teng Hsiao-p’ing.“On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Party and state leadership”，in Teng Hsiao-p’ing，Selected works，302—325.Teng Hsiao-p’ing.“Conversation of 26 April 1987 with Lubomir Strougal，”in Teng Hsiao-p’ing，Fundamental issues in present-day China，174—179.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466]Teng Li-ch’ün“.Hsueh-hsi‘Kuan-yü Chien-kuo-i-lai tang-ti jo-kan li-shih wen-t’i ti chueh-i’ti wen-t’i ho hui-ta”（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studying the“Resolution on certain historical quest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state”），in Tang-shih hui-i pao-kao-chi，74—174.

鄧力群：“學習《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于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問題和回答”

[1467]Teng Li-ch’ün.“Comments of 11—12 August 1981 on the Resolution of 27 June 1981”，in Tang-ship hui-i pao-kao-chi.

[1468]Tennien，Mark.No secret is safe.New York：Farrar，Straus，＆ Young，1952.

馬克·坦尼恩：《無密可保》

[1469]The T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documents）.Peking：FLP，1973.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

[1470]Terrill，Ross.Flowers on an iron tree：five cities of China.Boston：Little，Brown，1975.

羅斯·特里爾：《鐵樹開花：中國的五個城市》

[1471]Terrill，Ross.Mao：a biography.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1981.

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

[1472]Terrill，Ross.The white-boned demon：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New York：Wiliam Morrow，1984.

羅斯·特里爾：《白骨精：毛澤東夫人傳》

[1473]Thomson，James C.，J 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小詹姆斯·C.湯姆森：《當中國面對西方時：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的美國改革家（1928—1937）》

[1474]Thurston，Anne F.Enemies of the People：the ordeal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Knopf，1987.

安妮·F.瑟斯頓：《人民的敵人》

[1475]Turston，Anne.“Victim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the invisible wounds.”Pacific Affairs，Part Ⅰ，57.4（Winter 1984—1985），599—620；and Part Ⅱ，58.1（Spring 1985），5—27.

安妮·瑟斯頓：“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看不見的創傷”

[1476]Tidrick，Gene，and Chen Jiyuan，eds.China's industrial refor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吉恩·蒂德里克、陳吉元編：《中國的工業改革》

[1477]Tieh Tzu-wei.“Ch’en I tsai‘Wen-hua tak-o-ming’chung”（Ch’en I 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kun-lun，5（September 1985），121—143.

鐵竹偉：“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

[1478]Tien，H.Yuan.China's population struggle：demographic decis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1949—1969.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3.

田心源：《中國的人口戰》

[1479]T’ienAn Men shih-wen chi（Collection of T’ien An Men poems）.Peking：Peking ch’u-pan-she，1979.

《天安門詩文集》

[1480]T’ien Chien.Kan ch’e chuan（The carter's story）.Peking：Chung-kuo jenmin wen-i ts’ung-shu，1949.

田間：《趕車傳》

[1481]T’ien Chien.“T’ieh-ta-jen”（Big iron man）.Shih-k’an，7（1964），4—7.

田間：《鐵大人》

[1482]Tikhvinskii，S.L.Istoriia Kitaia i sovremennost（’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Moscow：Nauka，1976.

S.L.齊赫文斯基：《中國的歷史和現在》

[1483]Times[London].Daily.London：1785—.

《泰晤士報》

[1484]Ting Wang.Chairman Hua：；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0.

丁望：《華主席：中國共產黨的領袖》

[1485]Ting Wang.Wang Hung-wen，Chang Ch’un-ch’iao p’ing-chuan（Biogra phies of Wang Hung-wen and Chang Ch’un-ch’iao）.Hong Kong：Ming-pao yueh-k’an，1977.

丁望：《王洪文、張春橋評傳》

[1486]Ting Wei-chih and Shih Chung-ch’üan“.Ch’ün-chung Lu-hsien shih women tang ti li-shih ching-yen ti tsung-chieh”（The mass line is the sum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our Party）.Wen hsien ho yen-chiu，1983，420—428.

丁偉志、石仲泉：“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

[1487]Tong，Hollington K.Chiang Kai-shek.Taipei：China Publishing CO.，1953.

董顯光：《蔣介石》

[1488]Townsend，James R.The revolutionization of Chinese youth：a study of Chung-kuo Ch’ing-nien.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7.

詹姆斯·R.湯森：《中國青年的革命化：〈中國青年〉研究》

[1489]Trager，Frank N.“Sino-Burmese relations：the end of the Pauk Phaw era.”Orbis，11.4（Winter 1968），1034—1054.

弗蘭克·N.特拉格：“中緬關系：友好時代的結束”

[1490]Treadgold，Donald W.，ed.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

唐納德·W.特瑞德戈德編：《蘇聯與中國的共產主義的異同》

[1491]Tretiak，Daniel.“The Sino-Japanese Treaty of 1978：the Senkaku incident prelude.”Asian Survey，18.12（December 1978），1235—1249.

丹尼爾·特雷蒂亞克：“中日一九七八年條約”

[1492]Truman，Harry S.Memoirs.vol.1：Year of decisions.vol.2：Years of trial and hope.Garden City，N.Y.：Doubleday，1955—1956.

哈里·S.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

[1493]The truth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30 years.Hanoi：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4 October 1979.In FBIS Daily Report：Asia and Pacific，supplement，19 October 1979.

《過去30年越中關系的真相》

[1494]Tsai Mei-hsi.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1949—1974：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蔡美西（音）：《中國當代小說（1949—1974）》

[1495]Tsedenbal，Yu[mjagin].“K Sotsialisticheskomu Obshchestvennomu Stroiu Minuya Kapitalizm”（Toward a socialist social order，by-passing capitalism）.Problemy Dal’nego Vostoka，4（1974），6—29.

澤登巴爾：“越過資本主義朝著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邁進”

[1496]Tso-chuan.Legge's translationT.he Ch’un Tseu with The Tso Chuen，in The Chinese Classics，V.

《左傳》

[1497]Tso-p’in（Literary works）.Monthly.Canton：1954—.

《作品》

[1498]Tsou，Tang.Embroilment over Quemoy：Mao，Chiang and Dulles.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59.

鄒讜：《金門紛爭：毛澤東、蔣介石和杜勒斯》

[1499]Tsou，Tang，ed.China in crisis.Vol.2：China's policies in Asia and America's alternatives.Foreword by Charles U.Dal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鄒讜：《中國在危機中》第2卷：《中國在亞洲的政策和美國的選擇》

[1500]Tsou，Tang.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a historical perspectiv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鄒讜：《從歷史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

[1501]Tsou，Tang.“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CQ，38（April-June 1969），63—91.

鄒讜：“‘文化大革命’與中國的政治制度”

[1502]Tsou，Tang.“Marxism，the Leninist Party，the masses and the citizens in the rebuilding of the Chinese state”，in Stuart R.Schram，ed.，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257—289.

鄒讜：“中國國家重建過程中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黨、群眾和公民”

[1503]Tsu-kuo（The fatherland[China monthly？]）.Monthly.Taipei：1964—.

《祖國》

[1504]Tsu-kuo chou-k’an（China weekly）.Weekly.Taipei：1953—.

《祖國周刊》

[1505]Tsu-kuo hsin-hsing ch’eng-shih（The motherland's new type cities）.Shanghai People's Press Editorial Group.Shanghai：Shanghai Jen-min，1974.

《祖國新型城市》

[1506]Tsurumi，Patricia.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帕特里西亞·楚魯米：《日本在臺灣的殖民教育（1895—1945）》

[1507]Tu P’eng-ch’eng.Tsai ho-p’ing ti jih-tzu li（In days of peace）.Sian：Tung-feng wen-i，1958.

杜鵬程：《在和平的日子里》

[1508]Tu-shu（Reading）.Monthly.Peking：1979—.

《讀書》

[1509]“T’uan-chieh jen-min chan-sheng ti-jen ti ch’iang-ta wu-chi：hsueh-hsi‘Lun Cheng-t'se’（”A powerful weapon to unite the people and defeat the enemy：a study of“On policy”）.Writing Group of the CCP Hopei Provincial Committee.HC，9（2 August 1971），10—17.

“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學習‘論政策’”

[1510]Tung，Chi-ping，and Evans，Humphrey.The thought revolution.London：Leslie Frewin，1967；New York：Coward-McCann，1966.

董志平（音）、漢弗萊·埃文斯：《思想革命》

[1511]Tung-hsiang（The trend）.Monthly.Hong Kong：1978—.

《動向》

[1512]Tung-pei shih-ta hsueh-pao（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東北師大學報》

[1513]T’ung Huai-chou[pseud.]，ed.T’ien-an-men shih-wen chi（Poems from the Gate of Heanenly Peace）.Peking：Jen-min wen-hsueh，1978.

童懷周：《天安門詩文集》

[1514]Turkmenskaya Iskra.Daily.Ashkhabad：Turkmenistan CPCC，Supreme Soviet，and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urkmen SSR.

《土庫曼火花報》

[1515]Twelf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September 1982）.Peking；FLP，1982.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516]Tzul-iao hsuan-pien（Selected materials）.Peking：n.p.，January 1967.

《資料選編》

[1517]Ullman，Morris.Cities of mainland China：1953 and 1958.[Washington，D.C.]：Foreign Manpower Research Office，Bureau of the Census，U.S.Department of Commeree，196 1.

摩里斯·厄爾曼：“大陸中國的城市（1953年和1958年）”

[1518]Ullman，Morris B.“Cities of mainland China：1953—1959”，in Gerald Breese，ed.，The city in newly developing countries，81—103.

摩里斯·厄爾曼：“大陸中國的城市（1953—1959）”

[1519]Unger，Jonathan.Education under Mao：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1960—198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

喬納森·昂格爾：《毛統治下的教育：廣州學校中的階級與競爭（1960—1980）》

[1520]Union Research Institute[URl].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lan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67.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stute，1968.

聯合研究所：《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

[1521]Union Research Institute[URI].Catalogue of Red Guard publicatiohs held by URI.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70.

聯合研究所：《聯合研究所所藏紅衛兵出版物目錄》

[1522]Union Research Institute[URl].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eptember 1956—April 1969.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71.

聯合研究所：《1956年9月—1969年4月的中共中央文件》

[1523]Union Research Service.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55—.

《聯合研究署》

[1524]United Kingdom Regional Information Office for Southeast Asia.Hong Kong Branch.News from Chinese provinclal radio stations.Hong Kong.1960s.Irregular.

聯合王國東南亞地區情報部香港分局：《中國省級廣播站的新聞》

[1525]United Nations.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Annual.Bangkok：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Pacific，1973—C.ontinues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聯合國亞太經社委員會：《亞太統計年鑒》

[1526]United State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ternational trade handbook.Washington.D.C.：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December 1972.

美國中央情報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貿易手冊》

[1527]United State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National Foreign Assessment Center.China：the steel industry in the 1970s and 1980s.Washington，D.C.：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May 1979.

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家對外評估中心：《中國七八十年代的鋼鐵工業》

[1528]United State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ey.National Foreign Assessment Center.Chinese defense spending，1965—1979.Washington，D.C.：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July 1980.

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家對外評估中心：《中國的防務開支（1965—1979）》

[1529]United States Congress（92nd）.Joint Economic Committe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 economic assessment.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

美國國會（第92屆）聯合經濟委員會：《對中國經濟的估價》

[1530]United States Congress（95th）.Joint Economic Committee.The Chinese economy post-Mao.Vol.1：Policy and performance.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

美國國會（第95屆）聯合經濟委員會：《毛以后的中國經濟》

[1531]United States Congress（97th）.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2 vols.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2.

美國國會（第97屆）聯合委員會：《四個現代化下的中國》

[1532]United States Congress（99th）.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Vol.1：The four modernizations.Vol.2：Economic openness in modernizing China.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6.

美國國會（第99屆）聯合經濟委員會：《面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

[1533]U.S.Consulate General.Hong Kong.Current Background.Weekly（approx.）.1950—1977.Cited as CB.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當代背景材料》

[1534]U.S.Consulate General.Hong Kong.Extract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1955—1960.Cited as ECMM.Title Changed to Selection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1960—1977.

《中國大陸雜志集萃》

[1535]U.S.Consulate General.Hong Kong.Selection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1960—1977.Cited as SCMM.Formerly Extracts for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雜志選》

[1536]U.S.Consulate General.Hong Kong.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Daily（approx.）.1950—1977.Cited as SCMP.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

[1537]U.S.Consulate General.Hong Kong.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Supplement.1960—1973.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1538]U.S.Department of State.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Monthly.Washington，D.C.：1922—.

美國國務院：《國務院公報》

[1539]U.S.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Washington，D.C.：1949.Reissued with intro.and index by Lyman Van Slyke as China white paper.2 vol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美國國務院：《美國和中國的關系，尤其是關于1944—1949年時期》（《中國白皮書》）

[1540]United States Government.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See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美國政府聯合出版物研究署

[1541]United States.National Foreign Assessment Center.See United State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美國國家對外評估中心

[1542]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China briefing.Chicago：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1968.

芝加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中國簡況》

[1543]Urban，George，ed.and intro.The miracles of Chairman Mao：a compendium of devotional literature，1966—1970.London：Tom Stacey，1971.

喬治·厄本編：《毛主席的奇跡》

[1544]URI.Union Research Institute.Hong Kong.

香港聯合研究所

[1545]Usack，A.H.，and Batsavage，R.E.“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United States Congress（92nd），Joint Eco-nomic Committe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 economic assessment，335—370.

A.H.尤薩克、R.E.巴特薩維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貿易”

[1546]Van der Kroef，Justus M.“The Sino-Indonesian partnership.”Orbis，8.2（Summer 1964），332-356.

賈斯特斯·M.范·德·克羅夫：“中國—印尼伙伴關系”

[1547]Van der Kroef，Justus M.“Chinese subversion in Burma.”Indian Communist，3（March—June 1970），6—13.

賈斯特斯·M.范·德·克羅夫：“中國在緬甸的顛覆活動”

[1548]Van der Sprenkel，Otto；Guil lain，Robert；and Lindsay，Michael.NewChina：three views.London：Turnstile Press，1950.

奧托·范·德·斯普倫克爾、羅伯特·吉蘭、米切爾·林德賽：《新中國：三家說》

[1549]Van Ginneken，Jaap.The rise and fall of Lin Piao.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6.

雅普·馮·吉內肯：《林彪浮沉錄》

[1550]Van Ness，Peter.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Peking's support for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彼得·范內斯：《革命與中國的對外政策：北京對民族解放戰爭的支持》

[1551]Van Slyke，LymanS.ee U.S.Department of State.

[1552]Vance，Cyrus.Hard choices.New York：Simon ＆.Schuster，1983.

賽勒斯·萬斯：《艱難的選擇》

[1553]Varg，Paul A.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lomats：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1890—1952.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

保羅·A.瓦格：《中國人與外交家》

[1554]Vertzberger，Yaacov Y.I.China's southwestern strategy：encirclement and counterencirclement.New York：Praeger，1985.

亞科夫·Y.I.弗爾茨伯格：《中國的西南戰略：包圍與反包圍》

[1555]Vladimirov，O.，and Ryazantsev，V.Mao Tse-tung：a political portrait.Moscow：Progress，1976.

O.弗拉基米洛夫、V.伊亞贊切夫：《毛澤東：一幅政治肖像》

[1556]Vogel，Ezra F.Canton under communism：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1949—1968.New York：Harper ＆.Row，198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埃茲拉·F.沃格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一個省城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

[1557]Wagner，Rudolf G.Literatur und Politik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Frankfurt：Suhrkamp，198 3.

魯道夫·G.瓦格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和政治》

[1558]Wakeman，Frederic.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e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弗雷德里克·韋克曼：《歷史與愿望：用哲學觀點看毛澤東思想》

[1559]Walder，Andrew G.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8.

安德魯·G.沃爾德：《張春橋與上海“一月風暴”》

[1560]Walder，Andrew G.“The informal dimension of enterprise financial reforms”，in United States Congress.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1.630—645.

安德魯·G.沃爾德：“企業財政改革的日常范圍”

[1561]Walker，Kenneth R.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肯尼思·R.沃克：《中國食用糧食的收購和消費》

[1562]Walker，Richard L.“The human cost of communism in China.”Report to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 of the U.S.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1.

理查德·L.沃克：“人類的代價——共產主義在中國”

[1563]Wan-sui（1967）（1969）.see Mao Tse-tung ssu-hsiangw an-sui.

《毛澤東思想萬歲》

[1564]Wang，James C.F.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1976.

詹姆斯·C.F.王（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帶注解的目錄》

[1565]Wang Jo-shui.“Ts’ung p’i‘tso’tao-hsiang fau-yu ti i-tz’u ko-jen ching-li”

（The experience of one individual of the reversal from criticizing“leftism”to opposing rightism）.Huac-h’iao jih-pao，12—21 March 1989.

王若水：“從批‘左’倒向反右的一次個人經歷”

[1566]Wang Ling-shu.“Ji Dengkui[Chi Teng-k’uei]on Mao zedong.”Liao-wang（Outlook）overseas edition，6—13 February，1989，trans.in FBIS Daily Report：China，14 February 1989，22—26.

王靈書：“紀登奎談毛澤東”

[1567]Wang，Mason Y.H.，ed.Perspectiv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University Ceneter，Mich.：Green River Press，1983.

梅森·Y.H.王編：《當代中國文學中的思想》

[1568]Wang Meng.“Tsu-chih-pu hsin lai ti ch’ing-nien-jen”（The young newcomer to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Jen-min wen-hsueh，9（1956），29—43.

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1569]Wang Nien-i.1949—1989 nien-ti Chung-kuo：ta-tung-luau-ti nien-tai 1949—1989（China from 1949—1989：a decade of great upheaval）.Honan：Honan jen-min，1988.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1570]Wang Nien-i.“Mao Tse-tung t’ung-chih fa-tung‘wen-hua ta-ko-ming'shih tui hsing-shih ti ku-chi”（Comrade Mao Tse-tung's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at the time when he launched the“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in Tangshih yen-chiu tzu-liao，4（1983），766—774.

王年一：“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對形勢的估計”

[1571]Wang Nien-i.“‘Wen-hua to-ko-ming’ts’o-wu fa-chan mai-lo”（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rrors of the“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Tangshih t’ung-hsun，October 1986.

王年一：“‘文化大革命’錯誤發展的脈絡”

[1572]Wang Xizhe.“Mao Zedo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Anita Chan，Stanley Rosen，and Jonathan Unger，eds.，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the Li Yizhe debates，177—260.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1573]Wang Ya-lin and L Chin-jung.“Ch’eng-shih chih-kung chia-wu lao-tung yen-chiu”（Research on the housework of urban workers and employees）.Chung-kuo she-hui k’o-hsueh，1（1982），177—190.

王雅林、李金榮：“城市職工家務勞動研究”

[1574]Washington Post，The.Daily.Washington，D.C.：The Washington Post Co.，1877—.

《華盛頓郵報》

[1575]Watson，Andrew.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order region.Cambridge：Cambrl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安德魯·沃森：《毛澤東與邊境地區的政治經濟》

[1576]Watts，William.See Clough，Ralph N.

[1577]Wehrtechnik，vereinigt mit Wehr and Wirtschaft.Monthly.Monatsschrift für wirtschaftliche Fragen der Verteidigung，Luftfahrt und lndustrie.Boon-Duisdorf：Wehr und Wissen Verlagsgesselschaft gmbh，1969—.

《國防技術》

[1578]“Wei shih-mo yao cheng-feng？”（Why do we want to rectify？）.Editorial.JMJP，2 May 1957.

“為什么要整風？”

[1579]Wei T’ien-ts’ung，ed.Hsiang-t’u wen-hsueh t’ao-lun chi（Collected essays on“native soil”literature）.Taipei：Hsia-ch’ao tsa-chih she，1978.

尉天聰編：《鄉土文學討論集》

[1580]Weiss，Kenneth G.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boat：the U.S.in Sino-Soviet crises.Alexandria，Va.：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December 1982.

肯尼思·G.韋斯：《艦炮里產生的力量：中蘇危機中的美國》

[1581]Wen Chi-tse.“Mao Tse-tung t’ung-chih tsai Yenan shih-ch’i shih tsen-yang chiao-tao wo-men hsueh che-hsueh ti？”（How did Comrade Mao Tse-tung teach us to study philosophy during the Yenan period？），in Ch’üan-kuo Mao Tse-tung che-hsueh ssu-hsiang t’ao-lun hui lun-wen hsuan，68—82.

溫濟澤：“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是怎樣教導我們學哲學的？”

[1582]Wen-hsien ho yen-chiu（Documents and research）.Peking：Chung-yang wen-hsien wen-chiu-shih，1983—.

《文獻和研究》

[1583]Wen-hsueh-pao（Literary gazette）.Weekly.Shanghai：1981—.

《文學報》

[1584]Wen-hsueh p’ing-lun（Literary review）.Bimonthly.Peking：1957—F.ormerly Wen-hsueh yen-chiu.（Literary research）.

《文學評論》

[1585]Wen-hsueh p’ing-lun ts’ung-k’an，10：tang-k’ai tso-chia p’ting-lun chuanhao，10：（Literary review series，10：special issue，critiques of contemporary writers）.Peking：Chung-kuo she-hui k’o-hsueh，1981.

《文學評論叢刊》第10期：“當代作家評論專號”

[1586]Wen-hui pao（Wenhui daily）.Shanghai：1938—.

《文匯報》

[1587]Wen-i hsueh-hsi（Literary studies）.Monthly.Peking：1954—.

《文藝學習》

[1588]Wen-i pao（Literary gazette）.Weekly.Peking：1949—.

《文藝報》

[1589]Wen-i yen-chiu（Research on literature and art）.Monthly.Peking：1979—.

《文藝研究》

[1590]West，Philip.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1916—195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菲力普·韋斯特：《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1916—1952）》

[1591]White，D.Gorddn.“The politics of Hsia-hsiang youth.”CQ，59（July—September 1974），491—517.

D.戈登·懷特：“下鄉青年的政治”

[1592]White，Gordon.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class origin：the c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76.

戈登·懷特：《階級和階級起源的政治：“文化大革命”》

[1593]White，Gordon.Party and professinals：the political role of teach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Armonk，N.Y.：M.E.Sharpe，1981.

戈登·懷特：《黨與專業人員：當代中國教師的政治作用》

[1594]White，Lyun T.，Ⅲ.Careers in Shanghai：the social guidance of personal energies in a developing Chinese city，1949—196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林恩·T.懷特第三：《在上海的經歷：在一個發展中的中國城市里涉及個人能力的社交指南（1949—1966）》

[1595]Whiting，Allen S.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India and Indo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5.

艾倫·S.惠廷：《中國的威懾微積分學：印度和印度支那》

[1596]Whiting，Allen S.Chi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70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艾倫·S.惠廷：《70年代中國的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

[1597]Whiting，Allen S.Siberian development and East Asia：threat or promise？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艾倫·S.惠廷：《西伯利亞的發展與東亞：威脅還是承諾？》

[1598]Whiting，Allen S.China eyes Jap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艾倫·S.惠廷：《中國看日本》

[1599]Whiting，Allen S.“How we almost went to war with China.”Look，33（29 April 1969），76.

艾倫·S.惠廷：“我們是怎樣幾乎與中國開戰的”

[1600]Whiting，Allen S.“The use of force in foreign policy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402（July 1972），55—66.

艾倫·S.惠廷：“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

[1601]Whiting，Allen S.“Sino-American detente.”CQ，82（June 1980），334—341.

艾倫·S.惠廷：“中美緩和”

[1602]Whitson，William W.，with Huang Chen-hsia，The Chinese high command：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1927—1971.New York：Praeger，1973.

威廉·W.惠策恩和黃震遐：《中國的高層指揮：共產黨軍隊政治史（1927—1971）》

[1603]Whyte，Martin King.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馬丁·金·懷特：《中國的小團體與政治儀式》

[1604]Whyte，Martin King.“Town and country in contemporary China.”Comparative Urban Research 10.1（1983），9—20.

馬丁·金·懷特：“當代中國的城鄉”

[1605]Whyte，Martin King，and Parish，William L.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馬丁·金·懷特、威廉·L.帕里什：《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

[1606]Wich，Richard.Sino-Soviet crisis politics：a study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communication.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0.

理查德·威奇：《中蘇危機的政治》

[1607]Willmott，W.E.，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中的經濟組織》

[1608]Wills，Morris.Turncoat：an American's 12 years in Communist China.En 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8.[The story of Morris R.wills as told to J.Robert Moskin.]

莫里斯·威爾斯：《叛徒：一個美國人在共產黨中國的12年》

[1609]Wilson，Amy Auerbacher；Greenblatt，Sidney Leonard：and Wilson，Richard Whittingham，eds.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New York：Praeger，1977.

艾米·奧爾巴徹·威爾遜、西德尼·倫納德·格林布蘭特、理查德·惠廷厄姆·威爾遜編：《中國社會的不正常現象和社會控制》

[1610]Wilson，Dick，ed.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a preliminary assess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ty Press，1977.

迪克·威爾遜編：《在歷史天平上的毛澤東：一個初步評價》

[1611]Wilson Quarterly，5/yr.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l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1976—.

《威爾遜季刊》

[1612]Wilson，Richard W.Learning to be Chinese：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in Taiwa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0.

理查德·W.威爾遜：《學做中國人：臺灣兒童的政治社會化》

[1613]Wilson，Richard W.；Wilson，Amy A.；and Greenblatt，Sidney L.，eds.Val-ue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y.New York：Praeger，1979.

理查德·W.威爾遜、艾米·A.威爾遜、西德尼.L.格林布蘭特編：《中國社會價值的變化》

[1614]Winckler，Edwin A.，and Cady，Janet A.，eds.Urban planning in China：report of the U.S.urban planners delega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ew York：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1980.

埃德溫·A.溫克勒、珍妮特·A.卡迪編：《中國的城市規劃》

[1615]Witke，Roxane.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Little，Brown，1977.

羅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

[1616]Wolf，Arthur P.，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阿瑟·P.沃爾夫編：《中國社會的宗教和儀式》

[1617]Wolf，Arthur P.“Gods，ghosts，and ancestors”，in Arthur P.Wolf，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131—182.

阿瑟·P.沃爾夫：“神、鬼和祖先”

[1618]Wolf，Margery.The house of Lim：a study ofa Chinese farm family.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68.

瑪杰里·沃爾夫：《林家：一個中國農民家庭的研究》

[1619]Wolf，Margery.Revolution postponed：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瑪杰里·沃爾夫：《把革命放在次要地位：當代中國婦女》

[1620]Wolff，Lester L.，and Simon，David L.，eds.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an anlytic compilation with documents on subsequent developments.Jamaica，N.Y.：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United States，1982.

萊斯特·L.沃爾夫、戴維·L.西蒙編：《〈與臺灣關系法〉的立法過程》

[1621]Wong，Christine Pui Wah.“Rural industraliz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lesson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cade”，in United States Congress.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1.394—418.

克里斯廷·汪培華（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業機械化：‘文革’十年得出的教訓”

[1622]Wood，Shirley，A street in China.London：Michael Joseph，1959.

雪莉·伍德：《中國的一條街道》

[1623]Woodside，Alexander.“Peking and Hanoi：anatomy of a revolutionary partnership.”International Journal，24.1（Winter 1968—1969），65—85.

亞歷山大·伍德賽德：《北京和河內》

[1624]World Bank.See Chenery，Hollis.

[1625]World Bank.Papers prepared for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Township Village and Private Enterprise，Peking，November 1987.

世界銀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銀行鄉鎮和私人企業討論會準備的論文

[1626]World Bank.China：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Annex G：Education Sector.World Bank Document（1 June 1981）.Washington，D.C.：World Bank，1981.

世界銀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

[1627]World Bank.China：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vol.1：The economy，statistical system，and basic data.vol.2：The economic sectors：agriculture，industry，energy and transport ande xternal trade and finance.vol.3：The social sectors：population，health，nutrition and education.Washington，D.C.：World Bank，1983.

世界銀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第1卷：《經濟部門：農業、工業、能源和運輸、對外貿易和財政》第3卷：《社會部門：人口、衛生、營養、教育》

[1628]World Economic Herald.See Shih-chieh ching-chi tao-pao.

《世界經濟導報》

[1629]World Policy Journal.Quarterly.New York：World Policy Institute，1983—.

《世界政策雜志》

[1630]World Politics：a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Quarterly.Princeton，N.J.：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8—.

《世界政治：國際關系季刊》

[1631]World Press Review.Monthly.New York：Stanley Foundation，1961—.Formerly Atlas（1961—1972）；Atlas World Press Review（1972—1980）.

《世界報刊評論》

[1632]Wu Chiang.“Pu-tuan ko-ming lun-che pi-hsu shin ch’e-ti ti plen-chang wei-wu lun-che”（A partisan of the theor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must be a thoroughgoing dialectical materialist）.che-hsueh yen chiu，8（1958），25—28.

吳江：“不斷革命論者必須是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

[1633]Wu，Eugene.See MacFarquhar，Roderick.Wu Han.Hai Jui pa kuan（Hai Jui dismissed from office）.Peking：Ch’upan-she，1961.

吳晗：《海瑞罷官》

[1634]Wu Han.“Shen-hua-chü shih pu-shih hsüan-ch’uan mi-hsin？”（Do plays of fairy tales spread superstition？）.Chung-kuo ch’ing-nien，15（1961），9—11.

吳晗：“神話劇是不是宣傳迷信？”

[1635]Wu-han shih ch’eng-shih kuei-hua she-chi yuan（Wuhan City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Academy）.Ch’eng-shih kuei-hua ts’an-k’ao t’u-li（Reference key to urban planning）.Wu-han：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1977.

武漢市城市規劃設計院：“城市規劃參考圖例”

[1636]Wylie，Raymond F.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1935—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雷蒙德·F.懷利：《毛主義的出現：毛澤東、陳伯達和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

[1637]Xiao Lan[Hsiao Lan]，ed.The Tiananmen poems.Peking：FLP，1979.

蕭蘭編：《天安門詩抄》

[1638]Xu Liangying and Fan Dainian.Science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Armonk，N.Y.：M.E.Sharpe，1982.

許良英、范岱年：《中國的科學和社會主義建設》

[1639]Ya-lu chiang（Yulu River）.Monthly.Shenyang：1950—F.ormerly Tung-pei wen-i（Northeast literature and art）.

《鴨綠江》（以前為《東北文藝》）

[1640]Yager，Joseph A.Transforming agriculture in Taiwan：the experience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

約瑟夫·A.亞格爾：《臺灣農業的改革：農村重建聯合委員會的經驗》

[1641]Yahuda，Michael B.China's role in world affair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8.

邁克爾·B.亞胡達：《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

[1642]Yahuda，Michael.Towards the end of isolationism：China's foreign policy after Mao.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3.

邁克爾·B.亞胡達：《孤立主義走向盡頭：毛以后的中國外交政策》

[1643]Yahuda，Michael.“Kremlinology and the Chinese strategic debate，1965—1966.”CQ，49（January-March 1972），32—75.

邁克爾·B..亞胡達：“蘇聯政策研究和中國的戰略爭論（1965—1966）”

[1644]Yalem，R[onald]J.“Tripolarity and world politics.”Yearbook of world affirs，1974，28.23—42.

羅（納德）·J.耶勒姆：“三極與世界政治”

[1645]Yang，C.K.[Ch’ing-k’un]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9.

楊慶堃：《共產主義革命中的中國家庭》

[1646]Yang，C.K.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9.

楊慶堃：《一個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農村》

[1647]Yang，C.K.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

楊慶堃：《中國社會的宗教》

[1648]Yang Ch’ao.Lun Mao Chu-hsi che-hsueh t’i-hsi（On Chairman Mao's philosophical system）.2 vols.Hsi-yang tivch’ü yin-shua-so，1978.

楊超：《論毛主席哲學體系》

[1649]Yang Ch’ao.Wei-wu pien-cheng-fa ti jo-kan li-lunw en-t’i（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Chengtu：Szechwan jen-min，1980.

[Rev.ed.of Lun Mao Chu-hsi che-hsueh t’i-hsi.]

楊超：《唯物辯證法的若干理論問題》

[1650]Yang-ch’eng wan pao（Yang-ch’eng evening news）.Daily.Canton：1957—1966，1980—.

《羊城晚報》

[1651]Yang Kuo-yü et al.，eds.，Liu Teng ta-chūn cheng-chan chi（A record of the great military campaigns of Liu[Po-ch’eng]and Teng[Hsiao-p’ing]）.3 vols，Kunming：Yun-nan jen-min，1984.

楊國宇等編：《劉鄧大軍征戰記》

[1652]Yang，Martin M.C.Socio-economic results of land reform in Taiwan.Honolulu：East-West Center Press，1970.

楊懋春：《臺灣土地改革的社會經濟效益》

[1653]Yang Tung-liang.“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ebate on coastal defense versus land border defense.”KMJP，10 February 1981 in FBIS Daily Report：China，5 March 1981，L3—L7.

楊東梁：“‘海防與塞防之爭’簡析”

[1654]Yao Hsueh-yin.“Tak-’ai ch’ung-hu shuo liang-hua”（Open the window to have a direct talk）.Wen-i pao，7（1957），10—11.

姚雪垠：“打開窗戶說亮話”

[1655]Yao Meng-hsien.“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 Vietnam War.”Issuess＆Studies，1.9（June 1965），1—13.

姚孟賢（音）：“中國共產黨人與越南戰爭”

[1656]Yao Ming-le.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 Biao.Trans.with introduction by Stanley Karnow.New York：knopf，1983.Published in Britain as The conspiracy and murder of Mao's heir.London：Collins，1983.

姚明樂：《林彪的密謀與死亡》

[1657]Yao Wen-yuanO.n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Lin Piao anti-Party clique.Peking：FLP，1975 Also in Raymond Lotta，ed.，And Mao makes 5，196—208.

姚文元：《關于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1658]Yao Wen-yuan.“She-hui-chu-i hsien-shih-chu-i wen-hsueh shih Wu-ch’an chieh-chi ko-ming shih-tai ti hsin wen-hsueh”（Socialist realist literature is the new literature of the age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Jen-min wenhsueh，9（1957），99—112.

姚文元：“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新文學”

[1659]Yao Wen-yuan“.On the new historical play Hai Jui dismissed from office.”Wen—hui，pao，Shanghai，10 November 1965.Reprinted in CFJP，10 November 1965；CB，783（21 March 1966），1—18.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1660]Yearbook ofw orld affairs.Annual.Londo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London：Stevens＆Sons，1947—1984.

《世界事務年鑒》

[1661]Yeh Chien-ying.See“Ying-ssu lu”pien-chi hsiao-tsu.

[1662]Yeh Chien-ying Biographical Writing Group of the Military Science Academy.Yeh Chien-ying chuan-lueh（A brief biography of Yeh Chien-ying）.Peking：Chün—shih k’o-hsueh Yuan，1987.See also Hsueh Yeh-sheng.

軍事科學院葉劍英傳記寫作組：《葉劍英傳略》

[1663]Yeh Wei-lien，ed.Chungk-uo hsien-tai tso-chia lun（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Taipei：Lien-ching，1976.

葉維廉編：《中國現代作家論》

[1664]Yeh Yung-lieh.Chang Ch’un-ch’iao fu-ch’en shih（The history of Chang Ch’un-ch’iao's rise and fall）.Chang chun：shih-tai wen-i，1988.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史》

[1665]Yen Ching-t’ang.“Chung-yang chün-wei yen-ko kai-k’uang”（Surve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in Chu Ch’engchia，ed.，Chung-kung tang-shih yen-chiu lun-wen hsuan，hsia，567—587.

閻景堂：“中央軍委沿革概況”

[1666]Yen Fang-ming and Wang Ya-p’ing.“Ch’i-shih nien-tai ch’u-ch’i wo-kuo ching-chi chien-she ti mao-chin chi ch’i t’iao-cheng”（The blind advance in our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1970s and its correction）.Tang-shih yen-chiu，5（1985），55—60.

閻放鳴、王亞平：“七十年代初期我國經濟建設的冒進及其調整”

[1667]Yen，MariaT.he umbrella garden：a picture of student life in red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54.

瑪麗亞·嚴（音）：《宏大的園地：紅色中國學生生活寫照》

[1668]Yen Yuan-shu.Tan min-tsu wen-hsueh（On national literature）.Taipei：Hsueh-sheng，1973.

顏元叔：《談民族文學》

[1669]Ying，Esther Cheo.See Cheo Ying，Esther.“Ying-ssu lu”pien-chi hsiao-tsu.Ying-ssu lu：huai-nien Yeh Chien-ying（A record of contemplation：remembering Yeh Chien-ying）.Peking：Jen-min，1987.Cited as Ying-ssu lu.

《縈思錄》編輯小組：《縈思錄：懷念葉劍英》

[1670]Yu，George T.“Sino-African relations：a survey.”Asian Survey，5.7（July 1965），321—332.

喬治·T.于（音）：“中國同非洲的關系概覽”

[1671]Yu Shiao-ling.“Voice of protest：political poetry in the post-Mao era.”CQ，96（December 1983），703—720.

余曉玲（音）：“抗議之聲：毛時代以后的政治詩”

[1672]Yu-Shih wen-i（Young lion literature and art）.Monthly.Taipei.

《幼獅文藝》

[1673]Yü Ch’iu-li.“Report on the 1979 draft national economic plan.”JMJP，29 June 1979，1，3.

余秋里：“關于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

[1674]Yü Kuang-chung.Lien ti lien-hsiang（Associations of the lotus）.Taipei：Wen-hsiang shu-tien，1964.

余光中：《蓮的聯想》

[1675]Yü Nan.“Chou tsung-li ch’u-chih‘9.13’Lin Piao p’an-t’ao shih-chien ti ihsieh ch’ing-k’uang”（Some of the circumstances regarding Premier Chou's mangement of the 13 September incident when Lin Piao committed teachery and fled）.Tang-shih yen-chiu，3（1981），59.

于南：“周總理處置‘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況”

[1676]Yuan Ssu.“Bankruptcy of Empress Lü's dream.”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12.2（Winter 1978—1979），66—73.

袁思（音）：“呂后夢的破滅”

[1677]Yue Daiyun，and Wakeman，Carolyn.To the storm：the odyssey of ar 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樂黛云、卡羅林·韋克曼：《走進暴風雨：奧德賽——一位中國革命婦女》

[1678]Yun-nan she-hui k’o-hsueh（Yunnan social sciences）.Bimonthly.Kun-ming：1981—.

《云南社會科學》

[1679]Zagoria，Donald S.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New York：Atheneum，1964；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唐納德·S.扎戈里亞：《中蘇沖突（1956—1961）》

[1680]Zagoria，Donald S.Vietnam triangle：Moscow/Peking/Hanoi.New York：Western Publishing，Pegasus，1967.

唐納德·S.扎戈里亞：《越南的三角關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內》

[1681]Zagoria，Donald S.，ed.Soviet policy in East Asi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唐納德·S.扎戈里亞編：《蘇聯在東亞的政策》

[1682]Zagoria，Donald S.“Moscow，Peking，Washington，and the War in Vietnam”，in Allan A.Spitz，ed.，Contemporary China，14—20.

唐納德·S.扎戈里亞：“莫斯科、北京、華盛頓與越南的戰爭”

[1683]Zagoria，Donald S.，and Kim，Young Kun.“North Korea and the major powers”，in William J.Barnds，ed.，The twoK oreas in East Asian affairs，19—59.

唐納德·S.扎戈里亞、金永昆（音）：“北朝鮮與大國”

[1684]Zagoria，Donald.“The strategic debate in Peking”，in Tang Tsou，ed.，Ch ina in crisis，2.237—268.

唐納德·S.扎戈里亞：“北京的戰略爭論”

[1685]Zagoria，Donald S.，and Ra’anan，Uri.“On Kremlinology；a reply to Michael Yahuda.”CQ，50（April-June 1972），343—350.

唐納德·S.扎戈里亞、尤里·拉阿南：“論蘇聯政策研究——答邁克爾·亞胡達”

[1686]Zanegin，B.；Mironov，A.；and Mikhailov，la.K sobitiiam v Kitae（On developments in China）.Moscow：Politizdat，196 7.

B.扎尼津、A.·米洛諾夫、伊亞·米哈伊洛夫：《論中國的發展》

[1687]Zhelokhovtsev，Aleksei Nikolaevich.[Schelochowzew，A.N.]Chinesishe Kulturevolution aus der Nähe.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9.

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澤羅克霍夫契夫：《中國“文化大革命”探微》

[1688]Zhelokhovtsev，A.“Kul’turnaya revolitusiya”s blizkogo rasstoyaniya（zapiski ochevidtsa）.Moscow：Politizdat，1973.Originally published as a three-part article in Novyi Mir，44.1，2，3（January.February，March 1968）.Published in English as The“Cultural Revolution”：a close-up（An eyewitness account）.Moscow：Progress，1975.

澤羅克霍夫契夫：“文化大革命”

[1689]Zhou Enlai.See Chou En-lai.

[1690]Zhou Jin.“Housing China's 900 million people.”Beijing Review，48（1979），17—27.

周金（音）：“九億人民的住房”

[1691]Zinoviev，Alexander[Aleksandr].The radiant future.Trans.Gordon Clough.London：Bodley Head，1981；New York：Random House，1980.

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光輝前程》

[1692]Zweig，David.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1968—198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戴維·茲威格：《中國農村的激進主義（1968—1981）》

[1693]Zweig，David.“Opposition to change in rural China：the system of responsibility and people's communes.”Asian Survey，23.7（July 1983），879—900.

戴維·茲威格：“中國農村改革的阻力：責任制與人民公社”

[1694]Zweig，David.“Strategi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policy‘winds’and brigade accounting in rural China，1966—1978.”World Politics，37.2（January 1985），267—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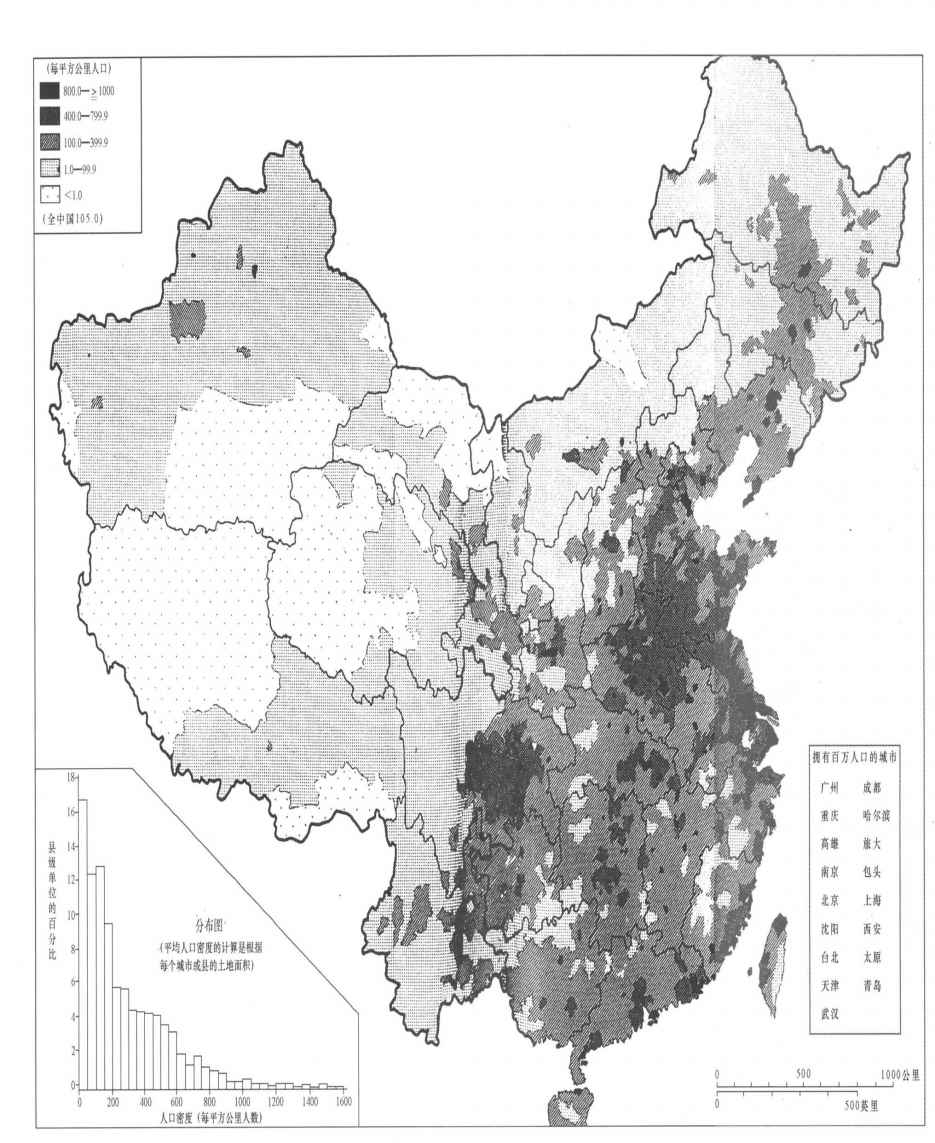
戴維·茲威格：“政策執行策略：中國農村政策‘風’和大隊核算（1966—1978）”

# 重印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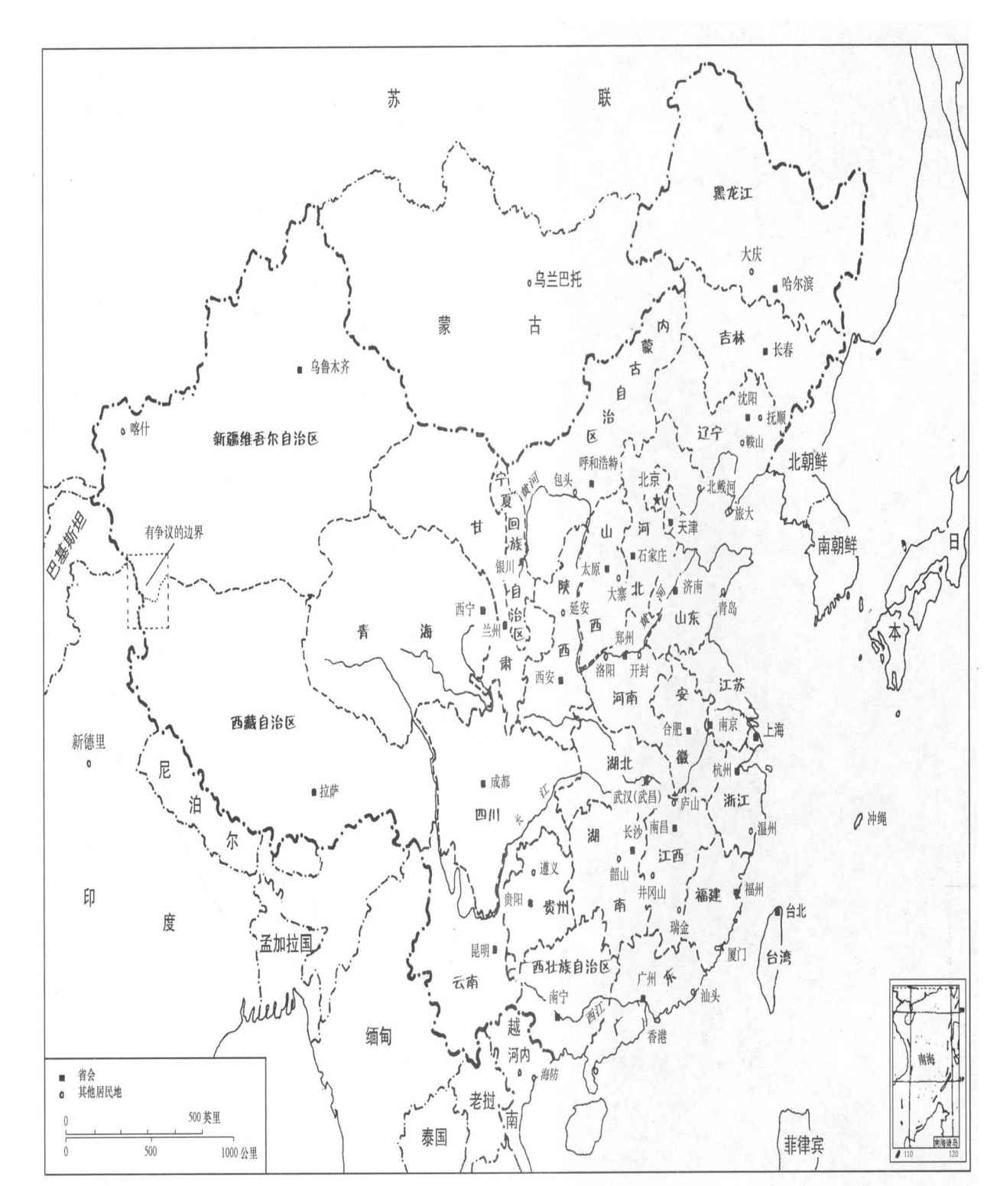
1992年我們出版了《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一書的中譯本，當時由于時間倉促，共有五十余人參加了該書的翻譯、校對、引文核查及統稿工作。雖然做了很大努力，但事后發現譯稿中還是存在一些錯譯、漏譯或譯文不恰當等不盡人意之處。此次重印，我們特請李殿昌先生對全書重新進行了校訂。對于李先生認真、細致的工作我們表示忠心的感謝；也要感謝李先生的妻子張曉華女士，她協助李先生做了大量工作；還要感謝孟慶龍和俞金堯先生，他們不僅參加翻譯，而且做了大量組織和統稿工作；最后還要感謝所有譯者及相關人士，他們的辛勤勞動和大力支持使該書得以順利出版和重印。

編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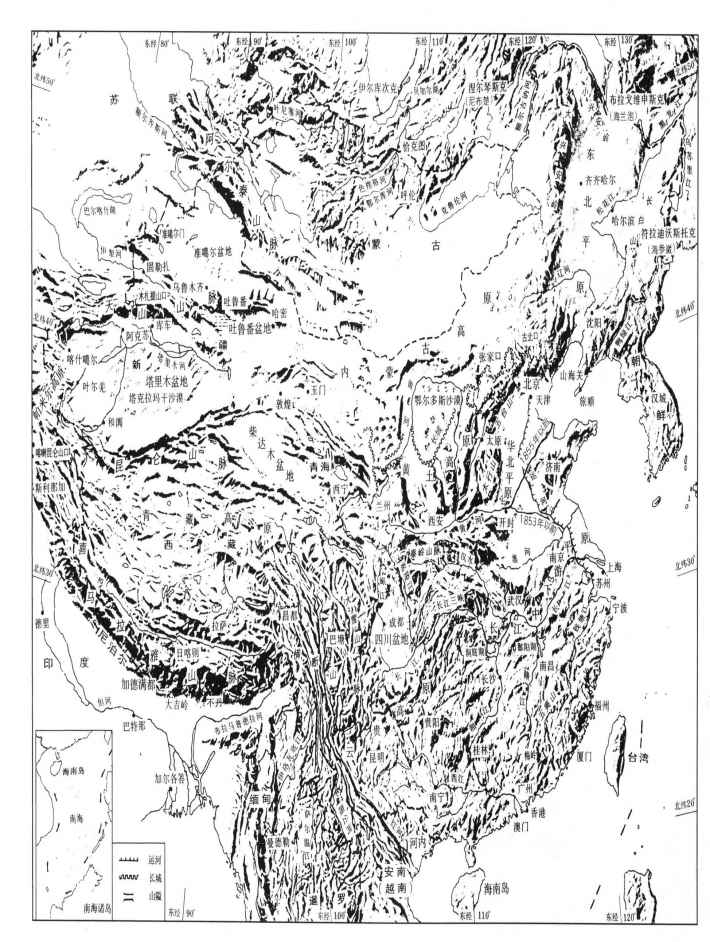
2006年10月



地圖6 人口



地圖2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地圖



地圖1 中國地形